全 球 畅 销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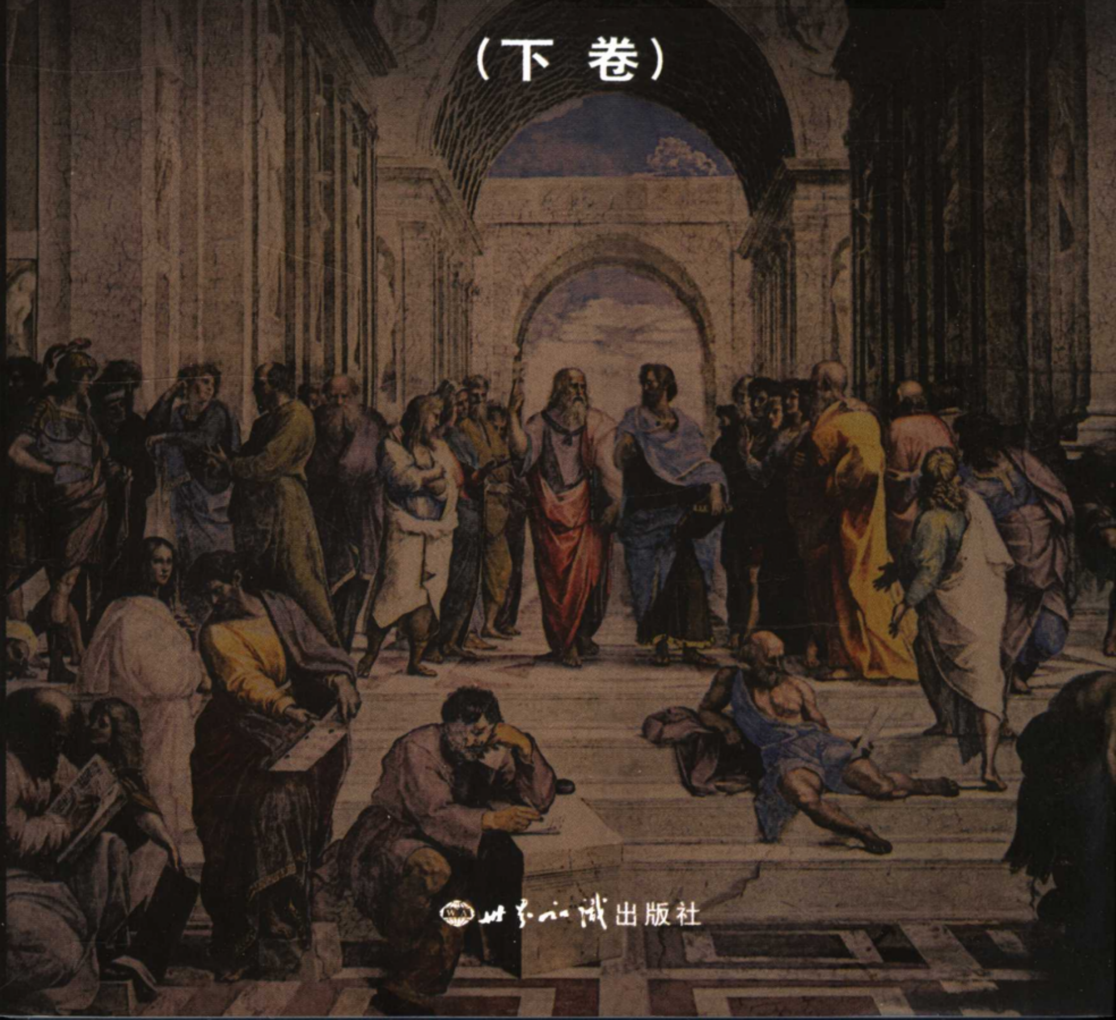
NORMAN DAVIES

欧洲史

[英] 诺曼·戴维斯 著
郭 方 刘北成 等译

EUROPE A HISTORY

(下 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由一双眼睛观察、一个大脑过滤、一支笔写就的“一部欧洲所有部分、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的总体史”。

欧洲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从史前到当代的百科全书，融权威性和可读性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欧洲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不是探索一个简单的歌剧脚本，而是力图重现一个复杂的总乐谱，还有它包含的一切杂音，以及它本身无法仿效的交流密码。

从冰河时代到冷战时期，从雷克雅未克到伏尔加，从米诺斯到玛格丽特·撒切尔，诺曼·戴维斯在本著作中讲述了整个欧洲的历史，他选取了欧洲大陆经历过的十个最具理想的历史时期作为本书的时间主线。

“同时具有高质量和重要意义的书是不多见的。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就是其中之一。本书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它是以惊人的才智、明晰的语言和令人敬畏的知识广度写就的。……这是一部人人都应该阅读的巨著。”——A. C. 格雷林，《金融时报》

“一本伟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伟大之处在于其中充满了惊奇和情感……对历史上很多非常敏感的事件都给出了一流的评论。”——珍·莫里斯，《独立报》

“一部包罗万象、没有恭维、挑战阅读神经的著作。”——迈克尔·伯利，《星期日独立报》

“恢宏的、史诗般的巨著……戴维斯之后，将再也不可能用传统方式书写欧洲历史了。”——《伦敦书评》

“它满载着学识，充盈着常识，闪耀着智慧，洋溢着出色的评判。”——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星期日泰晤士报》

“不朽的、权威性的……一本探询所有时代的思想意识，回答众多的探询，并将激起更多探询的著作。”——诺埃尔·马尔科姆，《星期日电讯报》

“伟大的著作之一……它值得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泰晤士报》

“没有一部用英文写的欧洲史著作能像本书这样，如此公正地对待欧洲东部和欧洲西部……鲜明的特色，生动的细节，犀利的观点，令人信服的分析，所有的一切造就了这部一流的读物。”——《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ISBN 978-7-5012-3077-8

9 787501 230778 >

ISBN 978-7-5012-3077-8/K · 503

定价：129.00元（上、下卷）

欧洲史

（下卷）

［英］诺曼·戴维斯　著
郭　方　刘北成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史／（英）戴维斯著；郭方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
书名原文：Europe：A History
ISBN 978-7-5012-3077-8

Ⅰ.欧...　Ⅱ.①戴...②郭...　Ⅲ.欧洲—历史
Ⅳ.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9409 号

图　字：01-2005-6236

策划编辑　王　立　张光勤
责任编辑　侯奕萌　阮中强　王瑞晴
文字编辑　傅立刚　杨志芬　赵雅雯　周明晟　田　非　陈　平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余　岚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欧洲史（下卷）
　　　　　Ouzhou Shi（Xiajuan）
作　　者　［英］诺曼·戴维斯
译　　者　郭　方　刘北成　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购书热线　（010）65265919　（010）65233645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70×640 毫米　1/16　53¼印张　8 插页
字　　数　941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29.00 元（上、下卷）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从冰河时代延伸到原子时代的历史类精品著作，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表现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整体史印象。本书以时间为主线由快到慢逐渐推进，第1章覆盖了长达百万年的史前时期，而在最后一章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本书出版当年为止的46年间的历史。

诺曼·戴维斯捕获了所有的历史事件：罗马的崛起与衰落，阿拉里克人和阿蒂拉人的大举侵略，诺曼征服，罗马教廷的权力斗争，文艺复兴和改革，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以及它因陷入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这是第一部给予欧洲东部和欧洲西部同等分量的欧洲史。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内容的选择、重新安排和表现方式，它把传统的叙述体与独特的特写结合在一起，使鲜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跃然纸上：299个讲述各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概要介绍"（知识窗）散布于整部书，介绍的论题跨越了各章的界限，描绘了各种奇特的事物和思想，这些通常是过于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忽略的；12幅"快照"从最佳视点俯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欧洲的全景，如同对时间推进和领土扩张的迅猛进程叫一声暂停，帮助读者松一口气并审视这些重大历史变革，并如棱镜折射出欧洲历史丰富多样的变化；100幅地图和图表、72幅图片覆盖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所有这些说明，戴维斯的《欧洲史》是近几年出版的最具价值、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读物之一。

作者在牛津大学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参考了牛津大学图书馆丰富而古老的资料，同时也得到了哈佛大学乌克兰语研究所和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帮助。

原著第一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被译成几十种语言。本书根据1997年Pilmlico公司出版的修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聊城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翻译而成。

NORMAN DAVIES



作者简介

诺曼·戴维斯 1939年生于英格兰。曾获波兰克拉科夫大学博士学位，原伦敦大学东欧斯拉夫学院教授，在伦敦大学执教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欧与东欧史。现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研究员、教授。

主要著作：

《起义在1944年：华沙之战》(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被《纽约时报》评为2004年度100本最畅销书之一。

《上帝的操场：波兰史》(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欧洲的心脏：与波兰当代有关的历史》(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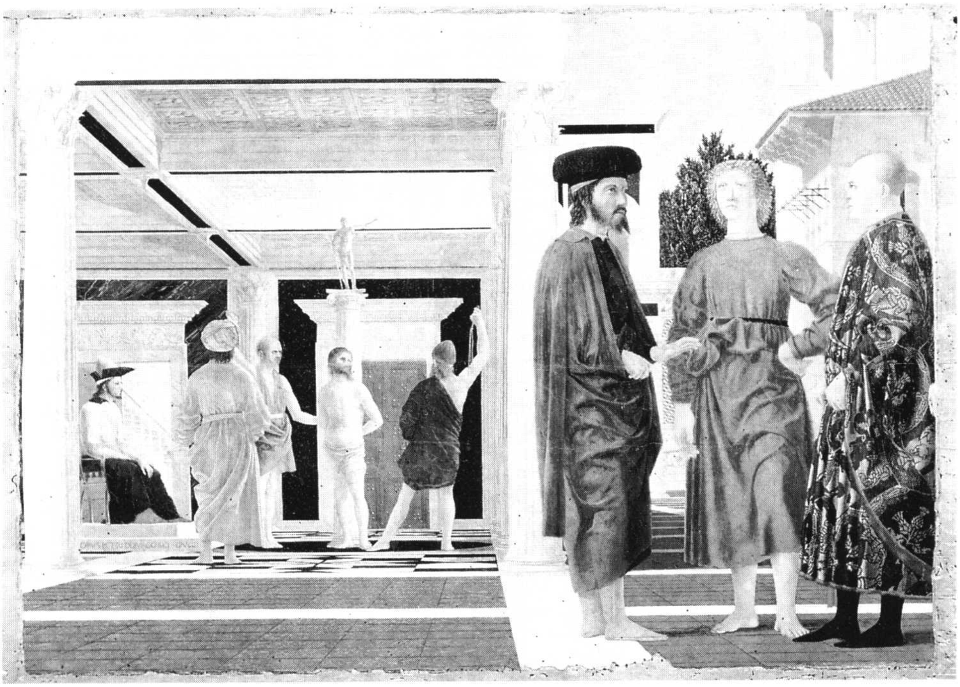
《不列颠群岛：一部历史》(The Isles: A History)

《微观世界：一个中欧城市的肖像》(Microcosm: Portrait of a Central European City)

责任编辑：侯奕萌　阮中强　王瑞晴
封面设计：小　月


PELLE · CVPIDINEOS · TOTO
NE · TVA · POSSIDEAT
CONAMINE · LVXVS
PECTORA · CECA

38. 维纳斯



39．透视法



40．寓言



41．哥伦布在圣多明戈登陆，14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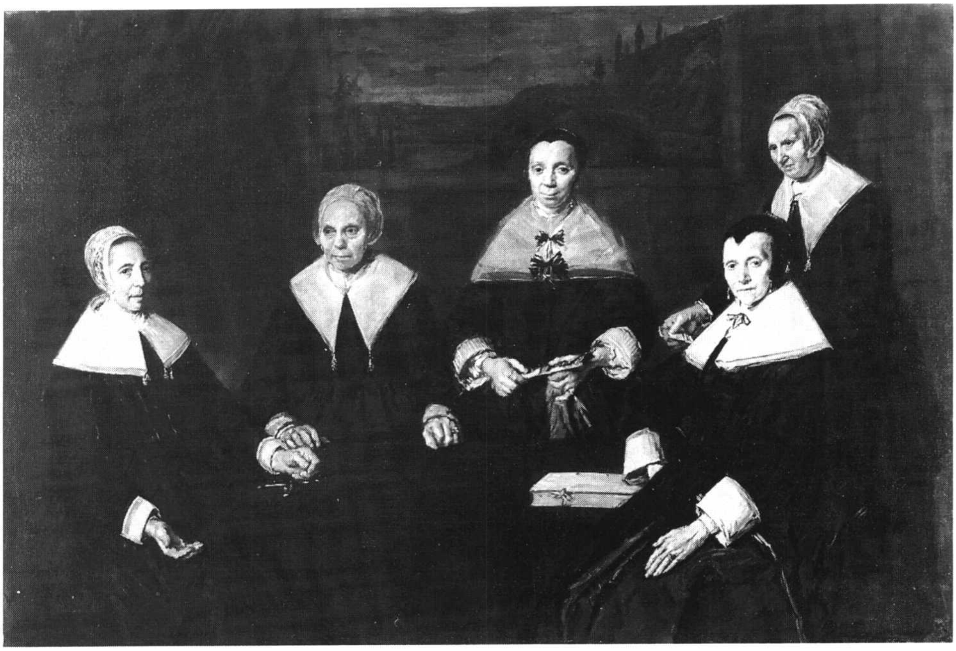
42．路德进入沃尔姆斯，1521年



43．帝国之梦



44．逝去光荣的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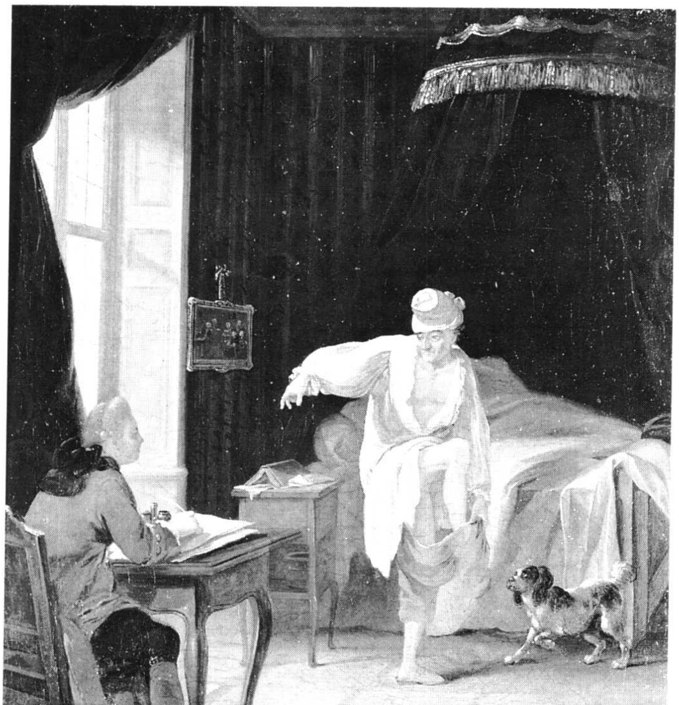
45．理事会



46．莫斯科的假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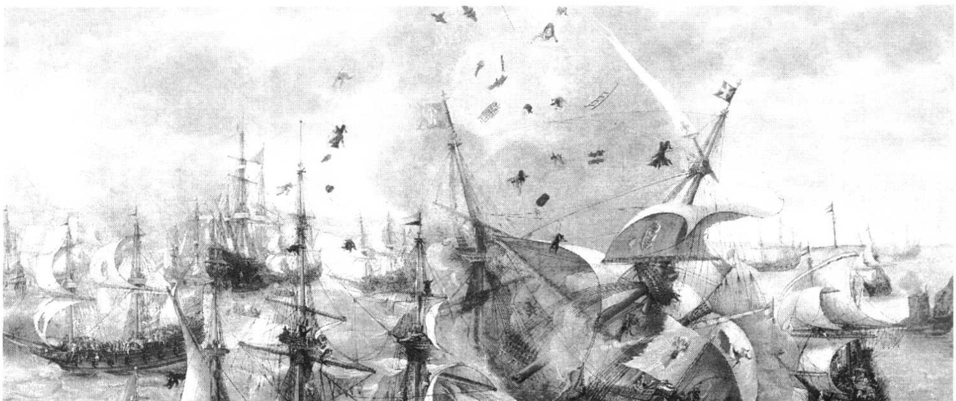
47．作为一家之父的太阳王



48．不穿裤子的哲学家



49．大陆的主人



50．海洋的霸主



51．穿粉红衣的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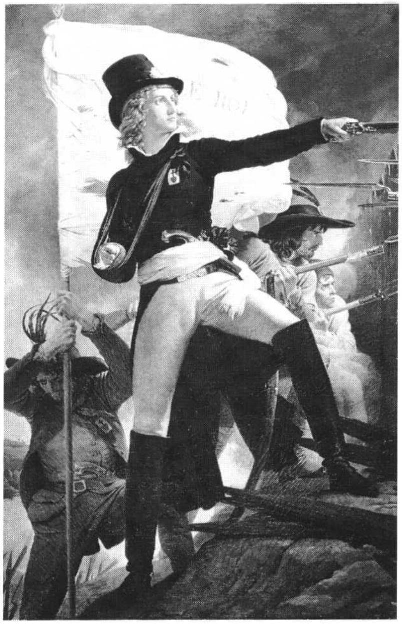
52．读者与听者



53．母亲



54．夏天



55．保皇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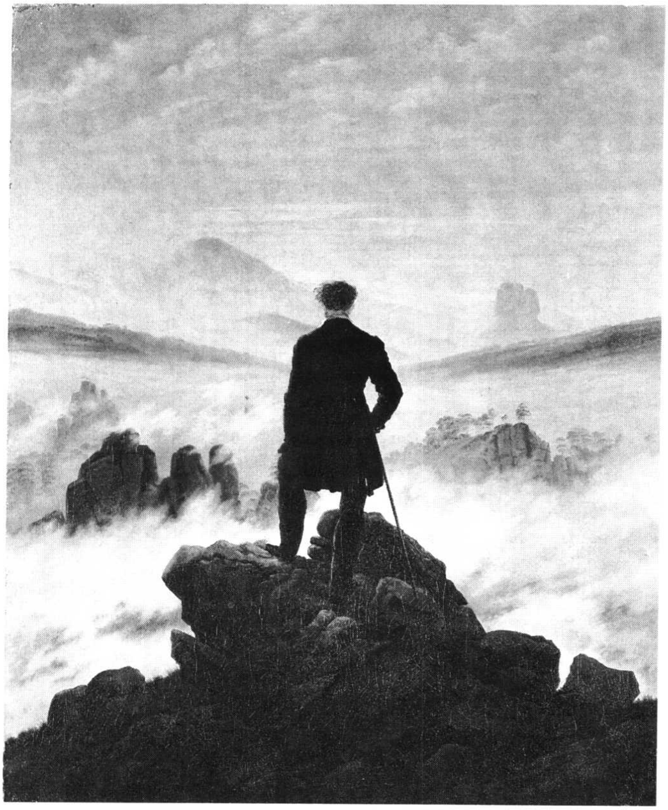
56．共和派



57．儿童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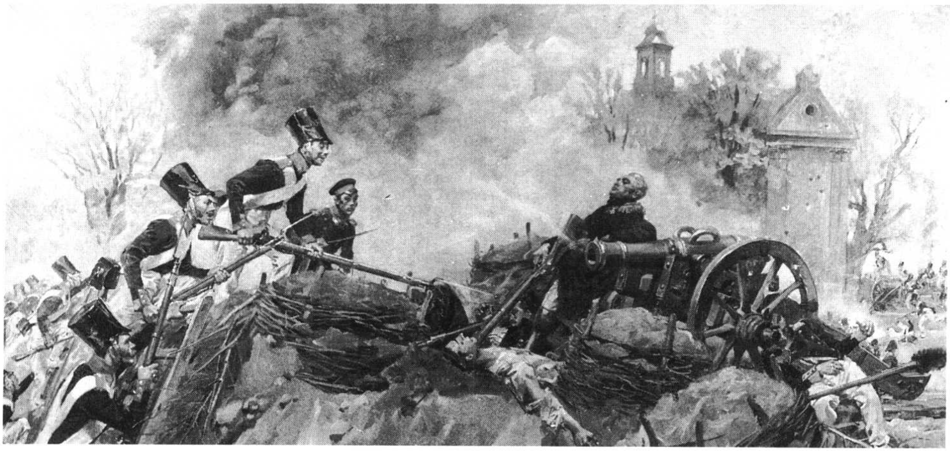
58．穿闪亮铠甲的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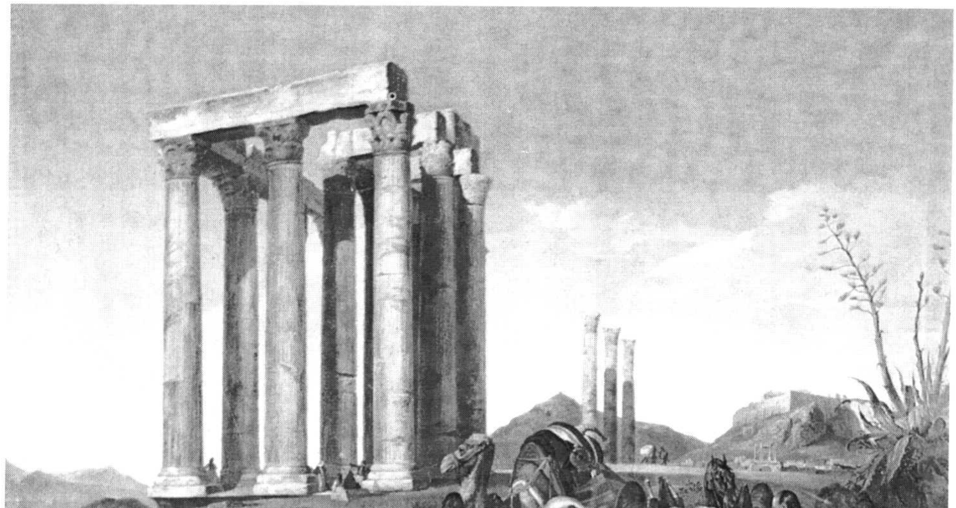
59. 永久的流浪者



60. 发电机



61．决不投降



62．自由的希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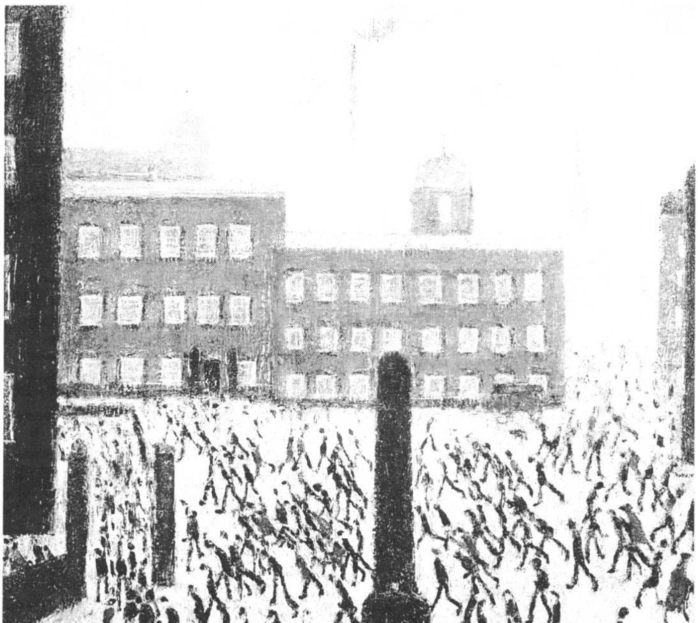
63．音乐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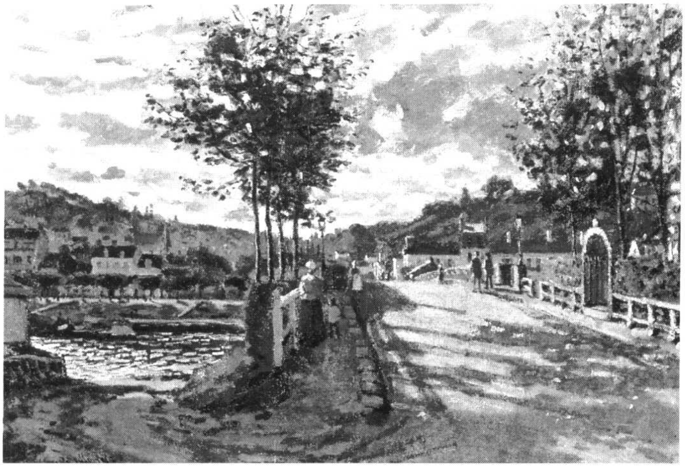
64．欧洲的协调



65．农村的穷困



66．工业的罪恶



67．印象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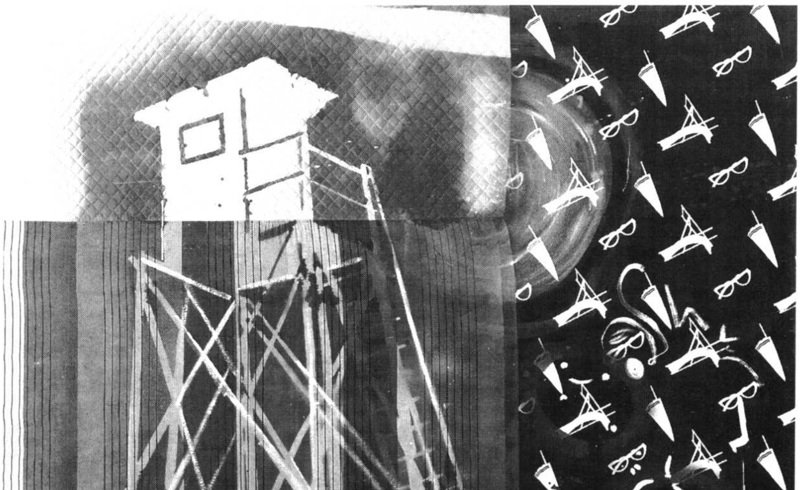
68．原始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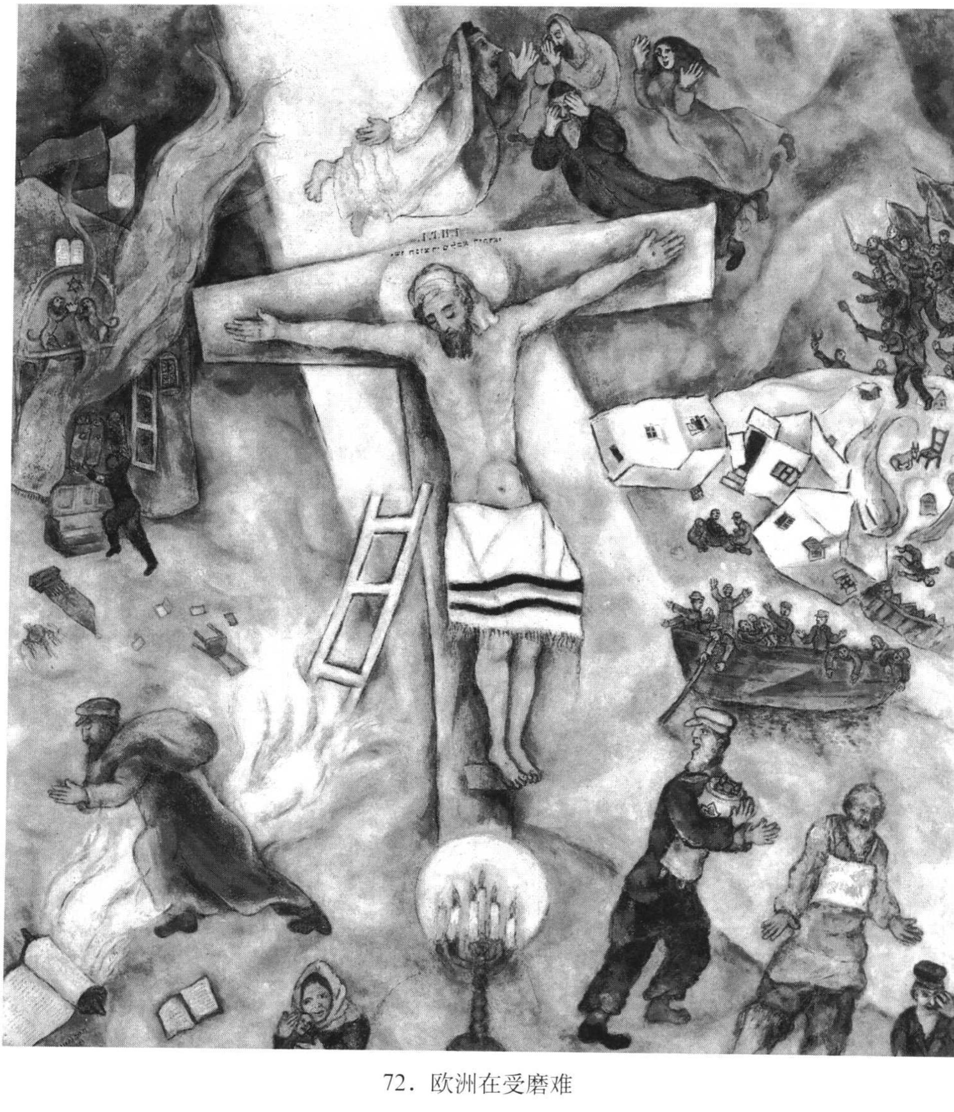
69．超现实派



70．欧洲被欺骗



71．欧洲被分裂



72. 欧洲在受磨难

目　录

（上　卷）

（下 卷）

地 图 目 录

第8章

启　蒙

启蒙运动与专制主义，约1650—1789年

现在有一种贬低所谓“理性时代”的幼稚论。在回顾这段历史[577]时，人们觉得有一点似乎很不寻常，即欧洲众多的大思想家竟忽略了人类其他所有能力，而单单对人类的一种能力——理性——给予如此的重视。有人会得出结论说，如此之幼稚必遭挫折，而理性时代最终所遭遇的挫折是以恐怖的革命年代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在此前和此后的时期中，理性的优点都未受到如此的重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在目睹父王的鬼魂时，告诉他心存怀疑的同伴：“霍拉旭，天地之间事物之多，是你的哲学做梦也想不到的。”而到了十九世纪，理性主义又成为昨日黄花：

> 启蒙……2. 肤浅虚妄的重智主义，对权威和传统的无理蔑视等；尤用于指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的精神和目的。(1865年)[1]

另一方面，在评价宗教改革以后的时期时，必须记住欧洲长久以来一直在与什么抗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承诺的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协调一致没有取胜，世界依然充斥着宗教教条、魔法、迷信。在宗教战争之后，人们可以看到，“甜蜜理性之光”的照耀乃是一种自然而必要的解毒剂。事实上，偏执教条根深蒂固，就连启蒙运动整个洪流也只是冲刷了它的表面。

政治史研究者们把这一时期称做“专制主义时代”，这一标签也

存在类似的问题。它很容易使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当时欧洲大多数统治者享有绝对的权力，或至少追求绝对权力。不，事实并非如此。专制主义时代的欧洲人既不是清一色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清一色的专制主义者。

[578]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法国大革命之间的一个半世纪中，欧洲地图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每场战争的结束都伴随着领土交易。尤其是乌得勒支和约（1713 年），还引起了一场纷争；而第一次对波兰—立陶宛的瓜分（1773 年）则标志着一场浩劫的开始。大不列颠列岛的统一（1707 年）预示着一个新的重要单位的出现。但地图上的主要国家基本保持不变。法国向莱茵河地区扩张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普鲁士不得不安于相对不高的收益；奥斯曼的最后一次大冲刺受到遏制并被逆转；俄国成为惟一一个急剧扩展的国家。欧洲的老弱病残没有一个真正消亡的：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瑞典、波兰—立陶宛都虚弱不堪，却都存留下来。

各种政治体系林立繁复，大多数教科书都难以详述（见原书附录Ⅲ，第 1265 页）。在这个“专制主义时代”，专制主义国家实际上只占少数。一端是完全分权、立宪、共和的瑞士联邦，另一端是极端专制独裁的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和教皇国，居中的国家则类型繁多。欧洲共和制的代表是威尼斯、波兰—立陶宛和联省共和国（荷兰）；立宪君主制在各时期的代表分别是英国、苏格兰和瑞典；绝对君主制以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为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既是选举产生的，又是世袭的，介于共和制和立宪君主制之间。普鲁士的宪政结构则根据一种独裁传统来运作，介于立宪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欧洲的成百上千的小国——小皮特（younger Pitt）曾恼火地称之为“一群蚊蚋”——类型就更多了：有微型城邦共和国，如拉古萨（Ragusa，位于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热那亚，日内瓦；有微型公国，如库尔兰（Courland）；有教皇国，如阿维尼翁（Avignon）；还有奇特的混合型国，如安道尔（Andorra）。

此外，许多欧洲国家仍是聚合型的。统治者在领土的各个组成部分上用不同的系统统治。普鲁士国王在柏林有一套举止规范，他们在那里是帝国臣属；在柯尼斯堡又有另一套规范，他们在那里完全独立；在诸如明登、纳沙泰尔等属地又有别的规范。哈布斯堡王室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只享有虚位，在布拉格和维也纳却是专制君主，在1713 年之后的布鲁塞尔则是立宪君主。不列颠国王在本土是立宪君

主，在殖民地则是独裁君主。

政体在不同时期也有重大的变化。譬如英国，在克伦威尔时期是共和体制，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又变为君主制，在 1688—1689 年的“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又回到备受推崇的中间道路上。十七世纪晚期，瑞典和丹麦的君主制都迅速转向绝对君主制。十八世纪，瑞典的“礼帽派”和“便帽派”针锋相对。在扬·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1674—1696 年在位）的统治之下，波兰一立陶宛仍根据贵族民主制的规则来统治。1717 年之后，它只能作为俄罗斯的保护国而存在。俄[579]罗斯国内，沙皇是理所当然的专制独裁统治者，他在波兰却扮作是“金色自由”的支持者。外表和简单的归类往往具有欺骗性。

对于专制主义，我们尤其要全面考虑。它在程度上轻于沙皇和苏丹的独裁——后者在贯彻个人意志时没有任何制度阻碍，但又甚于权威主义精神——某些君主就凭这种精神效仿普鲁士，去压制本来可以合作的机构制度。显然，专制主义起源于封建时代后期（当时处境艰难的君主们不得不与外省和贵族的根深蒂固的特权作斗争），还起源于天主教世界（当时罗马教会不受直接的政治控制）。但它不一定适合新教和东正教世界。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在不同阶段无疑属于专制主义国家范畴。由于种种原因，英国、普鲁士、波兰一立陶宛和俄罗斯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应该强调的是，专制主义更多的是指一种政府理想，而不是实际的政治现实状况。它涉及一系列为了纠正中世纪晚期残留下来的过分分权体制而形成的政治理念和设想。它常常对某些君主的“个人权力”表示赞同，而不赞成另外一些君主的“有限权力”——这些君主的权威受到议会、自治省、城市自治宪章、享有豁免权的贵族和教士的制约。很难给专制主义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对它的肯定往往出自廷臣们的赞颂，而不是哲学家们的详尽论证。专制主义有许多诸如波舒埃（Bossuet）或布瓦洛（Boileau）之类的赞颂者，却只有一个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来论证它。也许像托斯卡纳（Tucany）这样的小国比大国更能体现专制主义精神。在任何地方专制主义都未获得彻底的胜利：从未产生过一个完全专制主义的国家。但在十六、十七世纪，它的确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激进力量。十八世纪，当它的影响变得更为广泛之时，它却为追求民主、自由、公意的新潮流所取代。“开明专制”时代也是英美立宪主义时代。

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对“专制主义”的大呼小叫往往是一种误

解。当英国乡绅抱怨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时，真正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不是国王和议会之间实际上的权力均衡，而是担心国王会强制推行法国和西班牙的做法。当波兰贵族尖锐批评他们的萨克森国王的“专制主义”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反对改革。因为实际上萨克森国王在波兰—立陶宛比其他有限君主制国家的君主所受的限制更多。

法国的专制主义可作为主要的参照物。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时期最长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法国显然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激起无数人的仰慕。但这位最伟大的绝对君主抱憾而死，因为他终于相信这个理想无法实现。

[580] 因而，专制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路易十四创立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以灾难性的革命而告终。这场革命在把法国变为共和主义使徒的同时，也把法国的至尊霸权带向了终点。专制主义最为顽强的反对者们将享有这一最后的胜利。英国的立宪主义不仅鼓舞了十九世纪的主要强国，同时也影响了反叛英国的殖民地（指美国——译者注）的宪法，从而影响到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

1650年后，欧洲的殖民地和海外属地继续扩大，有些地方已经具有了独立的能力。西班牙、葡萄牙全力开发现有的属地。在北美，西班牙人深入大陆腹地，从新西班牙（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在南美，他们借助于耶稣会有组织的殖民活动，致力于开发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波哥大）、秘鲁、巴拉圭和拉普拉塔（科尔多瓦）。他们企图让自己的商船垄断贸易，直到1713年的贩奴合同（西班牙根据乌得勒支条约与英国签订的最后一个合同——译者注）迫使他们允许外国商人参与。荷兰人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想要夺取巴西海岸，但最终葡萄牙人还是挺了过来。1662年条约之后，葡萄牙人从圣保罗南下到达普拉特河流域（1680年），并向西进入富含金矿的米纳斯吉拉斯（1693年）和马托格罗索。除了东印度群岛之外，荷兰还保有了圭亚那和库拉索岛的殖民地。俄罗斯人1648年发现了后来被称做白令海峡的地方，1679年占领了勘察加，并与中国在阿穆尔河（黑龙江）签订了边界条约。一个世纪之后，继丹麦人维特斯·白令（Vitus Bering，1680—1741年）的探险活动之后，俄罗斯人在科迪亚克岛上建立了要塞（1783年），并宣称拥有阿拉斯加（1791年）。他们从那里派遣小分队到达北加利福尼亚的罗斯堡

(Fort Ross)(1812年)。

但大多数的殖民地事业是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发起的。法国1664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东海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和卡拉科尔(Karaikal)建立了商站,并在马达加斯加岛和留尼汪岛上设有驿站。1682年,法国人在密西西比河上建立了殖民地,为了彰显路易十四的声威,命名为路易斯安那,首府为新奥尔良。由于特拉华(1682年)、贵格派的宾夕法尼亚(1683年)和佐治亚(1733年)等殖民地的建立,英国巩固了它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但也受到了来自法国的强大竞争压力。商业利益与海上发现是紧密联系的。继法国海军上将布干维尔(Bougainville)1766—1768年的环球航行之后,皇家海军上校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于1768—1780年间三次远航探险。在这种情况下,法英之间的殖民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英国靠着强大的海军力量来解决这些冲突。1713年大不列颠获得了纽芬兰,1757年夺取了法属印度,1759—1760年又得到了法属加拿大,从而巩固了它作为头号殖民强国的地位。

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些最先从事殖民活动的海上国家。德意志诸国、奥地利、意大利诸国都没有参与进来。因而在这一点上它们落后于波兰采邑库尔兰和丹麦。库尔兰公爵1645年购买了[581]多巴哥,还在冈比亚短期保有了一个商站;丹麦的西印度公司得到了圣托马斯、圣约翰斯(1671年)和圣克罗伊(1733年)。

欧洲与遥远大陆和不同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欧洲长期以来保持孤立状态,对于欧洲以外的文明知之甚少,因而像"黄金国"(El Dorado)之类荒诞不经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现在关于印度、中国或美洲边疆的详细记述源源不断地出现,开始激起人们更加严肃的思考。在波斯暴富的J.B.塔韦涅埃(J.B.Tavernier,1605—1689年)创作的《六次航海记》(1676年)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此后海盗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52—1715年)的《新环球航行》、德国外科医生英格伯特·坎普弗(Engelbert Kaempfer,1652—1716年)的《日本史》和后来第一个访问麦加的瑞士人J.L.布尔克哈特(J.L.Burckhardt,1784—1817年)所作《阿拉伯游记》与此一脉相承。世界上第一部通俗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出自英国讽刺小说家丹尼尔·笛福之手,故事是以一个被丹皮尔放逐到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上的苏格兰水手真实经历为蓝本的。这

些著作常常为欧洲读者了解世界宗教、民间传说和世界文化提供一种比较视角，也为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他们用以质疑欧洲或基督教中心论的最有效的工具。它们给欧洲人当头重击，使他们认识到暹罗人也许更快乐，婆罗门更聪慧，易洛魁人不像他们自己那样残忍嗜杀。有趣的是，耶稣会那些擅长撰写民族志游记的作家的作品却成为了轰炸他们自己思想世界的最为有效的弹药。这里有人会提到修士J.F.拉斐陶（J.F.Lafitau，1670—1740年）所描述的加拿大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或者是耶稣会士T.克鲁津斯基（T.Krusinski，1675—1756年）出版于1733年的《波斯回忆录》，该书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殖民地因素也明显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以欧陆为主战场的战争，同时都有海上和殖民地战场。大陆强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和日益壮大的普鲁士、俄国——不得不重视富庶的海上强国，尤其是英国、荷兰——它们虽没有多少军队，却能通过充当外交联盟的出资者、军需供给者和牵线人而发挥关键作用。

均势理论日益主宰外交事务——这个理论把欧洲任一部分发生的变化都视作对整体的潜在威胁。这是一个表明“欧洲体系”正在形成的可靠标志。殖民地是这个方程等式的一部分。英国对这个体系有着特别的兴趣。它本能地反对任何一个欧陆强国占有优势，并巧妙地以最小代价来维持势力均衡。这种国际关系已完全没有此前时代的道德和宗教热忱，它们已沦为一种礼仪形式。这种均势状态，在小型职业军队参加的程式化的战役中受到考验；双方高级军官属于同一个国际[582]军人兄弟会；战争结果以精确计算的领土割让来衡量。领土被视作是赌场的筹码，统治者依战争的运气而得到或失去这些筹码，根本不考虑居民的利益。如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一样，此后的一个时期所有的重大国际会议——乌得勒支（1713年）、维也纳（1738年）、亚琛（1748年）和巴黎会议（1763年）——都是本着同样令人愉悦的犬儒主义精神举行的。

经济生活也同样受到了殖民地的很大影响。欧洲日益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些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利的国家和另外一些无力这样做的国家。英国获利最丰。尤其在乌得勒支条约之后，它控制了大西洋的蔗糖、烟草和奴隶贸易。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布里斯托尔因此变得富有。英国战时封锁敌国港口的政策不断引来与他国的纠纷，不仅是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其他中立国——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他们擅长走私、抢劫和偷越封锁线。同一时期的英国也效仿荷兰，发展了

各种永久性的公共信贷机构——英格兰银行（1694 年）、伦敦交易所和国债制度。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开始起步。［**资本主义农业**］

[583]

资本主义农业（CAP—AG）

在《过去与现在》杂志（1976 年）第 70 期上，美国历史学家布伦纳提出了关于“前工业时代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假说。公认的观点把经济变化归因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他对这种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他的论证是从英法对比开始的，他认为英国的早熟和法国的滞后关键在于其不同的阶级结构。在英国，地主阶级创造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农业资本主义体系，而“（法国）农业人口的最完全的自由和地产权却带来了贫困，带来了一个愈益落后的恶性循环。”[1]

此后的 17 期中，历史学家展开了大辩论。第 78 期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封建社会的人口和阶级关系”的论坛，历史学家们再次联合起来批判上述假说。同期还刊出了一篇对“东西德农民组织与阶级”进行阐释说明的文章。第 79 期上有两篇更充满敌意的文章。一篇哀叹这种“关于庄园发展的混乱认识”，另一篇出自法国农业史学家之手，用 18 个论点对“布伦纳命题”进行全面轰炸。第 85 期使讨论扩展到了“前工业时代的波希米亚”。最后在第 97 期上，布伦纳教授终于出面回击，详尽论述了他本人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观点，这使得争论进一步发展。[2]

这种辩论是历史学家们用以跨越现存知识中的鸿沟的方法。但它存在两个弱点：他们运用琐细的例子来得出宽泛的概括；这些争论仍毫无结果，他们却不以为耻。要是工程师用这种精神来处理问题，一座桥也别想建成。

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一种答案。在布伦纳论辩开始的那一年，另一位美国学者也着手同样的“资本主义农业”问题，并用来解释“一个世界经济体的起源”。[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确定了西方有一个欧洲经济的“核心区”，而东方则是依附的“边缘区”。他认为，核心区包括英国、尼德兰、法国北部和德

国西部，在十五世纪时仅占有“极小的优势”。但它们得以通过有利的贸易关系开发其优势，并建立起种种条件，把东欧的封建贵族转变为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它们还把自己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投入到新大陆。结果，它们创造了我们所熟知的框架体系，“强制的经济作物资本主义”控制了殖民地和东欧的农业。在核心国繁[584]荣兴旺的同时，普鲁士、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的农奴却沦落至与种植园黑奴相当的地位。这种体系一经建立，其不平衡就会不断扩大。“十五世纪的微弱优势在十七世纪变为了巨大的不平衡，到十九世纪则成为了天壤之别。”[4]

这一假说很快受到了专家们，尤其是布伦纳的抨击。他们批评沃勒斯坦过于简单化、过分强调贸易，甚至是“新斯密主义”。[5]结果证明，这种“波兰模型”——沃勒斯坦论证的关键点——对于波兰全境都不能适用，而且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匈牙利的牛肉贸易不是由贵族或资本家中间人来经营的，而是自由的赚取工资的农民经营的。欧洲贸易中的俄国因素和奥斯曼因素都被忽略了。与无法支撑普遍结论的微观理论相反，这个宏观理论经不起细节的推敲。

最后，沃勒斯坦著作最有趣的方面就是它为研究东西欧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核心与边缘区的假设未被确证，但欧洲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却得到了充分证明。

英国出现了约翰·劳（John Law）这样的人物。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苏格兰金融家，他设计了利用殖民贸易发展大众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实验。他的宏大“计划”和皇家银行（1716—1720年）在巴黎得到了摄政王的资助。与伦敦的南海泡沫事件同时，它以售卖路易斯安那经营权的股票，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投机热潮。泡沫破灭，即使没有数百万之众，也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破产。劳逃之夭夭，而法国人从此在很长时间里抵制债券业务。同时，劳的公司的商业运营却繁荣起来，1716—1743年法国的海外商业额增长了四倍。

中、东欧却没有什么发展。土地仍是主要的财富来源；农奴制占据支配地位，内陆贸易无法与海上贸易相提并论。德国在缓慢地恢复实力，波希米亚的恢复则更快一些。1648年以后，波兰—立陶宛发生了一场彻底的经济衰退，再也不能恢复元气。波罗的海贸易逐渐转

到俄国手中，1701 年圣彼得堡的建立打开了“通向西方的窗口”。

社会生活方面，尽管时有暴乱发生，但在 1789 年洪水闸门打开之前，仍是在既有的轨道上运行。贵族富可敌国，而农民则贫困潦倒，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已司空见惯。西欧与东欧的差异虽不断增长，但还未达到迥异的程度。就连在商业压力最大的英国，土地贵族仍保持了他们的至尊地位。事实上，由于英国贵族并不反感开凿运河、开采煤矿等商业活动，他们得以继续保持他们的高位。这是一个大贵族和显贵（grandee 和 magnate）的时代——西班牙的梅迪纳（Medina）、西多尼亚（Sidonia）和奥苏纳（Osuna），瑞典的布拉赫（Brahes）和邦德（Bondes），奥地利的施瓦岑堡（Schwarzenbergs），匈牙利的埃斯特哈齐（Esterhazy），波希米亚的洛布科维茨（Lobkowitz），波兰的拉济维乌（Radziwiłł）和扎莫伊斯基（Zamoyski）等家族——他[584]们都拥有受限定继承权保护的大地产，过着王公的生活，享有招贤纳士、呼风唤雨的权力。[**波兰贵族**]

[585]

波兰贵族（SZLACHTA）

根据 1739 年的一个清单，斯塔尼斯瓦夫·卢勃米尔斯基（Stanisfaw Lubomirski，1719—1783 年）继承了 1071 处庄园地产，横跨波兰的九个王室领地，从其家族所在地——克拉科夫附近的维希尼茨到乌克兰基辅附近的捷蒂耶夫（Tetiev），有近一百万个农奴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他从 1776 年起就是王国大元帅。他可以自称是欧洲最大的地主。通过联姻和政治联合，与恰尔托雷斯基（Czartoryski）、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和扎莫伊斯基家族结交，他理所当然地属于波兰最有势力的贵族之列。他们都拥有庞大的地产和私人军队，富可敌国。他们居于社会体系的顶端，其贵族地产之多，在欧洲首屈一指。

但是，大贵族并不是整个贵族阶级的典型代表。到十八世纪中期，绝大多数波兰贵族都失去了土地。他们通过出租家产、侍奉大贵族，甚至像农民一样在土地上辛勤耕作来维持生活。但经济上的落魄都不能夺去他们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们的贵族血统、他们的家族徽章、他们的法律地位以及把这种地位遗传给其子女

的权利。[十字架]

波兰的小贵族绝对是独特的。在一些省份，如马佐维亚省，他们占人口的1/4。在一些地区，他们建起坞堡，与农民隔离。这个小贵族群体都是“堡内贵族”。他们坚定地维护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彼此以“阁下”、“夫人”相称，对农民则直呼“你”。他们把所有贵族视为兄弟，其他人都是劣等人；对假扮贵族的人，施以极刑。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封爵程序，不让他人染指。除了从军打仗和管理土地之外，他们不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活动。他们总是骑马进城，哪怕是匹老马；他们身披红色斗篷，佩带武器，哪怕是象征性的木剑。他们的房舍很可能简陋肮脏，但他们还必须修建一个门廊，以展示家族的盾形徽章。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卢勃米尔斯基亲王等都与他们地位相当。

因而，波兰贵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的经济分化与法律、文化、政治一致性之间的反差。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贵族不同的是，他们不承认本土头衔。这里没有波兰男爵、侯爵和伯爵。他们最愿意做的是确认在1659年立陶宛与波兰合并之前一些人已经在立陶宛得到的个人头衔，或者是与卢勃米尔斯基一样由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赐予的头衔。

[586] 从法律角度看，波兰被瓜分时，贵族身份法被废除，贵族等级也随之终结。有些贵族，如卢勃米尔斯基家族，设法在奥地利或普鲁士确认自己的贵族地位。少数人在俄罗斯确立自己的贵族地位。但他们中80%失去了贵族地位。这个被剥夺的阶级成为整个十九世纪激烈反俄情绪的发源地。1921年波兰共和国复国，一个民主的波兰议会正式确认废除贵族特权。但“波兰贵族”对于自己特殊身份的意识却历经种种灾难而保留下来。迟至1950年，社会学家发现马佐维亚的集体农庄成员避免与“农民”邻人交往，衣着不同，语言相异，还奉行复杂的订婚习俗以防止与非贵族通婚。1990年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还有年轻的波兰人佩带刻有徽章的图章指环以表明其身份。至此，波兰人仍互称为“阁下”或“夫人”。“贵族文化”已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欧洲早期，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只有西班牙在一定程度上与波兰模式相类似。西班牙的贵族和小贵族（Hidalgos）与东方的大地主、小乡绅类似。[1]

在许多国家，贵族此时正在被动员起来为国家服役。法国和俄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正式、系统的方法。路易十四实行了一套等级头衔制度，每个等级或头衔有相应的年金。最高是皇室，接下来是亲王和五十名公爵、七名主教，然后是佩剑贵族（古老的军人家族）和穿袍贵族（文职廷臣）。彼得大帝实行了一种服役贵族制度，把贵族分为十四个等级，使贵族更严格地依附于国家的雇用。在普鲁士，王权与容克的联盟虽然没有那么正式，但是同样有效。小贵族（在西班牙和波兰尤为众多）则被迫成为大贵族的扈从，服兵役或受雇于外国。英国已经没有农奴制了，圈地运动使得土地所有权的利用更为有效。以农民被赶出土地为代价，自耕农和乡绅阶层得以发展起来。

在欧洲的大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富裕的商业和职业阶层，还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在两三个地方，产业工人也开始出现。但大体上说，旧的等级制度依然原封不动：贵族占据着议会；城市有特许状，有行会；农民则要服劳役，要遭遇饥荒。在现存的体制下，社会内部无疑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当这股力量破壳而出，正如 1789 年 [586] 法国革命向世人所展示的那样，社会动荡将会是空前的。[**普加乔夫**]

[587]

普加乔夫（PUGACHEV）

农民是近代欧洲最大的社会阶级，而俄罗斯帝国是版图最广的国家，因而规模最大的农民暴动发生在俄国中心地带就不足为怪了。主要的农民起义有四次：1606—1607 年的博洛特尼科夫（Bolotnikov）起义，1670—1671 年的斯坚卡·拉辛（Sten'ka Razin）起义，1707—1708 年的布拉文（Bulavin）起义和 1773—1774 年的普加乔夫起义。同样，1917—1921 年的苏俄内战[1]也包含了很大的农民动乱成分。

叶梅连·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Emelyan Ivanovich Pugachev，1726—1775 年）是一个哥萨克小土地所有者、退伍军官。他长年浪迹于旧教寺院，熟谙民间疾苦。1773 年，他在位于欧洲边缘的乌拉尔河畔的雅茨克城揭竿而起，自称彼得三世，并许诺解放农奴。伏尔加河流域诸省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他的队伍。他受到了农民、哥萨克人，甚至游牧民族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拥戴。但由于缺乏协调一致，这些支持者很快沦为一群乌合之众。

起初女皇轻视“普加乔夫侯爵事件”，只出价 500 卢布取他的人头。但悬赏很快涨至28000卢布。一时间，伏尔加河各要塞都

落入普加乔夫之手。他将喀山夷为废墟，屠杀了所有反抗者。他建立了一个很滑稽的朝廷，模仿被叶卡捷琳娜谋杀的丈夫国王身边的随从。在作乱两年之后，起义失败。普加乔夫的主力军在察里津被围困，他本人则被带到莫斯科，五马分尸。[2]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农民人数众多，却从未在历史记载中反映出来。只有当他们周期性的暴动扰乱了政治统治时，书中才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写作偏爱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或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这样的事件，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展示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3]事实上，农民起义从未获得成功。农民一直被说成是最保守的社会力量，与宗教、土地、家族和古老的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周期性的愤怒反抗是绝望情绪的爆发。对他们而言，幸运与不幸的循环远远比任何社会革命思想重要。[4]

农民研究是新兴的学术领域之一。它为考察社会、经济、人类学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尤其适合比较分析——欧洲各地之间和各洲之间。一个以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为中心的研讨会的举行促成了《农民研究》（1973年创刊）学刊的创立。其发刊词强调了世界农民的数量和存在的农民问题：

[588] 在占人类大多数的贫困人口中，农民是处于最底层的……任何一社会阶级都不曾如此长期地反抗这种状况……但迄今为止，学术刊物都把农民置于边缘位置。我们出版的这份期刊，将把农民置于中心……[5]

同俄国一样，法国也吸引了众多历史学家来研究其庞大的农村人口。编写一部多卷本的《法兰西经济社会史》，这个计划激励着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们。勒鲁瓦—拉杜里负责主卷的撰写，他把领土、人口统计学和经济等专题与四百多年的年代分期结合起来分析。基本线索如下：首先是早期“完整世界的毁灭”，之后是十五世纪后期的“农村复兴”，接下来是“内战创痛”和十七世纪生态系统的“漂流、重建与危机”，最后这个生态系统在大革命之后保存下来。[6]

关于法国的农民暴动已有无数的研究——十六世纪的“什一税抗税暴动”、吉耶讷地区的反抗盐税起义（1548年）、利穆赞—佩里戈尔的乡巴佬起义与新乡巴佬起义（1594年，1636—1637年）、[7]诺曼底的戈蒂埃暴动与穿拖鞋者暴动（1594年，1639年）、

"乡村投石党之乱"(1648—1649年)以及普罗旺斯接连不断的叛乱(1596—1715年)。学者们试图把法国农民起义的周期与俄国、甚至中国的农民起义联系起来。[8]

一位研究普罗旺斯叛乱的历史学家证明，农民起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动乱有着内在的联系。他提出五种类型的暴动：

1. 贵族或中产阶级内部的党派之争；
2. 小民与富人的斗争；
3. 农民大众反抗某一政治派别的斗争；
4. 农民起义各派别之间的斗争；
5. 整个社区联合反抗外来力量的斗争。[9]

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它们揭示了农民生活相似而古老的性质。西西里收割者与从戈尔韦到加里西亚的农民几百年来唱着同样的劳动歌谣：

> 飞舞，飞舞，锋利的镰刀
> 乡村满是，
> 满是丰收的粮食
> 地主乐开怀(重复)
> 生活多么美好甜蜜！
> 哼哼，哼哼，
> 这头猪是四腿乌龟(重复)
> 甭说穷富，我们都是乌龟蛋。[10]

在王权、教会和贵族的扶持下，文化生活也飞速发展起来。欧洲艺术进入了古典主义时代。在颠覆巴洛克风格的过程中，规则、严谨大行其道，建筑回归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罗马风格，带有略显俗丽的装饰或洛可可式装饰。王宫和公共机构的建筑最为引人注目。城市规划、几何图案的规则园林、园艺设计都备受重视。人们竭力想把混乱的自然世界简化为秩序与和谐的世界。紧随巴黎之后的示范城市还有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圣彼得堡。

绘画已过了早熟的巅峰期。在法国，继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年)、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1600—1682年)和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1619—1690年)的古典风景和传说题材画之后，出现了J.A.华托(J.A. Watteau，1684—1721年)和J.H.弗拉戈纳尔(J.H. Fragonard，1732—1806年)所作的肤浅无聊的田园风光。戈弗雷·内勒(Godfrey Kneller，1646—1723年)开创

的英国社会风俗画派在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年）和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年）的非凡作品中登峰造极。两位卡纳莱托（Canaletto，1697—1768年，1724—1780年）留给后人的是威尼斯、伦敦、华沙的全景写实画。宗教题材画除了少数的名家，如威尼斯的G.B.提埃坡罗（G.B. Tiepo-[589]lo，1693—1770年），总体上呈现衰落之势。室内装潢，尤其是家具，主要适应贵族的需要。以A.C.布尔（A.C.Boulle，1642—1732年）为首的巴黎橱柜制造师们使用的是诸如乌木、红木、椴木等舶来材料；布尔擅长乌木镶嵌与嵌花。他们分别为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宫殿制作的作品，现在一眼就能认出，只有格林林·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1648—1721年）和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卒于1779年）的作品才能与它们相媲美。细瓷大多是从中国进口。在圣克卢（Saint Cloud，1696年）和塞夫尔（Sèvres，1756年）先后设有皇家制造厂，在其他地区，如萨克森的迈森（Meissen，1710年）、圣彼得堡（1744年）、伍斯特（Worcester，1751年）也建有类似工厂，还有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年）开办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工厂（1769年）。沙龙中充斥着丝、银制品和种种奢华物品。

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战胜了拉丁语，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也带领欧洲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法国宫廷剧作家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年），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1622—1673年）与让·拉辛（1639—1699年）等人的手中，戏剧所采用的语言和结构形式成为下一个世纪的国际模式。社会道德喜剧传统得到发扬，英国有复辟时期的喜剧家们和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年），法国有彼埃尔·奥古斯丁·博马舍（1732—1799年），意大利有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年）。

诗歌尤其易受追求严谨风格和形式的冲动影响。约翰·弥尔顿（1608—1674年）、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和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年）则是执英国诗歌牛耳的三人。蒲伯在他的英雄双行诗《论批评》（1711年）和《论人》（1733年）中充满智慧的论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这一代人的兴趣和脾性：

> 挥洒自如的写作来源于艺术，而非运气，
> 正如舞步娴熟的学舞者。
> 艰苦于你无伤，
> 声音定是理智的回声。

所有自然不过是不为你们所知的艺术；
所有机会不过是不为你们所见的方向；
所有分歧不过是不被了解的和谐；
所有部分的恶不过是普遍的善。
因此，不管有多么骄傲，不管理性出了什么错，
有一条真理是明确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2]

稍后，抒情诗占据了上风，扭转了前期的潮流，其代表是罗伯特·彭斯（1759—1796 年）的苏格兰诗歌，克里斯琴·冯·克莱斯特（Christian Von Kleist，1715—1759 年）、F.G. 克洛施托克（F.G. Klopstock，1724—1803 年）和年轻的歌德（Goethe）的德国诗歌，让·劳彻（Jean Roucher，1745—1794 年）和安德烈·谢尼埃（André Chenier，1762—1794 年）的法国诗歌。尽管散文写作仰赖于非小说文学类型，但真正的小说却由此萌发。这方面的先驱出现在英国。除了《鲁滨逊漂流记》之外，著名的小说还有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 年）、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1740 年）、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749 年）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1767 年）。在法国，多才多艺的伏尔泰和卢梭也是颇有造诣的小说家。（见下文）

尽管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作者引领风骚，读者群却不只限于这些[590]国家。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读懂法语；外国名著也被译为本国文字，广为流传。波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但实际上在波兰译为波兰语的名著就包括了《鲁滨逊漂流记》（1769 年）、《曼侬·莱斯戈》（1769 年）、《老实人》（1780 年）、《格列佛游记》（1784 年）、《埃米丽历险记》（1788 年）和《汤姆—琼纳的故事》（1793 年）。一些波兰作家，如东方学家波托茨基（Ian Potocki，1761—1825 年）则以法语写作，供本国和全世界的读者欣赏。

从 J.S. 巴赫（1685—1750 年）到 W.A. 莫扎特（1756—1791 年）和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70—1827 年）的欧洲音乐家们，巩固了古典主义乐曲的基础。他们在古典音乐的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建树：器乐、室内乐、交响乐、合唱；尽管他们的风格常常与此前的巴洛克风格混淆，他们的作品却是以特殊的节奏感和力量为其独特风格的标志，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奏鸣曲**] 他们还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保持了某种平衡。巴赫创作的众多“康塔塔”，莫扎特的《安魂曲》（1791 年）、贝多芬的《庄严弥撒》（1823 年）和巴赫的九部协奏曲、莫扎特的四十一部交响曲和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都可作为例证。奥地利—德国的作曲家地位逐渐上升，除了巴赫、莫扎特和

[591]

奏鸣曲（SONATA）

从起源上讲，奏鸣曲指的是“发响的”而不是“唱出来的”音乐。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它被用于指逐渐几乎成了所有器乐中最重要的一种乐曲形式。在从海顿到马勒的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中，奏鸣曲占据中心位置。奏鸣曲与此前的复调风格迥异，它所体现的传统正是后来的“现代”风格所反对的。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乐曲分为一系列规则的乐章，二是编排精致的和声。[乐调]

奏鸣曲的起源不止一个，最初见于加布里埃利（Gabrieli）创作的用小提琴、短号和6支长号所演奏的《交响圣乐》（Sonata pian e forte，1597年）。但直到博洛尼亚的阿尔坎杰洛·科列里（1653—1713年）时才正式成为四个乐章。C.P.E.巴赫（1714—1788年）的键盘乐使之进一步发展，海顿和莫扎特将其完善。后人在J.P.拉莫（J.P.Rameau）的《和声论》（1722年）的基础上发展出其理论基础。直至卡尔·车尔尼（C.Czerny）发表《实用作曲教程》（1848年）时才有了关于奏鸣曲的详尽论述。此时奏鸣曲最典型的代表贝多芬已经去世二十年了。

传统的奏鸣曲分为四个反差很大的乐章。第一乐章快板，节奏很快，类似于歌剧的序曲。第二乐章节奏较慢，由巴洛克的首部咏叹调（ARIA DA CAPO）演变而来。第三乐章通常是基于舞蹈组曲的三拍三重奏。终曲的基调和节拍又回归开场。四个乐章都遵循标准的模式，包括旋律主题的呈示、和弦的展开、最后是对前面的再现，有时还有相关的尾声和“余音”。

和音与复调是相反的，同赞歌一样，它是以基于渐进和弦的音乐为特征的。它的音符不构成独立的旋律和节奏。因而，古典和声是与复调对位正好相反。巴赫在莱比锡一所空教堂谱写《赋格艺术》（art of fugue，1750年），这一举动象征着复调时代的过去。疲惫不堪但精神得到升华的贝多芬，挣扎着想要完成他最后的五部四重奏，可视作是和音的巅峰。

贝多芬认为升C小调四重奏（作品131号，1826年）是他最精美的作品。他在其中呈现奏鸣曲形成中的各个因素——开场赋格曲，单主题谐谑曲，中心变奏咏叹调以及转位赋格“奏鸣曲中的奏鸣曲”。这部作品被称为是“人类经历的循环”和“欧洲音乐的缩影”。

从1750—1827年，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创作了150多部交

响曲，100多部钢琴协奏曲，50多部弦乐四重奏，还有大量的协奏曲——这些都是以奏鸣曲的形式创作的。这些作品构成了古典乐曲的核心。

贝多芬之外，一流作曲家还有约翰·帕赫贝尔（Johann Pachelbel，1653—1706年）、G.P.泰勒曼（G.P. Telemann，1681—1767年）、G.F.亨德尔（1685—1759年）和约瑟夫·海顿（1732—1809年）。但音乐从本质上来说是超越国界的。在他们的时代里，意大利作曲家同德国作曲家一样具有影响力，如让·巴蒂斯塔·吕利（J.B. Lully，1632—1687年）、阿尔坎杰洛·科列里（A. Corelli，1653—1713年）、亚历山大罗·斯卡拉蒂（A. Scarlatti，1660—1725年）、托马索·阿尔比诺尼（T. Albinoni，1671—1751年）和安东尼奥·维瓦尔蒂（A. Vivaldi，1675—1741年）等人。此外，丹麦的布克斯特胡德（D. Buxtehude，1637—1707年）、法国的弗朗索瓦·库泊兰（F. Couperin，1668—1733年）和J.P.拉摩（J.P. RAMEAU，1683—1764年），还有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风琴调律师亨利·普塞尔（H. Purcell，约1659—1695年）也享有盛名。克里莫纳（Cremona）的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利（A. Stradivari，1644—1737年）改良了欧洲的最重要乐器——小提琴，使之臻于完美。帕多瓦（PADUA）的B.克里斯托福里（Cristofori）于1709年发明了钢琴。歌剧也从最初的背景音乐对话形式发展成为W.C.格鲁克（W.C.Gluck，1714—1787年）的全景宏制音乐剧。[**康塔塔**]、[**音乐**]、[**歌剧**]、[**斯特拉迪**]

正式的宗教仍保留了其早期的模式。欧洲的宗教地图无重大变更。正统教会继续依据严格的容忍或不容忍的国家法律来运作。官方宗教的信徒，一旦通过宣誓和严格的忠诚测试，都将获得晋升的机会；而非官方宗教的信徒和不愿宣誓者，在未受到残酷迫害的时候，还得以在法律的边缘存活。在天主教国家中，新教徒通常被剥夺公民权利。而在新教国家中，天主教徒也遭到同样的对待。在大不列颠，英格兰的教会和苏格兰的教会对罗马天主教徒和各自的新教反对者公开实行限制政策。瑞典、丹麦和荷兰也有类似的禁令。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是惟一受到承认的教会，而犹太居民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波兰—立陶宛的宗教异端最多，尽管如此，各种限制禁令仍不断增加。[593] 1658年，索齐尼派（Socinians）因受到勾结瑞典的指控而被驱逐。1718年，非天主教徒不许参加国会。1764年，犹太人不能参加议会，只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地方自治村。俄国的宣传机构对波兰东正教徒的悲惨处境大为同情。但他们的状况比起俄国境内天主教徒的遭遇来说

[592]

斯特拉迪（STRAD）

“弥赛亚”（Le MESSIE，‘The Messiah’），有着全世界最为权威的品牌标志 Antonius Stradivarius Cremonensis Faciebat Anno 1716。这是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约 1644—1737 年）去世近四十年后仍留在他的工作室里的十把小提琴之一。1775 年，他的儿子把它卖给了萨布拉伯爵。除了属于一名法国音乐教师德尔芬·阿拉德（1815—1888 年）的十几年之外，它大部分时间都属于琴行老板——塔里西俄（Tarisio）、维罗梅（Vuillaume）和 W.E. 希尔斯（W.E.Hills）。塔里西俄总是许诺把它展示给朋友看，但却从未履行诺言。其中一个朋友说：“它就像弥塞亚一样，总是许诺，但从未实现过。”

这把乐器很少被演奏过，现在仍崭新地保存在牛津的阿什莫尔博物馆保湿的展览柜中。外观上毫不起眼，不像早前的“长斯特拉迪（Long Strads)”，它有 356 毫米的标准身长，直纹腹板，棱角分明，装饰朴素，倾斜的 F 孔，烘烤过的胡桃木双面镶嵌背纹。只有斯特拉迪瓦里独一无二的清漆的橙褐色光芒显示出它的高贵出身。约阿希姆（Joachim，匈牙利小提琴家，1831—1907 年）曾经演奏过一次，称赞它“集甜美与恢弘于一身”。人们普遍认为，弦乐器音质的关键在于它所使用的漆。清漆过于黏稠会产生一种难听的金属声，过于光滑又会损害共鸣效果。斯特拉迪瓦里是业内高手，他找到的这种漆有韧性且耐久。他的声望是无人企及的。

小提琴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它是六弦提琴家族的后代，更是雷贝克琴和一种里拉琴的后代。其功能多样，旋律效果精美，适合于独奏，同时它还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弦乐家族的天然领导。作为普通的小提琴，它可用于演奏舞曲。由于小巧便携，价格适中，很快就成为欧洲流行乐和“古典乐”挑大梁的乐器。除了雅可布·斯坦纳（J. Stainer，1617—1678 年）是来自蒂罗尔之外，小提琴制作大师都是意大利人，如布雷西亚的马吉尼（Maggini）、克里莫纳的阿马蒂（Amati）和斯特拉迪瓦里、威尼斯的瓜奈利（Guarneri）。

利奥波德·莫扎特（L. Mozart）、G.B. 维奥蒂（G.B.Viotti）等人的系统教育方法的发展，使得小提琴演奏艺术突飞猛进。巴黎音乐学院建于1795年，开同类学校的先河，此后布拉格（1811

年)、布鲁塞尔(1813年)、维也纳(1817年)、华沙(1822年)、伦敦(1822年)、圣彼得堡(1862年)和柏林(1869年)也陆续建立了音乐学校。

令人震惊的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东欧人在小提琴演奏上独领风骚。这一现象也许反映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小提琴演奏传统。更为可能的解释也许是,政治上受到压迫的民族在音乐创作上往往居于特殊的地位。不管怎样,尼科洛·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1782—1840年)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既不是东欧人也不是犹太人的"伟大演奏家"。来自维也纳的约瑟夫·约阿希姆与来自卢布林的波兰人亨利克·维尼亚夫斯基(H. Wieniawski,1835—1880年)(他曾参与建立圣彼得堡的艺术学校)开创了一个风格传统。克莱斯勒(Kreisler)、伊萨依(Ysaye)、西盖蒂(Szigeti)到海斐茨(Heffitz)、米尔斯坦(Milstein)、奥伊斯特拉赫(Oistrakh)、谢林格(Szeryng)和伊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等音乐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形成了一个辉煌的传承脉络。他们都演奏自己的"斯特拉迪"。令人遗憾的是,"弥赛亚"这把珍贵的斯特拉迪小提琴却注定只能供人观赏,而不能聆听。当代的工匠们特别重视木材的选择、厚度和弧度的变化以及材质老化的影响。

[593]

已是小菜一碟。普鲁士则道听途说地大肆宣传路德教徒在波兰所遭受的迫害。

罗马天主教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再寻求收复新教的地盘。它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向海外,尤其是耶稣会在南美、西印度群岛、中国、北美及1715年之前在日本的活动。由胡尼伯罗·塞拉(Junipero Serra,1713—1784年)发起,方济各会在加利福尼亚连续完成了21次出色的传教使命,涉及从圣迭哥到旧金山的整个地区,直至今天,这些传教活动仍是茫茫荒野中的一种精神慰藉。在欧洲,梵蒂冈无力阻挡各地教会日渐增长的离心倾向。由于路易十四在"王权争端"中占领了阿维尼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1676—1689年在位)1688年被迫秘密开除他的教籍。而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1700—1721年在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更好的决定,而发布通谕谴责詹森派(1713年)。这个通谕本是专门针对同情詹森派的雄辩家帕基埃·凯内尔(Pasquier Quesnel)所作的《道德思索》的,却成为一场强烈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使法国思想界数十年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在尼德兰,它还导致了1724年天主教内部分裂,乌得勒支大主教由此创立了荷

兰旧天主教会。在德国，冯·霍恩泰因（I.N.von Hontheim）（笔名Febronius）创作宣传小册子（1763年），希望通过大幅削减罗马的集权权力来达成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和解，一场运动由此掀起。在波兰，由于俄罗斯在政治上控制了教会，梵蒂冈失去了有效控制。

在这些纷争之中，耶稣会成员显得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他们日益成为罗马的麻烦。本尼狄克十四世（1740—1758年在位）的温和立场使他赢得了伏尔泰的嘉誉，他开始调查耶稣会的活动。耶稣会被指[594]控从事大规模的赢利活动，还被指控为了吸收新教徒而不惜接受当地信仰。1759年他们被逐出葡萄牙，1764年被逐出法国，1767年被逐出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克雷芒十三世（1758—1769年在位）支持这一团体，表示"但愿他们保持现状，要么就解散"。但克雷芒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是在天主教势力正式要求废除耶稣会的阴影下当选的，因此最终对这种要求表示了默许。1773年8月16日他发布简短通谕，正式取缔了耶稣会，其理由是它不再奉行创建人的宗旨。这个通谕在除俄罗斯帝国以外的欧洲所有国家生效。这使得天主教的教育和传教活动陷于混乱，为世俗学校和大学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1685年发生了这个时期最恐怖的事情：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敕令》，法国所有的胡格诺教徒被驱逐流放（见下文）。但总体上说，迫害的速度在放缓。许多国家钻这个空子，执行不容忍法。不论非国教徒在何处生存下来，他们现在都变成公开的了。英国还造了一个新词——"广教主义"（Latitudinarianism），指的是主张对所有新教徒采取宽容态度的一支强有力的观点。公理会教友或"独立者"于1662年浮出水面。最初允许他们存在的条件是，他们的教堂至少要设在教区教堂方圆五英里之外。追随着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的杰出奋斗历程，公谊会或称"贵格会"涌现众多的烈士，直到1689年的《容忍法案》颁布，他们才同其他的新教徒一样赢得了信仰权。1727年，浸信会、长老会、独立会组织起来在伦敦成立了非国教徒大会（General Body of Dissenters）。摩拉维亚教会再次出现在荷兰、英格兰以及萨克森的赫恩哈特（Herrnhut）实验社区。十八世纪的习俗与十八世纪的许多法律不同，它是偏向于宽容的。这种环境适合自然神论者、新教徒和爱开宗教玩笑的人。伏尔泰写道："他们说，上帝总是站在强者一边。"[共济会]

针对正统宗教日益增长的惰性，出现了种种宗教的反潮流。在天主教世界中，米格尔·德·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1640—1697年）的寂静主义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位创始人传授"只有在完全的精神消极状态中才能避免罪恶"的主张。他死在罗马的狱中，他的著作《精神向导》（1675年）被耶稣会斥为异端。在路德宗世界里，P.J.

斯彭内尔（P.J.Spener，1635—1705年）的虔信主义也引起了同样的激荡。这位创始人宣称所有信徒都可以成为教士，并由此创立了信徒小圈子虔诚阅读圣经的做法。他的著作《虔敬的愿望》（1675年）成为一个以哈雷大学为中心的持久运动的基石。

在圣公会世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的卫斯理宗造成英国国教分裂。卫斯理在牛津大学创办了学生的"圣洁会"，并发明了一种精神体验方法，他还参观过赫恩哈特。他毕生都在传播福音，走访英伦三岛的荒僻之处，用自己的热忱点燃那些被忽视的大众心中的激情。但是，他对主教制度的弃绝注定要导致分裂。1785年第一个卫斯理宗大会在伦敦召开。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595]（1707—1788年）是一个极富天才的圣公会赞歌作曲家，他所创作的恢弘的乐章淋漓地表现了时代的变革基调。

卫斯理宗在威尔士根基尤为深厚。人们普遍认为，它不仅激起了当地的宗教复兴，还带来了一场民族复兴。[3]1743年1月，第一次威尔士卫斯理宗联合会召开，早于英格兰的同类会议。它信奉加尔文的神学教义，这一点颇似长老会。同时，兰道罗尔的教区长格里菲斯·琼斯（Griffith Jones）组织了巡回学校；威廉·威廉姆斯，又称"潘蒂塞林（地名）的威廉"（1717—1791年）创作了恢弘的威尔士赞歌；来自有"威尔士的耶路撒冷"之称的兰盖托（Llangeitho）的丹尼尔·罗兰得（Daniel Rowland，1713—1790年）开创了一种兴奋的传教传统；这一切都铸造了种种工具，使得威尔士语言和文化得以复兴，进入现代。曾经听过威尔士唱诗班和着那些赞美歌（Llanfair、Cwm Rhondda或者Blaenwern）的旋律引吭高歌的人，都不难理解民族自豪、精神升华意味着什么。不必说，威尔士卫斯理宗的狂热与启蒙运动大相径庭。其时，启蒙运动是欧洲主要文化圈里的主流。

在犹太世界中，"美名大师"托夫（Baal Shem Tov，1700—1760年）定居在波多利耶的麦德热窝村，他的哈西德主义（Hasidism）对波兰的犹太教拉比的颠覆，相当于卫斯理宗对圣公会主教的颠覆。"虔诚者"反对犹太教会毫无生气的繁文缛节，他们组成宗派式的集团，由世袭的"圣人"统领。他们与基督教卫斯理宗在空间上和文化上相去甚远，但在脾性上却相近。他们严格遵循正统犹太教的衣着饮食规定。但是，与卫斯理宗相似，这一运动的特征也是大众的狂热、欢快的音乐与精神的复兴。

欧洲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同样引人注目。人民反对前一时代的严格束缚，但更多地不是通过修改法律，而是通过忽视宗教权威曾经强加于人的品味准则与行为规范来实现的。加尔文教和耶稣会的清教主义直到1660年仍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一个世纪

里，艺术敏感度的激增与道德约束的急剧下降并行不悖。“优雅时代”乃是与松弛的道德规范紧密相连的。一方面，上层阶级和他们的效仿者们前所未有地迷恋优雅生活的艺术：他们的衣着、宫邸、家私、音乐、收藏无不体现着奢华与文雅。同时。各个阶级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松弛，尤其是性道德的松弛。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放纵不仅为人们所容忍，而且变成一种炫耀。长期的宗教改革打断了这一潮流，在此之后，人们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生活了。对身体健康的富人而言，夸张的衣着、狂饮、美宴、调情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人们以假发和蓬松的衬裙、园林、彩绘瓷器和在阴部抹粉为[596]傲。这一社会风气无疑有助于促进宗教复兴，但也扩展了思想宽容的余地，这一点为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们所利用。[**性爱**]

[596]

性爱（EROS）

据说，“他把所有的石头都翻了一遍”（这是一句双关语，原来的意思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但这里暗示他一个女人也不放过——译者注）。腓特烈·奥古斯都（Friedrich Augustus），这位萨克森选侯、波兰国王，据说是近300个孩子的父亲。这些孩子中包括法国元帅莫里斯·德·扎克斯（Maurice de Saxe，1696—1750年）。腓特烈·奥古斯都惊人的性爱生活表明他的品味宽泛和精力充沛。[1] 除了他的妻子拜罗伊特的埃伯丁之外，他还得到了一群情人的青睐——公开的、秘密的、绝密的。莫里斯·德·扎克斯是瑞典柯尼希斯马克女伯爵奥洛拉之子。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罗托夫斯基伯爵是在布达（Buda）虏获的土耳其女子法蒂玛之子。他的同父异母妹妹亨里埃塔·迪瓦勒女伯爵奥泽斯卡是华沙一个酒商之女。在公开的名单上，德斯特勒女伯爵之后是特申夫人、贺依姆夫人、科塞尔夫人、玛利亚和丹霍芙女伯爵，但英国驻德累斯登大使的前情妇不在此列。要是他的政治冒险的准确性有他的精子命中率的一半，腓特烈·奥古斯都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2]（也有扫兴者估计他的后代只有8个）。[3]

启蒙运动 根据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是欧洲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脱离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更简单地说，欧洲已经达到了“自主决断的时代”。这一比喻是非常深刻，因为这是把中世纪的基督教当做父母，而把欧洲的世俗文化当做文艺复兴所孕

育的成长中的孩子。童年时代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家长的宗教传统、家庭的争吵。随着“理智自主”，即自我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的获得，产生了关键性的成就。但这个孩子仍带有一些家族的典型特征。

但是，也许只有把“理性之光”竭力想要照亮的黑暗作为参照物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运动。这种黑暗不是来自于哲学家们视为可以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宗教，而是来自于逐渐把欧洲基督教包裹起来的所有那些不经思考的、没有理性的教条态度。这些态度包括偏执、迷信、禁欲、狂热，都可以用那个时代最贬义的词来概括：“狂热”。法国称这一运动为“启蒙”，它涉及广泛的领域：哲学、科学、自然宗教、经济、政治、历史和教育。

特定的理智习惯促成理性主义生长，而这种特定条件并不是处处都可以看到。一方面，它需要天主教与新教并存，两者敌对的教义可[597]以提供思想冲突；另一方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宽容，使理性的对话可以进行。十七世纪存在这种条件的只有三四个地方：波兰一立陶宛有这种条件：耶稣会教徒与东正教、犹太人以及一些极端教派混居。瑞士也部分存在这种状况：天主教省区与新教省区之间一直可以进行思想的交流。苏格兰和英格兰存在这种情况：广义上的圣公会传统保护相互冲突的观点和看法。但这种条件在尼德兰最为典型：本土的资源与一长串有思想的避难者形成互补关系。从 J.J. 斯卡利杰（J.J.Scaliger）和勒内·笛卡尔到斯宾诺沙、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勒克莱尔（Le Clerc）和培尔（Bayle）。有“巴达维亚的雅典”之称的莱顿、欧洲国际大都市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实验室。尽管法国人从一开始就地位显著，而且法语也成为通用语言，但法国本身是直到十八世纪中期变得宽松之后才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舞台。其主要人物之一伏尔泰，曾被迫定居于瑞士，或者说是瑞士边境。

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自然的理性之光”可追溯到梅兰希顿（Melanchthon）的一部著作《论自然法》（1559 年），而且通过梅兰希顿可以追溯到西塞罗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因此，莱顿的贾斯特·利普斯（Joost Lips，笔名 Lipsius，1547—1606 年）翻译斯多葛派的著作，就被人们视为一个里程碑。它与科学革命的成果和笛卡尔的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占据中心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它使人相信，理性可以揭示人类和物质世界以及自然宗教、自然道德、自然法的杂乱无章的表面之下的规律。在艺术中也是同样，它导致了这样一个概念：只需严格的规则和对称的图案就能表达所有与美相关的自然秩序。美就是秩序，秩序就是美。这就是古典主义真正精髓所在。

启蒙运动的哲学主要是关注认识论，也就是，关于知识的理论，

或者说我们如何认识我所要认识的事物。在这个方面，三个英国人奠定了后来争论的基础：英格兰人约翰·洛克（1632—1704年）、爱尔兰人乔治·贝克莱主教（1685—1753年）以及曾任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的苏格兰人大卫·休谟（1711—1776年）。作为经验主义者，他们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科学的观察和推理方法可以应用于人类事务。因此与他们同时代的亚历山大·蒲伯认为：

你自己去认识，不要假设上帝在观察，
正确地研究人类的是人。[4]

洛克著名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提出一个假设：人类的大脑在出生时是一片空白——一个“白板”。这样，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出自于经验，或者通过感觉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种种资料进行加工，或[598]是通过反思能力对思想内在活动产生的资料进行加工。洛克的假说在法国得到发展。孔狄亚克（1715—1780年）在其著作《论感觉》（1754年）中使用了一个比喻：无生命的雕塑通过知觉的获得而有了生命。拉美特利（1709—1751年）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他在《人是机器》（1748年）中根本否定了精神的存在。但是，贝克莱主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争论说只有思想和精神的东西能够存在。休谟在《人性论》（1739—1740年）中用理性的方法探讨知性、激情和道德，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信仰不可能是理性的。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最后结论就是：非理性也许并非是完全不理智的。

在道德哲学领域中，几种宗教和思想观念最终导致功利主义的产生。理性主义者在评价道德原则的时候，往往把它们对改善人的条件的功用作为衡量标准。这种趋向早在洛克身上就有体现。霍尔巴赫男爵（1723—1798年）在某些方面是启蒙哲学家中最激进的。他提倡享乐主义的道德观念，认为能够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就是善。后来快乐更多的被视为是一种集体的善，而不是个人的善。社会和谐，而不只是个人的幸福成为了目标。1776年，年轻的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提出了指导原则：“衡量是非的标准就是能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幸福。”

启蒙运动并不同情欧洲犹太人。犹太人被视为宗教团体，他们的宗教被视为是不理智的、愚昧的。例如，德莱顿（Dryden）就毫不吝惜讥讽之词：

犹太人这个顽固、阴郁、嘟嘟囔囔的种族，
被上帝溺爱的人群，娇纵堕落

任何国王都无法统治他们
任何神灵都无法取悦他们。[5]

一些犹太领导人也开始这样批评他们自己。他们渴望摆脱传统犹太教的限制。犹太人的启蒙运动（haskalah）由此开始，想要从内部改革犹太群体（见原书第 843 页）。

这个时期，科学知识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个时代的巨人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伊萨克·牛顿爵士。他在 1687 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成为此后 200 多年物理学和宇宙运行的基础。他发明了他称之为“流数”的微积分学。作为启蒙运动之父，他名副其实：1666 年，他在剑桥的三一学院开始进行研究光的性质的实验。他把一个棱镜放在他的窗户百叶帘的一个孔后面：

我看见……偏向影像一端的光确实产生了比偏向另一端的光更大的折射。因而据推断，决定影像长度的因素正是由不同折射率的光线组成的光。……由于折射率不同，它们可以传播到墙上的各个部分。[6]

正是光的特性启发了爱因斯坦，最终推翻了牛顿的体系。这不啻[599]于是一个绝妙的讽刺。[$e = mc^2$] 作为一个惟一神论者，牛顿与许多公开的荣誉绝缘。但声名与财富并未离他而去。他甚至还涉足了炼丹术。他曾有趣的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浩瀚的真理海洋，仍神秘地展现在我面前”。[7] 蒲伯为安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牛顿坟墓题写墓志铭：

道法自然，久藏玄冥（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于冥冥暗夜之中）；
天降牛顿，万物生明（上帝说“让牛顿出世”，于是便有了光明）。

技术的改进和其他科学的进步有助于牛顿定律的充分运用。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研制了超级望远镜；英国海军学院提供 2 万英镑奖金，得到了一个经纬仪。在数学方面，也许莱比锡人戈特弗雷德·莱布尼兹（1646—1716 年）本能在牛顿之前独立发现微积分。在生物学方面，更准确的说是植物学方面，瑞典人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aeus，1707—1778 年）发表了《自然体系》（1735 年）和《植物学基础》（1736 年），详尽地阐述了植物分类，在混乱、无序之中找到了秩序和规律。在化学方面，一些科学家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约瑟夫·普雷斯特利（Joseph Priestly，1733—1804 年）探索了空气的复合性

质，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1731—1810年）实验展示了水的复合性质。成就最大的是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nine—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年），是他发现了化学反应的过程。[火气][欧拉]

对于知识理论的兴趣与不断增长的信息储存结合起来，必然导致对编纂百科全书的狂热。常识的摘要在中世纪已是司空见惯；但他们一度不再流行。早期有人试图复兴这种类型：1630年在荷兰出版了L.H.阿尔斯特德（L.H. Alsted）的摘要，1674年路易·莫雷里（Louis Moreri）在里昂出版摘要。但是，普遍认为，现代媒体之父是彼埃尔·培尔（1647—1706年）。他的《批评与历史辞典》第一版对开本1697年于鹿特丹出版。英国这方面的代表是皇家学会会员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的《技术辞典》（1704年）和埃弗兰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的《(钱伯斯）百科全书》（1728年）；在德国有胡布纳（J. Hübner）的《国家、报纸和交谈的实用百科全书》（Reales Staats Zeitungs - und Conversation Lexicon，莱比锡，1704年）和J.T.雅布隆斯基（Jablonski）的《万用词典》（Allgemeines Lexicon，莱比锡，1721年）；在意大利有G.皮瓦蒂（G.Pivati）的《万用词典》（Dizionario Universale，威尼斯，1744年）；在波兰有B.赫梅洛夫斯基（B.Chmielowski）的《新雅典》（Nowe Ateny，1745—1746年）。J.H.泽德勒（Zedler）的《百科词典》图文并茂，共64卷，外加4卷增补，于1732—1754年陆续出版。法国德尼·狄德罗（1713—1784年）和让·达朗贝尔（1717—1783年）受《钱伯斯百科全书》法译本的启发，发起了编纂艺术、科学和工艺的理论词典的宏伟计划。这个17卷本的百科全书共16288页，于1751—1765年出版于巴黎，其增补、图解和索引直至1782年才全部出版完毕。由于这本系统性的百科全书立场偏激、反教会、还猛烈抨击现存政权，其编纂者不断受到官方的骚[601]扰，但它确实是这个时代的里程碑。其主旨在于对人类现有的全部知识进行总结。《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于1768年在爱丁堡问世，它的名气虽不及狄德罗等人的百科全书，但流传更为久远。胡布纳的《词典》印刷了多次，有多种译本。1808年出版商F.A.布罗克豪斯（Brockhaus，1772—1823年）最终买下了其版权，在它的基础上编纂了一本最为著名的德国百科全书。

[600]

欧拉（EULER）

1765年，俄国驻柏林大使授权不惜代价去邀请一位独眼人赴圣彼得堡。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年）提出他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的条件：3000卢布的薪水，他的妻子获得一笔年金并为他的四个儿子安排高职。俄国人毫不踌躇地答应了他的条件。五年前，俄国军队蹂躏了他在夏洛滕堡的农场，沙皇就曾经给予他丰厚的补偿。因为，欧拉是那个时代的数学天才。普遍认为，数学史上只有C.F.高斯（Guass，1777—1855年）能与之相提并论。高斯在欧拉离开柏林十年后出生于不伦瑞克。

据说，“欧拉算算术就像其他人呼吸和鹰翱翔一样自然”。他的父亲是瑞士的一名牧师，他曾在巴塞尔大学就读，从小就记忆力惊人。他能够背诵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全文，连行数和页数都丝毫不差。年轻时他与伯努利（Bernouilli）兄弟结伴同往俄罗斯。腓特烈大帝的下属发现了他的天才。他的成果丰富，富有创见。他撰写了886篇科学论文，约4000封信件，50年时间中他平均每天能写出两页。他去世45年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科学院会刊还在刊登他未发表的论文。他发现了许多定理，创造了三角函数，还完成了圆周率的计算，并提出了超越数的存在。“欧拉定理”证明了指数函数与三角函数的关系：

$$e^{ix} = \cos x + i\sin x$$

欧拉的威望把圣彼得堡科学院带入了欧洲科学的主流。他开创了辉煌的圣彼得堡数学学派。但他不愿意谈到这一点。当腓特烈大帝的母亲在波茨坦逼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说：“夫人，在那个国家，谁说话，他们就绞死谁。”[1] 但欧拉的权威是如此之大，他在他所编写的教科书《无穷小分析引论》（1748年）中所用的符号成为了标准数学符号的基础。在为数学家们提供一种统一的交流工具方面，他功不可没，这是欧洲人一直没有做到的。

宗教思想受到了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圣经研究方面。起初问题是如何区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敌对的教义，他们都在圣经上为其教义找到了依据。剑桥研究员威廉·奇林沃斯（W. Chilling-

worth）的《论新教徒的宗教》一书开了风气之先。他曾在杜埃师从耶稣会，并被错误地指控为一个索齐尼分子。法国演说家里夏尔·西蒙（Richard Simon，1638—1712年）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在《旧约历史批评》（1678年）中运用了经典的法国文学批评手法。虽然西蒙的书受到波舒埃的抨击，并且被列入禁书目录，第一版全部被销毁，但这种方法却存留下来。

对宗教的理性思考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导致自然神论这种时髦思想。自然神论把宗教信仰缩减到其最小的核心：相信“最高存在”，相信造物主上帝，相信天意。它在英国崭露头角，最初表现为各种粗糙的信条，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切尔贝里的赫伯特爵士（Herbert of Cherbury，1583—1648年）的《论真理》（巴黎，1624年）和J.J.托兰德（Toland）的《基督教并不神秘》（1696年）。1730年代，当伏尔泰到英国时，自然神论达到了顶峰，但在主教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宗教的对比》出版之后却大大衰落。有人曾对卡罗琳女王说到该书的持久影响：“不，尊敬的女士，他没有死，他只是被埋葬了”。法国人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目的是在传统的基督教和开始公开表达无神论观点的以霍尔巴赫男爵（1723—1789年）、克洛德·爱尔维修（1715—1771年）为代表的更极端的自由思想者之间找到一条折中的道路。例如，狄德罗在编写《百科全书》的“基督教”、“信仰”和“天意”等条目时，就采取了自然神论立场。伏尔泰毫不吝惜地攻击正统宗教，但也同样饱含激情地反驳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1770年），捍卫上帝的存在。在思索夜空的时候，他写道：“只有瞎子才不为此景所惊叹；只有傻子才不承认这一奇迹的创造者；只有疯子才不崇拜这个创造者。”他一语双关地表示：“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必须把他创造出来。”[8]

启蒙哲学家们反对教会和国家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令人产生这种印象：天主教和绝对君主制在盲目反对所有理性和变革中联合起来了。据说狄德罗对救赎来临之事予以尖刻的讥讽：“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牧师的肠子勒死。”他的说法极其接近主张进步与反动水火不容的简单化革命观点。后来，天主教宣传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尔[602]（de Maistre，1754—1821年）的立场同样极端，但他的观点却截然相反。在他的著作《关于法国的思考》（1796年）中，他坚持认为反叛与不虔诚是同义词。

理性经济学在启蒙运动中居于优先地位。普遍的进步观念体现为经济进步思想。在微观层面上，绅士们专注于崛起中的地产经营学，坚信他们的地产不仅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变成兴旺繁盛的实业。荷兰人的土地开垦和以荷兰模式进行的开垦改变了从东英吉利的

沼地到维斯瓦三角洲的一些低地的面貌。圈地运动加速进行，尤其是在英国，这对农民构成了威胁，但却有望造就适合商业性耕作的大型农业单位。合理的畜牧方式、秧苗挑选、土壤施肥、庄稼轮作、沼泽地排水等，提高了产量，获得巨大的收益；1770 年代的温莎的“农夫乔治”（国王乔治三世的绰号）以及诺福克郡霍尔克姆的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在农奴制盛行的国家里，一些开明的地主相信如果解除农奴的劳役义务，他们的工作会更有效率。从法国到波兰，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主动解放农奴的例子。

宏观层面上，一种独裁类型的重商主义长期执掌牛角。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让—巴蒂斯塔·柯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 年）就是典型代表。在他的领导下，开始兴建国家手工工场，在殖民地开发种植园，整顿税收，修建码头、道路，开凿运河，改善交通。类似朗格多克大运河（1681 年）的运河在欧陆比比皆是：西班牙的瓜达尔基维尔运河、瑞典的埃斯基尔斯蒂纳运河、立陶宛的奥古斯托夫运河、俄罗斯的涅瓦—伏尔加运河。

但是，人们日益坚信，若非消除人为的限制与束缚，经济生活就无法突破某种极限，不能扩展。爱尔兰银行家理查德·坎特龙（Richard Cantillon，卒于 1734 年）的著作是这一潮流的最初体现。老米拉波（Mirabeau）在脍炙人口的著作《人类之友》（1756 年）中引用了坎特龙的话。但真正使得这一思想得到普及的是一群与百科全书派有关的经济学家或“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 年）、让·德·古尔内（Jean de Gournay，1712—1759 年）、J.P. 杜邦·德·内穆尔（J.P.Dupont de Nemours，1739—1817 年）。当时有名的口号“农民穷，国家贫”就包含这样一种革命思想：只有保证每一个人的富足与自由，国家的繁荣才有保证。魁奈的信徒雅克·杜尔哥（Jacques Turgot，1727—1817 年）试图把这一学派的原则应用于政府的实际运作之中，最终失败了。但是 1765—1766 年间曾居住于巴黎的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年）成为了魁奈圈子中的密友。对于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来说，这段经历在他思想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市场]

[604]

市场（MARKET）

亚当·斯密博士（1723—1790 年）是一位极度心不在焉的教授。他有一次冲泡了一杯黄油面包，却说这杯茶太难喝了。他喜

欢衣冠不整、神情恍惚地在街道上漫步，用假声与自己激烈地辩论，并以他那独一无二的“蠕虫般的”步态行走。这已成为了爱丁堡一景。他有一次在滔滔不绝之际径直走进了一个硝皮坑。他几乎是无法结婚的，因而一直与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想想这样一个生活乱得一团糟的有趣人物居然着手把一种思想上的秩序说成日常生活的机制，这是很有意思的。[1]

在英格兰学术生活沉睡的时代，斯密和他的朋友大卫·休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明星。他曾与约翰逊、伏尔泰、富兰克林、魁奈、伯克等人过从甚密。国王的大臣们在接见这位年长的教授时全体起立。威廉·皮特说：“斯密先生，我们都站起来了，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学生。”

斯密28岁时就出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并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他的职业生涯由此开始。《道德情操论》探讨了认同与反对的根源。他自问人类贪婪的含义是什么，自私如何能为公益服务，并由此进入了经济学的王国。他的900页的《国富论》(1776年)实质上就是继续扩展这一探索的文章。它粉碎了统治经济思想200年之久的重商主义学派保护主义哲学。斯密不断思索，提出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社会”，所有人都参与社会机制的运作。他还提出了“市场”规律,勾勒出生产、竞争、供给、需求和价格的运行机制。对于劳动力的组织他尤为重视，这在他关于一所别针厂著名描述中可以体现出来。合理地分配任务、实现技能专业化，就能使工人们一天生产48000个别针，而每个工人一天只能独立生产2至3个别针。他同样强调市场的自律性，强调如果市场不受阻碍，就能促进社会和谐。他发现了两大基本市场规律——积累规律和人口规律。他的文字令人震惊：“对人的需求必然调控人的生产。”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让市场决定一切”。[2]

自此之后，经济学一直探索斯密提出的种种问题。这条线从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经由霍布森、巴师夏和马歇尔，一直延伸到凡勃伦、熊彼特和凯恩斯。在斯密手中，经济学还是思辨哲学的一个分支；现在，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他们所作出的 [605] 结论的脆弱性。但在大众心目中，经济学有更大的抱负。它填补了由于宗教衰落、大众道德下降而造成的真空；并日益被视作为公共政策的焦点，医治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甚至是个人满足的源泉。它不再安于作一门技术性学科，用医学解释人体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它本身就要成为目的所在，它将定下目标、动机和激励因素。看到这种情况，斯密这位道德主义者定会惊得目瞪口呆。

长期以来，理性主义的政治理论是与对绝对君主制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而绝对君主制与追求秩序和谐的古典主义精神相吻合。理性主义政治学是试图找到对付地方特权和封建特权的这堆乱麻的最有效方法。霍布斯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不谈他的论证过程——与莫城主教、伟大的波舒埃（1627—1704 年）这样的法国教士的结论相去不[603]远。而波舒埃是君权神授的主要鼓吹者。但在十八世纪时，论证却改变了方向。洛克在他的两篇《政府论》（1690 年）中提出，政府应服从自然法并反对世袭原则。他认为应存在某种形式的中立权威，以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纠纷。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强调财产权的同时，还提出了政府是通过缔结一个社会契约而组成的思想，并由此得出了自由主义的基石——“同意”（consent）原则。尽管他几乎没有提及司法权，但是他提倡分权，主张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制衡。这两个原则在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 年）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日内瓦，1748 年）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论述。孟德斯鸠的灵感部分来源于希腊罗马的共和制度，部分来源于英国 1689 年的立宪制度安排：

“每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管理附着于人民权利的种种事务的行政权以及与民法相联系的行政权……如果由同一个人来行使所有这三种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力、执行公众决策的权力和量刑定罪的权力，一切都将失去。”[9]

洛克与孟德斯鸠的理论通过《百科全书》尤其是“政治权威”和“天赋自由”这样的条目而得到广泛传播。它们促进了民主潮流；有的人认为，它们也促成了革命。理性主义的历史写作也走到了历史前台。历史学不再只是编年史和日记中的事件联系，不再是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和君主的鼓吹者，而成为了研究因果联系与变革的科学。波舒埃的所谓《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1681 年）或克拉伦敦伯爵的《大叛乱史》（1704 年）以及天主教和新教对宗教战争的众多记述仍属于旧传统的范畴。但到了十八世纪，一些人转向新式的历史学。培尔的《辞典》（1702 年）把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家按字母顺序编成条目，并以一种不可或缺的质疑精神来审视每个人资料中的确定与存疑之处。它表明，不能接受没有证据的历史事实。维科的《新科学》（1725 年）提出了历史循环论。孟德斯鸠针对古代世界所作的《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 年）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而伏尔泰对查理十二和路易十四的研究则提出了偶然因素和伟大人物的因素。休谟的论文《宗教的自然史》（1757 年）捅破了宗教史的神圣外衣。他们都

不再用上帝的作用来解释过去的事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回归了自马基雅维利和圭奇阿尔狄尼（Guicciardini）时代以来就弃置不用的思维习惯。他们都对新潮的进步观念感受敏锐。1750年7月3日和12月11日，青年杜尔哥在索邦（巴黎大学）分两次宣读了他的长篇拉丁文论文。这篇论文堪称为对进步观念的经典阐述：

[605] 大自然赋予所有人幸福的权利……各代人通过连接世界的现状与过去的一系列因果联系而相互联系起来……人类全体，从起源开始看，对哲学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同各个个体一样都有其幼年期和进步……整个人性，虽然在冷静与激动、幸运与不幸之间交替波动，但缓慢而稳健地迈向更高程度的完善。[10]

历史学家们日益把对自己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注运用到对过去的考察之中。他们不再满足于了解国王和宫廷做了些什么。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美国史》（1788年）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惊世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1788年）是这个时代的两大里程碑。主教亚当·纳鲁谢维奇（Adam Naruszewicz）的《信奉基督教后的波兰民族史》（1780年—）只有一卷得以面世，因为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大使不能容忍在这样一部早期斯拉夫史中，把波兰人描述的比俄罗斯人更加显赫。

反思起来，我们不禁会怀疑，启蒙运动的智者们真的比受到他们无情抨击的宫廷史官和教会历史学家更客观公正吗。吉本对修道院制度的攻击，伏尔泰对波兰一知半解的讥刺——他为了生动阐述他对宗教偏执的观点，把波兰作为了替罪羊——都不过是以一种形式的偏见代替另一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编纂学的范围大大扩展，名声也大有改善。事实上，启蒙运动充满了矛盾。实践启蒙理想的主要参与者们在运动的目的和方法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但他们的观点看法却大相径庭。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就有着天壤之别。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 - Marie Arourt，1694—1778年），在囚禁于巴士底期间使用笔名伏尔泰（Voltaire）。他身兼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宣传小册子作者、国王们的信友等多重身份，但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位战斗的智者。他出生于巴黎，其漫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种各样的流放生活中度过。他的著作、印刷品和出版物都不断遭到谴责。他徘徊于政治和社会上层的外缘，最终极具象征意义地在与日内瓦毗邻的法国边陲小镇费尔奈定[606]居下来。32岁那年，他受辱离开巴黎，除了1744—1747年在凡尔赛

很不舒服地当了三年皇家史官外，他在84岁以前再也没有回到巴黎。他蛰居英国六年，在洛林的吕内维尔城的斯塔尼斯瓦夫·莱茨辛斯基的宫廷的三年大受欢迎，在普鲁士的三年则得到腓特烈大帝的敬慕。他因发表对加尔文的看法而被逐出瑞士。1760—1789年，他在费尔奈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这位“欧洲客栈老板”被人们热情地称为“伏尔泰王”。这位“村长”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抽干沼泽、经营模范农场、建立教堂、剧院、丝厂、表厂。伏尔泰不无得意地指出：“40个野人组成的难民营已被改造成为1200个有用的人组成的富饶小镇。”

伏尔泰出版的著作达100多卷，均致力于宗教宽容、政治上的和平自由、经济上的进取、艺术上的思想导向等目标。在《英国通信》（即《哲学通信》，1734年）中，他盛赞英国的一切，从贵格教派、议会、商业精神到培根、洛克和莎士比亚。这些内容为大陆上的传统天主教人士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而《路易十四时代》则为法国人了解刚过去的事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批判性的视角。哲理小说《老实人》是对卢梭的回应。该书讲述了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老实人”和他的睿智的家庭教师潘格罗斯的故事。潘格罗斯的格言是“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他们从森窦顿脱龙克城堡出发周游世界，遭遇了所有的各种灾难：战争、屠杀、疾病、逮捕、折磨、背叛、地震、海难、审讯和奴役。最后他得出结论，由于世界上邪恶当道，个人所能做的只是把个人的事情处理好。老实人最后的话是“我们只能耕作我们自己的园地”。《论宽容》（1763年）是他发自内心的呐喊。他有感于图卢兹骇人听闻的卡拉事件而作。卡拉这位信奉加尔文教的父亲因被指控反对其子改宗天主教而受车裂之刑致死。《哲学辞典》（1764年）是卷帙浩大的《百科全书》的袖珍本，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此外，他还著有大量悲剧、无数论辩性小册子和约15000封信件。他在巴黎去世前，有幸看到人们在他最新戏剧上演的舞台上为他的半身塑像加冕。目睹此景，伏尔泰说：“如果我被处决，也会有这么多人来观看的。”他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 我们出生，生活，我的牧羊女，
> 为何而死，如何而死，不得而知；
> 人人皆来自虚无；
> 去向何处？亲爱的，只有上帝知道。[11]

他曾宣称，“吾至死崇敬上帝，爱吾友，于敌亦不怀仇恨，惟憎恶迷信。”[12]

让—雅克·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年）出生于信奉新教的日内瓦。比起伏尔泰来，他的流浪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607]他展现出几乎同样的多方面才华：音乐家、小说家、哲学家，而且享有与伏尔泰相当的崇高声望。他童年时代出逃，在萨伏伊和瑞士的马路生活了近十年，后来在一位居住在阿讷西的笃信天主教的夫人劝说之下改宗，并为她所收留。卢梭几乎是自学成材，为了生计，他曾做过家庭教师，芭蕾舞教练，在巴黎当过随从，曾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馆秘书。他与一个贫穷简朴、未受过教育的女子黛莱斯·勒瓦瑟同居，育有五个子女，都送往孤儿院照料。这段关系成为他的大部分压力的来源，也是促成他的许多思考的一个动力，很可能还是他间歇性精神病的根源。中年卢梭凭借在第戎科学院折桂的《论科学与艺术》（1750 年）及大受欢迎的歌剧《乡村乐师》（1752 年）而一举成名。他与狄德罗成为密友，并由此卷入巴黎沙龙聚会，他时而在沙龙上光芒四射，时而又为此所害，最后他再次开始流浪生活。子虚乌有的阴谋迫害幻想困扰着他。担心伏尔泰党徒的加害和他内心的不安全感，使他四处流亡：日内瓦、普鲁士统治下的纳沙泰尔的莫捷、比安湖中的小岛、英格兰、多菲内的布尔关和蒙特宽。他最后的岁月在巴黎度过，修改他的回忆录和《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1782 年），最后在埃默农维尔城堡中与世长辞。

卢梭的逆反性格使得他用启蒙运动的方法来否定和贬低启蒙运动的成就。使他一举成名的论文提出了文明腐蚀人类天性的看法。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 年）用一种田园诗的眼光来描绘原始人的生活，把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痼疾归咎于经济的繁荣。这使激进派和保守派联合起来反对他。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 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的故乡阿尔卑斯山麓的爱情故事。小说在激情、道德情操和未被驯服的天性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爱弥尔》（1762 年）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描述了如何抚养一个孩子，使之免遭文明带来的人为堕落。自然之子应从上帝给予的经验中学习，而不是从人类编写的书籍中学习。要幸福快乐，他必须具备技能并保有自由。

《社会契约论》（1762 年）是一本真正革命性的著作。开篇就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邪恶不公大加挞伐：“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主要理念——公意、主权国家以及契约本身——表明解决办法不能由任何理想的统治者来确定，只有根据被统治者的利益才能有效地确定。伏尔泰诉诸开明的精英，而卢梭则诉诸大众。

卢梭的《忏悔录》（出版于 1782—1789 年）以极其生动坦诚的话语剖析了自己不讨人喜欢的个性。他坦陈了自己的内疚与疑虑。一位

评论家写道："他知道读者会原谅他，因而痛心疾首地捶胸顿足。"这种对自身扭曲心理的专注使人想到以后的一个时代。卢梭鄙视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他耿耿于怀，定会在最后审判日告诉上帝："我比那个家伙更好！"[13]

教育是启蒙运动思想最容易付诸实施的领域。教会实际上垄断了[608]学校和大学的课程，长期以来冲淡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影响。在天主教世界里，招收男生的耶稣会和虔敬会学校，以及招收女生的乌尔苏拉会学校，各有自己的规矩。法国胡格诺和詹森派学校被关闭后，教育呈现僵化。如果吉本对剑桥的回忆可以相信的话，新教世界的学校也是慵懒麻木盛行。他回忆道："在马格达伦学院度过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碌碌无为的五年。"苏格兰与普鲁士的学校和大学情况要好得多。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1664—1727年）在哈雷大学内创办的学社，柏林开设的世俗学校，为地方技术学校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启蒙运动处处都与教育中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对抗。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学院"条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所有这些意味着，一个年轻人……十年后离开学院时，只有对一门死语言的一知半解，和他本该努力忘记的修辞概念和哲学；往往是健康不良……更常见的是他对宗教的知识如此肤浅，因此第一次碰到亵渎神灵的谈话就缴械投降……"[14]

就长期而言，在启蒙运动影响之下，宗教教育与一般教育逐渐分离；现代科目逐渐成为对古典科目的补充；并且，正如边沁长期争取创办的伦敦大学那样，高等教育在摆脱教会的监护。[夸美纽斯]

但《爱弥儿》的影响是无可匹敌的。卢梭对同时代哲学家的方法不以为然。他写道："洛克的箴言是与孩子们讲理，这也是当下流行的做法。但……那些用讲理来培养的孩子是我见过最愚蠢的。"（《爱弥儿》）相反，他提倡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对孩子实行"自然主义教育"，在青春期以前禁止使用书本教育。他打破了关于孩子发展的流行看法。第一本以卢梭精神写成的教育手册是 J.B. 巴泽多（J.B. Basedow）的《初级读物》于 1770—1772 年问世；两年后，他在德绍开办第一所学校——博爱学校。

但当时最为大胆的教育计划出现在波兰。1772—1773 年，波兰的特殊情况促成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建立。这是欧洲最早的国家教育部门。它的出现正好遇上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政治危机和耶稣会的解体，前者为它提供了动机，后者给它提供了大部分的智力支持。几年前，

[609]

夸美纽斯（COMENIUS）

1670年11月15日，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在阿姆斯特丹去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项完全失败了的事业的头号怪人。他是捷克兄弟会派的最后一任主教；近五十年的时间他被放逐在外；他在未完成的著作《人类改进通论》中就普遍和平与文化问题提出了高瞻远瞩的观点。他曾预言教皇将被推翻，1672年世界将终结。但这种预言只不过激起人们的嘲讽。

夸美纽斯1592年出生于摩拉维亚，他一生都在与潮流抗争。他游历广泛，在海德堡大学就读。他曾希望一直当富尔内克（位于今捷克境内）兄弟会学校的校长。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取得胜利，1621年把他驱逐到波兰；1657—1658年波兰国内亲瑞典的新教徒遭到迫害，他流亡到尼德兰。他的大部分经历都用于宣传波希米亚命运，撰写教育学的论著以及担任巡回教育顾问，并以这一身份游历英国、瑞典、特兰西瓦尼亚等地。[1] 他甚至还受邀出任哈佛校长。

但是，事实上，夸美纽斯的观点连贯，他的批评者难以忍受。他对教育改革的激情直接来自于捷克兄弟会的原则。捷克兄弟会是以本国语阅读圣经的胡斯派传统得以成长的土壤。他来自于摩拉维亚这样的多语种省份，又曾在十几个国家生活，因此了解对语言教学的需求。为战争与宗教冲突所困扰的生活，自然而然使得他对于和平的乌托邦有着强烈的渴望。

他以多种语言写作，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声誉。他的早期作品《世界迷宫》和《心的天堂》描述的是一种心路历程，是以捷克语写成的。《语言入门》，最初是作为拉丁语、捷克语和德语的三语教科书，后来被译为几百种文字，其中包括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世界图解》（1658年）成为了视像学习的先驱，同样大受欢迎。他的教育论著汇编《夸美纽斯教育论著全集》（1658年）比起他那些短命的政治著作来影响更为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夸美纽斯留下的遗产越来越重要，并吸引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崇拜者。

在宗教领域，下一个世纪里那些以“摩拉维亚教会”新形式复兴了捷克兄弟会的人，对他推崇备至。（见原书第594页）

在捷克复兴的年代中，他被尊为民族的圣人。帕拉茨基（Palacky）为他编纂传记；吕特佐夫（Lutzow）伯爵使《世界迷宫》

风行全世界；T.G. 马萨里克（Masalyk）把他视作为捷克民主与人文主义历史的关键人物。他的回忆录第一部分就命名为“夸美纽斯的圣约”。[2]

现代教育理论家把夸美纽斯视为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所编写的教科书有助于儿童理解，也启发了福禄培尔（Froebel）、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和蒙台梭利（Montessori）等人，他们发展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渐进性学习方法。[儿童] 普遍教育的提倡者把他的文章奉为前人典范而加以引用：[610]

> 不仅有钱有势者的孩子应被送往学校，所有的孩子，不论贫富，不分男女，不论城市或乡村，都应该来上学。如果有人问：“要是工匠、乡巴佬、脚夫，甚至连女人都识字了，结果会怎样？”我会回答说：“他们都将有思考、选择、跟随和做好事的能力……就算有人似乎天生愚钝也不成问题……一个人性情越是迟钝软弱，他越需要帮助……”[3]

每个孩子阅读漫画，查阅图书，听电视讲座，看电影录像时，都该把夸美纽斯尊为良师益友。

当波兰的改革者孤注一掷想要摆脱俄国对波兰令人窒息的控制时，他们曾向卢梭征求意见；卢梭充满同情地写作了《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1769 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关于教育的。他建议创立一个单一的统一教育体系，以取代所有现存的机构。波兰人相信了他，波兰的最后一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以此作为同意瓜分波兰的条件。波兰的政治前景[610]一片黑暗；但它仍有可能赢得文化的复兴。此后 20 年时间中，国家教育委员会创建了近 200 所世俗学校，其中大部分在共和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他们培训了新的教师，前耶稣会成员编写了波兰语言和文学、科学、现代语言等科目的教科书。这位国王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只要今后 200 年内仍有人自称为波兰人，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波兰的的确确是灭亡了（见原书第 661—664、719、721—722 页），但它的文化却没有消亡。国家教育委员会被取缔，但它的理想被成为俄罗斯帝国西区的地区教育委员会继承。在恰尔托雷斯基（Czartoryski）亲王的开明管辖下，这个教育委员会直到 1825 年才结束。它为波兰培育出了最有才华的一代爱国者和文人，他们学习诗歌，激扬文字。[15]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国家中，启蒙运动的思想作用于不同的目的。在尼德兰和不列颠，启蒙思想形成了权势集团自由派主张的一部分。C.J. 福克斯（C.J.Fox）和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英国议会的演讲就体现了启蒙精神。在美洲殖民地，公然挑战英国统治的“叛乱者”诉诸启蒙思想。在法国，它们则激励了反对旧制度但缺乏合法手段的思想界人士，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但程度稍小。中欧和东欧许多地方，如同急切期望改善自己地产经营状况的乡绅一样，“开明专制君主”们想使自己的国家欣欣向荣，也有选择地采用了启蒙思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确实认为他们自己是富于理性的开明君主，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和他的兄弟、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不例外。但他们与他们的哲学家顾问之间的关系却通常是专制的主人与恭顺的门客之间[611]的关系。伏尔泰阿谀的功夫比起他的机智毫不逊色。他对腓特烈的穷兵黩武、叶卡捷琳娜的残酷迫害定有所想，但他却很少直言。只有卢梭曾对腓特烈直言不讳。[正步]

[612]

正步（GOOSE—STEP）

普鲁士军队的阅兵式行进，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矫揉造作却最富表现力的肢体运动形式之一。外国评论家称它为“鹅步”（goose step）。一行行士兵脚蹬长统靴，经过训练，每个上踢运动时脚尖绷直，腿抬高至水平位置。为保持平衡，他们必须身体前倾，手臂像机械悬臂一样摆动，最典型的特征是下颌前伸。由于迈出每一步都需付出巨大努力，音乐节拍必须保持适中或缓慢。行进时还必须表现出一种严肃的，似有威胁靠近的气氛。尽量使自己面部表情狰狞可怕，这也是士兵们必须做到的一部分。

正步的肢体语言传达了一套清晰的信息。对普鲁士将军们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士兵所受的训练和强健的体魄使他们能承受各种命令，无论多么痛苦或是滑稽可笑都能完成。对普鲁士平民来说，这意味着任何不服从都会被无情地镇压。对普鲁士的敌人，这意味着普鲁士军队不仅是一群身穿制服的年轻人，而且还是纪律严明的一群超人。对全世界而言，它宣称普鲁士不仅强大而且傲慢。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体现。

正步的气氛与其他国家军队的阅兵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法国军队以其轻步兵的高速行进步伐而自豪。当军号吹响，

他们的行进就充溢着精心培养出来的一种冲劲。波兰骑兵一往无前地冲锋，他们往往是在距司令的观礼台一英尺处急停下来。这里所展现是一种令人欢跃的马术和演技的融合。伦敦皇家步兵卫队的慢速行进气势宏大，每一迈步都会有一刹的停顿。它所流露的是一种典型英国式的宁静祥和、自信自制的脾性。

正步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十七世纪就已经有了记载，直到二十世纪末仍存在。1945 年之前，普鲁士和德国所有军队都以此作为标准的阅兵式姿势。世界各国由普鲁士军官训练的军队或崇拜普鲁士模式的军队也都采用了这种步法。在欧洲，俄罗斯军队和后来的红军、苏联所有卫星国先后采用了它。西德的联邦国防军不再使用正步，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队依然保留了这一形式，直到 1990 年 11 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1994 年，莫斯科克格勃的特别支队仍在表演这种正步：过去 70 年来他们一直用高抬腿的慢动作，完成环绕列宁陵墓的仪式。

人们也可以看到，启蒙运动的理想在历经革命危机的动乱剧变之后仍存留下来。革命前时代的启蒙改革家们，如普鲁士的冯·斯泰因男爵（von Stein，1757—1831 年）、奥地利的犹太改宗者 J. 冯·索南费尔斯男爵（von Sonnenfels，1732—1817 年）、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斯塔希茨（Stanislaw Staszic，1755—1828 年）或巴伐利亚的冯·蒙特格拉斯伯爵（von Montgelas，1759—1838 年），他们在 1815 年之后仍然活跃。但这些 1789 年之后崭露头角的革命家们——米拉波、丹东、孔多塞、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在此之前却默默无闻。就此而言，托马斯·潘恩（Tom Paine）是个例外，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也是如此（见第 9 章）。

尽管如此，截至 1778 年卢梭和伏尔泰相继去世后，启蒙运动开始飞速进行，其影响持续数十年仍强劲不减。事实上，它作为现代欧洲思想的一个永恒支柱，其地位已稳固下来。但最初推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却渐渐失去说服力。纯粹理性已被认为是不足以承担理解世界、解读剧变征兆的任务了。

浪漫主义 这个标签涵盖了无数罪恶。对文化理论家来说，这一问题极其复杂，一些人坚持认为浪漫主义不止一种。但是这里指的是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的针对渐趋衰落的启蒙运动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它与正规的宗教无任何联系。事实上，它所包含的许多特征如果不被认为是积极地反对基督教，也至少可以认为是非基督教的。

其主要关注点是人类经验的精神和超自然领域，这一点也是宗教十分关注却被启蒙运动所忽视了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启蒙运动对此前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所关注的东西是矫枉过正。而浪漫主义有时被视为对启蒙运动这一缺陷所作出的回应。最好把它看作是某些时尚和思想的延伸继续。它们尽管一直存在，却与启蒙运动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些思想常常被归纳为“反启蒙运动”或“前浪漫主义”。

关于“反启蒙运动”的讨论集中在从那不勒斯人维科（1668—1744年）到三个东普鲁士人哈曼、康德和赫尔德所提出的哲学论题上。维科的《新科学》（1725年）除了提出历史循环论外，关注传说和原始社会所使用的象征表达方式。大多数启蒙哲学家会认为这些课题幼稚浅薄，不屑一顾。维科与赫尔德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大脑如何过滤、解释如此巨量的数据，建立起对过去和现在的认知。他们都强调历史视角的作用，都“觉得……把这些杂乱无章的材料合成为连贯的[613]图像所需的天赋，与调查的理性方法所需的天赋是极为不同的……最需要的是创造想象力。”[16]

J.G. 哈曼（J.G. Hamann，1730—1788年）一生都在柯尼斯堡和里加度过。人们对他并不注意，认为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哲学家。他所写的那些德语文章复杂难懂，次序混乱（无法翻译），仅散见于一些小册子中。但他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发展了休谟关于非理性的思想，在同时代人中广负盛名并受到专家的好评。甚至有人声称哈曼“点燃了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反叛运动的导火索”：

> 哈曼代表了那些听到了铁耙下蟾蜍的呼叫声的人们，就连铁犁耙过他自己时他也要仗义执言；因为如果大众听不见这呼喊，如果蟾蜍因为受到‘历史谴责’而被一笔勾销……那么这种胜利只能是他们无所作为而致。[17]

当然，思想渗透一种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活跃和成熟于1770年代和1780年代的一些人直到后来才产生重大影响。康德和赫尔德尤其如此（见第9章）。

但是，许多评论家都坚持把卢梭包括进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卢梭与其说是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不如说是第一位浪漫主义者（至于他为什么不能两者皆是尚无充足理由）。卢梭认为人性本善，这一观点与同时代大多数人相左。他们满怀敌意，认为人性需要驯服和纠正。卢梭对感性的诉诸、对情感的推崇，标志着欧洲风气的又一转折：

卢梭具有流浪汉的品味，因此对巴黎社会的清规戒律充满了厌恶。浪漫主义者从他身上学到了对于传统束缚的蔑视——先是对服饰礼仪……最后扩展到了整个传统道德领域。[18]

卢梭对他的故乡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充满热爱，这也使得人们对环境的态度有了改观——此前他们对环境惧怕而退缩。卢梭对普通民众的推崇，尽管有一种致力于民主的真诚，但有时却被视作为极权主义的源头之一。

对“前浪漫主义”的讨论通常是围绕与狂飙突进派——因 1777 年上演的 F.M. 克林格尔（Klinger）的同名戏剧而得名——和符号象征理论有关的文学主题来展开的。在 1770 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中，长期消极软弱的德国站起来反对法国的理性主义，欧洲文化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歌德的第一部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 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书中那位忧郁的少年主人公自杀了。歌德曾说他在创作这部书时，他决定“屈从于内心的那个自我”。这个决定与古典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但影响最大的还是一位来自苏格兰金尤西的中学教师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 年）。他成功地创作了最伟大的文学伪作。他称他的《古诗片断》（1760 年）、《芬歌尔》（1761 年）和《帖莫拉》（1763 年）为盖尔族吟游诗人莪相（Ossian）作品的译[614]本。后来正如约翰逊博士所了解到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尽管如此，这些对苏格兰高地智慧的满怀忧思的转述，却脍炙人口。赫尔德就是它在德国主要的仰慕者。不仅仅是在德国，据说，该书的意大利文译本是拿破仑最喜欢的一本书。

古典传统在艺术领域也受到抨击。1771 年，在伦敦皇家学院举办的夏季展览会上，宫廷画家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1738—1820）展示了他的一幅作品《沃尔夫将军之死》，纪念 12 年前死于魁北克的沃尔夫。令观赏者震惊的是，画面中的人物身着当代服饰，垂死的将军身着红色的军人短制服。老资格的艺术家乔舒亚·雷诺兹把韦斯特带到一边，给他讲用古代的托加袍和月桂花冠等衣饰来装点历史和道德场景的规矩。破坏规矩的绘画就缺少了那种超时空的中立的背景，就不能保证画中讯息的传达。但这种说教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因为现实主义已经来临。至于浪漫主义是否随之而来，只能依靠推测了。[19]

法国的霸权在欧洲持续了近 200 年，从 1661 年年轻的路易十四亲政开始，一直到 1815 年拿破仑的垮台。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国

败北，但它独步欧陆的地位并未最终被取代，直到1871年法国向俾斯麦的德国投降。在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作为欧洲政治、文化和时尚的中心的地位是无可匹敌的。[领带]

[615]

领带（CRAVATE）

法语“领带”一词cravate，几乎被所有欧洲语言所吸纳。它在德语里是krawatte，西班牙语是corbata，希腊语是gravata，罗马尼亚语是cravata，在标准波兰语中是krawat，在克拉科夫的波兰语中奇怪地变为krawatka。在英语中，它特指“亚麻或丝质手绢，通常戴于衬衫领子之外，绕脖一圈或两圈。”[1] 在标准法语的《利特尔词典》中，它有两种不同的意思：1．克罗地亚产的马。2．男人戴在脖子上的轻软纺织品，有时女人也佩戴。[2] 所有资料都一致认为，它是从“croat”或是克罗地亚人认为的“hrvati”的古代形容词衍生出来的。

一个东欧的形容词究竟是怎样与一种最为普遍的欧洲服饰永久地联系起来的，这只能靠人们的猜测。一种观点认为，拿破仑对俘获的哈布斯堡士兵所佩戴的围巾很欣赏。[3]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利特尔词典》中提到伏尔泰用过这个词，而当时拿破仑还没有出生：“你看到一身猩红的魔鬼了吗？……他戴的是一条蛇，而不是领带（cravate）。”[4]

路易十四可能更接近谜底。最为可能的是凡尔赛的克罗地亚雇佣军带来了这种席卷全世界的时尚。不管怎样，那些否认欧洲“小民族”影响力的人应该记住，克罗地亚人扼着我们的喉咙。

有意思的是，在克罗地亚，男人们可以用本地的masna来装饰他们的脖子，也可以用再次引进的kravata。

法国长期称雄，部分原因是它所拥有的广袤领土和庞大的人口这些天然优势，以及它对于经济、军事资源的系统培育；同时也是由于它的主要对手陷于混乱状态之中：西班牙衰弱不堪，德意志满目疮痍，意大利四分五裂，而奥地利则专注于对付奥斯曼帝国。另外，波旁王朝历代君主们惊人的高寿无疑也有助于巩固法国的地位——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先后成为统一和稳定的中心。最终导致法国逐渐衰落的因素在于法国社会内部不断增长的紧张态势和新兴强国的

崛起，尤其是大不列颠、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些国家在路易十四即位之时根本还不存在。

同所有伟大的政治有机体一样，法国的“旧制度”经历了三个显著的阶段：成长、成熟和衰落。第一发展阶段是从 1661 年到十七世纪末，正值路易十四风华正茂的统治中期。第二阶段是从路易十四理想破灭的晚年到路易十五驾崩，在此期间，法国受到反法同盟的遏制。最后一阶段是路易十六在位期间，他和他的大臣们无法控制愈益严重的局势，在 1789 年终于爆发了欧洲所曾经历过的最大的革命风暴。对法国人自己而言，这是一个“炫耀国威”的时代。路易十四在[615] 1688 年 1 月 8 日给维拉尔侯爵的信中写道：“自夸自大是与最高统治者最为相配相宜的品质。”[20]

比起欧洲其他君主来，路易十四更被视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最高象征。他统治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72 年。这个“太阳王”受到顶礼膜拜。这种崇拜情绪影响了他的朝臣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观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曾坐镇埃尔埃斯科里亚尔（马德里西北 42 公里处）而统治世界，路易十四也身居凡尔赛的堂皇宫殿而统治法国。他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据称，他是专制主义最完美的形式——纯粹君主制的体现；是模范的统一的政府结构的建筑师与鼓励者；是经济与殖民事业的推动精神；是艺术与思想品味的独裁者；是这个未滋生宗教异端的天主教民族“最基督教化的国王”；是欧洲外交的领袖；是欧陆[616]最为强大陆军的指挥官。这种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太阳王”无疑是小国君主们争相效仿的君主。他在他的周围都打上了他个人的烙印。他的功绩也并非不可想象的。但没人能与这样一个夸大的形象相匹敌。在承认他的实验的伟大同时，也必须努力去发现隐藏在王权面具之后的那个人，去发现凡尔赛宫熠熠生辉的外表之下法国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

很难把路易十四的真实个性与被他视为君王事业之关键的戏剧性表演区分开来。他在“福隆德”（投石党）运动的恐怖之中成长起来，这一运动撼动了近代法国君主制的根基。他本能地感觉到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国家渴望秩序，渴望强有力的政府。因而，他所设计和建立的凡尔赛宫廷不仅仅是一个夸饰虚华之物。它把贵族牢牢地束缚起来为国王和国家服务：盛大华丽的宫廷舞会、芭蕾、音乐会、戏剧和狩猎、宫殿大花园中的盛宴和烟火，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贵族子民对他的恭顺服从，为了创造一种国家共同体意识。从 1661 年马萨林（Mazarin）去世、他开始亲政之日起，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其目的。在他亲政后举办的第一个盛大的露天宴会上，他以主角的身份出现，这并不仅是为了娱乐（见插图 47）。路易十四从他西班牙血统的

母亲那里继承了对礼仪的喜好，又从马萨林那里学到了保密与伪装的技巧。他英俊潇洒、精力充沛、胃口惊人、喜怒无常；时而勇武慷慨，时而卑鄙恶毒。在骑马、射猎、胃口和性爱方面，他那些狂热的随从远逊于他。但在沉醉于美酒与女色的同时，他还能够密谋策划推翻他的同伴。就像1661年尼古拉·富凯（N. Fouquet）案一样，他武断地逮捕了他的重臣。"太阳王"也难脱猥琐。

路易十四向黎塞留（Richelieu）和马萨林学习，牢牢地控制了可以增强其权力的工具。他继承了一个庞大而顺从的官僚体系，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一个丰盈的中央金库和一个屈服了的贵族阶层。他还进一步扩展权力，控制了早已屈从的法国天主教会，摧毁了胡格诺教徒的"国中之国"，派遣他的总督统治外省，取消了任何形式的中央立法机关。他在宣传上最有天分。凡尔赛宫成为理想的象征，其光辉掩盖了法国的实际状况。对法国人和外国游客而言，各种仪式的光辉与壮观无疑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太阳王是一个完美的权力体系的中心。据传闻，路易十四曾走进一个法院，打断了法官的话，说道："朕即国家"。此时的他不一定确信他自己的机智妙语，但他肯定会佯装自信。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足以开出一长列清单：从路易丝·德·拉·瓦莉埃到曼特农夫人。这是对古老的虔诚教友会的道德法规的嘲笑，并因此创造了一种氛围：国王的欢愉就是法律。专制主义的伟大[617]实验的辉煌外表之下是百出的漏洞。凡尔赛宫并不等于整个法国，国王的意志正处处受到抵抗。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逃避责任远比执行实施一项法令来得容易。追求划一的努力尽管是强而有力的，但也不能抚平所有的皱褶不平之处。高等法院与外省时有抗拒之举。路易十四对外战争实际的收益不多，债务与羞辱却接踵而至。

因此，我们不能仅通过分析法国政府的机构设置来理解法国。路易十四从内部重振皇室权威的长期努力并未伴随着大规模地废除地区与城市的各种限制条款的举措。法国的各大省份分为"财政区"和"等级省"。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由王室官员直接控制，后者则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北方实行习惯法，南方则是实行罗马成文法。各省内部还存留着大量的地区自主权、高等法院、免税权、特许权；贵族在各自的领地内还保有大部分传统司法权。当然，最重要的是：国民大会，即三级会议，必须名存实亡；巴黎高等法院必须学会不经讨论就让敕令登记生效。约50000人的庞大官僚队伍唯利是图，腐败堕落，成为压在全国人民身上的重负。他们对国王的命令推诿拖沓，对地方臣民的需要反应迟钝。

国王的主要优势在于国内不存在可能集结形成其他权力中心的重要机构。在不会受到联合反抗的情况下，他可以建立一个由他直接操

纵的、简练精悍但权力极大的中央机构，并且在各省建立一个足以镇压地方叛乱的新的统治网络。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最高会议”，其成员是一小撮秘密顾问，会议由国王召集，每周两三次，就一些重大的国内外政策进行咨询。路易十四实现了他早先的夸口——成为自己的首席大臣。1661 年之后的关键十年中，他与他所宠信的勒泰利埃（Le Tellier）、利奥内（Lionne）和柯尔伯三人密切合作。建议的提出与政策的执行都委于国务秘书——最初有外交国务秘书、军事国务秘书、海军国务秘书和皇家国务秘书等人——和一系列次级委员会，如负责财政的王室财政会议、负责法律命令的内政外交委员会（枢密会议）、负责宗教事务的信仰委员会、负责法典编纂的司法委员会。

国王早期在执行决策上依赖于一些特别委员会，他将他们派出去执行一些特殊任务。但他越来越依赖于总督：他们可以很快就从单纯的调查监督员升迁为终身总督，各自负责辖区内的财政与司法事务。最后，他依赖于军事改革：废除了旧的贵族征募制，创立了一支完全听命于国王的庞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是贯彻其内外政策的工具。

传统的三个等级的社会结构与法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日益脱离。理论上，三个等级应该是自治的、自我管理的群体。而实际上，他们已[618]经高度碎化；它们还被剥夺了真正的自治权，都日益屈从于王权。只有教士（第一等级）保留了自己的组织——五年会议。但由于国王控制了 600 多个主要的教区长和主教的任命权，而且高级教士与低级教士之间存在利益与观点上的巨大分歧，这实际上使得他们失去了群体的主动性。

黎塞留驯服了贵族（第二等级），而“福隆德”运动的失败又使贵族进一步蒙羞。同样，他们内部也存在分裂对峙。大公们变为领取王室年金、看重头衔甚于实际影响力的人群。大部分旧贵族家族日益依赖于为王室服务而求取生存，或者是通过占据司法、行政部门的职位成为“穿袍贵族”，或是通过军职而成为“佩剑贵族”。大量暴发户和升迁者（莫里哀曾讽刺过的“资产阶级贵族”）的涌入，使得贵族阶层的影响大为削弱。诸如奥弗涅地区等偏远地带的小贵族和强盗头子这样的惹是生非之人在绞刑的威胁面前也乖乖就范。

至于第三等级，由于囊括了除第一、二等级之外的所有人，成分复杂，根本没有产生一种共同目标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社会升迁希望就是以钱买官或是买下贵族爵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是最受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仍是受到领主、教士和王国官员的三重税负剥削的农奴，挣扎在饥饿线的边缘。学者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称他们为“野性未泯的动物”。他们自己也常常用“在恐惧之中”来形容他们的境况，这是对于灭绝的一种原始恐惧。他们因绝望而频繁

起事，却屡遭挫败。这已成为乡村里司空见惯的情况。

经济政策是大实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初被人们认为是“大理石人”（冷面人）和“典型的资产阶级贵族”让—巴蒂斯特·柯尔伯的领导之下，一个系统的计划在构想中成熟，旨在使财政、税收和商业都建立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这种“柯尔伯主义”代表的是重商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统制经济，它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失败，尤其是其实施后期。但它是路易十四其他计划得以实现的发动机；在评判其成败时只能以这位君主真正不知满足的财政胃口的庞大需求来加以衡量。

在金融方面，柯尔伯创立了监督总局（1665年），负责监督其他所有的下属机制——国库、王室财政会议、年度前景估算报告、节余清单、国家收支总账。从1666年起，国家铸币厂铸造了精美的路易金币和银币，其币值保持了近30年的稳定。

在财政方面，1674年创立了国债局，通过发行国债来筹资。1680年建立了王国税务总局，协调所有税种的征集，只有臭名昭著的人头[619]税或土地税（由总督征收）除外。柯尔伯死后，预算赤字激增，种种权宜之计都已试过。其中包括1695年开始征收人头税，1701年发行纸币，1710年征收国家什一税。

在商业方面，柯尔伯实行一种新的体制，试图把所有私人活动都纳入国家管制的范围之内，并给予国家企业优先权，尤其在制造业和外贸方面。“纺织品法”（1669年）就是一例，它足以展示他对细致规定的狂热追求。设在阿布维尔的凡罗拜大纺织厂，或是从布鲁塞尔迁往巴黎的戈伯兰织毯厂是他扶持制造业的纪念碑。各种国有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1664年）、西印度公司（1664年）、北方公司（1669年）、黎凡特公司（1670年）——则是他重商主义信仰的证明：他坚信国家的总体财富只能由外贸带来的收益来增加。柯尔伯对海军和修建海军码头、国家武库的热情源自于普遍的重商主义信条：外贸意味着对于有限资源的国际争夺。要赢得竞争就需要军队。重要的是，法国的支柱产业——农业——除了作为价格管制对象和廉价食物来源之外，很少受到重视。

法国军力资源的集结需要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柯尔伯本人强调建立一支能与荷兰和英国抗衡的海军。除了以土伦为基地的传统“苦役船”外，他把所有的水手和停泊的船只编制成册，以供征募。20年间，相关船只由30艘增至107艘，其中包括法国人引以为傲的“皇家路易号”。这是一艘四桅大船，配有118门大炮。柯尔伯还在罗什福尔建立了海军基地，在北部的布雷斯特、勒阿弗尔、加来和敦刻尔克等港口修建了防御工事，开设了海军造船厂和海军学院。

但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比起海洋来，法国更关注其陆路边界。路易十四只亲临过他的战舰一次。柯尔伯的主要对手，无情的军事大臣、卢瓦侯爵弗朗索瓦·米歇尔·勒泰利埃（1641—1691 年）管理国防处，把主要的精力投向发展陆军。卢瓦侯爵的下属官员事无巨细，无所不管。他们废除了旧的贵族征募制，改革了军团编制，创设了新的掷弹兵、燧发枪兵和石炮兵团队。骑兵的传统优先地位被步兵取代。这些新的团队接受严酷的训练操演，他们装备着燧发枪与刺刀，身着精制的制服。这成为了十八世纪军队编训的先驱。炮兵与工兵团曾一度因军队削减而成为平民，现在又重新吸纳进来，服从总体指挥。职业军官在军事学院中受训，依军功而升迁，都由著名的指挥官统领——最初是老蒂雷纳（Turenne），后来是年轻的孔代（Condé）和英姿飒爽的维拉尔元帅（Villars）。所有的大城市都建立了大规模的兵营和军火库。根据著名攻城专家、皇家工程师、城防巩固委员会主席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德·沃邦元帅（Sébastia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 年）的创议，北部和东部边境修建了由 160 个堡垒组成的宏大防御链。萨尔路易、兰道、纽布雷萨克和斯特拉斯堡等地的工[620]程，使法国付出了比修建凡尔赛宫更多的金钱。最终的结果就产生了一架军事机器，只有法国所有邻国联合力量才能使之停止。它的格言就是“以一敌多”。[**阿尔萨斯**]

宗教事务必然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路易十四表现出传统的天主教徒的虔诚，但他遵循着“笃信基督的国王”应当家作主的传统，以及宗教分歧将威胁国家统一这样的信条。1685 年他与曼特农夫人秘密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此后，他又受到了耶稣会建议的强烈影响。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就产生了巨大的前后不一，而且与其他领域一样，法国的宗教事务在路易十四统治早期和晚期形成惊人的反差。1669 年，莫里哀的反教会讽刺剧《伪君子》几经拖延终于上演，受到了王室的欢迎；但 1680 年又被禁演。

30 年来，路易十四是一个真正的高卢教会教徒——用大臣们的亲属充任主教职位，批准了《四点宣言》（1682 年），1687—1688 年还挑起了与罗马教皇的公开决裂。《四点宣言》是高卢教会教义的精练阐述，他下令法国所有学校和学院都要学习：

1. 教廷的权力限于精神领域。
2. 教会公会议所作的决定高于教皇的决定。
3. 高卢教会的教规不受罗马干涉。
4. 教皇并非永远正确，其决定只有在教会接受以后方为有效。

但是，后来路易十四因与天主教势力完全隔离而感到沮丧，于是转变了态度。1693年他撤销了《四点宣言》，并不遗余力地支持教皇

[622]

阿尔萨斯（ELSASS）

1670年的一天，法国军队占领了斯特拉斯堡的莱茵桥并将其焚毁。此举发出一个信号，法国人不满足于他们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的部分阿尔萨斯，不把斯特拉斯堡据为己有绝不甘心。当时斯特拉斯堡是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市，纯粹是德意志城市。它的语言和莱茵河对岸所讲的阿勒曼尼方言（即德语）完全一样。但路易十四是不轻易罢手的。由于模棱两可的“属地归并”策略的实行，斯特拉斯堡很快就将与阿尔萨斯全境一起归入法国的领土。尽管当地的方言可以存留下来，这个省将成为法国统一的试金石。[1]1870—1918年以及1940—1945年的德国复兴并不能长久。

在位于帝国东翼的西里西亚，著名城市布雷斯劳是由西里西亚皮亚斯特王朝的最后一位亲王代表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着。西里西亚从根源上讲不属于奥地利，就像阿尔萨斯不是法国的一样。第一个与西里西亚发生联系的是波兰人，到1526年波希米亚人才与之发生关系。正如阿尔萨斯的本地语言和文化抵制一切将它们完全法国化的企图一样，西里西亚的斯拉夫人也坚持抵制几个世纪以来到达当地统治他们的波希米亚日耳曼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移民浪潮。

在波兰东边是红罗塞尼亚省，波兰300多年来一直统治着大城市勒武。它比斯特拉斯堡法国化和布雷斯劳奥地利化更加波兰化。它的犹太人社区亦享有悠久的历史延续性。但勒武从起源上讲并不属于波兰，而是属于罗塞尼亚的。1670年时，当它成为东部礼拜式教会（乌克兰教会）的最早中心时，乌克兰文化还处于其幼年期。[**维查库夫**]

罗塞尼亚再往东去，莫斯科刚征服了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城（见原书第556页）。俄罗斯东正教会正要在乌克兰中部建立其统治地位，并制造传说称基辅是俄罗斯文明的摇篮。

斯特拉斯堡、布雷斯劳、勒武和基辅具有很多它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多民族省份或国家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任何排他性的民族主张都会证明是特别具有毁灭性的。到1945年为止，它们都被清洗过许多次了。阿尔萨斯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四易其手。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波兰时常为争夺西里西

亚（又名希隆斯克）而开战。奥地利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为争夺红罗塞尼亚（又名东加里西亚，西乌克兰，或东小波兰）至少发生六次纠纷。俄罗斯人、德国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红军和白军、纳粹和苏维埃争夺不下二十次，乌克兰中部遭到瓜分和蹂躏。

1949年，斯特拉斯堡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所在地，此时铁幕隔开了它的东方邻居。事实上，由于布雷斯劳的德意志人口被迫迁离；从勒武涌来大批波兰难民，布雷斯劳刚刚改名为弗罗茨瓦夫；而由于俄罗斯人的涌入，勒武人满为患，怨声载道。苏联东欧集团的内部边界和铁幕一样是不可渗透的。西方发起和解的进程，但用了近50年时间才推进到整个欧洲。 [623]

绝对论者，一直到死。1695年他颁布敕令，使主教享有对教区教士生活财产的绝对控制权。这使得激进派不懈地反对他。在关于寂静主义的争论中，他偏向夸夸其谈的“莫城之鹰”主教波舒埃，反对寂静主义的支持者“康布雷的天鹅”主教费内隆（Fénelon）。他的立场激怒了贵族，也激怒了宗教界人士。不过，正是波舒埃曾经指导路易“成为他的人民的上帝”。

在对待新教徒的政策上，路易起初是采取消极歧视的态度，然后是骚扰他们，最后转向了暴力迫害。马萨林统治时期，君主不愿去打扰这个群体，因为他们在“投石党”运动中表现了对国王的忠诚。从阿布维尔的纺织工到伟大的蒂雷纳本人，这些胡格诺信徒工作辛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不幸的是，对《南特敕令》的违背和据信、对所谓“改革宗教”的偏袒这两件事使天主教各派别联合起来。因而，从1666年起，胡格诺教徒的活动凡不在《南特敕令》规定中的，都被视为非法。第一批教堂被夷平，他们还建立了“改教基金”，对每一个改宗天主教的人奖赏六个利弗尔。从1679年起，还采取了一系列法律和军事手段来强力铲除新教。在普瓦图、贝尔恩和朗格多克等地进行了恶毒的“龙骑兵行动”，士兵们驻扎在拒绝改宗的人家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最后，1685年10月，在卑鄙的巴黎主教哈雷·德·尚普瓦隆（Harlay de Champvallon）和卢瓦（勒泰利埃）的催促下，国王废除了《宽容敕令》（《南特敕令》）。波舒埃主教因此赞其为“新君士坦丁”。在一片恐怖统治中，多达100万巴黎头面人士或被迫屈服，或被逼逃亡。多菲内和塞文山脉的反抗活动一直持续了30年。 [621]

同样，在对待詹森派的态度上，国王的政策摇摆于妥协与镇压之间。法国国教会的一个派别接受了詹森派的观点。他的观点还通过圣

西朗主教（St Cyran，1581—1643年）、安托万·阿尔诺主教（Antoine Arnauld，1612—1694年）和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等人的著作广为传播，帕斯卡之功尤大。詹森派的活动主要以巴黎波尔罗亚尔的西多会修道院和无处不在的阿尔诺家族为中心。阿尔诺家族与王室联系密切——与国王的堂妹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外交大臣和蓬波纳侯爵西蒙·阿尔诺（1616—1699年）、前波尔罗亚尔学校学生拉辛、乃至波舒埃都有关系。但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起，詹森的《奥古斯都论》中的"五点教义"被正式判为异端，詹森派信徒就被当做企图颠覆政权的人来对待了。帕斯卡和其他人被迫秘密发表论著。1661年，服从声明谴责"五点教义"导致了公开的分裂。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纯洁如天使，傲慢似魔鬼"的修女们被驱逐到凡尔赛近郊的乡间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第一轮的迫害以奇怪的"教会的和平"（"克雷芒九世的和平"，1668年）而告终。它使得詹森教徒可以在签署服从声明的同时，在"恭敬的沉默"中坚持出自良知的异议。对詹森派进一步的打击是与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同时发起。1679年伟大的阿尔诺被放逐到布鲁塞尔。

1693年，雄辩家帕基埃·凯内尔（Pasquier Quesnel，1634—1719年）的著作《新约法文版附关于道德问题的反思》出版之后，又引发了一轮决定性的迫害活动。随之而起的大狂热与主教波舒埃和费内隆关于寂静主义的争论纠缠在一起，于是国王决心采取行动。170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受人劝说，撤销了对"恭敬的沉默"的妥协案，1713年又颁布通谕，列数詹森派的罪状，谴责其活动和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被关闭，它的教堂被摧毁，附设的墓地被夷平。人们为了救出帕斯卡和拉辛的骸骨，不得不在夜幕掩护下将他们从墓中掘出。路易十四一举将教义争论转变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教会和国家与其思想批判者之间的长期对抗。这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发端。

在史书中，史家们最为系统阐述的就是路易十四的艺术政策。这个"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有时被描述为一种样板，即王室的品味与扶持可以决定整个时代的全部文化生活。"古典主义被塑造得像是文学层面上的官方教义，以配合在政治和精神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君主秩序和宗教统一的教义。"[21]用当时的主要文学评论家尼古拉·布瓦洛（1636—[623]1711年）的话来说，"一个奥古斯都就能轻易创造出很多个维吉尔"。

当然，王室的慷慨扶持的确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促成制度化的统一。法兰西学院（1635年成立）作为法语的官方守护神，于1694年出版法语大词典。绘画与雕塑学院，即后来的美术学院则赋予了国王的画师夏尔·勒布伦以巨大的权力。法兰西科学院（1666年）也效

仿伦敦皇家学会开展活动。音乐学院（1669年）也为国王的乐师让一巴蒂斯特·吕利（Jean - Baptiste Lully，1633—1687年）展示其天才提供了一个平台。美术学院把勒布伦的艺术专制与柯尔伯的组织天分结合起来，动员建筑师、装潢师和雕刻师参与众多的项目。这些项目最大的追求就是和谐与秩序。最重要的是，皇家宫廷下令汇集全国有创意的文艺界人士，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文学上，“国王四友”——布瓦洛、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La Fontaine）——如日中天、名噪一时，很少有作家能有这么幸运。法国国家剧院（1680年）把几个巡回演出团合并为一个大的剧团。

但仔细考察就会明白，古典主义的垄断地位，错觉多于实际。一方面，国王本人的品味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折中。古典主义对艺术规则公式化的狂热并非子虚乌有，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会遵循这些规则。另一方面，统领文艺界20年的“古典主义高蹈派”逐渐失势，1687年以后，法国文化生活陷入了激烈的“古今之争”。统一的表面被撕裂，暴露出一个多样化和异端的文化图景，而巨匠们的队列常常使得人们忽视这一图景。

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是衡量他的权力和威望的最好标准。他的外交政策仰赖于欧洲历史上最彻底的外交活动和军事力量。前者是由国王本人在凡尔赛宫展开的，后者则只能经过长期的战备才能部署完毕。他的外交政策将欧洲引入冲突之中。结果，路易十四在有的地区被视为第一个试图用武力征服欧洲的独裁者，是后来的拿破仑和希特[624]勒的先驱。而反法同盟可视作为几百年后的“盟国”的先祖。

实际上，路易十四的眼界相当有限，尽管后来他发表了关于法国“天然疆界”的评论，但他事先似乎并没有实现这一“天然疆界”的清晰计划，更不用说统治整个大陆的计划了。他抛弃了早年的谨慎，但他的目标在本质上仍是巩固王朝基业。马萨林使他与西班牙公主联姻，按《比利牛斯条约》的规定，他1660年在圣让—德吕兹迎娶了玛丽·特蕾萨（Maria Teresa）。由此，他根本不可能避免西班牙王位继承带来的问题。他不断卷入尼德兰和莱茵事务，乃是出自于他对受到包围遏制的内心恐惧。他对战争与扩张的渴望也几乎赶不上瑞士和俄罗斯的君主。要不是有极具威胁力的后勤支持，他对国威（La Gloire）的热爱也可被视为完全正常的。路易十四所打的四场大战中，前两次仅限于尼德兰境内，第三场是他的“属地归并”政策（他发起的一场通过法律的狡计来获取德国领土运动）挑起的。第四场则是由于西班牙统治王朝无能引起。在最后这场战争背后则是国际上争夺殖民地和贸易权的斗争。[**大广场**]

“权力转移战争”（1667—1668年）的起因是路易十四对布拉邦特

[626]

大广场（GROTE MARKT）

1695年，法国一位无能的元帅维勒鲁瓦公爵用炽热的炮弹轰炸布鲁塞尔，城中的大广场化为灰烬。在那次战役中，路易十四的大军挺进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摧毁了16座教堂、4000所房屋，还有被誉为“我们欧洲政治文化最精细部分的完美石制图景”的一个大众广场。

1312年布鲁塞尔获得特许状，大广场于此后的几十年间建成，布拉邦特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在这里举行过马上长枪比武赛。广场南面是一座歌特式的市政厅，它支撑着一个160英尺高的钟楼，钟楼造型清峻，直插云霄。钟楼顶部安放着圣迈克尔（St Michael）的镀金塑像。市政厅对面是王家文艺复兴宫，许多公爵曾在此居住，但从未住过国王。“九个民族”的镀金高楼耸立于广场的每一侧。其中有西班牙国王的“面点师之穹”，正面饰有雕塑的弓弩手之屋卢浮（La Louve），还有上层呈船尾状的造船者之屋。在它们前面有一条鹅卵石砌成的小道，埃格蒙特（Egmont）和霍恩（Horn）就是在这里被处以绞刑。1792年，迪穆里埃（Dumouriez）在这里发表法兰西共和国宣言，群情激昂；1830年同荷兰军队厮杀声在这儿回响。今天，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游行在这里举行，为首的演员们装扮成“查理五世的宫廷”。平时，卖花者、周日鸟市占据广场，最近又开辟出停车场。

1713年以后，布鲁塞尔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建。1830年，它成为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又进行了广泛的翻修。十九世纪里，新区由五条林荫大道构成的五边形连接起来，延伸包括附近的小山丘。王宫、政府部门和议会设在库登堡。库克尔贝赫区模仿蒙马特建立了气势宏伟的圆顶圣心大教堂，直到1970年才完工。而光华闪烁的“原子”金属雕塑又使人想起1958年的世界博览会。现代的“贝莱蒙特城”（1967年）是欧盟委员会所在地，北约总部则设在“扎芬特姆”（Zaventem）。从1971年起，布鲁塞尔就成为了比利时三个语言州中的双语地区——其法律地位与讲弗拉芒语、法语和德语的地区平等。它最初是弗拉芒人占大多数的城市，现在呈现出最为复杂的语言构成模式，其中包括法语、土耳其语，甚至还有英语。

感情丰富的观察者们把布鲁塞尔视为未来欧洲最适合的首都，因为据说它已经战胜了它本身及它邻居们的民族主义。它被形容

为"历史隧道"的出口，穿透现代民族主义的黑压压的大山，一直到达"多文化"、"多语言的勃艮第"的"美好模式"。[2] 事实也许如此。但过渡思想上的自命不凡与当地的风格并不吻合。大广场旁边街道转角处的那个快乐的"撒尿的小男孩"雕像（1619年），经历了维勒鲁瓦轰炸的纷飞炮火，依然树立于基座之上。它所表达的就是对所有这样的自负应持的最健康的态度。 [627]

的领土要求。战争之初，法国入侵西属尼德兰，这一举动激起英国、荷兰、瑞典结成"三角同盟"，最后以《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的签订而告终。路易十四夺占了比利时的12个要塞。

法荷战争（1672—1679年）的起因是，路易决心惩罚在他过去的行动中曾横插一杠的荷兰人。他进行了充分的外交准备：劝说荷兰的海上对手英国和瑞典放弃其承诺，让波兰加入法国的阵营，还让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三世转而成为反对派的协调者。如前一次战争一样，也是以法国入侵西属尼德兰开始的，但孔代跨过莱茵河，警醒了这个帝国。最后路易不失时机地削弱了西班牙对弗朗什—孔泰的控制。在奈梅亨和会（1678—1679年）上，路易十四的外交官们操纵了局面——以商业利益诱惑荷兰人，迫使西班牙割让领土，并把解决方案强加于弱国身上。

通过"属地归并"（Réunions）政策，路易暂时停止了公开的战争，转而诉诸繁复模糊的法律程序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他设立了法庭，审理对东部边境无数城市和司法辖区提出领土要求的王室请愿书。每作出一个有利的判决，他就会立即占领相关地区。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有不下160起兼并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其中著名的就有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神圣罗马帝国专注于土耳其对维也纳的进军，这使得路易很好地掌控了这些运作的时机。

九年战争（1689—1697年）是由于路易公然挑战奥格斯堡同盟而起。该同盟是奥兰治的威廉三世煽动各国为阻止法国进一步的冒险活动而组建的。法国入侵西属尼德兰和巴拉丁领地，蹂躏海德堡，这两 [625] 举引发了一系列殚精竭虑的攻城战和海军战役。通过《里斯维克条约》（1697年），路易被迫放弃他的"属地归并"计划，但仍保留了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 [**大广场**]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年）可算得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德国、尼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战斗同时也在殖民地和海上进行。1700年西班牙的查理二世死后无嗣，路易十四决定遵照其遗嘱，暂且放下他自己的事业。战争由此开始酝酿。到路易

把自己年轻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普提为继承者时，战争就已不可避免了。反法同盟重新集结，这是参加国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次，由萨伏依的欧仁（Eugene）亲王、马尔博罗公爵和荷兰执政海因西乌斯（Heinsius）任军事统帅。路易先发制人，占领了荷兰控制下的西班牙尼德兰境内的“联省屏障要塞”。战争进程中，海上和陆上不断进行围攻与反围攻，最后参战各国都精疲力竭。1709年，在马尔普尔凯进行的那场“激烈”但非决定性的战斗使得法国得以免遭入侵之苦。据说，维拉尔元帅曾告诉他的君主，“陛下，您的敌军顶多能再取得一次这样的胜利，他们就都会被消灭。”

《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和《尼什塔特条约》（1714年）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了法国历次战争的结果。但这与各主要参战国的预想均相去甚远。法国的野心受挫，但并未完全打消，法国还保留了许多重大收益，其中包括里尔（Lille）、弗朗什—孔泰和阿尔萨斯；安茹公爵腓力普仍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荷兰人与法国人一样精疲力竭了，但仍控制着“联省屏障要塞”。西班牙最初加入反法同盟，一败涂地，后来又站在法国一边，再次损兵折将。西班牙人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帝国的统一。他们发现正是他们自己引发了这场他们一直想要避免的灾难。奥地利人一直想阻止法国得到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权，但最后以分得大部分战争成果而妥协，其中包括西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最后结果证明，那些边缘强国是最明显的受益者。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和萨伏依王室都巩固了自己的王权地位。前者攫取了莱茵河上的上海尔德兰省，并几经周折得到了瑞典统治下的波美拉尼亚；后者占有了西西里。新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见下文）地位大升，并确立了它对直布罗陀海峡、米诺卡岛、纽芬兰和其他美洲岛屿的控制，以及它对西班牙殖民贸易的垄断。联合王国——不再仅仅是英格兰了——崛起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最主要的外交掮客以及法国霸权的主要反对者。

因而，路易十四的大实验早在1680年代就达到了巅峰，自此以后则收益日减。与战争、宗教迫害、众多大人物的去世相伴随的，是[627]病入膏肓的国运衰败。法国的政府和社会都呈现受长期痼疾折磨消耗的迹象。例如，国家财政渐渐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至1715年，国家净收入为6900万利弗，支出为1亿3200万利弗；各年公债数目为8亿3000万至28亿不等。[22]更严重的是，法国大众生活日益贫困，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可耻的贵族免税权依然如故；中产阶级由于胡格诺教徒的逃离而受到重创，他们竭力减轻国家管制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农民在饥饿边缘辛苦劳作，毫无出头之日。在饥馑之年，当时关于他们苦境的报道——光脚赤足、忍饥挨饿，靠树皮、浆果和甜菜根勉强

维持生计——已得到现代有关食物价格与死亡率关系的研究的证明。各省接二连三出现公开的流血反抗——贝尔恩（1664 年）、维瓦雷（1670 年）、波尔多（1674 年）、布列塔尼（1675 年）、朗格多克（1703—1709 年）、卡奥尔（1709 年）。乡村暴动，焚烧教堂的举动被军事镇压和大批绞刑的执行而无情镇压下去。法国的外表依然熠熠生辉，但根基已经开始动摇。1715 年 9 月 1 日，路易十四驾崩。马西荣主教的葬礼演说词是这样开头的：“我的兄弟们，只有上帝是伟大的”。幕布降了下来。

十八世纪的法国完全是路易十四伟大但并非完美的实验的产物。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酵母乃是出自针对路易十四创立的旧制度的政治和社会僵化的一种自发反抗。路易十四的内外政策都是致力于保持各领域的现状。约翰·劳的冒险计划使人们对变化与改革观念心存怀疑，它所带来的最初冲击加强了这一体系内在的保守性。而路易十五年幼，政府大权握于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手中，此人道貌岸然，品质败坏；年轻的国王又长期听从于他年长的老师弗勒里红衣主教安德烈（1653—1743 年）的意见。这两个因素更加固了体系内在的保守性。摄政王轻率地恢复了高等法院反对王室敕令的“抗辩权”——这是一剂避免无休止的作恶却逃脱责任的古典药方。红衣主教治理法国期间，国家稳定，国力平平，但外交危机不断，并且爆发了一次关于詹森派的激烈争论。路易十五（1723—1774 年）亲政后，酷爱狩猎、追逐美女，荒于国家政务，这一时期国力渐衰，停滞不前。无休无止的财政危机，加上连年战争，使得王室与高等法院的冲突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教皇绝对论者、高卢派和詹森派之间的宗教怨仇在 1764 年[628]达到白热化，耶稣会教徒被驱逐出境。此后它们的争论逐渐沦为惯常的蒙昧主义和恶言相向。王室与大众之间的裂隙更为加深。这个时代最令人难忘的个性人物当之无愧应该是蓬巴杜尔侯爵夫人，她聪慧有权势，但又完全身不由己。她竭尽所能解除国王难以言状的郁闷，据说还留下那句名言“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科西嘉岛][大谋略]**

路易十六无疑期望在位期间能像他的祖父那样维持一个既长久又无聊的统治。他甚至看到了改革的必要。但他是旧制度的第一个囚徒。在 1789 年 7 月 14 日洪水（指革命）突袭的那一天，他在日记里记下的是他的祖父在没有狩猎安排的日子常用的话——“无事可记”。

在英伦三岛，这一时期的头等大事是联合王国的诞生（1707 年）。这是一系列复杂的宗教、王朝、宪法和国际冲突的最终结果。内战之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开始了一个紧张的僵持时代。查理二世的统治经历了两次英荷战争、1679 年的“天主教阴谋案”和两次苏格兰誓约者叛乱。这位国王同他的父亲一样，极不情愿地通过议会

[628]

科西嘉岛（CORSICA）

拿破仑·波拿巴出生时是不是法兰西王国的臣民，这个问题是模糊不清的。他的哥哥约瑟夫肯定不是。热那亚共和国把科西嘉岛卖给了路易十五，岛上公民大会直到1770年9月才认可了这项交易，当时拿破仑只有一岁。拿破仑的父亲是帕斯克勒·保利（Pasquale Paoli）的秘书。保利曾领导反对热那亚的起义，还领导了反抗雅各宾派统治的起义，后来死于伦敦。

科西嘉岛有一段很长的自治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自治政府经历了比萨、热那亚和法国的宗主权统治，最后被法兰西共和国废除。

从1793年起，科西嘉岛就作为第90个行省并入了法国本土。但它个性鲜明，一直存在地区分离主义。1982年制定的地区法恢复了部分自治权，但还不足以根除反法的恐怖主义。当地非法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与西班牙巴斯克诸省的分离运动组织埃塔，以及北爱尔兰的共和军不相上下。尽管恐怖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具有普遍的模式，但它决不仅限于东欧或巴尔干半岛。

[629]来进行统治，并竭尽所能去限制议会权力。在宗教政策上，他在极端的新教教派与天主教教派之间走中间路线。圣公会重新确立了至尊地位，这限制了宽容的范围。这种限制在英格兰表现为《克拉伦敦法典》（Clarendon Code）和《宗教考查法》（Test Act）的颁布，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表现为主教制的恢复。在外交政策上，围绕应该以商业利益为由与荷兰人开战还是应该以宗教、战略考虑支持荷兰人的问题存在极大争议。[**劳埃德保险社**]

[630]

劳埃德保险社（LLOYD'S）

1688年2月18日，《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中提到了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在塔街经营的一家咖啡屋。不久以后劳埃德发起创办了一份《每周简讯》，报道商业和船运新闻，它成为了《劳埃德名单》（Lloyd List）的前身。这样，他就为那些对保险业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聚会场所和信息服务。劳埃德保险

社后来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协会。在迁到伦敦交易所之后，它于1774年发出了第一份标准化保单。它在1811年进行了重组 [**纹章**]，1888年的法律又确认了它的特权。它为"投资人"的辛迪加小组和"承保人"公司之间提供了接触点。前者认捐资金，后者分摊每张保单的保险金额。

保险业出售的是安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意大利的贸易城市。那里的人们非常清楚地了解"相互性"原则或风险分担原则。这是商业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一。十八世纪保险业的加速发展反映了其他许多领域安全需要的增长。

起初，保险文化只是一小撮商界精英的专属领域 [**商人**]。但它的边界不断稳步拓展——首先是进入了新的风险领域，如火灾、人寿、事故、健康；其次是进入了新的社会群体；再次是进入了欧洲新的商业化程度低的地区。到十九世纪中叶，各国政府开始考虑普遍保险计划的收益问题；1888年，德国政府引进了所有国家公务员的健康和退休金保险计划。到二十世纪末，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社会保险"，这一概念已成为广为接受的理想。

保险在社会心理领域中有着深远的含义。如果说长期的不安全感促成了迷信宗教和 [**魔法**] 传统的滋长，物质安全的进步就必将影响到人们对有关命运和死亡这类难以估测的重大问题的反应。1693年，皇家学会委托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准备一份关于"人类死亡率"的数据报告。最近由于不问年龄就出售年金保险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学会对此感到忧虑。哈雷发现，只有奥地利统治下的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地区（现称弗雷茨瓦夫）的数据记录比较合理，他们在登记死亡情况时还附上了去世者的年龄。哈雷分析了1687—1691年布雷斯劳的6193起出生和5869起死亡，制定了一张表格。表中列出不同年龄段的人口群，每年龄段人口的估测数目以及每个年龄段人口每年的死亡数。由此，他向人们展示了寿命与不断变化的死亡几率之间的关系原则。哈雷的"布雷斯劳表"成为了现代保险精算的先驱。它从上帝手中夺走了控制人类死亡的垄断权。

所有这些问题在1685年后发展到了顶点。1685年查理的兄弟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1701年去世）继承王位。他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专制统治者，还是路易十四收留的避难者。他的即位激起了两次不成功的起义——一次是阿盖尔（Argyll）公爵领导的苏格兰起义，一次是蒙默斯（Monmouth）公爵领导的英格兰起义。国王

企图扩大《宽容法案》的范围，把天主教徒包括进去，此举使得英格兰的主流新教议会党（后来以“辉格党”著称）逼迫他们的保皇派反对党（此后以“托利党”闻名）最后摊牌。内战和宗教纷争的幽灵若隐若现，但是各色见风使舵者已经准备好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他们的地位。英裔爱尔兰伯雷教区牧师就是一例：

当王家的詹姆斯登上王位
天主教再度流行，
我大声斥责《刑法》
签署《权利宣言》。
我发现罗马教会
正适合我的宪法；
要不是大革命
我曾是一个耶稣会教徒，
这就是我要维护的法律，
至死不渝，阁下！
不管哪个是国王统治，
阁下！我都将是伯雷的教区牧师。[23]

詹姆斯寄希望于法国的支持。他两次试图逃亡国外，最终成功。

詹姆斯之女玛丽的丈夫、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决定阻止英格兰落入法国之网，他采取了坚决的行动，确保了新教徒所取得的胜利。1688年11月5日，他带领一只强大的雇佣军在托尔湾登陆，未遇抵抗就清除了伦敦的英军。他的地位因而坚不可摧。直到那时他才召集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后者实施“光荣的”、“不流血”的革命，并将英格兰王位赋予他和他的妻子。[24]这个解决方案符合了主要参与者各方的要求。联省执政为这一行动提供了资金。荷兰的联省议会对本国的执政能在海外建立更有权势的地位感到满意，而威廉则为能大大增加自己抗击法国人的力量而感到心满意足。英国的“辉格党”对能有一个外来的国王也感到满足，因为他会比斯图亚特家族的国王更容易控制。

在英格兰，《权利宣言》和此后颁布的《权利法案》以及新的[631]《宽容法案》（该法案承认了新教徒，但不承认天主教徒）把革命的成果确立下来。革命的成果与新的宪制安排紧紧相连，权力的天平从国王一边倒向议会一边。在爱尔兰，这种转变表现为血腥的征服，最终

在1690年7月1日（11日）博因河战役中*，“比利王”（英王威廉的绰号）和他的“奥兰治党徒”取得胜利。这样，在这个天主教徒为主体的国家里，新教徒得以长期保持其优势。在苏格兰，这种转折导致恐怖的格伦科大屠杀（1629年），英国所支持的坎贝尔家族屠杀信奉天主教的麦克唐纳家族，这标志着高地与低地之间的一场殊死之战的开始。在国际上，苏格兰与英格兰加入了奥格斯堡同盟，并联合加入后来历次针对路易十四的反法同盟。

因而，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既不特别光荣，也不革命。它的出发点是为了把政治和宗教上的权势集团从詹姆斯激进的做法中挽救出来。它能够成功，则是通过1066年以来惟一一次对英格兰的成功入侵实现的。在后来的几代中，它却产生了一个极具信服力的神话。它奠定了一种宪政理论的根基。这种理论即议会绝对主权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英吉利意识形态”的东西。它认为，“绝对专制权力”（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用语）已从君主手中转到了从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把绝对主权置于议会之手。至少在理论上，它赋予议会过去只能由英国国王享有的最高统治权威。就此而言，它与人民主权论有根本性的差别。人民主权是通过正式的宪法来统治政府的所有部门，多数欧洲国家后来都是效仿美国或者是革命后的法国实行这一体制。不可避免地，议会主权论不仅成为新教徒的“旗舰”，而且也保证了英格兰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的优势。因为，英格兰的国会议员总能够形成对非英格兰议员的多数优势。议会主权注定可以历经后来几个世纪的变迁而存留下来。300年后，它仍是阻碍英国加入欧共体的一个主要因素。[25]

复杂的王朝关系使得最终的结果在25年之久的时期内一直扑朔迷离。从1701年起，路易十四正式承认“老僭位者”詹姆斯三世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James Edward Stuart）（1688—1766年）的王位要求。当时，玛丽（1694年）和威廉三世（1702年）先后去世，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的17个子女全部去世，信奉新教的斯图亚特家系后继无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所有的人都将无嗣带来的灾难铭刻于心。苏格兰与英格兰签署联合法案（1707年），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伦敦和爱丁堡对王朝继承一波三折而共同产生的受挫感。苏格兰议会以自身的解散为代价，确保英格兰接受了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并答应帮助苏格兰解决其高额债务，承认独立的苏格兰[632]

* 1690年7月1日（旧历）≈1690年7月11日（新历）。由于历法变化带来的混乱，也可能是由于与新教徒1690年7月在奥赫里姆（Aughrim）取得的第二次胜利混淆，北爱尔兰传统上把“博因河战役”作为国庆节来庆祝，庆典在7月12日举行。——译者注

法律和长老会教堂的存在，口头承诺用英格兰的军队镇压高地叛乱(见原书附录Ⅲ，第1285页)。

从此，“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将由设在威斯敏斯特的联合议会统治。英伦三岛上的老国家将添上一个新的“不列颠”国家身份。近代英国的国家认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尊重英格兰的传统；忘掉苏格兰分离的历史记忆。不列颠进入了它崛起的新时代，结束了岛内的分裂状况。尽管选择汉诺威家族继承斯图亚特王位的决定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继位还是顺利完成。此后，一个既不是英格兰人又不是苏格兰人的王朝成为了不列颠民族的支柱。[26] **[哥达]** **[共济会]**

[633]

共济会 (MASON)

1777年，洗礼者圣约翰节时，伦敦现存的四个共济会会社代表在一家名叫“鹅与烤肉架”的酒馆聚会，成立了“世界母亲大会社”，并选出了第一位大师。尽管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研究共济会的历史学家们对这次聚会是否发生过，或是伦敦的大会社从此成为这一国际性运动的中枢并不表示怀疑。[1]

共济会的早期历史是模糊不清的。有个故事讲，十三世纪教皇颁布敕令，创立了一个修建教堂工匠的社团。这纯粹是虚构的。共济会与中世纪的石匠（Commecines 或 Steinmetzen）联系，乃至与前圣殿骑士（ex – Templars）秘密组织的联系，也是未曾得到证明的。1723年的一份报告中有两句韵文：

> 如果历史不是古老的寓言，
> 共济会就是来自巴别塔前。

最早的可靠资料显示了十七世纪苏格兰共济会的情况以及内战期间与英格兰发生的联系。古董学家、占星家、牛津博物馆的创办者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1617—1692年）在日记中记下了他自己入会时的情景：

> 1646年10月16日下午4时30分，我在兰开夏的沃灵顿成为了一名共济会员，同时入会的还有柴郡的亨利·梅恩威灵。该分会在场的会员有里奇·彭科特先生、沃顿、詹姆斯·科利尔先生、里奇·桑基先生、亨利·利特尔、约翰·艾兰姆、理查德·艾兰姆和休·伯鲁。[2]

共济会的神秘色彩是故意渲染的。这对同情共济会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对反对者来说又令人厌恶。未入会者对其礼仪、等级、伪东方术语以及暗号、象征、目的等猜测不已。共济会的圆规和直角尺、围裙和手套以及地板上的圆圈，很显然是故意设计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对它起源于中世纪的行会深信不疑。但引起最大争议的还是所谓的秘密宣誓。有一种说法称，新介绍入会者被蒙上眼睛，有人问他：

> "你信任谁?"回答说："上帝。""你要去哪儿旅行?"回答说："从西方到东方，向着光明去。"接着他被要求手按《圣经》宣誓，"即使是喉咙被割断，舌头被扯掉，身体为大海的粗砂掩埋……"也不会泄露会社的秘密。[3]

共济会一直是一个互利的社团，尽管其利益无从定义。它的敌人常坚持认为，它反对男女平等，因为它从不吸收女性入会；它反社会、反基督教，因为据称会员利用各自的政治、商业和社会关系互相帮助，损害他人。共济会员一直强调他们反对无神论，宣扬宗教宽容、政治中立，并致力于慈善事业。[634]

十八世纪共济会急剧扩展。它从英国最高层贵族中吸纳成员，并成为僧侣阶层的持久支柱。1725 年被驱逐的苏格兰人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共济会分会；此后共济会分会遍布欧洲大陆的每一个国家。它在布拉格（1726 年）、华沙（1755 年），甚至圣彼得堡都建立了组织。到拿破仑战争时，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分会网络。传说在波罗金诺或滑铁卢战场上敌对双方的军官互致暗号表明身份，并下令停火。

在天主教国家中，共济会转而反对教会，并在激进的启蒙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4] 其成员往往是自然神论者、哲学家以及教会和国家的批评者。例如，1795 年奥地利才开始镇压共济会，在此之前奥地利没有公布教皇谴责共济会的通谕，因此共济会在推动艺术发展方面极为活跃。在法国，它为革命前的酝酿作出了贡献。十九世纪以后，它又将与自由主义运动紧密联系。

天主教会的反应是毫不含糊的。梵蒂冈把共济会视为恶魔。从 1738—1890 年，历代教皇在六次通谕中，谴责它是邪恶的妄图颠覆的阴谋家。忠诚的天主教徒不能成为共济会员，极端天主教人士把共济会会员同雅各宾派、烧炭党人和犹太人一道划为公敌。二十世纪的极权政体对他们更加敌视。纳粹和共产主义者把共济

会员投入集中营。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他们只有在法西斯垮台，或东方的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之后才能重新开始他们的活动。

有关共济会作用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关于共济会最惊人的文件还是它的成员名单，据说其中有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一世、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都、俄罗斯的保罗一世、雷恩（Wren，英国科学家）、斯威夫特、伏尔泰、孟德斯鸠、吉本、歌德、彭斯、威尔克斯（Wilkes）、伯克、海顿、莫扎特、吉约坦（使用断头机的提议者）、马拉、拉法耶特将军、库图佐夫、苏沃洛夫、威灵顿；麦克唐纳元帅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塔列朗、坎宁（Canning，英国政治家）、司各特、特罗洛普（英国小说家）、奥康纳（O'Connell，英国下院议员）、普希金、李斯特（匈牙利音乐家）、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匈牙利独立运动领袖）、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德国的威廉一世；埃菲尔（法国工程师，因设计埃菲尔铁塔而著名）、提尔皮茨（一战期间德国海军上将）、沙恩霍斯特（普鲁士将军）、马萨里克（捷克第一任总统）、克伦斯基（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总理）、施特雷泽曼（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和丘吉尔，以及从乔治四世到六世除一人之外所有英国国王。这表明，这个最大的国际秘密社团并不是完全隐秘的。

詹姆斯三世党人叛乱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在1688—1714年的历次事件中都遭到失败。除了老僭位者和他的儿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又被称做“小僭位者”、“漂亮王子查理”、“查理三世”）的个人命运之外，这场叛乱联合了所有因君主制被推翻而情感受到伤害的人。詹姆斯三世党人叛乱悼念旧君主制的消亡，怀念英国天主教和欧洲的联系，追忆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在苏格兰它还博得了托利党人士和那些为流亡者和流放者哭泣的人的同情。他们煽起了两次大的叛乱——“1715年起义”和“1745年起义”。在第一次起义中，詹姆斯三世追随军队深入到南部，直达兰开夏，第二次则打到了德比。

后一事件激起了摧毁苏格兰高地文明的最后一役。1746年4月16日，身着红装的英格兰人和低地苏格兰人万枪齐发，阻截了部族人的最后一次冲锋，这就是可怕的“卡洛登沼地”（Culloden Moor）灾难。自此之后，部族的生活永远地受到了压制。他们被禁止讲盖尔语，禁穿民族服饰，他们的组织被取缔，他们的领袖被放逐。可怕的（苏格兰高地）清洗运动允许效忠派地主驱逐居民，转而牧羊，这使

得苏格兰的盖尔人甚至少于北美。他们让高地荒芜神秘，不知情的旅行者却从此爱上了这一点。[**短裙**]

[635]

短裙（PHILIBEG）

1727年，格伦加里（Glengarry）的麦克唐奈（Macdonnell）部族酋长开始从事冶铁业。他把因弗高里（Invergarry）森林租给了一个来自兰开夏的巴罗的贵格派冶铁工人托马斯·罗林逊，并召集人力砍伐树木，管理熔炉。罗林逊时常造访，他注意到氏族的传统服装"系带长裙"妨碍他们劳动。于是，在咨询因弗内斯（Inverness）要塞的裁缝之后，他设计了一款稍短的褶皱及膝的袍子。这种裙袍很快就被称为"PHILI—BEG"或"褶裥短裙"。由此看来，苏格兰所谓最古老的高地服饰中的核心部分是由一位英格兰人发明的。[1]

不久之后，詹姆斯党徒第二次叛乱被镇压，威斯敏斯特议会禁止了所有高地服饰。近40年时间里，除了英军忙于招募的高地连队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在公开场合穿着短裙。这些连队包括黑卫兵连队（1739年）、高地轻步兵连队（1777年）、锡福斯高地连队（1778年）、卡梅伦连队（1793年）、阿盖尔连队、萨瑟兰连队、戈登连队（1794年）。同时，正当伦敦的高地人社群发起运动，要求恢复短裙时，高地的男性公民已经逐渐养成了穿裤子的习惯，并一直坚持下去。[**第二名**]

1822年，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这是自统一以来国王的首次访问。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担任典礼司仪。曾在滑铁卢载誉而归的高地兵团身着短裙盛装，列队游行。苏格兰所有的部族酋长都被要求以"传统服饰"出席。他们也穿着花色各异的方格呢短裙。方格呢编织业几个世纪以来蒸蒸日上，为富人们提供马裤装。但那些色彩缤纷的图案与部族无关，只是因地区不同而略有差异；并且，普通百姓并不会使用这些图案。最有名的图案是坎贝尔家族的黑绿方格图案，为黑卫兵所采用，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基德155号"，是以一位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主命名，他曾为他的奴隶订做这种图案。但高地兵团的使用，加上1822年的聚会，使得每一种图案都和一个部族名相对应的习俗得以形成。后来，有两兄弟合著插图精美的伪书《苏格兰衣柜》，又大大促进了这种习俗。兄弟俩自称为因弗内斯附近的艾林—艾加斯岛上富于

传奇色彩的宫廷的主人——索别斯基—斯图亚特家族的后人。

图案与部族相联系的做法完成了两个世纪来文化创造的非凡进程。在第一阶段，长老会殖民地在阿尔斯特建立之后，高地文明起源于爱尔兰这一显著特征先是遭到忽视，后来则被完全否定。[636]他们编纂了新的纯粹苏格兰的历史和文学，詹姆斯·麦克弗森才华横溢的伪诗"莪相"尤为突出。所谓的"古老与独特的"高地习俗，如短裙之类，由于适应了呼唤一种明确民族谱系的要求而颇具吸引力。最后一个阶段始于《赦免法案》（1786年）的颁行。在此阶段内，大批高地难民聚集低地，各部族苏格兰人纷纷采用新的传统，以标明自己非英格兰的身份。维多利亚女王十分鼓励这种极度浪漫的游戏。她1848年得到了巴尔莫勒尔的地产，并为她那个非苏格兰人的圈子以及她的家族设计了一种巴尔莫勒尔图案。

格伦高里的麦克唐奈部族没有看到这场革命的结果。[2]他们最初是斯凯岛（Skye）上麦克唐奈部族的分支或亚氏族。他们曾经做过"三岛之王"，其名字在盖尔语中就是"唐奈（九世纪苏格兰国王）之子"、"世界统治者"。他们与麦肯齐家族世代为仇，在争斗稍歇之时，他们又一直在天主教事业和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中起到突出作用。1689年，麦克唐奈部族的一个人在基里克兰基山口高举詹姆斯二世大旗，1715年还参加了谢里夫穆尔战役。他的继承人率领600名族人参加了"1745年起义"，并被囚于伦敦塔。但第16任酋长却变卖了祖先的地产，移民新西兰。他们的红、黑、白和深绿的图案具有所有简朴与古老的特征，至于1727年所发明出来的苏格兰短裙是否使用它来装点就不得而知了。

十九世纪晚期，整个欧洲风行"发明的传统"。[3]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发明了"五一节"（1890年），希腊人重新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俄国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日（1913年），苏格兰人确立了"彭斯夜"——此时的低地人则迷上了短裙、排箫和香羊肚——他们都是想赋予他们的选民一种普遍的认同意识。

圈地运动持续了两个世纪，把小土地所有者从英格兰的土地上赶走。大清洗运动与圈地运动一道，完成了一个清洗的过程，这将使英国社会拥有一些最为持久的特征。大不列颠在这些清洗中失去了农民，而农民正是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主力军。它们也带走了社会的团结一致、原始民主制和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民

族意识。它们意味着英国的民族感只能由国家机构，尤其是王室和帝国自上而下的地传给下层，而不是从农民家庭对土地的传统依恋中自下而上地生长出来。此后，土地大部分成为了农场主和地主这一少数者阶级的产业。英国社会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资产丰厚的少数效忠派，另一部分是被剥夺土地的贫困大多数。后者把这种被剥夺的宿怨带入了英国阶级体系制度之内。

在英伦三岛中，爱尔兰是分离的。尽管它未遭到苏格兰高地那样[636]被蹂躏的命运，冲突带来的后果仍是深刻而痛苦的。宗教战争时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691 年后，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剥夺了天主教徒出任公职、拥有财产、接受教育和通婚的权利，进一步巩固了新教徒的最高地位。1707 年的联合不包括爱尔兰。它保留了自己的议会，但仍必须服从古老的“波伊宁斯法”。该法使伦敦的国王大臣们自动拥有控制立法的权力。与苏格兰不同，爱尔兰不被允许与英格兰进行自由贸易。它与威尔士也不一样，它还未经历过任何形式的民族或文化复兴。它也没有直接参与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有新教徒移居的阿尔斯特除外，逃难而来的胡格诺教徒在当地开办了亚麻工业，非常兴旺。爱尔兰人口不断增长，使得乡村的贫困成为不[637]争的事实。1726—1729 年和 1739—1741 年的饥荒，预示着 1840 年代的灾难。穷凶极恶的“白衣少年”匪帮，1761 年第一次出现于乡村。亨利·福拉德（Henry Flood，1732—1791 年）和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1746—1820 年）领导的改革运动最终被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和他的联合爱尔兰人协会（1798 年）的叛乱所干扰。但这次叛乱最终夭折。1801 年，通过第二个联合法案，爱尔兰被强迫加入联合王国。

汉诺威王朝统治英国 123 年。四个乔治的统治时期——一世（1714—1727 年）、二世（1727—1760 年）、三世（1760—1820 年）、四世（1820—1830 年）——实行的是真正的立宪君主制。在这个时期英国经历了帝国的得失、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空前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崛起。后者让英国能独自超然于欧陆事务。英国与同时期崛起的欧陆邻国之间的这些差别使得许多眼界狭窄的历史学家把英国史和欧洲史区别看待。

回溯历史，汉诺威王朝统治后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 1776—1783 年所谓的“美国革命”中失掉了 13 个英国殖民地。当然，在 1776 年时没人能预料到美国的全部潜力。那 13 个殖民地看起来仍非常脆弱，在一个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的大陆上，被无法控制的自然力所包围。在独立战争前夕，大英帝国的胜算前景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很大的。英国海军力量之强，法国和西班牙占据的广袤的西部和中南部美

洲领土可以不遇有力抵抗就轻易到手（1803年，法国人被迫以低廉价格出售他们占有的“路易斯安那”——实际上是整个中西部）。但是，失去了最具吸引力的大西洋彼岸领地，英国人不得不向别处寻求帝国的进一步财富，尤其是在印度和非洲。

当时，英国政府甚至对最直接的影响都视若无睹。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1737—179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名者——译者注）以大号字体签署《独立宣言》（1776年），此举无疑是正确的，让国王乔治“不用眼镜”就可以阅读。对英国的欧陆对手而言，美国起义为短期的介入提供了机会。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了美国的事业，而要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上，他们是绝不会允许的。但对所有有良知的欧洲人而言，美国革命提出了关乎根本政治原则的问题，向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居统治地位的君主制的根基发起了挑战。革命胜利后制定了宪法的七项条款，其中就包含了对启蒙运动理想最清楚和实用的阐述。它们简短、世俗、民主、共和、理性，牢牢扎根于洛克的契约论、英国的法治精神、孟德斯鸠的分权论和卢梭的公意思想之中。宪法是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的名义制定的，它证明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的悖论在于：[638]宪法的主要制定者中有许多人，包括托马斯·杰弗逊和乔治·华盛顿，都是奴隶主；宪法是与当时最自由、统治最好的国家进行斗争得来的。

十八世纪之前，萨伏依（Savoy）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疆省份。它位于法兰西王国和伦巴第平原之间，横跨阿尔卑斯西部山脊。它的统治者自诩为欧洲最古老的王室，他们是十一世纪翁贝托·比安卡马诺伯爵（Umberto Biancamano）的后代。伯爵的家族在塞尼山和大圣贝尔纳关隘的两侧斜坡上都获得了领土。其西区——萨伏依，讲法语的郡，包括尚贝里、阿纳西和勃朗峰山峦———直延伸至日内瓦湖畔。其东区，讲意大利语的皮蒙特公国，包括奥斯特、苏萨和都灵，则延伸到利古里亚海滨。瑞士联盟崛起之后，该省与帝国的主体隔离开来。都灵的统治者地位上升，成为了帝国的公爵，能够追求一种实质上的独立地位。维克多·阿马戴乌斯二世公爵（Victor Amadeus Ⅱ，1675—1730年在位）同他的前任一样，在强邻法国和哈布斯堡之间谨慎行事。然而，他在西班牙王位战争的关键时刻背弃了同路易十四的联盟，神圣罗马帝国赐给他皇室成员的地位和西西里岛作为回报。1720年，奥地利人逼迫他以西西里岛换取撒丁岛，使他最后坐在萨伏依、皮蒙特和撒丁本身所构成的复合“撒丁王国”的王位上。这个奇特的复合体，王朝政治的原始产物“南方的普鲁士”，一个世纪后

却意外地成为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见第10章）。

那些正在很快失去它们过去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国家名单足以开出一长串。西班牙名列榜首。在波旁家族统治时期——腓力普五世（Philip V，1700—1746年在位）、斐迪南六世（Ferdinand Ⅵ，1746—1759年在位）、查理三世（1759—1788年在位）和查理四世（1788—1808年在位）——它失去了成为一个强国的所有权力。它在欧洲大陆上的属地除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外已尽数失去。而与之关系紧密的美洲帝国的价值尚值怀疑，西班牙只能处于大公贵族、教会和宗教裁判所支配控制之下。仅在腓力普统治时期，就上演了700次火刑。它在按照法国方式重组政府部门、修缮装饰马德里，通过建立科学院（1713年）来鼓励文化生活等方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集体农场]** **[普拉多博物馆]**

同样，葡萄牙处于无视民意的君主和狂热的教会统治之下，发展滞缓。“虔诚者”约翰五世（1706—1750年在位）是一位教士国王，“与女修道院长生子，其中一个儿子成为宗教裁判所长老”。他的继承者约瑟夫一世（1750—1777年在位）的统治因里斯本大地震而摇摇欲坠，由“葡萄牙的柯尔伯再世”蓬巴尔侯爵塞巴斯蒂昂（Marquis of Pombal，Sebastão，1699—1782年）推行积极但短命的改革，才使之得以恢复。人们常常把“埋葬死者，供养生者”这句话当做是蓬巴尔说

[639]

集体农场（BASERRIA）

1786年纳瓦尔的人口调查资料证明，共有农场是巴斯克地区农村独特社会组织的基础。为了克服单个农户经常遭遇的种种危机［**格里伦斯坦村**］，纳瓦尔议会确认了每个农场由两个合住的男女管家来经营。一个农场的所有成年成员，无论是地主还是佃户，都有权选举每一代的男接班人或女接班人，只要男女管家之一去世或退休，他或她就接替工作。管家及其后代的婚姻和嫁妆也须取得集体认可。结果，共有农场的所有权和管理都非常稳定，在经济上能够实现自足。这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急剧发展的时代“巴斯克文化的真正库房”，是最近农村人口开始减少之前巴斯克身份认同的基石。当一种体制能够在多少世纪以来维护了最古老的前印欧的民族时，这个体制中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组织是不可分割的。

的。但他本人很可能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从1750年起，他控制这个国家近1/4世纪。他重组了财政、教育、海军、商业和殖民地。玛丽[639]一世（1777—1816年在位）与同时代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一样渐渐地精神不太正常了；葡萄牙也和英国一样在摄政王统治下经历了一个革命阶段 [**地震**]。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仍是四分五裂，尽管分界线有些变化。其主要的对手是都灵的萨伏依王室、控制米兰的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托斯卡纳公国。1738年那不勒斯重新建立独立的波旁王国，增添了制衡因素。这些国家都因开明君主的明智治理而获益匪浅。在别的地方，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共和国与教皇国的教会专制政府之间依然对比鲜明。天主教势力只有在镇压耶稣会（见原书第593—594页）时才会联合一致，其余时候都各行其是，这使得梵蒂冈操纵政治的余地大大削减。克雷芒十一世（1700—1721年在位）、本尼迪克十世（1740—1758年在位）和庇护六世（1775—1799年在位）三位教皇的

[640]

地震（QUAKE）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遭地震袭击。地震引发的海啸摧毁了塔古斯河上所有的船只和码头。城市2/3的建筑或被夷为平地，或被焚毁。约3万至4万市民丧生。从苏格兰到君士坦丁堡都感受到震波。

里斯本地震既不是欧洲的第一次灾难，也不是最后一次。1421年也发生过这样的毁灭性灾难，马斯河低地堤坝坍塌，吞没了荷兰地势低矮的成百上千个村庄。1631年12月，维苏威火山爆发，意大利约有18000人丧生。1669年，埃特纳火山喷发的熔岩将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港掩埋。1356年的地震蹂躏巴塞尔，而1908年12月28日的地震则将墨西拿和雷焦卡拉布里亚夷为平地，77000人丧生。类似1666年伦敦大火的灾难还有很多。而瘟疫与霍乱直到十九世纪末才从欧洲销声匿迹。[**公共卫生**]

然而，1755年地震所带来的绝不仅是物质损失。它动摇了启蒙运动最为珍惜的希望，撼动了哲学家们对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世界和一个善良、理性的上帝的信念。它使正义和不正义一起毁灭。正如伏尔泰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包含着邪恶的。"

长期在位并不能阻遏梵蒂冈政治上日益无足轻重的趋势。世俗文化有显著的复兴；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官办学院推广意大利语和意大利文学，科学与学术繁荣兴盛。费拉拉的档案学家 L.A. 穆拉托利（L.A.Muratori，1672—1750 年）、那不勒斯的经济学家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1712—1769 年）、米兰的犯罪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 年）、帕维亚的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沃尔塔（Alessandro Volta，1745—1821 年）等人享誉欧陆。他们无疑加强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酷刑**]

尼德兰联省王国同葡萄牙一样，也曾是西班牙王冠上的一颗明[640]珠，它仍拥有广大的海外帝国，但对欧陆事务却影响甚微。他们的海上优势为英国夺去；而陆上又为哈布斯堡四面包围。共和寡头与奥兰治王室间持续日久的拔河赛一直打到 1815 年，最终产生了世袭君主制。[**巴达维亚**]

在整个十八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仅有一次在舞台中央亮相。瑞典在查理十二世领导下最后一次追求强权的努力生不逢时，以灾难告终（见下文）。除此之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安于默默无闻的存在状态。丹麦—挪威王国的四位奥登堡国王——腓特烈四世（1699—1730 年在位）、克里斯蒂安六世（1730—1746 年在位）、腓特烈五世（1746—1766 年在位）与克里斯蒂安七世（1766—1808 年在位）——以开明的方式逐渐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克里斯蒂安七世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积极的实验，两年内通过了 2000 条法令。但 1772 年国王的首席大臣、据说与王后私通生子的普鲁士人 J.F. 施特鲁恩泽（J.F.Struensee）以欺君之罪被斩首，实验也由此戛然而止。瑞典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抗专制主义王权的强大运动，议会在运动中突显出来。激烈进行的议会忙于应付议会四个等级艰难的运作和“礼帽派”与“便帽派”的敌对。查理十二世的姐姐乌尔里卡·里沃诺拉（Ulrica Leonora）让位于[641]她那倒霉的德国丈夫腓特烈一世（1720—1751 年在位）；他的继承者、霍尔施泰因—戈托尔普—奥伊廷的阿道夫·腓特烈（Adolphus Frederick，1751—1771 年在位）1756 年遭遇普鲁士阴谋，这两个事件极大地削弱了君主制。古斯塔夫三世（1771—1792 年在位）领导了 1772 年的宫廷武装政变，恢复了君主制，使瑞典向当代政治和文化的主流靠近。这位饱含爱国激情、建有丰功伟绩的年轻国王曾横扫巴黎的沙龙，1792 年力图组织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亲王联盟，遭暗杀身亡。[**火气**]

[642]

火气（ELDLUFT）

1773年，瑞典化学家卡尔·舍勒（Karl Scheele）（1742—1786年）发现空气是“几种气体”的混合物，其中一种组成成分正是燃烧的奥秘所在，他称之为“火气”。1774年10月，他把这个发现结果寄给法兰西国家火药与硝酸钾生产总监安托万—洛朗·拉瓦锡。同月，拉瓦锡邀请非英国教徒的英国实验家约瑟夫·普雷斯特利共进午餐，他从普雷斯特利处又一次听说“脱燃素空气”是如何使点燃的灯芯发出白色火焰的。

拉瓦锡负责管理国王的“包税系统”和国家火药总署。因而，他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投身到他所热爱的实验中去。他已经注意到，许多物质在燃烧时重量增加，并且他非常明白，这个结果是不符合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燃素”理论的。燃素是一种“不可见的（虚构的）物质形式，大多数科学家，包括普雷斯特利仍然相信其存在和作用。

因此，拉瓦锡设计了一个实验，以测量“水银在封闭容器中燃烧时所吸收的‘火气’量”。他发现，不仅加热了的水银会与火气发生化合作用，而且进一步加热时，会有新的化合物析出，还可以分离出它的组成成分。现代化学分子式是这样表述拉瓦锡的实验的：

$$Hg + O = HgO\text{（氧化汞）};\ HgO = Hg + O$$

科学终于理解了化学反应的实质，即物质世界是由简单元素与其化合物组成的，物质可以与其他物质相化合，也可以与其他物质相分解。

拉瓦锡接下来开始命名的工作，简单元素以简单名称命名，化合物以复合名称命名。舍勒的“火气”，或普雷斯特利所称的“脱燃素空气”变为了“成酸元素”，舍勒所称的“臭气”变为了氢气，水银与氧气的化合物成为“氧化汞”。1787年，在拉瓦锡的帮助下，新的元素表出版了，33个元素以其新名称亮相。1789年，他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化学教科书《化学纲要》。此时舍勒已经过世，很可能是因他的锅炉排放的烟熏中毒而死。1791年，普雷斯特利由于支持法国大革命，他的住所被伯明翰暴民焚毁，使他无家可归，逃往美国。1794年5月8日，拉瓦锡与其他26个包税人共赴断头台。据说，法官对申诉作了如下评论：“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化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正当西欧国家被法国霸权困扰之时，中东欧的国家也有自己的重大问题需要关注。路易十四在位时，中欧经历了两次出人意料的大变动，对日耳曼国家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次是奥斯曼人最后一次冲击，1683 年卷土重来围困维也纳。第二次是普鲁士崛起过程中的突进阶段。普鲁士野心勃勃，扰乱整个地区。东欧则正处于俄罗斯帝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后者从此成为一流的军事、政治强国。古老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陷于这些急速的变动之中，它先是集结兵力、解维也纳之困，然后在觊觎垂涎的邻国打压下渐渐衰落。十八世纪结束前，中东欧的传统力量格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十七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进攻浪潮是与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这场危机使得维齐（首相）大权落于阿尔巴尼亚裔的柯普鲁卢（Köprülüs）家族手中达 30 年之久。1650 年代，克里特岛争议、威尼斯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危机肇始；1660 年之后又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继承问题使奥斯曼政府与哈布斯堡处于对立立场，危机加深。柯普鲁卢家族把战争视为转移军队的阴谋和仇恨的手段，特别是为了控制禁卫军团他们采取了严酷的惩戒措施。1672 年柯普鲁卢家族进攻波兰的波多利亚省，攫取了德涅斯特河上的卡梅尼察要塞，但其攻势最终被“王冠首领”扬·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阻遏在乔齐姆。1681—1682 年，他们支持匈牙利托克利（Tököli）伯爵领导的叛军，宣布匈牙利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随即沿多瑙河突入维也纳。

维也纳之困从 1683 年 7 月到 9 月，持续了两个月。这个供给不足的奥地利首都被一支装备有攻城重炮的 20 万大军所围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德意志亲王们正专心致志地对付进犯莱茵河的路易十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无力对多瑙河危机作出回应。结果是波兰提供了最有效的援助。索别斯基当时已经登基，并断绝了早期与法国的联盟关系。他把对土耳其战争和奥地利提供的资助视作解决本国国内问题的方法。9 月初，他获得了援军指挥权。他先在维也纳森林卡伦[643]山高地教堂祈祷，接着于 12 日下午两三点下令发起进攻。他的轻骑兵飞快地冲下山坡，直扑奥斯曼人营地的中心。五时半，他策马疾驰于敌军队伍之中，目光所及之处，一片恐慌、混乱和屠杀。次日夜，他在大维齐（奥斯曼帝国首相）的帐篷里安顿下来，才有时间给他的妻子玛丽—路易丝王后写信：

“我的心灵和灵魂惟一的安慰、我最美丽、最亲爱的玛丽申卡！

我们最神圣的天主上帝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和荣誉。我们夺取了所有的枪支、整个军营，还有无数的战利品；……这里的火药和弹药足够一百万人使用……维齐仓皇逃窜，只来得及配备一匹马……［军营］周围竖有围墙，足足有华沙城或勒武那么大……我拥有

了所有的帐篷、车马以及其他成百上千的富贵享乐之物……禁卫军被丢弃在壕沟里，晚上他们将被处死。……他们还留下了一大群无辜的奥地利人民，尤其是妇女；但他们竭尽全力地屠杀……维齐有一只美妙绝伦的鸵鸟，……但它也将被杀死……他有许多浴室、花园和喷泉；兔子、猫，还有一只鹦鹉到处飞个不停，我们抓不住它……”[27]

索别斯基把先知绿军旗寄给教皇时，他附上查理五世模仿米伦贝格的话：“我来了，我看到了，上帝胜利了。”

奥斯曼土耳其那天在维也纳的撤退只是个开始，此后200年他们一直节节溃退。从短期来看，这鼓舞了教皇组织的神圣同盟的领袖们，他们顺多瑙河而下，侵入那些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就毫无争议的领土。《卡洛威茨和约》（Carlowitz，1699年）规定，匈牙利归还给奥地利，波多利亚归还波兰，莫斯科重新得到亚速，威尼斯重获摩里亚半岛。从长远来看，这使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领土陷于联合钳形攻势之中。哈布斯堡控制西翼军事边疆，俄罗斯人从东翼不懈地挺进黑海附近。就这方面而言，1726年的奥俄条约（见原书附录Ⅲ，第1284页）起到了长远的战略作用。

土耳其战争一直悬而未决。1739年，奥地利被迫放弃所有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它在早先的《帕洛维茨条约》（Passarowitz，1718年）中得到的贝尔格莱德。但三次大的俄土战争——1735—1739年，1768—1774年，1787—1792年——使得整个黑海北岸落入俄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库楚克—凯纳吉条约》（Kucuk-Kainardji，1774年）则具有决定意义。沙皇得以对苏丹臣民中的基督教徒行使保护权，并获得了过去只有法国人才能享有的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商业特权。这标志着“东方问题”的肇端。但土耳其仍统治着大部分巴尔干。整个十八世纪，往往在那些第一本能是去支持奥斯曼当局的民族中间，民族的期望也在缓慢地增长着。

希腊卷入政治舞台，部分是由于自治程度的提高，部分是由于俄国的干涉。希腊的官员阶层成长起来，而培养他们的学校也得到了同[644]步发展。贡童制度（奥斯曼帝国在基督教属民中征选男孩，将他们培养成伊斯兰教军人和官员）在1676年之后就中止了 。希腊社会的民族自觉性越来越强。威尼斯盘踞科孚，还从1699年起占领了摩里亚，这使希腊与西方的关系加强。1769年，俄国派遣一支舰队到达地中海抵御奥斯曼人，预示着希腊的解放。俄国人给予希腊商人商业特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塞尔维亚也受到类似发展进程的影响。争夺贝尔格莱德的战争，以及1711—1718年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当时许多塞族志愿者聚集

在哈布斯堡的军旗下，这两件事表明了奥斯曼人并非不可战胜的。“黑乔治”彼得洛维奇（Petrovic，1767—1817年）同时在土耳其和哈布斯堡军队服役，他在1804—1813年起义中跃上巅峰。这场起义使塞尔维亚人首次尝到独立的滋味。1815—1817年，米洛斯·奥布廉诺维奇（Miloš Obrennović，1780—1860年）领导了第二次起义（他后来杀害了“黑乔治”），为获得国际承认铺平了道路。

罗马尼亚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由法纳希腊人（因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聚居点而得名）代表土耳其进行统治。尽管法纳希腊人政权腐朽堕落，剥削成性，但它仍然鼓励移民，提倡加强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奥地利攫取布科维纳（1774年）以及俄国1769—1774年，1806—1812年占领希腊，催生了变化。摆脱奥斯曼，获得解放的思想第一次在希腊民族心目中生了根。

数十年来，保加利亚备受折磨：奥斯曼大军往返过境，留下大批溃散军队。这些兵匪几十年来蹂躏着乡村。1794年，兵匪的一位领导人帕斯瓦奥格鲁（Pasvanoglu）在多瑙河上的维丁（Vidin）自立为王，成立了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强盗国。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同塞尔维亚人一样，日益把眼光投向俄罗斯。

阿尔巴尼亚为地方部族酋长所控制。其中之一就是布沙蒂的穆罕默德，他于公元1760年建立了一个王朝，在从斯库台起的上阿尔巴尼亚，维持了几代人的统治。另一位是台佩莱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他以若阿乔安尼那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采邑，其领土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爱琴海。[**山鹰之国**]

[645]

山鹰之国（SHQIPERIA）

阿尔巴尼亚（山鹰之国）可算得上是人们最不熟悉的欧洲国家了。爱德华·吉本在1780年代沿海岸顺流而下时，他曾写道“从意大利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我们对它的了解比对美洲大陆腹地的了解还少。”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阿尔巴尼亚更深受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之苦。

1911年的起义把阿尔巴尼亚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出来，加速了由阿尔巴尼亚信奉基督教的邻国所组成的“巴尔干同盟”的形成。联盟成员国，除保加利亚之外，其领土内都有大量的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它们都不希望看到一个联合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大阿尔巴尼亚”出现。《伦敦条约》（1913年5月）结束了巴尔

干同盟战争，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的主权独立。但它坚持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确定疆界，并建立西方式的君主制（见原书附录Ⅲ，第1310页）。

阿尔巴尼亚社会内部由于社会阶级和宗教的分歧而呈一盘散沙。北方的高地盖格部族仍盛行血族复仇，南方的低地人（或称托斯克）则与之相去甚远。2/3的居民是穆斯林信徒，剩下的1/3的一半是天主教徒，一半是东正教徒。主要的少数民族有东边讲弗拉其语的畜牧民族，沿海城市的意大利人，还有习惯于把南阿尔巴尼亚视为“北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加告兹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塞尔维亚和希腊入侵阿尔巴尼亚。协约国与意大利签订了第二次《伦敦条约》（1915年），秘密许诺把阿尔巴尼亚变为意大利的保护国。阿尔巴尼亚君主制命运变幻不定。第一任国王威廉·冯·维德（Wilhelm von Wied）3月登基，9月就仓皇逃离。战后，阿赫迈德·索古将军（Ahmet Zogu）被选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元首，1926年又自封为国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墨索里尼建立了25年前协约国许诺给意大利的保护国。阿尔巴尼亚领土扩展，把科索沃地区囊括进来。维克多·伊曼纽尔十世（Victor Emmanuel X）被宣布为国王。1944—1945年德国还曾短暂占领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于1946年建国，其建立者是一群信奉共产主义的托斯克人，他们由于得到西方的支持，利用战时机会而地位上升。他们的领袖恩维尔·霍查（Enver Hodzha）接受了战前的疆界划分，放弃了生活在黑山、科索沃、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利益，使其几乎陷于完全孤立之中。在吉本身后200年，亚得里亚海的旅行者们在航行或飞行途中经过阿尔巴尼亚时，依然觉得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1]

黑山（Crna Gora），外界称它“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这是威尼斯人对他的称呼。它是巴尔干半岛上惟一逃脱奥斯曼统治的地区。传说中上帝创造世界时剩下很多岩石，于是他便创造了门的内哥罗。尽管土耳其人曾短期占领过它的首都采蒂涅，但他们从未长期保有它。他们说“一支小军队被击败了，接着一支大军饥饿而死”。门的内哥罗从1516—1696年一直是一个神权国家，有主教统治。从1696—1918年则由彼得洛维奇王朝的世袭君主统治。

十八世纪时，巴尔干精英们第一次开始憧憬独立，至此，他们已为奥斯曼统治达四至五个世纪之久。这段经历留下了它的烙印。东正

教会很早就顺应时势，向其教徒灌输根深蒂固的保守、反西方观念。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东正教会就把西方看做是比异端更可怕的镇压的根源。结果，撼动了西方世界的那些伟大的文明开化运动——文艺[646]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无一能有效地渗入巴尔干国家。其政治传统与理性主义、专制主义或立宪主义无甚关联；亲族政治在各个层面上占据支配地位；贿赂是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的润滑剂，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土耳其谚语说“权力是一个食槽，不从中捞取食物的就是猪”。这个封闭的疆域日益缩小，后来它被人们称为“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它的边界就构成了欧洲最为根深蒂固的文化断层线之一。

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一消除，哈布斯堡就再次重振山河。利奥波德一世（1658—1705年在位）在其有生之年未能见到路易十四王权式微；但他的儿子约瑟夫一世（1705—1711年在位）和查理六世（1711—1740年在位）所继承的遗产在匈牙利、意大利和尼德兰大大增加。继承问题再次带来了重大政治危机，引发了一场欧陆大战。查理六世和他曾名义上继承其王位的西班牙的查理六世一样，也没有男性子嗣。他心胸狭窄，偏执顽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强制推行宗教顺从，并通过《国本诏书》来保证其女玛利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顺利继承王位。结果，他一驾崩，王位就被巴伐利亚选侯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 Albert）夺去。阿尔伯特登基为查理七世（1742—1765年在位），与法国勾结进行统治，统治短暂，是四百年来惟一一位非哈布斯堡皇帝。王位后来又落入玛利亚·特利莎的丈夫托斯卡纳大公弗朗西斯一世（1745—1765年）和他们的长子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手中。实际上，玛利亚身兼女皇、皇太后、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女王几种身份，她控制维也纳四十年之久。这个女人明辨是非，节制隐忍，她励精图治，尤其致力于农业改革，减轻农奴的负担。“戴着王冠的革命者”约瑟夫二世则截然相反，是一个缺乏耐心的激进分子，他坚定地反对教会和皇室特权。“约瑟夫主义”——指的是他强调国家权力、反对传统的教会和贵族支持的政策——是彻底的开明绝对君主制形式之一。

在此期间，奥地利官僚体系得到发展。这个体系有时被称做“财政主义”，即以职业公务员精英阶层为基础的一个体系。军事体系也日益膨胀，并经过重组。这两者成为保证哈布斯堡君主制在德意志帝国消亡之后仍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凝聚力。维也纳大学设有专门培训这些公务员的学院，输送人才直接进入财政、司法和教育等部门的高层（普鲁士的哈雷大学也起到同样作用）。这些官僚受过高等教育，

薪俸丰厚，使用德语，忠心耿耿，他们完全仰仗君主的恩宠，从而形成了对抗贵族、教会和各民族多元利益的坚强缓冲器。他们还领导了公正的理性化与改革运动。

在此最后阶段（如历史所证明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凝聚力由于主要王公奉行各自的王朝政策而受到极大削弱。哈布斯堡皇帝们只能[647]依赖帝国以外的土地和财产为生。同样，选侯们的生活也江河日下。从1697—1763年，萨克森选侯韦廷（Wettin）家族作为波兰—立陶宛国王进行统治。自1701年起，勃兰登堡选侯霍亨索伦家族就登上了普鲁士王位（见下文）。从1714年起，汉诺威选侯成为大不列颠国王（见上文）。整个十八世纪中，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选侯一直企图通过与法国的传统联盟关系来扩大其财富。而“德意志”所有的“首都”——维也纳、德累斯顿、柏林、汉诺威、慕尼黑——由于对外联系不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最后两代皇帝——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在位）与弗朗西斯二世（1792—1806年在位）——已经不可能挽救将倾的帝国大厦，革命洪流很快将之摧毁。

[欢乐颂]

匈牙利刚脱离土耳其人的控制，又落入他们的哈布斯堡解放者专制罗网。1687年，存在了700年之久的选举君主制被废除。哈布斯堡的世袭统治者把贵族议会变为了记录皇帝命令的机关。马扎尔贵族古老的“反抗权”被彻底终止。1704—1711年，弗朗西斯·拉科齐（Francis Rákóczi）成功地利用了哈布斯堡忙于对付西班牙和土耳其人的时机，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萨特马尔和约》（1711年）恢复了许多古老的自由权，后来马扎尔又以这些权利作为同意《国本诏书》的条件。这些自由权成为了1848年之前盛行的基本法。匈牙利没有重蹈邻国波希米亚的覆辙。然而，妥协也是付出了代价的。1746年后，玛利亚·特利莎执政之时从不咨询匈牙利国会；而约瑟夫二世则粗暴践踏宪法的所有规定，甚至未行加冕礼。他把奥地利和匈牙利视为一个统一国家对待。1784年他把德语定为官方语言，由此引发了抗议风潮。利奥波德二世1791年重新确立了匈牙利的独立地位，同意使用拉丁语和马扎尔语，这才平息了抗议之火。匈牙利人生活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它是以大贵族和郡县议员的荫护关系为中心的，而不断的对土耳其战争、种族与宗教隔离又加深了这种保守性。玛利亚·特利莎实行农业改革，在所谓的1767年“土地调查”中终止了农民对土地的隶属关系，因而扑灭了他们的革命情绪，这也很可能是延长这种保守性的原因。但她的教育改革，加上布达大学的成立以及世纪之交时马扎尔人的文学复兴，却埋下了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种子。时机一到，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高涨，将唤醒少数族的斯

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犹太人，激起他们起来反抗。

十八世纪是普鲁士崛起过程的关键时刻。这种解释通常是考虑到普鲁士后来将完成统一德意志的任务。事实上，普鲁士的崛起是通过不懈地执行王朝政策来实现的。这些政策不断分裂德意志世界，造成这个王国不具备成为一个潜在的民族国家的任何特征。而效率极高的管理机器的出现，使得统治者得以维持一支比例失调的常备大军的存在。（就职业士兵与人口的比例而言，普鲁士在效率上是其邻国波[648]兰—立陶宛的 30 倍）。普鲁士货物税（1680 年）的征收也使供养这支军队成为可能。军队以贵族军官集团为基础，1733 年后则依靠各州招募农民入伍。[**正步**]

腓特烈三世（1688—1713 年在位）和"欧洲教头"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 年在位）统治期间，霍亨索伦家族依然按照"大选侯"制定的不道德的原则行事（见第 7 章）。1700 年，他们把选举权出卖给哈布斯堡，以换取后者承认他们登基为帝的要求。1728 年，他们以奥地利割让贝格和拉芬斯泰因为条件，接受了《国本诏书》。在西班牙王位继承联盟和北方大战中，普鲁士的灵活应变能力使他们得到了重大的土地收益——什切青与西波美拉尼亚。瑞典是最后一个意识到以普鲁士为盟友与以之为敌人同样危险的国家。独一无二的"普鲁士精神"就是从对王朝的忠诚、军队强大带来的傲慢和因文化教育进步而产生的自豪感三者混合物中生长出来的。1694 年，在哈雷建立了普鲁士的第一所大学；柏林则由于法国胡格诺教徒和奥地利新教徒的大批涌入而萌发了活力，建立了皇家艺术学院（1696 年）、皇家科学院（1700 年）。1777 年还颁布了一条敕令，以期改善大众教育。

在腓特烈大帝（1740—1786 年在位）统治期间，普鲁士释放了过去历代统治者小心翼翼积累起来的力量。腓特烈 1740 年出兵占领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一鸣惊人。此后 25 年中，战争一直是他主要的政策工具。腓特烈把他的国家带到了被歼灭的边缘，又转而诉诸于外交上的强盗行径。最后终于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中为普鲁士打造了一个巩固的领土基础（见下文）。[**格罗森米尔**]

腓特烈的个性是那个时代的奇观之一。他的父亲生性残暴，经常鞭打他，童年时代还逼迫他亲眼目睹自己朋友凯特被处决行刑。他曾被父亲囚于奥德河的屈斯特林要塞多年。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他的性格。他在位时，大炮的轰鸣声、战场的呻吟声与国王悠扬的笛声、哲学家们的交谈声混杂起来。腓特烈曾经说过："我出生太早，但是我见过伏尔泰。"颂扬他的丰功伟绩的绝不仅仅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们。

[650]

格罗森米尔（GROSSENMEER）

1785年时，格罗森米尔是德意志西北部奥登堡大公国的一个村庄，邻近尼德兰边境和普鲁士新得到的东弗里斯兰省。当时有142个家庭，再加上77名“贫民”和其他暂时居民，总人口为885人。对这个村庄的家庭进行分析，反映出如下几种类型：

家庭类型	NO.	%
1. 独居者（如寡妇）	2	1.4
2. 非婚家庭（如同居的兄弟姐妹）	1	0.7
3. 单一家庭（父母与子女）	97	68.3
4. 扩展的家庭单位（几代人与亲属）	28	19.7
5. 复合家庭（2个或2个以上的婚姻单位同居）	14	9.9
总 计	**142**	**100**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扩展家庭和复合家庭一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少数（30%），但单一家庭仍占据明显多数（68%）。

这一领域一位资深学者选择这个例子作为“欧洲含混区域（其家庭往往具有我们所称的‘中间’特征）”的典型。以此类独立的例子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四区假设”。如果把格罗森米尔（1785年）作为欧洲“中西部”或“中部”地区的典型，英国埃塞克斯的埃尔姆登村（1861年）可作为“西部”的典型，意大利博罗尼亚附近的法加尼亚（1849年）可作为“地中海”的典型，而俄国的克拉斯诺索巴基诺（1849年）则是“东方”的典型。地理是不可信的，而这个概括是浮夸的。

这个假设是作为另一个老模式的改良理论提出的。那个被认为是“广泛接受”的老模式贸然把传统欧洲家庭划分为两种更简单的类型——“西方”和“东方”。格罗森米尔被视为埃尔姆登的变体类型，后者不低于73%的家庭都符合简单类型的标准，而法加尼亚被认为是克拉斯诺索巴奇诺的变体类型，后者86%的家庭都属于扩展或复合类型。[1]

比较社会史是一门成果极为丰富的学科。但同类只能与同类相比，这是一条绝对的原则。把前工业时代德国的一座村庄与处于工业革命顶峰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村庄相比较是值得怀疑的。但在“西方学者”中，以俄国腹地一个农奴盛行的村庄为基础，

作为另一个被称为"东欧"的整个"含混地带"的典型代表，这种做法是具有惊人典型性的。程式化了的多样性就等于否定了多样性。[**大家庭**]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家庭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英语刊物《家庭史学刊》于1976年创刊。在此之前，研究家庭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们明显"对历史视角漠不关心"，而社会史学者们则专注于阶级问题。许多学者猜想，自远古以来欧洲就存在一种传统的父系大家庭形式，因而在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前没有太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像弗里德里希·勒普雷（Frédéric Le Play，1806—1882年，法国工程师，研究社会学问题而著名——译者注）这样的先驱，知道的人并不多。他曾著书《家庭组织》（1871年），提出了家庭类型论。勒普雷提出有三种家庭类型：父系扩展家庭；由三代核心组成的主干家庭以及不稳定的蜂巢家庭。最后一种只在父母抚养子女时才存在。除历史悠久的谱系学外，对历史上家庭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是100年以后的事了。[2] [651]

尽管如此，这个领域研究的多样化已非常惊人。有对各类情况的研究，从中世纪冰岛的喂奶技术，到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私生子，或是十九世纪撒丁的父权。主要的研究线路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研究家庭单位的形成、结构与解体的研究。[**集体农场**] 第二种主要围绕家族或亲族内的生物趋势和性趋势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第三种主要研究家庭单位内部的个人、性别、代际问题——进而关注"人生过程分析"、女性、劳动模式、儿童、婚姻、老龄等问题。[**格里伦斯坦村**] 第四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强调家庭习俗、礼仪、仪式。第五种是从法律角度出发，审视家庭法和政府政策的演变。第六种是从经济角度，审视不同农业、城市、或工业背景下的家庭预算。所有现代家庭问题，从单亲家庭到失业、子女管教、青少年犯罪，都有其历史根源。系谱学也没被遗忘。曾经为贵族精英阶层所热爱的活动近来已成为最为普及的消遣活动。[3]

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学家的兴趣反映了可以利用的资料的性质。例如，中世纪贵族家庭，或文艺复兴时期商人家庭很早就可以研究，因为它们都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记录。[**商人**] 农民或平民家庭则更难以研究。但运用社会学和计量学的技巧 [**地租**]，利用视觉、文学、统计学和口传资料，已开发出了大量的信息。任何时期或地区都被纳入进来。家庭史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因为每个人都是家庭的成员，或者曾经是家庭成员。

阿克顿勋爵（英国史学家，“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译者注）也称他为近代国王中“最完美的实践天才”。

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和战役数不胜数，都是历史上的经典战争。作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组成部分的两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1744—1745年）使得玛利亚·特利莎对他憎恨不已。这两次战争后，他保住了侵略战争的成果。他在默尔维茨（Mollwitz）和霍图西茨（Chotusitz）、霍恩弗莱德堡（Hohenfriedberg）都获得了胜利。1745年他占领了布拉格。七年战争让他跃上了荣耀的巅峰，又陷于绝望的深谷。战争起因是他出兵萨克森。在洛沃西茨（Lobositz）、罗斯巴赫（Rossbach）、佐恩多夫（Zorndorf）、洛伊瑟恩（Leuthen）、科林（Kolin）、库内斯多夫（Kunersdorf）、列日尼茨（Liegnitz）和托尔高（Torgau），他机智地利用国内交通线，使敌人大军打压的企图一次[649]又一次落空。在罗斯巴赫，他以极小的损失取得胜利。库内斯多夫一役，他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1762年，国库空虚，英国中断提供资助，俄国似有进取柏林之心，在此危急关头，俄罗斯女皇去世，突如其来的停战再次挽救了他。《胡伯图斯堡条约》（Hubertusburg，1763年）又使得他再次保住战利品丝毫无损。当他的守卫迟疑犹豫时，他曾厉声叱责：“狗崽子们，你们还想长生不死吗？”

腓特烈一威廉二世（1786—1797年在位）统治时期，普鲁士开始走上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新国王甚至不惜冒与波兰一立陶宛联盟断绝关系之险。考虑到革命年代和俄罗斯强大力量，他才回到了正轨。第二、三次瓜分波兰中，普鲁士得到了但泽和华沙。至1795年，柏林统治的这个国家中有40%的人口是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还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社群。它是欧洲最具活力的大熔炉之一。要是这种状况没被打断、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很难想象德国和中欧的历史最终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但事实是，老普鲁士将被拿破仑所征服，1815年出现的新普鲁士将会改变很多，真正成为一只猛兽。

如果说普鲁士是小国谋求强权的成功典范，那么俄罗斯则是欧洲版图最大的国家以空前规模追求强权的代表。腓特烈大帝本人都为之惊叹。他曾评论俄国人：“倾整个欧洲的力量才能让那些绅士规规矩矩地待在他们的国境之内。”

从1676年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tch）去世到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的149年间，罗曼诺夫家族把这个国家从一个新生的地区强国推上了不可战胜的“欧洲宪兵”的地位。阿列克谢继位与路易十四登基相差不到十年，当时他还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莫斯科国王，凡尔赛对他一无所知；莫斯科大公国摇身一变成为“全俄罗斯的帝国”，其领土吞并了大量的邻国而扩张；其社会与统治都进

行了彻底的改革；国家和主体民族的整个身份都被重塑。对所有为这种权力炫耀而欢呼的人来说，凡是促成这个转型的人和政策都是好的，同时也如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历史学家）写到彼得大帝时说的，是“必要的”。

在独裁政体中，独裁者的个性是首要因素。俄罗斯有两个人物的个性尤为突出——彼得一世（1682—1725 年在位）和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 年在位）。他们都得到了“大帝”的称号，在体格、精力、坚毅程度上都被夸大了，他们都因对俄罗斯的强盛作出了无可争议的贡献而备受嘉誉。但从总体评价上看，无论是对统治者或是对这个王国，人们一定会疑惑，能否单单用块头和蛮力作为评价某个统治者是否伟大的标准。在他们身上，批评者不难找到带来耻辱而非尊重的个性特征。尤其是彼得大帝，他在道德上是一个魔鬼。他一生沉溺[652]于“傻瓜与小丑会”——俄国一个猥亵渎神的团体，类似于英国的地狱之火俱乐部——荒淫放荡的活动之中。他的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古怪的低下品位而不去追究。但他本人亲身参与粗俗变态的酷刑（在 1697 年大规模惩处叛乱的射击军事件中第一次暴露出来），即使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也绝不能视为一个小缺点。他乐于摆弄船模和小锡兵，对他的许多计划给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却漠不关心，修建圣彼得堡就是一例。即使他的确使俄罗斯发生了“从无到有”的变化，但是这位能够下午刚刚才亲眼目睹了自己无辜的皇储被鞭责致死，傍晚就可以出席猥亵的宫廷舞会的沙皇，已经与尼禄相差无几了。

同样，叶卡捷琳娜展现在历史学家们面前的是“与丑恶幽灵斗争的光辉形象”。[28]她是一位德国公主，出生于什切青，原名索菲亚·奥古斯塔·弗里德里卡·冯·阿尔霍特—泽伯斯特（Sophia Augusta Frederica von Alhalt—Zerbst）。她的贪婪占有欲在历史上难有能出其右者。她的放纵淫欲本身并非不适宜的，但当这种行为与卑鄙阴谋交织起来时就不得不说是令人反感厌恶的了。有流言称，她企图与一匹马做爱时，因一架名为“叶卡捷琳娜的绞盘”的机器出现故障而死。这个流言之所以引人瞩目，只是因为人们一直都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回到正题上来，她是通过宫廷政变夺取王位的。她煽动近卫军谋杀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1761—1762 年在位）。她先后让十位大臣做她的情夫，并通过他们进行统治——从格里高利·奥尔洛夫（Gregory Orlov）、格里高利·波将金（Potemkin）到比她小 38 岁的普拉顿·祖波夫（Platon Zubov）。用对她有利的说法是，她率领一批文官仆从，用劝说多于恐吓的方法进行统治。宽容一些的传记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为俄罗斯所作出的贡献与路易十四在成为凡尔赛之囚前为法兰西作出的贡献相当。……专制独裁统治被洗清了暴虐的污点……专制政体变

为了君主政体。”[29]

与古罗马一样，近卫军政变已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的习惯。由王朝继承人合法继位的少之又少。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1727年在位），又名斯科沃罗茨卡（Skovorotska），她本是拉脱维亚的一名村姑，成为了彼得的第二任妻子，在他临死时推翻了他。彼得二世（1727—1730年在位）通过伪造遗嘱而继承王位；库尔兰女公爵，安娜女皇（1730—1740年在位）通过枢密会议的计策而登基；不伦瑞克公爵伊万六世（1740—1741年在位）尚在襁褓之中，就通过比隆男爵的计谋继位；曾是吕贝克主教未婚妻的叶丽萨维塔女皇（1741—1761年在位）是近卫军兵营的常客，是通过赤裸裸的武装政变上台的；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则是弑父篡位。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很有可能成为一位致力改革的沙皇，但长期被官方史学家认为是精神失常，很显然这是由于他神智太正常了。保罗坚持掘出他那位遭谋杀的父亲彼得三世的尸骨，把他父母重新下葬于彼得保罗大教堂。年迈的奥尔洛夫伯爵被迫手捧皇冠，跟在35年前死于他手中的受害者棺椁之后。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和解行为极好地象征了萦绕着整个圣彼得堡宫廷的阴谋骗局和暴力恐惧。

1700—1721年第二次北方大战期间，莫斯科公国脱颖而出。这场[653]持续20年的争斗是围绕着彼得大帝与瑞典年轻的查理十二之间的对抗展开的。彼得垂涎瑞典在波罗的海入海口的土地，年轻的查理十二则急于毕其功于一役，打击所有的邻国。1700年8月，查理冒险在哥本哈根附近登陆，彼得攻打芬兰湾的瑞典要塞纳尔瓦失败，战争由此拉开序幕。主要战场在波兰—立陶宛交界处。波兰—立陶宛国王（萨克森选侯奥古斯都）已私下与彼得结成秘密联盟。最终，波兰—立陶宛比瑞典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见下文）。

最初几次交锋之后，查理十二在大陆上主动发起了攻势。他的首要目标是惩罚彼得的萨克森盟友，1704年他成功地使波兰亲瑞典派领袖斯塔尼斯瓦夫·莱茨辛斯基（Stanislaw Leszczynski）取代奥古斯都登上波兰王位。此举却让彼得趁机攫取了瑞典的立沃尼亚和因格里亚省。随即，1703年圣彼得堡新城就在这儿宣告成立。1707年，查理转而东向，指望获得立沃尼亚和乌克兰军事首领马泽帕（Mazeppa）的支持。但在这两处他都被欺骗了。1708—1709年冬天，由于农民游击队的骚扰，他被迫放弃了进军莫斯科的最初计划，转而南下。1709年6月27日，他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遭受重创，全军溃退，被迫逃入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寻求庇护。大获全胜的俄国军队横扫西侧，占领了华沙，恢复了奥古斯都二世的王位。波罗的海诸省落入俄国手中。众多贪婪的德意志王公加入丹麦和普鲁士的行列，攫取瑞典更西边一

些的领土。1718 年 11 月，查理十二世在围攻挪威一瑞典边界处的腓特烈斯夏德要塞的战役中阵亡。于是，在奥兰群岛召开了一次外交会议，此后在尼什塔得（Nystadt）附近签订了《俄瑞条约》（1721 年）。瑞典从此一蹶不振。彼得成为北方事务的仲裁者，并为他所拥有的"通往西方的窗口"而颇为自豪。1721 年，他擢升自己的地位，不再使用俄国"沙皇"的称号，而改称"皇帝"——但他在世时这一称号未得到广泛认可。[**彼得格勒**]

莫斯科公国一披上帝国的外衣，就强制推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旨在把这个新生的帝国改造为一个现代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彼得一世眼中，改革就等同于"西方化"。这位沙皇曾于 1696—1698 年、1717 年两次出访欧洲，停留了很长时间，他把从海军建设到剃须的各类技术都认真记录下来。但真正督促俄罗斯进行改革的还是北方大战。建立一支常备军以及供养这支常备军的财政与社会机构，乃是沙皇最紧迫的需求。古老的莫斯科大公国效率极其低下。军队是一支杂牌军，一到冬天就作鸟兽散，它不仅消耗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并且在遇到像 1705 年这样的歉收年份时，国家税入的 96%都会被耗尽。到彼得统治末期，一支 30 多万人的经过训练的正规军建立起来了。他征收人头税，使国家税人增加了两倍；他实行了农民征募制，改组了贵族阶层；这一切都成为军队的有力支持。

俄国改革不遗余力。1701 年颁布了一项重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法令》，作为管理政治警察系统的规章制度。全国划分为省 [654] （1705 年）；中央统治机构内部建立了一个参议院和各个行政院（1711 年），引入了市政府制度（1718—1724 年）；国家鼓励贸易、工业、教育、文学、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这些改革措施带来了重大变化。1721 年废除了主教制度，使俄国的东正教会服从国家神圣会议的管理。改革还命令牧师讲出教徒告解中的秘密。1722 年颁布了职级表，把等级制度与服军役和地产结合起来，并使扩充了的贵族阶层牢牢地受到这一制度的约束。如此之多的新机构的创立也就意味着一位权威所称的"世袭国家的部分解体"，俄国第一次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区分。[30]尽管发生这些社会变化，但是政治领域未发生重大的变革，贵族们也仍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贵族一旦拒绝接受教育或服军役，他们将遭受当众鞭笞，并被剥夺公民权。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彼得的改革并不是当代人所想象的那样。这些措施并未成为一股强大的统一力量；正相反，它们使沙皇的臣民在忠诚义务上出现分歧，尤其是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同样，这些措施往往只引进了西方制度的形式而忽略了其实质。彼得仅仅下令俄罗斯人剃掉胡须，佩戴扑粉的假发，并不能把俄罗斯人变为欧洲人。

相比之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更关注实质内容。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尽管开明的空话讲了不少，专制和农奴制的根基并未触动。但是，她1766—1768年对立法委员会颁布的著名圣谕却是旨在编纂一部现代法典，而她在省级行政上表现出中央集权化和“俄罗斯化”倾向。最重要的是，她接受了“贵族自由权”。这些举措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影响长久的改变。《贵族诏书》（1785年）确认了此前一条法令给予贵族议会和各省自治政府的有限权利，从而成为职级表的补充；放松了对于把奴隶作为私产进行买卖的古老限制。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半新半旧的混合体：专制君主政府日渐依赖它所创造出的服役贵族阶层，同时贵族却不会把他们对地方大众行使的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悖论在于，俄国专制君主坚持垄断政治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有效性却比不上西欧的立宪君主。”[31]至少旧的莫斯科公国的专制统治是稳定一贯的，而新的俄罗斯帝国却潜伏着毁灭自身的种子。[欧拉]

尽管如此，俄国还是无休止地继续它的扩张（见原书附录Ⅲ，第1277页）。这个国家还来不及充分开发它现有的领土，却一再放纵自己庞大的胃口。在西面，俄国吞并了瑞典—芬兰和波兰—立陶宛的大部分。在南面，亚速首当其冲（1696年），俄国接着鲸吞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黑海省份以及克里米亚（1783年），然后转向波斯、高加索和中亚。在东面，它横跨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起探索了阿拉斯加海岸，并于1784年在科迪亚克岛上建立了一个永久殖民地。

[655] 俄国历史学家一直用“民族任务”、“积聚土地”这样的字眼来为他们国家的扩张辩护。事实上，俄国及其统治者醉心于领土征服。他们对土地的饥渴正是明显的无效率和军国主义传统所带来的病态症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竟然需要持续增长的土地与人口供应，以消除它的不安全感，以进行别人用少得多的资源就可完成的行动，以供养保卫罗曼诺夫王冠的那架过度膨胀的机器，这是极其讽刺的。毋庸置疑，这是“政治饕餮”，即所谓“狼犬一般的饥饿”的极端表现，是一个只有靠吞噬邻居的血肉才能生存的有机体过度领土肥胖症的极端表现。每一位成功的俄国官员都需要一份地产，由成百上千或成千上万个农奴来保证他全家用习惯的方式生活。叶卡捷琳娜二世把约80万名被征服的“灵魂”重新分配，其中单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的就不下50万人。颇有意义的是，前瑞典“波罗的海省区”的德意志贵族获准保留其贵族特权，但立陶宛和罗塞尼亚（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前波兰贵族却没有这么幸运。

在不断扩展的俄罗斯帝国之内，乌克兰保持其独立身份100多年。从1654年至1783年，乌克兰“首领国家”就由第涅伯哥萨克的

继承人在沙皇的监督下统治，哥萨克人最初为反对波兰，寻求与沙皇结为联盟。乌克兰人在马泽帕领导下想趁1708—1709年瑞典人侵之机夺取解放，无果而终。他们遭到镇压，也正是克里米亚被兼并之时，而他们作为抵御鞑靼人和奥斯曼人缓冲屏障的作用也随之终结。[罗斯]

[656]

罗斯（RUS'）

1749年9月6日，圣彼得堡，宫廷史官杰哈德·缪勒（Gerhard Müller）博士起身朗读一篇以拉丁语写成的题为《俄罗斯名称与起源》的文章，他详细阐述了他的理论，古老的基辅国家是由诺曼人（古代挪威人）建立的。但爱国的俄国听众高声喊叫阻止他讲话，他们不愿听到俄国不是由斯拉夫人建立的。官方调查之后，勒令缪勒博士放弃这一课题，现存的他的出版物都被销毁。他至少躲过了那一年去世的法国学者尼古拉·弗雷雷（Nicholas Fréret）的那种命运，后者由于著书，认为法兰克人不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而一度被投入巴士底狱。[1]

自此，俄国历史学家为"诺曼起源"论争论不休。由于实行国家审查制度，俄国的历史特别受到政治干预和目的论的影响。基辅国家的故事被编造出来是为现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利益服务的，相反的版本则是服务于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利益。然而现已证明，诺曼人确实有某种介入，这是不可否认的。"罗斯"的名称曾被归于"红头发"的北欧海盗（维京人，在英语里是russet），或归于芬兰人对瑞典人的称呼"ruotsi"；或归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一个叫"Rhos"的部落，但斯堪的纳维亚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还曾归于本部设在朗格多克的罗德兹（Rodez）的一个多国商业财团。

最后这个极富想象力的（也是不太可能的）假说认为，罗德兹公司利用诺曼水手，经由波罗的海—第聂伯河路线，深入哈扎拉人（Khazaria）的奴隶市场，并于公元前830年驱逐了与之竞争的犹太人的拉答尼亚（Radaniya）财团。后者控制了从黑海到起于阿尔勒（Arles）的北非地区的奴隶贸易。据说罗德兹人在哈扎利亚建立了罗斯人的汗国后，就从以伏尔加河上的塔穆托尔卡/塔马塔卡为中心的外国统治精英变为了以基辅为中心、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当地社会的本土王公。[2] [哈扎利亚]

当不可能作出牢靠的结论时，再次审查就是至关重要的了。但研究基辅起源最令人生畏的是，第一手资料范围太广了。除了斯拉夫和拜占庭编年史外，学者们还必须研究古罗斯文学，比较德国和土耳其（哈扎利亚）传说、北欧古字碑文、斯堪的纳维亚与荷兰法典、丹麦与冰岛编年史、阿拉伯地理，考古学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谜团比较稀罕的一种证据是东欧全境大量出土的阿拉伯钱币。[**迪拉姆**] 最早提到基辅的——以 QYYWB 的形式——是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一封希伯来信件。这是哈扎利亚的犹太人写给开罗附近的弗斯塔德—埃及犹太教堂的。[3]

[657] 但从缪勒的时代到1991年，学术的主要障碍在于俄国或乌克兰无人可以自由进行独立的研究。自由的乌克兰和自由俄国的出现能否改善学术环境还是未定之数。[**王室档案**] [**斯摩棱斯克**]

此后，罗塞尼亚与俄罗斯的历史性差别被正式压抑。乌克兰重新命名为小俄罗斯，抹去了它独立传统的所有痕迹。俄罗斯还剥夺了乌克兰哥萨克人与顿河或库班河上俄罗斯人享有同等自治程度的权力。丰饶的乌克兰大地遭到了剧烈的俄罗斯化和殖民地化冲击。农民移居到欧洲最后的未开发地、南方的"荒原"，其中主要是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在斯拉夫人中还强制保证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垄断地位，在公开场合必须使用俄语。存留的东仪天主教徒都被迁走。俄罗斯移民开始改变城市的面貌，尤其是基辅，现在已经俨然是一座俄罗斯古城了。乌克兰、波兰和犹太文化逐渐失势。罗塞尼亚语（乌克兰语）在乡村继续存在，但俄罗斯官方称其为俄语方言。1794年建立的"新俄罗斯"省首府，宏伟的敖德萨新港口成为蒸蒸日上的玉米贸易的出口地，打开了通往南方的窗户。[**波将金**]

[658]

波将金（POTEMKIN）

1787年，新俄罗斯省总督、战地元帅格列高利·波将金（1739—1791年）亲王为叶卡捷琳娜女皇和皇室组织了一次顺第聂伯河而下的游船旅行。他是想证明他成功地在这个新近从奥斯曼手中夺来的省实施了殖民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调集了一批流动"村庄"，放置在河岸的各个重要位置。波将金的下属打扮成快乐的农民，皇家驳船一进入眼帘，他们立即为女皇和外国大

使热烈欢呼。接下来，驳船一转过弯，他们就立即脱下帽子和工作服，拆除布景，连夜在沿河的下一个位置重新搭建。由于当时叶卡捷琳娜是波将金的情人，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把戏；受骗的傻瓜主要是那些外国大使。“波将金村庄”已成为俄国悠久的欺骗和作假传统的别称。[1] 武力与欺骗是所有专制独裁的拿手好戏。但在俄国，波将金作风却一再重演。

在这个问题上，职业骗术家的观点也许并非完全不相关。据一位资深克格勃叛逃者称，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起，他们就巧妙系统地欺骗西方舆论。苏联的安全部门严格控制所有信息，有选择性地泄露和灌输某些信息，从而不断使西方产生错误的印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非斯大林运动”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斯大林主义。1960 年的“中—苏分裂”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双簧表演。“罗马尼亚独立”是为了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的方便而虚构的神话。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是由克格勃中的渐进主义分子设计安排的。“欧洲共产主义”是又一个骗局。就连波兰的“团结工会”都是莫斯科间谍控制的。1984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出版的这本克格勃大揭秘是知情人编写的，对于思索“公开性”和“改革”的暧昧之处或 1991 年“暴动”之迷的人来说，这是必读书目。问题是：职业骗术家什么时候才停止他们的欺骗活动？[2]

除了“波将金村庄”之外，人们还常常提到以波将金亲王命名的那艘战舰。1905 年革命时，那艘战舰士兵暴动，驶出了敖德萨。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怀疑，那场兵变是不是也是一场骗局。[3]
[苏维电影局]

阴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所有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是骗子、阴谋家、甚至邪恶的“不明力量”的各种谋划。而反对者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阴谋和欺骗根本就不存在。这两种看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宣传]**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是欧洲国家中俄国扩张最大的受害者。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消亡是俄罗斯帝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个国家与它过去的乌克兰省命运相仿，先是俄罗斯渗透的目标，接着又时而为之直接统治，时而为之间接统治。1696 年索别斯基死后，俄罗斯的[657]影响与日俱增，至北方大战期间，已经完全可以把波兰变成一个俄罗斯保护国了，只不过名义上不是而已。在经历波兰改革派与以俄国为后台的维持现状派斗争的几十年动荡之后，局势合乎逻辑地走向瓜分

的结局。1772年至1795年间，以俄罗斯为首的列强大饱口福，侵吞了整个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扬·索别斯基（1674—1696年在位）享誉海外，却忽视了国内问题。维也纳之困一役表明波兰依然是一流的军事强国，但这已是最后的辉煌。立陶宛将饱受内战煎熬；自由否决权使得波兰议会时常中断；贵族上层仍我行我素，丝毫无损；中央立法和税收陷于停顿。依照1686年与俄国签订的《永久和约》，波兰放弃了乌克兰，这个和约未得到批准。国王致力于为神圣同盟作战，期望能为他的儿子在摩尔达维亚打下半壁江山。多年后，一位沙皇凝视着华沙索别斯基的雕像，感叹不已："这又是一个（像我一样）把生命浪费在与土耳其人作战上的人。"[32]

1697年的国王选举粉碎了索别斯基的一切计划。雅可布·索别斯基未赢得选举团的信任；奥地利候选人受贿而退出；法国候选人孔蒂公爵（Duc de Conti）在但泽附近海岸遭遇船难。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都由于得到俄国的金钱支持，并适时地改宗天主教，赢得了选举，登上皇位，是为奥古斯都二世。索别斯基家族被流放，一无所有，只得把女儿嫁给同时遭受厄运的被流放的斯图亚特家族。漂亮王子查理于是有了一位波兰母亲。

萨克森时代——奥古斯都二世（1697—1794年，1710—1733年在位）与奥古斯都三世（1733—1763年在位）统治时期——通常被认为是波兰历史的最低点。波兰国王以萨克森选侯的身份作为主要参加国投身北方大战。战争引发了无尽的灾难与瓜分。瑞典与俄国之间的战斗主要在波兰—立陶宛展开，双方分别得到两个敌对的波兰贵族集团的支持（见上文）。萨克森宫廷把波兰—立陶宛作为抗衡邻国普鲁士的制衡因素和巧取豪夺的对象。萨克森军队驻扎于波兰境内期间不受波兰议会抗议的影响。军队的堕落行径导致了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与邻国匈牙利国内的冲突有很多类似之处。冲突又反过来给俄国直接干涉提供可乘之机。

俄国1709年在波尔塔瓦取得胜利之后，奥古斯都二世只能依靠俄国军队的援助重登波兰王位。此后，他被视为双重危险人物——既[659]是沙皇的爪牙，又是一位"专制统治者"。1715—1716年，国王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爆发了公开战争。对沙皇而言，这是一个天赐之机。彼得大帝以调停名义，既把波兰贵族从他们的萨克森国王手中救了出来，同时又强加条件，使波兰沦于依附地位。1717年1月在华沙召集的"沉默国会"或"哑巴国会"上，俄国军队立于其侧，下列事先准备好的决议未经讨论就获得通过：

1. 将国王的萨克森军队驱逐出共和国（换句话说，国王失去了

维持其独立权力基础的一切表象)。

2. 维护贵族的"金色自由权"(换句话说,通过保留自由否决权,在任何合适的时候都可以使共和国中央政府陷于瘫痪)。

3. 共和国武装部队不得超过24000人(换句话说,波兰—立陶宛将失去国防能力)。

4. 军队由皇家、教会和贵族地产摊派提供经济支持(换句话说,国王或议会无力控制军队)。

5. 该解决方案由沙皇提供担保(换句话说,沙皇可以任意介入波兰—立陶宛事务,也可以合法地镇压一切改革运动)。

从此,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实际上已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俄罗斯帝国的附庸,可保护俄国免受西方伤害又不费一钱半厘即可维持的缓冲地带。[**性爱**]

奥古斯都三世统治时,中央政府彻底崩溃。俄军推翻了重新选举的斯塔尼斯瓦夫·莱茨辛斯基,才把这位国王扶植上台,由此引发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但国王通常在德雷斯顿。议会仍定期召集,但却常常还未召开就由于自由否决权而受阻。30年里只有一届议会通过了立法。因附属性原则的一个极端例子,政府为贵族上层和省议员(Dietines)所控制。共和国没有外交、国库和国防,无法进行任何改革,成为哲学家们的嘲讽对象。1751年法国《大词典》的第一卷出版时,那篇关于"无政府"条目的醒目文章通篇讲述波兰。[**康塔塔**][**什拉赫塔**]

改革派逃亡国外,并由此开启了波兰从未间断的政治移民传统。斯塔尼斯瓦夫·莱茨辛斯基两次当选为国王,又两次被俄国人驱逐,他在法国寻求政治避难。他把女儿嫁给了路易十五,因而获得洛林公爵的封号。在南锡,他被称为"好国王斯塔尼斯瓦夫",可以领导一个开明政府,而这一切他在国内是无法做到的。

波兰的末代国王斯塔尼斯瓦夫·奥古斯都·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w August Poniatowski,1764—1795年在位)是一个悲剧人物,在某些方面又是一个高尚的人物。他是叶卡捷琳娜早期的情人之一,他被赋予改革共和国同时又保留俄国支配权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他为1717年的宪法所缚,激起了改革本应避免的大动荡。怎么可能做到削减贵族神圣的谏诤权而又不激起他们的抵制?怎么可[660]能做到限制俄国干涉的权利而又不招致俄国的干涉?怎么可能做到废除自由否决权而不引起某些人行使这项权利。这位国王三次试图打破恶性循环,但三次都失败了。每一次,俄国军队都前来恢复秩序,而共和国则受到瓜分的惩罚。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国王提出改革的建

[660]

康塔塔（CANTATA）

1734年10月，新加冕的波兰国王返回故里。因通知的时间太短，他的乐师不得不在三天之内谱写一个九部分的康塔塔庆贺曲。乐曲激昂高亢，旋律和歌词都是巴罗克风格的：

1．合唱乐章	歌颂您的好运，有福的萨克森
4．宣叙调	何物惊动了您，萨尔马特
5．咏叹调	咆哮吧，放肆的大众，从你们的心底！
7．咏叹调	用热情激发的武器惩罚敌人！
8．宣叙调	哦，国父，那么承认吧，缪斯女神也会纪念萨尔马特选举您为国王的那一天。
9．合唱乐章	帝国的建立者，皇冠的主人……

导致这部康塔塔产生的事件早已被人遗忘，但乐曲却经改编融入后世的作品而获得永生。第7号成为了《圣诞清唱剧》中的第47号。第1号成为了《B小调大型弥撒曲》中的“和撒拿”（赞美上帝之语）。因为波兰国王同时也是萨克森选侯，而他的乐师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议，导致了巴尔同盟（The Confederation of Bar）战争（1768—1772年）和第一次瓜分。1787年到1792年，国王支持大议会的改革措施和5月3日制定的宪法（1791年），结果带来塔尔戈维卡（Targowica）同盟的建立以及第二次瓜分（见第九章）。1794—1795年，国王支持塔代乌斯·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sciuszko）领导的民族起义，引发了最后的结局。第三次瓜分后，共和国不复存在。无国可统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于1795年圣叶卡捷琳娜节退位，后来死于俄国的流放地上。

当共和国在经历最后的苦痛时，立陶宛大公国仍保持了独立性。它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并未影响到它充满活力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使它孕育出了四种流传久远的传统。它的首都威尔诺（Wilno；维尔纳 Vil'na，维尔纽斯 Vilnius）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汇处。波兰精英们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1733年后建立国家[661]教育委员会，后来又有以威尔诺大学为基地的地区教育委员会，该大学在沙皇统治下依然欣欣向荣，直到1825年。大公国成为俄国犹太人移民基地，加强了立陶宛的意第绪文化。立陶宛和罗塞尼亚（白俄

罗斯）的农民阶级未受波兰化运动波及，并保留了足够的资财，使他们后来能够抵御一切俄罗斯化运动。大公国被俄罗斯帝国兼并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其统治实体的地位。但公国的居民不会彻底忘记他们的根。他们投身十九世纪的各次波兰起义。波兰和犹太传统保存了下去，直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大屠杀时代。而立陶宛传统以及在稍轻一些的程度上历经劫难的白俄罗斯传统，得以迎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独立的曙光。**[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 **[立陶宛语]**

十八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最要紧的就是均势。这个时期的所有大战都旨在维持均势（见原书附录Ⅲ，第1282—1283页）。没有一个国家觉得自己强大到能够对整个大陆发起军事征服；但相对小的地区动荡局势可以引起结盟和联盟的连锁反应，以遏制各国感受到的威胁。当时很少涉及意识形态或民族自豪感之类的问题。联盟关系可以迅速改变，小型职业军队可以迅捷地投入战斗，以简洁的、模式固定的几场战役解决纠纷。在欧洲协调全盛期，召开过一系列的外交会议，仔细衡量开战的后果，并对殖民地、要塞和地区的得失列表比较。大体上说，这些战争为他们的目的服务。欧洲所发生的大的权力与领土的重新分配没有一次是军事征服的直接结果。战争引发的调整——尤其是《乌得勒支条约》中西班牙领土割让，或普鲁士攫取西里西亚——并不能与瓜分波兰相比。这个当时最大的领土重新分配并没有诉诸于战争手段。**[大谋略]**

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为欧洲历史提供了它最可吹嘘的和平侵略的范例。瓜分通过1773年、1793年和1795年三个阶段完成，分割了一个与法国版图相当的国家。瓜分所用的是强盗式的方法，所有正式协议的签订都有未见于文字的暴力威胁来支撑，受害者被迫宽恕强盗们割裂祖国的罪行。许多当代评论家对避免了战争心存感激，习惯于接受瓜分者的解释。许多历史学家接受了认为波兰人自己导致灾难的观点。历史需要有伯克、米什莱（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或麦考莱（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这样的人来直言不讳地把罪行称为罪行。

瓜分机制是以两个简单的考虑为基础的：首先，需要俄国干涉军来镇压波兰改革运动；其次，俄国挺进共和国，对共和国的其他邻国，即普鲁士和奥地利构成了威胁。在经历了精疲力竭的七年战争后，各国已经无力与俄国再启战端，普鲁士尤其如此。因而有人建[663]议，如果普鲁士和奥地利以默许俄国在波兰的行动为条件得到领土补偿，它们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于是，通过邻国达成的共同协议，毫无国防之力的共和国屈服于俄国对本国改革派的镇压，并割让大片领土，作为军事行动的费用。更糟的是，当这些罪恶的刽子手告诉世人他们的干涉是多么慷慨与和平之时，共和国不得不默默倾听。

[662]

大谋略（DESSEIN）

1742年，苏利公爵（Duc de Sully）的回忆录准备再版，为此进行了大量的重新编辑工作。特别是公爵对外交关系有大量散轶、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评论，这些评论被简化，合为一章，题为《通常被称为“亨利大帝大谋略”的政治策划》。因此，苏利笔下的这个《大谋略》是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被重新编辑出来的，甚至是被创造出来。评论家争论说，它是十八世纪的产物，而不是十七世纪的产物。[1]

必须说，马克西米连·德·白求恩（Maximilien de Béthune，1560—1641年）这位罗尼男爵和苏利公爵，在担任亨利四世的首席大臣的十年间，与外交政策毫无牵连。他曾经是皇家财政总监、法国道路大总管、炮兵与城防总管、巴士底总督。[2] 他的国际关系思想可追溯到1610年他退休后的最初几年，从30年战争起又有了重大修正。他在两卷本的《回忆录》（1638年）中未经分类将这些思想全部发表了。

苏利的直接目的是减弱哈布斯堡的优势。但他根据这个机会主义的目的，制定了一个大谋略，设想了欧洲新地图和维持永久和平的机制。这张地图是由15个平等国家组成，西班牙将被限制在伊比利亚半岛，奥地利从神圣罗马帝国中分离出去，重新分配它们的属地。例如，西属尼德兰可以由英格兰和法国分割，也可分给联省王国。匈牙利恢复其独立选举制君主国的地位。德国皇帝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垄断权力。为维持永久和平，苏利还设计了一个欧洲王公联盟，由联合理事会管理。大国在理事会中有四个席位，其他国家两个席位，实行轮值主席制度，从巴伐利亚选侯开始担任第一任主席。联盟用联合军调解争端、执行政策。

新地图和新联盟背后的主要思想是“均势”。任何强国都不应强大到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身上。欧洲将是“一个完全基督教的国家”和“一个大家庭”。在欧洲版图之内享受贸易自由。在欧洲版图之外，欧洲将摧毁土耳其，同时在亚洲和北非进行“权益性”的征服活动。

[663]

大谋略是由一位不用负责任的退休政治家设计，经十八世纪的编辑重塑，不仅具有理论抽象性。它可能受到了埃默瑞克·克吕塞（Émeric Crucé）的《新悉涅尼》（1623年）的影响，克吕塞曾

设想建立世界性的和平大会，由威尼斯主教主持。他的这个思想可能又是从一位波希米亚国王早在1458年就提出的“永久统一联盟”建议（见原书第428页）中吸取了灵感。大谋略无疑是属于从但丁的《世界帝国论》到伊拉斯谟（Erasmus）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那一悠久的理论写作传统。但它在“均势”时代得到了普及，吸引了广泛关注。从它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到国联和欧洲共同体建立的这两个世纪中，它关于国际稳定、自由贸易、联合主权、联合执行的基本思想一直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它认识到了许多人忽略了的东西，即和平是权力的一个功能。[3]

在第一回合中，波兰—立陶宛的混乱在1760年代后期已达到无法遏制的程度。国王提出有限的改革建议，却激起了各方面的反对。普鲁士炮轰维斯瓦河上波兰海关，终结了波兰建立现代财政体系的种种准备。俄国人一直在煽动反对所谓波兰境内虐待宗教少数派的运动，并成功压制了表示抗议的波兰主教。卡西米尔·普瓦斯基（Casimir Pulaski，1747—1779年）领导的巴尔同盟采取了同时反抗国王和俄国人的立场。1769年，奥地利浑水摸鱼，夺取了斯皮什（Spisz）地区的十三个市镇。圣彼得堡不得不趁土俄战争间歇之机采取激烈的行动。柏林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到了：俄国如果肯把罗亚尔普鲁士省（Royal Prussia）给普鲁士，普鲁士就不会反对俄国的干涉。只要让奥地利在波兰南部分得一杯羹，奥地利也不会反对。腓特烈二世曾揶揄玛利亚·特蕾西亚：“她眼泪流得越多，她拿走的就越多。”俄国则攫取了“白罗塞尼亚”大部。

第一次瓜分条约是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所有的细节都完全符合法定程序。整个过程洋溢着对波兰“金色自由”的敬意。于是，受害者被哄骗得自己来操刀切割。国王在议会提出了有利于瓜分的动议。惟一表示抗议的是塔代乌斯·雷耶坦（Tadeusz Rejtan），他横躺在议院门口，阻挡国王进入。他后来被宣布为精神失常。共和国于1773年9月7时18分分别与三个瓜分列强完成了条约[664]签订手续。只有西班牙国王提出了抗议。腓特烈评论说：“我像享用圣餐一样分享了波兰的躯体，但我不知道女皇是如何拉拢了她的告解神父的。”

第一次瓜分带来了几年的相对平静时期。波兰—立陶宛埋头于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见上文）；1775年国王得到允许，提出建立内阁的构想。巴尔同盟所有成员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逃亡国外。普瓦斯基逃亡美国，在那儿创建了美国骑兵。俄、普、奥则忙于消化吸

收他们来路不正的收益。

启蒙世纪的最终结局竟然是，三位开明君主采取联合行动，镇压一场开明改革运动。对波兰的攻击伴随着大量的开明词句；接下来的“欧洲地图合理化”也得到广泛的谅解。伏尔泰曾讥讽说：“一个波兰人——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人；两个波兰人——一场争吵，三个波兰人——波兰问题。”[33] ［**王室档案**］

但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波兰—立陶宛仍是俄国的俘虏，改革派极力挣脱束缚。如果国王放松控制，将会有人取而代之。只要他们一行动，改革与镇压的整个循环将再次开始。1787 年就再次开始了这一循环。

178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清晨，布拉格。在旧城诺斯提兹伯爵的国家剧院（现称蒂尔剧院）内，邦第尼（Bondini）的意大利歌剧团正在进行《浪子受罚》的首场公演。最初广告宣传演出是在 14 日傍晚，名为《石客》，原意是为了款待前往德累斯顿结婚的托斯卡纳公主。结果，新歌剧的乐谱还未完成。据乐团低音提琴手瓦克拉夫·斯沃博达称，作曲者和一帮抄写者 28 天通宵达旦地工作；序曲乐谱飞递至剧院时还墨迹未干。[34]但演员们未因此而畏缩。当晚 7 点，在烛火通明的礼堂内，作曲者鞠躬致意时，欢呼声雷动。两个 D 小调拉长的渐强和弦响起，欢呼停止，礼堂内鸦雀无声。音乐飞速流动，以极快、活泼的节奏进入了序曲开场几小节的急促音符。



序曲终了，指挥（莫扎特）转向乐团，称赞他们的演奏能力：“好极了，先生们，令人惊叹。”

歌剧剧本事先就为王室打印出来，在售票处可以买到意大利语的剧本，金纸装帧的 40 克朗，平装本 20 克朗（kr.）。扉页上写着：

浪子受罚。或唐·乔瓦尼。两幕喜歌剧。1787年在布拉格剧院上演。在美丽的布拉格……编剧：达·蓬特，维也纳帝国剧院诗人。作曲：沃尔夫冈·莫扎特，教堂乐正。

演员表是：唐·乔瓦尼——路易吉·巴齐；安娜——特蕾莎·塞波里提；奥塔维奥——安东尼奥·巴格里洛尼；埃尔维拉——卡特琳娜·米希利；利波瑞罗——菲利斯·蓬兹安尼；泽琳娜——卡特琳娜·波尔蒂尼（剧团班主的妻子）；骑士长——朱塞普·罗利。[36]

莫扎特的这部歌剧后来被命名为《唐·乔瓦尼》，不过是一个民间勾引故事的又一版本。这个民间故事已成为欧洲传奇之一。唐璜这个塞维利亚的花花公子，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那不勒斯狂欢节和法国游园会哑剧中的出场人物。莫利纳（Molina，1630年）、契科尼尼（Cicognini，1650年）、莫里哀（1665年）、高乃依（1677年）、哥尔多尼（1736年）和沙德韦尔（Shadwell，1776年）等人均创造了相关的文字作品。人们用它做成音乐、芭蕾或舞台剧，1669年在罗马上演，1746年在巴黎，1767年在都灵，1770年在卡塞勒（Cassel）先后上演。在莫扎特之前的十年中，它至少为四部大型歌剧提供了灵感——它们分别是维也纳的里希尼（Righini，1777年）、华沙的阿尔贝蒂尼（Albertini，1783年）、威尼斯的弗帕（Foppa）/瓜尔蒂（Guardi）和伯拉蒂（Berlati）/加萨尼加（Gazzaniga，1787年）创作的。莫扎特的词作者达·蓬特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伯拉蒂的词；布拉格演唱奥特维奥的男高音火速赶往威尼斯演唱加萨尼加歌剧中的同一角色。[37]

基本情节非常简单。开场唐·乔瓦尼就杀死了骑士长，即他最近的爱情征服品安娜的火冒三丈的父亲。经过一系列的阴谋，在终场时，他两度遇上死去骑士长的雕像，雕像吼叫着要复仇，而这个罪人则被地狱之火吞噬了。达·蓬特把这个故事简缩为两幕对应的剧，每一幕都是按照相同的结构发展：

[666]

第一幕	第二幕
Nos（音乐作品序号）.1－7	Nos.14－18
分别说明	对手分离
[乔瓦尼和三个女人]	[乔瓦尼乔装打扮或不在场]
（咏叹调）乔瓦尼—安娜	乔瓦尼—利波瑞罗
（三重奏）骑士长之死	（三重奏）欺骗埃尔维拉
（二重唱）安娜—奥塔维奥	
埃尔维拉被误引到利波瑞罗处（No.4）	埃尔维拉被误引到利波瑞罗处

泽琳娜—乔瓦尼—马塞托
乔瓦尼—泽琳娜

Nos.8 – 10
人物与感情的交融
集体对立
四重唱
[乔瓦尼在幕后]
安娜明白了乔瓦尼的罪恶
咏叹调（No.10）

利波瑞罗的叙述
咏叹调（No.11）
[乔瓦尼的花园]
咏叹调（No.12）
终曲　蒙面人上场
企图谋害泽琳娜
集体敌对

乔瓦尼—马塞托
泽琳娜—马塞托

Nos.19 – 21
人物与感情的交融
对抗指向利波瑞罗
六重唱
[利波瑞罗下]
奥塔维奥明白了乔瓦尼的罪恶
咏叹调（No.21）
[墓地]
乔瓦尼的叙述
二重唱(No.22)
[安娜的住所]
咏叹调(No.23)
终曲　埃尔维拉上场
复仇：雕像
集体终结[38]

当然，一个提纲不可能表明乐谱与歌词完美精巧的结合。剧中那些难忘的时刻已经经受住无数次的反复上演和模仿。在4号咏叹调中，乔瓦尼的仆人向埃尔维拉吹嘘他的主人征服女子的高超技巧：

在意大利640个，在德国231个，
在法国100个，在土耳其91个，
在西班牙已经有1003个！（1003个！）[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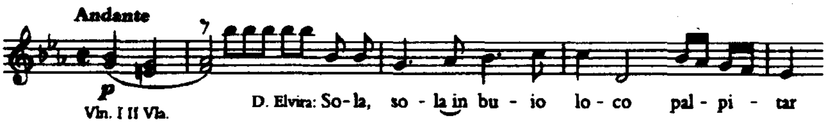
在动听的7号咏叹调（“把你的小手给我”）——“所能想象到最完美的勾引二重唱”——中，乔瓦尼未用一点暴力或欺骗就赢得了毫无戒备的泽琳娜的芳心。他强有力、自信的旋律逐渐升高，与女高音相互逗弄，最后手挽手，沉浸在狂喜中走下：

[667]　二重唱：泽琳娜和乔瓦尼[40]



在情节剧式的墓地一场（第二幕，第 11 场），令人恐慌的长号伴奏下，石头客人慷慨激昂地宣布他怪异诡谲的预言："天亮之前将是你最后一次大笑。"此时，演员们都颤抖了：

六重唱：安娜，埃尔维拉，泽琳娜，奥塔维奥，利波瑞罗，马塞托[41]



乔瓦尼的末日来临，曲终，演员们和着才智焕发的双赋格齐声唱着穿透力极强的本剧寓意：

这就是罪人游戏的下场！他的生与死都是一个样。[42]

七个月后，歌剧在维也纳第二次上演，莫扎特和达·蓬特对歌剧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以适应新的演员和剧院。为了容纳这些添加部分，他们删掉了奥塔维奥的 21（22）号咏叹调（"还给我，我的宝贝"）：

咏叹调：奥塔维奥[43]



但他们很快又重新恢复了这个部分，并一直保留下来，从此成为标准曲目必不可少的部分。

1787 年莫扎特与他的妻子康斯坦查两次访问布拉格。当时正是他事业的巅峰。第一次访问是在 1 月和 2 月间，他把 38 号交响曲"布拉格"（K.504）公之于众，后来还指挥了《费加罗的婚礼》一场成功的演出。演出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响，他当即与邦第尼签署合同，创作一部新歌剧，下一季初上演。回到维也纳后，他给一位来自波恩、名叫贝多芬的 17 岁钢琴家上了几课。5 月，他挚爱的父亲去[668]世，他悲痛不已，而地产的处理问题又困扰着他。但在那个夏天谱写的《F 调嬉游曲》（K.522）或悦耳的 G 大调《小夜曲》（K.525）中，丝毫也听不出他的悲伤抑郁。

莫扎特带着《唐·乔瓦尼》前往布拉格的六周之旅在他的通信和

当地报纸上都可以找到证明。10月1日他刚得到拍卖他父亲在萨尔茨堡财产所得的微薄收益，离开了维也纳。他再次与康斯坦查同行，当时她已身怀六甲。150英里的旅程用了三天时间，因为《布拉格总邮报》4日已经公布了他抵达的消息。“这儿消息已经传开，（我们著名的莫扎特）新创作的歌剧《石客》将在国家剧院首次上演。”[44]他下榻于科尔马克街20号的三狮旅店，四天后他的词作者达·蓬特也来与他会合，入住街对面的格拉特斯饭店。13、14、15日，托斯卡纳公主上门拜访，并临时决定为她用德语演出一场《费加罗的婚礼》。此时的莫扎特非常消沉。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这里所有的事情都磨磨蹭蹭的，因为演唱者很懒，他们拒绝彩排，而经理人又着急又胆小，不愿强迫他们。”[45]那个月的最后一周几个演唱者生病，又还没有序曲，就这样度过了。最后首场公演赢得了广泛赞誉。《布拉格总邮报》欣喜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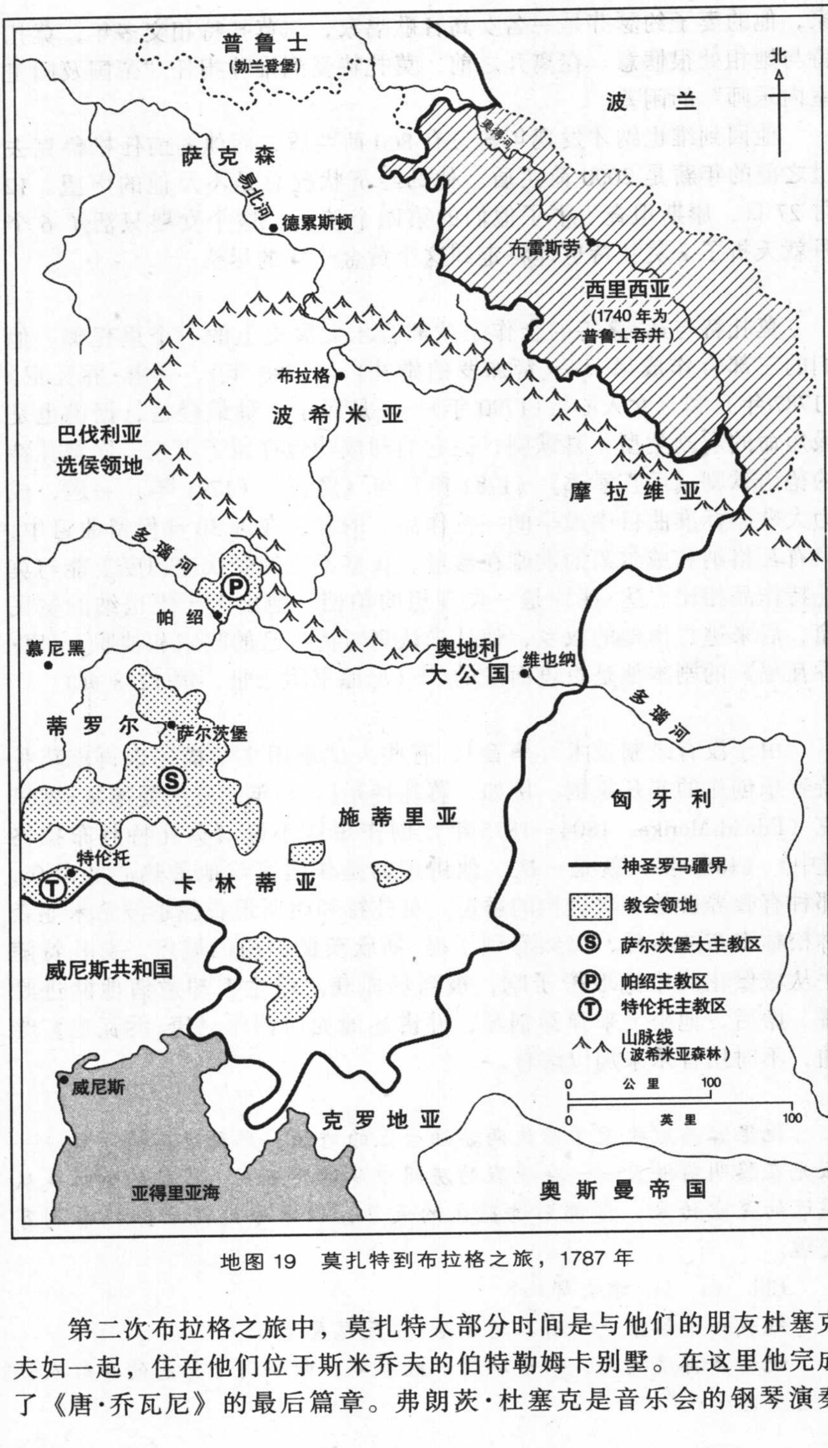
“星期一……意大利歌剧团演出了莫扎特大师群情翘首盼望的歌剧《唐·乔瓦尼》……鉴赏家和音乐家称，布拉格从未听过这样的音乐……舞台上乐团的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演好，以回报感谢莫扎特。由于合唱和布景的变化额外支出巨大，才华横溢的赫尔·瓜尔多索尼（Herr Guardosoni）参与了所有的变动。空前的观众规模证明了对该剧的一致嘉许。”[46]

11月3日，为莫扎特个人又再次上演了这幕歌剧。13日莫扎特夫妇离开了布拉格，此前，几位布拉格的头面人士在这位作曲家的剪贴簿上极尽溢美之辞：

当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人物）的魔笛吹响
安菲翁（希腊神话人物）和着里拉琴唱歌
雄狮变得温驯，河水静静流淌
猛虎侧耳聆听，岩石四处走动

当莫扎特美妙的音乐奏响
赢得大众齐声赞颂
缪斯女神驻足倾听
阿波罗亦洗耳恭听
你的崇拜者和朋友，
约瑟夫·赫尔德勒克
大神学院校长于1787年11月12日，布拉格。[47]

[669]



地图 19　莫扎特到布拉格之旅，1787 年

第二次布拉格之旅中，莫扎特大部分时间是与他们的朋友杜塞克[670]夫妇一起，住在他们位于斯米乔夫的伯特勒姆卡别墅。在这里他完成了《唐·乔瓦尼》的最后篇章。弗朗茨·杜塞克是音乐会的钢琴演奏

家，他的妻子约瑟芬是一名女高音歌唱家，与莫扎特相交多年，莫扎特与她相处很惬意。在离开之前，莫扎特受到推荐担任“帝国及国王室内乐师”的闲差。

他回到维也纳才发现年薪只有800荷兰盾，而他的前任格鲁克去世之前的年薪是2000荷兰盾。他的经济状况总是不及他的声望。12月27日，康斯坦查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这个女婴只活了6个月就夭折了。莫扎特也即将走到这个黄金十年的尽头。

莫扎特与达·蓬特的合作是欧洲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们的三部合作成果——《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唐·乔瓦尼》（1787年）和《女人心》（1790年）——是属于一种最轻松，据说也是最短命的歌剧类型：喜歌剧；但它们却成功地存留了下来，同莫扎特的德语歌剧《后宫潜逃》（1782年）与《魔笛》（1791年）一道，成为大歌剧标准曲目中最早的一批作品。的确，在近30部保留曲目中，只有瓦格纳和威尔第的歌剧在数量、长盛不衰的受欢迎程度上能与莫扎特作品相比。达·蓬特是一位理想的拍档。他出生于维也纳的贫民窟，后来逃亡出他的故乡，他从未认真对待自己的改宗和神职。《唐·乔瓦尼》的剧本他是由衷而发的。[48]（见原书附录Ⅲ，第1278页）

由于没有录制技术［声音］，有些人试图用文学描述来再现莫扎特音乐创作的非凡氛围。例如，莫扎特死后60年，诗人爱德华·默里克（Eduad Mörike，1804—1875年）创作短篇小说《莫扎特赴布拉格途中》（1851年）就是一次。他讲述的是作曲家与他最热心的听众，那种有教养者的一次虚构的邂逅。莫扎特和康斯坦查翻越波希米亚森林松林密布的山丘，突然看到了冯·斯欣茨堡伯爵的城堡。莫扎特随手从城堡花园中摘取橙子吃，被当场抓获。但主人却邀请他共进晚餐。席后，他坐下来弹奏钢琴，并讲述他如何创作《唐·乔瓦尼》终曲，不时用音乐来加以解释。

他很容易地吹灭了身边两盏烛台上的蜡烛，那种恐怖的气氛——微光在黎明前泯灭——在死寂的房间中蔓延开来……清越的喇叭声从遥远的星空传来，仿佛划过蓝色的天幕，以冰冷的死亡颤抖着刺穿灵魂。

Chi　va　la. 谁去那儿？

给我一个答案——有人听见唐·乔瓦尼要求。

说话声再度响起，一如从前一般单调，命令这个邪恶的年轻人让亡者安息……[49]

捷克人也没有忘记莫扎特光临他们国家的短短几天。一位当代捷[671]克诗人把伯特勒姆卡别墅之夜作为跳板，来回忆这个遥不可及的天堂：

当他开始演奏
他的马尾辫在背上跳舞
就连海贝也停止了哼鸣
竖起它们精巧的耳朵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把门锁上？
为什么不把马匹从马车上卸下？
他离开得太匆忙了。[50]

莫扎特热爱的布拉格正要达到欧洲城市少有的辉煌顶峰。它是哈布斯堡属地内的第二大城市，五六十年来一直在进行规模空前的建筑翻修。演出《唐·乔瓦尼》的蒂尔剧院只有四年历史，它也只不过是许多宏伟的公共建筑之一。现为英国大使馆的图恩宫（1727 年）只是众多奢华的贵族府邸之一，莫扎特 1787 年第一次访问布拉格时曾在这里停留。其他还有科勒瑞多—曼斯菲尔、戈尔兹—金斯基、克兰姆—加拉斯、卡列托—米勒西莫、洛布科维茨—斯瓦岑堡等人的府邸。圣尼古拉方形教堂（1755 年）是迪岑霍弗父子（Diezenhofer）设计的 12 个巴洛克风格的教堂之一。当年莫扎特离开后一周，在这里演奏了他的 C 大调弥撒。加洛林宫（1718 年完工）是大学建筑群所在，克勉馆（1715 年完工）则是耶稣会教堂和图书馆所在。

最重要的是，最近关闭了城中四个主要的历史中心，并加以装饰，连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布拉格沃尔塔瓦河左岸古老的城堡山“赫拉德坎尼”上建有圣维特斯大教堂（1344 年）和雅盖隆王朝的弗拉迪斯拉夫斯基宫（1502 年），1753 年到 1755 年，帕佳西（Pacassi，奥地利王室建筑师）的富丽的办公楼的高墙将赫拉德坎蒂围住。赫拉德坎蒂山脚下的“小城”由于建起主教宫殿而生色不少。古老的查理桥（1357 年）连接起城市的两部分，660 米长的桥身装饰着一系列美轮美奂的宗教、历史题材雕像。老城坐落在右岸，汰翁教堂和市政厅高耸于街道之上。街道进行了大量的翻修，重新焕发了活力。钟楼也一如既往，使得街道生机盎然：每到整点时就会出现游行队伍，基督和使徒们走在最前列，殿后的是死神、土耳其人、吝啬鬼、傻瓜和公鸡，接着洛雷托广场大钟（1694 年）敲响报时。1784 年皇帝约瑟夫二世才特准了《联合布拉格特许状》。

哈布斯堡统治下最大的受益者是贵族。他们的府邸为这座城市增辉，他们的扶持主宰了这座城市的音乐。他们大多是那些从三十年战争期间没收捷克本土贵族财产中获益的德意志家族的后裔。他们在繁荣的波希米亚乡村拥有巨额财富，支撑着他们在城里的奢华生活。至[672]莫扎特的时代为止，大部分捷克人已经沦为没有领袖的农民群体，尽管一些中间阶级，如杜塞克夫妇，仍生活在捷克与德意志社会的边缘地带。

贫富差距极端悬殊。约瑟夫二世 1771 年第一次访问布拉格时，布拉格六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荒，震惊了这位皇帝：

> 今年饥荒中发生的事情是多么令人羞耻啊。人们竟然死去，在街道上接受了最后的圣餐……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富有的大主教，一个庞大的天主教教士团体，这么多修道院和三座耶稣会宫殿……但至今没有任何事例表明他们中任何一个收留过一个躺在他们门口的凄惨的可怜人。[51]

约瑟夫二世无法忍耐天主教会的陈腐和自以为是。十年前就下令解散了耶稣会；1780 年他大权独揽，发布了大批改革法令，几乎要动摇社会秩序最为神圣的支柱。结果，农奴获得解放；宗教宽容扩展到东仪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严禁使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劳动；世俗结婚和离婚取得合法地位；死刑被废除了；共济会蓬勃发展起来。教会财产世俗化得来的财富用来大量修建豪华的皇家和贵族建筑物。

布拉格庞大的犹太人社群也分享了这种繁荣。他们把 1744—1745 年的最后一次大放逐抛之脑后，1780 年代还得到了皇家宽容特许状。为赞颂皇帝，犹太人居住区改名为“约瑟夫区”，并参与了城市的大规模重建。中世纪的旧—新犹太教会堂和克劳斯犹太教会堂都加以重修。犹太区政厅上竖了一个现代大钟，用拉丁数字显示时间，在它下面的另一大钟用希伯来数字显示时间。布拉格的犹太人命中注定后来将成为维也纳犹太民族中最具活力的一支。

布拉格的共济会也沐浴在帝国宽容的光芒之中。由于莫扎特是维也纳的奥地利大会社成员，他们把他作为自己人来欢迎。他们所代表的是反抗天主教对思想文化事务窒息般的控制的强劲潮流。

莫扎特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样宽松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喜歌剧的发展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氛围。他在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中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浪子的“受罚”过于戏剧化，而很难被人们认真对待；他和达·蓬特的另一个合作成果《女人心》（《所有女

人都这么办》）被某些人认为是过于放纵，令人反感。像“每一个甘泉谷底的洞穴”这样的台词很难做出其他解释。洛伦佐·达·蓬特本人是一位改宗的犹太人。他的名声与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塞恩加特的乔万尼·卡萨诺瓦（Giovanni Casanova di Seingalt，1725—1798 年）相去不远。卡萨诺瓦一生从事间谍、纵欲、逃离法律制裁，晚年在波希米亚北部的杜克斯（Dux）（杜赫佐夫，Duchcov）的沃尔德斯坦伯爵[673]手下担任图书管理员。他 1787 年 10 月 24 日前去拜访布拉格的出版商，还很可能留下来观看了《唐·乔瓦尼》的首场公演。一些评论家暗示，他就是唐的原型。

粗俗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潜流。[52]但考虑到奥地利官方信奉清教主义，把性引诱作为公众娱乐的主题并非平庸之举。它冒犯了约瑟夫时代的布拉格道德卫道士，也触怒了当今的女权主义卫士。终究唐·乔瓦尼和卡萨诺瓦一样，是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把女性当做纯粹的欲望猎物。卡萨诺瓦本人的话是很贴切的：

> 有爱的男人……相信他能给予被爱对象的愉悦多于对象最终所能给予他的愉悦。因而，他急于满足她。女人最关注自身的利益，她不能不把自己所感受到的愉悦凌驾于她将给予的愉悦之上。因而她忸怩拖延……[53]

然而，莫扎特最伟大的素质之一就是把自身置于周围世界的感情之上。甚至就在他承受着病痛、贫穷、厄运的痛苦折磨之时，他的音乐也是时而活泼欢快，时而崇高超凡。他的音乐虽然是在俗世间创作，却是不属于这个俗世的。尽管他周游广泛，二十年间遍履欧洲宫廷，他的音乐中却不带丝毫当时政治的痕迹。

1787 年的欧洲正在走向过去两个世纪发展潮流的转折点。就是在这一年，美利坚共和国的宪法签署生效，令欧洲的君主们惶恐不安；美元开始流通。英国处于小皮特内阁领导下，由于人们发起对第一任英印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弹劾，同时还发起建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帝国的全球利益受到热烈讨论。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刚开始进行她对土耳其人的最后一次进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在新省克里米亚款待她的盟友、莫扎特的老板约瑟夫皇帝。尼德兰执政威廉五世被流放，共和派的“爱国”党挟持他的妻子作为人质。正当莫扎特准备动身前往布拉格之时，普鲁士军队也整装待发，以重新扶植执政上台。梵蒂冈则正抵御世俗化浪潮：庇护六世（1755—1799 年在位）被禁止派遣教皇大使前往慕尼黑，那不勒斯国

王还拒绝照惯例向教皇宣誓效忠。在佛罗伦萨，他所面对的是一位把高卢教会的教规引入托斯卡纳教会的大公。截至《唐·乔瓦尼》上演之时，法国的缙绅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均已召开过，又被解散了。法国国王坚信国家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下定决心召集三级会议，最[674]初是定于1792年7月。其他对将来影响重大的事件当时几乎无人注意。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面世。8月，贺拉斯·索绪尔（Horace Saussure）首次登上勃朗峰。人类正在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回顾历史，历史学家们可以看到，莫扎特的音乐表现了旧制度许多最衰败破落的方面。在当时，没有人知道约瑟夫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保罗·雷尼尔（Paolo Renier，1779—1789年在位）是威尼斯126位总督中的第125位。波希米亚的邻居波兰已进入其51个主权国王和亲王统治的最后十年。教皇庇护六世命中注定死于法国革命的地牢中。

在创造性艺术方面，传统一如既往地与革新力量相竞争。1787年杰里米·边沁撰写了《论高利贷》，歌德创作了长诗《伊菲革涅亚》，席勒创作了《唐卡洛斯》；除了雷诺兹、庚斯博罗、斯塔布斯、罗姆尼外，弗拉戈纳尔、大卫和戈雅等人也正致力于绘画创作。与莫扎特同时代的音乐家还有海顿、凯鲁比尼（Cherubini）和C.P.E. 巴赫。

当然，有人会说，创作《唐·乔瓦尼》是想以绝妙、直觉的讽喻讲出等候着这个腐败放荡的大陆的宣判词。假如事实如此，但在莫扎特的信件往来和作品本身中并没有这样的暗示。人们没有意识到大难临头，尤其是在法国。例如，当时最激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孔多塞侯爵只对一件事深信不疑，那就是君主制是不可动摇的。[54]一位天资聪颖、喜好音乐的法国女青年记录下了她对同时期巴黎的印象：

（罗什舒瓦尔饭店的）音乐聚会非常出色。一周举行一次……还有彩排。当时著名的钢琴家蒙特格鲁夫人弹奏钢琴；一位来自意大利大歌剧团的歌手演唱男高音部分；另一个意大利人曼丁尼唱低声部；黎塞留夫人是首席女歌手；演唱的是女低音，杜拉先生演唱男中音；合唱部分由一些很棒的业余歌手负责。维奥蒂小提琴伴奏。我们用这种方式演出了最难的终曲部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维奥蒂又吹毛求疵……我怀疑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像巴黎所有的高楼大厦中的轻松、和谐、礼貌和坦诚……

在欢歌笑语之间，我们正渐渐向1789年5月靠近，在歌舞升平中滑向绝壁。想想人们谈论根除所有弊病时的心满意足。他们说，法国将获得新生。从未有人说过“革命”这个词。[55]

第9章

革　命

动乱的大陆，约1770—1815年

法国大革命具有一种普遍性，这是其他许多欧洲革命所没有的。[675] 实际上，正是这次事件使“革命”这个词具有了完全现代的意义，即，革命不仅仅是政治大变动，而是一种政府体系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基础的彻底颠覆。今天，历史书籍里面充斥着“革命”。例如，人们把英国内战说成“英国革命”，更有人把俄国革命升级为第三次世界革命。此外，还有罗马革命（指恺撒的活动——译者注）、科学革命、军事革命、工业革命、美国革命，近年来甚至还有性革命等说法。这些说法都名不副实。

但是，有理由说，1789年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其影响不仅超出了法国，而且超出了政治范围。巴黎当时是一个霸权的首都，是国际文化中心。革命者继承了启蒙运动关于普遍抽象的人的观念。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世界各地的所有民族而奋斗，是在反对世界暴政。他们最著名的纪念碑不是某个狭隘地伸张法国人权利的声明，而是掷地有声的人权宣言（见下文）。米拉波（Mirabeau）对国民议会说：

> 一个民族把生存之道简化成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这些观念对于人心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散播到世界各国——这样一个民族的影响无疑将征服追求真理、中庸和正义的全欧洲，也许不是马上，也不是在一天之内……

正是这种情绪人们把某种完全法国的东西贴上了“欧洲第一次革命”的标签。[1]

外国人也有同样切身的参与感。一位狂热的英国青年（华兹华斯—译者注）后来感到懊悔，当时却欣喜若狂地写道：“能活在那个黎[677]明曙光初现之际，就是有福了。”一位老政治家（伯克—译者注）则哀叹：“骑士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轮到诡辩家、经济学家和会计的时代了。欧洲的光荣永远消失了。”当时一位著名作家（歌德——译者注）目睹了瓦尔密战役后说：“此时此地，一个新的世界纪元开始了。”[2] 历史学家无论持何种立场，一定会选用色彩最强烈的字眼。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被他所谓的“无套裤汉主义”所吓倒，把法国大革命称作“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事情”。[3] 儒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怀有相反的情感。他用这样的语句来开始他的著作：“我给这场革命下的定义是：法律的降临、权利的复活、正义的反击。”[4]

法国大革命把欧洲拖进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刻而漫长的危机。它使整整一代人陷入动乱、战争和令人不安的革新之中。它从巴黎这个地震中心一次次地发出冲击波，远及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从葡萄牙海岸到俄国腹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意大利，余震尚未消失，铁蹄动地而来，士兵身着鲜艳的制服，帽子上系着蓝白红三色帽徽，“自由、平等、博爱”挂在嘴边。对于支持者来说，革命意味着从君主、贵族和教会的传统压迫下解放出来。对于反对者来说，革命是阴森的暴民统治和恐怖的同义词。对于法国，革命宣告了一种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开始。对于整个欧洲，革命提供了一个危险的以暴易暴的实例教训。革命开始于种种进行有限和平改革的愿望，却“结束于种种抵制任何变革的承诺”。从短期看，它失败了；从长远看，它对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而且还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这场革命盛装表演包含许多妇孺皆知的人物和传说。在由革命领袖——米拉波、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和波拿巴——组成的核心队列之旁，伴随着由他们的对手和牺牲者组成的长长队伍：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的场景；农民的女儿夏洛特·科尔黛“为了拯救千百万人”将马拉刺死在浴缸里的场景；根据拿破仑的命令抓捕和处决流亡的当甘公爵的场景。围绕在主队列周围的是一群活跃而有个性的配角：“目击了两个大陆的革命”的英国流亡哲学家、激进的托马斯·潘恩（Tom Paine）；革命前的主教、“令人不齿的欧坦主教大人”、最高层的幸存者、无人能模仿的塔列朗（Charles de Talleyrand-Périgord）；冷酷无情的公诉人安托万·富基埃—丹维尔（Antoine Fouquier-Tinville）。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展示一个与法国革命相伴的巨大的人物画廊，既有英雄，也有恶棍，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

[676]



地图 20 欧洲，1810 年

英国有在“胜利”号战舰甲板上殉职的纳尔逊（Nelson），德国有沙恩霍斯特（Scharnho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奥地利有爱国烈士安德烈亚斯·霍弗尔（Andreas Hofer），波兰有骑着白马战死在河流中的高贵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Poniatowski），俄国有在雪地艰苦跋涉的百折不挠的库图佐夫。在欧洲的文学艺术中，从戈雅的《战争的灾祸》、大卫的拿破仑肖像，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狄更斯的《双城记》、密茨凯维支的《塔杜施先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系列令人刻骨铭心的语言和绘画作品把革命装点得更加绚丽。[678]

对这一革命时代加以解说，必定要逐一考察起因、革命事件本身以及种种后果。任何编年叙事必定以革命前的骚动作为序幕。人们必定要探究温和的要求是如何导致了极端的变革，法国的国内冲突如何导致了欧洲大陆的战争。危机是从1770年代启蒙运动消退之时开始，结束于1814年开幕的维也纳会议。

序 幕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论话题。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背景（有时可能要追溯革命前的整个历史）、不稳定的深层原因、直接触发的事件或者说点燃火药桶的“火星”。十八世纪晚期的整个欧洲笼罩着日益加深的紧张不安的气氛。导致这种紧张气氛的社会变化并非集中发生在法国，但法国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面对政治瘫痪和财政压力，法国显得比邻国更缺少承受能力。“革命几乎在欧洲所有地方都迫在眉睫。它在法国爆发了，是因为旧制度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更衰败、更令人厌恶、也更容易摧毁。”[5]

就政治领域而言，最大的地震发生在大西洋彼岸。大不列颠一直被启蒙思想家视为最稳定、最温和的国家，此时突然陷入与其美洲殖民地居民的战争中。后者在法国的帮助下决心摆脱英国的统治。但是，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它把法国的财政危机推到崩溃边缘。另一方面，它也促使法国人和其他人思考自己的困境：如果可怜的弱智的乔治三世被划入暴君一类，那么欧洲的其他君主应该属于哪一类呢？如果美洲人为了三便士茶叶税就能造反，那么把大多数欧洲人压迫得痛苦不堪的横征暴敛有什么道理可言？如果北美人因为在英国国会没有代表，就需要建立一个美利坚合众国，那么欧洲有些国家甚至根本没有议会，欧洲人对此又该如何作想呢？美国的宪政思想既是极其简单的，又是普遍适用的：

>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神圣而无可辩驳的：所有的人被创造成平等而独立的，因此他们获得固有而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6]

欧洲对美国革命的参与作用是世所公认的，有雕像和纪念碑为证。而欧洲革命中的美国因素却并非总能得到人们如此爽快的承认。[679]不过，正是从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到1789年4月29日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就职典礼的十几年间，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把关

于现代政府的争论推到了前台。

汤姆·潘恩（1737—1809）是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的教友会信徒，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活跃的联系纽带。“激进的汤姆”在英国被驱逐后，全身心地投入美国革命事业。他的《常识》（1776年）是美国革命中最有影响的小册子；他的《人权论》（1791年）是对法国革命的一个最激进的呼应。他曾经成为法国国民公会的议员，后侥幸逃过了断头台。他的《理性时代》（1793年）是用煽动性文字写成的一部自然神论著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世界就是我的祖国，”他写道，“而我的信仰就是行善”。

在东欧，三个强大帝国正在消化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果实（见第八章）。一个用来宽慰的口实是：毕竟避免了战争；但是宣传的烟幕掩盖不住暴力的现实。更严重的是，在波兰一立陶宛，瓜分的事实只是引发了对俄国霸权的愤恨。启蒙运动在波兰的流传必然导致与沙皇专制的对抗。俄国的势力范围与法国的势力范围平行发展，最终酿成“暴君”与“自由之友”的碰撞。革命时代最终演变成法国与俄国的大撞击，实非偶然。

在日常政治现象之外和背后，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十八世纪晚期欧洲秩序井然的表面背后，一些捉摸不定的深层力量正在设法脱颖而出。引起人们不安的一个因素是技术变化：动力传动的机器问世，这种机器既有建设能力，也有破坏能力。第二个因素是社会变化：人们的“大众”意识日益强烈。人们认识到，千百万人组成的大众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个因素是思想变化：文学和哲学都愈益关注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历史学家必须确定这些发展变化是否相互关联：所谓的工业革命、社会思想中的集体主义潮流、浪漫主义的发端是不是同一个耦合进程中的相互关联的部分；它们究竟是革命剧变的原因还是仅仅是它的伴随物和促进因素。

工业革命是一个宽泛的术语，被广泛地用来描述一系列技术和组织变革，绝不限于那一个最著名的因素：动力传动的机器的发明。此外，经过广泛的历史讨论之后，这个术语开始用来指一个更复杂的变革系列中的一个阶段。这个更复杂的变革系列现在被称作“现代化”，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充分展开（见原书第764—782页）。即便如此，还有若干“原始工业化”因素必须考虑：其中包括农业开发、劳动力流动、蒸汽动力、机器、采矿业、冶炼业、工厂、城镇、交通、金融和人口。

科学耕作是启蒙思想家、尤其是重农学派的梦想之一。在最初的[680]

合理化阶段，农业就逐渐进步到发明用马作动力（还不是动力传动的）的机器，使得生产有可能大大加速。英国亨格福德农场主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1674—1741年）早在1703年出版的《马力耕作法》中就鼓吹一种机器磨；1803年，铁头的罗瑟勒姆犁铧进入市场。在这一百年间，农业试验如火如荼，但是进展极其缓慢；农业生产的平均水平不是取决于发明创造的速度，而是取决于普通农场主的步伐。**[资本主义农业]**

由于农场逐渐提高了农业产量，同样土地的产品能够养活的人越来越多了。原来耕作土地的人能够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职业。农业效率的提高，也促成生育率的上升，从而造就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至少在农民可以自由离开土地的国家里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提供没有技术的农民，仅仅是一半答案。工业既需要人力，也需要技术。对工业发展最有利的地方，也是手工业传统最发达的地方。

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蒸汽动力。但是直到1711年它才被真正应用于实际。那一年，托马斯·纽可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年）在德文郡的一个矿山，用一个笨拙的大蒸汽机抽水，从而驯服了蒸汽动力。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机械制造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年）对蒸汽机作了很大的改进。他在1763年接受任务，修理一台纽可门蒸汽机。他改进了压缩机。从此，蒸汽动力似乎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机器上了。

从水磨和印刷机出现以后，人们就逐渐适用机器了。十八世纪，在钟表制造匠手中，机器达到了很高的精确度。但是，有了远比人力、水力和发条强大得多的动力以后，发明的热潮就汹涌而来。这首先发生在纺织业。布莱克本的詹姆斯·哈格里弗斯（James Hargreaves，1720—1778年）、普雷斯顿的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年）、博尔顿的萨缪尔·克隆普顿（Samuel Crompton，1753—1827年）等一批兰开夏人，分别建造了珍妮纺纱机（1767年）、水利纺纱机（1768年）、纺纱“骡机”（1779年）。珍妮纺纱机仅仅适合农舍里手工操作；水力纺纱机和骡机适合工厂里蒸汽牵引。在法国，雅卡尔发明的提花织机（1804年）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雅卡尔]**

但是，由于煤炭是产生蒸汽的最有效的燃料，因此只是在大规模开采煤炭之后，蒸汽动力和机器才被广泛使用。煤炭业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革新实现的，其中包括地下水泵、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发明的安全灯（1816年）以及爆破炸药的使用。同样，只是在钢铁生产大发展了以后，才大量地用钢铁来制造机器。钢铁业的发展也是通过一系[681]列的革新实现的，其中包括苏格兰卡伦铁厂进行的革新（1760年）和亨利·科特（Henry Cort）的搅拌炼铁法专利（1783—1784年）。

[681]

雅卡尔（JACQUARD）

1804 年，里昂纺织工程师约瑟夫—玛丽·雅卡尔（1752—1834 年）改进了织布机，用一组穿孔卡片来控制纬线和梭子，结果能按照预定的设计织出各种布。在纺织史上，雅卡尔的织机是在此前阿克莱特、哈格里弗斯、克隆普顿的发明基础上的一大推进。在更大范围的技术史上，它也是向自动化机器迈进的一大步，是从自动钢琴、手摇风琴到打卡数据储存系统等各种精致机器的先驱。它确立的两个原理是日后计算机沿用的：雅卡尔织机的机身和其他部件是“硬件”，打孔卡片是“软件”。

早在动力传动机器发明之前，就有把产业工人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即集中在“工厂”里的做法。（factory 一词是表示“手工生产”的 manufactory 一词的简写。）在十八世纪，丝织厂、地毯厂、瓷器厂到处可见。但是配置重型设备，就需要常年的维修和定期地供应燃料和原料，从而使工厂组织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变成了一种必要。“阴森的巨型工厂”出现在兰开夏和约克郡的纺织区。这些王宫规模的丑陋的庞然大物不协调地矗立在小河旁边，吞噬着小河的流水，图拉真圆柱般的烟囱喷吐着刺鼻的黑烟。工厂的出现造成了新城镇的急剧发展。其原型就是兰开夏棉纺织业的中心曼彻斯特。1801 年第一次英国人口普查显示，在 25 年的时间里，曼彻斯特的人口增长了 10 倍，从一个教区发展成一个有 75275 在册人口的城镇。如果说人口被吸引到新的工厂城市，那么也可以说，工厂被吸引到少数有现成居民的大型中心。像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城市，由于有大量的手工工人和穷人，对于寻找劳动力的雇主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内陆交通是发展的关键；它们必须像海上贸易一样便捷。大量的煤炭、钢铁以及棉花、木材、黏土等商品需要从矿区和港口运送到工厂。制成品需要运送到遥远的市场。这就涉及河流、道路和铁路运输。在英国，这种需求所产生的动力依然是最大的。1760 年，布里奇沃特公爵的工程师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1716—1772 年）修建了一条非凡的航道，让它经由巴顿渡槽而穿越兰开夏的艾尔韦尔河，从而扩大了原有的运河系统。1804 年，在南威尔士的梅瑟[682]蒂德菲尔，科尼什矿场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1771—1833 年）巧妙地制造出能够沿着一段轨道牵引矿井罐车的高压蒸汽机车，但是，它比马力更昂贵。1815 年，麦克亚当（J.L.

McAdam，1756—1836年）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种用碎石铺底、柏油铺面的修路方法。（碎石路在英文中即macadam。——译者注）

没有金钱便没有一切。投资者必须愿意冒极大的风险来谋取巨大而不确定的收益，才能投入大量的金钱。只有在前工业化的企业已经积累了风险资本储备的国家里，才可能找到这种金钱。

人口因素也极其重要。工业革命的进程引起人口增长，人口增长促进工业革命的进程。人口发动机在这其中的作用是不难理解的。难以搞清楚的是，人口发动机是如何启动和点火的。当然，在法国，长期以来人口增长缓慢。这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欧洲大国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无法提高人口水平。相反，大不列颠则具有许多优势：繁荣的农场主、流动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的手工工匠、充分的煤铁供给、广泛的贸易网、国内路途很近、商业企业家、急剧增长的人口以及政治稳定。几十年后才可能有什么国家能够开始与之竞争（见原书附录Ⅲ，第1294页）。

集体主义——主张社会整体应该拥有权利和利益——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它是对抗自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以来得到重视的个人主义。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隐含在现代国家的理念中，因为这种理念强调所有臣民的共同性；它还隐含在重农学派和经济学家关于社会政治机体的运转的讨论中。它明确地体现在卢梭的公意概念中，而且成为功利主义者的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发展可能受到日益膨胀的欧洲城市中民众和人群的激励，受到产业工人涌入工厂大门景象的鼓舞。不管怎样，集体的力量，无论是有序还是无序，都会刺激起启蒙思想家或将军、煽动者和诗人的想象。

浪漫主义因社会日益紧张而兴盛起来。它发轫于德国，第二代则是英国的诗人和政论家——尤其是年轻的湖畔派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年）、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以及罗伯特·骚塞（1774—1843年）的三人组合以及令人惊叹的诗人、版画家、插图画家威廉·布莱克（1757—1827年）。德国浪漫主义依然在结出硕果。歌德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年）在歌德转向其他方向之后发表了历史剧《华伦斯坦》（1799年）、《玛丽·斯图亚特》（1800年）和《威廉·退尔》（1804年）。但是，到1798年华兹华斯在廷特恩攀登悬崖之时，英国的浪漫派正引领风骚。欧洲已经陷入可怕[683]的战争和革命之中。人类似乎因无理性濒于自我毁灭。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逻辑和理性的自由统治已经走向终结：

> 啊，如此一天，岁月如梭
> 我的面容可憎！

脖子上挂的不是十字架
而是信天翁？[7]

* * *

哦，玫瑰，你一副病容！
隐形的蛆虫
在夜间飞行
寻找你那
深红快乐的卧榻；
它那阴险的爱情
正在摧毁你的生命。[8]

我们在此看到早在弗洛伊德著作问世前近100年就有了弗洛伊德式诗句。[**欢乐颂**]（弗洛伊德的德文Freude，意为“欢乐”。—译者注）

[684]

欢乐颂（FREUDE）

1785年，在莱比锡附近的戈赫利斯村，弗里德里希·席勒创作了《欢乐颂》(An die Freude)。这是在曼海姆经历了一次绝望的爱情和一个贫困的冬天之后，他对自己感受到的精神解放的赞颂。它是政治和个人的交响。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它最初的题目是“自由颂”：

欢乐啊，美丽神奇的火花，
来自极乐世界的女儿。
天国之女啊，我们如醉如狂，
踏进了你神圣的殿堂。
被时尚无情分开的一切，
你的魔力又把它们重新连接。
你温柔的翅膀飞翔到哪里，
那里的一切人们都结成兄弟。
亿万生民，互相拥抱吧！
把这一吻送给全世界
弟兄们，在那繁星密布的上苍，
定有位慈父居住在彼方。[1]

七年以后，贝多芬宣布了要给这首颂诗谱曲的想法。此后他酝酿了30多年。

1817年，贝多芬产生了创作一部恢弘的“德意志交响乐”的想法。他觉得这部交响乐可以用一首合唱来结束。他最初的笔记提到一首赞美歌，“旧式交响乐中的一首宗教歌曲……柔板部分的歌词应该是希腊神话或教会圣歌。快板部分应该是酒神狂欢。”[2]只是到1823年6、7月间他才明确地转到《欢乐颂》上来，然后又是不断的迟疑。在那些年里，尽管因为耳聋日益严重而带来痛苦和沮丧，他还是用创作《庄严弥撒》和精彩地演奏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9—111号战胜了逆境。

但是，D小调第9交响曲（作品第125号）所攀登的思想创造和情感解放的高度远胜于此。在一个短暂、窸窸窣窣的前奏之后，第一乐章，不太快的略呈庄严的快板，是由整个乐队一起演奏D小调下行和弦的罕见音响启动的。第二乐章，极活泼的快板，“谐谑曲中的极品”，中间有若干完全停顿，而每一次又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开始。第三乐章，如歌的柔板，有两个极其高雅的旋律相互缠绕。

[685] 向最后一个乐章的过渡被设计成用两段著名的“喧哗”杂乱地重现前面的主题。这个过渡被低音的响亮呼唤打断：“啊！朋友，何必老调重弹！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很快，一个新的主题从管乐部悄悄地进入。这个主题用D小调的欢乐音调，小号的调子反复展现，它是所有交响曲旋律中最简单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旋律。在有56个音符的一行乐谱中，只有三个音符不是连续的。这样一个曲调表达了贝多芬对席勒诗句的重新安排：



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惊愕的复杂，使得演奏者和听众都进入外界活动与想象的领域。本来就扩大了的交响乐队又增添了一个庞大的合唱队和四名独唱歌手。四人组用两个音部咏唱主题。男高音唱：“快乐歌声响遍大地”，伴以打击乐器演奏的进军旋律。交响乐被插入的两个声部引出雷鸣般的合唱：“亿万人民，让我拥抱你们！”独唱歌手与合唱队交错咏唱席勒颂诗的开头两句，然后另外两个声部推动女高音把高音A维持了12拍。到了尾声，独唱歌手混合成一种“全面轮唱”，一段华彩，最后一次冲击，融入逐渐

减弱的主旋律。最后是庄严地反复咏唱“欢乐女神，欢乐、欢乐，上帝降临大地”直至最终清晰地从 A 降到 D。[3]

尽管伦敦交响乐协会曾给予一笔定金，1824 年 5 月 7 日“第九”的首演还是在维也纳的宫廷剧场举行。作曲家本人充当指挥。由于双耳失聪，他完全不能控制场面。直到音乐停止，他还在指挥。他被一名演员牵引着转过身时才看到观众在鼓掌。

贝多芬一直被视为一个旷世天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第五交响曲的开头被 BBC 用来作对欧洲纳粹占领区广播的开始曲。在他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他的《欢乐颂》乐曲被当成欧共体的礼仪乐曲。赞颂人类互相友爱的歌词把一个前民族主义时代和一个后民族主义时代连接起来。这首乐曲被认为适合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尖厉噪音的大陆的热切期望。

年轻的反叛者把浪漫主义的疆界开拓的更辽阔。1797 年，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诺瓦利斯，1772—1801 年）创作了《夜颂》。与但丁对贝娅特丽丝的情感一样，他也把自己早已陨落了的爱情升华成神秘的散文诗。1799 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 年），莎士比亚、但丁和卡尔德隆作品翻译家的弟弟，写成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卢琴德》，暗示爱美应该成为最高理想。在法国，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1768—1843 年）发表了《论革命》（1797 年）以及与当时潮流相抵牾的《基督教的真谛》（1801 年）。1812 年，英国放荡不羁的乔治·拜伦爵士（1788—1824 年）发表了《柴尔德·哈罗德游记》，引发了遍及欧洲的崇拜浪潮。

在传播新思想方面，沙龙和文化中心依然十分重要。施莱格尔兄弟的耶拿圈子在德国很有影响。但是欧洲沙龙的第一把交椅当然属于热尔梅娜·内克（斯塔尔夫人，1766—1817 年）。她是路易十六的首相的女儿，浪漫主义思想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她本身就是一个作家。她先是在巴黎的巴克街，后来在流亡地，主持一个云集了各路才子的“宫廷”。她写的小说《黛尔芬》（1803 年）带有女权主义倾向；《柯丽娜》（1807 年）是一份激情宣言；《论德国》（1810 年）是一篇把德国浪漫主义介绍到法国的论文。

直到哲学家调转枪口对付理性后，理性才被驯服。由维科开始的对启蒙思想的种种偏离却在东普鲁士的环境中令人难以置信地得到发展。伊曼努埃尔·康德（1724—1804 年）无疑是哲学家中的巨人。他在理性和浪漫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康德是一个虔敬派教徒，终身未婚，过着学究式的刻板生活，畸零地远离当时的风云变幻。他从未离

开他的故乡柯尼斯堡，而且他撰写的那种厚重佶聱的专业文字越发使得他难以捉摸。一位评论者写道："柯勒律治转向康德之后并没有使他的诗歌得到提高。"[9] 不过，康德的三大"批判"提出了一个思想体[686]系，几乎后来所有的哲学家都宣称从中受益。

《纯粹理性批判》（1781 年）反对把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当做数学那样的精准科学来接受。该书认为，凡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现象都有其高深莫测的存在根源。每一种根源被称作 das Ding-an-sich，即"物自体"（the thing-in-iteslf）。他不无歉疚地写道："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我只得废除知识。"理性需要用信仰和想象来补充。《实践理性批判》（1788 年）是一部道德哲学论著，阐述了康德关于"绝对命令"的理论。这一理论同情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强调义务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判断力批判》（1790 年）是一部美学论著。他提出智性与理性二者作为判断工具的著名区分。康德主张艺术应服务于道德，应避免表现肮脏的东西，"美如果不能服务于人就没有价值。"

康德对历史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与同时代的吉本一样，他对历史记载中触目可见的"满纸荒唐"、"幼稚轻浮"和"破坏欲望"感受痛切。与此同时，他极力在混乱中寻找可理解的意义。他发现这种意义存在于这样一种理念之中：冲突乃是一个教师，使理性从少数高贵者扩展到整个人类的行为。他在《普遍历史的观念》中写道："人们会祈望和谐，但是大自然更懂得什么对人类有利。（大自然）需要不和谐。"康德的政治学鼓吹共和主义。虽然他不喜欢恐怖统治，但是他欢迎法国革命，指斥家长制政府和等级特权。在《论永久和平》中，他号召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后者应致力于全面裁军和埋葬大国均势体制。这些观点尤其不符合一个普鲁士国王的臣民的身份。[够了]

[687]

够了（GENUG）

1804 年 2 月 12 日，康德在柯尼斯堡去世。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够了。"人在临死时说的话是最真实的。[1]

人物	去世时间	临终遗言
阿格里皮娜，尼禄的母亲	公元前 59 年	"捶打我的子宫吧"
彼埃尔·阿伯拉尔，哲学家	1142 年	"我不知道"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吉亚	1503 年	"等一下"

人物	去世时间	临终遗言
巴亚尔，法国骑士	1524年	“上帝和我的祖国”
马丁·路德	1546年	“是”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	1547年	“僧侣，僧侣，僧侣！”
弗朗索瓦·拉伯雷	1553年	“我去找这个了不起的东西”
瓦尔特·雷利，英国爵士	1618年	（对刽子手说）“动手吧，家伙”
查理一世	1649年	“记住”
托马斯·霍布斯	1679年	“黑暗中的一跳”
莱斯皮纳斯，沙龙主持人	1776年	“我还活着吗？”
伏尔泰	1778年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平静地死去”
约瑟夫二世	1790年	“这儿躺着约瑟夫，他一事无成”
莫扎特	1791年	“这是为我自己写的”
拿破仑	1821年	“约瑟芬”
贝多芬	1827年	“喜剧收场了”
黑格尔	1831年	“他并不理解我”
歌德	1832年	“再多一点光亮”
内森·罗思柴尔德	1836年	“全都是因为我的钱”
J.M.W. 透纳，画家	1851年	“太阳就是上帝”
海涅	1856年	“上帝会宽恕我。这是他的职业”
达尔文	1882年	“我毫不惧怕死亡”
马克思（回答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1883年	“快点，滚开”
弗朗茨·李斯特	1886年	“特里斯坦”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1916年	（哼唱）“上帝拯救皇帝”
克列孟梭，法国政治家	1929年	“安葬我时，让我去德国正面对峙”
希姆莱	1945年	“我是亨利希·希姆莱”
H.G. 威尔斯	1946年	“我还好”

赫尔德（1744—1803年）生于莫龙根，因阅读卢梭的著作热血沸腾，放弃了在里加的工作，乘船前往法国。他后来在歌德的帮助下在魏玛定居。他那聪慧的大脑产生出许多关于文化、历史和艺术的新颖想法。他从反理性主义的角度对认识论辩论做出了贡献。他宣称，感知是全部身心的作用。在《人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年）中，他发展了维科关于文明从诞生到发展、灭亡的循环论，认为进步是比线性前进更复杂的事情。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最重要的工作乃是

他终生热衷的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民俗民歌的收集研究。这里提出的一个主题，不仅在浪漫派文学中，而且在整个关于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见原书第816—817页）

[688] 所有的艺术都对气氛的变化做出了反应。在音乐界，莫扎特和海顿一直忠实于工整、优雅、和谐的古典规范。但是，贝多芬在很快掌握了古典规则之后就逐渐地进入了音乐的革命狂飙时代。在他最初决定把第三交响曲《英雄》(1805年）献给拿破仑的时候，他的音乐已经达到了高峰。卡尔·玛丽亚·冯·韦伯（1786—1826年）曾经是德累斯顿的歌剧指挥，后来变成浪漫派艺术家的一个样板。他第一部成功的歌剧《森林少女》(1800年）呈现了一个哑女与森林的秘密进行交流的感人故事。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年）的旋律天才就像他那部未完成的交响曲一样，因疾病和早夭而戛然中止。但是他已经谱写了600多首歌曲，数量之多，无人可比。除了那些公认的大师外，还有一个强大的配角阵容，其中许多名字几乎被人遗忘，如杜赛克(J.K. Dussek，1761—1812年)，穆齐奥·克莱门蒂（Muzio Clementi，1752—1832年)，奥金斯基（M.K. Oginski，1765—1833年)，胡梅尔(J.N. Hummel，1778—1837年)，约翰·菲尔德（J. Field，1782—1837年)，玛丽亚·希曼诺夫斯卡(M. Szymanowska，1789—1831年)。最后这一位是当时罕见的女性演奏家和作曲家。

在绘画方面，对新古典主义的追求仅仅被部分地克服。最有影响的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从未停止使用古典主题。但是浪漫主义的惆怅早已潜入诸如因受马赛鼠疫启发而创作的《圣罗克》等画面中。而且它也成为他创作的拿破仑时代英雄肖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最激进的革新发生在其他地区。在德意志，肖像画家P.O. 龙格（Runge，1777—1810年）寻求“宇宙永恒旋律的象征”。在英格兰，乔治·斯塔布斯（Stubbs，1724—1851年）笔下的动物从古典的极其平静拘谨的牧场转移到诸如备受赞扬的《受到狮子攻击的马》这种亢奋的场景中。透纳（J.M.W. Turner，1775—1851年）沿着可能把他完全引向印象主义的路迈出了第一步。他在1802年第一次游历瑞士，创作了《赖兴巴赫瀑布》。从一开始他就被大自然的狂暴威力所吸引，在眺望大海时尤其如此。与他同时的风景画家约翰·康斯太布尔（J. Constable，1776—1837年）具有更温和的性情，但同样敏于研究大自然的脾气。插图画家威廉·布莱克（W. Blake）关注的则是狂想和超自然的世界。他给但丁作品配的插图显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在欧洲广为流行。在西班牙，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1828年）自1789年出任王室画家。他的绘画记录了战争和内乱的种种梦魇和恐怖。他讲到自己的一幅绘画作品时说：“《理性的安

睡》使得魑魅魍魉大行其道。”[10]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主要是从革命前的思想和政治冲突中寻找大革命的根源。启蒙“哲学家”们被视为破坏了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路易十六的大臣——杜尔哥（1774—1776 年在任）、内克（1776—1781 年和 1788—1789 年两度在任）、卡隆（1783—1787 年在任）和洛梅尼·德布里安大主教（1787—1788 年在任）——把法国引向崩溃。历史学家认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以及随后发生的攻陷巴士底狱乃是一系列因素的直接后果，这些因素包括民众不满，宫廷、教会和[689]贵族横行荒淫、改革“太少太迟”等。伯克（Burke）怀疑“猪狗般的大众”策划了阴谋；梯也尔（Thiers）在回忆大革命时，强调绝对专制政府的不公正；米什莱（Michelet）强调“民众”的苦难。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 年）为这场辩论贡献了一份重要的智慧。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证明，改革和革命的发展变化不是一种直截了当的事情。路易十六一直真诚地致力于改革，而且在他的统治下政府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善。他写道：“被革命摧毁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1]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主义”更难以忍受。[12]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对其中许多论断做了精细的补充。这些研究揭示了巴黎高等法院在阻碍国王改革方面起的作用，高等法院的时论作者在传播哲学家思想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作为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甚至有一项研究宣称，内克在第一次出任财务大臣时曾经成功地实现了收支平衡。这是在暗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出现的法国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促成三级会议的召开——并不是整个制度崩溃的结果，而仅仅是管理不善的结果。[13]

在这种辩论中，人们曾经首先强调经济社会问题，认为它们构成了政治巨变的基本原因。马克思也是一位历史社会学家。他属于把法国革命当做全部历史讨论焦点的那一代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准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这一衣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拉鲁斯（C.E. Labrousse）发表了研究成果，对十八世纪晚期法国农业周期性萧条和 1787—1789 年食品紧缺和物价飞涨做出了定量证明。[1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勒费弗尔（Lefebvre）和柯班（Cobban）两人的追随者之间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阐释之争，而这一争论只不过凸显了他们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偏向。[15]关于“资产阶级”利益的重要作用，似乎出现了一种共识。柯班写道：“这场革命是属于他们的。至少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场完全成功的革命。”[16]另一位讨论者写道：“法国革命乃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经济演变的顶点，这场演变使得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17]但是这种资产阶级论受到挑战，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农民和无套裤汉。这种阶级分析大多保留着一种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味道，在那些否认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联系的学者那里尤其明显。在有的人眼里，这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教授之争”，“成了现代世俗世界的神曲。”[18]

与任何一次危机一样，心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国王及其大臣不一定知道大祸临头，但是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可能用20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确，由于民众没有适当的代表，因此国王和大臣无从确知民众的态度。而且，在农奴遍地的农[690]村，在无产者充斥的巴黎，没有任何手段来缓解因贫困引发的恐惧和遏制不住的怒火。中央的优柔寡断和民众中流传的惊恐结合起来，就成为必然导致灾难的契机。尤其是，暴力孕育着暴力。“从一开始……暴力就是革命的发动机。”[19]

要想追根溯源地探讨大革命的国际背景，那就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20]当人们考虑那些使普遍骚动转变成爆炸性革命的机制时，政治和军事的背景情况应该受到重视。在欧洲的地窖里，有一些酒桶的木塞即将喷出，而且确实喷出来了。但是，有一些小酒桶的木塞能够被迅速地更换掉。只有当某个大酒桶可能爆炸时，整个地窖才会有危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巴黎的事变上。但是，从编年史角度和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来看，其他一些骚动中心也需要注意。从联省共和国到奥属尼德兰，尼德兰的局势发展虽然经常遭到忽视，但却极端重要。法国某些外省，尤其是多菲内省，抢先表露出的不满也很重要。整个东欧最关键的事件是，波兰—立陶宛大国会召开，准备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改革。上述这些重点地区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它们表明，在革命爆发之前，革命骚动就具有某种全欧性。

在联省共和国，1787年10月，执政与反对派的传统冲突达到了新的沸点，普鲁士军队应邀前来维持现状。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坚持武装中立，又由于随后与英国发生的海上战争，荷兰遭受很大损失。到1780年代后期，传统的商业势力和共和派起来反对执政威廉五世（1766—1794年在位）及其盟友英国和普鲁士。他们开始按照美国方式自称“爱国派”，宣布代表人民反对这些君主。他们在与政府斗争时劫持了执政的夫人威廉明娜（普鲁士的公主——译者注），引起国际喧哗。正是威廉明娜的劫难促使普鲁士人采取行动，并且提供了在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地区实行绥靖的口实。但是诉诸暴力对旁观者起了作用。它无疑也加强了奥属尼德兰“爱国派”的决心，后者正

遭遇一次对自己实力的考验。这个事件也引起法国人的关注，因为当时他们正在严厉地审查国王与臣民的关系。法国的异议者早从笛卡儿时代起就把荷兰看作是一个自由的天堂。从 1787 年起，荷兰的异议者又开始把法国看作是惟一现实的援救来源。

1788 年 7 月 21 日，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维济耶城堡网球场召开。这次会议是非法的，但是被当地名流视为捍卫外省高等法院的一个手段，因为当时国王命令高等法院准予他的敕令[691]登记生效。这是自 1628 年黎塞留（Richelieu）撤销了许多外省机构以来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7 月 7 日，格勒诺布尔发生支持高等法院的示威骚乱，也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启动了一个得寸进尺的欲望升级进程，促成了一年后巴黎许多事变的发生。多菲内的高等法院蔑视王权已经有 20 多年了。国王的许多加税要求都遭到它的拒绝，因此它在当地很得人心。1788 年 5 月敕令旨在削弱这些桀骜不驯的高等法院，为罢黜犯上的官员做准备，因此有可能打破整个一代人感到惬意的平衡。

1788 年 9 月，多菲内三级会议在罗芒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从形式上是合法的，因为它与被授权的全国三级会议准备工作重合。但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实质上的省宪法。除了选举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其中包括维也纳的大主教勒夫朗·德·庞皮尼昂）外，会上还可以听到会议主席穆尼埃（J.J. Mounier，1758—1806 年）法官和安托万·巴纳夫（Antoin Barnave，1761—1793 年）鼓吹公民权利的热烈讲演。穆尼埃后来成为制宪会议的主席；巴纳夫不久成为雅各宾宣言的起草人。会议决定，第三等级增加一倍代表，三个等级同场辩论，代表个人拥有表决权。这些措施后来在全国三级会议上重演，从而把国王召集的驯服工具变成了一个只想完成自己议程的独立议会。正如一本地方指南书骄傲地宣称的：“1788 年是多菲内革命年。”[21]

多菲内的小型革命引起宫廷里的争执，促成了国王的主要大臣布里盎主教的辞职：是他提出召集三级会议的动议，但现在他又不能获准用武力来挫败造反的省份。这样就为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东山再起开辟了道路。他被召回来挽救国王的财政。多菲内的事变对 1788 年 11 月在凡尔赛召开的筹划全国三级会议的（第二次）缙绅会议有决定性的影响。多菲内关于第三等级地位的提议影响了当时最激进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这个小册子的作者西耶斯教士（Abbé Sieyès）问道。“是一切。迄今为止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那么它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22]

在华沙，1788 年召开的“四年国会”被认为是争取俄国批准、恢复国家独立的国王计划的一部分。它启动了波兰—立陶宛的改革进

程，情况很像法国，直到二者都被暴力所吞噬。当时，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多变化。腓特烈大帝去世，新的普鲁士国王很同情他的波兰邻[692]人。俄国忙于对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奥地利约瑟夫二世忙于对付尼德兰。1787 年，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判断，向叶卡捷琳娜女皇提出一项建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女皇允许波兰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如果财政和行政机构能够维持它，那么国王立即与俄国签约结盟，共同对土耳其作战。俄国和波兰就能和谐地追求自己的目标。5 月，国王在第涅伯河卡纽夫王室城堡附近接待了俄国女皇。在这最后一次与他的前情人的会面中，他从叶卡捷琳娜那里什么也没有听到。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女皇对约瑟夫二世表示，她不同情波兰。事实上，她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波兰人的愿望是不能满足的。

波兰的国会不顾一切地推行国王计划的内政部分。1788 年 10 月，它首先宣布实行联邦制和多数表决制，借此绕过亲俄派成员的“自由否决权”。接着它表决建立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这迈出了自 1717 年由俄国确认的宪法所限制的一步。这是以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和解为依托的。国会中的活跃分子集结在亲英的国王周围。国王梦想建立一个英国式的君主政体。核心部分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有改革后的雅盖隆大学的校长胡果·科瓦泰神父（the Revd Hugo Kollataj，1750—1812 年）、斯坦尼斯瓦夫·斯塔希茨神父（the Revd Stanislaw Staszic，1755—1826 年）以及国会的发言人斯坦尼斯瓦夫·马瓦霍夫斯基（Stanislaw Malachowski，1736—1809 年）。他们都是美国模式的热烈拥护者。历经 3 年的狂热立法活动之后，他们短暂的光荣时期终于在 1791 年 5 月到来：他们制定的 5 月 3 日宪法获得通过（见下文）。

1788 年 11 月，布拉班特（Brabant,）和埃诺（Hainault）(奥地利的属地，今比利时的两个地区——译者注）的等级会议也采取了同样重大的步骤。他们对皇帝约瑟夫二世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怒不可遏，因此投票决定扣留本省的税收不予上缴。他们早就因宗教和政治原因心怀不满。他们都是西班牙派的天主教徒，很难接受皇帝的这样一些敕令：对神学院、进香朝圣和修道团加以压制；用国家审查制度取代了主教审查权；直接对教会征税。同样，作为自 1354 年以来就享受特权的阶层，他们不能忍受皇帝不与他们磋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等城市十分珍爱它们对等级会议审议决定的传统否决权。但是在他们尽力抗争时，他们促成了一次宪法危机。奥属尼德兰的这次危机比正在法国酝酿的危机提前一步上演。在同一周内，法国缙绅正在奔赴凡尔赛磋商全国三级会议日程，比利时“爱国党”成为巴黎

的头条新闻。1789年4月29日，皇帝试图把一个新宪法强加给比利时的等级会议，这正好在法国三级会议召开前6天。当皇帝的强行手段遭到奥属尼德兰国务会议拒绝后，他决定使用武力。6月20日，奥地利军队入侵布鲁塞尔，解散了国务会议，废除了《欢乐入城》宪章（Joyeuse Entrée）。就在这同一天里，桀骜不驯的法国三级会议举[693]行了"网球场宣誓"，启动了法国的革命进程（见下文）。

布鲁塞尔和巴黎具有了一种共同语言。消息在它们之间迅速传递着。"比利时造反"在皇帝发动政变后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成为"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成分。当时，不是巴黎领导着布鲁塞尔，而是布鲁塞尔领导着巴黎。

1789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死神降临巴黎街头。罕见的寒冬增加了因政府财政崩溃、物价飞涨、失业所造成的困苦。饥荒在贫民区蔓延，面包房前的骚乱频繁发生。当一个名叫雷韦龙的富有制造商竟敢在公众面前说，他的工人每天只用他付给他们的三十苏的一半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时，他在圣安托万郊区的房子被人们包围起来。第一天，愤怒的人群在"第三等级万岁！""内克万岁！"的呼喊声中破坏了一些建筑。第二天，皇家轻骑兵团开了进来，遭到投掷物的攻击。有人开了一枪。士兵以密集火力还击，至少导致300人死亡。三级会议的代表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迎接他们的正是这个消息。

革　命

与149年前的英国一样，当法国的全面危机日趋尖锐之时，国王因财政崩溃而召集长期冷落的议会来帮助自己。各方的期待是，给王国政府提供财政帮助，但要得到解除民众痛苦的回报。因此，根据事先的安排，各省和各地城市选出来的代表带着"陈情书"来出席三级会议。国王的大臣想用这些陈情书当做评估民众不满的性质与比例的主要工具（现在历史学家就是如此广泛地利用它们）。有些申诉并没有什么革命性："南特的贵族假发制造者不应受到新的行会会员的打扰。现有成员92人已经足够多了。"[23]

1789年5月4日星期日在巴黎举行开幕仪式。在卡莱尔的一段栩栩如生的文字中描绘了这一场面：

看……圣路易教堂的大门突然大开，游行队伍一列列向圣母院进发！……法国的民选代表们，然后是法国的宫廷……都按照预定的位置、穿着预定的服装整齐列队。平民代表们"着普通的黑色外套和白

领结”；贵族身着齐膝天鹅绒上衣、金边袖口、色彩鲜艳华丽、缎带沙沙作响，手摇羽毛饰物；僧侣身着各种白色教衣。最后走来的是国王本人以及王室成员，也都身着最亮丽浮华服装……大约有一千四百人从各个方向聚集到一起，担负着最深切的使命。

是啊，这些默默行进的人群已经决定了未来。这些人没有像古老的希伯来人那样抬着象征性约柜；但是，他们也守着一种圣约。他们[694]也主导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全部未来都在那里，命运幽幽地笼罩着它，在他们的心中和尚未定型的思想中……[24]

不过，三级会议一旦召开，就不可能俯首听命了。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这三个等级本应分别开会，而且应该亦步亦趋遵循王室官员所制定的议程。但是，第三等级代表很快发现，他们已经像多菲内的情况一样取得双倍代表名额，如果能够让三个议院合在一起投票，他们就能让大会程序服从他们的意愿。僧侣和贵族中有许多第三等级的同情者，因此这两个等级不可能组成同心协力的反对派。于是，6月17日，第三等级打破了原有规则，邀请另外两个等级与他们联合，并且宣布自己是惟一的国民议会。这是决定性的突破。三天后，这些代表被挡在原来会场门外，遂转到邻近的网球场聚会，在那里宣誓：除非法国获得一个宪法，绝不解散。米拉波伯爵对受命前来驱散代表的军队高声喝喊：“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来到这里是受命于人民，不会在刺刀的威胁下解散。”[左派]

大混乱继之而来。在宫廷里，国王的温和派大臣与其他更强悍的大臣吵翻了。7月11日，雅克·内克这位在三级会议开幕式上受到热烈欢迎的大臣被解职。巴黎炸开了锅。围绕着奥尔良公爵在罗亚尔宫形成了一个革命总部。罗亚尔宫的花园变成了著名的自由演讲和自由恋爱之地。每一类政治高论都伴有色情表演。激烈的演说家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担心报复，大声疾呼：“内克的放逐是针对爱国者的又一次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的信号。”皇家卫队倒戈了。13日，一个公安委员会建立，48000人登记参加拉法耶特将军领导的国民自卫军。造反的人群捣毁城市里可恨的国内税卡，在寻找武器时洗劫了圣拉扎尔修道院。14日，当人们从伤兵院拿走了3万支火枪后，巴士底狱要塞被包围。经过短暂的交火，驻军司令投降了。国王丢掉了他的首都。

在此紧要关头，在整个事变的中心，依然有希望实现一种井然有序的和解。17日，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前往巴黎，并当众接受了三色徽章。相反，在外省，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引发了对“另外4万个巴士底狱”的进攻狂潮。城堡和修道院遭到焚烧；贵

[696]

左派（GAUCHE）

从法国三级会议召开之日起，宫廷党贵族本能地坐到国王的右边，第三等级坐到左边。坐在当权者的右边，就像坐在“上帝的右手”旁边一样，乃是一种固定的特权标志。结果，“右派”就自然地成为政治既得权势的同义词。而“左派”就被用到反对派身上。这种区分在 1793 年以后的国民公会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时雅各宾派及其盟友占据会场的左边和高处的席位。他们组成了位于“山岳”的革命代表集团，在物理空间上就高于位于“平原”的温和派。“左”和“右”的对立从此成为政治光谱的一个基本比喻。[1]

但是这个比喻也有缺陷。它只适用于直线排列的政治光谱。“左派”和“右派”由一个调和的“中间派”加以分开：

改革 ———————— 维持现状 ———————— 反动

极左派—左派—中左派—中间派—中右派—右派—极右派

在这个图式中，最成功的政治家很可能是借助左翼温和派与右翼温和派而控制中间地带舆论的人。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的辩证论者认为政治光谱不是直线型的，而是两极型的。在他们的图式中，政治乃是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两种力量注定相互抗争，必定有一种力量会建立霸权。从长远看，就像拔河比赛或天平一样，中间派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平衡，总会让位给“左派”或“右派”。那种认为政治秩序能够建立在共识、宽容、妥协、克制和尊重法律的基础之上的观念，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幻想”。

左 ————————△————————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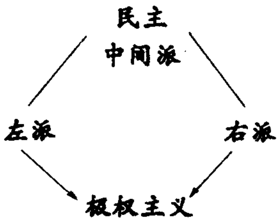
进步　　　　　　　　　　　　　倒退

直线型图式和两极型图式共有一个可疑的假设：“左”和“右”是完全对立的。

政治会议的空间安排也因而包含着重要的考虑。例如，英国的下院让发言者右边的政府席位与发言者左边的反对党席位正面

[697] 相对。这准确地反映了两党制的对抗政治，让现任大臣与影子大臣通过公文递送箱面对面地交流。这也是一个辩证的概念，积极地打击着第三党的活动和多数欧陆国家议会所倚仗的结盟原则。它不能被用于通过按比例选举产生的议会。相反，英国上院是沿着一个四边形的三面安排坐席的，有一批独立议员坐在中间的“横向席位”上。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一排排座位连成一片，显示的是所有到会者被迫的意志一致（见原书附录Ⅲ，第1334页）。

不过，二十世纪的政治经验表明，右派可能像左派一样激进。除了相互对立外，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都企图推翻民主的民意。由此看来，政治势力最好是用一种圆形轨迹来排列。在这种图式中，不仅左派反对右派，而且极权主义和民主相对立：



基于上述思考，可以看出，对于民主议会中多元而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来说，马蹄形或半圆形可能是最合适的空间安排。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从华沙到巴黎的许多欧洲国家的议会，而且也是用于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的“半圆形会场”。[2]

族家族，不分男女老幼，遭到饥饿农民的攻击，因此开始流亡。各个城市宣布自治，盗匪四处滋生。法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武装阵营。这就是“大恐惧”的缘由——那个夏季，全国到处谣传贵族的阴谋和农民的残忍，由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集体歇斯底里症。[25]

从此，革命就获得了自身的动力以及由各种不可控制的事变所决定的节奏。它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695] ***在第一个五年阶段（1789—1794年），***法国革命越来越激进地加速发展，直至原先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所有制度都被扫除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议会，又称制宪议会，致力于设计一个立宪君主制。1789年8月4日到5日一夜之间，通过30个不同的法令，废除了全

部农奴制机制和贵族特权。在《人权宣言》（1789年8月24日）之后，又废除了旧的行省（1789年12月）和确立教士的民政体制（1790年6月）。1790年7月14日，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之时，整个法国欢庆盛大的结盟节。在巴黎，国王出席了弥撒，议会的领袖也都到场。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将军宣读了奥顿主教塔列朗（Talleyrand）提供的一份庄严的效忠誓词。

在奥属尼德兰，革命进展得更快。1789年8月，有权势的列日主教大公被"爱国派"在一次政变中抓获。同月，德莫什将军（General de Mersch）组织了一支义勇军来与奥地利人对抗。11月，根特的游行以血腥屠杀告终。最后，12月，布鲁塞尔赶走了奥地利卫队。年底，一个独立的比利时联邦宣告成立。它的存在持续了13个月，直至1791年2月奥地利军队卷土重来。

在法国，一个统一的宪法生效，需要举行新的选举。这次选举把原有的温和的领袖统统弃之一边。新的立法议会对君主制没有多少好感。它在12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争夺控制权，直到1792年夏天共和国宣布建立以及共和国的国民公会开幕。当时法国处于战争状态，革命运动主流被极端激进派所控制，而这些激进派在此之前控制了巴黎的自治机构公社。由此来看，如果说三级会议和国民议会（1789—1791年）是由米拉波等宪政派支配，立法议会（1791—1792年）是由共和主义的吉伦特派支配，那么国民公会（1792—1795年）则是听命于罗伯斯庇尔等极端雅各宾派。

雅各宾派统治的两年恐怖是从1792年的入侵恐慌开始的：当时普鲁士军队被认为已经距巴黎在射程之内（见下文）。当国王期待外国救援而撤换吉伦特派大臣时，民众的不满就开始高涨了。7月，不伦瑞克公爵宣言宣称：他的目的是解救国王，如果王宫被触动，他将处决全体巴黎人。消息传来，巴黎人群情激愤。雅各宾派正需要这样的借口来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和号召废除君主政体。500名热血沸腾的马赛人出发去支援巴黎。8月10日，马赛人冲锋在前，很快就攻陷杜伊勒里宫，国王的瑞士卫兵遭到屠杀。9月，公社控制了首都，巴黎监狱里数千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屠杀；国王被废黜；共和国宣告诞生。

9月20日，国民公会开幕，恰恰瓦尔密战役打响。瓦尔密的胜[697]利击退了外敌，挽救了革命。9月22日，即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日，后来被定为革命历法的起始日。[**葡月**]

接下来，行政权力被集中到两个前后相继的公安委员会——第一个（1793年4—7月）是由丹东主导的，第二个（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是由罗伯斯庇尔主导的。国民公会独立的主动权丧失了。人

[698]

葡月（VENDÉMIAIRE）

1793年10—11月，法国国民公会表决通过实行一种基于革命原则的共和历。一系列法令规定了这种共和历：每年的开始是在9月22日的秋分之时（昼夜平分点），革命纪元的元年应该定为自1792年9月22日，即宣布共和之日始。一年分成相等的12个月，每月30天，每月分成3旬（不再有星期，也不再有星期日。）

月的名称：葡月（收获葡萄之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割晒牧草之月），穑月（收割之月），热月（炎热之月），果月。

日的名称：按照每一旬，称第一日、第二日……第十日。（见原书附录Ⅲ，第1288—1289页）。

该历法实行后，1794年1月1日就被正式地转化成共和2年第2旬第2日。

为了与365¼天的自然年度保持一致，共和历以四年为一组，称作“法兰西闰年组”，每年另外加五天，称作“无套裤汉日”，每四年再加一个闰日，称作“革命日”。

革命历正式维持了14年，实际上在第六年以后就被抛弃了。在执政府时期，格里历又被普遍使用，到共和14年，即1806年1月1日，格里历正式恢复。

在打破国民的方向感时，最好的方式被认为是改变历法。反对革命的阵营极力维持旧的时间概念，革命者极力坚持使用新的时间概念，历史学家必须考虑这二者。

[698]们斗志高昂地进行对外战争。旺代等地的“反革命”遭到无情的打击。一部极其民主的新宪法被通过了，规定了普选权、全民投票和民选政府，但只是一纸空文。巴黎的公安委员会通过分布在法国各个公社和省的下属委员会的网络，保持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些根据1793年3月21日管理外国人法令建立的委员会，成为无限独裁控制的工具。

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孩子了。恐怖变得猖獗起来，吞噬着越来越[699]多的牺牲者。1794年4月，丹东及其合作者因质疑恐怖的意图而受到指控并被处决。1794年7月28日，即共和2年热月10日，主要的恐怖主义者罗伯斯庇尔受到指控并被处决。**[吉约坦]**

君主的命运也反映了上述进展。1789年10月，在一次妇女进军凡尔赛的抗议活动之后，路易十六及其全家被裹挟着迁到巴黎的杜伊

勒里宫居住。他早就成为嘲笑的对象：

> 路易，你要想看看
> 杂种、王八和婊子，
> 你就照照镜子看看
> 你的王后和你的儿子。[26]

1791年6月，在否定了自网球场宣誓以来所做的一切让步之后，他乔装逃向东部边境，但是在香槟省的瓦伦被抓住。他蒙羞回到巴黎，然后签署了国民议会准备好的法国第一部宪法，变成人民的“世袭代理人”。1792年8月，杜伊勒里宫被攻陷，他也被逮捕和“停职”。9月，他被废黜。1793年1月21日，他被当做卖国贼审判后处决。10月16日，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遭受同样命运。十岁的皇太子路易十七被交给一对平民夫妻收养，后来因照顾不周得肺结核而死亡。

波兰—立陶宛也同样出现了从宪政改革到革命恐怖的进程。1791年5月3日宪法是一份只有11个条文的简短文件。但就在这部宪法中，旧制度的所有弊端，包括自由否决权，都被消除。“两个民族的国家”被确定为现代宪政国家。君主被宣布为世袭（虽然当时的国王是一位年老的单身汉）。资产阶级获准享有过去仅限于贵族的选举权。农民过去被排斥在公法之外，现在被纳入公法范围。这是第一个取得实际成功的和平改革，是欧洲同类宪法中的第一部。它的起草、通过和发表早于法国宪法四个月。这正是自由主义改革者们一直渴望的那

[700]

吉约坦（GUILLOTIN）

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Josèphe – Ignace Guillotin，1738—1814年）博士并没有发明断头机（法文：guillotine）。他所做的只是敦促法国国民议会采用他的同事安托万·路易发明的更人道的处决犯人的机器。这项提议于1792年4月被采纳，在时机上恰好为雅各宾派恐怖做了准备，从而把吉约坦提高到齐名者（eponym，又译“名祖”）的地位——所谓“齐名者”是指“其名字被（或被认为）用来命名某事物的人”。[1] 革命年代产生了许多这类齐名者。其中包括拿破仑的宗教事务大臣让·比戈（Bigot，在法文里表示宗

教信仰虔诚者——译者注）以及极端爱国主义的士兵尼古拉·沙文。沙文高唱："我是法国人，我是沙文"。（后来人们用沙文主义来表示极端爱国主义——译者注。）

许多齐名词进入了国际词汇。植物学在这方面的词汇很丰富，因为许多奇异的植物都是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Begonia（秋海棠）取名自植物学家 Michel Begon（卒于 1710 年），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其他还有 Camellia（山茶）、Dahlia（大丽花）、Fuchsia（晚樱科植物）和 Magnolia（木兰）。紫色岩生植物 Aubrietia（南庭荠）就是取名自法国画家 Claude Aubriet（1665—1742 年）。

物理学通过对公制度量单位的命名来保持对探索者的纪念。电流单位 ampere（安培）令人想起 André Ampère（1775—1836 年）。另外像 angstrom（埃，波长单位）、ohm（欧姆，电阻单位）、volt（伏特，电压单位）和 watt（瓦特，功率单位）都属于这一类。

服装里常见到齐名词。cardigan（开襟羊毛衫）和 raglan（套袖大衣）都出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将军的名字。时髦的 leotard（紧身连衣裤）取名自杂技演员 Jules Léotard（1842—1870 年）。所有穿 pantloon（马裤）、pants（短裤）、panties（紧身短裤）的人都应该记得裤子之父 Pantaleone de' Bisognosi 这位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人物。

食品业产生许多例子。Bechamel sauce（调味酱）取名自路易十四的一个管家。Sandwich（三明治）乃是十八世纪的一种调配食品，取名自约翰·蒙塔古，桑维奇（Sandwich）伯爵四世（1718—1792 年）。十九世纪产生了 chateaubriand steak（烤大牛排），madeleine cake（马德琳蛋糕），pavlova（奶油水果蛋白饼）令人想到那位侯爵、那位蛋糕师傅和那位杰出的芭蕾舞演员。茶余饭后吸烟会使人想起曾经担任法国驻葡萄牙大使的让·尼古特（Jean Nicot，1530—1600 年；尼古丁一词取自他的名字——译者注）。

技术发明经常使用发明者的名字，例如 spinet（斯皮耐琴，古钢琴）、mansard（复折屋顶）、diesel（柴油机）、shrapnel（榴散弹）、biro（一种圆珠笔）等。

但是许多齐名词是有争议的。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把画家费德里哥·巴罗齐（Federigo Barocci，卒于 1612 年）说成是巴罗克风格的创始人。对于把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爱尔兰流氓帕特里克·胡利汉（Houlihan）说成是流氓（hooligan）的鼻祖，人们也有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欧洲的现在充满了欧洲的过去留下的语言痕迹。

类意义深远的进步。在伦敦，埃德蒙·伯克兴奋不已，思绪澎湃。他写道：波兰的5月3日宪法“可能是迄今降临于人类的最纯粹的……公益”：

> 这些措施既让理性感到满足，也让道德情感感到宽慰，还激发人们的想象……一切都合情合理、井然有序，但是一切都比所能想象的更好。除了这种闻所未闻的智慧与幸运的契合，这种幸福的奇迹外，更好的是，没有留一滴血，没有阴谋背叛，没有暴行……如果他们在开始着手之后知道如何推进，他们就是幸福的民族。[27]

伯克对“波兰革命”的欢迎也应该像他对法国事变的指责一样广[701]为人知。在荷兰，《莱顿报》写道：“如果本世纪有什么奇迹的话，一个奇迹就发生在波兰。”

“幸福的奇迹”只持续了一年多一点。俄国可不打算容忍自己的门口有一个宪政的波兰，更不用说是一个独立的波兰了。正如波兰—立陶宛经历了第一轮革命性改革，它也得经历第一轮的革命战争。与法国的情况一样，波兰的改革者也身不由己地从温和转向铤而走险。在1791年宪法因俄国干涉和第二次瓜分（见下文）而被废除后，1794年爆发的民族起义带有更激进的主张，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暴力与恐怖笼罩下被肢解。法国的革命进程被内部的反动所遏制，而波兰的革命进程被外国势力所摧毁。

在第二阶段（1794—1804年），从共和二年热月开始，法国革命显然在轨道上停了下来——喘口气，清点一下。虽然政府依然不稳定，但是杀戮的欲望被制止住了。立法的狂热也平息下来。（国民公会在过去三年里通过了11250项法令。）革命者们发现了一个军事天才，而且他们投身到与敌人的战争中。只是出于维持秩序和防止混乱的需要，政治家们联合起来，试着采用一系列政治措施来应付局面。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热月党人统治了16个月。1795年11月，随着一部新宪法和一个两院制议会的出现，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应运而生。1797年9月（共和五年果月十八日），督政府践踏议会的权利，迫使议会缄默。1799年11月，由于督政府最成功的将军进行的雾月18日政变，三人“执政府”建立，并由全国公民投票所认可。1802年5月，这位最成功的将军使自己成为终身第一执政；1804年，他进而成为皇帝。

在第三阶段，即帝国阶段（1804—1815年），通过把自己锁定在

对那位将军、帝国创造者拿破仑·波拿巴的崇拜上，革命获得了稳定。怀疑和纷争依然存在，但是都被他为了完成征服世界的使命而进行的重大战争所淹没。波拿巴主义把革命战争和征服变成了目的本身，把军事需要变成了绝对优先目标。一个冒牌君主领导着一个冒牌的民主制度；一个有效率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连接着一个立法残存机构和大胆革新的奇怪组合。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托付给战场之神们。拿破仑说："成功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演说家。"

根据行政机构的变更来划分历史时期，会与上面的分期略有不同。如果这样划分，从1789年6月到1792年9月是立宪君主制时期；从1792年到1799年11月是"第一共和国"时期；从"雾月十八日"到1815年是拿破仑独裁时期（参见原书附录Ⅲ，第1286—1287页）。

[702] 所有的革命观点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通过国民议会的辩论和政治俱乐部的形成而逐渐体现出来。

最初的立宪派是由米拉波伯爵（1749—1791年）和其他自由派贵族如拉法耶特将军等领导的。他们促成了废除绝对君主政体和贵族僧侣特权。到1791年4月米拉波病故时，他们变成了处境困难的少数派。他们在斐扬派俱乐部聚会。在国王逃往瓦伦事件发生后，君主政体失去人心，拖延它的死亡，就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知道，米拉波一度想给路易十六献上一个"法国自由缔造者"的纪念碑。

吉伦特派因一批来自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的代表而得名。为首的是雄辩的律师皮埃尔·维尼奥（Pierre Vergniaud，1753—1793年）。他们在立法议会中聚集起来。他们最初是中央集权派，愿意与国王政府合作，但逐渐表现出民主共和情绪。他们的活动以罗兰夫人的沙龙为中心。他们的影响在1792年达到顶峰，当时他们主持了国王的最后一届政府，并开创了向共和国的转变。

形成对照的是，雅各宾派，即"自由与平等之友社"乃是无限民主以及革命专政和暴力的鼓吹者。他们因他们的俱乐部位于圣奥诺尔街前多米尼克修道院而得名（巴黎的多米尼克派被称作"雅各宾派"，因为他们早期的居所在圣雅克街）。他们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意志坚强的集团——大约3000人，却娴熟地扼住了两千万人的喉咙。他们的成员上有布洛利亲王以及两位公爵——埃及永公爵和年轻的夏尔特尔公爵（后来的国王路易—菲利浦），下有粗俗的布列塔尼农民"热拉尔老爹"。"热拉尔曾经对他们说，'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律师，我原来想在天堂里和你们在一起的"。雅各宾派的领袖包括：乔治·丹东（1759—1794年），被卡莱尔称作"出自大自然火热胸膛的人"；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年），一个极富煽动性的报人，与丹东一起被

处决；让·马拉（Jean Marat，1743—1793年），“患病的医生”，《人民之友》主编；热罗姆·佩蒂昂（Jérôme Pétion de Villeneuve，1756—1794年），曾担任巴黎市长；安托万·圣茹斯特（Antoine Saint—Just，1767—1794年），被称作“恐怖大天使”，还因对罗伯斯庇尔的恭顺而被称作“圣约翰”；最后当然还有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年）为人不苟言笑、严格律己，被称作“来自阿拉斯的不可腐蚀的律师”。据说，在革命前，他宁可拒绝升迁为法官，也坚持主张判处一个人死刑。在第二个公安委员会里，他的权力和影响大得让人不可思议。他是巴黎民众的英雄，但在他的反对者看来，他是魔鬼的化身。

雅各宾派能够在1791年亮相，是由于国王冒险地采用以毒攻毒的策略。他想擢用最狂暴的对手来驯服其他对手。在佩蒂昂经国王批准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后，雅各宾派牢固地控制了首都的自治政府“公社”。此后，在系统地消灭了他们的竞争对手和驯服了国民公会后，[703] 他们又大批地杀害自己的同伙，直至罗伯斯庇尔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丹东的口号是：“勇敢、勇敢、再勇敢。”圣茹斯特在抨击君主政体时宣称：“统治就不可能清白”。在提议对其敌人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时，他说：“幸福在欧洲是一个新观念。”罗伯斯庇尔曾经问国民公会：“公民们，难道你们想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支持雅各宾派的俱乐部之一是科德利埃俱乐部，即“人权与公民权协会”，设在巴黎科德利埃区以前的方济各修道院，其成员与雅各宾俱乐部相重叠。他们的后期领袖是像埃贝尔（J.R. Hébert，1757—1794年）这样真正的“忿激派”，以激烈的无神论和理性崇拜为特征。埃贝尔被罗伯斯庇尔以“极端分子”为名处决。[**左派**]

如果说雅各宾派大多是职业律师和报人，那么其活跃的支持者大多是巴黎郊区的默默无闻的无产者。这些无套裤汉中包含着比任何实际行使权力的集团和个人更激进的分子。他们中间有欧洲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像“卢森堡区爱国者协会”或“法国先贤祠两性友爱会”这种面目不清的组织，是在巴黎“各区”的各种会议大厅里组织起来的。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至今也不能完全说清楚。实际上，作为革命的推动力，它们也许比通常受到赞扬的资产阶级起了更有效的作用。雅各宾时期的许多革命委员是由它们提供的。它们塑造了一种持久的传统。在十九世纪的每一次“革命”中，这种传统都向当局提出挑战。[28]

反对革命的力量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政治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地区性的。最

初反对力量集中在王宫里，由普罗旺斯伯爵（后来的路易十八）领导的“极端派”想要恢复旧貌。加入他们行列的有大多数被剥夺的贵族和大批的流亡贵族，其中既有高级贵族也有低级贵族。他们不仅反对共和派和雅各宾派，而且反对立宪派。例如，宫廷对拉法耶特将军极其蔑视。1790年，教皇禁止教士宣誓效忠世俗机构，从此，僧侣只能要么屈服，要么反抗。1792年，革命出现不仅反教会而且反宗教的倾向，所有的罗马天主教徒，即绝大多数民众都义愤填膺。反革命情绪的这一主要因素一直很活跃，直至1801年波拿巴与教皇签订《教务专约》才平息下来。1789年获得自由的农民大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革命的主要获益者之一。但是，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农民与巴黎[704]的革命领导人在精神上有一道互不理解的鸿沟。农民很快就转而反对共和政府的压迫。许多农民认为共和政府比以前历届政府更坏。

反对革命的思想直到复辟之后才得到充分的阐释。但是，最势不两立的莫过于萨伏依行政官约瑟夫·德·迈斯特尔（Josèphe de Maistre，1753—1821年）写的《关于法国的思考》（1796年）。他认为，革命者是撒旦的仆人。他还反对渗透在革命思想中的启蒙普遍主义因素。他写道，他经常见到法国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俄国人，“但是说到‘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一个。”他的同时代人安托万·里瓦罗尔（Antoine Rivarol，1753—1801年）以“里瓦罗尔伯爵”著称，曾经写过赞扬法语的著名论文。他因转而撰写反对革命的新册子而被迫逃亡。他写道：“人们无法对思想开枪。”

法国有一些省顽固地效忠君主，因此反复地爆发叛乱。甚至在巴黎也不得不下力气来镇压保皇派的起义，最著名的是共和四年（1795年）葡月十三日事件。在一些比较偏远的省，如勒加尔（Le Gard），反抗活动一直持续到1815年。[29]当然，最坚决的反抗集中在西部。在最初对旧制度的垮台表示欢迎之后，民众的怒火持续喷发了几年。1792年，许多教区支持那些拒绝向世俗当局宣誓效忠的教士。它们得到的回报往往是，一伙伙城里的共和派来到乡村巡游，捣毁教堂，攻击“顽固的”教士。1793年，由于实行普遍兵役制，这些乡村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共和派官员和职业人士的子弟经常可以获得征兵豁免：这似乎就是命令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去为他们最不想要的无神论共和国送死。1792年5月，丹东得知据说是由鲁瓦里侯爵（Marquis de la Rouairie）在布列塔尼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个阴谋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它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民众叛乱的先声：旺代的暴动和朱安党人战争这两个叛乱拖住法国西部十几年。

旺代的暴动引发了近3年之久的内战。它是1793年3月在卢瓦尔河畔圣弗洛朗爆发的，但是很快就遍及西部绿树成荫的乡村。最初

的发起者是一些拒绝征召的农民，如莫日的驾鹰狩猎人卡特利诺（J. Cathelineau），蒙莱弗里的猎场看守人斯托夫勒（J.N. Stofflet）。但是，领导权很快就转到当地绅士之手——邦尚（Bonchamp）侯爵、累斯库尔（Lescure）侯爵、"亨利老爷"拉罗什雅克林（La Rochejacquelin），代尔贝（Gigot d'Elbée）将军，塔尔芒亲王（Prince de Talmont）。这支"保卫国王和天主教的圣徒军"所装备的是镰刀、叉子和猎枪。他们打着白色军旗，上面装饰着百合花和"路易十七万岁"的标志。他们戴着一个领巾和一个绘有圣心和火十字的袖章。他们打了21场恶仗，在血腥的绍莱战场取得胜利，攻占了南特，蹂躏了曼恩省和安茹省。他们奋不顾身的勇气被"亨利老爷"的命令充分调动起来：

我前进，跟我上！我退却，杀了我！我战死，为我报仇！ [705]

1793年10月，旺代叛军开始了他们最雄心勃勃、但也（被证明）是最有勇无谋的行动。大约三万武装者，带着几十万老弱妇孺，越过卢瓦尔河，向诺曼底海岸进发。目的地是格朗维尔小港口。他们相信，英国舰队和流亡贵族军队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们。但是，他们被愚弄了：格朗维尔已经封港。拉罗什雅克林的进攻被击退；英国舰船连影子也没有。退却开始了。当队伍沿着冬季的道路溃退了120英里时，他们完全成了各种困苦和暴力的牺牲品。城镇对他们封闭，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厮杀。有15000人尸横勒芒的大街小巷。他们饥寒交迫，随处倒毙。他们遭到共和军的追赶、劫掠、奸污。当他们抵达卢瓦尔河时发现，桥梁已被封锁，船只尽悉焚毁。他们的战士被分割、被杀戮。手无寸铁的平民遭到了毫无忌惮的大屠杀。最后的结局发生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地点是南特附近的萨沃奈。韦斯特曼（Westermann）将军——丹东的追随者——向国民公会呈交的报告说：

旺代已不复存在……我已经把它埋葬在萨沃奈的树林和沼泽中……根据你们的命令，我让我们战马的铁蹄践踏了他们的孩子；我屠杀了他们的女人，让她们再也不能生出土匪来。我没有留下一个俘虏来责骂我。我把他们全部消灭干净了。沿路遍布死尸。在萨沃纳，匪徒们一直在口呼投降，而我们则不停地向他们射击……怜悯不是革命者的情感。[30]

旺代人的撤退史称"逆风行进"。仅就死亡人数而言，它绝不亚于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

这时，旺代的内陆地区正在遭受从莱茵地区调来的克勒伯尔将军

的共和军的蹂躏。1794年整整一年里，共和军的“凶狠纵队”对叛乱村庄发泄报复的怒火。成千上万的人被枪决、斩首，他们的粮仓和教堂灰飞烟灭。在罗什福尔港口，有数千名拒绝宣誓的教士眼睁睁地饿死在囚船的甲板上。在昂热，有数千犯人被立即执行枪决。在南特，有更多的人被集体溺毙。稍后，为了遏制反抗，在叛乱地区的中心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军事要塞，驻有2万卫戍部队。（1808年刚刚修成时称作“拿破仑—旺代”，1815年更名为“波旁—旺代”，现在称“罗什—叙尔—雍”。）附近的空旷田野上立着一个十字架，纪念旺代最后一个指挥官夏雷特骑士的最后反抗。他在南特被行刑队枪毙，临死前最后一声呼喊是“国王万岁！”[**溺毙**]

[706]

溺毙（NOYADES）

1794年春，法兰西共和国的官员在南特想要处死许多旺代叛乱者，但是因人数太多而感到棘手。他们放出“凶狠纵队”；他们饿死和残杀俘虏；他们一批批地枪杀俘虏达千人。但是这还不够。然后他们想出溺毙的主意。南特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港口，有一批大型闲置的囚船。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效率却又不引人注意的重复使用处决室的办法：晚上把满载的囚船沉下去，然后再让它浮起来。这就是恐怖的溺毙。需要乃是杀人技术发明之母。[1]

一个半世纪之后，纳粹官员在占领波兰后也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想杀死的犹太人太多了，因此遇到难题。他们放出了“别动队”；他们让犹太人在拥挤的隔离居住区里饿死；在索比保尔，他们把犹太人赶进在各地巡回的铺撒生石灰的火车车厢。[2] 但是这还不够。然后他们想到了毒气。最初试验向流动货车放一氧化碳，但效果不理想。到1941年初，他们试验在封闭的房间里使用Zyklon—B氰化氢毒气罐，再加上德国一流专家设计的焚化炉。[3] 试验表明，屠杀能力将会极大地提高。一年后，纳粹党卫队就能够开始用特制设备实施工业化的种族屠杀计划。[4]

一位从特雷布林卡死亡营中出来的目击者后来向纽伦堡法庭审问者描述这种过程：

[**拉兹曼**] 每天都运人到那里。有时是三列、四列或五列火车，上面装的全是犹太人。他们抵达后，必须立即在站台上排好

队。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开排队。在德国人的鞭打下……他们被迫立即脱光衣服。然后，他们只能乖乖地裸体穿过街道走向毒气室。

德国人怎么称呼那条街？

天堂之路。

请告诉我们，一个人抵达那里后能活多久？

从脱衣到走进毒气室，男人只有8到10分钟，女人大约用15分钟，因为女人要被剪掉头发……

请告诉我们，特雷布林卡火车站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集中营的指挥官库尔特·弗兰茨修建了一个设有各种标志的第一流的火车站。储放衣服的棚房安装上的标志有"餐馆"、"售票处"、"电报室"等……

一个伪装的火车站？……请告诉我们，德国人在杀人时有什么表现？

他们把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她的怀孕的女儿带到这座房子里。几个德国人就开始观看分娩过程……老祖母央求一死了之。[707] 但是，当然首先杀死的是新生婴儿，然后是婴儿的母亲，最后才是老祖母……

证人，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集中营平均每天消灭多少人？

平均而言，每天一万到一万二千人。[5]

可以想象得到有人会欣赏这样一种观点：纯粹的毒气室体现了一种"人道态度"，因为它类似于井然有序的屠宰场。如果低等人种必须去死，那么与其让他们长期受苦不如让他们立即死掉。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纯粹的逻辑包含这种考虑。纳粹死亡营的运作的特点是毫无情感的效率和毫无道理的残忍。

1942—1945年，克罗地亚亚塞诺瓦茨的"死亡工厂"是由法西斯主义的乌斯达莎（当时统治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操作的。战后，它成为南斯拉夫大规模宣传的内容。官方统计有70万死难者，主要是塞尔维亚人。这个数字一直有人质疑。[6] 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亚塞诺瓦茨既毫无人性，也没有使用任何现代技术。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数不胜数。不过，无论枪决还是毒气室，也还是可以看做是一种幸运，因为免除了乱棍打死、鼎镬烫死或手锯断头的痛苦。

由于胜利方共和国的宣传，“旺代主义”被普遍地用来等同于农[707]民的愚昧、宗教迷信以及专横教士的统治。这幅画面是不公正的。诚然，有些旺代人在艰难之时被神秘的殉道方式所吸引，而且会倾向于自我放纵。但是他们的叛乱不是非理性的。他们遭受了许多实际的侵害和羞辱，其中包括当时公开嘲弄宗教的风尚。在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他们那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热忱都会受到普遍的赞许。邦尚侯爵临死前宽恕了5000名俘虏，这充分体现了旺代人的道德情操。他们的悲剧在于，在雅各宾极端狂热的阶段，他们拿起了武器。他们的敌人毫不犹豫地动用了大屠杀的手段，然后又对牺牲者造谣中伤。拿破仑把他们称作“巨人”。法国用了20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才逐渐接纳了这个“屠杀平民”或“法国大屠杀”的恐怖故事。[31]

1793—1801年的“朱安党人”有许多与旺代起义相同的基本动机。而且他们在地域上与旺代起义有重合交错之处。不过，他们分布的更广，在布列塔尼、诺曼底和昂热的活动区域更大。由于他们采用了游击战，他们坚持的时间也长得多。朱安党人（Chouan）的称呼取自“chat-huant”（法文：灰林鸮），这种鸟是林中的青年农民最喜欢用的联络手段。他们最早推出的领袖让·科特罗是勒芒附近圣康德托瓦的护林员，自己取绰号“让·朱安”。在共和政府看来，他们就是一群“土匪”；但是，他们坚持了三场持久的战役，与共和国调集来的所有军事力量抗争到底。

[708] 第一次战役（1793年10月到1795年4月）是由旺代人西进诺曼底通过该地而引发的。当时有五千朱安党人加入了旺代人的队伍。最终，由于督政府下令停止迫害不宣誓的教士而实现了停火。第二次战役（1795年6月到1797年4月）始于一次对布列塔尼黄杨桥共和军军火库的大胆袭击。当一支由英国舰船运送的王党军队在吉贝隆半岛登陆时，看来很可能发展成正规战争。但是，督政府的奥什将军被证明是太称职了：他在消灭了登陆部队之后，又软硬兼施地采用宗教宽容和坚决的军事措施逐渐绥靖了农村地区。第三次战役（1797年9月到1801年7月）是由于督政府决定废除北部和西部各省选举结果引起的，因为保皇派候选人在这些省大获全胜。由此重新开始了对不宣誓教士的迫害，朱安党人与“蓝衫军”（共和军士兵）之间也发生了一系列残杀。1799年在莫尔比昂省凯列阿诺的乔治·卡杜达尔（1771—1804年）的领导下，反叛者配合行动，很快就占领了一些城市，诸如勒东、勒芒、南特和圣布里厄。但是，在拿破仑建立执政府后，反叛者的胜利就到头了。拿破仑采用了与奥什将军相似的战略。1801年的《教务专约》实现了宗教调和，此后普遍的敌对平息下来。但是小股的地方反叛者继续咆哮于山林僻壤，直到1804年卡杜达尔

被捕并被处决。[32] [朱安党人]

凡是想对“反革命”做出准确说明的，都不能忽视基准线的急剧变化。1789年领导革命的立宪派到1792年就已经被算成“反革命”[709]了。最坚决的反抗浪潮之一是1793年6月为了声援吉伦特派而发动的，当时引发了里昂、马赛、波尔多等地的叛乱。而吉伦特派不久前还是雅各宾派最亲密的合作伙伴。甚至无套裤汉在赢得选举权和廉价的面包后，也转而反对他们的雅各宾恩主。波拿巴被看做是既背叛了波旁王朝又背叛了共和国，因此招致了“白党”和“红党”两方的嫉恨。1800年12月24日巴黎发生一起爆炸，原计划是在波拿巴去歌剧院的路上暗杀他。这本来是王党流亡者的阴谋，却被当做处决雅各宾和共和主义反对派的借口。凡是失败的反对者都被斥之为“反动分子”。[红色]

暴力是大革命的一个特征，也是批评者始终最深恶痛绝的。暴力采取了许多形式。暴民统治和私刑从1789年7月14日起就开始出现了。巴士底狱要塞司令德洛内以及下级牺牲者的头颅被挑在长矛上在巴黎全城游街示众。对教士和贵族的人身和财产的狂暴攻击随处可见。偶尔也会发生像1792年9月巴黎滥杀囚犯那样的大屠杀；像刺杀马拉这样的暗杀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还有像雅各宾派垮台后马赛发

[708]

朱安党人（CHOUAN）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萨尔特省西部地区，除勒芒外，当地政治大多数情况下是被一种坚实的右翼反共和传统支配着。这与东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反差：东部地区是由同样坚实的左翼反教会的共和派联盟支配着。这个“红色地区”在1960年代还在支持共产党。这种格局不是由于土地占有情况的社会因素或宗教因素。根据法国农村史领衔学者勒鲁瓦—拉杜里的研究，这只能用1793—1799年朱安党人暴动所留下的无法痊愈的创伤来解释。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789年的“陈情书”显示，最激烈的反对什一税和教士的呼声出自西部，而不是出自东部。革命的共和国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太极端了，以至于把自己最初的支持者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到了第五共和国时期，人们的选举行为依然不能摆脱第一共和国所犯错误的阴影。勒鲁瓦—拉杜里写道：“用现在来解释现在，行不通。”[1] 法国的一个省尚且如此，那么整个欧洲不更是如此吗？

[710]

红色（ROUGE）

1789年的三色旗是由法国王室旗子的白色和巴黎市旗的红蓝两色组成的。它被设计成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1794年巴伐利亚共和国采用了同样颜色但横向排列的国旗，这是继承了相似但更悠久的联省共和国的国旗。

但是，不久被革命者所采用的是红旗。在古罗马时代，红旗表示战争。红色是鲜血、火焰和巫术的颜色。一般认为，其现代生涯始于1791年：进攻杜伊勒里宫的群众捡起了一面浸染鲜血的王旗。从此，“红色”和“白色”就被视为革命和反革命的颜色标记。司汤达用《红与黑》的形式来描绘复辟时期激进派与教会反动之间的斗争。

政治运动的颜色标记具有深厚的内涵。采用红色的有加里波第的“千人团”、社会主义者以及更激烈的共产党人。采用代表土地颜色的绿色（墨洛温王朝曾经使用过的颜色）的有农民政党、爱尔兰爱国者以及后来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纯正蓝色”（不褪色的蓝色）曾经是西班牙表示贵族血统的标记，很适合英国的托利党和其他保守派的心意。工联主义者喜欢［**橘黄色**］，自由主义者则喜欢黄色。纳粹开始因其冲锋队的制服而以“褐衫党”著称，后来又因其党卫队的制服而与黑色联系在一起，而黑色在其他人看来乃是欧洲传统上表示邪恶、死亡和海盗的颜色。他们强迫集中营里的囚徒佩戴各种颜色的臂章，其图解模式是红色＝政治犯，绿色＝刑事犯，黑色＝反社会分子，粉色＝同性恋，紫色＝耶和华见证会教徒，褐色＝吉卜赛人，黄色＝犹太人。[1]

许多颜色包含着多种含义。在天主教的象征意义中，红色代表殉道和（红衣）主教，白色代表纯洁贞节，蓝色代表希望和圣母玛利亚，黑色代表哀伤、多明我会修士和耶稣会修士。在种族自觉和政治正确的时代，“黑色就是魅力”，“白人”是指不受欢迎的“死男人”，“红皮肤人”（对印第安人的蔑称）必须改称“cardinal”（红衣主教，深红色）；最好的比喻是彩虹。

生的那种持续的恐怖的反攻倒算。这些事情都不是这次革命特有的。但是革命暴力在两个方面开了先例：一是使用了大规模的征募军队，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战斗伤亡数量；二是雅各宾派释放出了政治恐怖的残暴统治。在大众心理学的领域里，这两个现象都与那种巨大的能量

相关：正是那种能量驱使一个绝望而破产的民族陷入20年热情征战的狂欢。这两者都是可以避免的。

恐怖统治是由（第二个）公安委员会设想出来的，是作为一种自觉的政策工具来推行的。它不局限于摧毁革命的活跃反对派。它是被用来制造前途未卜、惶恐不安的气氛，让反对派在思想上陷入瘫痪。它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武器分别是牧月嫌疑犯法令和革命法庭。前者要求所有的公民必须检举有嫌疑对当局心怀歹意的人。由于最高限价法把全部经济领域变成了一个动辄得咎的可能犯罪之地，嫌疑犯法令与之结合，就使法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可能突遭横祸。嫌疑犯法令使得法庭几乎只能发布死刑判决，源源不断地把无辜者送上断头机。巴黎的纪录已经达到数万之多。在外省，用军事力量支撑着恐怖。应该提醒一下，恐怖时期在巴黎遇害的牺牲者只是旺代被杀死人数的十分之一。

但是恐怖所制造的风气至今令人惊愕。它制造了一种由间谍、告密者和无限怀疑组成的环境。它制造了那样的景象：双轮货车上塞满了受刑者，穿过充满仇恨的街道；那些面对死神的男男女女，有的神态安详，有的稀松瘫软；歹毒的女人们在断头机旁编织毛衣，血淋淋[710]的头颅滚落进身边的大筐里。通过这种极端可怕的环境，它创造了一大批传世的冷峻幽默。丹东在被问及姓名和住址时答道："我是丹东，还算得上众所周知。我的住址是湮灭。但是我将永存史册。"德穆兰在被问及年龄时答道："我的年龄是那个善良的无套裤汉耶稣的年龄，是革命者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年龄。"他当时38岁。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说了一句没有说完的话："我无辜而死，我宽恕我的敌人，我希望[711]我的血……"处于同样困境的丹东说："丹东，不要软弱。刽子手，向他们展示我的头；我的头是值得展示的。"罗伯斯庇尔稍早时用手枪打中了下巴，因此只能发出不连贯的尖叫。

许多滥施革命暴力的作恶者自己也死于暴力。"旺代的屠夫"韦斯特曼与丹东死在同一个断头台上。督政府进行了一些审判，惩治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施虐狂。

立法改革也依循着与革命本身一样的大趋势，经过了立宪、共和和帝制这三个阶段。结果极其混乱。旧秩序的各种制度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产的或短命的权宜之计，帝国则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取舍和修正。最终的产物往往是奇特的混合，既非昔日之鱼，又非革命之鹰。例如，世袭贵族在1789年就与其他等级一起被废除了。在共和国时期，所有的人都简化为一个等级：公民。波拿巴推行用人惟贤的思想："为有才能者打开晋升之门"。帝国实行了新的等级、头衔体

制，建立了一个依据对国家的贡献大小而册封的亲王、公爵、伯爵等贵族阶层。荣誉勋位团（1802年）就是拿破仑为建立一个才能体制而提出的办法。

在宗教方面，教士的民政体制（1790年）把所有的教士都变成了领取薪水的国家官员，没收了所有的教会财产。共和国迫害不宣誓的教士，废除立宪时期建立的教会，发明自己的世俗历法和世俗崇拜（如1794年的最高存在崇拜，1796年的有神博爱教），推行社会生活的非基督教化。波拿巴在羞辱了教皇之后，正式恢复天主教。1801年的《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但是教会的任免、薪水和财产均由国家管理。1804年12月2日教皇庇护七世出席了巴黎圣母院皇帝加冕仪式，但是他的动作太慢了，波拿巴把王冠自己戴到头上。不论是否妥当，拿破仑的宗教大臣让·比戈（Jean Bigot，1747—1825年）的名字变成了宗教偏执的代名词。[吉约坦]

在教育方面，原先教会学校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帝国时期，以巴黎的教育部和全国主要城镇的公立中学为基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学校体系，让法国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

在地方政府方面，原有的各省及其历史上形成的特权和等级会议都被废除了。1790年新建了83个稍小的省，大多以河流或山脉命名。帝国保留了这些新省，而且大大增加了省份的数量。拿破仑改造它们的内政组织，建立了省长公署。

[712] 在经济领域里，革命政府长期以来一点点摸索着前进。1790年，制宪会议废除了旧的税收，但也不得不发明类一些新的土地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它发行了著名的指券（国债券）来为教会财产的国有化提供资金。指券后来逐渐贬值，成了一种极其低廉的纸币。1793年雅各宾派采纳了一种经济纲领来满足庞大军队、恐怖政策和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需求。他们的“统一意志”教条不仅应用于政治上也应用于经济上。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控制的军火工业，通过最高限价法来严格控制物价，宣布废除了农民的所有债务。1795年以后，督政府越来越指望着用劫掠和进贡来代替一种经济政策。拿破仑又增添了一种旧式的柯尔伯重商主义者的形象。宏大的公共工程靠的是优先确保源源不断的金钱内流。

共和国和帝国都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与英国争夺商业航运控制权的斗争始于第一次反法同盟。1806年11月拿破仑的柏林敕令正式宣布对英伦诸岛实行封锁。他说：“我希望凭借陆地霸权来征服海洋。”英国的回应是1807年的枢密院令，禁止所有的中立国与法国通商，除非携带原产地的证明书。这反过来刺激了拿破仑于1807年12月颁布米兰敕令，以严厉的报复来恫吓任何遵守英国规定的人。由此法国

在所有占领国推行大陆体系，并且造成拿破仑与丹麦、瑞典和俄国等合作的条件。这使欧洲第一次尝到统一的经济共同体的滋味。但是这也造成了极大的反感，动摇了法国的地位。

税收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变化。昔日令人愤恨的税费和豁免权都已销声匿迹了。立宪派政府的目标是实行适用一切人的公平而普遍的税制。雅各宾派则对生活必需品征收货物税，因为选举权仅限于纳税人。督政府退回到财产所有者的民主。帝国时期，尽管中央政府的土地税得到更有效的征收，但是税收负担十分沉重，这种负担尤其落在农民身上。

1790 年代的立法洪流造成了堵塞，需要通过系统的审查和汇编来加以清理。国民公会从 1792 年开始的工作最终结束于宏伟的民法典（1804 年），后者很快被重新命名为拿破仑法典。该法典取代了 1789 年生效的 360 部地方法典，在南方的罗马法和北方的习惯法之间、在 1789 年的平等主义原则和督政府的权威主义的有产阶级的反动之间，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习惯法在民政领域丧失了地位）普遍的公民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确认。在家庭法方面，世俗结婚和离婚得到承认，但是财产的平均分配则仅限于男性继承人，已婚的妇女被确定“没有能力”签订契约。这部法典深刻地影响了至少 30 个国家的社会发展。

从长远看，革命可能在纯粹观念的领域里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它[713]的许多具体立法规定在 1815 年以后注定会被进一步的修改，或者只能应用于法国了。但是其中的许多基本理念和理想却保留下来引起全世界的思考，甚至在那些还不能找到直接的实际表达形式的地方也引起共鸣。例如，在君主政体 1814—1815 年复辟之前，共和主义早就在法国失败了。但是，共和主义存活下来，滋养着一种传统，到 1848—1851 年又得以重新伸张，最终自 1871 年起持久地把持了这个国家。由于君主政体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还是一种主要的政体形式，因此 1792—1799 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记忆和榜样不可能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革命理念本身也是无法压制的，即便是在具体的革命运动已经遭到镇压的地方也是如此。1789 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都对政治社会秩序持一种静止的观念，如果发生了变革那也最好是有限的和渐进的。1789 年以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世界会天翻地覆，意志坚定者能够调动起社会力量，呼唤出潜藏在极其静谧的社会表面之下的心理能量。这种发现引起了普遍的恐慌，在某些地方也唤起了人们的希望。这也极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此，革命就与那些规模较小的反叛、起义和暴动区分开来。

反革命也开始展翅飞翔。从此，革命信条必然有对立物与之抗衡。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年）在英语世界、歌德在德语世界都有持久的影响。德·迈斯特尔的神学中心论的《关于法国的思考》（1796年）把革命视为上帝大发雷霆。他的这种思想绵延不绝，代有传人，直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们都与伯克一样，本能地反对“被疯狂、纷争、邪恶、混乱和无谓的伤感所充斥的对抗世界”。

人权的概念即便不是法国革命者发明的，也确实因他们而获得最强大的现代动力。《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发扬了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期间的一些基本宣言所蕴含的概念。它历尽沧桑却风骨犹存，成为革命初期理想主义的永久纪念碑。它是1789年8月26日“在主宰面前和它的庇护之下”通过的，由一篇前言和17个条款组成。前言的文字遵循的是美国那些宣言的风格。17条列举了“自然的不可转让的神圣权利”：

1.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

2.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4. 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714] 5.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

6. 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

7. 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

8. 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9.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

10.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11.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12.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13. 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

14. 所有公民都有权……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15. 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16. 凡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17.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33]

社会通常认为，“人权”（rights of man，英文 man 或者法文 homme 既然表示一般的人类，也可以特指男人——译者注）自动包括妇女权利。但是，包括孔多塞在内的一些勇敢的思想者不以为然。他们声称，妇女完全被忽视了。时机一到，原先的宣言又增添了新的思想，尤其是关于社会经济领域的人权。1793 年修改后的宣言第 21 条声称：

公共救助是神圣的义务。社会对不幸的公民负有维持其生活之责，或者为他们寻找工作，或者确保给不能劳动的人提供生活资料。[34]

1794 年奴隶制被宣布非法。宗教宽容也获得保障。[**妇女**]

当然，法国版的人权受到共和国和帝国的专制实践的极大限制。1815 年以后，它继续与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作斗争。但是，它对全欧洲的影响却远远大于英美版，这既是因为总的说来当时法国文化具有更大的影响，也是因为法国士兵用他们的背包把它带到整个欧洲大陆。压迫者到处散播另一种解放的种子，并不算什么新鲜事。

革命方式的地理差异常常被人忽略。巴黎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并不是整个法国。土伦在 1793 年曾被英国—西班牙海军占领。那里的港口和城市乃是王党和共和派激烈厮杀之地。内战也扩大到马赛、波尔多和里昂，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被还以 1794—1795 年的“白色恐怖”。在许多地区，只要加以有效的组织，保皇派的情绪[715]就可能赢得多数人的支持。结果，革命者取得胜利，这既是因为他们集中了优势的军事力量，也因为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把保卫革命和保卫法国联系在一起。爱国热情与革命激情的结合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莱茵军战歌”（1792 年）中。这首歌又名“马赛曲”，注定在 80 年后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斯特拉斯堡**]

[716]

妇女（FEMME）

奥林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1740—1793年）是布列塔尼地区蒙托邦的一个屠夫的女儿。她来到巴黎时已是一位寡妇。她原名玛丽·古日，不愿使用夫姓。她有志于文学活动，采用了一个笔名。从革命之初她写过剧本和政治小册子。她对制宪会议排斥妇女感到愤怒，发表了一份《女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用以对抗“男人的权利”：

1. 权利方面，妇女生来是自由的，而且始终是与男人平等的……

2.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女人和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而国民无非就是女人和男人的联合。

4. ……若不是受到男人压迫她们的暴政，妇女自然权利的行使是没有界限的。

5. 自然和理性的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

6. 法律应该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所有的公民，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应在法律的形成中共同起作用。所有的公民在法律眼中都是平等的，应该有平等的资格接受一切荣誉、地位和位置……除了品德和才能外没有其他任何区别。

7. ……妇女和男人一样遵从严格的法律。

8. 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而且适用于妇女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9. 任何被宣告犯罪的妇女都将完全在法律范围内处理。

10. 任何人都不得因发表根本性意见而遭受迫害。妇女有权登上行刑台，也有权登上演讲台。

11. 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说“我是你的孩子的母亲”而没有任何野蛮的偏见迫使她隐瞒真相。

12. 妇女权利的保障需要有绝对的公共服务……

13. 妇女和男人对维持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平等的。

14. 女性和男性公民有同样的权利来确定税收的需求。

15. 所有的妇女因她们的贡献而和男人联合起来，有权要求所有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16. 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17. 财产由两性平等地分享或分割……[1]

这个女性主义创始宪章一直让人有点惊奇。在公开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之后，这位作者被送上断头台。

"自由女斗士"安娜—约瑟夫·泰鲁安格·德·梅利库（Anne-Josèphe Théruoingue de Méricourt 1758—1817 年）从列日来到巴黎，鼓吹更激烈的女性主义。她认为，妇女应该为革命战斗，为此她组织了一个凶猛的女战士兵团。她在《法国人变得自由》中写道："针和纺锤不是我们知道如何对付的惟一武器。" [717]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 年）从伦敦来到巴黎，此前她在《人权辩护》中抨击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她的《女权辩护》（1792 年）是德·古日理性主义观点的放大。她与政治学者威廉·葛德文结婚，死于难产。她生下的女儿长大后成为诗人雪莱的妻子。

这些激进女性主义先驱者的观点，在主要的革命者圈子里没有赢得什么同情。卢梭早已定了调。他提出一种性别角色：罗马主妇那种自我克制的英雄主义与鼓励男人表现更多男子气概的女性温柔二者的结合。德·古日、泰鲁安格·德·梅利库、罗兰夫人（吉伦特派领袖之一，死于断头台——译者注）、夏洛特·科尔黛（因刺杀马拉而闻名——译者注）和塞西尔·雷诺（因闯进罗伯斯庇尔住所而被处死——译者注）等这类人给罗伯斯庇尔造成的震撼不亚于妇女进军凡尔赛给路易十六留下的印象。1793 年 6 月，妇女被明确地剥夺公民权。[2]

现代国家概念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现代国家是指，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把相同的法律同样地应用于全部领土上的所有公民。它的各种要素是在许多世纪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不仅仅是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但是，雅各宾派的极端平等和帝国的独裁在二十年里对法国地方主义的破坏比绝对君主政府在一二百年里的进展还要大。不仅如此，革命军队把整个欧洲古旧国家政体博物馆（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威尼斯共和国）统统扫到一边，为十九世纪政府改革清理出一个平台。再有，民族主义并不完全是由法国革命创造出来的（见第十章）；但是，民族观念和国籍意识是在那些颠覆了旧秩序的国家里大大强化的。

军国主义——相信武力是推行政策的正当有效工具——也不可避免地得到发展。十八世纪的战争只具有相当有限的目标；战争中的佼

佼者更多的是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战场赢得土地。相比之下，法国的革命军队是在1792年以后聚集起来的，正值普遍兵役制军队、战时经济以及全民武装的热情交织在一起，能够产生前所未有的宏大结果之时。虽然最终的失败或许也证明了军国主义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在20多年间似乎是所向披靡的进军显示了战争所能达到的成就。这是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1753—1823年）留下的遗产。这位军事工程师和行政官在公安委员会、督政府、帝国时期，尤其是在波拿巴的眼中，一直被盛赞为"胜利的组织者"。卡尔诺写过这样的话："战争是一种暴力状态。人们应该把它做到极致，或者说做到家。"

革命战争，1792—1815年

从一开始，人们就能预感到革命会引起国内战争乃至国际战争。尽管1790年5月法国制宪会议正式宣布放弃征服战争，但是没有一个君主听到"消灭暴君"的喊叫会感到舒服，而这种喊叫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则是此起彼伏、余音回荡。同理，没有一个革命者能够身处[717]"流亡者"和王党的敌对阴谋而高枕无忧。刻意的权力炫耀造成了普遍的不安气氛。1791年，教皇公开谴责革命。接受这个挑战的一方面是吉伦特派的布里索，他号召人民讨伐"暴君"；另一方面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长利奥波德皇帝。他在皮尔尼兹会见了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君主后，号召结成君主联盟"恢复最虔敬的基督徒陛下的荣誉"。

俄国、奥地利、瑞典、普鲁士、萨克森和西班牙的君主都赞成积极干涉。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他们的计划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她表示："法国的事态乃是所有头戴王冠者不能不关注的。"他们的领头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策划了未成功的路易十六逃往瓦伦的方案。他已经获得了俄国的津贴，却于1792年3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的假面舞会上被暗杀。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是路易十六的暧昧立场：他的公开声明与他的秘密通信是互相抵牾的；他既反对革命，又与革命合作。结果，救助路易十六的意见有很大分歧，造成了拖延，使革命者获得了主动权。1792年4月，在国王的默许下，他们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斯特拉斯堡**]

法国突然陷入战争。这应该追溯到路易十六的一个最危险的以毒攻毒的决定。1792年春天，宫廷党和极端激进派都向国王鼓噪战争。王后希望进行战争，这样革命就有可能败给由她的兄长领导的国际救[719]援力量。激进派希望战争，因为布里索派想靠一场军事胜利来抬高自己。于是路易十六接受了他们的表面意见，拒绝了比较温和的吉伦特

[718]

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

1792年4月24日，向第一次反法同盟宣战的消息传到驻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军队。当天晚上，在斯特拉斯堡市长家里的联欢会上，来自汝拉的工兵上尉克劳德—约瑟夫·鲁日·德·利尔（Rouget de Lisle，1760—1836年）即兴创作了“莱茵军战歌”的词曲。无论在哪里，只要革命陷入危险，人们就会唱起这首激昂振奋的歌曲：

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敌兵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原词：用鲜血洗刷我们的哀伤！）

因为这首歌最先是在斯特拉斯堡传唱的，因此在译成德文后被称作“斯特拉斯堡之歌”。到了夏天，“斯特拉斯堡之歌”传到法国南部地区。6月22日晚上，在马赛的一个宴会上，一位来自蒙彼利埃的医学学生弗朗索瓦·米鲁瓦唱了这首歌。它确实激动人心，因此有一个马赛义勇军营队，一路唱到巴黎。7月30日，他们唱着这首歌进入首都。这首歌马上被称作“马赛曲”或更简单的“马赛”。后来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了。只有一点疑问：从南部来的这个义勇军营队会不会说法语。[1]

当革命军队在欧洲各地行进时，“马赛曲”加快了他们的步伐。它被翻译成从意大利语到波兰语的各种语言。1795年7月4日，它被国民公会法令正式采纳，从此开始了国民国歌与各种王国国歌（如“上帝拯救国王”）相抗衡的习俗。拿破仑曾经说，马赛曲是共和国最伟大的将军。

至于鲁日·德·利尔，他在1793年因同情王党而被捕。他熬过了恐怖时期，最后死于贫困。他的纪念碑立在隆勒索涅。

派大臣和雅各宾派的忠告。1792年4月20日，法国军队受命仓促越过边界，进攻奥地利统治下的尼德兰。路易十六赌博的结果是出乎所有怂恿者的希望之外。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较量。王后所指望的救援力量迟迟没有出现。布里索派也没有赢得持久的优势，到夏天就被雅各宾派取而代之了。欧洲渐渐丧失了和平调停的所有希望。国王本人也威信扫地，在9月第一次重大战斗在瓦尔密发生之前他的废黜就已经在进行中了。

只有俄国毫不动摇。叶卡捷琳娜女皇忙于对土耳其的战争，直至1792年1月雅西条约签订。但是，她一结束对土战争就立即把目光投向西方。她对反革命十字军的贡献在于，她坚决反对波兰宪法："她一分钟也不能接受这份宪法"：

> 波兰宪法绝不是雅各宾式的。但是对于叶卡捷琳娜来说，在1791年春天，在革命的波兰和革命的法国之间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她)感觉到波兰涌动的革命暗流……因此她在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粉碎了革命。[35]

她把一个由波兰卖国贵族组成的假联盟召集到圣彼得堡，迫使普鲁士国王丢掉对波兰的同情，命令俄国军队进军。而恰恰在同一时间，路易十六也下令法国军队进军。于是革命战争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开始了。20年后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始作俑者将做决定性的较量。

因此，1792—1793年俄波战争乃是革命全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基本上决定了后来在东方等待拿破仑的那种均势格局。结果并不是一个早已确定的结局。在国王的侄子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和美国独立战争老战士、西点军校创建人柯希丘什科的领导下，经验不足的波兰军队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俄国军队进入波兰治下的乌克兰一个月后，1792年6月18日波兰军队在波多利耶的杰莱尼采赢得一个精彩的胜利。直至普鲁士军队从背后包抄过来之前，波兰一直似乎有可能顶住。最终，形势逆转也主要是由于国王投降而不是由于军事征服。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都为了终止流血而加入俄国人支持的塔尔哥维查联盟，接受了第二次瓜分的条款。他于1793年1月4日在圣彼得堡签字，条款正式生效。六个月后，在俄国刺刀的影响下，在立陶宛的格罗德诺召开了波兰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国会。在没收财产的威胁下，贵族代表给自己祖国的屈辱披上合法外衣。5月3日宪法自然受到指责而被废黜。俄国兼并了相当于半个法国的大片领土，普鲁士获得但泽（该地很快发生起义）。[**勃兰登堡门**]

[721] 在西方，革命战争演变成几乎淹没整个大陆的巨大冲突。1792

[720]

勃兰登堡门（TOR）

勃兰登堡门是1793年柏林老城兴建的19个门之一。就在这一年，普鲁士王国卷入革命战争。它那优雅的多立克式柱廊模仿的是雅典卫城的门廊。顶上是“御天座”——一组巨大铜像立于“胜利战车”之上。这座门命定要俯瞰德国现代的各种重大悲喜剧。它目睹了1806年拿破仑进入柏林的盛大仪式，以及普鲁士国王、帝国皇帝、共和国总统和帝国元首的历次阅兵队伍从菩提树下大街滚滚而过。1871年，它欢迎从普法战争凯旋的军队回到这个当时被描述成“不卫生”和“不敬神”的城市。这个事件刺激了柏林作为德意志帝国首都的第一次重建。1933年，它迎接了总理希特勒。在1945年4—5月的柏林战役期间，它位于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分别指挥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这两支竞争部队的分界线。一天，当朱可夫军队的两名中士把一面红旗插上附近帝国大厦顶上时，科涅夫麾下第一波兰军的战士在勃兰登堡门的废墟上插上红白两色旗。1953年，它俯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东德工人的示威游行。1961年8月到1989年11月，它成为柏林墙所俘获的的中心区。

几个世纪以来，“御天座”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视为政治气候的风向标。1807年，它被运到巴黎。1814年复辟后，它被复原，但是与战车一起面向西方。1945年它被摧毁，只是到1953年才用旧模子制成一组新塑像重新安置。这一次共产党当局被说成有意使它面向东方。最终，到1991年柏林第三次重建时，在为重新统一后的政府做准备时，“御天座”稳稳地面向了西方。它的姿态不仅标志着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欧和西欧的关系。[1]

铜像或石像的象征姿态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例如，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的英雄耶拉契希将军（1801—1859年）的塑像最初是在十九世纪末竖立起来的，他那指控的手指明白无误地指向布达佩斯。1991年，它手指的方向改为贝尔格莱德。1993年，有报告说，它手指的方向再次调整，转向在克拉伊纳地区自立的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克宁。

年的战争使法国患上深刻的恐惧，促使革命领袖们先是废黜了国王，然后又致力于一场无限度的战争。先是法国侵入奥地利领土，很快又

转变为普奥军团挺进法国。但是，不伦瑞克公爵的高调政治宣言并没有以有力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普鲁士军队进展缓慢，乃至当时与魏玛分队同行的歌德有时间对加农炮弹造成的心理效果进行试验。1792年9月20日，当瓦尔密战役打响，他们被“革命炮火”打退时，他们还在距离前线20英里的阿戈讷森林里面。以后，战争供养了革命，革命又供养了一场成功的战争。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时，革命军队在尼德兰后退，然后夺取了萨瓦。他们前进、前进、再前进，行进了近二十年。

革命战争的进程通常被人们按照三次主要的反法同盟（1793—1796年，1799—1801年，1805—1814年）来描述的。这是一种误导，因为每一次反法同盟都迅速瓦解，而战争在两次同盟的中间期还在继续。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些欧陆列强提供了盟军的主力。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同盟的主要组织者英国人及其伟大的军事大臣小威廉·皮特（1759—1806年）的旨趣相一致。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说有不止三次同盟，而是有五次、六次甚至七次同盟。英国的那些同盟伙伴反复地遭到入侵和占领。英国则偏安海岛，没有遭受蹂躏。这场冲突既包括军事领域，也涉及经济领域。有几次它超出了欧洲范围，显示了一些全球洲际战略的迹象。

1793—1796年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表明，把这些盟国聚在一起是多么困难。俄国正忙于消化波兰，因此不出力气。普鲁士处于同样的原因也退出战斗。只留下奥地利任由法国军队对其所属的尼德兰和北意大利进行毁灭性的攻击。1795—1796年，西班牙改变立场，英国变成孤家寡人，仅有一支躲过灾难的海军。法国人在摧毁国内反革命的同时，开始在国外扶持革命政权。荷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1794年）是其中的第一个。法国还开始提拔才智出众、精力过人的年轻将领。其中第一个就是拉扎尔·奥什（Lazare Hoch，1769—1797年）将军。他征服了莱茵地区，粉碎了朱安党叛乱，一度准备夺取爱尔兰。

在东方，尽管遭到第二次瓜分，波兰一立陶宛依然拒绝投降。1794年初，出走的柯希丘什科再次归来，3月24日在克拉科夫的市场广场宣读了“起义令”：“为了民族自治……为了普遍自由。”5月，[722]他发布解放农奴宣言。他领导手持大镰刀的农民在拉茨瓦维采战胜了俄国正规军（4月4日），与旺代人在绍莱的胜利遥相呼应。人民法庭将主教、俄国间谍和塔尔哥维查联盟分子判处死刑。这里最终成为一场公开的革命：各国君主必须采取行动了。华沙被普鲁士从西面包围，两支俄国军队从东面挺进。10月10日，在马切约维采，柯希丘什科负伤落马，据传说（误传）喊了一句：“波兰完了”。苏沃洛夫猛

攻华沙东郊普拉加，屠杀当地居民。他向圣彼得堡送了一份只有三个词的报告：乌拉，普拉加，苏沃洛夫。他收到的回复也只有三个词：太好了，陆军元帅，叶卡捷琳娜。[**王室档案**]

[723]

王室档案（METRYKA）

1795年，在镇压了波兰一立陶宛共和国之后，俄国军队把被征服国家的国家档案运送到圣彼得堡。其中包括波兰王国的“王室档案”（Metryka Coronna）。这套记录包括中世纪以来王室办公厅发布的所有的法令、法规和特许状的副本，此外还有立陶宛大公国和马佐维亚公国的类似文件集成。由于目录和索引均被拿走，因此华沙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丢失了什么。在整个十九世纪，波兰历史学家无法像普鲁士或俄国历史学家那样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结果在国外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波兰在欧洲历史上就像今天这样处于边缘地位。

200年来人们一直在鉴别、拼凑和尽可能地寻找波兰遗失的档案。有些部分是在1815年以后归还的，更多的部分是在1921年里加条约之后归还的。还有许多是用各地的散件拼凑的。1945年苏联红军再次抢走了所有相关的资料，只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有选择地公布了一些。任何独立的研究者都不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查找沙皇时代或苏联时代的档案。[1] [**掠夺物**]

关于始于1440年的“立陶宛王室档案”（Metryka Litewska）的命运，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一位美国学者做了详细的说明。她借助十七世纪瑞典入侵华沙后整理的部分目录副本，编写一部便利西方学者的苏联档案指南。她不惮辛苦地查证了被俄国档案人员重复登记、胡乱编排和存放的各部分档案中的大部分。[2] 但是，在被掠走两个世纪之后，立陶宛王室档案的主要部分还存放在圣彼得堡。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政府的呼吁犹如对牛弹琴，因为俄罗斯联邦正式宣布继承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档案中所有涉及“俄国历史”的文件，“不管它们存放的地点以及形式上的所有权。”[3]

训练有素的西方历史学家习惯于强调必须查找文献资料的工作原则。在可以接触到文献资料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忠告。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则，而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当局十分清楚的原则：谁掌握了文献，谁就能够控制它们的使用和解释。

这一次，按照不应该再有波兰人及其共和国的设想进行了第三次瓜分；连波兰人形式上的认可也不要了。普鲁士夺取了马佐维亚和华沙，将这一地区称作“新南普鲁士”。奥地利夺取了另外一大块土地，称之为“新加利西亚”。俄国为自己争得了相当于英格兰领土面积的一大块土地。最后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条约附有一个秘密协定：

> 鉴于必须消除一切能够唤起波兰王国的记忆的东西……签约各方一致同意……绝不把波兰王国的名称或称号加进自己的头衔里。从现在到将来，那些名称将永远弃之不用。[36]

这时，包括戎马倥偬的波拿巴，西欧任何人都会有波兰命运不公的想法。俄国确立了自己是革命死敌、君权卫士的名声。波兰人过去扮演的角色是良好政府的顽固反对者。现在他们则要向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的法国军队提供数量最多的外国连队。

1796—1797年意大利战役是督政府针对奥地利的属地发动的。当时奥地利因同盟伙伴失利而陷入孤立。这次战役是波拿巴将军在国际舞台的初次亮相并因此而著名。他比奥什将军小一岁。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在阿尔卑斯滨海山脉前线的衣衫褴褛的法国军队就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这位年轻的将军对他们说：“意大利方面军的士兵们，我要带着你们到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去。你们将找到荣誉、名声和财富。难道你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吗?”在12个月的时间里，铁蹄踏遍了整个意大利北部。波拿巴的战术才能第一次是1796年5月10日在洛迪桥展露出来，使他获得了战略支配地位。他随后解放了米兰；围困曼图亚，在里沃利被粉碎奥地利的抵抗。通向卡林西亚的大路已经敞开了，维也纳只能等候敌人来犯。**[格里伦斯坦村]**

波拿巴表现出对所有与战争相关的事情都有兴趣。凡是暴动兵变都遭到迅速而刻意残酷的镇压。在进入帕尔马大公国领土时，他要求立即交出全部艺术珍宝。这个政策旨在使卢浮宫的艺术品收藏成为世[724]界之最。在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之前的谈判中，他坚持自己决定条款而不向巴黎请示。这类行为使他占了国内政客的上风。

1798—1799年的埃及战役是督政府为了打破英国的殖民地和商业霸权而发动的。如果法国能够在中东站住脚，就能削弱英国与印度的[725]联系，为建立法国在整个地中海的统治而铺平道路。战争始于夺取马耳他，继之有4万人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尽管战胜了埃及统治集团马木路克，但形势发生逆转，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摧毁法国舰队（1799年），俄国和土耳其建立战略同盟。这是一系列类似的包抄英国方案流产的先例：这些方案包括在加勒比海（1802年）包

[724]

格里伦斯坦村（GRILLENSTEIN）

1797年，有一个男孩出生在奥地利瓦尔德维特尔地区格明特教区格里伦斯坦村一个农民织工的家庭。我们不清楚这个家庭的姓名，但是他们的生活周期可以根据教区记录加以重构（见原书附录Ⅲ，第1292页）。1817年，这个男孩已经20岁了，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六岁的女人，最晚到12月这对新婚夫妻有了自己的小孩。这时，这户人家似乎成了勒普雷（Le Play）所说的主干家庭的完美例子：由一个51岁的祖父主持的家长制的三代之家。[格罗森米尔]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第二年（1818年）祖父就退休了，让妻子和两个未婚的年轻女儿与自己在一起，把家长的位置让给儿子。他继续在附近干农活维生，直到12年后他再婚并离开这里。

因此，从1818年起，这户人家就与主干家庭模式毫不相像。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那个男孩承担起全部责任，不受父母权威的约束，但是有退休的父母做后盾。他的家庭在扩大，又生了3个孩子，但是也遭遇一系列死亡：大儿子（1821年）、母亲（1826年）、最小的新生女儿（1827年）。在他的父亲和未婚妹妹们离开后（1830年），为了填补这些损失，他只好接纳一系列的织工及其家庭和几个佣人。到1841年，这时他最大的孩子21岁，这户人家包括三个非亲非故的家庭——户主家庭和两个老织工家庭，后者刚刚取代了两个单身妇女及其私生子。人可以想象这里会有多少麻烦。[1]

这个例子是历史学家选出来的，旨在说明根据标准的社会学模式来得出普遍结论是多么危险，同时指出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动态变化。家庭生活周期显示了家境的起落变化。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各个时代欧洲各地的农民生活十分重要。

抄英国，用极低的价格出售路易斯安那以实现在美国包抄英国（1803年），甚至在澳大利亚包抄英国（1804年）。一切都毫无成效，因为正如波拿巴在陆地上一样，英国皇家海军证明在海上是无敌的。1799年8月波拿巴离开埃及，进行了雾月十八日的政变，夺取了法国的统治权。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似——是他所统治的那个地方的外国人。他生于科西嘉岛首府阿雅克肖。在他出生前一年，路易十五从热那亚手里买下这个岛屿。当他作为士官生被送到法国接受军事教育时，他既无财富，也无权势，而且还不能娴熟地运用法语。他长成一个身材矮小却坚毅自信的年轻人，在他浅色的皮肤下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并不久远的土著“血亲复仇”传统。但是法国是“一匹狂野的牝马”，有待驯服：

> 哦，直发的科西嘉人！在穑月的艳阳下
> 法兰西是多么美妙！
> 她是一匹桀骜不驯的牝马
> 还未套上铁嚼和金色缰绳。[37]

这位直发的科西嘉人因革命而改变了一生。革命使他在24岁时成为炮兵将军。他目睹了攻占杜伊勒里宫时的混乱场面。但是，他随后请假回到科西嘉帮助他的兄弟。如果不是全家因当地的动乱而被赶走，他可能就留在那里了。1794年，因为他曾在小罗伯斯庇尔领导下在土伦战斗，所以他一度被热月党人逮捕，而且申请加入奥斯曼帝国苏丹参谋团也遭到挫折。但是，1795年10月王党暴动时，他恰好在巴黎。他用“几发榴霰弹”就拯救了国民公会。

此后，这位一度受怀疑的炮兵军官就一帆风顺了。1796年，他被任命为那支衣衫褴褛的意大利方面军司令。他正确地意识到巴黎政府的命运建立在前线传回的捷报上，从而以同样的速度成为自己政治上司的主人。那些自身难保的督政们公开地向他献殷勤。1798—1799年他离开巴黎远征埃及反而加强了他的地位。雾月十八日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使他成为法国的实际独裁者。当时人们的恐惧只能由一个绝对的外来者加以排除。从此，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在他自称为了自卫而进行的40场浴血战斗中，拿破仑一往直前，从不回首顾盼。在同样暴发的元帅们——贝尔蒂埃、马塞纳、麦克唐纳、缪拉、苏尔[726]特和内伊——和同样暴发的杰出大臣们——塔列朗、古丹、富歇和克拉尔克——的簇拥下，他毫无闪失地坐在这匹法兰西牝马上。

当这位科西嘉骑手驾驭法兰西时，他给它套上的是科西嘉家族制度以及整个波拿巴家族：约瑟夫成为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国王；吕西安成为卡尼诺亲王；路易成为荷兰国王；热罗姆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埃利莎、波利娜和卡罗利娜也都成为女大公、公主或王后。他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的克里奥尔人，一个被处决的贵族的遗孀）的婚姻没有任何子嗣，以离婚告终。他的波兰情妇玛

丽亚·瓦莱夫斯卡生了一个儿子，但不被承认。他的第二个妻子奥地利的公主玛丽—路易丝在1811年生了一个儿子，即拿破仑二世、罗马王。此时，在“穑月的艳阳”上空，乌云正在聚集。这位全欧洲的君主已经在考虑入侵俄国。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拿破仑是“一个不讲道德也依旧伟大的人”。[科西嘉]

1799—1801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可能是保罗一世促成的。这位新沙皇急于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国军队收复了原属于奥地利的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接着波拿巴重新恢复了平衡。但是，保罗一世突遭暗杀；大陆上的同盟失去了核心；英国再次孤家寡人地面对法国。盟国与法国签订吕内维耳条约（1801年）后，继之而来的是英国签订的亚眠和约（1802年）。

第二次同盟垮台后，波拿巴能够居高临下地进行清理工作。他扩大在意大利的侵占区域，包括皮蒙特、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为了镇压海地的起义，他派遣了一支远征军（以失败告终）；他入侵德意志，促成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并且在布伦开始征召一支英国人军队。他甚至开始再次计划对他的主要敌人实行战略包围。1805年3月30日他写信给波斯皇帝：

法国皇帝波拿巴向波斯皇帝费思·阿里致敬！

我有理由相信，主宰各国命运的神灵希望我支持你维持强大帝国的努力。

波斯是亚洲最高贵的国家，法国是西方的帝国之首……

但是世界上还存在其他帝国……那里的人生性贪婪、嫉妒，从不安分。俄国人厌倦自己的那些荒漠，侵入到奥斯曼疆域的最远部分。英国人命定生活在一个富不敌贵国一个小省的岛屿上，他们却正在印度建立一个霸权，而且无疑在日渐强大。正是这些国家在窥探和恐惧……[38]

拿破仑对亚洲国家的高度重视并非毫无诚意。在埃及战役期间，他曾经说过：“欧洲是一个鼹鼠丘，所有的大帝国和大革命都出现在东方。”[39]但是，欧洲事务很快就插进来了。

1805—1814年的第三次同盟是皮特的最后一个外交杰作，也是怀着决一胜负的目的组织起来的。但是，决一胜负的时刻姗姗来迟。在海上，英国在特拉法尔加角的胜利（1805年10月21日）导致了海上的绝对优势，使法国再也没有机会进攻英国。在陆地上，拿破仑却依[727]次彻底摧毁了各个敌手。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导致了奥地利的

彻底失败和俄国的退却；1806年的耶拿战役和奥尔施泰特战役导致了普鲁士的全面覆灭；1807年的艾劳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导致了整个俄国军队的大溃退。在18个月里，维也纳、柏林和华沙被一一占领。至此，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在涅曼河的一只浮筏上，与俄国和普鲁士签订和约（1807年7月）。英国第三次茕茕孑立。[**斯拉夫科夫**]

[727]

斯拉夫科夫（SLAVKOV）

斯拉夫科夫，意为“光荣之地”，是捷克南摩拉维亚州首府布尔诺以东15英里远的一个小镇。1805年12月2日，它当时以德文名字奥斯特里茨，成为“三皇之战”的地点。此役大捷是拿破仑诸多胜利之中最辉煌的一次。

在奥俄联军的进逼下，拿破仑以退却来吸引敌人。有三支联合纵队在晨雾中进击法国军队右翼。拿破仑宣布：“当他们转向我的右翼时，他们就把侧面亮给我们。”

达乌元帅带着部队刚刚用48小时从90英里之外的维也纳方面赶来，在一天之内打退了四倍敌人的主要进攻。到上午10点，大雾消散，著名的“奥斯特里茨的太阳”开始散射光芒。法国军队夺取了普拉岑高地，从这个制高点他们可以用大炮扫射战场的各个部分，把敌军切割成两部分。在法国近卫军击退了俄国近卫军后，俄军开始溃退了。法军炮火击碎低谷湖泊的薄冰，切断了主要的退路。走在15万人留下的2万具尸体以及同样多的俘虏之间，拿破仑品尝着自己最美妙的时刻。他对幸存者们说：“你只要说‘我曾到过奥斯特里茨’就足够了。”[1]

格罗、韦尔内、卡列、热拉尔都画过这场战役。也有诗人颂扬它。但是所有的刻画都比不上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第三卷中的描写：

> 当太阳喷薄而出……用它那耀眼的光芒照射田野和雾霭的时候……他从美丽而洁白的手上脱下一只手套，用它给几个元帅打个手势，发出开始行动的命令。[2]

今天，与滑铁卢一样，奥斯特里茨也是一个火车站，连通法国的南部和西部。军事史学家现在更关注的是普通士兵的经历与感受而不是将军们的作战方案。[3]但是，正是这些重大战役决定了谁是其他一切的主人，而那一切构成了历史。

但是，英国的活动不仅确保了战争的延续。通过皇家海军的封[728]锁，英国进行了一场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下属所有国家相对抗的商业战争（见下文）。此外，1808 年英国派遣一支军队赴西班牙北部，对抗拿破仑刚刚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占领，这样就把伊比利亚半岛的内战国际化了，把小阿瑟·韦尔斯利造就成“钢铁公爵”，给拿破仑造成一个重要牵制——这是拿破仑从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彻底根除的。

已经奄奄一息的反法同盟的成员国历经艰难曲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重新振作起来。1808 年，意大利部分地区像西班牙一样展开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1809 年奥地利废除与拿破仑的协定，结果是在维也纳视线之内的瓦格拉姆再次遭到惨败。1810—1812 年，普鲁士开始躁动，最初是进行秘密的地下抵抗活动。与此同时，俄国越来越讨厌与法国的关系，担心拿破仑重建波兰—立陶宛的计划，而且与其他国家一样，对大陆体系的限制感到恼火。拿破仑正在走向自己权力的顶峰。[**紫罗兰**]

[728]

紫罗兰（VIOLETS）

1810 年这一年内，拿破仑就向香水制造商夏尔丹订购了 162 瓶他最喜欢的橙花油科隆香水。在一封著名信札里，他曾经请求约瑟芬在他们见面前的两个星期内不要洗澡，好让他享受她全身的自然芬芳。当她去世时，他在她的坟墓周围种了紫罗兰，而且后来一直戴着用那里的紫罗兰做的鸡心盒子。[1] 他有毫不遮掩的恋香癖。

气味，“无言的感觉”，“嗅觉维度”在历史上触目皆是，尽管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2] 有一种理论认为，男性的性冲动是由女性的“鲱鱼—海水”气味刺激起来的，产生游回到海洋出生地的欲望。[3] 龙涎香、海狸香、麝猫香、麝香等等天然香水构成了自古代以来奢侈品贸易的最大项目之一。中世纪有寻香热潮，有进香朝供，有 165 瓣玫瑰，有处女的花朵。法国革命散发着巴黎露天排水沟的气味。二十世纪则散发着战壕和集中营的死尸的恶臭。现代主义的时代散发的是工业污染和 1922 年第一个人工合成乙醛夏奈尔 5 号的气味。

在1792—1812年这20年间，欧洲地图和国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革命军队带来了三种疆域和政治变化。

[729] 首先，革命军队在各个时期都在扩大法国的疆域，兼并了尼德兰、德意志、瑞士和意大利的大片领土。到1810年，从共和国的83省增加到帝国的130省，人口达四千四百万。埃纳河、阿列河、奥德河等系列之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如“易北河口”（汉堡），“辛普朗（山口）”、“蒂布勒”等。随着一次次的兼并，法兰西帝国的法兰西性质逐渐减弱。（见原书地图，第1291页）

其次，一批新的国家建立起来。每一个都与法国有着密切联系，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标准宪法和法国式的行政机构。这些国家包括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1804年），由此转变而成的荷兰王国（1804—1810年），伊特鲁利亚王国（1801—1805年），莱茵联邦（1806—1813年），贝格大公国（1806—1813年），威斯特伐利亚王国（1807—1813年），华沙大公国（1806—1813年），意大利的五个共和国，所谓的（北）意大利王国（1805—1814年）。[伊利里亚]

[730]

伊利里亚（ILLYRIA）

与拿破仑时代许多昙花一现的创造一样，1809—1813年的伊利里亚省在正式废除后依然长久地散发着魅力。在附属于法国人辖下的意大利王国时，它们包括从的里雅斯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一长段亚得里亚海岸以及卡林西亚、卡尔尼奥拉、伊斯特里亚、斯洛文尼亚、斯拉沃尼亚和克拉伊纳等重要部分。它们的法国总督驻在省会卢布尔雅那（莱巴赫）。摆脱哈布斯堡统治后的短暂自由足以点燃两个长期坚持的运动。一个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伊利里亚主义”运动，还有一个是要求归还的里雅斯特和阜姆（里耶卡）的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见原书附录Ⅲ，第1231页）

1815年以后，该地区的特殊性质受到重视，哈布斯堡的统治是以一个分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形式复辟的。这个实验到1848—1849年的动乱走到了尽头，当时克罗地亚省长、耶拉契奇将军带领军队参加镇压匈牙利民族起义的战争。经过一些拖延后，克罗地亚获得的奖赏是，在哈布斯堡的匈牙利王国内享有广泛的自治。

“伊利里亚主义”最初是在1830年代活跃起来的运动，旨在保护哈布斯堡领地内的所有南斯拉夫人、抵制愈益增强的外来文

化统治。[1] 强行规定马扎尔语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官方语言的举措，使之进一步发展。但是从十九世纪中期起，以卢布尔雅那为基地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复兴逐渐地与以萨格勒布（阿格拉姆）为基地的克罗地亚人的民族复兴分道扬镳。斯洛文尼亚人于1867年以后在二元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得以安身，精心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斯洛文尼亚语——在宗教改革以后这种语言已经有了固定的文字。[2] 相反，克罗地亚的领袖们选择加入一个塞尔维亚文化激进主义群体，与他们一起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文学语言，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们是以所谓的“什托卡夫斯基”方言为基础，用“什托”而不用“卡”或“卡伊”作为表示“什么”的单词。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强调自己对罗马天主教的忠诚（与塞尔维亚东正教相反）和用拉丁字母书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来强化自己独立的民族身份。[3] 到1918年，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南斯拉夫人运动中显示出既分立又联合的民族性。这二者在南斯拉夫国家的形成中起了突出的作用[4]（见原书第979页）。[**克拉巴特**] [**马其顿**] [**萨拉热窝**]

1945年以后，虽然重新构建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完全从属于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还是争取在联邦内获得与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黑山）、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相同的自治地位。斯洛文尼亚是最小但最富有的一个共和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奥地利相似。1992年，它率先赢得独立。克罗地亚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获得欧盟的支持，它的主权宣言先是导致了与塞族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残余部分的战争，接着又导致了波斯尼亚的肢解（见原书第1124页）。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新生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是否不会像它们曾经归属的却已经被人遗忘的伊利里亚行省那样昙花一现。

[731]

第三，拿破仑后期在征战之后，也允许一些原有的国家继续存在，但是对其边界做了重大修改，对其内政实行严格控制。这样的国家有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葡萄牙。

逃过拿破仑开明专制的革命性改造的欧洲地区只有英伦诸岛，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领地。除了这些例外，整个欧洲发生急剧变化，扫除了传统秩序，让各地人民尝到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时间短暂。[**布布莉娜**]

各地人民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或主动进行变革，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有些地方，他们显然是欢欣鼓舞的。例如，荷兰和瑞士有

着根深蒂固的共和派分子，他们主动寻求法国的干预。人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布鲁塞尔、米兰和华沙等城市会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在其他地方，对法国的态度则是由暧昧而逐渐转向敌视。拿破仑善于高谈解放，但是拙于落实。解放农奴、实行共和政府等的好处必然被日益加重的赋税和无情的兵役负担所抵消。在一些国家，尤其在西班牙，法国人的出现引发了恶性的内讧。欧洲许多在理论上支持革命的人民发现它在实践中极具压迫性。

拿破仑统治下的尼德兰引领着法国在外国的试验路线。巴达维亚共和国（1794 年）让位给路易·波拿巴统治的荷兰王国（1806 年），然后整个尼德兰被法兰西帝国直接吞并。关于民族权利的革命观念也感染了瓦隆人、佛莱芒人和荷兰人。在以后几十年里，他们要脱颖而出。

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用了若干年几经曲折才定下一种格局。波[731]拿巴最初在 1797 年的安排被第二次反法同盟颠覆了，但是在后来的战争中又被恢复和扩大。1797—1799 年形成的五个共和国——伦巴第的西萨尔平共和国、热那亚的利古里亚共和国、那不勒斯的帕尔瑟佩共和国、卢卡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成为革命秩序的旗舰。此外还有一些更短命的实体，如匹昂比诺公国，伊特鲁利亚王国等——它们在 1805 年以后或者并入法兰西帝国，或者并入那不勒斯王国，或者并入为拿破仑的继子欧仁·博阿尔内设立的（北）意大利王国。废除教皇国，粗暴对待教皇，都使当时的舆论大为震惊，在天主教国家里面反应尤其强烈。庇护六世（1775—1799 年）曾斥责人权，后来被剥夺了世俗权力，在法国的监控下死于瓦朗斯。庇护七世（1800—1823 年）曾经宣布基督教并非与民主不兼容，后来却因宣布革除所有（未指名的）"彼得遗产的抢劫者"的教籍而被法国人拘捕了五年。拿破仑时代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意大利的民族情绪，同时也导致了心怀恐惧的保守派与新一代的自由派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革命战争期间，德意志与意大利相似，经历了多次的组建和破坏。1790 年代，由于普鲁士从最后两次瓜分波兰所获得的果实而酝酿着重大变化。在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 年在位）统治下，普鲁士曾经冒险与波兰—立陶宛建立联盟。但是俄国的强权逻辑马上就把普鲁士拉回原来的轨迹。到 1795 年，柏林获得了但泽和华沙，治下的居民有 40%是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还有为数众多的犹太人。普鲁士五分之一的人口是移民的后代。E.T.A. 霍夫曼（Hoffmann，1776—1822 年）在华沙的短暂统治并非逝水无痕。这位《幻想篇》（1814 年）的作者曾担任新南普鲁士的主要行政官。他为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区杜撰了一些常常是异想天开的德国名字。如果普鲁士能够

[732]

布布莉娜（BOUBOULINA）

1801 年，雅典附近伊兹拉岛的一位年轻寡妇，与邻近斯派采岛的一个船主德米特利奥斯·布布利斯结婚。她的父亲在俄国支持的奥里奥夫伯爵起义之后曾被奥斯曼当局逮捕。她本人与秘密组织“友谊社”有联系。“友谊社”是以伊斯坦布尔的法纳里希腊人郊区为基地。她来自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群岛，但是东正教使当地人有一种希腊认同感。当布布利斯被海盗杀害后，拉斯卡里娜·布布莉娜（Laskarina Bouboulina，1771—1825 年）成为自强自立的女富商和希腊民族运动的重要支持者。[1]

在独立战争期间，布布莉娜亲身投入斗争。她建造了一艘战舰“阿伽门农”号。该舰参加了多次战斗。她骑着一匹白马英勇地奔驰在战场上，送去子弹和食物，也送去勇气，人称“船长”。在围攻纳夫普利翁时，她指挥军队封锁要塞、杀戮奥斯曼卫戍部队。但是，她也一直为人所诟病。不喜欢她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偶像下令杀害土耳其和犹太妇女以抢夺她们的珠宝首饰，她还销铄纳夫普利翁的大炮来卖钱。

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妇女爱国故事。伊庇鲁斯地区的苏利村特别受到尊崇。1801 年，村里的男人被奥斯曼当局抓走后，妇女和儿童聚在悬崖边上跳扎龙格舞。每个妇女轮流领舞，然后跳崖殉难，无一苟且。现代希腊的女学生还在表演这个舞蹈，从台上跳到一叠垫子上。她们边跳边唱扎龙格的歌曲：

> 鱼儿不能生活在陆地上，
> 花儿不能开放在沙滩上；
> 苏利的女人不能理解
> 没有自由还怎么活着。

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像布布莉娜这样的女民族英雄。同时代的波兰贵族妇女埃米莉亚·普拉特尔（Emilia Plater，1806—1831 年）女扮男装，在与俄国人的战斗中牺牲。这种形象在今天被视为偏离了女性主义的核心观念。

布布莉娜没能看到希腊独立。她被杀害了，但不是被土耳其人，而是被一个暴躁的邻居。在一次争吵中，他从自家窗户里举起一支毛瑟枪，击中了她的心脏。

连续而不中断地发展，很难想象普鲁士的历史会是怎样的。就当时的情况看，旧普鲁士被拿破仑压碎了，新普鲁士——1815年在重构的疆域上重新出现——是一只完全不同的野兽。

拿破仑统治下的德意志是法国击败第二次反法同盟、坚决打破神[733]圣罗马帝国的产物。这个过程始于1803年。当时一系列教权国家实行世俗化，112个帝国城市和公国分别划归巴登、普鲁士、符腾堡和巴伐利亚。1804年，有350个帝国骑士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同时有一些更重要的王公则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哈布斯堡的弗朗西斯获得了奥地利皇帝的头衔，他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同侪则自封为国王。1806年，德意志西南地区的16个王公组成了莱茵联邦。该联邦有义务向拿破仑提供军事援助。他们的领袖，“邦君之长”是卡尔·特奥多尔·弗赖赫·冯·达尔贝格（1744—1817年）。他是美茵茨大主教和法兰克福公爵。由于这些变化都违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皇帝的地位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1806年8月，拿破仑很轻易地安排了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清算。在同一年里，在耶拿战役后，普鲁士崩溃了。国王退到柯尼斯堡。萨克森加入了莱茵联邦。1807年，在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在普鲁士的西部领地为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建立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但泽变成自由市。普鲁士的其他地方，包括柏林，依然处于法国占领之下。除了纽伦堡书商J. W. 帕尔姆（因撰写小册子《论德意志的奇耻大辱》而被法国人枪杀）和普鲁士轻骑兵少校费迪南德·冯·席尔（1809年领导自己的团队进行了一场仓促的起义）外，几乎没有什么烈士。

但是，拿破仑时代的经历使得许多古老的特殊主义被打破，为德意志统一的民族身份奠定了基础。拿破仑曾经嘲讽地说，德意志总是处于“要成为什么”而非“是什么”的过程中。但是，他做了许多除旧布新的事情。1810年，在法国占领期间成立的柏林大学培育了新的思想。它的第一任校长是哲学家费希特（J.G. Fichte，1762—1814年），即爱国主义的演讲《致德意志民族》（1808年）的作者。1813—1814年的“解放战争”显得特别令人振奋。诗人、历史学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年）的《时代精神》（1806年）最先发出反抗的号召。他的歌词“德意志祖国在哪里?”被口口相传。据说他自己的回答是：“凡是用德语呼应和吟唱对天堂里的上帝的赞美诗的地方，就是德意志。”在这些年里，被迫流亡的普鲁士男爵冯·斯泰因造访了圣彼得堡，斥责拿破仑是“人类的敌人”。他提出了一个时机尚不成熟的德意志民族联邦方案。他写道：“德意志必须凭借着自己在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战略地位来自强自立。”这就是全德意志和中欧这两个概念的基石。[高加索]

[734]

高加索（CAUCASIA）

有一种观念认为，欧洲各民族都属于一个起源于高加索的白人种族。这种观念的最早提出者可能是格廷根大学的学者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年）。虽然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它注定要流传许久。

从小受《圣经》和希腊古典作品熏陶，欧洲人长期以来习惯把高加索作为他们祖先的故乡。《创世纪》里关于大洪水的记载说："方舟停在阿拉拉特山上"（创世纪，第八章，8:4）。阿拉拉特是亚美尼亚在《圣经》里的名字。关于金羊毛和普罗米修斯的传说都与高加索有关。但是，高加索的民族和种族成分极其复杂（参见原书附录Ⅲ，第1298页），认为他们是纯正种族来源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比较明显的高加索亚人种，如所谓的类亚美尼亚族群，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都不占有很大比例。

布鲁门巴赫是比较解剖学、尤其是头盖测量学的先驱者。一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是"五大种系说"。这是他对自1798年起30年间公布的各种颅骨进行研究的结果；[1] 后来这种理论变成一种流行观念。根据布鲁门巴赫德的体系，高加索人代表了欧洲人，是人类最高级的人种。当这位教授研究人种学时，他得到了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一个颅骨，认为它是人类最完美的标本。[2]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政府还在援引高加索人种概念来制定社会政策和进行社会统计，确实异乎寻常。在南非，直到1991年，荒谬的白人种族观念渗透进实施种族隔离的压迫和歧视性法律。

除了白色"高加索人种"外，布鲁门巴赫还确定了棕色的"马来亚人种"，黄色的"蒙古人种"，黑色的"尼格罗人种"以及红色的"亚美利加人种"。他的五大人种说比居维叶的简单的白棕黄人种说赢得更广泛的接受。居维叶男爵（G.L. Cuvier，1769—1852年）是法兰西学院的比较解剖学家。

稍后，肤色人种分类法又覆盖上一种彻底的种族等级观念。其中，欧洲的白皮肤民族占据最高位置。这种发展最初是由维克多·库特（Victor Courtet，1813—1867年）推动的，但是最有影响的论证是约瑟夫—阿瑟·德·戈宾诺伯爵（Joseph-Arthur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年）在《论人种的不平等》（1855年）一书中做出的。他写道："历史表明，所有的文明都出自白种人，只有维护创造文明的高贵种族的血统，社会才能伟大辉煌。"种族混杂导致

[735]

退化。"民族退化完全是由于他们经历了各种血统混合。"[3]

戈宾诺还写了一部波斯史，认为白种人是古代雅利安人或"伊朗人"的后裔。他传播了一种错误说法，即把"白种人"与印欧语系混为一谈。由此，他把荒谬的雅利安人标签变成了早先同样荒谬的高加索人种论的伙伴和竞争对手。

"白种人"、"高加索人种"、"雅利安人"和"欧洲人种"都体现了长期以来为欧洲居民的种族构成寻求一种排他的、因而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共同性质。它们也是一大批可疑词汇中的一部分。那些可疑词汇还有"黑人"、"亚裔"、"闪族"和"拉美人"等，把生理、地理和文化标准无可救药地混淆在一起。

欧洲居民内部生理特征的多样性促使许多人尝试着画出人口构成或地区族群的边界。亚麻色头发的"北欧人"[4]（纳粹意识形态所采用的说法）、"伊比利亚—凯尔特人"、"大西洋—波罗的海人"（把英国人和荷兰人、北方日耳曼人混在一起）、"中欧人"（包括大多数日耳曼人和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内）以及浅黑的"印度—地中海人"，所有这些说法都会在流行的工具书中碰到。比起曾经流行的把每一个现代民族都塞进一个特定种族概念的做法，这些说法虽稍有改进，但依然是想入非非（参见原书第 817 页）。即便如此，像"海岛人种"、"日耳曼人基因"或"波兰血统"还没有从民间俗语中消失。更不用说充斥着欧洲民间语言的"丹麦肤色"、"红发爱尔兰人"或"黑狗"、"白雪女士"等说法。

现代基因科学进展很快，把十九世纪先驱者的方法和结论都甩在身后。在这方面，最关键的进展是 1953 年 DNA 机制的证明。一般说来，科学进展所强调的是人类所共有的大量基因物质以及基因中所包含的大量特征密码。[5] 从 1956 年到 196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系列宣言中谴责自布鲁门巴赫、戈宾诺以来曾经流行过的主要的种族神话。[6] 种族和血缘的差异并非不予考虑。但是人们要清扫地基，以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因素上，在得到验证的科学原则基础上进行更精妙的基因分析，并且最终消除长久以来对肤色和颅骨的纠缠。

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陷入混乱的泥淖。1807 年法国的远征最初仅仅是因葡萄牙与英国关系密切而对葡萄牙施以惩罚。但是，法国在西班牙驻军并且把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硬塞到西班牙王位上，在西班牙引起了普遍愤慨。从此，法国方面遭受了重重磨难。葡萄牙人坚守在托里什韦德拉什前线的壕堑里，英国人从科伦纳的基地出发突

袭，马德里和许多省会都掌握在反对派的手里，许多农村地区被游击[736]战争所控制。法国人发现，占领西班牙的代价日益增大。1808—1809年，拿破仑亲自出马，使法国占领军日渐窘迫的命运暂时有所好转。但是，他不能久留，而他的副手苏尔特和马塞纳所赢得的每一次胜利都反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1812年，被围困在加的斯的反法自由派，为重建一个有限君主制而通过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1813年，亲法派成功地使原来的君主费尔南德七世复位。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此时，威灵顿正在顺利地征服整个比利牛斯半岛。[**游击战**]

拿破仑统治下的波兰是一个激情亢奋与沉痛失望交织之地。1806年12月，拿破仑抵达波兰，然后创建了华沙大公国。这使得波兰人兴奋不已；但是这些变化没有达到人们对恢复共和国的期望。1809

[736]

游击战（GUERRILLA）

1808年6月，在攻陷科尔多瓦后，法国将军杜邦带着大批战利品向安杜哈尔和莫雷纳山口撤退。途中他中了埋伏。包围他的不仅有安达卢西亚的正规军，而且有安达卢西亚的农民武装团伙。后者追击着他的退却部队。他带着22000人缴械投降。这件事表明，占领西班牙要比入侵西班牙难得多。

在整个半岛战争中，法国军队面对这两种战争。一种是与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正规军的主要战役，另一种是游击战，即对付出没无常的农民武装团伙的“小型战争”。第二种战争实际上是特别险恶的。游击队避免公开作战，特别愿意搞伏击、夜袭和突袭哨兵。被他们激怒了的法国人对平民进行集体屠杀。他们留下了这个名称 guerrilla，后人用它来称呼所有模仿他们的人。他们向世界显示了小规模的坚定的战斗队伍如何能挑战具有优势的职业军队。

拿破仑时代西班牙的游击队有许多的后继者，不仅仅有殖民地战争的民间英雄和拉丁美洲的山林革命者，而且在欧洲也有门徒，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爱国者和（法国）“游击队员”（maquisard）以及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如爱尔兰共和军、自由巴斯克）。[1]

惟一重大争论是游击队的发明权。在法国史学界，这种发明权不是属于西班牙游击队，而是属于“让·朱安”及其追随者，也就是那些早在法国军队开进西班牙10多年前就公开蔑视共和国政府的威力的那些法国人。[2]

[737]年，奥地利第二次战败，把克拉科夫交给大公国；但是接下来法国没有采取任何举措来帮助收复但泽、立陶宛或被俄国兼并的省份。波兰志愿军参加了自1796年意大利军团起各个阶段的革命战争。但是由所谓的"巴约讷数额"（指拿破仑在巴约讷用年俸750万法郎"换取"西班牙国王退位）所象征的恶性财政勒索，常年的兵役、死亡和伤残，加剧了普遍的不满。拿破仑从未袒露他对波兰的最终意图，甚至到1812年他短暂地控制了几乎是波兰历史上的全部领土时也守口如瓶。他的神话在他死后的浪漫主义时代比他生前更动人。当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在"民族大会战"（莱比锡战役）的尾声策马跃入埃尔斯特河时，拿破仑的这位最忠实的副手以此表达了一个受了太多的欺骗而疲惫不堪的民族的绝望。

大不列颠虽然免遭法国占领，但是也被革命战争动摇了根基。的确，当抗击外部敌人时，国内也不时地出现革命前景。1797—1798年，斯皮特黑德与诺尔（泰晤士河上一个沙岛）的海军哗变与沃尔夫·托恩领导的爱尔兰联合会的起义交织在一起，形势极其紧张。当然，与法国的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也阻碍了政治改革。例如，在托恩失败后，1801年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合并，但因所承诺的天主教解放推迟了三十年之久，错过了大好时机，使二者的联合严重受损。与此同时，由于海军的接连胜利，由于法国入侵的威胁（只有1798年在爱尔兰的最边缘变成实现），英国人的团结极大地增强了。由于小皮特和他的雄辩对手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年）之间慷慨激昂的交锋，国会的威望也得到提高。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商业、殖民地和经济实力一直在积聚。抢夺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地的名单越来越长。在国内，《原则圈地法案》（1801年）大大加速了社会变革的步伐。尽管战争还在继续，但喀里多尼亚运河（1803—1822年）还是破土动工了。1811年，在诺丁汉发生了最早的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同一年，老国王最终宣告自己长期精神错乱，让自己的儿子摄政。摄政时期（1811—1820年）被证明是英国建筑业、赞助事业和高雅社会最辉煌的一段插曲。

斯堪的纳维亚也躲过了革命，但没能避免相关的动乱。瑞典两次卷入对俄国的战争。1788—1790年，在斯文斯昆德海战胜利后，它没有受到伤害。1808—1809年，它先失去了芬兰，在接下来的惨败中又失去了国王古斯塔夫四世（1792—1809年在位）。1809年的宪法规定了有限君主制，拿破仑的一位元帅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1763—1844年）应邀接受王位，成为查理五世。他加入反法同盟，参加了德意志的解放战争，从丹麦那里拿走了挪威。[挪威]

[738]

挪威（NORGE）

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之时，由于丹麦一直明显地支持失败的那一方，挪威的领袖们冲破了400年丹麦的统治。1814年5月17日，在位于克里斯蒂安尼亚附近的埃斯沃尔德召开的议会上宣布挪威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立宪君主国。宪法基本上仿照西班牙1812年宪法制定的。丹麦总督克里斯蒂安·腓特烈（Christian Frederick）被一致推举为自1389年以来挪威的第一位国王。

但是埃斯沃尔德议会没有得到瑞典的承认，也没有得到丹麦国王的承认。自从1809年失去了芬兰，瑞典就一直想得到挪威以作为补偿。而丹麦国王单方面地承认了瑞典的要求。但是，瑞典军队在王位继承人贝尔纳多特的率领下已经进发去贯彻协定了。经过两个星期的战斗，挪威人被迫接受一项妥协。在一个瑞典—挪威联合王国内，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宪法和独立的议会，但不能保留自己的国王。这个安排被写进一个联合法令里，而且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确认。

从此挪威的民族运动在文化上是反对丹麦文化的统治，在政治上是反对与瑞典的联合。任何压力都不能使挪威人觉得应该放弃他们的宪法；围绕着对外政策、国旗、尤其是瑞典国王的权力争吵了90年，使这种联合早已变了味道。有一次，因为超越权限，整个挪威内阁在国家宪法法庭面前受到指控，首相被判罚款。瑞典政府最终听任挪威发布第二次独立宣言。丹麦王子查理被一直选为国王，于1905年11月25日进入首都。国王采用哈康六世（Haakon VI）的称号，恢复了首都的原名奥斯陆。经过磨难，埃斯沃尔德议会的意志最终得以实现。[1]

但是，丹麦竭力维持一种中立政策，却两次受到英国的无情报复。在伟大的改革者雷文特洛乌（C.D.F. Reventlow，1748—1827年）[738]的领导下，丹麦的启蒙运动获得许多成就，如解放农奴、赋予犹太人公民权、实行贸易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依然不能使国家免于邻国的欺凌。1801年4月，据说纳尔逊用他那只瞎了的眼睛看望远镜，不接受要求停火的信号，致使丹麦舰队在哥本哈根覆没。1807年9月，哥本哈根被英国人包围，被迫投降。此后，由于丹麦人转而全心全意发展与法国的联系，因此受到贝尔纳多特和维也纳会议的惩罚。

巴尔干地区不在法国直接影响范围之内。惟一被法国人占领和管[739]

辖的地区是所谓的伊利里亚行省——主要是现代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伊利里亚**] 但是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气息吹遍了每一个角落。希腊受到强烈影响。1799 年，在俄国帮助下建立了“七岛共和国”[**七岛**]；当帕特农神庙的大部分建筑雕塑被运出雅典时，立刻引起民族情绪的爆发。[**掠夺物**]在塞尔维亚，1804—1813年和

[740]

七岛（HEPTANESOS）

1799 年 3 月，科孚岛上的法国驻军向乌沙科夫元帅领导的俄土远征联军投降。科孚岛是“七岛”，即爱奥尼亚七岛中最大的岛屿。根据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 年），爱奥尼亚群岛由前威尼斯共和国交给法国。俄军攻占科孚岛是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引发的极其罕见的俄土合作的结果。一旦站住脚，俄国就抛弃了奥斯曼盟友，并且创建了一个模范的“七岛共和国”：它有议会和由沙皇亚历山大的主要大臣恰尔托雷斯基大公设计的宪法（1803 年）。[1] 这种慷慨施舍的目的在于超过“革命的”的法国，建立未来希腊国家的核心。这种安排只延续了 4 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见原书第 733 页），爱奥尼亚群岛转归法国。1809 年以后，它们才一个个地由英国舰队所夺取。

英国的统治被证明还不如俄国所扶持的政府那么开明。一部强加的宪法赋予总督压倒一切的权力。一小伙权贵控制了咨询议会和压迫性的殖民地土地占有系统。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的主要目的是遏制群岛居民想并入希腊的愿望。1848 和 1849 年，凯法利尼亚爆发农民暴动，总督亨利·沃德在镇压时实行大规模的抓捕、拷打和处决。当时帕默斯顿正在谴责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人是“最野蛮的畜生，却自称根本不配的文明人”，奥地利将军海诺被伦敦人塞进马槽里，因此，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把沃德描述成“爱奥尼亚群岛血腥的海诺”。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这不过是帕默斯顿粗暴处理唐·帕西菲科事件（1850 年英国和希腊的一次争端——译者注）的一个小前奏。[2] 迟至 1859 年，根据英国专员格莱斯顿的建议，群岛与希腊的联合事宜被一笔勾销。但是到 1864 年，这又在与希腊达成全面协定时作为一个挽救面子的姿态予以承认。在这场危机中，爱丁堡公爵艾尔弗雷德拒绝接受希腊王位。英国君主政府最终又把爱丁堡公爵这一空缺的封号授予了生于科孚岛的一位希腊流亡王子，这算是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吧。[**哥达**]

[741]

掠夺物（LOOT）

1799年，英国驻奥斯曼宫廷大使埃尔金（Elgin）爵士游历雅典，获得了帕特农神庙建筑雕塑的最精致的部分。帕特农原来被当做军火库，因一次爆炸而造成严重损毁。也没有人想修复它。埃尔金会说，他与奥斯曼当局的交易是合法的，而且是具有公益精神。但是雅典人反对这种行为。一位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希腊领袖发出不得将希腊宝藏卖给“欧洲人”的警告。他后来写到：“说到底，这是我们所捍卫的东西。”[1]

“埃尔金大理石雕塑”是大英博物馆的珍贵展品的一部分；有些人认为它们是英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2]（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把英格兰“巨石阵”的巨石运到雅典，人们也可以同样说它们是“希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欧洲许多画廊和博物馆都是在对其他民族或个人进行劫掠的过程中修建的。十七世纪，瑞典从德意志、波希米亚和波兰抢走了大量的艺术品和贵重物品。拿破仑是卢浮宫最热心的赞助者(见原书第722页)。他从埃及掠夺来的考古文物有许多又被英国人掠夺走了。俄国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核心收藏品很大部分是从波兰运来的。埃尔金爵士到雅典的那一年，苏沃洛夫将军的军队抵达意大利，随队有一些训练有素的文化商人小组。沉重的政治权力通常都伴有轻盈优雅的手指。

二十世纪，纳粹通常被认为是盗窃艺术品的大师。戈林自认为是一个艺术行家；希特勒曾经是学绘画的学生，他计划在他的家乡林茨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艺术中心。克拉科夫、巴黎、佛罗伦萨、根特、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许多中小城市都遭到全面的洗劫。满载掠夺物的火车源源不断地从东方运往帝国。到激战结束时，在奥地利的阿尔特奥塞的一个废弃的盐矿，人们发现数以千计的欧洲最伟大的艺术珍品。[3]

但是，纳粹的抢劫还只是故事的一少半。纳粹并没有教授俄国人如何抢劫。战争结束50年后，红军从德国抢劫者那里抢劫的成批的前辈大师作品和其他的德国掠夺品都开始在俄国曝光。例如，1991年在莫斯科发现了迈锡尼时代的所谓金制“阿伽门农面具”，16000件特洛伊出土的“普利阿摩斯宝藏”（由谢里曼带到柏林的）。[4]这些“战利品”和“特殊发现”被秘密存放在艾尔米

塔什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扎戈尔斯克修道院达半个世纪之久，除了“克格勃”和极少数保管人员外，无人知晓。它们大部分原属于私人收藏，如布达佩斯的赫尔佐格和哈特瓦尼的收藏，阿姆斯特丹的科尼希的收藏，曼海姆的克雷布斯基金会的收藏。这里所说的涉及上百万艺术品。与大英博物馆一样，问题是要说服俄国的发现者，发现和持有是两回事。

[742]

其他盟军也不能不受怀疑。柏林的“莫扎特收藏”在战争期间为了安全而送到波兰，至今在克拉科夫大学图书馆而没有返还柏林。1990年，在得克萨斯的一个车库，发现了“奎德林堡珍品”中的一批无价之宝，包括一本公元九世纪用珠宝装饰的熠熠生辉的德国圣经。而这个车库原属于一个前美军中尉。[5]

当然，1954年海牙公约所确认的“文化财产”的法律概念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发明。[6]

1815—1817年两次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也得到俄国支持。在罗马尼亚两公国，1806—1812年俄国的占领和随后比萨拉比亚的割让，引起了极大反感，完全是给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布布莉娜**]

俄罗斯帝国正处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的统治之下。这是其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之一。亚历山大的父亲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濒于精神错乱；他的国内政策出自于胡思乱想，如对贵族和官员恢复使用体罚；他的对外政策也是随心所欲，翻云覆雨。因为他想拥有马耳他骑士团，便脱离了第二次反法同盟；1801年，他莫名其妙地与英国决裂。他被几个醉醺醺的军官杀死。此后，亚历山大决心与拿破仑长期对抗。在他青年时代的朋友、现在成为主要大臣的恰尔托雷斯基大公（Adam Czartoryski，1770—1861年，波兰贵族，曾经被叶卡捷琳娜扣为人质）的指导下，他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明智的态度。他从广阔的视野来考虑欧洲的重建，表现出对立宪君主政体的优越性的真诚关注。[40]他兼并了芬兰，使之成为一个自治的大公国；解放了波罗的海诸省的农奴；在20多年的时间里，把西部所兼并的波兰—立陶宛地区变成了以维尔诺的大学和文化教育区域为中心的开明的社会文化试验的舞台。[41]他还奠定了国家教育体系的基础，建立了从此成为沙皇政府中心机关的（咨询）国务会议。俄国几乎不可能实施激进思想；但是直接接触过波兰、意大利乃至巴黎的这一代俄国军人也不可能不成为一个骚动之源。

拿破仑战争并没有阻挡俄国向东方的领土扩张。从 1801 年兼并格鲁吉亚起，俄国开始了此后 60 年对高加索的征服活动。1812 年，就在拿破仑逼近莫斯科之时，一支俄国探险队在北加利福尼亚海岸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殖民地罗斯堡——比美国开拓者抵达这一地区要早 30 多年。[42] [**加告兹人**]

[743]

加告兹人（GAGAUZ）

在俄国 1812 年占领比萨拉比亚之后不久，这个沙俄的新省就吸引了一股移民浪潮。其中有一批被称作加告兹人的巴尔干基督徒。他们的原居住地是现在的北保加利亚。他们定居在科姆拉特地区，即现在的摩尔达维亚。他们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古兹语支，在中亚有相近的语言。他们的宗教是属于斯拉夫教派的保加利亚东正教。他们离开自己先人的故乡是出于恐惧还是更多地怀着希望，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一些加告兹穆斯林群体留在了奥斯曼统治的保加利亚。

关于加告兹人的早期历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他们是中古时期的突厥人，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保加利亚化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突厥化的保加利亚人，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后还保持着原来的宗教。这两种观点都与事实不符。[1]

加告兹人是东欧一些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2] 伏尔加河流域的穆斯林鞑靼人就包含着一个接受了洗礼的少数族群。他们接受了征服者的宗教。俄语称他们为"克列申"（即"受了洗礼的人"——译者注）。北高加索的车臣人主要是穆斯林，但也包括一些基督徒。阿布哈兹人也是同样情况 [**阿布哈兹**]。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在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都是多数（见原书附录Ⅲ，第 1310 页），在马其顿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少数族群。[**马其顿**] [**阿尔巴尼亚**]

在罗多彼山脉两侧，在保加利亚和希腊边界的两侧，生活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操保加利亚语的穆斯林社群，被称作"波马克人"。他们的亲属联系远至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他们在希腊的存在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1876 年，可能是当地的波马克民兵而非奥斯曼的职业军队制造了格莱斯顿所谴责的"保加利亚惨剧"。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他们在随后保加利亚战争的恐怖中得到足够的报应。但是他们从未迁走。[3]

在波斯尼亚，宗教是把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东正教的“塞族”、天主教的“克族”区分开的惟一标准。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塞—克语”，所有的人都是斯拉夫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1991年占当地总人口44%）经常被民族主义的邻居看成是抛弃了天主教或东正教而信奉奥斯曼统治者的宗教的叛逆。事实上，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很多波斯尼亚家庭很可能是摩尼教徒。［**保加尔派**］

二十世纪晚期，这些原来不太出名的民族反复地成为欧洲的头条新闻。19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权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发动了一场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复兴进军”。清真寺被破坏，保加利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加告兹人、波马克人和土耳其人——被迫在改变自己的名字或移民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许多人选择了移民。1991年，当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时，克姆拉特的加告兹人（此时有20多万人）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车臣人大胆地举起了独立的旗子，在格罗兹尼宣布脱离俄罗斯，建立自己的民族共和国；伏尔加喀山的鞑靼人则在酝酿建立“鞑靼斯坦”。[744]

1992年，在南斯拉夫迅速瓦解之时，波斯尼亚政府宣布独立，希望能维持一个多民族共和国的完整。它获得了国际承认，但是没有得到重大的国际援助，也没有受到国际保护。西方慈善组织和象征性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存在根本不能遏制随之而来的抢夺地盘、集体屠杀和“种族清洗”的汹涌浪潮。一个自封的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以帕莱为首府）仿照那个自封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以克宁为首府）建立起来，而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是在克罗地亚原哈布斯堡军事边界地区建立的。在一年的时间里，占人口31%的塞族夺取了77%的领土。萨拉热窝与其他几块飞地一样被围困住。克罗地亚人的攻击把穆斯林从莫斯塔尔等西部杂居区赶走，而塞族则逃离中部穆斯林控制区。大概有二三十万人死于战争。世界领袖们在吹口哨，而波斯尼亚在燃烧。由于没有坚决的治国才能，共产主义的瓦解所带来的后果类似于将近200年前土耳其人撤退时的情况。［**萨拉热窝**］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大陆体系造成的紧张关系开始显露。这也是英国实行封锁的结果。由此促成了1812年3月沙皇与瑞典的联盟，也导致拿破仑把大约60万大军部署在沙皇俄国的西线。这种紧[742]张关系也造成1812—1814年不光彩的英美战争的主要争端。美国船

运业长期夹在英国和法国相互矛盾的规定之间；1807年，英国军舰“列奥波德”号上的军人登上美国船只“切萨皮克”号，造成严重侵犯。杰斐逊总统提出自己的“和平强制”和“不通商”条例，但很快就屈服于第12届国会中的“主战鹰派”的要求。美国的军队在加拿大没有赢得任何重要的领土，而英国也没能重新控制它的前殖民地。从后人的眼光看，想来有些奇怪，大陆体系既导致了华盛顿的行政官邸——从1814年起被称为白宫——的焚毁，也导致了莫斯科的焚毁。

拿破仑后来也承认，1812年的俄罗斯之战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他把它称作“波兰战争”，因为大多数战事是在波兰传统疆界内发生的，还因为如果取得成功就必然会引出波兰—立陶宛问题。拿破仑大军于1812年6日跨越的边界，只是在不久前才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在当地居民心目中，这是连接波兰和立陶宛的历史边界。[米尔]拿破仑面临着选择。一方面是进行一场政治战争：他可以利用军队来

[745]

米尔（MIR）

1812年，当拿破仑大军逼近时，普拉托夫将军撤到白俄罗斯，他手下的哥萨克把炸药桶放在米尔城堡的围墙下面，把这些围墙炸得粉碎。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途中，曾有几天把司令部设在这里。但是，11月10—11日，当沙皇军队杀回来时，在这里与撤退的法军进行了一场激战，使这里更加破败。

米尔在很长时间里曾经是波兰—立陶宛边界上的重要要塞之一，是欧洲最东边的封建城堡之一。它曾经是立陶宛大公的一个要塞，在1434年落入私人手中。大约在1500年前后，在立陶宛元帅杰尔泽一世和他的儿子杰尔泽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的伯爵统治时期，大兴土木，加固要塞。五个红砖砌成的高大堡垒由防卫墙联结起来。它们的外围使一个马蹄形的防御工事，四周环有壕沟。自1569年起，中央要塞被拉济维乌（M.K. Radziwiff）王公变成了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石工精细的辉煌王宫。直到1812年，它和附近的涅斯维兹是拉济维乌家族的两个主要基地。

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米尔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它于1395年遭条顿骑士洗劫，在十五世纪被鞑靼人两次袭击，在1655年被瑞典人占领，在1706年被查理十二焚烧，1794年被俄国人攻陷。

米尔最辉煌的日子是卡罗尔·拉济维乌大公，“帕尼·科羌库”（1734—1790年）时期。他在瑞典战争的蹂躏之后恢复了这座宫殿。它是这个由数以千计白俄罗斯农奴供养的巨大地产中的“核心”财产。天主教教堂和希腊东正教（东仪天主教派）教堂与犹太教会堂、鞑靼人清真寺比邻而立。每年一次的马市是由一个相当大的吉卜赛人社群主办的，他们的“王”在传统上是由大公来给加冕的。1761年，在大公国的法庭开庭期间，王宫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狂欢。1785年，这里曾接待了波兰最后一位国王。俄国的统治是从1793年第二次瓜分开始的。吉卜赛人立刻大规模地移居摩尔多瓦。拉济维乌家族离开这里，迁往他们在普鲁士的庄园。1812年以后，这里只留下废墟。

但是，米尔因密茨凯维支的史诗《塔杜施先生》而永垂不朽。这位诗人描述立陶宛的“最后的晚餐”时，对米尔王宫还记忆犹新。当地贵族对拿破仑的解放充满希望和善意。他们举办了一次华丽的宴会。绅士和女士跳起“波罗乃兹”舞。他们在犹太人扬基尔的铙钹伴奏下尽情享受。那个犹太人“像一个波兰人那样热爱这个国家”。最后，他们举起酒杯为古老的波兰祝福：“让我们彼此相爱！”

解放农奴，发动全体居民的反俄情绪。另一方面是进行一场纯粹的军事战役：其结果完全听凭战争的运气。他注意到，立陶宛的波兰人与华沙的波兰人有很大差别。因此，与在他之前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和在他之后的希特勒一样，他决定忽视当地状况，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毫不吐露关于政治前途的任何想法，只是敦促着穿过立陶宛进逼莫斯科公国的心脏。在莫斯科附近的波罗金诺，他取得了历次胜利中代价最大的一次胜利。他占领了莫斯科，但是城市及其大部分仓储都被焚毁。沙皇完全拒绝谈判，并且下令他的军队避免重大交火。[744]到11月饥寒交迫之时，拿破仑宣布撤退。绵延500英里的拿破仑大军备受折磨：俄罗斯的寒冬、哥萨克的袭击以及别列津纳河不合季节的泛滥。拿破仑乘雪橇逃到华沙，然后奔向巴黎。至于他的军队，在6月份渡过涅曼河的60万大军，只剩下二十分之一的人活下来，给人们讲述可怕的故事。这位皇帝曾经评论说：“所有的帝国都亡于好大喜功。”**[马莱]** **[救世主]**

1813—1814年的最后几次战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勤状况而不是由战场上的表现决定的。尽管1813年10月在莱比锡附近的3天“民族大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受到重挫，他还是赢得了后来大部分的战

[746]

马莱（MALET）

1812年10月23日凌晨3点，一个身着全副帝国将军制服，来到巴黎波潘库尔营房，要求紧急会见国民卫队指挥官。他自称拉莫特将军，是新任命的卫戍司令。然后，他宣布，拿破仑在莫斯科被杀死了，元老院紧急会议已经宣布成立“临时共和国政府”，国民卫队必须马上在旺多姆广场集合。在交给卫队指挥官一份晋升证书后，他命令卫队指挥官指挥其他部队，并负责释放两名政治要犯吉达尔将军和拉杜里将军。他的指示依据的是一份形式庄重的书面命令。

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拉莫特将军”在巴黎卫戍部队巡视，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拉杜里将军和吉达尔将军被安置在一家餐厅大享口福。但是，接到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临时政府的命令的高级军官，不少于13个。元老院紧急会议据称是在卢森堡宫召开的。但是负责卢森堡宫的军官根本没有看到。

当大部分国民卫队已经积聚在旺多姆广场上时，事情才开始不顺了。拉莫特在与胡林将军个别交谈时，要求胡林将军交权。他的命令受到抵制。他开枪击穿胡林的脑袋。稍后，在与另一批军官会面时，他被一个以前的战友认出来：“他不是拉莫特，他是马莱。”这个阴谋策划者被众人制服，解除了武装。

克劳德—弗朗索瓦·马莱（Claude-François Malet，1754—1812年）是汝拉人。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雅各宾信仰的准将。他因对拿破仑心怀不满而被监禁，早已被军队除名。他在狱友、坚持教皇权力至上的君主派分子拉丰神父的帮助下制订了计划，拉丰伪造了那些文件。马莱的妻子从戏剧用品商人那里租了一套制服。真正的拉莫特是一位共和派将军，正流亡美国。

马莱和拉丰在半夜翻越监狱院墙。马莱回家换上行头，然后去了波潘库尔。拉丰在复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军事法庭上，马莱独自承担了责任，但未能挽救那些被他欺骗的人的生命。他的最后要求是对行刑队下的开枪命令。[1]

马莱事件揭示了拿破仑帝国的真相。马莱准确地估计到，帝国的命运系于一个人的生命。在听到拿破仑去世消息的那一瞬间，没有人想到由罗马王或拿破仑家族继承王位。结果，法国几乎只需要有人开一枪就能回到共和政体。“小事件”可能会造成历史进程的重大改变。

[747]

救世主（SPASIT'EL）

1812年，为了庆祝俄国从拿破仑占领下解放出来，亚历山大一世发布敕令：为莫斯科修建一座献给基督救世主的教堂。这个方案是由尼古拉一世召集的一个委员会落实的。1837年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河畔开始施工。按照火车站建筑师康斯坦蒂·顿的设计，这是一个巨大的十字形教堂，顶上有五个圆顶，一个巨大的青铜炮塔和一个耸入云霄的十字尖顶。室内用422公斤黄金来装饰。钟楼里装配俄国最大的铜钟。外墙铺波多利亚大理石和芬兰花岗石。经过45年的施工，1883年5月26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出席了"基督救世主教堂"的落成仪式。

1931年7月18日，《真理报》宣布，一个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委员会决定在莫斯科河畔修建一座"苏维埃宫"。五个月后，基督救世主教堂被炸毁。1933年，斯大林支持约丰和舒谢夫的设计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建成一座415米高的大厦，比德国的帝国国会大厦的空间大六倍。顶上有一个列宁塑像，高度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三倍，仅食指就有六米长。

这个苏维埃宫一直没有修建。被炸毁的教堂的大理石板被用来装饰莫斯科地铁车站。经过30年的拖延，尼基塔·赫鲁晓夫下令把河畔的那个大洞改造成一个露天的、全天候的游泳池。[1]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不可避免地涌现出各种方案，主张重新开发这个地方，恢复基督救世主教堂的昔日光彩。

斗。但是，他面对着在他的帮助下形成民族意识的各国人民的意志，还面对着许多君主恢复自己君权的决心。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从东方推进，威灵顿从南方推进，已经势不可挡。法国年轻人的生命遭到无情的征用。在最后两年里，拿破仑丧失了一百多万人，他甚至[747]已经不能再用一场同心协力的战斗来捕捉他的对手。此时，皇帝被告知已经没有能够打仗的士兵了。1814年4月，英、俄、普大军进驻巴黎，拿破仑退位。革命战争乃至革命结束了，或者说，就这样消失了。

有人会认为这场革命战争的结果十分清楚。但是，在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眼里，盟军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写道："欧洲联盟的确最终战胜了法国军队，但是不能说法国在这场斗争中被击败了。"[43]当然他指的是法国维持了领土的完整，革命思想继续流传以及还会有惊人事件发生。

所有的人都认为，整个大陆的命运曾经危如累卵。拿破仑喜欢谈论“欧洲”。当他在提尔西特提到欧洲时，沙皇接过话题。亚历山大问：“欧洲，指的是什么?”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欧洲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意思是指掌权的王公)。1814 年春天，当他策马挺[748]进巴黎时，他说道：“我终于让法国与欧洲和解了。”这个和解的过程比预期的要漫长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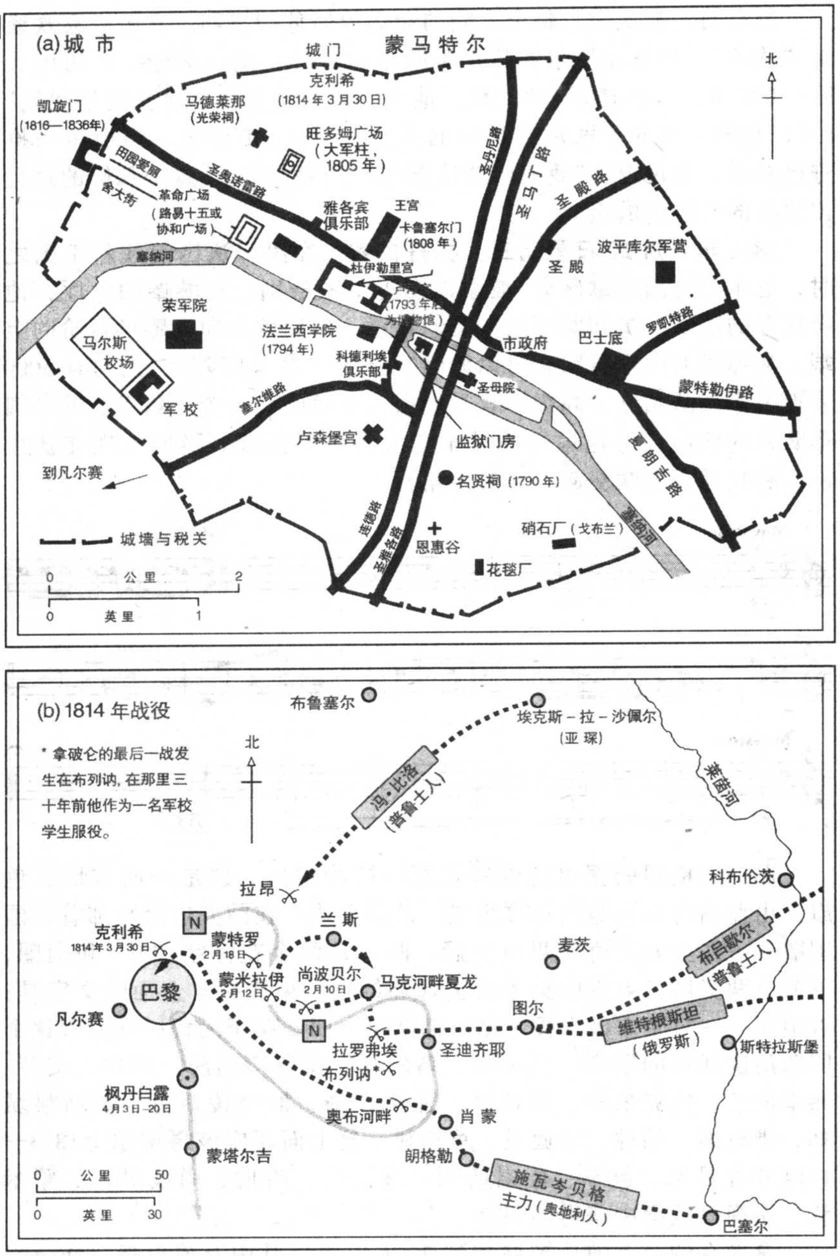
1814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枫丹白露。在离开法国前往新王国之时，厄尔巴岛国王拿破仑·波拿巴向近卫军告别。在城堡的大厅，他向仅存的随从人员和盟军的专员们致意。然后他走向马蹄形台阶的上端。从那里的大理石阳台可以俯瞰宽阔的“白马庭院”。大约有 5000 老近卫军列队站立。高级军官站在由一个旗队和一个乐队组成的半圆形队列的前面。送他远行的马车在大门口等候着。当他出现在扶栏前，骑兵号手就吹奏起《皇帝号角》:[44]



那一天检阅的军旗还保留在军事博物馆里。这是一面方形三色旗，由蓝白红三色竖向条纹组成，外镶金边。在前方边沿装饰着帝国国徽——在上方两角有两顶王冠，两边是两个花体字“N”和圆圈，下方有两只鹰，上方中央是由蜜蜂环绕的一束庄稼。上面的文字是：近卫军——皇帝拿破仑授予精锐部队第一团。旗子的背后覆盖着这个团队历次战役的勋章：马伦哥、乌尔姆、奥斯特利茨、耶拿、艾劳、弗里德兰、埃克米尔、埃斯林、瓦格拉姆、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城郊、维也纳、柏林、马德里、莫斯科。这上面还应该再增添上1813—1814 年在吕岑、包岑、德累斯顿、莱比锡、哈瑙、尚波贝尔、蒙米赖、沃尚等战役中获得的荣誉。

拿破仑的个人随从被缩减到 20 人以下。其中有德鲁奥（Drouot）将军，这位“大军中的圣贤”后来宣读拿破仑葬礼的演说词；贝特朗(Bertrand) 将军，他后来把皇帝的骨灰送回法国；巴萨诺公爵（Duke of Bassano)，他的外交大臣。文职官员有贝利亚尔（Belliard)、比西(Bussy) 和孟德斯君（Montesquion）等副官以及法伊男爵和洛尔涅·代

[749]



地图 21 革命的巴黎

[750]德维尔男爵，约阿讷骑士和秘书组。军事随员包括皇家卫队司令科萨科夫斯基伯爵（Kossakowski），龙骑兵司令奥纳诺伯爵（Count d'Ornano），两位军需官古尔高上校和拉普拉斯上校，地形参谋阿塔林上

校，波兰语翻译瓦佐维奇上校。老近卫军司令、但泽公爵勒费弗尔—德努埃特元帅骑在马上带着一队骑兵等候着，准备护卫着拿破仑的马车到布里亚尔。除了他以外，帝国的其他元帅没有一人到场。皇帝家族也没有一个代表到场。

珀蒂将军带领着旗队，下令开始检阅。军鼓敲击“走上战场”的鼓点。拿破仑走下台阶，走进队伍之中。虽然当时没有现场记录下皇帝的演说，但是珀蒂将军牢牢地记在心里：

军官们，士兵们，我的老近卫军们！我向你们告别。20年来，我有幸与你们在一起。我看到你们总是在光荣的征途上。

反法同盟把整个欧洲武装起来对付我。有一部分法国军队背叛了自己的职责和法国……有了你们，有了其他坚贞不屈的人们，我还能再打上3年。但是，那样会使法国遭殃，那就违背了我的初衷。所以，向法兰西已经选择的新君主效忠吧。不要遗弃这个最可爱的祖国，她已经受了很长时间的苦难了。

不要为我的命运担心。只要我知道你们是满意的，我就永远会感到满足。我本来会选择死亡的……但是，不，我选择了有尊严的道路。我将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写下来。[45]

此时，珀蒂将军举起军刀高呼：“皇帝万岁”，接着是雷鸣般的应和。

我无法一一拥抱你们，所以我将拥抱你们的将军，来吧，珀蒂将军……

在拥抱了珀蒂将军后，他说：“把鹰徽拿过来。”他亲吻了三次军旗上的鹰徽，并且说：“亲爱的雄鹰，但愿这些亲吻能够拨动所有勇敢者的心弦。”最后他说：“再见了，我的孩子们。”“这些头发已经灰白的战士多少次流血而面不改色，此时则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46]拿破仑大步跨上马车，气宇轩昂地坐在上面，驱车出发了。

枫丹白露宫在巴黎东南37英里处，是拿破仑最喜爱的官邸。它是1528年弗朗索瓦一世围绕着一个中世纪的狩猎塔楼兴建的。它透露了法国文艺复兴最早的气息。它被一片浓密的橡树和松树林环绕着，成为真正能够让人躲避喧嚣、心旷神怡之处。它没有凡尔赛宫那么森严，也没有被其他什么人的荣誉光环所笼罩。它的建筑是分布在一系列的庭院周围：椭圆庭院、亲王庭院、喷泉庭院、办公庭院，狄

安娜花园。白马庭院是在路易十三时期修成的，自1814年4月起作为“告别庭院”而闻名。枫丹白露宫内有许多艺术珍品，例如罗索[751](Rosso，1495—1540年）为宫内弗朗索瓦一世画廊所做的壁画装饰既有辉煌的风格，又适宜不太大的规模。那些主要是十六、十七世纪的装饰和附属设施后来配上了拿破仑自己收集的帝王家具。这座行宫曾经用来作教皇庇护七世的金丝笼，也见证了拿破仑和约瑟芬最幸福的日子。他曾经说：“枫丹白露的森林是我的英式花园。我别的都不想要。”[47]告别这个地方当然令人黯然神伤。

帝国近卫军体现了两个军事术语的本质：精锐部队（corps d'élite）和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它组建于1798年11月，当时是执政府卫队，后来逐渐扩大，直至变成军队中的军队。1805年它有大约5000人，分成四个兵种——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1809年，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老近卫军，由这些精锐中的老战士骨干组成，另一部分是青年近卫军，是新招募的和调转过来的。到1813年，它达到巅峰期，有近60个不同兵种的团，约50000人。

近卫军只接受最优秀的申请者。他们必须达到1.78米的身高，25岁，识字，必须参加过3次战斗。他们穿着华丽的军装，领到优厚的薪水，受到特殊的训练。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可以直接见到皇帝。他们有权被其他士兵称作“先生”。每个星期，只要有可能，他们的“小平头”（指拿破仑）都会巡视这些“大胡子”和“爱发牢骚的老兵”，这些“打不垮死不了的”战士。老兵中的骨干，“老战士中的老战士”，已经服役17年、20年甚至22年。他们可以与皇帝开玩笑。一个骑兵被问道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勋章。“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在埃及沙漠里曾经给你一个甜瓜。”“甜瓜，没有，没有……”“有过，是一个甜瓜，参加过17次战役，受过7次伤，在阿尔科拉、洛迪、斯蒂维耶雷堡、金字塔、阿克、奥斯特里茨、弗里德兰……”在他牺牲之前，他是帝国的一名骑兵，军饷为1200法郎。近卫军里有许多异乎寻常的外国人。在“老兵”的四个团里有两个团是荷兰人组成的。还有一些由意大利人组成的轻步兵连。一个骑兵团里有挥舞弯刀的马木路克，德国的执矛骑兵和立陶宛的鞑靼马。有三个骑兵团是由波兰执矛骑兵组成的，是“最忠实的”团队。

在好多年里，人们知道拿破仑一直不愿让他的近卫军在战斗中流血牺牲，除非是实施闪电袭击或者到了关键时刻。在波罗金诺战役中，他下令让他们后撤：“我不能让近卫军在远离巴黎300里格的地方毁掉！”但是，在以后的战役里，由于训练有素的战士在新兵中的比例越来越少，他毫不吝惜地使用近卫军。在1814年壮烈的撤退中，

他们一路血战。[48]

拿破仑在三个星期前抵达枫丹白露的时候，还满怀击败反法联军的信心。他的计划是，从他在香槟的防御阵地转守为攻，一下突进到敌人的交通线。但是，四处活动的哥萨克抓住了他的一个传令兵，发现了他“把敌人引开巴黎”的意图。[49]于是，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752]他发现俄、普、奥军队不是向他挺进、与他决战，而是突然联合夹击防御薄弱的首都。俄军挺进到罗曼维尔。普军在蒙马特尔架设起大炮。奥军沿塞纳河溯流而上，抵达沙朗通。反法联军25万人陈兵在首都的防御线外围。由拉古萨公爵马尔蒙（Marmont）元帅指挥的守卫战士站在他们的阵地上。英武的迪罗克（Duroc）曾在俄国丢掉一条腿，现在仍拒不投降：“你要能还给我一条腿，我就放弃我的阵地。”但是政客们忍受不了围困。市民们害怕遭遇莫斯科的命运。塔列朗向沙皇提出试探性的建议。3月30日，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带着皇后离开了首都。

拿破仑乘着四轮马车从圣迪济耶疾驰而归，一天之内赶了120英里的路程。与两年前他乘着轻便雪橇离开莫斯科一样，与他同行的是外交大臣、忠实的科兰古（Caulaincourt）。31日晚11点，他在距巴黎圣母院仅8英里远的“法兰西庭院”客栈换乘快马。在那里他见到一名法国军官，得知巴黎已经投降。这个消息来的十分突然。皇帝步行前往巴黎，但是路上遇到更多的溃散人员。他发现大势已去。早上6点，他精疲力竭地返回到枫丹白露，准备重新集结人马。3天后，即4月3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他在枫丹白露检阅了近卫军。1万名步兵和4600名骑兵听到他的训话：“几天后我将带你们进军巴黎。对不对？”他们齐声呼应：“进军巴黎！皇帝万岁！”

然而，身不由己的皇帝很快就放弃了所有的积极行动计划。他所遭受第一个打击是，得知帝国元老院批准了一个不包括他在内的临时政府，而且已经建议恢复波旁王朝。接着他又得知马尔蒙的部队已经倒戈，从而使继续抵抗变得几乎不可能了。法语由此获得了一个新词：raguser（由马尔蒙的公爵称号ragusa演变而成——译者注），意思是“背叛”。第三个打击是，他听到他的元帅们劝他让位给他幼小的儿子。麦克唐纳元帅对他说，把剑指向法国人，是不可想象的。内伊元帅宣布：“军队不会进军（巴黎）。军队将服从他们的将领。”[50]这些最勇敢的人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最后，皇帝发现，反法同盟再也不会接受4月4日提出的他（第一次）退位的条件。在这可怕的一周时间里，他越来越痛苦地认识到，能够流放就不错了。“崩溃”至此完成。

最苦涩的一杯酒是他的妻子玛丽—路易丝递给他的。皇后根本不顾他那些温柔的鼓励信函，对他早先的冷漠和不忠报之以利益的考虑。她的反应先是犹豫不决，然后是无情的冷漠。拿破仑最初设想，她会与他会合，要么在枫丹白露，要么在他离去的路上，与他一起流放。后来，他同意她应该去见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皇帝，为她的丈夫求情。结果证明，她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她去了维也纳，但是却与她的丈夫永远决裂了。

[753] 法国军队必须解除原来的效忠誓言。奥热罗元帅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特别令人心痛。他宣布："士兵们，你们的誓言因这个人的退位而失效了。这个人为了他残忍的野心而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却没有勇气像一个士兵那样死去。"[51]三色帽徽被换成了白色帽徽。

大浪淘沙方显出近卫军的本色。在他退位的夜晚，他们聚集在枫丹白露的街道上，手持火炬，高呼"皇帝万岁"。他不得不下令让他们回到营房里。他还收到波兰团队高级军官文森蒂·克拉辛斯基伯爵（Wincenty Krasiński）的一封让人感到温暖的信："元帅们临阵脱逃了。政客们背叛了你……但是你的波兰战士挺立不动……"[52]不过，即便波兰团队也发生了分裂。有三分之一的执矛骑兵留下来了。还有三分之一，主要是法国人，做猢狲散了。其余的1384人在索莫山脉之战英雄科杰图尔斯基（Kozietulski）的领导下，奔赴波兰。科杰图尔斯基最后向皇帝告别：

陛下，我们把武器放在陛下的脚下。这些武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凭借武力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我们这些波兰人曾经为这个世纪最了不起的人服役……陛下，请接受我们向……一位不幸的君主表达我们忠贞不渝的敬意。[53]

巴黎的政治活动是由元老院主席塔列朗操纵着。他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敦促联军发动进攻的匿名信号，是他幕后策划的；现在他在自己的住所招待沙皇。流亡的王党分子纷纷归来，波旁王朝的"股票"每天都在升值。现年59岁的普罗旺斯伯爵（路易十八）重归故里。他在外流亡了23年之久，辗转于科布伦茨、维罗纳、布兰肯堡、卡尔马、库尔兰的米塔瓦、华沙，最后5年在英国。就在拿破仑在枫丹白露打点行李的那一星期，他在白金汉郡的哈特韦尔收拾行装。他决心强调自己的世袭权利，否定元老院给他准备的宪法，但是他也打算颁布一部由他自己制定的自由宪章。由于他有美食家的名声，他被人们称作"好吃牡蛎的路易"。他是一个调和分子，不想更换整个帝国大厦。拿破仑的元帅和大臣们镇定地等待着复辟。俄军驻扎在香榭

丽舍大道。弗朗西斯皇帝驻在朗布耶。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驻在杜伊勒里宫。巴黎人出门就会见到各种奇异景象：梳着猪尾辫的普鲁士老掷弹兵，身着彩色服装的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士兵，身着锁子甲的切尔克斯士兵，巴什基尔骑射手。

正当法国与其前皇帝纠缠之时，欧洲其他地区正在适应他垮台造成的影响。1814 年时，消息传递很慢。4 月 10 日，威灵顿和苏尔特在图卢兹附近还在进行半岛战役的最后一战，他们都不知道拿破仑已经退位。直到 6 月英国一艘战船要求科孚的法国卫戍部队投降时，后者才知道局势的变化。在其他地区，拿破仑帝国的主要碎片已经散落。在东方华沙大公国已经被俄国占领一年多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754]君主国已经复原。莱茵联邦已经解体。在瑞士，旧体制已经恢复。在西班牙，费尔南德七世刚刚复辟。在尼德兰，奥伦治的威廉正在奋起反对把它从丹麦转交给瑞典。在意大利，拿破仑的附属国都被奥地利推翻。教皇庇护正在返回罗马的途中，他将回去恢复禁书目录和宗教裁判所。

英国免于大陆的兵燹之灾，正在沐浴摄政时期的胜利光芒。建筑师纳什（Nash）用一种奇异的仿东方风格重建布赖顿行宫。首相利物浦勋爵在谈到拿破仑时说："他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了。"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发表了第一部苏格兰高地风土人情的小说。乔治·史蒂文森在纽卡斯尔附近的基灵沃思煤矿改进第一台真正能运转的蒸汽机车。英语稍后从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那里获得了"节制生育"（birth control）这个术语（这句话可能有误，因为桑格是美国人，在一百年后的 1914 年公开宣传节制生育的方法——译者注）。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在贵族板球场开始了第一个赛季。民众对战后经济衰退的不满已经开始酝酿。英国与美国的战争逐渐偃旗息鼓，但还没有终结。

在艺术领域，1814 年是古典派艺术还如日中天，而浪漫派艺术正迅速崛起之年。这是 E.T.A. 霍夫曼的《幻想篇》，即他的幻想"故事"问世之年。在绘画领域，戈雅、安格尔和特纳都十分活跃。在音乐领域，年轻的舒伯特在谱写《魔王》；贝多芬完成了他惟一一部歌剧《菲岱里奥》。费希特在这一年去世了。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在这一年出生。

在复活节前一周，法国的政治又到了一个危急关头。4 月 6 日，盟军的专员抵达枫丹白露，实施修改后的退位诏书，拿破仑当时签署了诏书。

同盟各国既然宣称皇帝拿破仑是欧洲重建和平的惟一障碍，皇帝

> 拿破仑恪守自己的誓言，宣布他本人及其后嗣放弃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王位。为了法国的利益，他愿意做出任何牺牲，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54]

接下来的谈判导致了枫丹白露条约。该条约在11日缔结。据此，拿破仑保留自己的称号，获得两百万法郎的年金，拥有厄尔巴岛作为他的个人领地，还拥有个人的随从人员和卫队。

这一次，英国专员尼尔·坎贝尔与这位备受打击的皇帝长谈了数小时。

> 我看到面前是一个洋溢着生气的小个子。他像一头野兽一样在房间里急速走来。他佩戴肩章，身着蓝色马裤、红色高统靴、没刮胡子，没有梳头，鼻烟的颗粒散落在上唇和胸前……[55]

他们讨论了威灵顿在半岛的战役。然后，据说皇帝说："你们这个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我一直努力提高法兰西民族，但是我的计划失败了。这就是命。"[56]

[755] 当谈判结束时候，这位下台皇帝的内心危机达到一个高潮。他确信，他被自己的家族和元帅遗弃了。在把近卫军的指挥权交给内伊时，内伊对他说："我们都是你的朋友。"他却尖刻地回答："是啊，沙皇的朋友也是杀害他的凶手！"他派去见皇后的信使再通过盟军阵地时历经艰难。在奥尔良，青年近卫军站在皇后一边，帝国军需官把皇帝金库的剩余都藏在主教马厩的马粪堆下面。11日，拿破仑与科兰古一起吃便饭，后者是他与巴黎元老们的一个中介。他发现男仆把他一直放在床边的一对手枪的火药清空了。但是，他两年前在俄国差点儿被哥萨克捕获，从此就随身带着一小瓶鸦片。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吞下鸦片。毒药有点失效了。它足以让他因腹部痉挛而发出尖叫，却不能致命。科兰古带来一个医生。到第二天早晨，皇帝恢复过来。他说："一个人死在床上是多么不容易！"（直到1933年科兰古的回忆录发表，这段秘闻才披露出来。）[57]

13日，拿破仑向留在他身边的最后一位元帅詹姆斯·麦克唐纳（塔兰托公爵）告别。这位忠实的苏格兰人是流亡的詹姆斯家族的后人。最近他和科兰古一道与同盟方面进行关于退位的谈判。当他即将离开时，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坎贝尔上校已经来了。但是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拿破仑送他一把土耳其总督的礼品剑，纪念1799年的埃及战役："收下它，记住我，记住我们的友谊。"[58]

枫丹白露条约一签字，就开始为前往厄尔巴的旅途做准备。皇帝

将由四位盟军专员送到法国南部。这四位专员是坎贝尔上校、舒瓦洛夫伯爵、冯·科勒男爵以及特拉西斯·冯·瓦尔德伯格伯爵。他们将途径里昂和阿维农，最后抵达里维埃拉港口，一艘英国军舰在那里等候，准备用5天航程开到厄尔巴。在枫丹白露森林的罗斯尼埃尔仓库，有一组马夫和车夫再紧张地工作，清洗8辆护送马车，给马车打油，绘制皇帝徽章，装载20节行李马车，准备101匹坐骑和辕马。皇帝的家具和私人财产将装载100辆马车之多，随后运去。最沉重的物件将提前送到南部的布里亚尔，在第一天傍晚与皇帝及其随从人员会合。先行队伍在14日早晨就踏上蒙塔日大路了。

挑选随从人员的权利留给了皇帝。他获准配备30名官员组成的副官班子和600人的卫队。由耶尔兹马诺夫斯基将军从波兰骑兵中队里挑人组建了一个骑兵队，少数法国士兵和马木路克也获准加入。还有一组水手，一个由100名炮手组成的炮兵队以及一个由三个掷弹手[756]连队和三个轻骑兵连队组成的步兵营。这个营的战士是通过最后的面试才挑选出来的。

在最后一个星期六，拿破仑想对自己生命中的女人做一番了结。他给约瑟芬的信中写道：

在流放期间，我将用笔取代剑……他们永远背叛了我……再见了，我亲爱的约瑟芬。像我一样学会听天由命吧，不要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中抹去，这个人从来没有忘记你，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你。[59]

在给皇后玛丽—路易丝的信中，他使用敬体的“你”：

我亲爱的妻子，上天……发出了惩罚我的判决。我祝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安排……我很难想象命运是否还能让我们团聚……在对我的所有惩罚中，和你的分离是最令我痛苦的。我只有一个责难。为什么帝国没有用你所具有的那种母性来温暖我的心？你又怕我，又爱我……[60]

这些信没有发出。它们是几天后在枫丹白露拿破仑的书桌中发现的，还没有签名。

此后就无事可做，只是等待定在下个星期三的启程了。拿破仑又恢复了常态。他造成了许多麻烦。他有一两次像往常一样大发雷霆。他还破坏了专员们的午餐。他让男仆宣布他要光临他们的餐桌，因此让他们站着，然后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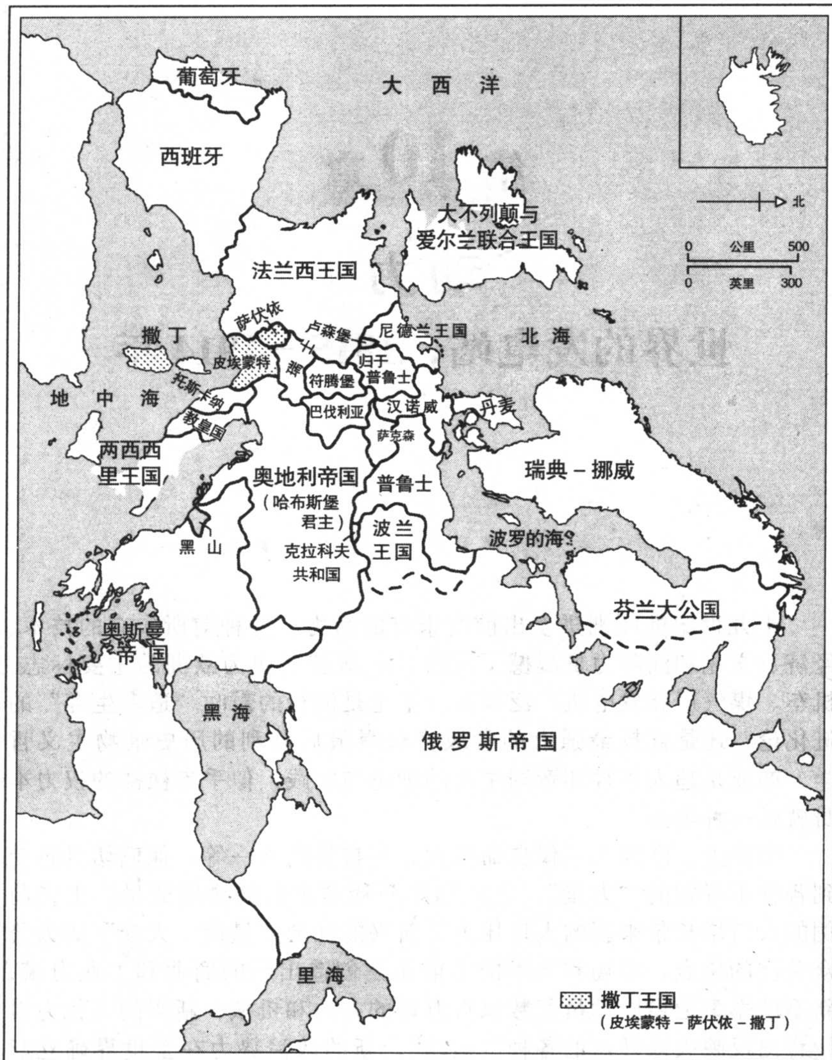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军人，拿破仑多次思考死亡和名声泯灭的问题。有一次

他问塞居尔元帅：在他死后，人们会说什么？这位大臣吟诵了一段悼念的颂词。拿破仑用高卢方式紧握他的手腕说："不，他们会仅仅说'哦'。"[61]

星期三早晨，拿破仑为了出席告别仪式而穿戴的非常简单。他是戏剧表演和控制时间的大师。他曾经解释说，历史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他指出："人们总有机会收复失去的地盘，但是不会有机会收复失去的时间，永远不会。"他必须品尝这个机会出演历史学家所说的拿破仑肖像系列中的"最后的晚餐"。他究竟穿的是近卫军轻骑兵的军便装——白色背心和马裤，外罩绿色短上衣——还是蓝色短上衣配蓝色紧身裤，有关记载说法不一。在所有的公开场面，他都脚蹬长统靴，腰间佩剑，胸前佩带一枚荣誉星章，头上戴着后边向上翻起的有名的黑色帽子。11 点整（有的记载说是时钟敲 10 下的时候），他匆匆走向门厅，然后走上大理石的台阶。

历史上有许多时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者标志着某个长治久安的政权或体系寿终正寝。这些时刻对于所有相关的人都是危险时刻，对于那些想剪裁自己的研究对象、以适应整齐的历史阶段划分的[757]历史学家也同样有危险，因为政权、社会和经济很少会像个体那样在一夜之间死去。即便在发生了明显的灾难性大崩溃的时候，延续的、惯性的力量总是要与变化的动力展开较量。拿破仑并没有去世。他还没有变成传奇人物。他向近卫军告别了，但这不是最后一次。

[758]



地图 22 欧洲，1815 年

第10章

动力

世界的发电站，1815—1914年

[759] 十九世纪的欧洲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种前所未有的技术、经济、文化和洲际力量震撼了欧洲。* 机械装置成为欧洲的主要标志，机车、煤气厂和发电机广泛普及。不论是流行的鼓吹“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还是宣扬最强大的阶级将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亦或是超人崇拜和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似乎赤裸裸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实际上，欧洲人不仅自命强大，还自觉高人一等。他们切身感受到各种不寻常的“力量”：电流和炸药释放出新的物质能量，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带来新的人口压力，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大众”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市场和技术的空前拓展创造出新的商业和工业力量，新型的军事力量则动员起数以百万计的人力和机械，新兴的文化力量孕育出反映大众呼声的各种“运动”，新的政治势力在全世界确立起从未受到挑战的霸权。

的确，十九世纪是欧洲凯歌行进的“实力世纪”。欧洲的领袖先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后几十年则是未能获取“有利境遇”、却使整个大厦崩塌的德国。所有未能适应或无法竞争的民族与民众——农民、手工织工、城市贫民、殖民地居民，被迫移民他乡的数百万爱尔兰人、西西里人和波兰人以及土耳其、奥匈和俄国等三个东

---

* 作者在此处及下文中多次使用power一词。译文根据不同语境分别译为“力量”、“实力”、“势力”、“能量”、“压力”、“强国”、“权力”、“政权”等。——译者注

方大帝国，则沦为欧洲的失败者和牺牲品。这个世纪的大幕在法国革命的余波中拉开，在俄国革命的开端中落下。在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自命为欧洲主人的拿破仑宣称权力就是他的情妇。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列宁宣布"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人们自然会认为，二十世纪的"力量"要远胜于十九世纪。说到[760]底，蒸汽和电力的能量无法与核裂变释放出的能量相比。飞驰的列车赶不上飞机和洲际火箭的速度。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虽然深重，却无法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极权暴政相提并论。关键在于，在十九世纪，力量即意味着奇迹和希望；到了二十世纪，力量却成为怀疑的对象。自工业革命到环境保护主义兴起的这段时间里，人们的态度已经转变。1805 年发现电流时，没有人怀疑电力的好处；核能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曾几何时，工业化和殖民主义被认为是前进了一大步。如今，人们充其量认为它们的后果祸福参半。

人们看待力量与速度的心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830 年，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开通了世界上第一趟旅客列车，这列时速 24 英里的"火箭"在途中撞倒了一名英国高层政治家，因为虽然有大量的警示信号，他根本没有当回事。1898 年，英国首次允许汽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但规定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 4 英里，以便一个手持红旗的骑马人可以在前边引导。如今，成千上万的人在德国高速公路上以 100 英里的时速奔驰，或乘坐时速 240 英里的法国高速列车和时速高达 1000 英里的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却不再关心速度。自十九世纪以来，力量与速度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而熟悉即意味着漠然。

大多数欧洲人自然并未意识到自己手中掌握了多么大的权力。野心勃勃地企图把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是轻率的，明智之举是小心翼翼地驾驭权力。早期的领袖英国人在处理大陆事务时如履薄冰，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缔造者奥托·冯·俾斯麦也是如此。这位铁血宰相把德国变成一个强国，而不是普遍的威胁。他最有名的格言"铁与血"（1849 年）和"血与铁"（1886 年），不是针对战争，而是就预算和社会事务而言的。作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熟谙政治领导本身的限度，不去追求"控制时局的趋势，只是偶尔地改变时局的发展方向"。歌德的警句说得好："智者以退为进"，"天才就是知道何时该停下来的人"。[1] 俾斯麦的继任者就不明白应当有所收敛。

与某些人预料的相反，欧洲与现代力量的冲突带动了基督教文化的复苏。"铁路时代"亦是基督教昌明的时代。传教士与工程师一道踏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身处迅速变化的世界，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渴望回到早先的虔诚与修行。面对冥顽不灵的机器，顺应日益高

涨的浪漫主义浪潮，人们越发认为必须恢复对神的信念，也更乐于接[761]受超自然现象，更渴望体验“生命的奥秘”。在面临死亡时，人们并不反对把生命之旅看成是“心灵铁路”上的旅程：

救世主以天国的真理
铺就了通往天堂之路，
铁道线从凡间通向天堂
终点是永恒的生命……
上帝之爱的火焰、真理的动力
驱动机车和列车。
所有意欲开始光荣之旅的人
必能接近救世主，与他同坐在
头等、二等以及三等车厢
悔悟、信仰和神圣……
来吧，贫穷的罪人，时候到了，
在铁道线的任何一站，
只要你忏悔并摆脱了罪恶，
列车就会停下，捎带上你。[2]

十九世纪初，欧洲面临十分严酷的环境。只有在革命战争结束时形成的政治和国际体制内，变革的动力才能发挥作用。而1815年的惊人事件极大地扭曲了这一体制。

1815年2月，就在维也纳会议未能达成协议之际，革命的妖魔再次从瓶中脱身。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在之后的“百日时期”，欧洲不得不再度面对革命战争的幽灵。这一事件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1814年时，获胜的列强的政治倾向是谨慎的，到1815年它们已彻底倒向反动。在此后几十年中，这种反动的政治倾向造成了压抑的氛围，一旦出现任何变革的征兆，便会立即遭到镇压。

因此，“百日王朝”震撼了整个欧洲。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只身在昂蒂布登陆。三周之内，他在多菲内翻越阿尔卑斯山，把受命“将他送回牢笼”的内伊元帅争取过来，凯旋进入巴黎，路易十八被迫逃亡海外。三个月之内，拿破仑改组了军队，从巴黎出发前去进攻聚集在北部边境的反法联军。拿破仑的战略很简单，在反法同盟联手对付他之前，就把他们各个击破。6月16日，他在利尼击败普鲁士人，但未能阻止普鲁士人秩序井然地撤退。6月18日，他大胆地攻击布鲁塞尔附近的英国人。在伤亡惨重的一天时间里，威灵顿勋爵“薄弱的红色防线”抵挡住法国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傍晚时分，

布吕歇尔的普鲁士骑兵出现在地平线上，横扫了法国人。这是拿破仑的第60次战役，此后他终于退出历史舞台。6月22日，他再度宣布退位。7月15日，逃亡到罗什福尔的拿破仑向英国皇家海军“柏勒罗丰”号的梅特兰舰长投降。他被带到普利茅斯，后被流放到遥远的圣赫勒拿岛。这一次他再也未能逃离。他在岛上撰写回忆录，预言欧洲将在十年之内落入“哥萨克或共和党人”之手。按照塔列朗的说法，[762]拿破仑之死“甚至不成其为一件大事，只是一条新闻而已”。[生态]

滑铁卢战役后，列强重新聚首，怀着一种历经磨难的心态召开维也纳会议。我们不能指责战胜国列强的代表在维也纳会议上像前一年一样以“舞步代替进步”。他们不愿再冒任何风险。首先，他们认为革命极大地威胁到君主政体，因而决意恢复这一神圣制度的各项权利。在恢复君主政体的过程中，列强很少关注民主和民族诉求。战胜国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不惜损害战败国的利益来补偿不满的国家。一个由39个邦组成的德意志邦联取代了莱茵同盟和神圣罗马帝国（见原书附录Ⅲ，第1299页）。普鲁士获得萨克森半部，以抵偿其一直急切要求的阿尔萨斯、洛林和华沙。奥地利放弃对尼德兰的领土要求，得到北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作为补偿。联省共和国失去好望角，补偿则是奥属尼德兰。瑞典失去芬兰，得到挪威。俄国对芬兰、立陶宛和波兰东部的拥有得到确认，还获得华沙附近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沙皇可以成为该国国王。英国获取了从黑尔戈兰到锡兰的众多岛屿。那不勒斯、马德里和都灵复辟了一批过时的君主国，却未能重建古老的共和国。正如沙皇亚历山大所说：“共和国已经不再时髦。”只有克拉科夫共和国是一个例外，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都声称拥有该城，结果最终三方都未能得到。

因此，维也纳和解从本质上说极为保守，实际上是倒行逆施。维也纳会议企图在一个变革力量只是暂时受挫的世界阻止变革。威灵顿公爵对滑铁卢之战的评价是“一桩好得很的事情，也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侥幸不过的事情”。整个欧洲人同此心。变与不变之争异常激烈，胜利者惊恐于最微不足道的让步。即使是有限的渐进改革也备受猜疑。1839年，威灵顿公爵写道：“着手改革即意味着革命的开始。”更有甚者，法国这一革命骚动的永恒源泉并未平息。1830年、1848年、1851年和1870年，巴黎不断爆发革命骚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评论说：“巴黎一打喷嚏，欧洲就感冒。”法国式民主威胁到君主制、教会和财产等梅特涅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支柱。他宣称，法国式民主是“必须治好的疾病，必须扑灭的火山，必须用灼热的烙铁烧焦的坏疽，是正张开巨颚准备吞噬社会秩序的九头蛇怪”。[3]

梅特涅表达了极端反动的1815年精神，即反对一切事先未获许

可的变化。这种精神先是体现于俄、普、奥、英的四国同盟，它们同意一旦形势需要即再度召开会议，接着是沙皇建立的更为广泛的“神[763]圣同盟”。四国同盟召开了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1818年），决定重新承认法国为体面的国家。神圣同盟则提出，列强应当永远维持各国边界和政府的现状。

在英国政府看来，所有这一切走得太远了，英国政府建议摄政王反对神圣同盟，已经使摄政王处于与苏丹和教皇为伍的境地。依照英国的标准，利物浦勋爵领导的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府，在国内政策上反对任何改革。即使是利物浦勋爵政府，也不允许欧洲的反动派使国际局势变得和没有安全阀的蒸汽机一样危险。在之后的特罗波会议（1820年）、莱巴赫会议（1821年）和维罗纳会议（1822年）上，英国明显限制了列强镇压那不勒斯、希腊和西班牙革命的远征。在关键性的西属南美殖民地起义问题上，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与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一道，阻止了欧洲对美洲事务的干涉。1826年，坎宁在下院宣称：“我催生了新世界，以恢复旧大陆的平衡。”实际上，他摧毁了列强国际会议体制的基础。他在去世前不久评论说：“局势已恢复到安全的状态，每一个国家都管好自己，上帝会眷顾我们每一个国家。”

尽管如此，短命的“会议体制”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欧洲进入动荡不已的十九世纪做好了准备。会议体制的机制一度类似于早熟的国际联盟，但未能建立起任何永久性的机构，这种体制建立起保守的大陆秩序，令之后所有改革者和革命者都必须与之抗争。这种体制还划定了五大国——四国同盟加上恢复元气的法国——在下一个世纪反对所有暴发户和新来者的国际舞台。虽然屡经重大的修正，但直到1914—1918年之前，会议体制始终支配着欧洲的版图。

十九世纪的欧洲以1815年为起点，历经三个清晰的发展阶段：反动时期（1815—1848年）、改革时期（1848—1871年）和对抗时期（1871—1914年）。在第一个阶段，守旧的堡垒不断获得成功，1848年全面爆发的革命浪潮彻底摧毁了这些堡垒。在第二个阶段，列强勉强承认，有节制的改革比无止境的抵制更为可取。列强在各个方面都做出重大让步。宪法得以通过，最后的农奴制残余也废除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个主要民族中，有两个实现了目标。在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欧洲进入到一个激烈对抗的时期，外交格局的重新调整、重整军备以及殖民争夺，使对抗进一步激化。40年无与伦比的和平未能缓解紧张局势，日益恶化的局势最终在1914年8月转变为公开的冲突。欧洲的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一场现代战争，较之这场战争造成的杀戮，拿破仑战

争无异于一场小规模的战斗。

“现代化”与“现代主义”* 是两码事。现代化首先是一个社会[764]学术语，用来描述共同体从“落后”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复杂变革。现代化起始于以农业、农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土地上耕作，生产所需的粮食；现代化的终点是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在城镇和工厂谋取生计。现代化包括大约30到40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彼此互相关联，每一个都是整个变革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今，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通常被视为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或阶段。“自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冶金术和城镇以来，还没有哪次变革像工业化的来临这样深远地影响了人类生活。”[4]

一致公认，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是英国，更确切地说是英国的某些地区，如兰开夏、约克郡、黑乡、泰恩塞德、克莱德班克和南威尔士等。工业化很快就传到欧洲大陆，尤其是那些位于或靠近比利时、鲁尔和西里西亚大煤田的地区。现代化的影响由这些工业集中地区不断扩展开来，先是波及各个港口，接着是重要的城市，最终遍布工业化刺激下的整个国家。现代化并未就此止步，其影响在不同层面上改变了全欧洲的面貌。现代化向欧洲以外世界的扩展，要么是帝国经济体向海外殖民的结果，要么是当地采取主动，其影响却被视为“欧洲化”。如此一来，现代化就不单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焦点，还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所在。

最重要的是，必须把现代化看成是推动变革的发动机，而不是其各组成部分的静态总和。这个发动机，或者说引擎，首先必须点火发动，然后加速，最终实现关键性的“起飞”，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行模式。(把现代化进程比作二十世纪的飞机飞行固然不错，但十九世纪早期的火车似乎是更为贴切的类比对象。) 先是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锅炉升火，积聚足够压力的蒸汽，就到了发车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蒸汽带动活塞，车轮开始转动；接下来是一个巩固时期：引擎在一阵嘎吱声中震颤着加速运行；最后是壮观的奔驰阶段：火车发出美妙的隆隆声，以最大速度和功率在铁道线上飞奔。

在整个十九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努力创造条件，使各自国家从经济点火迈向社会“起飞”。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失败了，

---

* “现代主义”通常特指与社会经济趋势相对应的文化潮流。在十九世纪，保守的教会人士把它当做一个带有贬义的术语（见原书第797页），后来这一术语意指所有的先锋派艺术运动（见原书第854页）。

[765]还有一些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英国率先起步后，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也开始了同样的进程，先是比利时和荷兰，然后是普鲁士、皮埃蒙特和法国。到十九世纪末，资源富饶、活力四射的统一的德国很快就赶上了英国，领跑整个欧洲。

在大多数国家，现代化的都市地区与偏远省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差。在英国，英格兰地区开始对偏远的高地和岛屿另眼相看。在法国，围绕巴黎－里昂－马赛轴线开始形成高度发达的地区；在低地国家是里尔－列日－鹿特丹地区；德国是莱茵－鲁尔－柏林－萨克森－西里西亚地区；奥匈帝国是波希米亚－维也纳－布达佩斯中心带；在统一后的意大利则是伦巴底地区。像爱尔兰、布列塔尼、加里西亚和西西里这样的省份则极不发达。在1914年前的数十年间，俄罗斯帝国加速迈向现代化，但其地区差异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大的。

由于各国之间、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同，当时欧洲各国的经济差异显得极为突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100年里，欧洲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带，一个是普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进地区：北欧和西欧，一个是正在工业化但很大程度上未实现现代化的落后地区：南欧和东欧。前者参与到英国依然占据支配地位的“全球海洋经济”，同英国一样通过获取海外殖民地来推进这一经济体系。后者只能成为粮食、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以及受控制的工业品市场。

德国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在于，虽然已成为工业化地区最有活力的国家，它却由于政治和时机上的原因未能获得相应的殖民地。这样一来，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立即与东欧国家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以此补偿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失败。如果说早先西欧与东欧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宗教和政治上的分野，现在则带有浓厚的经济色彩。

东欧的工业化仅限于一些局部地区，这些地区如同散落在落后乡村的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北波希米亚、罗兹－华沙－栋布罗瓦三角地带、下诺夫哥德罗和圣彼得堡的棉纺织工厂、加里西亚、罗马尼亚和里海的油田，都属于这样的工业化岛屿。不仅如此，这些岛屿不但在地理上处于孤立隔绝状态，即使到十九世纪末，它们的力量仍不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进入到起飞阶段的临界点。这无疑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战略后果。广大的农村人口贫困日甚一日，他们不再背负以往的各种土地义务，却没有足够的机会在城镇中改善自身的状况。他们既未得益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没能从工业带来的意义重大的就业机会[766]中获得任何好处。更糟糕的是，在一个积贫羸弱的社会，国家仍不得不毫不宽容地向饱受贫困折磨的臣民课税。这无异于埋下了社会动荡

和政治反抗的种子。有鉴于此，再加上对德国迸发出来的活力的担忧，西欧列强决定以一场大规模的投资运动来维系与俄国的政治和睦关系。1890 年到 1914 年间，法国、英国、比利时在俄投资急剧增长，推动了俄国铁路里程、工业产量和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增长。

问题依然在于，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经济体。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如果确实存在这么一种欧洲经济体——西欧在俄国的大量投资预示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那么德国显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到 1900 年，德国既在西欧的工业和贸易中有巨额投资，又在东欧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经济早熟与政治滞后之间反差如此显著，因而主要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是德国人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在 184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 年）得出了与卡尔·马克思（见原书第 837—838 页）迥然不同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变革的动力来自阶级斗争，而在李斯特看来，变革的源头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国家可以凭借保护性关税以及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大量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李斯特是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的最有条理的鼓吹者。普鲁士成为渴望追寻普鲁士成功足迹的那些人——尤其是东欧人——的榜样，激发起他们无限的想象。[5]

与此同时，没有多少欧洲人费心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现代化发生在欧洲而非其他的地方？一种可能的答案似乎是，欧洲"恰巧"同时具备了其他更为古老、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不具备的特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关系和政治环境。这里的侧重点在于巧合，换句话说，现代化滥觞于欧洲是一个"欧洲奇迹"。[6]

现代化进程可以具体分解成无数的分支步骤和新进展，而且每一个步骤和发展彼此相互影响。除开催生工业革命萌芽的十来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另外 30 个左右的变革因素，它们推动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新变革。（见原书附录Ⅲ，第 1293 页）

机器的逐步引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机械从麦科马克的马拉收割机（1832 年）到蒸汽打谷机，最终发展到拖拉机（1905 年）。农业机械成为工业化地区和非工业地区间贸易的大宗出口项目。机器的推广不但把更多的人手从农田解放出来，还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可以迁移到城镇和工厂。

在革命战争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度提高，法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先后废除农奴制，几百万士兵永远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村[767]庄。东欧在数十年后才陆续解放农奴。在普鲁士，农奴解放在

1811—1848 年间带来更多的不幸，无情的劳役地租常常导致强制性的结算。在奥地利，废除农奴制是在 1848 年时突如其来地实现的，遗留下一连串有待解决的争议问题。在俄罗斯帝国，农奴凭借 1861 年的圣旨获得解放，波兰王国凭借 1864 年 4 月的圣旨废除了农奴制。

为补充"煤国王"的不足，人们着手开发新的动力来源，先是煤气，接下来是石油，最后是电力投入商业使用。1813 年，伦敦帕尔马尔街开始使用煤气灯照明；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英国家庭和城市已经广泛使用煤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石油开始得到应用。欧洲在加里西亚的博里斯劳、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和黑海的巴库开发油田。与此同时，事实证明，内燃机（1889 年）的革命性意义并不亚于蒸汽机。格拉姆发明发电机（1869 年）和德布雷茨建造高压输电线路（1881 年）后，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电力开始得到广泛应用。1900 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电小姐"首次正式登台亮相。就在那一年，煤炭在全球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 92%。

从带动传送带到驱动汽船，动力机械和发动机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然而，关键性的新生事物是发明了机器设备和动力设备，前者是制造机器的机器，蒸汽锤、打桩机一类的动力设备则把人从繁重的手工劳作中解脱出来。这一领域的创始者是发明金属车床的乌里奇的亨利·莫兹利（1771—1831 年）。

虽然抽水机和安全性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采矿业依然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1900 年时的矿井和 1800 年时没什么两样，欧洲数百万采煤工人蜷缩在采煤工作面上手工挖掘，他们用健康换得的不光是高工资，还有硅肺病。铁矿业主要集中在富含褐铁矿的卢森堡－洛林、西班牙北部、瑞典北部以及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鼓风炉的设计不断改进，最终发展到亨利·贝塞麦爵士在谢菲尔德建造的贝塞麦转炉（1856 年）和马丁在西罗伊尔发明的平炉炼钢法（1864 年）。钢铁业的发展为铁路时代提供了质优价廉的钢材，钢材还广泛应用于桥梁、船舶、建筑构架和武器军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同素异形理论和实验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为市场提供了专门用于工具制造和大炮铸造的优质合金。电冶金使铝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如果说制铁业者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巨头，那么他们的真正继承人显然就是十九世纪后期的钢铁大王，如勒克勒索的施耐德和埃森的克虏伯。钢产量成为衡量工业实力的关键指标。（见原书附录Ⅲ，第 1296—1297 页）

交通运输在速度、效率和舒适程度上都有了迅速的提高。约翰·麦克亚当发明碎石柏油路面（1815 年），标志着道路建设进入到一个[768]新时代，但只是在汽车发明之后，它才得以物尽其用。特尔福德在梅奈海峡上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悬索桥，标志着桥梁技术达到新的高

度。铁路比以往更快捷地运载了更多的旅客和货物，价格也更为低廉。1800 年，从巴黎到圣彼得堡的陆上行程需要 20 天时间，1900 年则仅需 30 小时。全欧洲都沉醉于铁路的效率和对铁路的迷恋之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比利时建成当时最密集的铁路网（每百平方公里有 42.8 公里铁路，英国有 19 公里，德国为 17.2 公里）；瑞典则拥有当时人均占有里程最长的铁路网（每万人铁路里程为 27 公里，比利时为 12.2 公里）；西伯利亚人均铁路里程最少（每万人铁路里程为 2.5 公里，俄国的欧洲部分每万人的铁路里程为 5.7 公里）。[**奔驰汽车**]

[769]

奔驰汽车（BENZ）

1885 年，曼海姆的卡尔·本茨（1844—1929 年）制造了一辆以汽油为燃料的三轮“机动车”。海报上常常把它宣传为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但它绝非两百年汽车发展史的起点。早在 1769 年，尼古拉·居纽（1725—1804 年）制造的一辆蒸汽车辆就已经获得“机动车”的名号。1850 年，蒸汽动力车辆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还尝试用煤气作为车辆的动力。不过，尼古拉·奥托（1876 年）、戈特利布·戴姆勒（1885 年）和鲁道夫·狄塞尔（1897 年）发明的四冲程内燃机，真正开创了汽车运输之未来。

如今，最早的三轮奔驰车陈列在慕尼黑国家博物馆。这辆车的两个驱动轮由差数齿轮带动，实心的轮圈共装有 80 根辐条，前导向轮由一个竖式手柄操纵。发动机带有电子点火装置，装在一个垫高的长座椅下方。这辆车没有车身，发动机功率不到 1 马力，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16 公里。[1]

汽车在欧洲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安德列·米其林发明的充气轮胎（1888 年）和美国人的批量生产方法（1908 年）。摩托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先后发明出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汽车业迎来了一些重要的商业性汽车制造企业，如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1899 年）和巴黎的雷诺汽车公司（1901 年）。1901 年，戴姆勒-奔驰公司推出“梅塞德斯”。1906 年，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推出“银灵”，为汽车制造业树立起豪华和可靠性的新标准。（列宁拥有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两次世界大战延缓了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但运输工具和熟练驾驶员的数量却大幅增加。1938 年，希特勒主持了大众汽车公司甲壳虫汽车的下线仪式，成为汽车大

众化的里程碑。在斯堪的纳维亚，普及汽车的先锋是哥德堡的沃尔沃汽车公司，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是比尔森的斯柯达汽车公司。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波兰获得许可生产波兰版的菲亚特汽车。1950年后，西欧进入汽车广泛普及的时期，苏联集团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普及汽车。

在技术发展史上，人们总是为是否拥有"第一"的桂冠而苦恼，这往往歪曲了技术进步的合作与积累的本质。技术进步的确会有某个质变的时刻，问题是很难确定这种质变究竟是在何时发生的。例如，首次动力飞行究竟在什么时候？你可以说是洛努瓦和比安弗尼的"蝶形"直升机模型（1784年）、亨利·吉法尔的蒸汽飞艇（1852年），也可以说是克莱芒·阿代尔发明的以汽油为燃料、在空中飞行了50米的飞机（1890年），或是K.E.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实验火箭。大多数教科书都倾向于认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动力飞行是1903年12月17日在北加利福尼亚的基尔德维尔山上进行的，但依据的是一个不同的标准："可控的动力飞行"。[2]

在航空领域，1783年6月5日，蒙戈尔费埃兄弟在里昂附近的昂努瓦首次试飞热气球，此后直到整个十九世纪，热气球飞行成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齐柏林伯爵发明的可操纵飞艇（1900年）和不久之后的飞机淘汰了热气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奥托·利林塔尔成为德国滑翔飞行的先驱，1903年，莱特兄弟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实现了以内燃机作动力的有人驾驶飞行。1909年7月25日，路易·布莱里奥了不起地驾驶一架单翼机在31分钟内飞越英吉利海峡。

通讯系统同样大有改善。统一的邮递服务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快捷的通信。1840年5月1日，英国发行了世界上首枚邮票："黑便士"邮资印花税票。此后，苏黎世和日内瓦（1843年）、法国和巴伐利亚（1849年）、普鲁士、奥地利和西班牙（1850年）、瑞典（1855年）、俄国和罗马尼亚（1858年）、波兰（1860年）、爱尔兰（1873年）也先后发行了邮票。电报（1835年）、电话（1877年）和无线电通讯（1896年）的发明，使得长距离即时通讯成为可能。快捷的通讯具有重大的价值，这方面最著名的实例发生在1815年7月19日：由于用一艘特制快艇来传递信息，内森·罗思柴尔德比竞争对手早好多个小时就知悉了滑铁卢战场的消息，从而在伦敦证券交易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暴利。万国邮联（1874年）、国际电信联盟（1875年）、国际计量局（1975年）和国际铁路总局（1890年），大大改善了国际通讯

联络。[**照片**]

投资与赢利同步增长。私人企业进行再投资以获取进一步的利润；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带动了税收的不断增长。对资本的无限需求实际上消除了私人借贷的可能性，还恢复了股份公司的发展（1720年的"南海泡沫"大灾难后，英格兰和法国限制股份公司的发展，但苏格兰未受影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有限责任股份公司在欧洲各地都已成为常见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有限公司"（以及它们的股东和股东年会），付给投资者股息，同时对债权人仅承担有限责任。通过"横向"合并和"纵向"订约，

[770]

照片（PHOTO）

索恩河畔沙隆的一间老谷仓享有被摄入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的殊荣。1826年的某一天，约瑟夫·尼斯福尔·尼埃普斯用一张白镴板，经过8小时的曝光，成功地拍摄下谷仓的影像。13年后，尼埃普斯的伙伴路易·达盖尔（1789—1851年）开始出售一种照相装置，它在表面涂了一层氯化银的铜板上显影，需要曝光13分钟。达盖尔显影术引发了一个漫长的改进过程，其间先后发明了深受欢迎的箱式照相机、彩色胶卷、无声电影、有声电影、X光照片、红外线摄影以及缩微摄影，直到最近，又发明了便携式电子摄像机。[1]

不能过分夸大摄影术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它彻底淘汰了具象派美术。[**印象派**]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视觉意识。它是人们利用各种科学和信息的有力工具。克里木战争的图片使全世界注意到军事冲突的现实，家庭相片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摄影还增添了记录历史的新方式。50年前，人们已能记录声响[**声音**]，摄影图片则可以收集过去一切方面的真实影像。[**奥斯维辛**]

然而，摄影术的真实性具有欺骗性。例如，苏联官方摄影的修改技巧就臭名昭著。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痕迹从记录中消除得干干净净，戈尔巴乔夫不雅观的胎记最迟在1985年就从照片上消失了。即使是诚实的摄影师，也是随意地选取摄影的角度、光线、色调、结构和记录的瞬间，最重要的是，对拍摄对象的选取也是随心所欲的，这使得他们展现出来的东西和他们掩盖的一样多。与历史学家一样，照相机总是在说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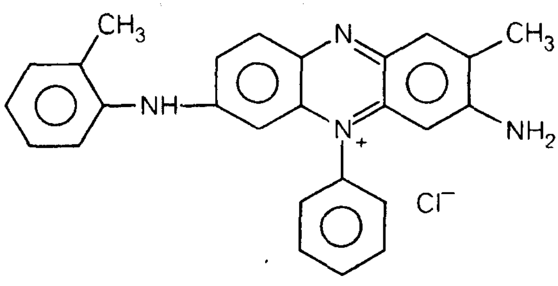
这些有限公司很快就联合成规模更大的联合企业，其形式或是统一的托拉斯，或是联合卡特尔。在英国，人们对垄断顾虑重重，托拉斯和[770]卡特尔发展缓慢。英国规模最大的公司，如从事汽船运营的“半岛与东方轮船航运公司”或“丘纳德轮船公司”，大多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卡特尔在法国很普及。德国统一后，巨大的托拉斯和按照美国模式组建起来的康采恩迅速发展，控制了所有的市场部门。

人口的增长带动人口聚居中心迅速形成，普遍的富足以及全新需求的产生则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化学工业是众多新兴工业中最重要的一个行业，苯胺染料的发明（1856年）、萨尔韦纯碱萃取法（1863年）和合成肥料的生产，标志着化学工业的诞生。各种人造原[771]料，如塑料、混凝土、玻璃纸、赛璐珞、人造纤维、黏胶纤维、乙酰水杨酸等大量涌现出来。德国人对化学工业的创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李比希、霍夫曼、本生和拜耳。[**苯胺紫**]

[772]

苯胺紫（MAUVE）

1856年的某一天，一位18岁的学生在位于伦敦树木茂盛的郊区哈罗的家庭密室里做实验。这个孩子，即后来的威廉·亨利·珀金爵士（1838—1907年），想提炼出治疗疟疾的药物奎宁的合成物。结果，在用重铬酸钾来使硫酸胺脱氢时，他偶然地获得一种新的沉淀物。脱水和酒精萃取后，他看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人见过的绚丽颜色。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合成染料。他称之为“泰尔红紫”。后来，法国化学家根据锦葵花的紫红色把这种染料称为“苯胺紫”:[1]



两年后，珀金开始商业性生产苯胺紫，一位来自皇家化学学院的年轻人约翰·彼德·格里斯分析得出上述令人吃惊结果的化学

反应。他的分析证实，用盐酸或亚硝酸钠来处理主要的芳族氨，如苯胺，就会生成重氮化合物。这些重氮化合物依次与酚化合物或芳族胺起化学反应，就会生成各种色彩艳丽的生成物，即人们所知的偶氮染料。例如，用盐酸或亚硝酸钠来处理苯胺，即生成氯化重氮苯。[2] 如同其他染料一样，这种“重氮反应”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会生成被称作“发色团”的分子，也就是说，会生成吸收某一特定波长光线的原子束，并使最终生成物带有独特的色彩。

在苯胺紫的示范效应下，出现了大量人工合成色彩：品红与紫罗兰色（1860 年）、里昂蓝（1862 年）、苯胺黄与苯胺黑（1863 年）、大丽粉、珀金绿、曼彻斯特棕或俾斯麦棕（1864 年）、茜素红（1871 年）以及伦敦橙（1875 年）。1881 年，英国邮政局用苯胺紫来印制著名的 1 便士紫丁香邮票时，这种颜色已经不再时髦了。但色彩带给人们的美感永远不会千篇一律。

色彩表明事物的某种基本属性，因而也体现出人类对环境所作反应的基本特性。在欧洲，传统上黄色与怯懦联系在一起，红色使人联想到愤怒，黑色则与抑郁相关。绿色和棕色令人感到安慰，蓝色和红色则使人兴奋。北欧人喜欢各种色度相差不大的柔和颜色，地中海沿岸居民则酷爱明亮的红、黄、蓝原色。 [773]

异彩纷呈的色彩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定会引发意义深远的变化。在苯胺紫发明以前，所有的色彩和色素都是从自然物质中萃取的。红色染料一般取自茜草的根茎。每一个纺织城镇都不得不辛辛苦苦地运送数千吨茜草。靛青是蓝色的主要来源，罗马人从贝壳中获取这种颜色以提炼他们所谓的“堂皇的紫色”：黄颜木或胭脂树的黄色。某些色调和颜色，尤其是绿色，只能通过二次染色来获得。大约在 1850 年，在法国提炼出一种叫“骨螺紫”的半合成颜色，它是把鸟粪用硝酸处理后获得的。

然而，自苯胺紫发明后，人们可以无限地提供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颜色。到二十世纪末，欧洲商业性生产的合成染料已经达到 4000 种。[3] 过分装饰的海报、华而不实的衣物、迷人的墙纸，更不用说“彩色印片法”的影片、彩色照片和彩色电视，都以前工业化时代所无法想象的方式使人们对后工业化时代感到满意或厌恶。

英国在合成染料方面的领先地位很快就被德国超过，1863 年，弗里德里希·拜尔（1825—1880 年）在伍帕塔尔－巴曼的一个洗衣房里建立起第一家苯胺染料工厂。[4] 拜尔公司、巴斯夫公司（巴迪什苯胺与纯碱公司）以及赫希斯特公司很快就使德国成为世

界化学工业的中心。到 1890 年，德国化学工业的规模已经是英国化学工业的 20 倍。像英国化学工业公司一样，I.G. 法本的联合企业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5]

合成染料很快使科学家进入到以前的染色师傅所不了解的领域。通过提炼此后发明的种类繁多的合成与半合成物质，现代化学打破了只有自然界或上帝才能预定各种物质内在结构的假说。较之合成染料的发明，半合成物质赛璐珞（1862 年）和半合成纤维粘胶纤维（1891 年）的发明要晚一些。这些发明预示着合成药物的发明，如乙酰对氨苯乙醚（1888 年）、阿司匹林（1899 年）、阿斯凡纳明（1910 年）、吖啶黄（1916 年）和海洛因；对胰岛素（1921 年）和甲状腺素（1926 年）等激素的分解，最终发展到人工合成这些激素；氯霉素（1950 年）的投产，标志着第一种合成抗生素的诞生。化学不光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在贝克兰、拉希和奥斯特罗米斯兰斯基分别发明酚醛塑料（1907 年）、氨基树脂（1909 年）和聚氯乙烯（1912 年）后，化学产品成为物质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1864 年，法国欧仁尼皇后穿上一件三苯甲烷绿色的睡袍，表明合成产品不光有实用性，还具有审美价值。

新大陆的开发，尤其是美洲和非洲的开发，殖民地的争夺，国内对原材料的渴求，海外对更多的工业品的需求，这一系列因素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牛仔裤]

因各国的政体、资源和相对地位不同，各国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也就各异。现代化的好处尽人皆知，一些贫穷的国家，如俄罗斯和西班牙，政府往往踌躇不决，既对落后感到羞愧，又对依赖感到担忧。在决定接受海外投资之前，像俄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可以使臣民不受外界的影响。但较为开明或更为迟疑不决的国家，如奥地利，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工业革命一旦启动，势必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在经济领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变为有各种新需求、新渴望的工薪阶层、消费者和纳税人。纸币广泛流通。营销、广告和配售领域也涌现出大批新技能和新技术。科学技术上的突破纷至沓来，创造发明不再只是发明家个人的事，而是进入到有计划的研究与开发阶段。人们对金融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刺激了各种信用社、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涌现。商业业务大幅增长，促进了度量衡和通货的标准化。

[774]

牛仔裤（JEANS）

“热纳”是法国人对热那亚的称呼，后来其含义延伸，意指热那亚海员所穿的一种传统样式的裤子。“尼米斯呢”本是指一种坚韧的蓝色制衣帆布，后来被错误地用来指法国城镇出产的传统斜纹粗棉布。列维·斯特劳斯（1829—1902年）是个土生土长的巴伐利亚人，14岁时移民到纽约，进入他兄弟所开的为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探矿者和边疆居民提供补给品的商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的某个时期，列维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斜纹粗棉布衣服与热那亚式长裤搭配出售，并用铜铆钉来加固口袋和线缝。这样就创作出时装设计史上最持久、最普及的服装样式，一个德国移民用法国面料和意大利样式创造出一种典型的美国产品。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牛仔裤始终是北美的日常服装，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牛仔裤风暴席卷了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成为“美国化”的主要标志。[1]

在社会领域，大规模城市化带来一大堆新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还兴建起一批新的公共事业。新兴的公共事业包括铺设马路、城市交通、街道照明、城市消防、供水供气、排水系统以及城市规划、医院、公园和警察。城市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划分，取代了以往乡村中贵族与农民的区别。中产阶级意识到自身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员认为自己大大高于商人和店主，同样，工人阶级也在引导下逐步形成自身的等级制度。不论是农场还是企业，工资劳动者都成为在职职工的主体，而“壮工”遍布于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大量富裕中产阶级家庭所需的家政服务，为男子和妇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较之自己经营较老的行当，人们认为在新工厂中工作更受人尊敬。与没有一技之长的临时工和城市贫民相比，熟练的专家和工头工资很高，自诩为“工人贵族”。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就在于，其阶层概念是基于灵活的经济标准，这与过去以出身和法律特权为基础的分层截然不同。

人们以前一直认为，传统的欧洲家庭属于多元、稳定和家长式的复合型大家庭。现代研究驳斥了围绕这种“令西方人想家的传统家庭”的先入之见。研究表明，单一家庭和核心家庭绝非直到现代才形成的。即便如此，人们不会否认现代化对家庭结构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肯定，现代生活方式使家庭史先驱、提出“血统家庭”概念的弗

雷德里克·勒普莱（1806—1882年）看重的家庭稳定性荡然无存。[7]

妇女的生存环境有了根本改观。传统的乡村生活确保了妇女作为承担共同劳动的平等一员的地位，而且家庭能够缓解生育和做母亲的压力。现代城市生活则使男人成为“家庭支柱”，妇女要么成为孤独的女主人和家务管理者，要么——就工人阶级妇女而言——承受着三重负担：户外工作者、主妇和母亲。因此，在上流社会整洁的客厅外面，还有一个充斥着卖淫、绝望和夭亡的下层社会，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工业化助长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口迁移浪潮，人们起先是季节性地从本地的村庄向工厂迁移，接着以地区规模由乡村向城镇迁移，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则是世界范围内洲际性地向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城市迁移。无节制的人口迁移给城市带来一连串的问题：过度拥挤、居无定所、住房紧缺、无家可归、斑疹伤寒和霍乱的流行、繁荣中的失业以及无法解决的持续贫困。进步姗姗来迟，最严重的流行病，如1830—1835年、1847—1848年、1853—1856年、1865—1867年、1869—1874年、1883—1887年、1893—1895年间在全欧洲范围内爆发的[775]霍乱，引发了公共和个人卫生领域的革命以及公共医疗机构的建立。[公共卫生]医学的进步最终使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有了可喜的下降。

然而，人口的不断增长滋生出诸多不幸：村庄人口过剩、血汗工厂、童工、超过生理承受极限的工作时间、剥削妇女以及贫民窟里难以言述的惨状。贫困和城市生活导致的精神病变滋生出有组织的犯罪。人口的日益增长还带来其他一些后果：一个新兴的屡屡犯罪的下层阶级；按照苏格兰场模式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侦探成为一项新的职业；监狱的大批建造以及随着《福尔摩斯探案集》（1894年）的发表而形成的新文学门类：犯罪惊险小说。

英国小说家、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1804—1881年）最深刻地描述了极端的贫富悬殊。在《西比尔》（1845年）一书中，狄斯雷利写道：“有两个互不交往、没有任何一致之处的民族；他们彼此对对方的习俗、思想和情感一无所知，就好像对方是……另一个星球的居民。”[8] 这一描述相当准确，指责却完全有失公道。十九世纪时，私人慈善事业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博爱]

在文化领域，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层次极大提高。城镇居民必须具备基本的认字识数能力；儿童必须接受普遍的初等教育。大批的装配工、技工和学徒必须接受职业教育；高等技术教育致力于培养工程师和研究者。政府和商界首脑提倡创办新型的中等学校，培养公共服务机构、殖民地管理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行政骨干。妇女教育也开始启

[776]

公共卫生（SANITAS）

1829 年，一场空前凶恶的霍乱袭击了乌拉尔的奥林堡。1830 年，同样的霍乱冲击了莫斯科。1831 年，这场霍乱又攫住了正在与波兰作战的俄国军队，此后又传播到匈牙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它于 1832 年 2 月抵达伦敦，3 月传到巴黎，6 月蔓延到阿姆斯特丹，随后登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班牙人为了自保，颁布了一项处死所有未检疫移民的法令。1833 年 1 月，霍乱仍然侵入波尔图，并通过葡萄牙进入西班牙。当时人们对这场霍乱一无所知，欧洲人首当其冲地面对未来 90 年里多次席卷全世界的六次霍乱大流行中的第二次霍乱大疫；俄国则是病菌侵入欧洲的入口。[1] [**流行病**]

这场流行病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因为当时人们还未充分了解其传播方式。“霍乱”一词是一个古老的希腊词汇，本意是指排水沟，它准确地描述了病菌侵入肠道引起的猛烈腹泻，这种腹泻能在短短数天内淘空患者的身体。当时的医学界无法判明，这种类似于痢疾的疾病早先以各种方式流行，虽然被冠以形形色色的名称，其实就是同一种疾病。到 1883 年，最终发现了致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病菌：1 号霍乱弧菌，人们喝了被这种病菌污染的水，小肠就会感染。这种病菌是英国陆军军医在所有流行病的源头印度首次发现的，医生们最终认识到，要预防霍乱就必须提供洁净的饮水，最佳的治疗方法则是简单的补充水分技术。1817—1823 年，霍乱第一次大爆发，向东横扫了整个亚洲。此后在 1829—1851 年、1852—1859 年、1863—1879 年、1881—1896 年以及 1899—1923 年间的各次霍乱大流行，都猛烈地侵袭了欧洲。第二次霍乱大疫在肆虐美国 15 年之后，最后又于 1847—1851 年间掉头猛烈地袭击欧洲。在英国，1848 年有 53000 人死于霍乱，1849 年法国因霍乱死亡的人数与英国相近。1851 年，巴黎树起一座雕像以乞求上帝怜悯霍乱的无助受害者。

乞求上帝怜悯霍乱的无助受害者。各国首次决心协同一致改善公共卫生状况。1848 年，伦敦成立了卫生总署，它致力于改善英国发展中城市的肮脏环境，降低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卫生总署在流行病的历次袭击中极富成效地保护了英国，狄斯雷利伟大的《公共卫生法案》（1875 年）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机构的地位，该法案责成地方市政当局必须提供有效的污水处理、排水系统以及洁

净的饮用水。第四次霍乱横行时，英国死于霍乱的人数为15000人，但仅为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的十分之一。第五次流行病大爆发时，汉堡1893年的死亡人数超过80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1893—1894年间的死亡人数超过80000人，英国则以防治了最后一例本土霍乱病例而自豪。

[777] 1851年，拿破仑三世采取主动，召集各国在巴黎举行国际卫生大会。会议的宗旨是各国交换疾病传播与防治的情报，尤其是有关霍乱疫情和防治方法的情报。当时，不论是巴斯德还是李斯特，都还未在细菌学领域做出开拓性的发现。国际卫生大会导致了一系列卫生学会议的定期召开，1907年，国际卫生组织在巴黎成立，它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先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征服霍乱后不久，一场异常凶险的流行性感冒就压倒了征服霍乱的全部成功。这场流行性感冒可以追溯到1918年1月伊阿华州爆发的猪瘟，1918—1919年它随着美国军队渡海来到欧洲。当时人们把这场流行性感冒称为“急性黏膜炎”、“弗兰德斯感冒”，它传播到西班牙后，又得到一个“西班牙贵妇”的绰号，它专门攻击青年人，尤其是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这场流行性感冒摧毁了德国——在德国，流行性感冒甚至不属于必须向医疗当局报告的疾病——使主要城市的劳动力陷于瘫痪，也使运输和军队调动中断。在三个可怕的高峰期，1918年7月、1918年10月以及1919年2月，这场流行性感冒夺走了欧洲数百万人的生命，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大约4000万人死亡。“数月内死于这场流行病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任何一场灾祸。”[2]

[778]

博爱（CARITAS）

1818年，荷兰慈善协会为救助失业者，开放了一系列工人聚居区。这些聚居区遵循纠正懒惰这一极为古老的荷兰传统。[巴达维亚] 4000多名因乞讨被判罪的男人被押送到维恩汇岑的聚居区。贫穷的妇女则被押送到莱顿的聚居区。位于弗雷德里克索尔、威廉索尔和威廉明那索尔的三个“自由聚居区”旨在向自愿居住者传授农业技术。不久以后，这些聚居区全部由国家提供资金。德国、比利时和瑞典也建立起类似的机构，而且大都实行

军事化管理。[1] 这些聚居区表明十九世纪的欧洲越来越多地提供了社会关怀，也反映出兵营化管理的日益强化。至于《英国济贫法修正案》（1834 年）引入的济贫院，其宗旨是身体强壮的慈善领受者必须参加劳动。

不同形式的慈善活动古已有之。圣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七项“宗教救助”和七种“善行”，从而确立起基督教徒的基本行为准则。前者分别为忠告、忍耐、告诫、安慰、救济、宽恕、祈祷；后者依次是授人以衣、施人以水、供人以食、救人于囹、庇人以舍、顾人于疾、葬人以地。按照这种分类法，即可区分需要给予施舍的不幸者的类别。这些不幸者包括迷路者、身体羸弱者、文盲、失去亲人者、受压迫者、罪犯、罪孽深重者、陌生人、衣衫褴褛者、挨饿者、遭囚禁者、无家可归者、病人、疯子和死者。基督教教义十分强调慈善的重要性，一如圣保罗所云：“信仰、希望、慈善三者，慈善乃其中至为伟大者。”[2] 正因为慈善意味着“爱你的邻人”，施舍才有了“慷慨的礼物”的含义。

在中世纪，教会承担了关怀弱者的责任，其资金来源是什一税。圣贝尔纳德开创了修道院的慈善传统，圣弗朗西斯则树立起教会在社区从事社会活动的传统。两种传统都有众多的继承者。皇室、贵族和地方赞助人在感动之余建立起广泛的网络，为病人和年老体弱者建造“上帝之家”，为朝圣者、旅客和陌生人建造旅店，为应获得救济的穷人建造济贫院，此外还修建了众多的麻风病院。伦敦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很多更为专门的机构，如圣巴托罗缪医院、专收精神病人的伯利恒的圣玛丽疯人院，以及专门收留遭犹太社区驱逐的犹太人的圣玛丽“皈依者客栈”。[3] 在其他地方，一些富有的商人，如曾经当过市长的理查·维廷顿（卒于 1423 年）爵士，对慈善事业慷慨捐赠。**[麻风病人]** **[商人]**

[779] 宗教改革时期，中世纪的慈善体系开始瓦解，尤其是在新教国家。英国解散修道院（1540 年）造成的社会后果远远超过令穷人处境艰难的《伊丽莎白济贫法》。现代欧洲不得不谋求新的解决之道。随着人口的增长，慈善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专门化。在十八、十九世纪，各种专门的退伍军人之家、精神病院、感化院、监狱、医疗养老院、济贫院、工人聚居区和慈善学校迅速增加。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大声疾呼废除奴隶制和严刑拷打，迫切要求改善有辱人格的环境。筹措慈善资金以及管理慈善事业的责任由教会转移到教区和市政委员会，转移到各种私人慈善团体，并最终转移到国家。**[流浪汉]** **[酷刑]**

辉格党人传统上总是倾向于把慈善活动的发展看成文明向前迈进的证据。有些历史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尽管社会关怀机构有很大的发展，人数日益增多的被收容者却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管制。慈善的接受者或许不惧怕肉体上的暴行，但以心理和道德强制为基本特征的各种严酷制度，会剥夺他们的自由、自尊和个性。在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内，在阅兵场、学校教室、工厂、医院病房、济贫院，严格的控制不断强化，其始作俑者却视之为提高效率的必要代价。

事情还有更糟糕的一面。人们会觉得纳闷，对大众的严格控制为什么没有以某种方式与争取较为开明的政治制度的运动联系起来。不论是雇员，还是失业者，其命运都是永无休止的劳作。这印证了尼采所说的一句风凉话："工作乃是最佳的管制方式。"只有当社会控制加剧的时候，政治控制才会有所放松。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切尔·福柯（1926—1984年）的著作体现出这种思路。福柯本人是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施虐-受虐狂，他决意探究各种极端体验，并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改革的严厉批评者。通过考察疯人院和性观念的历史，他认为疯人院使那些最为敏感的人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人们的性观念又把人类的基本冲动变成伪善和禁忌，他因此断言：现代是一个"压抑的时代"。[4]权力决定了一切社会关系。他宣布："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混乱而明目张胆地性变态的社会。"[5]十九世纪工人聚居区里的被收容者想必很赞同他的看法。

动。大规模扫盲为新兴的大众文化铺平了道路，坊间出版了大批通俗杂志、拙劣小说、传奇文学、侦探小说、连环画杂志、励志类书和家庭读物。有了固定的收人，人们得以尝试各种新的休闲娱乐方式：音乐协会、家庭度假、旅游、登山和各项体育运动，工人踢足球，老板则打高尔夫球。**[消遣]** **[环法自行车赛]** 对体育活动的癖好，无疑是产生于备受拘束的现代生活方式，这种癖好与对教育的热衷相结合，造就出一批混合型的青年运动，如在中欧各地广泛出现的"索科尔体育协会"以及"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1908年）。宗教文化也有所发展。识字儿童绝不会死记硬背地学习教义问答手册。城市教区的教堂大厅成为社交、慈善和戒酒活动的中心。在新教国家，涌现出大量的福音主义运动、主日学校和各种读经班。在天主教国家，教会组建了最早的工业教区和私人教会小学，任命了工人牧师。大学里的学者孜孜以求地去了解变革中的世界，创立了一系列全新的社会科

学：经济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每一门新学科都对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学等传统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心理学领域，城市和工业生活使人们养成对于乡村居民来说全然陌生的态度。工厂汽笛声、铁路时刻表、守时和节制，凡此种种，都是会使一个农民觉得奇怪和厌恶的新事物。新奇的市场带来了惊人的花销，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和强制性节约由此初露端倪。由于无法在一个变动不安的陌生社会里确认自身的地位，人们变得忧虑不安，阶级意识开始萌芽。新近接受教育的几代人也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而当他们生活在乡下的村庄时，从来就没有想过何为民族认同和民族语言。在不再是无助的农奴，并且能够对政治事件的是非对错形成个人观点的几代人中，政治意识也诞生了。实际上，在那些剥夺了被压迫民族自由表达和自由投票权的国家，往往会产生极为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最后，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表现出一种帝国主义心理，暴发户的一代欧洲人被告之要以稳定和可靠的社会所不会接受的方式蔑视其他种族和文化。

在政治领域，各国政府都面临新的挑战。政治家不再只对圈子里的一小撮精英分子发表演讲，而是必须面对广大的纳税人听众，必须听取人们日益老练和自信地表达的各种不同意见。他们不再能够无限期地把政治生活局限于传统的男性有产阶级；他们面对的是越来越有组织的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运动和后来的妇女普选权运动。1848 年[780]到 1914 年间，绝大多数欧洲人获得了选举权。结果，政党应运而生，每一个政党都有大批的追随者，致力于维护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天主教徒、农民、工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利益。各国政府也形成门类齐全的行政部门，管理着有着自身愿望和意志的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各国政府就是最大的雇主，而且必须顾及雇员的福利，建立国民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各国政府还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更适应妄自尊大的城市和人口稠密省份的需求，不得不全盘重新考虑首府与边陲的关系。各国政府还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专业、商业和工业团体，十九世纪的后 50 年里，政府尤其要面对工会的挑战，他们要求获得压力集团那样的权利，直到很久以后，工会才完全融入社会政治生活。

最后，在军事领域，不论是将军还是政治家，都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战争形式：平民和妇女将应召投入战争，军队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征募和动员，配备铁路运行表的作战参谋将调度配备机关枪的士兵，在每平方英尺每小时要承受 20 吨高爆炮弹轰炸的阵地作战。对于将军和政治家而言，在所有的新挑战中，战争形式的新发展是他们在 1914 年时最没有准备的。对战争意义的反思，并未促使欧洲人削减军事力量。早在 1797 年，康德即已义正词严地从道义上谴责战争。

他在《风俗的形而上学》一书的结尾写道："应当让战争永无容身之处。"但是，德·梅斯特尔的说法更为人所熟知：战争状态是"人类的常态"。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的《战争论》（1832年）是本世纪最明晰、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他在书中写道："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

对现代化进程的描述很容易使人形成一种印象，似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一帆风顺，发展方向清晰明确。这只是一种假象。这一进程时常遭到敌视，充斥着各种巨大的障碍和从未间断的意外事件。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有可能碰到一个不想让铁路穿过其领地的贵族；任何一台机器都有可能落到一个想捣毁它的无依无靠的工匠手里；一家新工厂拔地而起，许多村庄却废弃荒芜；一边是华丽的市政大厅，一边却是悲惨的贫民窟。在自豪而进步的欧洲，每出生十个婴儿，就有三到四个夭亡。经济增长并未达到稳步发展的程度，新兴的资本主义则是起伏不定的。极端的景气与骤然的萧条交替出现；1815年后的十年和平时期，整个欧洲经历了一场长时间的衰退。1848年和1871年，欧洲又相继出现新的衰退期。所有的阶段都包含为时更短的从发展到紧缩的周期。工资和物价间歇性地波动不已。以前，经济危机总是由瘟疫和饥荒这样有形的原因造成的。如今，经济危机的肇因被归因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因素，如生产过剩、市场景况或财政破产。普遍的社会物质条件明显改善，但就单个家庭而言，有的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财[781]富，有的却陷入令人绝望的贫困。从物质上说，欧洲社会是富裕的；从心理上说，欧洲人严重失常。

尽管如此，在欧洲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中产阶级看来，现代化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丰富的物质财富，丰富的多样性，丰富的新体验，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时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苏格兰的大学教授每年可以挣到600英镑，是工人阶级收入上限的10倍，用这笔钱可以购买一幢有六个卧室的房屋。1890—1891年，奥匈帝国的17个正式民族共拥有215家注册豪华旅馆和1801家报刊。"美好时代"就是一个跳华尔兹舞，在皇家咖啡馆晚餐，购买印象派作品，享受奢华的"新艺术"的时代。"里昂市长爱德华·赫里欧这样的法国政治家，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坚持自己对瓦格纳和康德的看法。"亨利·詹姆斯这位生活在欧洲的美国小说家，1895年就已经用上了电灯，1896年有了一辆自行车，1897年就已经用打字机写作。这几年正是一个英国皇家委员会所称的"大萧条"时期。当物价逐渐回落时，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这至少可以使穷人吃上便宜的粮食。只有那些拥有土地的贵族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财富正日益缩水。在4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没有发生重大战争。

“看起来这个世界将一直发展下去。”[9]

人口增长是欧洲活力最可靠的指标之一。从绝对数字上看，欧洲人口从1800年的大约1.5亿人增加到1914年的4亿多人。同期人口增长速度则是前300年的2倍（见原书附录Ⅲ，第1294页）。欧洲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人口增长的含义。1816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出版了他那沉闷的《人口论》的最后一版。他预言，粮食生产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口却以几何级数增长。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欧洲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因饥荒导致大量死亡。实际上，有些人认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就是大灾难的前兆。[**饥荒**]

不列颠群岛可耕地有限，人口又飞速增长，因而特别易受饥荒的侵袭。事实上，大灾难并未发生。大饥荒确实发生了，但不是在过度拥挤的欧洲城市，而是像爱尔兰饥荒那样发生在欧洲最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如加里西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情况有所好转，欧洲开始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几个欧洲国家，如乌克兰和法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过剩，1870年到1900年间，各地的粮食价格都在下降。不过，局势大体上还说得过去。

从十九世纪开始，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欧洲人口统计的变迁。瑞典不寻常地早在1686年就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在十九世纪开始进行定期人口普查，法国和英国是从1801年开始，德意志关税同盟国家是1818年，奥匈帝国是1857年，意大利是1861年，俄罗斯也从1897年开始定期人口普查。到十九、二十世纪[782]之交，所有国家都已有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东欧十九世纪统计资料远比二十世纪进行的统计可靠。）

人口的自然增殖导致欧洲总人口增加。在十九世纪初，欧洲年均出生率最高，死亡率也是最高；到二十世纪头十年，出生率仍呈上升趋势，在很多国家高达40‰。医学进步使得死亡率同期下降了一半，从大约40‰下降到20‰。整个欧洲的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热情既大大超过以往，也远胜于以后的年代，只有法国是一个奇特的例外。城市的发展成为人口增长的动力，到1914年，欧洲已经出现12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伊斯坦布尔位列前茅，紧随其后的是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伯明翰、鲁尔、汉堡和莫斯科。从马德里到奥德萨的其他20个城市的人口也超过50万人。在发达国家，虽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直线下降，农村人口的总量依然变化不大。1900年，英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德国为40%，30年间下降了75%。在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农村人口要占到总人口的80%，而且这一比例还

令人担忧地有所上升。十九世纪的最后25年里，欧洲有2500万人移民到美国。1914年前的20年中，加里西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移居海外。(见原书附录Ⅲ，第1294页)

是否应当把十九世纪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迁仅仅看作是文化生活的“背景”或决定因素，历史学家意见并不一致。例如，马克思就是一个决定论者，“在他看来，一切思想和意识都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从而也就是为根本的经济关系所决定。”(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马克思与其说是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不如说是他所处时代的产儿。)有些人则站在另一个极端，主张文化有其自身的生命。时至今日，至少大多数人都接受一种折中的见解：要正确了解文化，就必须涉及文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

浪漫主义 在十九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主流思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反动。其他人则认为它反映了工业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各种态度。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对。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浪漫主义兴起时的环境，的确与启蒙运动吸引力的衰退息息相关（见第9章)。同时，浪漫主义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与这样的一代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受过革命的严酷考验，感受到机器和工厂的冲击，对1815年后死气沉沉的反革命氛围感到愤怒。浪漫主义几乎无所不在，甚至连俄国也有所表现，如人们对天主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分裂漠不关心。浪漫主义的影响波及各种艺[783]术形式，尤其是诗歌、绘画和音乐，以及所有门类的人文科学。浪漫主义在德国最为繁荣。英国的浪漫主义也势头良好，尽管像拜伦勋爵这样最重要的浪漫主义者在欧洲大陆要比在国内更受欢迎。稍晚一些时候，浪漫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与根深蒂固的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分庭抗礼。在波兰和匈牙利，浪漫主义也成为主流思潮，表达了民族挫败的极端痛苦。

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则是反对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的力量，浪漫主义专注于一切非理性的人类体验：激情、异常的超自然事物、迷信、痛苦、疯狂和死亡。启蒙运动强调征服自然，浪漫主义热衷于匍匐在威力无边的大自然脚下：可怕暴风和瀑布、巨大的山脉、空旷的沙漠和寂寥的海洋。启蒙运动承继传统的和谐、克制以及支撑文明习俗的法则，浪漫主义力求挑战既定的习俗，喜好一切野蛮、离奇、异国情调、陌生和疯狂的事物。启蒙运动力图揭示隐藏在这个世界混乱表象下的秩序，浪漫主义热衷于一切生灵内在的“精神”。启蒙运动要么是不信宗教的，要么就是反宗教的，浪

漫主义则笃信宗教，甚至蔑视传统的基督教仪式。启蒙运动迎合的是知识分子精英，浪漫主义迎合新近获得解放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

[帕纳萨斯人] [消遣]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说明浪漫主义在整个欧洲散发出来的魅力，诗歌无疑是最佳的途径。约翰·济慈（1795—1821年）像古人一样因一位中世纪少女的魅力而憔悴：

> 骑士啊，是什么苦恼你
> 独自沮丧地游荡？

[784]

帕纳萨斯人（PARNASSE）

1835年夏，一群徒步旅行者住进日内瓦的联合旅馆，其中包括匈牙利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和法国作家乔治·桑。他们在旅馆登记簿上的留言，充分展现出极佳的幽默感和浪漫主义一代人的观念：

	李斯特	乔治·桑
出生地：	帕纳萨斯山	欧　洲
居住地：	–	大自然
职　业：	音乐哲学家	–
信　仰：	怀疑	上帝
目的地：	真理	天堂
护照期限：	–	无限
颁发国：	–	公共舆论[1]

在1835年的时候，“欧洲”观念并不比帕纳萨斯山的传说*更为真实。

---

* 希腊南部的帕纳萨斯山古时被认为是太阳神和文艺女神的灵地，希腊传说中的诗人之山。——译者注

[785]

消遣（RELAXATIO）

1865年7月14日，年轻的英国插图画家、登山家爱德华·怀伯尔在第17次尝试时登上马特峰。马特峰在法语中称作塞尔万山，海拔4440米（14566英尺），金字塔形的岩山从山麓的村镇策尔马特拔地而起，在下山的途中，怀伯尔登山队中的4名队员失足身亡。[1]

在阿尔卑斯山登山史上，怀伯尔登山队登上马特峰绝非首个重要的行动。1799年，费迪南德·德·索绪尔就已经登上勃朗峰。怀伯尔登山队的悲剧性壮举宣告了登山这一新兴运动的诞生，突出地表明人们对娱乐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任何运动都已不再为有闲的精英所独享。传统的嗜好，如打猎、射击、钓鱼、骑马、游泳以及教育旅行，都已不再有任何限制。欧洲各色人等都在寻找新的运动项目、新的挑战以及保持身体健康的新方法。

1863年10月26日，在伦敦弗里梅森酒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足球协会宣告成立。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使足球规则标准化，确定比赛组织的基本原则。（对这项运动抱有其他想法的代表，另行建立了英式橄榄球联合会。）职业俱乐部很快建立起来，英国足球联盟也于1888年正式成立。[2]

英国足球联盟推广从“英式足球”发展而来的足球运动，此后这项运动迅速传到欧洲大陆。到十九世纪末，足球已经成为欧洲极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和经常性的观赏性娱乐活动。1904年5月，来自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英国、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等国的代表，在巴黎成立国际足球联合会。足球是最能体现平等精神的运动。正如过去的一句格言所说：“踢球时人人皆兄弟。”[3]

湖中的芦苇已经枯了，
也没有鸟儿歌唱！[10]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既陶醉于布尔盖湖的美丽，也沉浸在关于不朽的思想之中：

哦，时光，停留你飞一般的脚步！
而你，幸运的时针

暂停你的行程！
让我们在最美好的时刻
品味这转瞬即逝的喜悦。[11]

乔科莫·列奥巴尔迪（1789—1837 年）吟唱起《亚洲流浪牧羊人的黄昏之歌》：

[784]

可是，孤独、永远的流浪者，
你是如此富有思想，或许你了解
现世生活的内涵——
我们的痛苦和叹息，
或许你了解，这垂死的含义——
容颜最终老去，
或许你了解，这尘世的消亡——
每一个熟悉而钟情的伴侣的离去。[12]

约瑟夫·弗赖赫尔·冯·艾兴多尔夫（1788—1857 年）抒发了他最喜爱的主题：希望、祖国和家乡西里西亚森林中的孤寂：

在凉爽成荫的山谷
老水车在转动。
但我的爱人
已离开她曾居住的地方。

她答应做我的真爱，
用戒指把爱保障。
如今她的誓言已经飘散，
戒指也已破碎。

[785]

当我听到水车的吱呀，
再没有任何意愿和挂念。
最好的治疗就是死去
一切归于寂静。[13]

约留茨·斯洛伐茨基（1809—1849 年）感情真挚而动人，赞美了高尚的精神生活：

倘若人能选择，他会把安家之所
选在峭壁上的鹰巢，他会知道
如何入眠——即使闪电映红了双眼，
如何倾听沙沙作响的松林中精灵的哀鸣。[14]

[786] 不久以后，浪漫主义令人陶醉的成功引发了复古的趋势。这种复古以复兴古典主义理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简言之即新古典主义。此后，这两股对立的潮流在整个十九世纪始终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相互竞争的铁路公司修建风格截然不同的铁路总站，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的尤斯顿车站属于优雅的古典风格，邻近密德兰铁路公司的圣潘克拉斯车站则是火焰式的新哥特建筑。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在文学上结出累累硕果。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年）、亚当·密茨凯维支（1798—1855年）和J.W.歌德这三位时代巨人难以简单地加以归类，他们的作品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元素糅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不朽之作《叶普盖尼·亚历山大·奥涅金》（1832年）、《塔杜施先生》（1834年）和《浮士德》（1808—1832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完成，也都属于诗体小说或诗体戏剧。这三部体现出卓越语言技巧的杰作恰逢其时，识字的迅速普及不仅使这三部作品的作者赢得民族诗人的荣誉，其诗行和段落还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内容。每一个波兰人都会背诵“哦，立陶宛，我的故乡，你是如此繁荣”；每一个德国人都会陶醉于“柠檬盛开的土地”；每一个俄罗斯学童都学过来自圣彼得堡的“青铜骑士”的诗行：

上天注定，我们要
要打开通向欧洲的一扇窗口；
我们会在海边站稳脚跟……

我爱你，彼得的创造，
我爱你那整齐优雅的容颜，
我爱浩浩荡荡的涅瓦河的波涛，
和两岸的花岗岩……

展现出你全部的壮丽，彼得之城，
如俄罗斯一样岿然不动！
被你征服的大自然
在你面前也失去了暴烈的脾气。[15]

不过，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年）绝非只是一位民族诗人。他是超然卓立的智者，高居于几乎所有思想领域之上。他擅长各种不同的体裁，了解迅速变化的世界，创造力也渐次发展，凡此种种使他称得上是最后一位“通才”。歌德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先后入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在魏玛住了将近半个[787]世纪。他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哲学家、科学家、旅行家、律师、管理者。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歌德初期的浪漫主义倾向开始消退；在朋友席勒的鼓励下，他的古典主义创作时期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浮士德》犹如一幅巨大的心理全景画，包含了歌德对人类境况的毕生思考。歌德是欧洲最伟大文化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他不断追求无法企及的境界：

> 万象皆俄顷，无非是映影；
> 事凡不充分，至此始发生；
> 事凡无可名，至此始果行；
> 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16]

浪漫主义晚期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态。这与许多艺术家患有肺结核，以及为了治病而定期服用鸦片有关。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逃离曼彻斯特文法学校后过着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后来在牛津吸毒成瘾。他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1822年）影响到风格奇特的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以及波德莱尔的成长。斯洛伐茨基的最后作品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流露出奇异和神秘的特征，[17]杰拉尔·拉布鲁尼·德·内瓦尔（1808—1855年）这位患精神分裂症的“超级浪漫派”、“最浪漫的浪漫主义者”，在诗歌中也流露出一种病态：

> 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女伴在哪里？
> 她们躺在坟墓里。[18]

浪漫派表现出这种显而易见的精神错乱以及对幻影和幻觉的兴趣，我们不难从中发现现代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象征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和颓废派的源头（见下文）。

1848年，聚集在那不勒斯流亡者之子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828—1882年）周围的诗人和画家，在伦敦高尔街的一幢房子里成立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是这个时代的完美典

范，它的灵感来自欧洲大陆，却仍然属于排外的英国人的文艺运动。除罗塞蒂兄弟外，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主要成员还有J.E. 密莱司（1829—1896年）、W. 霍尔曼·亨特（1827—1910年）、福特·马多克斯·布朗（1821—1893年）和爱德华·伯恩－琼斯（1833—1898年），以及在文艺批评领域发掘出的一位斗士约翰·罗斯金（1819—1900年）。这个团体的名称来自于他们对意大利十五世纪艺术风格的共同[788]爱好，这使得他们反对当时的学院派绘画。他们的创作明显表现出文学与艺术的相关性，D.G. 罗塞蒂既翻译但丁的作品，又是维荣的翻译者。他们还把他们的原则应用于从建筑、家具到镶嵌工艺、挂毯、彩色玻璃和室内装饰的各个领域。他们致力于追求他们认为既属于中世纪晚期艺术的技巧、又首先体现出中世纪晚期艺术精髓的东西。他们模仿肖像画明晰的结构和鲜明的色彩；他们流露出一种往往以神秘的虔诚体现出来的严肃道德感。他们最受欢迎的绘画作品当属密莱司的《奥菲莉娅》（1851年）和亨特的《世界之光》（1854年）。威廉·莫里斯（1834—1896年）是后来加入的新成员，他是诗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手工艺人、印刷商和设计家。在这个团体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破裂之后很久，莫里斯还在凯姆斯科特主办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一些最富创意的活动。

这一时期也是欧洲大陆小说艺术的全盛时期。奥雷诺·德·巴尔扎克（1799—1850年）和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年）出生在隔海相望的鲁昂和普茨茅斯，两人都跻身于牢牢抓住大众想象力的最优秀作家之列。这一时期的重要小说全部及时地翻译成各种主要的欧洲文字。批评家们对作品的评价并不一致，但以下作品肯定属于一流作品之列：亚历桑德罗·孟佐尼的《约婚夫妇》（1825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1834年）、狄更斯的《奥利佛·退斯特》（1838年）、米哈伊·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40年）、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W.M. 萨克雷的《名利场》（1848年）、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1862年）、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费奥多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6年）和《克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以及波利罗·普鲁斯的《玩偶》（1890年）。通过分析各种社会和心理问题，小说已经成为欧洲普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家习惯在小说创作中融入自己最贴近的观察。据说福楼拜曾经说过："包法利夫人写的就是我本人。"

如同文学一样，音乐领域在十九世纪也孕育出数量繁多、形式多样的作品，这些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古典和早期浪漫派大师创立的音乐宝库。生于汉堡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年）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作曲家。他融合了对古典形式的合理关注与浪漫主义对抒情性

和强烈情感的酷爱，因而赢得了“巴赫和贝多芬的真正传人”的荣誉。赫克托·柏辽兹（1803—1869年）是一连串更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管弦乐作曲家中的第一位，他的《幻想交响曲》（1831年）打破了一切现有规则。浪漫主义文学成为柏辽兹灵感的主要来源。有人说，“雨果是浪漫主义者，而柏辽兹本人就是浪漫主义的化身”。浪漫派音乐家的名单上还有最伟大的钢琴大师、倦怠的波兰流亡者弗雷德里克·肖邦（1810—1849年）、不知疲倦的匈牙利艺术大师弗朗茨·李斯特（1811—1886年）、罗伯特·舒曼（1810—1856年）和菲力克斯·门德尔松－巴特霍尔德（1809—1847年）。一份名单（见原书第819—820页）囊括了绝大多数民族乐派的主要人物；十九世纪后期有杰出的俄罗斯音乐家安东·鲁宾斯坦（1830—1894年）、彼得·柴科夫斯基（1840—1893年）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年），德国新教徒马克斯·布鲁赫（1838—1920年）和瑞士犹太人恩斯特·布洛赫（1880—1959年），[789] 以及一个繁荣的奥地利－德国新浪漫派分支，其主要人物包括安东·布鲁克纳（1824—1896年）、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年）、理查·斯特劳斯（1864—1949年）和歌曲作曲家雨果·沃尔夫（1860—1903年）。在整个十九世纪，法国乐坛涌现出一批以细腻和独创性见长的杰出天才：塞萨尔·弗兰克（1822—1890年）和卡米耶·圣－桑（1835—1921年）、加布里埃尔·福雷（1845—1924年）、克劳德·德彪西（1862—1918年）以及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年）。

大歌剧把音乐、历史与文学戏剧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极为适合于浪漫主义风格的音乐表现形式。三个主要歌剧中心的竞争造就了大歌剧的成功。法国歌剧的主要人物是夏尔·古诺（1818—1893年）、贾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年）、乔治·比才（1838—1875年）和儒勒·马斯内（1842—1912年）；莫扎特和韦伯开创了德国歌剧传统，卓越的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则把德国歌剧推向顶峰；意大利歌剧无与伦比的优美旋律传统的缔造者是乔亚琪诺·罗西尼（1792—1868年）、吉坦诺·唐尼采第（1797—1848年）、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年）和吉亚卡莫·普契尼（1855—1924年）。一个被冠以喜歌剧、轻歌剧或音乐喜剧等不同名称的歌剧门类也繁荣起来，尤其是巴黎的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年）、维也纳的小约翰·斯特劳斯（1825—1899年）和弗朗茨·列哈尔（1870—1948年），伦敦的吉尔伯特和苏利文（见原书附录Ⅲ，第1278页）。

十九世纪见证了各种音乐机构的兴起，音乐学院、管弦乐和合唱团体、专用音乐厅、音乐出版社和音乐院系把音乐艺术转变为一项重要的公众事业。

G.W.F.黑格尔（1770—1831年）的深刻思想支配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哲学**。黑格尔是费希特在柏林大学的继任者，他的很多观点完全跟浪漫不沾边，作为职业哲学家，他自认是个理性主义者。在一次去伯尔尼奥伯兰的旅行中，他评论说："弥撒一成不变的单调场景，只能使我产生一个念头：令人生厌。"另一方面，他的许多独创性思想在一个思想大潮涌动的时代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还为许多比他更桀骜不驯的学生和评论家提供了充足的精神武器。1806年10月，他与拿破仑在耶拿擦肩而过，当时他刚完成《精神现象学》，赞美这位拿破仑皇帝的"时代精神"。

事实上，黑格尔所喜爱的两个理念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是对立面矛盾冲突的产物——辩证法。另一个是"精神"，即纯粹同一性的实质，在《历史哲学》中，他把"精神"赋予一切政治国家和文明演进的每一个阶段。黑格尔把辩证法应用于纯理念领域，扩大了辩证法的适用性，从而全面有力地阐明了进步的概念。辩证法澄清了混乱，表明矛盾冲突会导致好的结果。另一方面，黑格尔用历史精[790]神来颂扬国家，使之成为与时代权力作斗争的民族运动的武器。黑格尔抱有极端的德意志中心论，似乎把新教和即将在那个时代崭露头角的普鲁士的最高权力合理化。他歌颂战争和战争英雄，把日耳曼人置于现代文明领袖的地位。"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新世界的目的是实现作为自由的无限自决的绝对真理。"黑格尔一本正经地判定美洲是"绝对理念的最后体现，超乎它以外恐怕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了"。[19]不知道美国人听到这样晦涩艰深的形而上学式赞誉时是不是会感到荣幸。不过，这或许有助于解释美国学术界根深蒂固的亲德传统的原因。

科学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运动而非浪漫主义的传统。然而，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的著作把科学思想发展到极致，不仅标志着"实证主义"这一哲学分支的诞生，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有其自身仪式、教义和神职人员的伪宗教。孔德认为，一切知识都经历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依次按照神学、形而上学、"实证"或科学原则来获得系统化。孔德在《实证政治学体系》（1842年）一书中首次阐述了这种"三阶段规律"，它是了解孔德对科学的精细分类和在《实证哲学教程》（1850—1854年）中勾勒的新"社会科学"的关键。这门"社会物理学"依照科学方式重组人类社会。"社会工程师"队伍有这样一句口号："为预知而认知，为预防而预知。"孔德当然是现代社会学之父之一，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序列的最高层。同时，他坚持必须拥有制度化的宗教力量，还发起创立一种实际上属于科学教会范畴的宗教；这样一来，他临了实际上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

立场，把科学变成了神秘崇拜的对象。在 T.H. 赫胥黎这样的批评者看来，孔德的实证主义 = “天主教 - 基督教”。

在同一时期，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突然加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科学发现虽然不如哥白尼、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那么重要，但知识的新大陆完全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科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物理、化学、医学和生物学领域涌现出一些最卓越的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拉第、门捷列夫、巴斯德、孟德尔、赫兹、达尔文。重大发现和发明不再是零星出现，而是成千上万地成批涌现出来（见原书附录Ⅲ，第 1272—1273 页）。除了一两位美国天才人物外，科学领域完全成了欧洲人的一统天下。1851 年，在阿尔伯特亲王的支持下，伦敦举办大博览会，数百万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蜂拥而至，博览会的收入交给自然科学博物馆和皇家科学与技术学院。[元素] [基因]

[791]

元素 (ELEMENTA)

1869 年 3 月 1 日，圣彼得堡大学化学教授迪米特里·I. 门捷列夫（1834—1907 年）准备去加里宁旅行。他专心编写《化学原理》的教材，潜心制订一项博学的俄罗斯科学推广计划，还接受委托研究农家乳酪制作方法。当时他的教材正写到化学元素的分类，为此他需要寻找一种将各种元素分门别类加以区分的体系，3 月 1 日这天，他突然找到了一种方法，即按照原子量以及元素彼此之间的相同特性，把各种元素排列成一个表格。

九年后，门捷列夫参加了在卡尔斯鲁厄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化学大会，在会上，意大利人斯坦尼斯劳·卡尼扎罗提醒他注意到一张按照原子量排列的元素表。从那以后，门捷列夫就一直在进行某种智力纸牌游戏，将各种元素按照原子价和不同特性进行排列。他将卡尼扎罗的元素表与自己的分类编组方法结合起来，结果得出了元素周期表的最早样式，他还得出了周期律的一个临时性的表述：“各种元素按照其原子量价排列，其特性表现出完全的周期性。”同月，他在俄国化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试论基于原子量和化学亲合性的元素分类体系》。1871 年 3 月，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家德国期刊。

在门捷列夫之前，人们对化学元素的认识是零散的。古代人辨别出 10 种真正的元素，但他们的认识与对土、火、气、水四大要素的信念交织在一起。拉瓦锡分辨出23种元素，汉弗利·达维

以电解法分离出钠和钾。1860年，卡尼扎罗在卡尔斯鲁厄的元素表上列出了60种元素，正好是自然界存在的90种元素的三分之二。

门捷列夫的发现并未赢得多少直接的支持。英国和德国的一些最重要的化学家，包括门捷列夫一度在海德堡共过事的本生在内，都拒不接受门捷列夫的发明。1875年，门捷列夫的机会到了，一个法国人辨别出一种新元素“镓”。门捷列夫能够证明这一新元素是他能预测其存在、原子量和属性的六个未知元素中的一个。这位俄国理论家证明自己的理论超出了研究实验，这令整个化学界惊奇不已。国际声望和财富接踵而至。然而，在俄国，门捷列夫的开明观点引发了矛盾。1880年，他未能成为俄国皇家学会的正式会员，1890年他被迫辞去圣彼得堡大学的教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成了万事通，不仅为制造黑色火药和破冰船提供专家意见，还是制定度量衡、发展航空学乃至石油工业的顾问。

[792] 令人惊奇的是，在得知原子结构后，门捷列夫认为放射学理论与他的元素周期率相抵触。事实上，正是放射学最终证实了他的伟大发现。每一种元素的原子中所含的电子数与其原子量和化学特性密切相关。[电子]

门捷列夫逝世后，他的学生把一张元素周期表覆盖在他的棺木上。此时，元素周期表已经成为公认的物质化学分类原则，成为现代化学与物理学的交汇点。1955年，为纪念门捷列夫，人们把19种人工放射性元素中用氦离子轰击锿-253获得的一种元素命名为“钔”。

科学不断置疑传统的宗教假说，其顶峰是围绕达尔文的《物种起[792]源》(1859年)和进化论展开的大论战。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所受的教育，是相信《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完全是实情，相信上帝在六天六夜里创造了世界，因而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人类是在数百万代时间里缓慢演化而来的理论。科学与宗教的这种独特冲突没有更早些爆发倒真是一件怪事。毕竟，早在1669年，丹麦人尼尔斯·斯丹诺就写出了关于古生物化石的开拓性古生物学论文。1778年，G. 布丰在《自然史》中估算地球存在的时间大约为75000年，这是人类第一次科学计算地球的年龄。自1796年后，把宇宙的起源归因于一团不断膨胀的气云的拉普拉斯星云假说也开始流传。1809年，法国博物学家J.B. 拉马克（1744—1829年）提出了以获得性特征遗传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自斯丹诺时代以来，地质科学家一直在与把自然陆地的形成归因

于《圣经》所记“大洪水”的所谓“洪积论者”作斗争。[**猴子**]

[793]

猴子（MONKEY）

1860年6月30日，星期六，牛津大学一间教室里满满地挤进了700人，他们是来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的。表面看来，他们是来听美国学者德雷珀博士宣读论文《对达尔文先生关于欧洲智力进化观点的思考》。实际上，他们是来旁听这篇论文的两位主要讨论者之间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进化论的狂热反对者、被称为“油滑的塞姆”的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由于达尔文缺席，论战的另一方就是将要获得“达尔文的牛头犬”这一绰号的古生物学家T.H.赫胥黎教授。

德雷珀博士的论文早已湮没无闻。威尔伯福斯主教以一种愉悦的心情问道，赫胥黎先生是否“声称自己的血统是来自于一只猴子”？赫胥黎始终镇定如一，解释说达尔文的学说远非只是一种假设。最后，他说道：“我不会因祖先是一只猴子而感到羞愧，但我会羞于与一个运用极高天赋来混淆真理的人为伍。”[1] 一片喧嚣中，人群中一位妇女晕倒在地。

大众接受现代科学的过程中，这次会议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一年前，《物种起源》正式出版；两年前，达尔文读到一篇名为《论物种多样性的趋势：兼论自然选择方式使多样性和物种长久存在》的论文。四年后，在谢尔顿剧场举行的又一次论辩中，本杰明·狄斯雷利忍不住以“油滑的塞姆”的风格嘲笑说：“问题在于，人是猿猴还是天使？我的回答是，阁下，我站在正确的一边！”

进化论此后的发展历程时常为人提及。后来，人们把达尔文本人亲自促成的一种新进化论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它鼓吹的不祥命题不光是适者生存，而是惟有适者才有权生存。另一支进化论流派则专注于“改善人种”的实验科学，如人类的繁殖。这一流派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优生学，其先驱是以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为首的数位英国学者。这一学派的拥护者包括高尔顿的学生和传记作者卡尔·皮尔逊（1857—1936年）——他是一位统计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了“社会帝国主义”理论——以及把这一学派思想在德国广为传播的H.S.张伯伦。

弗朗西斯·高尔顿应对当时一些最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和假成果负责。在深入西南非洲腹地进行开拓性考察后，他出版了《旅行

的艺术》（1855年），使非洲探险一时间蔚然成风。他的《气象[794]学》（1863年）开创了现代气象科学。作为早期的心理学家，他率先研究孪生子的行为，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心理测试中心。他热切地研究优生学，撰写了《家畜与人的群居性》（1871年）、《人类天赋研究》（1883年）、《自然遗传》（1889年）等一系列著作。此前，他还完成了一项极受欢迎的研究《天才遗传的规律及其价值》（1869年）。他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从法官到摔跤选手等范围广泛的成功者的血统，力图证明“禀赋与天才乃至道德品质都具有在家庭中传播的趋势”。在《天才遗传规律》的最后一节，他分析了“不同种族的价值比较”，将种族划分成从A到I的九个等级，断定古希腊人是“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民族”，而非洲黑人尽管有一些杰出的个人，永远无法达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平均水平，澳洲土著人的等级又次于黑人。[2] 达尔文声称从未读过比高尔顿的这本书“更有趣、更富原创性”的著作，但他拒不承认优生科学，视之为“乌托邦”。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达尔文的葬礼上，高尔顿公开呼吁，大教堂绘有《创世纪》内容的彩色玻璃窗应该换成与进化论更为相配的内容。[3] 关键在于，高尔顿这位“天才的遗传”的鼓吹者，正是达尔文的堂兄弟。[4]

达尔文带来的冲击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这部分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科学论战吸引了广大的听众，更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事关人类本身：人类的祖先不是亚当而是类人猿——“一种多毛的四足动物，长有尾巴和尖尖的耳朵，大概其习性是树栖的”。这在当时无疑是个耸人听闻的新闻。自1831—1836年间乘皇家海军贝格尔号远航南非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后，达尔文收集了物种形成的有关资料；1838年，达尔文读到马尔萨斯的著作，产生了有关物种进化的最初灵感。直到20多年后，他才在别人的催促下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公开了自己的论点。30多年后，他才在《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年）一书中充分论述了这些观点。后人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达尔文对自然选择[794]或者说“适者生存”过程的许多细节性描述；但几乎所有的人很快就接受了进化论的主要内容：现有动植物物种的演化，是通过与所处环境的不断相互作用以及物种内部的竞争实现的。同时，主流基督教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人类进化是出于上帝的意旨的观点。社会科学家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众多的学科；“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有如弱肉强食的丛林，只有最适应的民族、阶级或个人才能生存下来——有很长的历史。

实际上，这个时代最富特色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普遍相信人类能够、而且应当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和自然现象。因此，除了经济学和人种学之外，又出现了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政治科学以及后来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的拓展，纯哲学的空间缩小了，最后只剩下少数传统的研究领域：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政治理论。

宗教再度恢复了活力，神学文献大量出版，民众普遍表现出宗教狂热，教会教义和组织也有所强化。这种新风气的形成，部分是出于对革命时期种种暴行的深恶痛绝，部分是因为早先的许多宗教歧视已不复存在。启蒙运动接近尾声，人们早已普遍接受了宗教宽容原则。[795]十七世纪以来，大多数新教国家就已经废除了针对天主教的歧视性法律。新教徒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也获得了同等的权利。犹太教徒在中世纪时遭到驱逐，如今很多地方又重新接纳了犹太教。例如，1817年，普鲁士创立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合而为一的全国性教会，1850年宪法则完全确立了天主教会的地位。在奥匈帝国，1867年《奥匈协定》的内容之一就是确保完全的宗教宽容。在英国，1829年的议会法案撤销了针对罗马天主教的绝大多数禁令，1888年又解除了对犹太教徒的禁令，但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依然被排除在君主政体之外。在荷兰，尽管天主教与共和派之间关系紧张，拿破仑的政教协定却一直实行到1905年。激进的法国理性主义者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理性的狂热，为了与圣母升天节对抗，他们在里摩日举办了一个数学节。

相反，在俄国，东正教会对宗教多元化实行严格的限制。波罗的海沿岸前瑞典省份的新教徒、高加索的土著基督教徒、中亚的伊斯兰教徒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犹太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和前波兰省份的东仪天主教徒受到国家的控制、折磨和歧视。法律规定犹太人必须居住在所谓的“犹太居留区”（见原书附录Ⅲ，第1311页），只有获得特别许可方能在其他地区居住。俄罗斯的罗马天主教会由所谓的圣会来管理，实际上被剥夺了与梵蒂冈的一切直接联系。圣彼得堡拒绝与罗马有任何官方往来，直到1849年以有利条款达成一项宗教协定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1839年在整个帝国，1875年在前波兰议会王国，东仪天主教徒都被强制皈依东正教。

有三个独立的新现象促进了欧洲的神学争论，一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开始走出彼此隔绝的樊篱，互相交换各自的观点；二是浪漫主义时期对外来宗教，尤其是佛教和印度教的浓厚兴趣；最后是科学精神的发展。在整个十九世纪，很多神学家不但在本教派内享有盛名，还

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这些神学家包括：西里西亚人、加尔文教徒、柏林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激进的布列塔尼修道院院长于格·拉梅内（1782—1854年）、巴伐利亚天主教徒、慕尼黑教区长J.J.伊格纳兹·冯·陶林格尔（1799—1890年）、由英国圣公会皈依罗马天主教的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年），以及其著作在死后数十年间一直不为人理解的悲观的丹麦人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年）。

施莱尔马赫在普鲁士联合教会颇具影响，他把神学的严密性注入到一种整体的人类艺术和文化观。在《论宗教》（1799年）一书中，他告诫浪漫主义的一代人，他们表面的鄙夷之下其实蕴藏着深层的同情心；他的主要著作《基督教信仰》（1821—1822年）是对新教教义[796]的标准概括。直到1989年，他的《神学研究纲要》（1811年）仍被视为这一领域的最佳入门书籍。[20]

拉梅内神父试图调和基督教会与具有革命传统的教派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传统足以同基督教信仰相提并论。他提出"自由之神"的口号，立场也日趋激进，最终迫使罗马声明与他断绝关系。1830年革命的后果、梵蒂冈对天主教波兰的背叛、教会对社会正义的漠视，所有这些都使他愤慨不已，因而成为现行社会体制的批判者。信仰不能与对教会的忠诚混为一谈，爱国主义与对国家的忠诚也不是一回事。他著作的书名表明了他的立场：《一个信徒的话》（1833年）、《罗马的困境》（1836年）、《平民读本》（1837年）和《现代奴役》（1840年）。拉梅内的著作对欧洲天主教内部的持异议者影响深远，同时也足以证明，一颗批判的心灵绝非深刻信仰的障碍。

陶林格尔领导了对教皇无谬说的抵制（见下文）。他的《论教皇与宗教会议》（1869年）被认为是"一千年来对罗马教廷最严厉的抨击"。纽曼曾任牛津大学圣玛丽大学教区的教区牧师，他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他的经历说明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纽曼作为安立甘宗内部牛津运动的领袖而声名鹊起。他与爱德华·皮由兹（1800—1882年）、约翰·基布尔（1792—1866年）共同撰写了论战性的系列《时代书册》，力图糅合"第三十九条论纲"与早期基督教神父的观点，教会对《书册》的攻击使纽曼对安立甘教义的信仰荡然无存，并促使他辞去了神职。在《为自己的一生辩护》（1864年）一书中，他极为坦率地回顾了自己精神上的挣扎。如书中所记，他皈依天主教之举招致众多的抱怨。后来，纽曼与同他一道皈依天主教的红衣主教H.E.曼宁（1808—1892年）在教皇无谬说问题上发生分歧；不过纽曼的异议并未发展到不服从的程度。

克尔恺郭尔的著作首先是针对黑格尔哲学，其次才是针对丹麦基

督教会暧昧的惯例，但克尔恺郭尔的涉猎范围远不止于此，他还深入到其他无人探究的知识领域。《恐惧与战栗》（1843 年）、《恐惧的概念》（1844 年）和《对死的厌倦》（1849 年）进入并考察了无意识心理学领域。《非科学的附言》（1846 年）常常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开山之作。克尔恺郭尔的全部著作有力地抨击了理性主义。克尔恺郭尔认为，主观性即真理。他写道："基督教王国的历史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漠视基督教的历史。"在一段奇特地预见泰坦尼克号悲剧的段落中，他把欧洲人比作一艘大船上的乘客，在驶向毁灭性冰山的航程中以狂欢作乐来度过漫漫长夜。

论辩过程中，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开始采纳许多文学和历史批评的方法和价值观。在这一方面最大胆的初步尝试，要算埃内斯特·勒南（1823—1892 年）的《耶稣传》（1863 年），该书导致作者被法兰西学院暂时除名。即便如此，"现代主义"仍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在被教士团郑重其事地声讨之后。

很难对这一时期宗教狂热的程度做出评判，确定无疑的是，较之[797]十八世纪，基督教信仰在十九世纪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也唤起了人们更大的热情。扫盲识字的普遍趋势既促进了世俗教育的发展，也使宗教教育得到强化。传教运动既以遥远大陆的异教徒为对象，也针对新兴工业城镇中贫穷和堕落的人群。尤其是各个新教国家，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领导和社会规范作用。各种奋兴派运动，如德国的虔信派和英国的循道宗，渗透到全国各地和各个社会阶层。在其他国家，如爱尔兰和波兰部分地区，民众的虔诚逐渐与民族反抗运动结合起来。宗教艺术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这些宗教艺术形式通常受到中世纪模式的启示和激发。这一时期的宗教艺术主要体现在哥特式教堂建筑、赞美诗、像英国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和德国拿撒勒画派这样有宗教倾向的艺术运动以及大量的教会音乐。按照新哥特派建筑师 C.F. 辛克尔（1781—1841 年）的看法，"艺术本身就是宗教"。从柏辽兹到弗兰克，作曲家始终满足了人们对新的弥撒曲的需求。[弥撒]

罗马天主教会不可能不受变革之风的影响，虽然它显然不愿意随波逐流。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和德国南部等天主教中心地区，较少直接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更进一步说，革命时代的各种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高层天主教教士团的统治，他们因此抱残守缺，极为保守，这种立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暴露出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境内围绕教皇国展开的殊死搏斗才被压制

* 原文如此，按照下文内容看，应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译者注

下来，令梵蒂冈惊恐不已。部分是在介入论战的法国主教和1814年恢复活动的耶稣会的压力下，教皇至上论再度时兴起来。[**伯纳黛特**]

[798]

伯纳黛特（BERNADETTE）

1858年2月11日到7月16日，在比戈尔地区卢德附近的一个岩洞里，一个营养不良、患哮喘症的流浪儿玛丽－贝尔纳·苏比鲁看见了一连串共18个奇异的幽灵。伯纳黛特听到一阵疾风吹过，然后就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她身穿纯白衣服，系一条蓝色腰带，脚上则是金色的玫瑰。这个幽灵告诉伯纳黛特要祈祷、忏悔，要修一座小教堂，并饮用山上的泉水。有时，幽灵用方言宣布她是“圣灵怀胎”。幽灵撒圣水以驱除魔鬼，又证明自己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卢德镇凡是亵渎幽灵的居民都得了病。其他踩踏了岩洞附近玫瑰的人，则发现自己的财产遭受了损失。泉眼中流出的水证明具有治疗功效。

起初，政府及教会当局对此事均未在意。他们长时间地审问伯纳黛特，收罗了一大堆证词，还在岩洞外修起了一道栅栏。之后，他们再也无法阻止本地人和潮水般涌来的朝觐者，就把伯纳黛特搬到纳韦尔的一家女修道院。不久以后，他们决定附和他们无法战胜的事物，为了接待朝觐者，修建起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大教堂，为检验那些声称被奇迹般治愈的人，还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医疗中心。卢德成为欧洲最大的宗教康复中心。

在教会史上，圣伯纳黛特（1844—1879年）属于一大群圣母玛利亚空想者和坚持传统信仰、反对日益抬头的现世主义的天主教虔信者中的一个。与患肺结核的圣特蕾莎·马丹（1873—1897年）一样，伯纳黛特展现出受苦受难的信徒的圣洁，马丹被人们称作“利西奥的小花朵”，她所出版的自传《心灵的诉说》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伯纳黛特也被法国天主教会招入反对教会之敌的斗争。1933年，在圣特蕾莎被追封为圣徒18年后，伯纳黛特也被封为圣徒。

另一方面，玛丽－贝尔纳·苏比鲁的事例表明，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现代化的时代，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历史学家描述了公立学校和兵役制稳步地将农民转变成整齐划一的法国人的过程。1858年的事件表明，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每一个卢德人，包括主教在内，都说卢德方言。没有一个人认为伯纳

黛特是疯子或是魔鬼崇拜者。她并未描述常见的圣母玛利亚形象，也没有描绘基督之子的形象。她属于这样的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社区：人们崇拜水，亡者和新生儿衣物的洗涤仪式完全是由妇女来主持。在她生活的地区，主教虽然修葺了圣母玛利亚的神龛，比利牛斯山荒野的洞穴和岩洞依然是仙女出没的地方。她甚至把幽灵叫做"小蜻蜓"，这个词有时也用来指"仙女"。她的赤脚、满是虱子的身体，她始终如一的坚定，最重要的是，她一连数小时出神入迷地跪地不起，都使她极其令人信服。有人认为，她的肢体语言成为"社会记忆的非语言媒介"。伯纳黛特所传达的，正是周围的人信以为真的东西。 [799]

庇护九世（1846—1878 年在位）——梅特涅最初误以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统治时期，教会采纳的信条超出了最专横的中世纪教皇所能提出的要求。1854 年，教会颁布"圣母玛利亚圣灵感孕说"。1864 年，名为《重大事项》的教皇通谕断言教会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威之上，而《谬误举要》异乎寻常地列举了一系列"现代错误"，内容包括从公证结婚到宗教宽容的种种事项。1870 年，梵蒂冈会议通过教义法规，把教皇无谬说引入信仰和道德规范范畴。这些立场太过极端，教会内外对教皇的尊敬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德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冲突，即所谓的"文化斗争"，一些瑞士、德国和荷兰的神职人员则与天主教会分道扬镳，另行组织了"老公会"。庇护九世被褫夺了一切世俗权力，死于梵蒂冈宫，死前还声言自己是"一个道义的囚徒"。他的忠实仆从耶稣会士于 1872 年被逐出德国，1880 年被逐出法国。[**《谬误举要》**]

在利奥十三世（1878—1903 年在位）这位"和平的教皇"统治时期，罗马教会在政治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上更接纳现代思想。1888 年的教皇通谕试图肯定自由主义、民主以及良知自由的积极方面。1891 年的教皇通谕表明教会站在了社会正义一边，谴责无所顾忌的资本主义的暴行，并敦促所有国家改善全体公民的福利。然而，庇护十世（1903—1914 年在位）时期，1907 年的教皇通谕又断然指责现代主义是"所有异端邪说的缩影"，似乎再度举起了反动的旗帜。

在东正教世界，变革主要发生在民族主义政治领域。奥斯曼帝国的权力撤出巴尔干地区后，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和保加利亚就建立起独立的东正教自治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服从自身的宗教会议或牧首。教会成为巴尔干各民族日益形成的民族认同的重要中心。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丧失了先前的大部分特权和影响。这些独

立教会一再遭到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查禁，更受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威胁，俄罗斯东正教会日益要求保护和资助苏丹统治下的所有东正教臣民。东正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两边都没有表现出对教会统一或不同教派联合的普遍愿望。俄罗斯东正教对老公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1895 年的沙皇加冕礼上，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英国圣公会进行了接触，这也是此后东西教会一系列接触中的第一次。然而，早期普世教会主义的活跃必然仅仅局限于新教世界。普鲁士于 1817 年实现了教会归一，加尔文宗和路德宗教徒走到一起。英国与海外《圣经》协会（1804 年）、基督教青年会（1844 年）和基督教女青年会（1855 年），是跨教派合作与国际合作的先驱性组织。一般说来，罗马天主教教士团对这些组织持不介入态度，直到非洲和亚洲的各种相互竞争的传教组织丑闻迭出，才最终促使罗马教廷采取行动。1910 年，世界传教士大会在爱丁堡举行，会上成立了国际传教士委员会，该组织是普世教会主义运动的两个公认的源头之一。

十九世纪的欧洲政治围绕着君主制的命运展开。君主制在本世纪恢复了以往的最高统治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运动[802]逐渐侵蚀了君主制的基础。一般说来，除某些值得注意的偶然事件之外，各国的君主制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1914 年时，神授王权的统治者比一百年前还要多。各国的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义务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自由主义沿着两条平行的轨迹发展，一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二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着重于同意的政府这一基本概念。自由主义之名来源于西班牙语的 liberales——他们起草了 1812 年宪法以对抗西班牙王室的绝对权力；实际上这一名词的历史渊源更为久远，它植根于启蒙运动、甚至更早时期的政治学说。就自由主义的大部分早期历史而言，它与有限政府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美国革命中，自由主义第一次获得持久的成功，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倚重英国的议会政制，尤其是法国革命立宪时期的经验。从形式上看，最为完备的自由主义包含共和主义，虽然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把君主视为促进稳定的因素，很乐于接受一个得人心的、有所限制的公正君主。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最看重法治、个人自由、宪法程序、宗教宽容以及普遍人权。他们反对王室、教会、贵族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固有特权。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也十分重视财产，把财产视为负责任的判断和名副其实的公民权的源头。由此可见，虽然自由主义者在剪除专制主义羽翼和奠定现代民主政体方面树立了榜样，并不准备构想激进的普选

[800]

《谬误举要》(SYLLABUS)

1864年12月8日，教皇庇护九世颁布了一个 Quanta cura〈重大事项〉的教皇通谕以及一份《我们时代最严重的错误的事项举要》。这些文件在梵蒂冈的圈子里已经酝酿了不下15年，并且数修。早在1862年，这些文件就激起过一阵狂热，当时，都灵出版的一份反教权杂志《调停者》(II Mediatore) 刊载了这些文件部分泄露出来的内容。

《谬误举要》分为10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包含若干条款。该文件的宗旨在于揭露错误，因此罗马天主教会在所有特定问题上的立场都可以从相关条款中找到。每一条款的开头都是“以下看法是不正确的:”

关于无神论与绝对的理性主义

1. 上帝不存在。

2. 上帝的启示能够被用来反对一切科学的或哲学的思考。

关于温和的理性主义

关于宗教无差别论

15. 所有宗教和宗教派别都是平等的。

关于政治团体

18. 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秘密组织、读经会、开明的教士团体都允许存在。

关于教权

24. 教会没有世俗权力。

26. 否认教会拥有财产的权利。

28. 主教只有在取得政府同意后方能公布教皇的函件。

30. 教会的权利完全是来自于国家法。

32. 应该废止神职人员免服兵役的做法。

33. 否认教会有权讲授宗教教理。

37. 建立不受罗马教皇控制的民族教会。

关于政权

39. 政府是社会权威的惟一源泉。

43. 政府可以单方面废除宗教协定。

44. 国家法高于教会法。

45. 政府完全有权决定教育政策。

46. 政府对神学院享有最终控制权。

49. 政府可以不与罗马取得联系就摈弃僧侣统治。
50. 提出各种团体具有独享的任命或废黜主教的权利。
54. 国王与君主可以免受教会法之管辖。
55. 政教分离是必要的。

关于道德规范

56. 人类法律不必遵循自然的或神的法则。
58. 只有来源于实体的权利才会得到认可。
63. 允许反抗合法的君主。

关于基督徒的婚姻

66. 婚姻本质上并非神圣的。

[801] 67. 婚姻纽带是可以解除的，因此严格地说政府可以批准离婚。

68. 政府可以单独对婚姻的障碍做出解释。

关于教皇的世俗权力

75. 虔诚的信徒可以质疑教皇的世俗和宗教权力。
76. 教会将因放弃其世俗权力而获益。

关于自由主义

77. 天主教已不再适宜是惟一的教派。
78. 进入天主教国家的移民应当有权公开信奉各种宗教。
80. 罗马教皇能够、也必须顺应“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并与之保持一致。[1]

《谬误举要》是应意大利主教的要求而颁布的。在建立意大利王国的大辩论中，意大利主教要求教皇给予指导。罗马教廷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许多条款是以一般性措辞来表述的，却反映出意大利当时极为特殊的局势。这一重大缺陷造成了许多误解。例如，第18条显然是全盘谴责一切“开明教士”团体，即被视为是对自蒙塔朗贝尔以下所有开明教士的抨击。其实，这一条款的含义仅仅是想约束那些支持政府解散修道院计划的皮埃蒙特教士。

仔细解读《谬误举要》的文本，不难发现，梵蒂冈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只是力图保持自身的地位。《谬误举要》说“认为罗马教皇必须与现代文明保持一致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其实只是想表明一种显而易见的态度，即教会以宗教的永恒原则为指导，不会屈从于各种流行的口号。

《谬误举要》造成了与其初衷大相径庭的影响。一些关键条款

> 起草得很糟糕，而且本不该列入其中。这双重的负面因素一旦在充满敌意的新闻界散布开来，就使很多人相信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对任何宽容、任何理性思想，反对任何形式的婚姻破裂、任何形式的民族自决乃至任何形式的社会慈善。从政治上看，梵蒂冈的律师反常地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秘密社会成员、独立的读经者以及开明的教士一起列为魔鬼的团伙。这正是当时时代的一个特征。欧洲其他地方的那些极富才智的保守主义者，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费奥多·陀思妥也夫斯基或许是当时最伟大的人物，他就会最大限度地支持第 18 条。只是有一点，陀思妥也夫斯基从俄罗斯人的特殊立场出发，极有可能在第 18 条禁止的各种团体外再加上一个："罗马天主教团体"。[2]

权或平等主义的计划。经济自由主义侧重于自由贸易概念及相关的自由放任学说，反对政府通过保护性关税来调节经济的做法。它强调财产权，鼓励从事不受过分限制的各种商业和工业活动。经济自由主义的矛头直指两个方面，一是消除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林立的经济壁垒，另一方面是与从古老的行会到新兴的工会在内的各种集体主义组织作斗争。

通常认为自由主义是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也确实广泛吸引了古老的特权贵族阶层与工业无产大众之间人数日益增加的社会支持者。实际上，自由主义的吸引力远不止于此。它肯定还影响到各种基本上不是出于社会和经济动机的不同利益集团，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分布广泛的"学生社团"、共济会、文化持不同政见者，到教育和监狱改革者、贵族化的英国辉格党人和波兰议院的议员，甚至包括俄国军队中持不同政见的军官群体"十二月党人"——他们在 1825 年敢于密谋反对邪恶的专制。

鉴于英国超前的发展，自由主义在英文著作中得到最令人信服的阐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经济学方面，大卫·李嘉图（1771—1823 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17 年）完成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开创的事业。李嘉图的追随者在反谷物法同盟和曼彻斯特学派——以理[803]查·科布顿（1804—1865 年）和约翰·布莱特（1811—1889 年）为首的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哲学领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 年）根据当时的争论和经验，提炼并完善了早先自由主义倡导者的一些较为苛刻的原则，从而确立起一种最完善的宽容和协调的自由主义。例如，穆勒捍卫"自由放任"经济学，同时强调雇员的工会权利必须与雇主资本家的权力势均力敌。穆

勒赞同他的哲学家父亲詹姆斯·穆勒（1773—1836年）之类功利主义者主张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同时坚持必须避免把幸福与快乐混为一谈。在《论自由》（1859年）一书中，他提出了经典的个人人权宣言：只有在个人权利侵犯到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才能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他写道：“就人类干涉任何同类的行动自由而言，惟一正当的目的是自我保护。”在《论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年）一书中，他极其清晰地论述了女权主义的目标，认为男子与妇女之间的种种差异，根本不成其为两者拥有不同权利的理由。

然而，作为流产的革命的发源地、各种最为成熟、酝酿已久却又针锋相对的政治观点相互交锋的国度，法国必定成为围绕自由主义而上演的政治戏剧的舞台。法国政坛的特征不仅在于保守的天主教君主主义者与激进的反教会共和主义者都有稳固的地位。而且，一连串具有自相矛盾特点的人物，使法国政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如前雅各宾派共和党人、“公民国王”路易·腓力普（1830—1848年在位），以及自命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后来当上皇帝的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1848—1870年在位）。

因此，法国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保守派与自由派交替执政的拉锯局面，其间夹杂着一系列的暴力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1815—1824年在位）和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路易·腓力普的七月王朝被1848年2月23日的革命推翻。短命的第二共和国被它最初的受益者路易·拿破仑推翻，他进而宣布自己为皇帝。第二帝国（1851—1870年）在普法战争的屈辱和巴黎公社的暴力中崩溃。1879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延续了70年，以极不稳定的政府、极其活跃而无益的公共争论以及各敌对阵营之间的极度仇视而著称。1894—1906年间，众所周知的德雷福斯案件在法国朝野轰动一时，表明法国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势力仍未达成妥协。

暴力之神在西班牙同样大行其道，西班牙成为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极端激进派和教会支持的极端王权主义分子之间分歧巨大，根本无法弥合。1829年以后，很多极端王权分子支持觊觎王位者唐·卡洛斯（卒于1855年）及其继承人的要求，他们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804]地区拥有大批忠实追随者。一连串孱弱而堕落的君主，斐迪南七世（1814—1843年在位）、伊萨贝拉（1840〈43〉—1868年在位）、阿方索十二世（1874—1885年在位），毫无主见，随波逐流。结果，在1812年、1820年、1837年、1852年、1855年、1869年、1876年，自由主义的宪法频繁地引入西班牙，又接连遭到废除。在当时的西班牙，支持教会政治的阴谋、暴行和内战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奥斯塔的阿马迪奥公爵（1870—1873年在位）的短暂统治结束后，西班牙曾经

建立起一个短命的共和国。1876 年后，在阿方索十三世（1885—1931 年在位）的统治下，自由主义的中间派最终强大到足以将立宪君主制维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普拉多博物馆]**

[806]

普拉多博物馆（PRADO）

1819 年 11 月 19 日，马德里普拉多大街的西班牙皇家美术馆向公众开放。美术馆的建立要归因于国王费迪南德七世的爱好，他不久前重登王位，伊莎贝拉·德·布拉干萨也成为他的第二位王后。美术馆由首任馆长安戈拉王子管理，大公会议负责监督有关事宜。美术馆的场馆是一座正面为科林斯风格的新建筑，它是 13 年前由建筑师唐·璜·比利亚努瓦瓦埃为一座博物馆而设计的。最初的展品共有 311 幅绘画作品，这还不包括六年前威灵顿公爵从约瑟夫·波拿巴的行李中夺去、但尚未归还给西班牙的大量杰作。

美术馆的第一份展品目录于 1823 年用法文出版，因为号称“圣路易之子”的昂古莱姆公爵和最新一批法国占领军已经进入西班牙，以把国王从他的臣民手中营救出来。在吸收合并了取自被查禁的修道院的“特里尼达藏品”后，美术馆于 1838 年更名为国立博物馆。1873 年，自由党人叛乱结束后，它又更名为普拉多博物馆。该馆在 1936—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关闭，许多馆藏珍品转移到日内瓦展出。

西班牙皇室的美术收藏可以追溯到卡斯蒂利亚的约翰二世（卒于 1445 年），他以购买了罗杰·范·德·威登的作品而闻名。西班牙皇室美术收藏最重要的捐助者包括：提香的赞助人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雇佣了委拉斯凯兹的腓力四世，以及 1774 年没收了耶稣会全部财产的查理三世。大火和法国占领使藏品遭受了严重损失，西班牙皇室美术收藏还是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美术收藏之一，卡斯蒂利亚高原空气干燥，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利于藏品的保存。

普拉多博物馆引为自豪的藏品包括了意大利画派、佛兰芒画派、德意志画派、荷兰画派以及法兰西画派的所有重要画家。最重要的是，它是西班牙画派的大本营，该画派包括居住在托莱多的克里特人埃尔·格列柯（1541—1614 年），塞维利亚人迭戈·委拉斯凯兹（1599—1660 年）和巴托罗米·牟利罗（1618—1682 年），巴伦西亚人乔西·德·里贝拉（1591—1652 年），以及无与伦比的弗

朗西斯·德·戈雅（1746—1828年），后者是普拉多博物馆开放时最著名的当代画家。

“美术画廊保存了人类创造性天才的精髓。”[1] 它们提供了了解欧洲历史的最方便的途径，比任何历史书籍都更能迷惑人们的判断力，更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力。普拉多博物馆立于欧洲主要国立画廊的前列，这些国立画廊包括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以及梵蒂冈博物馆。在这些国立美术馆之下，是往往有着令人惊奇的上佳收藏的“地区性”画廊和博物馆，如明斯克、曼彻斯特、慕尼黑、克拉科夫和牛津的博物馆；此外，各种专注于收藏现代美术的画廊，以及从绍莱、杰德拉齐奥到达利齐等地的许多无名而热诚的艺术机构，也都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807]

1784年，费迪南德七世出生，普拉多博物馆的建筑开始动工，另一个欧洲王室也正计划开办一家公共画廊。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委托一名商人在伦敦收集了一批过去大师的作品以充实他在华沙的个人收藏。后来，俄波战争以及波兰的瓜分使这一计划中断。这位国王被流放到俄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他收藏的2900幅绘画，这批绘画注定要装饰俄国而不是波兰的画廊。他从未见过伦敦的那批绘画，也无法再支付购买款项。那批绘画留在了英国，构成了达利齐学院绘画陈列馆的核心展品，也是欧洲众多应当更为人们所知的小规模珍品收藏之一。[2]

葡萄牙也经历了长达80年的宪法之争，最终以废除君主制而告终。巴西独立后不久，国王佩德罗决定留下来当巴西皇帝，他很快于1826年颁布了宪章。种种阴谋使宪章难以付诸实施。直到1853年，玛丽亚二世和她两个儿子的专制宫廷才掌握了实权。在卡洛斯（1889—1908年在位）统治期间，进步党和改革党的“循环内阁”控制了议会，联手把日益高涨的共和呼声压制下去。卡洛斯王朝在鼎盛时期曾搞过一阵为时短暂的王室独裁，但国王和王储很快就遭到暗杀。1905年10月5日革命爆发后，军队支持革命并宣布成立共和国，葡萄牙末代国王曼努埃尔二世（1908—1910年在位）退位去了英国。

法国发生的每一次“革命”都在欧洲激起巨大的反响。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引发了布鲁塞尔的八月起义和华沙的十一月起义（见下文）。在巴黎，拉法耶特走在暴动队伍的前列，反动的查理十世及其“教士党”被废黜，国民议会推选出路易·腓力普。在布鲁塞尔，

起义者占领德·维尔旅馆，荷兰军队未能恢复秩序，结果路易·腓力普的儿子纳穆尔公爵被选为未来的比利时国王。自1815年以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比利时省份就不甘屈从于荷兰。比利时的独立对列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批准建立一个典型的立宪君主制王国。当国王的不是纳穆尔公爵，而是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一世（1831—1865年在位）。[哥达]

1848年2月，革命洪流远胜于1830年，接连爆发的革命迅速蔓延到除英国和俄国之外的所有主要欧洲国家。这一次，麻烦的苗头在1845年就已经在瑞士初露端倪，1846和1847年，克拉科夫共和国和西西里也先后出现动乱的迹象。推翻路易·腓力普等于是发出一个信号，德意志、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各大城市都燃起革命之火。1848—1849年的事件之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主要是因为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和布拉格的斯拉夫国会进行了重要的辩论，以及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见下文）。事实上，这是一个血腥的行动比单纯的言语更有力量的时代。拉马丁、密茨凯维支、桑多尔·裴多菲这样的诗人投入了战斗，但设置街垒的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拉马丁最初在法国革命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密茨凯维支召集了大批波兰流亡者为罗马共和国而战。裴多菲死于反对奥地利人的战[805]斗。“七月战斗”期间，巴黎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卡芬雅克将军的部队粉碎了工人的抵抗，解散了工人们为时短暂的国家工场。在柏林及其他地方，君主都倾向于先开火再讨论宪法问题。在意大利，撒丁尼亚在伦巴底发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圣战”。在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科苏特宣布为摄政和独裁者，复辟行动导致两支俄国军队的干涉和持续一年的战争。在意大利，君主不得不召集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军队来摧毁罗马和威尼斯的共和国。

因此，秋后算账的结果，1848年导致了一系列危害自由主义的灾难。只有一个国家的君主制被推翻，而在法国，路易·波拿巴总统很快就摧毁了给他带来权力的共和制度。三年之内，撵走国王的法国人，被迫再度面对一个专制的皇帝。欧洲新兴的共和国没有一个幸存下来。旧时代的象征梅特涅也结束了在伦敦的流亡，回到维也纳。随同梅特涅一道回来的，还有新领袖推行的新压迫。

不久以后，1848年就被看作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反动政权虽然获胜，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他们再也无法承受1848年的重演。1848年前得到承认、巩固、在某些国家被废除的宪法，现在又一一重新颁布甚至有所扩展。革命者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得到认真对待，虽然他们的暴力手段遭到摈弃。经过一段时间的犹疑之后，各国君主认识到，向民众的要求做出明智的让步，远比无休止的

压迫更为可取。同意政府这一项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断赢得广泛的认同。在未来20年里，1848年的胜利者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僵化的立场。民族和宪法的呼声再次高涨。即便是东方的专制帝国也开始屈服。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即位，罗曼诺夫王朝“按俄国方式”步入了一个自由化时期。1867年，通过《奥匈协定》，哈布斯堡王朝最终满足了匈牙利人长久以来的渴望，建立起皇帝与国王体制并行的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君主国，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在其统治的其余时间里一直与这种体制共存。

当然，政治自由主义并不一定与经济自由主义同步发展。例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于1818年创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当时正处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大退却时期。关税同盟最初只想涵盖普鲁士版图，最终稳步扩展到除奥地利之外的德意志邦联所有国家。关税同盟宣布废除一切内部关税，形成了德国新兴产业能够繁荣壮大的日益发展的自由贸易区。1828年，又诞生了两个彼此竞争的关税同盟，一个是以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为基地，另一个则是以萨克森为中心，四年之内它们都并入德意志关税同盟。1852年，奥地利试图打破自身的孤立，[807]提议整个中欧和北意大利组建一个关税同盟。普鲁士抵制了这一提议。1854年汉诺威王室继位，普鲁士的胜利得到进一步巩固，除了桀骜不驯的不来梅和汉堡外，全德意志均纳入到关税同盟之中。在政治统一的前景看起来仍很遥远的时候，一个除奥地利外的统一的德意志经济体已经成型。

按照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标准来衡量，英国既领先、也落后于主要的竞争对手。一方面，英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议会之母”、法治之乡，《权利法案》和自由贸易的发源地。长期以来，英国社会一直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国家，大概也是对自由主义思想最为开放的国家。另一方面，英国的各项制度罕见地从未经历过革命或占领的洗礼。君主政体依旧按照十七世纪末以来形成的惯例和习俗进行统治，似乎法国大革命从未发生过一样。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及其庞大家族不仅是代议制政府的理想陪衬，还成为一支稳定的力量以及向国外施加审慎影响的渠道。英国也有支持共和制的呼声，但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行动来废除君主制或引入一部宪法。[哥达]

[808]

哥达（GOTHA）

图林根的萨克森－科堡与哥达公国建立于1826年，当时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爵被迫离婚，用萨尔费尔德换取了哥达。同萨克森－阿滕堡、萨克森－迈宁根以及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一样，萨克森－科堡与哥达公国的八块面积很小的飞地注定最终要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

萨尔费尔德公爵有两个儿子，厄内斯特（1818—1893年）和阿尔伯特（1819—1861年）。公爵的弟弟利奥波德（1790—1865年）迎娶汉诺威王室的女继承人夏洛蒂·奥古斯塔。公爵的妹妹路易丝也嫁给了一位汉诺威王室成员，她在法兰克尼亚的阿莫巴赫时怀了孕，生下未来的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1830年，这个家族的前景有了极大的改观，一方面是维多利亚像她已故的叔父一样出人意料地成为汉诺威王位的假定继承人，同时，利奥波德被推举为比利时国王。

“利奥波德叔叔”是最佳的皇室媒人。他的侄儿是萨克森－科堡与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他的外甥女则是汉诺威的维多利亚。1836年5月，他把这两个人撮合到一起。当时他们都是17岁。他们后来成了“欧洲的父母”[1]（见原书附录Ⅲ，第1300—1301页）。

汉诺威王族早先的头衔是“吕讷堡－采勒”和“不伦瑞克－吕讷堡”，1714年，王室登上汉诺威选帝侯（当时就是汉诺威的国王）和英国国王的宝座，便同时放弃了上述两个头衔。尽管居住在英国，他们仍然迎娶德意志的新娘，同时委托代理人管理他们祖先的土地。汉诺威法律不允许女性成为君主，因此，维多利亚登上英国王位后，汉诺威就给了她父亲的兄弟，后来又给了普鲁士。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于1840年2月10日结婚。他们一共养育了九个孩子。从1858年开始，头三个子女分别与未来的德国皇帝、霍亨佐伦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以及未来的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爵结婚。[2]

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国在欧洲王室中的地位原本很一般，大公爵的女儿玛丽于1841年嫁给了未来的俄国沙皇罗曼诺夫的亚历山大二世，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玛丽的两个儿媳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森讷堡－格卢克斯堡家族。她的女儿也叫玛丽，嫁给了身为爱丁堡公爵、皇家海军上将、未来的萨克森－科堡与哥达公爵的英国阿尔弗雷德王子（1844—1900年）。先是黑森

的伊丽莎白与一位俄国大公爵的婚姻，继之伊丽莎白的妹妹艾莉丝嫁给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巩固了达姆斯塔特与圣彼得堡之间的联盟。

[809] 1853年，德意志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森讷堡－格卢克斯堡家族登上了丹麦王位。他们很快就向前走得更远。克里斯蒂安九世的长子弗雷德里克（1843—1912年）成为丹麦和挪威王室的祖先。他的次子威廉（1845—1913年）与一位俄国大公主结婚，后来成为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开创了希腊皇室的谱系。[3] 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1844—1925年）是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的妻子，后来当上了英国王后。他的次女玛丽（1847—1928年）是罗曼诺夫王朝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后来当上沙皇皇后。

在这张堂表兄弟姊妹的密集关系网中，有一个最大的“暴发户”：巴滕贝格家族。[4] 早在十四世纪，巴滕贝格的黑森伯爵一系就已经绝嗣。他们在1858年通过一次贵贱结亲又重新获得了这一头衔。黑森的亚历山大亲王（1823—1888年）随姐姐玛丽前往俄国，在沙皇的骑兵部队中服役。他与皇后的女官、一位被谋杀的波兰将军之女朱丽娅·豪克私奔，他逃出俄国并在维也纳获得一项任命。他的庶民新娘现在改名为巴滕贝格伯爵夫人朱丽娅，为她的子孙带来了姣好的容貌和父亲的姓氏。她的姐姐写过儿童故事，他的兄弟曾于1848年在托斯堪尼任波兰军团指挥官。[5]

亚历山大与朱丽娅有四个儿子。次子娶了一位黑山公主，三儿子先是登上、后来又失去了巴伐利亚的王位，四儿子亨利伯爵与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最小的孩子比阿特丽丝结婚。只有长子摸到了王位的头彩。在与维多利亚女王最宠爱的孙女、黑森的维多利亚结婚后，他成为路易·巴滕贝格伯爵（1854—1921年），从父系上说，他是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堂兄弟，同时又是皇后艾丽丝的姐夫。他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加入皇家海军，历尽艰辛当上了海军上将、海军情报部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是英国第一海务大臣。不幸的是，身为一个德国人，他马上被勒令退休。当时，他的长女已经是瑞典王后，次女艾丽丝则是希腊王妃。他的侄女是西班牙王后，被人们称作“迪基”的幼子路易（1900—1979年）则追寻他的足迹进入英国海军部，后来成为缅甸伯爵。1917年7月，家族的名号再次改变，这次是从巴滕贝格改为蒙巴顿。当时，他们罗曼诺夫一支的亲属已经遭到拘捕，而萨克森－科堡与哥达－汉诺威－泰克王室的亲属则匆匆地更名为“温莎”。

最后，海军上将路易·蒙巴顿展现出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利奥叔叔”一样的做媒天赋。年轻的希腊流亡亲王菲利浦是蒙巴顿喜爱的侄子。[6] 在温莎王室中，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出人意料地于1937年进入英国王室的假定继承人序列。“迪基叔叔”把他们撮合到一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森讷堡－格卢克斯堡的菲利浦亲王（生于1921年）与温莎的伊丽莎白公主（生于1926年）于1947年结婚。两人都是源于萨克森－科堡与哥达、汉诺威、黑森及丹麦的相同的血统支系。除了伊丽莎白的苏格兰裔母亲的一些亲属外，两人再没有一位祖先是现代英国人。他们也都各自两度更改了各自的姓氏。菲利浦采用了他叔父所取的名字蒙巴顿。在妻子于1953年加冕为伊丽莎白二世后，菲利浦及其家庭凭借一份枢密院命令恢复了女王未婚时的名号：温莎。有系谱学家证明，他们是金雀花王室、都铎王室、斯图亚特王室乃至查理大帝、埃格伯特国王和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后裔。 [810]

温莎王室于1917年以只有一方执行的单务契约的方式即位，共和主义者H.G. 威尔斯称他们是“乏味的外来户”。不过，他们的堂兄弟德国皇帝却没有那么吹毛求疵。有一次，他罕见地灵机一动说，他去剧场看了一出《萨克森－科堡与哥达的风流妇人》。[7]*

英国古老的制度在改革之旅中步履缓慢。激进改革者往往不得不付出几十年的艰苦努力。1832年之前，英国议会从未进行过任何改革，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议会一样可耻地落后于时代。《谷物法》一直延用到1846年。直到1836年和1857年，公证结婚和离婚才分别成为现实。宪章派在1838—1848年间首次呼吁的普选权从来没有得到全面落实。除爱尔兰（1869年）和威尔士（1914年），英国国教会也从来没有实行政教分离。直到1911年，上院的封建特权没有丝毫 [810] 削弱的迹象。宗教宽容从未全面实现。就两党制而言，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古老的分野披上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新外衣，延缓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大规模社会立法的到来。自由主义倾向的W.E. 格拉斯敦（1809—1898年）和本杰明·狄斯雷利（1804—1881年）支配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英国政坛，在他们执政时期，对帝国的关注往往使国内的改革显得无足轻重。威尔士在行政上始终属于英格

* 德皇威廉这是借用莎士比亚的名剧《温莎的风流妇人》讽刺英国汉诺威王室。——译者注

兰的一个组成部分。1885年，苏格兰拥有了自己的国务大臣，这是一个低级大臣的职位。爱尔兰则从未实现自治（见下文）。英国开始对讲英语的自治领推行自由主义政策，但并不愿意最大限度地把这些政策推广到所有殖民地。英国人总是喜欢以宽容和自由主义而自豪，但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大多数已经过时。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他们在国内民主方面远远落后于法国，在社会立法方面落后于德国，在民族政策上落后于奥匈帝国。[消遣]

坊间已有大量的历史评论涉及自由主义政治与强大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英、德两国的差异。人们集中探讨了英、德两国在建立稳定的议会体制上的反差，进而集中分析两国中产阶级在阶级结构和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与英国资产阶级不同，新兴的德国资本家被认为是"依赖国家"，他们逃避自己的民主义务，听任普鲁士王[811]室那些开明、但本质上非自由主义的大臣的领导。很久以后，希特勒崛起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家的合作"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的羸弱，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所谓德国式"特殊道路"观点。[21]普鲁士确实树立起一个"法治国家"的榜样，它尊重法律形式，宪法却从属于宫廷、军队和官僚的权威主义传统。这就使得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政府打上了"表面民主"的印记。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记住，德意志帝国是一个邦联制国家，其中几个王国远远没有普鲁士那么专制。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稍微放宽视野，就会发现德国式道路根本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例如，瑞典既拥有日益发展的英国式议会体制，又存在一个开明官僚阶层以及非自由主义的德国式资本家阶层。1866年，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僚鼓动下，瑞典组建起两院制议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资产阶级阶层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一道成长起来，他们反对扩大选举权，也并未加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联合自由党。也就是说，瑞典资本家对自由主义的兴趣并不比德国资本家高。在瑞典，自由主义成为政府大臣、非资本家的"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乃至农民的共同事业，他们共同维护了瑞典逐步形成的民主。[22] [诺贝尔]

在所有的主要强国中，俄国是最抵制自由主义的。1815年、1855年、1906年反复出现的一次次改革，在某些特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建立起国务会议和国立学校教育，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奴（1861年），赋予"米尔"、地方自治会、大学以及刑事法庭以重要的自治权利。经过两度努力，终于组建起国家杜马这一具有咨议权的立法会议。1906年到1917年间，国家杜马时开时停，承诺最终使俄国步入立宪政体的轨道。然而，事实证明，进步

的呼声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哪个致力于改革的沙皇能够长久地支持改革事业。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似乎都是因为军事失败而被迫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前者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者是在日俄战争及随后的1905年革命中失败。两人同样被迫中途改弦更张。每一次改革的终结都是因为“巨大的压力”：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每当改革夭折，自由主义力量遭到镇压之际，随之而来的都是狂热的反动时期。维也纳会议100年之后，俄国的独裁政体和警察体制仍然基本上未受触及。俄国社会未做出任何努力来削弱独裁者沙皇享有的拒绝任何让步的基本权利。更有甚者，俄国频繁插手干涉，阻止境外自由主义的进步。虽然亚历山大二世放弃了直接的干涉主义，但出于长久以来的本能，俄国一直扮演着“欧洲宪兵”的角色。1848年2月的一次宫[812]廷舞会上，当尼古拉一世听说路易·腓力普被推翻时，他宣布：“先生们，备好战马！法国成立共和国了。”

总之，自由化之风在不同程度上吹遍了欧洲所有的君主制国家。自由化的势头忽大忽小，对各国的影响程度不一。1815年后的反动年代里，欧洲自由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经过1848年的蓬勃发展达到顶峰。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者仍在奋争，他们的未竟事业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断发生冲突。

同各种自由主义倾向一样，**保守主义**开始成为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或变革本身，也不应把它与纯粹的反动立场混为一谈。保守主义坚持应对一切变革加以引导和控制，以期使这些变革不会威胁到国家与社会的各种既定制度——君主制、教会、社会等级、财产、家庭的有机发展。它的名称来源于拉丁语的conservare，意思是“保全”。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埃德蒙·伯克（见上文）一开始对法国大革命是持欢迎态度的，只是在后来才决定性地转而反对大革命的暴行。像自由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重视个人的价值，反对无所不能的国家，谋求削弱中央的行政权力。尽管如此，事实表明，他们常常是最有效率的未来改革者，他们会缓和较为激进者所提建议的激进程度，扮演与统治朝廷沟通的中间人角色。在英国，保守主义的主要实践者是罗伯特·皮尔爵士（1788—1859年）及其追随者狄斯雷利。他们在欧洲大陆有众多的仰慕者。自由派保守主义者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只有十分细微的区别。在很多民主国家，两者之间的许多一致之处即构成政治生活“中间立场”的范围。

民族主义业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力量之一，它是指一系列关于民族的观念，其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法国革命最大限度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变迁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此后，民族主义在各大洲传播开来。民族主义有两个彼此对立的变种。其一是国家或公民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受到现行国家统治集团的支持。其二是大众或种族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动力来源于那些国家中的共同体的要求，而且与政府的政策针锋相对。为了比较两种民族主义的异同，一些历史学家区分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导向"和"民族导向"过程。两者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思想和行动出自不同的渊源。国家民族主义是由"上层"倡导的，即一伙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地把他们的价值观推行到整个社会。大众民族主义则起源于"基层"，谋求获得民众的支持以左右或推翻现行的秩序。[23]民族主义还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区分：温和的赫尔德式文化民族主义与咄[813]咄逼人的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仅限于宣传或保存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政治民族主义则要求获得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权。[24]在民族国家中，绝大多数公民意识到一种共同的一致性，分享共同的文化。

关于民族的本质问题，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民族实质上属于精神的范畴。勒南写道："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它由两种事物组成。一是流传下来的对过去的大量共同回忆。二是现在的共识，共同生活的意志。"为了达成民族共识，一个民族中的许多成员被迫忘却一度把他们分隔开来的压迫和不公。"忘却，乃至人们所认为的历史谎言，是民族形成的必备条件。"[25]

国家民族主义的源头是统治精英的利益，英国是个很好的例子，以美国为例更能说明问题。1707年，当联合王国形成时，还不存在什么英吉利民族。生活在不列颠群岛的人民认为自己是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然而，时光流转，随着英国主流文化的普及，忠实的清教徒和讲英语的官吏的宣传，英国人逐步形成一种涵盖一切的强有力的认同感。进入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统治集团推行大众教育，有效地压制了英国非主流文化。例如，威尔士儿童如果敢说威尔士语，就会被罚贴上威尔士的标记。所有大不列颠人都被要求忠于新英吉利民族的象征：标准的英语，起立并高唱皇家国歌《上帝保佑吾王》（1745年），还要表示对英国国旗的尊重（1801年）。新的英吉利民族就以这样的方式最终形成。各个更为古老的民族并未消亡，但已降格到次要或从属的伙伴民族地位（见第8章）。

同样，美国政府为了整合形形色色的移民文化，不得不推行一种官方的民族文化。美国内战期间，据说美国国会以1票的微弱多数

（这反映出国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通过法案，强制性规定公民必须说英语而非德语。从那以后，新归化的公民在获准宣誓效忠之前，英语知识被认定与宪法常识同等重要。在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教育的促进下，新的、讲英语的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接受美国版的英国文化成为所有移民家庭获得成功的基础。

各种国家民族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实际上把“公民权”与“国籍”等同起来。在英国官方的习惯用法中，国籍即意味着公民权，也就是说，国籍是由英国法律保障的某种东西。在美国，“民族”等同于国家或政治国家。如此使用术语只会使问题混淆不清，不过这也许是官方有意为之。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难以消除的误解，比如认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居民全都是“俄国人”；较之那[814]些更为准确地界定公民权的国家，英、美的做法相形见绌。[26]

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力求通过各种手段，借助各种仪式、象征艺术、对历史的诠释，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培育共同的文化，来增强国民的民族凝聚力。在十九世纪，每一个打算引入普及初等教育的政府，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性的选择，即在教育中使用哪种或哪几种语言。奥斯曼帝国始终给予少数民族以自治权，是欧洲惟一没有强制推行共同的国家文化的国家。1867 年后，与国家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大众民族主义思潮在奥匈帝国占了上风，奥匈帝国也不再强行推行统一的国家文化。

大众民族主义兴起于基层，遍布于这个时代的各个王朝国家和多民族帝国。它坚实地植根于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认为表达公意的适当场所是民族或种族共同体，而非人为划定边界的现代国家。它创造出一种精巧的神话：民族的“血缘”与民族疆域的“土壤”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依照这一神话的假定，如果意大利人生活在从瑞士到西西里的数个国家，那么对于意大利民族来说，废除那些国家，由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取而代之，就是正义的。当然，绝大多数现实的民族主义者都承认，一个完全羽翼丰满的民族，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的成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幻想阶段。意大利国家一建立，许多意大利领导人都认识到，必须仿效其他政府的榜样，运用国家权力来统一公民的文化和意识。正如 1861 年马西默·阿泽利奥在统一的意大利议会开幕式上所说：“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意大利，接下来必须着手培育意大利民族。”

十九世纪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这样一种信念展开，即欧洲人可以分为“历史的”民族和“非历史的”民族。黑格尔首先表述了这一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采纳了这一观念，把民族竞争视为一个进化过程，某些民族能够独立存在，其他一些民族则注定要消

亡。到马克思那儿，经济因素走上前台。当然，衡量的标准和结果差异很大，人们公认的民族国家的名单也就千差万别。不管怎样，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普遍认为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现有的列强具有历史赋予的命运，列强承认的一些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瑞典、丹麦和希腊亦是如此，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波兰人属于主要的竞争民族。马志尼勾勒的一幅未来的欧洲版图包括 12 个民族国家。

[815] 事实上，历史性的概念即使并非虚假，也完全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五个列强的赞美者认为，它们是欧洲舞台上最永恒的固定角色，但其中的三个国家注定要在一个世纪之内消失。丹麦或英国等自认为是举国一致的民族国家，注定要听到来自国内其他民族不满的呼声。许多民族不再抱有幻想，认为完全有理由赢得民族自决。这一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幅员面积，也不是经济独立或有效的历史诉求，而是政治环境。面临普鲁士强权的反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几乎毫无成功的可能，一旦普鲁士改变态度，他们的事业立即有了保障。意大利人的希望有赖于法国的积极支持。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对于波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依然记忆犹新，他们既无外部援助，也没有好的机遇。政治环境也是决定希腊、比利时、罗马尼亚和挪威成功建立民族国家的惟一因素，而同一时期的爱尔兰、捷克或波兰则未能成功。奥斯曼帝国羸弱不振，从而为这些民族的独立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各民族将孕育出数量最多的民族国家，但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些民族也未能登上国际舞台。[**阿布哈兹人**]

不过，民族主义并非只在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才兴盛，正相反，它在贫困和压迫中发展壮大。人们几乎会认为，民族理想越是炽热，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在整个十九世纪，坚定的民族活动家始终致力于唤醒他们希望吸纳的人们的民族意识。诗人、艺术家、学者、政治家借助于六种主要手段来勾画激发民族信念的现实图景。

人们广泛搜集历史，为本民族争取自身权利和土地的长期斗争提供依据。史前史是一个特别受垂青的课题，因为可以以此来证实土著居民的权利。倘若无法寻找到事实，则必须求助于神话，要么就直截了当地虚构。民族英雄和年深日久的民族胜利，都被发掘出来加以赞美。人们漠视任何带有普遍影响的事物，不考虑任何反映民族屈辱或民族敌人之荣耀的事物。

语言得到改良和规范，成为独一无二的民族认同的证据。人们编纂各种语言词典和语法，修建图书馆，以填补历史的空白。国立中学和大学编纂出专门的教材。语言学家着手证明，以前被忽视的本地方

[816]

阿布哈兹人（ABKHAZIA）

阿布哈兹人是一个人口不足25万的小民族，他们生活在克里米亚以东300英里的黑海海岸。阿布哈兹人的主要城市是苏克姆，又叫苏克米。他们的语言与穆斯林文化接近于高加索人，与北方的俄罗斯人和东面的格鲁吉亚基督徒鲜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欧洲的尽头”。

阿布哈兹人生活的地区，在中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兴盛一时的受拜占庭－希腊影响的王国，他们始终占据着贯通南俄罗斯与高加索的要冲。1810年到1864年间，沙皇征服了这一地区（见原书附录Ⅲ，第1290页），迫使大批本地人逃亡外地。从1931年起，阿布哈兹成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三个名义上的自治加盟共和国之一；俄罗斯人和明格列尔－格鲁吉亚人大批涌入，阿布哈兹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绝对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警察头子贝利亚本人是明格列尔人，他驱逐了黑海沿岸的希腊人，同时无情地推行格鲁吉亚化政策。

因此，当格鲁吉亚于1991年从莫斯科获得独立，阿布哈兹人也要求从格鲁吉亚获得某种程度的真正自治。1992—1993年的格鲁吉亚内战期间，他们与第比利斯的冲突只是为俄罗斯军队重新占领阿布哈兹铺平了道路。一位哥萨克首领告诉一个外国记者说，像阿布哈兹和千岛群岛这样的外围领土的命运，将检验俄罗斯的伟大。“事实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地盘。”[1]

一种丑恶的民族主义加剧了前苏联各个民族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发出了重新征服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声音。阿布哈兹之后，俄罗斯下一步还有其他几个干涉目标，包括鞑靼斯坦和车臣以及俄罗斯联邦内的其他非俄罗斯地区。迟早，俄罗斯要在新的民主体制与老的帝国主义之间做出抉择。

言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深奥微妙，捷克语、加泰罗尼亚语、盖尔语或挪威语作为完备的交流手段，完全同现有的官方语言一样富有表现力。挪威语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证。为了挑战既定的丹麦和挪威的官方语言和书面语言，人们发明出一种被称为“新挪威语”或“乡村语言”的复合结构的农民方言。1899年，新挪威语运动达到高潮，参加者认为自己是政治独立呼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像爱尔兰的盖尔语一样，新挪威语运动只取得有限的成

功。[**挪威**]

民间传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传说把现代民族与其最古老的文化底蕴联系起来；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民间传说的真实性很难加以核实。赫尔德的《民谣集》(1778年) 包含了从格陵兰到希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谣，与之不同的是，民族主义学者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本民族的民间传说。在这一点上，雅各布·格林 (1785—1863年) 和威廉·格林 (1786—1859年) 兄弟的作品当然是开创性的。他们数量庞大的作品包括《古老德国的工匠诗歌集》、《德国英雄》、《德语语法》和以"格林童话"享誉世界的《儿童与家[817]庭童话集》(1812—1815年)。同时代的塞尔维亚人乌克·卡拉季奇 (1787—1864年)，不仅出版了著名的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童话集，还编纂塞尔维亚语语法、词典，改进西里尔字母表。[**《卡勒瓦拉》**]

宗教可以使民族情感神圣化，但宗教往往造成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的隔阂。就民族性的新教或东正教教会而言，这种分离主义久已有之。即便是罗马天主教也一反自身的普遍使命，把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区分开来，使立陶宛人继续保持非俄罗斯化、波兰人非德意志化。在一些国家，面对本民族异教神祇的仪式和习俗的复兴，基督徒一片茫然。威尔士信奉佛教的大臣在威尔士诗歌音乐比赛年会（或称艾斯泰德福德 *Eisteddfod*）上身着德鲁伊特*的装束。日耳曼神祇也重新出现在德意志帝国的舞台和报刊上。[**萨满**]

种族理论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十八世纪末，人们发明出高加索人种的概念。1848年，牛津大学的一位德国教授首次公布与高加索人种有关的"雅利安种族"概念。欧洲所有的民族都很想自命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血缘种族集团。对于人种学以及据说与每一个现代民族相对应的"种族类型"，人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在伦敦，皇家历史学会赞助其成员进行实验，以证明那些有着凯尔特人姓氏的人，脑容量要小于盎格鲁-撒克逊血缘的人。[27]（姓戴维斯的人是毫无希望的了。）在德国，优生学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居住在德国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 (1855—1927年) 把富于创造力的民族限定为雅利安人和条顿人。他写道："真正的历史开始于日耳曼人强有力地夺取古代遗产的那一刻。"他还说："那种认为基督是犹太人的看法，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就是出于欺骗。"[28] [**高加索**]

在俄国，泛斯拉夫运动也带有种族色彩。泛斯拉夫运动声称，要在沙皇的领导下把所有斯拉夫人统一起来，往往认定（子虚乌有的）

---

* 德鲁伊特是古代盖尔或不列颠人中的祭司，他们在威尔士及爱尔兰传说中是预言家和占卜家。——译者注

[818]

《卡勒瓦拉》(KALEVALA)

《卡勒瓦拉》，或称《英雄的国土》，通常被视为芬兰的民族史诗。全诗共分50篇，22795行，1835年出版第一版，定本于1849年出版。它是一部半口语化的史诗，很大部分是汇编自真正的民间传说。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要编辑者埃利亚斯·伦洛特（1802—1884年）的作品，他按照古典风格改编和修饰从芬兰东部和俄罗斯卡累利阿农民那里收集到的原汁原味的口语素材。因此，它不仅传承了欧洲非基督教民间传说的遗产，还表明十九世纪激进主义分子从被忽视的民间源泉中吸收养分，从而形成民族意识的进步。赫尔德（1744—1803年）确认了这样一个观念：现代国家繁荣与否，取决于是否形成以本国语言和民间传统为基础的独特文化认同。《卡勒瓦拉》就是赫尔德的观点付诸实际的最出色的典范。

在伦洛特的时代，芬兰的统治者由瑞典变为沙皇俄国，芬兰人迫切需要在文化上与瑞典和俄国主子分道扬镳。故事集中讲述"不朽的圣人"韦伊奈默伊宁如何管理卡勒瓦拉国家，领导人民同居住着神祇、巨人和看不见的精灵的"北方国"斗争：

> 上了年纪的韦伊奈默伊宁
> 唱着歌踏上了旅程，
> 乘上他的铜船开始远航，
> 他坐着铜做的船，驶向巍峨的地方
> 驶向天堂下面的陆地。
> 他长眠在他的船里，
> 不再疲惫，还有他的船，
> 但他留给我们康特勒琴
> 他迷人的竖琴留在了芬兰，
> 为他的人民留下了永久的欢乐，
> 为芬兰的孩子留下了伟大的歌谣。

欧洲所有民族都曾经对本民族民间传说加以编辑、浪漫化和再创作。《特鲁瓦的基督徒》和托马斯·马洛礼爵士再现的亚瑟王传奇都属于同一种性质。就连美国人也想参与其中；伦洛特的工作对亨利·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1855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者熟悉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一位成员于 1851 年出版的《卡勒瓦拉》德译本。

对于那些形成独立文化认同的冲动受制于政治依赖的民族来说，芬兰语的《卡勒瓦拉》和威尔士语的《马比诺吉昂》这样的民族史诗具有特殊的意义。毫不奇怪，《海华沙之歌》和《卡勒瓦拉》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翻译成了波兰文。

[819]

萨满（SHAMAN）

"萨满"，即部落里"会巫术的男子"，在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乃至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地安人中，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属于一个古老的职业，是民间医师、智者、术士，他们的药剂、仪式和箴言赋予他们独特的权威。他们头戴有角的面具，鼓是他们这一行当所特有的工具，他们用鼓来与树木、岩石和天空之神交谈，他们既有行善的力量，也有作恶的威力。他们能够不为人知地周游另一个世界，为人类带来伟大神灵的智慧。直到现代，俄国的许多偏远地区依然可以看到萨满教的踪影，但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萨满教会在中欧出现。[1] 在中欧，妇女也可以信奉萨满教。

在整个十九世纪，匈牙利国内一直就马扎尔人的起源问题争论不休。一般人认为，马扎尔人与匈奴人同种。[**乔包**] 学者们不这么认为。一派学者注意到马扎尔人的祖先是伊朗人或哈扎尔人。若纳斯·萨诺维奇（1733—1785 年）创立的另一派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东方。从那以后，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明确证实了马扎尔人与芬兰 - 乌戈尔族之间的联系。例如，1974 年在卡马河的波舍泰根发掘出一处墓葬遗址，业已证实它在马扎尔人向西迁徙之前就已经是主要补给站之一。同样，现代对马扎尔民间传说的研究，也收集到萨满教存在的众多证据，因而突出了马扎尔人与西伯利亚之间未为人知的联系。[2]

斯拉夫人的种族亲和力将孕育出政治上的团结。在波兰和克罗地亚天主教徒中，泛斯拉夫运动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都曾开展早期的泛斯拉夫运动，现在则反对泛斯拉夫运动，用科学论文来证明俄罗斯人实际上是斯拉夫化的芬兰人。[29] 泛斯拉夫运动在塞尔维亚人、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当中最为流行，他们都把俄国看成解

放的救星。俄国民族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相交融，表现出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独特狂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最无前途的事物写下了乐观的笔记：

> 我们伟大的人民像牲畜一样被抚养成人。自呱呱坠地起，他们就饱受痛苦的煎熬，这种痛苦是任何其他民族无法忍受的，却只是使他们在不幸中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俄国作为斯拉夫民族的首领，将与斯拉夫民族一道，向世界发出前所未闻的最强音，他们表达的将是人类友谊的誓约……据最新的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思想完全在于建立普遍的人类友谊。[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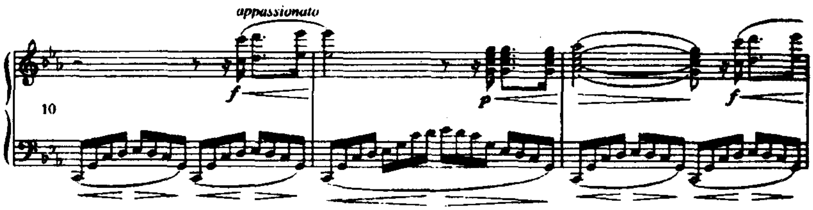
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只有俄国人愿意相信。

在欧洲各地，各种艺术和文学形式都被用来诠释和展现民族主[819]题。诗人孜孜以求地渴望赢得民族诗人或“桂冠诗人”的荣誉。小说家偏好写作关于民族英雄和民族习俗的历史或伪历史的传奇文学。这个领域内虽然还有更早的作品，但公认的典范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年）的威弗利小说系列。简·波特（1776—1850年）根据柯希丘什科的生平写成的小说《华沙的犹大》（1803年），赢得了国际性声誉。画家和雕刻家同样追随浪漫主义对民族主题的渴望。法国主要的浪漫派人物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努力在各个领域都出类拔萃。

作曲家发掘本民族民间舞曲和民歌的和声与节奏，形成匠心独具的民族风格，这些风格日后成为多个“民族乐派”的特色。肖邦优美的马祖卡舞曲和波罗乃兹舞曲，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民族乐派还有众多杰出的作曲家：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斯美塔那（1824—1884年）、安托宁·德沃夏克（1841—1904年）和列奥·亚纳切克（1854—1928年），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1843—1907年），芬兰[820]作曲家让·西贝柳斯（1865—1957年）和丹麦作曲家卡尔·尼尔森（1865—1931年），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1860—1909年）、恩里克·格拉纳多斯（1867—1916年）和曼努埃尔·德·法雅（1876—1946年），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1881—1945年）和祖尔坦·科达伊（1882—1967年），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1857—1934年）、弗雷德里克·戴留斯（1862—1934年）和沃恩·威廉姆斯（1872—1958年），著名的俄罗斯“五人强力集团”：塞萨尔·居伊（1835—1916年）、米利·巴拉基列夫（1836—1910年）、亚历山大·鲍罗丁（1833—1887年）、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柯夫（1844—1909年）以及穆索尔斯基（1839—1881年）。这些民族乐派有助于增强音

乐的社会吸引力。更可喜的是，那些因语言障碍无法以文学形式来推动民族事业的民族，现在可以在音乐厅对整个欧洲发表演说了。

有意思的是，音乐的抽象性质使人们对同一首乐曲的感受大相径庭。肖邦这样的作曲家，不但吸引与他抱有相同政治意向的听众，还牢牢抓住了对他的政治观点毫不在意的听众的心。他的天才无远弗届，冲破了民族与国度的界限。苦乐参半的波兰旋律，流淌出飘渺灵动的怡人情感，肖邦的音乐交替呈现出热烈反抗和忧郁消沉的基调。在某些人听来，他用音乐演绎出波兰的历史，在另一些人听来，他展现的纯粹是个人内心深处的惨痛。在谈及肖邦作品第 10 号第 12 首中最著名的一段乐句时，罗伯特·舒曼认为它表达的含义是“花丛中的大炮”：



在歌剧领域，民族神话与气势磅礴的音乐剧的惊人音乐风格紧密结合。全神贯注地观看和聆听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或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观众，完全不会顾及歌剧所表现的历史真实与否。在民族歌剧领域，歌剧脚本内容的不真实似乎强化了宏伟的音乐。**[尼伯龙根]** **[歌剧]** **[苏萨宁]** **[特里斯坦]**

不可否认，民族主义与欧洲社会的现代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实际上，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更为极端，乃至认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两者存在绝对的相互关系。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道：“现代性乃是现代民族及一切相关事物的基本特征。”[31]这种夸大的断言使一个绝佳的例证难以成立。就现代民族主义[821]的激发因素而言，政治压迫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个超前的民族运动的实例，在现代化进程启动前很久，它们就已经充分发育成熟。现代化进程对民族主义的切实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性质，使民族主义拥有大大超过以往的社会支持者。1870 年后的欧洲现代化初期，“民族主义的转型”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民族主义还突显出“文明”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文明是从古代世界和基督教承继而来的各种思想和传统的总和，它从外部把欧洲本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欧洲人共同的遗产。相反，文化

（德语中的 Kultur）形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就是各个特定民族所独有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本民族的语言、民间传说、宗教异端乃至特殊的癖性。早先，人们赞美文明而藐视文化。如今，民族主义把这一切颠倒过来。民族文化受到赞美，共同的文明则受到贬低。教育良好、能讲多种语言、四海为家的精英分子风光不再，只把自己看成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受过不完全教育的民族大众更为强大。

民族主义的理论化方兴未艾。十九世纪末流行的各种思潮中，有一种思想涉及上文提到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社会学联系。这种思潮认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背井离乡或接受新式教育的个人决意从属于这么一个共同体；新兴的民族凭借“虚构的传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有意思的是，在一位不为人所知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卡兹梅茨·克列斯－克拉乌兹（1872—1905 年）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上述两种非常现代的思想。[32]

民族主义的激情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冲突。少数民族遍布欧洲各地，他们的大众民族主义势必与国家导向的官方民族主义发生冲突。英国出现了三种潜在的分离主义运动，俄罗斯帝国则有 70 种。即使是从种族角度看非常和谐的德意志帝国，在前波兰省份、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与丹麦接壤地区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也都长期存在民族冲突。[**阿尔萨斯**][**石勒苏益格**] 民族运动领导人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领袖之间也发生重大冲突，后者既不赞同民族主义，也反对优先考虑民族目标。

俄国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罗曼诺夫王朝的国家体制，不但与帝国境内非俄罗斯民族相抵触，还与俄罗斯民族本身的民族情感格格不入。在古老的莫斯科公国的核心地带，“帝国”与“民族”岌岌可危地并存着。帝国制度以宫廷、贵族阶层为基础，官僚机构如同一个外来占领势力那样控制着一个与其没有多少共同点的幅员广大的农业社[822]会。农奴的解放只是延缓了这个基于农村公社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农业民族的失败。十九世纪初，俄国曾数度尝试颁行一部俄语《圣经》——它本来有望成为现代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基石——但均告失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事件。[33]

几十年过去后，民族主义频繁地表现出好斗的倾向。民族运动开始成为反抗反动王朝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但一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未能完全得到满足，他们就变得灰心丧气。所以，在十九世纪最后 25 年里，“解放的、统一的老民族主义”不断地让位于一种不宽容的“整体民族主义”。人们开始谈论驱逐少数民族，开始把不遵从

民族主义者对共同体的教条界定的任何行为都视为“背叛”。(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广泛流传的“民族主义”一词，正是这种消极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德国完全是日耳曼人的德国，“罗马尼亚是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浪漫国是浪漫国人的浪漫国*。

或许正是在德意志帝国，“血统与土地”的思想具备了最深厚的基础。法国则为整体民族主义提供了最有条理的鼓吹者。1899年，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年）和夏尔·莫里斯（1868—1952年）共同创立“法兰西行动”组织，他们的著作清晰地阐述了整体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法兰西完全是属于法国人的，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忠诚的法国天主教徒。巴雷斯作为摩泽尔省的众议员，毕生为使德国归还阿尔萨斯－洛林而奋争。在《背井离乡的人》（1897年）一书中，他阐明了一个观念：四处流落、无所归属的社会成员毫无价值可言。在其他著作中，他很快把矛头指向犹太人。《灵异的山丘》（1913年）提出天主教教义与法兰西密不可分的思想。莫里斯先是攻击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后来又成为贝当维希政府的支持者，在两件事上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言语非常尖锐极端，乃至罗马教廷于1926年把他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

整体民族主义的影响遍及十九世纪末所有欧洲国家的民族运动。除德国和法国外，它在波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曼·德莫夫斯基（1864—1939年）的“民族民主运动”就极为显著地体现出这种整体民族主义的特征。在意大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年）一类的民族统一论者，与生俱来地相信整体民族主义，试图从奥地利攫取的里雅斯特和南蒂罗尔。在俄国，整体民族主义导致所有不相信俄罗斯民族特性与东正教教义一致性的人，都被排斥在民族运动之外。在英国，那些把“英国”等同于“英格兰”的人，无疑也受到整体民族主义的影响。在爱尔兰，不论是北爱尔兰新教徒（Protestant Ulstermen）的立场，还是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的极端倾向，都体现出整体民族主义的影响，新教徒认为北爱尔兰根本没有天主教徒的容身之地，天主教徒则把所有新教徒和英裔爱尔兰人视为异族统治的代理人。就犹太人而言，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巴勒斯坦不单是受压迫的犹太人的避难所，还是属于“犹太国家”的土地，只是出于宽容才允许非犹太人居住。

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揭竿而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达方[823]式和发展前景。一些政治理论家试图把西欧的民族主义划定为“温和

* 浪漫国是安东尼·霍普在1894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中虚构的一中欧王国名。——译者注

的、人道的、解放的民族主义"，把东欧的民族主义归入偏执的、种族的民族主义的范畴。[34]这种划分方法显然有失公允。西欧也有很多偏执、种族民族主义的实例，如爱尔兰共和军和佛拉芒祖国阵线。东欧的许多民族主义运动既包括所谓的"西方"因素，也包含"非西方"的成分。任何贴标签的简单化做法都失之偏颇。事实是，东欧的专制帝国抑制了自由的民族主义的发育，进而激发起各种方式的暴力反抗。187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大众民族主义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有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尽管如此，仍处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很多人，却不得不把他们获得解放的时机向后推迟将近一个世纪。之所以会有如此长时间的延误，并非毫无行动自由的人民希望如此，主要是由于相继出现的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性质。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开展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才于1871年实现既定的目标。1847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最有影响的领袖、撒丁王国的首相卡米罗·加富尔（1810—1861年）在都灵创办《复兴报》，这一运动即以"复兴"运动闻名于世。这一运动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各种争取独立的秘密团体，其中有著名的"烧炭党人"，他们曾先后在那不勒斯（1820年）、都灵（1821年）和罗马（1830年）发动流产的起义，以及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领导的"青年意大利"。马志尼是位民族革命家和预言家，他在马赛、伯尔尼和伦敦的流亡生涯中度过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他创立了一种民族意识形态，意在唤醒冷漠的同胞，争取撒丁王国的查理·阿尔贝那样对民族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统治者支持民族事业。他宣布："民族体现出说同一种语言的公民的广泛性。"1834年，他创立了国际性的民族运动机构："青年欧洲"，该组织为欧洲大陆各国筹备民主宪政训练大批的密谋者。

在"革命之年"的1848年，意大利处于席卷欧洲的大风暴的中心。威尼斯和罗马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君主费迪南德二世。查理·阿尔贝希望能从米兰的起义捞到好处，发动了一场针对奥地利的"圣战"。在拉德茨基将军的反攻和炮弹的无情轰击下，这些起义全都遭到镇压。马志尼提出的口号"意大利将独自行动"未能兑现。他的那位富于浪漫色彩的同志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年）先后战斗在罗马和威尼斯，起义失败后逃亡南美洲。

十年后，意大利局势有了转机。加富尔的撒丁王国把民族运动当成驱逐奥地利人的最佳手段，开始加入意大利人的事业。撒丁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现英勇，拿破仑三世优雅地问道："我能为意大利做些什么?"结果，法国与撒丁王国及时签订了一项协定。法国承诺在意大利北部支持撒丁反抗奥地利，同时继续在中意大利维护教皇

国。之后，意大利民族运动借助三场战争实现了既定的目标。1859—1860年，马真塔和索浮里奥两战的胜利，确保法国和撒丁联合进攻奥属意大利的成功；民间组织的加里波第千人红衫团进行了轰动一时[824]的远征，攻占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在帕尔玛、莫德纳和托斯坎尼，公民投票赞成并入意大利，法国攫取了萨沃依和尼斯，奥地利仍然保有威尼西亚，教皇在法国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统治罗马。1861年5月，都灵召开的全意大利议会宣布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1849—1878年在位）为意大利王国国王。1866年，意大利与普鲁士一道对奥开战，意大利设法从奥地利夺取了威尼西亚。1870年，意大利又与普鲁士一道对法开战，夺回了教皇国的其余部分，并把罗马教廷的统辖范围限定于梵蒂冈。此时，除了特兰蒂诺（南蒂罗尔）和伊斯的里亚之外，意大利王国的版图已经完整。加富尔已死，加里波第退休去了卡普雷拉岛，马志尼这位共和主义者仍在流亡，对意大利未能实现共和伤心不已。（见原书附录Ⅲ，第1304页）[《豹》]

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进程非常类似于意大利民族运动。它滥觞于1813—1814年“解放战争”中迸发出来的热情以及复辟时期的各种秘密团体。1848年，全德意志国民议会召开，旋即遭到解散，德国民族运动遭受到最重大的挫折。当普鲁士国王转而加入民族事业后，德国民族运动于1871年实现了目标。

1848年3月前的一段时期，即所谓“三月革命前的时期”，德意志邦联的一无是处逐渐暴露无遗。邦联议会降格到与一个上诉法院差不多的地位。邦联依然专注于支付三十年战争以来欠下的债务。邦联宪法规定所有的德意志诸侯参加议会，但诸侯要么兴之所至地偶尔参加，要么干脆置之不理。诸侯有权废止立法、召集外部援助，从而压制了自由主义者的积极性。1848—1849年间，同法国和意大利一样，德意志境内烽烟四起，维也纳、柏林、科隆、布拉格、德累斯顿、巴登和其他许多地方都发生了起义。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召开，起草出一部未来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但国民议会无力把任何一项决议付诸实施。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问题导致国民议会出现深刻的分裂。国民议会无法决定德意志是仅仅局限于日耳曼民族的疆域，还是应该包括绝大多数人口为非日耳曼人的整个奥地利帝国。国民议会把王冠献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他拒绝接受这项“带有阴沟味道”的荣誉头衔。1849年7月，国民议会在互相指责和镇压中宣告解散。（见原书附录Ⅲ，第1304页）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普鲁士转而支持德国的重新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瓦解德意志邦联、结束与奥地利的无望纠葛。威廉一世（1861—1888年在位）统治初期，普鲁士的局势动荡不安。冯·罗恩的

[825]

《豹》（GATTOPARDO）

“1860年5月的某一天。‘此时面对我们的死亡，阿门’。日常的《玫瑰经》吟诵完毕。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亲王用平稳的声音复活了悲伤而荣耀的圣餐礼，其他声音交织成一片嗡嗡声，不时可以听到一些令人不快的话：爱、纯洁、死亡。在一片嗡嗡声中，这间洛可可式的客厅似乎完全变了样。鹦鹉似乎也局促不安，在豪华的内墙上扑闪着彩虹般的翅膀。一个从良的妓女坐在两扇窗户之间，看上去像是在忏悔……

“接下来，一切又都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一条叫本迪戈的大丹狗也在仆人离去后摇着尾巴出了门。妇女们慢慢站起身，她们的裙裾摆动，露出了地面乳白色瓷砖上绘制的裸体神话人物。只有安德罗米达的画像依然被皮隆神父的法衣覆盖着，神父依然深深沉浸在特别祈祷中……”

塞莱纳亲王唐·法布里齐奥·科波拉正在巴勒莫的别墅举行一成不变的家庭仪式。此时，西西里正处于4月墨西拿起义失败到加里波第5月11日登陆马尔萨拉之间这段令人焦虑的时刻。塞莱纳亲王的盾形纹徽图案是“豹”，他也因此而闻名，但波旁王朝、封建特权以及亲王本人压倒一切的情感生活都已衰落了。

历史小说其实可以分成很多种类。低劣的历史小说往往不惜篡改历史，凭借不着边际的虚构营造出异乎寻常的背景。有些历史小说则把过去当成中立的舞台，向读者灌输一些永恒问题的信念。《豹》出版于1958年，是帕尔玛公爵兼领兰佩杜萨亲王的朱赛佩·托马西的一部遗著。很少有哪位小说家表现出托马西这样强烈的共鸣和历史感。

“1910年5月，唐·法布里齐奥的三个女儿仍然待字闺中，住在塞莱纳别墅。家庭礼拜堂的圣物早已丢弃一空，红衣主教宣布这些圣物是伪造的。有一次，这一堆圣物里增加了本迪戈的皮毛，它被制成一条毛毯长期保存下来。女仆把它的尸体拖出去扔掉时，它玻璃般的眼珠盯着她，似乎流露出卑微的谴责。本迪戈的其余部分被扔到院子角落里。扔出窗外的时候，它的外形又成了有着长长胡须的四足动物，它的右前腿举着，仿佛是在诅咒。然后，在铅灰色的尘土中，一切都归于平静。”

军事改革巩固了权势集团的专制统治，但在各邦特权等级议会的选举中，以瓦尔德克的“进步党”为首的自由派占据了多数。为了解决由此产生的危机，1862 年，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 年）被任命为首相，还被授权在必要时采取非宪法措施。俾斯麦的目标是使普鲁士支配德意志，进而使德意志执欧洲之牛耳。普奥共管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多次造成两国间的摩擦。威廉一世无从决定是领导德意志邦联，还是如 1863 年法兰克福王侯会议上那样，把问题踢给弗朗茨·约[826]瑟夫。俾斯麦决定建立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北德意志联邦，他巧妙地运用有限战争的手段，使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1864 年，普鲁士进攻并打败丹麦，兼并石勒苏益格。1866 年，奥地利把石勒苏益格问题提交德意志邦联议会，普鲁士旋即退出议会，进攻并打败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在赫拉德克－克拉洛弗（柯尼格伦茨）附近萨多瓦的辉煌胜利，确认了普鲁士的最高权威以及北德意志联邦的创立。1870—1871 年，普鲁士进攻并打败法国。在随后的一片兴高采烈中，俾斯麦安排北德联邦接纳南德各邦国，宣布威廉一世为德国皇帝。德国重新统一，保守主义阵营大获成功，自由主义者则步履维艰。[**赫尔曼纪念碑**]

波兰民族运动的历史最为源远流长，具有最深厚的背景，表现出最坚定的决心，承受着最沉重的压力，却只争取到最微不足道的成果。波兰民族运动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反俄同盟；自波兰遭到瓜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 1733 年、1768 年、1830 年、1863 年、1905 年、1919 年、1944 年，每一代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发动过武装起义。波兰民族运动孕育出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成熟的一种超前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与经济原因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保存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荣誉的愿望。

十九世纪初，波兰人多次发动起义，目标是恢复被消灭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他们受到浪漫主义诗篇神秘意象的激发，相信波兰是“各民族的救世主”，将会迎来自己的“复活日”：

> 万岁，救世主，人类的主宰！
> 波兰依照你的指令，匍匐在你的脚下
> 像你一样接受惩罚
> 也将像你一样再度复活。[35]

尽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也参与其事，但反抗俄国的主要行动是由波兰会议王国指挥的。1830年11月，谣传沙皇打算调集波兰

[827]

赫尔曼纪念碑（HERMANN）

赫尔曼纪念碑，即阿米尼乌斯纪念碑，耸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德特莫德附近托伊托堡森林中一处树木繁茂的斜坡坡顶的岩层上。它是纪念日耳曼人的首领、切鲁西的阿米尼乌斯在公元9年几乎全歼来犯的罗马军团的一场胜仗。巨大的铜像将近30米高，基座周围建有柱廊。比真人大十倍的赫尔曼头戴有翼头盔，手握一把巨大的复仇之剑，双眉紧皱地注视着下面的平原。

这座纪念碑花了将近40年时间才建造完成。就像1830—1842年间巴伐利亚国王在多瑙河上雷根斯堡附近峭壁上修建的经典的瓦尔哈拉殿堂一样，阿米尼乌斯纪念碑见证了不忘拿破仑和解放战争的一代人。直到德国统一和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如日中天的时候，纪念碑仍未完工。纪念碑的设计者和创意者厄内斯特·冯·班德尔总是无法筹集必要的资金。他在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学校中募集捐款，最终筹得了足够的款项。赫尔曼纪念碑于1875年竣工揭幕，成为帝国新兴的自豪感的合适象征。

在民族主义的全盛期，每一个自尊的民族都为找到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感到光荣，建造公共纪念碑则是出于明确的社会和教育目的。赫尔曼纪念碑是席卷欧洲的一股伪造历史的逆流的榜样。[1] 在德国，可以和赫尔曼纪念碑相提并论的纪念碑还有莱茵河畔的矮林纪念碑、图林根州屈夫霍伊瑟山上的威廉一世骑马雕像，以及一个爱国者同盟于解放战争一百周年时在莱比锡建造的莱比锡大会战纪念碑（1913年）。从时代和精神气质上看，赫尔曼纪念碑非常接近于伦敦议会大厦外竖立的反议会最甚的狮心王理查的塑像、克拉科夫的格鲁恩沃德纪念碑（1910年）以及克莱蒙费朗附近盖戈维高原上的韦辛格托里克斯纪念碑。

这种民族情绪的政治美学发挥到极致的标志，大概要算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为卢埃林亲王的狗“盖勒特”建造的纪念碑，它坐落在北威尔士的“贝德盖勒特”（意思是盖勒特的墓地）。[2] 悲怆越深，时代越久，浪漫派一代人对祖先遗迹的热情也就越高。

军队进攻比利时，波兰人策划了一个狂热的阴谋，从而引发一场俄波战争。沙皇拒绝了保守派查尔托里斯基亲王提出的接管华沙政府的建议，从而排除了双方对话的任何可能性。事态因此日益恶化，最终导致两国势同水火。这一次，波兰职业军队一度有获胜的机会，但渐渐

被俄军侧翼包围和击溃。1831年9月，俄国人猛攻华沙附近的最后一个炮台，在遍布战死者和伤员的战场上，俄军发现波军索文斯基将军的遗体依然屹立不倒。这位拿破仑时代的老将军为了不向任何暴君低头，命令手下把他的木腿“牢牢扎进波兰的土地”。战争的结果，波兰会议王国的宪法遭废止。所有起义者被剥夺了自由和财产。1万名流亡者逃往法国，成千上万人被戴上镣铐流放西伯利亚。

[828] 1848年，波兰民族运动的热情大为降温，这主要是因为两年前精心策划的一场全面起义惨遭失败，当时克拉科夫共和国没有约束革命者，从而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在奥地利军官的煽动下，加里西亚附近乡村的农民屠杀了数千名贵族。因此，在1848年这一“所有民族的春天”里，波兰只有波兹南发生的一场小骚动，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两场暴动，以及约泽夫·贝姆将军率领的一支为匈牙利而战的英勇善战的分遣队。

1863年1月，波兰会议王国再度爆发起义，遭到态度前后不一的“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镇压。亚历山大二世虽然解放了帝国的农奴，却不打算给波兰人一部宪法。在华沙，牧师、本堂神甫和拉比领导了长达两年时间的爱国示威运动，还秘密建立起民族政府。严酷的游击战争持续了16个月，以起义领袖在要塞的墙边被处决而告终。这一次，波兰会议王国本身遭到镇压。沙皇俄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支政治犯队伍，8000名波兰人，踏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可怕旅程。

1905年，波兰社会主义党接过爱国起义的火炬。华沙和罗兹的罢工和街垒战浪潮比圣彼得堡的起义坚持了更长的时间。从各波兰省份征集的大批郁郁寡欢的年轻人，却充当了俄国军队的炮灰，毫无信念地在满洲里与日本人作战。

波兰民族主义连遭挫折，从而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之后的数代爱国者，往往选择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而不是为之战斗。他们提出“有组织的工作”的概念，目的是增强经济与文化力量，并对超过地方自治以外的任何政治要求都加以约束。这种做法逐步成为一切缺乏军事和外交支持的民族运动的基本战略。与此同时，波兰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形成了“整体民族主义”。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各行其是，秉持不同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扼杀了共同斗争的可能性。德莫夫斯基领导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与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独立运动竞争激烈。德莫夫斯基领导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喊出“波兰是波兰人的波兰”的口号，反映出强烈的反德、反乌克兰和反犹情结。

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官方明显区别对待日益高涨的各种民族主义

浪潮。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完全不允许有独立的民族认同。直到1906年，波兰人任何形式的政治表达都在禁止之列。然而，在芬兰大公国，芬兰人享有他们大多数邻居不具备的自治权利。波罗的海的日耳曼人，大多数为路德宗教徒，也享有其他俄国波罗的海省份居民所没有的宗教和文化宽容。沙皇俄国“民族牢笼”的栅栏很密，但也有不少漏洞。

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特别隐蔽。1867年的《奥匈协定》意在缓和民族问题，实际效果却使民族问题成为一个死结。讲德语的精英分子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文化传遍奥地利，只能让民族问题蔓延到整个奥[829]匈二元帝国。归根到底，“奥地利是一个有着日耳曼外表的斯拉夫人住宅”。实际上，三个“主要的民族”，日耳曼人、马扎尔人和加里西亚波兰人，都被鼓励去支配其他的民族。奥匈帝国的统治体系尤其适应特定的需要，因此，在波希米亚是少数民族的日耳曼人压迫捷克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压迫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加里西亚的波兰人压迫鲁塞尼亚人（乌克兰人）。每当受排斥的民族倾倒于民族主义魅力时，这种民族压迫就甚嚣尘上。雪上加霜的是，奥匈帝国先是引入“帝国参议会”，最终又于1896年推行成人普选权，恶化了哈布斯堡王朝复杂的政治局势，三个民族统治集团只能以没完没了的交易和妥协来维持自身的优势。奥地利日耳曼人把持帝国的法庭和军队，为了对抗暴躁的马扎尔人，他们只好维护极端保守的加里西亚波兰贵族的利益。结果，波兰人直到最后依然对皇帝忠心耿耿。马扎尔人永远不知足；奥地利日耳曼人的舆论日益退回到大德意志的老观点；捷克人则倍感陷入无望的困境。自命为“最后一位老派的君主”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48—1916年在位），统治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帝国的国歌可以用包括意第绪语在内的17种官方语言来演唱。弗朗茨·约瑟夫之所以深得人心，完全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墨守成规所致。在帝国风光的表层下面，未治愈的患处开始溃烂。如一位首相承认的那样：“我的政策是使君主国的各民族处于不满情绪得到很好缓解的和谐状态。”[36] [基因]

欧洲的各种民族运动此起彼伏，有些是教科书没有重点介绍的。许多较小的共同体专门致力于文化使命。在普罗旺斯，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830—1914年）组织了复兴普罗旺斯语言和文化的运动，还入选法兰西学院。在威尔士，在中断几个世纪之后，一年一度的威尔士诗歌音乐比赛会于1819年重新开始举办。1858年，在兰戈伦创立了许多伪德鲁伊特教的仪式，逐步奠定了这类仪式的基本特征。在德国，斯洛文尼亚地区的波拉布人、索布人和卡舒布人，使古老的斯洛文尼亚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波拉布人在汉诺威附近卢考周围

[830]

基因（GENES）

1866年，摩拉维亚布尔诺的奥古斯丁派修道院院长格雷戈·孟德尔（1811—1884年），发表了关于普通绿豌豆繁殖实验的成果《豌豆培植》。数年时间里，这位修道院院长一直在修道院的花园里观察豌豆的生长和繁殖。孟德尔小心翼翼地对实验豌豆进行异花授粉，集中观察豌豆的少数几种特殊性状，如植株高度和颜色，从而揭示出植物连续世代之间的特定遗传模式。他证实，在他实验性预测的杂交品种中，将会再现植物的某些显性和隐性性状。他的观察结果完全被人们所忽视。直到1900年，三位生物学家才分别重新发现了作为现代遗传学起点的“孟德尔遗传定律”。[1]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孟德尔遗传学说一直停留在实验阶段。二十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发现了活细胞的“染色体”，但基因——孟德尔称之为“个体特性”——的结构，始终是令研究者困扰不已的难题。直到1944年，人们才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的重要性，1953年，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在这一点上，生物学大大落后于现代物理学和化学同期取得的进步。

同时，一位苏联科学家声称解决了许多关键性难题。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1976年）否认遗传的染色体原则，提出环境影响和嫁接将导致植物出现遗传变异。他公布的实验结果表明，小麦种子的出芽率在低温下有显著提高。他甚至企图用小麦植株获得黑麦种子。这纯粹是欺诈，他的实验结果是伪造的。但是，李森科使斯大林相信他的学说能够扭转苏联农业的衰退，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1938年当选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后，他下令在数百万公顷的耕地上播种用他的方法处理过的谷物。一旦谷物发不出苗，农民就因搞破坏的罪名遭到逮捕。李森科的批评者，包括俄国首屈一指的遗传学家尼古拉·伊万诺夫·瓦维洛夫，都被关进了古拉格集中营。教师被迫把李森科学说当做真理。苏联生物学遭受几乎无法弥补的摧残。李森科本人不仅被两次授予斯大林奖金，还获得一枚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2]

西方生物学家把李森科视为一个“文盲”。作为回击，李森科嘲笑所有的正统生物学家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奴颜婢膝的反动的堕落者”。他所嘲弄的对象中，排第一位的就是格雷戈·孟德尔神父。[3]

的一块飞地上幸存下来，1871 年，在俄国人的帮助下，他们发表了自己的文学选集和语法。劳济茨地区的索布人大约有 20 万，他们于 1848 年在包岑建立了一个“文化协会”。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也努力复兴本民族的古老文化。

事实表明，不管是宪政体制还是专制国家，都对民族主义抱负怀有敌意。在这一方面，有必要比较一下爱尔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经历：政治算术对他们都很不利。

爱尔兰人是一种主要的“西方民主”的参与者。1801 年，《英爱合并法案》生效，50 多位爱尔兰议员进入了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这种地位使爱尔兰人享受到各种好处，但管理自身事务这一最热切的[831]要求却得不到满足。爱尔兰人的政治活动从未间断。数年时间里，丹尼尔·奥康内尔（1775—1847 年）领导的“天主教协会”组织起规模巨大的公众集会，并于 1829 年实现了宗教宽容。此后，大饥荒带来的苦难，连续数个《土地法案》的不公，政治进步的迟缓，一连串问题使得爱尔兰人的情绪始终处于不满爆发的临界点。英国保守党沾沾自喜的态度，北爱尔兰新教徒的顽强抵抗，以芬尼亚社成员（即“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成立于 1858 年）和新芬党（1905 年）为代表的爱尔兰右翼激进派的暴力行径，所有这些都导致爱尔兰政治陷入僵局。在爱尔兰农村，政府支持的地主与反抗的佃农组织“土地联盟”（1879 年）长期冲突不断，造成了普遍的恐惧气氛。虽然 C.S. 巴涅尔（1846—1891 年）及其领导的威斯敏斯特爱尔兰政党得到格拉斯敦自由党的支持，上院仍然连续三次否决了《爱尔兰自治法案》。爱尔兰真正的文化觉醒是后来的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使爱尔兰人民非英国化”，爱尔兰文学剧院、盖尔运动协会以及盖尔语联盟纷纷建立起来，标志着爱尔兰文化觉醒的真正到来。1900 年，维多利亚女王 40 年来首次访问都柏林，废除了不准“穿绿色，张挂绿旗”的禁令，鼓励在整个帝国举行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就一个象征性姿态而言，这一举动来得太晚了。1912 年草拟第四个《爱尔兰自治法案》时，贝尔法斯特的北爱尔兰自愿军和都柏林的全国自愿军召集了庞大的军队。世界大战的阴云逼近欧洲的时候，爱尔兰正处于内战的边缘。爱尔兰的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北爱尔兰桀骜不恭，没有任何爱尔兰人的特性。一位未来的英国首相说道：“爱尔兰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道深深的鸿沟分开的两个民族，这道鸿沟比把爱尔兰与英国分开的海湾更深。”[37]如今，一直寻求美国支持的新芬党开始寻求德国的援助。**[饥荒] [奥林奇派]**

[832]

饥荒（FAMINE）

1845年到1849年间，爱尔兰遭受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导致的饥荒直接造成100万人死亡，超过100万人移民国外，爱尔兰820万人口锐减四分之一。虽然爱尔兰当时属于英国这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没有得到多少有效的救济。在某些观察家看来，这次饥荒是马尔萨斯学说所预言的最严重的大灾变，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次饥荒是数百年来治理不善的最终结果。[1]

灾难的直接起因是马铃薯晚疫病导致的真菌性枯萎病，这种病害使得马铃薯的收成连续三年骤减。在这种枯萎病于1845年跨过爱尔兰海的前一年，人们就已经在怀特岛注意到这种病害。在英国本土，它只是轻微的公害，但在爱尔兰，它却成为死亡的传播者。

十九世纪初，爱尔兰大部分农村人口的生计完全依赖于“马铃薯培植”。马铃薯是一种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农作物，在多雨的爱尔兰大地上很容易成活。它供养了为数众多的穷苦人民，他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歌唱、舞蹈、喝私酿的威士忌酒以及讲故事上了。就像英格兰人为玫瑰起了各式各样的名字一样，爱尔兰人对马铃薯的叫法也有很多。他们把马铃薯叫做murphy、spud、tater、pratie，还把它叫做“任人摆布的舶来品”。

爱尔兰对马铃薯的依赖是多年来的混乱无序造成的。1780年后的60年间，爱尔兰经历了一次人口大爆炸，爱尔兰人口在此期间增长了300%，同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只增加了88%。然而，除阿尔斯特地区外，爱尔兰工业化程度很低，未能吸收过剩的人口，尽管拿破仑战争后爱尔兰人已经开始向美国和澳大利亚移民。最为严重的是，英国把一系列强制性法律强加给爱尔兰，阻碍了爱尔兰推行摆脱困境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长久以来，爱尔兰的土地占有状况持续恶化。1829年之前，爱尔兰天主教徒甚至被禁止购买土地，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有钱购买土地。英裔爱尔兰地主，通常是一些在外地主，索取很高的租金或实物地租，佃户一旦稍有违抗就会立即遭到驱逐。驱逐由军队强制执行，拖欠者的房屋往往被夷为平地或干脆“推倒”。爱尔兰农民没有任何安全可言，自然不会有多少生产积极性。他们时常会杀掉迫害他们的人，或者跑去参加英国陆军。用威灵顿公爵的话说，“爱尔兰

是世上最优秀战士的永不枯竭的温床”。爱尔兰也是贫困之乡，大量家庭住的是泥糊的茅屋，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家徒四壁，不得不与猪相伴。一位德国旅行者评论说，与爱尔兰人相比，“似乎连列托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中的最贫穷者，过得也更为舒适。”[2]

一位宽宏大量的爱尔兰历史学家写道，罗伯特·皮尔爵士初期的政策“比人们有时承认的要更为有效”。[3]1846年，价格得到了控制，向人们发放了玉米面，各项公共建设工程也开始提供就业机会。但皮尔因废除《谷物法》问题垮台，上台的是不相信干预的辉格党内阁。那位“铁公爵”* 宣称：“腐烂的马铃薯说明了一切。”爱尔兰人交纳租金，却吃荨麻。 [833]

1847年，政府公开供应了300万份定量浓汤食物。这不足以阻止斑疹伤寒的肆虐，也无法制止大批农民逃离乡间。科克郡的斯基贝林地区饿殍遍野，儿童在济贫院里奄奄一息，12个地主却收取高达50000英镑的地租，向英格兰的谷物出口也仍然在护卫下继续着。成群结队的强盗恣意劫掠乡间城镇。负责救济的财政大臣说道：“我们所要与之斗争的，不是饥荒这一自然的邪恶，而是这个民族自私、堕落和强横性格等道德上的邪恶。”[4]

1848年，马铃薯再次歉收，移居国外的人流汇聚成巨大的浪潮。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步行到各个港口。地主往往因农民的离去而受到惩罚。他们倒在跋涉的路上，暴卒于船上过于拥挤的统舱里，或是死于纽约与蒙特利尔码头上的人群里。他们踏上陆地后，又饱受热病、胃痉挛以及仇英心理之苦。

饥荒结束了丹尼尔·奥康内尔领导的抵制联合王国的运动。它也彻底摧毁了人们要求和解的真切希望。大批爱尔兰人不断移居国外：

> 十年一百万！我们贤明的政客们
> 平静而淡漠地分发着配给券。
> 他们很少想到，一个古老的民族
> 就这样从历史的画卷消失：
> 凄凉的大海吞没被遗弃的人儿，
> 就像清除仁慈这一飘零的落叶。[5]

这次饥荒并不是欧洲的最后一次饥荒。此后，芬兰和比利时

* 即威灵顿公爵。——译者注

于1867年又发生了类似的大灾难。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在波及范围上超过这次，而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更为充分地暴露出饥荒的恐怖性质。[**丰收**] 饥荒不论在哪里发生、如何发生，都是不可饶恕的。1849年8月，英国政府最终的救济措施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对都柏林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

乌克兰人身受两个“东方独裁国家”的统治。他们一度臣服于波兰，如今要受俄国和奥地利的统治。乌克兰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在十九世纪中叶挣脱农奴制的束缚前，他们必定只有淡薄的民族意识。他们传统上以“罗塞尼亚人”而闻名，为了反对沙皇官僚所起的“小俄罗斯人”这一误导和侮辱性的称呼，他们开始采用“乌克兰人”的称呼。（“乌克兰人”意指具备政治意识的罗塞尼亚人。）谢甫琴科（1814—1861年）的诗篇极大推动了乌克兰的文化觉醒；之后的几十年中，乌克兰人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在俄国，乌克兰人面对的政权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把他们看成一个地方性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而且只允许他们信奉俄罗斯东正教。在奥地利，他们享有稍微多些的文化和政治自由，能够保存东仪天主教的圣餐式，也开始逐步采用乌克兰人的称呼。到世纪之交，他们组织起规模很大的罗塞尼亚语学校教育体系。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波兰人共同体，波兰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包括利沃夫在内的加里西亚地区人数上占优。[**乌克兰**]

[833] 在俄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帝国，乌克兰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祖国被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等其他民族所霸占，而且这些民族全都敌视乌克兰民族主义。从最低限度来说，这也是令人沮丧的。众多潜在的乌克兰民族成员归化为法国人和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来居留。像爱尔兰人一样，他们仍然是一个无国家的民族。乌克兰民族活动家也开始指望德国的支持。

[834] 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发展尤为如火如荼。奥斯曼帝国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容许宗教和文化自治，却又消灭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除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部分地区外，帝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同化为主流伊斯兰文化的过程十分缓慢。这样一来，一旦奥斯曼帝国权力衰微，发育成熟的各基督教民族就会迫不及待地破壳而出。在赢得充分主权之前，这些民族长时间享有实际上的自治，象征性地接受有名无实的奥斯曼帝国守备部队的统治。这些民族倾向于在一块最低限度的领土疆域内开始生活，一旦无法满足他们的志向，就会不断导致各民族之间的冲突。这些民族甚至没有哪个是同文同种的。1832年，希腊正式赢得独立，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在

1856年，黑山在1860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1878年，也相继宣告独立。阿尔巴尼亚是惟一在宗教上以伊斯兰教为主的穆斯林民族，因而缺乏基督教列强的支持，直到1913年才赢得独立。（见原书附录Ⅲ，第1302页）[**阿尔巴尼亚**]

希腊人过得并不幸福，他们的君主就更不用说了。1833年到1973年间，希腊共有七位君主在位，其中五位以退位而告终。巴伐利亚的奥托一世（1833—1862年在位）是希腊人的第一位国王，他是一个热衷于德国效率的天主教徒，事实证明他比奥斯曼皇帝更不得人心。第二位国王乔治一世（1864—1913年在位）来自丹麦，建立了一个迭遭意外的王朝。民族主义者与外来国王势同水火。塞尔维亚人的经历也好不到哪去，卡拉多德维奇王朝和奥布廉诺维奇王朝之间的流血世仇，导致十位王室成员先后遭刺杀。俄国的支持招致奥地利的强烈反应，塞尔维亚人的榜样尤其给奥匈二元帝国的斯拉夫人留下越来越深的印象。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获胜，最终促使维也纳摊牌。

不幸的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不利于建立稳固的民族国家。“巴尔干化”成为政治破碎、心胸狭窄和凶残争斗的代名词。二十世纪初的三次巴尔干战争中，基督教国家热衷于互相厮杀，其凶狠程度一点不比反对正在撤出的土耳其人的战争逊色。（见下文）

历史学家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大众民族主义盛行的大陆，为什么一些国家没有顺应普遍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十九世纪的苏格兰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民族运动？毕竟，苏格兰人较早地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作为英国的小伙伴，他们很容易找到理由对英格兰人的统治感到愤慨。但他们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兰文化中盖尔因素与苏格兰低地因素的分歧，阻碍了共同民族认同的形成，另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加迪夫或贝尔法斯特一样，苏格兰的主要城市格拉斯哥在英帝国的事业中极其繁荣。在帝国本身开始衰落前，苏格兰对繁荣的联合王国始终保持着忠诚。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先驱、诗人休·麦克迪尔米德（1892—1978年）才开始写作。1977年，汤姆·纳恩才出版了苏格兰民族运动的重要政治论著《英国的分裂》。[38]

与此同时，一位最富先见之明的观察家断言，民族主义仅仅是问[835]题的一个方面。1882年，厄内斯特·勒南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看法：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是永恒的。它们迟早要被取代，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欧洲联邦”。梅特涅曾经说过：“在我看来，欧洲实质上早已是一个祖国。”[39]希望的种子已经撒下，这样的情感有朝一日会以更为现实的形式破土而出。

如同民族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属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反对剥削和操纵，所保护的不单单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社会主义之名来源于伙伴关系的概念，“团结”这一现代习语的字源是拉丁文的 Socius，意为“同伴”。社会主义者认为，除非把资源集中起来，平等分配财富，个人利益服从共同的利益，否则穷人、弱者和被压迫者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与自由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并不惧怕现代国家，相反，它期望国家担任仲裁者，往往还是照顾性措施的主要执行者。社会主义直截了当地反对国内外压迫者。国际团结的情感使其与生俱来地反对民族主义。一般认为，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学说来源于四个不同的渊源：基督教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见原书附录Ⅲ，第1308页）

基督教社会主义已有几百年的悠久传统，只是没有使用这个称呼而已。基督教教义历来敦促人们为共同体服务，抛弃个人财富。从苦行修道会的实际劳作，到莫尔、康帕内拉、哈林顿和摩莱里等人的乌托邦思想，《登山训众》经常被用来为集体主义的经济方案辩护。在十九世纪，以“工人学院”首任校长 J.F.D. 莫理斯（1805—1872年）、查理·金斯利（1819—1875年）、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年）、为德皇讲道的阿道夫·施托克尔（1835—1899年）等人为代表，新教徒普遍表现出最积极的进取心。牛津运动宣布其在城市贫民窟的“使命”，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罗马天主教较为克制，直到1891年才颁布相关的教皇通谕。在俄国，东正教教义、农村公社的集体主义传统以及拥有无上权力的国家的存在，为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工会运动起源于自由市场经济中工资劳动者的脆弱性。从多塞特郡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时代开始，工作的男子和妇女艰难地赢得了组织工会、就收入和劳动条件进行集体谈判以及举行罢工的权利。工会运动赢得权利的关键性时刻在英国是1834年，法国是1864年，德国是1869年。到1900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开展了活跃的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各国工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就各异其趣。除英国式的非意识形态工会外，还有脱胎于古老行会的“横向联合”的同业工会、“纵向联合”的产业工会、法国或西班牙式的无政府主义-工联[836]主义工会、自由主义的工人协会、既反对罢工也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黄色”工会、以教会为依托的基督教工会。如同比利时的情况一样，在很多国家中，数种不同类型的工会共同开展活动。在俄国，沙皇警

---

* 1834年3月，英国的六名农业工人因为在多塞特郡的托尔普德尔村组织工会而被处以流放澳大利亚殖民地七年的苦役刑。——译者注

察开了组织工会之先河，他们决定以组织自己的正式工会来智胜各种非法组织。“警察社会主义”的实验有一个糟糕的结局。1905年1月5日，警官加彭神父率领的游行队伍遭到警察开枪射击。“流血星期日”引发了俄国1905年革命，加彭神父则遭杀害。在遭到布尔什维克镇压前，俄国的工联主义享受了难得的十年独立发展时期。

合作社致力于保护成员免遭大企业的危害，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消费和农业等三个领域。1800年，幻想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在苏格兰建立新拉纳克纱厂的实验性纺织工人聚居区。新拉纳克纱厂规定一个工作日工作10个半小时，保证工人享有疾病保险，但它存活的时间还没有其创办人长。1844年，兰开夏出现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先驱者合作社。在F.W.赖法伊曾（1818—1888年）的倡议下，德国率先成立农业合作社，它在农民自由组织起来的地方，尤其是东欧，将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1796年弗朗索瓦·巴贝夫（1760—1797年）在巴黎策划“平等派阴谋”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被督政府处死的巴贝夫一样，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全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包括克劳德·昂利·德·鲁弗鲁瓦·圣西门伯爵（1760—1825年）、夏尔·傅立叶（1772—1837年）、艾蒂安·卡贝（1788—1856年）、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路易·勃朗（1811—1882年）以及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1809—1865年）。圣西门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与孔德关系密切，求图把科学和技术运用于一个专家统治的理想化社区。他的《新基督教》（1825年）奠定了一个宗教派系、模范公社和审判伤风败俗行为的基础。傅立叶和卡贝都曾在美国建立模范合作社聚居区。傅立叶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1808年）中构想了一个按照科学秩序来安排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政府，在“和谐”的道路上通过各个不同的完善阶段向前发展。（这一点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和国家消亡思想的源头。）

布朗基以“闷味儿”和“拘留犯”闻名，他是一个巴贝夫式的阶级反叛者，由于不断组织既反对君主制、也反对共和国的暴动小组，他一生中有33年是在狱中度过的。1839年，他攻占巴黎的德维尔旅馆达两天之久，酿成了一场灾难；他的追随者在1871年领导了巴黎公社起义。（他本人错过了这一事件，因为他在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前一天被捕。）他的座右铭是“既不要上帝，也不要老板”。与布朗基相反，路易·勃朗主张建立由工人管理、国家提供资金的人人平等的工场，工人各尽所能，按需取酬。1848年革命时期，他在《劳动组织》[837]（1839年）中勾勒的方案曾经短暂地付诸实施，不久他就被迫流亡英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当中以普鲁东的影响最大。他在《什么

是财产?》(1840年)中对(过量的)私有财产的抨击曾经轰动一时,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财产是盗窃"更被反复引用。他的《贫困的哲学》(1846年)激起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犀利得多的反驳,他在《十九世纪革命的一般概念》(1851年)中描绘了一个没有边界、中央政府和国家法律的未来欧洲。普鲁东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这使他的追随者很快就与主流的社会主义者发生冲突;他支持工人针对国家采取直接行动,这一点成为法国工联主义的基础。

法国思想有力地影响了早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费迪南德·洛斯劳尔(拉萨尔,1825—1864年)是一个西里西亚犹太人,他的成长时期是在巴黎度过的,在组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后,他死于一次罗曼蒂克的决斗。那两位亲密无间的流亡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和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相识于巴黎,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发表恰逢其时,他们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奇特的一对。他们因激进的新闻报道被驱逐出普鲁士,之后在英国定居下来。恩格斯很快就成为一位富足的资本家,在曼彻斯特经营一家棉纺厂。马克思作为一个私人学者,在伦敦过着贫困的生活,靠恩格斯的津贴维持生计。马克思毕生的著述《资本论》(三卷,1867—1894年)是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30年独立研究的成果。他从头至尾运用纯理论的社会哲学,其间散漫地混杂着卓越的洞察力和浮华的卖弄学问。他借鉴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彼此互不相关的思想,把它们重新组合成全新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像达尔文创立自然史的普遍学说那样,构建关于人类社会的普遍学说;他曾想把《资本论》的第一卷题献给达尔文。他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圣西门的阶级斗争观、巴贝夫的无产阶级专政观(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观念)、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布雷和汤普森的剩余价值论,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原理。所有这些成分被糅合成一种救世主学说,其心理基础据信是来源于童年时期他的家庭所背弃的犹太教。马克思是先知,无产阶级是上帝的选民,社会主义运动是教会,革命是"基督复临",共产主义是"应许之地"。[40]

马克思在实际政治中鲜有作为。他协助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这是一个后来被称颂为"第一国际"的有名无实的组织,他为该组织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一些充满激情的演讲稿。他的大批追随者来自德国[838]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俄国学生,而不是在英国。马克思去世后葬在伦

敦海格特公墓，墓地正对着赫伯特·斯宾塞的墓地，墓碑上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编撰了《资本论》的后两卷，从而完成了一部合著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两人的个人特征并不总是能分得一清二楚的。恩格斯有自己的思想。他比马克思更熟悉社会状况，也更关注学说的实际意义。他在《反杜林论》（1878 年）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中阐述了"国家的消亡"，极大地鼓舞了积极的革命者。

后世评论家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颇为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说明了自由主义欧洲的状况"，是"一个典型的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理论家"。[41]他们的看法或许是对的，但不得要领。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严密性要远逊于其情感上的力量。那些逐渐相信马克思为社会正义的梦想奠定科学基础的人，大多从未批判性地思考过他的著作。马克思无意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宗教。

新兴的工人阶级显然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拥护者。实际上，许多工人设法躲避这一运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组织都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英国的费边社就是一个典型。在东欧，初出茅庐的工人阶级依然弱小，社会主义要么像在俄国那样被国际主义反叛者控制，要么像在波兰那样被独立运动分子把持，他们希望战胜其民族主义对手宣扬的种族分裂。由于不断受到地方利益、政府压制和知识分子软弱性的阻碍，社会主义运动动员大批追随者的努力归于失败。在大多数国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了生存而奋斗，往往经历过数十载的挫折。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得以形成颇为可观的社会主义政党群体。（见原书附录Ⅲ，第 1308 页）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遭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案查禁 12 年后，它于 1890 年永久性地建立起来。德国社民党起源于 1875 年的《哥达纲领》以及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各种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合并。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其主体部分是卡尔·考茨基（1854—1928 年）起草的。它很快就被拒斥启示论社会主义观的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 年）的修正主义和德国国会中政党领袖的实用主义倾向所修正。

作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遇到类似的困难。"第一国际"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互相指责中解散。之后的"第二国际"于 1889 年在布鲁塞尔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很快就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控制。第二国际组织召开多次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得像一个和平主义的压力集团，1914 年，各国支部没有一个反对战争，第二国际也就解体了。所有政党都未能填补第

二国际消亡后留下的空白，只有由V.I.乌里扬诺夫（列宁，1870—[839]1924年）这样的流亡者和其他志趣相投的造反者领导的俄国革命派政党除外。

俄国的革命传统与酿成革命的独裁制度一样悠久。十九世纪时，1825年，"十二月党人"开创了革命传统，他们是一群受法国和波兰思想影响的军官。此后的几十年中，在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年）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5—1889年）的领导下，俄国革命传统日益带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运动，即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到农村去改变农民的信仰，所遭遇的只有不理解。1879年，民粹派一分为二，一派强调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另一派"人民的意志"则提倡暴力。后一派的一名成员于1881年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西方的报道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P.N.特卡乔夫（1844—1885年）。特卡乔夫也从未进入日后布尔什维克英雄人物的行列，但他却是名副其实的布尔什维主义先驱者。作为激进的民粹派，特卡乔夫实际上起到连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的桥梁作用。他断然拒绝教育大众，代之以呼吁训练革命的精英分子。他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道："我们不应再关注'怎么办？'的问题，它早就已经解决了。发动革命！"他晚年在瑞士的流亡中度过，其时正在瑞士的列宁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著作，然而列宁在公开场合却指责他。特卡乔夫与列宁之间没有任何"承继关系"，但肯定有共同的精神。[42]

列宁小组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未来社会主义者在不利环境中面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困境。作为流亡者或非法移民，列宁及其同志不可能采取他们从中汲取最初灵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手段。作为革命家，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为允诺与沙皇作斗争的人鼓与呼的俄国舆论。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必定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尤其是更好地顺应了农民和非俄罗斯民族这两个帝国境内最大选民群体要求的社会革命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俄国这样的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家，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革命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一旦小组的大多数人热衷于密谋手段时，他们不愿意去大规模组织公开支持者。（虽然列宁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或"多数派"的名称，他们通常总是处于少数，即使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也是如此。）列宁像特卡乔夫一样察觉到，训练有素的少数派无法在没有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他一旦试图用社会主义原则为这样一种战略辩护，却从一开始就被指责为用幻想代替现实。"谎言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灵魂。"[43]换言之，列宁主义是一种似是

而非的社会主义，是对原型的一种古怪而隔膜的模仿。一位在俄国后共产主义时期备受推崇的评论家指出："俄国革命中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型之间的关系，同太平天国'基督教'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44]人们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840]间才普遍认识到这个事实。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度过了幼年时期，但两者很快就分道扬镳。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论点在于，任何形式的统治都是可憎的，政府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有害无益。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的再洗礼派和掘地派，[45]英国无政府主义思想成熟的标志是威廉·葛德文（1756—1863年）的《政治正义论》（1793年）及其女婿雪莱的那部胸襟开阔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 那个可恶的假面具终于完全撕毁，
> 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
> 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
> 没有阶级、氏族和国家的区别，
> 也不再需要畏怕、崇拜、分别高低；
> 每个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
> 身边走过的女人都是真实、美丽
> 和仁慈，一个个好像自由自在的天仙，
>
> 口里说的是以前所想不到的聪明，
> 心里有的是以前所不敢有的热情，
> 周身上下完全改换了一副模样，
> 原来人间已经变得好像是个天堂；[46]

第二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以法国的普鲁东及其学生昂瑟默·贝尔加里克的活动和著述为代表，他们主要集中探讨互助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工人不应卷入议会政治，应以街头和工厂的直接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解放。

俄罗斯帝国的极端独裁引发的过激反应孕育出第三股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一流派的代表是两位俄国流亡贵族：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年）和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1842—1921年）。巴枯宁曾经宣称"毁灭的激情也是一种创造性推动力"，他解散了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宣布"共产主义者相信，为了夺取国家的权力，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革命社会主义者（指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工人是

为了摧毁国家。”巴枯宁成为由无政府主义衍生而来的拉丁语系国家集体主义的灵感源泉。克鲁泡特金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地理学家，参加了争取建立没有任何中央政府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他出版了《食物的征服》（1892年）、《田野、工厂和工场》（1899年）以及《互助论》（1902年）等著作。

柏林新闻记者马克斯·施蒂纳（1806—1856年）是第四股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他在《个人及其财产》（1845年）一书中最先阐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德国的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享有免于制度统治的绝对权利。这吸引了从库尔贝、毕加索到王尔德的众多先锋派艺术家和作家。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奉行的各项原则本身就排除了建立有效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任何可能性。

在实际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取得了几个方面的成果。革命的无[841]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者控制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尤其是在西班牙，全国工人联盟发展成为西班牙主要的民众运动。农民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波及从安达露西亚到乌克兰的广泛地区。无政府主义还促成了现代恐怖主义——早期意大利斗士恩里克·马拉泰斯塔称之为“用行动来宣传”——的诞生。在恐怖主义者看来，轰动一时的谋杀或破坏行动，将使不公正的行径公之于众，动摇政府推行政策的决心，震撼精英统治分子的神经。恐怖行径的受害者包括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法国总统萨迪·卡诺（1894年）、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1896年）、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卡斯蒂略（1897年）以及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1900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其最终目的的和平与和谐而言，这些暴力行径毫无助益。

最后，与上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本意截然相反，无政府主义促成了一项重要的传统：道义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暴。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开创了这一传统，他认为婚姻制度的强制力并不比沙皇制度弱，这种非暴力信条吸引了从印度的“圣雄”甘地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内的众多热忱追随者。[47]贝尔加里克著名的战斗口号“无政府状态本身就是秩序”被当做完全消极的情绪，遭到人们广泛的摈弃。但是，这一口号包含极为严肃的道德要素，促使现代人关注政治和技术不可抗拒的盲目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被列为“最具吸引力的政治信条”。[48]无政府主义者与政治家俾斯麦处于政治舞台的两个截然对立的极端，俾斯麦处于欧洲政治的核心，无政府主义者则处于边缘。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支配了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和德意志帝国，他企图通过控制德国进而控制欧洲。俾斯麦是1848年后

欧洲秩序最主要的缔造者，他正是在这一年步入政坛，因而极为憎恶欧洲各地发生的革命。俾斯麦的人格和政策颇多自相矛盾之处。在德国国会和外交会见中，这位“铁血宰相”的面部表情令人生畏，私底下他却是癔病和失眠症患者，如最近披露出来的那样，他还是一个吗啡成瘾者。身为拥有土地的容克，他喜爱自己在舍恩豪森和瓦尔岑的地产，却领导了欧洲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他是一个老派的普鲁士保守主义者和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君主主义者，却接受了自由主义对手的民族主义，既给德国带来了普选权，又推行了社会保险。他是一个旗开得胜的军国主义者，却无休止地对胜利成果忧心忡忡。他是所谓德国统一的英雄，却决意使大德意志分裂。他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力量与克制的非凡结合。他确立起拥有巨大权力的地位，小心谨慎地一点一点让步，以使对手感到宽慰和安心，从而消弭他们的敌意。他曾经说：“你用刺刀可以办到任何事，但你无法用刺刀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人们对俾斯麦的评价毁誉参半。无人否认他具备高超的政治艺[842]术，对他的道德观和种种意图则非议四起。在德国爱国者和保守派卫道士看来，俾斯麦为国家和欧洲带来前所未有的稳定时期；一旦威廉二世把“这位领航员解职”，人们看到的只是不断的冲突。在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眼中，俾斯麦过去是、将来也是——用以赛亚·柏林的话说——“一个伟大而邪恶的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侵略者，有意识地运用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更糟糕的是，他打赢了每一场战争）；他还是一个骗子，他引进民主程式完全是为了保全不民主的普鲁士权势集团；他是一个恃强凌弱者，用国家权力机器胁迫对手，用“文化斗争”对付天主教会，用“殖民委员会”胁迫波兰人，用查禁镇压社会民主党。他不会否认所有这一切。无疑，在他看来，为了防止出现大毛病，正确的做法是动动小手术，开出小剂量气味难闻的药。借用左翼阵营里难得的一位俾斯麦赞美者的话说：“现代欧洲的历史可以从拿破仑、俾斯麦和列宁这三位巨人的角度来书写。这三人当中……俾斯麦造成的危害大概是最轻的。”[49]

欧洲犹太人在现代历史上起到极为突出的作用，以至于他们的故事成为形形色色的神话和误解的主题，既有人对他们赞赏有加，也有人对他们无比敌视。犹太历史的主线是清晰的。上个世纪惟一为犹太人提供安全栖息地的大国波兰－立陶宛分裂后，出现了三个彼此密切相关的新情况。首先，犹太人开始了一个新的大移民时期。其次，犹太人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获得公民权。最后，犹太人日益频繁地挣脱犹太社区所强加的各种传统束缚。[50]

1773年波兰遭瓜分后，犹太移民浪潮开始出现。波兹南、但泽等波兰西部地区的犹太人发觉自己已成为普鲁士公民，能够毫无限制地前往柏林、布雷斯劳和其他德国城市。加里西亚波兰人则成为奥地利公民，开始迁往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其他省份，尤其是布科维纳、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后来则迁往维也纳。前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东部的犹太人成了俄罗斯帝国的公民，俄国的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居住在“犹太人定居区”。（见原书附录Ⅲ，第1311页）不过，法律常常被冲破，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奥德萨，开始形成生机勃勃的犹太人社区。波兰移民离开已成为历史的极其守旧的波兰宗教社区，受到“哈斯卡拉运动”（犹太启蒙运动）、民族同化、世俗犹太政治等新趋势的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犹太移民的规模和速度明显扩大和加快。在某种程度上说，移民潮出现的原因在于日益加剧的人口压力和现代化、城市化的固有进程。欧洲犹太人从1800年的约200万人，增长到[843]1900年的900万人左右。迫害——尤其是对迫害的恐惧，也是导致犹太人移民的原因。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统治时期，沙皇政府试图强化犹太定居区法律。在随后而来的一窝蜂式的移民潮中，往往无法分清移民与难民之间的区别。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永远地离开了俄国，前往西欧和美国。[**大屠杀**]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给予犹太移民极大的帮助，犹太人在这些国家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这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1791年9月27日，国民议会授予所有宣誓效忠的犹太人以公民权。提出这一倡议的是国民议会主席格雷古瓦神父（1750—1831年），他认为平等对待犹太人是基督徒的义务之一。在议会辩论中，克莱芒-通纳勒公爵做出一个著名的区分：“不应给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犹太人任何东西，但作为个人，他们应当被赋予一切。”[51]此后，犹太人的法律解放成为欧洲自由主义的普遍要求，除俄罗斯帝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逐步明确了犹太人的法律地位。（见原书附录Ⅲ，第1295页）

然而，犹太人的解放导致了双重后果。犹太人要获得解放，那么不光是东道国，犹太人自身的行为和态度也必须有实质性的改变。解放犹太人不仅意味着取消外部强加给犹太人的种种限制，还意味着要清除犹太人心灵中“内心的犹太居民区”。在现代，人们关注反犹主义的根源时，常常忽略了犹太人自身严厉的种族隔离教规。敏感的犹太人如果试图脱离封闭的犹太社区，就无法遵守在穿着、饮食、卫生和信仰方面的613条教规；与外族通婚更是受到严厉禁止。按照犹太法律的训诫，犹太人的血统是依照母系计算世代的，因此犹太妇女受到小心翼翼的守护。如果一个犹太女子敢于和外族结婚，她的家庭就

[844]

大屠杀（POGROM）

1881年4月，乌克兰的伊里查维格勒镇发生了一场有组织的大屠杀。在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基辅、敖德萨、华沙和下诺夫哥德罗等地相继出现了袭击犹太人社区的风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令俄国当局惊恐不已，他们不去制止各种保守派团体和城镇暴民，却把犹太人当做公众的替罪羊。Pogrom（大屠杀）是一个古老的俄语词汇，意思是“围捕”或“私刑”。它通常是指一个种族集团协同袭击另一个种族集团，过去有许多受害者遭受过这种袭击，如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1881年以后，它开始带有袭击犹太人的特殊含义。[1]

1903—1906年间，俄国掀起了第二波大屠杀的高潮。官方宣传机构总是把犹太人与支持革命的闹事者相提并论。基什尼奥夫死亡45人（1903年），敖德萨死了300人（1905年），比亚韦斯托克也死了80人。最终，遍布整个帝国的历次事件中，全部伤亡人数超过800人。[2]

1917—1921年间又爆发了第三次高潮，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历次大屠杀。红军最早在诺夫哥德罗－谢韦尔斯基进行了一场屠杀，还发明了一句口号：“打倒资产阶级和犹太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俄国“白卫军”的行径，表明他们的残忍有过之而无不及。邓尼金的部队打着“打败犹太人，拯救俄罗斯”的旗号，在普罗斯捷诺夫杀害了1700人（1919年），在法斯托夫杀害1500人（1919年9月），在杰杰耶夫杀死了4000人。整个犹太人的伤亡人数超过60000人。犹太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内战、或者仅仅是反犹主义的受害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918年11月22日到23日夜间，就在波兰军队从乌克兰人手中夺回利沃夫后不久（见原书第921页），该城数个地方出现零星骚乱，波兰士兵声称遭到开枪射击。在随后的大屠杀中，估计有374人丧生，其中55人是犹太人。三个联合调查团对事件起因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一场受害者大多为基督徒的大屠杀中，难道反犹主义依然是关键所在？无论如何，利沃夫大屠杀被广泛地报道，“波兰大屠杀”也成为战后报刊的头条新闻。最血腥的大屠杀发生在其他地方，但波兰并非最后一次在敌对宣传中首当其冲。[3]［**维查库夫**］

会与她断绝关系，还会举行仪式宣布她已死亡。需要有极大的决心方能抵抗如此沉重的压力。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犹太人一旦摈弃他们的宗教，往往会转而秉持极端的立场，如无神论和共产主义。

哈斯拉卡运动最早形成于柏林，这一运动与摩西·门德尔松（1726—1786年）联系在一起，他是莱辛的剧作《智者纳旦》里纳旦的原型。哈斯拉卡运动是业已在基督教世界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启蒙运动的自然延伸，它力图修正犹太教育中排外的宗教内容，使犹太人接触欧洲主流文化。这一运动的信徒以“智者”而闻名，他们在波兰东部、尤其是加里西亚犹太人当中赢得不少支持者，加里西亚已经开始开办德语教育的犹太世俗学校。1816年，利沃夫的拉比发布了对“智者”的禁令，这反映出正统犹太教领袖的忧虑。

早期哈斯拉卡运动的有限教育理想最终传播开来。一些犹太领袖开始提倡全面的同化，犹太人借此可以全方位参与公共生活。这一思潮试图把犹太习俗限制在家庭和犹太会堂的私人圈子里，使犹太人与共同生活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这么做打破了许多传统的禁忌，势必[845]为1825年出现于德国的新教派——犹太教改革派奠定了基础。犹太教改革派致力于调和犹太宗教原则与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它不要求追随者同等地信守教规和各种限制。它逐渐成为大多数西欧和美国犹太移民的规范，对中东欧传统犹太社区的犹太民众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在西欧和东欧的一些较大的中心地区，法律的宽松加上犹太民族同化论日益发展，为犹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个时代的犹太人更频繁地跻身于金融家、律师、医生、作家、学者、艺术家和政治家的行列。用其中一位受益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话说，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勤奋的犹太小学生书包的分量，足足抵得上一个内阁大臣的公事包。”在英国，犹太人取得划时代的重要突破，例如，1841年，伦敦市推选莱昂内尔·德·罗思柴尔德男爵为代表伦敦的议员，1868年，狄斯雷利成为欧洲历史上首位犹太人首相。

确切地说，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狄斯雷利（1804—1881年）——其祖父是来自威尼斯的西班牙裔犹太移民——会把自己归人犹太裔之列。他的全家受洗皈依了英国国教，狄斯雷利与犹太教彻底断绝了关系，他的父亲曾说，犹太教“切断了犹太人与人类大家庭的联系”。“是的”，当上首相后狄斯雷利告诉朋友说，“我已经爬到了这油腻腻的杆子的顶端”。

然而，正如狄斯雷利的经历充分表明的那样，成功的同化恰恰对犹太社区构成了威胁。如果犹太人都仿效狄斯雷利的榜样，那么所有人都不再成其为犹太人。结果，随着移民和同化过程的加速，犹太人

的同化面临不少阻力。新兴的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是文化上的，后来成为政治上的，融入到欧洲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中；犹太民族主义的动力是源于犹太人的特殊经历所带来的种种忧虑。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体现在所谓的“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它把希伯来语从礼拜仪式上使用的“死的”语言，成功地改造成现代文学和政治的工具。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包括加里西亚讽刺作家尤若夫·培尔（1774—1839 年）、克泽密涅克的语言学家 I.B. 莱文森（1788—1860 年）、塔尔诺波的历史学家拉赫曼·克罗克马尔（1785—1840 年）以及《觉醒，我的人民》的作者、维尔诺的诗人杰赫迪·吕勃·戈登（1830—1892 年）。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创立起一种将在一个世纪之后被以色列吸收的世俗犹太文化，它对欧洲的影响微乎其微。

稍晚一些时候，与希伯来语相竞争的意第绪语开始复兴。1897 年时，90%的犹太聚居区和加里西亚的犹太人仍把意第绪语作为母语。哈西德派教徒的书面语言广泛地使用意第绪语，但只限于宗教用途。到世纪之交时，那些既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反对在波兰、俄国和德国进行民族同化教育的犹太领袖，提倡用希伯来字母来书写意第绪文。在此后的 40 到 50 年时间里，意第绪语复兴运动造就了兴旺的新闻业、充满活力的纯文学和受到“犹太工人联盟”特别支持的世俗学校体系。扎莫希奇的 I.L. 佩雷斯（1852—1915 年）和艾萨克·巴舍[846]维斯·辛格（1904—1992 年）是这一运动最著名的实践者，他们两人都是以波兰语作家的身份投身这一运动的。

与欧洲其他的民族主义相比，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犹太人神圣的国土位于欧洲疆域之外。除此而外，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具备了当代民族运动的一切特征：热忱而富于幻想的中坚分子，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诠释的复杂意识形态，各种大相径庭的政治观念，仍然有待劝服的大众，形形色色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及从一开始就明显不可能获得实际成果。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犹太殖民者第一次尝试迁往巴勒斯坦，标志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开端。1882 年，一个犹太殖民者团体“耶路撒冷之友”得到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的财政援助。两年后，在西里西亚的卡托维兹召开了首届犹太殖民者联合大会；1897 年，在瑞士巴塞尔成立了统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大多是有独立倾向的波兰拉比，如索恩的泽维·赫尔什·卡利舍尔（1795—1874 年）和比亚韦斯托克的塞姆尔·莫赫莱维尔（1824—1898 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领导权落入以布达佩斯出生的新闻记者西奥多·赫泽尔（1860—1904 年）为首的激进主义分子手中，后来，科隆银行家大卫·

沃尔夫森（1851—1914年）和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家钱姆·魏兹曼（1874—1952年）这样的人成为激进分子的领袖。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克罗尔马尔的《当代迷途指津》（1851年），它最有说服力的文献是来自敖德萨的物理学家利奥·平斯克撰写的小册子《自行解放》（1882年）和赫泽尔的《犹太国》（1896年）。

从一开始，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米兹腊希”与主流的世俗民族主义之间就格格不入。犹太复国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者与整体犹太民族主义者之间泾渭分明，分歧尖锐，大卫·格鲁恩（1886—1973年）的“以色列工人党”成为犹太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格鲁恩又名本-古里安，生于维斯杜拉的普沃茨克，他很快就从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1880—1940年）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组织中脱颖而出。犹太社会主义者与犹太民族主义者之间也有共同点，他们都相信欧洲犹太人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一时间，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取决于三个无法估量的重大因素：反犹主义的演变，东欧犹太民众的激进化以及获得一块适合土地的谈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达成初步的解决方案毫无信心。获得一块犹太复国主义者故土的谈判进展甚微。赫泽尔于1901—1902年谒见奥斯曼苏丹，未能取得任何成果；1903年，英国承诺在东非肯尼亚高原提供一片土地，结果导致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发生彻底的分裂。这最后的一次经历强化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信念：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与历史上“以色列人的土地”巴勒斯坦密不可分。直到英国于1916年占领耶路撒冷并随即发表《贝尔福宣言》，犹太人才在这一问题上见到了曙光。

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始终普遍存在着“憎恶犹太人”意义上的反[847]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起因于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从本质上说，它属于一种邪恶的心理综合症，总是老一套地把阴谋和背信弃义的罪名强加在犹太人头上。长此以往，犹太人就成为各种不幸的最大替罪羊。这种反犹主义以一种难以解释清楚的方式爆发成熊熊大火，有时也会逐渐减弱，但始终余烬未熄。到十九世纪末，反犹主义又在几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被煽动起来，其一是移民使许多欧洲国家第一次与犹太人有了接触，其二是不利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新兴的城市，第三个因素是民族主义浪潮的勃兴，许多人不再那么能够容忍道德规范和文化的差异。反犹主义最终表现为俄国的大屠杀、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以及用心险恶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52]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舆论认为，忍耐和教育将消除普遍的摩擦。以伦敦的“英犹协会”为代表的一些十分和谐的犹太人社区，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出于政治目的夸大反犹主义。例如，1911年，《大英百科全书》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一旦反犹主义消失，犹太民族也将不

复存在。”[53]这种观点完全错了。不论是反犹主义，还是犹太民族主义，都在不断发展。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难以预料的是，在俄国、波兰和乌克兰等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反犹主义广泛传播；犹太人相对较少的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反犹主义表现出最恶毒的形式。

在东欧，激进的犹太政治在犹太民众中尤其兴盛。除犹太复国主义外，还有各种彼此竞争的政治潮流。革命的共产主义谴责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在内的一切民族主义，在犹太人甚至犹太裔中赢得了大批支持者。他们构成了其中一名成员定义为“非犹太的犹太人”这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54]社会主义的“犹太工人联盟”致力于改善犹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状况，既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

为什么欧洲犹太人在欧洲文化和成就的各个方面都做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巨大贡献？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让人着魔的谜。这一时期欧洲犹太人的新发展既激起嫉妒，也令人钦佩，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犹太人的才华如此出众，势必触动了正在做最后努力的欧洲基督教文明捍卫者脆弱的神经，也使那些认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外侨”的成功威胁到自身的无能之辈坐立不安。不过，话说回来，犹太人的成功与激励着犹太家庭的心理动力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些犹太家庭既要战胜他们已经离开的封闭性犹太社区的排斥，又要消除他们力求获得认可的主流基督教社会的疑虑。犹太人之所以具备非凡的技能，显然还与对教育的热情密不可分，这种热情源自于对《希伯来圣经》的研读，可以很容易地转向争取早日掌握外国语言、法律资格或科学技能。知识与交往的不断发展，也必定促进了犹太人的成功，[848] 较之土生土长的同胞，有国际交往的那些人要有优势得多。事实表明，对于有天赋的个人来说，适当的不安全感将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e=mc^2$] [维也纳世界]

[849]

维也纳世界（WIENER WELT）

1848 年到 1914 年间，维也纳人口增加了 5 倍，达到 200 万人左右。维也纳的犹太人从 5000 人增加到 17500 人，增加了 35 倍，在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从大约 1%（1848 年）提高到约 9%（1914 年）。

犹太人从东方、尤其是波希米亚和加里西亚来到维也纳，是为了逃避传统犹太生活方式，接受现代世俗教育。因此，维也纳的中学、大学和专门职业中，犹太人为数极多。在1881—1886年

的高峰期，犹太学生占到学生总人数的 33%。1914 年时，他们仍占法律系学生总数的 26%，医学学生的 41%。1910 年，犹太人在全体教师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43%。1935 年，维也纳 62%的律师是犹太血统，医生中犹太人的比例则为 47%。[1]

不过，光有数字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由于其特殊的境遇，再加上身为事业蒸蒸日上的专业人员，维也纳犹太人成为资产阶级的堡垒。他们是教育、文化和艺术慈善团体的主要赞助人和积极分子。作为最有影响的外来少数民族，他们渴望确立起平等的地位，进而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作为一个在不同程度上抛弃自身文化的族群，维也纳犹太人特别醉心于文化领域每一项创新的现代事物。他们的经历是日后犹太人移民美国浪潮的预演。“犹太人只是 1900 年前欧洲先锋派的主要力量之一。正是维也纳犹太人奠定了维也纳在现代文化领域的地位。”[2]

下列这些名字或许可以显示出犹太人天赋的深度和多样性：

音乐：马勒、勋伯格、科恩戈尔德（作曲家），古多·阿德勒（音乐学家），所罗门·苏尔泽（礼拜仪式音乐家），埃德·汉斯力克（音乐评论家），约瑟夫·约阿希姆（小提琴家）；

哲学：特奥多尔·贡佩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小组成员弗兰克、哈恩、诺伊拉特；

法律：J. 格拉泽、J. 昂格尔（法理学家），E. 斯坦巴赫与 J. 奥夫纳（社会立法者），A. 勒夫勒、S. 图克尔（犯罪学家）；

医学：祖克尔曼（解剖学家），申克（胚胎学家），施泰因诺赫（生理学家），格鲁伯（卫生学家），兰德施泰纳（血液病学家），冯·巴希（病理学家），皮克（药理学家），贝内迪克（神经病理学家），卡尔普鲁斯（神经病学家），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精神病学家），卡索维茨（儿科学家），克莱恩（眼科学家），门德尔（外科学家），霍尔班（妇科学家），诺伊伯格（医学史家）；

文学：A. 施尼茨勒、J. 罗特、S. 茨威格、R. 比尔 - 霍夫曼、M. 赫茨菲尔德（作家），M. 塞斯、M. 贝内迪克、T. 赫泽尔、F. 奥斯特里茨（编辑和记者），K. 克劳斯（文学评论家）；

政治：N. 伯恩包姆（犹太自治论者），T. 赫尔泽（犹太复国主义者），欧根尼·施瓦茨巴赫（教育改革家），约瑟芬妮·威泰姆斯坦（开明的沙龙女主人）。

[850] 维也纳犹太人与犹太教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在维也纳，性情直率的大拉比莫里茨·古德曼（1835—1918 年）主持的犹太会堂

得到宗教团体的有力支持。维也纳还有各种西班牙裔犹太人和哈西德派教徒的集会。这些人也被看做是犹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更多的是“犹太裔”。像马勒那样皈依天主教的可算是一个例外。弗洛伊德抵制一切宗教。他写道：“我很高兴和自豪地认识到我是一个犹太人，尽管我对任何宗教都抱有极为消极的态度。”[3]

人们不应忘记，犹太人既不是维也纳惟一的移民群体，也不是人数最多的外来移民。维也纳接纳了更多的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就世纪之交奥地利形成的反犹主义而言，我们不应当忽略反犹主义蕴涵的普遍仇外心理。正如维也纳最有名的反犹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所表明的，对犹太人的仇恨伴随着对斯拉夫人的蔑视，而且两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希特勒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偏执狂自有其维也纳渊源。

人们也不应忽略犹太人自身偏见的影响。西方化的犹太人往往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来自东方的犹太人，“法兰克福犹太人看不起柏林犹太人，柏林犹太人轻视维也纳犹太人，而维也纳犹太人又鄙视华沙犹太人”。上述犹太人全都蔑视“最低贱的”加里西亚犹太人。[4]

就连古德曼大拉比本人的观点也是含糊暧昧的。一位女天主教徒要求古德曼读读她写的排犹主义小册子，古德曼以心理分析的风格回答说：“基督教也发现自身具有不令人满意的两面性”：

> 基督徒向一个犹太男子的画像下跪，却在一个犹太妇女的画像前局促不安，因为他的“使徒”、喜庆日和《诗篇》都是来自于犹太教。排犹主义的存在则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消除了这种矛盾。由于不得不把一个犹太人崇敬为上帝，他们就向其他的犹太人报复，把他们看做是魔鬼……
>
> 亲爱的女士，你会说，是雅利安人解放了犹太人。事实并非如此。犹太《圣经》平静而渐进地感化人类的结果之一便是，雅利安人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5]

这位大拉比强调说：“犹太教命令我热爱和尊重每一个人。”维也纳苦乐参半的风气使怨恨和欢乐交织在一起。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在两大势力之间保持平衡。1897年，公开的反犹政治家卡尔·卢埃格尔当选为市长，皇帝拒绝加以批准。经

过两天的考虑后，他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同意任命卢埃格尔，与此同时把一枚勋章授予古德曼大拉比。

当然，绝大多数犹太人既不出类拔萃，也未出人头地。从统计学意义上说，到二十世纪初，大部分欧洲犹太人的生活与一百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麇集在前波兰地区毫无变化、一潭死水般的农业社会，他们贫困、笃信宗教，完全是一盘散沙。在很多方面，他们的观点与移民到西方的孩子们甚少共通之处，倒是更接近于一直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极端虔诚的贫苦农民。这些受压迫的“东方犹太人”成为众多偏见的笑柄，歧视不仅来自本地，还来自业已在德国和奥地利获得成功、完全抛弃了犹太世界的犹太人同胞。[55]

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帝国主义**与早期帝国主义大不相同。此时的欧洲帝国主义旨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对最后的可供剥削国家的控制权。很显然，世界资源是有限的，已建立殖民帝国的国家很快就确立起长久的优势，迟到者自然无缘“第一次瓜分”。1875 年后的 20 年里，六个欧洲列强攫取了占地球表面积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殖民地被看成是先进的工业经济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殖民地供应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半成品，“宗主国”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利润。不论是在剥削范围还是程度上，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力度都急剧加大。在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某些人看来，日益加剧的殖民地资源竞争必将导致国际冲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典型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而来的，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使命，即依照宗主国模式使殖民地“欧化”。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一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与政治当局和商业团体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与美洲的西班牙传教士等前辈传教士不同，新时代传教士往往自命肩负起更为宽泛的使命，如医疗、世俗教育、行政改革和技术革新等。

帝国主义列强力图利用殖民地的军事潜力。欧洲军队开始引入由殖民地居民组成的团队，这和早先欧洲士兵抵达海外一样令人吃惊。

世界版图很快被占满，欧洲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把注意力对准数量日益减少的目标。美国人早已摆脱了殖民地地位。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在前一个时期就已经慑服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仍未被欧洲人染指的只有非洲、印度支那、中国和太平洋诸岛屿。

欧洲人建立起各种不同类型的殖民地，彼此之间差异很大。英国[851]凭借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维持着全球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在很大程

度上始终依靠土著君主和当地军队来维持殖民统治。德里的英国官吏人数还没有奥地利在布拉格的官吏多，却统治着4亿人口的印度。英国移民建立的较大领地全都赋予自治领的地位，加拿大于1867年、澳大利亚于1901年、新西兰和纽芬兰于1907年、南非于1910年，相继获得自治领地位。与英国的做法相反，法国推行的是更为紧密的一体化政策。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行政部门并入到法国的宗主国行政体系。移民北非的法国人，尤其是普法战争后背井离乡的阿尔萨斯-洛林人，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这种中央控制的传统更接近于俄国而不是英国的做法。一旦时世变迁，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断绝，这种做法会引发很大的问题。

直到很晚近的时期，非洲这个"黑暗大陆"仍然有许多地理上的神秘之处。从远古时期开始，欧洲人就已经在非洲北部海岸建立了殖民地。直到1889年，欧洲人才充分认识到灌溉着法老土地的尼罗河资源。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们仍在数年时间里对戴维·利文斯通这样的传教士探险家漠然视之。与欧洲人的观念相反，非洲既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也未形成任何完整的宗教；非洲有着种类异常丰富的不同语言和文化，这助长了欧洲人认为所有非洲人都是石器时代的野蛮人的观念。然而，欧洲人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非洲的土地和人民，开始"争夺非洲"。非洲在军事技术上十分落后，西非古老王国的抵抗与阿兹特克和印加王国曾经组织的抵抗相去无几。阿比西尼亚是唯一维持了独立的土著帝国，这或许是因为它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缘故。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也拥有一个为欧洲各国所承认的皇帝。在中国，非洲式的正式殖民受到禁止，因而租界和商业特许权成为当时的通例。中华帝国对欧洲人具有如此大的价值，以致它在1901年成为欧洲人共有的保护地。这一屈辱的事件推动了十年后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现代中国历史的开端。[**义和团**]

中国的邻国日本在1855年之前一直闭关锁国，但它迅速地学习欧洲方式的精髓，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先是在朝鲜、接着在中国满洲建立起殖民帝国。1904—1905年的战争中，日本在陆地和海上全面击败俄国，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打破了许多欧洲人的错觉。

太平洋群岛是最后才被帝国主义玷污的。帝国主义发展历程的最后步骤是德国夺取西萨摩亚（1898年）、美国攫取夏威夷（1900年），英法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实行国际共管（1906年）。

[852]

义和团（BOXER）

1900年8月14日下午2点左右，一支多国救援部队，经过从天津出发的十天边战边走的行军，攻入北京。这支军队的到来结束了义和团对北京城内使馆区的围攻，在此前的8周时间里，用栅栏防卫的使馆区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

“义和团起义”控制了正处于慈禧太后衰落时期的中国，这是一场决心驱逐所有“洋鬼子”及其工厂的仇外运动。义和团——其英文名称“Boxers”来自于“义和拳”的中文寓意：“正义与和谐的拳头”——被欧洲人带来的从铁路到基督教的所有事物所激怒。他们认为外国公使馆对他们的政府施加了邪恶的影响。

在欧洲历史上，1900年的远征中国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共同的冒险把所有列强暂时性地团结起来。为了消除共同的威胁，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与日本组成联军。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指挥许多国家的水兵守卫使馆区。救援部队由俄、美、日军以及印军一个旅组成，有20000人之多，由司令官阿尔弗雷德·盖斯理爵士指挥。德国元帅冯·瓦德西伯爵指挥20000名德国士兵组成的远征军于9月末抵达，但很快就撤出了。

一旦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过去，欧洲人之间的一致立即破裂了。德国和意大利提出比其同伙多得多的赔偿要求。俄国拒绝参加起诉对屠杀负责的中国人。事实上，控制满洲里的俄国军队本身就犯下了大规模屠杀的罪行。英国与德国对最终条约的解释大相径庭。所有参与者的所作所为表明，假如确实有过欧洲的联合，也顶多是昙花一现罢了，这次昙花一现的联合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

如果说欧洲帝国主义以“欧化”的方式为整个现代世界提供了最[853]具影响的发展经验，它也使欧洲自身面临广泛的压力和影响。欧洲各民族分成“适于统治帝国”的民族和不适合统治帝国的民族，这是继早先区分“历史的”与“非历史的”民族之后，又一次划定欧洲民族的等级。帝国主义显著推动了业已建立殖民帝国的国家的经济，进而提升了那些国家的军事潜力，使战略均势朝着有利于西欧的方向倾斜。它还极大增进了欧洲对非欧洲文化和外来“殖民地”文化的熟悉程度。在某些国家，如英国，人们对西藏或贝专纳的了解比对欧洲邻国的了解还深。不过，它也加深了欧洲人的宗教和种族偏见，使他们

形成了与他们的帝国一样挥之不去的障碍和情结。这些偏见相当极端，例如，1904年时，汉堡市甚至在动物园的围栏里展出了一群萨摩亚妇女。[56]

如悲观主义者预言的那样，到世纪之交时开始出现殖民地冲突。1898年，英国和法国的远征队在苏丹的法绍达形成对峙，英法两国差一点就此大打出手。1899—1902年间，英国与两个南非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因德国支持布尔人而变得复杂。1906年和1911年，法国两度采取行动，争夺摩洛哥的控制权，激起了德国的强烈抗议。殖民竞争并未酿成全面的战争。殖民竞争确实使愤怒不断升级，但列强在中国和摩洛哥采取的对商业利益的"门户开放"政策，通常总能使这种对抗有所缓和。

海军力量的强弱事关帝国的成败。战舰以陆军无法企及的方式决定了世界范围内商业利益控制权的归属。一部经典的研究著作是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撰写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1890年）。1898年，海军的作用显现出来。在这一年，美国海军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仅存的殖民地中夺走古巴和菲律宾。与此同时，德国海军大臣冯·蒂尔皮茨做出启动庞大造舰计划，挑战英国无敌舰队的战略决策。军备竞赛开始了。

晚期的俄罗斯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它似乎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活力，抵消了它的主要弱点。长久以来，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和其他一些人就把俄国视为将来惟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强国。俄国拥有全球幅员最广大的统一版图、欧洲最多的人口以及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队。它是欧洲最大的农产品输出国，拥有最为丰富的未探明矿产资源，也是境外投资的主要接受国。在文化上，俄罗斯文化最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欧洲苍穹中最富魅力的一颗明星。早先文学传统有限的俄罗斯语言如今已发育成熟。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契诃夫跻身于世界文学巨匠之列。穆索尔斯基、柴科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等人使俄罗斯音乐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辉。俄罗斯芭蕾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学校是各自领域的佼佼[854]者。在社会方面，俄国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前农奴制农业社会。但是，农民的命运正在逐步得到改善，而且俄国比任何国家都更为严肃地关注农民问题。P.A.斯托雷平在1906—1911年间推行的农业改革使农民能够自由流动，并有能力购买土地。在欧洲人眼中，沙皇光彩夺目的宫廷以及一批又一批完全融入欧洲生活方式的贵族、商人、艺术家和教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俄国的落后。从政治上说，自1905年后，俄国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已取得了重大进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族问题。稳定压倒一切；对外战争的副作用就是不断激化国内危

机。要使自身的巨大潜力变为现实，俄国必须做的就是无限期地延长欧洲的和平。[切尔诺贝利]

[855]

切尔诺贝利（CHERNOBYL）

“切尔诺贝利是乌克兰境内普里皮亚特河上的一个小城镇，距离普里皮亚特河与第聂伯河汇流处20俄里，距离基辅120俄里。切尔诺贝利有居民6483人，其中东正教徒2160人，旧礼仪派教徒566人，天主教徒84人，‘上帝的选民’3683人。庄园属于弗瓦迪斯瓦夫·霍基耶维茨基伯爵所有，迷人的城堡坐落在俯瞰三条河流的小山上。水上贸易、捕鱼业和洋葱种植是城镇的经济来源。”[1]

上述引文引自1880年波兰出版的《地名辞典》，它有一个令人误解的书名，目的是为了躲避沙皇的新闻检查。这本书中的一个条目列举了曾经属于波兰联邦的所有城镇和乡村。切尔诺贝利就是那些曾经属于波兰版图、后来被并入俄国和苏联的大片领土中的一个典型城镇。该城的犹太居民宁愿用他们的意第绪语来称呼它。在数个世纪中，波兰地主、犹太市民和鲁塞尼亚农民一直共同生活在一起。

切尔诺贝利第一次在特许状中出现是在1193年，当时它被说成是罗塞尼亚公爵罗思特斯拉维奇的狩猎小屋。后来，它被并入立陶宛大公国，成为王室直辖村庄。为了抵御四处劫掠的鞑靼人，该地修建起城堡。1566年，也就是立陶宛大公国把治下的乌克兰地区转让给波兰王国的三年前，皇家骑兵首领费隆·克米塔获准永久保有切尔诺贝利，从那以后他就自称为“切尔诺贝利的克米塔”。不久以后，切尔诺贝利通过联姻转到了萨佩哈家族手中，1703年为霍基耶维茨基家族所有。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后，俄国兼并了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的宗教历史极为丰富多彩。犹太人社区在该城人口中占绝对多数，他们可能是波兰殖民战争期间费隆·克米塔作为代理人和租赁地管家而带入的。此后，他们分化成哈西德派犹太人和东正教犹太人。1596年后，这一地区的罗塞尼亚农民大多数信奉希腊正教（东仪天主教），只是在鞑靼人的威逼之下才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全盛期，鲁卡兹·萨佩哈于

1626年建立了多明我会的教堂和修道院。在那些年代里，切尔诺贝利成了宗教宽容的天堂。切尔诺贝利生活着一群反对特伦特会议各项教令的老公会信徒，十七世纪时一群旧礼仪派教徒又从俄国迁入此地。他们都是为了逃避1648—1654年赫梅利尼茨基(Khmyel'nytsky)起义及1768—1769年起义的极度恐怖，才来到切尔诺贝利的。后一次起义的领袖之一邦达仁科（Bondarenko），被霍德凯维奇（Chodkiewicz）的轻骑兵抓住并残忍地处死。1832年，沙皇当局没收了多明我会修道院，1852年多明我会的拉斯科尼基教堂也被没收。 [856]

1880年后，切尔诺贝利的命运多次发生转折。1915年，它被德国占领，在随后的内战中，它又先后被布尔什维克、白卫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攻占。1919—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它先被波兰军队，继之被红军骑兵占领。1921年，它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和大饥荒中，切尔诺贝利又遭受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在1936年的边境大清洗中，波兰人被驱逐出境。1941—1944年德国占领期间，犹太居民遭到纳粹屠杀。20年后，切尔诺贝利被定为苏联第一批核电站的厂址之一。1991年后，切尔诺贝利加入乌克兰共和国。[**丰收**][**科纳尔姆王**]

《苏联大百科全书》根本没有提及上述事实。“切尔诺贝利”条目的六行篇幅中，只谈及切尔诺贝利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性城市，拥有一家铸铁厂、一个干酪车间、一间修船所、一座艺术品陈列室和一所医学院。[2]

凑巧的是，切尔诺贝利周围的沼泽地里，艾属植物十分茂盛，切尔诺贝利也因艾属植物的斯拉夫语词汇而得名。在《圣经》中，茵蔯通常被作为痛苦的同义词，象征着上帝的愤怒：

> *就有烧着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茵蔯”。）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蔯，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3]

任何逐字逐句读过《新约圣经》的人都会认为，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核泄漏事件肯定招致了上帝的愤怒。

晚期的德意志帝国最深切地感受到帝国经历所带来的困扰。德国集现代、科学、民族、繁荣和强盛于一体，在很多方面是十九世纪各国的榜样。但是，它就像某个齿轮已经松动的庞大机器，机体剧烈震

颤，开始温度过高，最后的爆炸将摧毁整座工厂。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人们把他肌肉萎缩的手臂看成是他的国家有缺陷的一个标志——统治时期，德国摆出一副傲慢和好战的姿态。德国强有力的工业化进程要晚于英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德国才实现政治统一。结果，德国未能建立与日耳曼人的骄傲和杰出才能相称的殖民帝国。德国"生存空间"思想的出台，与其在殖民地争夺中掠获的赃物不多有关。客观地说，德国的劣势更多地属于想象而非现实的劣势：德国在东欧邻近地区的经济渗透，足以抵消缺乏地处遥远的殖民地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德国人心头的愤恨却越积越深。皇帝和他的宫廷没有认识到，和平才是德国最终控制欧洲政治和经济舞台的关键。

[e = mc²]

[857]

$e = mc^2$

1896年1月28日，德国内政部批准了一份不寻常的要求正式放弃国籍的申请。申请人居住在瑞士，年仅16岁。他未能通过苏黎世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并正在阿劳的州立学校学习。这位生于乌尔姆镇、长于慕尼黑的流亡学生痛恨德国学校教育的严格管制。他对自己就读的教会小学充满厌恶之情，很早就逃离了大学预科学校。他的家庭迁到米兰后，他觉得很不安全。像许多年轻的前犹太人一样，他是一个反宗教分子、和平主义者，而且为激进社会主义所吸引。他在数学上颇具天赋。

最终被苏黎世理工学院录取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经常因为在实验室做电动力学实验而缺课。他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朋友，阿德勒后来在维也纳刺杀了奥地利首相。1901—1905年间，他在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继续苦苦思索着麦克斯韦、赫兹和马赫等人所做工作的理论意义。

据说，爱因斯坦对时空相对性的直觉，是在伯尔尼乘坐电车去Kramgassse大街上班时激发出来的，他在电车上想象自己正以光速向钟楼飞速前进。很长时间里他一直想知道，假定反射出他影像的光波正以同样的速度前进，那么他是否能从驾驶员的反光镜里看到自己。无论如何，凭借"相对的同时性"原理，爱因斯坦逐步认识到，自然界并未经历过瞬时的相互作用。同时，光速是恒定的，约为每秒186300英里，那么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距离就是相对的。1905年，他在《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物

体的惯能和能量的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中有一个将推翻经典物理学、奠定原子时代基础的等式。设定 e = 能量，m = 质量，c = 光速，那么 $e = mc^2$。

不久以后，除上述狭义相对论外，爱因斯坦又创立了取代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广义相对论。这一理论是对量子物理学的重大贡献。1914 年，他进入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工作，1921 年荣获诺贝尔奖。

在他的理论被证明为正确之前，爱因斯坦时常有些担心。有一次他说："如果相对论是正确的，德国人会认为我是德国人，瑞士人会认为我是瑞士人，而法国人则会认为我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如果相对论证明是错的，法国人会认为我是瑞士人，瑞士人会认为我是德国人，而德国人会认为我是犹太人。"[1]

1933 年，爱因斯坦离开纳粹德国，前往巴黎寻求庇护，法兰西学院因为他的德国国籍而拒绝接纳，他被迫前往美国。欧洲失去了全欧洲最杰出的天才。

现代主义 与政治动荡相对应，欧洲形成了许多"世纪末"的文化潮流，通常用"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这些文化思潮。现代主义在诸多方面意味着与传统的根本决裂，这种决裂远远超出通常意义上知识风气的盛衰消长。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500 年来欧洲人努力的目标遭到公开摈弃。"[57]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所有艺术形式，理论家常常把现代主义与这一时期其他极为重要的新发展联系起来，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雷泽的人类学，乃至无政府主义政治学。不论是否是对政治与社会张力的直接反应，现代主义肯定蕴涵着一种深切的隐忧。**[阿利西亚]** **[声音]**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 年）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性情多变的德国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阐述了这个时代的许多最震撼人心的思想。他有次曾把哲学家比喻成"一管炸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4 年）、《道德的谱系》（1887 年）、《偶像的黄昏》（1889 年）、《权力意志》（1901 年）等著作中，他不断破除种种公认的见解。他咒骂基督教、民主以及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他解释道："道德无非是个人的群体本能。""宗教世界纯属虚构"。现代人是卑劣的，"我将给你们超人"。统治精英总是凭借暴力大行其道。"白肤金发的野兽不会被看错，他们渴望掠夺和胜利。"最大胆的是他宣称："上帝死了"，"世间仍然会有他的幽灵出没的洞穴"。"上帝之死"被认为是人类思想解放的大事。

[856]

[858]

声音（SOUND）

1888 年末或是 1889 年初，已届耄耋之年的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应邀为爱迪生“完美的留声机”朗诵自己的诗作。他开始朗诵自己最脍炙人口的诗篇：

> 我跃上马镫，约里斯和狄利克也跃上马镫，
> 我策马飞奔，我们三人一起飞奔。
> “飞一般”，门闩打开时看护人叫道；
> 当我们急驰而过，围墙发出回声：飞一般……
> 边门落下，日色西沉，
> 我们并肩奔驰直到午夜时分。
> 彼此不发一语，我们飞快向前
> 并驾齐驱，不分上下，步调一致；
> 我在马上转过身来，但……[1]

他含糊不清地朗诵了几行后，承认已经忘记了 40 多年前写下的诗句。重新开始后，他嘉许地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对着爱迪生先生的著名机器说话的日子。这段即席讲话和未标明日期的录音，是现存最早的录音之一。[2]

同年，埃米尔·柏林纳在德国展示了他发明的留声机，柏林纳留声机用更容易刻录的圆盘代替蜡筒。图林根州沃特绍森的一家名为卡默勒－莱因哈德的玩具工厂投产留声机，很快就推动了录音的大规模市场化——这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3]

录音使音乐和音乐欣赏彻底改观。例如，在莫扎特逝世 200 周年的 1991 年，人们举办了一个展览，展示过去 200 年来莫扎特作品演奏在音质和种类上的演变。参观维也纳新国家剧院的游客都会佩戴立体声耳机，在游览过程中，耳机接收各个“语音解说区”发出的红外线信号后自动播放。他们将听到剪辑自利奥波德·莫扎特在沃尔夫冈出生那一年出版的《初学集》中的小提琴演奏，也能比较一下无活瓣法国号和小号的声音与现代铜管乐器声音的区别。他们还能听到录制于 1900 年的早期歌剧录音里的一段非凡的慢板，以及威廉·赫尔什演唱的咏叹调《伊希斯与奥纳西斯》，还可观看一台电脑声谱仪显示埃迪塔·格鲁贝娃演唱《黑暗女神》时的和音频率。可惜，人们听不到莫扎特亲自演奏的声音。内行

的听众会告诉你莫扎特曲目演奏取得的巨大进展。莫扎特变幻莫测的“声音世界”被还原得栩栩如生。[4]

录音在很多方面彻底改变了人们关于过去的观念。1888 年前，历史记录缺乏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它们是无声的。各种档案和非自然信号如同聋哑人一样。人们无从寻觅拿破仑战役的怒吼，贝多芬协奏曲的节奏以及加富尔演说时的语调。1888 年后，历史已能将声迹记录下来，历史记录空前丰富。[859]

勃朗宁惊慌失措的朗诵录音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下属的国立音响资料馆，目前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许多类似的录音资料库。1910 年，巴黎开放了第一所“录音资料室”。国际音响资料协会拥有大到国立广播公司，小到地方性或私人公司的数量庞大的录音资料。除了音乐资料外，还有民歌、文学、广播、口述历史以及方言学等相关音响资料。[5]

在东欧，托尔斯泰伯爵是为后代留下录音的先驱者之一。1910 年 3 月号的《留声机杂志》评论道：“俄国颁布了一道命令，在沙皇帝国版图内禁止出售托尔斯泰的录音。斯拉夫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不再这么气量狭小呢？”[6]

尼采似乎在鼓吹，除强者的统治外，生活毫无意义。他的敌人认为他是邪恶和有教养的无理性的预言家。尼采之于哲学一如克尔恺郭尔之于神学。两人都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尼采宣布：“基督教决意裁定世界是邪恶而丑陋的，并已经使世界变得邪恶而丑陋。”[58] [悬蠢] [859]

就其影响而言，尼采的妹妹所散布的经过修订的尼采哲学一点不比尼采本人的影响小。伊丽莎白·尼采－福斯特（1846—1935 年）照顾垂死的哥哥并欣赏他的思想，她曾于 1886 年率领一群“雅利安”殖民者前往巴拉圭的新日耳曼尼亚殖民地。她既是瓦格纳的朋友，又同墨索里尼保持朋友关系，还极其仰慕纳粹党，把尼采的名字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后来，一位“元首”含泪出席了她的葬礼。[59]

从社会学角度说，大体上可以把尼采的观点看成是知识分子厌恶新兴的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的表现。一个艺术家和作家的国际性小圈子信奉尼采的观点，他们希望强化所谓的“高尚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隔阂，进而维系自命的思想精英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们成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合适伙伴，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街头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最近，一位评论家写

[860]

愚蠢（FOLLY）

尼采曾经抱怨，历史学家从来不去写那些使历史变得真正有趣的事情：愤怒、激情、无知以及愚蠢。他的抱怨只能是针对德国学派的历史学家。波兰就有从人类的缺陷和美德的角度来分析过去的悠久传统。波岑斯基的经典之作《波兰愚行的历史》出版于1842年。[1]1985年，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亚当·米什尼克出版了《幽默的历史》，记述波兰对共产主义的抵制。[2]

如今，人人都知道，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心智"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在古往今来的欧洲历史上，愚蠢荒唐比比皆是。特洛伊人准许木马进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激怒新教徒脱离罗马教会，英国政府逼得美洲殖民地居民造反……然而，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人人都能从错误中有所得。有句古老的波兰谚语说得好："波兰人在错已铸就时总是聪明的。"布莱克在他的《地狱的箴言》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傻瓜如果坚持自己的愚蠢，就会变得聪明起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才是真正的愚蠢。人们也可以用那种语言撰写欧洲历史。[编年史]

道："大众文化孕育出尼采这样一位敌手来反对自身。他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说明了大众的威胁所引发的恐慌。"[60]

回顾过去，最令人震惊的似乎恰恰是尼采及其赞赏者对"大众"嗤之以鼻的刻毒态度。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说道："许多人降生，[860]太多的人降生，而他们把家族支系拖得太长了。"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尼采号召"上等人对大众宣战……大多数人无权继续活下去。"在一封写于1908年的私人信函中，刚刚在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读到尼采著作的D.H.劳伦斯当真设想用一个煤气室来无痛苦地处置过剩的人口：

> 倘若我能随心所欲地行事，我将建造一座同水晶宫一样大的毒气行刑室，有军乐队演奏柔和的音乐，一架摄影机轻快地运转着；接着我会走到穷街陋巷，把所有的病人、瘸子和伤残者都带进来；我会平和地引导他们，他们会感激地露出疲惫的微笑；乐队轻柔地演奏着《哈里路亚合唱曲》。[61]

这位备受爱戴的人来自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他说这番话 33 年之后，奥斯威辛集中营开始兴建。H.G. 威尔斯（1866—1946 年）的观点与其大同小异，只不过表达得更为隐晦。他是一位幻想家、社会主义者，《时间机器》（1895 年）和《星际战争》（1898 年）的作者，也是这个时代最受欢迎、最多产的作家之一。《期待》（1902 年）一书表明他是优生学的热忱提倡者，在他看来，这门改善人类种群的科学要求消灭弱者、低能者和社会不良分子。他问道："这个新共和国将如何对待各种低等民族……黑人……黄种人……［以及］所谓文明世界的白蚁——犹太人？"[62]

当然，重要的是，所谓的"大众"，如其诋毁者所辱骂的那样，[861] 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群众是可见的；大众——即所有可能的群众的总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群众……是一个比喻说法……它把其他人纳入到一个集合体……否认他们具有我们认为我们自身和我们相识的人才具备的个性。"[63]

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所引发的思想争论远远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范畴。例如，早年阅读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激发了那不勒斯作家本内迪托·克罗齐（1866—1952 年）创立"精神哲学"。克罗齐不仅研究那不勒斯、现代欧洲和当代意大利的历史，还著有《美学》（1902 年）、《逻辑学》（1905 年）和《史学理论》（1917 年）。在研究人类精神演进时，他不但摈弃形而上学，也否定宗教的作用，而是强调人类直觉的作用和历史的重要性。1903 年，他创办《评论》杂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他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克罗齐晚年成为反对意大利法西斯的思想领袖。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年）是一位奥地利医生、精神分析学说和专业的创立者。他的研究工作不仅对新兴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影响到所有涉及心理和人格的人文科学。他从催眠术着手，考察了人类借以自我保护，抵御外部和内部压力的无意识心理过程。他尤其揭示出性欲在导致神经官能症的无意识和压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梦的解析》（1900 年）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他们很快就组成"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不过，分歧很快就出现了，弗洛伊德早期合作者之一的卡尔·荣格（1875—1961 年）出版了《无意识心理学》（1912 年），首次提出"集体精神分析"概念以及内向与外向人格的差异。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 年）一书中，弗洛伊德认为，发达社会的生活方式必然使人的欲望受到压抑，实际上使幸福变得遥不可及。纳粹崛起后，他被迫于 1938 年逃往英国。此时，精神分析学说已经拥有大批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它向人们揭示出一个全新的、令人尴尬的自我概念："自我并非自己房子里的主人。"[64]

作为一种艺术流派，颓废派可以被看做是晚期浪漫主义的分支。它起源于人们探究最极端的感官体验的愿望。颓废派运动探究纯感官体验，孕育出欧洲文化的一些最富创造力的杰作，尽管其间一直丑闻不断。查理·波德莱尔（1821—1867年）的作品表现出早期颓废派与浪漫派之间的联系，他曾把德·昆西和爱伦·坡的作品翻译成法文。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1857年）后来被视为象征派诗歌的宣言，这一流派力求发掘现实丑恶外表下隐藏的秩序与美的“应和”：

[862]

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石，
不时说出模模糊糊的语音。
人们穿过象征的森林，
森林投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行人。[65]

在《航行的诱惑》一诗中，他构想一个想象中的天堂：“万物有序而优美、愉悦、平静而极乐。”波德莱尔的后继者，尤其是保罗·魏尔兰（1844—1896年）和阿蒂尔·兰波（1854—1891年），用语言再现出他们最为景仰的印象派画家笔下的画面：

秋天的
小提琴
那长长的呜咽
用单调的
忧郁
刺伤我心。[66]

或是：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67]

颓废派的挑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魏尔兰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颓废意味着……关于高度文明的最为成熟的思想。”同时代人却很少赞同他的看法。波德莱尔曾因在诗中“侵犯公共道德准则”，而被处以大笔罚款，还受到极大的羞辱。魏尔兰与兰波私奔，并在一次争吵中开枪打伤兰波，结果遭到监禁。1893年，一位居住在巴黎的德国作家公开抨击毒品、同性恋和歇斯底里，哀叹“数千年来一直符合逻辑和约束堕落行为的既定秩序崩溃了”。马克斯·诺尔道写道：

"濒临沉沦和灭绝的情绪大行其道。"[68]奥斯卡·芬格尔·弗拉赫蒂·威尔斯·王尔德（1854—1900 年）——他创作了几部杰出的喜剧，其中以《认真的重要》尤为出色（1895 年）——因同性恋的罪名在雷丁监狱度过了痛苦的两年时光。他的合作者、色情插图画家奥布雷·比尔兹利的大多数作品都不宜出版，诗人、批评家、老派的伊顿公学性鞭挞者阿尔吉隆·史文朋（1837—1909 年）的作品也是如此。这些唯美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与社会主流的先入之见格格不入，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宗教典礼、社会改良和自我克制的鼎盛期。[**儿童**] [**环法自行车赛**]

[863]

儿童（BAMBINI）

1907 年 1 月 6 日，在罗马郊区圣洛伦佐贫民窟，一所只有一间房屋的托儿所开始招收新生。它配有儿童家具，还有满满一橱智力玩具和益智游戏玩具，却没有合格的教师。托儿所面向双职工的工人子弟，不然的话他们的父母在白天只好任由他们在街上乱跑。这家托儿所被称为 La Casa dei Bambini，意思是"儿童之家"。

托儿所的创办人玛丽亚·蒙台梭利博士（1870—1952 年）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她是一个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的女权主义者，一位合格的医生，一家智障儿研究所的负责人。背地里，她还是有着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的儿子马里奥·蒙台梭利后来在阿姆斯特丹主持国际蒙台梭利协会。

《蒙台梭利方法》出版于 1910 年，宣传儿童集中教育的原则。儿童想要学习。儿童能自学。儿童也有五官，应该全部加以开发。应该让儿童自由选择学习的内容和时间。他们所需要的是没有胁迫、良好的设施以及不断的鼓励。对于当时的教育者来说，这些观点无异于诅咒，他们赞成的是"口说板书"、宗教教育、严格的纪律、僵化的教学提纲和作息时间。蒙台梭利博士告诫说："教育不是唯命是从就能获得的，教育的获得在于对环境的体验。"[1]

蒙台梭利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例如，她认为儿童不喜欢糖果，却喜欢沉默。在教学中她坚持写作应先于阅读。但是，她的核心信念，即一切从儿童的需要出发，逐步成为先进的现代教育学的基础。她开办的数百所学校遍布整个欧洲和美国。法西斯掌权后，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关闭了她的学校。

在很多方面，蒙台梭利追随两位早期先驱者的足迹，瑞士人 J.H.裴斯泰洛齐（1746—1827 年）和图林根人弗里德里希·福禄

倍尔（1782—1852年）。1837年，福禄倍尔在伯尔尼附近的布尔多夫开办了第一家“儿童养育学院”，它是“儿童之家”的真正先驱。后来，瑞士教育学家让·皮亚杰（1896—1980年）发展了蒙台梭利关于儿童心理的观点。[2]

[864]

环法自行车赛（TOUR）

1903年7月1日下午2点15分，巴黎郊区蒙泰龙的雷韦尔－马坦咖啡馆附近画了一道起跑线，大约60名自行车手正准备启程前往里昂，巴黎到里昂赛段是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6个指定赛段中的第一赛段，选手要在路面很差的道路骑行467公里。估计选手们是日以继夜地骑行。19天后，莫里斯·加兰率先进入王子公园，成为获胜者，他累计骑行了2430公里，平均骑行速度为每小时26.5公里。他骑的自行车把手很低，穿着到膝的长袜、运动型灯笼裤和一件套头圆领部分折反为双层的运动衫，戴着一顶有耳罩的扁平帽子。他获得的奖金为6125法国法郎，相当于242英镑。此后，除开战争年代，这一赛事在每年的7月都会举行。[1]几个现代因素共同促成了这项欧洲最漫长和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闲暇和娱乐观念的转变，（男子）大众体育比赛组织的完善，大量发行的报纸的竞争，以及线闸、自行车齿轮以及橡胶轮胎等相关技术的发展。

赛事直接起因于两家巴黎周刊《汽车》和《自行车》之间的竞争。《汽车》周刊的出版商亨利·德格朗热正力图打入自行车市场，因为他把周刊改名为《汽车与自行车》而遭到起诉。作为回应，他举办了环法自行车赛。他决不后退，亲眼目睹了《汽车》杂志的发行量迅速增长，而《自行车》的发行量一路萎缩直到最后湮没无闻。在1936年退休前，他一直是环法自行车赛的赞助人和主办者。

经过数十年的完善，环法自行车赛才最终定型。以前，比赛线路经常发生变化。1906年后的五年里，比赛线路延伸到阿尔萨斯；路边观众人群开始高唱《马赛曲》，德国政府便不再允许赛事经过阿尔萨斯。在山地赛段，赛程要经过比利牛斯山脉的图马莱特山口（2122米）、萨伏依地区可怕的加布里埃山口（3242米），参赛者在这些路段要扛着自行车通过破损不堪的道路。环法自行

车赛赛程最长时曾达到5000公里以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固定为比较适中的3700公里左右，分为30个日间赛段完成。1913年7月，赛事开始用鲜艳颜色的运动衫来辨认领先者，当时德格朗热突然跑进路边一家商店，买了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件“黄色领骑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环法自行车赛开始成为一项国际性赛事。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车手常常摘得桂冠。像埃迪·默克斯或雅克·恩奎蒂这样的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其拥趸人数之多不亚于任何体育明星。1991年7月，举行了第79届环法自行车赛，观众人数达到2200万人次，最后冠军被一位西班牙巴斯克人米盖尔·安杜兰夺得，他的骑行速度达到平均每小时39.504公里。[2]1994年的第82届环法赛上，有段赛程安排在英国，选手们要先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再进行比赛，安杜兰则史无前例地连续第四次夺得冠军。安杜兰将再次踏上征程。*

现代绘画与文艺复兴以来长盛不衰的具象派艺术——摄影已经使之完全过时了——彻底决裂。1836年，决裂的时刻到来，爱德华·马奈（1832—1883年）在一阵表现癖之下在巴黎的“落选者沙龙”展出[865]了画作《野餐》。从那以后，各个流派和团体不断尝试新的艺术形式、技巧、色彩和结构，为了把握这些流派和团体的发展脉络，人们不得不使用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称。最开始是以莫奈的《日出·印象》（1874年）而得名的印象派：莫奈、毕加索、西斯莱、雷诺阿、塞尚和德加，随后是以修拉为首的点彩派（1884年）、新印象派（1885年）、以塞吕西埃和勃纳尔为首的纳比画派（1888年）、高更促成的综合主义画派（1888年）、恩索尔、凡·高所开创的表现主义画派（1905年）以及德国的画家团体“桥社”。接下来是俄耳甫斯主义、马蒂斯、杜飞和弗拉曼克为首的野兽派（1905年）、布拉克和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1908年）、未来派、黑猫与蓝骑手团体（1912年）。到1910年、1911年，以旅居德国的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年）的作品为标志，绘画已经发展到纯粹抽象主义阶段。[印象派]

在建筑和设计领域，“新艺术主义”从流行的建筑标准和常规中“脱颖而出”，发展成波及全欧洲的浪潮。最早的新艺术主义代表作是维克多·霍尔塔在布鲁塞尔设计的穗状房屋。这一流派建筑的典范是

* 1995年，安杜兰创记录地连续第五次夺得环法赛冠军。——译者注

[866]

印象派（IMPRESSION）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克劳德·莫奈喜欢和奥古斯特·雷诺阿一起作画。他们把两人的作品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想看看各自将会如何捕捉对同一景致的不同印象。他们常去的地方是巴黎附近圣克劳德对面偏僻的布吉瓦河岸。

1869年，莫奈开始创作《布吉瓦的日出》（见图67）。最初，他似乎想撷取一个平凡却不平庸的场景：日暮时分人们在一座桥上漫步。他尝试营造一种全新的效果：他不是去描绘自己看到或在心目中想象的世界，换言之，他笔下的世界既不是写实的，也不是理想化的；他描绘的是世界带给他的印象。毫无顾忌地刻意强调主观性的印象派运动，即因他的另一幅油画《日出·印象》（1874年）而得名。莫奈坚持自己的方向，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数年时间里，他没有卖出一幅画。在同时代人看来，莫奈的作品毫无价值，极不文雅。有一次，当他离开巴黎去看望新生的儿子时，债主扣押了他画室里的所有作品，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曾经试图自杀。[1]

印象派对三件事情感兴趣。首先，他们致力于发现人类视觉的弱点：人们在看到某些物体的同时，遗漏了其他一些事物。所以，他们一心一意描画一种有选择的不确切影像。莫奈刻意用模糊的笔触来描绘布吉瓦的景象，斑斑点点的波浪，不对称的窗户，失真的树叶以及凌乱的云彩。

其次，印象派画家沉醉于光影的奇异效果。莫奈曾在非洲的轻步兵部队服役数载，亲眼目睹了撒哈拉大沙漠极其丰富的光影效果。他做了一系列系统的用光实验，从不同角度反复绘制同一主题的作品。他绘制了12幅鲁昂大教堂正面的素描，每一幅都捕捉了教堂在一天中不同时段不同光线下的景象，使公众认识到他出奇的手法。

第三，印象派钻研艺术家自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感受力和理解力。这是他们给予现代艺术以极大促进的关键。

人们往往认为，现代派艺术，尤其是印象派，反对摄影的逼真影像。[照片] 事实上，最具选择性和短暂性的，莫过于光线在几分之一秒内进入有特定曝光时间和角度的照相机镜头所定格下来的影像。印象派画家对摄影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在画预备性素描时常常使用摄影方法。例如，塞尚在绘制风景和自画像

时都使用过快照相片。[2] 照相机没有灵魂，尽管它像人的视觉一样是选择性的，而且对光线的明暗变化十分敏感。正是在涉及人类心灵的领域里，现代派艺术家赢得了一席之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用塞尚的话说，他们“比过去的大师更加出色”。

C.R. 麦金托什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1898 年）、彼得·贝伦斯在德国设计的车间厂房和在奥匈帝国的从卡尔斯巴德到切尔诺维茨的一系列火车站。J. 奥尔布里希在维也纳设计了被称为“新艺术”的分离派展览馆（1898 年），专门展出分离派艺术家的作品。展览馆上铭刻着“为时代而艺术，为艺术而自由”。

在音乐领域，德彪西和拉威尔探索了印象主义音乐。此后，勋伯格、欣德米特和威伯恩等先锋派音乐家抛弃了自中世纪以来盛行不衰的基本和声和旋律。[音程]

在文学方面，一种更为深刻的知识分子激进主义超越了藐视社会风俗和性道德观的颓废派。先是法国人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 年）和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 年），接着是来自布拉格的德国犹太人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 年），推翻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类借以认识现实世界的手段的公认看法。他们是文学上的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贡布雷]

1913 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和卡夫卡的第一部小说集问世。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巴黎首次公演时引发了一阵骚乱。因担心受到诽谤罪的指控，都柏林的一位出版商撕毁了乔伊斯的手稿；其他一些出版商却鼓足勇气出版了 D.H. 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和阿波里耐的《醇酒集》。马克斯·恩斯特的《风景》（城镇与动物）和考考斯卡的《自画像》显露出时代的第一缕曙光。像大多数欧洲社会一样，绝大多数欧洲艺术家的冒险事业依然因循可靠和传统的形式；在现代主义领域，摧毁传统文化的基础则成为时尚。

在整个十九世纪，**国际关系**始终相当稳定。维也纳会议的五大国依旧支配着欧洲；1815 年后，五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全面冲突。欧洲[867]实际爆发的战争在持续时间和交战规模上都是有限的。欧洲列强组织了一些国际警察行动，即一个大国插手镇压当地无法控制的革命。法国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不断干涉，俄国对波兰和匈牙利的干涉，即属此类行动。欧洲也时常爆发地区性冲突，尤其是在意大利、德国和巴尔干地区。形形色色的殖民地战争在海外屡屡爆发。从规模上说，所

[867]

贡布雷（COMBRAY）

欧洲到处是使人联想起过去时光的地方。但是，没有哪个地方能与沙特尔附近的村庄伊利耶尔相比。童年时的马赛尔·普鲁斯特曾多次在伊利耶尔度假，他在头脑中把伊利耶尔再现为“贡布雷”。

在所有的文学大师中，普鲁斯特是最伟大的锻造时间者，因而也是历史学家尤为感兴趣的一位作家。他相信过去永远不会消亡，借助于艺术可以再现深层下意识回忆中的过去。因此，诸如蛋糕屑掉到一杯茶里这样的平庸琐事，都会触发对永远不为人知的地方和事件的回忆。更确切地说，它不仅仅勾起对过去类似琐事的回忆，还引发了对与这些琐事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情感与体验世界的回忆。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从1903年到1922年的19年时间里，普鲁斯特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巴黎的一间熏蒸消毒、用软木衬里的房间里，试图使过去重现生机。他所回忆的绝大多数事情，以及青年时期的无数念头和忧虑，都发生在伊利耶尔：“莱奥妮姨母的房屋”、“有着鸟形路标的马路”、“汤松维尔的公园”以及“斯万家那边”：

> 根本就没有那种著名人物降生或死去的地方，也不存在人们前去向他表示敬意的地方。有的只是著名人物所喜爱的地方，他期待被赋予思想的地方，以及依然守望那一思想的地方……[1]

一般说来，小规模的私人陈列馆最完好地保存了过去的精神。人们至今可以到伦敦多蒂街的狄更斯故居去感受狄更斯；在特里尔的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尽劫难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故居，人们可以感受青年马克思的生活；人们还可以在维也纳伯格街19号弗洛伊德故居里，想象自己正躺在弗洛伊德的红色长沙发上。倘若要做一次追寻往昔时光的朝圣之旅，就只有去厄尔－卢瓦尔的一个普通小村庄，为纪念普鲁斯特，它已恰如其分地改名为“伊利耶尔－贡布雷”。

有的冲突与战争都无法与1815年前的拿破仑战争和开始于1914年的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的活力向内倾注于内[868]部改革，向外则在全球展开新的帝国主义征服。只有两个棘手的问题

会扰乱国际秩序。一个是法、德两国日益加剧的对抗。另一个是所谓的“东方问题”。

法德对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查理曼帝国的分裂；进入现代后，大革命时期的战争成为两国对抗的根源。法国人不会忘记，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德意志强国是1793年和1814—1815年的入侵者。在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看来，法国是1805—1813年期间的占领者，正是在反对法国占领的斗争中，现代普鲁士和奥地利才赢得并确保了生存权。1815年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战败的法国和分裂的德意志不愿再争吵。但往昔仇恨的火焰在平静的表面下升腾。到1840年，法国再度要求获得莱茵河边界，激起了德国的强烈抗议，爱国歌曲《守卫在莱茵河》以及《德意志之歌》反映了当时的情况。1848年，法国再次被视为德意志内部动荡的源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开始了“第二帝国”自信的冒险，普鲁士也巩固了自身在德意志的地位，两个强国都惊恐于对方咄咄逼人的姿态。俾斯麦策划了埃姆斯电报这一站得住脚的借口。事实表明，他一手策划了其结局将打破欧洲均势的整个事件。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俾斯麦发动的第三次闪电战争，它所引起的轰动甚至超过了比萨多瓦战役。法国人热切地要打这一仗，他们渴望教训普鲁士人。他们发现面对的是所有德意志邦国的联盟，而且其装备比法军更精良，组织更严密，也领导得更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法国自1643年罗克鲁瓦战役以来始终保持的陆军优势就土崩瓦解了。1870年8月1日，拿破仑皇帝之子高呼“打到柏林去”，礼节性地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之后，强大的德军蜂拥冲过德法边界，在梅斯包围了法军主力。以皇帝为首的另一支法军赶去解梅斯之围，径直落入了德军在色当附近精心设下的陷阱。败局已定之际，巴赞将军说出了一句不朽的话：“我们掉到了夜壶里，到明天我们就会被关在里面。”[69]一支受命避免正面进攻的德军全线包围了法国人，随即展开近距离猛攻，法军在抵御了克虏伯钢制大炮数小时的轰击后投降。皇帝本人成为阶下囚，后遭废黜，最终逃往英国避难。法国继续战斗了8个月，当巴黎被围、挨饿并在普鲁士大炮的轰击下崩溃时，第三共和国政府被迫请求达成屈辱的和平。1871年5月，法国屈服，同意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支付巨额赔款，接受德军占领两年。

普鲁士的辉煌胜利带来若干影响深远的后果。它促进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德意志诸侯齐集凡尔赛，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首位德意志帝国皇帝（1871—1888年在位）。它促使人们认识到，新德国的军事力量无人能敌。在法国，它引发了孤注一掷的巴黎公社[869]事变，刺激了法国人更为急切地要求复仇的反德情绪。

“东方问题”，如同其名称所表明的，起因于两个显然不可改变的相关因素：俄罗斯帝国的不断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持续退却。它导致巴尔干各民族的独立，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还激起了最终引爆1914年致命危机的一系列纠纷。在整个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前景日甚一日地变得清晰可见。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正中下怀。自从第三罗马帝国的神话出笼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重建基督教势力已经成为沙皇政策的终极目标。一旦拥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就实现了不受限制地进出不冻海的梦想。1871年，陀思妥也夫斯基得意洋洋地展望说：“君士坦丁堡将属于我们!”对于其他列强而言，“欧洲病夫”的衰败酿成了许多危险。英国担心通向印度的交通线。奥地利因东南边界出现一批有俄国撑腰的国家而如痈在背。德国感受到威胁则是因为俄国是惟一其军事力量有朝一日会超过自己的陆军强国。

1683—1914年间，俄国的扩张贪得无厌，按保守的估计，俄国以平均每天55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70]这种扩张并不总是直接威胁到欧洲。在拿破仑时代的扩张后，俄国的主要攻击矛头指向俄国人常常称为“中南部”的高加索和中亚、中国以及日本。不过，欧洲也未能免于俄国熊不断试探列强容忍限度的骚扰。俄国插手希腊独立战争就敲响了警钟，《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把俄国的所得局限于多瑙河三角洲一隅。1831年、1863年，俄国两度侵犯波兰名义上的独立，激起英国和法国的强烈抗议。柏林和维也纳却欢迎俄国的这一举动，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有各自控制的波兰领土。正因为如此，列强这两次均未采取任何行动。1853年，俄国挺进到多瑙河各公国，导致奥地利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和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见下文）。之后，圣彼得堡认识到在欧洲的直接吞并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帝国易受到海上力量强大的敌人的攻击。俄国决定撤出北美，1867年，把阿拉斯加以微不足道的800万美元卖给美国。在圣彼得堡看来，从其他地方可以更轻松地获得不动产。1859年，历经半个世纪的暴行和蹂躏，俄国完成了对高加索山地部落的征服，高加索的车臣英雄沙米尔被俘。1860年，俄国从中国攫取了阿穆尔河和沿海地区，1864年从波斯获得了突厥斯坦，1875年从日本夺得萨哈林岛（库页岛）。所有这些土地后来都被失去者谴责为“不平等条约”的结果。1900年，[870]俄国占领满洲，导致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冲突和失败。1907年，英俄划分了波斯的势力范围，结束了英国几十年来对中亚的担忧，却引起英国对俄国觊觎波斯湾的疑虑。

一旦英国和法国决定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保卫多瑙河各公国，抵制俄国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臣民的要求，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年）随即爆发。奥地利立即占领了多瑙河公国，西方列强在撒丁王国的援助下派遣惩罚性的远征军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尽管经受了痛苦的堑壕战、霍乱和可怕的损失，英法联军最终还是成功地包围了塞瓦斯托波尔。《巴黎和约》（1856年）规定，黑海中立，一个共同的欧洲保护领强加给奥斯曼帝国，并保证奥斯曼帝国和多瑙河公国的领土完整。[**阿布哈兹人**]

即便如此，俄国人在二十年内又重返巴尔干。这一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等三个奥斯曼帝国省份同时发生起义，为俄国人提供了插手的好机会。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武装干涉，奥地利的外交调停以及136名土耳其军官在保加利亚被杀，激起了奥斯曼帝国凶残的报复。1876年5月，在臭名昭著的“保加利亚恐怖”中，有超过20000名农民遭到屠杀。在伦敦，格拉斯敦怒斥道：“土耳其人只有一种方式方能洗刷对他们的痛骂，那就是洗刷他们自己。”在君士坦丁堡，接连有两位苏丹被推翻。在圣彼得堡，沙皇觉得有义务保护巴尔干基督徒。先后召开的两次国际会议对新苏丹、“可恶者”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施加了各种限制，他答应推行议会体制，反倒令列强困惑不已。1877年4月，俄军侵入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地区和亚美尼亚。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山口顽强抵抗，俄军在很长时间里毫无进展；1878年1月，哥萨克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俄、土两国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1878年），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接受沙皇苛刻的条件，包括建立一个面积大得惊人的独立的“大保加利亚”。（见原书附录Ⅲ，第1245页）

1878年6月3日到7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目的是为了满足英国和奥地利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限制俄国野心的要求。这是一次盛大的外交盛会，也是所有欧洲列强最后一次聚首平等地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俾斯麦自命为“诚实的中间人”，担任会议主席，这标志着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声望日隆。这次会议也绷紧了战争之弦，伦敦的音乐厅中充耳可闻这样的歌声：

> 我们不想打仗，但老天作证，如果我们参战，
> 我们有得是军舰，我们有得是人，我们有得是钱。
> 我们以前就和这头熊交过手，只要不列颠人一息尚存，
> 俄国佬就不会拥有君士坦丁堡！[71]

柏林会议在很多方面暴露出欧洲列强权力游戏最无所顾忌的方面。巴尔干人民没有任何有效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列强不假思索地[871]决定了一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奥地利占领；保加利亚被分成

两个部分，爱琴海出海口也被剥夺；列强屈尊俯就地确认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的独立，却拒绝了三国最看重的领土要求。相反，列强自己却恣意妄为：俄国控制两海峡的企图落空，就从盟国罗马尼亚手中夺走比萨拉比亚；英国从附庸国奥斯曼帝国获得塞浦路斯；奥地利获得新帕扎尔州；狄斯雷利带着所谓“体面的和平”离开柏林。毫不奇怪，巴尔干各民族很快就自行谋求往往是暴力的解决方案。列强放弃一致原则，以双边条约和联盟的方式来寻求安全。各国开始放手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

陆军实力依然是主宰欧洲大陆政治的关键。不难发现，只要这一点不改变，德国与俄国就将在所有的全面冲突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五大欧洲列强中，三个存在重大的军事缺陷。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但没有征兵制的陆军。法国人口出生率灾难性地下降，严重威胁到应征士兵的兵源。奥匈帝国军队在技术和心理上都依赖德国。

在3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外交和军事集团。一开始，英国与法国因争夺殖民地而疏远，英国与俄国在中亚问题上互相猜忌，俄国与法国因沙皇制与共和制之间的敌视而疏远。这么一来，俾斯麦就能够随意地构建保护德国免受法国复仇的体系。1879年，俾斯麦与奥地利缔结两国同盟。1881—1887年间，德、奥、俄三国结成“三皇同盟”。从1882年起，德、奥、意结成“三国同盟”。1884—1887年以及1887—1890年间，德国与俄国签署两份《再保险条约》。然而，欧洲两股最强烈的政治情绪，法国对德国的仇恨和俄国对两海峡的渴望，必将导致不言而喻的结局。法国势必设法挣脱俾斯麦精心编织的罗网，俄国也必定因觊觎巴尔干的野心受挫而不满。因此，在俾斯麦解职后的年代里，俄国与德国的关系开始疏远；沙皇开始寻求新的伙伴。到1893年，法国银行已大量投资俄国企业，巴黎与圣彼得堡签订了《法俄同盟条约》。法国借此一举摆脱孤立，重获自信，并从东西两线威慑德国。1904年，法国解决了与英国的争端，双方达成“友善的谅解”。1907年，英、俄两国就波斯问题达成协议，通向法、英、俄三国协约的道路终于敞开了。

当时，瞬息万变的欧洲外交似乎即将形成一个暂时性的新格局。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的性质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列强彼此之间也都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枝节问题。例如，英、德两国之间尽管有分歧，彼此依然希望达成和解。事实上，当时的局面是西方和东方列强联手对抗中欧列强，在二十世纪其余的时间里，列强操纵的这一战略格局始终给国际关系造成压力。在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欧洲分裂成两个[872]大规模的军事阵营，这一回再不会有什么“诚实的中间人”了。（见原书附录Ⅲ，第1312页）

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始终步履蹒跚，虽然军队组织和后勤已有重大改进。铁路使现有的运输、动员和后勤供应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总参谋部的职能按照普鲁士模式重新设计，以处理庞大应征军队带来的繁杂事务。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各国军队除已装备枪管刻有来复线的击发滑膛枪外，与奥斯特里茨战役时没有多大的区别。人们逐步认识到枪管凿制来复线的效用，它先是应用于1866年普鲁士的德莱泽撞针枪，接着是性能卓越的法国“夏塞波”后膛步枪和1870年的克虏伯后膛炮。海军方面，蒸汽动力和装甲舰开始普及。不过，直到高爆炸药、机关枪和远程火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明出来，现代机器和现代化学才在武器装备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诺贝尔]

[873]

诺贝尔（NOBEL）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对物理学、化学、文学、医学以及最重要的和平事业成就的最有声望的奖励，必须由武器利润来提供资金。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年）是个在圣彼得堡长大的瑞典人，他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鱼雷工厂。在接受了化学家的训练后，他回到瑞典致力于改进炸药。他首先制造出硝化甘油，又先后发明了无烟硝化甘油火药前身的黄色炸药（1867年）、葛里炸药（1876年）和混合无烟火药（1889年）。他的家族企业因炸药制造和巴库油田开发而变得极为富有。终其一生诺贝尔始终抱有和平主义观点，他在遗嘱中写明，用遗产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五个奖项。在诺贝尔和平奖设立的头九十年里，或许是因为欧洲迫切需要和平缔造者，和平奖得主绝大多数是欧洲人。

1901年　J.H. 迪南、弗雷德里克·帕西
1902年　埃利·杜科蒙、查理－阿尔伯特·戈巴特
1903年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
1905年　贝尔萨·冯·苏特纳
1907年　厄内斯托·莫内塔
1908年　K.P. 阿诺尔德松、弗雷德里克·巴耶
1909年　奥古斯特·贝那尔特、P. 德·埃斯图内勒男爵
1911年　托拜斯·阿塞尔、A.H. 弗里德
1913年　亨利·L. 拉封丹
—
1920年　L.V. 蒲日耆

1921年 卡尔·布兰廷、克里斯蒂安·朗格
1922年 F.南森
1925年 J.奥斯汀·张伯伦
1926年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
1927年 F.E.比松、路德维希·克菲德
1930年 纳森·塞德布洛姆大主教
1933年 卡尔·冯·奥西埃茨基*
1937年 埃德加·塞西尔爵士
—
1946年 埃米莉·巴尔奇、J.R.穆德
1949年 博伊德－奥尔勋爵
1951年 列昂·茹奥
1952年 阿尔伯特·施韦泽
1958年 多米尼克·培尔
1959年 菲利浦·诺埃尔－贝克
1961年 达格·哈马舍尔德
1962年 林努斯·卡尔·鲍林（美国）
1968年 热内·萨米埃尔·卡辛
1971年 维利·勃兰特
1974年 西恩·麦克布莱德
1976年 麦瑞德·科里根、伊丽莎白·威廉斯
1979年 特里萨修女
1982年 埃娃·麦尔达尔
1983年 莱赫·瓦文萨
1986年 埃莉·韦塞尔（译者注：韦塞尔也是位美国人）
1990年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所有的获奖者中，只有两位因为拥护和平而遭难。他们全都是德国人，路德维希·克菲德（1858—1941年）因为反对德国重新武装而遭到监禁；卡尔·冯·奥西埃茨基（1889—1939年）是德国和平运动的领袖，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自1871年后，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不能由此认为军事理论家没有考虑新式武器带来的冲击。波兰铁路巨头杨·布洛赫在

* 1933年和平奖颁给了英国人诺曼·安吉尔，奥西埃茨基是1935年和平奖获得者。——译者注

《未来的战争》（1898 年）一书中提出，打一场防御性战争的建议将不再可行。大多数将军的反应是部队多多益善。[72]一旦军队人数成倍增加，战场局势可能陷入僵局，人们逐渐认识到，动员程序是胜利的关键。总动员被视为比单纯的宣战更具威胁性。但是，欧洲没有出现什么风云紧急的征兆。在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欧洲军队更多是面对手持长矛的部落民，而不是彼此对峙。

不过，人们日益认识到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伸向因全球交通线而相互往来频繁的全世界。不难想见，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开始以全球视野来思考问题。在开拓性的《历史上的地理枢纽》讲座（1904 年）中，牛津大学首位地理学教授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 年）指出，世界上已没有可供帝国拓展的处女地了。因此，对现有资源的争夺势必将进一步加剧。人口分布和大陆构造都将制约这一竞争的进程。麦金德绘制了一幅名为“强国的固有席位”的耸人听闻的地图，把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俄国划定为世界最佳的天然堡垒。这个“心脏地带”的周围，是“核心新月形”半大陆强国，如英国、中国等；再往外是海洋型的“外层新月形”，它把美国与非洲、澳大利亚和日本连为一体。他起初的意图是警告西方列强警惕俄国与德国可能的联合。后来，他鼓吹建立一个由强大的新兴国家组成的隔离带，以隔离俄、德两国，他发明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 控制了东欧，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 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岛；
> 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全世界。[73]

麦金德的思想注定会受到德国人的认真对待，在日后重视空中力[874]量的时代，他的思想在美国也大行其道。

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欧洲依然维持了长久以来的和平局势。人们已经开始担忧脆弱的和平前景。法德对抗、反复出现的巴尔干危机、外交集团的对峙、帝国主义的摩擦以及海军军备竞赛，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程度。1908 年在波斯尼亚已经拉响了一次警报，1911 年警报再次在阿加迪尔响起。所有列强都表现出延续和平的愿望，也都在加紧战争准备。**[奥伊伦堡事件]**

波斯尼亚危机表明了欧洲最有可能引发冲突的地点。1908 年，奥匈帝国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就吞并了波斯尼亚，在此前的三十年里，奥匈帝国一直以国际托管的方式占领和管理着这个国家。波斯尼亚危机爆发后，德皇威廉宣布他将“像身披闪光铠甲的骑士”一

[876]

奥伊伦堡事件（EULENBERG）

1907年10月23日，柏林一家法院开庭审理莫尔特克诉哈登一案。这是被统称为“奥伊伦堡事件”的六宗广为关注的审判中的第一宗案例。它暴露出德国皇帝亲近随从中普遍的同性恋关系。

像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男性鸡奸也是非法的。刑法典第175条规定对男子间“不自然的性行为”处以一至五年的监禁。库诺·冯·莫尔特克将军控告《未来》杂志编辑马克西米安·哈登在发表的材料中以“恋人”和“竖琴师”的名字嘲弄了两位高层朝臣。莫尔特克声称，他和他的朋友冯·奥伊伦堡亲王受到了哈登的诽谤。公开法庭上公布出许多耸人听闻的细节，尤其是奥伊伦堡的前妻和一个名叫勃哈德的士兵所做的证词。关键性的证词来自一位职业性科学家马格纳斯·赫希费尔德博士。他解释说，尽管鸡奸行为是非法的，潜在的同性恋本身并不违法。法庭采纳了哈登的答辩，认定原告显然是同性恋，但并不意味着触犯了刑法第175条的规定。[1]

这一判决的政治意义十分重大。莫尔特克是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奥伊伦堡曾一度担任驻维也纳大使，与皇帝关系至为密切，而且公开热衷于谋求首相之职。哈登和赫希费尔德两人都持自由主义观点，反对皇帝的外交政策。两人均力争废止刑法第175条，他们也都是犹太人。帝国的权势集团面临叛国罪名的攻击。

后来又发生了一连串丑闻，首相冯·布劳控告另一位自由主义编辑阿道夫·布兰德；皇帝的首席军事秘书冯·霍伊森－海瑟勒伯爵在一次男扮女装的节目当中，穿着芭蕾舞短裙在皇帝本人眼前倒地而亡；莫尔特克－哈登一案则两次重审。波茨坦要塞被法庭关于鸡奸的一系列禁令以及一连串相关的自杀事件所震撼。（胸甲骑兵紧绷绷的白色马裤和长及大腿的马靴，使他们在法庭上显得特别令人生气。）哈登打官司的费用由帝国大臣秘密地偿还了。奥伊伦堡则倾家荡产。他虽然一辈子放荡不羁，却申明自己是无辜的。最终，他还是因作伪证而被判刑，只是因为不断装病和一直持续到1918年的缓刑，他才免于被捕入狱。

德国并不是惟一发生具有政治意义的性丑闻的国家。与奥伊伦堡事件同时，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和以叛国罪被处死的罗杰·凯斯门特爵士的悲剧震惊了全英国。[2] 然而，德国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国家战败而蒙受屈辱时，早先性丑闻的伤疤更难抹去。

[877]

以一位同性恋犹太人、财政大臣沃尔特·拉特瑙于1922年遭暗杀开始的一连串相关事件，进一步使人们心目中形成“同性恋—叛国—犹太人”恶性循环的观念。皇帝本人在回忆录中把大战的彻底失败归咎于“国际犹太人”阴谋，哈登的指控则是这个阴谋最早的迹象。历史学家把1907—1909年的事件归咎于皇帝对军队将领日甚一日的依赖，以及他们先发制人的进攻政策。[3]

尽管纳粹宣传部门就是靠渲染这类事情起家的，纳粹党却极为敌视同性恋者。早在1933年5月，一伙纳粹暴徒就捣毁了赫希费尔德博士的性学研究所。1936年奥运会前夕，盖世太保在一系列突击行动中杀掉了柏林大部分同性恋人口。集中营里大量的“桃色三角关系”应当置于纳粹罪行清单的前列。刑法第175条最终于1969年被废止。

样与奥地利并肩战斗，列强认为无法插手干涉。奥地利采取的策略，使贝尔格莱德建立大塞尔维亚的希望落了空，并警告了试图进一步调停的俄国。波斯尼亚危机还成为激起“青年土耳其”党人起义的一个因素，他们在1908—1909年间推翻了奥斯曼政府，推行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纲领。最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危机使巴尔干各国相信，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只能在内部以武力方式解决。

1912年到1913年，巴尔干爆发了三场地区性战争。1912年5月，意大利进攻奥斯曼帝国，夺取了罗得岛、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1912年10月，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注意力转到阿尔巴尼亚的起义，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组成的“巴尔干联盟”乘势进攻马其顿的奥斯曼土耳其人。1913年6月，保加利亚进攻塞尔维亚，拉开了巴尔干瓜分战争的序幕。在每一次危机关头，都举行了国际会议，也都签订了条约。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获得独立，马其顿却未能独立。奥地利的赌博得到了回报。德国极大加强了对土耳其的影响力。俄国的野心仍未满足。东方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见原书附录Ⅲ，第1309页）**[马其顿]** **[阿尔巴尼亚]**

动荡日益加剧，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冲突。在没有政府出面领导的情况下，民间率先组建了“国际法协会”(1873年)、“国际议会联盟”（1887年）和诺贝尔委员会等组织。经过自1843年开始的漫长酝酿和筹备，第一届国际和平大会在伦敦召开。1891年起，国际和平委员会在瑞士伯尔尼正式开展工作，负责协调各国分支机构的行动，组织各种会议。各国人士公开发表和平言论，其中著名的有瑞士法学家J.A.布伦奇利（1808—1881年)、德国

人伯塔·冯·祖特内尔（1843—1914 年）、奥地利人 A.H. 弗莱德（1864—1921 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以及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1873—1967 年）。安吉尔在《大幻想》（1910 年）一书中指出，国家的经济利益将使战争变得多余。[诺贝尔]

[875] 不过，最成功的和平呼吁来自俄国沙皇。在他的干预下，1899 和 1907 年两次在海牙召开大规模的和平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国际争端的仲裁以及地面战争的规则。海牙会议取得了实际成果。1900 年，国际法庭成立，1907 年，通过了《海牙公约》。一个海事会议也于 1908—1909 年在伦敦召开。

和平主义既未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也未获得主要国家政治家的支持。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思想根深蒂固。正如冯·毛奇元帅在给布伦奇利的书面答复中所说：

> 永久和平只是一个梦想，甚至还不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战争部分体现出神的旨意。没有战争，世界就会停滞不前，就会沉湎于实利主义。在战争状态中，展现出人类最高贵的美德：勇气和无私，忠于职守，自愿牺牲自我以及甘冒生命危险。[74]

英国和法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绪。1914 年 7 月 31 日，饶勒斯遭暗杀，刺客的理由是和平主义即意味着叛国。

与此同时，各国将军们开始认识到，未来战争将造成闻所未闻的巨大破坏，列强一旦投入战争就将面临由此而来的风险。1890 年 5 月，耄耋之年的毛奇最后一次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就此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 如果战争爆发，没有人能够预见会持续多长时间，也没有人知道如何结束……先生们，它将是一场“七年战争”；它将是一场“三十年战争”，将给……首先把火柴扔进火药桶的人带来灾难。[75]

因此，究竟是秉持普遍的军国主义精神，还是进行更加审慎的协商，欧洲各国的陆军参谋部左右为难。于是他们在所有路线中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途径。他们加速各自的战争准备，储备庞大的军火，大规模训练征兵制部队，同时十年如一日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各种对抗、恐惧和憎恨不断升温，直到最后达到爆发的临界点。

饶勒斯谋杀案前一个月发生的一桩刺杀事件，最终点燃了总爆发的导火索。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奥地利伊斯特大公弗朗茨·斐迪南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斐迪南贵贱结

亲的捷克妻子、霍亨堡女公爵索菲亚随同出访。他无视任何警告，有意把访问时间定在塞尔维亚民族节日“圣维特斯节”，即科索沃战役百年纪念日（见第9章）。在塞尔维亚人看来，这无疑是蓄意的侮辱。结果，反哈布斯堡统治的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黑手党”派出的一群年轻的刺客，藏身于萨拉热窝街道两旁列队的人群中。

当天早上，大公乘坐一辆1910年出厂的28马力的格雷夫与斯蒂夫特牌汽车，走了一条刺客未曾预料的线路；访问者平安抵达市政厅午餐，索菲亚在那里接见了一个穆斯林妇女代表团。刺客投出了一枚炸弹，但未造成任何伤亡，有一名男子被捕。然而，午餐后，大公的司机开错了方向。司机倒车改变行驶方向时，敞篷车上的乘客正对着[877]另一名密谋者、患有肺病的19岁学生乔瓦利·普林西普藏身的位置。普林西普用左轮手枪近距离直接瞄准开枪，皇室夫妇受了致命伤。弗朗茨·斐迪南咕哝不清地说：“索菲亚，亲爱的，不要死！为了我们的孩子活下去！”但索菲亚已经死了。她的丈夫也在一小时后死去。遇刺的当晚，他们被葬在位于多瑙河阿尔斯德滕住宅的教堂墓地里。他们的汽车以及血迹斑斑的衣服收藏在维也纳军事博物馆。[76] [科诺普什蒂]

[878]

科诺普什蒂（KONOPIIITE）

科诺普什蒂（以前叫科诺皮什）城堡位于中波希米亚松林的深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喜爱的打猎行宫，配备有华丽的皮革和桃花心木家具。城堡里收藏有数量庞大的打猎战利品。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极好的藏骸所，塞满从象牙到驯鹿角的各色物品。后来，城堡的主人请求纳粹党卫军把它当做休息室，他们决定把它漆成黑色。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因为四件事情被人们记住。首先，他娶了捷克的索菲亚·冯·查特克女伯爵，由于这桩婚姻属于贵贱结亲，他被迫放弃了子女的继承权。其次，在索菲亚的支持下，他成了“奥地利以宗教之名掩盖的狭隘（天主教）偏执的坚定维护者。”[1]其三，他想把奥地利由二元君主国转变为平等国家的联邦。第四，由于在1914年夏天无视避开波斯尼亚的建议，他的遇刺成为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弗朗茨·斐迪南被刺是哈布斯堡家族一系列死亡事件中的第三宗。二十五年前，堂兄鲁道夫之死使斐迪南成为帝国继承人。鲁

道夫一直困扰于两种互相抵触的影响，一方面是极为传统的父亲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另一方面则是固执而任性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鲁道夫是一个积极的反教权主义者，他曾在笔记簿中写道："我们是更高等的生灵还是动物？我们是动物……"[2]1889年，鲁道夫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另一个狩猎行宫奥地利的梅尔林开枪打死做了他17天情人的玛丽亚·维扎拉，然后自杀身亡。1898年，伊丽莎白皇后在日内瓦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刺伤后不治身亡。

很少有人谈及弗朗茨·斐迪南对打猎的酷爱。然而，他却以一种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社会需求的热忱走遍全世界搜索猎物。他老早就是一个打机关枪的老手，能把森林里进入射程内的所有动物都撂倒。他在波兰的两次行猎就足以使欧洲野牛濒临灭绝的边缘。他下令把猎获物的遗骸妥善加以保存。在科诺普什蒂，玻璃器皿中有成千只制成标本的动物，墙上挂满兽头，各个陈列室里摆满经过皇帝牙医小心翼翼修补的兽牙。

1914年6月23日，大公和妻子离开科诺普什蒂前往萨拉热窝。据说，当他被刺身亡后，皇帝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对侍从武官咕哝道："上帝不容挑战。一个更高的权力恢复了我已无法继续维持的秩序。"[3]通常认为，这一墓志铭是针对大公贵贱结亲的婚姻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被蓄意屠杀的无助生灵。

在短短四周时间里，萨拉热窝的枪声就使欧洲的外交和军事克制土崩瓦解。各国大臣官邸发出一份又一份最后通牒、动员令和宣战书。维也纳想对塞尔维亚动手，并从柏林获得自由行动权。7月23日，奥地利向贝尔格莱德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参与对暗杀者的搜捕行动。塞尔维亚政府一方面搪塞奥地利，同时下令部分动员。25日，俄国帝国会议决定支持塞尔维亚，但未就此举与英国和法国协商。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紧接着宣布动员，这导致德国先后对俄、法两国发出最后通牒。按照施里芬将军的战争计划，德国必须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此刻，木已成舟，局势已无可挽回。两份最后通牒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德皇听从将军们的建议，帝国的安全已不容任何拖延，必须立即加以保障。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之后，德军越过德比边境开往法[879]国，英国政府向柏林发出最后通牒。五个欧洲强国终于投入到一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99年的全面战争。

1914年8月3日，星期一，伦敦，白厅，外交部 在这个和平的夜晚，英国外交大臣正在书房里朝窗外观望。爱德华·格雷爵士负责这个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对外政策。此时，奥地利正在与塞尔维亚交战。两天前，德国对宣布动员的俄国和法国宣战；德国军队已经占领卢森堡，并做好进攻比利时的准备；俄军则已经攻入东普鲁士。英国仍未宣战。爱德华爵士在下院作了一个长篇演说，刚刚协助首相亨利·阿斯奎斯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准备一旦比利时遭到入侵，就立即发往柏林。当时一定是晚上八点或九点，因为他记得点灯人点燃了楼下院子里的煤气灯。他和一位朋友在一起，这位朋友后来回忆了他所说的话："全欧洲的灯火都将熄灭。我怀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否还能看到它们再度点亮。"这一幕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场景之一，数不胜数的教科书里都有描述。几乎所有的名言集也都收录了格雷的这些话。[77]

不幸的是，爱德华爵士本人在回忆录里根本没有确认这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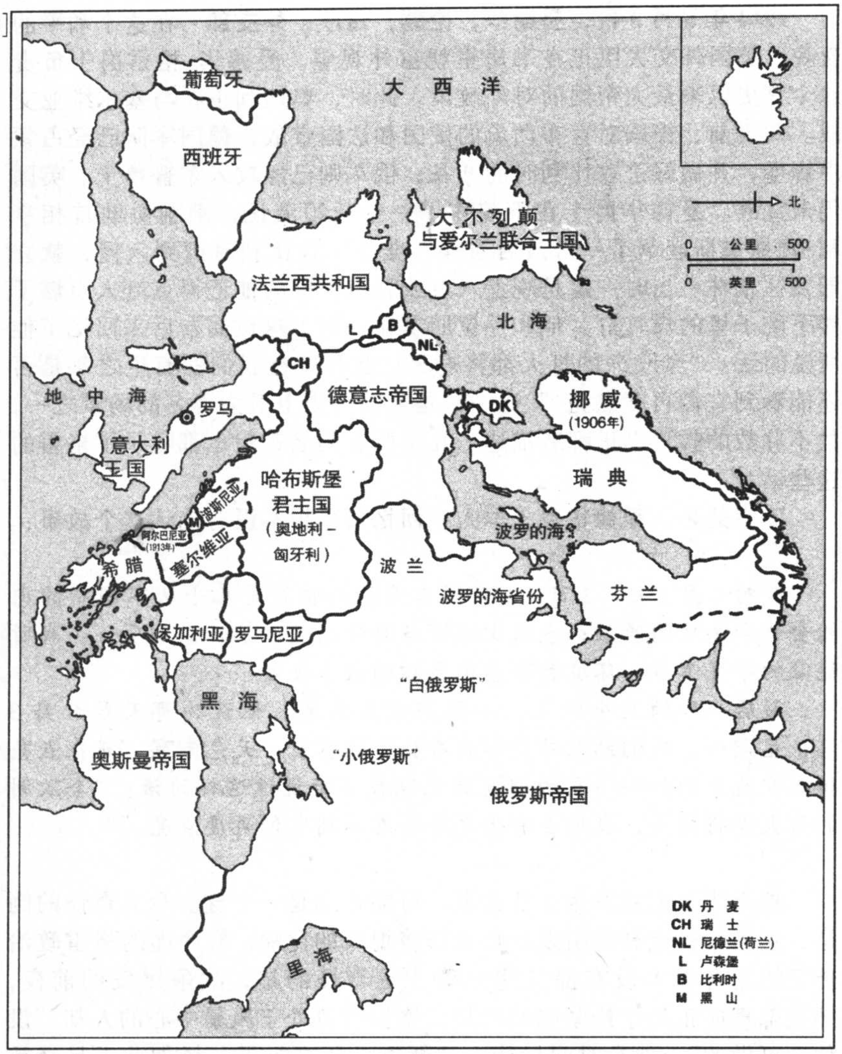
我对8月1日、2日、3日那三天的回忆，是几乎从不间断的内阁会议和高度的紧张；我很少记得当时讨论通过了什么事项……我所能做的事并不多；环境和事态迫使我们做出决定……

最后一周的某个晚上，一位朋友来看我，他认为那天是8月3日，星期一。我们站在外交部我办公室的窗前。天色渐黑，正在点亮楼下空地上的灯……我的朋友回忆说我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全欧洲的灯火即将熄灭，我们在有生之年将看不到它们再度点亮。"[78]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令人奇怪的倒是，见到灯被点亮却引发出灯火即将熄灭的比喻。最严谨的格雷政治传记的作者根本没有提及这一幕。[79]更奇怪的是，战争爆发的前夜，外交部理应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格雷这位处于风暴中心的人却"没什么可做的"。他有时间接待一位朋友，还进行了一场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他都记不清具体细节的谈话。

同一个晚上，柏林面对的现实是，外交官们刚刚使德国投入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没有忠实的同盟国。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把战争的爆发归咎于俄国，他宣称："俄国把一支火把扔进了我们的房子。"在圣彼得堡，自两天前收到德国的宣战书后，沙皇和将军们以不可阻挡之势着手行动。在巴黎，法国人正因贝特曼莫须有地指责一架法国飞机轰炸纽伦堡而陷入一片混乱。在维也纳，奥地利在过去的一周内一直在进攻塞尔维亚，

[880]



地图 23 欧洲，1914 年

[881]皇帝和大臣并不急于投入另一场针对俄国的战争。在罗马，三国同盟的第三个伙伴不露声色地等待时机。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才能真正听到枪炮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引发了没完没了的争论，二十世纪初的外交体制常常被认为是战争爆发的一个首要原因。人们往往断定，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的对峙，必定会使天平偏向战争一边。庞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导致了一种所谓的“地缘政治共识”，即对峙双方都

认为必须援助盟友，不采取行动将导致可怕的后果。据说是这种共识束缚了外交家的手脚，他们不可避免地沿着致命的道路走下去，最终使一场小规模的巴尔干冲突发展成全球战争。这种论调值得商榷。中欧列强当然受到“三国同盟”的约束。如果奥地利受到攻击，德国确实有义务援助盟国。问题是奥地利并未遭到进攻，维也纳根本不能求助于现有的条约规定。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不能看做是针对奥地利的战争行动，尤其是贝尔格莱德对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做出了和解性的回应。进一步说，德国痛苦地意识到，另一个盟友意大利除非是受到绝大的压力被迫参战，否则根本不会为保卫奥地利而投入战争。因此，奥地利决意惩罚塞尔维亚并请求德国的同意，不能视为是出于三国同盟的条约义务要求。

就三国协约来说，条约义务的约束更为松散。“协约”并非“盟约”。一旦遭受攻击，俄国和法国确实负有相互援助的条约义务；俄法两国痛楚地意识到，“协约”的第三个成员英国并不负有为保卫它们而参加战争的正式条约义务。更有甚者，由于协约国列强均未与贝尔格莱德正式结盟，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就构不成“宣战理由”。尤为重要的是，俄国与塞尔维亚并未签订有效的双边条约。[80]根据1839年的条约，英国承诺维护比利时的独立。这一年代久远的义务在三国协约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可见，1914年的外交体制给各国政府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虽然这种回旋余地只是名义上的。德国无须无条件地援助奥地利，俄国也不必无条件地援助塞尔维亚，英国更不必无条件地去援助俄国和法国。几乎所有的关键决策都不是出于条约义务，而是以“荣誉”、“友谊”、“恐惧”或“权宜之计”为理由做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少关注外交体制，多注意外交家的言行。

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年），即后来的法尔敦伯爵格雷，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他相貌英俊，温文尔雅，满怀为国献身的抱负，战争爆发之际，他行将退休。肖伯纳曾恶作剧地称格雷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容克”。格雷出自诺森伯兰一个郡中的世家，祖上的一位军人在1759年明登战场上的英勇事迹使该家族首次出名。后来，辉格党人、伟大的《1832年改革法案》的倡议者格雷伯爵二世使该家[882]族声名鹊起。为了纪念法尔敦伯爵二世查理·格雷，一种芬芳的印度茶即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使家族在英国更加广为人知。普法战争爆发时，爱德华爵士刚到记事之年。当时八岁的爱德华问父亲：英国支持哪一方？父亲告诉他：“德国人。”爱德华和两个兄弟进入温彻斯特公学寄读，后入牛津大学巴里奥尔学院，毕业后作为柏威克的自由党议员开始了无可挑剔的政治生涯，1892—1895年任外交部次官，1906—1916年任阿斯奎斯自由党内阁外交大臣。[81]

格雷的生活方式十分朴素。他挚爱妻子多萝西，他们对大自然有着共同的热爱，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每当不在一起的时候，他天天都要给妻子写信。格雷还为她改建法尔敦的地产，建立了占地面积很大的野禽禁猎区。他嗜好垂钓，喜好到野外观察和研究野鸟，他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诗歌学者。在伦敦工作期间，格雷雷打不动的行程之一，是每周六早上从滑铁卢车站乘6点钟的火车前往汉普郡伊特岑-阿巴斯的小屋，在那里度过一个垂钓周末。"他宁可用假蝇钓一条3磅的鲑鱼，也不愿在下院发表广受好评的演说。"[82]

格雷详细地记述下这些朴素的乐趣。他出版过用假蝇钓鱼以及记录法尔敦野禽的书籍，还出版了论述华兹华斯的长诗《序曲》的著作：

> 在宁静而愉悦的心境中
> 我们的身躯熟睡了，
> 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 凭借和谐的力量、快乐的奇异力量
> 带来宁静的眼睛
> 我们看到生命万物。

他一度在美国担任客座讲师，以"再现"作为授课主题。他记述了以外交大臣身份款待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汉普郡乡间一日游的经过。来访者是一位热心的鸟类学家，对鸟鸣声颇有鉴别能力。罗斯福毫不迟疑地辨认出一种金色羽毛的鹪鹩——这是惟一的一种英国和美国共有的鹪鹩科鸟类——的叫声，这给格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罗斯福当时说："没有留下历史记载的民族必定熟悉我们今天听到的鸟鸣声。"[83]

格雷并不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或周游世界的外交家。格雷不像他的两个兄弟——他们一个在非洲死于狮吻，另一个死于野牛蹄下，他对英帝国没有多少了解。他能阅读法文，却不能说任何外语，除了偶尔去欧洲大陆度假，他对外国知之甚少。他深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光辉孤立"精神的影响，当时他刚刚步入外交界。他认为英国没有理由过分卷入欧洲事务。他的格言是"不做承诺"和"我们必须自行[883]其是"。1914年时，52岁的格雷的个人生活一团糟。他的妻子在八年前的一次马车事故中身亡。他独自陶醉在大自然里，视力也日益下降。他患有白内障，视网膜也逐渐受到损害，因而读起文件来很吃力。倘若不是因为工作压力，他本来要在1914年夏天去咨询一名德国眼科医生。

格雷对德国并无敌意。实际上，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敌意。德国的野心使他忧心忡忡。与人们谈论的殖民竞争和德国对“有利境遇”的渴望相反，格雷判断德皇的野心是针对其他地方。他在战争结束后写道：“德国人真正想要的，是一块受德国保护的……白种人可以居住的气候温和而富饶的土地。我们没有这样的地方。”[84]他不赞许德国人的野心，另一方面，德国对东欧的觊觎并未对大英帝国构成威胁。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里，绝大多数新闻都未涉及欧洲的危机。在大公遭到枪击的当天下午，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的赛马萨丹纳帕路斯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巴黎大奖赛冠军。英国 1914 年 7 月的日程表上依旧排满惯常的夏季通告：

7 月 2 日，约瑟夫·张伯伦逝世。

7 月 3 日，柯罗的《丰满的裸女》在克里斯蒂拍卖行以 6600 几尼成交。

7 月 4 日，哈佛赢得亨利赛艇会的大挑战杯。

7 月 7 日，维克多·雨果的塑像在根西岛的坎迪德公园落成剪彩。

7 月 9 日，英国国教会允许妇女进入堂区管理委员会。

7 月 11 日，伦敦—巴黎—伦敦航空赛冠军成绩为 7 小时 13 分 6 秒。

7 月 12 日，瑞士迪文德斯：圣西吉伯特诞生 1300 年纪念仪式。

7 月 16 日，格雷夫森堂区教堂：美国大使为纪念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的彩色玻璃剪彩。

乔治·卡庞蒂埃（法国）在世界白人重量级拳击赛中击败“炮舰”史密斯（美国）。

7 月 24 日，爱尔兰自治大会失败。

7 月 26 日，在爱尔兰人枪击事件后，苏格兰边地团在豪斯向人群开火。

7 月 31 日，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在巴黎被谋杀。

8 月 1 日，厄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的探险队驶向南极。[85]

在伦敦，7 月 31 日，伦敦证券交易所关闭，银行利率也调高到 8%，这是遇到真正麻烦的第一个信号。8 月 2 日，星期日，英国所有教堂和礼拜堂举行“为国家祈祷”仪式。8 月 3 日，考斯赛船周不祥地取消了。

格雷在 1914 年危机期间的表现可谓毁誉参半。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对格雷赞赏有加：

> （格雷）面临极其艰难的两场斗争：1）防止战争，2）一旦战争降临，不抛弃法国。我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施展沉着的技艺。他必须使德国人认识到，必须认真考虑我们的态度，同时又不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我们受他们的控制。[86]

[884] 英国主要的自由主义报纸《曼彻斯特卫报》完全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由于期望政府保持中立，所以当英国宣战时，这家报纸感到震惊，便公开宣称："多年来，格雷始终在隐瞒整个事件的真相。"[87]

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也持尖锐的批评意见。1914年初，他认为英德关系"比过去数年来更为友好"，进而主张削减军备开支。他在后来写道："在我们的政治家当中，格雷是最与世隔绝的，对他说来诺森伯兰就足够了。"他指出了格雷所犯的重大错误："假如（格雷）在英国即将宣战的那一刻及时警告德国……事态会完全不同。"[88]

在德国，格雷同样受到批评，只不过语言更为尖刻。许多人相信格雷"经验不足"，是个"诡计多端的伪君子"和"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他把德国拖垮了。就连那些理解格雷善意的德国人对他的评价也很苛刻。"（爱德华爵士）自以为正在稳妥地驾驶着他的船，却不知道是其他人的手在掌舵。"他是"一个有两套人类价值观的人……有双重的道德准则"。[89]

战争结束后，格雷丝毫没有提及集体战争罪行，更不用说反省外交家的错误了。相反，他详细叙述了一则关于日本的趣闻，一位日本外交家曾对他说："我们一直是艺术家的民族，如今……我们学会了杀戮，你们却说我们变得文明了。"[90]

爱德华爵士走向战争的行程开始得很晚——是从7月的最后一周开始的。7月25日，他"以镇定的从容自若……和应受谴责的对责任的漠视"，和往常一样到伊特岑－阿巴斯去过垂钓周末。[91]此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战争"。一开始，他同情奥地利，在他看来，只有当奥地利断然拒绝塞尔维亚的和解立场时，事态才开始失去控制。他认为列强会"悬崖勒马"；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必须援助法国；英国不应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因此，我们（英国政府）"必须跟德国人谈"。26日，与哈尔丹子爵一道进餐后，格雷与一名非官方的德国使者巴林会谈，后者向柏林报告说，英国将保持中立，除非比利时遭到彻底的"侵吞"。27日，格雷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未得到任何回应。

31日，德国和俄国都在进行动员，格雷仍未对任何一方做出肯

定的承诺，虽然他拒绝了德国提出的缔结一项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见下文）。8月1日是星期六，由于取消了前往汉普郡的旅程，他在布鲁克斯俱乐部进餐，有人看见他在那里打台球。8月2日，他出席周日内阁会议，会上大臣们没有对德国入侵比利时的各种后果得出明确的结论，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好几名大臣，包括枢密院长莫利、贸易大臣约翰·伯恩斯，宣布如果英国放弃中立就辞职。

爱德华爵士8月3日的日程以一次早上的内阁会议开始。午餐后，他于下午2时前往外交部会见德国大使利奇诺夫斯基亲王，亲王[885]通知爱德华爵士，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已迫在眉睫，并请求他告知预定在一小时后发表的演说内容。格雷拒绝泄露讲话内容，会见结束后，他穿过马路前往威斯敏斯特宫，下午3点整，他起身说道：

> 上周，我曾指出，我们正在努力……维护欧洲的和平。今天……欧洲的和平显然已无法维系。至少俄国和德国已经宣战。

爱德华爵士解释说，英国仍然可以自由决定政策。英国没有参加法俄同盟，而且“甚至不知道（这一同盟）的内容”。然而，在概述决定英国是否采取行动的各种因素后，他开始表达对法国处境的同情。“法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更不希望卷入一场因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争端而起的战争。他们卷入战争是出于光荣的义务……与俄国明确的同盟。”他接着列举了英国的利益所在，还特别提及英吉利海峡和1838年的《英比条约》。他总结道，英国的“无条件中立”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立场。多亏有强大的海军，英国参战并不比袖手旁观要承受更多的东西。如果漠视“荣誉和利益的义务”，英国的威望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他相信英国不会在责任面前退缩：

> 如果我们被迫表明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这似乎并非不可能，那么，我相信……我们将得到举国上下坚定、决心、勇气和毅力的支持。[92]

虽然语言含糊其辞，爱德华爵士最终告诉全世界，英国继续保持中立是有条件的，即德国不再威胁比利时和英吉利海峡的港口。

演说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曾找爱德华爵士谈过话，丘吉尔问道：“下一步怎么办？”格雷回答说：“我们将发出最后通牒，在24小时内阻止对比利时的入侵。”[93]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阿斯奎斯的妻子来看望他。她问道：“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是的，无法挽回了。”“亨利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靠在椅背上，手里拿着笔……我站起身，

把头倚在他的身上，我们一言不发，默默地流着泪。”[94]

1914年时，英国的国防几乎完全依靠海军。路易·巴滕贝格亲王既不是海军大臣也不是第一海务大臣，却倾向于支持战争。路易亲王让海军在夏季演习后不再分散，8月2日他建议实施海军总动员。[95]丘吉尔同意了。3日凌晨，丘吉尔在海军部的办公桌上看到妻子的一封信，信中谈及“这将是一场邪恶的战争”。他回复说：

> 亲爱的小猫，一切都结束了。德国人对俄宣战已经破坏了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对法宣战也是指日可待。
>
> [886] 我深切了解你的看法。这个世界已经疯狂，我们必须关照自己和我们的朋友……可爱的小猫，我温柔的爱。你忠实的W。亲吻你小猫咪。[96]

与格雷交谈后，丘吉尔给首相写了一张短笺：“除非收到禁令，我将大规模部署英、法海军以保卫英吉利海峡。”[97]

8月4日星期二，伦敦在等待中度过了24小时。早上传来消息，大批德军已经越过比利时边境。下午2点，英国的最后通牒发往柏林，要求当天答复。阿斯奎斯在写给密友维妮莎·斯坦利的信中写道：“温斯顿已经涂好了出战前的颜料，切望打一场海战。”[98]两艘德国军舰“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穿越地中海驶向土耳其。英国人自信能够俘获它们。

最后通牒的时限于伦敦时间晚间11点、柏林午夜12点到期，德国未做出任何答复。15分钟后，内阁在唐宁街10号开会。后来，大卫·劳合－乔治在致阿斯奎斯夫人的私人信件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 温斯顿容光焕发地冲进房间，他面容开朗、举止敏捷、滔滔不绝地说他如何发电报给地中海、北海以及天晓得什么地方。你会看到他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99]

从那一刻开始，这位海军大臣向所有英国海军舰只发出信号：“自即刻起处于对德战争状态。”与英国主要政治家的意向完全相反，英国放弃了和平的中立。这一决定把一场大陆战争转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英国的宣战把现代最大的一场外交灾难变为既成事实。整个事态完全倒向外交家数月来一直设法避免的最可怕的结局。这已经是连续第四份宣战书，奥地利发出第一份宣战书，第二和第三份是德国发出

的。英国是协约国列强中唯一主动走向战争的国家。

四个星期之前，维也纳要求贝尔格莱德就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做出满意的答复，分析家预计欧洲危机可能通过四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首先，这次危机完全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就像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后事态的平息一样。其次，危机可能引发一场仅限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参加的局部战争。第三，如果列强失去克制，危机可能引发一场大陆战争，当时的外交同盟和总参谋部的计划就是针对这种大陆战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和奥地利将与俄国和法国捉对厮杀，英国仍将保持中立。最后，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但愿不发生这样的事情！——英国直接卷入，结果，有节制的大陆战争发展成一场无法控制的世界大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伦敦与柏林的外交关系比欧洲其他国家首都之间的关系要重要得多。维也纳是局部战争的关键，柏林是大陆战争的关键，伦敦则是全球战争的关键。

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学生都能举出一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英国的卷[887]入会造成极为特殊的复杂局面。从战略角度看，英国的资产遍布全球各个角落，而它们的命运根本不会影响到欧洲国家的利益。从政治角度看，1914年的英帝国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针对英国的战争即被视为意在争夺世界霸权。从经济角度看，英国依然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国的技术和工业力量虽然不再能与德国相抗衡，但能够动员起巨大的资源。从外交角度看，傲慢的“阿尔比恩的主人”从未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们以难以言喻的自信、坚定的正直感和背信弃义而闻名。

最重要的是，从纯军事角度看，英国是一个未知因素，一个掠夺者，英国投入战争的影响完全无法预知。英国拥有制海权，欧洲大陆上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也无法消灭不列颠群岛。同时，英国又只拥有被德皇称为“区区规模的陆军”*，在通过征兵逐步扩大之前，这支陆军不可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英国政府享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即英国不会遭遇突如其来的失败，一旦战争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英国的军事实力就能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稳步得到增强。

这些事实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陆战争一开始就朝有利于法、俄的方向发展，英国参战将使决定性胜利的天平完全倾向法、俄。如果战局朝有利于中欧列强的方向发展，柏林和维也纳不能指望

* 德皇的评价在英国被错误地翻译为“不堪一击的小部队”，而且广泛流传开来，英国远征军因此选择了“不堪一击的老兵”作为绰号。

有这样好的结果。即使法军和俄军在第一次打击下就战败，那么如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一样，中欧强国仍须面对坚强不屈的英国，英国将使出浑身解数组织起新的同盟来反对它们。如果初期的战局没有决定性的变化，英国将处于比任何国家都有利的地位，从而在战争的后期阶段增强自身的相对实力。与德国不同，英国不可能赢得一场大陆战争；但英国不会轻易被击败。简言之，不论战局如何发展，英国都有能力使所有德国将军梦寐以求的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有限战争"的前景化为泡影。

人们在谈论军国主义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1914年，美国的豪斯上校访问了柏林，对德国人夸大的武力展示感到震惊。然而，所有列强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军事炫耀和自吹自擂，彼此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方式有所不同。较之1939年时不同，1914年时的所有国家中，尚武精神都与荣誉感紧密交织在一起。一位德国观察家尖锐地指出："[英国人] 认为英国的军国主义是属于上帝的，德国的军国主义却被视为属于魔鬼。"[100]军事安排的技术环节也同样产生了影响。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备受关注。英国和法国海军参谋部事先就达成协议，法国[888]舰队应当集中部署在地中海，皇家海军则负责巡逻守卫英吉利海峡。这就意味着，一旦法德在比利时开战，英国的中立就将自动允许德国军舰自由出入法国和英国海岸。动员程序是另一个重要的军事问题。德国的预防措施是实施一个准备性阶段，称作"战争临近状态"，随后的第二阶段几乎可以立即完成全面动员。实际上，德国宣布"战争准备"就相当于其他国家宣布总动员。

在最后摊牌之前，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为首的德国外交家必须集中精力解决上述问题。

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0年）是个典型的普鲁士文官。他博学、高雅、诚挚，一辈子都是在国家官僚体制的最高层度过。霍尔韦格出身于法兰克福的一个银行家世家，该家族后来迁居柏林，并在两代人之前受封为贵族。特奥巴尔德的祖父莫里茨·奥古斯特使这个家族崭露头角，他是一位法学教授，从反对俾斯麦统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中脱颖而出。特奥巴尔德因为太年轻，没有赶上在他祖父所厌恶的普法战争中服役。他和兄弟马克斯被送到费尔斯滕舒勒-普福尔塔寄读，此后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并通过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务员考试。他是学校里的优等生，20岁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为此后一片光明的仕途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先后担任波茨坦市长、布隆伯格（比德哥什）行政专区主席、勃兰登堡省主席，1905年任普鲁士内政大臣，1907年出任帝国内政部国务

秘书，1909年起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兼普鲁士总理大臣。从那时起直到1917年7月，他一直负责这个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101]

贝特曼－霍尔韦格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容克。他在柏林东部的霍亨菲诺有一处很好的地产，这块“骑士封地”并非家族传统代代相传而来，而是他的祖父买下来的。离开学校后，他曾在本地民团第15长枪骑兵团服役，但为期只有一年。他渐渐对霍亨菲诺产生了极为深厚的感情，霍亨菲诺占地7500英亩，一条长长的林阴道两边栽种着椴树，直通俯瞰着奥德河的峭壁，林阴道的尽头是一幢三层的红砖建筑。他的座右铭是“我和我的房子服务于上帝”。他年轻时并不安分，生活浪漫，四处游荡，吟诗作赋，与波希米亚朋友在埃菲尔铁塔和七峰山周围闲逛。他的兄弟宁可卖掉得克萨斯的不动产，也不愿意面对国家考试，这使他感到很困窘。他曾在地方选区参加德国议会选举，但选举委员会以技术性细节抹掉了他在选票上的微弱优势；从此他再未冒险涉足大众政治。他娶了一位颇不从俗的女子玛塔·普夫埃尔－威尔肯多夫，当他受命担任宰相这一帝国最高职位时，她说：“亲爱的提奥，你不能接受！”[102]

贝特曼并不是一个性格单纯的人。他做事从来一板一眼，即使是[889]在柏林，每天早上7点也都雷打不动地骑马。问题是他条理分明的习惯没有用在提高效率和决策上。他口才极佳，消息灵通，不幸的是性格拖沓，而且一再失态——这本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应该避免的缺陷。在德皇周围的军人集团中，他显得特别不自在；他也很害怕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恭顺的德国民主政治。库尔特·里茨勒是贝特曼的私人助理，在整个1914年危机期间满怀敬意地与他一道工作，里茨勒的日记提供了贝特曼任宰相期间的大多数内幕资料。里茨勒注意到“他的狡猾和他的笨拙一样突出”。[103]他的传记作者也谈及他“咄咄逼人地维护自我意识”。[104]

贝特曼之所以能出任宰相之职，部分是由于他在文官阶层中的资深地位，部分是由于人们相信他能够在保守派和激进分子之间保持中庸立场。按照德国的标准，他属于极为温和的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他经常公开表明对和平的承诺，对军国主义的危险提出警告。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泛日耳曼联盟对他深恶痛绝，常常要求解除他的职务。

贝特曼奉行的指导原则是所谓“远离战争的世界强国”。在前一年的11月，他斥责王储缺乏自制：“在每一次外交僵局时都使用武力威胁……不但是盲目的，而且是可耻的。”[105]萨拉热窝事件后不久，他估量了欧洲的政治前景，对里茨勒透露说：“任何全面的冲突都（将导致）一场颠覆现状的革命。”[106]两周以后，他以个人身份向德皇抗议

王储和某些新闻媒体夸大其词的声明。

1914年7月，58岁的贝特曼的个人生活因为两个月前妻子的去世而遭受沉重打击。他要么孤身一人，要么与里茨勒一道往返于霍亨菲诺与柏林之间。贝特曼对英国怀有极为友好的情感。他的儿子恩斯特曾于1908年在牛津大学获得罗兹奖学金，后来死于战争。危机爆发前，他的一切言谈举止无不表明，他希望并期待英德友好。

除开周围的亲密同事，贝特曼的所作所为没有博得多少赞誉。里茨勒钦佩他在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并把他的“踌躇不安”与格雷“冷冰冰的伪善”相提并论。里茨勒写道：“宰相是属于十九世纪头50年的人，是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文化的继承者。”[107]德皇却很粗暴，7月中旬，欧洲局势开始变得糟糕，贝特曼提出辞职，德皇明白无误地对他说道：“你煮了这锅汤，现在你得把它喝下去。”[108]阿尔伯特·巴林是汉堡－美国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柏林与伦敦之间非官方的中间人，他也不再支持贝特曼。巴林的一位朋友就是在贝特曼之前出任宰相的比洛，巴林把贝特曼称作“比洛的报复”，还谈及贝特曼的“迟钝”、“消极”、“缺乏进取心”以及“极端的无能”。巴林写道：“贝特曼罕见地能说会道……没有认识到政治是一项肮脏的事[890]业。”[109]前任宰相冯·比洛指出了贝特曼所犯的重大错误：“（萨拉热窝事件后）本来完全可以告诉维也纳：我们明确拒绝认可塞尔维亚与奥匈之间的任何决裂。”[110]

在英国，贝特曼受到无情的批评。流行的资料不仅批评他“半心半意”和“优柔寡断”，还描述了他“本质上属于普鲁士式的政治道义观”。人们普遍认为，主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贝特曼没有认识到国家的方向盘实际上落入军方之手。[111]战争结束后，贝特曼明确表达了战争的集体罪愆观点。他在回忆录中强调：“所有国家都有过失，德国应承担大部分责任。”[112]

贝特曼通往战争的行程开始于7月的第一周。由于外交大臣外出度蜜月，贝特曼从一开始就独自负责德国的外交政策。他一再表明避免国际冲突的决心。7月5日早上，德皇召见贝特曼，就奥地利在与塞尔维亚的争端中要求德国提供援助一事征求他的意见。结果是做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决定：一是避免直接答复奥地利，二是向弗朗茨·约瑟夫保证德国不会抛弃他。当天下午，贝特曼参加德皇军事顾问会议，会上主导性的意见是认为俄国不会干涉，塞尔维亚应当受到惩罚，而且“越快越好”，这使得贝特曼告诉奥匈帝国大使说：

维也纳必须判断使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关系明朗化所应采取的行动。[德国承诺]，不论贵国做出何种决定，都可以确定无疑地把德国

对贵君主国的支持视为盟国和朋友。[113]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开战的所谓“自由处理权”。

7月8日晚，贝特曼回到霍亨菲诺，天空繁星点点，他在阳台上与里茨勒交谈。他解释了一场全面冲突带来的危险。接着表明无所作为乃是所有政策中的下策。对俄国的忧虑使他心神不宁：“未来属于俄国，这就像一个可怕的噩梦，正越来越逼近我们。”[114]可见，贝特曼实际上赞同那些更为坦率的将军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延误只会使德国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6天后，即7月14日，虽然并未发生任何特殊的事件，贝特曼却向德皇报告说：“我们的处境非常危急……这一行动纯属冒险之举，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大的义务。”看来贝特曼已经甘于从事“精心策划的冒险”：打一场大陆战争。[115]

7月的第三周，贝特曼开始怀疑自己的赌博押错了筹码。当时的整个局势如云里雾中，丝毫看不到明朗的迹象。他建议德皇延长波罗的海之行，以维持一切如常的外观。这一建议遭到德皇拒绝后，他提出辞职，可他的辞呈依旧未获批准。按照里茨勒的说法，宰相陷入宿命论的情绪之中，他意识到公众舆论倾向于战争，“人民要求采取行动的巨大冲动就要失控”。[116]在这种想法的主导下，他采取了两个实际[891]步骤。他命令内政大臣停止继续逮捕社会主义者、波兰人和其他“不可靠分子”；在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向反对党通报了严重的局势。这两项措施实际上消除了民众反对战争的呼声。

7月29日，俄国以部分动员来回应奥地利对贝尔格莱德的进攻，贝特曼最后一次认真估量了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他向英国提议，两国签订一项中立条约，保证法国本土的领土完整。当天夜里，他一反先前的政策，在一封“世界着火了”的电报里痛斥维也纳，建议进行调停。两个行动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结果，德国面临与俄国的战争，却又没有明确获得奥地利的援助。柏林承诺援助维也纳，维也纳可以不援助柏林。两国同盟完全陷入混乱。

7月30日，决定的时刻到了。德皇收到圣彼得堡发出的数封电报后大吃一惊。他在其中一封电报的页边潦草地写道：“针对我们的灭绝战争”。[117]柏林相信德国已处于“包围”之中。晚9时，贝特曼会见了军方领导人冯·毛奇和冯·法金汉。他们决定宣布进入“战争临近状态”，这样一来，等于是自动开始了倒计时，一场全面的大陆战争将于8月的最初几天爆发。从这一刻开始，除非贝特曼收回成命，不然一切都已注定。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在7月5日和7月30日这两个关键时刻，

将军们强行推行了与贝特曼的建议相违背的战争路线。确实，作为最后一着，德皇拥有普鲁士传统的对将军和大臣的“指挥权”。问题是这位宰相从未使自己处于这一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他并未误入战争的歧途；他只是参与做出挑起战争的各项决策。[118]惟一可以替他减轻责任的说法是，俄国也像德国一样轻率地进行了动员——这一点常常被同盟国历史学家所忽视。

因此，对于这位宰相而言，主要的考虑是如何把责任归咎于协约国。30日夜11时，他获悉俄国已经开始总动员，情报也证实他先前在对俄动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8月1日，贝特曼对俄宣战，同时要求法国保证放弃法俄同盟，这是巴黎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巴林以个人身份目睹了宰相官邸花园房间里的这一幕：贝特曼发疯似的驱使职员草拟宣战书。巴林问道：“阁下，为何如此匆忙地对俄宣战呢?”贝特曼回答说：“如果我们不宣战，就无法说服社会主义者去打仗。”[119]8月2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受命从密封的信封中取出毛奇7天前准备好的函件。函件要求比利时接受德国的保护以抵御（子虚乌有的）法国进攻。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

[892] 8月3日下午，就在格雷在下院发表演说的同时，贝特曼在德意志德国议会发表了关于俄国扔“火把”的演说。他宣布：“我们被迫面临一场同俄国和法国的战争。”在重复格雷所说的决心和毅力之类的话之后，贝特曼表示：“整个日耳曼民族……团结如一人。”[120]

4日，德军侵入比利时。正午时分，贝特曼从威廉大街获悉英国的最后通牒已经送达。德皇下达御诏，平静地谈到德国是“问心无愧和清白地开战”。[121]但贝特曼勃然大怒。英国大使前来辞行时，宰相官邸里回荡着贝特曼的咆哮。这位宰相连珠炮似的发表了一篇空前激烈的抨击演说，在20分钟的时间里，他一直用法语高声训斥大使：

> 惟因英国的参战，这场战争才转变为一场无边的世界性灾难。伦敦本可以约束法国的复仇主义和泛斯拉夫沙文主义。白厅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一再怂恿他们……我所做出的一切［和平］努力均遭曲解。是谁曲解的？是英国。为什么会这样？比利时的中立。这一中立——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打破这一中立，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难道就是打一场世界大战的理由吗……与这样一场导致彻底毁灭的灾难相比，这一中立难道不是轻如鸿毛吗？德国人民、皇帝和德国政府是热爱和平的。大使和我一样很清楚这一点。我们问心无愧地参加战争。英国要承担巨大的责任。[122]

大使的眼泪夺眶而出。外交走到了尽头。

颇为奇怪的是，英国大使关于这次长篇激烈演说的原始摘要中，并没有贝特曼所说的“轻如鸿毛”之语。看来，像格雷关于“灯火熄灭”的话一样，在那次命运攸关的会面中贝特曼是否说过那样的话，颇为值得怀疑。[123]

1914年夏季的这些日子里，在远离外交官的地方，人们流露出各种不同的情绪。

在巴黎，8月3日，马塞尔·普鲁斯特驱车送他的兄弟——一名前往凡尔登的军医——去东方火车站，午夜后方回到奥斯芒大街，他在给代理人的信中写道：“就像威尔斯的小说描写的那样，上百万人将在一场世界大战中遭到屠杀。”[124]

在英国，维吉尼亚·吴尔夫在苏塞克斯郡刘易斯附近的罗德梅尔过法定假日。8月3日下午4时，她写信给瓦尔萨·贝尔说：“最亲爱的，我们走之前你能帮我们付一半的租金（15英镑）吗？……邮差带来一些小道消息，说我们有两到四艘军舰被击沉，我发现……和平依然存在……我真的很喜欢你。”[125]

年轻的诗人鲁珀特·布鲁克一周前曾与阿斯奎斯和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一起吃饭，此时他赶紧给已是拉弗莱特夫人的格雯·达尔文写了封信：

一切都在朝坏的方向发展。我希望德国把俄国打得粉碎，法国再把德国打个稀巴烂。我担心，与我的愿望相反，德国会把法国打得很[893]惨，接下来俄国会彻底摧毁德国。法国和英国是仅有的必须有些实力的国家。普鲁士是恶魔。而俄国意味着欧洲和所有庄重得体的终结。我认为未来会出现一个暴虐、疯狂的世界性斯拉夫帝国。[126]

D.H. 劳伦斯正在与三位朋友在湖区度假：

我一直在威斯特摩兰散步，相当愉悦，帽子上缠着睡莲……我在雨中嬉戏，柯蒂梁斯基则哼唱着希伯来音乐……我们走到巴罗因弗内斯，得知已经宣战了。我们全都要疯了。我还记得士兵在巴罗车站与亲人吻别，一位妇女大胆地对她的爱人喊到：“克莱姆，当你抓住他们，叫他们尝尝你那玩意儿的厉害”——所有的有轨电车上都贴着招贴画：“战争——维克斯－马克沁阁下招工。”

我沿着海岸走了数英里。我记起平整的沙滩和烟青色大海上令人啧啧称奇的落日……巨大的痛楚使一切事物越发带有惊人地生动和梦幻般的美。[127]

德国和奥地利同样是群情激昂。托马斯·曼正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特茨，战时人力总动员令下达后，他惊讶不已。他拒绝为他的兄弟亨利希当证婚人，他记录下当时的感受：

我们难道不应感激有这样完全出乎意料的机会去体验如此重大的事件吗？我的第一感觉是巨大的好奇，以及——我得承认——对被诅咒、难以理解和命运注定的德国的最强烈的支持，即使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无条件地把“文明”当成最高的善，它至少正准备去摧毁这个世界上最卑鄙的警察国家。[128]

在维也纳，满城谣言四起，说罗马教廷大使拒绝接触皇帝。据说庇护十世因为未能维持和平心碎而死。（他死于8月20日。）梵蒂冈的档案表明这些谣传是错误的：教皇国大臣赞同帝国主义政策。

维也纳充斥着咄咄逼人的挑衅气氛。6个月前，奥地利总参谋长冯·H. 霍埃岑多夫曾经问德国总参谋长“我们为什么等待?”此刻他对种种耽搁备感愤怒。就连持怀疑态度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也被说服了。7月31日，蒂萨告诉比利时大使说：“我亲爱的朋友，德国是不可战胜的。”[129]

诗人斯蒂芬·茨威格——他后来谴责这场战争——被举行爱国游行的人群所打动。他提前结束了在奥斯坦德附近勒科克的海滨度假，乘坐最后一趟东方快车刚刚回到家里。他曾经对一位比利时朋友说：“要是德国人有朝一日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在路灯柱上。”不久，他就看到德国军列在赫贝斯塔隆隆驶过德比边境：

以前，成千上万的人从来没有想过在和平时期就应当思考的问题，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相互彼此拥有，从来没有意识到令他们超越日常生活的未知力量。[130]

茨威格担心自己会在东方战线服役。他承认说：“我雄心勃勃……要征服法兰西，一个因为你热爱所以必须惩戒的法兰西。”他[894]很快印制了致敌人阵营里的朋友的公开告别辞：“我不会去克制对你们的这种［普遍的］憎恶之情，我身体不好，但这种憎恨为我带来了胜利和英雄般的力量。”[131]

8月3日，当茨威格到达维也纳火车西站的时候，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什泰因，即托洛茨基，刚好离开维也纳。他也目睹了同样的游行，看到他的社会主义同志在《工人报》办公室里乱成一团，而

且被警告将要被拘留。他立即乘火车前往苏黎世，在那里他开始写作《第二国际与战争》，他在这本书里用一些著名的措辞来描绘心目中未来的社会主义，如“民族自决”、“欧洲合众国”。[132]

与托洛茨基相反，列宁不露声色地在加里西亚扎库潘附近的波罗宁避难，他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将阻止重大冲突的发生。据说，在得知他的德国同志投票赞成战时信贷后，列宁声明：“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而是一名共产主义者。”[133]在附近的克拉科夫，克拉科夫大学刚刚结束了一个学年。毕业生中有不少是预备役军官，正离开学校参加各自的军队，他们有的将为奥匈帝国皇帝——国王而战，有的为德皇而战，有的则为沙皇而战。

在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的宫廷接受了前些天做出的重大决定。在未与陆军大臣协商的情况下，沙皇就于7月30日（俄历7月17日）星期四下达了总动员令。德国的最后通牒接踵而至，沙皇一直置之未理。星期六，圣彼得堡收到了德国的宣战书，随即在周日对德宣战。因此，8月3日（俄历7月21日）是俄国进入战争状态的第一天。晚7时，俄国开始实施军事审查。各家报刊宣布“国民必须忍受信息披露的匮乏，心甘情愿地认识到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134]同一天，沙皇巡视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讲话。皇室成员在伊维隆的圣母教堂做祈祷，教堂里有纪念俄罗斯与圣山最早的宗教联系的圣像。

俄国的乐观主义者对“大军事计划”充满信心，该计划制订于1914年初，诸多目标中的一项是把帝国军队的动员时间缩短到18天。驻圣彼得堡的英国武官报告说，希望“俄国人在德国人进入巴黎之前开进柏林”。以内政大臣和警察总长皮奥特尔·杜诺沃夫为首的悲观主义者，则有强烈的不祥之感。杜诺沃夫曾在2月向沙皇报告说，如果战事不顺利，“将在所难免地爆发一场最激烈的革命”。[135]

在瑞士的沃韦，音乐理论家、小说家、世界文学圈子里的明星罗曼·罗兰目瞪口呆地注意到周围的朋友全都沉浸于战争的狂热之中。他对梵蒂冈的立场极为愤怒，声称欧洲自从托尔斯泰——他刚刚写完托氏的传记——去世后就完全丧失了道义上的指路明灯：

> 8月3—4日，我身心交瘁。我宁愿死去。与疯狂的人类生活在[895]一起，眼见文明崩溃却又无能为力，真是糟透了。这场欧洲战争是数个世纪以来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它毁灭了我们对人类手足之情所怀有的最神圣的希望……我在欧洲几乎是孑然一身。[136]

1914年爆发的战争比现代任何事件都更促使人们思考历史的因

果关系。许多人相信，如此巨大的灾难必定是同样重大的原因导致的。很少有人认为一些个人应当承担责任。围绕着战争的“深层起因”问题，已经出版了大量的著述。实际上，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这些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机会。

我在这儿使用“巨大的”一词，并非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起所有专家都认为不会发生的重大海难震惊了整个欧洲。1912年4月15日，世界上最大的邮轮、白星航运公司43500吨的“泰坦尼克”号，于首航途中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后沉没，船上1513人丧生。鉴于这艘船的吨位，这次事故显然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另一方面，没有理由把灾难的起因与船只吨位大小拉上关系。两个调查委员会都指出，导致灾难发生的原因，是这艘特定的轮船在特定航程中的一些特殊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船体的设计，救生艇的数量，北极冰川的反常状态，过快的船速，史密斯船长设定的北方航线，以及撞上冰山后的1小时45分时间里未能有效地协调行动。很显然，研究海难的历史学家不仅必须探究“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原因，还要明了其他大型船只得以平安穿越大西洋的原因。[137]

“泰坦尼克”号的例子可以用来类推战争爆发的起因。战争史家不但要考察1914年和平破裂的原因，还要探究1908年、1912年和1913年时和平得以维系的原因。晚近时期“冷战”的经历表明，虽然存在发生巨大灾难的可能性，但两个对峙的军事和政治集团并不一定是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原动力。

在激发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那位自作聪明的A.J.P.泰勒。战争的阴霾笼罩了几代人，几百万人的生命和鲜血使战争史染上浓厚的情感和道义色彩；战争史的书写需要有极不客气地挑战传统观念的人。在探讨1914年的各种事件时，A.J.P.泰勒举出三个人的名字，似乎是这三个人单枪匹马地引发了战争，“这三个作决定的人，虽然他们也是客观环境的牺牲品，是贝希托尔德［奥地利外交大臣］、贝特曼-霍尔韦格以及已故的施里芬。”身为一个坚定不移的仇德主义者，泰勒只字未提爱德华·格雷爵士。[138]

在另一篇论述1914年军事后勤的杰出论文中，泰勒开始认真考虑一个极端的立场，在他看来，历史原因似乎成了多余的概念：“如[896]今，寻求重大事件的各种深层原因已经成为时尚。1914年爆发的这场战争或许根本就没有深层原因……1914年7月，局势步入歧途。惟一可靠的解释是，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发生了。”[139]

后来，泰勒又回到较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这场历史上的大灾难

起因于普遍原因和特殊因素的致命汇合。他证明其他历史学家极为重视的“深层原因”既是战前和平的基本要素，也是和平破灭的根本原因。没有这些“特殊因素”，“深层原因”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 正是要对 1914 年的战争负责的东西，秘密外交、均势、强大的大陆军队，使欧洲享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不应当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战争的爆发?”。问题应当是：“为什么长时期维持了欧洲和平的因素在 1914 年时未能发挥同样的作用?”[140]

换句话说，引爆火药桶必须得有火星。没有火星，火药就不会爆炸。没有打开的火药桶，火星又是无害的。

泰勒本该精心选择泰坦尼克号的例子来解释这种观点。他却没有用轮船做比喻，而是选择汽车为例证。这么一来，他强调了大多数灾难理论都强调的原动力因素，把事件看成是不可阻挡地向临界点发展：

> 战争与道路交通事故极为相似。它们同时具备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归根结底，每一起交通事故总是内燃机的发明导致的……但警察和法庭不会认真考虑各种深层的起因。他们寻求每一起事故的特殊原因：驾驶员的失误，超速行驶，酒后驾车，制动失灵，以及恶劣的路面等。对战争而言情况也是这样。[141]

第11章

熄灯礼拜*

阴影笼罩下的欧洲，1914—1945年

[897] 野蛮的阴影笼罩着二十世纪的欧洲，这阴影曾令最原始的野蛮人感到震惊。当工具的创造性变革超越了人们以往的感知时，欧洲人默许了一连串的冲突，这些冲突毁灭的人类生命超过了以往所有战乱给人类造成的牺牲的总和。尤其是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毁灭性是无法估量的；并且迅即传遍全球。然而战争的重点毫无疑问是在欧洲。更重要的是，在两代人的流血战争过程中，欧洲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倒在了屠杀性政治制度的手下。这两个国家政治制度内部的敌对性杀死的人甚至比它们在战争中死亡的人还要多上千万。一个少有的良知的声音在罪恶发生前就说过：

为什么这个年代不如早些年代？
在悲痛和畏惧的恍惚之中
我们没有抚摸最腐臭的伤口
反倒亲手撕裂它们？

西方，正在消失的光线依然耀眼
一簇簇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但是死神已经在各家门上画了十字，
还呼唤着渡鸦，渡鸦正在飞入。[1]

---

*纪念耶稣受难的赞美诗——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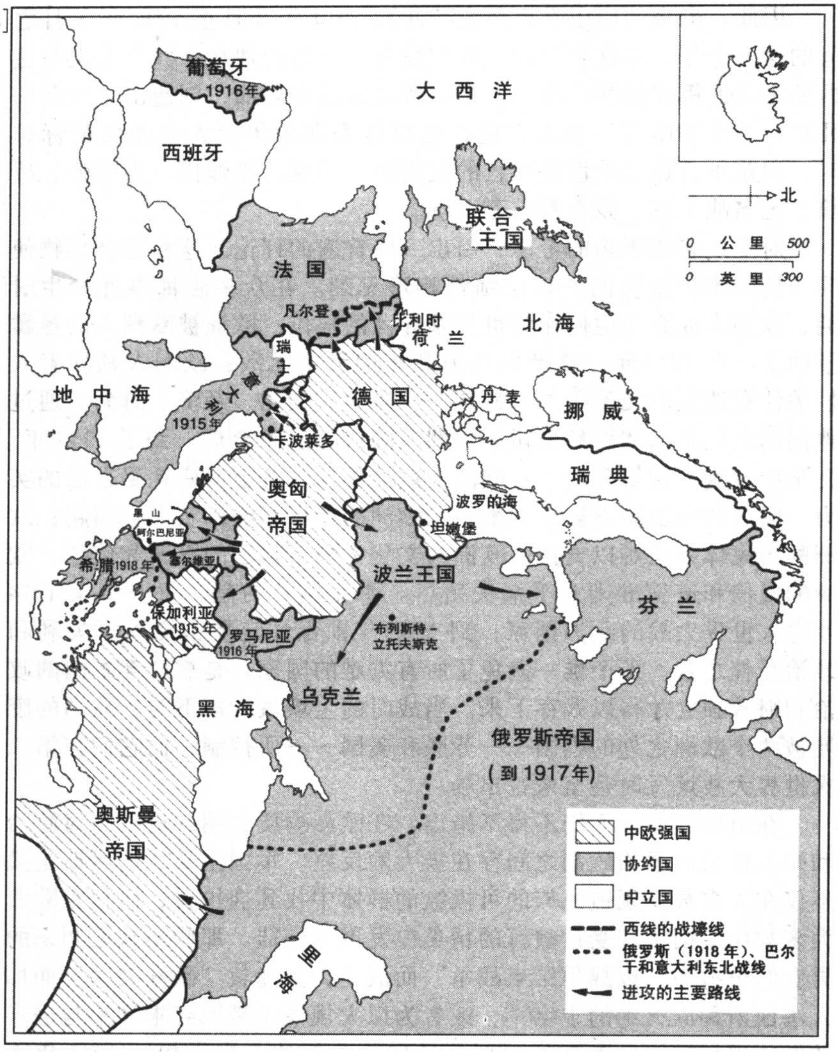
因此，未来的历史学家肯定要回顾1914年8月至1945年5月之间的这三十年，在这个时期，欧洲抛弃了自己的理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恐怖，再加上当时所有的战争恐怖，创造出了空前的死亡、苦难和堕落。当人们选择足以代表那个年代人类经历的标志时，很难不首选二十世纪死亡的代表物：坦克、轰炸机、毒气弹、战壕、无名战士墓、死亡营、万人坑。

对上述恐怖事物的考虑，引出一些普遍的评论。这些恐怖事物使同一期间维护生命的一切成绩都相形见绌。在众多恐怖事件发生时[899]期，欧洲人放弃了他们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欧洲被欧洲人的愚蠢侵蚀了。在1914年，欧洲的权力和威望天下无敌：欧洲人领导着人们关注和谈论的几乎每一个领域——科学、文化、经济、时尚。通过他们的殖民帝国和贸易公司，欧洲人的权力遍布全球。到了1945年，几乎所有这一切都失去了：欧洲人彼此争斗，直至彻底耗尽自己的实力。欧洲的政治势力被大大削弱；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被超越；欧洲的殖民体系已难以支撑。欧洲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真诚和信任；欧洲的威信和道德准则几乎消失殆尽。明显例外的是，每一个于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到1945年前都注定要饱受军事失利和政治受挫之苦。那个惟一避免了所有灾难的国家，是靠放弃本国的政治和财政独立才得以残存下来。当战时的尘埃最终落下时，欧洲的废墟被两个欧洲之外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所控制，而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甚至未曾出场。

在道德领域，人们不得不指出，在欧洲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对政治和知识价值的恐怖压制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在大多数受压迫民族的可操纵的群体中找到拥护者，而且在欧洲大多数民主国家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中发展了信徒。那些不缺乏知识的男女们被迫为“以战争结束战争”而战斗，为拯救“欧洲文明”而加入法西斯种族灭绝的十字军，或者为以大规模杀戮而寻求和平与进步的做法进行辩解。崇高的理想就是如此曲解的。当真相于1941年大白于天下时，正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盟国领袖们毫不犹豫地招募了一个罪犯去打击另一个罪犯。

在史学领域，人们不得不考虑这些事实：欧洲的恐怖事件在人们短暂的记忆中是犯罪，但是主观的、政治的和党派的观点继续支配着公众的判断。全部重大冲突的历史往往总是由胜利者重新改写，他们最大限度地夸大失败者的罪恶和愚蠢，同时把己方的罪恶和愚蠢缩小到极致。归根到底这就是人的本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由以西方强国为首连同他们东方的战略盟友这一类似的同盟取得了胜利；这是他们关于那个时代的版本，并且继续影响着战后的教育、媒体和历

[898]



地图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1914—1918 年

史著作。1918 年后，这一盟国的版本被首先授予官方证书，当时战败国的代表们被迫承认唯有他们自己犯有战争罪。1945 年之后，当盟国法庭致力于单独调查敌方的战争罪行时，这种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任何以相同的手段和标准去审判各个盟国的公开意图在政治上都是无法实现的。从兰贝思* 到莫斯科再到华盛顿，官方的战争博物馆

* 兰贝思（Lambeth），伦敦的一个地名，帝国战争博物馆所在地——译者注。

继续依照单方面的观点展示罪恶与英雄主义。缴获的战败方档案中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都完全能够看到；而战胜者的关键性档案仍然被严密地封存。50年了，但要出版一部比较公正和客观的著作还为时过早。[900]

在诠释方面，在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思索“欧洲内战”的一贯性之前，许多年过去了。那些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停战经常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14—1918年发生的所谓“士兵的战争”被认为与1939—1945年发生的“民众的战争”有很大区别。任何卷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长期争斗的人都会去思考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运动。现在，得益于事后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持续不断的冲突其实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组成部分：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同一出戏剧分开的两幕。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加者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未决事务创造出来的。由于卷入1914年的军事冲突，欧洲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在混乱中产生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革命运动，其中一个在1945年被粉碎了，而另一个直到1989—1991年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时才垮台。(见第12章)

面对德国的扩张以及随后出现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对孪生的祸患，民主主义的西欧强国只能向美国呼救——第一次是在1917—1918年，后来是1941—1945年。1945年以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的力量来抵御庞大的苏维埃帝国的挑战。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德国重新统一和苏维埃帝国的分崩离析，欧洲人民才能恢复其在1914年那个美丽的夏天骤然中断了的自然发展进程。

因而，在这个剧本中，1914—1945年的岁月是欧洲的动乱时期，它填补了十九世纪晚期长期的和平与冷战时期更为长久的和平之间的空白。它们可以被比喻为大陆板块的滑落，以及地震多发期。它们包括1914—1918年最初的军事震颤，四个帝国的瓦解，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爆发，十多个新生主权国家的出现，两次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武装停战，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掌权，然后是1939—1945年第二次普遍的军事战争。

动乱的中心位于德国，这个欧洲最新、最活跃和最不满现状的民族国家。地震区的断裂带沿着德国东部边界延伸。德国几乎毫不掩饰其反对西欧的计划。但是，在东欧，它面对着两方面的诱惑：一个是几个相对弱小和贫穷的邻国，一个是俄罗斯，惟一实力强大到足以向德国的军事力量挑战的欧洲国家。因此，从一开始，决定欧洲未来的主要斗争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展开。这场掌握在极权主义革命者手中的斗争注定要变为一场通向死亡的斗争。从一开始，西方的民主派就扮演了掠夺者的角色，毫不关心东欧人民的命运，却决定阻止任何一个最终可能转而反对西方的咄咄逼人的大陆强国的发展。这种军事实

[901]力格局决定了欧洲在二十世纪剩余年代的政策。它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核武器的发明和美国的卷入，就很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结果，公开和普遍冲突的时代被莫名其妙地限定在那浸满了鲜血的 30 年里。非常巧合的是，战争的开始和结束都发生在德国的首都柏林。1914 年 8 月 1 日，在帝国首相官邸，德国皇帝的代表向俄国宣战，战争开始。1945 年 5 月 8 日，在苏军设在柏林一卡尔斯霍斯特（Belin – Karlshorst）的总部内，投降的第三幕最终决定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行动，战争结束了。

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21 年

爆发于 1914 年 8 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人们普遍预期只会持续三到四个月，到圣诞节就会结束。常识认为，现代化战争会比过去的战争更激烈，而且更具决定性。无论哪一方在战争的初期占据上风，就有了速胜的手段。结果是，战争不是持续了四个月，而是进行了四年多。甚至到一战结束，欧洲的格局也未确定："大三角"军事一政治权力集团直到 1945 年才明确，而且在某些方面直至 1991 年才彻底解决。(见原书附录Ⅲ，第 1312 页)

一开始，"大三角"的地缘政治结构并不很明朗。由于只有法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所以西方联盟（英国和法国）存在严重的缺陷。在它们的潜力充分调动出来之前，度过了不稳定的两年。首先，它们要争取意大利于 1915 年 5 月加入协约国；其次是在英国本土和大英帝国范围内稳步增强军事实力；第三，使美国于 1917 年 4 月参战。英国的亚洲盟友日本，虽然已于 1914 年 8 月 23 日对德国宣战，但却没有在欧洲的冲突中发挥任何作用。英法联盟的主要伙伴沙皇俄国，据认为受到了一系列的阻碍：繁琐的调动程序，广阔的国内交通网络，值得怀疑的工业生产能力，战略目标互相分歧的建议。不过俄罗斯发动攻势较早。俄罗斯最终的崩溃不是因为缺少炮弹和士兵，而是因为政治和道德的腐败。[2]

中欧强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能够从统一政策和内陆交通线的全部优势中获得利益。它们因为意大利的背叛而失去了一个盟友，却意外地恢复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出于对俄国的恐惧，奥斯曼帝国于 1914 年 11 月站到了德、奥方面。在 1914 年，它们曾对两线作战的前景感到恐惧。而现在它们没有必要感到不安了：它们自己已经能够经受八个战场的主要战役——西线，在比利时和法国；在东线对抗俄国；在巴尔干；在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在高加索；在意大利；在各个殖民地以及在海上。

各参战国的战争目的没有因战争爆发而得到明确。中欧强国以防[902]御和威慑为目的发动了战争。它们的目的是防止奥地利被削弱，粉碎它们认为对德国形成的包围圈，在法国和俄国提出领土要求之前先发制人。然而它们很快就炮制了一份欲望的清单。它们计划把比利时的东部省份（列日和安特卫普）并入德国，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划归奥地利；增加德国的殖民收入，以便削弱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建立凌驾于“中欧”，包括波兰在内的政治和经济霸权。只有奥斯曼帝国仅仅要求维持现状。

协约国由于受到攻击而拿起武器，从此它们便产生了不可救药的道德优越感。不过，塞尔维亚希望把奥地利人从波斯尼亚驱逐出去，法国打算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英国不久也寻求在殖民地和财政方面得到补偿，俄国人心怀扩张领土的庞大计划。1914 年 9 月，俄国总参谋部出版了一本“未来的欧洲地图”，它居然同后来在 1945 年实现的版图惊人地相似。[3]此外，俄国还设法得到了其盟国的秘密承诺，战后由其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意大利的目的是得到其邻国的意大利人居住区。

一些国家力图保持中立地位。西班牙、瑞士、荷兰与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自始至终一直坚持中立，并因此而兴旺发达。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分别于 1915 年 9 月、1916 年 8 月和 1917 年 6 月卷入战争。中国因受到日本的攻击，尽管占领的是德国在中国的租界，也于 1917 年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其他国家更不愿参战。1914 年 8 月 6 日，由于毕苏斯基（Pilsudski）领导的波兰军团有几百人在行进中越过了克拉科夫附近的俄国边界，从而开辟了东线战场。当时他们正带着马鞍希望找到马。他们的目的是显示波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和多次瓜分之后依然保持着活力。当哥萨克骑兵逼近后，他们便明智地撤退，后被编入奥地利军队。

军事战略和策略总是建立在近来发生的战争经验教训基础之上。普法战争和布尔战争已经证明步兵进攻的脆弱性。据认为解决的方法是将三方面紧密结合——使用密集炮火作为对敌方阵地进行攻击的主要武器，利用铁路网以便迅速调动攻击力量，动用骑兵以包围和追击敌人。在东线，这些设想没有显出无效。但是，在战壕密布的西线，在能抵御猛烈炮火的混凝土地堡前，其遭到的上千次失败的军事进攻甚至就被料想到了。尽管显示防守胜于进攻，将军们并不轻易修正他们的设想。飞机引擎容易坏，而且不可靠，只能用来侦察、炮火引导和空战。在大多数地方，几乎没有碎石路，马力依旧是必不可少的。在海上，潜艇发射的鱼雷证明比无畏战舰上 15 英寸口径的大炮更为致命。

[903] 在西线，德军在进入消耗战之前差点给敌人以休克性的打击。中路德军猛力插入法国香槟（Champagne）的心脏地带，德军右翼通过一个巨大的车轮弧形穿过法国北部。以重获1870年的胜利为目标，德军从三个方向向巴黎进军。他们在列日和伊普雷斯分别受到比利时和英国远征军的短暂阻击。［兰格玛尔克］中路德军在埃佩尔内（Epernay）低地被耽搁了。但是，在1914年9月的第一周，法国首都正面临灾难。霞飞（Joffre）将军刚刚征用了600辆雷诺牌出租车把法军所有可用的后备力量都运送到马恩河前线。德军中路恰恰没有什么势头；而德军右翼正巧又离得太远。如此，马恩河战线的形势发生了逆转。从10月到11月，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沿着整条海岸修筑了双重战壕的战线，战事稳定下来。（见地图24）

[904]

兰格玛尔克（LANGEMARCK）

兰格玛尔克是比利时境内伊普雷斯（Ypres）以北五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如同那个地区所有的村庄一样，也有一个战争公墓，公墓中安葬着在1914—1917年期间英—德军队在伊普雷斯突出部进行的一系列战役中阵亡的将士。从外观上看，这个公墓与其他许多公墓没有区别。实际上，安葬着25000名未经鉴别的德军士兵的杂草丛生的墓地无法同梅南城门（Menin - Gate）附近的庄严的纪念碑相比，在纪念碑上，刻着40000名未经鉴别的英军阵亡者的名字。然而，按照一位首席军事历史学家的观点，“就现实意义而言，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诞生地。”[1] 不为许多现代参观者所知的是，兰格玛尔克还掩藏着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志愿者及其战友们的最后安息之地，上帝更多地宽恕了他们的行为。

希特勒，一个不成功的艺术系学生和逃避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者。1914年8月1日，他满怀激情地在慕尼黑公众的人群听到了宣战的消息，并立即报名参加德军。他被分配到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并于10月份来到西线战场，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伊普雷斯战役。在路途中，他成为可怖的屠杀无辜者的目击者，那里，成千上万的未经过充分训练的德国新兵，主要是热情高昂的大学生，被职业化的英军士兵发射的密集火力打得血肉横飞。这是德国人的第一次惨败，在帕申代尔（Passchendaele）和索姆（Somme），无疑充满了复仇情绪。希特勒永远不会忘记它。

希特勒最重要的经历是在战壕里度过的，在那里他过了四年

令人陶醉的“勇敢的传令兵”或“军营传令兵”的生活，无疑这对他日后的经历引发了病态的欲望。受到战友们或死亡或伤残命运的刺激，受到伟大德国付出巨大牺牲却换来失败的折磨，他要为他们的死复仇；他要德国的征服者们轮流蒙受耻辱；他要重新培植德国人自豪、高傲、充满仇恨而又冷酷无情的感情。他那复仇的誓言打动了数百万心灵受到创伤的德国人。

因此，兰格玛尔克象征着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象征着伊普雷斯和凡尔登（Verdun）的惨败之间，象征着伦敦闪击战、华沙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间最基本的精神纽带。

在以后的三年中，这条战线几乎没有移动。双方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整理偶尔的突出部，或者是取得一次突破。但每一次推进都毫无收效。欧洲人的鲜血从未像这般恣意挥霍地流淌。在伊普雷斯、维米岭和索姆河的三大战役中，尤其是在凡尔登战役，生命的丧失有时达到每小时以万计，或每平方英尺以百计算的程度。这是一场无知的悲剧，没有人能预见，也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停止。1917 年 2 月，德军有计划地退却以准备在阿拉斯（Arras）和苏瓦松（Soissons）之间选择进攻地点。这是一个少有的理性行动。不可避免地，舆论的矛头指向软弱无力的将军们。英军把这一行动说成“他们是一群跟着蠢驴走的狮子”。[**杜奥蒙特**]

在穿过波兰腹地的东线，德奥军队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并且避免了连续进行战壕作战的厄运。1914 年 8 月，两支俄国军队跨过边界，一支进入东普鲁士北部，另一支深深插入加利西亚南部。因为“俄国人的蒸汽轧路机”意味着缓慢运动，所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成就。但随后命运发生了变化：在 9 月份进行的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战役中，兴登堡（Hindenbe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指挥的德军全歼了北路的俄军，从而洗刷了以前由于马恩河战役失利带来的耻辱。南路俄军在克拉科夫郊区被迫停止前进。在 1914—1915 年冬天，在罗兹（Lodz）附近的德—俄边界和喀尔巴阡山的匈牙利边境发生了两次非决定性的战役。但是，随后在 1915 年 5 月，在加利西亚的戈尔利采（Gorlice），德军的作为证明他们在西线也能成功：他们摧毁了敌军的防线，以扇形向平原地区深入。到 8 月，德军占领了华沙，并夺回了利沃夫。当年秋天，他们攻入立陶宛，并且做好了翻越喀尔巴阡山进入罗马尼亚的准备。[**彼得格勒**]

由于俄罗斯帝国面临着长达 1000 英里的边境线遭到入侵，沙皇亲自指挥前线部队。1916 年 1 月，布鲁西洛夫（Brusilov）将军发起的反攻深入挺进加利西亚，连续 18 个月围攻普热梅希尔（Przemyśl）

要塞。但是代价巨大，不得不结束攻势。在罗马尼亚，德军于12月攻陷布加勒斯特（Bucharest）。1917年，德奥军队主力重新发动攻势，[907]稳步攻入波罗的海各省、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由于国内革命与俄国的军事失利交织在一起，德国和奥地利是否能够在沙皇帝国自行垮台前将其摧毁，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常说俄军遭到过多的伤亡，实际上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在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参战国。关键的统计数字涉及战俘。因为每有100名沙皇士兵战死疆场，就有300名士兵投降。比较起来，英军相应的投降人数是20人，法军是24人，德军26人。沙皇的士兵几乎无人愿意打仗。[4]

[905]

杜奥蒙特（DOUAUMONT）

1916年2月25日，德军进攻凡尔登的第四天，王储（Crown Prince）的部队夺取了石头和水泥砌就的杜奥蒙特要塞。该要塞距凡尔登突出部的边缘起始点六公里，正处在通往市中心的半途处。在此后的18个月里，它将成为这场在延续时间之长和程度之激烈方面无与伦比的战役的焦点。该要塞的西部靠着沃欧（Vaux）要塞，俯瞰着默斯（Meuse）的右侧，并监视左侧的山丘，尤其是304号工事（Cote 304）和死神—人类高地（Le Mort - Homme）。对于德国进攻者来说，杜奥蒙特要塞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钳形运转的枢纽，由沿着130英里弧形地带的14条铁路线进行补给。对法国防御者而言，它构成了萨克雷大路（voie sacree）的终点，通过从巴尔勒迪克城（Bar - le - Duc）撤退，这条狭窄的走廊地带得到加强。由于日日夜夜遭到炮轰，以及在地下挖坑道，另外轰炸造成了经常性的震动，它的废墟和隧道成为进行肉搏战和全体士兵被活埋的场所。月面一般崎岖不平的战场被不断地搅拌成泥浆、砖石建筑和人类遗骸的冰冷的混合物。它被法军于10月24日收复，德军一直在争夺，直至1917年8月，但直到1918年9月美军对圣米歇尔（St Michel）发动进攻，这里均未能最终确立谁胜谁负。贝当（Petain）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曾断言："人们需要勇气。"

凡尔登战役的参加者有大约80万人，相当于这座城市人口的40倍。它在法国人的记忆中，就像索姆河与伊普雷斯在英国人的记忆中和卡波雷托（Caporetto）在意大利人的记忆中那样；或许像斯大林格勒在俄国人的记忆中那样。对德国人而言，这暗示着他们所有的军事失利将导致巨大而无谓的牺牲。

1986年，在纪念凡尔登战役70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和德国总

理在凡尔登出席了两国和解的仪式。他们的手用一种欧洲其他交战国领袖很难做到的方式握到一起。

从此，许多荒废的景观已经恢复植被。但是，在杜奥蒙特的大量骨灰罐，及其带有四个十字架的塔，守卫着安放在这座共同的花岗岩墓地中的双方 13 万身份不明的士兵的遗骸。一个装备有展览室、说明材料和电视片的纪念中心，试图传达一位老战士曾称之为“无法言传”的东西。在杜奥蒙特前面的花坛，一座已不复存在的村庄遗址上，圣母玛利亚的像雕刻在一座小教堂的正面。她是欧洲的圣母玛利亚。[1]

[906]

彼得格勒（PETROGRAD）

1914 年，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被更名为更具爱国主义色彩的名称——彼得格勒。正如英国皇室将家族名称由汉诺威—萨克斯—科堡（Hanover – Saxe – Coburg）更改为温莎（Windsor）一样。因为在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中，保留具有德国来源的名称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彼得格勒这个名字只存在了不到十年，就再次被更名为列宁格勒（Leningrad）了［哥达］。

圣彼得堡已经发展为欧洲最为豪华壮丽的都市之一。除去古典式的宫殿和政府机关大厦外，涅瓦河两岸形成主要的港口和商业区；它既是辉煌的文化都市，又是正在发展的工业区域，也是一个巨大的要塞。叶卡捷琳娜女皇为了向其前辈彼得大帝致敬，把一座体现 200 万公民共同精神的青铜骑士的雕塑赠送给圣彼得堡市。

当该城第一次更名时，把握其未来命运的人还被流放在瑞士，而且没有近期返回的可能。他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在关于《社会民主革命的任务》的声明中，呼吁利用纷乱进行一场国际性的内战，并预测到沙皇制度的垮台。他在俄国的追随者因涉嫌叛国罪被捕。在对他们进行的审判中，辩护律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在不久的将来，他肯定对自己选择的被告而感到懊悔。[1]

在苏维埃统治时期，彼得格勒/列宁格勒，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酷的经历。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鄙视，首都从这里迁往莫斯科。它反复多次地被斯大林视为其实并不存在的反对派策划阴谋活动的中心。它首次失去了在革命群众中的重要地位，在大清洗中亦然。

1941—1944年，它成为德—苏战线的前沿地带，忍受了长达1000天难以描绘的寒冷与饥饿，死难者高达数百万人。[2] 尽管国家官员和军队保卫该城的战斗手段达三年之久，苏联当局却既未能也不想撤走或援助城内的居民。其结果是城内的居民每天遭受着考文垂与华沙犹太隔离区那种双重的灾难。与对街道上的尸体和科学工作者倒毙在试验室长凳上的描述相比，对市党部内狂饮欢宴的描述只不过增添了一笔无人性的记录。[3]

经历了每一次严峻考验的列宁格勒被频繁涌入的移民潮流所补充。“英雄城”成为人类再生能力的象征。还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前夕，该城第三次更名的问题提了出来。出于对共产主义老战士的恐惧，公民们投票决定，既不叫列宁格勒，也不叫彼得格勒，而叫圣彼得堡。

当时，在巴尔干战场上，数量上居优势的奥地利军队稳固地占据了上风。他们占领了贝尔格莱德（1915年10月）、黑山和阿尔巴尼亚（1916年）。一支英勇的塞尔维亚军队翻山越岭向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的撤退，竟成为传说的素材。1915年，塞尔维亚人被围困在马其顿，受到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的联合进攻。但是，马其顿防线守住了，这部分归功于经色萨洛尼卡（Thessalonika）（萨洛尼卡）赶来支援的法军。西欧强国冷酷无情的压力迫使希腊政府垮台，希腊的中立也宣告终结。[**弗罗拉**]

[908]

弗罗拉（FLORA）

1914年8月末，教士苏弗尔克（Suffolk）35岁的女儿，弗罗拉·桑德斯（Flora Sandes）带着七个伙伴来到塞尔维亚（Serbian）城镇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克拉古耶瓦茨距贝尔格莱德（Belgrade）大约50英里，是塞尔维亚军队保卫首都、反抗奥匈军队进攻的主要基地。弗罗拉的小组走在塞尔维亚救济基金会（Serbian Relief Fund）委派的几个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的医疗队前面。1915年4月中旬，她们由梅布尔·圣克莱尔·斯托巴尔特（Mabel St Clair Stobart）夫人组织起来，这位令人钦佩的夫人在上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组建了一支妇女伤病员运送队。现在，她来自萨洛尼卡（Salonica），统领着一支由70名身强力壮成员组成的野战医院队伍，除去她的丈夫司库约翰·格林哈尔夫（John Green-

halgh）以外，全体成员都是女性。她借助一支特殊的“飞行纵队”来搜寻伤员，她骑马为他们带路。600多名英国妇女志愿队活跃在塞尔维亚。

在所有的妇女战时组织中，英国妇女医疗服务队无疑是最具专业化的。著名的苏格兰妇女医院（SWH），在她们的创办者爱丁堡（Edinburgh）外科医生爱尔西·英格里斯（Elsie Inglis）之后，她们开始证明女性能够妥善处理艰巨事业的最紧张和责任最强的事物。她们及时地派出14个设备齐全的医院到盟军驻扎的各个前沿，除去英国控制区。圣克莱尔·斯托巴尔特夫人在出航前往塞尔维亚之前，在切尔堡（Cherbourg）和安特卫普（Antwerp）工作。英格里斯医生于一年后的1917年11月在俄罗斯去世。[1] 在那些年代里，女外科医生仍然是一种新事物，尤其是在军事医院里。一位曾要求观看英格里斯医生工作的法国记者，出来时显得脸色发青，喊道：“是真的，是她动的手术！”[2]

1915年10月，当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突破防线后，塞尔维亚军队只能在冬季翻过山脉向阿尔巴尼亚沿海撤退。这次可怕的行军由于泥泞、大雪、饥饿、霜冻、伤寒以及炭疽，夺去了4万人的生命。斯托巴尔特夫人的团队一直同军队行进在一起。

在所有的志愿者当中，弗罗拉·桑德斯（1879—1961年）在她性别颠倒的生涯中走得最远。她参加了塞尔维亚陆军，是活着转移到阿尔巴尼亚的幸存者，直接参加战斗，身负重伤，因作战勇敢而获勋章。战争结束时，她晋升为军官。她后来同俄国移民结婚，定居在贝尔格莱德。她因公然蔑视盖世太保，只能返回英国寡居。[3] 她穿着东欧传统服装，从俄国到波兰再到阿尔巴尼亚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这些地方妇女们在艰难时期分担了大量死去的男性的工作。

影响英国妇女决心的一个因素取决于本国政府的态度。当爱尔西·英格里斯于1914年8月要求从苏格兰妇女医院调至陆军部工作时，她被告知：“我的好女士，回家待着吧。”[4]

在地中海，西方列强掌握着海上霸权，并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以打破在法国的僵持局面。1915年4月25日，一支英国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Gallipoli）登陆，目的是攻占君士坦丁堡，以便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按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此举乃是攻击中欧强国的“软肋”。这个计划构想得非常完美，其结局却是一场悲剧。由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雄的澳新军团组成的远

征军，其行动事先被泄漏。由精力旺盛的青年军官凯末尔·帕夏（Kemal Pasha）率领的土耳其军队正在悬崖顶上等候英军。从那以后，西方列强的行动就限制在奥斯曼帝国外围。一位年轻的英国幻想家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只身一人到阿拉伯半岛去煽动当地部落反抗奥斯曼帝国。法国人在黎巴嫩确立了统治地位。1916年，艾伦比（Allenby）将军率部从埃及的英军基地挺进至巴勒斯坦，在圣诞节那天骑马进入耶路撒冷。英军还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1917年3月，英军在经历了耻辱的失败后攻取了巴格达，并且紧逼波斯。阿拉伯人和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均受到英军胜利的鼓舞。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被说服发表一个宣言，接受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原则。在高加索，俄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多山的亚美尼亚边境地带进行拉锯战。战争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报复其亚美尼亚居民提供了机会。[**种族灭绝**]

[909]

种族灭绝（GENOCIDE）

1915年5月27日，土耳其政府判处东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应被强行放逐。作为基督教徒的亚美尼亚人，被怀疑同情帝国在高加索（Caucasian）战线的敌人俄罗斯，并计划建立俄罗斯帝国保护下的统一的亚美尼亚国家。大约二三百万人受到影响。虽然报道各有不同，但是据认为，这些亚美尼亚人中的三分之一遭到屠杀，三分之一遭到放逐的惩罚，只有三分之一幸存下来。这一事件常常被称为是现代种族灭绝的第一个例证。在1920年签署的色佛尔（Sevres）条约中，协约国承认统一的亚美尼亚是一个独立共和国。但在实践中，他们听任这个国家被苏俄和土耳其瓜分。[1]

阿道夫·希特勒充分地领悟了亚美尼亚人的先例。当他在上萨尔茨堡（Obersalzburg）向即将出发进攻波兰的将军们做最后指示时，他披露了自己对波兰民族的计划："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按照自己的意志愉悦地杀死了上百万的妇女和男人。历史反而视他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缔造者……我派出我的骷髅部队（Death's Head）去东方，并命令他们毫不留情地杀死波兰种族的或讲波兰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只有凭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获取我们所需要的生存空间。毕竟，今天谁还会谈论亚美尼亚人被大量歼灭的事呢？"[2]

无论如何，"种族灭绝"这个词在1944年前没有使用，这个

词是犹太血统的波兰律师拉瓦乌·莱姆金（Rafal Lemkin）（1901—1959年）创造的，当时他正在美国工作。莱姆金参加的揭露出波兰和波兰犹太人实际命运的运动于1948年成功地为联合国《预防和惩罚种族灭绝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Genocide）所承认。[3] 不幸的是，前南斯拉夫发生的战争显示出，该公约本身既未能预防也不曾惩罚种族灭绝。

在意大利，奥地利人加入到大陆边缘交通不便的高山地带的战役中，其时意大利人正在对这些地方提出领土要求。双方在伊松佐（Isonzo）河畔进行了11次规模庞大的战役，战斗中的伤亡毫不逊于在西方的战争。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战役中，阵亡人数达到50万（1917年9—12月）。意大利的伤亡人数与英国相当。意大利从灾难边缘令人惊讶地恢复大大削弱了中欧强国。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境内被击溃。意大利人的牺牲被其盟国大大低估，使意大利人的自尊深深地[909]受到伤害。

在列强的各个殖民地，每一个参战国的海外军事基地都感到有必要支持自己的宗主国。法国和德国在遥远的喀麦隆开战。英国则夺取了德属东非（坦噶尼喀）和德属西南非洲。在这场不平等的竞争中，较弱的德国一方总体上显得比对手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德国驻东非的军队在保罗·冯·莱托夫—沃尔贝克（Paul von Lettow - Vorbeck）（1870—1964年）统领下一直坚持到停战，实力基本未受损失。

在海上，战争在理论上本应在准备战斗的战列舰之间产生一系列全方位的竞争。实际上，在法国舰队开赴地中海之时，德国舰队经过[910]在日德兰半岛同英国海军一次不分胜负的战斗后（1916年5月31日），返回了本国港口。英国人表面上宣称他们控制了海洋，却未能应付德国从基尔港和不来梅港出击的潜艇，它们总计击沉了协约国1200万吨的舰只。英国在北海实施了无限制的潜艇战，英国人的封锁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但是英国也面临严重的损失。1915年5月7日，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U20号潜艇击沉，随后，德国又将其无限制的潜艇战扩大至大西洋（1917年），导致美国结束中立。

大战进入第三年，战争的后果开始反映到政治方面。在都柏林，1916年发生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被暴力镇压下去。在伦敦，常规的政党政府为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组成的战时联合内阁所取代（1916年）。与此同时，在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Francis - Joseph）的逝世显示出一种神秘的凶兆。1917年3月召开的

帝国议会第一次战时会议粉碎了捷克人自治的要求和单独讲和的传言。在法国，此起彼伏的士兵哗变导致一场持久的政治危机，最终以新任总司令贝当元帅（Marshal Petain）和新任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联手控制了国家权力。在德国，皇帝1917年的复活节公告（咨文）提议进行民主改革；到了7月，帝国议会所有在1914年投票支持战争的政党全都投票赞同停战议和。在东线，同俄国单独讲和的尝试失败之后，奥匈帝国重建了一个傀儡——首都设在华沙的波兰王国。这个王国没有国王，只有一个不设摄政王的摄政会议。该王国与普鲁士、奥地利或布格河（Bug）以东的波兰诸省没有任何关联。波兰王国的组建不久即因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团的解体而终止。毕苏斯基拒绝向德皇宣誓效忠。在俄国，发生了革命。在美国，产生了战争冲动。[懦夫] [莉莉]

[911]

懦夫（COWARD）

1916年10月18日上午6点，在西线的卡诺伊（Carnoy），西约克夏团（West Yorkshire Regiment）的二等兵哈里·法尔（Harry Farr）被一个英军行刑队处决。作为一个具有六年服役期的志愿兵，而不是新兵，两次因炮弹休克症而从前线撤回来。当他第三次休克时，战地医院拒绝为他治疗，因为他没有伤口，班长在抵制了一阵后将他护送到战壕里，他遭到逮捕。他反复地说："我受不了啦。"在军事法庭上，第14军总指挥称，懦夫的罪名似乎已经明确。总司令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也肯定了这一点。

法尔的遗孀格特露德（Gertrude）及时地收到了一封寄自陆军部的信："亲爱的夫人，我们遗憾地通知你，你丈夫已死去。他因逃兵罪被判死刑并于10月16日黎明执行死刑。"她既未收到战争寡妇年金也未得到对其女儿的补贴。她只收到教区牧师转发团队牧师的一封电报。"告诉他的妻子他并非懦夫。一个优秀的士兵从来不会活着。"她活到99岁并看到军事法庭的那份判决书，直到1992年判决书才被英国公共档案局公开。

二等兵法尔是1914—1918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3080名英军士兵之一，他们的主要罪名是开小差，也是307名未获缓期执行的士兵之一。在一起类似的案件中，道格拉斯·海格在驳回一份要求宽恕的申请时在备忘录中写道："如果这份申请获准，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获胜？"[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0万名英军士兵开小差，但没有一人被枪决。至于红军或德军的逃兵，被抓回来就没这么幸运了。

[912]

莉莉（LILI）

1915年，波兰中部地区的东部战线，某时，某地，一个年轻的德军卫兵梦见回家。汉斯·莱普（Hans Leip）想象着他的两个女朋友——莉莉和玛莲，同他一起站在营房门口的灯下，他用口哨吹出一支歌曲以自娱，他创造出一支伤感的曲调，随后又迅即忘掉了它。20年以后在柏林，他回忆起这首曲调，并补充进一些诗句，把上述两个姑娘的名字融入其中。诺伯特·舒尔兹（Norbert Schultz）为它谱曲后，1937年发表了这首歌。内战期间，柏林成为卡巴莱歌舞和流行歌曲的主要中心之一。但是，这首《孤独的哨兵之歌》未能获得成功。[1]

1941年，当德军占领南斯拉夫之后，贝尔格莱德电台功率强大的发射机被占领军征用。在该电台储存的二手唱片中有一张战前录制的汉斯·莱普写的歌。碰巧，贝尔格莱德的夜间音乐宣传能够被巴尔干半岛之外的北非收听到，无论是隆美尔的德军还是有“沙漠之鼠”称号的英军第8军都能收听到。这一次，雷尔·安德森（Lale Andersen）的声音飘浮在地中海星光照耀的苍穹下，使倾听的士兵们如痴如醉。歌词不久就被译成英语，又由安妮·谢尔顿（Anne Shelton）录音。围攻托布鲁克（Tobruk）之后，当一列英军战俘穿过德国非洲军团的战线时，两边都唱起了同一曲调：

莉莉·玛莲
在兵营雄伟的大门前，
那里有一盏路灯。
你每夜痴痴地等候。
在灯下你温柔地低语，
你爱我，永远爱我，
我的莉莉，我亲爱的莉莉·玛莲

当美国参战后，《莉莉·玛莲》由玛琳·迪特里希（Marlene Di-

etrich）接过来演唱。它穿越了各条战线。[2]

《秋叶》（Les Feuilles mortes）成曲于1943年战争期间的巴黎，那里每个人的口中都在唱着《莉莉·玛莲》。《秋叶》悲喜交加的歌[913]词是雅克·培维尔（Jacques Prévert）写下的，令人萦绕心头的旋律则是约瑟夫·科斯马（Joseph Kosma）谱写的。它的不可分离的情侣的主题，或许会再一次感动千百万人的心。但是简·加宾（Jean Gabin）受委托为其摄制的影片被取消了，这首歌也从未发表。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秋叶》才得以再次被发现，但是社会和政治气候都已经改变；此外，英语歌词也失去了原来的韵味：

窗外落叶随风飘扬，
秋叶有红有黄。
我看见你的双唇，
夏日的吻依旧其上，
我常常举起晒黑的手，
因为你的离去，
日子变得漫长。
不久我将听到去冬的歌，
但我永远失去了你，我亲爱的
其时秋叶已开始飞扬。

海岸边的波浪何在，还有情人的脚印消失在沙滩上？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秋叶》的传播是无法制止的。[3]

在二战后的时代，流行歌曲领导了美国文化潮流——不论其优劣、差异——并传遍了全欧洲。英美歌曲穿越大西洋的声音注定要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它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引起了美好的回忆，在那不勒斯，在华沙，在巴黎，还有在莫斯科，故乡的方言保留了它们的精华：

[914]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
我想开口讲，不知怎样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4]

奥地利年轻的王储（和平皇帝）亲自领导同协约国的一系列秘密谈判。1917年春，在瑞士，他两次会见他的连襟——波旁—帕尔马

的圣西克斯图斯大公（Prince Sixtus），一位充当奥匈帝国与英法谈判中间人的比利时现役军官。王储还准备向意大利割让领土，接受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宣言。然而，他既未说服意大利人，又未说服法国人，他只有能力影响柏林。当克列孟梭最终公开关系时，王储被迫向德皇臣服。从此，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同德国的军事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奥匈帝国内各民族和平发展的全部希望都被击碎了。[5]

美国公众推进和平的愿望使美国于 1917 年 4 月 6 日卷入战争。美国第 28 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 年），一位来自东海岸的自由主义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因其中立的政见于 1916 年 11 月再度当选为总统；他的代表豪斯[911]（Colonel House）上校访问了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直到 1917 年 1 月，威尔逊的合众国演讲还在呼吁“不分胜负的和平”。然而，美国的海运经济当时正遭到德国潜艇的致命威胁；而且德国拉拢墨西哥的拙劣方案在 1917 年 2 月齐默尔曼电报中披露出来，这终于消除了所有的疑虑。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公开对抗英、法的秘密外交。他的 14 点计划（1918 年 1 月）给盟国的战争目标提供了一致性和可信性。他特别强调民族自决的原则，并公正地付诸实施。由于伊格纳奇·帕德莱夫斯基（Ignacy Paderewski）在白宫举办的音乐晚会，威尔逊将波兰的独立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

综观之，1917 年的变化还是在盟国阵营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忧虑。目前，美国参战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俄国的混乱所抵消。协约国在得到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伙伴的同时失去了其在幅员方面最强大的伙伴。在美国的劳动力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重要性被人们认识到之前，12[914]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由于俄国的抵抗失去势头，德奥得以从东向西不断转移自己的资源。战争的结局看来取决于美国战争动员的结果和俄国革命的结果在时间方面的竞赛。

1917 年爆发的俄国革命由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链条的崩溃构成。这两次政治迸发——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及第二次的十月革命或者说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政变——伴随着足以深深动摇帝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大变革，还伴随着一场各个非俄罗斯民族国家民族起义的大雪崩。这些被兼并到沙皇俄国的非俄罗斯民族国家现在抓住了民族独立的良机。

推行战争的结果是戏剧性的。1917 年 2 月中旬，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帝依然操纵着欧洲最大的战争机器。在 12 个月之内罗曼诺夫家族就被消灭了；他们的帝国分裂为一系列自治的国家；而只占有

中央一小部分地区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一劳永逸地摆脱了战争。按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停战协定，所有俄方实际的参战者于1917年12月6日停止战争。德国既支持分离主义者的欲望，又纵容布尔什维克的阴谋的政策，获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

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不应简单地看作是革命的结果，而且也应视为革命的原因。早在布尔什维克专政明确其独立存在的意愿显露之前，俄国沙皇就丧失了其非俄罗斯臣民的效忠。当波兰各省因1915年德军的推进而丧失之时，帝国身居高位的波兰人政治家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曾一度倒向俄罗斯，尽管此后在西方强国的赞助下始终致力于波兰的独立。1916年8月，一个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其身居巴黎的主席领导下建立起来。在立陶宛，“塔利巴”（Taryba）[915]或称民族会议，在德国的赞助下于1917年9月建立。在芬兰，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不得不为自身的存在而战斗，在德国的帮助下，斗争从1917年中持续到1918年5月。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兴起与帝国势力的削弱一样迅速。1917年11月，一个乌克兰共和国在基辅宣告成立。根据1918年2月9日所谓的“面包协定”，乌克兰获得德、奥承认作为对获得合同的回报。在高加索，独立的泛高加索联邦同时成立。

面对这股自发的分离主义浪潮，设在彼得格勒的俄国继任政府除了屈服别无选择。1917年4月，临时政府宣布它支持民族独立。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治势力也如是。尽管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却无意承认各民族的独立。布尔什维克一旦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其民族事务首席委员——一位尚不引人注目的格鲁吉亚革命家J. V. 斯大林，就开始在每一个刚刚形成的民族共和国内组建布尔什维克党的分支机构，挑起反对每一个羽翼未丰的民族主义政府的种种事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力图以新的共产主义的外貌复辟已经灭亡的俄罗斯帝国。从一开始，他们就试图在文化自治和名义上的国家机构的幌子背后，把中央集权的一党专政强加给国民。这就是所谓“俄国内战”的主要潜在动因（见下文）。

因而，彼得格勒的革命是针对一个已经分崩离析的前国家中央政府而发动的。其直接原因在于沙皇宫廷的管理危机。沙皇本人不在前线，却错乱地以其判断失误的决定亲自指挥战争。国家杜马被忽视；沙皇的部长们被留给偏执狂的“德裔”皇后和她的江湖骗子宠臣，所谓的“疯子僧侣”格列高利·拉斯普京（Gregory Rasputin）（1872—1916年），任其摆布。当紧急的战时商业关注通货膨胀、食品短缺和军队供给被忽略时，沙皇核心圈子的成员们造反了。拉斯普京被谋杀，凶手是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大公（Prince Felix Yusupov），他是俄国最富有的妇人之子，是沙皇侄女的丈夫。在

其他情况下，该事件可能会作为一个小小的宫廷阴谋载入历史。事实上，它只是在摧毁整个制度的积怨中添加了最后一盎司。在宫廷政治之外，是数千万没有发言权的沙皇臣民——不满的知识分子，受挫的立宪主义者，困惑的官僚，无权的工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对生活和胜利均失去希望的士兵。俄国沙皇政府绚丽多彩的外壳挺立到最后一秒，随后便像一幢纸板房颓然倒下了。

从 1916 年 12 月 16 日拉斯普京被杀到布尔什维克 10 个月后夺取政权，这一系列事件是极端残酷和完全无计划的。在 2 月下旬，那摧毁食品供应的严冬一下子又转变为提前到来的明媚春光。成千上万为争取和平、面包、土地、自由的罢工者和游行示威者源源不断地涌上彼得格勒的街头。2 月 26 日，在兹纳门斯基广场，帝国近卫军的一[916]个连队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枪。次日，由 16 万被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首都卫队发生兵变并参加了暴动。沙皇的将军们互相推卸责任。国家杜马竟敢于任命一个不包括其本身在内的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们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或称“工人代表”和“士兵代表”会议。

在这种状况下，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国家杜马不得不致力于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竞争。每一方都做出了重大的决定。3 月 1 日，苏维埃单方面发布了第一号法令，号召每支部队选举自己的苏维埃。军官团的权威在军队中一下子就被破坏了。3 月 2 日，临时政府发表 8 点纲领，要求建立公开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由民兵取代国家警察。俄罗斯警察和地方官员的权威被一举削弱。俄罗斯帝国因一纸电报而崩溃。当晚，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宣布退位。

国家杜马中的立宪自由主义者同苏维埃中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一个对抗布尔什维克的不稳定的同盟，因而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暂时保持平稳。此中的核心人物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1881—1970 年），一位社会主义者和律师，他既是临时政府的成员，又是苏维埃代表。然而，前者主张继续参加世界大战的政策极不得人心。他们只是成功地煽动起连续不断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证明对更激进分子非常适宜。临时政府宣布了自己呼吁通过普选产生立宪会议，以使俄国的民主置于持久的基础上的意图。此举促使布尔什维克提出了自己的时间表：为了抓住任何统治俄罗斯的机会，他们必须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控制苏维埃并推翻临时政府。[**法蒂玛**]

在列宁于 4 月份返回彼得格勒前，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事件中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但是，春季和夏季不断恶化的形势为训练有素的颠覆分子创造了难得的环境。在 4 月、6 月、7 月的三次机会中，他们

试图利用自己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将街头的示威游行转变为武装起义。在最后一次机会中，临时政府以勾结德国"叛国罪"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被迫隐蔽到郊外。然而，在8月和9月，临时政府由于同拉弗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统率的军队发生冲突而陷于瘫痪。科尔尼洛夫流产的政变使列宁推迟了组织起义的计划。

[917]

法蒂玛（FATIMA）

1917年5月3日，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期，教皇本尼迪克十五世（Benedict XV）吁请圣母玛利亚祝福和平事业。十天之后，三个从未受过教育的儿童报告，圣母在葡萄牙的法蒂玛村外显圣。他们听到她说，她现在是罗萨利（Rosary）女士，反对基督教的人即将来到，应在当地建造一座用于祈祷的小教堂。不久以后，三个孩子之中的露西娅·多斯·桑托斯（Lucia dos Santos）泄露了天机，她说圣母的预言指的是俄罗斯：

"我将用我圣洁的心为俄罗斯祈祷。如果我的请求被人们听见，俄罗斯将发生转变，那里将出现和平。如果相反，她将把她的谬误散布到整个世界，引起战争，导致教堂被破坏……但到最后，我圣洁的心将获胜。"[1]

对圣母玛利亚的狂热崇拜经常同反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42年庇护十一世创立了圣母玛利亚的圣心节。1981年5月13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他对共产主义的垮台发挥了突出的个人作用，在罗马被一个想要成为杀手的人的子弹击倒。他向罗萨利圣母祈祷，恢复了健康，并参加了对法蒂玛村的朝圣。[2]

虔诚的基督教徒应当努力解读预言的奥秘。圣母显灵第一次载入记录的地点是舍瑙（Schonau）的伊丽莎白（Elizabeth）（1164年），以后在近现代持续出现。它们包括拉萨莱特（La Salette）（1846年）、卢尔德（Lourdes）（1854年）、蓬特梅因（Pontmain）（1871年）、玛尤（Mayo）的克诺克（Knock）（1879年）、比利时的班纳克斯（Banneux）（1933年）以及波斯尼亚的梅德尤果列（Medjugorje）（1981年）。在莫斯塔尔（Mostar）附近梅德尤果列的圣母显灵持续吸引了几千人来观看，但未能得到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确认。所有的观看者更为二战时大屠杀逼真场面的出现而激动，这预示了1992—1993年波斯尼亚发生的战争恐怖。[3][伯纳黛特][圣母像]

当列宁于十月初悄悄返回彼得格勒时，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被孤立并且威信扫地。军队出现了不满情绪；苏维埃分裂了。布尔什维克计划通过召开一个由来自各省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组成的类似的苏维埃会议，取代大彼得格勒苏维埃。与此同时，苏维埃的关键部门——革[917]命军事委员会，现在为布尔什维克所控制，能够迅速调集必要数量的士兵、水兵和武装工人，去实现苏维埃本身所不赞成的目的。托洛茨基（Trotsky）担任总司令。[**国家电影委员会**]

[918]

国家电影委员会（SOVKINO）

1917年10月24日，圣彼得堡各家电影院正在上映《沉寂的生活》（Silent Ornaments of Life）——一部集中反映奥勃伦斯基大公（Obolensky）与出身高贵的克劳迪娅（Claudia）和工于心计的奈丽（Nelly）之间复杂关系的心理分析式的歌剧。就在次日政权落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对电影艺术具有非常不同、非常明确的观点。列宁写道："在所有各种艺术中，对我们来说电影是最为重要的。"电影不是一种娱乐的工具而是一种对大众进行宣传的工具。因此，列宁在1919年签署了一项法令，把摄影和电影工业转归教育人民委员部。"苏维埃电影之友协会"应运而生，其缔造者不是别人，而是政治警察的首脑费利克斯·捷尔仁斯基。[1]

在路易·吕米埃尔（Louis Lumiere）发明的无声电影于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大咖啡店举行首映之后不久，俄罗斯电影就举行了首映式。俄罗斯的电影导演、纪录片制作者，电影厂商、影星以及像维拉·霍拉德娜娅（Vera Kholodnaya）这样的超酷明星纷纷到场。俄罗斯电影业的第一部故事片是一部历史剧——德兰科夫（Drankov）的《斯坚卡·拉辛》(Sten'ka Razin)（1908年）。1917年2月革命以后，出现了一个有关当代政治题材的轰动一时影片的短促活跃期，诸如《戈里沙·拉斯普京越轨的爱情》（Grisha Rasputin's Amorous Escapades)。在布尔什维克执政时期，所有这类轻薄的题材都被加以禁止。

布尔什维克并不掩饰他们要把电影转变为党的工具的计划。为此目的，他们首先必须摧毁现存的机构。在《电影院—Fot》(Kino - Fot)（1922年）中，诗人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aky）写下如下诗句，似乎他是按照宣传鼓动部门下达的命令而写的：

对你而言，它是一部电影，

对我而言，它几乎是整个世界观！
电影——流动的精神食粮
电影——文学的复兴者
电影——审美的消灭者
电影——象征着无畏
电影——是位运动员
电影——是思想的播种者。
但是，电影又是虚弱的，资本主义
以黄金遮盖了它的双眼……
共产主义者必须把电影
从投机商手中解救出来。[2]

经过几年的无序状态后，国家电影委员会（全称：全俄摄影电影“苏联电影”股份公司——译者注），缩写为SOVKINO，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运转起来。即使到那时，它仍未取得预期的成就，直到30年代它完全附属于斯大林主义的计划为止。

苏联电影史上，相当多的题材表现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人物。然而，在黑暗之中也存在一道[919]道闪电——其中之一与60年代一批“解冻”的杰出作品有关，当时邦达尔丘克（Bondarchuk）的《战争与和平》或是卡拉托佐夫（Kalatozov）的《雁南飞》（The Cranes are Flying）得以上映，其他更多的影片则与天才的导演们尤其是爱森斯坦有关。

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年），是里加总设计师之子，属于沙皇时期上流社会富有青年中的一员，这些人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布尔什维克安排。他才华横溢的技巧之外，还具有明确的思想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表达历史发展潮流不可抗拒的思想。他仅拍摄了6部影片；在每一部影片中，人类的集体事业均被置于优先地位。

在他的第一部影片《罢工》（1925年）中，爱森斯坦描绘了劳动大军领悟到自己力量的意义后的激情。他也讽刺了老板们像“鳄鱼”一样凶残的嘴脸。在《战舰“波将金”号》（1926年）中，该片渲染了1905年革命中的一个真实事件，集中反映了全体船员的激情和普通民众的压抑。在“敖德萨阶梯”一场中，一队哥萨克骑兵屠杀无辜的抗议者的画面，肯定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场面之一。在《十月》（1927年）中，他庆祝布尔什维克政变十周年，

再次通过攻克冬宫这一最振奋人心（但是凭想象制作的）的精彩的场面来突出体现工农大众的作用（见原书第920页）。在《旧与新》（1929年）一片中，他描绘了农民的集体生活。

当爱森斯坦经过几年国外生涯返回俄国后，便致力于更为久远的历史题材。他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年）是一部表现即将同德国发生又一次冲突的预言式探索。中世纪冰上大战的场景，其中形状怪诞的条顿骑士因自己穿戴的盔甲沉重而成批地倒在地上，它成为五年后发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可思议的寓言。影片《伊凡雷帝》（1945年）上映时，斯大林还健在并且观看了该片——他是一位热心的影迷——此举奠定了爱森斯坦至高无上的地位。

爱森斯坦的影片证明伟大的艺术与公开的宣传是无法共存的。实际上，正如宗教艺术一样，当要义明确时，观众便会全神贯注地接受其传递的思想。

在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期间，《战舰"波将金"号》在世界12部最佳影片中得票名列第一。[**波将金**]

在10月25日夜间，该计划付诸实施。布尔什维克纠察队包围了临时政府的所有建筑物，而对方竟毫无反应。10月26日上午10点，列宁发布新闻：

告全国公民书

临时政府已被废黜。政府职权已落入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彼得格勒无产者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人民群众为之奋斗[919]的目标得到保证——立即实现民主和平，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工人管理生产，创建苏维埃政府。工农兵革命万岁![6]

实际上，上述宣言中的每一个词都是虚伪的或骗人的。但这却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准确估计的那样，整个首都无人奋力反对他们。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仍旧蜷缩在冬宫内，等待着根本不可[920]能到来的救援。帝国军队毫无踪影。晚9时，"阿芙乐尔"（Aurora）巡洋舰上的布尔什维克水兵向冬宫射出一发空炮弹。晚11点左右，彼得和保罗要塞落入了30来发炮弹，其中两发击中了目标。绝大多数政府卫兵刚刚撤离；起义者开进冬宫时发现并无人抵抗。所谓"攻占冬宫"其实是后来杜撰出来的。清晨2时30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宣告投降。就在此刻，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他们并

不打算在那里停留。列宁在早晨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匆匆露了一面，他欢呼“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甚至不是一场彼得格勒社会主义者发动的起义。在10月26日宣言的原稿中，列宁曾以“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但后来他删除了此句。这并不是否认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是彻底的革命者。一旦掌握了政权，他们便着手清除旧俄国的根基和分支。在1917—1921年列宁执政时期，甚至在1929年斯大林之前，他们几乎重塑了俄罗斯生活的每一个侧面。但是，他们做到这一点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进行的；无视俄罗斯居于主流的激进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他们的方法同来自基层的自发革命毫无共同之处，但在他们的教科书中却说这是一场来自基层的自发革命。

布尔什维克起义的直接结果概括为三个著名的“法令”，列宁于10月26日晚将其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三个法令没有一个完全说明其意图是什么。和平法令实际上只是一个私下要求列强停战三个月的呼吁。土地法要求把土地的私人所有权转变为乡村公社所有。它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拔高，与此前（和以后）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完全不相协调，后者支持把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政府法令创设了由列宁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同时宣布该法令要得到未来的立宪会议的批准。在每一点上列宁均肆意施展诡辩术。通过12月的停战协议及1918年3月3日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而实现的国际和平，被布尔什维克用来对国内敌人发动全力以赴的战争。授予农民土地是一个及时的策略，它在关键时刻平息了俄国最大阶级的怒火。这场怒火不久即因一场大张旗鼓的“对村庄的战争”而熊熊燃烧起来，当时布尔什维克对价格和食品贸易强制实行国家垄断。

表示召开立宪会议纯粹是机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为召开立宪会议而进行的全国选举是临时政府原先的设想。选举于11月下半月如期举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候选人获得了24%的选票。在这次苏联历史上惟一的自由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取得明显的胜利，他们获得40.4%的选票。但这点小事挡不住列宁。他允许立宪会议在1918年1[921]月5日开幕，随后就粗暴地将其解散。在1月6日上午三四点之间，大会主席和社会革命党领袖维克托·切尔诺夫（Victor Chernov）（1873—1952年）正试图通过一项废除土地私有的法令，这时，一个水手、布尔什维克的卫队司令拍拍他的肩膀并宣布：“我奉命通知你，所有代表都应离开议会大厦，因为卫兵们都疲倦了。”[7] 从那一刻起，俄罗斯被迫陷入一场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死亡的俄国人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东线的阵亡者还多（见原书附录Ⅲ，第1320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1918年，以德奥军队拟议中毕其功于一役的攻势为开端，又以他们的全线撤退而告终。东线已不复存在；多山的意大利战线陷于僵持状态。这样，所有的战事又转向西线。从3月到7月，德军总司令把后备部队投入战场。他们并非没有成就。在英军战区，德军向亚眠以南推进了大约35英里。在中部战场，德军再次挺进到马恩河。然而，他们既未摧毁英法联军的战线，也没有动摇其斗志。7月，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贝当将军的“弹性防御”表明，攻击一方并不具备决定性的进攻优势。随后在8月8日——“德军的黑色星期五”，456辆英军坦克冲破德军防线，一天就收复了陷入敌手的35英里战线中的8英里。一周之后，德、奥两国的皇帝分别被各自的将军们告知：必须结束战争。9月和10月，在西线的东段，美军终于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首先是在圣米耶尔，在那里，他们清除了西线最大的敌方突出部，然后是在阿尔贡。德军的战线从未被突破；他们也没有感到失败。在10月3日，他们很难向美国总统威尔逊传送一份停战提议。[敌意]

[922]

敌意（HATRED）

1918年8月3日那一天，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来到圣玛格丽特（St Margarets）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大教堂，向国王和王后以及各部大臣、两院议员布道。布道会中许多人可能已经知道，大主教本人又要抗议本国政府战时政策的道德准则。他现在讲的话使许多人陷于窘境。他用一种柔和的苏格兰口音讲道：“有一种形式的愤怒，它能够使人们退化到恶毒的仇恨中，而这恰恰走到了一个基督教徒信念准则的反面。”作为向万能的主起誓过的信徒，万能的主因所有恨他的人而死于十字架上，我们必须保证仇恨的精神没有在我们心中滋长。”[1] 在他一旁，大主教的助理牧师和他最后的传记作者是雷乌德·乔治·拜尔（Revd George Bell）（1883—1958年），未来的齐切斯特主教。得到指引之后，牧师必然成长为欧洲新教的“基督教国际主义”的主要鼓吹者。[2]

拜尔主教不太可能是个国际主义者。他说话不带一个外国字。但是，他坚定地把握基督教的原则，而且有勇气表现出来。在大战后的岁月里，他受到乌普萨拉（Uppsala）大主教内森·索德布罗姆（Nathan Soderblom）的强烈影响，后者是瑞典的路德教徒，曾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Leipzig）任教授。1919年，他出席了讨论战争罪行的荷兰（Holland）瓦塞纳尔（Wassenaar）会议；1925年他帮助组织了有关基督教徒“生活与工作”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会议，它为后来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播下了种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作为环球基督教徒生活与工作（UCCLW）大会主席，拜尔面临着纳粹暴政压制下的德国教会问题。1935年，他强调公开解决抗议书问题；他代表“坦诚的教会”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德国）帝国主教缪勒（Muller），并且亲自在齐切斯特接见了愤怒的冯·里宾特洛甫。拜尔在诺维萨德（Novi Sad）（1933年）和法诺（Fano）（1934年）组织的世界教会工作和生活大会（UCCLW）为1937年的牛津大会铺平了道路，该次大会联合了一些普世基督教会团体，认识到了来自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方面极权主义的挑战，见到了牛津团体发动的“道德的重新武装”。

由于战争临近，拜尔主教大无畏地讲出了自己的思想。1939年6月，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他发表了“上帝高于民族”的演讲，谴责“明目张胆”地坚持国家主权和“被集体的利己主义造成的大破坏”。[3] 在11月里，他出版了《战争时期的教会职能》（The Church's Function in Wartime）一书：

“如果教会忽略了它在某一国家的教友与其他国家的教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它将不成其为教会。[教会] 必须……谴责本国军队进行的报复性暴力行为或轰炸。它自己应反对进行鼓吹欺骗和仇恨的宣传。它应准备促进同敌国恢复友好关系。它应该反对任何旨在灭绝或奴役人民的战争，反对任何直接破坏一国人民道德的措施……”[4]

这些原则不受欢迎，至少不被女王陛下的政府或他的教区全体教徒所欢迎。但是这些原则被上院反对拘留外国人（1940年8月）、反对“忘却轰炸”（1944年2月9日）和反对使用核炸弹[ALTMARKT] 的历次讲话所遵循。对盟国的轰炸攻势，他没有使用委婉的词语：

“已经不再有轰炸机要轰炸的防卫、军事和工业目标了。但是整座城镇……被抹掉了。当这市民、纪念碑和工业目标全部成为打击的靶子之时，将怎么能辨别这些目标呢？”[5]

1942 年 7 月，主教进行了一次危险的飞行，去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会见来自德国的基督教抵抗运动的成员。他请求作为盟国代表的呼吁遭到抵制。但是，本霍菲尔（Bonhoffer）神父从纳粹监狱的死囚牢房中偷偷给乔治·拜尔捎出他最后的信息。在信中他说："告诉他……同他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共同的基督教兄弟情谊的原则，并且我们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6]

"基督教的欧洲"永远是拜尔对未来的最崇高的思想。拜尔曾经质问轰炸攻势的鼓吹者："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为欧洲各国人民的未来关系储存后果吗?"在 1945 年战后对德国的一次广播中，他呼吁"欧洲精神"：

"今天，基本目标之一……应该是基督教世界的复苏。我们期待看到欧洲作为基督教世界……没有民族、没有教会、没有个体是无罪的。没有悔改，没有宽恕，也就不能有新生。"[7]

在被经济学家们抢走之前，在战后欧洲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些思想就具有了最突出的地位。（见原书附录Ⅲ，第 1064—1066 页）。乔治·拜尔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中发挥了独特和突出的作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于 1948 年 8 月 22 日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贡塞特格布夫（Concertgebouw）举行——距戴维森大主教的威斯敏斯特布道会几乎刚好三十年。

1918 年 10 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和平气氛对德、奥的打击甚至比已进行了四年的战争更严厉。从次要战线传来的都是令同盟军沮丧的消息。对马其顿的联合进攻已经获胜，保加利亚刚刚溃败。在巴勒斯坦，英军最终在卡麦尔山（Carmel）附近的麦吉多（Megiddo）取得战役的胜利；土耳其正在求和。在意大利，经过对皮亚韦（Piave）最后一次流产的攻势后，奥匈军队停止了战斗。欧洲人人皆知，优势在协约国一方，和平的触角伸出了，继续抵抗只能延长痛苦。究竟何时军队才能亲自掌握事态的发展。在东部，无所事事的德奥卫戍部队模仿俄国的苏维埃到处建立士兵代表会议。奥地利军队由于捷克、波兰、克罗地亚、匈牙利甚至德军团队的逃亡而土崩瓦解。德军团队明确决定回家。每个人都在要求本民族获得独立。10 月 20 日，当一个德国人—奥地利人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准备建立奥地利共和国时，游戏显然结束了。皇帝查理与哈布斯堡王朝 500 年的统治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若干前所未知的国家相继宣告独立：捷克斯洛伐克

(10 月 28 日)、南斯拉夫(10 月 29 日)、匈牙利(11 月 1 日)和建都于伦贝格(Lemberg)的西乌克兰共和国(11 月 1 日)。[维查库夫]

[924]

维查库夫(ŁYCZAKÓW)

1918 年 11 月 24 日,三个年轻人在举行了天主教的仪式后被埋葬在利沃夫(Lwow/L'viv)近郊的维查库夫一个特殊的军事地带。他们是 23 岁的齐格莱特·门泽尔(Zygmunt Menzel)、19 岁的约瑟夫·库尔代班(Jozef Kurdyban)和 21 岁的费利齐亚·苏利米尔斯卡(Felicja Sulimirska),他们三人均死于波兰和乌克兰人为争夺奥地利加利西亚前首府的战斗中。它是数千个墓地中的第一个,它迁葬了原来埋葬在各个公园里和广场临时墓地中战死的波兰人的遗骸,它成为"利沃夫保卫者之墓"的起始点,"年轻的雄鹰"之墓。[1] 墓地中埋葬的最年轻者恐怕就是战死的安托什·佩特雷切维奇(Antos Petrykiewicz),年仅 13 岁。

如同十九世纪欧洲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墓地一样,维查库夫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和艺术博物馆。像巴黎的拉雪兹公墓(Pere Lachaise)或伦敦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那样,森林环绕着它的装饰着雕像的家族陵墓,这些家族曾经使主要城市的发展富有活力。两小块独立的土地上林立着一排排简单的十字架,它们是 1830—1863 年起义中战死的波兰士兵的墓地标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好几百个像维查库夫那样的军人墓地,尤其是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维查库夫建于波兰统治时期的 1919—1934 年,一个侧面环绕着石狮和半圆形廊柱的高耸的凯旋门俯瞰着它。中央的拱门上端铭刻着这样的词句:他们死了,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活着;众狮子举着的盾牌上刻着城市的箴言:"永远忠诚"和"献给你,波兰"。在墓地后面矗立着一座带拱顶的地下室,它侧面的台阶可通向圆形拱顶的小教堂。整个建筑物被常绿灌木丛装饰,被青铜灯台所照耀。每一座单独的纪念碑都使人回忆起 1919—1920 年期间为保卫这座城市而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牺牲的波兹南(Posnanian)志愿军、法国步兵和美国水手们。[杜奥蒙特][兰格玛尔克]

如果当初维查库夫没有留下标志,其命运便会令人全无所知。在 1945 年后被苏联兼并的岁月里,墓地惨遭破坏和洗劫。十字架被拔掉,雕刻被玷污,墓碑被损坏,小教堂改作石匠的作坊。遗址由凶猛的狼狗看守,凭吊草木丛生的墓地要冒着被逮捕的风险。

墓地的衰落在秘密文件中有所记载；拜访者不会被认为是去瞻仰建立在墓地旁边的苏维埃战争纪念碑。直到 1989 年，由于华沙政府提出要求，墓地才得以恢复。

在西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墓地大多保存完好无损。在整个东欧，德国人、犹太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的墓地在共产党人各项运动的冲击下趋于荒芜。它们成为篡改历史的一个障碍。在 1918—1919 年的斗争中，战败的乌克兰人同他们的波兰敌人遭受到同样的伤亡。可是，利沃夫的乌克兰军人墓地在波兰人统治时期受到尊敬和管理。而在苏联人统治时期，它被人们遗忘了。

1991 年，作为西乌克兰最大的都市，利沃夫成为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第二大城市。1918—1919 年失败的噩梦依旧存在。长眠在维查库夫的波兰青年的希望最终破碎了。[**阿尔萨斯**]

和平情绪迅速蔓延到整个德国，并且对和平的要求迅即转变为对[925]德皇头颅的要求。帝国舰队在威廉港哗变。11 月 7 日，慕尼黑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9 日，柏林也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德意志共和国宣布成立。11 月 10 日，几天前已经宣布退位的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太子一起逃往荷兰。作为最后一招，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释放了最危险的波兰囚犯约瑟夫·毕苏斯基，并把他送上开往华沙的列车。毕苏斯基 11 月 11 日清晨回到故国，监督德国守备部队解除武装，出于对西方盟国的怨恨，他接管了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的政权。

因此，同盟国最终的垮台同俄国一样，与其说是彻底的军事失败，更不如说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崩溃。在东线多次获胜的德国军队，在西线也未受损失；它从未被赶回德国领土。但是，它与向其下达命令的政治当局产生了分歧。停战谈判从 11 月 8 日起在索瓦松（Soissons）附近的荷东德—苏尔—埃纳（Rethondes - sur - Aisne）举行。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 14 点建议外加协约国的 18 项附加条款为基础，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协议。18 项附加条款涉及从被占领土撤军，建立莱茵中立区，交出德国舰队、重武器和运输工具，支付赔款，以及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协约国如此苛刻地坚持投降条件，是为了他们能支配和平的条件。停战协定于 11 月 11 日上午 3 点在一列停驶的列车内签字，6 小时后开始生效。炮火于 11 月 11 日 11 时停止。

一千多万士兵阵亡，首当其冲的是结婚不久的青年男子或单身汉（见原书附录Ⅲ，第 1328—1329 页）。下级军官的死亡率特别高。他

们被称为“失去的一代”，意即“被牺牲者”。下级军官们在作战、伤亡方面的重荷只得由他们的家庭，尤其是女眷们承担。战争期间，大批妇女被征募去参加工作，以弥补那些士兵们留下的空缺。她们在军工厂、办公室以及许多此前长期对她们关闭的岗位工作——如有轨电车司机、管理人员或新闻工作者。对许多姑娘而言，这些变化为她们打开了通往社会解放之路，穿短裙、留短发和在公共场合吸烟就是这[926]种社会解放的象征。至少是在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妇女们前所未有地摆脱了家务和家庭的羁绊。变化反映在妇女选举权状况的广泛改善，但是社会和心理代价巨大。与这一代失去的青年男子相对应的是一代被遗弃的年轻寡妇和单身女子，她们命运的伙伴带着对她们的爱消失在战壕的泥泞中。人口损失和性别失衡必将产生长期的影响。

统计数据无法如此精确地反映每个家庭的经历。1918年9月5日，英国皇家空军第11联队第48战斗机中队来自兰开夏郡博尔顿（Bolton）的18岁空军少尉诺曼·戴维（Norman Davies），在他来到法国的次日，驾驶一架布里斯托尔战斗机坠毁在圣奥马尔（Saint - Omer）附近。对此事件的报告显示出，他的指挥官对飞机的损失比对飞行员的损失更关心。[8]1918年11月11日，还是博尔顿，博尔顿家庭在庆祝战争结束。次日，他们收到一份国王的电报，电报遗憾地通知，他们的长子、东兰开夏团11营19岁的二等兵詹姆斯·博尔顿（James Bolton）在停战前几分钟死去。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罗斯共有数百万个家庭遭受了同样的痛苦。

欧洲到处充斥着战后的难民——主要来自比利时、加利西亚和塞尔维亚。自中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之后，降临欧洲的最大一场瘟疫达到高峰期。“西班牙流感”夺去的生命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多，其中包括二等兵博尔顿。[**流行病**]欧洲变成了大规模外部救援的对象。国际红十字会和美国救援管理局面临一场空前规模的任务，特别是在东欧。

然而，说欧洲实现了和平是夸大其词。西欧赢得了某种喘息的机会；但在中东欧的广阔区域内，原有的一切秩序都被粉碎了。一批独立国家诞生了，其中的每一个都与邻国存在种种纷争。它们之中最大的苏联，不但同本国的绝大多数公民以及所有的邻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且作为煽动者到别处挑起各种革命事件。这样一来，当战胜的协约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求和解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继续陷于激烈的冲突之中。丘吉尔写道：“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终结，而小型战争刚刚开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大三角已经达到被摧毁的程度，因为只有西欧强国仍然未受损失。俄国已被德、奥击倒，而德、奥又被西欧打垮。然而俄国和德国两国还存在，不像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

国那样已经完全消失了。1918 年 11 月，西欧强国没有更多的喘息时间，在此期间，一个稳定的欧洲秩序“在俄国和德国都在休眠时”可能得以建立。不幸的是，西欧强国的和平努力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经过反复酝酿后于 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只是一个战胜国的会议，而不是全体欧洲国家的大会。既不代表苏联，也不代表德国；其他继承国只能按照他们的实力作为委托人和原告参加大会。所[927]有的重要决议都由一个十人会议敲定，后来则是四人会议——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有时加上意大利的奥兰多（Orlando）——从 1920 年 1 月起，是协约国常驻会议的外交部长们的会议。从实质上看，这已经足以使人们产生一种独裁或“强迫解决”的印象。尽管会议的组织者们百般炫耀会议的成果，和会却不能对欧洲许多紧迫的问题负责。和会给自己定的任务是起草并签订对战败国的和约。和会勉强承认了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并寻求托管俄罗斯帝国的利益，这引出极其有害的后果。俄国 1919 年始终都在三心二意地寻求折中的解决办法，而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的草率政策则促使政权迅速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见原书第 932 页）。

尽管威尔逊总统关于民族自决的主张获得广泛赞同，但其在运作中既不连贯又不公平。胜利的协约国认为没有必要讨论诸如爱尔兰这样的臣属民族的愿望，更不必说殖民地人民了。他们以牺牲前敌国的利益为代价，鼓励广泛的领土变更，同时却压制涉及本阵营内盟国利益的领土要求。以捷克为例，它要求侵占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领土、追求中世纪的“圣文西斯劳斯国家”的要求得到充分的支持。（见原书附录Ⅲ，第 1317 页）。而波兰人关于恢复 1772 年边界的要求却因为与列强恢复俄罗斯帝国的宗旨相悖，被痛斥为“次强权帝国主义”。会议每满足一个国家的利益，便会损害两三个国家的利益。

西方列强之间几乎毫无一致可言。美国人怀疑英、法两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意图。英国人猜疑具有拿破仑倾向的法国人。英、法两国都担忧美国影响的增强。当美国国会拒绝正式批准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和威尔逊总统提出的美国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联”）的得意计划时，这些疑点便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见下文）。协约国的外交官大大低估了和约的执行问题。对政治家们而言，在巴黎做出重大决议是一件事，至于决议在那些西方列强几乎没有影响和根本失控的欧洲偏远地区能否得到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形形色色的协约国国际委员会暂时安抚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地带。而国联毫无效力地诞生了。美国转而寻求和解；英国遣散了军队；法国缩小

了大陆单边政策。在那些由于和解方案而受到冒犯的人开始推测他们也许能不受惩罚地挑战和约之前，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当然，和会缓慢而费力地通过了大量令人惊讶的难题。五个主要条约付诸生效，十多个新生的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许多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得到裁定，组织和实施了一大批全民公决，大多数欧洲国家得到了企盼已久的新起点。说复仇主义已占据统治地位也有失公[928]允。当和会取得进展时，这种论调就趋于缓和了。劳合·乔治是“三巨头”中最为灵活变通的一个，他于 1 月在一片“绞死国王！”的呼喊声中到达巴黎，但随后就扮演了寻求宽容的解决途径的主角。但泽自由市的创建就是他温和影响的一个例证。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感谢。不应否认复仇主义的作用，它构成了战争罪行条款和赔款原则的基础，后者试图要求德国支付战争和单方面裁军计划的全部费用。与此同时，虽则克列孟梭在政治上坚持不妥协，还是出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意识，即战胜国的要求必须修改至德国可以接受的限度。[石勒苏益格]

[930]

石勒苏益格（SLESVIG）

1920 年 7 月 10 日，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Ⅹ）骑着一匹白马，穿过丹麦边境去收复南日德兰（Sonderjytland），又称北石勒苏益格（North Schleswig），它最近刚刚通过全民公决归属丹麦。[1] 于是，近代欧洲最艰难和旷日持久的领土纷争之一便告终结。

毗邻的省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位于日德兰（Jutland）半岛基部，是德国和丹麦长期形成的边界地带。历史上，石勒苏益格（丹麦语称之“Slesvig”）曾经是丹麦王国的一块采邑，而荷尔斯泰因属于神圣罗马帝国。镶嵌在兰斯堡（Rensburg）城门上的古老的绒鸭石（Eider Stone）是神圣罗马帝国传统边界的标志。尽管居民们种族混杂，讲丹麦语者在北部占主导地位，讲德语者在南部占优势。（见原书附录Ⅲ，第 1305 页）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首次突现是在 1806 年，当时法国人将这两个省判给了丹麦。这一判决得到维也纳会议的确认，后来当荷尔斯泰因被宣布为德意志同盟的一个成员时，这个判决就被不明不白地放弃了。这便成为产生麻烦的症结。在民族主义发展的时代，北进的日耳曼本地居民要求这两个省从丹麦分离出来。爱国主义的“绒鸭上的丹麦人”重新集合起来抵制他们。爱国主义的目标不久变为同建立制宪政府的斗争纠缠在一起。1848

年普鲁士军队为响应德意志占优势的省际议会的号召，占领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由于英国和俄国威胁要采取反对措施，他们最终被迫撤离。普鲁士又盯上了海港基尔。[2]

1863年11月石勒苏益格又一次陷入危机，当时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ck Ⅶ）去世而没有留下男性子嗣，而丹麦—石勒苏益格共同宪法又恰恰于此时获批准。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军队迅速出动以保证荷尔斯泰因的安全。1864年，在不断发展的混乱之中，普鲁士和奥地利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对石—荷两省进行为期六年的联合占领，以审查所有的问题。这一部署被1866年的奥地利—普鲁士战争所打破。普鲁士人的胜利使其得以单独管制被占领的石—荷两省，并将它们彻底吞并。安排举行全民公决，以及放宽居民选择丹麦国籍的承诺都没有兑现。

1848—1851年和1863—1864年的两场战争大大激发了丹麦人的民族自豪感。丹纳沃克（Dannevirke）防线的防御工事看起来经历了激烈的战事；连同像蒂柏尔·米尔（Dybbol Mill）这样英勇抵抗的据点都变成了民族的圣地。留下更多的东西是怨恨，它们是由占领者虐待选择丹麦国籍的居民以及警察蛮横地推行日耳曼化引起的，[931] 如同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年在普鲁士人统治的波兰一样。

1920年举行的石勒苏益格全民公决是协约国依照凡尔赛条约加以保护促成的。在北部的各县，92%的居民选择了丹麦，在弗伦斯堡（Flensburg）和中部石勒苏益格，75%的选票投向德国。商定的边界从此持续下来。

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曾经说过，只有三个人懂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女王的丈夫，他死了；一个德国教授，他已经疯了；还有他本人，他忘掉了所有这一切。”1920年以后，整个欧洲自由地追随帕默斯顿的榜样，虽然到处还有许多类似的难以解决的争端存留下来。每当解决一个领土争端，又有一些新的领土争端被创造出来。还有，解决争端的国际气氛远非健康。战胜国表现出来的复仇主义与反犹主义的混合物不是好预兆。作为冲突发源地的东欧，仍然没有受到控制。各项条约墨迹未干，所有各类人等即谋求对其加以修改。

1918—1921年爆发的绝大多数战争是以纯粹的地方性争端为导火线的。所有的百科全书都充斥着或正确或错误的模糊的战争发生地，后者创造了从阿伦斯泰因（Allenstein）到齐普斯（Zips）这类的新闻地名。然而有四场战争彼此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即俄国内战，匈牙利

内战，波—苏战争和希腊—土耳其战争。在这每一次战争中，西方列强都充分显示了其在向东部欧洲施展有利影响方面的无能。

1918—1921 年发生的**俄国内战**可以认为是一个命名不当的牺牲品。实际上，它是由一系列内战与一系列国际战争合为一体的一场战争。它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集中在争夺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控制权，由布尔什维克“红党”与其各种各样的“白党”挑战者互相争夺。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们都渴望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建俄罗斯帝国。另一方面涉及一连串延续下来的冲突，既有红军与白军之间的，也有前沙皇俄国领土内新独立的各共和国之间的。所有这些共和国都在为维护新近拥有的国家主权而奋斗着。但那并不是全部。除了驻扎在莫斯科的后备军队外，苏联红军还把每一个共和国的地方兵源都投入了战场。白军也同样投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队。许多外国军队对苏俄进行了武装干涉。各个民族共和国的政府面临频繁的地方叛乱；此外还有一些“散落的火炮”，例如，1918 年捷克军团的前战俘占领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结果，在大多数地区形成了多方混战的局面。
[**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

[933]

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B.N.R.）

直到最近，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未完全了解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BNR），它于 1918 年 3 月 25 日在明斯克（Minsk）宣布成立。确实，绝大多数西方人除去知道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一个行政区域，再没有其他概念。[1] 1918 年以前，白俄罗斯被挤压在波兰和俄罗斯之间，从未被认为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政治实体。外部世界曾把它称为白罗西尼亚（White Ruthenia），它构成了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的主要部分，但是自从它被划分给沙皇俄国，重新命名为白俄罗斯（White Russia）之后，白罗西尼亚的名称便被湮灭了（见原书第 655，663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所给予的支持大大增强了该国独立的民族意识。1914—1945 年期间，白俄罗斯人的学校、书店、报纸、出版物开始在维尔纳（Vilna）（又称维尔诺/Wilno）和明斯克出版发行。1916 年 1 月 1 日，陆军元帅兴登堡签署了一份政令，承认白俄罗斯语是德军占领区内的官方语言。1916—1917 年，白俄罗斯人自由地组建了剧院、高级中学、神学院、教育学院，最终还有政党。

这一切是由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团体赫拉玛达（Hramada）首创的。一个白俄罗斯民族议会于1917年12月在明斯克组成，只不过后来又被布尔什维克解散了。但是1918年2月德军进一步向前推进，将红军驱赶走，使本地人得以掌权。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发誓为所有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罗西尼亚人、波兰人、犹太人、立陶宛人和鞑靼人（Tartar），它一直运转到当年年底。1919年它被返回的红军所镇压，他们先建立了联合的立陶宛—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又建立了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1919—1920年波—苏战争期间（见原书第934—937页），白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被波兰人占领。1921年签署的里加条约（Treaty of Riga）不顾当地居民的意愿，分割了这个国家。在苏联统治下，东部地区受到镇压，当地人把统治者视为种族灭绝者。[2]恐怖在1939—1945年一直通过纳粹的屠杀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放逐延续着。但是，对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记忆依然存在。1992年，当白俄罗斯共和国重建时，来访的欧洲议会使团团长表示坚信，白俄罗斯完全有权利作为欧共体未来的候选国。[3]他对这点比当地的许多人民更乐观，当地的行政管理阶层已经基本上苏维埃化和俄罗斯化了。白俄罗斯骇人听闻的现代史保证白俄罗斯较之其他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更加依赖俄罗斯。

例如在乌克兰，它把战争中最大的战利品之一——十一支军队投入战场。1918年组建的乌克兰共和国军队分裂为两部分：最早建立的拉达（Rada）政权或国民议会的支持者，以及后继督政府的支持者。来自东线的德国占领军为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一直拖延到1919年2月才撤走。乌克兰的红军在顿巴斯（Donbass）地区的俄罗斯工人[929]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又得到设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区部队的补充。由邓尼金（Denikin）将军统率并得到法国军队支持的“俄罗斯志愿军”驻扎在敖德萨；其后继者，巴伦·弗兰格尔（Baron Wrangel）统领的“白卫军”扎营在克里米亚。毕苏斯基指挥的波兰军队，在1920年4月与乌克兰督政府结盟开进基辅之前，先于1919年初击败西乌克兰共和国的军队。无政府主义者内斯特·马赫诺（Nestor Makhno）领导的农民游击战士接管了乌克兰中部广大地区。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两年间易手达15次之多。把如此一场千变万化的斗争概括为红军与白军的二元化斗争是一种达到荒谬程度的简单化。（见原书附录Ⅲ，第1315页）

这些事件过程的复杂性不亚于作战队形。但是，从布尔什维克中

央的观点看，内战划分为各具重点的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第一阶段包括1918—1919年整整两年，白卫军从各个方向向苏俄推进——尤登尼奇（Yudenich）将军从西面进攻爱沙尼亚，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Kolchak）从东面攻入西伯利亚，邓尼金将军从南面攻入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拼死坚守莫斯科的心脏地带，一次次抗击来犯之敌。第二阶段始于1919—1920年交替的那个冬天，红军发起了攻势，追击每一支败退的白军，随后继续前进并依次征服了各个民族共和国。

关键时刻出现在1919年11月，当时邓尼金的军队直逼莫斯科以南100英里的图拉，波兰军队驻守在莫斯科以西不远处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双方的一次协同攻势即可将布尔什维克政权陷于灭顶之灾。但是，毕苏斯基的使者没有得到邓尼金对波兰独立问题的满意答复。所以波兰军队按兵不动，并着手同列宁进行谈判。邓尼金犹豫不决的态度造成致命的后果，他的阵地遭到红军骑兵横扫，匆忙从对察里津（Tsaritsyn）的胜利围攻中撤出。后来，邓尼金在其回忆录中谴责毕苏斯基成全了布尔什维克的最后胜利。[9]

此后，俄国中部的安全得到保障，数不胜数的大批红军呈扇形向各个方向出击，势如破竹。1921年，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扫除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这标志着在前沙皇俄国境内欧洲部分建立的各个民族共和国寿终正寝了。（见原书附录Ⅲ，第1314页）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军事专家感到困惑，必然将其归因于敌人的分裂，归因于军事委员、号称“俄国的卡诺”（Carnot）的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天才指挥，归因于国内交通运输的战略优势，归因于他们完全彻底的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布尔什维克制度并不受包括农民在内的俄国大多数阶级欢迎，不为从反动的保皇党人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政治流派所欢迎，不为所有非俄罗斯少数民族所欢迎。但是列宁亲自挑起的内战爆发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暂停一切现存的社会公共机构，以及铲除各种社会和政治反对派的借[931]口。契卡（Cheka）或称革命警察“非常委员会”（OGPU，NKVD和KGB的前身）被波兰贵族费利克斯·捷尔仁斯基（Felix Dzierzynski）（1877—1926年）组织起来。捷尔仁斯基的残忍使罗伯斯庇尔都显得怯懦。契卡镇压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根据列宁的命令，1918年7月在叶卡捷琳堡（Ekaterinburg）杀死了前沙皇及其全家，以及无数的无名牺牲者。布尔什维克对所有的经济部门实行军事化管制，包括劳动、运输和生产部门，这使该政权得以接管所有的企业和贸易单位，并以“反革命破坏”的罪名处决所有的持异议者。要不是当时能够号召爱国的俄罗斯情感去抵御外国“干涉者”，布尔什维克鲜少得到群众的支持。1920年4月，当波兰人帮助乌克

兰人夺回基辅时，所有的意识形态伪装都被剥去了。列宁号召人们保卫神圣俄罗斯，托洛茨基要求招募所有的前沙皇军官。极端的需要是极端的发明之母。

外国对俄罗斯的干涉被夸大。从表面上看，一支心怀歹意的可怕的外国军队造就了俄罗斯的痛苦。参加世界大战的德国正规军留在东线；德国志愿军"波罗的海军团"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一带游弋，布拉克—巴拉科维奇（Bulak – Balakhovich）将军率领的波兰义勇军在白俄罗斯；德国军队一撤出，波兰正规军就迅即出现在东线。英国远征军在摩尔曼斯克（Murmansk）和格鲁吉亚的巴统（Batum）登陆；法军占领了敖德萨；美国与日本控制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远东。对苏俄宣传当局来说，把这些外国人通通打成由邪恶的资本家雇佣来毁灭俄罗斯的同谋者是他们最简单不过的计谋。这种阴谋并不存在。协约国各国政府主要是关心俄罗斯帝国的统一问题；他们同德国人尤其是波兰人并无任何勾结，这两国公然蔑视协约国要求其撤出俄国的建议。协约国远征军被迅速调遣去守卫早些时候已运到俄国港口的大批军火，这些军火是用来帮助临时政府的。协约国的同情无疑地倾向他们[932]的前沙俄盟军，后者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推翻，并且正在乞求援助。但是协约国并未派出军队或拨出资金在俄国内战中实施重大的军事行动。当人人都能看出远征军的存在使布尔什维克达到了重要的宣传效果时，他们便撤离了俄国。损害在那时就造成了；苏联历史书籍借此鼓吹民族主义长达数十年之久。

西方国家的历史书籍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极少被人们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垮台相提并论。除了被巴黎和会承认的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从俄罗斯控制下争得自由的民族共和国未能获得与那些脱离了奥匈帝国的民族共和国等同的地位。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把苏俄对乌克兰或高加索的征服视为俄国内部之外的事件。更不幸的是，始建于 1922 年 12 月的苏联，往往被认为只不过是涉及俄国名称的变化。俄罗斯帝国解体的漫长过程，以及布尔什维克替换这个帝国的五年努力，可能被人们默默地忽略了。当布尔什维克亲手创建的帝国七十年后开始解体时，俄罗斯（Russia）、俄罗斯帝国（Russian Empire）、苏维埃俄国（RSFSR）与苏联（USSR）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只出现在一篇普通的论文中。**[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

俄国内战所造成的人员损失的程度被忽略了。然而，要是把战争的牺牲者，无论是在白军还是红军的恐怖行动中的牺牲者，以及可怕的伏尔加大饥荒的死难者都加在一起，总数可能不会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条战线牺牲者的总和。[10]

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伴随着一系列的冲突，但没有一个比匈牙利的冲突更严重。从1919年3月到8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坚持了五个月。许多欧洲共产党都是在那时建立的；但布达佩斯是惟一共产党掌权并维持了尽可能长时间的俄罗斯之外的城市。第一次匈牙利革命的短暂成功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当独立的匈牙利最初的自由主义政府再次签署了针对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的抗议书时，它得到了机会。大多数匈牙利人对将要失去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感到惊骇万分，这两个地方曾被匈牙利人视为自己文明的发源地。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贝拉·库恩（Bela Kun）（1886—？1939年）是一个犹太人，新近刚从俄国回来的前战俘，他充分利用了民众的民族主义热忱。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社会民主党和旧的军官团的共同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并允诺从有争议的领土上驱逐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人。一支匈牙利军队实际上在1919年6月已进入了斯洛伐克。同时，以苏俄为模式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决定实行激进改革。工业全部实行了国有化；教堂财产被没收；教士和农民一样必须从事强制性劳动。

[934] 此刻，匈牙利人意识到魔鬼正在进食。罢工者遭遇到一阵阵子弹。武装农民起义面临大规模的处决。持不同政见的军官在法军占领的塞格德（Szeged）组成了一支武装。他们与尼古拉斯·霍尔蒂·纳吉巴尼亚（Nicholas Horthy de Nagybanya）（1868—1957年），一位前哈布斯堡帝国海军上将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政府。罗马尼亚人借机派一支军队于8月攻入布达佩斯，最终葬送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红色恐怖遭到了白色恐怖的回击。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施加到库恩的追随者，尤其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身上。1920年，霍尔蒂被宣布为摄政，并建立起长达24年之久的独裁统治。前奥匈帝国皇帝查理一世（Charles）两次企图恢复匈牙利王位未果，议会摆脱军事控制的企图也失败了。虽然“法西斯”的标志尚未使用，而且也许不完全恰当，海军上将霍尔蒂一度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次极端的共产主义冒险招致一场强大的反共运动，然而不是最后一次（见原书附录Ⅲ，第1318页）[11]。

1919—1920年的**波一苏战争**牵动了整个欧洲。与布尔什维克对该事件的版本相对照的是，这场战争不是协约国发动的，不是协约国干涉苏俄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并非发端于1920年4月毕苏斯基进攻基辅。当然，两国间是存在领土纷争。但是，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于布尔什维克力图把本国的革命与预期的德国革命联系起来，由此要求

借道波兰。这个行动方针在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意识中相当明确，如果苏俄在俄国的试验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相吻合，它就是必要的一步。

1918—1919年冬天，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考虑通过“红色桥梁”向德国进军。当时他们命令红色的“西部军队”去探察波兰边境。然而内战所必需的百万雄兵一年后仍未凑齐。托洛茨基总是表现得十分谨慎；尽管斥责公众言论“左派幼稚病”，正是列宁热衷于革命战争。[12]波苏两国正规军之间的战争始于1919年2月，几乎可以说是偶然的，战争持续了20个月之久。当德国军队撤出东线的干涉区域时，波苏战争便打响了。波兰和苏联军队都被引入了对方的真空地带。最初的冲突于2月14日清晨6点发生在白俄罗斯，当时一支波兰骑兵巡逻队骚扰了正在进早餐的布尔什维克营地。那时，毕苏斯基（Pilsudski）正希望组建一个庞大的联邦，将从芬兰到格鲁吉亚的所有边疆共和国都囊括在内。他的计划一再受到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纷争的干扰。但是到了1919年8月，在拿下了维尔诺（Wilno）和明斯克（Minsk）两地之后，毕苏斯基站立在波兰历史上最强盛时的边界线上。他试图帮助邓尼金（见前面），但到头来却同布尔什维克展开了谈判。

对波兰人而言，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言行不一。列宁自始至终[935]都在发表连篇累牍的讲话，大谈与波兰的和平问题，而同时别雷奇纳河（Berezina）的红军突击部队却在持续增加。因此波兰人拭目以待。1920年1月，毕苏斯基为了巩固拉脱维亚的独立，越过封冻的德维纳河进行了一次突袭。然后他便收到了令其最担忧的信号：苏俄军队波兰前线总司令换上了战功赫赫的红色将军、年轻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1893—1937年），他不但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还是革命战争理论家。确信布尔什维克长时期地推迟进攻是为了发动更强有力的攻势后，毕苏斯基便匆匆与乌克兰的一派地方势力建立了迟到的联盟，并且向苏俄军队的最薄弱环节——南线发动猛攻。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进军基辅，像解放者一样受到欢迎。图哈切夫斯基的攻击准备被迫中断。在西方，既不懂政治也不谙地理的人们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不许干涉俄国”的呐喊。

1920年的战争可不是边境冲突，它是一场规模庞大的运动战。它启发了驻华沙的法国军事代表团一位年轻的顾问——夏尔·戴高乐上校，去构思其崭新的现代战争思想。双方多达上百万的军队在一千多英里长的战线上互相攻入对方最重要部位，并在6个月内又退了回来。在五六月份，到来的红军骑兵将波兰人从乌克兰赶了出去。骑兵司令官夸下海口“在夏天过去之前，我们战马的铁蹄就会踏上巴黎的街道。”7月4日那天，图哈切夫斯基终于发动了进攻，并下达命令：

"向西方进军！跨过白色波兰的躯体去开辟通往世界革命总爆发的道路。"他的进军演讲语出惊人。8 月中旬，他的骑兵部队推进到了托伦（Thorn）附近的维斯瓦河转弯处，距离柏林只有五天的行程。在后方袖手旁观的捷尔仁斯基（Dzierzynski）准备与一个"波兰革命委员会"一起接管波兰政权。列宁给他发来电报，要他枪决更多的地主。在华沙，教皇的使节、未来的教皇庇护十一世，准备亲自挑战这帮反对基督的人。包括许多犹太人在内的志愿者聚集起来保卫他们的家园。西方政府派去了一些将军，但没有提供援军。[**科纳尔姆亚**]

"维斯瓦河畔的奇迹"出现在 8 月 15—16 日。毕苏斯基已经秘密地准备从南侧发起反攻。图哈切夫斯基失掉了伸展过长的交通线。当毕苏斯基的攻势展开后，红军五个军的兵力被消灭，其中三个被完全歼灭；另外两个逃入东普鲁士避难。溃退是全面的。8 月 31 日，在南方的"扎莫什奇（Zamosc）包围圈"中，红军骑兵最终碰上了对手。在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大战中，2 万名骑兵以密集队形展开冲锋和反冲锋，直至波兰骑兵获胜。红军输掉了第一次战争。列宁提出和平请求。停战协定于 10 月 10 日签字，里加（Riga）条约于 1921 年 3 月 18 日生效。

波兰胜利的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凡尔赛协议保证了波兰的独立。英国驻柏林大使曾从他的罗尔斯·罗伊斯（Rolls - Royce）小轿车里观察过华沙附近的一些行动，他把见闻用吉本（Gibbonian）式的风格加以概括：

[936]

科纳尔姆亚（KONARMYA）

1920 年夏天，伊扎克·巴拜尔（Izaak Babel）（1894—1941 年）作为南俄新闻社（South Russian Press Agency）—亚格·罗斯塔（Yug - ROSTA）的战地记者在波兰前线服役。他隶属于布琼尼（Budyonny）的第一红色骑兵军，政委是约·维·斯大林（见原书第 959 页）。后来，记者写下了他在科纳尔姆亚的经历（《红色骑兵》，1926 年），一部精彩的短篇小说集问世，它们闪耀着当时的历史现实。

跨过兹布鲁奇河（Zbrucz）

一位师长报告说该师在黎明时攻占了诺沃格拉德（Novograd）—沃尔辛斯克（Volhinsk）。指挥部从克拉皮夫诺（Krapivno）

出发前进，我们吵嚷喧哗的后卫部队一直延伸到沙皇尼古拉一世修建的从布列斯特到华沙的永久大道上，这条大道是建筑在成千上万的农民的白骨上面的。……[1]

在这第一个故事的第一段中，审稿人可能会因设想书中所写的真实事件是实际上发生了的事情而得到原谅。

然而，任何一个熟悉波兰—苏俄战争的人，肯定很快就感到有可疑之处。当然，是有一个叫做诺沃格拉德—沃尔辛斯克的城镇。在 1920 年，这里曾是西蒙·彼特留拉（Semeon Petliura）的乌克兰督政府的大本营。可它不是位于兹布鲁奇河畔，而是位于斯卢奇（Slucz）河畔；再有，它不是被红军的第一骑兵军而是被红军第 14 军攻克的。这里确实有一条从波兰到布列斯特的大路，它是在尼古拉一世时由农奴们修建的。但是，它在诺沃格拉德 200 英里以外，不可能被后卫部队搞得乱哄哄的。

无数次这样的例证显示，巴拜尔不仅仅是犯错误。他故意搞乱了日期、姓名、地点和事件以便创造一个精心策划的结果。他积极参与拼凑文学的大杂烩，这种大杂烩的出现经常比历史本身更加“历史”。“他十分乐于盗窃历史，只要其结果得到艺术性的满足。”同样应该提到他的狂热的个人崇拜。《红色骑兵》被描写为一部特殊类型的纪实小说，但并不符合历史的准确性。[2]

还有，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许多事实可以被篡改。在《空军中队长特鲁诺夫（Trunov）》中，巴拜尔讲述了一位强健的哥萨克指挥官的故事，这位指挥官有一天出去击落了一名正在为波兰人而战的美国志愿飞行员。在塞德里克·E. 方特莱瑞（Cedric E. Fauntleroy）上校带领下的美国“科希丘什科”(Kosciuszko Squadron)空军中队的回忆，竟与巴拜尔的构思惊人地一致。他们讲述了一位莽撞的苏军机枪手如何在毫无防护的空地上向美国飞机开火，以及他们中的一位如何离开机群，确切地说是低空盘旋，把他打成了碎片。[3]

最终，巴拜尔的命运并不算好。这位可能是传播红军的英名最多的作者死于斯大林的劳改营（Gulag）中。

“如果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未能在图尔（Tours）挫败阿拉伯人（Saracen）的大举进攻……那么，牛津的各个学校现在教授的课程也许就是《古兰经》……要是毕苏斯基和魏刚（Weygand）未能在华沙战役遏制苏军的乘胜前进，那不仅基督教世界会危险地倒退，而 [937]

且仅存的西方文明也将受到危害。[13]

无论怎样，对布尔什么维克的打击都是相当沉重的。1920年的失败使他们与革命的德国连接在一起的战略希望破灭了。他们被迫从国际主义后退。苏俄别无选择，只能退回到不久以后斯大林号召的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列宁很快就从他的“左”倾热忱中退了回来，战时共产主义被摒弃了。1921年3月，就在苏俄与波兰订立和约的同一周，列宁出台了策略性的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新经济政策”，即著名的NEP。

更有甚者，一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与波兰隔开，布尔什维克就得以自由地重组他们的联邦国家。苏联的成立——包括最初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白俄罗斯、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高加索——直到波兰战争解决了边界问题，才得到承认。实际上，波兰人未能赢得更多的喘息机会：苏维埃进军欧洲虽然被击退了，但它并没有放弃这一目标（见原书附录Ⅲ，第1316页）。

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崩溃很难被看作意外。然而西方列强却没有一个应急计划。他们曾考虑把两海峡让渡给自己的盟友俄国；但是不打算把这项优惠给予布尔什维克。所以希腊在盟国的赞同下填补了这块空白。

1920年8月，已变得威信扫地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签署了色佛尔（Sevres）条约。一支协约国舰队攻占了伊斯坦布尔；意大利人占领了南部沿海；法国人占领了叙利亚；分离主义的库尔德人（Kurds）和亚美尼亚人占领了东部的广大地区；希腊人攻占了色雷斯（Thrace）和士麦拿（Smyrna）（伊兹密尔，Izmir）。他们对1453年从东正教徒手中夺取的君士坦丁堡怀有深刻的记忆；他们真诚地担忧小亚细亚半岛上众多希腊人的命运。因此，当最后一届奥斯曼帝国议会否决和约时，设在巴黎的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便邀请希腊“去恢复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秩序”。他们不再对基马尔帕夏（Kemal Pasha）抱有希望了。

在前两年，基马尔的公开身份是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领袖，该运动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的、世俗社会的民族共和国。他的大本营设在讲土耳其语的心脏地带——安卡拉。作为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他是土耳其苏丹、清真寺和面纱的死敌。一场反对外国人侵者的战争恰恰是他所需要的。由此观之，1920—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役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知的。孤军深入的希腊部队登上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直至占据了萨卡里亚（Sakarya）河畔。基马尔激励土耳其人保卫自己的故

土。1922年，希腊人的撤退变成了溃退：士麦拿陷落了；希腊军队一直被驱赶到海上。祖先曾在此居住了三千年的小亚细亚希腊人中的[938]绝大部分，连同黑海沿岸的黑海希腊人，通通被驱赶出去。对他们来说，这真是一场“大劫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打算同居住在希腊北部的土耳其居民易地而居，后者在同时也被希腊人驱逐出来。在此进程中，基马尔立自己为“加齐帕夏”（Ghazi Pasha）或称“尚武的君王”，最终成为阿塔图尔克（Ataturk），意即“土耳其之父”。苏丹被罢黜了。

协约国对土耳其的公然干涉比对俄罗斯更甚，但效果却完全一样。外国的武装干涉反倒激起了对外来干涉的反抗。土耳其共和国在其固有的民族领土上建立起排外的统治。强加给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被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所取代。希腊与土耳其着手组织双方居民的大规模交换；非军事化的两海峡被移交给另外一个国际委员会管辖。[14]在那个时刻，源于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冲突终于暂时停止了。[**瑞典社会主义者**]

[940]

瑞典社会主义者（SOCIALIS）

1920年春天，大选结果迫使瑞典国王邀请一位社会主义者来组阁。但是，他做得实在勉强。他召见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的领袖卡尔·希亚尔马尔·布兰丁（Karl Hjalmar Branting）（1860—1925年），并且说，他可以长期担任首相直到“没有社会主义、没有裁军和没有宪法变革”的时候。对于一个主张削减国防开支用于补贴社会福利和主张实行共和制的社会主义政党而言，这是些难以接受的条件。但还是达成了交易；布兰丁组织了一个联合内阁。他在政党内阁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这在民主世界的官方记录中是无可比拟的。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30多年前的1889年。它紧紧地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模式，而忘记了自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情结，稳步踏上议会道路，寻求社会改良的纲领，主张财富的再分配和国家干预。如同英国工党（British Labour Party）一样，它与工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包括接纳团体会员，并在工人社区内良好地组织起地方工会。它的选民主体主要由新兴的瑞典产业工人阶级组成，其受到中产阶级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1896年，该党在瑞典议会获得了立足点，1914年又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到1920年，布兰丁在议会两院中都领导着最大的单一政党。

瑞典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度始于1909年，连同普遍的男性选举权一起开始施行，这使得任何一个政党要赢得绝对多数都很困难。四个民主政党——保守党（Conservatives）、自由党（Liberals）、农民党（Peasants）和社会主义者几乎包揽了政坛，组织联合政府或临时更换部长如同家常便饭。一个小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有了代表。在1952年宪法改革之前，政党之间可以建立选举联盟以增加本党的代表。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SDA）取得政权和发挥影响经历了几个阶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兰丁于1920年、1921—1923年、1924—1926年三次领导联合政府。他曾因一项失业法案和推动削减防务预算而失败。他从未组成一个由本党占多数的政府。

从1932年起，布兰丁的后继者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把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变成了一个长期的执政党。除了一个短暂的间歇外，他控制瑞典政府达十四年之久。1936—1939年他与农民运动共同组建了红—绿联合政府，1939—1945年的内阁则是战时的维护国家统一的多党联合政府。

[941] 战后，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稳固的统治地位，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来改造瑞典。塔格·埃尔兰德（Tage Erlander）自1946年起执政达二十三年之久。瑞典的繁荣正如它的税制和国家主办的国民健康、教育与社会保障标准一样达到全盛时期。[1] 在奥洛夫·帕尔梅（Olaf Palme）的两届社会民主党内阁（1969—1976年，1982—1986年）之间只有短暂的几年是由保守党人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SSDA）的堡垒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独一无二的航程后，才于1988年瓦解。尽管国王在1920年惊恐万状，瑞典君主制却比社会主义更为长远。

至于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不稳定的存在，自相矛盾的说法较之现实更明显。社会主义思想只能有效地运用于那些有大量的过剩产品用于分配，并由民主政府保证公平分配的地方。实际上，在瑞典，当可获得的资源与公众的强烈愿望之间的差别缩小时，他们的劳动总是低效率。还有，在那些剩余物贫乏，或政府专制的国家，抑或二者兼备的国家，集体经济中的工人们易受剥削，而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得到了全部福利。这样的事例就出现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内战时期

内战时期，习惯上是始于1918年11月的停战日，止于1939年9月1日，欧洲始终未能摆脱战争的阴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在战争的余震中度过的。30年代是在人们越来越确信第二次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度过的。在此期间，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对破坏和平者缺乏有效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又一轮新的冲突。从理论上讲，他们的警告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忽略了政治和军事的现实性。由于1914—1918年期间大战带来的损失而震惊的西方民主国家不可能在麻烦初起之时愤而采取行动。同样，他们那些作用有限的“消防队”性的军事行动令人沮丧。协约国对俄国的军事干涉显示出西方国家既未能从意志上也未能从资源上控制布尔什维克。法国人对鲁尔区（Ruhr）的占领显示出德国人绝不可能被有限的手段所压服。从那时起，大多数军中参谋人员都确信：要么被迫打一场全面战争，要么什么也不干。而且，全面战争的准备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有甚者，如果俄罗斯与德国未能被分别加以约束，如果二者选择联合行动，那么便没有机会制约它们了。这一噩梦于1922年首次浮现出来，当时德国和苏俄代表团在出席热那亚（Genoa）同盟国间经济会议时决定共同参加一次事先未安排的沿着海滨到拉巴洛（Rapallo）的火车旅行，并且不惜冒犯他们的盟国东道主去签订德苏贸易协定。就其本身而言，拉巴洛事件不算是什么危机，但它显露出战胜国盟友间的主要弱点：它表明，莫斯科和柏林联合起来，便可不受惩罚地公然蔑视西方强国。经常未被人提及的是，它构成所有欧洲和平时期协商的基础，直至噩梦变成现实。

西方列强的局限性也突出地体现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广大地区。太[941]平洋、中国以及全球海上军备中的重大问题都是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而不是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解决的。1921年签订的华盛顿海军协定限定了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舰艇的吨位，比例为：5:5:3:1.5:1.5。在1923年签订的贡德拉（Gondra）条约中，美国在没有牵涉其前欧洲伙伴的情况下，确立了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世界权力的重心在转移。欧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惟一主宰。

巴黎和会的遗产并不是它的组织者所曾希望的。德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并没有对战胜国俯首帖耳。初创的德意志共和国极其脆弱，其1919年常设于魏玛的国民议会由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一个联合体所操纵。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是在明确的恐吓压力下才签署了凡尔赛条约，举行了催人泪下的仪式来告别那些即将被逐出德意志帝国之

外的德国人。柏林，它已经经历了1919年1月左翼人士发动的起义，当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被杀害；现在，它又目睹了1920年3月右翼发动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以及8月苏俄红军的逼近。人们无法预测，如果图哈切夫斯基达到了他的作战目的将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随着他把波兰人从有争议的城镇驱逐出去并将其移交给当地的德国人，他就已经放弃了打德国牌和推翻凡尔赛体系的意图。三十万武装的义勇军（Freikorps）更放任自流了。“红色萨克森”[942](Saxony）被共产党人所控制，极端保守派谈论着分离巴伐利亚（Bavaria)。德国距离全面内战只有一步之遥了。

社会动乱的幽灵笼罩着欧洲大陆。德国左、右两翼强烈的敌对状况不断发展。1922年，犹太血统的德国复兴部长沃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被暗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依靠大量的失业和可怕的极度通货膨胀发展起来。战争罪行条款的屈辱、对战争赔款的抵制和协约国对莱茵地区的占领则助长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1920年以后，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内部冒出了一个亡命之徒的新变种，试图融合左右翼两派的不满情绪。他们的首领阿道夫·希特勒因其流产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而成为了1923年11月8—9日的头条新闻的主角。

然而，一段时间后，曾担任首相又于1923年出任外交部长的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年）使德国恢复了一点点信心。施特莱斯曼允许德国军队通过与苏俄的秘密军事合作来逃避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裁军条款。而且，他通过镇压萨克森和图林根（Thuringia）的共产主义政权以及恢复支付赔款赢得了西方的认可。随后他又说服了协约国，使它们相信关于战争赔款的争论将会危害欧洲的经济。1924年，在道威斯计划下，他通过谈判从美国获得了以黄金做担保的8亿马克贷款，以确保德国工业得到恢复。1925年，在洛迦诺（Locarno)，他通过保证法—德边界的稳定性，获得了德国回归国际社会的机遇，1926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1927年，最后一些协约国间的委员会被撤销了。在同西方列强改善关系的热情中，几乎无人注意德国的东方边界以及德国的东方政策都被留待日后修改。

在国际金融领域，混乱持续了数年之久。由于战时协约国的安排，英、法借出巨额贷款，大部分是贷给俄国的；同时，英法本身又欠下数额更大的债务，大部分是欠美国的。凡尔赛条约中的赔款计划想让德国支付全部战争费用，以便英法等国政府以此偿还自己本身的债务。然而，该计划证明无法实行：所涉及的数额无法精确计算；德国拒绝全部支付；苏俄政府拒绝承认沙皇政府的债务；美国拒绝考虑

[939]



地图 25　新欧洲，1917—1922 年

重新修订计划。如此，替代方案的出台势在必行。巴黎和会上的一位英国代表 J.M. 凯恩斯（J.M.Keynes）早已发表了对流行观点的严厉批判。他在 1919 年发表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文中论证道：支持德国经济复兴是振兴整个欧洲经济的前提条件，惩罚性的战争赔款到头来将损害惩罚者本身。他的思想遇到强烈的政治对抗，这部分是由于他建议给予德国的优惠待遇似乎超过德国所宣称的牺牲。但是，必须将德国的复兴置于优先地位这一观点后来逐步变为现实。

[943] 赔款最初被确定为2.69亿德国金马克（Goldmark），分42年支付，即到1962年全部付清，但随后就被削减了。1921年，英国着手促进签订一项英俄贸易协定，此举打破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封锁。在竭力要求将德国的战争赔款削减至1.32亿金马克时，英国默认了法国的威胁，即如果德国不支付削减后的赔款，法国将出兵占领鲁尔区。1922年，他们建议，取消全部战争债务，代之以每年替英国向美国偿还3300万英镑，分63年支付，即到1985年付清。1923年，正当因有效需求不足引发了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时，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区造成恶劣的影响。1924年，根据道威斯计划，延期支付战争赔款的要求最终得到西方列强的首肯。德国应该以适当的比例支付赔款直到1929年，以后再每年支付25亿德国马克。协约国还向德国提供了一笔为数8亿德国马克的贷款，便于其支付下一次的分期赔款。但是，甚至这样也证明是不可能的。1929年，根据扬格计划（Young Plan），德国每年需支付345亿德国马克，分58年支付，即到1988年付清，以德国的国有铁路做担保。1932年，在洛桑会议上，被邀与会的德国签订最终支付30亿德国马克的协议——连这也没有兑现。那时，整个事情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德国收到的美国贷款比其正在支付的战争赔款还要多。总之，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发生大崩溃之日起，世界经济跌入萧条之中；美国所有对欧洲的贷款都被冻结了。

内战政策为再度出场、沦为专制政体战利品的自由民主党所控制。西方列强曾希望他们的胜利能迎来一个以他们的设想为模式的新时期。毕竟在大战爆发之时，欧洲大陆上存在着19个君主国和3个共和国；而在大战结束时，欧洲大陆则由14个君主国和16个共和国组成。然而“民主革命”不久就证明是虚假的。当一个或另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民主宪法被独裁者的这个或那个分支机构违犯时，几乎一年已经过去了。这不能归咎于某种单一的原因，只是西方强国无力保护他们促成的那种制度。独裁者以各种形式出现——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激进派、反对派、左翼独裁主义者（像毕苏斯基）、右翼军国主义者（如佛朗哥）、君主派、反君主派，甚至像蒂索（Tiso）神父这样一个斯洛伐克的预备修士。他们共同分享的惟一东西是坚信西方民主不适合他们。（见原书附录Ⅲ，第1320页）[**爱沙尼亚人**]

在两次大战之间诞生的两个新国家中，一个是民族共和国爱尔兰（Ireland），另一个是信徒专政的梵蒂冈（Vatican）。爱尔兰自由邦建立于1922年，原本是英帝国管辖范围内的一个自治领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百万爱尔兰人在英军中为英国效忠。但是，在1918年，

[944]

爱沙尼亚人（EESTI）

1923年，库登霍夫－卡勒基伯爵（Count Coudenhove – Kalergi）的泛欧联盟（Pan – European League）第一批办公机构中的一个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开始运作。从外观上看，办公室的大门是一个上面刻着泛欧联盟·爱沙尼亚字样的黄铜板。17年以后，当苏军入侵爱沙尼亚之时，这块厚铜板被该联盟的成员隐藏起来。1992年，当欧洲议会的老前辈奥托·冯·哈布斯堡（Dr Otto von Habsburg）博士访问爱沙尼亚时，它被从隐藏处发掘出来并出示给哈布斯堡博士看。这是爱沙尼亚半个世纪以来不曾向世界展示的潜藏的抱负。冯·哈布斯堡博士说："不要忘记爱沙尼亚，他们是欧洲人中最出色的。"

同时，苏联的赞美者也说道：波罗的海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生存下去实在是太小了。人们也对新诞生的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这种观点是：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或斯洛文尼亚或是克罗地亚，如果保持独立状态，将是极其脆弱的，但是，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它们每一个也都是类似卢森堡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或单独一个威尔士（Wales）或苏格兰（Scotland）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国。说到底，爱沙尼亚的国土比卢森堡要大20倍左右，而人口是它的4倍。在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每个小国都能在以前的大国旁边找到它们的地位。

由于对地方自治的期望，爱尔兰人的观点一分为二。北爱尔兰准备再一次以武力保卫英联邦，于1920年变成了英国的一个自治省。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南部爱尔兰则准备争取独立。他们成功了，但却是在经过两场恶战之后才取得的——一次是抵抗英国准军事警察武装，[944] 即"爱尔兰王室警吏团"，另一次是爱尔兰人之间的内战。爱尔兰独立的主宰者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1882—1975年）曾多次担任政府总理，他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古巴人。爱尔兰自由邦于1937年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并于1949年同英联邦断绝了一切形式上的联系。

梵蒂冈，其居民像爱尔兰一样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它是1929年根据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与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的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而创立的国家。它的面积只有44公顷（100多英亩），位于罗马市中心台伯河（Tiber）右岸。它的常驻居民大约有1000人，

完全处于教皇当局的绝对统治之下。它的诞生结束了教皇60年来被“囚禁”的日子，这要从1870年教皇国家被扼杀算起。

尽管西方民主国家赢得了大战的胜利，世界大战最有活力的政治产物却源于反西方、反自由、反民主的极权主义怪胎。极权主义一词是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杜撰出来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抱负。但是，从1928年起，极权主义一词开始包括具有共同特性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自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以后，苏俄（1917—1922年）及其后继者苏联（从1923年起）是长期以来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国家。它的榜样作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主要的法西斯制度出现在意大利（1922年）、德国（1933年）和西班牙（1936年）。[15]

[945] 极权主义的概念受到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双方面的拒绝，即极权主义者本身的拒绝。它注定要变成冷战时期的政治足球，在西方学者和政治理论家当中有着复杂的命运。[16]它未能吸引那些需要周密而无懈可击模式的人们，或者那些把政治现象与社会力量混为一谈的人们。对于任何一个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视为惟一罪恶的人，极权主义是一种可诅咒的和令人生厌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它得到了欧洲那些曾经直接实践过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人们的有力支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来都不是同质的：二者中的每一个都超越了时代，都引发出多样化的后果。但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比其实践者所准备承认的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二者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可以拉出一长串清单。有关这个主题的初创性研究谈到“六点综合症”。[17]但六点是不够的：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激进的运动，它们发展了公开承认融合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逐渐淡化了其国内民族主义原则，与此同时却接受了独特的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假设。在斯大林统治下，上述意识形态的混合物被归类为“民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久以后，德国的纳粹分子修改了其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1934年的同一时刻，二者均把社会民族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确定下来。

受过教育的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有意识地强调他们二者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当需要概括他们的信仰时，他们经常做出惊人类同的回答。一个说：“对我们苏联爱国者而言，祖国和共产主义已经融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另一个如此回答：“我们的运动紧紧抓住了怯懦的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汲取社会主义的真谛。它还从怯懦的资产阶级政党那里接收了民族主义。我们把二者投入我们生活方

式的熔炉中，形成了水晶般纯净的结晶体——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18]人们对这种夸夸其谈只能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者是“红色法西斯主义者”，而法西斯主义者是“褐色共产主义者”。

伪科学。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宣称他们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者求助于他们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或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而纳粹分子则求助于优生学和人种学。他们二者的科学方法或科学发现都未得到广泛的有独立见解人士的赞同。

乌托邦主义的目标。所有的极权主义者都珍爱一个新人类（New Man）的幻想，新人类能够创造清除所有现存不洁物的新秩序（New Order）。幻想的本质变化多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宣讲的那样，它最终要达到没有阶级存在的纯粹共产主义阶段；按照种族主义者的观点，则是进入没有任何犹太人存在的纳粹分子雅利安人的天堂；或是在意大利再现仿历史的罗马帝国。建立新秩序是一项证明现行所有[946]的牺牲和暴行都是有正当理由的任务。[**乌托邦**]

二元化的党—国家。极权主义政党一旦掌握了政权，便会创造出一个机构，在其中它自己的组织能够成倍地加强并监督所有存在的其他组织。国家机构的权力被削弱，成了执政党的意志的传送带。这个二元化的极权制度比人们所熟悉的但又容易误解的词“一党国家”更普遍。（见原书附录Ⅲ，第1321页）

元首原则或领袖原则。极权主义政党实行严格的等级界限。他们强制要求党徒盲目崇拜党的领袖，对崇拜的偶像奴才般地服从，把元首或领袖、首领或“伟大的舵手”视为所有智慧与仁慈的源泉。列宁回避这样的崇拜；但是，个人崇拜是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核心。

强盗行径。许多观察家指出了极权主义者精英与职业犯罪团伙之间存在的惊人相似之处。强盗们借口保护自己所在共同体免遭暴力而获得对共同体的寄生性控制，而那些对共同体产生威胁的暴力就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习惯性地惧怕自己的成员和受害者，千方百计地消灭各种对手。他们操纵法律，在表面上保持体面的同时，又运用讹诈和威逼的手段去控制辖区内的所有组织。

官僚主义。所有的极权主义制度都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去充任扩张的和二元化的党—国机构。这种新的官僚主义使用快速提拔的手段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机会主义分子。完全是依靠政党，它才能在争议中组织起仅有的社会选民，而这些选民的利益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必须考虑的。同时，它还包括若干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其暗中的对抗造成了现存的天才政治生活的惟一形式。

宣传。极权主义的宣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现代化大众广告的速闪技巧。它运用激情的象征，声与光，政治艺术和令人震撼的设计，以及“大谎言”的原则。它的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目标直指那些由于战争和现代化的浪潮而背井离乡的易受蛊惑和谋求复仇的社会成员。

权力美学。极权主义制度在艺术领域内强化一种实际上的垄断，宣传一种颂扬执政党的审美环境，修饰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狂热地赞美民族神话中的英雄形象，沉溺于妄自尊大的幻想之中。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德国纳粹分子和苏维埃共产主义者都爱好领袖自命不凡的肖像、出自刻板工匠之手的特大号雕像以及豪华的超大型公共建筑。

辩证法的敌人。没有一个极权主义制度能希望，在没有一个邪恶对手与之竞争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罪恶图谋合法化。法西斯主义在[947]欧洲的崛起对共产主义者无疑是天赐之物，否则他们只能借口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那些更为久远的罪恶来为他们自己辩护。法西斯主义者从未停止以各种名义标榜自己进行的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圣战，而共产主义者又总是通过“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来证明自己正确。极权主义内部的种种矛盾为其挑起的各种仇恨和纷争提供了动力。

仇恨的心理。极权主义制度通过竭力鼓吹对内外部敌人的仇恨激发了人们的热情。真正的竞争对手和值得尊敬的对立面其实并不存在。在法西斯分子的全部剧目中，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总是排在节目单的首位；而在共产主义者的全部剧目中，法西斯分子、资产阶级的走狗、“富农”和所谓的破坏分子总是遭到公众的无情辱骂。

先发制人的审查。如果没有严密的审查制度来控制各种信息来源，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操纵舆论。仅仅查禁违禁的观点和事实还不够；还必须预先编造能够传播的各种数据。

种族灭绝和高压统治。极权主义制度推行政治暴力突破了以前所有的界限。一个精心构建的政治警察和安全部门网络随时处于警戒状态，起初是用于摧毁所有的反对派和不受欢迎的人，后来是用于捏造对手以保持这一机制的随时运转。针对（清白的）社会或种族敌人的种族灭绝运动再加上相信意识形态的宣传，令公众随时随地处于惊恐状态之中。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集中营、草菅人命竟成例行公事。

集体主义。极权主义制度倡导各种强化集体凝聚力并削弱家庭和个人特性的活动。国营托儿所、“社会艺术”、青年运动、入党仪式、军事检阅以及各种形式的团队制服，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巩固高水平的社会纪律和遵纪守法者的行为。在法西斯意大利，建立了一种党管工

会的制度，取代所有的工会和雇员组织。1939 年这一制度在国民议会下院获得批准。

军国主义。极权主义制度惯于夸大“外来的威胁”，或者捏造出这种威胁，以团结全国公民保卫祖国。为重整军备采用了最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政策。在党的控制下，国家武装力量垄断了全部武器并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所有的进攻性军事计划均被描述为防御计划。

普救论。极权主义制度设想它们的体制将以某种方式扩展到全球，并据此行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科学”并因此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纳粹分子进而提出（接唱叠句）“今天德国属于我们，而明天它属于整个世界。”[**拉脱维亚**]

蔑视自由民主政体。所有的极权主义者都鄙视自由民主政体，只[948]因为它主张博爱主义，信奉妥协与和平共处，重商主义，忠于法律与传统。

道德虚无主义。所有的极权主义者都奉行目标决定了手段的正义性这一观点。一位英国的观察家写道：“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不仅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也是区分它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关键特征。”[19]

极权主义概念的好坏（成败）取决于在其主要的实践者之间比较这些观点的基本内容。极权主义概念的合法性不取决于各类知识分子，也不受其经常玩弄的政治游戏的影响。

然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们个性的来源方面。共产主义者献身于阶级斗争，而纳粹分子为种族纯洁而战。二者的重要区别还存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法西斯主义者注意保留私有财产的完整，以争取大工业家支持他们的事业。共产主义者废除了绝大多数领域的私有财产。他们对工业实行国有化，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根据这些理由，共产主义必然被判定为拥有更多极权主义分支的极权主义。[**左派**]

当然，坚持“全体人的管理”有时必须要求以极权主义的名义实现，这只是某人凭空想象的事。极权主义的乌托邦和极权主义的现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庞大的极权主义计划往往效率异常低下。极权主义不谈制度的成就，而只谈他们的雄心壮志。更有甚者，极权主义的弊病产生了其自身的抗体。深重的压迫经常激起英勇的反抗。揭露伪哲学有时能够培养人民高尚的道德准则。最坚决的“反共分子”是前共产主义者；最杰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是那些忠诚的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的爱国者。

从历史的观点看，令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各自的思想根源究竟有多大距离。1914 年之前，这两大运动的

主要成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专制制度——荡涤着全欧洲各种各样的联合体。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成型。它在 1917 年的浮现正好发生在法西斯主义协调一致之前。因此，共产主义者肯定被列为带头人，而法西斯主义者只是学得快。关键在于，按年代排序的领先地位能等同于因果关系吗？法西斯主义是像其信徒们所以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把世界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出来的十字军吗？法西斯主义者究竟从共产主义者那儿学到了什么？很难否认贝拉·库恩（Bela Kun）给了霍尔蒂制度得以存在的理由。1922 年 10 月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意大利总罢工使墨索里尼为其“进军罗马”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正是共产党人在德国街头和选举站的实力吓得德国保守势力将权力拱手交给了希特勒。

[949] 但是，很难说这就是事情的全貌。法西斯主义者是些声名狼藉的骗子：不能把他们的宣言太当真。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 年），这位社会主义报刊《前进》的前任编辑，有关阶级斗争的伪马克思主义论文（1912 年）的作者、贪污犯和街头混混，几乎不信奉任何政治原则。他毫不内疚地利用法西斯战斗队首先支援民族主义者于 1920 年野蛮地强夺阜姆（Fiume），又于 1921 年在大选中支持乔利蒂（Giolitti）的自由主义集团，随后杀害了社会主义领袖马特奥蒂（Matteotti）。再如，他自己宣称支持立宪君主国，而不久以前他还要推翻它。他不需要用这种策略寻求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他只试图利用其一手造成的极度混乱状态。

同样也必须谈及墨索里尼的奇特以及其 1922 年 10 月行动的异常成功。他首先促成了导致总罢工的混乱局面，然后又通过海底电报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担任首相。国王应该对这份电报置之不理；但他没这么做。墨索里尼没有掌握权力；他不过要吓唬一下而已，但是在将发生更大混乱的威胁下，意大利民主派投降了。意大利的首席历史学家写道：“进军罗马是一次轻松的列车旅行，随后跟着一场小规模的示威游行，而这一切就是对国王发出邀请的回答。”[20]几年后，当墨索里尼的制度陷入严重的困境时，阿道夫·希特勒坚持挽救他。元首听完汇报后说：“毕竟是领袖向我们表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21]墨索里尼表明可能发生的事即是自由民主的颠覆和再一次可怕的遍及欧洲的“全面战争”。

国际关系的气氛由于对战争的普遍憎恶而建立起来。至少在表面上，“不侵略”是起码的义务。在 20 年内，签署了一大批不侵略的条约（见原书附录Ⅲ，第 1322 页）。对那些无意发动侵略的国家而言，这些条约毫无意义；对那些有意发动侵略的国家来说，这些条约则提供了绝妙的借口：希特勒和斯大林都非常喜欢它们。

国联的创立应视为巴黎和会的成就之一。国联盟约于1920年1月生效，当天也是凡尔赛条约生效的日子，国联盟约已经被不适宜地并入了凡尔赛条约。国联寻求以仲裁和一致同意这两种手段解决争端，运用集体的力量制止侵略。它设想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每个成员国具有同等的投票权，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和常设秘书处，所有的机构都设在日内瓦。国联还接管了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和国际劳工会议。1920年11月，首次全体大会召开，到1941年为止每年召开一次。1946年4月，国联自动解散，其遗留的职能转交给设在纽约的联合国组织。

国联的工作开始得太迟，以致未能影响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还受到那些可能使之生效的非成员国的阻碍。在国联21年的运转中，所有欧洲三大强国从来没有适当的代表。在西方强国中，法国单独发[950]挥了全部作用。国联最初的发起国美国置身局外；英国则没有签署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日内瓦基础草案（1924年）。德国仅仅于1926—1933年，意大利于1920—1937年加入过国联。苏联于1934年被接纳加入国联，1940年又被开除了。一项重大的倡议是1928年法国和美国提出的，旨在杜绝国联的某些明显弊端。白里安—凯洛格（Briand—Kellogg）关于放弃战争手段的条约由包括苏联在内的64个成员国签署。但是它从未被并入国联自己的条约中。因此，当国联主张对侵略国实施军事或经济制裁时，却不拥有实施制裁的各种手段。其结果是，它在处置小问题时发挥重要作用，而在解决重大争端方面只发挥了无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西方强国的矛盾态度，国联未被授权挑战总的欧洲安排（移民），前者认为它们在1919—1920年间已经解决了。一个致命性的规定决定了在日内瓦公约的框架下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场争论”。一致同意的原则在全体大会和各个专门会议上支配着投票表决的结果，保证了从未有一项违背了列强意愿的决议能获得通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裁军大会直到1932年才得以召开，此时，苏联大大加速了重整军备的进程，不久，德国也加以效法。

因此，总体上讲，国联的各个发起国剥夺了它尊奉其崇高理想的种种手段。它建立了针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Syria）的殖民委任统治委员会；它负责管理但泽自由市、萨尔州（Saarland）和海峡委员会；它调解了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摩苏尔（Mosul）争端，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的马其顿争端（1925年），但对调解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维尔诺（Wilno）争端（1925—1927年）毫无成效。它未能制止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1年）或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Abyssinia）（1936年）。30年代后期，当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剑拔弩张时，不是由于国

联自身的过失，它完全无能为力。

在欧洲和平与合作领域内最活跃的国务活动家无疑当属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 年）。他是一位改良社会主义者，出生于南特（Nantes），曾十次任法国总理；但他经历中最有作为的阶段是在 1925—1932 年，当时他担任法国外交部长。他不遗余力地寻求法德和解。他是洛迦诺条约的总设计师；他一手缔造了摈弃战争的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主张建立欧洲联邦。他的美好设想以及缺乏成功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

白里安建立欧洲联邦的提议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但是这些建议对所有寻求政策种子的人都非常重要，这些政策的种子 20 年后终于结出了果实。这些建议首次被提出是在 1929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国联全体大会的讲话中：

"我想在那些正在构建地缘集团的人们中间，像欧洲人民一样，[951]应该有某种联邦契约……显然，这种联合将是在主要经济方面，因为经济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我依然坚信这种联邦形式的联系可能也会有益于政治和社会方面，而不会影响这个联邦中任何国家的主权……"[22]

关键词是"地缘集团"、"主要经济"和"主权"。

1930 年 5 月，一个更详尽的备忘录出台。这一文献被称为"欧洲的道德联盟"，它勾勒出使该联盟得以成功的原则和机制。它强调"经济问题一般应服从政治问题"。它设想成立一个常设政务委员会以执行决议，一个代表机构——欧洲会议以进行辩论。它呼吁国联的 27 个欧洲成员国尽快召集一系列会议以研究广泛的相关问题，包括财政、劳工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从 1931 年 1 月起，白里安主持国联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其成员对备忘录的反应。在这些成员中，只有荷兰的回答准备接受肯定要削弱国家主权的欧洲联邦。

事实证明，1931 年无论对白里安还是对他的理想都是最后一年。他关于欧洲联邦的首次讲话紧随其后的是华尔街的崩盘。对其备忘录进行的讨论与纳粹党赢得首次大选同时发生。白里安的欧洲蓝图被他出任国联满洲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所取代，国联满洲委员会在深思熟虑之后，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进行了口头谴责。在亚洲，日本蔑视国联并获得了侵略的报偿。在欧洲，"洛迦诺精神"是不健全的。斯特莱斯曼（Stesemann）死了；白里安本人处于病痛之中，辞去了职务。白里安之死引出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充满激情的颂词。他说：白里安"是他祖国的骄傲，并且珍惜祖国的

特权，但他的骄傲只是满足于法国像女神一样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领导其他国家在和平与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他高尚的思想境界无人能够超过。”[23]这些颂词是英法团结的一个罕见的证明。

在这种气氛中，法西斯意大利提出了一个替代的欧洲安全计划。墨索里尼提议缔结英、法、德、意欧洲四强条约。它意味着对欧洲一致的坏习惯一个玩世不恭的回答，并且省略了所有关于各国地位一律平等的托词。它厚颜无耻地试图动员“西方”去对抗“东方”的危险——即抵抗继承国的争吵和共产主义的潜在扩张。欧安计划得到了英国外交部一定程度的赞同，但是却没有引起凯道赛（Quai d’Orsay）（即法国外交部）的兴趣，后者更希望中止现存的各项安排。撇开慕尼黑会议不说，欧安计划的条款始终是一纸空文。

欧洲的文化生活深深受到战争后遗症的影响，战争后遗症增加了对传统价值的质疑，促进了现存的离心主义倾向。奥斯瓦尔德·斯宾[952]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一个德国人明确持有的“西方文明”的观点，开创了忧虑和悲观主义的风气。共产主义的出现激励了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讲，俄国布尔什维克挑战性的乌托邦立场表现出非凡的吸引力。活跃的共产主义政治家是少数人；但马克思主义观点却大为流行。前往莫斯科的朝圣者洪流提供了一个创纪录的外国人大规模上当受骗的奇观。对这些朝圣者而言，欧洲历史上最残忍的制度做得没错。[24]法西斯主义也打算招募自己的科学和文化合作者。某些个人，如G.B.肖伯纳（G.B.Shaw），力图讨好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在1931年访问苏联期间，他评论道：“我希望我们在英国有强迫劳动，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二百万失业者。”经过一次私人会晤后，他关于斯大林的观点是：“他被说成是一个热爱家庭的模范：正直而且坦率。”[25]回想起来，像韦伯（Webb）的《苏联的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sation）（1935年）这类书显得十分荒谬；但却迎合了战后一代人真诚的渴望，同时足以使世界对苏联的现实一无所知。在受到政治压迫的知识分子之中缺乏健全的道德，正如在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教士的背叛，1927》（La Trahisóon des clercs）一书所描述的，是一个反复提及的主题。如果本达自己没有试图为斯大林的审判秀辩护，它或许会更有说服力。西班牙社会哲学家何赛·奥尔泰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视极权主义为威胁大众文化的一个标志。在他的《群众的革命，1930》（Rebelion de las Masas）一书中，他警告说，多数派的民主原则传播了暴政的种子。

在宗教思想中，保守的天主教等级制度对共产主义采取了较之新

教教会更为强硬的政策。但是在1937年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两份紧密相关的通谕 Mit brennender Sorge 和 Divini Redemptoris 中，裁定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与基督教水火不相容。与此同时，诸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年）这样的天主教哲学家寻求更新教会的社会思想。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1875—1965年）和瑞士人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年）引起了各宗教派别间的大辩论。前者曾是法兰克福的大学教授，后者有影响的著作《教会的辩证法/辩证神学》（1932年）（Die kirchliche Dogmatik）致力于恢复新教的基本原则。

在文学领域，在 T.S. 艾略特（T.S.Eliot）非凡的代表诗作《荒原》（Waste Land），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剧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1920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1923年）和《芬尼根的觉醒》（Finnegans Wake）（1939年）等作品中，战后那种颓废和迷茫的意识被生动地表达了出来。1928年以 D.H. 劳伦斯（D.H.Lawrence）未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和贝尔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的《三便士戏剧》（Dreigroschenoper）的创作为标志。前者大胆抨击了英国性欲的泛滥，后者是柏林前纳粹时期政治左翼和非传统的艺术界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在同一时代，一战前即以其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1900年）和《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1911年）闻名于世的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年），带头保护德国文化免受德国政治家坏名声的影响。在移居国外和成为流放中的[953]"德国好人"的象征之前，他出版了更多的小说，诸如《魔山》（Der Zauberberg，1924年）一书，探索了瓦格纳和尼采含糊不清的遗作。在俄罗斯，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个文学自由的短暂间隙，给予革命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1880—1921年）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893—1930年）充分展现才能的空间。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把苏维埃作家分裂为党的奴仆和持不同政见的受迫害者两大类，前者如高尔基（Gorky）和肖洛霍夫（Sholokov），后者如奥西普·曼德尔什塔姆（Mandel'shtam）（1891—1938年）或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年）。曼德尔什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Nadzezhda）的回忆录《希望与希望的对抗》（Hope against Hope）直到1960年前仍不准出版；但是它们提供了俄国地下文化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中欧，极权主义的先兆笼罩在卡夫卡（Kafka）的《城堡》（Castle）（1925年）和《审判》（The Trial）（1926年）、卡莱尔·恰彼克（Karel Capek）的寓言戏剧《昆虫表演》（The Insect

Play）（1921 年）、维特凯维茨（Witkiewicz）的小说《贪得无厌》（Insatiability），以及罗马尼亚的卢西安·布拉加（Lucian Blaga）（1895—1961 年）和克罗阿特·米罗斯拉夫·科尔莱扎（Croat Miroslav Krleza）（1893—1975 年）的作品中。卡夫卡作品中的反英雄主角“K”因被控永远不会被发现而遭逮捕，最终被两个戴夜礼帽的人“像一条狗一样”被杀死了。斯坦尼斯瓦夫·维特凯维茨（Stanislaw Witkiewicz）（1885—1939 年）以《维特卡西》（Witkacy）而闻名，他既是画家、数学家，又是作家，现在被认为是荒诞派戏剧的先驱。他在波兰以外的生活经历鲜为人知，他命中注定要在红军伙同纳粹德军入侵波兰的那一天自杀。然而，虽然没有博得公众的喝彩，如同卡普里（Capri）的一位瑞典医生所回忆的，阿克塞尔·蒙特（Axel Munthe）的《圣米歇尔的故事》（Story of San Michele）（1929 年）却被译成了 41 种语言出版。[**禁书目录**]［**荒原**］

[954]

荒原（WASTE LAND）

T.S. 艾略特（Ellot）的《荒原》诞生于 1922 年，作品反映的是一个居住在欧洲的美国人的故事。最初的草稿开始于：“首先我有一对触角在汤姆（Tom）的住地探索。”出版的版本开头是：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繁育着
丁香花离开了寂静的大地，混合着
回忆和欲望，激起
忧郁伴随春雨扎下根来。

艾略特的 4－3－3 行诗，大部分写成于瑞士，受到传说中的圣杯（Holy Grail）的启迪，由一连串神秘的文学暗喻和片段组成。其总体印象好似在一个已经被摧垮的文明的废墟上漫步。

最后一节诗在纷纭复杂的事物中表述了东欧的衰落：

那些佩戴头盔大批涌来的人们是谁
越过一望无际的平原，在干裂的土地上蹒跚
被平展的地平线所环绕……

一段注释提到引自瑞士小说家赫尔曼·赫斯（Hermann Hesse）的话：“起码欧洲东部是美丽的，在圣杯前往混沌之路后，它是移

动的酒宴，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Dmitri Karamazov）那样唱着歌。”

这首诗的结尾是：

伦敦桥正在倒下，倒下，倒下。

阿基坦大公（Le Prince d' Aquitaine）在废弃的塔楼中。

我用这些片断（未完成的作品）对抗自己的毁灭，

为什么后来第三行适合你。哈伊罗尼穆斯（Hieronymo）的再度疯狂。

Datta. Dayadhvam. Damyata.

Shantih Shantih Shantih

后来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时说：“各种各样的文艺评论家对我依照现代世界的评价翻译这首诗给予了荣誉。……对我而言……这恰是一片有节奏的挑剔之声”。[1]

在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一个短暂的年代内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始建于1923年关闭于纳粹上台后的1934年，法兰克福社会学院庇护了一个致力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交叉的边缘学科的知识分子阶层。诸如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enheimer）（1895—1973年）、西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年）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年）等人感到，现代科学还在寻找分析人类活动和帮助人类进步的有效方法。激进派和左翼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相对立，他们否认传统的逻辑和认识论，同时又畏惧技术、工业社会和渐进改革的祸患。他们追求的未证实的、受时代制约但不受其决定的“批判性理论”，给美国和1945年后欧洲的整整一代社会科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整体研究的最著名成果是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共同完成的《启蒙辩证法》（Die Dialektik der Aufklarung，1947）。[26] **[年鉴学派]**

在艺术领域，传统主义风格继续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继象征主义、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后，又有原始主义、达达主义、至上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登场。带头的实验者包括俄国流亡者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1866—1944年）、犹太流亡者马克·查格尔（Marc Chagall）（1889—1985年）、左翼的加泰罗尼亚流亡者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年）、意大利流亡者阿米迪奥·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年）、瑞士人

保罗·克雷（Paul Klee）（1879—1940 年）、奥地利人奥斯卡·柯柯什卡（Oskar Kokoschka）（1886—1980 年）、法国人简·阿尔普（Jean Arp）（1887—1966 年）和西班牙人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956] 1989 年）。法国是他们的麦加。他们的折中主义创作倾向终其毕生。克雷用纯色画出了抽象概念；达利画出了弗洛伊德的骚动的梦境；阿尔普在地板上作画。

在音乐领域，在战前形成的新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在许多国家都找到了新的拥护者：俄国人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和拉赫马尼诺夫（Rachmaninov），波兰人卡罗尔·希曼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wski）（1882—1937 年）和匈牙利人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 年）。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的东欧人，他们的突出之处在于强调文化的联系超越了发展中的政治分野。[STRAD] 德国人卡尔·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 年）在作曲和音乐教育方面享有盛名。他创作的世俗清唱剧《卡尔米娜·布拉娜》（Carmina Burana）（1937 年）为中世纪的诗歌配上了动人的、舒缓的、质朴的乐曲。[乐调]

在建筑和设计领域，瓦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 年）在魏玛（Weimar）建立了包豪斯建筑学院，后被纳粹当局关闭。包豪斯建筑学院从表现主义和结构主义中依次汲取了灵感，开创了实用的方法。它的杰出人物包括伊登（Itten）、莫霍伊－纳吉（Moholy－Nagy）、康定斯基（Kandinsky）和克雷（Klee）。

除国际性的隔阂最容易被消除的音乐界以外，东欧对文化先锋派的贡献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一些小团体或个人或是通过移居西方而闻名，如罗马尼亚的雕塑家康斯坦丁·布兰苏西（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 年）；或是通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家赞助的苏联展览会而引人注目的人物，如卡吉米日·马雷维奇（Kazimierz Malewicz）（1878—1935 年）、帕维尔·费罗诺夫（Pavel Filonov）（1882—1946 年）、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omir Tatlin）（1885—1953 年），或是亚历山大·罗津科（Alexander Rodchenko）（1891—1946 年）。自然，对先锋派的充分接受在各处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在东欧，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和共产主义更长时期的统治，将非正统文化驱逐入黑暗之中达半个世纪之久。例如，捷克早期的立体主义的“奥斯玛团体”（Osam Group）汇聚了这样一批画家，如安托宁·普罗查兹卡（Antonin Prochazka）（1882—1945 年）或波胡米尔·库比斯塔（Bohumil Kubista）（1884—1918 年），仅以最特殊的专家而闻名。立陶宛象征主义先驱米卡罗尤斯·丘尔留尼斯（Mikalojus Ciurlionis）（1875—1911 年）或结构主义理论家与实践者弗瓦迪斯瓦夫·斯特拉明斯基（Wladyslaw Strzeminski）

(1893—1952 年)的重要性，以及犹太人存在的实力，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举办的展览会上才被显露出来。[27]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其文化一致性较之当时表现出来的状况更为深刻。

[955]

年鉴学派（ANNALES）

1929 年 1 月 15 日，《经济和社会年鉴》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创刊于巴黎。[1]在简短的前言"致读者"中，有两位主编的签名——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 年）和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 年）。前言表示相信新刊物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刊登了四篇主要文章：古斯塔夫·格罗茨（Gustave Glotz）论希腊古代文献的价值；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论中世纪商人的教育；M. 鲍蒙特（M. Baumont）论最后一次战争以来的德国工业活动以及 G. 梅盖（G. Mequet）（吉尼娃）论苏联的人口问题。在第二部分"科学生活"中包括许多新题目，布洛克（Bloch）的"小块土地纲要"或"土地资产纲要"以及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撰写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生涯概况"都附有技术性的描述。评论部分刊登了十多篇论文，论述的范围从西西里（Sicilian）的奴隶到威尔士（Welsh）的经济史。封底为该杂志主要创办者之一的《阿蒙·科林文集》（Armand Colin）做了广告，也为韦达·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与 L. 加卢瓦（L. Gallois）的 22 卷《环球地理》做了广告。

《年鉴》不仅仅是要创办一本杂志，而是要创办一个极有权威的历史学校。其目标在于打破已经确立的权威，并通过从社会科学中汲取技术和论题来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不仅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且心理学、人口学、统计学、地理学、气候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医学都具有自己的位置；特别重视跨学科的学术探讨。[2]

《年鉴》的知识分子背景正在显现。费弗尔与布洛克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相会。前者以对弗朗什—孔代地区的研究而著名。布洛克当时正从事法国农村史的研究。他们既没有意识到吸引当时的史学界明星诸如外交史学家雷努文（Renouvin）的注意，也没有意识到吸引文献注释研究家福斯泰尔·古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的注意。两人都受到与众不同的大师的影响。其中一位是爱弥尔·杜尔干（Emile Durkheim）（1917 年去世），一位先锋派社会学家。第二位是保加利亚人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 年），他的研究集中于中世纪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史"。第三位是韦

达·白兰士（1845—1918年），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也是人文地理学的创立者。正是韦达·白兰士，他鼓励费弗尔和布洛克走出去，到农村去寻找有关往事的新来源和新视角。[3]

可能最发人深省的是，《年鉴》最初的主编准备发动反对职业犯罪的斗争。那是一种专业化的罪行。历史学家们更加密切地关注他们自己背后的隔断或"隔断墙"。呼吁是明确的：

"如果所有正统的专家在精心料理自己花园的同时，依然能费心研究自己邻居的工作，再没有什么会比这更好了。可是墙高得经常挡住了视线。我们自己意识到只要表明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克服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4]

[956]

如果威胁在1929年就能被认识，反对职业犯罪的斗争必将在随后几十年内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

[957]

乐调（TONE）

1923年，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完成了他的小夜曲。这是完全用十二音体系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十二音体系是标榜无调性音乐的先锋学派精选出来的表现方式。[1]

甚至从中世纪开始，十二音调就以大调或小调的形式构成了欧洲音乐原理中的基本要素；每个八度音调的八分音符都向作曲家们提供了音符的蓄水池，从中构成旋律、和弦与和声。比较之下，在十二音体系中，传统的音调和八度被摒弃，以利于使用所有十二拍半音阶音符的基本序列或音列。每一个序列都能在音阶中的任何音高、任何点上开始，即能处理为转位和回归，对每个系列提供48种可能形式。合成的音乐充满先前闻所未闻的音符的间隔与混合，造成不寻常的剧烈的刺耳的听觉效果。它表现出的一种与过去的决裂就像抽象的、非表现性的艺术或非语法的"有感知的小溪"式的散文那样激进。在勋伯格之后，它的主要实践者是贝尔格（Berg）、韦伯恩（Webern）、达拉皮科拉（Dallapiccola）、卢蒂恩斯（Lutyens）与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

无论怎样，无调性不是解构音乐形式的惟一途径。巴黎的"六人团"把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1866—1925年）奉为自己的导师，他们包括阿尔图尔·奥涅格（Artur Honegger）（1892—1955年）、达利厄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年）与弗朗西

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1899—1963年）。他们以多调性做实验，即同时使用两个或更多的音调。保尔·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年）通过使用和声系列扩展了调性的和谐。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898—1993年），来自圣苏尔皮采（St Sulpice）的风琴演奏家，受到东方音乐基于鸟鸣的旋律和与可视色彩相配的音调的启发，发展了复合节奏。亨利克·古莱茨基（Henryk Gorecki）（1933年生）在中世纪的和声和自由节拍中寻找灵感。哈里森·伯特维斯特尔（Harrison Birtwhistle）（1934年生）将文艺复兴的单音音乐转变为新的用法。安托尼·伯盖斯（Anthony Burgess）（1917—1993年）遵循批判主义和虚构的思想写下了后调性音乐。[2]

梅西安（Messiaen）和古莱茨基都是天主教信徒，寻求以现代主义方法再现旧时的效果。前者的《时间终结四重奏》（1941年），在战时写成于西里西亚狱中；后者出众的、广泛流传的第三交响曲（1976年）也是以在西里西亚的战时经历为动因，反映了对时代与心境的特殊感悟。他们比理智的十二音主义者拥有更广泛的听众。[3]

[958] 不过，现代主义日益增强的声望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内战时期欧洲文化的最强劲影响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变革和美国。收音机、柯达照相机、大众化的留声机，尤其是电影，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多亏好莱坞，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1889—1977年），一位父母双亡、来自伦敦东区的街头表演者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他的许多影片，如《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年）、《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5年）以及《大独裁者》（The Dictator）（1939年）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启示。其他欧洲人通过银幕再输出，这些人包括瑞典人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德国人玛琳娜·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和波兰人波拉·内格丽（Pola Negri）。时尚的美国进口货还包括大众化的汽车、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的动画片（1928年）、爵士乐、流行舞曲。许多欧洲的年轻人随着查尔斯顿舞和探戈舞的旋律从一次战争跳到另一次战争。

在社会经济领域，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迅猛向前推进，但是极不规范。战争的需求给重工业的发展和广泛的技术革新带来强劲的动力。然而，和平开始处于范围广泛的市场、贸易和信贷的混乱之中。尽管存在着发展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石油和摩托化等新兴领域，但工业化国家依然面临战后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社

会抗议。

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刚刚开始，更别提获胜了。例如在英国，曾因参加东部起义被判处死刑的女伯爵戈尔·布思（Gore - Booth）（马尔基耶维茨（Markiewicz）女伯爵，1868—1927年），以全英国第一个当选的女议员和爱尔兰第一位内阁女部长而著称。[28]但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从它最忠诚的斗士爱莫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年）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但直到她逝世那一年也未能在英国获胜。控制生育的先驱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1880—1958年）于1921年开办了英国第一家控制生育诊所，她还是在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 University）任教的专业古生物学家。[避孕]

由于迁移机会少，农产品价格剧烈下跌，本地和外国的资本投资停滞等问题，东欧的农民社会面临农村人口过剩。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德国的经济瘫痪和对苏联的人为孤立引起了超出两国边界的巨大混乱。刚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不久，整个欧洲就遭受大萧条的袭击。

落入德国和苏联圈套的中东欧国家面对极其特殊的困难。在为建立稳固的政治制度而斗争的同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国家被迫承受诸帝国垮台的经济后果。在半工业化的和大量的农村并存的状况中，它们初始的经济发展在超级通货膨胀、战后工业萎缩和农村贫困等诸多重负下开始起步。以该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城市罗兹（Łódź）为例，1918—1939年该城的生产下降了75%，当时[959]它传统的俄国市场被关闭。农村社会发生了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原因有三：保守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激进的农民政党之间发生冲突；新的政府官僚与外资企业主的压迫以及阶级和种族间的对抗。从这点来看，在教育和扫盲方面、在瓜分大地产方面、在城市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非常值得尊重——部分原因是因为后来的制度要否定任何一项已经取得的进步。

空前的有计划的现代化于1929年开始在苏联出现了。它是如此激进、如此冷酷，以至许多分析家认为，是这次发生的事情而不是1917年那次，构成了真正的俄国革命。[29]此举为自1922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约瑟夫·斯大林攫取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性。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1879—1953年），即“科巴”也即是“斯大林”，在历史上通过施展犯罪天才夺取最高权力的病态罪犯中，他是最鲜明的一个范例。他以“大清洗”而居吉尼斯纪录之首。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哥里（Gori）附近的山村迪迪里洛（Di-di - lilo），父亲是个醉汉，母亲虔诚却遭遗弃。格鲁吉亚人说斯大林是奥塞梯人（Ossetian）。总之他不是俄罗斯人，虽然曾被送入俄罗斯

东正教办的神学院受教育。他被开除了，但不是在他已经接受了在格鲁吉亚被看作异教的俄罗斯基督教偏执狂的民族主义之前。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革命政治家，在那贫困落后的地方，政治的和罪犯的地下组织是互相重叠的。1908 年，斯大林加入布尔什维克，当时他策划了沙皇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武装抢劫案，在第比利斯设伏袭击邮车，劫走了押运的黄金。他再次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而他又再一次从那里逃跑了。这件事的细节招致了怀疑，首次是对斯大林最不满的传记作家托洛茨基提出的，他认为斯大林是沙皇和秘密警察的代理人。1917 年初，斯大林最后一次从流放地出逃后来到彼得格勒，在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或马克思主义工作证明的情况下，他担任了《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在革命年代里，他被列宁挑选担任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并建立了一个忠实追随自己的小圈子，特别明显的是在察里津（后来更名为斯大林格勒），此后他们把命运交到了他的手中。斯大林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 1920 年 8 月的波兰，当时，作为西南战线红军的政委，他无视同图哈切夫斯基部队联合作战的命令，并受到党内法庭的指责应对发生的灾难承担责任。他照例不会受到制裁；但他永远没有忘记这件事。（17 年之后，图哈切夫斯基与他 1920 年以来的四位战友被批准处以死刑，在判决书上签字的三位将军都曾在斯大林领导的西南战线服役。）

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期间，斯大林成为党的总书记，而且由于列宁的忠告来得太迟，他才免于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按照托洛茨基的说[960]法，他毒害了列宁以防遭到进一步的审查。以后，由于契卡（Cheka）和党的代表大会都被他老练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了。他继续熟练地施展狡诈和犬儒主义。他以智谋挫败了所有比他资格老的对手，他根据政局的需要摆布他们，或冷漠地接纳他们或败坏他们的名誉。这一招使他在五年内打垮了加米涅夫（Kamenev）、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布哈林（Bukharin），七年内斗败了托洛茨基。然后，斯大林把他们置于死地。他没有家庭生活。他逼得第二个妻子自杀身亡。他像隐士一样生活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由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照料。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回忆录是一份原始资料。他和他的老战友们总是白天睡觉，夜间工作，只是靠不断地听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和去他的乡间别墅度假放松一下。他极少抛头露面，很少讲话。在每年一度的格鲁吉亚之行中，他乘坐五部自制列车中的一部，其他的每一部都乘坐着一个他的“替身”，以减少遇刺的风险。他本来就用不着紧张。他一生很少讲母语。后来，虽然他除了俄语以外不讲外语，但他证明自己在外交方面如同在国内专制和战争指挥方面一样都十分精干。当他最终

倒下时，他是一个从未遇到挑战的超级大国的主宰。

在寻找最佳人选以描绘斯大林的头号竞争对手中，一位彼得格勒的美国军官曾经称托洛茨基为“一个荡妇的四等儿子，却又是耶稣基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人。”[30]然而斯大林的记录却要使托洛茨基的成就看起来像历史的小变化。托洛茨基预见到了未来：还在1924年他就已经正确地预言，“党和革命的掘墓人”将成为主宰：

“历史的辩证法已经钩住了他，并将把他高高举起。所有这些人都需要他，陈腐的激进主义者、官僚阶层、私营企业主、富农、暴发户、钻入革命土壤中的种种异己势力……他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而且知道怎样领导他们。斯大林将成为苏联的独裁者。”[31]

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的操纵者，斯大林有各种权利被判定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他曾谦虚地说过，“领袖只是匆匆过客，而人民在历史上永存。”[32]事实上，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只得成为匆匆过客，而领袖则在历史上永存。只有一个人的罪恶能够同斯大林相比拟，即另外一个留着奇特胡须的小个子，斯大林从未见过他，而且他也不像斯大林那么成功。

斯大林一旦稳固地掌握了权力，苏联人的生活节奏就开始飞速旋转。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效地恢复了社会和经济平衡；但它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解决苏联的现代福利无所作为。因此，出于对他的无限控制力的自信，斯大林开始从事一项非常危险的计划，该计划设计在十年内把苏联打造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工业和军事强国。它的雄心令世人惊讶；但就人类生活来说，它造成的破坏超过了欧洲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灾难，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遥远的大学中它那些依然兴旺发达的辩护士们善于坚持“要煎蛋就得打破蛋”（有失就有得）。[33]但是斯大林正在驯服他认为生活正得到改善的人民；最终煎蛋[961]证明不能吃。这里存在六个互相关联的主要因素：中央计划、加速工业化发展、重整军备、集体化的农业、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恐怖。

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方法超过了此前任何地方的任何尝试。国家计划委员会被授权制订五年计划，五年计划规定了国民经济每个部门的每个活动细节——生产、贸易、服务、价格、工资、成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人都被规定了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定额”。由于苏联政府垄断了就业，所有的职工都变成了“计划的奴隶”。实际上，由于党强调社会主义竞赛的时代精神，即强制工人通过效法传奇的煤矿工人阿列克赛·斯达汉诺夫（Alexei Stakhanov）提高自己的定额，超额完成计划成为一项制度化的要求。1928—1932年、1933—1937年和

1938—1942 年三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化以消费市场的缩小为代价而得以实现。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干得多，吃得少”。工业增长率每年以 20% 以上的幅度增长。全部初级工业产品以天文数字增长：1928 年该指数达到 1913 年水平的 111%，1933 年达到 281%，1938 年达到 658%。重工业——钢、煤、动力和化工工业实现了优先增长。数量远远凌驾于质量之上。虚假的统计数据变成官方崇拜的目标，他们的中央神殿坐落在永久性的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内。

重整军备未被宣布，不过军工生产综合体明显地成为变化中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单独分出的秘密军工部门拥有受到优待的工厂、人员和预算（这种特殊单独预算的存在直到 1989 年才被否决。）从 1932 年起，红军可以邀请其德国同行参加训练和操纵使用最现代化的武器——包括坦克、军用飞机和空降部队。

在 1917 年被延缓实行的农业集体化现在在完全无视人的价值的前提下开始实施。目的是在农村大部分劳动力被抽调到新兴工业化城镇时期，要确保国家完全控制食品供给。在 1929—1938 年的十年内，苏联 260 万农民土地中的 94% 被合并到 25 万个国有“集体农场”(kolkhozy)。在获得解放 70 年之后，俄国农民又退回到枪口威逼下的农奴制，所有敢于反抗者都被枪决或放逐。捏造出一个虚构的社会公敌——富农或吝啬的农民来为屠杀辩护。据估计，有 1500 万男子、妇女和儿童死亡，农业生产下降了 30%，天灾人祸遍布大地。

创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采用了大量官方的臆造，这些臆造随后被当做绝对的和颠扑不破的真理强制推行。这[962]些官方的捏造与严肃的政治哲学毫无共同之处，完全背离了列宁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包括：列宁“最优秀的门徒”斯大林的作用；精选出来的人民领路人共产党人的作用；苏联各族人民的老大哥伟大的俄罗斯人的作用；“所有爱国主义和进步力量”的最高成就苏联的重要地位；民主权利的源泉宪法的作用；苏联人民的统一和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爱；针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圈”；财富的公正分配；学术与艺术的活跃自由氛围；妇女解放；工农联盟；人民对敌人的“义愤”。许多这类的虚构被载入号称“真理的圣经”的斯大林所著的苏共党史（CPSU）简明教程（1939 年）——忠实信徒的权威著作之中。苏联的学者、教育家和立法者被迫宣传上述内容以求保命；西方学者从不这样做。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国所有的第一流诗人和艺术家都被征召到合唱队：

你，各民族光辉的太阳，

我们时代永远不落的太阳，
你比太阳更伟大，
因为太阳没有智慧……[34]

在宗教事务方面，斯大林主义继承了无神论的思路。国家教育积极反对宗教。在1920—1930年，东正教遭到无情的攻击，教堂被捣毁，神职人员被杀害。以后，重点进一步转向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号召人民捍卫神圣的俄罗斯，并重新开放教堂。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包含了国家无神论和东正教爱国主义的神奇共生。

高压统治和恐怖的主要工具——契卡（以及后来的国际政治保卫局/内务部/克格勃），古拉格（Gulag）或称国家集中营网，以及从属的司法审判——在布尔什维克早期就已经被完善了。在30年代，这些机构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其安全情报人员的规模足以与红军相匹敌，其所属集中营关押了全国人口的10%以上。到1939年前后，古拉格成为欧洲最大的就业部门。它的囚犯雇员——Zeks，被人为地有计划地饿死和累死，其平均预期寿命只有一个冬天。无辜的受害者被关在他们的家中和村庄里；其他那些被冠以“破坏分子”、“叛徒”和“奸细”等莫须有罪名的人则遭到严刑拷打直到其招供。通常的判决或者是立即处决，或者是有期徒刑或流放，八年、十二年或二十五年，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对最重要案犯的公开审判是以维护公众利益的名义进行的。他们还对重要审判的性质和规模加以掩盖。这种令人窒息的恐惧笼罩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达30年之久，大多数有关大恐怖的具体信息被成功地隐瞒起来。[**沃尔库塔**]

[963]

沃尔库塔（VORKUTA）

如果历史书将足够的篇幅用于描述人类的灾难，那么沃尔库塔肯定会成为其中最长的章节之一。从1932—1957年，这座俄国北极圈内佩赫拉（Pechora）河畔的采矿小城，位于欧洲最庞大的集中营群体的中心。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中，沃尔库塔营仅次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库利玛（Kolyma）营而位居第二，它的大门顶上拉着一幅标语：“劳动是一种具有荣誉、勇敢和英雄主义的事情”。1953年劳改营犯人暴乱时，沃尔库塔大约关押了30万犯人。多少年过去了，在那里受到损害的生命比在奥斯维辛还多；他们在绝望中缓慢地死去。但是，几乎没有历史书记载他们。[1] 有

许多来自沃尔库塔的见证人的报告，其中一些是用英文出版的；[2]但几乎没有人读到过这些读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甚至还有一位犹太幸存者写了一本关于2000多个苏联劳改营设施的详尽指南。他的记述几乎无人知晓。[3]除了类似的集中营、监狱和“精神病院”[DEVIATIO]，它还包括“死亡营”的一些部门。这些是类似在帕尔迪斯基半岛（Paldiski Bay）（爱沙尼亚境内）、奥特木特宁斯克（Otmutninsk）（在俄罗斯境内）和赫罗沃卡（Cholovka）（乌克兰境内）营内的设施，其中的囚犯被迫在没有防护的条件下从事清洗核潜艇或挖掘地下的铀矿。放射性引起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4]（见原书附录Ⅲ，第1330页）

在公开性时期的高潮，白俄罗斯明斯克附近的当地居民着手在库罗帕蒂（Kuropaty）森林挖掘。他们知道这里是50年以前的大恐怖时期许多被杀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遗骸的掩埋处。他们掀开了一系列圆形凹陷的覆盖物，每一个都包括一个埋着大约3000具尸体的巨大墓穴。假使松林中没有数百个这样的凹陷，他们很难看到真相。但是，到1991年，人们接到命令停止这项工作。他们在路边立起一个十字架，留下了松林未被触动的秘密。[5]

1989年，致力于揭开斯大林时代真相的俄罗斯“悼念”组织在乌拉尔（Urals）地区的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发掘出一个30年代掩埋过的深坑。里面发现了8万个人的骨架。子弹穿透的头颅讲述着一个真实无误的故事。他们不是在古拉格劳累致死的牺牲者。当地的一位摄影师说：“受害者被人拿走了自己的低跟女鞋，连同他们的孩子在此被枪杀。”[6]

人们有权问：广袤的俄罗斯究竟隐瞒了多少这样的屠杀场所？

[964] 斯大林恐怖主义时期的三个阶段相继达到了残暴和荒谬的高潮。起初的恐怖行动直接针对精心选择的目标。这时恐怖行动的牺牲者主要是二流人物——1929年以前国家计委的前孟什维克管理人员、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和重要人物的下属。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受到警告，她不是“不可替代的”。由于农民抵制集体化或抗议任意屠宰他们的牲畜，1932年以后，农民恐怖行动或称“驱逐富农”行动迅速蔓延。对富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然而比较贫困的农民却被鼓动去消灭比他们更富裕一些的邻居。1932—1933年出现的恐怖性饥荒是具有双重目标的集体化运动的副产品，集体化运动意在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和一举把全国的富农尽可能集中起来。[收获]

收获（HARVEST）

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男人、妇女和儿童在“一场大约涉及四百万居民的扩大化的大恐怖”中正处于死亡或濒临死亡的境地，“如同一个巨大的贝尔森（Belsen）（集中营）。”“其余的人处于衰弱的各种不同阶段，甚至无力埋葬自己的亲属或邻居。”“（如同在贝尔森一样），营养良好的警察和党务官员小组监督着受害者们。”[1]

1932—1933年，作为苏联集体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大林体制在乌克兰以及比邻的哥萨克（Cossack）地区发动了一场人为的恐怖性饥荒。所有的食品储备被强制征用；一条军事封锁线防止进口各种食品；人民大众被留下来等死。运动的目标是消灭乌克兰人的民族特征连同“阶级敌人”。死亡人数大约达到七百万人。[2] 世界发生过许多可怕的饥荒，内战又加剧了这些饥荒。但是，通过国家政策来组织一场大屠杀行动般的饥荒，必然被视为惟一的。

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此后这样描写儿童：

> 你曾见到过德国集中营内关押的儿童的新闻照片吗？他们就是这般模样；他们的头像沉重的球压在细细的脖子上，好似鹳一般；……此外，他们的整个骨架上紧绷着一层黄色的薄膜般的皮肤……春天到了，他们对这一切已经不再有表情了。他们却有着带有喙的像鸟一样的头——或蛙头——薄薄的白嘴唇——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像鱼一般，张着嘴……这些是苏联儿童，而那些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是苏联人民。[3]

外界没有被告知。在美国，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颁给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位记者，他淋漓尽致地讲述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但是没有刊登出来。[4] 在英国，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抱怨道：（恐怖性饥荒）“避开了绝大多数英国亲俄分子的注意”。[5]

最终找到了上述事件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历史学家努力揭示了它的滔天罪恶。他写了一本412页的书，平均每页大约500个单词，然后，他在前言中说明：“在这本书中，不是每一个单词，而是每一个字母就意味着大约20个人丧失生命。”[6]

政治恐怖行动或"肃反"始于1932年12月初，起因于列宁格勒地区党的领袖S.M.基洛夫（Kirov）遇刺。以此为起点，政治恐怖行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展，直至吞没了苏共的领导层，包括红军将领和契卡本身，并最终波及全体国民。由于每个牺牲者都被要求消除十至十二名同谋甚至其家庭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时涉及的人数以千计，最后达到了数百万之多。最初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在世的老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支持的一切事物。然而，那仅仅是个开端。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者的大会"的代表们，他们驯服地欢呼过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却发觉他们自己反而遭到被审判、被大批处决的下场。经过对季诺维也夫（1936年）、皮达可夫（1937年）和布哈林（1938年）的三场主要的公开审判后，只剩下惟一活着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他在设防的墨西哥避难所活到1940年。但是性子极其暴烈、不分青红皂白的头号恐怖魔王、斯大林的首要刽子手叶若夫（N.I.Yezhov）仍然不受约束。这样的事物是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Molotov）为首的恶魔似的领导核心的动力。1939年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每天早上都签署一份上书几千名受害者姓名的名单，同时各地秘密警察分支机构又得到更多的任意处置无辜平民的配额。直到1939年苏共十八大召开以前，恐怖行动始终没有停止。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冷漠地指责叶若夫是堕落者；直到领袖死亡，恐怖行动才彻底停止。

在数十年内，外界舆论都不能了解事实真相。在60年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纪实性著作问世，以及少数勇敢学者的悉心研究成果出版之前，西方大多数人都认为恐怖的描述被大大地夸张了。大多数苏联问题专家倾向于缩小恐怖的程度。苏联当局直至80年代才承认此事。与希特勒不同的是，斯大林没有为公开揭露付出代价。他的牺牲者的总数永远不可能确切地计算出来；但却不大可能多于5000万。[35]

无疑地，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许多在列宁的一生中并不显著的特征。托洛茨基把这种变化归之为"热[965]月党人的反应"，这使得所有关于苏维埃和共产主义历史的争论变得非常复杂。回忆的主要事实是斯大林主义成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得以稳定的形式，它提供了苏维埃在苏联活动的基础一直到1991年。因此，它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必须对这一体制作出总的评价。（见原书附录Ⅲ，第1321页）

1929年是苏联发生斯大林革命的一年，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危机的一年。历史学家惊讶于这两大事件是否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而

没有被联系起来，也许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调整的节奏。在所有的事件中，1929 年 10 月 24 日的“黑色星期四”，纽约证券交易[966]所的股票价格突然崩溃。恐慌到来了；各银行纷纷收回贷款；在采取任何能够控制上述局面的措施之前，大萧条正在涌入所有与美国存在商务往来的国家。这是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扩大影响的讽刺性的回敬。在美国国内，短期信贷“暴涨 20 天”的突然中止，导致大规模的破产浪潮，转而又引起随之而来的失业浪潮。“衰退”在 1933 年达到顶点，美国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失去工作；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其生产能力的 10%；食品储备由于饥饿的工人们无力购买而遭到破坏；“贫困在富足中肆虐”。

欧洲当时正为偿还战争债务而奋斗，并经常从减少黄金储备开始，其所感受到的衰退的影响并不比延期一年偿还债务更大。1931 年 5 月，奥地利的主要银行——维也纳信贷银行宣布自己破产；6 月，美国只得接受欧洲各国政府延期偿还全部债务的要求；9 月，英格兰银行被迫将英镑脱离金本位。信用，资本主义的基石正在坍塌。在几年中，商业失去销路，三千万人失去工作。到了 1934 年，美国有了一位新的、精明强干的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他的由政府创建工作岗位的新政意在拉动美国走上繁荣。他说：“我们惟一担忧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欧洲没有罗斯福，也没有新政。复苏之缓慢正如衰退之突然。

大萧条的影响是心理上的、政治上的，也完全是经济上的。从银行家到旅馆的门童，每个人都茫然不知所措。世界大战曾带来了死亡和毁灭；但是它也带来了生活的目标和充分就业。而和平似乎两样都没带来。有些人说，生活在危险和战壕里的友情之中总比靠失业救济为生强。其他人则认为，斯宾格勒（Spengler）关于欧洲正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的悲观思索是正确的。焦虑使街头充满暴力：在欧洲许多城市，左翼的战斗小队猛烈攻击右翼团体。那是骗子、冒险家和极端主义者大显身手的时期。[死亡]

[968]

死亡（MOARTE）

1927 年，科尔内留·科德雷阿努（Corneliu Codreanu）在布加勒斯特组建了阿尔亨盖尔·米哈伊尔（Archangel Michael）军团。连同他的准军事的侧翼部队——铁卫军，它发展成为欧洲最具暴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之一。在1937年，它保障了自己在大规模右翼—种族主

义的选票中获得多数票,而在1940—1941年,由于同安东尼斯库(Antonescu)将军的军队结盟,它一度控制了罗马尼亚的"民族军团国家"。1941年2月,它发动了反对军事盟友的叛乱,但被镇压下去。

该军团的意识形态阐述了一种独特的关于"血与国土"题的变种,给予祖先的骨骸以特殊的位置。在复兴罗马尼亚的命运中,它要求创造一个生者和死者的民族共同体。党的仪式以对死者的崇拜为中心进行。每次大会从对阵亡同志点名开始,对他们名字的回答是大声喊"到"。众圣徒坟墓中的土与党的战场上浸满鲜血的土混合在一起。隆重的仪式由挖掘出烈士的遗体、清洗和再安葬组成。挖掘出了1938年死于谋杀的首领科德雷阿努(Codreanu)的尸体,成为该军团当权的数月中最重大的事件。纳粹的飞机飞临上空,把花圈投到敞开的陵墓上。科德雷阿努只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尼亚数百个死于政治谋杀的人之一,当时军团的敢死队在与国王的政治警察部队连续作战。科德雷阿努是被绞死的,在秘密埋葬前被人用枪射击头部并用硫酸毁了容。他被埋在七吨混凝土之下。

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东正教徒确信,死者的灵魂直到尸体腐烂才离去。有鉴于此,依照传统,在死者第一次下葬和挖掘出尸骨后,整个家庭聚居三至七年,满怀深情地为死者用葡萄酒清洗,以便使其灵魂进入不朽的境界。人们还相信,有些类别的尸体不会腐烂。东正教实施逐出教门的仪式包括"身体可以永不消失"的词语。当出现被凶杀者和自杀者时,受到折磨的灵魂被认为将永远滞留在坟墓中。在马拉穆列什县(Maramures),人们举行"死亡婚姻"的仪式,以便抚慰这些灵魂。

在罗马尼亚的一些地区,民间还保持着一个落入陷阱的灵魂可以在日落和鸡叫期间逃跑的传统。尤其是在圣安德烈日(St Andrew' Day)(11月30日)和圣米哈伊尔夜(St Michael's Eve)(11月8日),复活了的尸体返回到世界上,从锁眼中钻入房屋,对睡眠中的牺牲者进行性诱惑并吸他们的血。为防护这类不速之客,农民们要牵着黑色种马走进墓地。对任何种马厌恶迈过的坟墓,他们就在那个可疑的尸体上钉一个大木桩,把它钉住。根据最早的人类学研究,它以一个吸血鬼的国家而著称。[1]

[969] 政治学家总结到: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只是同类中一个丑恶的变种,它具有反犹太主义和恋尸狂的特殊兴趣。人类学家可以得出结论:它激发起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民族传统。1991年12月,随着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垮台,一个"新的罗马尼亚运动"出现了,它以科德雷阿努作为自己的英雄。[2]

在德国，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崛起无疑地被与大萧条联系了起来，但这又不是一种简单的联系。纳粹分子并没有带领失业大军进军柏林；没有“夺取政权”。希特勒不必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去颠覆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也不必像墨索里尼那样去威胁国家首脑。希特勒通过参与德国的民主进程，并经合法政权的邀请获得了权力。这同他和他的喽罗们实际上并不是民主派或立宪主义者无关。

德国应对大萧条的政策特别脆弱，大萧条的影响仿佛被倒入已经溢满危险的杯中。战败的积怨仍然存在，极左与极右翼势力的街头争斗随时可见，民主派的领导人受到联合政府与选民们的忧虑这两方面[967]无情的挤压。在整整十年内，德国经济先是受到赔款的重压，以后又遭受超级通货膨胀的压力。到了20年代末期，德国经济几乎完全依靠美国的贷款。当施特莱斯曼于1929年10月去世时，克拉什上台之前几天，没有人事先对骚乱做出预报。同样没有人预见到，1930—1933年接连发生的骚乱伴随着一系列不寻常和无法预料的事件。

在那些年里，纳粹分子第一次参加了接连举行的五次议会选举。在三次大选中，他们的选民和当选的议会代表都增多了。在1932年11月的第四次大选中，他们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他们从未赢得过绝对多数。然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纳粹党在帝国议会中奠定了其单独的最大政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变化多端的国际背景下，街头的暴力行动日益升温，而纳粹党徒则对此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20年代初，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被协约国显然毫无限制的权力所冲淡。如果共产党人试图接管政权，德国的工业家和民主派确切地知道要请谁来。但是，在30年代初，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内状况并不比德国强；而苏联看起来正朝气蓬勃地实现着现代化。随着共产党人得到了几乎与纳粹党一样多的选票，德国的保守派领导人控制红色威胁的手段大大减少了。

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大概也潜藏着这样一种感情，即可以通过对特殊争议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来对大选加以补充。对这种机会，希特勒当然不会错过。在内阁行将垮台的混乱中，一位任期短暂的部长恳求行使非常时期的总统权力。1930年9月，为了民主的利益，一位少数派总理说服兴登堡（Hindenburg）总统行使魏玛宪法第48条款。从此以后，德国总统就有权“动用军队维持秩序和安全”，并且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可以用来推翻民主制度的工具。

这些事件的后果是残酷的。政治风暴延续了三年之久：经济深度衰退，失业队伍扩大，共产党人与反共分子在街上激战，选举一再推

迟，无休止的议会危机。1932年6月，由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为总理的又一个少数派内阁组成，经过纳粹党议员们做工作，巴本才得到议会的支持。六个月以后，巴本策划了另一次联合：他决定邀请希特勒出任总理，自己改任副总理，并将12名部长中的3名纳粹党部长安插进内阁。兴登堡总统和德国的右派议员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们正想利用希特勒来反对共产党人。事实上，当希特勒接受了邀请，粉墨登场时，是希特勒利用了他们。

不到一个月，也就是下一次大选的前一周，一场神秘的大火烧毁了德国国会大厦。纳粹分子随即宣布，这是一场红色阴谋，并逮捕了[969]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狂热的反共气氛中，纳粹党在大选中获得了44%的选票，随后，他们又毫不费力地通过了旨在保证总理在四年任期内独掌大权的授权法。10月，希特勒组织了旨在批准德国退出国联和国际裁军大会的公民投票。他获得了96.3%的赞成票。1934年8月，随着兴登堡总统的去世，希特勒立刻召集了又一次公民投票，要求公众赞同他在新的党—国中兼任元首和总理，并拥有一切紧急处置权。这一次他赢得了90%的支持率。希特勒从此控制了德国。在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后阶段，他一次也没有违反宪法。对希特勒的成功来说，个人的责任很容易确定。在此事四年之后，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接见了他从前的搭档冯·巴本。希特勒说："由于让我当了总理，赫尔·冯·巴本，你使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得以在德国实现。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冯·巴本回答道。"确实如此，我的元首。"[36]

希特勒靠民主政治取得的胜利揭示了民主的真正本质。民主本身鲜有价值：它是好还是坏，完全取决于运用它的人民。民主掌握在开明和宽容的人们手中，它就会产生开明和宽容的政府；民主掌握在食人者手中，就会产生食人的政府。在1933—1934年的德国，民主之所以产生了纳粹分子的政府，是因为德国选民的流行文化没有对排斥暴徒给予优先考虑。

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是一个奥地利人，根本就不是德国人却成为全德国的主宰。他出生在奥地利靠近巴伐利亚的边境小镇布劳瑙（Braunau），他的父亲（一个海关官员）是一个非婚生子。希特勒背负着这一耻辱长大成人（因此，熟人们有时不客气地称他为"Schickelgruber"——译者注：这是希特勒的祖母的姓）。他早年的生活充满艰辛和痛苦，更确切地说充满了灾难。他具有一定的艺术天分，但却错过了系统学习的机会。他在维也纳四处漂流，寄宿在破败的小客栈里，以做室内装潢和画明信片为生。他性格内向，愤懑不平，孤独寂寞，精通反对斯拉夫人和犹太暗娼的德国维也纳社会病理学派。当他逃亡到慕尼黑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而这对他的个

人苦难而言恰似一种幸福的解脱。希特勒服役期间作战勇敢，两次被授予铁十字勋章（二级和一级），当他的战友们在战场上战死和被毒气毒死时，他却幸免于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正躺在野战医院里，为德国的战败而深感痛苦。[**兰格玛尔克**]

希特勒战后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早年失意的空虚感。他的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接纳了一种陈腐的种族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它首先吸引了希特勒本人这样的流浪汉，随后[970]又吸引了数百万选民。在战败的德国的临时演讲台上和街头巷尾，他发现了自己雄辩和煽动的才干，而这将使他进入上层社会。他学会了在演讲时调整声音的高度和速度，打手势，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或充满狂暴的愤怒，所以，即使他演讲的内容毫不重要，也能强烈地感染听众。他的技能，不久将被探照灯、扩音器与和谐的齐唱放大，只能被比作复兴主义的鼓吹者和后来的流行明星的技能，后者虚幻的催眠表演引起大众的歇斯底里。他强烈的感情不可思议地与一个受辱的民族的感情相一致。他玩弄人民的恐惧，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和盟国的“背叛行为”咆哮。他仅有的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遭到彻底失败。1923 年 11 月的“啤酒馆政变”教育了他坚持使用“合法的手段”——群众集会、选举程序和政治讹诈。在对他进行审判时，他怒斥法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使他成为全国性的人物；以后他在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狱的两年使他有余暇撰写杂乱无章的回忆录《我的奋斗，1925—1926 年》，该书成了一本畅销书。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这确实是大多数德国人所乐意听到的。希特勒允诺使德国再度强盛起来，让“第三帝国”成为一个千年帝国。但确切地说，他只把这个帝国保持了 12 年又 3 个月。“在一个弥天大谎中”，他写道，“总有一些可信的因素”。

在私生活方面，希特勒始终是孤僻、不合群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结束单身生活。他喜爱动物和儿童，并一直保留一位家庭女教师。与他那些趾高气扬的丑角般的同僚们相反，他穿着考究，彬彬有礼。人们无法把他同个人的暴力相联系，尽管他明白无疑地下达过种族灭绝的命令（无记录）。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腓特烈二世的画像至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他爱引用腓特烈二世的话：“现在我了解了人，但我更喜欢狗。”[37]他的最爱是建筑学。20 年代，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山间别墅——贝格霍夫（Berghof），坐落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附近的一座山峰上。之后，他又迷恋上一个洋洋大观的计划，试图在故址上重建柏林，或者是把他的故乡林茨（Linz）变为欧洲的艺术中心。西方评论家们吹捧希特勒为“罪恶的天才”。“罪恶”是准确无误的，而“天才”则值得怀疑。[**幽灵**]

希特勒一旦掌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对手和竞争者。他必须碾碎党内的社会主义派别，其时党内的社会主义派别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群众基础，并且呼吁“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以维护他们的胜利成果。在 1934 年 6 月 30 日的“长刀之夜”，他召集了党内新的精锐卫队——党卫军“黑衫队”，去消灭党的老战斗队——冲锋队“褐衫队”。元首所有的直接对手——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党内社会主义派别领袖格奥尔格·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纳粹议会党团领袖冯·施莱歇（von Schleicher）将军被一举消灭。1933 年希特勒下令取缔了德国共产党，随后又解散了国内所有政党。夺取兴登堡的总司令部后，希特勒赢得了军队的支持，并清除了军队中的不可靠分子。

[971] 希特勒上台后没有提出重大的经济构思。德国毕竟不像俄国那样需要搞现代化。但是他不久就开始对集体经济进行探索，并采纳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雅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提供的蓝图。他要求最初的工业支持者们积极行动起来，并预测这一行动将会带来信任与就业。沙赫特的计划将凯恩斯的金融管理与国家对工农业的全面干预相结合：工会被纳粹党的劳动阵线所取代；罢工不受法律保护。像美国同行那样的新政策旨在通过国家资助的劳动创建计划实现充分开工和充分就业。旗舰计划包括德国高速公路建设（1933—1934 年），大众汽车公司的开办（1938 年），尤其是重整军备。

[972]

幽灵（BOGEY）

1938 年 3 月德军占领了奥地利之后不久，据说阿道夫·希特勒曾命令第 17 防卫区司令官，通过“打靶训练”摧毁多莱尔斯海姆（Dollersheim）村。村里的居民被迁走了，此外村里所有的建筑物连同墓地，均被炮火夷为瓦砾。这场野蛮行动背后的要害似乎是希特勒的父亲及其祖母玛丽娅·安娜·希克尔格卢勃（Maria Anna Schicklgruber）都安葬在多莱尔斯海姆村。并且，希特勒最近也获悉了其父早年生活的事实。根据盖世太保的报告，年轻的希克尔格卢勃小姐在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中充任家庭女佣时，以处女之身怀上了希特勒的父亲。从希特勒的观点看，暗示使他感到不安。

由此观之，加上许多其他迹象，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因其出身、血统、躯体和人格的强烈负罪感、羞耻心和自我仇恨种种感情而深受折磨。没必要采用表面上冲突的证据去推论，希特勒是心理分析史的一个首要人物。[1]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对元首战时的思维状况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他那难以控制的疑难病症。从 1936 年到 1945 年，他把全部信任倾注到一个可疑的医生泰奥·莫莱尔（Dr Theo Morell）博士身上，他经常以大剂量的葡萄糖、维生素、兴奋剂、开胃剂、松弛剂、镇静剂和止痛剂为希特勒治疗，通常是直接进行静脉注射。希特勒难以摆脱的肠胃胀气使他每天都得大量服用以阿托品和马钱子碱为基本成分的排气药。莫莱尔的对手们不断地向盖世太保报告，称他在用隐秘的手法毒杀元首。[2]

士兵们可以是天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些时候，按着“幽灵上校”壮观的节奏齐步前进，英军中有人谱写成这首令人难忘的短歌：

当希特勒只得到一个球时，
戈林有两个，不过小得厉害，
希姆莱宁愿要一样的
只有戈培尔一个都没有。[3]

这里的要点在 20 年后才揭开，当时苏联当局解禁了人们早就料想到的有关对希特勒的尸体解剖报告的内容，它声明：尸体“左侧的睾丸不见了”。[4] 这份报告带有依照克格勃（KGB）当局的计划抛出的痕迹，并没有得到其他见证人的支持。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严肃地对待此事。因为先天性的单睾丸变体非常罕见，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必然通过自阉而自残的。[5] 这个秘密即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格勃公开了其秘密文件后仍未得到解答。[6] [973]

然而对身体证据的调查并没有停止。希特勒众多的侧面介绍暗示出其道貌岸然的外表之下的一些丑闻。只要他在场，就不允许他人谈论哪怕是最轻微的性话题。他深深地惧怕乱伦。他公开表示厌恶各种类型的“淫秽”。尽管证据互相矛盾，他的性生活或是完全高尚的或是令人作呕的堕落。

在每个阶段，希特勒光辉的开局都被到处弥漫的失败感所破坏。此外，他反复冲动地自杀。在他带有政治仪式的爱情中，他沉迷于一系列所谓的宗教的天主教的拙劣的模仿之中。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觉得非说不可了，即历史、德意志民族、或者上帝、或者无论什么，都已经发现他是一个杰出人物。结论只能是：在他胸中沸腾的自我仇恨为公开的仇恨火上浇油，然后他把这种仇恨引向犹太人、斯拉夫人、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吉普赛人，

并最终引向德国人自己。

不用说，自我嘲弄是一种比自我奖励更为健康的机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在另一首壮观的副歌中行进，它以伤感的赞歌曲调歌唱“绿地上的冰山”：

我们是弗莱德·卡尔诺（Fred Carno）的军队，* 是一支引人嗤笑的步兵。
我们不会战斗；我们不会射击；
我们不使用流血的方法。
当我们抵达柏林时，德国皇帝将会说：
“啊！啊！我的上帝，多么血腥的、多么令人畏惧的一帮
英国步兵啊！”

有关纳粹主义同德国工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有争议的问题。共产主义学者十分赞同的标准的解释是，假设“经济原因居于首位”的论断。按照这种解释，巨大的商业利益不仅决定了短期的政治方针——旨在消除德国的左翼势力，而且也决定了德国的长期战略方针。德国对东方的扩张很可能起因于德国工业对原材料、稳定的原油供应和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相反的论断是“政治居于首位”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希特勒不久就抛弃了保护实业家的政策，发展国有部门作为平衡私人工业的砝码。例如自1936年，四年计划出台，帝国巨头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取代了帝国首席经济顾问沙赫特，促进国有钢铁企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在那个方针中都做了布置。折中性的解释则主张，是同盟“多头权力中心”的改变导致了纳粹党、军队和畸形工业结构的形成。[38]重整军备从心理上和政治上都非常重要。被人为约束的德国军事部门可以迅速复兴；从1933年起，克虏伯集团的营业额开始显著增长，而且重整军备还治愈了德国受到伤害的骄傲和自尊，争取了军队。德国军队在1935—1936年就能够采用征兵法扩军了。希特勒对怎样使用他重新武装起来的军队并没有一个精密的计划。但是，人们此刻恰好想到了希特勒的外套下装备着枪。

农业并不是纳粹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提出了组建农业合作社的计划。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让国家确定价格，并且保证农民的经济安全。

说得委婉些，纳粹的意识形态并不那么深奥。与斯大林不同，希

* 弗莱德·卡尔诺是当时民间巡回马戏团的所有者。

特勒未能继承一个能集中了自己意图的党的主体思想。他自己仅有的一本著作《我的奋斗》（1925 年出版），被想方设法放置于几乎每一个德国家庭的书架上。该书只包含二至三个连贯的思想，没有任何独到之见。其最重要的内容是一系列关于从假设的统治民族的存在到假设的德国有权向东方寻求生存空间的论点。

希特勒认为种族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他把各个种族分类为“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承担者”和“文化的破坏者”。当今“人类文化发展的承担者”是“雅利安人”。“雅利安人最大的敌人是犹太[974]人”。犹太人是雅利安人的死敌，最致命的敌人。希特勒既不想给雅利安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不想在雅利安民族之中建立民族等级制度。在他关于主题的章节中，他评论说，有些事情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都不需要解释。[39]希特勒还相信“种族纯洁”这一“铁的逻辑”。他说，“雅利安人每一次与低等人的结合，结果就是文明人民的死亡。”“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灭亡……由于血液污染/中毒。”[40]希特勒相信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依赖其民族领土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其人口和领土面积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41]

由于德国的邻国们已经拥有了大片的土地，或者在殖民地，或者在俄罗斯征服的大草原，而德国要想与它们竞争，就只有攫取与其国土毗连的东方的土地。“我们停止德国不断的向南方和向西方的行动，把我们的视线转向东方的土地。”[42]“德国扩展到波兰和乌克兰，将使其不但有实力与俄罗斯打仗，而且还能击退法国这个德国的死敌。”希特勒相信，德国是在不利的条件下正在为生存而战。“德国现在还不是世界强国，”他哀叹道，“德国或者将成为世界强国，或者将不复存在。”[43]

公开的种族主义带有集体主义的信条，它经常被诸如“民众的本能”这样含混不清的词语所描述，但它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至于希特勒自己对战前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义务，他曾说过：

“我只是合乎逻辑地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所缺乏的东西……如果它能冲破荒谬的民主秩序的束缚，民族社会主义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我们要对银行和工厂进行社会主义化担忧呢？我们要对全人类进行社会主义化。”[44]

近来的研究证实，青年的希特勒通晓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的群众集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45]他吸收的可能比他了解得更多：纳粹分子从未有过理智行事的

传统，而且他们的节制并不意味着原始社会主义被置于其视野之外。正是纳粹分子首先把五月一日规定为德国工人的全国节日。

纳粹的政策从这些少数人动摇不定的主张中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排犹措施的出台。犹太人被从国家公职人员和德国公民中清除出去；犹太商人遭到公开的联合抵制；犹太人同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遭到禁止。1935年出台的纽伦堡法明文确认了上述措施。从一开始，纳粹政权就支持无痛死亡术，杀害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者，奖励多生育子女的英雄德国母亲们。在社会等级方面，纳粹分子蔑视一切现存的等级制[975]度——贵族、军官团体、僧侣和行会。纳粹党—国的队伍对每一个准备为其服务的不知羞耻、不持异议的人敞开大门。德国每一个城镇和乡村的办事处都被最庸俗、低能和贪婪的人所占据。他们的偶像是失败了的养鸡场主、操纵着党卫军的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或者是再也不能挤进座舱的身体超重的前飞行员、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46]这是另一个其精神特质与苏联迅速增长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精神特质酷似的对应者。

如同斯大林主义一样，纳粹主义也非常擅长一本正经地虚构故事。纳粹的宣传兜售了许多怪异的概念。希特勒是当代的腓特烈二世或现今的俾斯麦。纳粹党人是古代日耳曼诸神或是中世纪条顿骑士的传人。第三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与霍亨索伦帝国天然的继承人。团结和自由的德国人民牢记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本民族知识和艺术的无限欣赏，解放了的妇女们充满自尊，对叛徒和敌人满腔义愤……一切都非常相似。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无止境。元首就是一切美好、智慧与仁慈的化身。

绝大多数纳粹首领不信仰宗教；希特勒本人则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纳粹的典礼仪式与其说来自近代宗教，毋宁说更像是对古代德意志异教徒的拙劣的模仿。因此，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同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的信奉基督教的德国民族的关系。他们常常忽略理论问题。但是为了安抚天主教徒，希特勒于1933年7月同梵蒂冈订立了宗教事务契约，承认了德国各主教教区的自治，作为对教皇放弃干涉政治的答谢。希特勒的妥协促使天主教的一些主教，例如维也纳的枢机主教伊尼策尔，对纳粹的目的表示了赞同和支持。但是，协定并没有阻止梵蒂冈发布"在焦虑中"的通谕（1937年），这份通谕谴责纳粹的意识形态，并在德国所有天主教堂中宣读。为了管理新教徒，希特勒于1935年宣布成立了一个使基督教会接受国家控制的部门，还试图在帝国主教米勒（Muller）博士的领导下创立"德国基督教徒的新运动"，以"卐"（读"万"）字符拥抱十字架。1933年11月，这些名义为天主教

徒的纳粹代理人在柏林发动了一场以“英雄的救世主”名义进行的示威游行。最后，教徒与无神论者不得不尽可能友善地和平共处。

在高压和恐怖统治方面，纳粹分子学得很快。他们中的“褐衫党徒”和“黑衫党徒”共同的坚实基础是欺骗、敲诈勒索和图财害命。另一方面，在帝国议会面前，他们的背后没有像莫斯科大公国以来那样存在了500多年的沙皇宪兵充当保镖。社会控制体系与苏联相比并不完善。纳粹德国在就业方面没有实行国家垄断；农村没有进行集体化；直到1944年，军队中才设立党支部或政治委员。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纳粹党的特殊风格，即以蓄意制造的残暴兽行来弥补其结构上的缺陷。大出风头的极端暴行是必要的，只因为控制社会的更得力工具经常处于短缺状态。

帝国的安全机构从来没有像苏联同行估计的那般庞大。党的卫[976]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即秘密警察，都被纳粹党用来补充现有的军队和警力。但是却没有授予二者与NKVD同样的管辖权。1934年，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在离慕尼黑不远的地方开设；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集中营囚犯的数量呈下降状态。纳粹党的打手——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官日益同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制度。此时，大规模恐怖尚未成为常态。在德国本土，纳粹的暴力程度还处于不可预言的地步，能与之相适应的德国人还过得下去。大约50万德国犹太人受到迫害和驱逐；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中，大批犹太教堂和犹太人开办的商店被捣毁，从而造成极大的惊惶和恐惧。但是，“最后解决”的计划还不曾出台。在战争爆发不久，帝国掌握了便捷的或现代化的无痛致死技术并最终得到使用。一个必须公开的问题是，纳粹制度如何同苏联恐怖制度竞争，谁更老练，谁更强大？

政治学家更为纳粹主义的理论分类所烦恼：继阿伦特（Arendt）之后，一些学者接受了它是极权主义大家族中一员的论点；另一些则继诺尔特（Nolte）之后，认为它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还有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把它解释为一个“自成一体的运动”[47]。根据个人选择的标准，它或者是这些理论之一，或者都不是，或者都是。当最后一名获得大赦的纳粹分子死去近50年之后，许多分析家们出于个人的仇恨，出于政治偏见或出于胜利者的“综合症”，依然剧烈地摇摆。说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如果个人的观点能够被接受，那么纳粹主义是现代最令人憎恨、最令人反感的一种运动。纳粹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较之纳粹主义第三帝国的现实更丑恶。

为大萧条缠身的欧洲，有气无力地应对着斯大林和希特勒发出的挑战，西方列强则为自己本国的事务缠身而难以自拔。美国缺席，中

东欧国家弱小而分散。在“集体安全”的设想被提交讨论的关键时刻，欧洲的注意力又被西班牙内战所分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退回英伦三岛和帝国势力范围之内。在爱尔兰、印度和巴勒斯坦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危机。尽管工党两次组阁，国内的劳资纠纷依然纷繁复杂。1926年5月的总罢工，1930年共产党人的《工人日报》发刊，1931年工党为组成联合政府而开除了自己的领袖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932年奥斯瓦尔德·莫斯莱（Oswald Mosley）创建了英国法西斯联盟，所有这一切事件的发生均以失业人数激增到300万为背景。以斯坦利·巴尔德文（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为首的先后两届保守党内阁因提倡稳定和良好的管理，于1935年先后上台。在慕尼黑危机之前，他们两人最头痛的事情莫过于年轻的国王与美国寡妇之间的爱情以及随后的国王退位。与此同时，一系列显著的社会与技术进步出现了：英国广播公司（BBC）诞生（1922年），[977]家庭计划（1922年），全体妇女获得选举权（1928年），平装书出版（1925年），电视的发明（1926年），青霉素问世（1928年），还有引擎的发明（1937年）。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进入成年的一代人感到他们已经生活在相当沉重的压力之下，他们最担忧的一件事是欧洲大陆的动荡局势。

法国不可能置身于欧洲大陆之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政策重心在于构筑安全体系，此举部分地依靠对德国采取强硬路线，部分地通过在东欧建立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但随后不久，法国的外交重心发生了转变。30年代，法属阿尔及尔和西贡经历其全盛时期，与此同时，在法国国内，经济萧条导致劳工问题最为突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年）两次出任总理，期间他转换盟友和斯特维斯基（Stavisky）丑闻（1934年）造成大众对其幻想破灭。伴随着法国共产党和法兰西行动两家的大肆宣传，法国的政治舆论发生了两极分化。据称是静止的法国人观点的整个刻板体系，逐渐接受了安德烈·马其诺（Andre Maginot）的名字（他曾于1929—1932年任法国政府国防部长），并沿着法国东部边境的狭长地带修筑了一系列由防御工事组成的防线。这完全不公正。英国人后来的指责并不正确：法国军队已经丧失斗志，只要英军象征性的小部队不到场，法军就不乐于接受单方面同德军作战的任务；法军藏匿了系统的作战计划，这妨碍了盟军早期的进攻行动。

在3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因处于战略紧张局势的范围之外，而十分幸运。虽然瑞典受到生铁贸易衰退的沉重打击，但在社会民主

党领导下却建成了全世界最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瑞典社会主义者**]

与此相反，中东欧国家却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处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两面夹击之中，中东欧各国领导人完全有理由感到紧张。法国于20年代提出的“集体安全”措施已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纰漏。所谓的（对德国的）“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概念，其开始是作为一条隔离苏联的地带，没有再继续发展。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但没有包括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国家波兰），是一个旨在遏制匈牙利恢复活力的合作体系；从1934年起，它与由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组成的巴尔干国家协定相配合；而西方列强在果断行事方面没有好名声。当华沙于1920年遭到红军进攻时，他们慌忙主动派去了一个军事代表团，但却没有援军。1934年，当毕苏斯基元帅赴巴黎试探关于反对纳粹德国的预防战争时，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西方列强实际上从未决定他们的东欧政策应以与像波兰这样的新国家为基础，还是以与他们趣味相投的后布尔什维克俄国为基础，而后者从未成为现实。从1935年起，他们对希特勒的畏惧使他们不再厌恶斯大林，他们转而依靠鬣狗去制服恶狼。

在中东欧，30年代的国际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对国内事务产生影响。通常处于地下状态的各国共产党，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鲜少得到公众的支持；但是他们充当了一个重要的刺激物，借以煽动民族主义分子去进行反击。希特勒当时还没有煽动波兰、捷克斯洛伐[978]克和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他鼓励其他民族主义势力仿效他。用这种方法，专制统治得到强化，军事预算剧增，军官阶层的政治作用增强了；所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冲突加剧了。

例如在波兰，作为斯大林和希特勒共同的邻国，能够觉察到各个方面。毕苏斯基元帅于1932年和1934年分别同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在其“两个敌人学说”支配下，寻求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曾在1918—1920年间反对波兰独立的波兰共产党采取了国际主义和托洛茨基的倾向。它被流放的领导层，大部分是犹太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遭到大批处决。在另一个极端，民族民主运动产生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支派——法兰加（Falanga），该组织也遭到取缔。好斗的民族主义组织在每一个少数民族中萌发。乌克兰民族组织（OUN）——是由来已久的乌克兰军事组织（UWO）的一个极端分支——沉溺于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并煽动对农民的残酷镇压。犹太复国主义在犹太人社团中迅速发展，其中的“修订者”团体如贝塔（Betar）产生出了像梅纳其姆·贝京（Menachem Begin）或伊扎克·沙米尔（Yitzak Shamir）这样的好斗分子，后者将在别处出人头地。一个

纳粹的第五纵队在德意志少数民族中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恨。1935年毕苏斯基去世后，所谓的“上校政府”力图通过组织一个民族联盟阵营（OZON）来抑制各种政治离心力。但他们发现，各个主要的对立政党竟然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加入了帕德莱夫斯基（Paderewski）在瑞士组织的反政府的摩盖斯阵线（Morges Front）。在国家经济计划中，优先发展姗姗来迟的军事改革和重整军备。外交部长尤热夫·贝克（Jozef Beck）上校实行了一条对德苏两方不偏不倚的外交路线，这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快，他们希望他与斯大林合作。然而，尤热夫·贝克却对比波兰更小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敲响了民族主义的战鼓。他盯住了佐尔杰（Zaolzie）地区（波兰称之为切辛 Cieszyn），该地区1919年被捷克人强行占有。在1939年初，贝克又向立陶宛发出一份傲慢的最后通牒，要求结束不宣而战的状况。暴力事件很少；但暴力威胁到处存在。

波兰犹太人共同体——也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团——度过了自己最后一个夏天。在30年代晚期，对未来的担忧在增长，尤其是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和被驱逐出境者的浪潮出现之后。虽然在教育、国内法和就业方面各种形式的小规模骚扰在不断增加，但是同纳粹分子的狂暴行径相比，简直就不算什么了。对任何一个见到过那个年代的画面和文件的人而言，头脑中的映像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五花八门的公社制生活场景之一。犹太人的长老会议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力。各种各样的犹太社团可以自由活动。犹太影星、犹太拳击冠军、犹太女警察、犹太百万富翁应有尽有。正如有时已发生的那样，就波兰犹太人处于“毁灭的边缘”这点而言是够真实的；但这得回过头读历史。[48]

[979] 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政治素有好名声，这一点在国外较之其在国内的德意志、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塞西亚少数民族之间影响更大。除了宗教以外，它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它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它看上去是对苏联道义上的支持。在伟大的T.G.马萨里克（T.G.Masaryk）长期的总统任期内，国家始终团结一致。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于19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这三个民族没有共同的历史、语言和宗教。该王国是根据原属于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的倡议建立的，他们强烈要求塞尔维亚建国并接纳他们，但随后又对塞尔维亚的统治表示愤恨。塞尔维亚的君主和军队起支配作用，尤其是在1929年建立起君主集权专制制度以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由斯泰芬·拉迪奇（Stefan Radic）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地方事务中获得了更大的支配

权，而这在匈牙利人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在贝尔格莱德受到封锁。斯洛文尼亚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最早的召集人法特尔·科罗舍克（Father Korosec）的领导下静悄悄地繁荣起来。马其顿在慢慢地沸腾。暴力氛围由于拉迪奇（1929 年）被谋杀，以及之后亚历山大（Alexander）国王被谋杀（1934 年）而进一步加剧。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开始同克罗地亚合作。但时间太短了："南斯拉夫是一个必需的事物，"一位观察家如是说，"但并不注定其内部就是和谐的。"[49]（见原书附录Ⅲ，第 1319 页）[**萨拉热窝**]

[980]

萨拉热窝（SARAJEVO）

任何一个在萨拉热窝睡醒的人都能听见萨拉热窝之夜的声音。凌晨两点，天主教堂的钟声带着凝重的自信报时；一分多钟过去了，确切地说是 75 秒，只有在此时，东正教堂和谐的钟声才开始敲响。片刻之后，巴依清真寺（Bey's Mosque）塔楼也响起了沙哑、悠远的钟声。它鸣钟 11 下，表明土耳其的宗教时刻。犹太人没有钟，因此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属于他们。如此，以四个不同的历法分开监视、区别这些睡眠中的人们，规定他们何时起床、欢乐、哀悼、欢宴和斋戒……

波斯尼亚（Bosnia）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恐惧的国家。此外，波斯尼亚人致命的特性是无意识地仇视那些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而不愿做任何分析，也仇恨任何试图进行分析的人。还有，准备杀人或被杀的具有阵发性下意识仇恨的人比想得到一块更大的土地的人更多……它仇恨那些作为独立力量的活动，就像仇恨那足以毁灭周边一切的癌症那样。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可以说没有别的国家怀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它是一种如此敏感、如此忠诚和坚定不移的信条。但是，在秘密的深处潜藏着全部经过压缩和已经成熟的仇恨的风暴正在等候爆发的时机。你的爱与恨之间的关系正如高山与高山之下难以察觉的地质断层之间的关系一样。你被迫生活在爆炸的深层，它不时被你的爱的火花照亮。

在波斯尼亚这类国家，美德经常通过仇恨表达出来。那些表达出信仰和爱的人对那些没有表达出信仰和爱，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信仰和爱的人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最邪恶和最阴险的脸孔可以在最大规模的礼拜场合——在庙宇、修道院和伊斯兰托钵僧的聚会中见到。）

在每一个场合你都被告知：爱你的兄弟吧，尽管他信仰别的宗教，这不是标志斯拉夫人身份的十字架，尊重其他人的习俗，并为自己而自豪。但是自远古以来，即存在大量的虚情假意。在这些格言的掩护下，古老的本能和该隐似的计划只能处于蛰伏状态。他们将一直生存下去直到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完全改变为止。那么当这一时刻到来时，谁将有力量实行？

在莫泊桑（Maupassant）的一些小说中，有一处关于春天的狂欢情节，小说以前车之鉴在那些天里已经传播到各个角落这句话结束了对狂欢场面的描述：公民们！春天来了——当心爱情！

也许在波斯尼亚，人们也应当受到警告……[1]

包括这些段落的作品被归类为小说。他们把一个于 1920 年离开波斯尼亚的移民编造出来的映像奉为神明。这些材料 1946 年由伊沃·安德里奇（lvo Andric）（1892—1975 年）整理出来，安德里奇是特拉夫尼克（Travnik）的孩子，曾在萨格勒布（Zagreb）、维也纳（Vienna）和克拉科夫（Krakow）上学，也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囚徒，战前是南斯拉夫的外交官，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

它真是小说吗？作品的编者解释说：（安德里奇的作品）有许多是在波斯尼亚创作的，它紧紧依靠这种背景。他把他的故事植[981]根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的背景中。[2]换言之，这些故事的一个重要要素不是虚构。安德里奇以报道萨拉热窝之夜的声音同样的精确性描绘出了波斯尼亚社会的心理景象。这些描写可以被视为无价之宝的历史文献。

同时，在 1946 年，一位经验丰富的从事福利事业的官员正在萨拉热窝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她发表了对立的观点。她写道：“只有通过一起工作，人们才能摆脱仇恨，现在正是好时机。每一件新兴事物正在思考正确的道路。……现在我们不关心——谁是穆斯林，谁是天主教徒，谁是东正教徒？现在，应当关注兄弟情谊和团结。”

在地中海，主要的冲击波是由法西斯意大利挑起的。墨索里尼决意成为该地区的霸主，他喜欢模仿古罗马帝国的风格，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排除了积极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主义代表被谋杀以后放弃了议会，墨索里尼获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的计划由于顺从的国王和精简高效的“总体国家”幕后监督的机构而得以迅速实现。在 30 年代，他的目光盯得更远：意大利军队被派往阿比西尼亚、西班

牙，1939年3月又被派到阿尔巴尼亚。国联建议对意大利进行制裁，英国和法国威胁要对意大利进行报复，但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做。墨索里尼因奥地利在南蒂罗尔问题上落入圈套而洋洋得意。在1939年5月22日签署的“钢铁协定”以及随之而来的罗马—柏林轴心之前，他乐于宣扬意大利对德国保持的独立性。

西班牙的内战在不断恶化之中至少延续了20年。西班牙人因为在危急时刻爆发内战而备加不幸，当时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达到顶峰并扩展至全欧洲。结果，1936年的军事暴乱引起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注意。西班牙被变成了欧洲最丑恶的政治实践的实验室。在民主派的惨败中，为期三年的苦难达到了顶点。冲突的根源深深埋藏在西班牙动荡不定的历史中、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和难以消解的土地问题中。一半以上的土地属于只占人口1%的人所有。大多数农民靠少得可怜的土地或不足温饱的工资为生。力量微弱的工人阶级受到大萧条的沉重打击。由一个极端反动的阶层统治的罗马天主教会，既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又控制着从埃斯比利多银行（Banco Espiritu Santo）到马德里铁路（Madrid tramways）这样的许多企业，深深控制着国家的经济事务。一支军官对士兵的比例出奇地高的军队往往是极端教[981]皇绝对权力主义和保皇主义感情的堡垒。其结果是由教士、乡绅和军官组成了一个特别顽固和反动的社会堡垒，它总是习惯性地阻挡任何触及其利益的改革。社会的抗议是孤注一掷的、剧烈的和反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在南方的农业劳动者中还是在巴塞罗那的工会组织中均占据主导地位。在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存在分离主义势力，在加利西亚地区也有一些。在摩洛哥，反对里夫人（Riffs）的战争直到1925年才结束，军队的地位至高无上。在1930—1931年，最后的一次政治拉锯战导致军事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Primo de Rivera）的垮台，漫长的过渡期，“白色独裁”（the Dictablanca），国王阿方索（Alfonso）退位，最终是西班牙第二次宣布实行共和。

1931—1936年共和政府执政的五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1931年，托莱多（Toledo）的大主教由于谴责共和国遭到流放。1932年将军们发动了一次流产的政变。1933年，南方的大地主们宁愿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也不愿接受改革。立法提出允许开办公立学校和允许离婚，以及政教分离等条文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农业改革发生逆转，被扣押的土地又回到了原来的所有者手中。1934年，阿斯图里亚（Asturias）矿工一次坚决的罢工演变成为一次分离主义的暴动，这次暴动导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被血腥地镇压下去。在1936年2月的大选中，由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加泰隆人（Catalans）和共产主

义者组成的左翼势力——人民阵线获胜。但从此中央政府就开始对地方失去控制：忍无可忍的农民占领了大量地产，工人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总罢工，加泰隆人宣布自治，政治谋杀和教堂纵火事件激增。即将卸任的天主教徒总理说道："我们今天是在为民主举行葬礼。"国家正处于无政府状态。

1936年7月18日，将军们第二次发难。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年）将军从他在加那利（Canarie）的司令部渡海到得土安（Tetuan）并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把西班牙从红[982]色革命中拯救出来；在北非的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动用摩尔人（Moorish）的部队。"反马克思主义的十字军"要由反对天主教的摩尔人充当了"，[50]当时一位共和主义的同情者如此描写道。

在开始时，西班牙的政治派别极其广泛而又复杂。在国会中，人民阵线受到包括人民行动（Accion Popular）和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将军之子新近组建的法西斯主义长枪党（Falange Espanola）在内的右翼联盟的反对。在左翼，共产党在人民阵线277个席位中仅占16席，以拉尔科·加巴杰罗（Largo Caballero）为首的社会党占89席，玛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na）的左翼共和党占84席。然而，内战的重负不可避免地改善了两个最崇尚暴力和最激进的政党的命运。长枪党注定要成为军队的主要政治工具，共产主义者则注定要统治受围攻的共和主义者。佛朗哥说过，而且能够相信，他正在为抢先制伏布尔什维主义而斗争。他的口号是："轻信在胜利之中"（Fe ciega en la victoria）。除此之外的一种观点即共产主义的威胁被夸大了，而这正是许多西班牙人所担忧害怕的。

政治和地区方面支持的方式变得非常复杂。佛朗哥的军队司令部在摩洛哥宣布造反，反抗马德里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当时的统帅是阿萨尼亚（Azana）。这支军队能够依靠驻扎在西班牙大陆每一个城市中的卫戍部队，能够依靠长枪党的准军事卫队，在某些地区，能够依靠从西班牙王室正统主义时代延续下来的极端天主教势力（.the Requetes）。总的来说，他们可以依靠天主教僧侣阶层、大土地所有者、以及所有优先考虑恢复法律和秩序者的政治支持。自初始阶段起，他们就接受了葡萄牙、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援助。葡萄牙提供了安全基地。德国康多尔军团（Condor Legion）的作战飞机提供了空中优势。1937年初，意大利军队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和马拉加（Malaga）以南的沿海地区。

相反，共和政府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职业军队。它及时训练和派出了一支正规军；但是它不得不严重依靠各种左派势力的武装民兵——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工人社会（PSOE）、无政府主义的伊比利亚

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I）、马克思主义派别中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劳工总会（UGT）与共产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CNT）。总而言之，共和政府能够依靠农村中的农民、城镇中的工人、全国各地的反教权主义者和所有优先考虑宪法政府者的政治支持。在最初阶段他们就接受了海外援助：来自苏联的坦克、飞机、军用设备和军事顾问，以及由外国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在后期，1938—1939年，人们不得不承认，法西斯主义宣传中所描绘的噩梦已经成为现实。内格林（Negrin）领导的共和政府由于受共产党人的强硬路线和它的安全机构——由苏联的GPU直接控制的军事调查局（SIM）的影响而遭到颠覆。为安全起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黄金储备于1936年9月运送到敖德萨，此后再也没有运回来。[**前进**]

[983]

前进（ADELANTE）

1936年9月，共产国际在西欧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建议莫斯科组建一系列国际旅，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斗。这一主张最初是由法国共产党的莫里斯·多列士（Mautice Thorez）提出的，他回忆起红军中曾参加俄国内战的国际师团。[1]

因而，从一开始，虽然国际旅表面上说是志愿者的自发行动，他们其实完全从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的作战行动独立于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正规指挥之外；所有的高级军官和政工人员均由共产党员担任；而且所有新兵都经过苏联代理人的审查。他们的口号是"西班牙——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坟墓"，"他们不会得逞"以及"前进"。国际旅在巴黎的主要征兵机构的负责人是约西普·布罗兹（Jozip Broz），别名铁托（Tito），未来的南斯拉夫独裁者。它组织了一个"秘密铁路系统"，使用伪造的护照把新兵送到西班牙边境，从那里再送到国际旅在拉曼卡（La Mancha）的阿尔瓦塞特（Albacete）的主要基地。

在衰退的欧洲，大批劳动力有待安置——失业工人、法西斯国家的避难者和反叛的知识分子。在5万名参加国际旅的战士中，最大的一支力量是由在法国的劳工总会、设在比利时的波兰矿工组织和北部法国分部与左翼德国流放者组织的。他们中的80%是工人。一个外国志愿军的领导核心已在前线供职。他们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纵队"（见原书附录Ⅲ，第1325页）。他们的领袖包括卡尔洛·罗塞里（Carlo Rosselli），他是从意大利的法西斯监狱中逃走的社会主义者；汉斯·柏姆勒（Hans Beimler），从达

豪集中营逃走的德国人。

新兵中知识分子很少，但他们充满活力。他们经常茫然无知地响应号召。

许多人听到，它在遥远的半岛上，
在寂静的平原上，
在偏离大陆的渔夫之岛，
或一座精神堕落的城市；
并且像海鸥或花籽那样倾听、迁徙。[2]

国际旅的军事领导没有实战的经历。总司令昂德雷·马尔蒂（Andre Marty）是一位来自佩尔比格南（Perpignan）的加泰隆（Catalan）水手，1919年曾在一艘法国军舰离开教德萨不久时领导了一次叛乱。其首席军事顾问卡洛尔·斯维尔柴夫斯基（Karol Swierczewski）上校，化名瓦尔特（Walter），是一位在苏联安全机构工作的波兰军官，也是莫斯科的军事学院教授。监察长路易吉·隆哥（Luigi Longo）和总政委朱塞佩·维多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均为意大利共产党员。一位显示出实干才能的司令官是拉扎尔·斯特恩（Lazar Stern），别名克莱贝尔（Kleber）将军，他是一位生于布科维纳（Bukovina）的奥地利犹太人，是在俄国成为战俘时转向布尔什维克的。他也和许多类似的同志那样，一回到俄罗斯就会被斯大林下令枪决。 [984]

这些男子汉的勇气不容置疑。他们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并受到严酷的纪律约束，即使发生了细小的过失也可能遭到枪决。他们以不顾一切的勇气作战。例如，1936年11月，在马德里（Madrid）围困期间，英国营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有生力量。在哈拉玛（Jarama）战役中，该营600人中伤亡了375人。[3] 最糟糕的是，国际旅被利用来镇压共产党人昔日的盟友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到1938年底，克里姆林宫同意该旅撤出。大约12000人出发了，留下了大约6000个无处可去的德国人。……11月15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告别检阅时，人们举着内格林（Negrin）、阿萨尼亚（Azaña）和斯大林的画像，这一场面被称为“耶稣受难”：

你们是历史……你们是传奇……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当这和平的橄榄树又一次长出树叶，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同他们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回来吧！[4]

由于以后事态的发展，当西方强国接纳了反法西斯事业时，国际旅在西班牙的经历吸引了更多赞同的宣传。事实上，为佛朗哥而战斗的外国战士的数量从来都高于国际旅。前者包括一些法西斯正规军，一些空想主义的志愿者，一些像奥杜菲（O' Duffy）将军率领的爱尔兰旅那样大肆炫耀的雇佣兵。看到全部画面后，人们不能不在共产党人在1936—1937年征募的新兵同那些被西班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吸引的新兵之间进行比较。[**立陶宛**]

战斗是长期的、断断续续的，且经常是混乱的（见原书附录Ⅲ，第1324页）。[984]胡作非为的和乱糟糟的地方对立较之持久的战役或精心策划的战斗更为普遍。在这些战线后面，作战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杀害战俘和市民的事件。战略部署并不简单。经过最初的交锋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卫戍部队被诱降，随后政府军掌握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除去西北部的科伦那（Corunna）和最南端的塞维利亚（Seville）。但是，一旦叛军沿着西—葡边界重建防线并攻克托莱多（Toledo）的中央要塞后，它就能够逐步包围北部沿海和连接马德里与巴伦西亚（Valencia）走廊地带的政府军据点。叛军驻扎在布尔戈斯（Burgos），司令部在萨拉曼卡（Salamanca）；政府在巴伦西亚。此期间重大的事件包括：民族主义者围攻奥维多达一年之久，德国空军1937年4月轰炸格尔尼卡（Guernica），1938年为控制埃布罗（Ebro）和特鲁埃尔（Teruel）要塞而发动的突然攻击，1939年，佛朗哥军队先于1月围攻巴塞罗那，又于3月攻占马德里。在"欧洲最不驯服的城市"巴塞罗那，加泰隆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西班牙人政府，不管它们是红色还是白色，悲剧以失败的共产党人和其从前的同盟者——无[985]政府主义联盟制造的大规模流血事件而告终。在马德里，人民阵线残缺不全的国防会议抛弃了共产党人，它自己也因为叛军于3月29日胜利进入马德里而终结。在胜利的阅兵式上，佛朗哥最终满怀信心地选择了这样的口号："在这个国家有了秩序，西班牙是统一、伟大和自由的。"共和派的领袖逃走了，数以千计的流亡者逃离比利牛斯半岛。[51]西班牙从此被法西斯主义者牢牢地统治了40年。[**新法老**]

正如其对手所论述的那样，佛朗哥对西班牙人民的胜利，主要归因于其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与国外援助。但是真相并非那样简单和惬意。西班牙人民没有全部站在哪一边，也不完全属于西班牙的反民主势力。很难说西班牙共和派的失败是更应归因于自己的民族主义敌手还是更应归因于本阵营内的集权主义势力。佛朗哥能够把自己的支持

[985]

新法老（FARAON）

佛朗哥将军的陵墓位于马德里附近法伦峡谷（Valley of the Fallen）中的库塔尔·德·马罗斯（Cuel de Moros），建于1939年他获胜之后。它包括一座壮观的地下长方形廊柱大厅，这比圣彼得教堂的中殿还要大，它可以通过一条在花岗岩中开凿出的隧道进入，并与内战时期阵亡者的陵墓连接在一起。在外观上，它以世上从未建造过的最大的基督教象征——一个高492米，重181740吨的石制十字架，高居世界之首。[1]它是由前战俘们的奴隶般劳动建成的，给劳工们烙上"T"字，他们在埃斯科里亚尔附近的工地、采石场之间苦干了20年，并在埃斯科里亚尔附近的教堂被强制役使。他们被"通过劳动抵偿罪恶委员会"正式雇佣，这令人联想起纳粹分子的一条标语。据报道，1940年一位纳粹官员参观佛朗哥的旧址后发表评论："（佛朗哥）以为他是谁——一个新法老？"

FARAON在西班牙文里意为国王、王后、（埃及）法老。这里根据语境译为"新法老"。——译者注

者聚集到一起，而共和派的支持者却不能组成一个团结高效的民主派阵营。

对西班牙而言，同胞自相残杀的内战引起的结果是一个悲剧性的教训。据估计，双方伤亡人数达到40万到100万。[52]对欧洲而言，这也是一个消极的教训，即依靠什么样的机制来惩戒生活在本国之内的少数民族，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同样，自从西方的同情心强烈地倾向失败的共和派之后，它大大扩展了对来自法西斯势力的威胁的恐惧心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削弱了人们对"赤色魔鬼"的恐惧心理。由于佛朗哥不得人心的成就，西方民主派的舆论才成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佛朗哥强化了西方各国联合一致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决心，同时也使西方降低了对斯大林的敏感度。自从1939年3月以后，对每个西方政治家而言，很难证明共产主义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是巨大的威胁。

[986]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佛朗哥的胜利对控制欧洲局面的总趋势来得太迟了。如果法西斯主义在1937年或1938年就在西班牙取胜，那么可以想象，西方强国就会从危险中被及时唤醒，把希特勒消灭在萌芽状态。可以想象，后来发生的整个令人遗憾的故事就能够避免。事实

上，在西班牙拖拖拉拉的三年内战期间，独裁者们的力量不断壮大，而争取集体安全的机会也被错过了。

“集体安全”是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精心策划但后来夭折了的一系列措施之一，英国人过去曾是以说服别人为其火中取栗的高手。回过头来再看1933年晚些时候，当时希特勒首次驱使德国退出了国联。此前，因为苏联没有直接侵犯西方，西方一直不太担忧。然而，纳粹德国在中欧为所欲为带来更为迫在眉睫的危险。对伦敦和巴黎而言，最明显的对策就是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法、俄战略三角，拉拢苏联去抗衡德国。这也是英国自1917年以来特别希望提出的动议。这可以说是一个公共关系问题，当然，西方政治家们已经被灌输了有关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种种流言蜚语；不过，如何解释苏维埃制度现在正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或者说斯大林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更民主，却不是外交家们的智谋所能办到的。因此，在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杀戮行动期间，斯大林受到尊重并被引入爱好和平的民族的领袖之列。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的代表退出国联；而1934年9月18日，斯大林的代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却宣布加入国联。

在斯大林看来，重新同西方接近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可以扩大外贸，引进技术；可以改善苏联的形象，同时还让纳粹分子猜忌；还可以使忠实于苏联的外国共产党获得被接纳的机会，并通过加入人民阵线——如同在西班牙发生的那样——进入民主派的议会和联盟。还有一个公共关系问题，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爱把民主派政治家叫做“资产阶级剥削者”和“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同柏林之间谨慎发展着的关系，或者说最终同希特勒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他目前还能保持所有选择的空间。

在随后的岁月里，纳粹分子对西方的探索不屑一顾。他们的每一步行动对于凡尔赛体系来说都是一场灾难。1934年7月，他们在奥地利几乎政变成功，在那里谋杀了总理恩盖尔伯格·多尔福斯（Engelbert Dolfuss）博士，多尔福斯的祖国阵线组织起了反纳粹的一党制国家。1935年，他们庆祝萨尔地区回归帝国，通过凡尔赛条约设想的全民公决，然后迅即恢复征兵制，重组空军，废除限制军备条款。1936年3月，纳粹公然违背凡尔赛条约，重新占领非武装的莱茵地区。1937年，他们退出了具有英国背景的力图使外国军队撤离西班牙的不干涉委员会，又同意大利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8年3[987]月，希特勒策划了德奥合并运动，宣布成立大日耳曼帝国，并胜利进军维也纳（见原书附录Ⅲ，第1323页）。

在此期间，虽则希特勒多方面夸大德国重整军备的规模，但他对已经要求同僚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这一事实却守口如瓶。[霍斯巴赫]

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安排好即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时间表；相反，直到1942年之前，德国的企业家和将军们筹划的大多数战争并没有得到正视。与此同时，希特勒打算借助虚张声势和威胁手段，以便更为顺利地推进其“和平入侵”政策。他感到他能够得到自己打算得到的一切，而不需要通过战争，甚至不必通过局部冲突即可奏效。有鉴于此，1938年春，他开始大肆编造谎言，说什么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了不堪容忍的迫害。在此期间，西方国家领导人不能不注意到纳粹德国一意孤行地搞扩张，而“集体安全”并不能产生具体有效的结果。这样，在英国新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怂恿下，西方大国开始推行绥靖政策。张伯伦现在意识到欧洲重新爆发战争将损害英国微弱的经济复苏势头，并削弱英帝国在海外的地位。

绥靖主义，尽管它后来声名狼藉，但并不需要将其视为一项卑劣的投降者的政策。它包括着现实主义和宽容这两个因素；当然，这种形式便于同纳粹德国开展谈判，而否定了早些时候法英同意大利打交道的犬儒主义哲学。正如张伯伦所料，1935年12月签订的霍尔—拉瓦尔（Hoare - Laval）协定，只试图默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进犯，在伦敦和巴黎都被否定了，并导致了其倡议者的垮台。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自由主义的观点广泛地承认应该讨论德国人关于日耳曼少数民族在中东欧国家的悲惨遭遇。许多人赞同1933年麦克唐纳计划（MacDonald Plan），该计划提议以欧洲国家的军备平衡取代无限期延长的战胜国霸权。将军们提议：战胜国只有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干预德国最终对东方的侵略。同斯大林的红军合作依然是充满危险的行动，而在西方对德国直接采取行动恰恰会引发西方各国所竭力试图避免的全面战争。最重要的是，对张伯伦而言，到德国去行“纳粹举手礼”，或者说是去寻找一种解决苏台德（Sudeten）问题的办法，并没有什么不光彩。错误不在于谈判这一事实，而在于谈判者的技巧与优先考虑的重点。张伯伦好似一只走入狮穴中的羔羊，对于其命运所系的“遥远国度”可悲地一无所知，竟然没有想到绥靖主义的历史仅限于西方列强对希特勒的政策。它甚至形成西方日后与斯大林脆弱的关系史上一个更长的时期。忽视道德基本原则的民主政府同独裁者进行谈判往往要担很大的风险。[53]

被人们称为慕尼黑危机的事件于1938年9月根据希特勒规定的条件结束了，而且从未遇到严重的挑战。它关系到德国对法国的盟国[990]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法国还是屈居人下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排除在慕尼黑主要谈判国之外，丝毫没有考虑维持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防卫能力。谈判各方认为应该就德国向东扩张画一条线。然而谈判是

[988]

霍斯巴赫（HOSSBACH）

1937年11月5日，一个会议于下午4:15到8:30在柏林帝国总理官邸举行。出席会议的是一群最重要的德国首脑，包括戈林（Goering）、纽赖特（Neurath）和雷德尔（Raeder），他们在听希特勒讲演，题目是“发展我们在外交事务领域地位的机会”。讲话的内容，希特勒极其夸张地宣布，如果他死了，就应被视为他的最后遗嘱。他们是从霍斯巴赫（Hossbach）详细记述的备忘录中获知这些内容的，霍斯巴赫记录下了那一刻：

“德国政策的目标是保卫和维护人民群众、种族共同体并扩展它。这是一个生存空间问题……德国的政策不得不去清算两个充满仇恨的对手——英国和法国，对他们而言，德国巨人……经常令它们不安。

德国的问题只能通过暴力手段加以解决，而这从来不能避免风险……还有“何时”和“怎样”解决的问题。对这种情况，有三个问题需要论述：

问题1：1943—1945年期间。从我们的观点出发，这个期限一过，预计就只能有一种不利的变化……如果元首还健在，那么他最迟在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的决定是坚定不移。

问题2：如果在法国发生内乱……应该会吸引整个法国，那么进行反对捷克行动的时机就来到了。

问题3：如果法国处于同另一国交战的矛盾之中而不能继续反对德国……如果卷入战争，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必须同时打倒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

波兰——连同其背后的俄国将无意保证……俄国的军事干涉，考虑到日本的态度，更值得怀疑……

假设英国自身在同意大利的战争中决定不从事反对德国的行动……[1]

霍斯巴赫的备忘录所发挥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争论的文献更为重要。盟国检察官在纽伦堡审判时出示了这份文献，用于指控戈林和其他战犯参与策划了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当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指出该备忘录并不支持纽伦堡盟国检察官的观点时，备忘录的意义被大大

降低了。相反，它表明在1937年11月，纳粹尚未制订出具体的战争的计划，希特勒对发展着的局势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它还表明：元首在1943—1945年之前，有时相当含糊地大谈非常有[989]限的战争的可能性：希特勒的阐述大部分属于白日做梦……他不肯暴露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备忘录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知晓希特勒(像其他每一个德国政治家一样)力图成为欧洲的霸主。它还告诉我们，他在思索如何才能把野心变为现实。他的思索被低估了。它们与1939年爆发的现实战争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准确性只达到希特勒水平的赛马业情报贩子不可能令其委托人满意。[2]

A.J.P. 泰勒（Taylor）的分析全然令人惊异，因为它来自一位以反德情绪著称的历史学家。

满怀义愤的批评家们谴责泰勒所谓的忽视了“历史背景”和纳粹扩张主义的动因。1937年12月中旬，他们坚持认为，德军接到的命令已变为要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入侵。他们把这种变化作为他们解释备忘录的正当理由，并把这次会议作为“第三帝国的扩张倾向公开化和明朗化”的标志。[3]他们没有提到，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入侵较之元首其他不完善的方案更不具体化。

实际上，泰勒由于首先推翻“希特勒策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普遍共识”，而被错误地指控试图替希特勒开脱罪责。泰勒成功地证明的是：元首起草的总体侵略意图与无力制订总体战争计划不可思议地结合为一体。

几乎30年之后，有关“二战”起源的争论中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在没有斯大林任何提示，或者说在没有德国和苏联政策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被发现了。包括泰勒在内的所有参与者，局限于讨论德国的扩张，而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评论苏联的扩张。历史学家们面对着苏联档案一扇关闭的大门。如果在霍斯巴赫备忘录中存在一个苏联对等的记录，它永远也不会公之于众。人们无从获悉斯大林是否类似希特勒那样思考过或没有思考过战争。这样一来，由于缺少关于斯大林的意图的文献证据，绝大多数评论家宁可假设为：没有什么可讨论。

无论怎样讲，文献史写作的悠久传统培育出两种对立的极端倾向。其中一种认为，实际上，如果没有可用于审查的文献，那就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另外一种观点在由泰勒的贬低者系统阐述的“泰勒法”中充分地表达出来，即：文献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这两种极端同样有害。

在两个最重要的利益关系国波兰与苏联未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认为必须对希特勒正在进行的冒险行动施加压力。西方谈判者还是没有在谈判桌上亮出自己的王牌。正如希特勒所正确感觉的那样，他争论中更令人不能容忍的部分将不会被检验。此举，加上张伯伦极易上当受骗，决定了整个事件的结局。张伯伦如此这般地评价希特勒："尽管他的面部冷酷无情，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54]

张伯伦曾经三次访问柏林。9月15日，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他接受了希特勒关于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他被明确告知，这是"元首的最后要求"。他答应对此进行调查。9月23日，在戈德斯贝格（Godesberg），他面对一份突如其来的最后通牒：苏台德地区在五日内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与德国合并。这一要求被英国内阁和所有有关各方拒绝了。法国和德国开始进行军事动员。9月29—30日，在慕尼黑，张伯伦根据墨索里尼的建议并在达拉第和墨索里尼的陪同下同希特勒会晤，以求进行最后的抗争。张伯伦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的基本内容（本来是不该接受的）。在他那些高明的同僚们的帮助下，他交给挤在隔壁房间内等候结果的捷克人一份最后通牒，逼迫他们接受他们自己无法接受的结果或为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付出代价。张伯伦最后的贡献是强调协约国将对一个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提供保障，同时拆除其建筑在边界线上壮观的防御工事，起草一份英德友好宣言。他从飞机上走下来，挥舞着一纸协议，声称他带来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他如此运作的一贯精神，导致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足球队在同一年——在柏林同德国足球队进行比赛前向对方行纳粹举手礼致意。

张伯伦三次拜会希特勒必然会被归于历史上最卑劣的投降行径之一。在无情的压力下，无知加软弱就成了无能。在没有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做出硬性的安排之前，张伯伦没必要答应希特勒的任何要求；但是他同意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Benes）除了提出个人的抗议之外，没有权力签字放弃他的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他也做了。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是如此概括这一事件的后果的：

> "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一英镑。等如数付给后，又用枪逼着你要两英镑。最后独裁者同意拿走1镑17先令6便士，并欣然允诺剩余的以后再要……我们已经不战而败了。"[55]

在其他场合，丘吉尔写道：英国人在"耻辱和战争之间"进行了选择；"我们选择了耻辱，我们将得到战争"。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

分不到六个月就解体了，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布拉格。

[991] 毫无疑问，慕尼黑事件标志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外交斡旋的决定性的关键时刻。这还不意味着战争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播下了混乱的种子，而且从中产生了两种致命的臆断。首先，它使希特勒也许还有斯大林确信，进一步的“和平入侵”将带来更多的无本红利(将一本万利)。其次，它在西方造成了同希特勒对话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在这场游戏的第二个回合中，地图肯定会使波兰受到威胁，慕尼黑事件肯定会使希特勒和斯大林试图和平入侵；西方将试图不通过谈判就阻止战争；波兰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捷克斯洛伐克的厄运。这真是致命的一招。

在任何一本有关欧洲历史的著作中，1939 年都是“世界再次面临战争”，或战争变为现实的一年。除了苏联的出版物之外，在所有的编年史中，1939 年都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恰恰证明欧洲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战争已在世界持续了八年之久：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1937 年又把战火燃到中国内地。自从 1938 年 8 月，日本军队又在中蒙边界对苏联红军挑起争端。作为此次冲突的一部分，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组成了轴心国。因此，1939 年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对欧洲战争舞台的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为止所概括的欧洲战役的特点，把日本人提出的“亚洲人的亚洲”放在了第二位。在此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区域性的战争转变为一场全球战争。它还被称为希特勒的战争，其实这太不准确了。

到了 1939 年，全面的重整军备迅速地发展到极限，所有的力量都在重新武装。两年前，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英国已经做出决定扩充和重新装备皇家空军。这是一个保证英国得以幸存的决议。与此同时，法国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防部，并把巨大的施奈德—克虏佐(Schneider—Creusot) 公司实行了国有化。这是一个信号，即欧洲有关国家的政府正在准备对付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工业力量将如同受过训练的人员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点上，专业研究表明，在近十年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992] 数据无疑发生了变化。但英国的数字强调几个严酷的事实。极权主义政权因大萧条而受到的损失大大少于西方民主国家，它们的军费支出是西方国家军费支出总和的两倍多。它们的“相对战争潜力”(RWP) ——这是一种根据诸如车床水平这样的指数能够把工业实力转变为军事能力的计算结果——大致相当，德苏两国的军事潜力都分别相当于英法两国之和，意大利几乎无法测算，日本的“相对战争潜力”(RWP) 有点可笑地才达到世界总量的 3.5%。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仅为 10%。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苏联
工业生产(1938年)(1932年GNP=100%)	153	143	108	211	258
相对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世界总量=100%)					
1929年	43.3	9.4	6.6	11	5
1938年	28.7	9.2	4.5	13.2	17.6
军费支出(1933—1938年)(百万英镑)	1175	1201	1088	3540	2808
相对战争潜力(1937年)(世界=100%)	41.7	10.2	4.2	14.4	14.0[56]

即使不是天才也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和希特勒已经开动了战争机器，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如果美国漠不关心，西欧国家将很难遏制斯大林和希特勒。如果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西欧将无力阻止他们。整个世界都在密切注视，或应该密切注视斯大林和希特勒，以及那些落入他们圈套的不幸国家。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第二位的。

1939年，斯大林的战略意图受到一些始终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因素的影响。专业历史学家们由于从未获得接近文献的机会，往往自以为这一问题并不存在。但是，重现其战略意图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总的来说，苏联的国内革命正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领袖(Vozhd)能够充满自信地期待更积极地干预外国事务。最易受到武力攻击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大清洗运动即将结束，重新武装的红军已被外界认为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然而，两个重大的障碍依然存在。直接针对军官群体的大清洗最后阶段仍未完结，1939年对旧军事骨干的杀戮仍在进行。此外，红军仍在蒙古边境地区同日本军队作战。一贯小心谨慎、精于算计、守口如瓶的斯大林，直到新的军队骨干训练完毕并解决了同日本的边

界冲突之前，未必肯在欧洲冒一次大风险。他在近期的首要目标是引诱德国同西方列强开战，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57]

希特勒的地位并不那么受约束。他最近已经完全控制了军队，并且没有军队的委任状。他现在担任了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已经全部清除了将军们中的反对派；在免除了沙赫特博士的职务后直接控制了德国工业。他在西班牙的追随者们为胜利做好了准备，他本人在慕尼黑的成功摧垮了东部邻国的防御计划。他的部下沿着所有的边界地区挑起事端——在立陶宛的克莱彼达（Klajpeda），即梅梅尔（Memel）、但泽自由市、波兰的日耳曼人聚居区和斯洛伐克，在那里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寻求柏林的援助。他还没有为下一步制订好明确的战争计划；但是当他在位于贝希斯特加登的“鹰巢”中的玻璃窗[993]前凝视着展开的地图时，欧洲似乎到处都充满了机会。面对悲惨的猎物，鹰会选择猛扑过去吗？

1939年初，希特勒优先考虑的事情依然是如何处理波兰问题。慕尼黑协定签字三周后，他将波兰驻德大使召至贝希斯特加登，强调了事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这是长期准备的结果。长期以来，他曾多次安排戈林去波兰的森林中狩猎，从而导致共产党人的宣传以为纳粹—波兰同盟已经存在。[58]希特勒的建议集中体现在这样一种思路上：如果波兰人交出但泽自由市的主权，并且准许建设穿越波兰领土的柏林—柯尼斯堡公路，他们将能加入直接反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优惠联盟。这种无言的威胁不必详细说明。如果波兰人愚蠢到拒绝希特勒建议的地步，那么希特勒无论如何将拿下但泽，并可能寻求重新同苏联结成直接针对波兰的政治和经济联盟。想当然的是，希特勒众所周知的种族和意识形态偏见会让他期待波兰尽早接受他的建议。毕竟，由于波兰的上校们必须与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区作斗争，也由于波兰以反共主义而自豪，所以对希特勒来说，波兰和纳粹德国似乎就是天然的伙伴。

遗憾的是，希特勒和他的谋士们都不很了解波兰人。他们不知道波兰的民族主义对德国像对俄国一样满怀敌意，他们不知道波兰的上校们可能感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是保护性的，尤其是当外国人介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毕苏斯基元帅的继承者们的反应与张伯伦和贝奈斯会截然不同。这些上校们不打算向一个前奥地利的前下士奴颜婢膝。他们的天性是战斗，继续战斗。每一个波兰军官在1939年面对来自纳粹和苏联的威胁时，都受到毕苏斯基元帅精神遗嘱的感染：“败而不降就是胜利。”[59]

因此，元首始终保持出击的态势。几个星期过去了，波兰直截了当地公开了同苏联进行的贸易与友好会谈；而对柏林的建议却不予回

答。1939 年 3 月 21 日，捷克斯洛伐克崩溃一周之后，波兰驻德大使再次被召见并被告知，元首对事态没有进展大发雷霆。3 月 28 日，德国声明放弃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纳粹的宣传转到了但泽问题上，抱怨波兰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遭受到难以忍受的压迫。3 月 31 日，波兰收到英国主动提供的一份保持波兰独立的保证书。4 月 3 日，希特勒对此的回答是：下达了制订占领但泽和可能对波兰开战的计划的秘密指令。[**苏萨宁**]

在此期间，好运一次次降临到元首身上。3 月 10 日，自治的斯洛伐克政府被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宣布罢免；被触怒的斯洛伐克领导人蒂索（Tiso）神父向元首呼吁要求保护。随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乞求在贝希斯特加登拜会元首。在玻璃窗前重重的一击之后，希特勒表演最矫揉造作的一幕，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995]（Hacha）在此期间失去了知觉，经过注射强心剂才苏醒过来，他驯顺地承认其国家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变成纳粹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成为拥有主权的共和国；外喀尔巴阡—罗西尼亚（Sub—Carpathian Ruthenia）割让给匈牙利。希特勒一枪未发，就胜利地率军进入布拉格，如同当年进入维也纳一般。3 月 21 日，德军又占领了立陶宛的梅梅尔。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张伯伦领悟了一个真理，即希特勒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英国对波兰独立的担保，一个弱者采取的虚张声势的行为，是其反应迟钝的产物。更糟糕的是，匈牙利未经任何许可就占领了罗西尼亚。在耶稣受难日那一天，4 月 2 日，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欧洲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994]

苏萨宁（SUSANIN）

1939 年 2 月 26 日，莫斯科大剧院里回响着一部盛大的再度公演的俄罗斯最流行的歌剧。格林卡（Glinka）的《为沙皇献身》（A Life for the Tsar，1836 年）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一直暂停演出；1924 年拍成的一个短剧，当时它的名称是《锤子与镰刀》（For Hammer and Sickle），一直不曾走红过。重新上演时对剧本做了政治上的改动，并用了另外一个剧名《伊万·苏萨宁》（Ivan Susanin），现在恢复了昔日的辉煌。[1]这是党的路线转向笼络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最明显信号。

格林卡的歌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被描写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悲剧性歌剧”，它整理了 1830—1831 年波

兰起义的后果，反映了作曲家在“象征主义的曲调中使国家意识形态具体化的决心”。[2] 该剧以1613年为背景，正值罗曼诺夫王朝的缔造者为从大混乱时期的无序状态中确立秩序而斗争（见原书第557页）。在最传统的“营救剧”中，它讲述了一个善良的俄罗斯农民的故事，苏萨宁，把沙皇从卑劣的波兰入侵者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剧中，剧情步步紧随一部爱国主义教科书——《培养意志的俄罗斯历史》（Russian History for the Purposes of Upbringing, 1817年），其编者是作曲家格林卡的兄弟。格林卡的审美观念是运用俄罗斯的英雄与波兰恶棍这种二分法贯穿全剧。剧中设两个主角，二部轮唱——波兰的与俄罗斯的：两种舞台布景和两种音乐风格。厚颜无耻的波兰人被刻画得很过分，在波罗乃兹（polonez）、玛祖卡（mazurka）和克拉科维亚克（krakowiak）乐曲的伴奏下，单独地以刻板的集体形式唱歌、跳舞。俄罗斯人或唱着迷人的民歌或用时髦的意大利—俄罗斯风格唱着浪漫的抒情歌曲。不遗余力地强调政治启示。

苏萨宁遇害后，以米哈依尔·罗曼诺夫（Mikhail Romanov）胜利进入红场的高潮场面结尾。这里音乐变化为庄严的“颂歌进行曲”，其歌词是超级爱国主义的颂歌：

> *光荣属于我们的俄罗斯沙皇，*
> *光荣属于上帝赋予的沙皇—统治者，*
> *祝愿你的民族青春常在，*
> *祝愿俄罗斯民族得到上帝赐福。*
>
> 1939年，颂歌的歌词适时地修改为：
>
> *光荣属于你，我的俄罗斯，*
> *光荣属于你，我们的俄罗斯土地，*
> [995] *祝愿我们可爱的祖国，*
> *永远，永远强盛。*

利用了民族主义影响力的歌剧最常论及瓦格纳（Wagner）。但是，在格林卡那儿，这种联系更为明晰。实际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敏感性决定了何处与何时这场歌剧能够上演，在沙皇俄国，歌剧变成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每个歌剧演出季节的首演之夜的自动选择。到1879年，演出达到500场。1866年，它在捷克的布拉格上演，1878年，它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上演；1899年，在普鲁士的波森（Posen）的德国剧院（German Theatre）上演。但是，在华沙和

克拉科夫始终没有发现一名观众。最为意味深长的是，1940 年 2 月，当它在莫斯科重新上演一周年之际，在纳粹政权赞助下，该剧在柏林举行首次公演。

面临对波兰的特殊承诺，西方强国现在试图将一些实际措施写人协议。四五月间，一个协约国代表团访问华沙。它与波兰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即如果德国进攻波兰，波兰军队的任务是阻止德军，同时西方强国准备对德国发动反攻。法国的甘莫林（Gamelin）将军说得相当具体：至迟在总动员发出后的第 15 天，"我们的大部队"将跨过法德边界。另一个军事使团被派往莫斯科，讨论同红军的合作事宜。在他们于 8 月 5 日乘船缓缓驶向列宁格勒很久之前，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决定双方独自解决波兰危机，而盟国代表却对这一重大行动一无所知。

纳粹与苏维埃的亲密交往从 5 月的第一周就开始酝酿，当时斯大[996]林最信赖的心腹之一莫洛托夫（Molotov）被委任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他的前任李维诺夫是犹太人，其妻艾维是英国人。李维诺夫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热衷于处境艰难的集体安全政策。他争取建立一个英苏防御联盟的最后的孤注一掷以碰壁而告终。莫洛托夫因其赞同与柏林恢复联系而被任命。双方的直接谈判在"贸易会谈"的幌子下于 6 月份在莫斯科开始。

一旦斯大林和希特勒抛弃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并且他们的代表开始谈判，他们就必须迅速判断机会的大小。由于西方的优柔寡断，波兰便成为德苏两国瓜分东欧的惟一严重障碍。眼见令人炫目的诱惑，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都不可能对后来苏德之间为分赃而战过多忧虑。他们也无心猜测西方的长期反应。在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后，希特勒认为他能够单独对付英国和法国，并能在战争的进程中极大地增强德国的实力；而斯大林更乐于让希特勒去尝试一下。在得到希特勒的同意后，斯大林估计他能够单独击败东欧各国，并在战争进程中大大增强苏联的实力。很可能双方都确信，最好是在美国对危险保持警惕之前解决欧洲问题。美国目前的军费开支低于英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英国使团从容不迫地抵达莫斯科一周之后，冯·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先生也轻松地从柏林飞抵莫斯科 。

在那些夏日里，天气的晴朗就像政治预测的阴森冷酷一样，希特勒沸腾的思想不断膨胀。他的重整军备创造了纪录，军队中的边境守备师在三年间从 7 个增加到 51 个，超过了德皇军队在 1914 年前十年的规模。他确信西方像以往一样可以再次被愚弄，而令人讨厌的波兰

人可以单独惩罚。同伟大的斯大林思路相同，希特勒准备发动一场有限战争，而不考虑打这场战争是否必要。他不爱听唉声叹气的西方外交官的话，也不爱听本阵营中像戈林或墨索里尼那些人的话，后者想要延长和平。在5月23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没完没了地宣称要向东方开拓生存空间，并称战争迟早不可避免。6月14日，希特勒给他的将军们规定了一个为期八周的备战时间表。8月22日，即八周之后，他在贝格霍夫（Berghof）的另一次会议上宣称“战争比现在更好”。他的解释如下：“没有怜悯—冷酷的态度—可能是正确的—极其严峻。”[60]

准备工作的最后部分第二天就敲定了。8月23日，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显示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昔日的死敌，因互不侵犯条约而继续他们的贸易协定。更多的内容（除德苏双方高层人物外，没有人知道确切内容，直到六年后盟军缴获了有关档案）则以一项附加秘密议定书的形式作为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的补充文件：

[997] 莫斯科，1939年8月23日

在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双方下面署名的全权代表就确定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界限问题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讨论，结果达成以下协议：

1. 属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在这方面，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

2. 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维斯杜拉河、纳雷夫河和桑河一线为界。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是否符合双方利益的需要问题以及这样一个国家将如何划界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对任何事件，双方政府都将遵照友好条约的规定加以解决。

3.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宣布它对该地区没有利害关系。

4. 双方将视本议定书为绝密文件。

德意志帝国政府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权代表
约·冯·里宾特洛甫 维·莫洛托夫[61]

希特勒和斯大林划分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他们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其实是一个地道的侵略蓝图。

没有一个政党对西方强国持赞誉之词。里宾特洛甫确信德国能够战胜法国军队。至于英国，“帝国外交部长宣称，英国是虚弱的，它

想要别人为它统治世界的狂傲目标而战。斯大林先生热切地赞同……（但他）进一步表示，英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它将诡计多端地和顽强地进行战争。”[62]

德—苏条约往往被描述为希特勒的战争许可证。的确如此，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因为德—苏条约同样是斯大林的战争许可证。德—苏条约的墨迹一干，缔约双方没有对方的干扰而放心大胆地攻击它们的邻国。这正是它们双方所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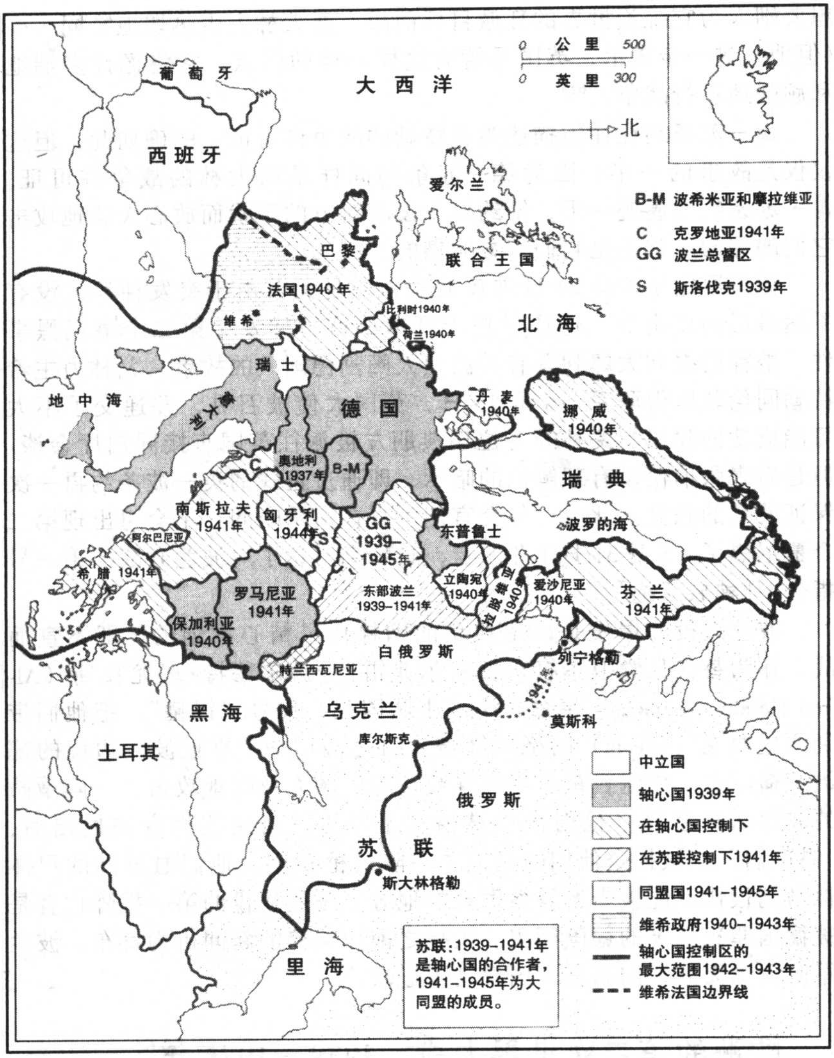
德军原定于8月24日进攻波兰，但是元首由于突发神经，没有下达最后的攻击令。他还异想天开地期待可能发生第二个慕尼黑事件。纳粹的报刊大肆刊登有关波兰人阉割德国人的故事；戈林力主希特勒同伦敦取得联系。8月25日，英国大使被召见，并递交了不太可能成功的建议。戈林的一位瑞典朋友被派往英国直接同白厅会谈。但是后来张伯伦没有理解他的暗示，即通过正式的英—波条约再一次保证波兰的独立。此后，外交官们一直在浪费时间：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慕尼黑了。8月31日下午1点，希特勒下达了对波兰开战的第一号指令。[**种族灭绝**]

波兰战役的爆发是以最典型的纳粹作风精心策划的，即不宣而战。作为替代，党卫军旗队长阿尔弗雷德·赫尔穆特·瑙尤克斯（Alfred Helmut Naujocks）奉命集中一小队囚犯，代号“锡罐”，把他们带到西里西亚（Silesia）的格莱维茨（Gleiwitz）一个靠近波兰边境的德语广播电台。该电台被一群身穿波兰军服的人及时地攻占，一阵激昂的波兰话夹杂着手枪射击声被播放了出去。当这些声音被播出后，“锡罐们”便被押送他们的党卫军一阵机枪扫倒，他们血淋淋的尸体被抛到很快就能被当地警察发现的地方。波兰战役的第一批阵亡者是被德国罪犯杀害的德国囚犯。天亮之前，纳粹的新闻机构宣布，波兰军队无缘无故地向第三帝国发动了进攻。[63] [998]

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64]

1939年9月1日德国人侵波兰并不是欧洲战事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德国已于1939年3月进犯立陶宛，意大利则于同年4月攻入阿尔巴尼亚。但是，9月1日的事件把一系列基本上属于地区性的局部战争演变成世界性冲突的背景。随着苏联的卷入——它已经在中蒙边界同日本交战，它就把欧亚两大战区连接起来了。理论上日本属于纳粹同盟体系，甚至在德—苏条约钳制了反共产国际俱乐部之时也不曾变化。但事实在于，日本、苏联、波兰、德国和西欧强国纷纷陷入冲突之网，这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无可争辩的论据。

[999]



地图 2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1939—1945 年

直到与日本之间的对峙解决之前，红军在波兰的作用始终不明确。8 月 28 日，由不知名的将军朱可夫（Zhukov）率领的苏军装甲部队在哈勒欣河（Khalkin - gol）对日作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似乎是在欧洲推行积极的苏维埃政策的前提条件。斯大林推迟进军波兰可能不是偶然事件，直到 9 月 15 日苏日在蒙古签订了休战协定，朱可夫的师团才能翻越乌拉尔山返回。[65]

德—苏条约在欧洲创立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随着西方强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面对着中欧与东欧的联合（见原书附录Ⅲ，第

1312 页），大三角现在转变了方向。大三角仍然不够完备，因为西方强国和苏联双方都避免发生直接的对抗。这意味着西方可以对斯大林的侵略佯装不见，只要斯大林将其反西方的活动限制在对德国的宣传和逻辑支持范围内。[66]德一苏条约还是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它为德国和苏联摧毁波兰以及重建十九世纪一直存在的共同边界提供了条件。此后，它又使德苏两国得以收拾那些干扰其部署的小国。没多久，它就给了希特勒在斯大林的支持和鼓舞下进攻西方的机会。

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证实：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给[1000]了苏联建立防御体系的时间。已知两年后发生的事情，这论点看起来貌似有理；但这可能还是解读历史的另一个权威例证。1939 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希特勒战胜西欧后会转而进攻苏联；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很可能和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因为至少还必须考虑其他三种局面。其一是德国有可能在西欧被击败，如 1918 年所发生的那样。另一种前景是，德国同西欧经过血战形成僵局，而后苏联不发一枪就能出头当欧洲的仲裁人。这是戈培尔关于苏联式游戏的观点，他指出："莫斯科的意图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直到欧洲……流尽鲜血。然后斯大林将步入布尔什维克化的欧洲，并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它。"[67]第三种可能性是斯大林将利用希特勒对欧洲作战的间隙，准备发动他自己的进攻。

由于苏联相关的档案处于封闭状态，有关这些事件的历史知识始终含糊不清。但有两点迹象很重要。第一，甚至几乎没有证据显示，1939 年 8 月以后，红军将准备全面防御置于优先地位。正相反，红军拥护革命的进攻理论。斯大林经常强调，共产主义与和平主义不同；在 1938 年对军校学员讲话时，斯大林强调，苏维埃国家无论何时都需要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第二，对 1941 年初夏红军部署的研究使人联想到，已经用了两年时间来为明显的进攻造势。[68]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两年后突然降临的灾难（见下文）。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不得不推断，斯大林开始履行同纳粹之间的条约，虽然未能赢得用以备战的时间，但是却在精心设计的侵略游戏中打败了希特勒。[69]

毫无疑问是德一苏条约将欧洲引入了无人能够预见的事态的发展之中。在第一阶段，1939—1941 年，该条约依然有效，纳粹和红军在它们各自划定的势力范围内继续迅速地从事冒险活动。红军的运气时好时坏；但是德国国防军对西欧提出的狮子大开口式的要求较之最异想天开的德国将军所能想象的来得更快。在第二阶段，1941—1943 年，纳粹的战争机器投入到东方。德—苏战争继续着决定欧洲命运的主要的军事竞争。西方强国，被缩小到控制一个严阵以待的海岛，只能发挥次要的影响。在最后阶段，1943—1945 年，东线的苏军与西线

日益增强的英美军队联合作战，以确保德国的垮台。

纳粹德国与苏联间的伙伴关系（1939年9月—1941年6月）。由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秘密议定书，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场战役的参加者在错误的前提下参加了战争。西方强国认为，他们在纳粹侵略的威胁下确保了一个同盟者；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保证了一个既可能受到苏联攻击又可能受到第三帝国攻击的同盟者。波兰人以为[1001]他们的任务就是在15天内阻止德军前进，直到法国军队从西面突破德军防线；实际上，他们面对着无法完成的任务，即要靠他们自己同时阻止德军和苏联红军的进攻。法国人没有发动进攻；英国人把他们的援助限定为在柏林上空投放传单。

在这种格局下，波兰的入侵者们充分享用着每一个可能的有利条件。德军司令部同其波兰对手一样大约拥有60个师的兵力；但由于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德军就已经在三面包围了波兰。无论是在机械化部队还是在空中力量方面，德军都占有压倒优势，在进攻的最初几天，德军就能在波兰打击上百个格尔尼卡（Guernicas）这样的城镇。更重要的是，在获悉其苏军伙伴将在后方粉碎波兰人的任何反击后，德军就能信心十足地投入其装甲师深入波兰领土。苏军司令部稳操胜券。谢绝了加入德军行动的任何时间表，苏联将军们得以在进军波兰给予其致命的一击之前，观望和等待直到波兰遭到德军的重创。因此，在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中，军事行动被政治和背叛行为蒙上了一层阴影。波兰人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进行了长达五周时间的毫无希望的抗击。西方强国对德国宣战，但却拒绝对抗苏联，甚至当苏联与德国的同谋关系很明显时，它们都没有干预战争。英国人不能干，法国人不愿干。法国的总动员旨在准备长期战争：他们要求所有的前线师团撤换临时军官，长时期的改编旨在阻止任何直接的进攻行动。这样，希特勒和斯大林才得以自行其是。

9月1日黎明，德国军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波兰。靠近边界的波军防线被包围。从9月9日起，华沙遭到合围。市民遭受到空前规模的轰炸。德国的第五纵队在前线后方行动。纳粹特别行动队出现在后方，射杀抵抗分子、掉队士兵和犹太人。呼啸着的斯图卡式(Stuka)俯冲轰炸机炸毁了铁路、公路和桥梁，连同挤满其间的避难者。一半被炸成瓦砾的华沙城，挖掩体准备经受长期的围攻。波兰军队在东南方重新集结，准备保卫利沃夫（Lwow)，同时在中部的布祖拉（Bzura）发动了一场决定性的反击。9月15日，德军发布的公报佯称华沙已经失陷（华沙抵抗了两个多星期）。斯大林可能感到他正在失分，于是在9月17日对波军发起进攻，红军部队蜂拥地越过了

波兰东部边界。他们散发的关于从纳粹手中解救波兰的虚假公报引起了全面混乱。实际上，他们长驱直入，到达布格河边同希特勒商定的界线，到达波兰同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南部边境，以便把被占领的波兰东部封闭起来。在彻底巩固胜利成果之前，德国和苏联军队就在布热希奇（Brzesc）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 - Litowsk）联合举行了胜利阅兵式。

9月28日签署的德—苏友好合作与划界条约较之五周前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走得更远。它重新划分了边界线，将立陶宛纳入[1002]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以交换波兰中部的一部分给德国。它还包括另外一个秘密议定书，意在共同抑制波兰人的“骚动”。这些措施迫使华沙最终放下武器，波兰政府逃走并流亡国外。大批波兰军人潜入森林或亡命海外。波兰最后的投降仪式于10月4日举行，当天希特勒抵达华沙，接受忠于他的军队的致敬。布格河以东的一切事务均由苏方掌管。

希特勒此时的思想被他忠实的宣传部长记录了下来：

> 元首的裁决给波兰人定了罪。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更像动物，完全处于原始和无组织状态。统治阶级是在下层社会和雅利安优等民族之间折中的一个令人不能满意的结果。波兰人的肮脏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的知识判断能力完全是零……
>
> 元首没有同化波兰人的意向……雄狮亨利征服了东方……其结果肯定产生一个强大的斯拉夫化的日耳曼杂交种族。现在形势比较好。现在我们了解了种族遗传法，可以依法行事。[70]

对波兰的双重占领带来了两种极权主义实验室并列存在。在两年间，纳粹和苏维埃秃鹫在波兰倒毙的躯体上泰然自若地欢宴。在德国占领区内，西部诸县被并入第三帝国，经受种族清洗和日耳曼化的严酷统治。所有其他各县都被纳入党卫军和军队统治下的所谓的波兰总督政府。这个“盖世太保国”既不实施波兰法律也不实行德国法律，而变成了纳粹意识形态最后的试验台。它仅仅是被占领的欧洲的一部分，为追求东部的生存空间，纳粹决策者在这里能有时间对全体居民全力推行种族政策。希姆莱首次视察波兰以后，老年病人和精神病人从医院中被抓走，孤儿院遭到纳粹警察的突然搜捕，符合人种培育计划的男孩和女孩被送往生育机构；[71]在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奈克（Majdanek）组建了集中营以处理抵抗者。在一场血腥大屠杀，即所谓的AB行动（AB—Aktion）中，大约有15000名波兰知识分子、军官、政治家和神甫被挑选出来枪毙或关押到集中营。从1939年后期起，波

兰大量的犹太人团体被强令迁入称为隔离区的地段内，然后逐步在四周筑起围墙，锁住入口，最后被完全隔离起来。得到犹太警察支持的犹太人委员会在纳粹的监督下管理隔离区。[72] [**奥斯威辛**]

在并入苏联的前波兰地区，上演了虚伪的全民公决，以证明选择并入苏联是“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公众的要求。这种“格伯乌国”（GPU—land）处于同苏联其他部分相隔绝的状态，遭受到斯大林主义恐怖暴力的严厉惩罚。约有 40 种人，从警察到集邮者，被挑选出来立即逮捕和流放。到 1941 年夏天，大约有一二百万公民被运[1003]送到劳改营或中亚的强制流放地。恐怖不仅直接针对所有的前波兰国家官员，也降临到乡村教师和看林人头上，而且全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犹太人的公共组织都受到同等对待。那些据称“从波兰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人也受到与别人同样冷酷的惩处。在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行动中，大约 26000 名波兰战俘——主要是预备役军官，其次是知识分子、军官、政治家和神甫，被从战俘营中带走，在统称为卡廷森林事件的一系列大屠杀中被枪杀。在布列斯特横跨布格河的界桥上，进入苏联的人们遇到其他一群人，包括寻求到第三帝国避难的犹太人。一个党卫军军官曾经大喊道：“在这个地球上你们想到哪里去？我们要杀死你们。”[73]

在这些年里，党卫军同苏联内务部的广泛合作关系实际上从未建立起来。纳粹的档案失踪了；苏联的档案仍处于封闭状态。即便这样，直到 1941 年，苏方还在任命驻克拉科夫党卫军总部的高级联络官。纳粹德国和苏联代表出席联合会议；交换俘虏；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宣传活动步调一致，全力开动。从 8 月 24 日起，苏联的报刊宣传一反以前的政策，把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的报道作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加以引用。《真理报》宣称，“德苏友好关系现在已经永远建立起来了。”[74] [**卡廷**]

[1004]

卡廷（KATYN）

1940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道命令，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枪决 26000 多名波兰战俘。这些战俘是上一年 9 月德苏两国联合夹击波兰的战役中被抓获的，被分别关押在科吉尔斯克（Kozielsk）、奥什塔科沃（Oshtakovo）和斯塔罗别尔斯克（Starobielsk）三个战俘营中。他们几乎全部是波兰预备役军官——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警官、教士，还有一名妇女，她被苏联人从这支在苏联的战俘大军中分离出来。战俘们被分成

小组驱往秘密刑场，他们被蒙住眼睛，捆绑双手，击中头部，埋入大坑内（这次行动于6月6日结束）。[1]

同是在这几个月，遵照德—苏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纳粹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进行了密切合作。瞒着外部世界，两个占领大国都进行了一系列同样的屠杀和驱逐行动。[2]也就在同一期间，西方强国被“虚张声势的战争”弄得束手无策，而他们的波兰盟友正遭到系统的和无所顾忌的屠杀。

1941年，当纳粹德国与苏联的条约废止，斯大林与流亡的波兰政府签署盟约时，波兰人探询有关波兰军官失踪的消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一次交谈中，斯大林告诉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他们肯定已经逃跑了。“但是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呢?”“嗯，可能是满洲（Manchuria）吧。”[3]

1943年4月，正当华沙犹太区爆发起义期间，驻波兰的纳粹当局公开发行了一部新影片，影片显现出4500多具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发掘出来的被杀害的波兰军官的尸体。他们称这是苏联人犯下的罪行。苏联人则称这是纳粹分子的挑衅。波兰流亡政府呼吁国际红十字会前来进行一次调查。为此，他们被克里姆林宫谴责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同伙”，苏联人并果断撤销了他们对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承认。一个国际委员会在德国人保护下访问了此地，他们支持德国人的观点。1944年，第二个委员会在苏联人保护下到达现场，他们支持苏联人的观点。[4]

卡廷大屠杀使英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陷入窘境。在充当波兰流亡政府的东道国的同时，伦敦深深致力于维持与斯大林的联盟。一份公开的但未出版的英国报告得出结论：“苏联人犯罪几乎就是确凿的事实。”但是，盟国事业的最高道德目标是不能拿来冒险的。这样，每一次努力的结果都只能是压制真相的揭露。官方的通讯社鼓励人们相信苏联人的说法。战时的审查制度使相反的报道无法传播。[5]事件被扼要地载入SOE的机密文件中：“在英国，官方的渠道不得不谎称：全部事情都是捏造……任何其他的观点都是不宜出版的，因为它可能被推断为我们也以权力犯下了类同于德国人那样的种种暴行。”[6] [1005]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和平时期鲜有诚实的信息可得。卡廷案件的刽子手们被苏联检察官在纽伦堡法庭提请公诉；但不久对德国人的指控就停止了，这一案件也不再追诉。在整个冷战期间，移居伦敦的波兰人被阻止发表有关的回忆录；英国官员被禁止出席每年一度的纪念仪式。尽管在1950年代美国国会的一个专门委

员会发现了不太确切的证据，英国外交大臣在1989年依然宣布卡廷案件的真相尚不明朗。直到1990—1991年，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总统部分地、叶利钦（Yeltsin）总统全部承认了苏联在卡廷事件中的责任时，英国战争罪行法令才谨小慎微地得到签署，而且其范围内不包括盟国罪犯。据报道，一些据说是内务部的刽子手们在俄国还活着，而且过得还不错。[7]

在苏联和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卡廷事件在整整50年间始终不准披露。[8] 苏联一个主要的有关纳粹暴行的纪念碑在白俄罗斯村庄哈廷（Khatyn）附近建立，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接受了一种精心策划的虚假信息。波兰新闻审查委员会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Polish Censorship）把卡廷列为不准提及的事件，甚至把它归咎于纳粹。[9] 私藏《卡廷名单》（Lista Katyńska）———部在国外出版的有关卡廷事件牺牲者所有人名的印刷品——是刑事犯罪行为。[10]经过半个世纪，“卡廷”事件为历史学家职业性的诚实和他们掌握的伟大同盟的真实提供了试金石。它绝不是苏联最极端的暴力活动。但是它是个绝好的问题，它迫使评论家们在日益有力的证据与胜利的西方和苏联政府谋求私利的陈述之间作出抉择。那些选择了说出真相的人由于“不科学”而被坚持驳回。[11]

西方各国的无所作为无疑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一位法国政治家称之为“虚假的战争”，对那些没有直接卷入战争的国家来说只不过是滑稽可笑罢了。在波兰陷落20个月之后，13个欧洲国家遭到外国军队的入侵，其中八个国家落入希特勒之手，五个国家亡于斯大林。1939年11月30日，斯大林率先派遣红军进入芬兰。

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暴露出红军内部的严重缺陷，同时检验了西方强国容忍的有限性。斗志高昂的芬兰军队抵挡住了苏联入侵者达五个月之久。在初期，他们使试图突破曼尼海姆（Mannerheim Line）防线的行动迟缓的苏军遭受惨重伤亡。苏军的策略和装备被认为显得略逊一筹；苏联的政策被谴责为明火执仗的侵略行径。当国联将苏联开除之后，西方强国再也不能像对波兰那样佯称斯大林的劫掠行为不管怎样总比希特勒的更具合法性了。在春季，当红军准备对芬兰发动一场势不可挡的进攻之时，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芬兰的求援，并通过纳尔维克（Narvik）和拉普兰（Lapland）铁路提供援助。甚至出现了轰炸巴库（Baku）油田以报复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的设想。重新涂上芬兰空军的“卐”字标志的英国空军的轰炸机中队正整装待发，只是芬—苏条约签订的消息才将伦敦从进退两难的窘境中解救出来。

芬兰虽然保持了独立和主权，却被迫让出卡累利阿（Karelia）东部的大片领土。德军总参谋部几乎不可能忽略苏联表面上软弱的含义。

芬兰战役暴露出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利益容易受到损害，尤其是瑞典通过纳尔维克向德国出口铁矿石。希特勒于1940年4月9[1005]日发动了进攻。丹麦被迅速占领，之后不久，挪威也陷落了。一只派往纳尔维克（Narvik）的联盟远征军遭到惨败。这是英国人第一次的明智选择，他们宁可隐瞒救命的信息，也不能泄露他们已经掌握了纳粹的密码。德国人的密码是波兰人最先破译的。[75]从此以后，斯堪的纳维亚就牢牢地控制在德国人手中。丹麦保留了国王和政府；挪威被交给一位当地的合作者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只要继续输出铁矿石，瑞典就可以保持中立地位。这意味着德国对西方的政策比对东方的要仁慈得多。

在1940年初夏，纳粹的战争机器就对西方联盟做好了攻击的准[1006]备。发动攻击必须是在德国士气旺盛、英国重整军备尚未取得成果之时。对西方联盟的攻击基于三个相互联系的战略——在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军事行动是要扫清道路；主要的地面行动针对法国；针对英国的空中行动是要压制英国皇家海军，并使联盟保持分裂状态。德国人的表现再一次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从5月10日对鹿特丹惨无人道的轰炸，到5月28日比利时的投降，对低地国家的征服仅仅用了18天。从5月14日越过法国边境，到6月16日巴黎陷落，击败法国只用了不到五个星期。

法国沦陷只是那些令人寒气彻骨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三个世纪以来，法国曾经被看作是主要的武装力量。1918年的胜利被认为已经抵消了1870年的灾难。然而，得到英国和波兰支持的法国军队现在被纳粹国防军击败了，所用时间比德国和俄国共同击败波兰还短。1940年的情况表明法国在1870年并非失常。德国入侵者在数量上并没有始终保持优势，甚至装甲车的数量也没有始终保持优势；但是他们的装甲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了第二轮闪电战。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由于没有延伸到比利时，所以被轻易地绕过了；德国装甲部队就像一支钢铁纵队，插入到北部的英国人和中部的法国主力集群之间。当侧翼的法国军队撤离时，他们被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猛烈的火力的德国军队追击着。在阿拉斯（Arras），陆军准将夏尔·戴高乐领导装甲部队进行了惟一有意义的反攻。但到处是一片混乱。英国远征军被彻底打败了，困在敦刻尔克的沙丘上。虽然第51步兵师（苏格兰高地师）在圣伐勒里（Sainte—Valerie—en—Caux）的海边悬崖使德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死亡、被俘或撤退是他们仅有的选择。

6月中旬，当巴黎再一次面临着70年前那场可怕的围攻时，法国的政府机构突然停止运作。与波兰人不同的是，波兰人拒绝与侵略者谈判，而法国领导人却主动求和。贝当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的英雄，派一位下属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贡比涅（Compiegne，康边森林）签署了停战协定。协定内容：法国解除武装；二百万法国士兵关押在德国充当劳工；允许一个设在法国中部城市维希（Vichy）的自治政府继续统治法国的南半部，条件是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给德国，并且法国北部必须由德国军队占领。当希特勒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检阅他的军队时，他成了欧洲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普里皮特（Pripet）河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少量混杂在一起的英国、波兰和自由法国军队仓促地渡过海峡返回英国。一个新的、傲然不屈的英国人的声音，丘吉尔用蹩脚的法语发表的演说在无线电波中回响：“一个能生产出300多种奶酪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戴高乐将军发表声明，“法国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没有输掉这场战争。”[**欧洲货币联盟**]

[1007]

欧洲货币联盟（EMU）

1940年夏天，德意志帝国银行拟订计划，准备在一个遍及欧洲的所有德国占领区的经济联盟中发行帝国马克作为共同货币。由于纳粹始终未能成功地确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这些计划也就变为一纸空文。

关于货币联盟的第二次尝试发生在三十年之后，欧洲委员会支持这个倡议。战后，建立在金本位美元基础上的货币协议处于困境之中；而欧洲共同体各国的货币，尤其是德国马克非常不合时宜地坚挺。首先是1969年拜尔（Barre）的报告，随后，以卢森堡的皮埃尔·维尔纳（Pierre Werner）为首的委员会于1980年拟订了完整的“欧洲货币联盟”计划。与此同时，绰号为“蛇形浮动汇率”（the Snake）的汇率机制将欧共体每个成员国的货币与其他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由于美国1971年放弃了美元的金本位制以及英国加入欧共体不久就放弃了蛇形浮动汇率，这一体系迅速解体。在1970年代，九种货币中可能只有五种还在实行约束力小得多的蛇形浮动汇率。

第三次尝试发端于欧洲委员会英国主席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他的倡议在两年后结出果实——产生了欧洲货币体系（EMS）连同一种新的汇率机制（ERM）和它所支持的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见原书第1086页）。20世

纪 80 年代由于法国根据单一欧洲协定（Single European Act）将法郎与联邦德国马克密切挂钩，这一体系大大得到加强。另外，1986 年签订的单一欧洲协定还吸引了英镑加入汇率机制。直到两个德国于 1990 年重新统一，不值钱的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等值兑换的致命决定实行之前，所有一切似乎都运行良好。此后，德国的高利率使得弱势货币处于不利地位，迫使后者或在允许的限度下贬值或在整个体系之外浮动。到 1993 年 8 月，只有德国马克与荷兰盾还保持在汇率机制的狭窄地带内，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早期的倡议者们将其形容为通往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平滑小径”(见原书第 1126—1127 页)。

1940—1945 年，尽管德国一度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从属的帝国银行从未强大到足以将其货币计划付诸实施。1969 年以后，一个独立的联邦银行强大到足以始终首先考虑自己当前的重点。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有效的政治框架缺失的情况下出台经济计划是永远注定失败的。

与对法国的重大征服相比，德国空军对英国进行的空袭似乎注定是次要的事情。但实际证明这是纳粹最重大的失败之一。由戈林负责[1008]的对英国进行的空袭，是由达到高潮的对英国的码头、工厂进行夜间突袭式轰炸，即所谓的“闪电行动”，以及同时进行空战以获取对英国南部和海峡的控制权等一系列行动组成的。“闪电行动”出动了多达 1330 架飞机的庞大机群，海因克尔式和容克式轰炸机，在梅塞施米特式和福克—沃尔夫式战斗机群的掩护下，从法国北部的基地起飞执行任务。对英国进行的空袭，只是作为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计划的序幕。在“海狮行动”的详细计划中，还包括拘捕 1100 名英国的重要人物。“海狮行动”被大大地提前了。空袭遭到了英国皇家战斗机群的顽强抵抗。英国皇家战斗机群装备了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而其中大约百分之十的战斗机是由波兰、捷克和自由法国的飞行员驾驶的（最好的空军王牌飞行员证实是一位与波兰 303 飞行中队一起作战的捷克飞行员）。德国对考文垂（Coventry）的轰炸没有击中坦克工厂，但却摧毁了大教堂和 500 多座房屋。这次轰炸与后来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上空的业绩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同盟国却把德国对考文垂的轰炸看作是纳粹野蛮行径的一个主要标志。持续了四个月之久的不列颠之战，在 9 月 15 日达到高潮——那天英国皇家空军的后备队几乎消耗殆尽，但此时，戈林也不得不承认，纳粹德国空军损失更为惨重，无法再继续战斗了。空战和入侵英国的计划被无限

期地推迟了。丘吉尔曾在下院说过："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大的贡献。"在敦刻尔克大溃败之后，这是英国最光辉的时刻。

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在三个方面是关键性的。第一，为同盟国的事业提供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基地，在这里，欧洲（大陆）精锐的陆军部队再也不可能受到攻击。第二，由于把英国变成了"地球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盟国空军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平台——盟国空军是西部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第三，在外交方面，为潜在的英语世界联盟的形成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5月7日，丘吉尔在法国最危急的时刻，成为了英国首相。他与美国保持着稳固的联系，并决心尽快地把美国人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在1940年秋，英国已成为欧洲联盟事业最后的立足点。没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保护，美国就根本不可能介入欧洲的战争。实际上，美国的援助使英国的财政和心理能够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坚持下去。1940年9月，美国以旧驱逐舰换得在英属加勒比海岛屿建立基地的权利。1941年3月，在租借法案更宽松的原则中，美国对英国的援助范围扩大了。这下德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去抱怨了。

海上的战争没有得到如此迅速的解决。德国向英国的海上霸权发起了坚决的挑战，使用了最新式的袖珍战列舰队和不断增强的潜艇集群。在第一回合中，英国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在锚地斯卡帕湾（Scapa）被击沉，德国装甲舰"施佩伯爵"号在普拉特（Plate）河口外的海战导致了它的毁灭。后来，"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战列舰出海作战了。"俾斯麦"号在击沉了追击它的英国战列巡洋舰[1009]"胡德"号后，它自己被英国的鱼雷攻击机击中，失去了战斗力，后来被英国舰队击沉。"蒂尔皮茨"号遭到追击，进入了挪威的峡湾。然而，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德国的主要战绩就是实施了潜艇战。在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和南特港落入纳粹之手后，"大西洋战役"激烈地进行了三年（见下文）。

在地中海，盟国的利益与轴心国对北非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发生了冲突。1940年5月，当墨索里尼宣战并侵入了法国的阿尔卑斯地区时，物资供给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了。意大利在的黎波里（Tripoli）的基地，被驻扎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英军以及驻扎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法军包围了。不久意大利就急需德国非洲军团运送给养。在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港之间2000英里的航线上，只有英国在航线中途马耳他岛的海军基地可以对英国舰队提供保护。马耳他岛经受了持续的封锁和轰炸后，勇敢地坚持下来了。迄今，战争初期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西方列强之间。当巴黎落入纳粹之手时，英国要求

法国交出全部舰队。当时法国舰队的主力部分停泊在阿尔及尔的米尔斯克比尔（Mers—el—Kabir）军港。当法国海军上将拒绝了英国的要求时，1940 年 7 月 3 日，英国皇家海军执行了一项无情的命令，摧毁所有停泊在港内的法国舰只及其船员。此后，英国把注意力转向了利比亚沙漠。一方面要面对德国非洲军团的推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巴勒斯坦日益增长的犹太恐怖主义。英国军队在埃及的处境一直很危险，直到 1942 年 10 月 23 日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的第二轮战斗取得胜利。随后的 11 月，英美联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登陆了。

希特勒抢先占领了欧洲，与此同时（1940 年），斯大林重新开始了对东方的入侵。在入侵芬兰的行动完全失败后，就像《纽约时报》所贴切地描述的那样，斯大林又一次充当了“希特勒狮子的鬣狗”。这次，斯大林的目标是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他毫不费力地就达到了目的。而此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法国的命运所吸引。

在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曾经发动过一场协调一致的颠覆战。接着，在 1940 年 6 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产主义者的基层组织被发动起来要求苏联对他们进行“援助”。莫斯科以苏联安全利益为借口，要求让苏联红军进入波罗的海三国。在随后发生的骚乱中，三国政府垮台了；苏联红军进驻波罗的海三国；预先策划的公民投票不过是一场预知结果的表演；斯大林主义者开始了无比残忍的恐怖行动。在大屠杀和驱逐出境的行动中，苏联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把波罗的海三国的全部德国人迁移到波兰的德国占领区。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是，塔林、里加或维尔纽斯却认为，纳粹向前推进的日益增加的可能性，意味着幸运的解放即将来临。就罗马尼亚来说，斯大林要靠德国更为直接的帮助。罗马尼亚脆弱的自由主要靠的是向德国出口石油。所以，当莫斯科提出领土要求，柏林劝告罗马尼亚接受时，罗马尼亚无法拒绝。1940 年 6 月 27 日，在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占领 10 天后，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Bukovina）和比萨拉比亚省就在回归其“苏联祖国”的炫耀中被苏联占领了。给蒙受羞辱的罗马尼亚留下的只有痛苦的复仇欲望。[**摩尔多瓦**] [**切尔诺维茨**] [1010]

[1011]

摩尔多瓦（MOLDOVA）

在金黄色麦浪中间的一块高地上，五个年轻的收割者坐在一小块地毯上共进午餐。一位头戴鲜红色头巾的姑娘，把报纸铺在

双膝上，正念给她那些微笑着的伙伴听。他们在分享一个大肚酒瓶中的葡萄酒或是水，一大碗面包或米饭，还有一大块红色的西瓜。大量未收割的和成捆的小麦向绿色的山谷中以及更远处长满树木的小山延展。在画面的前景中，摆放着一辆闪光发亮的绿色摩托车，在远处，一部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小地毯上的伙伴们所在的地方是摩尔达维亚（Moldavia，现名摩尔多瓦）。画中的时间可以是1940年之后的任何时期，当时，摩尔达维亚已被苏联合并。这幅阿列克赛·瓦西列夫（Alexei Vasilev）的作品被称为"《真理报》正在谈论我们"。[1]（见图70）

这幅画几乎算不上是大手笔。但是其技巧是够格的，效果让人赏心悦目。没有沉迷于任何生硬的政治手势。瓦西列夫成功地调动了所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如日丹诺夫（Zhdanov）称谓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所有主要因素，有如党的领导在1934年规定的那般。他创作的这幅画，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内容上的社会主义"。该作品的民族精神含蓄地体现在摩尔达维亚农民与莫斯科赞赏者之间的关系之中。它对党的忠诚明显地体现在画中人物为党报提到他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之中。它的阶级觉悟隐喻在农民的服装和体力劳动上。它的意识形态特征表现在画中人物的乐观主义及政治方面的正确态度。它所表现的寓意来得响亮而明晰：快乐的工人们加上现代化的机械，创造出高效的生产率和公共福利。这幅画明显地表现社会主义，而且显得相当真实。

而事实是，在苏联时期所有最主要的现实生活都遭到系统的歪曲。实际上，摩尔达维亚的农民群众不久前已被剥夺了土地和文化。他们被强迫在集体农庄中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剩余劳动被苏维埃国家掠夺一空。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古拉格死亡营，或作为破坏分子被枪毙。他们的语言被蛮横地改为西里尔字母，以便苏联教育出来的儿童不能再阅读战前的罗马尼亚或摩尔达维亚文学作品。他们被否认了所有与罗马尼亚的西半部摩尔达维亚的联系，并告诉他们那边是外国。他们遭到毒打、威胁，被迫去乞讨。却向世界告知，摩尔达维亚人民生活得绝对心满意足。

对公正的评论者来说，问题是这样被提出来的：当在人道和道德领域创作的基本意图是为了欺骗之时，艺术还能保留多少唯美主义价值？

[1012]

切尔诺维茨（TSCHERNOWITZ）

苏军于 1940 年 6 月进入北布科维纳（Bukovina）是其摧毁一种文明的第一步。自从 1775 年奥地利把原来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一个角从奥斯曼帝国夺过来，这里成为哈布斯堡王国最远的前哨基地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以后的 20 多年内，它又落入罗马尼亚手中。其首府名为切尔诺维茨（Tschernowitz），或切尔诺蒂（Cernoti），位于普列特河（Prut）畔，是多语种、多教派、多阶层社会的中心。在那里，中欧的德意志帝国文化，像一层透明的纱网，笼罩着当地犹太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罗西尼亚人（Ruthenian）富裕阶层的生活。经过苏联整整五十年的整治，切尔诺维茨变成了乌克兰一个缺乏生气的偏远省份。

古老的布科维纳（Bukovina）已化为乌有。但通过一位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后一个月返回的流亡者的怀旧，依稀能够看见它所表露出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生活在“不复存在的帝国边界线的德国统治阶级维护高贵地位的徒劳尝试”：

旧式的房屋有些依旧被喷涂成奥地利人喜好的蛋黄色，与俄罗斯式威严的豆青色此起彼伏。但是，布科维纳人已经不复存在……所有的原来居民或被杀害，或被遣返，他们的住所被不易冲动而爱吃卷心菜的乌克兰人所占据。那种野性的、色彩缤纷的、杀气腾腾的多样化……被准斯大林主义的千篇一律的切尔诺维茨所取代。在城市广场的集市上，曾有过“笼罩着一层大蒜气味”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利波瓦尼亚人（Lipovanians）和德国人为了羊皮、气味刺鼻的奶酪、劣质酒、烟草、食用油与牛粪的价格而喋喋不休地争吵的场面，现在变成了一大片铺设混凝土的游行场地，周围悬挂着列宁的巨幅画像。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世界性的边疆地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到了 1940 年秋季，可以对德—苏伙伴关系的利益加以评估了；显然希特勒比斯大林获利更多，法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业和战略价值比苏联占领的地方大得多。尽管元首被狡猾的佛朗哥拖延了——希特勒曾经在昂代（Hendaye）与佛朗哥会晤，但是，法西斯集团还是控制了（欧洲）大陆的更大部分地区。而且，德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避免了与西方长时间的争夺。在斯大林看来，希特勒的成功开始显示出威胁了。在法国被占领以后，对德国的

扩张计划来说，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一个是俄罗斯的传统猎场——巴尔干半岛；另一个便是苏联本身。

莫洛托夫 1940 年 11 月访问柏林时，德苏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莫洛托夫的态度极为强硬，提出了一系列很不明智的要求。据推测，莫洛托夫是被要求去试探德国人的忍耐限度。当元首承认德国正忙于与英国进行“生死之战”时，莫洛托夫说，“是的，德国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而英国则是为德国的死亡而战。”双方都料想到他们的伙伴关系结束了。不知道斯大林到底向苏联红军发出了什么指令；但是，12 月 18 日，希特勒发布了第 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

1941 年 4 月的巴尔干危机，根源在于墨索里尼愚蠢的错误。已经从阿尔巴尼亚推进到希腊北部的意大利军队遭到了勇敢的希腊人的痛击；领袖（墨索里尼）迫切需要德国人的再一次救援。除此之外，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也正受到内外困扰。摄政会议在努力与德国签订了协定之后，就被军队推翻了。当纳粹德国军队攻入南斯拉夫时，整个国家陷入分裂。在经过 11 天的战斗之后，德国人占领了这片充满敌意的广大地区。南斯拉夫政府流亡伦敦。克罗地亚宣布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全都获得了大片的领土。地下武装激增。恐怖的乌斯达莎（Ustasi）或克罗地亚“叛乱者”动用了法西斯死亡营和大屠杀的全部手段，对他们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进行了坚决的种族清洗。领导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保皇主义组织切特尼克（Cetniks）受到由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 年）领导的对立的共产主义运动日益强烈的反抗。南斯拉夫敌后游击队员们自相残杀的习性反而超过了他们消灭侵略者的坚强决心 。[濡毙]

在更南面的希腊，德国人的进攻势如破竹。雅典被占领；试图保卫克里特（Crete）岛的英国军队 5 月底被打败。斯大林对巴尔干半岛危机的反应显示出了他与希特勒的不一致。在德国人开始进攻的头一天，即 4 月 5 日，斯大林与南斯拉夫签订了友好条约。4 月 13 日，他[1012]与日本签订了至关重要的日苏中立条约。苏联为在欧洲开始的重大行动扫除障碍。在 5 月 15 日，朱可夫就建议苏联红军在德国军队发动进攻前抢先行动，阻止德国的进攻准备。朱可夫并因此而闻名。

从南斯拉夫战争开始，德国的战场就转向了东部。1941 年 6 月初，在从东普鲁士到罗马尼亚的偏远地区和偏僻的小路上，到处充满了德军露营地的喧闹和坦克的轰鸣声。每一个波兰农夫，以及全世界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都知道，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只有斯大林一人似乎一无所知，他命令要尽量避免边境争端。

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资料，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事实真相。通常的看法是，或者是斯大林没能深刻地了解希特勒背信弃义的程度，或者

是他正在为完成防御做准备。但又似乎都不像。不是专家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德国的战争机器不是向别处，而是直指东方。希特勒早就预想过，在 1942 年或 1943 年开始全面战争。但是他现在不得不决定，[1013] 或者乘胜进攻，或者冒失去主动权的风险，停止前进。对于前下士和他的一帮冒险家们来说，几乎没有时间犹豫了；他们的强烈欲望注定他们要么走向辉煌，要么走向毁灭。

至于斯大林，秘密的主人，人们只能去推测了。然而，正如德国人不久就发现的那样，苏联人并没有闲着。庞大的军事集结已经被重新部署在原来防守薄弱的前线地区；苏联空军的战斗机露天停放在靠近前线的机场上；边境警戒线已经向后撤回；对道路和桥梁进行了整修，以便重型车辆的通行。苏联红军的进攻态势一触即发。这一切都表明，斯大林很可能是装聋作哑，以掩盖他为防备德国的突然袭击所做的准备。[76]果真如此的话，他就是被对手抢先了。6 月 22 日黎明，德军对苏联发动了进攻。

纳粹在欧洲的霸权地位（1941 年 6 月—1943 年 7 月）。决定德国军队深入苏联境内的“巴巴罗萨”行动，投入了德军的主要兵力，开始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游戏。在“巴巴罗萨”行动开辟的苏德战场上，德军的伤亡人数占了德军在战争中伤亡人员的 75%，苏德战场肯定被判定为是导致希特勒最终失败的主要战场。在苏德战场上，令人惊讶的是，德国人接近了完全成功。有两三年的时间，纳粹德国的新秩序大大地扩展了。1941 年的进攻把德军送到了莫斯科城下；1942 年的进攻把他们带到了伏尔加（Volga）和高加索。（见地图 26）

德国 1941 年 6 月最初的进攻取得了突出的成果。156 个师，300 多万人，越过了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苏联红军全线溃退。苏联空军几天之内就被摧毁在地面上。苏联军队全都被包围了，大量的战俘被杀死。德军的装甲纵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波罗的海国家，在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德国军队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呼致意。按照传统的欢迎仪式，当地农民用面包和盐迎接德国士兵。在利沃夫，公众举行示威集会，公开宣布拥护乌克兰独立。撤退中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曾经在利沃夫屠杀了数千名政治犯。到了 12 月，尽管缺乏冬季装备，但前方的德国军团已经深入俄罗斯，并且围困了列宁格勒。在斯大林秘密保存在西伯利亚的预备队把他们赶回去之前，德国军队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斯摩棱斯克**]

1942 年，德军指挥部决定，德军沿着南方大草原向前推进。他们的重点是夺取乌克兰富饶的黑土地和遥远的巴库的石油。然而，他们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撤退中的苏联人搬走了地上的一切。工

[1014]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1941 年 7 月，德军飞速拿下斯摩棱斯克，以致苏共地方党委大厦及其中全部东西悉数落入德国人手中。斯摩棱斯克的档案包括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活动的各个方面的详细文件，其中也有斯大林的清洗和大恐怖。这批档案被带回德国后，于 1945 年被美军第二次缴获，并被运往美国。这些文件的规模远比落入美国手中并组成柏林的美国流动文献中心收藏的浩瀚的纳粹文献小得多。但是，苏联当局从不准许人们自由进入他们的国家档案馆，更别提党的秘密记录。因而，斯摩棱斯克的意外收获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建立在这些文件基础上的历史研究穿越了苏联宣传和西方理论的迷雾，提供了共产主义统治真正本质的第一个真正的一瞥。[1]

然而，许多苏联问题专家和苏联的辩护士并不愉快。在构建他们幻想的知识中鲜少或没有有效的证据，他们毫无希望地面对冷酷的现实。因此，当第一个分析了斯摩棱斯克档案的学者得出结论，他果断地宣布斯大林犯下的清洗罪几乎持续了二十世纪整个三十年代。首席辩护士无理搅三分地宣称："这种观点很难得到第一手证据的支持。"[2]类似的这种诡辩术直到苏联解体常常被视为科学。

档案对那些希冀操纵历史写作的人总是具有吸引力。1992 年俄罗斯当局披露了"特别档案"的存在，苏联政权一直把这些档案同其他记录分别保存。特别档案丰富的内容依然有待确定；但是，除了戈培尔（Goebbels）的日记外，它们确实包括了来自法国内政部保安局和波兰战前军事情报局的案卷，甚至还有来自英国远征军（1940 年）和卢森堡大公国的文件。据说它还囊括了帝国保安总局（RSHA）失落的全部档案。显然，纳粹的档案猎取者们把从全欧洲搜集来的机密档案存放到波兰和东德的古堡和地下室内，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再一次易手，成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苏联人重复多次地报复了斯摩棱斯克档案的损失。**[王室档案]**

更有迷惑力的是很可能纳粹档案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后被伪造。例如，在华沙，战后的共产党人的安全局（UB）继承了该市前盖世太保秘书处的内容。装备了适当的登记簿、密码、信笺、空白报告纸、官方印信，修改这些记录真是小事一桩。安全局几乎毫不费力地提供了波兰的抵抗运动——国内军受纳粹占领当局指挥的文件。[3]

[1015]

然而，50年来，由于文献的片面性，二十世纪中期历史学家的观点已经被指出一边倒的倾向。[4] 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共产党世界掩藏的宝藏开始修复已倾斜的天平。在德国，柏林文献中心储存的纳粹档案在准备移交给联邦政府时，前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Stasi）的文件在泄露其机密。在华盛顿，国会举行听证会以反对转移纳粹档案。[5] 因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非常深刻地领悟到："权力带来知识，也带来知情权。"

业地区空空如也；工厂的设备被拆除，运往远东，工业人口也转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epropetrovsk）的巨大水坝，苏联五年计划的骄傲，也被炸毁了。德国士兵翻越了厄尔布鲁士（Elbruz）山。当第二个冬季来临时，他们在向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逼近。

因为苏联的一个地区就相当于纳粹在西欧征服的所有土地，所以[1015]德军向伏尔加河的推进扩大了希特勒控制的地区。这片土地给了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在德意志边境之外的法网不及的地区现在扩展了1000多英里。纳粹根本无意考虑当地居民的意愿。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共和国——在前线地区只有军事政府，在奥斯特兰（Ostland）和乌克兰则只有受控于党卫军的帝国专员。曾经在1917—1918年得到德国全力支持的乌克兰民族运动遭到了镇压。由于愚蠢地固执己见，纳粹摒弃了所有争取人们站在他们一边的机会。由于十足的傲慢自大，他们把自己最大的长处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的暴行未曾受到限制。新的德国占领区的人们别无选择，只有反抗。为了被"恶棍"杀死的每一个德国士兵报仇，就得有100个农民被处死。村庄按惯例被夷为平地，村民被残杀。纳粹军官们对随意杀人感到很惬意。如在波兰，对居民进行了筛选和种族鉴别，并据此发给配给证和工作许可证。那里的犹太人没有被全部杀死，而是被关进了犹太人隔离区。斯拉夫民族，其中的上层人士被列入要消灭的人选，其余的则只配当苦力。数百万男子和妇女被运到德国从事强迫性劳动。随着所有劣等种族的增加，纳粹的战俘营和集中营大大地扩展了。由于苏联战俘未被授予战俘待遇的权利，大约有3百万—4百万男子在不设防的围墙内被杀害了。德国人把东方当做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三年间，乌克兰的人口就降至900万。

然而此时，纳粹自我标榜的"保卫文明的圣战"还能获得很多支持。大量的仆从军队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派往东部前线。罗马尼亚负责敖德萨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nistria）地区。佛朗哥将军从西班牙派出了精锐的"蓝色军团"。波罗的海国家现存的军队和警

[1016]察部队被调往德国服役。新兵和志愿者几乎从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涌入德国。其中有些人仅仅是名义上的志愿者，特别是苏联战俘，他们被迫在服役与饥饿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其他许多人，尤其是来自西欧的那些人，则是自愿为德国效力。前苏联军官弗拉索夫（Vlasov）将军领导着上百万俄罗斯解放军。哥萨克旅吸收了许多战前的流亡者。甚至连武装党卫军都招募了大量的外国人。[**拉脱维亚**]

[1017]

拉脱维亚（LETTLAND）

拉脱维亚人对德国没有特殊的爱。德国人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波罗的国家广泛地建立起要塞，并成为沙皇俄国的忠实臣仆。德军的到来预示着幸运的解救，这不过是苏联 1940—1941 年统治拉脱维亚时实施的屠杀和流放的结果。

因而，德国人几乎没有遭遇到抵抗，他们于 1941 年 7 月 1 日一进入里加，便着手恢复拉脱维亚的军队。起初，前拉脱维亚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以及前苏军的叛逃者，在德国人领导下重新组建军队。“后备安全警察”，后来重新命名为“辅助安全警察”(Schuma)，被用于前线服役，或从事守卫、劳动、消防任务以及开展“特别行动”(最后的委婉说法变成了在党卫军指挥下充当犹太人的屠夫)。1942 年，征兵令下达的次数大增，无论是参加低等级的志愿辅助队还是拉脱维亚正规军团，入伍手续都简化了。从 1943 年起，由于志愿者逐渐增加，该军团把主要的新兵编入了武装党卫军的三个拉脱维亚师（见原书附录Ⅲ，第 1326—1327 页)。官兵们宣誓：“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和“服从德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他们的指挥用语是拉脱维亚语，佩戴着带有拉脱维亚名字的盾牌形徽章。他们曾在列宁格勒和德国人撤向柏林的各条道路上作战。[1]

1944 年，在一次有党卫军帝国领袖出席的会议上，立陶宛师的参谋长记录下希姆莱（Himmler）关于纳粹秩序的新设想：

现在要求每一个党卫军军官，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必须面对德意志民族大家庭的整个生存空间。〔随后他挑选那些他认为属于日耳曼大家庭的民族：德意志、荷兰、佛拉芒（Flemish)、盎格鲁—撒克逊、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波罗的海各国人民。〕把所有那些民族合并成一个大家庭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一进程中德意志民族作为最强大的民族，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是),

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原则上，……（然后）这一大家庭……不能不承担起包容所有罗马（Roman）民族以及斯拉夫（Slavic）民族的使命，因为他们也是白种人。只有通过白种人的统一，西方文化才能从黄种人的威胁下被拯救出来。

当前，武装党卫军在这方面是领导力量，因为其组织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武装党卫军不仅包括德国人、罗马人和斯拉夫人，甚至包括伊斯兰人的部队……紧密团结地进行战斗。而且，重要的是，每一个武装党卫军军官在相同的军事学院中接受培训……[2]

纳粹的国际主义只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居于显要地位，当时德国已濒临失败的边缘。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对它没有特别突出的阐述。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欧洲人为之奋战。人们忘记了纳粹曾出版一份名叫《民族欧洲》（Nation Europa）的杂志。

大屠杀。随着对东方生存空间的占领，纳粹发动了规模最大的和最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动。从此，被纳粹特称之为“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的种族灭绝行动就一直被称为“大屠杀”（Holocaust），或者用希伯来语叫做“大屠杀”（Shoah）。大屠杀试图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杀死欧洲所有的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不清楚大屠杀是怎么开始的。始终没有发现来自元首的直接命令，尽管毫无疑问地他对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根本责任。可以认为（有任何理由假定），希特勒采取了预防措施来掩盖他卷入了大屠杀，以及避免早些时候曾经因安乐死运动的泄露而招致的坏名声。[77]欧洲的犹太人也许是导火索，然而并非纳粹种族灭绝行动的惟一目标。

在小心谨慎了几年之后，希特勒又恢复了他在1938—1939年早期经历中的那种偏激的语言。在1939年1月30日的广播中，他预言道，如果犹太人促成另一场战争，那么结果将是所有犹太人的毁灭。然而，在1941年7月之前，在波兰的德国占领区，由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隔离区中尽管死亡率很高，但还没有发展成大屠杀。确实，一直含含糊糊地谈论着，要把犹太人送往遥远的终点，以及中立的美国对此事的敏感。然而，1941年7月31日，戈林命令帝国保安总局局长准备“最后的解决”。[78]那一天立刻提前了，他必须得到元首的明确指示。一切疑虑都必须被打消。方针就是毁灭。“重新安置”成为官方对大屠杀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当德国军队推进到俄国前沙皇划定给犹太人居住的核心地区时，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又出现了，他们把上千的犹太人驱赶到洼地和山沟里全体射杀。在基辅（Kiev）附近的巴

比亚尔峡谷（Babi Yar），一次这样的行动大约就杀死了70000人。

1942年1月，包括帝国保安总局四局B—4处（犹太事务处）处长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内的党卫军首脑们在柏林附近的万湖（Wannsee）别墅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协调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加快奇克隆（Zyklon）—B煤气炉的试验；在海乌姆诺（Chelmno）、贝乌泽茨（Belzec）、索必博（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创建若干专用的死亡营；扩大波兰占领区的纳粹集中营，尤其是要扩大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二号营——比克瑙（Birkenau）；向最好的德国公司咨询有关焚化炉的设计和“剩余物（骨灰）的处理方法”；制订列车运行时刻表和国际铁路运输车[1018]辆调度计划；征召后备部队。如果不知道这些行动的目的，而误以为是德国屠夫们的年会（AGM），或许能得到宽恕：选定了7百万—8百万个“部件”（units）进行处理。问题是要尽可能秘密、有效地集合、运送和处理他们。[**漏集**] 从那时起，“最后的解决”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年——一个又一个城镇，一个又一个犹太人隔离区，一个又一个地区，一个又一个国家。在1942—1943年，大屠杀主要是解决最独特的民族——波兰德国占领区的300万犹太人。1943—1945年，大屠杀行动扩大到了巴尔干半岛各国、低地国家、法国和匈牙利。大屠杀行动最后大约完成了目标的65%。当大屠杀使用的设备被盟国军队摧毁时，大屠杀才停止。

通过大量的自传和文献资料，人们充分了解到人类面临死亡那一刻时的恐惧程度。一位年轻美丽的犹太少女记录下了她躲藏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普林森格拉特（Prinsengracht）大街263号时的日日夜夜。[79]华沙的犹太人居民委员会或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记录下了他既想为他的人民服务，又要为纳粹服务时的那种令人痛苦的两难窘境。[80]一位前死亡营司令官（鲁道夫·弗兰兹·霍斯，党卫军旗队长，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的自述暴露了一个有良知、有感情的人完全不受道德思考的（困扰）影响：

> 在奥斯威辛，我确实没有理由抱怨人家讨厌我……我只有一个念头，送出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东西，为了能完成规定的数量。
>
> 当母亲们与她们欢笑着或者哭叫着的孩子们一起走向煤气室时，我必须冷静地观看这一切……我不得不在恶臭熏天的地方坚持到最后……我还必须通过观察孔……观察毒气室里的死亡全过程。
>
> 当然，我的家人在奥斯威辛得到很好的照顾和充分的供给。当看到我的孩子们欢快地游玩，看到我妻子高兴的样子，我总会想，我们的幸福会持续多久呢?”[81]

有些人用小说文学的想象力对待这些比较低下的层面。[82]但是，最生动的记述来自那些只不过设法保留了自己人性的人。[**解答**]

[1019]

解答（RESPONSA）

1943年10月3日，一个男孩在纳粹于立陶宛考纳斯（Kaunas，即科夫诺，Kowno）建立的犹太人区实施的大规模杀害犹太儿童的“儿童行动”（Kinderaktion）中获救。救了男孩的男子问自己的拉比（犹太教的神职人员）可否把这个男孩当做自己的儿子领养。拉比说了些宽慰的话，但答案却是“不”。这个男孩必须永远受到尊敬其亲生父母的教育。[1]

在浩如烟海的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中，在他们的精神升华方面没有什么能够同纳粹在欧洲占领区的犹太区中拉比的解答相比。回答本教区教友们有关宗教困惑的质疑是拉比的核心职责之一；而且保留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自己如何做出回答的登记是他们的惯例。

若干这类登记依然存在，但是没有一份记录比考纳斯的幸存者、犹太拉比埃弗莱姆·奥什瑞（Ephraim Oshry）的更感人。战后，他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甚至他的收集中最简短的片断也反映了一个处在生命边缘的社团依然致力于引导一种有原则的生活方式。

·犹太人能够通过得到一张伪造的基督教徒洗礼证明而自救吗？

那是绝对禁止的。

·犹太区中的孕妇允许要求流产吗？

是的，如果不做流产，母亲婴儿都会被纳粹杀死。

·在犹太区中，如果一位妇女的丈夫失踪，她有权利从惯常的控制再婚的规定中获得解放吗？

无权。

·犹太区中的犹太人可以自杀吗？

自杀以后被安葬总比被灭绝后焚烧好得多。

·一个背叛的犹太人可以佩戴着十字架埋葬在圣地吗？

可以，但要与其他坟墓保持一段距离。

·一个非婚生婴儿可以接受长子继承权的仪式吗？

可以。

·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服装应如何处理？

根据宗教法，带血污的衣服必须埋掉；但干净的衣服可以留给牺牲者的子女。[2]

这就是说，出于大屠杀的威胁，拉比的解答显得过分宽厚仁慈。这是一个留待专家判断的问题。但是，任何人都承认渴望能把犹太法的严厉与仁慈为怀的责任感联系起来。例如，1941年8月，德军士兵在位于斯洛勃德卡（Slobodka）的犹太教堂里堆满了死猪死狗，先命令一小队犹太人在一堆动物尸体堆成的小丘上撕毁成卷的托拉（Torah）经卷，随后放火焚毁这座教堂。当奥什瑞（Oshry）拉比被问及怎样才能赎罪时，参与的人都处于饥饿之中。他的回答明确又温和："他们应该尽快地赎罪，尽其所能。"[3]

大量的评论指责欧洲被处死刑的犹太人所谓的"消极"态度。[1020] 在一定范围内，被迫充当合作者的犹太人被永远地打上"战犯"的烙印。[4] 哈西德派（Hasidic）的观点确实认为，上帝的脸在审判期间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虔诚的犹太人应该接受命运的安排。[5] 非哈西德派的拉比没有遵守这样一种严格的教规，尽管他们存在一种尊重本地法律的悠久传统。

雅典教区的首席拉比毁掉了他的会员名单，使许多犹太人幸免于难。萨洛尼卡（Salonika）教区的首席拉比不曾这样做，致使其会员绝大部分被纳粹杀害。

真正的要点是，同敌人合作还是抵抗的决定应当在积极的道德原则基础上定夺。甚至没有采取行动的地方，证据也不能置于道德消极性或中立的那一方。不可否认个体会犯下所有方式的背叛罪。但是，反面的例证是数不胜数。华沙犹太区中一个犹太医生小队决定充分利用他们的悲惨境遇对他们自己的饥饿症兆和进展情况进行科学研究。他们把这些成果藏在一个金属的牛奶桶中并埋起来，直到战后在华沙出版。[6]

在纳粹建立的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死亡营，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中从事验尸工作的一个犹太人在斜坡上认出了自己教区的拉比。拉比惟一的要求是"路兹"（Luz）即脊椎骨最上部的那块骨头能得到拯救（在犹太人的信仰中，"路兹"是使躯体在来世复生的核心）。这样，这位犹太人从拉比的尸体上取下这块骨头，并发誓于战后将它埋在耶路撒冷的圣地。[7]

有关当时人们对待大屠杀的态度的讨论一直集中于犹太人所谓的顺从和非犹太人所谓的漠不关心。这两种指责都被夸大了。记住雅努什·科尔扎克（Janusz Korczak），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激励人心的榜样，他平静地陪着一群孤儿从犹太人隔离区踏上他们最后的旅程。一位参加过战斗的幸存者说："平静地走向死亡也是勇敢的。"[83]另一个人回忆到，当邻居们被送往煤气室时，他自己的犹太家庭没有任何行动。[84]有时在一些彼此独立的隔离区里，犹太人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在几个犹太人隔离区发生过武装暴动。在华沙，1943 年 4 月 19 日爆发了英勇的犹太区起义，反抗纳粹进行的最后清洗。起义持续了三周，除了 80 个人幸存外，所有的起义者都牺牲了。起义领导人莫德采·阿涅列维奇（Mordecai Anielewicz）与战斗到最后的战友们在米拉街的堡垒里自杀了。[85]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一次坚决的越狱行动中，有 300 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出了灭绝营。[卡廷]

非犹太人对大屠杀的态度并不一致。生活在恐怖阴影下的大多数 [1020] 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良知；只有少数人参加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许多人仍然表示出同情。一位诗人在看到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高墙旁的儿童游乐场时，感到非常痛苦，这使他想起了孤独地死去的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我想起了市中心广场
在华沙天堂的旋转木马旁
春天晴朗的夜晚
游乐场的乐曲。
欢快的曲调淹没了
来自犹太人居住区墙内的炮声，
舞伴们轻扬飞舞
在高高的晴空。
……
在这里死去的那些人，孤独地
被世界遗忘了，
我们的语言为他们而成为
古老星球的语言，
直到，一切都成为传说。 [1021]
许多年过去了，
在一个新的市中心广场上，
诗人的诗句将迅速燃起人们的怒火。[86]

一位有思想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写出了甚至根本没有参与过大屠杀的那些人在道德上的迷惘。[87]

欧洲对大屠杀的反应触及了（人类）低下的堕落和高尚的英雄主义。在当时看来，在波兰德占区救助被隔离起来的犹太人的机会很小。那些更幸运的国家的批评者们永远不会认识到，一个独裁政体是怎样迫使在其控制下的每一个人改变他们与纳粹合作的程度的。不应该用自由社会的标准来判断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所谓的 szmalcownicy 或“小流氓/马屁精”，他们到盖世太保那儿出卖了逃亡的犹太人以及抵抗运动成员。而另外一些人则冒着个人的以及冒着他们家人的生命危险隐藏和保护逃亡的犹太人。1943 年，波兰抵抗运动建立了 Zegota 组织救助犹太人。[88]大约有 150000 或 5%的犹太人，由于藏在谷仓里、地窖里、修道院里，用假身份证明，或者是藏在森林中而幸存了下来。[89] [第 101 刑警营]

在另外一些情况不那么严酷的地方，欧洲人显示出了从高尚的献身精神到对大屠杀的无动于衷的种种表现。在哥本哈根，克里斯蒂安国王（King Christian）充满同情心地佩戴着“大卫之星”臂章骑马走上大街，丹麦 300 多名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因而得以逃生。在罗马尼亚，军队和警察为自身的利益杀死了几十万犹太人，而政府仍然不愿把罗马尼亚犹太人交给纳粹。在法国，维希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可恶的集中营，如在勒维内（Le Vernet），当地的保安队率先集中犹太人。他们把犹太人分为两类，一种是盟国的犹太逃亡者，一种是“本地”的法国犹太人，只有 8%的犹太人失去了生命。法国新教教会对迫害犹太人表示抗议，法国抵抗运动采取行动阻止流放犹太人的火车。在荷兰，尽管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但是大多数犹太人还是被迫害致死。在匈牙利，1944 年以前始终未被纳粹占领，一位机敏的瑞士外交官，拉尔夫·瓦伦贝格（Ralph Wallenberg）组织了许多犹太人逃亡。作为对他的报答，注定他在苏联滞留期间失踪。匈牙利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负责达成了利用捐款赎买匈牙利犹太人的交易。甚至在德国人占领的海峡群岛（诺曼底群岛），犹太人也被移交出去了。通常犹太人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占领区，在法西斯的西班牙或葡萄牙最安全。[90] [塔泽]

缺乏来自梵蒂冈的明确的抗议成为后来大量争议的主题。诋毁庇护十二世（Pius Ⅻ）的人认为，他对犹太人的不幸漠不关心。维护他的人则声称，庇护十二世由于害怕德国的天主教会受到报复，以及渴望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邪恶之间保持“公正”而倍感苦恼。[91]对几百万被纳粹杀害的天主教徒们，他确实是无所作为。

第101刑警营（BATT—101）

1942年7月13日拂晓前，德国预备役警察第101营（以下简称101刑警营）的全体人员在居住地波兰村庄尤热福沃（Jozefow）被唤醒，并被即刻派遣到附近的奥特沃克镇（Otwock）。没有人告知他们那里将发生什么事情。刚到达那里，营里的党卫军军官就向大家下达命令：抓走镇上全体强壮的犹太成年男子，枪毙所有的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那一天，他们处决了大约1500人，而在该营首次行动中，他们的牺牲者就超过83000人。

1962—1972年，210名第101刑警营前成员受到西德检察官起诉，检察官为他们准备了详尽的起诉书。所有的被告都是无党派的中年人，大多数属于工人阶级，从全国纳粹化最轻的城市之一汉堡（Hamburg）被征募从警。他们是普通的德国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为自己战时从事的职责感到悔恨；许多人宣称自己对直接的屠杀是清白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参与了屠杀。“对他们而言开枪杀人是太容易了”。

在每一个现代社会，官僚化和特殊化都会淡化追究执行官方政策的个人责任的意识。同辈群体对行为施加巨大的压力，并树立道德标准。如果第101刑警营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变成杀手，那么什么团体的成员不能变成杀人者呢？[1]

出于明显的原因，被置于同第101刑警营类似的道德地位的犹太人几乎不为人知。极少有人幸存。还有，对党卫军而言，在犹太区中使用犹太人警察以及在死亡营中招募犹太人特别工作队以执行最恶劣的任务是一种很普通的事。卡莱尔·佩雷赫德尼克（Carel Perechodnik）就是这些征募者之一。他受过教育，参加了奥特沃克（Otwock）犹太区中的犹太警察。他只求免于一死，并养活一家人。他处处遵循纳粹分子的命令，生活得相当滋润。在非犹太人朋友的帮助下，他逃到“雅利安人地区”，在那里他生活了很长时间，足以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的名字是《我是一名刽子手吗？》（Am I a Murderer?）[2]

对于任何一个不熟悉东欧的人，遍布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治警察在1944—1945年的活动依然使人难以置信。对这个国家的常识坚持认为：恶名昭彰的共产党安全局（UB）容纳了多得不成比例

的犹太人（或者说前犹太人），这些人罪恶滔天。但是，严酷的事实从未公布于众，而那些故事依然未经证实。不过，最近揭露出来的真相已粉碎了种种禁忌。这些材料更为可信，因为它们是犹太问题调查者根据犹太人参与者提供的证据和从犹太人的精神赎罪记录中整理出来的。这一研究涉及上西里西亚地区，特别其中的格利维采（Gliwice）镇（又名格莱维茨）。它的结论是，在1945年，安全局每个单独的指挥官和四分之三的本地情报员都具有犹[1023]太血统；那些前纳粹集中营和监狱重新充满了完全无辜的居民，尤其是德国人；折磨、饥饿、魔鬼般的拷打以及屠杀成为家常便饭。共产党人对德国居民判处死刑的制度估计使6万—8万人致死。这样看来，很难为战时波兰的刽子手、受害者和旁观者普遍支持各自特殊的种族群体的行为辩护。[3]

[1024]

塔泽（TAIZÉ）

法国沦亡后不久，1940年8月的一天，一位25岁的神学大学生从瑞士漫游到克吕尼（Cluny）的勃艮第（little Burgundian Town）小镇。他当时正在撰写一篇有关前本笃会隐修院制度的论文。他对修道院的没落还不如对自己创建一个宗教社团的未知的可能性更感兴趣。他是纳沙特尔地区（Neuchatel）的一位新教牧师之子，直至最近他还是一个思想困惑的不可知论者。他看到一块招牌，上书“塔泽有房屋出售”，于是骑自行车走了10公里来到山谷，并买下了这座半空的村庄中的房屋。他就是罗歇—路易·舒茨—马尔绍什（Roger—Louis Schutz—Marsauche）。

二战期间的塔泽，位置紧靠近法国的德占区与维希政府辖区的分界线。这位自封的修道士断断续续地独自住在那里。两年来，罗歇致力于庇护犹太难民直至盖世太保带走了他的客人。1944年9月解放后，他再次回到塔泽，为的是掩护德国战俘。村民反应激烈，杀死了这批德国战俘中一个患病的天主教神甫。二战末期，罗歇的姐妹热娜维埃沃（Genevieve）加入了他的行动，他们一起为20个农村孤儿提供了一个家。至少七个“修士”来此。作为非天主教徒，他们不得不申请特别准许去使用一个废弃的教区教堂。1948年当申请得到同意之时，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隆加利（Roncall）亲自签了名。[1]

塔泽社区公然蔑视等级。它没有正规的统治，也不属于哪个教派。它受到用最真诚的形式——快乐、简洁和宽容祈福的鼓舞，也受到青年的服务与和解的使命的激励，还受到一种强烈的信念的鼓励，即罗歇修士所著的书《短暂的动力》(The Dynamic of Provisional)（1965 年）主题思想。它迅即得到惟一的“塔泽之声”(Taize Sound)——朝气蓬勃的青年以最简洁的歌词和富有节奏的四声部重唱唱出的歌声——的认可。

一旦和解派的教堂于 1962 年在附近的小山丘上建起来，它立刻成为一个世界运动的论坛，成为常设的“青年会议”进行双向交流的论坛，并成为“人世间信任的朝圣地”。80 名身着白袍的修士在遍及全球各个大陆的精神创建者的位置上无私地奉献。传教团体前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纽约。无论何地人们存在分歧，塔泽精神都致力于使他们和解。起初，世界宗教（大）会议和梵蒂冈回避他们，但是它争取到了二者的支持。在欧洲，它获得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最高主教的支持，然后又取得天主教克拉科夫（Cracow）大主教的支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打破了“铁幕”，当时它的欧洲聚会从圣彼得和圣保罗发展到东柏林和华沙。

当代的欧洲基督教产生了一些具有鼓舞力量的人物，他们超越了现存的所有的屏障。[1025] 其中一位是艾格尼丝·贡哈·波雅修(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 年生于斯科普里/Skopje)，她是一位阿尔巴尼亚修女，比加尔各答的德雷撒嬷嬷（Teresa of Calcutta）而更为知名。[2] 另一位是荷兰人维伦弗里德·范·斯特拉登（Werenfried van Straaten）神父，他创立了“援助教会之所需”组织。[3]第三位这样的人无疑是有一颗普通的心，但却有一个非凡的名字的罗歇（Roger）修士。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说道：“经过一次塔泽，就如同穿越一次春天的泉水。”

永远也无法知道犹太人的确切死亡人数。纽伦堡审判估计的数字为 585 万。这个估计未必不很准确。大致地说，总数是由来自战前波兰的 300 万犹太人，来自苏联的 200 万，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 100 万[1023]犹太人共同构成的。由于 1939 年波兰东部被并入苏联，犹太人的人数在波兰和苏联之间也许有某些重复，但是没有负责的估计数字导致总数低于 500 万人。[92]从数量上说，这个数字也许可以与下列的估计数字相比较：估计苏联军队损失了 870 万人，德国军队损失了 350 万人，估计在乌克兰人、波兰的非犹太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之中的平民损失都分别达到了几百万人。[93] **[布恰奇]**

战后许多年，有两个估计数广泛流传：总共“600万”大屠杀的牺牲者，“400万人”死在奥斯威辛。第一个数字虽然有点偏高，但似乎还站得住脚。第二个数字则是不可能的。奥斯威辛接纳过两个人，这两个人后来被称为基督的圣徒。圣伊迪丝·施泰因（Blessed Edith Stein）是一位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在荷兰被纳粹抓获。马克西米利安·柯尔比（Maximilian Kolbe）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为挽救一位已婚的囚徒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50年后，由于试图找到适合多民族和多种宗教纪念大屠杀牺牲者的方式，又勾起了人们痛苦的追忆。[94]

当时，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事实上不可能使外界了解正在发生的暴行。早在1940年9月，一位勇敢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军官维托尔德·皮列茨基（Witold Pilecki，1901—1948年）就成功地潜入了奥斯威辛。从那里逃出前，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在集中营里组织了秘密的基层抵抗组织。[95]然而搜集到的情报却被外界判断为不可信。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出版了一份关于波兰犹太人灾难的报告，当时，政府委员会中的一位犹太人代表因为西方对此的微弱反应而绝望地自杀了。[96]当一位波兰信使访问华盛顿，提交一份死亡营目击者的报告时，首席法官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用冷冰冰的话反驳他：“我们没有说你撒谎……但是……美国的犹太人不会被鼓动比其他任何人采取更多的行动。”[97]当最终建议轰炸通往奥斯威辛的铁路枢纽时，同盟国的首脑们寻找理由拒绝了。[98]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杀死了上百万人而没有引起世界上明显的反应。希特勒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能干同样的事，直到外面的人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证据。[**奥斯威辛**]

[1026]

奥斯威辛（AUSCHWITZ）

1944年5月31日，一架英军第60摄影中队的蚊式侦察机从意大利南部布林迪西（Brindisi）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它的使命是飞往大约900英里以外德国占领的波兰，并拍摄奥斯威辛镇的合成燃料工厂平面图。碰巧的是，由于南非机务人员听凭照相机随意拍照，胶卷的最后一段在27000英尺高处拍下了两个相邻的党卫军奥斯威辛集中营主营和第二分部比克瑙（Birkenau）的第一张鸟瞰图。[1]

许多这类照片后来也被盟国通过空中侦察得到。其中一张拍摄于1944年8月25日，从低空拍摄，从上面足以看到一行新到

达的受害者，在党卫军卫兵押解下，走向第二号焚化炉敞开的大门。停在支线的列车，毒气室屋顶的进气孔，焚化炉的烟囱，连同成群的囚犯都清晰可辨。[2] 随后的一批照片摄于当年 12 月，它表明纳粹已经开始拆除焚化炉。

空中摄影已成为历史研究中若干领域的有价值的工具。它广泛地为考古学家、城市学家和景观分析学家所应用。在这件事上，它提供了大屠杀行动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而这正是战后的修正主义者力图否认的。

纳粹死亡营的部分真相在 1942 年以来为西方获悉。当时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公布了其地下情报员提供的信息。尽管如此，盟国没有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3] 奥斯威辛 II 被确认为各国遭到放逐的犹太人去向的"未知的终点站"，还是通过 1944 年 7 月奥斯威辛集中营五名逃亡者的讲述才得以证实。[4]

从此以后，犹太复国主义小组反复向盟国提出要求：轰炸奥斯威辛的营房设备与铁路车厢，以造成刽子手们出现混乱。但是这些要求未受重视。空军军官们坚持优先轰炸军事和工业目标。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做过如下记录："不可估量的大量时间……被浪费……在这些苦苦哀求的犹太人身上"。[5]

这些空中情报照片的命运较之其内容更富有启发性。胶片被飞机从意大利带回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英国皇家空军梅德门汉（Medmenham）基地进行处理和翻译。在这里，由于该行动的长官们只对合成燃料工厂平面图感兴趣，胶卷的最后部分没有被查看。1944 年 5 月 31 日和 8 月 25 日的历史性照片 30 年后才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档案库中发现，依旧没有洗印。[6]

1945 年 1 月 27 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而西方国家政府关于该集中营的详尽情报的急迫要求一直没有答复，直到 4 月 27 日，莫斯科才发出一个含糊而不确切的电报。它提到：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调查"表明，有"400 多万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在此被杀害。"[7] 如果仅仅是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牺牲者，这个数字与盟国检察官在纽伦堡法庭提出的统计数字是不相吻合的。[8] 但是它被允许逐渐变成约定俗成的看法。直到共产党政权在 1990 年垮台，奥斯威辛国家博物馆仍未感到可以自由地公布一个更加可信的估计：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牺牲者大约为 120 万—150 万人，[9] 其中大概有 80 万—110 万人是犹太人。 [1027]

在极端轻信与执著的怀疑之间，为了揭示一个近似的真相，人

们足足用了50年去从事当代历史上最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课题之一。西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不可能再有诗意了。"仿佛历史学家也失去了自己的才华。

[1025] 大屠杀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者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坚信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拒绝"普世的性本恶"[99]正如他们拒绝一个古老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带着你们独特的犹太人的忧伤来到这个世界呢?"[100]虽然如此，对大屠杀所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描述还是起到了作用。人们认为是埃里·维塞尔（Elie wiesel）把"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变成了现代的习语。[101]露西·达维多维奇（Lucy Dawidowicz）坚决主张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是有预谋的。[102]保罗·希伯格（Paul Hiberg）把大屠杀看作是基督徒两千禧年排犹主义的高潮。[103]耶胡达·鲍威尔（Yehudah Bauer）毫无掩饰地描绘出了一幅纳粹"屠夫"、犹太受害者和非犹太裔旁观者的图景。[104]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把那些个人的痛苦经历汇集成册。[105]

对此持异议的呼声显得不那么一致。一些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大屠杀的见证人，如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华沙犹太区起义领袖中目前惟一健在者，由于反对居支配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而受到辱骂。[106]一位学者坚持认为1941年发生的大屠杀是因为意外事件而引起的。[107]另外一位学者试图指出，犹太人的悲剧总体上应该放在纳粹恐怖时期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评价。[108]一群聚集在《历史评论月刊》中的观点暧昧的国际法学家们试图坚持或者"煤气炉故事"是一个骗局，或者是统计数字被大大地夸大了。他们挑起的最激烈的争论关系到承认他们的正确性。[109]其他批评家们则抱怨"大屠杀工业"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了犹太人的痛苦。[110]电影导演克劳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拍摄的痛定思痛的影片《舒赫》（Shoah，1984年）没有受到广泛的欢迎，许多人误认为这是一部文献历史片。[111]苦难还在延续，最后的话还得说。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比波兰因大屠杀而受到更重的创伤。犹太人千年来在波兰的客居实际结束了。波兰人民和波兰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彻底摧垮。波兰未来几代的公民们不仅要承受大屠杀的屈辱的记忆，而且还要背负起屈辱的遗产——互相指责、传递错误的信息和道德混乱。只有那些波兰犹太人才能充分理解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在这个世界上，两个最可悲的民族永远分道扬镳了。"[112]［**布恰奇**］

德国人突然进攻苏联改变了世界外交格局。1939年8月中东欧

的三个权力体系曾经结为伙伴关系。现在他们成了死敌。这为残存的第三个权力中心——英国与苏联的联合开辟了道路，并且重建了一个[1027]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交体系。在接纳美国以改变这种平衡之前，英国现在可以联合苏联共同对付德国。大三角又复活了。对毕生反共的丘吉尔而言，这意味着“赞颂魔鬼本身”。对斯大林而言，则提供了惟一可能的援助来源。1941 年 7 月 12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英苏互助条约。德苏条约被正式废除。斯大林甚至被说服克制对波兰的傲慢无礼，并同英国的另一个盟友——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签约结盟。根据一项政治条约，1941 年 7 月，双方又签订了军事协定。苏联保证对在苏联的上百万无辜的波兰流放者和战俘实行大赦；在苏联腹地组建一支新的波兰军队，由刚刚从卢比扬卡（Lyubianka）监狱地牢中获释的安德斯（Anders）将军出任司令官。这就像著名的《奥德赛》（Odyssey）的开头。[113]

然而，关键性的阶段还是到来了。没有美国的参加，盟国的力量比残疾人俱乐部强不了多少。丘吉尔和罗斯福于 8 月 11 日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规定了八项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第三，他们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第八，他们相信，世界上一切国家，基于实际的和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114]

但是，美国国会还是不情愿参战。苏联政府已经撤退到了伏尔加[1028]河畔的古比雪夫（Kuybyshev）；苏联政府为同盟事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英国共同占领波斯。对伦敦和莫斯科而言，幸运的是，日本人证明他们比盟国更有说服力。当日本人的轰炸机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攻击了设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时，他们“唤醒了正在沉睡的巨人”。日本人的行动虽然同欧洲战场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却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人的态度。美国畏惧战争的情绪骤然蒸发；国会通过了庞大的战争预算；总统可以放手大干了。这一切并非日本人的计划，但它们却无意间开启了伟大同盟的大门。“大三角”——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赢得战争的三重奏开始上演了。

德国人当然感到上当了。只要罗斯福总统打算停止援助英国，他们就不寻求同美国争斗。总之，德国人一直打算在美国参战前结束战争。为此，柏林选择了虚张声势：1941 年 12 月 11 日，希特勒在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讲中对美国宣战。

就某些方面而言，伟大同盟的突然出现，其令人震惊的程度同两

年前的德苏伙伴关系完全一样。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制度的每一项原则同苏维埃制度都是背道而驰的。与苏联结盟并不表明应当忘却斯大林过去的罪行。对斯大林在整个战争期间每年继续杀害大约一百万他自己的人民这一事实，西方领导人只得听之任之。当斯大林处于弱势而希特勒处于强势时，就必须帮助斯大林了。就斯大林的标准而论，西方的民主制度同希特勒一样，完全是令人厌恶和反社会主义的。但是，当德军推进到莫斯科城门时，斯大林只得接受西方的援助。意识形态微妙地没有被考虑进去。尽管反纳粹联盟被自由、民主、正义等外交辞令所包装，但大三角关系仍然是由犬儒主义的共同利益制约着的。

伟大同盟暂时还不能对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构成任何挑战。当务之急是保障自身运输航线的通畅，抑制德国在海上的进一步扩展，破坏德国的军工生产，构建未来发起反攻的基地。为了这些目的，英美军队在大西洋战役中联合作战；他们策划了一个庞大的区域性轰炸计划；着手向苏联提供军用物资。一切都取决于苏联红军能够免于崩溃，英国人能够守住其海岛要塞，以及美国人能够聚集起他们庞大的资源，以便在太平洋和欧洲同时作战。[**牛津赈济委员会**]

大西洋战役为保障英国人通往美国的生命线和美国通往欧洲的出口提供了安全的海上通道。在来自海上的袭击者被清除之前，已有2119.4万吨盟国的船舶，77000名英国海员和70%的德国潜艇损失掉了。德国的潜艇基地是坚不可摧的：1942年3月，英军对圣纳赛尔（St Nazaire）的袭击流产。这一事件突出地反映了盟国在海上的优势[1029]和德国在陆上的霸权这种差异，包括护航体系、空中巡逻、声纳探测等的反潜措施，经过好几个月才完成了部署。盟军的船舶损失在1943年3月达到顶点，此后，德国潜艇就遇到了灾难。41艘德国潜艇，连同护航舰ONS—5的沉没，迫使邓尼茨（Donitz）海军上将下令永久地从大西洋撤回其潜艇部队。

自从盟军于1942年5月31日首次派出1000架轰炸机袭击科隆（Cologne）以来，盟军对德国的轰炸性攻击愈演愈烈，它在实践上和道德上对纳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盟军实施的精确轰炸，例如，著名的对鲁尔地区水库大坝（Ruhr Basin）的袭击，或者根除纳粹设在挪[1030]威的泰雷马克（Telemark）重水工厂，都摧毁了目标。但是，试图通过大规模地轰炸摧毁德国的城镇来恐吓德国市民，则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941—1945年期间，无数批次的兰开斯特、哈里法克斯和空中堡垒式飞机把135万吨高爆炸药投向第三帝国。纳粹为了应对盟国的轰炸，不得不动用有限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德国的军火工业从来不曾中止运转；德国公民也像在闪电战之下的英国公民一样，在民族大业的旗帜下重新振作起来。1943年5月对汉堡（Humburg）进

行的一场大规模空袭引起了大火，导致 43000 名无辜者的死亡。另一场对德累斯顿（Dresden）的空袭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接近美国原子弹对日本的轰炸。[**阿尔特马尔克广场**]

[1029]

牛津赈济委员会（OXFAM）

牛津赈济委员会于 1942 年 10 月 5 日在圣女玛丽大学教堂（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内开始其生涯。其最初始的目标是减轻因希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其职能绝不只限于国际人道主义援救：国际红十字会自 1863 年始发挥职能，作为索尔费利诺（Solferino）战役恐怖行径目击的结果，亨利·杜南（Henri Dunant）创办了国际红十字会（IRC）。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比利时、塞尔维亚［FLORA］和加利西亚组织了许多援助战争受害者的行动。1918—1921 年期间，美国救济总署（ARA）提供了巨额援助，尤其是 1945 年以后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东欧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几乎所有交战国，包括德国都开办了不同形式的赈济代办处。牛津赈济委员会还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同国际红十字会一样，它独立于政府的政策。还有，它作为同盟国的一个基础组织，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中止发挥其职能。第三，作为英国的组织，它已准备好通过英帝国进入各个大陆。当国际援助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出去之后，它得到了妥善的安排。[1]

救济机构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进入战后时期，无时不在的东西方对立在北、南之间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差异。美国比以往更热衷于政治；苏联集团没有陷入有关人道主义的争论；联合国多少要受到其成员国政府的制约。这样，一些重要的作用就留给了后帝国时期的欧洲民间组织诸如牛津赈济委员会、拯救儿童组织（Save the Children）、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CAFOD）与无国界医生民间组织（Medecins Sans Frontieres）。北南委员会（North - South Commission）（1978—1983 年）以及相关的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建立了 GNP 增长 1% 的战略指标，富国应该用以援助“第三世界”。但是，在 1992—1993 年，前南斯拉夫的灾难突出地反映了欧洲自身的痛苦还远未结束。

西方援助苏联的行动自 1941 年起规模不断扩大，但鲜少得到受益人的承认。英国皇家海军接受了一项风险极大的任务，为从北极到

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运输航线导航。许多英国海员、船只以及整个运输船队中最杰出的部分——PQ17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经陆路从波斯湾直抵俄国。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向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估计相当于苏联军工生产能力的7%，此外还有28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

盟国的政治计划是在《大西洋宪章》和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条约》的基础上形成的。由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条约》规定，各个签约国在战争期间不得单独与轴心国签订和约。这些缔约国在四年后成为国联的后继者——联合国的核心。

伟大同盟一开始运作，斯大林就要求英—美两国承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几乎德国所有的战争机器都集中在东部；这便是斯大林要求其盟友分担其重负的全部原因。斯大林本人拥有的经过训练的后备军资源远比他吐露给别人的要多——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红军的实力总比德国人估计的更强大的一个原因。即便如此，红军面临德军的150个师与后来英—美盟军在北非面对的德军四个师之间也是严重的不成比例。然而，英—美一时还无法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虽然他们的空中力量在紧要关头帮助苏联从伏尔加河一带吸引了不少德军飞机；英美盟军最终在北非战场抓获的轴心国俘虏甚至比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抓获的还多。但是他们不能把主力投入到欧洲战场。欧洲大陆的每一个港口都掌握在敌人手中，还在法国北部沿海建造了庞大的大西洋堡垒。盟军在迪耶普（Dieppe）的一次流产的登陆表明，令人生畏的障碍在等待着任何一支登陆的盟国主力部队。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均不具有训练有素的人力后备资源。斯大林被告知，1943年将在西方展开一场重大的进攻；但是这场进攻直到1944年6月才实现。此前，仅有的一次宽慰是英美盟军在意大利南部沿海实施的西西里岛登陆战。

从盟军日益壮大的武装力量穿越地中海开始，艰苦的意大利战役就逐步展开了。与预期的相反，英国坚守着马耳他和通往苏伊士的海[1031]上通道；英美联军在北非的西端登陆，从而对轴心国的北非军团造成致命的威胁。“火炬行动”不久就将轴心国部队围困在突尼斯，1943年5月他们被迫全部撤走。此后，对盟军而言相当简单的一步是穿越西西里海峡，向法西斯意大利本土发动攻击。

挺进西西里岛的战役始于1943年7月10日，当时英美联军出其不意地在该岛的南岸和东岸登陆。德军的援兵来得太迟，未能阻止盟军占领全岛。从西西里岛出发，盟军于9月跨越卡拉布里亚（Calabria），并开始了向半岛北部山区推进这一艰巨任务；这一任务总计耗费了他们将近两年的时间。然而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的立足点还是产生了

重要结果。一旦盟军在布林迪西（Brindisi）建立了一个主要基地，盟军的空中力量便可以飞往包括波兰和南斯拉夫在内的中、东欧的广大地区。这样一来，就迫使德军司令部盲目动用几个师去占领法国南部。最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垮台。1943年7月25日，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说服意大利国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并接受了盟国提出的建议。"领袖"被德国空降兵从位于大萨索（Gran Sasso）山山顶的关押处奇迹般地救走，并成为德国人扶植的位于米兰的北意大利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轴心国堡垒内部的第一次重大分歧未能被掩盖住。

与此同时，在东线，规模浩大的德苏战争达到高潮。经历了1941年的劫难而生存下来的苏维埃政权，竭力挖掘俄罗斯蕴藏着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斯大林重新开放此前已被他下令全部关闭的东正教堂，并且像他上台之前列宁所做的那样，呼吁保卫神圣的俄罗斯。上百万的苏联人自愿地呼喊着"为了斯大林"的口号无畏地面对死亡，而这在1941年以前似乎是绝不可能的。苏联红军毫不吝惜地使用可供牺牲的非常惊人的人力资源，摧垮了德国军队的士气。潮水般涌来的步兵在没有炮兵象征性支援的情况下奉命攻打坚固的阵地。一群群军装破旧、装备落后的"伊万们"（Ivans）跨过遍布尸体的田野，前进，前进，直到德军的机枪打得发热，炮手失去斗志。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苏联方面能够承受住部队减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直到取得胜利。旷野、天气和战时最好的坦克——T-34型坦克减少了苏联红军的牺牲。朱可夫元帅统领的一支战绩辉煌的大军最大限度地追求空间和数量上的优势。

1942年德军不断地向前推进。德军接连不断地取得的一系列局部性战绩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即难以捉摸的苏军对手并没有落入圈套或陷入重围，而德军漫长的供应补给线正变得越来越长。到了初秋，当天气日益恶化时，德军既未能抵达伏尔加河，也未能到达里海之滨；而且一个危险的突出部正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形成。一次策略性的撤退或许可以改变局势，但元首断然拒绝撤退。希特勒必须为他下达的致命的命令独自承担责任，他命令冯·鲍卢斯（von Paulus）将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德军的势头最终使他们到达了伏尔加河右岸[1032]的斯大林格勒郊区。然而他们正在钻入一个无形的绞索。几天之后，朱可夫的部队逐渐迂回到德军的侧翼，直到一次突然的攻击，冯·鲍卢斯最终被合围了。在冰雪中经过三个月绝望的白刃战后，鲍卢斯于1943年2月2日在丢弃的废墟前投降了。斯大林格勒使100多万人丧失了生命。它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不可战胜的纳粹大军看来也难免犯错误。

斯大林格勒战事的消息闪电般地传遍了世界，大大增强了全欧洲抵抗运动的斗志和信心。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只满足于开展小规模的破坏活动，或是开辟帮助盟军飞行员和其他囚犯逃跑的地下交通线。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他们开始策划整个国家的自由解放。

在西欧，抵抗运动相对而言情况不是那么复杂。受英国 BBC 广播的激励和英国特别行动执行组织（SOE）的煽动，由勇敢的男女组成的爱国者小组策划了对纳粹当局的破坏活动，并最终帮助了盟军的先遣队。在丹麦，纳粹曾希冀在那里创立一个模范保护国，而抵抗运动迫使德国人在 1943 年 8 月颁布了《军事管制法》。在挪威也一样，纳粹放弃了通过维德昆·吉斯林的前法西斯政府进行统治的尝试。纳粹仅有的一次从挪威氢工厂将重水装船运走的行动未能得逞，该船行至廷修峡湾（Tinnsjo fiord）时被挪威爱国者炸沉。在荷兰，纳粹受到的困扰较少，因为他们破获了荷兰抵抗运动准备实施的一个代号为“英国游戏”的辉煌计划。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抵抗运动的影响由于共产党人的加入而日益增加。1942 年以后，在德国占领的维希法国地区，抵抗运动得到恢复，大批爱国者参加了游击队。与此同时，意大利爱国者集中到墨索里尼统治的北部山区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最终抓获和处决了墨索里尼。

然而，没有一个地方民众的抵抗比小小的卢森堡更坚决。在 1941 年 10 月的全民投票中，只有 3% 的卢森堡人赞成与第三帝国合并。随后卢森堡公众组织了最有效的反对纳粹统治的总罢工；与此同时，他们还毫不妥协地坚持不断的斗争和宣传。

在东欧，抵抗运动更为错综复杂。德国人对东欧的政策极为苛刻。尽管带有五花八门的政治色彩，各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分——民主派的波兰国内军（AK），反民主的乌克兰解放军（UPA），以及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全都陷入了痛苦的政治圈套之中，对民族自由的追求要求抵抗运动既要反抗希特勒，又要反抗斯大林。或者同挺进到本国的苏联红军合作，或者同拒不承认“资产阶级独立”原则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合作，其最好的结果是可怜地投降，通常更多地则是被囚禁及被杀害。[布恰奇]

以波兰为例，它的抵抗运动在欧洲是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它面对着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波兰抵抗运动开始于 1939 年晚期，当时它面对着纳粹和苏联两方面的占领军。波兰抵抗运动的主要成分是 [1033] 国内军（AK），这是一支构成复杂的松散的组织。国内军的权威性得到广大“农民军”（BCh）的承认，但未能得到准法西斯主义的（但也强烈地反对德国人）国家军（NSZ）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近卫军”（GI）

[1034]

布恰奇（BUCZACZ）

布恰奇的天主教执事。1939年，布恰奇县居住着45314个波兰人。在它下属的17个教区中，巴雷奇（Barycz）有4875人，布恰奇有10257人，科罗别茨（Koropiec）2353人，科瓦卢夫卡（Kowalowka）3009人，莫纳斯泰雷斯卡（Monasterzyska）7175人……在巴雷奇，一对波兰夫妇在1939年被乌克兰人杀害了……别尔纳茨基斯（Biernackis）家族中的一个人被打断了一条腿……但是，主要的袭击发生于1944年7月5—6日的夜间，当时有126名波兰人被杀害。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枪杀或被斧头砍死。镇上的"玛祖雷"（Mazury）收容院被焚毁。袭击者们端着机关枪，高喊着"杀啊"、"烧啊"。幸存者们逃到了布恰奇，他们蜷缩在前犹太居民没有门窗的房子里，在恐怖的环境下熬过冬天……

诺沃斯塔夫策（Nowostawce）天主教教区虽然居民稀少，但是在其辖区内却包括三个东正教教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比例为2:3。两个民族在1939年还能和平共处。但在德国人占领波兰后，环境恶化了。当1944年德—苏战线推进过来之后，这里只剩下了一片废墟……

科罗希奇亚廷（Korosciatyn）的天主教主教报告，1944年2月28日他居住的村庄遭到袭击，在主教住宅的地窖内，78人遭到枪杀、闷死或被斧头砍死……在1943年发生的上一次袭击中，大约有90人死亡。以后，伤寒又夺去了50人的生命。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村子里有13次所谓的"野婚"，其中只有一人活了下来。

在科罗别茨，实际上没有波兰人被杀害。但是，据报告称，东正教的讲坛上回荡着号召人们关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通婚的呼吁："母亲，你正在哺乳一个敌人，掐死他吧！"[1]

事件发生40年之后，波兰的罗马天主教会仍然试图纪实性地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加利西亚（Galicia）和沃尔西尼亚（Volhynia）这些前东方省份的"种族清洗"。估计受害者的规模达到6万至50万人。[2]

布恰奇是许多具有相同遭遇的地区之一。它位于包括整个红色罗西尼亚（东加利西亚）及其以远的利沃夫大主教区。战前它的居民包括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战争开始时，所有这三

个群体都受到了苏联统治者的惩罚。以后，犹太人被纳粹分子及其当地的合作者屠杀。再往后，波兰人又遭到乌克兰人的袭击。最终，返回的苏军消灭了所有与独立组织有联系的人。

在战时的波兰，由纳粹和苏联进行的种族清洗始于1939—1941年。纳粹清理了西部的几个地区用于重新安置德国人，苏联则从波兰东部放逐了数百万人。1941年以后，波兰地下运动的一些小派别试图把乌克兰人从波兰中部驱赶出去，而乌克兰解放军（Ukrainian Insurrectionary Army，UPA）则对波兰人实行了更大规模的恐怖行动。1945年，共产主义者们完成了种族清洗，把波兰人从乌克兰驱逐出去，又通过"维斯杜拉（Vistula）行动"把乌克兰人从他们在"人民的波兰"的家园中驱逐出去。[1035] 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决议把奥得河（Oder）以东的德国人全部驱逐出去。（见原书第1047页）

建立于1942年10月的乌克兰解放军开创了一个单独的、民族主义的乌克兰，它反对与渗透到德国战线后方的苏联游击队日益扩大的联合。（乌克兰解放军的总司令是罗曼·舒凯维奇（Roman Shukevich）将军，"Chuprynka"，他一直战斗到1950年被抓获。）不管怎样，当日益增强的共产主义潮流既未受到德国国防军的制止，也未受到党卫军加利西亚兵团的制止之时，乌克兰地下运动采用了孤注一掷的解决办法。西乌克兰或者将回到苏联的统治下，或者回到波兰的统治下。一些更为激进的人随后决定消灭他们最弱的对手，即波兰公民。[3] 他们毫无愧疚地杀死了每一个反对他们的人：

1943年3月11日。在乌克兰的利托果什奇（Litogoszcz）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害了一位被他们绑架的波兰教师。与此同时，他们还杀死了几个反对这次大屠杀的乌克兰家庭的成员。[4]

在同强大的潜在宗教势力的冲突中，牧师们受到了野蛮虐待：

来自奥科佩（Okopy）的雷乌德·路德维克·沃达尔柴克（Revd Ludwik Wlodarczyk）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自奥斯特卢夫卡（Ostrowka）的雷乌德·斯坦尼斯瓦夫·多布扎尼斯基（Revd Stanislaw Dobrzanski）被人用斧子砍了头；科雷特尼察（Korytnica）的雷乌德·卡罗尔·巴兰（Revd Karol Baran）被从腰部锯成两截；雷乌德·扎瓦吉基（Revd Zawadzki）被割断了喉咙……[5]

在战后的东欧，所有的战争罪行被公开归咎于纳粹分子。来自如布恰奇等地的受害者们被归并到“2000万俄国战争遇难者”之中，或以其他方式悄悄地隐瞒起来。[6] 悲剧的多民族性没有得到重视。所有各民族都错在只宣布他们自己的损失，而忽视了其他民族的损失，尽管有时会听到有关各民族共同遭受苦难的报道：

1942年5月至12月之间，14万多沃尔西尼亚犹太人被杀死。1943年春，一些藏在波兰人家中的犹太人连同庇护他们的波兰人一起被杀害了。当时，沃尔西尼亚居住着30万波兰人，其中4万人被乌克兰“恶棍”杀害。在许多村庄，波兰人同犹太人并肩战斗，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7]

但是，已经着手对战时大屠杀进行的公正的调查并不全面。例如，试图证实波兰人或天主教徒的损失时，不可避免地要忽略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损失。他们强调在苏联服役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合作者的作用，或者在德国人指挥下的乌克兰团体的作用。他们既不关心在德国警察部队中服役的西里西亚波兰人的活动，也不关心波兰人同苏军的合作。计算乌克兰解放军杀害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不是他们的职责。任何只考察一方面的活动必然导致曲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顺便说一句，布恰奇也是杰出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的故乡。[8]

的支持。冒犯地说，它同犹太隔离区中的犹太人战斗组织（ZOB）有适当的关系，虽然微不足道——它同乌克兰人、苏联游击队员势不两立，它与成群结伙的逃兵、逃亡者、强盗等共同在森林中划分地盘。它组织并运转了一个令人敬畏的“秘密国家”——有秘密情报工作的，有牵制公众注意力的、教育方面的、司法的和政治的等分支机构。但是，它未能在苏联的“解放”中幸免。它的民主派领袖们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公开审判中全部被处决。像奥库里茨基（Okulicki）将军——波兰国内军（AK）最后一位总司令——那样永不屈服的可尊敬的人士应当成为同盟事业中的英雄。在他们保持着可耻的沉默的西方同志们之间，他们反而被置于默默无闻、蒙受耻辱和早逝的处境中。[115]

在南斯拉夫，问题是通过英美两国一系列有争议的，甚至如一些

人所说的声名狼藉的决议解决的。与波兰不同，南斯拉夫处在苏联直接影响的领域之外。但1943年它才得到来自意大利的盟军的援助。伦敦和华盛顿选择了支持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此后，铁托的对手切特尼克便处于各种形式的诽谤和中伤的包围之中。他们的领导人，包括米哈伊洛维奇（Mihajlovic），最终被铁托的法庭以“叛国罪”处决。

这样的结果有力地说明在英美阵营中流行的“抵抗运动”和“通敌合作”的定义是多么轻率。那些从未经受过外国入侵的国家很难领会外国入侵后的复杂状况。当然，欧洲大陆有些人出于个人私利，选择了为入侵者服务；其余的人，例如在比利时，雷昂·德格莱尔（Leon Degrelle）领导的雷克斯（Rexist）运动，继续按照战前制定的原则行事。但是，许多人转而与入侵者合作是为了产生温和的影响，并限制已经发生的危害。在法国，经过贝当与希特勒那次重要的会见之后，与占领者合作的政策也许被误导了，也许没被误导。但是，那是为了爱国的需要而杜撰出来的。

在欧洲一直被苏联人和纳粹分子占领的广大地区，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两种集权制度都寻求通过彻头彻尾的恐怖手段达到强制服从的目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为苏联人服务与为法西斯分子服务同样令人陷入道德困境。对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而言，坚持原则意味着试图同时既反对希特勒又反对斯大林，而这种行为完全是自取灭亡。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从东线传来的种种消息令柏林逐渐失去信心。1943年春天，苏联红军发动了两年来的第一次全面进攻。在一路向柏林进军的五次重大战役的开始阶段，斯大林忠实的元帅们就开始迫使纳粹敌军后退。当年7月，在库尔斯克附近开阔的大草原上，德国人的战略性坦克部队被击溃。他们展开大规模进攻的能力被粉碎了。借用丘吉尔的一句比喻，潮水转向了。

[1036] **伟大同盟的胜利（1943年7月—1945年5月）**。从1943年年中起，伟大同盟各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密切合作。第三帝国虽然奋力战斗，但是已被包围了。苏军收复了全部被占领土。英—美军队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美国的工业实力、俄国的人力资源，连同大英帝国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其实力超过了正在萎缩中的希特勒的帝国。盟国在意大利仍然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也没有迹象表明德国内部发生了严重对立。除非“神奇武器”或许能扭转元首已经日趋黯淡的前程外，帝国随时都可能灭亡。

尽管各种传言过分夸张，武器更新换代的竞争确实相当激烈。这集中体现在喷气式发动机、火箭和核炸弹方面。德国科学家赢得了三项竞赛中的两项。梅塞施米特262喷气式战斗机的样机于1942年放

飞。V1 和 V2 型“复仇者”火箭在波罗的海之滨的佩尼明德（Peenemunde）研制，目标是 1944 年 6 月击中伦敦。但是，在核炸弹的竞赛中，盟国在新墨西哥（New Mexico）附近进行的曼哈顿计划领先于德国。核炸弹于 1945 年 7 月研制成功，但对欧洲战事而言已经太晚了。

就盟国而言，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政治和战略领域的协调。为此，先后在德黑兰（1943 年 12 月）、雅尔塔（1945 年 2 月）和波茨坦（1945 年 6 月）安排了“大三角”的三人会议。他们的讨论包含了三个主要议题——确定战争目标，太平洋战争和欧洲战争的优先问题，以及战后欧洲的重建计划。在战争目标上，伟大盟国坚持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尊重斯大林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忧虑，部分是由于接受了 1918 年的教训。当盟国结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是许可苏联在东欧建立专制模式。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旦宣布排除从战争中撤军的可能性，他们就放弃了削弱苏联领导权的最有效的手段。

对美国而言，在对德作战和对日作战孰为先后的问题上冲突尤为突出，美国在两方面的作战中都单独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已成为雅尔塔会议的主角。苏联自 1941 年以来一直对日本严守中立，而且在欧洲战事结束前不打算改变这种态势。英国正好与此相反，它已深深卷入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脆弱的远东航线拉得过长，所以不得不严重依赖自治领独立的战争努力，尤其是寄希望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加坡在战争初期就戏剧般地沦陷了。以后，英军的参战就局限在缅甸（在缅甸，日本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与英属印度的交界处），并且协助美军作战。

有关欧洲未来的一系列计划，盟国内部从未达成充分的决议。西方盟国在考虑西欧，首先是意大利的问题时把斯大林排斥在外，而斯大林则继续坚持他自己关于东欧的意向。一个重要的例外源于丘吉尔[1037] 1944 年 10 月访问莫斯科时同斯大林讨论的所谓的百分比协定。这一点从未被正式地接受过；但是有理由认为，双方考虑过将其作为巴尔干半岛的工作指南。据说，丘吉尔从衣袋中掏出半张纸片，他已经在上面列出了有关国家的简短的名单，在名单的旁边，一系列百分比代表着西方盟国与俄国各自期望的势力范围的平衡。据说斯大林抽了一口烟斗后，对下面的列表划上了一个简洁的蓝色对勾。

这份丘吉尔称之为“不规范的文件”，在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公开部门中并不存在，它的存在始终都是有疑问的。然而，在这个名单上列出的国家中，实际上只有在希腊，西方盟国的影响超过了原来的预想。那便是所发生的事实。

	俄国	其他盟国
罗马尼亚	90%	10%
希腊	10%	90%
南斯拉夫	50%	50%
匈牙利	50%	50%
保加利亚	75%	25%[116]

波兰是一个三大盟国尚不能就其前景达成甚至是非正式协议的国家。它的境况经常被视为后来冷战的源头。像法国一样，波兰是1939 年时的盟国创始国之一。驻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得到了广泛承认，它的士兵、水兵和飞行员正分别在英军和苏军服役。1943 年 4 月，斯大林借口纳粹揭露的卡廷（Katyn）事件中断了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承认了名分不当的波兰爱国者联盟——苏联支持的傀儡政权的核心部分。7 月，深受公众信赖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兼军队总司令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在直布罗陀的空难中身亡。从那时起，波兰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苏联的宣传要求退回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边界，现在则正好提出寇松线（Curzon Line）做边界。据非权威的说法，东部波兰的民众据称正吵闹着要求并入苏联；而一个对苏联利益持“友好态度”的波兰政府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要求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但是，对强大的苏联所做出的战争努力无限钦佩的西方舆论理所当然地愿意相信苏联人。因此，当苏联红军日益深入地挺进波兰腹地时，西方列强便迫使他们可怜的波兰盟友向苏联让步。

德黑兰位于伦敦至莫斯科战时空中航线的中间点，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确保各方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方面，三方取得充分进展。他们对迅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及战后伊朗独立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1038]是他们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相当激烈。当艾登（Eden）同莫洛托夫进行激烈争吵时，罗斯福总统“在他的椅子上睡着了”。西方领导人不惜以德国为代价对苏联做出了让步：波兰的边界应当整体向西移动，以补偿斯大林的要求；然而他们对波兰人保守了这个秘密。时机不是很好——但是，三方在来年共同进攻第三帝国的问题上恢复了充分的信任。

红军于 1943—1945 年发动的攻势始终保持着战争的主动权，迫使德军陷于不断的混乱之中。他们开始攻入波罗的海国家中部，继而

攻入白俄罗斯、乌克兰，最后攻克柏林。红军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向前跃进，把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集中到敌人过分延伸的战线前面，然后，像一股无法抵御的洪流冲向敌阵。继库尔斯克战役之后，第二次这样的攻势指向第聂伯河，德军以广阔的焦土地带来对抗红军。1944年1月发动的第三次战役，战略目标对准远方的维斯瓦河。1944年8月开始的第四次战役，向南转入巴尔干半岛，目标是攻取多瑙河。1945年1月的第五次战役，目标是奥得河及其纵深地区。

在这些战役中，红军每次实施的基本战术是分割、包围敌军进行抵抗的军事据点。一旦一座防御要塞被分割、孤立以后，就可以留待以后有把握时再将其摧毁。用这种方法，被隔绝在库尔兰（Courland）地区的几支德军部队，直至战争结束时仍未被击败。东线的许多德军要塞，例如布雷斯劳（Breslau），直至柏林陷落时仍然完好无损。红军的主导思想是防止德军准备反击，并因此去袭击、骚扰和破坏德军堡垒。俄国人知道怎样在大草原上作战：进攻的一方通常占据上风，而防御者往往会遭到迂回包围。当平原地区越战越少时，德军的抵抗和战斗就越来越顽强。三个这样的咽喉要塞出现在喀尔巴阡山区的杜克拉—帕斯（Dukla Pass），布达佩斯战役，以及波美拉尼亚墙（Pomeranian Wall）沿线。在这些地区，苏军和德军血流成河。

红军于1944年更名为苏军后，其名声有所好转。回想1939—1941年期间，即使在苏联本国，它也时常被视为异己的武装。在巴尔干诸国，人们是以爱憎混杂的感情接受了苏军。在德国，苏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杀戮抢掠，引起人们的恐慌。第一个从纳粹暴政下获得自由的德国村庄遭受集体屠杀。纳粹大量散发德国妇女被苏军钉死在畜棚门上的图片，以激励人们抵抗苏军。实际上，1944—1945年冬天，大量的德国居民逃走了。

苏军挺进中欧是现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恐怖的一次军事行动。参加此次战役的一名苏军士兵在前线自豪地写道，“共产国际的巨神”碾碎其车轮下的一切。[117]所以，如果说苏军把中东欧从可憎的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它又给中东欧带来了斯大林主义的奴役。随之而来的是抢掠、强奸、普遍的暴力犯罪，以及达到令人惊骇的公开的恐怖活动。对那些亲眼目击者而言，那是些令人终生难忘的场景。当屡屡受挫的德军部队撤退时，解放者的大军如巨浪般涌来。首先来[1039]到的是戒备森严、军容严整、装备着重武器的前线部队；其后到来的是二流部队和讨伐队，他们行军时只带弹药而没有口粮。在他们后面的是前线的流离失所者——掉队的士兵、军营的追随者、尚能走路的伤兵、在各条战线之间往来逃命的避难者，等等。在他们的后面，由身着笔挺的制服、乘坐美式吉普的内务部队组成了不断移动的警戒

线，射杀所有不能继续前进的人。最后来到的是“亚洲的游牧部落”，络绎不绝的人流搭乘一切交通工具向西移动——破旧不堪的卡车，抢来的农民手推车，矮种马，甚至骆驼。眼睛布满血丝、缠着绷带、委靡不振的德军士兵与无数乘坐卡车前进、朝气蓬勃、夸耀自己经历的斯拉夫和亚洲小伙子们形成鲜明对照。

苏军于 1944 年 8 月进抵巴尔干半岛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罗马尼亚反戈一击，向其不久前的纳粹老板开战；德军占领了匈牙利，以防其步罗马尼亚后尘。在保加利亚，王国政府 9 月被推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队同苏军部队汇合，于 10 月共同攻克贝尔格莱德。在苏联势力范围界限以外的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秘密地准备接管政权。在这一方向，到 12 月，苏军推进到了防御森严的布达佩斯；直至新年前夕，进军才暂时停止。

在西线，终于在 1944 年 6 月 6 日，即 D 日，开辟了第二战场。英国、加拿大、波兰和美国的部队在诺曼底海滩登陆。“霸王行动”无疑涉及了最伟大的战争艺术。它要求成千上万的官兵及其武器装备在敌人严密设防的海岸安全登陆，而守敌经营防御工事已达四年之久。盟军获胜是因为周密可行的计划，再加上好运气。盟军采取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措施，包括轰炸加来海峡（Pas - de - Calais）的佯攻目标，扰乱德军统帅部对登陆地点的判断。希特勒对诺曼底登陆的预感本来是正确的，但又被他自己否定了。空中优势不仅向登陆部队提供了急需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它阻止了德军强大的装甲后备部队向诺曼底战场推进。工业技术的奇迹包括被拖到诺曼底对岸的被称为“摩尔布里港”的巨大浮动船坞，以及保证对登陆部队无限制地供应汽油的海底输油管。天气的变化使英吉利海峡出现了 25 年来最大的海浪，这导致德军总司令隆美尔（Rommel）将军回家去欢度那致命的周末。

隆美尔的对手，美国的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知道，自己只能孤注一掷。进攻日期已经推迟了两次。由于有利的月光迅速暗淡，156000 名官兵，2000 艘战船，4000 艘登陆艇和 10000 架军用飞机多日来一直保持待命状态。在一片不安之中，进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时值夜半，大风渐渐平息，美军第 82 伞兵团和第 101 空降师降落在德军防线中部。他们中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士兵，空降时被悬挂在圣梅尔教堂（Sainte - Mere Eglise）的尖顶上，于是佯装死亡。再往西，在“珀加索斯桥”（Pegasus Bridge），第一位英军士兵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中士吉姆·沃尔沃克（Sgt. Jim [1040]Wallwork）驾驶他的“霍萨”号（Horsa）滑翔机于零点 16 分悄然降落在距目标 30 码的地方，由于身体受到猛烈撞击而失去知觉。第二

牛津和白金汉轻步兵团D连迅速冲过珀加索斯桥，占领了奥恩河（Orne Canal）的船闸，随后进入贡德雷（Gondree）夫妇的咖啡店，告诉他们解放的消息："一切都好了，朋友。"[118]

随后，在晨曦中，登陆舰的钢门被打开，主力部队涉水登上了五处被规定了代号的海滩。美国第一集团军的73000人攻击犹塔（Utah）和奥马哈（Omaha）；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加拿大第一集团军的83000人直捣戈德（Gold）、朱诺（Juno）和斯沃德（Sword）。惊慌失措的德国守军龟缩在地下掩体内，听任从远处军舰中发射的重磅炸弹的轰炸，以及来自空中的无情扫射。只是在"流血的奥马哈"，他们才勉强组成了一道火力网来牵制进攻者。在那里，得克萨斯突击队（Texas Rangers）冒着炮火英勇地攀登上峭壁，在山顶上只发现已经被摧毁的机枪阵地。挫折是局部性的。D日在继续。盟军除了在意大利建立了立脚点，还在法国赢得了支撑点。现在，第三帝国被打得千疮百孔。

不管怎样，"霸王行动"缓慢地向前推进。当德军从惊骇中恢复过来时，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抵抗。美军用了三周时间都未能攻克重要的登陆点——瑟堡要塞（Cherbourg）。英军本应于D日傍晚进入卡昂（Caen），他们却在前进的道路上战斗了34天（直至7月9日）。但是，后勤保障的优势胜过在东线所看到的任何事情。援军接连不断地进抵摩尔布里（Mulberries），汽油滚滚流向海底输油管。当美军最终突破到德军后方时，德军便只剩下逃跑一条路了。在不断地收缩战线中，德军在法莱斯（Falaise）被盟军合围，他们冒死突围，损失惨重。从此，盟军挺进巴黎和莱茵（Rhine）地区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

经过两年的败绩后，德国军队终于反对希特勒了。1944年7月20日，在元首设在东部的大本营——东普鲁士拉斯登堡（Rastenburg）附近的"狼穴"（现属波兰的肯特尔赞/Ketrzyn），有人试图刺杀希特勒。一颗装在公文包中的炸弹被放在会议室内沉重的橡木桌下面。炸弹在元首到达会议室时爆炸了；希特勒虽然幸免一死，但却受到极度惊吓，臂部受了伤。炸弹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放置的，他是毛奇家族的贵族克雷索（Kreisau——地名）俱乐部的成员。他的失败，以及其他密谋分子的惨死，遏止了其他谋杀希特勒的尝试。施陶芬贝格伯爵的同谋者们被吊在挂肉的大铁钩上慢慢地死去的情景被拍成电影供元首欣赏。大量的文献记述了德国人的抵抗活动。贵族个人和小组，例如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朋谔斐尔（Bonhoeffer）或"白玫瑰小组"的活动确实存在。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达到目的。[119]

与刺杀希特勒的密谋同时，德国的近邻——波兰和法国都在热切地期待着自由。苏军正在逼近华沙东郊。美军正在向巴黎西郊挺进。

这两座城市遍布各种各样的抵抗战士小组，他们主要听命于伦敦指[1041]挥；两个城市都急于开始反抗纳粹压迫者。在华沙，抵抗运动由处于地下状态的国家军领导，在巴黎则由自由法国指挥。

巴黎在8月19日爆发了起义。尽管情报少得可怜，但在城内发动攻势的意见占了上风，并且加速了美军的最后推进。部分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同美军司令官一道工作，美军司令官承认他们在诺曼底登陆以来的一系列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来自各处的攻击下，德国占领军退却了——而美军发动了进攻。勒克莱尔（Leclerc）将军率领的法国装甲师，在美军的指挥下参加了战斗，并光荣地担当了攻城先锋。德国占领军投降时没有执行元首片瓦不留的命令。8月25日，在德国狙击手仍然继续活动的情况下，戴高乐将军昂首阔步地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感恩礼拜。尽管巴黎市民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但人们仍然尽情欢庆。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恢复了；巴黎自由了。

几乎在巴黎起义三周前，华沙就已经在8月1日举行了起义。起义计划在苏军最终进攻华沙时，起义者同时在城内举行暴动。但是，华沙人没能分享到巴黎人那样的成功。波兰抵抗运动掌握的情报也少得可怜；他们对苏军总司令并没有打算帮助他们这一情报发现得太晚了。自从跨过波兰边界以来，苏联的将军们在所有的战役中都利用了波兰地下抵抗运动。但是，斯大林不承认他们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也无意让波兰重获自由。在来自各方的攻击下，德国占领军已经开始撤退。但是苏联人却突然在华沙边缘停止前进。邪恶的背叛行为在运作之中。曾经号召华沙举行起义的莫斯科电台，现在竟将起义的领袖们称作“一帮罪犯”。两个德国装甲师前来增援；德国占领军及时得到了纳粹后备队中最凶恶的武装党卫军的大量增援。受苏军司令部指挥的贝林将军领导的波兰军队，由于公然违抗军令和试图支援华沙起义而被从前线撤回。贝林本人被撤职。西方盟国试图以在意大利的空军援助华沙起义者，但由于苏联不愿提供机场和供给燃料而流产。在维斯瓦河一侧，起义者冒着敌人的炮火、扫射和轰炸，同敌人争夺着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每一条下水道，而苏军士兵在河对岸悠然自得地进行日光浴。在一系列的血腥屠杀中，纳粹军队在莫科杜沃（Mokotow）郊区杀害了40000名手无寸铁的波兰公民，这不禁使人回想起上一年被纳粹毁灭的华沙犹太区。巴黎解放数周之后，华沙起义者仍在坚持战斗。经过63天的奋战，起义者于10月2日投降了，起义者的总司令博尔（Bor）将军被德军逮捕入狱。他们惟一的慰藉是被作为战俘对待。尽管25万市民献出了生命，华沙仍未获得自由。战前的波兰共和国也未能恢复。被摧毁的圣约翰（St. John）

大教堂没有举行感恩礼拜。幸存的华沙居民被强制迁走。希特勒暴怒，命令不许给反叛的华沙城留下一砖一瓦。纳粹毁灭华沙城的过程持续了三个月，与此同时，苏军带着他们的波兰委员会傀儡，消极地隔河观望。直到 1945 年 1 月 17 日，苏军才进入空荡、寂静、大雪覆[1042]盖、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华沙城。

尽管西方盟国在诺曼底登陆了，但仍旧遭遇了许多挫折。在意大利，盟军虽然在 D 日之前就攻占了罗马，但是却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受阻达数月之久。D 日一周之后，对伦敦的闪电战重新开始了，德国向伦敦地区发射了 V1 飞弹；9 月份，伦敦又遭到 V2 飞弹的轰炸。8 月，一支在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登陆的美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且进展缓慢。在北部，布鲁塞尔于 9 月 3 日在一片欢庆中迎来了解放。但是，在"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 Garden）中，英军的空降计划和在莱茵地区攻占莱茵河桥的计划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在中欧，1944 年 12 月进行的"突围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美军在阿登（Ardeens）地区经受了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装甲部队的反攻。在巴斯托涅（Bastogne），敌人号召美军第 101 空降师投降，但德军总参谋部的后备力量及其翻译们最终被美军回应的"坚果行动"挫败了。在地中海，英军于 10 月份重新开进希腊，他们发现自己反而给希腊带来了内战。丘吉尔毫不犹豫地支持雅典政府反抗共产党人的进攻。在垮台之前，第三帝国就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

德国人预期的在 1945 年 1—5 月获得的最后胜利始终没有发生。在西线，英美空军的轰炸正在不断地把德国每一个主要城市变成一片残砖碎瓦和废墟。纳粹军官们徒劳地计划将其最后的据点设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暗堡群中。在东线，数百万处于绝望中的德国难民冒着严冬艰难地向西长途跋涉。数万人死于被击沉的"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号以及其他救助难民的船只，或死于冒险穿越结冰的维斯瓦湾（Frisches Haff）。元首最后的孤注一掷是征募所有德国 14 岁以上的男子组成所谓的"人民卫队"。其中的大多数中学生、残疾人和退伍军人死于苏军关于杀死任何身穿德国军服的人的政策。对但泽或布雷斯劳这样的主要城市以及奥斯威辛等集中营实施的强制撤退，往往伴随着死亡行军。德国人在东方的生活正走向终点。[**登霍夫**]

1945 年 1 月 12 日，朱可夫在大约 400 英里宽的战线上对柏林发动了攻势。当西方盟军尚未抵达莱茵河之时，红军已经清除了波兰的敌军。布达佩斯于 2 月中旬被攻克，这使苏军有可能向维也纳和柏林两个方向发动猛攻。3 月初，美军有一次幸运的机会，当时德军工兵炸毁莱茵附近莱茵河上最后一座大桥的企图失败了。不久，巴顿将军

就会乘胜越过这个西部的桥头堡，甚至比朱可夫在东部的行动更迅速；他的部队最终将于 4 月 23 日在萨克森的托尔高（Torgau）与苏军会师。得到加拿大和波兰部队支援的英军解放了荷兰，并沿着北部平原向纵深挺进。柏林陷入俄国人钢铁般的合围之中。在空袭中被炸毁的废墟下面的地下室中，元首看到帝国的防线土崩瓦解。

[1043]

登霍夫（DÖNHOFF）

玛丽安（Marion），登霍夫（Dönhoff）女伯爵 1909 年生于东普鲁士境内距柯尼斯堡（Königsberg）20 英里处的腓特烈施泰因（Friedrichstein）家族宅邸。她是众多兄弟姐妹中的第七个孩子，沿袭着半封建的东欧贵族一成不变的生活习惯，而不知他们的时代正在悄然离去。

在 1900 年代，腓特烈施泰因依然向它的居民们奉献着所有的自然美景和特别恩惠。它位于湖水荡漾、林木繁茂、四季分明的东部，孩子们在这里无忧无虑，骑马、野餐，这里还有图书馆、家庭教师、慈爱的保姆、尊贵的客人。玛丽安的母亲曾经在波茨坦宫当过皇太后的侍女，她以宫廷中那种刻板的礼仪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来管理家中事务。她训练女仆们称呼自己“早安，阁下，您最谦卑的仆人”。玛丽安的父亲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一位脾气随和的环球游历者，曾出任过德国驻圣彼得堡和华盛顿的外交官，他既是世袭的普鲁士上院议员，又是当选的德国国会的议员。他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并具有路德教徒般的虔诚。

像许多德国贵族家庭一样，登霍夫家族中世纪即移居东部。他们的祖先来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鲁尔河（Ruhr）畔的杜纳霍夫（Dunehof）。第二代仍叫杜纳霍夫，1330 年在利沃尼亚的里加（Riga）附近起家，并一直延续了 18 代。家族中比较年长的利沃尼亚支系，通常称为登霍夫，变成了显赫的波兰权贵——有王室权贵，波兰军事指挥官，地方行政长官和红衣主教。普鲁士人、新教徒登霍夫家是利沃尼亚的马格纳斯·厄恩斯特·冯·登霍夫（Magnus Ernst von Dönhoff）的传人，一度出任过波兰驻萨克森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大使，于 1620 年在哥尼斯堡附近定居。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Friedrich）于 1666 年买下了普雷格（Pregd）的主要地产。他的孙子奥托·马格纳斯（Otto Magnus），梅梅尔（Mermel）的统治者和签订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

的普鲁士特使，在1709—1714年建造了腓特烈施泰因大厦（宅邸）。

在普鲁士边境地区，战争和灾难接踵而至。在伟大的北方战争中，东普鲁士40%的居民死于瘟疫。绵延多年的革命战争见证了1791年对地产的限嗣继承、1807年法国人的到来、1810年农奴的解放以及1813年库图佐夫（Kutuzov）的到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腓特烈施泰因大厦（宅邸）逃过了1914年8月俄国人的进击，迎来了它的救星——陆军元帅冯·兴登堡（von Hindenburg）本人。

起初，1939年的战争看起来同其他战争差不多。然而到了1944—1945年冬，最后的和全部的报应显然就要来临。与他们的前辈不同，前进中的苏军蓄意要把东普鲁士的德意志特性立刻全部清除。由于家庭中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死了，他们不是死于东线战场，就是死于刺杀希特勒事件后的大批处决，只剩下玛丽安·登霍夫独自管理腓特烈施泰因和奎泰南（Quittainen）的地产。1945年1月的一个夜晚，她跨上自己的马，加入到西行逃难者的人流之中，在两个月内行进了1000英里，所有的路都是通往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她中途只停留了一次，与俾斯麦的儿媳逗留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瓦尔岑（Varzin））登霍夫家族600年来的东进冒险周而复始，又回到了起点。被遗弃的腓特烈施泰因并入了俄罗斯联邦。 [1044]

腓特烈施泰因以及登霍夫家族的命运在整个欧洲被上百遍地传诵着。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1年消灭了俄罗斯本国的贵族，同样的命运，或是在1939—1940年，或是在1944—1945年，也降临到红军所到之处的地主头上。普鲁士、波希米亚和波罗的海诸国古老的德国家族被抛入深渊，它还吞噬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波兰人家族，以及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匈牙利人家族。实际上，不仅仅是贵族阶级，而是所有各阶级的民众都被赶走了。苏维埃的鞭子不仅消灭了特权，而且毁灭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1]

至少玛丽安·登霍夫活了下来。战后，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汉堡工作，1968年成为《时代》（Die Zeit）杂志的编辑，1973年成为该杂志的出版商。当她撰写回忆录时，她认为复仇毫无意义：

> 我也不相信，憎恨那些接管了自己家乡的人们……必然证明热爱家乡。当我回想起东普鲁士的森林、湖泊，它那宽广的牧场和古老的林荫道时，我确信，它们仍像我原先住在那里时一样无比可爱。也许最好的爱便是没有任何占有的爱。[2]

1945年2月4—11日，三巨头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再次会晤时，[1044]战争已近结束。对德国的考虑，三巨头同意在德国建立四个由盟国分别占领的区域，摧毁第三帝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审判战犯，保证德国人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对于波兰，他们同意在那里举行“自由和不受约束的选举”，过渡政府应由斯大林控制的卢布林委员会成员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成员共同组成。对于最为关注生病中的罗斯福的日本，三巨头同意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3个月参加太平洋战争（对日作战）。一份秘密协定授权苏联重新占领千岛群岛（Kurile Islands）。这些安排不具有国际条约效力；只是各盟国不公开的工作指南。[基尔豪尔]

[1046]

基尔豪尔（KEELHAUL）

1945年2月，英国驻意大利第八军的一名军官——丹尼斯·希尔斯（Denis Hills）少校被任命为设在塔兰托（Taranto）的一个遣返战俘营的指挥官，战俘营中关押着8000名第162土库曼（Turkoman）步兵师的男性战俘。他管理的战俘们曾经被征召加入红军，在东线被德军俘虏，在自愿为德军服务前曾忍饥挨饿并同类相食。依照雅尔塔协定的条款，他用船将他们送往目的地敖德萨，他毫不怀疑，所有这些被遣返回国的苏联战俘都将被处死。[1]

在后来的任务中，希尔斯多次面对古老的士兵困境，即一个士兵的良心总也无法和他的命令相一致。在党卫军费德（Fede）的事件中，即犹太移民正试图乘一艘非法货轮离开拉斯佩齐亚（La Spezia）去巴勒斯坦（Palestine），费德劝告他的上司不应强求执行规定，既然他们走了，就让他们走吧。“我曾想在一小点仇恨的火花燃烧前就把它熄灭。”[2]

在“基尔豪尔”（Keelhaul）行动期间（1946—1947），希尔斯接收了498名前苏军战俘，在里兹奥尼（Riccione）的一个营地进行甄别。他向苏联遣返战俘的顺序是：（1）所有身着德军制服的被俘者，（2）所有前红军士兵，（3）所有曾经帮助过敌人的人。通过虚构出“准军事人员”这一类别，以及怂恿一些人逃跑，他把遣返人数降低至180人。当战俘们离开时，这批俄国人的首领告诉希尔斯：“你们这样做是让我们送死……民主放弃了我们。”“你们是牺牲品”，希尔斯回答道：“现在，其余的人将是安全的了。”[3]

至于被拘留在里米尼（Rimini）的武装党卫军加利西亚师中的乌克兰官兵，希尔斯少校是几个当面断然拒绝苏联遣返委员会要求的英国军官之一。当该师被暂缓遣返时，他收到来自该师司令部的一封信，感谢他"为你高度的人道主义工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为名维护原则"。[4] 根据国际法，加利西亚人是波兰人，而不是苏联公民。

希尔斯承认他"曲解了规则"。[5] 此后不久，他被以举止不当的罪名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降级，因为他被人发现清晨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城市广场上翻跟头。

盟国强制遣返大批男子、妇女和儿童回国任由斯大林和铁托杀害的政策被认为是一种战争罪行。1945 年 6 月，在奥地利的德拉瓦河（Drawa Valley）谷，英军使用暴力围捕所谓的哥萨克旅及其家属，导致大批人自杀。但此事被掩盖得天衣无缝，直至希尔斯少校撰写的一份报告于 1973 年在美国曝光，以及英国档案解密，此事才大白于天下。索尔任尼琴（Solzhenitsyn）称此为"最后的秘密"。只是在事发三四十年后，此事才通过出版的书籍而广为人知。[6] [1047]

最近，伦敦审判了一桩不寻常的诽谤罪，判处《部长与刽子手》（The Minister and the Massacres）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Count Nikolai Tolstoy）赔偿 150 万英镑。他在书中描述了英国官方的一个阴谋以及怎样对阴谋加以掩盖。原告不是被控下令移交哥萨克人的部长，而是一个面临与希尔斯同样问题即实行了一种不同政策的英国军官。他没有收到 1 便士赔偿金，因为被告们把官司打到了欧洲法庭。[7]

个人责任永远难于查证。但道德原则是明确的。如果"执行命令"不能为阿道夫·艾希曼辩护，它也不能为盟国军官辩护。

正像医生们将讨论究竟是以心、脑、肺还是躯体的死亡作为人死亡的确切时刻，国家灭亡的时刻也要精确。就第三帝国来说，围攻柏林使其窒息；元首 4 月 30 日的自杀阻止了所有复苏的机会；5 月 8—9 日的总体投降标志着帝国最后的抽动。1946 年的纽伦堡审判可以比喻为验尸官的公开展示厅。[1045]

正如在雅尔塔所预见的那样，围攻柏林的任务留给了苏军。最后阶段自 4 月 20 日起持续了三周。朱可夫不计代价地投入后备兵力；很可能他在此次战役中损失的官兵比美军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官兵还要多。当绞索收紧时，各类纳粹官员纷纷逃亡。希特勒

的副手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一去不复返。在最后一批飞机中，有一架飞机满载着纳粹档案起飞后消失了。柏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是一场逆向的华沙起义。最终，苏军士兵把红旗插在了帝国议会大厦顶上。

在威廉街（Welhelmstrasse）与上林登街（Unter den Linden）交汇处的地下室里，元首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希特勒谈道："如果输掉了这场战争，民族也将不复存在。"[120]他的命令传送到一个毫无回应的空中。爱娃·布劳恩（Eva Braun）拒绝出逃，4 月 29 日，他同爱娃·布劳恩举行了正式婚礼。4 月 30 日，这对新婚夫妇依照协议，分别服毒或开枪自杀身亡。他们因此避免了墨索里尼及其情人的命运，在米兰，后者在临死前一天双脚因为过度紧张而颤抖不已。希特勒自杀身亡时，俄国人距离他只有 200 英尺之遥。希特勒在一封短信和遗嘱中留下命令，在一个汽油坑中焚烧其尸体：

> 1939 年我或任何一个德国人并没想发动战争。这场战争仅仅是那些具有犹太血统或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们所渴望的和煽动的……想到我国士兵在前线立下的无法衡量的功勋，我会快乐地死去……首先，我指示国家领导人……严格地观察种族法，无情地反对全体人民的共同投毒者——国际犹太人。[121]

元首及其妻子的遗骸被克格勃人员埋葬在东部德国某地，并最终于 1970 年挖出烧成灰烬。1993 年，两块据说是希特勒的头骨碎片从前苏联的档案中取出示人。

"欧洲的胜利"，或胜利日在 1945 年 5 月的第二周到来了。对纳粹分子而言，这意味着覆灭，意味着对他们的战神的复仇；对德国民族而言，这标志着全面的失败。蒙哥马利将军在吕内堡荒原（Luneburg Heath）的帐篷中接受了一个德国代表团的投降书；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兰斯（Reims）附近的大本营接受了德军的正式投降；朱可夫元帅也在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苏军总部接受了德军的投降。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生效时间被盟军确定为 5 月 8 日午夜（GMT）。莫斯科时间为 5 月 9 日清晨 5 时。

和平声明并不总是与现实完全一致。盟军仍在太平洋地区作战。在新墨西哥的沙漠中，科学家们还在为进行首次核试验而忘我地工作着。在欧洲，零星的战斗仍在继续。在布拉格陷入困境的一支德军部队被弗拉索夫（Vlasov）的俄罗斯解放军所歼灭，后者徒劳地指望通过改换门庭而获得死刑赦免。反对苏联控制的零星的区域性抵抗，在东欧和苏联西部一直进行到 1950 年代。

六周以后，在波茨坦，三巨头于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了最[1047]后一次会议。斯大林是战时三大盟国领袖中惟一的在位者，他怀疑资本主义列强可能转而反对他本人。与所有的预言相反，丘吉尔在战后英国的首次大选中失利，他在议会中的位置被社会主义者克利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取代。罗斯福在德国垮台前已经去世；由他的严肃稳重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三巨头之间的分歧如此巨大，以致组织一次和平会议的初始想法被搁置起来。当杜鲁门夸张地宣布美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A—炸弹（原子弹——译者注）试验时，斯大林甚至都没表示惊奇。

看来波茨坦会议仅限于解决具体事务。德国须建立同盟国委员会以协调四个占领区的管理，奥地利恢复了独立，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捷克斯洛伐克收回了苏台德地区。不管波兰人同意与否，波德之间以奥得河—尼斯河划界。所有生活在新边界以东的德国人都得被驱逐。所有落入盟国手中的纳粹领导人都被交付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审判。除此之外，同盟国几乎未能达成其他协议；他们没有去尝试。

此时，重建和遗忘的过程都在积极进行：

每一次战争过后
有人不得不清理。
因为有些东西
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有人不得不把
碎石扔到路边
以便堆满尸体的马车
能够通过。

上镜头的必定不是它；[1048]
它经受了时代。
所有的摄影机都已经离去
去追随其他的战争。

那些知道
全部事情就是这样的人
必须为那些
几乎不知道，或知之甚少，
或者一无所知的人让路。[122]

[1049]



地图 27　二战后的德国，1945 年以后

星期五，1945 年 10 月 19 日，纽伦堡。[123]纽伦堡被美军占领。一名美军上校出任纽伦堡监狱的司令官，监狱就在元首大街上（Furtherstrasse）的司法大厦后面。在 24 名被定为“德国首要战犯审判”

的被告中，有21名被关在单人牢房中。这天是向他们送达起诉书之日。

送达起诉书的任务落到一位年轻的英国少校肩上，他曾当过战俘，能讲流利的德语。当他于下午2点前走进监区时，他看到三层单人牢房，每间牢房的门上都有一个安装着格栅的小窗口。一名警卫正懒洋洋地通过每间牢房门上的窗口向里面仔细察看。在楼上，敞开的楼厅罩着金属网。第二十二名被告最近自杀了。这一事件有十来个人可以作证。年轻的上校由监狱长和一位掌管牢房钥匙的军士长引领走进监区。跟在他们后面的有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及其翻译，两个携带文件的美军士兵，一个美国安全部门的官员，拿着笔记本的监狱心理学家以及监狱中的路德教牧师。几名宪兵即美国军警，头戴象征他们身份的白色头盔，自始至终紧随其后。

刚刚从英语译成德语的起诉书是些厚重的文件。起诉书的封面上写着："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以下是一排24个名字，为首的是戈林。起诉书提出了四项罪名：共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被告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两份副本，起诉书既概要地指出了他们应共同承担的罪责，又指出了个人被控告的不同罪责。英—美诉讼程序要求将起诉书送达被告本人。

这位年轻的上校，尽管有法律学位，却没有从事这类审判任务的实践经验。当他看到金属网时，他的思绪转而想到他的战时同伴，一位被盖世太保抓获的比利时飞行员，就是从苏莱斯内斯（Suresnes）监狱中一个这样的楼厅中逃走摆脱死亡的。虽然上校已经为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好几个月，但他却是刚刚抵达纽伦堡，而且从未面对面地接触过任何一个被告：

我看着监狱那一头高大的窗户。秋天明媚的阳光映照出通往上层单人牢房的螺旋形楼梯的侧影。这里总是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令人惊骇的钥匙开门声……[1050]

寂静持续到我们来到尽头的一间牢房。执勤的卫兵向我们敬礼。我注意到他佩带着左轮手枪和警棍……当牢房门被打开时，我打起精神面见摇摇晃晃站起来的囚犯……

我惊讶地脱口而出：

"你是赫尔曼·威廉·戈林？"

"正是。"

"我是尼夫少校，国际军事法庭任命的官员。我奉命向你送交控告你的起诉书副本，起诉书中你被称为被告。"

当我的话被译出来时，戈林阴沉着脸，活像舞台上的强盗。他默默地接过了我递给他的起诉书副本，继续听我说："我还奉命向你解释纽伦堡军事法庭宪章的第16条。"

于是，一份德文副本也交给了他。

"请你看一下段落（C）。你有权在出庭前同自己的辩护人进行接触，或者得到律师的援助。"

我的话正确并且准确。戈林严肃地望着我，听完后一脸沮丧。

"看来审判已经开始了，"他说道。

"你可以自己选择律师，或者由法庭为你指定律师。"

显然戈林没有听懂……随后他说，"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跟他们毫无关系……"

"我认为你应当指定一位代理人……"

他耸耸肩。

"对我来说一切都显得毫无希望。我必须仔细阅读起诉书，但是我不明白它怎么能有任何法律根据。"……

我离开戈林的囚室几小时之后，监狱中的心理医生吉尔伯特博士要求他在起诉书的副本上签名。戈林在上面写道："胜利者永远是法官，战败者永远是被告。"[124]

甚至在开庭之前纽伦堡审判的两难境地就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了。

欧洲的生存状态在1945年秋正处于最低水平。战胜的盟国把被打垮了的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并且竭力保持联合阵线。英美盟军解放了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西欧国家。它们都恢复了战前的领土面积。被苏联解放的东欧国家发现，这一解放是同一种新式的征服结合在一起的。英国，惟一避免了被占领的欧洲参战国，近来选择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它认识到胜利并未防止英国地位的明显下降。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既是战胜者，又未遭受战争的创伤。少数中立国，从西班牙到瑞士，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真正独立。

有几个国家已经举行了审判，惩罚那些现今被认定为犯罪的战时行为。在奥斯陆，吉斯林受到审判并于9月被处决；在巴黎，赖伐尔[1051]于10月9日被处以极刑。在莫斯科，对波兰地下军领导人的审判在6月进行；西方舆论没有充分意识到此案中的被告既非法西斯分子，亦非通敌合作者，而是英雄的盟友，他们惟一的罪行只在于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而斗争。西方各国政府宁肯私下里竭力劝说对被告减刑，也不

愿公开对苏联提出抗议。

纽伦堡，德国最古老和最（典型）有特色的城市之一，由于遭到11次大规模空袭，已经被炸成了一片瓦砾。后来，当两个党卫军师团决定将此地作为最后的抵抗据点时，在美军重炮的无情轰击下不得不屈服了。纽伦堡是德国中世纪著名歌唱家们的聚集地，还是汤豪泽（Tannhauser）、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和法伊特·施托斯（Veit Stoss）的故乡。上个世纪它被选定为德国珍贵的国家艺术品和历史文物的收藏地。1930年代，纽伦堡被选定为希特勒最富戏剧性的纳粹党大会的召开地点。现在，它又被选定作为国际审判法庭的所在地，这部分地是因为其具有的象征性意义，部分地是由于该城的司法大厦在空袭中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在纽伦堡举行审判强调的是盟国这样一种观点，即德国的罪恶不是源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例如1918年就是这种观点），而在于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本质。看来，确定审判地点，其接受历史教训比审判单个被告的罪行意义更为深远。

然而，纽伦堡对于审判的特殊贡献在第八号战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生于1885年）身上体现出来了，1933—1940年他作为纳粹大区的领袖统治着这座城市。这是他第二次在司法大厦后面的单人牢房中服刑，他曾经在一次正式视察监狱时因为骚扰一个少年犯而被捕。据他的看守们观察，他具有明显的性变态倾向，他终生迫害犹太人的特性根植于其反犹主义的性观念上。在反对“种族污染”的圣战中，他发明了一种虚构的生物化学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犹太男子精液中的蛋白可以永久地“污染”任何一位与之有过性接触的妇女。作为《冲锋队员》的编辑，他开展了一场持久的将德国少女从犹太诱奸者手中解救出来的战役——他后来在《德国公众健康的血统与根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给这场运动披上了伪科学的外衣。他是纽伦堡法的主要鼓吹者，该法禁止德国犹太人同非犹太人发生任何形式的性关系。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他发表演讲煽动暴徒们效法中世纪在城市中进行的壮观的集体屠杀。作为一名早期入党的纳粹党徒，他是少数可以对元首称“你”的领袖之一。但是，当他公开宣称戈林的女儿是人工授精产下之时，他就做得太过分了。被激怒的帝国元帅策划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揭露这一巨大的谎言，并勒令他立即退休。甚至希特勒本人也未能保住他。

盟国筹备审判战争罪行的决议未能迅速地付诸实施。如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一样，丘吉尔也反对这一决议。在没有法律先例时，他们主张最好立即处决纳粹首脑。他们的意[1052]见被驳回了：各盟国政府致力于实现1942年1月圣詹姆斯声明和1943年11月莫斯科声明提出的审判战犯的原则；坚持这些既定的政

策自然要比抛弃它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大三角中的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赞成决议，其结果是审判得以进行。他们既必须“忠实地执行法律的规定”,[125]又必须展示胜利者的无限权力。斯大林将实施审判作为显示他在苏联国内政治胜利的一件工具；没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取得巨大的国际胜利后会错过类似的显示力量的机会。斯大林毕竟是主要的受益者，因为在任何公平的审判中他本来可以轻易地在被告席中发现他自己的身影。

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波茨坦协定而创建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于1945年8月8日公布，即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两天之后。纽伦堡审判被预计作为以后在东京举行对日本领导人进行类似审判的参照物。

一旦起诉书被送达，纽伦堡公开审判就定于1945年10月20日开始。从那时起，司法大厦的审判大厅内，整个审判过程经历了403次开庭，最终宣读判决书则是在10个月以后的1946年10月1日。以英国的杰弗里·劳伦斯（Geoffrey Lawrence）爵士为首的四强盟国法官及其副手们坐在一边。到庭的21名被告，全都申明自己无罪，他们在严密的武装看守下坐在法官对面的被告席上。四大国的公诉人——美、英、法、苏各一名，与他们的副手和随员，连同一大群德国辩护律师、书记员和译员占据了审判大厅的中间部分。审判大厅上面的一侧被改建成了一个对公众开放的楼座。整个诉讼用英、德、法、俄四种语言进行记录。因而，参加审判的绝大部分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借助耳机听到同声翻译。

除了那些出庭的被告之外，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因下落不明而缺席审判，八个组织被宣布为集体犯罪组织——党卫军、保安警察、冲锋队、盖世太保、纳粹党的领导机构、帝国内阁、总参谋部、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对工业家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的起诉因其无法出庭而作罢。审判总计出示了4000多份文件，1809份宣誓书，以及33位活生生的证人。审判者们还放映了影片，出示了相当一批令人毛骨悚然的展品，包括“人皮灯罩”和像鹿头那样安放在木架上的人头。被告方面则提出了143位证人，以及成千上万份宣誓书。纽伦堡审判的文献汇编成43卷，于1946年出版。[126]

[1053] 美国首席检察官的公开讲演庄重地呼吁最高道德准则，同时也暴露出某种对法律不确定性的敏感。罗伯特·H. 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法官承认纽伦堡审判是“全新的和试验性的”。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爵士呼吁“法律至上”，M. De. 蒙东（M. De Menthon）呼吁“人民的良知”。鲁登科（Rudenko）将军谈起了法西斯主义恐怖下数百万受害者的“神圣的记忆”……和“所有热爱

自由的人们的良知”。通过争论，杰克逊很可能提出了一个最佳论点，即不接受以服从命令做理由为战争罪行辩护。“文明世界会问，是否法律如此滞后以致完全无助于惩罚这种严重的罪行……”[127]

在他们有限的授权范围内，审判十分得体而审慎地进行。通过对被告给予充分的礼遇和在必要时尖刻地斥责起诉方，英国上诉法院院长劳伦斯爵士为法官们树立了榜样。只有一次在对戈林进行交叉讯问时，杰克逊失去克制，使审判陷入混乱。一揽子式的裁决从来都是不可能的，而宣告无罪又总是可能的。

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针对纳粹党人的证据是确凿的，尤其是当那些证据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记录时。用于实施“最后解决”的死亡营，令人感到不可言状的恐惧的所谓的医学试验，史无前例的大量暴行被全面地、准确无误地载入文献。提供的最无力的证据是共谋罪，以及被告方很容易以主权国家通常的惯例为借口的那些证据。很难证实希特勒及其同伙的“秘密会议”形成了罪恶意图，或者具有侵略意图的重整军备是希特勒亲自策划的。无论如何，都不容许与盟国的作为进行直接比较。被告方不能列举凡尔赛条约或盟军轰炸攻势的弊端，也不能论及有关苏军暴行的题目。“我们是在审判主要战犯，”劳伦斯法官坚持说，“而不是审判起诉权。”试图对盟国拘留营的环境或正在发生的暴力驱逐德国人的情况进行的讨论被断然制止。1946 年 5 月 8 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被告方正试图援引盟国违反国际法的事例，但是检察官指出，如果这种行为被接受了，他将被迫出示证据予以反驳，而这并不会推迟审判。”[128]

苏联公诉人最先提出了卡廷森林大屠杀。当被告方律师能指出公诉人提出的许多事实属于捏造时，苏联代表团迅即打断了被告方的辩护。[卡廷]

纽伦堡审判的目击者们回想起许多充满戏剧性和冷嘲热讽的场面。有两眼发直的赫斯（Hess）坐在被告席上阅读戈林的虚构故事的具有象征性的场面。另一个稍逊一筹的轰动性新闻发生在 11 月，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未经宣布就加入了苏联公诉团，他作为 30 年代大清洗时斯大林的总检察长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观察员评论了审判庭中决定命运的沉重气氛与隔壁纽伦堡大饭店酒吧中充溢着灯红酒绿的欢乐气氛之间令人震惊的巨大反差。

美国安全人员出于对被告安康的考虑，为他们提供了两名精神病[1054]医生和一位心理学家。作为任务的一部分，心理学家准备对被告们进行智商测验：

沙赫特（Schacht），143 分；塞斯—英夸特（Seyss - Inquart）140 分；戈林（Goring），138 分；邓尼茨（Donitz），138 分；冯·巴本（von Papen），134 分；雷德尔（Raeder），134 分；弗兰克（Frank），130 分；弗里奇（Fritzsche），130 分；冯·席拉赫（von Schirach），130 分；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129 分；施特尔（Keitel），129 分；施佩尔（Speer），128 分；约德尔（Jodl），127 分；罗森堡（Rosenberg），127 分；冯·牛赖特（von Neurath），125 分；冯克（Funk），124 分；弗利克（Frick），124 分；赫斯（Hess），120 分；绍克尔（Sauckel），118 分；卡尔滕布鲁纳（Kaltenbrunner），113 分；施特赖歇尔（Streicher），106 分。[129]

当判决宣布时引起了一阵惊讶。银行家沙赫特、宣传鼓动家弗里奇、前任副首相冯·巴本被宣告无罪。帝国内阁、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也被宣告无罪。邓尼茨、冯·牛赖特、冯·席拉赫、施佩尔和赫斯分别被判处从 10 年到终身监禁不等的徒刑。戈林被认定为“侵略战争的领导者”，被判犯有所有四项罪名。他同另外 10 名被告被判处绞刑。苏联公诉人对所有无罪和监禁的判决都持反对意见。罪犯中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即将实施的绞刑做出反应。约德尔抱怨说，“我不应该受到那种惩罚。”里宾特洛甫说，“我将不能写下我美好的记忆。”汉斯·弗兰克说，“我应该被判绞刑，我想到了会被判绞刑。”[130]当心理学家询问赫斯他应该得到何种判决时，赫斯回答，“我没想过。可能是死刑。我不想听。”[131]戈林借助藏在牙套中的氰化钾自杀，躲过了刽子手。

对 10 名被告的处决于 1946 年 10 月 16 日在监狱的健身房执行。多数死刑犯临刑时都说了些爱国的话。弗兰克喊道，“德意志高于一切。”施特赖歇尔大声喊道，“希特勒万岁。1946 年普珥节（Purim）布尔什维克将绞死你们所有的人。”当时这给他妻子留下了好印象。据传说，美军刽子手们在行刑时手忙脚乱，拖长了犯人的死亡时间；随后，尸体被送到达豪（Dachau）火化。五名活着的罪犯被送往柏林附近的施潘道（Spandau）监狱，四强国在那里设置了管理人员，直至赫斯于 1987 年不可思议地死亡后才撤离。

这次审判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纯粹的政治上的担心表现为害怕被告会变成先烈。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审判揭露出来的事实真相激起了人们对纳粹战犯愈益强烈的反感，这足以抵消任何具有象征性的逆流。如果存在普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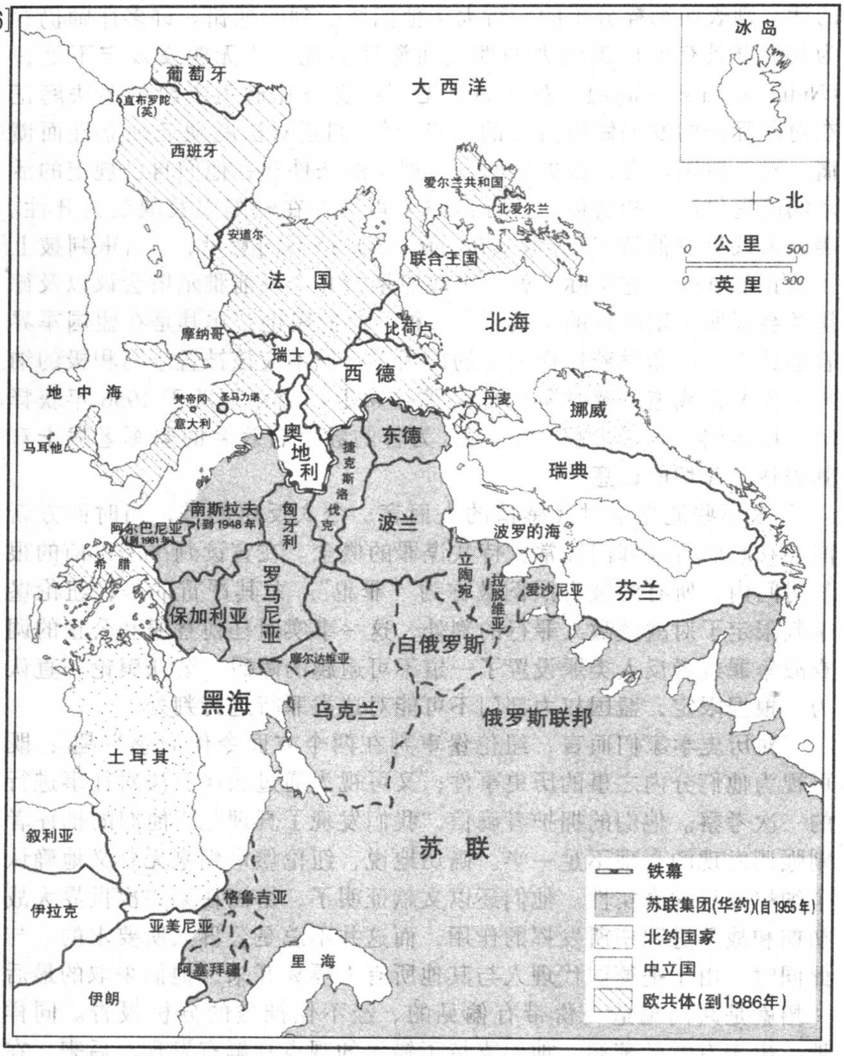
的话，则表明纳粹分子的罪行大于他们所受到的惩罚。许多律师仍然为起诉书具有事后追溯力的性质而深感担忧。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 poena sine lege）。对立的意见不接受杰克逊关于纽伦堡法庭正在对国际法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论点。[132]他们还对法庭缺乏独立性而愤慨。对于盟国而言，根据他们自己规定的条件和在他们自己规定的活动场所提供法官和公诉人，导致整个审判存在缺陷以及缺乏公开性。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持不同意见，“当审判披上[1055]了公正的外壳，它实际上就成了政府推行几个月前雅尔塔会议以及德黑兰会议所决定政策的工具。”[133]一种广泛的舆论，尤其是在盟国军界普遍认为，像邓尼茨这样正直的德国军官们不应该被置于与积极的纳粹分子戈林或施特莱歇尔同样的被告席上。当邓尼茨于1956年获释时，以美国元帅尼米兹（Nimitz）为首的数百名著名的盟军老战士对其表达了深切的歉意。[134]

对那些能克制时代感情的人而言，令人反感的是，当时西方新闻界和政府行政部门经常支持共谋罪的概念。在宣读判决书以前的很长时间内，所有的被告照例被称为“罪犯”。尤其严重的是，纽伦堡审判限定了对战败敌人罪行的判处，这一事实对任何普遍和公正的调查战争罪或者反人类罪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公众舆论一直认为，根据限定，盟国权力部门不可能对这类罪行进行判处。

对历史学家们而言，纽伦堡审判在两个方面令他们感兴趣：既可视为他们分内之事的历史事件；又可视为通过法律方法对往事进行的一次考察。他们的拥护者确信“我们发现了真理”。[135]他们的批评者则强调发现的真理不足一半。确切地说，纽伦堡审判毫无疑义地确认了纳粹罪行的真实性。他们还以文献证明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和战争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这并不总是公诉人所要求的。与此同时，由于把德国代理人与其他所有人隔离开来，他们采取的最后一招就是共同编造一份带有偏见的、经不住推敲的分析报告。同样地，出于有意的疏漏，他们支持了错误的观点却鲜有发现。后来，在最后判决前的起诉书中列举的历史材料意在明确显示国际军事法庭感兴趣的问题。然而，对这些历史材料的刻意选择，令纳粹主义最激烈的反对者都感到失望。例如，虽然提到纳粹德国与苏联的条约，但仅仅是在德国违反的条约类别中一带而过，这是十足的误导。一位历史学泰斗在起诉书送达单人牢房那一天写道：“公布的起诉书读起来就像是一部由非历史学家写成的历史。”[136]

纽伦堡审判既是大量有根据的历史信息的来源，又是许多明显曲解历史的来源。审判靠着受到鼓舞的西方公众舆论得到支持，以及靠着把判决视为福音的苏联检查制度的支持，纽伦堡审判成为沿用了50

[1056]



地图 28　欧洲分裂，1949—1989 年

年的独特的“历史的同盟计划”堡垒（见导言）。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索尔仁尼琴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公开性”，舆论才开始认识到，纽伦堡审判的公诉人是隐瞒而不是揭露的老手。安德烈·维辛斯基以罕见的诚实证明了这个事实，当时他在纽伦堡举行的宴会上提议，为处决所有的被告干杯，“让被告们去死吧！”[137]他的西方伙伴们像往常一样没有理解这位俄国人。他们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过后才问是什么意思。

第12章

分裂和统一

欧洲的分裂和统一，1945—1991年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存在一种认为欧洲存在是不重要的强烈[1057]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并没有在人们心中产生安全感。欧洲大陆不久便分裂为小的政治和军事阵营，这些阵营的能量滥用了将近50年。特别是在东欧，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无效的劳动。只有很少的国家可以保持中立地位，而欧洲统一的建构一次次地被推迟了。

在让—保罗·萨特和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圈子内，完全可以找到这种认为欧洲不重要的情绪。这种情绪很快便在绝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中消失了，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种情绪又随着和平运动和反对核武器运动而复苏。在东欧，这种情绪掩饰了官方宣传报道中的乐观主义。直到1989—1991年发生"改革革命"（通过改革进行革命）时，一直在人民的内心深处处于主导地位。

有幸的是，对于那些希望医治创伤的人来说，欧洲的分裂帮助唤起了建立强大欧洲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战前就存在了，而这场运动目前已经在西欧壮大起来了。它首先作为一场争取改革国际关系的道德运动而展开，后来发展到经济合作的范围；它孕育着一个新的统一体的观念。在欧洲议会（从1949年开始）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相关机构（从1956年开始）内部，它建立了一个含有多种机构的复合体，这些机构在当初设计时，是用于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被欢迎进入这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组织中而不断扩大的。尽管如此，在几十年间并没有忘却整个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还有另一个可替代的前景。

在事件中，西欧证明自己无可比拟地比东欧更加充满活力。在美

国的帮助下，西欧迅速地在战后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并且为无可匹敌的繁荣事业确立了前进的方向。受到西德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榜样的激励，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的成员国在公布他们事业的成就方面没有什么困难。成员国的数量从 1956 年的 6 个增加到 1983 年的 12 个，而且有不少希望加入共同体的申请还在考虑之中。当克里姆林宫与它的僵[1058]化帝国合作得更加可笑时，在亚洲和非洲非殖民化的快速进程中，西欧的帝国主义权利由于争取一个融合的欧洲的新的前景而解脱出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下，西欧对苏联威胁的严密防卫越来越不可靠了。到 1980 年代后期，欧洲的运动看上去正在向成熟的境地发展，而与此同时，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了。

尽管有分裂，但欧洲的概念在东欧没有像在西欧那样活跃。苏联的极权政治在错误地推进欧洲理想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前苏联阵营国家的公民们对于西欧堆积如山的食品印象极为深刻。但是有种种理由可以相信：他们重新加入“欧洲”的渴望既有追求精神的成分，也有追求物质的成分。一位斯拉夫的教皇说，“欧洲有两个肺。直到它有一天用两个肺呼吸之前它是永远不会痛痛快快地呼吸的。”[1]

为达到欧洲统一所浪费的年代可以正好分为三个阶段。这些浪费的年代在战后（1945—1948 年）就开始了，当时同盟国的统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冷战（1948—1989 年）的 40 年间，这种浪费持续下来。这些浪费的年代随着戈尔巴乔夫（1985—1991 年）的莫斯科令人惊愕的统治的终结而结束。总的来讲，这段浪费的光阴可以说是从 1945 年 5 月 9 日的胜利日开始，直到苏联于 1991 年 12 月的最终解体而告终。当时，几乎欧洲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1945—1948 年伟大同盟的解体

欧洲的解体在二战结束时的事态中就表现出来了。正如斯大林正确地预见的那样，东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一定会根据占领军的立场而确立的。但是，欧洲的分裂并没有立刻形成。最初，取胜的同盟国忙于解决立即出现的难民、定居和赔偿问题。他们不得不在建立一个德国和奥地利联合政府方面进行合作。斯大林小心谨慎地采取行动，在不同的首都实行不同的政策。美国人在表明他们的意图方面也表现得非常迟缓。

与 1918 年不同的是，并没有急于召开和会的要求。德国并不存在，所以无法与其签订条约；特别是斯大林，他不希望就他已经获得的巨大收益来重新进行谈判。因此，惟一可以召开的和会便是 1946 年 7 月至 10 月在巴黎召开的为解决五个小战败国——意大利、罗马

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问题的会议。会议的议程是由同盟国外交部长委员会确定的，正是这些人最终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条款，所有战败国都必须割让领土。意大利失去了在非洲的所有殖民领地，但保留了南蒂罗尔。所有的战败国都必须，主要向苏联和南斯拉夫，支付巨大的、总额达 12.5 亿美元的赔偿。不顾苏联的反对，会议坚持把多瑙河定[1059]为国际河道，把的里雅斯特作为联合国管辖下的自由港。

在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领土公开地分裂了，而的里雅斯特保持高度紧张状态达七年之久。包括港口和城市在内的 A 区由英国部队占领；东边的 B 区由南斯拉夫人占领。这种分割最终于 1954 年 10 月被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协议所接受。（见原书附录Ⅲ，第 1313 页）

战后欧洲面临大批难民。纳粹和苏联人都对难民重新进行放逐和把他们作为奴隶来使用。仅在德国就有 900 万这类难民，他们住在原始的、拥挤不堪的和刚刚由战俘腾空的棚屋中，人数最多的一批难民是从刚刚由苏联红军占领的国家逃出来的，由于害怕受到红军的惩罚，他们拒绝回到祖国去。他们由联合国难民救济署管理，并且慢慢地被作为无偿的工人分散到西欧的各个工业中心，而后又作为移民被送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最后一批移民直到 1951—1952 年才离开欧洲。

大批军人也处于困境之中。甚至西方大国在同盟国一方作战的军队也没有做好准备。例如，由安德斯将军领导的、打到意大利北部的波兰军队拥有几十万人和家属，他们的家乡被苏联军队占领了。1946 年，他们不得不被带到英国，在那里他们被编入波兰重组军团进行重新训练和同化。[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意大利，前加利曾党卫军（Waffen SS Galizien）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些在战前是波兰公民的人想方设法来到英国，而没有交给苏联政府处置。但是大多数前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人员就不那么幸运了。被苏联俘虏的德国战俘被送到古拉格，在那里他们的经历与苏联在德国的战俘的经历大体相同（幸存者在 1956 年被遣返回国）。

西方联盟意识到共产党对从西方回国的人采取的粗暴行动。但是苏联基本上坚持要求强制驱逐所有应斯大林的要求而回国的公民和军人。第一批被英国军队在诺曼底俘虏的前奴役劳工于 1944 年 10 月被秘密从利物浦海运至摩尔曼斯克。1945 年 9 月当很多苏联公民在被遣返前选择进行集体自杀时，奥地利爆发了激烈的反抗活动。如果集体自杀行为没有被制止，前哥萨克兵团的几十万人和大批克罗地亚人肯定将面临死亡。[3] ［**基尔豪尔**］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可以吹嘘他们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战俘的。对美国在 1945—1946 年的政策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管理上重新为在西欧关押的德国战俘

进行分类，为的是能绕过日内瓦会议的审查，而其中绝大部分很可能由于被忽视而死去。[4]

[1060] 在波茨坦讨论的交换战俘的工作从1945年秋天开始生效。至少有900万德国人离开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家乡。毫无防备能力的人成为该地区实行报复的牺牲品。共产党秘密机构把以前的纳粹集中营作为集中关押犯人的中心。虐待被关押的人是家常便饭。为死去的人而鸣响的丧钟敲响了几十万次。糟糕透顶、拥挤不堪的运输工具直达英国和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域。乡间的"与被放逐者相关的人"成为战后政治中一股强有力的反共势力。西德很多奇迹中的第一个奇迹就是这些人被成功地同化了。[5]

在更靠欧洲东边的地方出现了人口补偿运动。后重新命名为加里宁格勒的空城柯尼斯堡被苏联军队重新占领进行移民，从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个飞地。大约200万到300万波兰人被允许从苏联吞并的省向西迁移。比如，被重新命名为弗罗茨瓦夫的布雷劳斯这座空城的大部分区域被从利沃夫逐出的波兰人占领，这些人来的时候，带来了全部大学、市长和公司以及自己的博物馆。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前德国占领区为最贫苦的国内移民提供了业已存在的房屋和就业机会。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西方大国决定不向德国施压来获得惩罚性的补偿。相反，苏联表示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苏联官方要求的补偿达到2000万美元。但是他们没有等到盟国内部的协商可能性的消失便采取了行动：从占领的最初时期开始，苏联军人组成的补偿小组到处拆卸和迁移工厂、铁轨、发电厂、牲畜及铁路和汽车车辆。单个的和集体的苏联掠夺者们肆意掠夺，根本不管是在德国的领土上，还是在终究会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统治的领土上。

在整个欧洲，人们想与战争年代纳粹的同伙进行清算。在一些情况下，清算是通过法律程序完成的。在受到审判和流放的人中有皮埃尔·赖伐尔（Laval）、吉斯林（Vidkun Quisling）、威廉·乔伊斯（豪豪勋爵）和蒂索（Tiso）神父。年迈的贝当（Petain）元帅虽然被判死刑，但是还是在耶岛度过了他的余生。在荷兰诉讼是最完善的，大约20万被怀疑的同伙被扣押，在比利时扣押了634000人中的57000人受到判决。而在奥地利，9000人受到审判，35人被判处死刑。尽管通常审判的工作是由他们自己来处理。在意大利成千上万的法西斯分子被处以私刑，或被效忠派枪杀。在法国，在一次野蛮的报复浪潮席卷过后，至少1万人被杀害，而且借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西德，一旦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审判结束后（见原书第1048—1054页），解除纳粹控制的进程缓慢地展开着；对战犯的审判从50年代末开始。

零星地对党卫队军官、雇佣劳改犯的人和集中营人员的审判一直持续到60年代。但是，绝大部分的大鱼溜掉了：900万前纳粹分子，简直是太多了。

在东欧，共产党人把大清洗作为他们自己消除反对派的借口。几[1061]个重要的纳粹分子和合作者是很好的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赫斯于1946年在波兰受到审判并被绞死。另外，很多军官是可以幸免于难的，如果他们同意叛变的话。比如，波兰法西斯阵线（Falanga）的头目作为共产党支持的伪天主教组织（PAX）的头目于1946年从苏联的监狱中放出。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被冠以“法西斯分子”和“同伙”、被关押在共产党监狱中成群的东欧政治犯根本就不是这类人。纳粹战犯与抵抗纳粹运动的精华共住牢房的事并不少见。[6]克格勃为了镇压新一代的犯人，重新开放像布痕瓦尔德这种纳粹集中营。

无论如何，在混乱中，前第三帝国不得不受到管制。奥地利是立即被分离出去的。被缴械、缩小和解除军备的德国被分为五部分——四个占领区外加同样被分为四部分的柏林（见原书地图27，第1049页）。虽然在波茨坦公报中达成协议不能有德国中心政府，一批政府部门要求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重新开始经济生活。所有地方政府都属于由英国、美国、法国或苏联负责的委员会。在战后最初的两个冬天，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生存的问题上。德国的城市已经被夷为废墟，道路、铁路和桥梁都需要重建。无论如何要为5000万人中五分之一的难民解决食宿问题。

但是，德国政治确实在苏联占领区复活了。一个由莫斯科来的、由沃尔特·乌布利希（1893—1973年）率领的先遣小组在战争结束前就到了。当1945年12月地方选举结果表明，在苏联占领区的社会主义者得多数票时，共产主义者公开地突袭他们，逮捕他们的领导人，扣留供给卡。在苏联占领区搞的惟一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被否认了；结果是强制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合并。在1946年4月，已经成立的由乌布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统一党准备好要成立一个一党制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从1945年就开始发挥作用、由同盟国提议为争取德国“民主过渡”而成立的三个新生的全德国政党——科尔·舒马赫博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康拉德·阿登纳博士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联盟只能在西方占领的三个区域自由活动。

在波兰，共产主义的策划是特别显眼的。从1943年开始，西方大国便对他们的波兰盟国被钉上十字架不予理睬［卡廷］；在雅尔塔他们把波兰放在盘子里送给了斯大林。结果是一团糟。在1945年莫斯科审判前（见原书第1050—1051页），战时抵抗派的成员被大批逮捕；非共产党人受到无情地骚扰；错误的内战是与地下残余分子展开

的；雅尔塔允许进行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被一拖再拖。国[1062]家是由一个内务部官员瓦迪斯瓦夫·贝鲁特（1892—1956年）领导的，他伪装成一个“非党派”的领导。参加的一位伦敦波兰人代表没有任何权利。1946年6月举行的一次可疑的公民投票的结果，被有关得到凯尔采官方默许的怯懦屠杀的新闻所淹没。最终在1947年1月举行的选举显然是一种欺诈，美国驻华沙的大使立即以辞职来表示反对。[7]

但是直到这个阶段，斯大林的全面企图还不甚明了。如果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的行为是不好的——在南斯拉夫铁托血洗了其反对派，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西方最喜欢的儿子那儿，共产党人的做法就不那么坏了。贝奈斯（Benes）和他的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1886—1948年）仍旧在掌权。捷克的共产党人很受欢迎，他们看上去像是联盟的忠实合作者。在东欧的其他地方，政治形势让人迷惑不解。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阿尔巴尼亚在1946年、罗马尼亚在1947年也制定了共和国宪法。但是与德国有关联的巴尔干最后的君主们（他们大多与德国有关系）消失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悲痛。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响全面增长，但并没有被视为是反对法西斯时代同时的自然反应。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发展蓝图。

斯大林的谨慎是很容易解释的。根据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观点，苏联的名誉还是令人惊奇的好。苏联遭受了可怕的蹂躏，并且绝对需要一段时间的缓解。苏联吞并了2725000平方英里的外国国土，增加了2500万人口，同时需要时间对他们进行清洗并使他们能够适应苏联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苏联还没有原子弹。仅以此为由，与美国进行物质方面的冲突是不成熟的。最敏感的处理办法就是等待并观望美国是否会实施他们要从欧洲撤军的承诺。

美国的意见长期以来是有分歧的。国会有一个强大的院外集团，这个集团认为苏联的威胁被夸大了，应该让欧洲人自行解决欧洲问题。杜鲁门总统持相反的观点，他同意丘吉尔在富尔顿讲话时结尾的几句话“我们的苏联朋友们……对任何东西的赞赏也莫过于对强权的赞赏了”。因此，在两年间，美国采取了平衡政策。主战方的人不得不为倡导这个政策而进行每一分努力。苏联凌辱性的宣传本质、苏联同情者的颠覆活动、苏联执政者在德国的妨碍作用、苏联拒绝接受美国的经济议案和英国的建议的做法逐步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最终在1947年春天希腊爆发危机的第二天成功地迫使杜鲁门总统接受战略决定。美国的注意力被共产党在中国的节节胜利而吸引。

西欧共产党的力量由于反法西斯的胜利而大大加强。他们在法

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特别的抵抗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赞[1063]扬，选民中的四分之一支持他们。在1944年11月布鲁塞尔发生的共产党政变惨败之后，他们的战略是参加议会和联合政府。但是，不久在1947年意大利和法国的煤矿爆发的事先安排的示威浪潮，摧毁了和谐的统治。斯大林在西方的同谋者破坏了民主和经济复苏的进程。西方和苏联在德国的执政者的关系由缓和而变得不好，进而变得恶化。在德国没有共同语言；柏林存在分裂的双方相互敌视的局面。到1946年中旬，西方大国开始实现在波茨坦设想的联合的德国经济进程。苏联拒绝参与。在1947年6月由英美主持下成立的德国经济委员会支持三个西方占领区各行其是。

直到1947年，波斯（即伊朗）和希腊不得不由英国统治。但是，在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爆发的其他主要危机的压力下，破产的英国突然决定不能应付局面了。在波斯，议会决定反对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旨在让苏联军队从波斯的北部地区撤出，从而换得大量石油输出到苏联。面对苏联可能给予的回报，美国顾问被邀请到德黑兰。苏联和美国间新的一轮冲突正在酝酿之中。在希腊，1946年的5月，内战又重新开始。以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为基地，共产党的暴动向欧洲南部推进。英国对保护在雅典的皇家政权的开销直线上升；伦敦向华盛顿乞讨资金援助。美国非但没有准备从欧洲撤出，反而被要求承担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负担。全球大国权力的决定性转移即将发生。

杜鲁门总统对此事的反应是模棱两可的。在向国会申请对希腊和土耳其的400万美元的援助的同时，他阐明要制定一个新的、不可动摇的政策。他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是帮助那些武装起来的自由民族反抗武装的少数人和外部的压力”。1947年3月12日公布的这个杜鲁门主义，象征着美国已经自愿接受担当自由世界领导人了。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决定，并且保证美国军队可以在欧洲逗留一段时期。杜鲁门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被称为“遏制”——战后一种全新的封锁线。它与资深外交家乔治·凯南于1947年7月匿名发表的分析文章“苏联行动的来源”的内容是个巧合。它号召“针对苏联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熟练地和警备地使用反抗”。这纯粹是防御性的，离某些鲁莽者鼓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还很远。[8]

在这个关头，美国推出了一项慷慨的经济计划，从而推进其在政治上进一步介入欧洲的政策。在1947年6月5日，杜鲁门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公布了一个欧洲复兴计划。他说，“美国在为世界恢复健康的经济方面提供任何帮[1064]助都是合乎逻辑的，不这样做的话，就不会有政治稳定和令人满意的

和平。”与1920年代相反，美国根据共同利益向欧洲的复兴提供金融援助。马歇尔计划实施了四年，从1948年开始到1951年结束。该计划向16个参加计划的成员国提供了总共125亿美元的援助。为了能管理资金，马歇尔计划要求建立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组织要求接受援助的国家增加产量，扩大贸易，各自都能做出自己“相应的贡献”。尽管马歇尔计划款项的四分之一专门给了英国，五分之一专门给了法国，但是对盟国、中立国和前敌对国都给了援助。这在自我复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苏联把马歇尔计划称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欺诈。莫斯科拒绝参加，也命令它控制的国家不要参加。结果是，强硬的政治分裂由于明显的经济分裂而更加剧了。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利的西欧16国在稳步前进，而苏联及其依附国却陷入自己设计的孤立状态之中。

欧洲统一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见原书前言，第10页；第6章，第949—951页）。但是，建立独立国家的野心毁灭了任何朝着统一方向前进所作出的努力。欧洲人不得不在实现理想主义的梦想之前，咽下屈辱和失败的苦酒。他们在政府能够把与邻国和平相处放在首位之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帝国，放弃自己想称帝的愿望。

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道德尺度不是总能被记住的。对他们来说，国际的调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围绕着德国反纳粹运动的幸存者展开的，对于这些幸存者来说，1945年10月，在德国福音派教堂召开的斯图加特会议上由马丁·尼莫勒牧师制定的《罪恶的宣言》，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条令。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围绕法国的一些激进的天主教组织展开的。这些组织受到不抵抗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马克·桑尼耶（1873—1950年）的鼓舞，他的组织GRATRY社团直接可追溯到同拉梅内修道院长一条战线上。桑尼耶为“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状态的精神”而奋斗了30年。他是罗伯特·舒曼的宗师，在对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实施的政策有巨大的影响。1947年8月，联邦派组成的欧洲联盟召开了一个有50个组织参加的成立大会。另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在战后由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建人里昂内尔·屈尔蒂斯成立的牛津小组，以及在特别英国式的、活跃的、道德重建的反共运动中找到。

但是，在1945年当即出现的问题存在于英美政府的意图中。在西欧，伦敦和华盛顿在政治上处于优势。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构建新的欧洲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或实实在在地反对建立这种机构。但是他们两者都没有做。在国际合作领域，他们主要关注联合国；在政[1065]治方面，他们受到与斯大林的日益增长的冲突的牵制。他们对欧洲没

有特别的幻想。

但是，英美缺乏企图的状况也不是立刻可以看出的，在战后初期的年代中，丘吉尔个人的参与完好地预示着英国官方的支持。直到后来晚些时才显示出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工党与他的观点不同。它所能做到的只是鼓励讨论建立欧洲议会的问题（见下文）。工党的一个题为“欧洲统一”的小册子强调“英国的主权是丝毫”不能协商的。美国人也表示友好。作为贯彻马歇尔援助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看来是向欧洲统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只在1949—1950年当马歇尔援助用完时，美国和英国利益的局限才显现出来。

第一个认定欧洲发展方向的重要人物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7月英国大选中受到反对，欧洲最受尊敬的二战领袖从容地作出反应。他写道，“欧洲是什么？是一个碎石堆，一个尸骨存放所，是瘟疫和仇恨的繁殖地”。在1946年两次证明预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中，他所强调的观点在当时还不能被大众接受。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杜鲁门总统站在身边，他讲到“铁幕”：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经过斗争要建立的自由的欧洲。[9]

丘吉尔反对苏联有可能提早发动对西方的进攻的说法，但是他相信莫斯科企图进行“不确定的扩张”。他号召采取10年前反对纳粹德国时没有采取的“及时行动”。“从全球角度看”美国的态度“几乎是敌视的”。[10]在伦敦，《泰晤士报》怒发冲冠，声称“西方民主和共产主义之间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之处”。[11]

9月19日，在苏黎世，丘吉尔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他说，时间必须要短；原子武器的传播很可能不久就会使现存的分割更加严重。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如果我们要想组成一个欧洲合众国……”，他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12]“欧洲大家庭”的未来取决于“成百万的人决心做正确的事而不是错误的事。”因此，这个号召不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是道德的。《泰晤士报》对这个“鼓舞人的建议”嗤之以鼻。报纸评论说，“即使在西欧，也不可能建议谈得如此多的统一问题……已经来临了。”战后欧洲运动的创始人是为数不多的对丘吉尔的讲话表示祝贺的人之一。“你目前已经提出了欧洲的问题”，他写道，“政府再也不能无视这个问题了。”[13]

在这个阶段，丘吉尔的战略幻想设定要建立一个“兄弟般的协[1066]会”，这个协会由英联邦、“欧洲联盟”和美国三个相互关联的集团组成。英国将发挥“他们中间至关重要一环”的作用。他以把英国的外交政策立刻从3个不同的方面吸引到一起的方式，正确地分辨出相对抗的利益，这些利益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引发极紧张的关系。

丘吉尔的观点使他自然而然地当选为在1948年5月7日到10日私下成立的欧洲议会的主席。大约800名著名的应邀者要求讨论欧洲分裂问题。一个人数众多的德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康拉德·阿登纳任团长。文化委员会是由流亡的西班牙、作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Madariaga）首相负责。在他们的辩论中，他们意识到“超国家”的原则：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机构，需要各国放弃部分国家主权。丘吉尔的讲话暗示了最高的理想：

> 我们必须宣布使命并且设计一个联合的欧洲，其道德内涵将会赢得人类的感激，其物质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没有人敢于打扰她的宁静……我希望看到一个这样的欧洲，在那里每个国家的男男女女将认为：作为欧洲人就如同是他们本国国民一样，无论他们走到这片广阔领土的什么地方，他们将会感到“这就是我的家”。

德·马达里亚加愤怒的讲话也是同具雄辩力的：

> 必须诞生这样的欧洲，当西班牙人说“我们的夏尔特勒(Chartres)”（译者注：法国一地名），英国人说“我们的克拉科夫”（译者注：波兰一地名），意大利人说“我们的哥本哈根”，德国人说“我们的布鲁日”（译者注：比利时一地名），她将是……那么欧洲将要生存。为了生存，它将具有那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引导欧洲发明创造性的词汇：FIAT EUROPA（让欧洲来干吧）。[14]

欧洲议会毫无疑问被自己的热情弄昏了头脑。但是最终的宣言号召采取切合实际的步骤，例如创建一个欧洲议会和一个欧洲人权法庭；建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使现有议会的目标得以实施。后一个组织注定要获得“欧洲运动”的名称，这个运动确实是个先驱。除了丘吉尔以外，现有议会的名誉主席还有（法国的）舒曼，（意大利的）加斯佩里（Gasper）和（比利时的）斯巴克（Spaak）。他们现在不得不等着看哪个当权的政府会接受他们的想法。就苏联的不情愿而言，很显然他们只能希望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见下文）。

因此，到 1947 年年底，丘吉尔所说的铁幕变成了事实。三个事件扫去了所有悬而未决的疑团：创立共产党情报局（1947 年东欧共产党国家成立的情报局，用来交换情报——译者注）、布拉格的二月政变和对柏林的封锁。

1947 年 10 月苏联、东欧、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代表团在波兰登山胜地萨夫拉斯卡·波里巴（Szklarska Poręba）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其目的是协调兄弟党的战略。对于外部世界来讲，这个机构看起来疑似一个破坏性的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攻势——共产国际的复苏。

1948 年 2 月 25 日共产党在布拉格发生政变。捷克共产党与社会[1067]主义者曾在两年期间共同掌权；但是他们担心社会主义者得票数的增加，将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影响不久便会降低。他们参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同样意味着他们不能通过操纵来获得最高权力，如同他们的邻国波兰一样；所以他们依赖武力。武装起来的工人和民兵出现在大街上。谣传红军的驻军已经准备好要采取行动。非共产党的政治家们被逮捕，他们的政党被解散了。扬·马萨里克被从他的办公室窗户中扔出摔死。共产党的头目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说："如同用一把利刀切一块黄油。"贝奈斯（BENES）总统和往常一样，没有反抗。10 年中，东欧最具希望的民主在没有开枪抵抗的情况下已经两次遭到破坏。西方被吓住了。由于害怕苏联的进攻，五个西欧国家结盟 50 年，为经济和军事合作做准备。1948 年 3 月 17 日由英国、法国和比荷卢经济联盟组织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是目前已经冻结的新的安全结盟的前身。

最终的一击打向德国。德国经济委员会正在准备一个新的计划。关键的议案设想一个激进的货币改革，包括用 10 个旧的帝国马克交换 1 个新德国马克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联邦银行的前身）。苏联的特派员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什么也没有得到。1948 年 3 月 20 日，他和他的助手们离开了联合管制委员会，再也没有回来。大联盟解体了。

斯大林已经到了抑制不住的程度。苏联的外交在说服美国人离开欧洲和防止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进一步联合方面都失败了。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西欧只能在实力方面有所增强。所以俄国熊咆哮的时间已经到来。苏联军队不能冒险进行直接的进攻，但是它可以显示出对容易受到攻击的和极为象征性的目标——柏林城抓住不放。在 1948 年 4 月 1 日苏联巡逻队开始干涉在柏林和西方占领区之间的走廊地带的交通，但是没有任何结果。6 月 18 日开始使用德国马克和联邦德意志银行。根据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是侵略行为；在 24 日，苏联

军队把柏林整个封锁了，保护他们的占领区不会受到德国马克的侵害。德国的首都被封锁了，而且将会被封锁 15 个月。冷战已经开始。

西欧，1945—1985 年

给战后西欧下定义并非难事：它由未被苏联红军占领、未被共产党控制的国家组成。但是，这些国家属于两个不同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由中立国家组成，它们游离于那个时代的各种军事和经济组织之[1068]外；另一个较大的集团，其国家要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或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要么同时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见原书附录 III，第 1335 页）。

也可以用这个事实来区分西欧：1945 年它仍然是世界殖民帝国的大本营。的确，除了不属于传统殖民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的美国和苏联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殖民大国不是西欧国家。德国在 1919 年已经被剥夺了海外殖民地，意大利在 1946 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英国、荷兰、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却大多完好无损。在战后初期的几十年间，这些帝国的瓦解构成改变欧洲面貌的基本要素。由平等的、民主的伙伴组成的一个新的欧洲共同体的出现，非殖民化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许多欧洲殖民主义者希望能够保留或重组其殖民帝国。丘吉尔说："我没有当国王陛下的首相，是为了主持清理大英帝国的事务。"但他后来还是当了首相。

到 1945 年时，维持欧洲的殖民帝国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原因有很多。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殖民地人民中的精英分子很多都在欧洲受过教育，接受了民族主义和宗主国的民主观念，而现在正在大声疾呼要求独立。在战争期间，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已经削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制修复这种联系；也没有人愿意保留这种一个种族凌驾于另一个种族之上的制度。西欧所依赖的美国显然反对老式的殖民主义；联合国也是如此。帝国主义不再是可行的或是受尊敬的了。主要的问题在于帝国主义者是顺应变化的潮流，或是力图逆潮流而上。能够揭示这一时期东欧和西欧鸿沟的最好东西莫过于此。此时苏联正在扩大和巩固自己建立在东欧国家之上的帝国，而西欧的帝国政府却正在急切寻找拆除自己帝国的办法。由于某种原因，欧洲帝国主义的这两个方面很少被放在同一题目下讨论。

非殖民化的过程极其复杂，而其复杂性的诸多方面源于欧洲之外的情况。但是每一个殖民帝国都有自己的特质；每个殖民帝国拥有不

同的领地，从自治领到殖民地和托管地；而且每个帝国拥有不同程度的军事力量。在战争期间，除了英国和葡萄牙，所有的殖民大国都曾在战争中战败过、遭到占领，然后从弱势地位重新起步。

曾经占领过比大不列颠本土约大 125 倍的大英帝国，现在已经进入一种先进的变革状态。自 1931 年以来，所有的“白人自治领”已经全部独立；其他许多领地正准备自治或由地方统治。1945 年，英国殖民办公室的 25 万雇员中，仅有 6.6 万人来自英国本土。以印度[1069]为例，这个拥有 4 亿人口的次大陆，因为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决定给予印度无条件的独立。1947 年 8 月 15 日，当拉杰（印度王公）目视英国国旗最后一次降下时，英国最后一任总督在德里行礼致敬。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都获得了独立。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许多次大屠杀，但没有一次是直接针对英国人的。

一些小殖民地却引发了大麻烦。1948 年 5 月，在经历了多年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和阿拉伯反抗分子的暴力冲突后，英国把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交还给联合国。在马来半岛，共产党的起义从 1948 年到 1957 年持续数年之久；在塞浦路斯，1950 年到 1960 年爆发了反对埃奥卡（Eoka，希腊语“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译者注）的战争；在肯尼亚，1952—1957 年出现了反对英国统治的矛矛党人运动；在埃及，斗争在 1952—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达到了顶点；在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有 1959—1980 年针对白人的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事件。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争取独立的和平行动始于 1957 年的加纳和 1960 年的尼日利亚的独立运动。运动结束时，几乎所有的英国前殖民地都加入了英联邦——一个最初为自治领而成立的志愿机构。1961 年和 1973 年，南非和巴基斯坦相继脱离英联邦。截至 1968 年，英联邦事务部仅有的行政管理功能也分阶段移交给外交部。1973 年英联邦特惠税制终止。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解体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荷兰殖民帝国所占的领土比本土大 55 倍，但它不堪一击，一下就解体了。从 1941—1945 年日本人占领东印度群岛后，荷兰人再也没能有效地夺回控制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于 1950 年宣告成立。

比法国本土大 19 倍的法兰西帝国在痛苦中死去。其殖民地的许多居民拥有完全的法国公民资格；而北非的一些省，因为居住着大量的法国人而成为法国大都市的一部分。法国政府在战争中受到羞辱，因而觉得不得不宣称他们拥有的权力，加上他们掌握足够多的军事力量，这些都使他们为最后的失败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突尼斯和摩洛哥于 1951 年安全解决，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权也顺利交出。但在印

度支那，法国与越共进行了八年的战争，直到1954年5月的奠边府灾难才迫使巴黎把它移交给鲁莽的华盛顿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残酷战争进行了八年，它摧毁了第四共和国，最后以戴高乐将军1962年5月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做出让步而告结束。由于全力应付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已经让它的其他非洲殖民地先行独立。

1960年，当刚果试图效仿他的前法国殖民地邻国时，78倍于本土面积的比利时帝国崩溃了。此次运动毫无准备，加丹加省的脱离引发了内战，夺去数千人的生命，其中包括苏联人所支持的运动负责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和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

[1070] 葡萄牙帝国寿命最长。23倍于葡萄牙的安哥拉直到1975年才和莫桑比克及果阿一起脱离宗主国。

欧洲所有前殖民地除了一个之外全都获得了自由。1945年，多德卡尼斯群岛从意大利手中归还了希腊。1964年，英国允许马耳他独立。只有一些小的殖民地仍然没有独立，包括面临西班牙接管危险的直布罗陀，引发1983年英国—阿根廷战争的福克兰群岛（英国），法国的核试验基地马克萨斯群岛（法国）。香港（英国）应于1997年归还中国，澳门（葡萄牙）应于1999年归还中国。

非殖民化对前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几乎与对前殖民地的影响一样深远。过去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地位下降，与其他欧洲主权国家平起平坐，从而为后来的联合减少了障碍。它们丧失了许多传统经济利益，尤其是便宜的原材料和已经获得的殖民地市场。但是它们也摆脱了保护和管理那些遥远属地的包袱。它们都与亚洲和非洲人民保持了很强的文化和个人联系，后者可以输送大量的志愿移民加入“老国”的劳动力大军。在后帝国主义时代，来英国的加勒比人或印度次大陆人，来法国的穆斯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帝国的种族问题也随之引入这些国家。

东欧以既惊讶又羡慕的复杂心态看待西方的非殖民化。官方宣传部门发现，要庆祝那些遥远大陆上的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自己又不给一个说法是很困难的。普通民众想知道为什么可以给阿拉伯人、越南人和刚果人如此多的报道。知识分子则想知道为什么非殖民化对他们不适用。为了得到这些自由，他们不得不等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时代（见下文）。

·

杜鲁门主义一旦公之于众，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机构来协调美国卷入欧洲防务与安全的事务。苏联封锁柏林仅仅是让此事显得更加紧迫。1949年4月4日，西欧九国的外交部长加入美国和加拿大的行列，签署了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

在某种意义上，北约可以看作是过去大联盟的一个替代品，同样都以始于 1941 年的英美合作关系为中心。首先，较早的布鲁塞尔签字国与英美及意大利、葡萄牙、丹麦、爱尔兰和挪威一道签约，以后北约又扩大到包括希腊和土耳其（1952 年）、西德（1955 年）以及西班牙（1982 年）。它由一个政治委员会—北大西洋理事会主持，理事会有自己的秘书长，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它的地区军事司令部，统帅海、陆、空三军，控制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通道，以及从北角到黑海之滨所谓“铁幕”的所有范围。它是“遏制”现在被看作对欧洲和平的主要威胁苏联的主要工具。它的使命延续了 40 年，而且取得[1071]了无可争议的成功。

北约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对柏林的封锁——它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成功。英美运输机依靠超级的空中优势，轮番给拥有 200 万人口的柏林城空运他们需要的燃料、食物和原料。空运需要 277264 个班次；在高峰时期，每分钟都有一架满载货物的飞机降落在坦佩尔霍夫机场。每天都有 8000 吨物资从天而降。到最后，在西德到处都可见到面向东方修建的许多飞机跑道，西方大国在德国的知名度直线上升。直到 1949 年 5 月 12 日他们解除封锁前，苏联人对此敢怒而不敢言。

那时，建立一个单独的西德共和国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早在前一年的 7 月，盟军指挥官就在法兰克福向州总理提出建议，要求建立制宪委员会，起草一部联邦宪法。德国的领导人原来坚持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对此建议态度很勉强；但苏联对柏林的封锁使他们不再犹豫。《基本法》在封锁结束的当周就得以通过；8 月举行了选举。康拉德·阿登纳以一票的优势当选第一任联邦总理。建都波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人口最多的西欧主权国家。

苏联人对此有某种回应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已存在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独裁制提供了正式的框架，东德于 1949 年 10 月成立，定都（东）柏林。西柏林仍是争议很大的被西方盟国占领的一块飞地，是成千上万难民赖以继续寻求西方自由的一个瞭望孔。对一个统一德国的记忆很快成为对往昔的一种回忆，从而迅速消失了。

西欧的政治生活重新开始，其基础是对自由民主的普遍承诺和对民族国家绝对主权的广泛信仰。在北欧、低地国家和英国，君主制幸存下来，但它仅以民族图腾的形式存在。战后初期，对英美民主的兴趣很浓厚，对苏联也很崇拜。对法西斯主义的深恶痛绝抑制了舆论的民族主义倾向，推动各政党寻求社会改革，使共产主义变得可以尊重的。比例代表制和多党合作的政府最为普遍。西班牙和葡萄牙未被卷入战争，是战前法西斯主义得以延续的仅有的国家。在西欧可以看到

三种普遍趋势：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磨难和共产主义的衰落。

战前，基督教民主主义常常具有教会和教士口吻的忏悔，如今它多掌握在中间偏左的前天主教的“左”倾中心之中，摆脱了被教会庇护的身份，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使其的“左翼”与天主教工会组织[1072]有联系，其“右翼”则不然；政党领袖持中间立场。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最初在德·加斯佩里的领导下，深受分裂之苦，后来逐步滑到形成一个民族组织的道路上。在法国，1944年在乔治·皮杜尔和舒曼兄弟的领导下成立人民共和运动组织，但却受到戴高乐主义主流派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挑战。在西德，阿登纳博士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逐渐以主要政治力量的面目出现。阿登纳是个旧式保守派，他喜欢的格言是“无须实验”。但阿登纳与社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路德维希·艾哈德是个成功的组合。荷兰是个例外，它的“天主教人民党”仍然保持了宗教团体的性质。英国也是一个例外，它根本没有一点基督教民主传统。

欧洲社会主义的分裂倾向尤为严重，而且深受共产主义常与之竞争之苦。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摆脱了战前的阶级斗争主张，转而强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权和社会公正。彼得罗·南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在天主教民主党和强大的共产党之间持中间立场。在法国，居伊·摩勒领导的法国社会党放弃了战前的教条主义，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弗朗索瓦·密特朗时代才获得成功。在西德也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戈德斯贝格计划脱离了它的无产阶级传统而走向反面，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英国工党也是如此，它是各种倾向交汇的一个“大杂烩”，在竞选双方旗鼓相当时投下决定性的一票。

西欧的共产党原先占据着优势地位，1948年后迅速衰落。他们一般都从莫斯科获得指示和财政支持，拥有一个与无产阶级基础极不相称的强大的知识分子派别。当斯大林的罪恶揭露出来时，他们逐渐分崩离析。只有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保存了实力，通常拥有20%—25%的选票，形成一个稳固的团体，致使其他所有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在意大利，共产党在地方政府里作用很大，成功地管理着像波洛尼亚这样的资产阶级城市。在法国，共产党在永远消失之前，于1980—1981年与社会党终于形成了“共治”之势。

战后法国政治划分为解放之后产生的第四共和国（1946—1958年）和其后的第五共和国。两个共和国都受到杰出人物戴高乐的强烈影响。戴高乐于1944—1946年任总理，其后失意退隐12年，1958—1969年复出任总统，并在死后留下永远的传奇。尽管戴高乐是个民主派，但他倡导强大的行政权力，而且是法国国家主权的坚定捍卫

者——他反英、反美，最初甚至反对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由于共产党人和布朗热极右翼分子的攻击和频繁而短暂的不可靠的联合政府，第四共和国陷入“政治瘫痪”。它平均每六个月就换一位总理。1947 年，第四共和国因为戴高乐派的法兰西人民联盟（RPF）获胜而暂时得到挽救，这届共和国以爱国团结的面目示人，却被印度支那事[1073]件、苏伊士运河危机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所摧毁。第五共和国成立于 1958 年，当时把戴高乐从科隆贝双教堂召回，去镇压阿尔及利亚的军官叛乱，这次叛乱已经具备军事政变的所有特质，并且可能蔓延到巴黎。第五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统独立于国民议会，权力很大，可以控制政府组阁。1968 年夏天第五共和国又爆发了严重危机，巴黎的警察和示威者在街头发生冲突；但它度过了这次危机。在戴高乐的继承者乔治·蓬皮杜（1969—1974 年）和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1974—1981 年）任职期间，以及 1981 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后，第五共和国都呈现出稳定和不断繁荣的景象。第四共和国的失败把许多法国政治家变成了忠诚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对第五共和国的过分自信导致了法国与欧共体委员会（见下文）的巨大分歧，并导致 1966 年法国从北约统一军事指挥机构中退出。

但在 1962—1963 年，戴高乐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他决定不仅要把法德和解作为法国政策的基石，而且要给予它制度上的保证。戴高乐在西德访问时恭维德国年轻人是“伟大人民的子弟”，他对比了“德国的深重罪恶和巨大苦难”，赞扬德国人民“富有勇气、纪律性和组织性”。他还德国人以自尊。1963 年 1 月，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订《爱丽舍条约》，与西德建立了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关系”。从此，法德合作的一项综合性计划由于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而不断巩固，它们在外交、防务、教育和青年等方面的全面合作计划，为西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坚强领导。[15] **[杜奥蒙特]**

战后意大利政治长期以来表现出与法国第四共和国同样的缺陷，但却没能产生一个像戴高乐那样的挽救它的人物。1946 年君主制解体后，对建立什么样的政权达成了一致共识，那就是植根于战后所有政府都有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利用市政和地区政治的活力，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复辟。国家政策的一致性与政府内阁的不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反天主教和反教士的左翼与保守右翼之间的分化，已经引发了许多暴力的发生。在 1978 年谋杀总理的恐怖活动和 1980 年波洛尼亚爆炸死伤严重的暴行活动中，红色旅恐怖主义达到顶峰。繁荣的北部地区，尤其是都灵和米兰，与黑手党控制的南方落后地区有很大的差距，后者似乎不受改革的影响。意大利经济在战后恢复很慢，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发展很快。经济成功抵消了政

治上的弱点。意大利是北约的积极分子，在地中海提供南部边界堡垒，同时为在那不勒斯的美国第六舰队提供基地。国内政治的弱势加强了意大利对欧洲联邦主义的信念。

[1074] 坦率地说，1949年后的西德政治并不令人兴奋，这也许正标志着他们的功效。1966年，在阿登纳和艾哈德领导西德17年之后，基督教民主联盟让位于联合政府，三年后维利·勃兰特（1969—1974年）和赫尔莫特·施密特（1974—1982年）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长期执政，1982年以后政权重新落入赫尔莫特·科尔博士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手中。宪法规定成立了独立于联邦政府的联邦银行，与此同时，各州的地方政府保留了很大的权力（其中一些州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前就存在了）。波恩的中央政府享有把权力集中在对内的协调作用和外交事务上的自由。在联邦议院，魏玛体制下的比例代表制得到修正，把素有争议的边缘政党的影响降到最低。在英国的建议下工会重新组织起来，结果比英国自己的工会还有效。尽管德国在加入北约后重新武装，但在防务政策上仍然依赖美国的领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见下文）带来了除繁荣外的稳定和威望，这对国家的复兴帮助极大。阿登纳一步一步地用德国的合作换取盟国的让步。1952年西德赢得主权国家的地位，1955年取得参加北约的资格，1956年取得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资格，1973年又加入联合国。此后，在一段时期内，西德的政治面貌受到大名鼎鼎的反核和平运动和倡导环保的“绿党”以及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主义集团的影响下出现了生气或受到了影响。西德与东德数十年的对抗在1970年的“新东方政策”（见下文）后有所改变，后在1990年的重新统一中取得胜利。多年来，西德被描绘成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这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历史的包袱无疑抑制了他们的自信，使许多德国人倾向欧洲联盟的思想。评论家们担心，一旦德国繁荣不再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德国的独裁已经失败了，”一位历史学家在1969年写道，“但德国的民主还没有得到。”[16]德国统一后同样的担心会重新出现。

战后的英国政治不得不应付一个与其传统身份认同迥然不同的国家。英国政治受到两党左右摇摆的议会制和停滞不前的经济活动的支配，最重要的是受到英国长期寻找后帝国主义角色的支配。1945年7月，工党在大选胜利后实行了广泛的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使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在接下来的50年里，三任工党政府共执政了17年，三任保守党政府（直到1992年）共执政了30多年。由于议会多数派近乎独裁的强大权力，每一届政府的执政纲领都被其继任者推翻。例如，受到工党政府支持的工会，其过分强大的势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受到保守党强烈反工会政策的颠覆。而混

合的"第三党"自由党人、八十年代初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自由民主党人试图结束无谓争斗的努力，一再地遭到失败。经济的不稳定表现[1075]造成信心的下降。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长期的货币主义政策(1979—1990年)选择独裁的簿记方式，从而给政府所及的所有领域规定了纪律。其结果也许并非是有意的，但却使中央集权达到不同寻常的程度，而把地方政府和地区的声音给淹没了。人们不记得许多英国机构很长时间未受损害；随着伦敦城出现的一系列有失体面的、分裂的小插曲，警察、皇室和英国教会下降的权威有所上升。英国社会加速分化：新"企业文化"的相对繁荣与城区及其绝望的下层阶级相对应，与教育水平的下降、与青少年犯罪相对应。国家的凝聚力也发生动摇：七十年代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分离主义在全民公决中得到检验，公决支持维持现状。但是从1969年起，发生在北爱尔兰的一场事实上的内战要求有更强的军事实力，并使各地的自治走到了尽头。苏格兰分离主义因为历届保守党政府的英格兰中心主义立场而重新兴起。直到强硬的撒切尔夫人下台，英国民主处于危险中的看法仍普遍存在。

然而，当大英帝国淡出视野时，英国的主要困境却是它不得不在与美国保持审慎的"特殊关系"和与其欧洲邻居加强联系之间做出选择。很自然的倾向是鱼与熊掌二者兼得：既给美国和北约充分的支持，又加入欧洲共同体。走运的话，英国既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又可以损失最少的国家主权和历史联系。但戴高乐将军识破了这个策略，并且阻止了它。在戴高乐将军死后，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才得以重新谈判成功。但在八十年代末，原来的困境重现，英国迟早要做出选择。英国顽固分子害怕联合王国会失去它的灵魂；而他们的批评者却认为，国内问题只有在欧洲范围内才能得到解决。[17]一些人对联合王国是否能生存到庆祝其成立300周年那一天心存疑虑。

法国、意大利、西德和英国这几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目前是西欧最大的国家。小国只有加入地区集团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从战时开始就在非正式地协调各自的政策；他们于1958年完成了比荷卢经济联盟。由于种族矛盾，比利时在1971年变成佛兰德、布鲁塞尔和瓦隆尼亚三个自治省的联邦式联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挪威和冰岛都是北约的成员国，再加上瑞典和芬兰两个中立国，它们都参加了1953年成立的北欧理事会。在国内政治方面，各国都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一般来说，国家越小，加入欧盟越是得失攸关。

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虽然比较边缘化，但消失得很慢。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直到1974年才被推翻。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直到1975年佛[1076]

朗哥死后才结束。在希腊，由于塞浦路斯的冲突而形成分裂局面，一个军人小团体在1967到1974年间攫取了政权。西班牙从法西斯主义到民主政体的过渡几乎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一个经济改革计划稳步消除了许多矛盾。国王胡安·卡洛斯复辟君主制为政治领导提供了重要来源；而且公众一致赞成西班牙加入西欧机构。美国的支持也是一个因素。结果，尽管马德里与布鲁塞尔的谈判过程很长，在关键问题上十分谨慎，但141项条款对西班牙198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来说足够了，此时西班牙加入北约刚刚一年。与那些令人沮丧的预言相比，最终证明这种所谓落后的经济构成的一体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西欧的文化生活是以政治气候、科技和大众传媒的自由，尤其是电视业的巨大进步和美国进口的冲击波为基础的。其作用体现在传统约束的放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国的特殊性。艺术与科学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多元主义观点成为社会的价值规范。

在哲学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和让—保罗·萨特（1905—1980年）的存在主义在战后风行一时，而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剑桥大学的奥地利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使其他所有哲学变得多余了。在法国，支持雅克·德里达（生于1930年）及其解构方法的信徒设想所有的理性主义思想都是可以被解构的，而且都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了二三十年，这导致了以葛兰西、卢卡奇和布洛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批评者之间引发的所谓的“大对抗”。最具破坏性的批评来自波兰前马克思主义者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生于1927年），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1978年）一书既是一本手册，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份悼词。欧洲女权主义者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年）一书中找到了自己的现代宣言。萨特曾写道，“他人即是地狱。”他的伴侣波伏瓦写道，“你并非生来就是女人，你是不得不变成女人的。”[劳塞尔]

对科学的尊重不断加强，这个十分美国化的特点影响了所有的研究门类。社会科学，即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对所有的老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最能取代这个时代沉闷倾向的替代品是由出生于奥地利的卡尔·波普（1902—1994年）提供的。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34年）一书推翻了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科学方法的假设。他认为，根据爱因斯坦的例子，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和永恒的，最好的建立假设的办法就是坚持这种寻找其判断错误的证据的做法。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1957年）摧毁了社会科学能阐明支

配历史发展的法则的自信。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证[1077]明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正当性，他很希望能活着看到自由民主主义在整个欧洲的胜利。

在艺术方面，潮流转而反对现代主义中的分裂倾向；“后现代主义”是新、旧背景的混合体。像萨尔茨堡、拜罗伊特和爱丁堡这样的国际艺术节打破了国界。

大众传媒的发展日新月异。在一个几乎大家都识字的时代，自由的新闻业十分繁荣。像英国《泰晤士报》、法国《世界报》、意大利《晚邮报》或西德《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有质量的大报都有一些流行杂志、低俗小报加盟，从六十年代起还有合法的色情刊物加盟。影院、电台和声讯技术大大扩大了受众面，开创了诸如有形音乐剧这样的新艺术形式。但是，没有什么能与电视的影响力相比，电视于1944年12月在法国开播，在英国始于1946年，在西德始于1952年。

美国的影响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尤以好莱坞电影、歌舞剧和时装为甚。年轻人都穿着中性化的牛仔裤，模仿电影明星或摇滚歌星扭着身子迈着小碎步走路，其时尚和“大众文化”，完全跨越了大西洋，而且是大都市式的。在一个习惯了不加约束的商业广告的社会，人们担心“媒体就是信息”，换句话说，担心会习惯于相信任何事情。北约的通用语言——美式英语、科学和“大众文化”作为国际交流的主要工具，都是不可能抵制的。在法国，法语中的英语外来语是受到官方谴责的；但所有西方国家逐渐接受了把教英语和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作为教育和文化的首选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毫无头脑的物质主义被看作是最阴险的美国舶来品。尽管谴责美国人把欧洲人降到了经济动物的水准是不公平的；但是维利·勃兰特的话还是代表了在这方面的广泛看法，他说，“我们都想成为美国人吗？”

战后社会生活远比以前宽松和平等。战争扮演了大的测量器的角色：过去的阶级、职业和家庭出身的等级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像在美国一样，人们的流动性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有保证，财富和收入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在大众中，汽车和家用电器迅速普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绝大多数的西欧家庭包括工人阶级在内，都有汽车、洗衣机和冰箱，夏天有能力到地中海的海滩去度假。而东欧却只有羡慕的份儿。同时，提供大量补贴的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使财富实现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再分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数百万农民成了相对富裕的农场主。落后的农村，尤其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农村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和机械化。

大量的结构性的变化对社会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福利国[1078]

家”——如提供大量服务的英国国民保健服务（1948年)、西德养老金计划或法国的廉价房项目——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如疾病、失业、无家可归和年老等。但“福利国家”也使人形成心理依赖，变得麻木迟钝，指望国家给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它不能消灭贫困现象，在富裕社会里贫困显得尤其苦涩。提高工资把大众转变为“消费者”，在咄咄逼人的广告和社会攀比的压力下变成大买家。消费主义当然为经济提供了动力；但它把物质进步视为目标，而不是手段；它有把政治降格为对物质供应的争吵的危险；它告诉年轻人，只有财富能带来成就感。它把令人眼花缭乱的物品放在人们眼前，所以这种唯物主义比东欧共产主义宣传所倡导的唯物主义更为有效。

一般人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避孕药，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提供了方便，而“性解放”则迅速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它消除了婚外性行为、私生子、同性恋、离婚和未婚同居的社会羞耻感。在多数国家，它伴随着同性恋的公开化、不再歧视同性性行为、放松色情和猥亵的法律以及堕胎的普遍合法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变种，如丹麦和爱尔兰。而且，“性解放”尤其在天主教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认为他们关于婚姻、家庭和爱情的基本价值观受到威胁。

宗教生活严重衰落。战时的恐惧和战后的物质主义摧毁了许多人的信念。去教堂做礼拜不再是社会习俗，而成为家庭和个人的私人爱好。无论是市中心和城郊的工业区还是农村，冷冷清清的教堂里，既没有教徒，也没有固定的教士。无论是信奉国教的英格兰还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500年来，基督教第一次成了少数人的宗教。

对此的一个反应在于泛基督教主义。从1948年起，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自愿合作的宗旨下召集主要的国教会和东正教会参加。它的最高理想并不总能免受低级政治的影响。

最初罗马天主教会态度冷漠。五十年代，在工厂里活动的一个法国小教派“工人—牧师”遭到梵蒂冈的镇压。但是，激进人道主义者红衣主教龙卡利升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958—1963年)，则标志着向全面改革的转变。他的教皇通谕《人世和平》(Pacem in Terris) 写给所有信教的人，而《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 显示了对世[1079]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他召集的第21届普世教会泛基督教委员会大会，即“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掀起了自30天追思弥撒委员会以来最激进的方向改变。

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其四个会期从1962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65年12月，被标榜为“反宗教改革的终结”。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

斗争中，许多改革计划被取消或否决：修改并通过了不再谴责犹太人为杀害耶稣的罪人的宣言；而赞成现代生育控制方式的提议没有得到通过。但是罗马教廷的权力受到钳制；强制的特伦托公会的拉丁文天主教弥撒将被本国的礼拜仪式所取代；从未取得教廷公职的主教被授予更大的责任；关于通婚的限制放宽了；正式承认了泛基督教主义。最为重要的是，新的、开放的、灵活的精神得到解放。

在一些天主教的新团体里，“天主事工会”（Opus Dei）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天主事工会”（Opus Dei）于1928年由西班牙牧师麦格·何塞—马里亚·埃斯克里瓦·德巴拉格尔（1902—1975年）创立，在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放权给非公职主教的过程中，它起了特殊的作用。当它的创建者以破记录的速度被封为圣者时，它却被批评者视为教会中邪恶的非理性力量。而对它的信徒而言，它是一场无可指责的精神再生运动，尤其对青年人而言。

约翰二十三世的两位主要继任者继承了他发起的运动。保罗六世（红衣主教蒙蒂尼，1963—1978年）是自拿破仑驱逐了庇护七世后第一个离开意大利的教皇。他的教皇通谕《人类的生命》（Humanae Vitae）重申禁止避孕，使自由派大为沮丧。但是他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朝拜，拥抱东正教的领导人的活动却成了里程碑。他还对英国国教和路德教会进行了有限度的接近。约翰·保罗二世（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1978年当选）给教会的议程增加了巨大的魅力和活力。他是一个演员、语言学家和非凡的观光旅行家，他把教皇的权力带到全世界。1981年5月，在圣彼得广场，一个可能由克格勃雇佣的土耳其恐怖分子企图暗杀他，但他逃过了此劫。约翰·保罗二世固执地反对“自由神学”、生育控制和教士的无纪律，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激烈的传统主义者。瑞士神学家汉斯·孔教授（生于1928年）质疑教皇永无谬误的教条，被教皇终止教职，引起许多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忧虑；教皇在通谕《辉煌的真实》（Veritatis Splendor）（1993年）中总结的有关道德哲学教义的断言，则冒犯了这个领域的许多“相对论者”。但是他的视野仍然宽广且富于同情心。在西方，他步入了坎特伯雷英国国教会教堂；而且在爱尔兰亲自祈求和平。在东方，他在自己的祖国波兰发挥了重要作用，纯粹靠个人力量和对人权的支持来削弱共产主义。他援助受迫害的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东仪天主教徒；他还宣布尊重东正教。对于被困在苏联集团的人，他证明自己是来自西方的最可靠的希望之光。尽管遭到俄罗斯东正教的反对，他们联合抵制他的欧洲主教宗教大会（1991年），但他仍努力把东方和西方连在一起。他一直尽力致力于基督教欧洲的统一。

[1080] 跟预期相反，西欧人口在战后的增长远比战前快（见原书附录III，第1332页）。富裕没有阻止人口的增长。战时人口的损失很快就被战后10年的婴儿出生热所弥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6个国家的人口从1940年的2.64亿上升到1966年的3.2亿，1985年更达到3.55亿。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瑞士，其出生率也最高：在1959年到1985年间，瑞士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法国的人口恢复更是惊人：它的人口稳定在4000万人几乎有一个世纪，但在1985年达到了5520万，拉近了与英国和意大利的差距。西德不久也成了人口最多（1985年6110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出生率在60年代以后再度下降，造成以后几代人多寡严重不均的现象。但是死亡率也在稳步下降。这对年龄结构造成影响。难民和移民在德国、法国、英国的人口增长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战前的欧洲以中年人居多，而在战后，老年和退休的人群不断增加。农业人口大幅度下降，到196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的农业人口只占人口的17%。

西欧最大的成功在其经济领域。1948年后西欧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规模在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它是如此的不可预料和成就辉煌，以致历史学家们很难就其原因达成共识。描述它远比解释它容易得多。很明显，它要归功于马歇尔援助开的好头，归功于后来与美国的相互影响，归功于自由民主主义的氛围，这种氛围十分青睐不受拘束的自由企业制度。也应该把它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动力、运输和劳资关系的巨大变化联系起来考察。

马歇尔援助实际上是启动欧洲经济发展的举措，在战后初期欧洲的复兴岌岌可危时，它提供现金以维持欧洲的贸易和工业。但是，马歇尔援助对如何启动欧洲经济发展并不感兴趣。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是一次输血，即给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提供复兴的能量。美国最大的几家企业早期都在西欧投资。杜邦、通用和后来的IBM都曾帮助建立跨大西洋的竞争。不久，欧洲许多大的跨国公司，如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电气和公用事业公司及尤尼莱维尔，都能投桃报李。

当代的经济理论与实践是欧美相互作用的产物。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凯恩斯革命认为，政府干预通过调节货币供应、利率、通货和税收可以在改善经营观念、保持充分就业以及控制周期性的危机方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久，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起来反[1081]对凯恩斯。西欧从一开始就参与了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美支持下创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次会议上凯恩斯是英国代表团

的负责人。会议成立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由联合国进行管理，但欧洲介入很深，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其他纯欧洲的机构相互竞争。在西欧与在美国一样，都认为民主政治对于有效地管理成功的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要件。

科学和技术迈入了一个受到大国和国际基金鼓励的时代。欧洲原子研究中心（1953 年）和欧洲空间研究组织（1964 年）是两个主要项目之一。国家预算不能满足生产诸如航天器这样的昂贵产品的需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代农业技术只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应用。1945 年，只有英国农民使用拖拉机；到 1960 年，连欧洲大陆最小的农户也能做到了。各种机械化、化学肥料和集约耕作方式接踵而来。英国和西德仍是食品进口国，而丹麦、法国和意大利成了出口大国。从六十年代开始，西欧就为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即共同农业政策的臭名昭著的“黄油山”、“葡萄酒湖”和巨大的“谷物山”——感到头疼。发电则从传统的煤转向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燃料，尤其是法国大量投资兴建水电站和核电站。七十年代北海发现的石油、苏格兰和挪威的天然气都减少了对外国进口的依赖。

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大日新月异。国营铁路网络实现了电气化和合理化。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创建于 1981 年的快速列车为例，法国很快就进入了超级列车的时代，只有日本可与之媲美。德国的高速公路也得到系统的扩大；它们成为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高速公路的典范。阿尔卑斯山隧道或英吉利海底隧道（1993 年）和像奥地利的欧罗巴布鲁克桥那样的巨型桥梁，拉近了在一个统一网络里的联系。拥有巨大运输能力的国际水道把莱茵河与罗讷河、鹿特丹与马赛连在一起。鹿特丹附近的欧洲要隘，是世界上最大的要隘，也是雄心勃勃的莱茵三角洲开垦计划的重点区域，于 1981 年完成了对洪水的控制。航空业的发展使西欧商人可以到他选择的任何一个欧洲城市工作一天，而不必担心不能当天返回。

后工业经济结束了依赖于重工业的定量生产状况。服务业以及包括超市和百货商场在内的新的零售业也成倍地增长。在经历了五十年代著名的经济增长后，欧洲的钢铁产业让位于电子、塑料和精密机床制造业。

这是强大的经济发动机的一部分。自从马歇尔援助启动这台发动机，它就开始加速。除了 1951—1952 年由朝鲜战争引起的停顿和[1082] 1957—1958 年这两次小的停顿，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显示出向上的轨迹。1951 年发表的《欧洲经济报告》预测，到五十年代末，工业生产的增长将达到 40%—60%。但这个目标不到 5 年就提前完成。1964 年的工业产值超过 1938 年的两倍半。1948—1963 年，西德的 GDP 年

均增长7.6%，意大利为6%，法国4.6%，英国2.5%。西欧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贸易，占世界贸易的40%。

西德的"经济奇迹"是西欧经济复苏的中心。与普遍的误解恰恰相反，西德的表现并没有超过它的对手。意大利的经济奇迹不比西德逊色；而且西德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欧洲大陆最高的。但是由于西德经济的总量和其中心地位，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成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它的起点太低，所以其心理影响作用很大。尽管有些部门仍然实行了国有化，但它的制造者艾哈德博士放弃了在法国和意大利颇受青睐的政府计划。其他则要归功于高效率的机构、大量的投资、健全的培训机制和勤奋的工作。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1948—1962年，西德外贸年均增长16%；汽车拥有量从1948年的20万辆飙升到1965年的900万辆；同期修建了800万套住房，足以满足一个小国的需要。失业率急剧下降，造成"外来工人"大量涌入，尤其是从土耳其和南斯拉夫来的工人。外资的投入在1961年达到了顶峰，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外资的进入。工业生产（1958年=100）的数据显示了在战争中受损最严重的西德如何在战后走得最远：

	1938年	1948年	1959年	1967年
西德	53	27	107	158
法国	52	55	101	155
意大利	43	44	112	212
英国	67	74	105	133
美国	33	73	113	168
日本	58	22	120	347[18]

进行比较的话，西德的GDP达到1150亿美元时，其GDP比苏联集团的所有东欧国家GDP的总和还要多。

西欧成功的经济复兴不可避免地会令人思考。如果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如此繁荣，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屏障被消除，那它们联合在一起会是多么繁荣？这种寻求统一的思想激发了步履蹒跚的欧洲联合运动获[1083]得一丝新的生命力。它不仅吸引了那些把经济联合看作最终目的的人，也吸引了那些把经济联合视为推动更基本的政治进程的手段的人。

一旦英国拒绝担当领导，那欧洲的领导权基本上就落到法国手里，这不足为奇。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同，法国人跻身于胜利的盟军之列；同时，他们不接受别人分配给他们的二等国家的地位。在这

种情况下，占主流地位的戴高乐运动中民族主义色彩稍弱的一派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历史机遇。1948 年 7 月 20 日，即将离职的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发表声明强烈支持欧洲联合。之后，莫内、舒曼和普利文都站出来迎接这一挑战。

经济学家让·莫内（1888—1979 年）以在科涅克负责家族的白兰地生意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 1920 到 1923 年，他是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1940 年，他向丘吉尔提议建立法英联盟。1947 到 1949 年，他负责法国全国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由好几个部管理。他热忱地相信全面的欧洲联盟——即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全面联盟。他的目标需要通过所谓的"功能主义"的方法来逐步实现，也就是说，把不断增加的功能或"行动范围"从国家的控制下稳步转移到超国家的控制下。他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继承者，而且被称作"欧洲之父"。罗伯特·舒曼（1886—1963 年），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洛林人，是桑尼耶和莫内的门徒。战前他曾是老资格的国际联盟副秘书长。战争期间参加了抵抗运动，曾经被捕入狱。战后他是天主教人民共和运动（MRP）的创始人，桑尼耶是该组织的名誉主席。在第四共和国期间，他曾两次担任总理。在 1948—1950 年的关键时期，他入主奥塞路（Quai d'Osey），任法国外交部长。勒内·普利文（1901 年—　）是战时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两次出任总理。他也是后来背离戴高乐路线的前戴高乐派的领导人。

这几个法国人在联络委员会舒曼的同事保罗—亨利·斯巴克（1899—1972 年）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1881—1954 年）那里找到了知音（见上文）。前者是社会主义者，从 1938 年到 1966 年曾在比利时政府几乎连续担任外长、财政部长和总理。1946 年，他是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后者是天主教民主党人，说两种语言的南方蒂罗尔人，在 1945 到 1953 年历届意大利联合政府里担任总理。像斯巴克一样，他是北约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开始采取行动争取欧洲统一。

1949 年 8 月，欧洲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开幕。保守的英国决定了其最低纲领，即通过讨论、宣传和研究来促进欧洲联合。它没有任何执行权。包括英国在内的 11 个创始国不久就激增到 18 个。它由部长理事会的秘密会议和公开的咨询大会组成。其下属的犯罪、人权、文化和司法合作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正如其主持的欧洲人权法庭做[1084]的一样。但它的视野被定在模糊和遥远的未来。在斯特拉斯堡大会召开一年之后，更加雄心勃勃的舒曼计划在巴黎揭开了帷幕。

这些积极分子的策略是：为得到中等水平的收获而把计划制定得越高越好。它们不得不在仍由华盛顿和伦敦主导下的西方联盟的范围

内运作，不得不被视作对北约、欧洲经济与合作组织（后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现有安排进行补充。尽管如此，1950年的舒曼计划仍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建立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的一揽子计划。它建议成立一个经济机构协调钢铁业，建议成立欧洲军，两者一起将构成欧洲合众国的基础。而且它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没有提前与伦敦商量。结果舒曼计划的经济方面被采纳，而军事和政治方面被搁置起来。因此，欧洲联合的三个阶段被设定为沿着不同的轨道和以不同的速度逐步实现。

舒曼计划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呼吁法德和解。它出现在联邦德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经济发展、而政治上仍处于孤立地位的关键时刻。阿登纳总理来自莱茵州，一辈子都生活在法德战争的阴影中；他与舒曼一样，都是天主教自由民主党人。希望法德和睦相处为达成一致提供了条件，没有人有理由反对这种一致。舒曼计划一旦启动，来势很猛。

欧洲煤钢共同体（1951年— ）是舒曼计划的第一个产物。它旨在防止各成员国重新出现军工基地；第一任主席是让·莫内。创立煤钢共同体的条约于1951年5月签订，它把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比卢六国联合在一起。这些国家同意在煤和钢铁业建立自由贸易，遵守规范其生产和竞争的共同条款，而且，在“货单危机”文件出现的时候，对价格和生产进行控制。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功之举。英国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

军事方面的联合遇严重障碍。普利文计划（1950年）只采用了舒曼计划中有关军事安排的一个温和版本；但它仍然遭到戴高乐的痛斥。棘手的谈判拖延了四年。英国不想削弱北约的作用；法国则反对折中的机构——欧洲防务共同体（EDC）。最后的结果是成立西欧联盟（1955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独立权力的协商机构，它成立后经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1955年的墨西拿会议标志着欧洲运动的战略转向以经济一体化为首要因素。政治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各成员国认为，一个强大和成[1085]功的经济共同体肯定将为他们的长期政治目标开辟道路。三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坚持这一方针。在罗马签订的两个条约（1957年3月25日）表明六国决心把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功扩大到商业和经济生活的所有部门。他们创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或称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于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主要目标是消除所有内部关税，形成共同对外贸易政策，协调运输、农业和税收等诸方面，消除壁垒，形成自由竞争，以及鼓励资金、劳动力和企业的流动。

为了追求这些目标，成立了四个机构：部长理事会，管理和批准所有的政策决策；设在布鲁塞尔的从属的执行委员会，下设一个永久

秘书处和若干个分管各政策的总司；欧洲法院；以及一个轮流在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开会的欧洲议会。冒险再一次获得成功。到 1968 年取消了内部关税。共同农业政策（1962 年）不顾制造业者的抗议对农业进行大量补贴，给农民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新生活。1967 年增值税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共同体的收入，这些新增收入可以用于受压榨的社会部门和落后地区。欧共体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韦尔特·哈尔斯坦教授（西德），他从 1958 到 1967 年掌管着共同体的命运。他的继任者中有英国人罗伊·詹金斯，1985 年后的法国人雅克·德洛尔。不管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什么样的批评，不管有多少批评，与置身其外的国家相比，共同体的成员国越来越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哈尔斯坦教授评论道，“任何不相信欧洲事务会有奇迹的人，都不是现实主义者。”

为回应欧洲经济共同体而由所谓的“外七国”创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区（1958 年— ），这些国家是以英国为首的未参加《罗马条约》的几个国家。它的兴趣被限制在商业部门，而它的长远未来则因为投靠欧共体而蒙上了阴影。在 1973 年英国和丹麦退出自由贸易区加入欧共体之前，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参加欧洲运动是一个争论了 40 多年的焦点问题。英国政府没有参加 1951 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而且退出了《罗马条约》的谈判。阻力既是心理上的，也是实际存在的。由于没有遭受过国家沦陷的羞辱，许多英国人仍怀着主权和自给自足的幻想。他们还对英联邦有实实在在的承诺——包括棘手的英联邦贸易特惠制问题。在政治层面，他们把英美关系和北约成员国地位放在优先位置。1961 年和 1967 年，在麦克米伦和威尔逊执政时期，他们曾两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戴高乐不客气地加以拒绝。在《罗马条约》签订前的 10 年，戴高乐处于退隐状态，法国的欧洲政策由温和派主持。但是戴高乐重新上台时正赶上欧共体的启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戴高乐将[1086]军对英国人在战时背叛法国利益和其后第四共和国领导人背叛法国利益耿耿于怀。他强烈支持“祖国的欧洲”和“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而且他坚持恢复他所认为的法国主权。其结果体现在他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否决中，也体现在他与欧共体委员会——国王对教皇——的长期斗争中。法国代表集体抵制布鲁塞尔的活动，直到他们强行通过的卢森堡妥协案（1966 年）允许成员国在涉及国家最高利益时无视《罗马条约》关于多数表决制的规定。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 20 年完成了金融方面的许多重要进展。始于 1979 年的欧洲货币体系把各成员国的货币置于一个汇率机制框架内，以平抑过去的汇率波动。其设计者把它看作通往欧洲货币联盟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欧洲货币单位的出现预示着后来向单一货币的

发展。欧洲社会基金和欧洲发展基金都用于把财富重新分配给贫困的社会或地区。

共同体经济上的成功使新的申请国源源不断。1973年，在爱德华·希思时期，英国在第三次申请时与丹麦和爱尔兰一起被批准成为新成员。英国人的全民公决（1975年）确认了英国的永久成员国资格。6国变成9国。1981年，希腊加入，9国变成10国。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经过漫长的谈判后也被批准加入：10国变成12国。共同体第一次接纳三个“经济发展中国家”，而且希腊是不接壤的东欧国家。

欧洲联合的军事和政治方面仍陷于停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西洋联盟由于里根和撒切尔的二重奏而重新活跃起来；而北约的重要性因为苏联和美国的导弹纷争而凸显出来。欧共体的政治和国际作用边缘化。它的适用于六国小共同体的机构，越来越不适应12国日益增多的事务。欧洲的一个领导人把共同体称作“穿着婴儿衣服走路的成年人”。[19]欧共体似乎没有什么机会突破其狭窄的经济关系。

但也有人认为，12国欧洲的组成已经带来了新质量的东西。欧洲过去有过许多富国和大国之间的联盟，有过许多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在选择成员国的基础上建立联盟的幻想。但是现在联合已经实现，欧洲共同体把自己变成平等国家之间的自愿联合——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加入共同体的主要标准，除[1087]了应该是欧洲国家外，申请国还应该摆脱过去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传统。只有时间才能验证这些变化是否能永久保持。

中立国家

中立已经成为欧洲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特征。1945年，欧洲有11个中立国家；四个未卷入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在战后也拒绝加入军事集团；有两个国家在战后初期获得了中立国的地位。在中立和富裕之间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大多数中立国家并不急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以中立作为其生存方式的瑞士非常繁荣。在战争期间，它顽强地抵抗德国的入侵，战后其人口显著上升。瑞士极大地得益于毗邻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这两个战后经济发展很快的地区，其银行业和旅游业都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从拜耳化学公司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众多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它都表示欢迎。除了瑞士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外，列托—罗曼语被提升到国语的地位，而说法语的汝拉则被划为一个特别的州。瑞士的国防预算很高，全体男性被征召入伍以支持民

兵。瑞士妇女直到1980年的（全部男性）全民公决后才获得选举权。瑞士直到1963年才加入欧洲委员会；它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仅限于1972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瑞士，好几个毗邻的地区都宣布自己是免税区。它们包括德国的飞地比辛根，意大利的坎皮奥内、利维尼奥和奥斯塔河谷地区，以及1815年以来的法国上萨瓦省。

瑞典因在战时保持中立而获得繁荣，而且在战后继续保持中立。它是波罗的海地区委员会的中心成员，然而当它的斯堪的纳维亚伙伴们加入北约和欧共体时，它却仍然置身其外。社会民主党在国内长期执政直到1989年大选。特别是在1986年被刺身亡的首相奥拉夫·帕尔梅执政期间，在第三世界、难民和环境问题等许多问题上，瑞典都是领头的国家。

佛朗哥的西班牙在其元首在世时政治地位一直很低下。的确，佛朗哥和萨拉查两人特别长寿使伊比利亚政治发生时间错位，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法西斯主义在错误的时代幸存下来，在西欧尤其是法国起到抵消反共舆论的作用。葡萄牙是北约成员国，西班牙同意接受美国基地，但却拒绝更进一步的接触。不过大众旅游使西班牙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1975年，西班牙重新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为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开辟了道路，也为八十年代非凡的经济复兴开辟了道路。西北部的巴斯克恐怖主义、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分裂运动以及与英国关于直布罗陀的争端都使西班牙的复兴复杂化。 [1088]

爱尔兰共和国在战争期间从英国的占领下幸存下来，并在战争结束时脱离英联邦。但实际上对英国的经济依赖仍然存在：在与欧共体的谈判中它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追随英国扭曲的政策。天主教的优势地位、与北爱尔兰无休止的冲突以及“替天行道兵党”（Fianna Fail）（Soldiers of Destiny）和“盖尔人党”（Fine Gael）（‘Race of Gaels’）两个政党的竞争是其政治生活的中心。爱尔兰宪法把不列颠阿尔斯特（指北爱尔兰——译者注）当成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但爱尔兰共和军却被英国和爱尔兰双方都视作非法组织；而伦敦和都柏林的关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

芬兰参加了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见原书第1013页），尽管在1944年停战时芬兰不得不放弃更多领土，尤其是维普里（维堡）和佩萨莫，但它并未被苏联占领。1947年，芬兰与苏联签订和约，以出租波卡拉海军基地为代价确认了芬兰的有限主权。从此以后，芬兰被迫保持严格的中立，减少其武装部队，执行与苏联利益一致的外交政策。此后，芬兰经济快速增长，赫尔辛基成为欧洲最雅致最昂贵的城市之一——在列宁格勒眼皮底下向西方进行展示的样板。许多苏占国

家都希望能“芬兰化”，但除了奥地利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如愿以偿。

奥地利得益于盟国的虚构，说它是纳粹的第一个牺牲品。像德国一样，奥地利被分成四个占领区，1955 年四个占领国签署了“国家条约”，在此基础上，奥地利共和国成功地重获全部主权。其条件包括严格保持中立，以及在维也纳永久保留巨大的苏联战争纪念馆。在重获独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与邻国瑞士相似的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和相对缓和时期。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党和保守的人民党之间的微妙平衡，社会党的布鲁诺·克赖斯基（1970—1983 年）曾任总理一职。1986 年，一场使奥地利总统、前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名誉扫地的国际运动并没有伤害他本人；但这场运动却使人们回忆起奥地利的过去。奥地利的边界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由于 1868 年的条约，容霍尔茨（Jungholz）和米特尔贝格两个地区成为巴伐利亚关税区的一部分。而福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则与意大利的上阿迪杰和特伦蒂诺地区共享自由贸易。

七个欧洲公国，是历史上许多小国中硕果仅存的幸存者，它们太小了，在国际关系中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地位奇特，值得去探寻。

圣马力诺（创建于公元五世纪，领土 62 平方公里，人口 2.3 万）号称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它 1631 年获得独立，紧邻里米尼附近的[1089]蒙蒂塔诺（Monte Tiano）山坡，完全在意大利的领土包围之中。在战后，它是意大利富翁的避税场所，其政府由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轮流执政。

列支敦士登大公国（创建于 1719 年，领土 157 平方公里，人口 2.7 万）把外交政策交给瑞士处理。1980 年，它的人均 GNP 为16440 美元，居欧洲首位。它是神圣罗马帝国仅剩的一个国家。

摩纳哥公国（领土 150 公顷，人口约 3 万）占据尼斯以东里维埃拉河边的一块飞地，是自治的法国保护国。从 1861 年开始形成现代的雏形；过去曾属于西班牙（从 1542 年起）、法国（从 1641 年起）和撒丁岛（从 1815 年起）。其宪法把政府交给格里马尔迪家族掌管，收入主要依靠蒙特卡罗的赌场。

安道尔（领土 495 平方公里，人口约 4.3 万），位于东比利牛斯山区，自 1278 年起就获得了自治地位，当时它被置于乌赫尔红衣主教和德富瓦伯爵的共同保护下。近年来，后者的权力由阿列日省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来行使。经济上依靠旅游业，尤其是滑雪业以及免税贸易来维持。

马恩岛（领土 518 平方公里，1986 年人口 6.5 万）和海峡群岛

（包括泽西岛、奥尔德尼岛、根西岛和萨克岛——领土 194 平方公里，1981 年人口约 13.4 万）都是英国的属地，与英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诺曼人征服时期，但它们从未正式加入过联合王国。二者都是富庶的避税天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萨克夫人仍在与英国议会争夺权力。九十年代，马恩岛议会未能循英国之例让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法案合法化，招致与英国议会最后摊牌。

直布罗陀是惟一位于英伦诸岛之外而加入欧共体的英国属地。在这一点上，它效仿了法国的海外省瓜德罗普、马提尼克、留尼汪和圭亚那。而其他的英、法殖民地，像丹麦的自治区法罗群岛［**法罗群岛**］和格陵兰一样，都未加入欧共体。

梵蒂冈（领土 44 公顷，1981 年估计人口为 1000 人）是欧洲最后一个独裁政府。它的统治者教皇对这个教皇国行使无限制的统治权，正如他对罗马天主教行使的权力一样。梵蒂冈是罗马天主教的总部。与它最相似的是圣山阿索斯（Athos）的"神权共和国"［**阿索斯圣山**］,该国从 1926 年起就在希腊享有自治权。

这些幸存下来的公国提醒我们，多样性和传统在欧洲的生活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欧洲还没有完全被大国政治所淹没。

东欧，1945—1985 年

战后时期的"东欧"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它开始有理由被认为是所有那些处在苏联铁幕笼罩下的欧洲大陆地区。就此而言，它[1090]包括那些被苏联合并以及其他还没有被其合并的欧洲国家。不管怎样，它通常是被作为苏联在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卫星国的同义词，且有别于苏联本身。

根据最新的分析，这些区别其重要性十分有限。没有一个国家根据列宁主义组织在一起，不管是作为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治"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据说都应享有任何重大的独立举措。所有这些，在表面上看，都是被设计成一场由苏联领导的、具有独裁特权性质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无论从何种定义上说，在转而审视那些曾是苏联更为固执的追随者对苏联意志更为拗口的诠释之前，对东欧战后历史的研究只能以苏共的政策作为出发点。

1985 年后到其最终解体前，苏联的战后历史可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5—1953 年）是伟大的斯大林统治下的最后几年。第二个时期（1953—1964 年）受控于所谓的非斯大林化，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兴衰时期。第三个时期（1964—1985 年）是后来被冠为"停滞阶段"，是由列·伊·勃列日涅夫发起并鼓励的。总

的来看，那 40 年证实了现代历史中的最大的假象之一。苏联已经成为自二战以来欧洲具有最强军事实力的国家；并且正向着使自己成为全世界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的目的而进发。就外表看来，它强大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它是一个用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兵工厂武装起来的难以攻克的堡垒。与此同时，它的内部正在以一种空前的速度而腐化着；它的身躯被充满了如同癌症般的政治所缠绕。历史中泥足巨人比比皆是——古老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主要的例证——但是在这里它却是一只即将站着死去的身披铠甲的恐龙。而且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它的不幸——既不是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也不是直到很晚才觉醒的苏联领导人自身。这两大集团，除了许多可尊敬的例外，为羡慕苏联成为一个健康、进步的典范而耗费了那 40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斯大林统治后期并没有减轻人们的苦难和对长夜的恐惧。对促使他逐渐走向成熟的时代及胜利的思索被证实还没有建立起来。同一伙在战前依附于斯大林的亲信获得了权力。混杂着同样的恐怖、宣传和集体性的例行公事使俄罗斯人情绪低落。古拉格集中营继续着其常规性的对群众和劳改犯的逮捕行动。根据强有力的证据可以推测出，斯大林在他去世时仍在准备另外一场大肃清行动，因为他已经发觉所谓的“密谋的医生”组织。

在那些年中，苏联帝国把它的版图扩张到了最大范围，它是通过军事征服和创造了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克隆体的代理人来实现的。在占领东欧后不久，其主要的进展是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展开的。毛泽东曾写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在 1949 年获得胜利时莫斯科并没有直接进行干涉。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有[1091]着不同的观点，并且彻底地意识到斯大林曾经支持过的他的劲敌——蒋介石。但是他对暂时成为苏维埃阵营中一名忠实的成员还感到满意。在这十几年中，莫斯科一直是控制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行动的榜样。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还含有全球人类的一半。

苏联对曾是其殖民地的国家中人民有着很大影响。在非殖民化的时代中，莫斯科一直视自己为所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天生资助人和受益者。它与越南、阿拉伯世界和古巴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有可利用的资源都被投入到军用核子科学的研究方面。在乌拉尔山脉的马雅可地区，还有别处，成群结队受宠的奴隶般的科学家们在吃力地制造苏联的“炸弹”。1949 年，在北极的新地岛成功地试验了一颗原子弹；1953 年成功试验了一颗氢弹。在那之后，美国的核子垄断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到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已经确定了其超级强权的地位。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在其位于孔策沃的郊外别墅中因心脏病而去世。一个人在地板上躺了24个小时，遭受着死亡剧痛的折磨。没有一个重视自己性命的克里姆林宫医生去救斯大林的性命。政治局的成员们在他的床边轮流守夜：

斯大林刚一有恢复知觉的迹象，贝利亚就跪下来开始亲吻斯大林的手。当斯大林再次失去知觉时，贝利亚站起来并一巴掌向他打过去……表达经受压榨而出现的仇恨。[20]

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令数千万的人流泪。

非斯大林化恰恰是这个词所暗示的。它去除了与斯大林自身——即个人崇拜直接相关联的苏联政体的那些特征，“一长制”或“独裁”，或是实行随意的大规模恐怖行动。在爱伦堡的小说发表后，它开始了众所周知的一段称为“解冻”的间隔时期。当贝利亚在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被枪杀时，他的刺客同僚们的集体化领导阶层就可以确立内务部——即现在重组的克格勃的权利。但是他们完整地保留了独裁性质的统治机器。他们削弱了恐怖的氛围，但是并没有提及民主化和自由主义化的重大措施。苏联的政治体系依旧保留着极权主义的特征。在三年间，集体化的领导阶层让路给赫鲁晓夫的个人霸权。

热情洋溢的赫鲁晓夫或许是对斯大林的创造物最不感到厌烦的人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投机主义者，在恐怖时期最严重的年代中，他想尽办法在党内向上爬。作为斯大林在乌克兰时的上司，他有着一段黑色的记录；一个后来才认字的人，他属于是那种最粗鲁、俗气的文化人。然而他也有一种粗鲁的农夫才有的魅力——特别是在联合国当他用他的鞋子拍桌子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应该看看赫鲁晓夫于1956年3月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蛊惑人心的“秘密演讲”。这次演讲为每一位苏联领导人在就职仪式上把他的前任作为一个罪犯而公开谴责开创了先例。其间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谨慎的、很有选择性的[1092]揭露也与党的需要相符合。它所隐瞒的其实多于它所揭露的，最小化苏联的犯罪行为使他赚取了言过其实的正直名誉。它始于斯大林自己启示性的演说，直至30年后戈尔巴乔夫采用的手段。

赫鲁晓夫的统治因为三个重大的发展而令人知晓。对于“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的误解致使整个东欧陷入巨大的紧张不安状态之中，导致了在匈牙利的公开冲突和与中国的关系致命的分裂。军事科学的发展以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那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导致其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和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经济上取得的一定成绩令赫鲁晓夫吹嘘苏联将在20年内压倒

西方："我们会埋葬你们。"赫鲁晓夫的政治冒险主义完全吓坏了他的同僚们；1964年10月他在一场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中被赶下台，并过着隐居的生活。

列·勃列日涅夫，另一位来自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支配苏联的政治组织长达20年之久。作为一个让苏联恢复"新斯大林主义"和重新回到"停滞阶段"的人他一直备受谴责。在那段时间里，他可以被看作是了解最佳的制度体系，并尽可能地延长其生命的领导人。首先，他是一个小心谨慎且精明的官僚，能够认识到损害一台还不完善的国家机器的结果。在布拉格之春运动期间其短暂的自由主义化经历使他完全确信，与他有着紧密关系的同盟国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要求的不可靠性（见下文）。在国内，他联合他的主要伙伴阿·尼·柯西金所实行的短暂轻浮的经济改革使他确信风险大于收获。他对乌克兰的个人认识必然使他确信最轻度地缓和民族问题就会招致麻烦。他寻求缓和同西方的关系，即把一种带有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同仔细界定全球势力范围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一种似乎能够保证苏联永恒国际地位的稳定的安置。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苏联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同样了解——但他的接任者并不了解——消除谎言和高压政治必然会令上层建筑的结构解体。因此勃列日涅夫固执己见。他的批判者所公开抨击他的"停滞阶段"被看作是他和他们这一代长期渴望的和平和稳定。能够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调准暴力和欺诈行为到达一种可以被容忍的程度。不像斯大林，他并没有数以百万计地杀人；不像赫鲁晓夫，他并不赞同轻率的计划；不像戈尔巴乔夫，他没有摧毁他所依托的制度体系。

那个时代最具讽刺意义的一件事显然是：继任的总书记显示出能完美象征着苏联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具有毁灭性的弊端。这种稳定性到1970年末正逐渐变得迟钝。勃列日涅夫讲话开始含糊其辞，他的行动开始放慢，爱开玩笑的人称他是一具需要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尸体。当有病痛的继任者们争辩着改革和无所作为两者间互为反义的价值[1093]时，他的去世令这种惯性迟钝变为麻痹。尤里·安德罗波夫（1982—1983年），一位倡导改革的代表人，在改革可以被付诸实现的时候因癌症去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3—1985年），一位肺气肿病的受害者，并无意着手做任何事情。

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政治专政已趋于成熟，而并不像国外普遍以为的那样，它是一种由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古拉格集中营，一种带有侵犯性质的强制的审查制度，一所巨大的坦克制造兵工厂以及保卫力量支撑着的政治专政。但是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压迫手

段：这种专政首先必须依靠党和政府的双重结构，那就是依靠共产党的文官机构和依靠他们对于国家类似机构的控制（见原书附录Ⅲ，第1321页）。但是并不存在对于相应国家部门来说非从属性质的人类活动的分支部门；并不存在不听命于相应的共产党的委员会的国家分支部门。无论如何，或是最威严的政府部门或是处于最卑微地位的地方农场、工厂和足球俱乐部，如果是由国家组建的，那它才是合法的，如果是党批准组建的，那它也是合法的。

公民个人的境况十分可怕，因为国家法律和国家的法官们被由党操纵的普遍准则所支配，党不喜欢的任何事物都有可能迅速且合法的被镇压下去，并没有提起上诉且行之有效的权利。因为人们所有的生活所需都由国家垄断所提供，任何选择公然对抗党的意愿的人回原地受到判决，用行话来说，就是收到了他们的“狼票”（Wolf's ticket）。反抗者和他们的家庭都可能被例行公事般地剥夺了他们的居住许可权，他们的定量配给卡，他们的身份证以及从此以后的雇佣、住房、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渠道。一旦党的官僚政治专政处于适当的统治地位，则不再需要动用较为暴力的镇压手段，除非是用来对付那些异常勇敢且足智多谋的持不同政见者。至少在理论上，完全不存在私人创意、个人看法或自发的社会行为。在正常情况下，组织一次罢工，组建一个私人社团或是出版发行未经许可的信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广为流传的有关起义事件的消息，例如1962年发生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起义事件所引起的大屠杀，就被隐瞒了10年。

一大批阐述详尽的法律法规、手段、构造和心理上的避讳行使着党对国家机构控制的权力。党的控制在法律上被奉若神明。苏联宪法中惟一重要的条文就是其所声明的党的“领导角色”。这种简单的策略保证了所有其他的宪法条款，所有其他的苏联法律都以党和它的官员们对其所作的阐释为标准。就外部标准来看，这些根本就不是法律。党的章程是比苏联宪法还有效的一种公文。官名体系（或管制人名录——译者注）保证每一个职位，从国家的总统任职到乡村理事会的主席职务全部独一无二地都是由党任命的人来担任。每个党的委员会在国家和党的等级制度中都保留着按其自身的级别所能草拟发布的[1094]公告，以及拟定适合担任职务的候选人（包括党批准的无党派人士名单）清单的权利。结果是，党员们通常都在党的机构或是在一些国家政府部门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机构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党的中央委员会使所有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任命受到保护，并受到至高无上的武装部队和克格勃权力的统一指挥。

所有国家机构的管理被内外部共同运用权力的党的控制所进一步限制。部长、将军、大使、代表团长、全部工厂厂长、学校校长或

学院院长——所有这些国家机构中有名无实的领导者在形式上不得不接受同级平行的党的委员会的指挥。他们形如有较大的势力并在幕后操纵的党的书记们的公仆。同时，他们不得不接受主要的党组织或是由属于他们自己成员阶层内的党员组成的“党小组”的日常监督。结果是部长本身并不能真正行使他们的部长职务；军队的司令官无法对他的军队下达命令；公司经理无法管理他的公司。

每一件事都依赖于党的命令的有效传达。党的纪律确保“较高层机构”所作的决议都能被完全彻底地执行。党员宣誓要服从命令和保守秘密（不仅是保守党章中规定的秘密）。他们被训练得能够没有任何疑义地预见和执行他们上级的意愿。公开的辩论被阻止；讨论仅被局限于高层的决断能够被贯彻执行的方法上。

这些事实与民主国家的经历是如此的相异，以致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政治科学家能被这么容易地误导。不得不事先讲明用西方观念和西方术语来解释所有外来事务根本不适用。例如，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一种已经转化为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政治性军队。苏联政府也只是党的行政代理，因为它对于党的政治局和党的秘书处来说都是次要的。这种体系的首要执行者并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总统或总理，而是党的总书记（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委任自己为总统或是总理，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至高无上的苏维埃或是国家的立法机构并不显得至高无上，因为它仅能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事先准备好的身份注册。首先，国家选举并不是选举，因为并没有可供选择的成分。公民们依法被强制在党所任命的人的名单上确认赞同。

因此，在真正意义上，苏联从未真正地存在过，除非是作为一种党的权利的外部表现。它在历史上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阵线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当苏共（布）最终解体时，缺少它的苏联也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原因。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权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们所注意。作为对中央方针绝对忠诚的回报，勃列日涅夫准备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14个非俄罗斯人组成的共和国[1095]的政党首脑各行其政而不加干涉。这些苏联的共和国在几乎不为人所察觉的情况下逐渐变为国家的封地，就连莫斯科的正式文件也并未明确规定过。作为东欧的附属国，勃列日涅夫的地方男爵封地并未享有同等的范围：他们明显代表着政治局，且是保守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但是他们的出现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当发自莫斯科的信号渐渐变得令人困惑时，而他们却能如此令人惊讶且迅速地在离心轨道上加速前进。

苏联的武装部队，虽然庞大且威望很高，却被剥夺了采取独立行

动的能力：党把这件事情做得四平八稳，不留漏洞。仅把全部军官送入由党管理的学院受训还是不够的，在那里，他们只有加入苏联共产党才有可能获得晋升，或者如果没有在身边工作的“政治部主任”的连署签名他们就不能下达任何命令。军事阶层的组织体制都受控于总政治部（Glavpolit）的特务，它是重要的政治军事部门，它的上级成员包括最重要的总参谋部元帅和占据要职且遍及较低军事阶层的下级成员。按照常规，火箭部队对弹头不能给予控制，伞兵部队不能控制运输机，坦克部队并不拥有军火弹药和燃料。

苏联的武装部队包括四个主要部分——战略核部队、空军、陆军和海军。其数量最多可达 1000 万人。取决于统治者们的愿望，他们或者被设计成最为可怕的力量，或者是最无能且可以想象得到的力量。1955 年为适应北约而较迟组建华沙条约组织时，苏联则愈发陷入到另外一种官僚层面中。他们保留了对于总部设在莫斯科而非华沙的条约国组织运转的绝对控制权。

苏联安全部队的比例和组织对比于别的国家来说没有一丝相似之处。把他们称之为“秘密警察”是一种曲解。克格勃等同于具有很多其他作用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三合一体。除了来自外国的情报，克格勃的多样化领导地位管理着古拉格、总政治部（Glavpolit）、民兵和审查制度体系。它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洞悉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的情况并且尽一切可行的办法找出“不可靠的成分”。在每一个苏联的城镇里随处可见穿着制服、戴着天蓝色肩章的克格勃军官。他们指挥着大群的告密者、刺客和隐藏在人们中的秘密特务以及一支完全相同的、拥有上百万人，被训练用来管辖军队、守卫边、管理军营、镇压骚乱以及保护党的精英的第一流的内部部队。与他们的大多数公共且庄严的职责一样，他们在列宁墓前上岗执勤。他们设在莫斯科中部卢比扬卡的总部面对着他们的奠基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那里有全俄国境内最为可怕的地牢。

党的精英和精英以外的人形成的日渐增长的隔阂支配着官方所声明的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苏联社会。一旦这种清洗活动终止，官员职务名上的成员们就能确立他们的地位，窃取国家财产以为己用，并由于受到保护而逐渐变得富有且权力强大。奢侈的公寓和郊外别墅，昂贵[1096]的豪华轿车，惟一可进入到封闭的仓库的权力，兑换西方货币和出国旅游都分配给地位较高的阶层。就像米罗万·吉拉斯早在 1957 年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是“新阶级”——享有所有权的世袭阶级。与之相反，被集体化的农民，遭受着比那些奴隶更为恶劣的贫穷的折磨，在 1970 年以前他们既没有社会保障救济金也没有个人身份证。产业工人被告知他们已经继承了土地；他们辛劳地工作以期望着从未具体实

现过物质的住房、工资和安全条件能有所改善。知识分子阶层——官方解释为一个代表着“脑力工作者”——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收入却颇低的专业社会阶层。尽管像医生这样的个别职业中女性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事实是苏联妇女所得到的如此少量的救济是她们在西方生活的姐妹所不可能忍受的。像在纳粹德国，国家的口号是鼓励生育英雄母亲，而堕胎则是随处可见的惟一一种计划生育方式。“发达的社会主义”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说却是非常不发达的。

这并不令人惊讶，初期的苏联人口统计学趋势从一开始就支支吾吾，特别是在处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地区。斯大林年代由于战争伤亡而损失的苏联人口在 1950 年和 1960 年间得到恢复，从 1.785 亿（1950 年）增长到 2.624 亿（1974 年）；在大城市中的增长幅度和数量则更为惊人。但是苏联城市生活的艰辛并未影响到无忧无虑的生儿育女。到 1980 年时对出生率和对生活的期望值全都下降了。由于其中亚的加盟共和国地区持续的人口增长趋势，占据优势的俄罗斯民族逐渐衰退。即使在 1979 年，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的 52% 是很精确的，但是俄罗斯人却绝对属于少数民族了。

苏联的经济体系坚持推行由斯大林制定的基本方法和优先考虑的方面——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军事化和重工业。它的根本失败被长期隐藏伪造的统计数字幕后。甚至当增长率无法避免地减缓了速度并且不能达到指标时，五年计划还继续造成数量上持续成功增长的假象。总体的产量一直到 1980 年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苏联：精选的产量指数

	1945	1950	1960	1970	1980
钢铁（百万吨）	12.3	27.3	65.3	116	148
煤（百万吨）	149	261	510	624	716
石油（百万吨）	19	40	148	353	603
电（百万吨）	43	91	292	741	1294
汽车（千辆）	75	363	524	916	2199
工业集团 A	15	27.5	89.4	213.8	391.4
（固定资产 1931 = 1）					
工业集团 B	2.7	5.7	15	30	49.8
（生活资料 1931 = 1）					
小麦（百万吨）	47	81	126	187	189
牛（百万头）	30	25	34	39	43[21]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真相才开始大白于天下——总体的生[1097]产数据几乎是离谱的，而苏联的竞争对手们几乎在每一个部门都远远领先于苏联。

缺乏对公众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享有特权的军方和核子部门消耗了苏联 3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是官方所认可的五倍。同时，夸张的共产主义重工业口号继续大量生产出多余的铁、钢和未加工的化学品。其结果是一种可以大规模制造坦克、火箭和飞机的经济体系却不能维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整个民用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被不幸地忽视了。苏联的农业生产出了大量低质量的食品，但是这些食品却不能提供给家庭食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了一个纯粹的谷物进口商，同时国内供应却愈来愈依赖于被集体化的农民们的后花园（50%的食品源自 3%的可耕种的土地）。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民间艺术。苏联的形势证明了它对计算机化和在中央官僚机构以外的信息自由交流怀有特殊的敌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形成的大规模动力化，从菲亚特公司购买了生产许可权来生产拉达轿车，却因为缺乏支持性的服务，特别是现代公路的建设而受到阻碍。服务部门通常只是些新生的部门。商品奇缺使消费者无物可寻。对粮食和住房供给的补助价格仅能保证维系生命的标准，但同时却滋生出一个活跃的黑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依旧很不充分。在发展了 70 年后，苏联却连一条可贯穿东西的全天候公路也没有建设起来。贯穿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依旧是惟一的一条通往远东的重要交通线路。苏联民用航空总局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同时也是超负荷工作的。西伯利亚丰富的资源未能得到适当的开采。莫斯科颁布的命令越多，响应就越微弱。虽然有经互会，但东欧地区的附属国却从纯粹的贡献者身份变成纯粹的负担。苏联不良的出口收入是依赖于黄金和石油。直到 1980 年初，失控的军事开销与逐渐萎缩的家庭消费能力的结合，导致一次急需救治的系统化危机的爆发。

对环境的保护并不是严肃可行的。原始的工业生产方式和完成数量计划的压力已无法再顾及生态问题。即便是在那些刚刚通过环境法的领域，最底层的官僚们也无法以对抗党提倡的主要生产利益来推行这些法律。在极权主义的党和政府中，不会存在一种独立的环境机构或是基层活动机构。结果是，苏联系统化地制造出在欧洲最为丢脸的无视环保以及持续造成环境污染的例子。被毁坏的都市风景、死河、有毒空气、垂死的森林、没有受到监测的放射性公害以及日渐衰退的健康指数都被抑制在习惯性的保密的浓雾中。只有当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在 1986 年 4 月发生爆炸，使半个欧洲都沐浴在核辐射尘

埃中，才在最后一刻向世界发出了危险的警告。

[1098] 国家审查制度使苏联的文化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这种状况不明智地把所有行为划分成官方和非官方两方面。只有属于一个由党控制的协会的艺术家们才拥有表演或出版发行的权利。他们的作品被分为唯命是从的、中庸的和大胆反抗的几类。官方文化集中表现在1934年曾被放弃后又在1946年由安德列·日丹诺夫恢复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上。[摩尔多瓦] 这种风格以一种理想化的、强制性快乐的和本质上并不真实的方式来展示苏联的生活。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0年中允许出现一些有悖于这种原则的事情。赫鲁晓夫一方面准许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本描述可怕的古拉格集中营的书。另一方面，他痛斥第一届莫斯科现代艺术展，称之为"一大堆驴屎"。于是，解冻期很快转变成对其的再次冻结。少数有才能的艺术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保留有自主的余地；但是，那个时期中多数伟大的作品，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到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和索尔仁尼琴的主要小说作品不得不在国外被非法出版。许多杰作被尘封达20—30年之久。

与之相矛盾的是，苏联的压抑政策却产生出一种对独立的、高尚的文化的真实渴求，即一种多数开放国家并不知晓的，对精神和美学价值的渴望。官方政策方针的不道德却产生了针对自身的道义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日益重视教育的社会中，在接受过最佳教育的人的范围内的最为坚定的反对党派也变得冷酷无情了。(直到1979年，10%的苏联公民受过高等教育。)"需要或是不需要，"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曾说道，"每个苏联公民处于一种只和官方宣传进行永久性的内心对话的状态。"[22]安德列·萨哈罗夫，苏联氢弹之父，是最早的叛逆者之一；最雄辩的人物之一是基督教诗人和囚徒伊琳纳·拉图斯基亚（1954年出生）：

> 俄罗斯的悲惨故事
> (也许我们是在做梦?)
> 尚未在空白的书页上为米老鼠，
> 我们和收音机腾出地方，
> 然而明天这个漫长的冬天将开始。[23]

有系统的迫害仅最低限度地保留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宗教生活。苏联政府官方宣称其是无神论者；赫鲁晓夫还特别提倡使用武力来反宗教的活动；是对儿童的宗教教育构成了一种可耻的犯

罪行为。鞑靼斯坦和中亚的穆斯林是最不活跃的且最不愿惹麻烦。但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却被镣铐锁住了手和脚。它的神父领取国家发给的养老抚恤金，克格勃监督着它的教阶制度。1946 年被取缔的乌克兰东仪天主教只在地下陵墓中消灭殆尽，只在立陶宛有罗马天主教，大批神父被殴打或被流放致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新教徒和长期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特别是浸信会教徒和耶稣复临论者得到充分的表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犹太教刚有复苏的迹象就遭受了折磨。[1099] 在苏联的民族精神衰败的过程中，不能对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评价太高。[24]

一直有许多人试图去描绘出苏联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很多局外人也一直着重强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似乎理论才是真实的而实践却是不完善的。然而许多文字记载表明明智的共产党员是如何认识到理论本身是具有欺骗性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经常赞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如同把美国总统敬为神明的南海“恋物狂”厌烦美国的民主政治那样厌倦马克思主义。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共产主义除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外没有什么更为严肃的目标了。它的内心充满了谎言。[25]

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被合并到行动一致的苏联集团中的东欧八国（但是还没被最终合并到苏维埃联盟中）遵循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自身发展相类似的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全都经历了具有斯大林化（1948 年后）和非斯大林化（在 1953 年后的各个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受“正常化”意即公然反叛的事件发生后重新确立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标准化”的支配。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苏维埃联盟的军事“同盟国”、华沙条约国组织或是同苏维埃联盟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组织，或是经互会。已经学会在苏联的监护下进行交易的共产党专政管制着它们，苏联的这种监护以涉及相同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是正当的；除两方面的例外外，经互会继续效忠于苏联。

当然，仍然存在重大的区别和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些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还没有进入到非斯大林化的阶段，同时，其他的国家，像匈牙利，已经经历了非斯大林化和正常化两个阶段。一般而言，由于他们暴露在苏联式的管理下的时期比较短——这 40 年相比于在苏维埃联盟内部的 70 年来说——苏维埃化的程度要低得多。历史学家完全不愿去强调差别或是相似性。无论如何，事实是，战后 40 年中，东欧八国的历史经历是与苏维埃联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西欧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不用想象，他们全部都被包括在被描述成是受欢迎的或是民主的范畴内。

在最初的斯大林主义阶段（1945—1953 年），所有的东欧国家被迫接受这种当时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部普遍流行的制度类型。在紧接着战后的几年中，斯大林一直坚决主张加强对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境内的苏联地区的控制。与此同时，在别的地方建立起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坚持强硬的一致性的原则。但是，从 1948 年起，纪律变得严明起来；为了应付杜鲁门主义，铁幕中的任[1100]何缝隙都被填封上了。在不存在斯大林主义的任何地方冷酷地推行斯大林主义完全是斯大林主义晚期的主要特征。一群苏联的"顾问"和专家被安插到本地基层组织中以确保实施标准化和保持对中央的绝对服从。

在这个新的星系中，斯大林仍然是"闪烁着耀人光芒的太阳"。但是在东欧八国的每一个国家中，一群光芒较弱的太阳，权力弱小的地方斯大林们却已进入运行轨道。贝鲁特、哥特瓦尔德、拉科西、乌布利希、乔治乌—德治、日夫科夫、铁托和恩维尔·霍查，他们全部是莫斯科培养出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克隆体。把他们称作"傀儡"已经是对他们的奉承了。

南斯拉夫很早以前就是惟一一个拒绝顺从莫斯科意志的国家。铁托（1892—1980 年）执政时期都是这样。铁托是一个克罗地亚人，早年就投身到自己祖国的战斗中去，他拥有西方强权对他的支持，他没有依靠苏联的协助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因此他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有过不光彩的镇压记录。由他建立的，受塞尔维亚统治的多民族联盟几乎效法俄罗斯完全统治苏维埃联盟，并有效地抑制了民族问题的发生。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联盟于 1945 年成立。它的宪法确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联盟和六个拥有宪法修订权的共和国的权利，并于 1946 年 1 月起一直发挥着作用。但是铁托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根基，而且不愿任人摆布。他并不喜爱集体化农业，而对工人们实行的自我管理机制感兴趣。因此，当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责难］时，他并没有下力气去改过。1948 年 6 月，他和他的政党被驱逐出情报局；此后的几年中，他们生活在随时可能受到苏联惩治的威胁中。他们做到了许多人相信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都验证了这点，即便是公开反抗斯大林，尔后依然能够继续生存。在 1955 年赫鲁晓夫来访期间，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言归于好。但是南斯拉夫从未加入到经互会或是华沙公约国组织之中。脱离行动一致的苏联以后，它就可以自由地、卓有成效地去领导不结盟国家的运动了。

当南斯拉夫正要脱离苏联时东德加入到苏联中。在苏联地区发生的政治事件一直都呈现出一种使人满怀希望的假设，认为正在为建立

一个团结的共产主义德国而奠定根基。对柏林封锁的失败和宣布西德的成立展示出这种希望是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49年10月7日正式制定了宪法。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定宪法的时间晚五个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制定的宪法是为了将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许多的在共产党国家统一阵线控制下的附属国相结合。在第一次选举中，99%的选票投给了统一阵线。苏联占领军为自己保留了重要的权利。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了支持农民所有制运动而大规模实行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为此被延期到1953年才开始实行。持续出逃的逃亡者：那些10年以来可以搭乘从腓特烈施开往蒂尔加滕的地铁到达西柏林的任何人成为了首要的问题。在那12年间，即1949—1961年间，数以千计的人利用这种机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欧洲惟一一个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的国家。

经济互助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经互会，于1949年1月8日在[1101]莫斯科成立，在那里，依然保留有秘书处。包括创始成员国与阿尔巴尼亚（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0年）、蒙古（1962年）和古巴（1972年）。在当时，它的主要职能是支持用苏联的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离人民民主国家正式并入到苏联的体系结构中还有多远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只能去依赖运气，那这个问题将不会具有典型的特征。在独特的党内控制机制中可以找到主要的线索。如果“社会主义国际性”意味着任何事情，即苏联共产党可以轮流控制他们所负责的共和国内执政的兄弟党的事务。苏共中央秘书处下属的国际部特别被委任以这种至关重要的任务；它的每一张“办公桌”都负责监视一个特殊国家的内部事务。通过这种渠道，兄弟党中的所有领导职位都被纳入到莫斯科高层机构的官名体系中（注：管制人名录）；并且在采取一致行动的国家范围内，苏联特务能够被随意安插在关键的职位上。苏联共产党政治局能够有效地任命全部其他的政治局。克格勃能够有效地展开全部其他的有关共产党的安全服务，并且使全部新兴军队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化。1945年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并不希望他的附庸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大规模军队；因此，1948年以前他一直没有采取扩张行动。苏联的军事专家们实行直接控制，使得建立一个与北约一样的正式军事联盟的做法没有成行。

斯大林主义最为明显的特征可以从1948年6月以后的一系列的肃清活动和摆出重惩兄弟党领导阶层的样子中看出来。斯大林将曾用来对付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把他的东欧同志们放入“绞肉机”中。在华沙，1948年12月刚成立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议会目睹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受到“国家转轨”的指控前奴颜婢膝的自我批判行为。在索

菲亚，代总理科斯托夫，被指控推行铁托主义而被审判进而处死。在地拉那，科奇·佐治（Koci Dzodze）因涉嫌策划将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而被判处死刑。在布达佩斯，外交部长拉伊克被审判和处死。在布拉格，在经历了诽谤中伤和检查试验时期后，矛头直接指向了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1952年11月在对斯兰斯基举行的审判会上，14名被告中有11人是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指控被添加到对比较常见的铁托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苏维埃主义和外国间谍的指控之中。

在后斯大林主义的第二阶段（1953—1968年），苏联的附属国们一直朝着一个被用不同的名称标示的"国家共产主义"或"多中心主义"的阶段前进。每一个兄弟党都应该要求这种确定其自身单一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权利。苏联共产党保留有武力干涉的权利以防社会主义的收益处于危险之中。"社会主义的利益"仅是一个表示共产党垄断权利和表示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的代名词而已。

[1102] 在这种因莫斯科集体领导间的暗斗而产生的半信半疑的风气中，更有胆量的一方控制了局面。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的工人举行示威，威胁要发动公开的起义。苏联的坦克残忍地从他们身上碾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佩尔森（Plsen）也曾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民众的抗议呼声超出可以忍耐的程度。在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从容地放弃了几个重点政策。强制性的集体化被暂停；可恶的由苏联控制的安全局被替换掉；被监禁的党领导和大主教被释放。一位共产主义诗人在一首被获准发表、写给成年人的诗中大胆地宣称生活并不圆满：

> 他们叫嚷着向我们跑来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割破手指并不疼痛。"
> 但是他们感觉到了那种痛苦。
> 他们失去了信念。
> ……
> 过度劳累的人们……
> 吃不到苹果的波兰儿童……
> 女孩被迫去说谎……
> 人们相互诋毁、扭打，
> 在大街上互相攻击
>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怎样才是普通的流氓……[26]

华沙条约组织于1955年5月14日成立。人民民主的军队也成长

了七年；人们达成共识，本国军官兵团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来。多亏综合的政治结构，华沙条约组织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自由平等伙伴关系的联盟；没有一个成员国的军队拥有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但是在标准的武器装备和联合训练中却可以体现出明显的军事优势；这强烈地显示出国家的荣誉。这是为反对西德加入北约而对北约发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1956年证明是关键性的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场彻底贯穿东欧的冲击波。东欧的兄弟党不得不向斯大林背叛他们的罪行妥协。例如，曾向西方传媒泄露了该事件的波兰代表团事后获悉，战前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领导阶层因受到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指控罪名而被谋害了。贝鲁特当场死于心脏病。当年夏季时，这种情况发展达到了沸点。当统治党守旧的统治管制被那些自诩为改革者的要求所动摇时，动荡不安的局面开始时常出现。6月份在波兹南，波兰军队向举着旗帜、要求“面包和自由”以及“俄罗斯人回家”的示威者开枪，致使53名工人被杀。10月份，首先在华沙其后在布达佩斯，两个兄弟党在没有首先申明在莫斯科作出选择的情况下，采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改组政治局。

赫鲁晓夫对东欧的操纵陷入危机与美国的总统选举和苏伊士危机正好同时发生。对中东问题的分歧致使西方强权貌合神离；苏联此时[1103]有充分的时间来处理华沙和布达佩斯的问题。

10月21日星期日那天，中风的赫鲁晓夫未经宣布飞到华沙。他发现了被全副武装的波兰突击队和坚定地支持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波兰领导阶层包围的城市。（后来有谣言声称波兰已经突破了东德而加入到了北约阵线中。）两天的会谈说明哥穆尔卡的“波兰社会主义之路”并没有与苏联的基本利益相抵触，并且与他最大的，据说是最为勇敢的同盟国间的公开冲突也的确不是期望之中的。因此赫鲁晓夫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哥穆尔卡继续任总书记，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他的顾问应被撤职。一时间，哥穆尔卡沐浴在成为波兰的救世主和惟一受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光辉之中。

在布达佩斯，事件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并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给华沙带来烦恼。赫鲁晓夫对此感到焦虑，他以前对南斯拉夫，现在是对波兰人的宽宏大量不应被解释为慷慨的软弱。对匈牙利的镇压所引起的军事问题比在波兰所采取的行动所引起的要小得多。与波兰人不同，匈牙利的同志们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10月23日和24日晚间，波兰危机在这一刻得到缓解，匈牙利政党的斯大林主义书记兼国家安全主席格罗，拉科西的继任者要求苏联出兵干涉以避免其被撤职。匈牙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战败投降了。首先双方似乎可以

达成和解。苏联从匈牙利首都撤军；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抛弃了格罗并赞同亚诺什·卡达尔——一个曾遭受斯大林主义者迫害，像哥穆尔卡一样的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者接替其职位。这似乎是制约了已经成为总理的党的改革派领导伊姆雷·纳吉的活动进展。苏联最终同意撤军据说是谈判的结果。赫鲁晓夫准备第二次在布里俄尼拜访铁托。但是那时纳吉承认几个非共产党员混进了他的政府，打破了共产主义垄断。释放明曾蒂大主教引发了情绪高涨的示威游行，随后爆发了对令人痛恨的秘密警察的攻击。11 月 2 日，民众压力迫使政府请求联合国的协助并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公约国组织。4 日黎明时分，苏联装甲师未发出警告便再次侵入布达佩斯。英勇的匈牙利青年赤手空拳地同苏联坦克奋战了 10 天。鲜血染红了土地。纳吉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庇护，他后来又因苏联的安全指导而离开那里，其实正好被抓了个正着。在他被监禁在罗马尼亚后，根据事先安排，他和他的 2000 名追随者被枪杀了。数十万难民涌入奥地利。最终的伤亡代价达到了相类似的比例。匈牙利完全处在安德罗波夫的随从卡达尔和一个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革命政府的掌握之中。

匈牙利民族起义在苏联的档案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展[1104]示给世界：共产主义是不为民众的要求所动的。它摧毁了许多左派分子踌躇的同情心，毁灭了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党派在西方发展的前景，并且极大地加剧了冷战的紧张状态。在苏联集团内部，它冒犯了赞同共产主义的国家变体和力图代表哥穆尔卡和纳吉进行调解的毛泽东。它同样为通用的经济策略提供了推动力，而布达佩斯的胜利者安德罗波夫和纳吉是经济策略的主要鼓吹者。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了教训。在后斯大林主义竞赛的规则被完全理解前，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相类似的痛苦的折磨。

1960 年中苏关系的破裂仅对惟一一个欧洲国家，即阿尔巴尼亚产生了影响。就像中国人一样，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在关于非斯大林化的问题上有重要的保留。而且，因为铁托和斯大林的绝交，他们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并且不再拥有与苏联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共享的边境，保护他们免受苏联干涉。因此，他们决定走“中国式的道路”：地拉那把它对莫斯科的忠诚转给了北京。它依然是完全的斯大林主义者，完全实行集体化和无神论，完全处于孤立之中，且与所有的邻国都发生过争执。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情况还没有一丝改变。恩维尔·霍查宣称，“阿尔巴尼亚的惟一宗教就是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

[山鹰之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采用了部分仿照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制定的新经济策略，并承认现有的斯大林主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

陷。一种发展就是把经互会作为共同计划的合作者的招牌打出来。经互会给每一个成员国分配特殊的任务，并花大力气来传播现代科学技术。除了罗马尼亚外，这项措施令每一个成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主要的实验计划却在匈牙利首先启用。现任苏联共产党国际部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和卡达尔都认识到，随着匈牙利起义而产生的恐怖统治已经为明智的经济实验法创建了开端。经济改革不用以政治混乱作恐吓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将治愈营养过剩的公民们的自由梦想。主要的思想是将受限制的市场机制引入到一种仍然由国家控制的体系中，放宽对义务交付和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从而鼓励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繁荣正在令匈牙利人忘却他们的政治不幸。布达佩斯成为一个餐馆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没有政治的城市。"卡达尔化"似乎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折中办法，特别是对西方的经济学家来说，它不具有政治意义。

三个国家都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没有对这种发展中的趋势作出反应。

在所有人民民主政权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政权是最为勉强的。东德的国家安全局，一种拥有可怕名声的安全机构培养出它强硬的、意识形态上的盲目因袭的态度和极端的亲苏维埃制度。柏林持续的分裂和将近40个师的苏联占领军的存在而导致这种机构遭到破坏，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大批国民连年不断的离去。1961年8月13日，东西柏林间的所有十字路口都被封闭。在此后的28年[1105]中，柏林墙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陷入了牢笼，成为欧洲最为明显的共产党压迫的象征。放弃了所有关于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的想法，而同意代之以这样一种理论，即东德是由一个具有不同传统的分裂出去的民族继承的。花大力气来推动重工业的发展，通过大量游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赞助商来赢取国际社会的认可。到1971年乌布利希将总书记职位让给昂纳克时，东德和西德之间即将以一种"共生"(Vivendi)形式达成共识。然而，萦绕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情绪苟延残喘了近30年。"我们非常喜爱德国，"一位法国部长严肃地说道，"我们宁愿存在两个德国。"

罗马尼亚人讨厌一切变革，但是从来没有强制一种公开的破裂。1965年当选罗马尼亚共产党联盟总书记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1989年)，推行一种既古怪又臭名昭著的路线。作为一个指挥家，他创建了一种新斯大林主义的个人崇拜方式和一种被生动地形容成"家天下社会主义"的裙带关系的专政。在他制定的宪法中宣称，罗马尼亚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境界，但与此同时，它的人

民却处在恐惧和赤贫之中。他那令人恐惧的国家安全部令同时期的克格勃都相形见绌。他力求通过最少的外交手段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寻求平衡；并且他通过与以色列建交以及处在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范围内而获得了（不值得的）西方的赏识。他带着自己的品酒师暂住在白金汉宫，听取了英国外交部的劝告，被英国女王授以爵位。罗马尼亚一直被适宜地称之为东欧的朝鲜——一个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对于其值得怀疑的记录表现得过分自豪，并且本能地在其他黑手党间扮演调解人角色的封闭国家。

保加利亚和东德在为获得一成不变的讨厌的桂冠而进行角逐。工业化开始得比较晚，国家一直从事的是旅游业的开发和葡萄酒贸易。党的领导日夫科夫从1945到1990年一直使保加利亚走在奴隶般的亲苏维埃的道路上。

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68年1月才进行非斯大林化。自1953年哥特瓦尔德去世后上任的总书记安东尼·诺沃提尼的统治一方面不再注意波兰的政治缓和现象，另一方面不再注意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他的政权最终被对占据统治地位以及渴望体系改革的捷克人不满的斯洛伐克人组成的政治局所颠覆。新上任的领导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一位态度温和的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在行动一致的国家集团的历史中，他是惟一一位天生双眼含笑的总书记。言如其人，他主张“人性化的社会主义”。

在饱含生机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初期，杜布切克和他的政府计划实行从上层领导地位开始的强制性改革。但是他们在一开始就暂缓实行审查制度，平民由此被卷入到热情昂扬的辩论怒潮之中。他们是第[1106]一批意识到如果要使改革成功，就不得不发动起群众的心理动机的共产主义计划者。在4月改革纲要中，他们预言在国家国民大会上会产生一位强硬的领导角色。19年后，当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被问及布拉格之春运动和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区别时，他回答道“就是1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实践在与对手的斗争中仅仅实行了七个月。起先，对这件事似乎可以达成共识。苏联的同志很关注所谓的无节制政策，诸如媒体的宣传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肯定了它实行社会主义的承诺，它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的友谊，以及它继续留在华沙条约国组织中的决心。然而在7月，却在全国开始实行威胁华沙条约组织的策略，并且勃列日涅夫和以及他们的政治局成员在边境的蒂萨河边的切尔纳村庄就此开了一次私人会议。在那之后，这种策略被停止并且军队也被撤回。

1968年8月21日黎明，在从除了罗马尼亚以外的华沙条约国组织中调集的50万军队没有事先警告就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人

联合旁边的东德人从北方侵入，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从南方侵入，苏联的几个师经由波兰和乌克兰从东方侵入。出其不意和兵力、火力的集中是势不可挡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没有什么反抗。杜布切克被空运至俄罗斯囚禁起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被中断。华沙条约国组织从此永久地监视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杜布切克适时地被胡萨克取代，他是一位像哥穆尔卡和卡达尔一样，尽管残留着对斯大林主义痛苦的个人回忆，但依然信奉他的老前辈。当这一切全都过去后，勃列日涅夫在 1968 年 11 月于华沙举行的一次由行动一致的国家集团领导参加的首脑会议上清楚地说明了苏联的地位。勃列日涅夫主义明确地声明，莫斯科是因为社会主义的责任才被迫使用武力进行干涉，以保卫其盟国的“社会主义果实”。东柏林（1953 年）、布达佩斯（1956 年）和布拉格（1968 年）都是其中之一，但没有根本性的进展。行动一致的苏联集团内的成员根本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远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残酷得多。但是在世界范围电视机屏幕上所显示的以及它对世界的舆论冲击却是巨大的。这件事受到了几个共产党国家的谴责。中国称其为“厚颜无耻的纳粹权力政治”，南斯拉夫称其为“非法入侵”，罗马尼亚称其为“对主权国家的一次不可容忍的亵渎”。它给欧洲大陆带来的是一场永恒冰峰期。少数收听广播的人也不会忘记布拉格电台最后一次自由广播中劈啪作响的倾诉的声音：“当我们不再是新闻的时候，请记住捷克斯洛伐克。”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三阶段（1968—1985 年），行动一致的苏联集团眼见被勃列日涅夫主义奠定的标准正在受到一种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社会阶层以及最终的政治抗议所形成的日益壮大的潮流的挑战。全部的权力手段都处于共产主义者权威人士的掌握之中；因此，反对派不得不寻找新的、非暴力的渠道。捷克斯洛伐克是主要的“正常化”榜样。波兰则是主要的挑战者。

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确实成为了一件可怜的展品。胡萨克无所[1107]不用其极地施行党对社会控制的统治，用以摧毁布拉格之春运动的精神。这其间虽然没有开枪镇压或是进行审判，但是扬·帕拉赫，一位当众自焚的青年学生，他的绝望却抓住了民族情绪。

前任部长和大学讲师们都被送去做最卑贱的工作——杜布切克成了森林巡视员。受到警察的骚扰是普遍现象。布拉格这个欧洲最美丽同样又是经济最为萧条的城市。在剧作家哈维尔把周围的一群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写入其《77 宪章》——人权宣言之前，10 年的光阴已飞逝而过。

在行动一致的苏联集团内，区域化是其后期的主要特征。不管如

何赞口不绝地歌颂社会主义的国际性，这个集团还是被划分成一连串的类似船上的防水密隔舱。国家共产主义鼓励建立这种状况，即在与莫斯科保持密切的联系的同时，各自间也相互独立。将波兰同立陶宛或乌克兰或是1968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开的警戒线就像铁幕本身那样严格。逮捕了一群身强力壮，肩背遭禁的文学作品穿过白雪皑皑的塔特拉山脉山脊的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员很好地说明了事态的状况。东欧人其实比他们的近邻更熟悉西欧和美国的生活。

波兰人民共和国显示出许多不寻常的特性。它是苏联最大的附属国，拥有一支数量上超过英国的军队。不管是在结构上还是心理上它的苏维埃化程度都是最低的。波兰的农民已经成功地避免了集体化；波兰的律师业抵制共产主义的垄断；波兰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阵线的伪多元论允许存在无党派政治。最为重要的是，在令人敬畏的大主教斯蒂芬·C. 维辛斯基(1901—1981年）管制下的罗马天主教会并不像其他的地方那样屈从于政治控制。1956年12月达成的协议令教会取得了完全的自治，只要党的统治没有被公然颠覆。党的社会学家一直在推测那发展迅速的，已将波兰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强国的现代化会迅速地破坏宗教。实际上它是一种保留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忠诚，反而削弱党（的势力）的教会。

波兰的敌对和正常化周期持续了25年。哥穆尔卡从一个民族英雄迅速地转变成一个乖戾的老上司。在1960年代中期他镇压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1968年3月镇压了学生运动，1970年血腥屠杀波罗的海港口抗议的工人。1968年，把争夺权利的目标转向党政机构中的犹太人成分的党内极端民族主义者小集团的挑战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没有显著特点的、不体面的“反犹太人复国运动者运动”，致使波兰境内几乎是全部残余的犹太人纷纷离开波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爱德华·盖莱克的10年统治中采取了一种由西方过剩贷款资助的“酸菜炖[1108]肉”式的策略，并且，在保护工人委员会中形成了由统一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工人阶层组成的反对党，即“团结工会”的前身。1979年6月波兰人罗马教皇的来访创造出一种孕育变革的道德氛围。

1980年8月一群格但斯克造船厂意志坚定的罢工者组建了团结工会。它由一位名不见经传且绑在“狼票”上的失业电工莱赫·瓦文萨领导。罢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由上百万人参加的抗议活动。团结工会主张采取非暴力行动，它并不同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它仅仅确保自己的组织中没有共产主义者。作为在行动一致的苏联集团内惟一的一个独立组织，它赢得了罢工和招募成员的正当权利。党员们开始成群结队地退党。团结工会威胁要在一年内不加尝试地推翻现存的统治

秩序。莫斯科的观点认为团结工会必须被镇压。一次非共产主义性质的工人运动是应受诅咒的。患病的勃列日涅夫让苏联军队负责警戒，把剩下的工作留给波兰军队去做。1981年12月13日晚间，在厚厚的积雪的掩护下，沃伊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动了一次在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完美的军事政变。几个小时后，有四万到五万名团结工会的激进主义分子被逮捕；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并且军代表接管了全部主要的公共机构。戒严令暂时令国家处于瘫痪状态。1982年，强制稳定国内局势后，雅鲁泽尔斯基开始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正常化"看起来似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它是一场最虚伪的胜利。在七年时间里，雅鲁泽尔斯基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历史必须给使苏联集团屈服的波兰人记功。

尽管从表面上看，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的出现后来可能被认为是第一个将要打碎莫斯科自身外表的改革趋势。当认识到这个制度是病人膏肓时，这种趋势最终会以俄罗斯改革或是"重组"的名义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由克格勃产生出的，是惟一有办法知道真正会发生什么事的机构。雅鲁泽尔斯基已经担任了25年波兰军队的军事政治部门首脑的职务。他必然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指挥克格勃的代理人。他以"施洗者约翰"的角色对安德罗波夫的另一个门徒戈尔巴乔夫起了作用。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勾结注定会把波兰变成"改革的实验室"。

到1980年早期，行动一致的苏联集团的内部操作已经不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40年的腐蚀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力气。表面上，一切显得井井有条；私下里却十分混乱。在洲际弹道导弹时期，华沙公约国组织的疆域不再成为有效的安全缓冲区。在石油价格偏高的时期，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苏联所消耗的要多于其所补充的。在有电视的时期，东西部每一家的生活状况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团结工会指出工人们已经不再尊重"工人的国家"。共产党精英的重要部门将会失去统治的意志。在间谍历史上，雅鲁泽尔斯基最亲近的副官之一选择走上了爱国主义的道路，他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华沙条约国组织近十[1109]年来有如洪水般多的间谍活动档案。[27]

无论如何，这就是尤里·安德罗波夫的职业生涯，他为开始使苏联居于领先位置其后使苏联体系崩溃瓦解的非凡的领导方针的改变提供了钥匙。作为驻布达佩斯的大使，安德罗波夫一直是实行政治改革的替代经济策略的合作人。作为苏联共产党国际部的主席，他必然知道一直困扰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是波兰的代价沉重的起义可能会蔓延到苏联。作为在关系缓和时期（见原书第1115页）时克格勃的首脑，他是可以看到外部力量和内部衰落之间对比最为明显的

人。1970年，安德罗波夫发动了一次巧妙且灵活的迫害苏联反对派的运动。他不需要动用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取而代之的是缩减了四处游荡的人，同时把顽固分子送入精神病院或是流放到国外。他通过给予犹太人移民到国外的特惠权利来驳斥苏联犹太人与日俱增的不满。当那些文件审查通过他的办公桌时，他可能惟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最杰出的天才不热爱共产主义。这些天才可以列出很多：政治小说家索尔任尼琴、舞蹈家努列耶夫、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洛波维奇、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不屈不挠的生物学家布科夫斯基、数学家安德列·阿马尔利克（他在奥韦尔之后著有《1984年苏联还能幸免于难吗?》一书）。这些人必然会在安德罗波夫与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在矿泉疗养地治疗肾病时照顾他的年轻聪明的党书记的长谈中着重提及到。

无论如何，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倾向一再受到阻碍。苏联政治局中挤满了现状的拥护者。戈尔巴乔夫1979年被从斯塔夫罗波尔调来仅仅是分派给他管理苏联农业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直到临终前，安德罗波夫也没能实现他的愿望。他的去世给予了勃列日涅夫分子一份最终的无为租约。不管阿尔马利克的预言如何，1984年到来了也过去了；苏联帝国因没有改革而幸免于难。

东西方关系：冷战在欧洲，1948—1989年

从开始到结束，冷战的焦点都在欧洲。其动力来自欧洲国家“大三角”的崩溃，使胜利的西方同盟面对着一个胜利的苏联（见原书第1312页）。它还源自战时同盟的无能为力，在波兰独立、德国的未来以及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分割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准确地说，冷战何时开始尚值得商榷。但是，在美国向欧洲许诺，正如杜鲁门主义和1947年马歇尔计划所表达的，以及随后的苏联的不予同意中，冷战就抬头了。1948—1949年苏军封锁柏林，导致了北约的形成，冷战明显在进行中。直到40年后铁幕在欧洲破裂，冷战还没有结束。不[1110]过，值得强调的是，冷战很快超出了欧洲的范围，一直有一个亚洲部分。从美苏竞争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内部逻辑，使之转变成真正的全球对抗。

亚洲部分的对抗来自争执，同欧洲发生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进入角色，1945年8月苏军投入到反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战役中。雅尔塔协定规定，作为斯大林参战的报酬，苏联可以占领库页岛。但是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任何一方都没有预料到由于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导致日本的突然和整体的崩溃。这对于苏联来

说完全是意外的喜事。他们迅速占领了满洲，把 60 万名关东军赶到西伯利亚的帐篷里。而且，除了库页群岛的主要岛屿以外，他们还占领了日本至今仍然认为是北海道的一部分北方四岛，将其更名为“小库页群岛”，把鄂霍次克海变成苏联的战略内湖。还有，苏联还公开支持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革命，现在他们直接插手。在中国，苏联反对美国的长期代理人，曾经在对日战争中是伟大同盟的一部分的蒋介石政权。到 1949 年毛泽东进入北京时，一个“竹幕”在远东形成，与欧洲的铁幕相呼应。

冷战的全球化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地缘政治学上而言，这是一个在欧亚大陆上主导了大量地盘的国家与另一个可以把陆地、海洋和空中力量伸展到世界的所有角落的国家之间相斗的自然结果。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来讲，它反映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庇护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集团同另一个追求民主、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当时的非殖民化进程加剧了这种对抗，产生了一系列动荡不定的后殖民国家，这些地区有价值的资源形成了无法抵抗的诱惑，例如石油蕴藏丰富的中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洲际弹道导弹的发明使冷战的全球化成为定局，整个地球都处在永久的监视和突然的核袭击的范围之内。从此，俄国的城市和美国的内陆都成为前线，与中国台湾和柏林一样。

在军事领域，冷战经过几个明显的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在核武器储备和空中打击方面都决定性地处在领先地位，苏联不能冒险发生重要冲突。1951 年 1 月在莫斯科会议上，当时正值美国身陷朝鲜之时，斯大林明确指示苏联集团的领导人们做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但是这一计划从未见效。[28]首先是英国在 1952 年，然后是法国在 1960 年独立发展了核力量。北约声称“压倒一切的报复”主义。两场共产主义代理人的战争打响了，一场是 1950 年 1 月发生在朝鲜的反对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的战争，另一场是印支战争，1954 年被打败的法国军队向美国人让路。欧洲方面，虽然在两个武装营地内都密布武器，但没有爆发战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游戏发生变化。感谢 1958 年的人造卫[1111]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于 1957 年 10 月 4 日发射成功——译者注）和 1960 年的 U-2 飞机事件，克里姆林宫得以证明其火箭足以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两个超级大国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太空竞赛”，部署地球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虽然美国把一个人运到了月球上，赢得了竞赛，但是不能确定真正的军事优势在哪一方。苏联似乎正在核武器、传统陆军和海军力量方面占据优势。但是“战术”和随后的核武器“战场”的出现，同北约新的“可伸缩反应”主义一起，

使任何纯数量的计算显得多余。如果发生主要洲际弹道导弹的对射，将越过北极上空。这一认识使欧洲上空的压力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对峙带来的军事花费达到最大限度。华沙公约采纳的攻势战略不见实施。急剧扩张的苏联舰队没有投入检验。大量的重新武装同不止一次的更加脆弱的解除武装的企图一同进行。但是再次，欧洲的冲突没有发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一代更致命的武器的部署，尤其是苏联的SS-20s导弹，美国的巡航导弹，开始新一轮的军事竞赛。1983年里根总统提出数十亿美元的战略防御计划（SDI），通常称为“星球大战计划”，是一个以太空为基地的反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公开对莫斯科提出挑战。但是却不能简单应战。每一方都拥有数千吨的核能量，可以把卫星破坏多次；哪一方又不可能使用它们。主张制止核武器的人坚决相信他们的观点将被采纳。反对的一方——只能在西方自由言论——以同样的热情相信军事设计者，像斯特兰奇洛夫博士发疯了。但是和平女神由原子弹掌握着。

除了一些轻微的滞后，冷战的政治节奏通常紧跟着军事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形势最为紧张，双方都确信自己追求的事业不会失败。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对抗达到顶点。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虽然有多次警告，双方都丧失了能简单获胜的信心。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共产主义陷于瘫痪，1969年苏联将先发制人的核武器攻击针对北京；强大的美国因为不能制服弱小的越南而万分沮丧；北约由于戴高乐主义而深深分裂。因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和美国都十分后悔，转而更多强调缓和。在维也纳首次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很快成为政治讨论，导致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越南，以及1981年在波兰宣布军事管制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势再度紧张。事实上，在冷战的所有阶段，都可以看到威胁与缓和的微妙混合。在对抗最冷峻的年代有缓和的时刻，而在所谓的[1112]“缓和”年代也有紧张的瞬间。当然，在40年没有发生公开战事的欧洲，也许称为“冷战”没有称为“热和平”更准确，如同一个法国评论家所称谓的那样。这是一场时高时低、反复多次的发烧。

经济关系从未达到潜在的水平。西方不愿意出售先进的、具有军事价值的技术。美国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列出的单据包括数以千计被禁止的商业信息。东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持经济自给自足，宁肯落后，也不依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苏联农业连续歉收，导致对大量购买美国谷物的恐慌，而百分之五十的苏联石油产品被指定为经互会范围内的亏本贸易。

文化关系在规模与内容上都很保守。布尔什维克芭蕾、红军合唱团或玛祖夫舍（Mazowsze）民间舞蹈团的巡回演出，与各种各样的西方交响乐团或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相交流。苏联阵营的国家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充分准备，由国家支持的运动员表现良好。体育被当做一种政治工具，在1980年美国联合抵制莫斯科运动会和1984年苏联在洛杉矶运动会上报复表现最为公开。

外交关系被各种各样的障碍包围。联合国安理会瘫痪长达40年，最经常地是由于苏联的否决权。间谍战达到了奇怪的均衡：苏联在英国招募雇员盗取了西方最高级别的情报，在东方德国的间谍则达到波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时代，对共产主义间谍在美国活动的合乎情理的恐惧导致一场完全不合理的搜寻间谍的行动。随后，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检查出窃听设备，以致使馆不得不被放弃。没有信任。

防御恰恰起源于冷战的开始。斯大林曾经允许重新统一德国以换来摆脱美国。在1955年日内瓦会议上当艾森豪威尔总统遇到斯大林的接班人时，西方再次惊讶地发现苏联同意裁军。1959年在戴维营看到了赫鲁晓夫，麦克米伦则戴着哥萨克的帽子出现在莫斯科。但是正在进行的对话由于U-2飞机事件、第二次柏林危机，以及最为严重的在古巴发现苏联的导弹事件而中止。

U-2飞机是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高空侦察机，据称能够免予受到攻击。1960年一架来自土耳其的飞机在伏尔加河上空被击落。艾森豪威尔愚蠢地否认所有这些行动的存在，直到赫鲁晓夫亮出了驾驶员以及指责他的行为的证据。

1961年柏林危机酝酿已久。从东到西的难民流日渐增加。仅在1961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就有1万人穿越分界线。克里姆林宫不止一次的威胁要与民主德国签署一个单方协定，以终止四国占领的权力。苏联在地方驻军上占据多数优势。但是西方没有反应。然后在1961年8月13日筑起了一堵墙。年轻的肯尼迪总统面临从未有过的考验。他私下安慰说这堵墙减少了第二次封锁柏林的机会，因此没有[1113]作出军事反应，相反，他发动了一场宣传行动。站在墙的一边，他用独特的、缓慢的波士顿音调大胆地宣称："我是一个面包圈。"*

第二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把冷战带到战争的边缘。肯尼迪已经从柏林危机中走出来，加上此前他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会晤，确信他在迫使莫斯科服从美国的决定方面遭到失败。接下来，他不得不

* 他误将德语"Ich b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说成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面包圈）。

给出确凿的证据。他提升了美国在越南南部的行动。当空中照片显示在古巴地下导弹发射室出现的苏联导弹距佛罗里达海岸仅仅90英里时，他决定必须迫使克里姆林宫撤退。惟一的问题是怎样撤退。华盛顿拒绝了将古巴进行隔离的外科手术般的空中打击。这一星期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然后苏联导弹撤出了古巴。美国也着手从土耳其撤出自己的导弹，并忍住不去攻击古巴。[29]

裁军谈判拖延了数十年之久。日内瓦允许创立者越过苏联的拒绝进行检查。1963年的莫斯科协议禁止空中核试验，但只是在给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损害之后。1968年的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旨在维护五个已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垄断权，尤其把中国排除在外。除了在当时起制止作用外，它在所有方面都是失败的。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一轮会谈（SALTⅠ）在四年后，于1972年达成一个过渡性结论。第二轮会谈（SALTⅡ）一直搁浅，直到1980年被美国国会阻止。在减少军事武器的绝对拥有数量方面，与限制其增长的速度正相反，协商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关于涉及常规武器的减少共同平衡力量的会谈，在维也纳进行了15年。关于涉及核武器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START），从1982年开始在马德里进行。政府间长达30年的谈判没有多少效果，反对核武器的群众运动也软弱无力，虽然这一运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在西方得到相当的支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再次得到支持。

相对于美苏对抗的主流而言，欧洲国家直接卷入冷战外交不可避免地位居次要。但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它们逐渐坚持自己的主张。1957年，在苏联的同意下，波兰向联合国提交了在中欧建立无核地带的拉帕基计划，1960年提出在同一区域实现核冻结的哥穆尔卡计划。以后没有发生更多。1965年波兰的天主教主教向其德国同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他们已准备好“原谅和被原谅”。这种有勇气的首创之举，虽然被共产主义政府宣布为叛变行为，却在充满恐惧和仇恨的道德迷雾中指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1114] 苏联在东欧的政策对德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共产主义宣传付出巨大的努力，使战争时期的德国恐怖症得以存在。在西德，被驱逐者刺耳的声音为基督教民主政府带来相当沉重的负担，其祖国东部无秩序的命运只能使热情逐渐高涨。盛行的政治气氛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温和，很大程度上通过德国教会的良好管理，为勃兰特的东方政策铺平了道路。

东方政策于1969年提出，由一系列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成。在紧急的情况下，勃兰特寻求打破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所形成的东西方关系的僵局。自从联邦共和国得到完全承认，西德追求所

谓的哈尔斯坦主义，拒绝与民主德国建交的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除外）。结果导致对几乎所有德国东部邻居的完全隔离。在打破坚冰之后，勃兰特开始寻求与民主德国以及苏联集团的其他成员的妥协。他希望西德和东德通过10年、20年或者30年的逐渐增多的交往，将软化东柏林的体制，从而导致事实上的和解。东方政策的前两个目标显然实现了。第三个目标则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能确定勃兰特是否曾真的希望德国重新统一。在退休期间，他承认："重新统一是德国政治生活的谎言。"

虽然如此，勃兰特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具有相当影响。东欧没有料到德国会出现一位具有明显和平意图的社会民主党总理。作为吕贝克一个女店员的私生子，勃兰特（1913—1992年）经受了所有可能的社会上的不幸。战争期间在挪威度过，参加了反纳粹的斗争，他具有纯洁的民主资格。而且，在1957—1963年担任西柏林的市长期间，他获得了坚决抵制共产主义的声望。因此，在德军失败后二十五年，即1970年8月他出现在莫斯科时，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10月，在波兰，他在华沙犹太人的烈士纪念碑前下跪，这一令人感动的姿态将长久留在世人的记忆中。在东柏林，他的提议不会遭到抵制。在三年内，他锻造了《德苏合作条约》（1970年）、《德波条约》（1970年），拔出德国失去领土的这根刺，1973年与民主德国签署了相互承认的条约。铁幕和柏林墙没有破裂，却被赋予了新的改善的机会。虽然德国问题没有解决，但却通过最低限度的交往，在一个稳定的框架里得到修正。勃兰特的保守反对派指责他出卖了德国与生俱来的权利，他回答道："一个人不能出卖他已经赌输的东西。"

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西德的新东方政策是否加剧了欧洲的分裂，通过耻辱的让步，它事实上为重新统一铺设了道路。两种解释并[1115]不矛盾。当然，它为接下来的十年定下了基调。直到结束对民主德国的联合抵制，它使联邦德国花费巨大，却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回报，还有大量暗动作，例如政治犯的丑恶交易，东柏林出卖之以换回高贵者的赎身。通过缓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充满威胁的气氛，它为"缓和时代"开辟了道路。

缓和是一个经过选择的含糊的外交词汇。对那些主张者来说，其意思可以是"放松"或"温和的天气"。它在法语中还有枪的扳机的意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显然意味着缓和压力，但是这种缓和是否产生健康的或致命的影响则可以进行公开的推论。

除了波恩的新东方政策和第一轮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在遥远的中国还可以找到对防御的重要鼓励。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拜访了年迈的毛泽东主席，由此"打中国这张

牌”。冷战的两极结构转变成一个新的由苏联集团、中国和西方组成的三角结构。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僵局，苏联领导人感到迫切需要稳固其在欧洲的位置。毕竟，在斯大林格勒胜利的30年后，虽然在西部侧翼没有一个正式据点，苏联依旧存在。谈判从1970年开始，在1973—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达到高潮。

在苏联看来，赫尔辛基最终协定取代了从未实行的德国和平条约。在西方看来，它标志着承认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地位不能通过暴力途径结束，并且决定让苏联以昂贵的政治代价购买稳定。谈判的第一项围绕着安全问题进行，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除非共同同意和平交换外，保证欧洲边界的存在。谈判的第二项包括扩展经济合作的措施。谈判的第三项包含一项协议，筹划广范围的文化与通讯项目，并保证人的接触。这就是政治价签。从1975年最终协定签署之日起，东方政权就不得不在尊重公民权利和公开破坏其神圣的承诺之间选择。

赫尔辛基最终协定被很多人批判为是向苏联征服东欧投降。同时，也正式鼓励了遍及苏联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在波兰，它为团结工会的前身罢工委员会作了早期宣传；在捷克斯洛伐克，为瓦茨拉夫·哈维尔领导的77宪章集团作了宣传；在苏联，为众多的“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作了宣传。它完全被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忽略；但是却被美国卡特政府看重，卡特认为，从长久的苏联威胁的角度，没有从欧洲解脱的理由。

[1116]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西方出现了三个新面孔。1978年一个斯拉夫人教皇登上圣彼得的王位，提出要重新统一基督教的欧洲的观点。1979年一个十分刚毅的女人入主唐宁街十号。她很快被克里姆林宫称为“铁女人”。1980年一个退休的电影演员进入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伟大的通讯员”很快称苏联为“罪恶的帝国”。这三个新领导人为东西方关系带来了新气象。三个人在道德层面上都反对共产主义；三个人在东欧都受到巨大欢迎，超过西方；三个人看起来都对以前几十年的和解不满。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北约的双重路线政策，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艰难的经历表明西方正在从三个执著的幻想中受难。在政治学家中间已经流行谈论“趋同”一词——即时间将会拉近东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这是纯粹的假想。东西方差距每一天都在拉大。根据各国对莫斯科的依附程度对共产主义政体进行区分也是适合的。这一政策给像齐奥塞斯库这样最专制的政权带来最大的恩惠。缓和已经培养出了一种被称为“鸵鸟”政策的假设。它认为共产主义者的举止依赖于西方的良好举止。对西方资本的恶意评

论只会鼓励“鹰派”；而善意将鼓励“鸽派”。在实践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模式。没有人屈从一个像雅鲁泽尔斯基那些严厉的话，然而他转向了改革。没有人提供给昂纳克这样多的甜点——但昂纳克还是从前一样的鹰派。事实是，共产主义者并不对善意作出反应。正如最早的一个关于缓和的评论家在其以“希望与失望”为主题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增加东西方关系的紧张程度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也是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的惟一策略。[30]

在这些纷呈的言论中，东方出现了一颗新星。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生于 1931 年）出任苏联共产党第四位总书记。他是被党组织选任的，没有民主资格。然而，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未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第一个苏联领导人。他和蔼可亲，机智敏捷，讲话不带笔记。他是一个男人，正如撒切尔夫人很快宣称的那样：“我们可以和他交易。”

戈尔巴乔夫上任的早期岁月致力于改组苏共中央政治局，例行公事地指责前任领导人，并且进行一场反腐败的危险运动。但是风格显然发生了变化。世界正在等待着看内容是否随之而变。外交政策为苏联领导人提供了最大的调整空间。可以合理地假设，如果戈尔巴乔夫改变，他将第一个改变东西方关系。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第一次会晤没有产生特别多的结果。新来者[1117]采纳了老的“星球战士”的标准。但是军事花费的负担不是秘密。在 1987 年 12 月冰岛雷克雅未克会议之前，为制定减少中程核力量的条约已经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在雷克雅未克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突然停止会谈。他提出了一个轰动性的将所有核武器裁减 50% 的计划。里根眩晕、退却、遗憾。中程核武器条约签署了。但是过去的极端警惕、极端猜疑的对抗也结束了。这位总书记似乎为冷战的停止感到满意。

不久以后，一场特别事件重新使东西方关系紧张起来。空中防御已经是过去十年的军事议题，列在巡航导弹和星球大战之后，耗资数十亿。每一方都担心对方的导弹和炸弹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找到目标。苏联因为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建立一个未授权的雷达站，击落了一架侵入苏联领空的韩国客机 KAL007 而遭到巨大的羞辱。然而，专家对世界军事计划的所有担心因为一个德国男学生的恶作剧而消除。1987 年 5 月 28 日，19 岁的马赛厄斯·鲁斯特秘密驾驶一架微型单翼飞机从汉堡出发，经过波罗的海上空，在拉脱维亚越过苏联边界，而且在世界上空中防御最为密集的地方保持树梢水平的低空飞行，最后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圆石上降落。单枪匹马，他使整个冷战都看起来荒唐可笑。

到1988年12月马耳他会议时，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轻松地宣布冷战结束。

欧洲的统一与分裂，1985—1991年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两到三年里，欧洲的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西欧，美国的存在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欧洲经济共同体仍然局限在经济领域。在东欧，企图穿过铁幕的人仍然会被枪杀，所有的老人像昂纳克、胡萨克、卡达尔、齐奥塞斯库、日夫科夫以及霍查还在执掌政权。“欧洲的其余部分”仍然处于“现存的最后的殖民帝国状态”[31]。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也保持一副强硬的外表。1987年11月他以传统的形式主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70周年庆祝活动。1988年5月，他以斯大林本人也会同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精神在基辅发动了“东正教的千禧年”运动。

但是，在欧洲，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都在快速地向不可预见的转变发展。随着冷战阴云的淡去，人们会在许多地方捕捉到新的、令人兴奋的信息。在戈尔巴乔夫参加雷克雅未克裁减进攻性武器会议之后的两年里，苏联放弃了对其卫星国的控制。

[1118] 在三年之内，西欧的政治统一排上了议事日程，在四年之间，苏联自行消失了。西欧统一的同时，东欧在分裂。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会发生如此规模的巨变。但是，两个人处于这场巨变的旋涡中心。一人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人是欧共体委员会的新任主席雅克·德洛尔。戈尔巴乔夫和德洛尔的政敌认为他们两人都缺乏现实主义：改革者在追求不能实现的改革，统一者在从事无法完成的统一。

雅克·德洛尔（生于1925年）曾任法国财政部长，是一个理想的技术管理官员。他生于巴黎，曾经是一个富于实践的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他没有访问过美国。他还是一个布道者，是莫内和舒曼的忠实信徒。莫内和舒曼的宏伟远见潜伏了30年。德洛尔的反对者称他是一个“欧洲原教旨主义信徒”。舒曼曾经说过：“欧洲不会一举或者仅仅根据一个计划就能建成”，而是必须经过确切的行动。舒曼的话精确地概括了德洛尔的做事方法。德洛尔实现自己抱负的主要工具是《单一欧洲法案》。在他作为欧洲委员会主席的两个任期（1985—1989年和1989—1992年），将是《单一欧洲法案》从概念到实现的重要时期。

从正文内容看，《单一欧洲法案》是一个关于在欧洲经济共同体

内部完全取消贸易障碍和人员流动限制的详尽计划。这一法案 1985 年形成，1986 年得到各成员国批准，共有 282 章。该法案为在 1992 年底建成拥有 3.2 亿消费者的欧洲单一统一市场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还制定了取消欧共体内部边界、实现商业自由竞争、统一对消费者的保护、实现各国生活水平均等、相互承认专业资格、调和增值税及其他间接税，以及统一电视、广播和通讯指标等方面的措施。法案的第 148 章确定了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的多数表决原则。部长理事会成员表决权的大小是由其拥有的票额比例决定的。理事会成员票额的分配比例是：西德、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各 10 票，西班牙 8 票，比利时、荷兰、希腊和葡萄牙各 5 票，丹麦和爱尔兰各 3 票，卢森堡 2 票。这样理事会达到有效多数就需要 72 票中的 54 票或 75%的投票。

不难预见，《单一欧洲法案》将会像"特洛伊木马一样"被用来实现更加广泛的其他计划。这是因为，如果不取消仍然存在的诸多限制，那么单一市场就不可能实现。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金融、政治、司法以及社会的进一步统一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连锁要求。在经过 20 年极其平稳的发展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在布鲁塞尔，"欧共体在前进"成了流行语。1987 年，共同体正式接受了欧洲理事会的旗帜，这是其作为共同体发展到一个时代的标志。旗帜深蓝色底子上的 12 颗金星不再是斯特拉斯堡观念的象征，而是代表了 12 个成员国在共同体扩张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不断发布大量的指令。从单个来看，这些指令[1119]通常是琐碎的，并被认为没有意义。例如，它所关注的欧洲安全套的法定直径问题（意大利政府明确地要求缩小其尺寸）就是这些指令中受到污言嘲笑的对象之一。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指令形成了朝着一个固定方向运动的雪球。在共同体理事会接受了资金的自由流动原则后，1988 年 6 月共同体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有关修改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程序的指令。

随着共同体委员会在促使欧洲统一方面的决心愈来愈鲜明，批评它的人表现出了惊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勉强接受了"1992 年方案"。但是，1988 年 9 月 20 日她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的一篇讲演中，愤怒地攻击共同体委员会的意图是根据想象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机构。在另外一个场合，她像 20 年前的戴高乐一样，对欧共体委员会的规划发出尖锐的"不！不！不！"的抗议声。撒切尔夫人得到了"小英格兰人"的支持，也赢得了那些担心"欧洲堡垒"反美势力增长的美国保守人士的同情。但是撒切尔夫人错误地判断了英国保守党在这方面的立场，在 1990 年 11 月的一次"内阁政变"中，英国保守党抛弃了她。

此时，潮流似乎快速地向有利于共同体委员会的方面转变。苏联阵营的分裂正在改变着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德国的统一造成各方对其不相称的影响力的不安（不仅仅是德国本身感到不安）。这样，如果欧共体没有统一的政策，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将有可能滑入飘摇不定的危险状态。

同时，另外一股提议之风推动了共同体向前发展。1990 年 3 月比利时提出了一份备忘录，确定了辅助、民主、效率以及聚合四项目标。一个月后，一封法德联名信件又提出了共同的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司法以及警察政策。在该年的马德里各成员国首脑高峰会议上，德洛尔提出在五年内建成一个欧洲政府的胚胎。这样，共同体的进一步扩大问题以及欧洲议会和欧洲安全的加强问题就排上了议事日程。共同体的扩大计划是按照加入者的几个类型进行的。到 1991 年，共同体将允许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剩余国家加入共同市场（虽然还不具有完全的资格），将给予三个后共产党国家候选国资格。并且在三年内最终完成奥地利、瑞典、芬兰以及挪威最后加入欧共体的谈判。申请完全加入欧共体或者成为候选国的国家还向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些欧洲以外的国家扩展。有 12 个成员国的欧共体等待着成为拥有 20 个甚至 30 个成员国的共同体。

共同体成员国欢迎共同体委员会的决定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对辅助原则的理解。这一原则借自基督教教会法规，它确定了共同体的中央机构只能处理涉及最重要领域的政策，而将其余所有事务都留给“所属的政府一级”去处理。民族国家极力坚持其余所有事务应该留给它们自己去处理。但是如果把辅助原则延伸一下，它也可以越过民族国家政府一级，将布鲁塞尔直接与地方、地区政府连接起来。因此，急需明确该原则的适用范围。

[1120] 欧洲政治统一的强烈拥护者不再掩饰他们对民族国家的不满。民族国家除其所有的历史上的罪过外，目前在处理大的事务时显得太小而无能为力。在处理小的事务时又显得太大也处理不好。一些国家担心共同体会像联合国那样成为各国政府的俱乐部是有理由的。一直以来就有争论说，除非提高共同体议会的等级使之高于各成员国各自的议会，否则欧洲民主就不会取得进展。

在这种背景之下，就产生了关于欧洲“地方”的争论。任何加强共同体中央机构的举措会相应地加强成员国内部的分离倾向。布鲁塞尔的突出必定会引起爱丁堡、米兰、巴塞罗那以及安特卫普问题的突出。地方的利益可以在成员国内部和成员国之间得到确认。比如，在实行分权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地方政府要求广泛的自治权。在曾是中央集权制堡垒的法国，最近也增强了全国 22 个地方的管辖权

(与德法两国的趋势相反，英国中央政府严厉拒绝了地方分权的要求。地方政府的权限缩小)。“欧洲地方”概念的形成将会克服共同体与其东部邻居之间的鸿沟。比如，意大利就提出了建立一个包括亚得里亚海内陆五国在内的“五角区域”。德国、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讨论了将来在波罗的海两岸进行区域合作的可能性。

国际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增强了成员国内部的离心力。在西班牙，加泰隆人和巴斯克人长期存在的离心倾向得到了控制，但是效果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在意大利，伦巴第人联盟重新建立起来，其目的在于把意大利北部从意大利南方（Mezzogiorno）的负担下“解放”出来。在英国，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正掀起第二次风潮，独立的苏格兰在共同体内部比在共同体外部更危险。

不过，在现实中一切还处于不确定状态。大家还在争论共同体在继续“深入”前是否应该在地理上扩大。德洛尔主张“先深入，后扩大”。他的批评者指责他的这种做法使共同体保持在小规模、限于西欧范围，并且由共同体委员会来控制共同体是一个欺诈。即便如此，1991 年 12 月，共同体 12 国在马斯特里赫特召开的会议仍然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为了促进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共同体委员会筹划制定一个关于建立欧洲联盟的广泛的条约。该条约旨在修正和扩大罗马条约。条约正文的 61351 个词标志着欧洲统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条约为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单一稳定的金融”、“共同的公民资格”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32]开辟了道路。但是条约没有涉及欧共体的扩大问题，也没有谈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转变问题。由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由仍然专注于纯粹西方事务的欧共体委员会控制，因此它没有为欧洲大陆另一半将要发生的崩溃做准备。

与此同时，在德洛尔因欧共体的发展而享有盛名时，戈巴尔乔夫却在经历着发怒、挣扎和失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危机的分析可以从他后来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他的很多思想非常明确地体现在他《新思[1121]维》(1989 年）一书中。苏联军事力量的进一步扩张没能保证苏联的更大安全。军费的开支已经到了阻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地步。实际上，苏联经济再也不能承受消费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共产党人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失败了，与西方的科技差距与日俱增。苏共腐败且失去生机。青年人在回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民众对空洞的承诺失去了耐心。苏联整个社会处在冷漠之中。苏联的外交政策处于混乱之中。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像所有其他革命斗争一样，对苏联国力形成了一个无底洞似的消耗。苏联在东欧的霸权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都是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事实。戈尔巴乔夫的战略首先在于消除冷战造成的苏联旧体制赖以兴盛的恐惧和憎恨气氛，以营造宽松的

外部环境，将主要精力转向国内改革中的重大复杂问题。在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访问美国和西德时，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热”（Gorbymania）风靡一时。尽管他仍然支持共产党传统的颠覆西方国家的政策，但是他急切地欢迎里根总统访问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体现在两个闻名世界的词语中。一个词语是“新思维”（重组），也就是说把市场原则引入经济管理中，把非党派利益引入政治生活中。另一个词语是“公布”（Glasnost）它被错误地翻译为“公开”（Openness）。实际上，它是标准的俄语“公布”一词，其反义词是“沉默”或“禁忌”。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一词语的最初目的在于激励党内同志对一些至今仍然拒绝承认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着手鼓励人们争论。为此，不对说出自己观点的人进行惩罚是很重要的。于是，苏共开始说话，继之媒体开始说话，最后是苏联人民开始说话。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中，他们第一次发现检察官和警察不会用来反对他们。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公布”以不可预见的、无法限制的、无法停止的争论的湍流转向“公开”。在这湍流中最激烈的水流是几乎遍及全世界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

因此，很快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尽管他在西方享有自由的声誉，但是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要使苏联体制富有人性和恢复活力，而不是要摧毁它。他赞成民主化而不是实行民主。戈尔巴乔夫与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做法一样，他安排自己取得了国家总统的职位——这样看起来他似乎与美国总统处于同等地位。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够面对选民，也没有试图取消他的主要的、非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职位。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六年改革，实施的措施没有达到其原定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他为苏共中央机关新增了一个新的、由举手选举出的人民代表。但是他从来没有同意进行自由选举。在经济领域，他不断地玩弄市场化的调子，但是他拒绝所有更加激进的计划。他拒绝实行农业非集体化或者提高农产品价格。他延误对私有财产立法。因此在苏联计划经济开始崩溃的时[1122]候，市场经济还没能开始运作。在民族事务方面，戈尔巴乔夫鼓励各共和国说出它们的要求，但是却拒绝满足它们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治战术家。他劝诱保守派，遏制激进派。但是他没有赢得民众大量而坚实的信心。在普通俄罗斯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活动家。戈尔巴乔夫及其西方崇拜者们都既没有抓住他所统治的苏联体制的最基本特征，也没有认清苏联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忽略了采取措施从已知失去动力的机器上取消强制机制。他们放弃了由苏共一党执政这一苏联政治制度

的基石，而且当地方不能听从中央的指挥时他们感到震惊。他们低估了苏共几十年思想灌输产生的影响，它使大多数行政人员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他们坚持认为苏联是一个自然的、民族的实体，就像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时仍然称呼它为“我的祖国”。最重要的是，他们错误估计了“公开”对于受到压制的民族的影响，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言论自由就等同于独立的要求。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体制的笨拙的修补有可能是最糟糕的行为。

在此，本文仍然需要对共产主义崩溃的原因给予更多的笔墨。政治学家通常不可避免地强调政治体制的因素，而经济学家们则强调经济的失败。但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对于了解共产主义崩溃的原因同等重要。关于东欧人民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与荒唐的生活进行斗争的情况，学者们已经从人类学角度做了一些出色的研究。现在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对苏联普遍存在恐惧的一代人似乎在顷刻之间决定对苏联已经忍受到头了。一旦党的领导人失去了用强制手段维护自己权威的意愿，上百万的男男女女就会简单地选择不遵守他们的命令。东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已经从头到脚腐烂了。[33]独立的文化特别是宗教通常比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艺术家和宗教信仰者通常是仅有的能够设想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的人。其余的人就像科幻片中住在一个被水淹没的星球上的居民一样，他们经过艰苦的训练已经适应了水下的生活，当水开始退去时，在开放的空气中他们已经忘记了该怎样进行呼吸。[34]

又一次，在这关键的时刻，共产主义大厦的最早裂缝出现在波兰。波兰的国内物质条件在恶化，新一轮的罢工即将出现。绝望的部长们转向被禁止的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寻求挽救局势的办法。这是对波兰共产党政治上破产的承认。1989年初，波共领导人召集圆桌会议讨论与非法的反对者分享权力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团结工会从此可以竞争限定数量的议会席位。波兰议会的选举产生了一场轰动。在团结工会参加竞选的每个选区，瓦文萨的人都大获全胜。许多居于高位的波共党人没有能够重新当选，甚至是在那些他们是惟一候选人的选区也没能当选，因为选民们只是简单地在选票上删[1123]掉他们的名字。在这一最接近正常化的“共产党国家”里，共产党的权威急剧地趋向零。

1989年8月在仍然实行共产主义宪法和共产党担任国家总统的情况下，束手无措的波兰共产党人邀请团结工会组阁。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T. 马佐维耶茨基当选为总理。作为国家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华沙条约理事会中拥有自己的席位。苏联阵营不复存在。匈牙利也

在进行自己的圆桌会谈。在东德，由新教教会组织的合法游行也在进行。

共产党权力衰落的趋势在急剧发展。到 1989 年，在匈牙利"悲惨事件"发生的秋季，共产党的大崩溃开始发生。1989 年 10 月 23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纪念匈牙利民族起义 33 周年活动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被宣布废除。匈牙利共产党允许反对者进入议会，同时也将自己改成社会民主党。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在柏林 1989 年 11 月 9 日，守卫东德边界的卫兵竟然对于柏林墙两边人群拆毁柏林墙的行为无动于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丧失了保卫它的意愿。在布拉格，11 月 17 日一场学生示威游行出了差错，报道说一名示威者被警察打死。但是一周后，哈维尔和杜布切克却一同出现在瓦茨拉夫（Wenceslas）广场的阳台上会见崇拜他们的人群，接着一场总罢工很快就结束了失去抵抗力的行政当局。至此，一场"天鹅绒革命"圆满成功。目睹这些事件的一位最敏锐的外国观察家评论道："共产党的垮台在波兰用了 10 年，在匈牙利用了 10 个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 10 天。"[35]最后，圣诞节过后，在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一场血腥叛乱在处死齐奥塞斯库的恐怖中达到了顶点。在这场叛乱中受到憎恨的安全人员战斗到死。

戈尔巴乔夫虽然是可敬的，但他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不是东欧自由的建筑师。他是一个看到大坝将要溃决，决定打开闸门让水流出的水闸管理员。大坝迟早都会溃决，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只是使它的溃决没有造成巨大的灾难而已。

到 1990 年，前几年冲突的实际结果开始发挥作用。先是经互会，继之是华沙条约停止运作。执政的共产党一个接着一个退出政权。每个新政府都宣称自己实行民主政策和自由市场经济。各有关国家以不同的速度很快与苏联达成了苏军分阶段撤军的条约和时间表。德国统一的步伐在加快。民主德国的机构径直消失了。西德的各个政党开始在东德开展活动，这样在一次全国性的大选中科尔总理获胜。10 月，[112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吸纳了东德的公民、领土和财产。自由之火在西部来风的吹拂下向更广更远的地方扩展。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像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各个共和国一样也被点燃了。尽管没有得到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车臣纷纷宣布独立。波斯尼亚 、马其顿、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及乌克兰也都已准备好会随时宣布独立。

南斯拉夫联邦的彻底分裂尤其是恶性的。民主选举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境内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出人头地。在贝尔格莱德，联邦政务会遭到由塞族人担任联邦议会领导的这一设想的重创。该设想将是

对建立大“塞尔维亚”情绪的火上浇油。1990年8月，当克罗地亚克宁的塞尔维亚人反对萨格勒布（Zagreb）时，公开战争爆发的时机成熟，这场战争在第二年的春天爆发。塞尔维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军队在斯洛文尼亚遭到彻底失败后，向克罗地亚发动了突袭。恐慌和相互的暴力很快蔓延到一个分裂的共和国的各个部分。在这些共和国中，少数民族往往构成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大多数。正如铁托在临终前叹息的：“我是惟一的南斯拉夫人。”[36]铁托的话不符合事实。但是右翼的种族暴力这一幽灵的存在使得实行超国家性质的“南斯拉夫”政策是不可能的。**[领带][伊利里亚][马其顿][萨拉热窝]**

只有波兰变革的步伐是缓慢的。波兰是第一个放松共产党的控制，最后一个摆脱它的控制的国家。马佐维耶茨基政府优先关注经济问题。1990年12月，在四分之一的选票流向一个前安全部门的代表之后，瓦尔萨使自己当上了总统。波兰政权从一个仍然由共产党支配的议会中解放出来用了10个多月时间。根据旧的判断标准，波兰革命是相当非波兰式的。

德国的统一是以急剧的方式进行的，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人怀疑德国统一的合理性。正如维利·勃兰特所说的：“属于一起的东西现在正成长在一起。”当前民主德国成为联邦德国的一部分后，它毫无疑问自动地加入了欧洲共同体。而且与联邦银行（Bundebank）的建议相反，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是按照1∶1的比率兑换的。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德国统一对于德国及其邻居造成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波恩政府想当然地认为，东德人作为德国人是会欢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联邦德国的习俗和法律的，而西德人作为德国人是会高兴地为统一付出代价的。一些人开始猜想统一的德国不会像分裂时的德国那样对欧洲感兴趣的。随着公众舆论变得越来越焦虑和趋于以自我为中心，德国联邦政府不得不重申它对欧洲统一负有的责任。一个影响深远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是修改基本法第23条，德国的统一就是按照该23条完成的。按照修正案，联邦德国现在主要关注的不是向“德国其他地区”开放的问题，而是为“实现统一的欧洲”[37]承担责任问题。

事实证明，在所有后共产党国家里实现非共产主义化是一个棘手[1125]的问题。现行的法律虽然缺乏正规性，但不可能全部被废除。共产党的官僚们现在宣称将永远致力于民主，不可能大规模地开除掉他们。前秘密警察不可能轻易地被揭穿。德国由于成千上万的告发者被暴露而处于摇摆中。波兰重新开始调查政治谋杀案。罗马尼亚的新政权实际上在反对实行非共产主义化。唯独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了“证据法”，旨在开除腐败和犯罪的官员。

苏联经济模式的遗产是可怕的。后共产党国家尽管在起初阶段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波兰通过实施休克疗法计划，进行了金融改革，克服了通货膨胀。但是，愈来愈明显医治经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前苏联阵营的所有成员在通向实现能够自我生存的市场经济道路上必须面对几十年痛苦的重组。[38]与此同时，它们出现的问题又会被用来将它们排除在欧洲共同体之外。

共产主义产生的社会态度在每一处都顽强存在。处于萌芽状态的公民社团还不能填补空白。（共产党垮台后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空白）人们对政治的冷漠很普遍。琐碎的争吵无处不在。作为抵抗失业和意外事件的缓冲，人们对共产主义残存的同情比原先预想的要大得多。“水下”的几十年生活已经使大众不再相信所有的承诺，而总是准备最坏的结果。有一句受到讥笑的谚语说是“如果有人有所得，那么就有人有所失”，其影响现在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没有人能够猜到这场灾难的程度。

共产主义不战而败的事实并不能减轻它所留下的痛苦。但是没有使人发泄心中痛苦的药物。一位这场事件的参与者曾抱怨说：“和平时期不可能有主显节。”另一位答道：“我很高兴能够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这场灾难的结束；但我想在下一个灾难开始时死去。”[39]

这场共产主义大崩溃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苏联，是从 1991 年开始的。苏联经济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物质条件在恶化。冬天过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接近苏共的机体。几个同事为抗议他重新实行独裁体制而辞职。最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加盟共和国在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后尘。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盟共和国和苏联的行政权威并行统治。在莫斯科市本身，市议会选举了一位民主的市长，而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选了一个民主派人士叶利钦担任总统。叶利钦着手使俄罗斯摆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在进行战争。在格鲁吉亚，因戈尔巴乔夫尽早批准使用强大武力，针对莫斯科的反叛被平息下去。在维尔纽斯，苏联军队也枪杀了一些平民，由于缺乏外界的支持立陶宛议会的分离活动失败了。克里姆林宫在打算以一个由主权共和国组成的更加松散的联盟来代替苏联。新的联盟条约定在 1991 年 8 月 20 日签署。

1991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发生的夭折的莫斯科政变其目的在于阻止联盟条约的签署，从而挽救苏共残存的权利。政变所要阻止的东西[1126]本身预示着灾难。这次政变的密谋者根本就不是“意志坚强的人”。他们将自己的行为限定在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戈尔巴乔夫本人喜好的形式上。实际上，他们明确地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将会默认他们的行为。因此他们对于政变没有制定任何章程，而章程是有能力的起义

者必须制定的。事实上，这次政变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变。它是临死的恐龙最后一次抽动尾巴。8月19日是星期日，七个神色紧张的密谋者坐成一排出现在苏联电视台上，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的命令得到苏共机构和媒体的遵守。他们将行动的时间安排在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最后一天。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他们指派的密使进行接洽时，他们便无计可施。叶利钦没有被逮捕，在俄罗斯议会前他爬上一辆坦克上并公然蔑视密谋者的命令。但是，密谋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驱散叶利钦的支持者，而街道上的坦克没有装备弹药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三天之后，密谋者径直爬进他们的大型豪华车溜之大吉。这一预谋的政变无疑证明：苏联体制已经脑死亡了。尽管苏联共产党仍然控制着世界上最令人畏惧的安全机构，但是他们却不能用它来履行最简单的行为。

在一段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觉察所发生的事情。他从克里米亚返回后仍然谈论党的未来问题和改革问题。他是被叶利钦残酷地带到现实中来的。叶利钦迫使他在俄罗斯议会朗读密谋者的名单。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的人。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信誉完全坍塌。就在列宁创建的党自行解散前，戈尔巴乔夫辞去了党的总书记职务。1991年9月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自己的最后一部法律，将自身的权力移交给前联盟的主权共和国。1991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签发了最后一个法令，将苏联克格勃分成若干部分。现在就剩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将不存在的国家的傀儡总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没有什么比苏联宇航员谢尔盖·格利高里的命运能更好地说明苏联解体的事实。谢尔盖1991年9月5日进入太空，1991年底仍然在围绕地球运转等待地面让他返回的指令。他离开时苏联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他要返回的是一个苏联已不存在的世界。在拜科努尔航空中心的指挥官们发现他们身处在独立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境内。

1991年12月对欧洲两端来说都是一个做出决定的月份。它开始于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的全民公决。在这次全民公决中91%的民众，包括居于少数民族地位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土面积居欧洲第二位，人口居第五位。

12月9—10日，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深化欧洲统一的计划表。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在排除使其感到恐惧的“欧洲联邦化”* 字眼后，英国首相又提出了一条有关在货币方面退出的条款，他还拒绝签署社会宪章，并说服[1127]

* 在英国人听来，美国人把殖民主义一词美化了，与德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用法截然不同。这个词也被用作欧洲的美国中心论的代码。

他的同伙重申北约的作用，而且还声称在这次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有些人担心在欧盟发展方面会形成“可变易的几何型”的欧洲和“两个发展速度的欧洲”。尽管如此，欧盟条约的绝大多数重要条款被各国领导人接受。12国领导人达成了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有，欧盟的公民资格就给予成员国的所有公民（标题2，8—8e），成员国应该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标题2，102—109m），欧洲货币联盟（EMC）和欧洲中央银行将在一个联合银行体系内在1999年启动（标题2，105—108a），欧洲议会将取得与部长理事会共同决策权（标题2，137—138a，158，189—190），将建立一个地区咨询委员会（标题2，198a—c），将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标题6），辅助原则应该将共同体的大多数行动留给“成员国”（标题2，3b.）。12国的领导人还接受了关于教育、文化、卫生、能源、司法、移民以及犯罪的内容详细的宪章。在欧洲条约之外，他们还批准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但是没有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么轻松地就达成这些协议真是令人感到怀疑。剩下的问题就只有批准这些协议了。用不了多久死亡商人将会预言该条约的死亡。[40]

就在同一个周末，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做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他传唤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前往莫斯科。然而他不知道，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国的领导人已经在距离波兰边境不远的一个森林狩猎场进行谈判。12月8日凌晨2点17分他们签署了一份宣言，宣称“苏联已经停止存在”。第二天他们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是一个恰当的称呼，在其之下苏联战略军事力量的核心部分将置于一个司令的领导之下，而苏联的其他绝大多数机构被悄然废除了。到1991年底，欧洲最后一个帝国的和平过渡完成。

为了弥合东西欧之间的分裂，西方采取了一些小的步骤。北约建立了一个联合合作理事会，邀请前华约成员加入该组织。欧洲共同体与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联系条约。欧洲发展和重建联合银行在伦敦开张。食品和金融援助送到了前苏联，维护和平的使团到达前南斯拉夫。然而这些措施太小了，欧洲共同体仍然限制从东欧进口农产品，控制对东欧的贸易。除德国向东德投资外，西方在前东欧国家投资很少。欧盟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政策，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潜伏的战争没有采取有效的遏制措施。欧共体还没有出现精干的领导人，“白欧洲”与“黑欧洲”之间的鸿沟仍然是巨大的。

1989年之后形势发展得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观察家有闲暇时间思考东西欧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人们的生活习惯会使他们认为东欧是东欧，西欧是西欧。西欧的政治家们集中精力开垦他们

自己的花园。他们没有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毁坏邻居房子的爆炸已经炸[1128]毁了他们自己的篱笆和墙。正如一位匈牙利人所写的："他们舒服地靠在墙上，而不知道这面墙是用炸药砌成的。"[41]

40年来，铁幕决定了东西欧的政治、经济生活结构。它为马歇尔计划、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联邦德国以及西欧的经济成功提供了活动空间。它不仅为共产党，而且为西方的银行家、设计家、工业家们提供了非常的便利，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营造西欧宽松的环境。它还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保护主义因素提供了特别的便利，因而为共同农业政策的扭曲变形提供了便利。简而言之，铁幕是西欧有可能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的、自满的富人的俱乐部而从来不顾及其他人的福祉的危险的原因之一。铁幕对于西欧人在勃列日涅夫主义上的态度负有责任，他们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资本主义所得到的东西，西方的政治家们梦想永远保持他们概念模糊的孤立主义。事实上，最终欧洲人不得不面对两种选择：要么一起重建自己的村庄，要么以新的伪装重新堵上铁幕上的漏洞。

事实上，欧洲的东西部发生的事件是紧密相连的。就像从东欧来看，欧洲共同体的成功是导致苏联阵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共产党之后民主的成功与否将决定欧盟的命运。莫斯科从东欧以及重要地区的撤退，比如从盛产石油的巴库地区的撤退，将会产生新的争夺地，俄罗斯将被迫抵抗西方公司和机构在这些地方的扩张。

对一些人来说，东西欧的共同性似乎在于普遍实行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西方的胜利看起来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一位学者因提出"世界历史的终结"[42]这样的问题而一夜成名。最接近事实的结论是：欧洲处在一个还不能预见到尽头的历史剧变时期。

在一位前政治领导人看来，1989—1991年的革命产生了三个欧洲。"欧洲一"由已经建立了民主的西欧国家组成。"欧洲二"由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加上斯洛文尼亚构成。这四个后共产党国家有理由希望它们在加入欧洲共同体时遇到的障碍不会大于前十年三个后法西斯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在加入欧共体时遇到的障碍。"欧洲三"由剩余的前苏联阵营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里期望加入欧洲的人将不得不等到二十一世纪实现自己的愿望。[43]

然而，宣布良好意愿本身并不能产生结果。对经济的优先考虑蒙蔽了人们更广阔的视野。任何顽固坚持经济优先的做法一定会拖延共同体的扩张，也许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共同体的任何大的扩张一定会既附有巨大的代价，又加强了对欧盟现有机构进行改革的压力。[1129]如果德国人能够为统一1700万德国同胞所付的代价进行抱怨，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就不可能对欧盟统一更多新加入的成员国所需的牺牲

[1130]



地图 29 欧洲，1992 年

表示欢迎。如果各成员国政府在批准《马斯特赫里特条约》时面临困难，那么在执行该条约时他们将面临更大的问题。

随着欧盟扩大和统一过程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抵制这一过程的行为会更加激烈。欧洲法院作为共同体与其主权成员国对抗的讲坛，其地位将会成为一个尖锐问题。“16 个成员国的欧洲”或“20 个成员国的欧洲”是不能由适用于管理“6 个”或“12 个”成员国的欧洲的机构来管理的。如果欧盟不改革自身的管理机构，那么它将会逐步地停

顿。因为改革欧盟的管理机构是驱动欧盟自身扩展和深化的一部分。

一位悲观的观察家认为，欧洲只有在面临特别重大的灾难，也就是说遇到种族灭绝，大规模迁移或者爆发战争时，才会进一步走向统一。[44]根据这一逻辑推理，货币联盟只有在现行的货币制度崩溃后才能建立，政治联盟只有在政治政策明显地失败后才会达成。只有“欧洲三”恢复到原有的制度，“欧洲一”才会受驱使接受“欧洲二”。

1991年12月，无论是西欧的统一还是东欧的分裂都没有按其正常形势发展下去。然而，只有极其个别的人能够记得这么多障碍倒塌的时间。有些成年人太年轻不会记得佛朗哥或铁托。只有近30岁的人才会回想起戴高乐或布拉格之春，50岁的人才会回想起匈牙利暴动或《罗马条约》，60岁的人才会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景，退休年龄以下的任何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不会有清晰的记忆。90岁以下的人不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活生生的记忆，百岁以上的人是仅有的知道世纪之交、欧洲大危机开始之前的那些黄金岁月的活着的人。

爱德华·拉申斯基伯爵（1891—1993年）就属于这非常稀少的最后一类中的一员。他诞生在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地区的扎科帕尼（Zakopane）的一个波兰人家庭。这个家族在普鲁士拥有大量地产。他们在柏林的宫殿为让给帝国议会大厦已经被拆毁。拉申斯基（Raczynski）曾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克拉科夫学习过，在莱比锡学习过，后来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他曾担任过波兰驻国联大使，而且在1933—1945年间在圣詹姆斯法院任职。他后来成为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统。他永远不能回国。但是1991年12月19日人们在使馆为他举行了100周岁庆祝活动，46年前就在同一地方英国连同斯大林迫使他屈服。拉申斯基新近结婚。他是那些经历了欧洲危机从开始到结束的——如果是结束的话，为数极其稀少的不屈不挠的欧洲人之一。

1992年2月14日牛津夏镇。在一开始，没有一本书。现在最后[1131]的几个字正在印在最后几页上。破晓微弱的阳光照在房子最高层公寓工作间窗边的书桌上，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夜晚的冰霜留在房顶的斑斑湿痕正在闪烁。在黑暗天际的云彩正朝着淡黄色发光的天边慢慢行走着。在索恩克利夫（Thorncliffe）的破旧果园中，已经落光树叶的苹果树在暗淡的光线中延伸到一排维多利亚时代红砖房旁。一只孤独的乌鸦在山毛榉最高的枝头上放哨，如同自撰写“欧罗巴的传说”以来上千个同样的黎明一样。只有这一次牛津汽车构件厂令人窒息的臭气被刮到别的地方。这家人一直熟睡到早上上学的时候。

住在这座房子里的家庭成员的亲属遍布半个欧洲。这个家庭的一

部分人与这个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屿、与兰开夏和离得更远的威尔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庭的另一部分人深深扎根于古老的波兰东部地区，并在过去10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就是在苏联。在牛津和克拉科夫上学之后，家庭的两个主要成员在布莱斯帕斯卡的城市的克莱蒙费朗的热尔左维亚（Gergovia）大道相遇，他们也许一直因为这样一种无穷的可能性而感到有趣。这些令人高兴的事件毫无疑问会为一个人的历史感添加色彩。在写历史的时候，时间和地点是至高无上的。历史学家是他们所撰写的历史的必要组成部分。

今天是欧洲共同的守护神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的宗教节日。在圣·阿洛伊修斯（Aloysius）的耶稣教堂祈祷的人“庆祝斯拉夫族人的起源……但愿他们的降生就是我们的降生”。这个念珠祈祷“根据东欧民族的意愿”已经背诵下来了。教士古怪地解释说，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是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使徒（见原书第5章）。

上学时间。这个星期在斯奎勒尔学校，女教务长在集会上一直在谈论阿尔巴尼亚穷苦的孩子们。

早晨的报纸对于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的宗教节日什么也没有讲。《独立报》的头版头条刊登的是“联合国向克罗地亚派兵”。《卫报》“欧洲”栏目副刊刊登的是一篇关于在摩尔曼斯克购物的长篇报道。马德里昨天出版的《国家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是法国和西班牙组成的联合纵队对巴斯克领导的“埃塔”（Eta）开战；该报刚刚把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Mikailo Gorbachov）返聘为月栏目作家。在《世界报》上，以三版的篇幅着重刊登了北非的情况。在海牙发行的《电讯报》重点刊登关于北约低空飞行的F-16战斗机的新闻。慕尼黑发行的《南德意志报》关注的是联邦财政部的事情。华沙两天前出版的《选举报》（*Gazeta Wyborcza*）全篇报道了宪法法庭及其反对由共产党掌权的议会通过的关于养老金的一项法令的情况。《牛津时报》周刊就其来信专栏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与牛津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就对妇女进行教士祝圣仪式。[45]

惟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主要事件是由《晚邮报》头版头条报道的，标题是“列宁的大屠杀”（“Massacrateli ondine di Lenin”）。莫斯科对当[1132]代欧洲历史的了解程度日益增长。莫斯科的一篇社论引述《共青团真理报》，列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到目前为止收藏的档案中的秘密文件目录。他们揭露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个人坚持实行革命暴行的行为。例如，1918年8月11日，列宁在写给奔萨（Penza）同志

们的信中说：

> 必须对五个造反的富农（Kulak）地区给予无情的镇压……又需要树立一个榜样：1. 吊死不少于100名富农，富人、吸血鬼……2. 公布他们的名字。3. 把他们的粮食全部拿走。4. 根据昨天的电报选择人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人们看到、战栗，四周绵延数里的呻吟声……再者，把死硬派找出来。列宁。[46]

《邮报》（*Corriere*）评论说，这些夸张之词不是希特勒的通信中写的。因此这是真实的。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不是从斯大林开始的。

整个星期的国内新闻都是关于大选前的争论，主要是关于金钱。在国外，人们可以在法国总统的艰苦工作、前苏联的核武器、一场世界拳击比赛的定罪或爱尔兰制宪法庭否决一个14岁被强奸的受害者可以做人工流产的新闻中做出选择。欧洲委员会主席已经为一项大的预算提交了一份议案——“与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时代相匹配”。英国的小报嘲笑这份议案的最后一款。在题为“不，雅克·德洛尔不是一切都好”的社论中，《每日邮报》评论说，“这种欧洲—恩赐可以极为容易地落到靠不住的签约人的口袋里去，或者躺在五光十色的垫子上悠闲自得地在享受温暖的地中海阳光的照耀。”[47]《世界报》分析了这个现象，“大不列颠动员起来反对欧洲统治”。（La Grand—Bretagne se mobilise contre les “eurocrates”）[48]

除此之外，在萨瓦的阿尔贝维尔和库舍韦正举办第16届冬季奥运会。重要赛事（“blue ribbon” event），男子坡道和障碍滑雪结合项目的冠军被意大利人约瑟夫·波利格（Josef Pollg）获得。

自称为惟一为全欧洲人发行的报纸《欧洲人》不但在近期已经失去了其不正派的发行者，而且也失去了在克里姆林宫的英雄。本星期的首要新闻故事“意大利面对愤怒的欧洲”报道了罗马在推行欧洲共同体方面的劣等纪录。商业栏目没有攻击“美国孤立主义者”，反而攻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1000万美元使俄国卢布平稳的计划。[49]

正如预计的那样，在早晨晚些时候，开始下雨了。报纸的气象地图列出了读者们关心的区域。《泰晤士报》发表了三张地图——两张大些的是不列颠岛屿（不到爱尔兰西边一点）早上和下午的地图，另一张侧重大西洋中部。《世界报》有两张欧洲气候地图，一张法国气候地图。《邮报》有一张从大西洋到克里米亚的地图，另一张是意大利地图。《南德意志报》有三张大的地图，所有都是关于欧洲的，提供了由雷克雅未克、吕勒欧（瑞典）、里斯本和雅典的大量气象站提

供的具体气象信息。《选举报》没有刊登气象地图，但是列出了前一天筛选出的欧洲国家首都的气温——罗马和里斯本（13摄氏度），伦敦（10摄氏度），雅典（9摄氏度），维尔纽斯、里加、塔林和明斯克（1摄氏度），基辅和布拉格（1摄氏度），布加勒斯特（3摄氏度）。《解放报》（Varsovians）不知道莫斯科的气温。

[1133] 《欧洲人》上布满了最大的气象地图，而且是彩色的。它标出了新的共和国，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但是没有俄国，它被错误地与独联体等同起来。附带的"欧洲道路工程图"没有标明莱比锡附近A9—巴特·迪伦贝格（Bad Durrenberg）交叉路口以东的道路。所以，他们不打算修护东欧的道路，这是真的。

这就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不得不弄明白的每天纷乱无章的信息。

今天是情人节（圣瓦伦丁节）。从传统方面讲，这是鸟类开始求偶的日期；因此，它也成为人类爱情之鸟交换必要的信号的日子。《泰晤士报》刊出一页接一页的含糊其辞的和语法错误百出的语句：

AGATHA AARDVAAK，我所有的爱赫克托（Hector）树……ARTEMIS，不仅仅是长庚星（注：金星的别名）在求情。你的爱。Algy……克里斯琴一个真正王家的古斯古斯（Hesperus）。（Un vraie cousous royale.）Je t'aime infiniment. 我对你的爱无尽头，国王……MENTEN，在玄武岩蓝色的海（Blue Seas at Basalt Rocks）……MOONFACE loves Baby Dumpling and Smelly……POOPS，我是你的。（Ich bin deiner.）bist du meine?（你爱我吗?）Wirst du sein mein（是你我他的）情人节?[50]

一些报纸对情人节的来历给予相互矛盾的解释。一个版本说，中世纪的人接受了罗马牧神节（注：2月15日，古罗马纪念畜牧神的日子）；Lupercal或"狼窝"是母狼把罗慕洛斯（Romulus）和勒莫（Remus）养育成人的山洞，在那里，罗马人后来为能够生儿育女用羊血沾满全身。罗马的两个称为瓦伦丁的殉道者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异教徒的嬉戏负责。

今天也是格伦科大屠杀的300年纪念日。事实上只有38人被杀戮。"在民族历史的进程中"，斯凯岛的麦克唐纳勋爵说，"被杀戮的人数很少。"所以仍有相当数量的麦克唐纳人在风笛吹奏的《哭泣的格伦》中行进着。正如《泰晤士报》报道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坎

贝尔家族所起到的作用如同“威斯敏斯特政府的代理人”。现在这只是一个标题而已。上星期的德国《时代》周刊专门刊登了关于苏格兰分裂特征的根源的特写文章，同时还附有一张来自格拉斯哥的胡乱涂写的大照片——“英国人现在就滚出去”。[51]

为乐谱填词是一种可行的习性。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帮助填写歌词。早7点35分已经开始为巴赫的协奏曲“爱的双簧管”（oboe d'amore），BWV 1055的头几行填词了。早晨的报纸附上了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幻想诗《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作为情人节的先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下午2点，没有听到卡托维兹铜管乐（Katowice Brass），但是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为下午带来了生气。今天，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有很好的平衡。有一段时间，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台没有播出雅纳切克（Janacek，捷克作曲家）的作品。

对于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被迫一成不变地要预测未来。这种预测有助于追溯历史事件的动向，但是也并不能追溯到很多的动向。

在欧洲西边，越过大西洋，美国无疑达到了其力量的顶峰。但是[1134]它似乎在陷入自身债务麻烦、与盟国的麻烦以及本国公民的多样性造成的麻烦之中。它与日本产生了特别难以调和的问题。后者在经济方面的超凡能力已挫伤了美国的骄傲。美国正在脱离欧洲，它不必再被冷战的锁链和欧洲绑在一起。美国副总统奎尔本周在伦敦坚决声明，美国没有脱离欧洲。

在欧洲的北部，苏格兰的独立运动又开始兴起。本周，绝大多数苏格兰人表达了改变苏格兰地位的意愿。他们拥有摧毁联合王国的力量，因而能够挫一挫英国人的傲气，这在布鲁塞尔是任何人也办不到的。不过，也许他们能够使欧洲成为我们的欧洲。

在欧洲南部，在目前欧共体的核心地带，法德两国人都感到紧张。法国被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压力、M. 勒庞领导的民族主义敌对运动，以及一位在任时间太长而令人生厌的社会党总统所困扰。德国在为统一付出巨大代价的压力下也处于摇晃之中。面对这些烦恼，法德两国都转向促进欧盟的进一步发展来寻求安慰和支持。本周，在一个名叫《德国人》的电视节目中，德国总理引述了托马斯·曼的话。托马斯·曼期望实现“欧洲人的德国，而不是德国人的欧洲”。如果德国人失去了马克，他们也许会失去对欧盟的热情。

在欧洲东部，欧洲的版图仍然处于变动之中。每月似乎都有新的国家诞生。有很多关于这里民族主义危险的讨论。这些危险来自哪里？如果将目标指向更大的、更加危险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小的民族主义，那么关于民族主义危险的谈论就会更令人信服。危险并不是不存在。波罗的海三国正在麻烦的汪洋中漂浮。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把在90年代结束前取得欧共体的完全资格作为奋斗目标。捷克和斯洛伐克可能会走向离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无路可走。南斯拉夫联邦注定会很快分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就像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那样，如果处于和平的环境中，应该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独联体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而且俄罗斯联邦以其目前的形式不比独联体健康多少。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人为的庞大的混合物，拥有的国土面积是美国的两倍，它的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极其不平衡，而且没有牢固的政治核心。俄罗斯领导人几乎不可能通过民主和祈祷把国家团结在一起。如果莫斯科允许远东地区向自治化发展，并且允许日本人在那儿投资，而且鼓励西伯利亚在外国的帮助下开发自己的资源的话，俄罗斯领导人是有机会把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俄国的欧洲部分像以往一样有太多的人口和士兵，已经无力供养他们。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的两年中显出了异乎寻常的忍耐力。但是，他们也许不会糊里糊涂地这样做。如果民主的俄罗斯不能实现繁荣，那么它将开始进一步分裂。到那时，实行专制体制的俄罗斯将会以极其激烈的方式重新宣布自己的存在。

苏联的解体当然是近代以来最重大，也许也是最可怕的事件。其[1135]解体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欧洲历史上其他所有的大解体。这些大解体包括：西班牙霸权的解体、波兰的分割、奥斯曼的撤退、奥地利－匈牙利的分裂。然而，苏联的解体几乎不是一件能够召唤历史学家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废墟上，就像吉本（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坐在罗马竞技场上那样，写一部安魂曲的事件。因为苏联不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即使在它短暂的辉煌时期，它也是无与伦比的卑鄙和虚伪。它比有记录以来的其他任何国家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死亡和痛苦。它既没有给它的居于统治地位的俄罗斯民族带来好的生活，甚至也没有给它的统治集团带来好的生活。它是大规模的毁坏，不仅仅限于毁坏俄国人的文化。正如许多有思想的俄国人现在所承认的那样，苏联是一个愚蠢的东西，永远也不应该首先考虑建立它。前苏联的主权共和国现在正捡起1918—1922年失去的东西，当时他们最初的独立之火被列宁的红军熄灭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俄罗斯，是的，但是什么样的俄罗斯？"[52]

苏联解体的最鲜明的事实是，它是通过自然的过程发生的。苏联

不像罗马帝国是因野蛮族入侵而亡，不像波兰是被贪婪的邻居瓜分而亡，也不像哈布斯堡帝国是被大战的耗损而压倒的。苏联也不像纳粹德国那样是在一场战斗中失败而亡的。苏联的灭亡是因为它不得不灭亡，因为它内部组织的古怪器官已不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了。在原子时代，它不能像它的沙皇前任那样，通过扩张来解决内部问题，它也不能从它所占领的国家获得更多的好处。它不能容忍与曾经宣称要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的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它不能忍受改革的氧气。于是它停顿下来。它是被政治的动脉疾病击倒的，其创伤面比历史所能够提供的任何东西都大。

这么大规模震动的后果必然会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公开的疑问，那就是前苏联帝国的人民能否继续以最少的鲜血和仇恨重新处理他们的事务。苏联的解体是以如此和平的方式发生，本身说明解体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那些在高加索和南斯拉夫占有地盘的民族战士有许多潜在的模仿者。不足为奇，西欧国家对苏联解体的反应格外谨慎。这些政府对处于挣扎中的共和国援助缓慢。一些人以错误的保持稳定为名，急切地想使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复活。他们处在迷茫阶段，而且一半措施被竞争代理机构搞得一团糟。

反过来说，东欧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也许正好能成为西欧统一的驱动力。数以万计的阿尔巴尼亚难民游过亚得里亚海企图拼命进入意大利。成群的俄罗斯的、乌克兰的以及罗马尼亚的游民和商人涌入波兰，就像近来波兰人涌入德国和奥地利一样。德国令人羡慕的吸收外来移民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上百万的东德失业者，而且来自数以千计的合法的不再受欢迎的寻求避难者。如果中欧的混乱场景在更大规模上重演，那么西方国家首都的紧急意识将[1136]会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得到加强。到目前为止，欧洲共同体的统一在以极其缓慢的步伐向前发展，而来自东部的一股强劲的冷风将会加快这一步伐。

欧共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国内的发展。只要美国处于强大的地位并保持相对的繁荣，西欧的现状就不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北约将会被保留，欧洲共同体将以设计的步骤向前发展。但是一旦美国陷入危机，欧洲国家将会为了共同的防卫利益走到一起。来自西方的大西洋强风和东部的冷风对欧洲的统一有着同样的作用。

就像自然界一样，欧洲不可能容忍真空地带的存在。迟早，西部的欧洲共同体和东部的继任国家必然会重新确定它们的身份、它们的界限以及它们的职责。反正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一个新的平衡将会建立起来，也许这一平衡是在一个多边的结构中形成。地区性的组织，

比如波罗的海理事会以及某种形式的前苏联俱乐部都会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是，一条新的分界线将会沿俄罗斯的纵深地带和欧洲的核心部分之间的某个地区确定——希望是沿着一条和平边界而划定的。

“欧洲，是的。但是怎么样的欧洲?”在日蚀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古老的欧洲已经逝去了。根据下面这句诗，人们可以对古老欧洲的消失和它那棱角鲜明的城墙的消失而感到懊悔：

永远追随静止不变的蔚蓝色
我为古老藩篱环绕的欧洲惋惜[53]

人们不能将它带回。目前的“欧洲”作为冷战的产物还不足以完成赋予它的任务。共同体创立之父的道德和政治远见几乎已经被遗忘了。

在最近的将来欧洲将不会实现完全的统一。但是它有机会比过去几代人少经历一些分裂。如果幸运在向我们微笑，那么物质的和心理的障碍将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少些残忍。欧洲在前行。风吹着衣裳颤动飘摇（Tremulae sinuantur flamine vestes)。

附录一

各章注释

欧罗巴的传说

1. See Chapter 1, note 15.
2. Ovid, *Metamorphoses*, ii. lines 862 ff. translated by A. D. Melville (Oxford, 1986), p. 50.
3. More correctly, 'tit for tat'.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1.2.
4. Ovid, *op cit*. ii, line 875.
5. Possibly from the Assyrian word, *Ereb*, meaning 'the West'.

导言

1. Henryk Batowski, *Kryzys dyplomatyczny w Europie, 1938–39* (Warsaw, 1962); *Ostatni tydzień pokoju i pierwsze tygodnie wojny*, 2nd edn. (Poznań, 1969); *Europa zmierza ku przepaści* (Poznań, 1989); see also his *Niedoszła "Biała Księga" z roku 1940: rozprawa zródłoznawcza* (Cracow, 1993); and '17 September 1939: Before and After',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27/7 (1993), 523–34.
2.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ed. Henri Berr (Bibliothèq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Paris). J. Vendryes, *Le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appeared in 1921, H. Verin, *La Gloire des ingénieurs* in 1993.
3. From Juliusz Słowacki, *Journey to the East* (1836), trans. by Norman Davies, rather better than in *Heart of Europe* (Oxford, 1984), p. xi.
4. *The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ed. J. B. Bury, H. M. Gwatlin *et al.* (8 vols., Cambridge, 1936–9).
5. *Handbuch der europaischen Geschichte*, ed. T. Schieder (7 vols., Stuttgart, 1968–79).
6. *Periods of European History*, ed. Arthur Hassall (9 vols., London, 1897–1936).
7. e.g. *The Fontana History of Europe* (400–1945), General Editor J. H. Plumb (15 vols., London, 1963–); *The Library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General Editor Geoffrey Barraclough (London, 1965–);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 to 1945*, General Editor Denys Hay (11 vols., London, 1968–).
8. John Bowle, *A History of Europe: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urvey* (London, 1979), 589.
9. See Anthony Seldon, *Contemporary History: Practice and Method* (Oxford, 1988).
10. Walter Raleigh, *A Historie of the World*, in his *Works* (London, 1829). Raleigh prudently confined his history to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11. 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1936).
12. Eugen Weber, *A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 Me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71).
13. 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A Personal View* (London, 1969).
14. Jacob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London, 1973).
15. Michael Andrews, *The Birth of Europe: Colliding Continents and the Destiny of Nations* (London, 1991).
16. Fernand Paul Braudel, *La Me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e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trans. a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ondon, 1973); see also William McNei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1963);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1974).
17. A. Low-Beer, 'Empathy in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55 (Apr. 1989), 8 ff.; J. Cairns, ibid. 13 ff.; also K. Jenkins and P. Brickley, 'Reflections on the Empathy Debate', ibid. 18 ff.

18. See David Lehman, *Signs of the Tim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1991); reviewed by Louis Menand, 'The Politics of Deconstruc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1 Nov. 1991.
19. Apocryphal. On my mischievous master, see Adam Sisman, *A. J. P. Taylor* (London, 1994).
20. Claude Delma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e* (Paris, 1969), 127, 'il n'y a pas une Vérité, mais autant de vérités que de consciences.'
21. Norman Davies, Preface to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1981), vol. i, p. vii.
22. Lord Acton, quoted by Geoffrey Parker, *The Thirty Years' War* (New York, 1984), p. xv.
23. 'It is part of my creed that the only Poetry is History, could we tell it right'; Thomas Carlyle, letter to Ralph Waldo Emerson, 12 Aug. 1834,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Emerson and Carlyle*, ed. J. Slater (New York, 1964), 105.
24. See 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 *TLS*, 16 Oct. 1992, 12–15.
25. Ibid. 15.
26. 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quoted by Denys Hay,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n Idea* (Edinburgh, 1957), 123.
27. Edmund Burke, from *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 (1796), quoted by Hay, *Europe*, 123.
28. William Blake, 'The Ancient of Days' (Urizen Creating the Finite Universe), frontispiece to *Europe a Prophecy* (1794), British Museum; reproduced in *William Blake*, ed. Vivian de Sola Pinto (London, 1965), pl. 4.
29. John of Trevisa, translating Bartholomew the Englishman's Latin Encyclopaedia; quoted by R. Barber, *The Penguin Guide to Mediaeval Europe* (London, 1984), 30.
30. George F. Kennan, *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 (New York, 1891), i. 420–2; quoted by Benson Bobrick, *East of the Sun: The Epic Conquest and Tragic History of Siberia* (New York, 1992), 267–8.
31. See Hay, *Europe*, 125; also Egbert Jahn, 'Wo befindet sich Osteuropa?' *Osteuropa*, 5 (May 1990), 418–40.
32. See W. H. Parker, 'Is Russia in Europe? The Geographical Viewpoint', in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Russia* (London, 1968), 27–9.
33. T. S. Eliot, *Die Einheit der Europaeischen Kultur* (Berlin, 1946); also published as 'The Unity of European Culture' in an appendix to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1948), esp. 122–4.
34. Henri Janne, *Europe's Cultural Identity* (Strasburg, 1981).
35. Quoted by Margaret Shennan, *Teaching about Europe* (London, 1991), 241.
36. Jean Monnet, quoted by Anthony Sampson, *The New Europeans* (London, 1968), 6; see also Mia Rodriguez-Salgado, 'In Search of Europe', *History Today*, 42 (Feb. 1992), 11–16.
37. See J. Tazbir, *Myśl polska w nowożytnej kulturze europejskiej* (Warsaw, 1986), 101–5.
38. L.-P. Ségur, *Tableau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de l'Europe de 1786 à 1806*, quoted by J. Fabre, *Stanislas-Auguste Poniatowski et l'Europe des lumières* (Paris, 1952), 8.
39. Dostoevsky, 8 June 1880. For a full discussion see Milan Hauner, *What Is Asia to Us? Russia's Asian Heartland Yesterday and Today* (New York, 1990), esp. pt. i, 'Russian Ideology and Asia: Historians and Geographers'.
40. Alexander Blok, 'The Scythians', in Cecil Kisch, *Alexander Blok: Prophet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0), 152–3.
41. René Albrecht-Carrié, 'Two Special Cases: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Unity of Europe: An Historical Survey* (London, 1966), 24–7.

42.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1989; 2nd rev. edn. London, 1991); also G. Schopflin and Nancy Wood (eds.), *The Search for Central Europe* (Oxford, 1989); and J. Le Rider, *La Mitteleuropa* (Paris, 1994).
43. *Heart of Europe* is the title of an appeal for the fate of occupied Belgium (London, 1915); of a short history of Poland by Norman Davies (Oxford, 1984); of a guidebook to Prague by Bohomir Mraz (London, 1988); of a Hungarian art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 (Edinburgh, 1992); and of J. P. Stern's collected essays on German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London, 1992).
44. Hugh Seton-Watson, 'What Is Europe, Where Is Europe? From Mystique to Politique', 11th Martin Wight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 Apr. 1985; *Encounter*, 65/2 (July–Aug. 1985), 9–17.
45. Ibid. 14.
46. Ibid. 16.
47. Ibid. 17.
48. Dimitri Obolensky, 'Hugh Seton-Watson, FBA',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8 (1987), 631–41.
49. Douglas Johnson, 'What is European History?', *UCL History Newsletter*, 8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ec. 1991), 9–10.
50. F. Guizot,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n Europe* (London, n.d.), 32.
51. George Burton Adams, *European History: An Outline of Its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1899), 6.
52. Terne L. Plunkett and R. B. Mowat, *A History of Europe* (Oxford, 1927), preface, p. vii.
53. Rudyard Kipling, '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 in *The Definitive Edition of Kipling's Verse* (London, 1949), 234–8.
54. Kipling, 'Recessional: June 22, 1897', in *The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Oxford, 1939), 1069.
55.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2 vols., London, 1987–91). [BLACK ATHENA]
56. Molefi Kete Asante, *Afrocentricity* (Trenton, NJ, 1988), 6, 11. Afrocentrists can be particularly scathing about American black leaders like W. E. B. Du Bois who worked for inte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Educa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at Harvard, the citadel of western images in America, Du Bois was steeped in the traditions of European scholarship. . . . Working from a Eurocentric vision, he participa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currents of Western Europe, and therefore reflected the same mental flow as Darwinism, Marxism, and Freudianism. These rather materialistic approaches to life viewed conflict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progress' (ibid. 16–17).
57. See George James, *Stolen Legacy* (San Francisco, 1976), which maintains that European philosophy and creative thought derive from Africa.
58. S. Amin, *Eurocentrism* (London, 1989); V. Lambropoulos, *The Rise of Eurocentrism: anatomy of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93).
59. Jacques Ellul, *Trahison de l'occident* (Paris, 1975), 217.
60.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1978).
61. In his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 (see n. 64 below), W. H. McNeill uses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erchangeably with 'the Civil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Civilization', 'our civilization', and 'European History'. He makes two main divisions: 'Classical Civilization' and, from AD *c.*900, 'European Civilization', the latter identified with 'Western Christendom' (pp. v–vii, 243–8).
62. Maurice Kee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 (London, 1969), 9.

63. Ibid. 12.
64. W. H. McNeill,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 6th edn (Chicago, 1986), 672. 1st edn. 1949—a companion to the 9-v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ading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65. J. Mortimer Adler, 'Great Books, Past and Present', in his *Reforming Education: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d. G. van Doren (New York, 1988), 318–50; see also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1994).
66. J. Plamenatz, 'Two Types of Nationalism', in E. Kamenka (ed.), *Nationalism: 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an Idea* (New York, 1976), 23–36.
67. Ibid. 29–30.
68. Eric Hobsbawm, 'The Return of Mitteleuropa', *Guardian*, 11 Oct. 1991. [**WIENER WELT**]
69. 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s and Reality* (London, 1919), and esp.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21 (1943), 595–605. See Chapter X, n. 73.
70. In this, Dr Plamenatz (see n. 66 above) was not alone. See Chapter X, n. 23.
71. See 'The Stanford Mind', *Wall Street Journal*, 22 Dec. 1989, and 'Stanford's Image', *San Jose Mercury News*, 17 Mar. 1991; also 'Travels with Rigoberta: Multiculturalism at Stanford', in Dinesh D'Souza,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New York, 1991), 59–93.
72. See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1987).
73. Stanford University, General European Program, 1987–8: 'Europe I' (Prof. J. Brown), 'Europe II' (Prof. J. Diefendorf), 'Europe III' (Prof. J. J. Sheehan).
74. Quoted by George Gordon, 'The Land Where You Can't Tell Wrong from Rights', *Daily Mail*, 21 June 1991.
75.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op. cit.
76. D'Souza, *Illiberal Education*, op. cit.
77. Adler, *Reforming Education*, op. cit.
78. Goethe, 'Talismane', from the *West–Ostlicher Divan* (1815), in *Goethe: Selected Verse*, ed. David Luke (London, 1964), 233.
79. 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45* (Oxford, 1965).
80. Hugh Gaitskell,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1962; quoted by Keith Robbins; see n. 98 below. Lord Tebbitt in the House of Lords in 1992 improved on Gaitskell's gaffe, talking of '1000 years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history'; quoted by Prof. David Cannadine at the Anglo-American Historic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30 June 1994.
81.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History and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Syllabus and Courses, 1992–3* (The White Pamphlet) (London, 1992).
82. Jonathan Israel, 'History in the Making', *Independent*, 28 Dec. 1992. See also Conrad Russell, 'John Bull's Other Nations', *TLS*, 12 Mar. 1993.
83. David Cannadine, 'British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st and Present*, 116 (Aug. 1987), 180. Dissenting opinions were published in 119 (May 1989).
84. See BBC *Newsnight*, 17 Sept. 1991, on 'J. R. Tolkien's Heritage'; also H. Carpenter, *J. R. R. Tolkien: A Biography* (London, 1992).
85. As of 1992. By 1993–4, the Honours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Oxford was offering two course variants, one of which was the 'Special Cours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Early English Literature'. 'Ol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ld English Translation' were still set papers for all candidates for Honour Moderations and Preliminary Examinations in English. *University of Oxford Examination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Oxford 1993, 31–3, 71–2, 177–87. 'The Examination in the School of

Modern History shall always include 1) The History of England . . . 2) General History during some period . . . 3) a special Historical subject . . .' The requirement for a knowledge of compulsory non-English texts had been dropped (ibid. 49, 257 ff.).

86. Jean-François Baque, 'Car chaque enfant meurt à son rang: le patriotisme en chantant', *Historama*, 89 (July 1991), 64–6.

87. V. Ogilvie, 'Teaching Without Nationalistic Bias', *The Times*, 7 June 1947; G. M. Trevelyan, 'Bias in History', *History*, 32/115 (1947), 1–15; Paul Kennedy, 'The Decline of Nationalistic History in the West, 1900–7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73), 77–99.

88. Tadeusz Korzon, *Historya Nowożytna, Tom I do 1648 roku* (Cracow, 1889), 1–2.

89. Korzon's volume initiated a series planned to cover four periods of Modern History: i, Renaissance; ii, Reformation, 1517–1648; iii, Balance of Power, 1648–1789; and iv, Revolution, 1789–1815. In his judgement, *historya najnowsza* or 'Contemporary History' took over from Modern History in 1815. Thereafter, the historian's task was reduced to collecting material for later analysis (pp. 2–4).

90. Special credit in this field must go to the Eckert Institute in Brunswick, which embodied UNESCO's efforts to revive pre-war schemes for eliminating national bias from history-teaching. See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An Outline of the Institute's Development, Tasks and Perspectives* (Braunschweig, 1947); also n. 107 below.

91. K. V. Bazilevich *et al.*, *A History of the USSR* (3 vols., Moscow, 1947–8).

92. e.g. the Oxford Syllabus for GCE A-Level History (1992) required candidates to take two papers from a list of seven 'Outline' and seven 'Special' papers. The Outline Papers cover limited periods such as 1066–1273, 1603–1715, or 1895–1964, and are subdivided into so-called 'British' and 'General' sections (in effect, into English and West European plus Russian). Each contains 'Nominated Topics', such as 'The Peasants' Revolt' or '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Special Papers address subjects such as 'Government in Early Tudor England, 1509–53' or 'Nazism and the Third Reich, 1919–45'; University of Oxford Delegacy of Local Examinations,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1992: Regulations and Syllabuses* (Oxford, 1990), 49–72.

93. D. Iredale, *Discovering Local History* (Aylesbury, 1977); C. Phythian Adams, *Rethinking English Local History* (Leicester, 1987); also E. Hinrichs, *Regionalitaet: der 'kleine Raum' also Problem der internationaler Schulbuchforschung* (Frankfurt, 1990).

94. See M. G. S. Hodgson and E. Burke (eds.),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1993).

95. Élie Halévy, *L'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XIXème siècle* (1913–26), trans. as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6 vols., London, 1949–52); Denis Mack Smith, *Italy: A Modern History* (1959), trans. as *Storia d'Italia dal 1861 al 1958* (2 vols., Milan, 1966); Hugh Kearney, *The British Isles: a history of four nations* (Cambridge, 1989).

96. Christopher Dawson, *The Making of Europe* (London, 1932). See also C. Scott, *A Historian and His World: A Life of 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 (London, 1984).

97. Richard Coudenhouve-Kalergi, *Pan-Europa* (Vienna, 1924; New York, 1926); Pierre Renouvin, *L'Idée de fédération européenne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du XIXe siècle* (Oxford, 1949); Salvador de Madariaga, *L'Esprit de l'Europe* (Brussels, 1952); R. Albrecht-Carrié, *The Unity of Europe: a historical survey* (London, 1966).

98. Keith Robbi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istory*, 75/245 (Oct. 1990), 369–87, being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in Cheltenham, Apr. 1990.

99. Jenny Wormald, 'The Creation of Britain: Multiple Kingdoms or Core and Colonies?', *TRHS*, 6th ser., iii (1993), 194.
100. See Norman Davies, 'Stalin's History Lesson', *Spectator*, 6 Aug. 1988.
101. L. Brezhnev, Speech at Bad Godesberg, W. Germany, 23 Nov. 1981.
102. M.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London, 1987), 191–5: 'We are Europeans' (p. 191); 'The home is common, but each family has its own apartment,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entrances' (p. 195).
103. See G.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lbany, NY, 1985).
104. Such, apparently, was the fate of Tiny Rowland, later Chairman of Lonrho and proprietor of the *Observer*, who in 1941 was arrested and interned under Section 18B of the Act relating to 'British-born persons with leanings towards Fascism'; 'All Well That Ends Well', *Observer*, 23 May 1993.
105. Norman Stone, 'The Evil Empire: Heroes and Villains', *Sunday Times*, 1 Sept. 1991.
106. David Cesarani, *Justice Delayed* (London, 1992).
107. *Against Bias and Prejudice: The Council of Europe's Work on History Teaching and History Textbooks* (Council of Europe Report, Strasbourg, 1986).
108. Margaret Shennan, op. cit. p. 53, esp. the chapters 'Europe and the Time Dimension' and 'Europe's Cultural Identity'.
109. Jean-Baptiste Duroselle, *Europe: A History of Its Peoples* (London, 1991), 'Epilogue', 411–15.
110. See Adam Zamoyski, 'An Historic Case of Euro-fudge', *Sunday Telegraph*, 6 Nov. 1988. J. Nicholas, 'Half-truths about Half of Europe', *Guardian*, 25 Oct. 1991.
111. 'Quand un livre scandalise la Grèce', *Libre Belgique*, 26 Apr. 1990; 'La prima Storia Europea offende tutti i 12', *La Stampa*, 4 Nov. 1990; C. M. Woodhouse, in *Kathimerini* (Athens), 3 June 1990.
112. Academician M. V. Sakellariou, letter to the Greek Deputie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18 Mar. 1990.
113. *Kathimerini*, 30 Sept. 1990.
114. Jacques Montaville *et al.*, *Histoire de l'Europe* (Paris, 1992). See Julian Nundy, 'History Leaves Britain Behind', *Independent on Sunday*, 19 Jan. 1992.
115. Benedik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n. (London, 1991); quoted by G. Varouxakis in *UCL History Newsletter*, 8 (Dec. 1991), 22–4.
116. Prof. Marc Raeff, in 'What Is European History?', *History Today*, 36 (Jan. 1986), 46–50.
117. Professor Marc Ferro, ibid.
118. Dr. Eva Haraszti, ibid.
119. Prof. Immanuel Wallerstein, ibid.
120. A. J. P. Taylor, ibid.

第 1 章

1.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in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1734); also 'On the Difference of Men in Different Climates',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trans. as *The Spirit of Laws* (London, 1878), xiv. 2.
2. P. Vidal de la Blache, *Principes de géographie humaine*, ed. E. de Martonne (Paris, 1921), trans. as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1926); also *La Personnalité géographique de la France*, being the introduction to his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English trans. (Manchester, 1941); F.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Paris,

1985). Montesquieu wrote that Britain was 'a nation so distempered by the climate to have a disrelish of everything, nay even of life' (Esprit des lois).

3. Luigi Luca Cavalli-Sforza in *Scientific American* (1991), as reported by S. Connor, 'On the Origin of Speeches', *Independent on Sunday*, 10 Nov. 1991.
4. Dr Steve Jones, BBC Reith Lectures 1991, published as *The Language of the Genes: Biology, History and the Evolutionary Future* (London, 1993).
5. See Introduction, nn. 42, 43, and 68; also J. Szucs, '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 in *Tőrténelmi Szemle* (Budapest), 24 (1981), 313–69, published as *Les Trois Europes* (Paris, 1985); H. C. Meyer, *Mitteleuropa in German Thought and Action, 1815–45* (The Hague, 1955); and O. Halecki,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52).
6. See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see Introduction, n. 16).
7. Robert Fox, *The Inner Sea: The Mediterranean and Its People* (London, 1991).
8. See David Kirby,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London, 1990); also J. Fitzmaurice, *The Baltic: A Regional Future?* (London, 1992).
9. Neil Ascherson, *Black Sea*, p. 267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10. Ellsworth Huntington,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1915; 3rd edn., New Haven, Conn., 1924); *The 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45).
11.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934), abridged (London, 1960), 151.
12. Michael Anderson, *The Birth of Europe*, op. cit. 97.
13. C. Stringer and R. Grun, 'New Light on Our Shadowy Ancestors', *Independent on Sunday*, 1 Sept. 1991.
14. W. J. Perry, *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 (London, 1925), 34.
15. See Barry Cunliffe, 'Aegea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an Europe', in *The Root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Chicago, 1987), 5–15; also J. Howell, 'The Lake Villages of France', ibid. 42–53.
16. See Gerald S. Hawkins, *Stonehenge Decoded* (London, 1970).
17.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 1987).
18. Marija Gimbutas, in G. Cardona *et al.* (eds.), *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Philadelphia, 1970), 54; quoted by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17.
19. As suggested by Jones, *The Language of the Genes*.
20. On European onomastics, see G. Semerano, *Le origini della cultura europea: rivelazioni della linguistica storica* (Florence, 1984).

Cnossos, 1628 BC

21. See Jacquetta Hawkes, 'The Grace of Life', in *The Dawn of the Gods* (London, 1968), 73–156, where 'the feminine spirit of Minoan life' is contrasted with 'the masculine Achean spirit' of later times.
22. Sir Arthur Evans, *The Palace of Minos: 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Early Cretan Civilization* (4 vols., London, 1921–36), i. 17. See also S. Horwitz, *Find of a Lifetime* (London, 1981), and A. C. Brown, *Arthur Evans and the Palace of Minos* (Oxford, 1981).
23. On the Anemospelia sacrifice, discovered in 1979, see Peter Warren, 'The Minoans and Their Gods', in Barry Cunliffe, *Origins*, op. cit. 30–41.
24. Gerald Cadogan, 'A Theory That Could Change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9 Sept. 1989.

第2章

1. Eliza Marian Butler, 'The Myth of Laocoön', in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Cambridge, 1935), 43–8.
2. *The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1939), Nos. 632, 614, 608.

3. Maurice Bowra,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Oxford, 1933), 9; Walter Savage Landor, quoted ibid.; J. C. Stobart,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 Survey of Hellenic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1911; rev. edn. London, 1933), introduction.
4. Gilbert Murray, *The Legacy of Greece* (Oxford, 1922), Introduction.
5. From Aeschylus, *The Persians*, in D. Grene and R. Lattimore (eds.),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Chicago, 1959), i. 232–3.
6. George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 1907), xii. 303.
7. From Jules Michelet, *Histoire Romaine* (1834), bk. ii.
8. Rainer Maria Rilke, 'Die Sonette an Orpheus', *The Penguin Book of German Verse*, ed. L. Forster (London, 1957), 403–4.
9. Bernard Williams, quoted by Oliver Taplin, *Greek Fire* (London, 1989), 170.
10. Sappho, quoted ibid. 141.
11. Glycon, trans. Peter Jay; see *The Greek Anthology: A Selection in Translation*, ed. Jay (London, 1990).
12. Simonides, 'On the Spartans at Thermopylae', of which there are innumerable translations. See Earl of Cromer, *Paraphrases and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ek* (London, 1903), no. 33.
13. Quotations by, respectively, Oliver Taplin, George Steiner, and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1872): in Taplin, 'Outstaring the Gorgon', in *Greek Fire*, 36–61.
14. *Antigone*, 332 ff., in Sophocles, *The Theban Plays*, trans. E. F. Watling (London, 1947), 135–6.
15. Sir Ernst Gombrich, *The Story of Art* (Oxford, 1952), 52.
16. Ibid. *passim*.
17. K. J. Dover, *Greek Homosexuality* (London, 1978).
18. See David M. Halperin, 'Sex Before Sexuality: Pederasty, Politics, and Power in Classical Athens', in M. B. Duberman *et al.*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New York, 1989; London, 1991), 37–53.
19. See John Boswell, 'Revolutions, Universals, and Sexual Categories', ibid. 17–36.
20. Thucydides, from 'Pericles' Funeral Speech',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London, 1954), ii. 4.
21. Dithyramboi, Fragment 76, *The Works of Pindar*, *ed.* L. R. Famell, (London, 1932) iii, 171

Syracusae, Year 1, Olympiad 141

22. See M. Finley, 'Five Tyrants', in *Ancient Sicily: To the Arab Conquest*, vol. i of a *History of Sicily* written with D. Mack Smith (1968), abridged C. Duggan (London, 1986).
23. Livy, *History of Rome*, xxiv. 34 (Loeb Library).
24. After ibid.
25. From Plutarch, *Marcellus*, xv (after Loeb).
26. ibid., xix. 3.
27. Ch. M. Danov, 'The Celtic Invasion and Rule in Thrace in the Light of Some New Evidence', *Studia Celtica*, 10/11 (1975–6), 29–40.

第3章

1. Cato, *De Re Rustica*, 1.
2. Quoted by, among others, the Venerable Bede, and by Edward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ch. 17.
3. Reginald Blomfield, in R. W. Livingstone (ed.), *The Legacy of Greece* (Oxford, 1924), 406.

4. From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Horatius', in *The Lays of Ancient Rome* (1842); W. H. Henley (ed.), *Lyra Heroica* (London, 1921), 147–63.
5. Appian, *Romaika*, bk. 132, quoted by B. H. Warmington, *Carthage* (London, 1964), 260.
6. Rudyard Kipling, 'A Song to Mithras' (Hymn of the XXX Legion, AD c.350), in *The Definitive Verse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1940; repr. 1989), 523–4.
7. *Aeneid*, vi. 851–3.
8. W. De Burgh, *Legacy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36), ch. ii, 'The Reception of Roman Law'.
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9.
10. Virgil, *Georgics*, ii. 490; iii. 284; *Eclogues*, xi. 32; i. 66; *Aeneid*, i. 362.
11. See Gilbert Highet, 'Vergil', in *Poets in a Landscape* (London, 1959), 55–81.
12. Horace, *Odes*, ii. 3; *Ars Poetica*, 139; *Epistles*, 11, 2, 45; *Odes*, xxx. 1.
13. Ovid, *Ars Amatoria*, ii. 107.
14. Theodor Mommsen, *The History of Rome*, English trans. (London, 1890), iv. 90.
15.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 p. vii.
16. Ibid. 11.
17. Ibid. 201.
18. 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 trans. Robert Graves (London, 1957), on Augustus, 51–108.
19. Ibid. 149–79.
20. Ibid. 209.
21. Ibid. 223.
22. Ibid. 285.
2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3.
24. Ibid.
25. Adapted from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08), 438–48.
26. *The Meditations of the Empero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trans. Robert Graves (London, 1955), iii. 21.
27. Ibid. vi. 50, 48.
2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10.
29. Ibid. ch. 15.
30. See G. Vermes, *Jesus and the World of Judaism* (London, 1983); D. Flusser, *Judaism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Jerusalem, 1988); and M. Baigent and R. Leigh, *The Dead Sea Scrolls Deception* (London, 1991).
31. With thanks to the Al-Shalom Reformed Synagogue, Glencoe, Ill.
32. Irenaeus, *Adversus Heraeses*, III. iii. 1–2, quoted by J.-B. Duroselle,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Paris, 1949), 8.
3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16.
34. C. P. S. Clark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1929), 69; also J. F. Bethune-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London, 1903). There are, in fact, two different formulas of the Nicene Creed—the shorter version issued at Nicaea in 325 and a longer version, also known as the 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possibly drawn up at the General Council of 381. Se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Confessing One Faith . . . : the 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Geneva, 1991).

The Bosporus, 4 November 1079 AUC

35. Jacob Burckhardt,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1852), trans. M. Hadas (New York, 1949), 343–53.
36. Eusebius of Caesarea (*c.*260–340), *Vita Constantini*, quoted by Burckhardt, *Constantine the Great*, 231. See also *The Essential Eusebius*, trans. Colm Luibhaid (New York, 1966).
3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s. 14, 16.

第 4 章

1. See Mortimer Wheeler,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1954).
2. Salvian of Marseilles, *c.*440, quoted by Jacques Le Goff, *Mediaeval Civilization, 400–1500* (Oxford, 1988).
3. Simeon Potter, *Languag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60), ch. 7,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See also Harold Goad, *Language and History* (London, 1958).
4. G. Labuda, *Źródła, sagi, i legendi do najdawniejszych dziejów Polski* (Warsaw, 1961) contains studies of Alfred the Great, the Gotho-Hunnic Wars, the *Widsith*, and the *Chanson de Roland*. See also J. 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Calif., 1973).
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42. For the 4,600 villages, he quotes 'a curious MS fragment of the year 550 in the library at Milan' (n. 11). On the subject of *panicum milium* he comments: 'In the wealth of modern husbandry, our millet feeds poultry, not heroes' (n. 12).
6. Ibid. ch. 30.
7. Ferdinand Lot,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Âge* (Paris, 1951), 3; also 'Le Régime des castes', 115 ff.
8. Charles Oman, *The Dark Ages, AD 476–918* (6th edn., London, 1919), 29.
9. Lot,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311.
10. Oman, *The Dark Ages*, 207.
11. See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12. *Koran*, sura 5, verse 3.
13.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bridge, 1953), i. 3.
14. From the *Shorter Encyclopaedia of Islam*, ed. H. A. R. Gibb and J. H. Kramers (London, 1961), 16, 491.
1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35.
16. *La Chanson de Roland*, cxlix. 2000–9; *The Song of Roland: The Oxford Text*, trans. Roy Owen (London, 1972), 76.
17. Henri Pirenne, *Media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Princeton, NJ, 1925), 27; also his *Mahomet and Charlemagne* (London, 1939).
1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23.
19.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Francorum*, ii. 27, trans. J. H. Robinson in *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 i (Boston, 1904), 51.
20. Bed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 and People*, trans. Leo Shirley-Price (London, 1955), i. 27, p. 76.
21. Ibid. i. 30, pp. 86–7.

Mons Iovis, *c.*25 November AD 753

22. C. Bayet, 'Remarques sur le caractère et les conséquences du voyage d'Étienne III en France', *Revue historique*, 20 (1882), 88–105.

23. J. N. D. Kelly,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pes* (Oxford, 1988), 91–2.
24. Abbé L. Duchesne (ed.), *Le Liber Pontificalis: texte, 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e* (Paris, 1884), 440 ff.; *Étude sur le Liber Pontificalis* (Paris, 1877).
25. J. M. Wallace-Hadrill (ed.),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Continuations* (London, 1960).
26. *Liber Pontificalis*, 447.
27. Ibid.
28.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104.
29. Ibid. 109.

第5章

1.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4, 47.
2. Quoted by Donald Bullough, *The Age of Charlemagne* (London, 1965), 13.
3. Ibid. ch. 4, 'A Court of Scholars and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4. Oman, op. cit. p. 382.
5. Shakespeare, *Macbeth*, v. v. 19–28.
6. F. L. Ganshof, *Qu'est-ce que la féodalité?* (Brussels, 1944); trans. as *Feudalism* (London, 1952), p. xx.
7. Hugh Trevor-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London, 1966), 96.
8. Lynn White, Jr., *Media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61), 14–28.
9. A 9th-cent. investiture described in the 12th cent. *Chanson de Saisnes*, or *Saxenleid*, of Jean Bodel of Arras; quoted by Ganshof, *Feudalism*, 126; see Jacques Le Goff, 'The Symbolic Ritual of Vassalage',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1980), 237–87.
10. C. Seignobos, *The Ris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1939), 128.
11. N. Brussel, *L'Usage général des fiefs en France* (1727), i. 3; quoted by J. H. Robinson, *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1904), i. 178.
12. Eric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1942), 34.
13. Marc Bloch, 'Les Deux âges féodaux', in *La Société féodale: la formation des liens de dépendance* (Paris, 1949), 95–7.
14. P. Skwarczyński, 'The Problem of Feudalism in Poland',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4 (1956), 292–310.
15. F. Tout, *The Empire and the Papacy, 918–1273* (London, 1921).
16. C. W. Previté-Orton, *Shorter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Cambridge, 1952), i. 368.
17. From Liutprand, *Antapadoseos*, *vi*, i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quoted by Robinson, *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 i. 340–3.
18. See Zbigniew Dobrzyński, *Obrządek Słowiański w dawnej Polsce* (3 vols., Warsaw, 1989).
19. *Relacja Ibrahim Ibn Jakuba z podróży do krajów słowiańskich w przekładzie Al Bekriego*, ed. T. Kowalski (Cracow, 1946); quoted by Davies, *God's Playground*, i. 3–4.
20. See Otto Hoetzsch, *The Evolution of Russia* (London, 1966), 17.
21. *The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trans. Edward Fitzgerald (1859; ed. G. F. Maine, London, 1954), quatrains 1, 11, 49.
22. See H. F. B. Lynch, *Armenia: travels and studies*, 2 vols. (London, 1901, repr. 1990); also M. Chahin, *The Kingdom of Armenia* (London, 1987).
23. Shota Rustaveli, trans. M. J. Wardrop as *The Man in the Panther Skin* (London, 1912). On Georgia see W. E. D. Allen, *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 . . . to the Russian Conquest* (London, 1932); D. M. La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Georgian Monarchy*,

1652–1832 (London, 1957); and R. G.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London, 1988).

24. Hen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 (New York, 1956), 51.
25. J.-B. Duroselle,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55.
26. From *The Confession of Golias* composed by Hugh, a follower of Archbishop Reinald of Cologne and known as 'the Archpoet'; text in M. Manitius, *Die Gedichte des Archpoeta* (Munich, 1913), 24–9; quoted by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27), 182.
27. Bernard de Ventadour, quoted by R. Pernoud, *Aliénor d'Aquitaine* (Paris, 1965), trans. Peter Wiles as *Eleanour of Aquitaine* (London, 1967), 102.
28. Jean, Sire de Joinville, *Livre des saintes paroles et bons faits de notre roi, Saint Louis*, quoted by A. Lagarde and L. Michard, *Le Moyen Âge* (Paris, 1962), 123–32.
2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48.
30. Jacques Le Goff, *La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de l'Occident* (Paris, 1965), 98.
31.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London, 1970), 61, 64.
32. See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Feudal Nobility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1174–1277* (London, 1973).
33. Ernle Bradford, *The Great Betrayal: Constantinople 1204* (London, 1967).
34. *The Oxford Book of Prayer*, ed. G. Appleton (Oxford, 1985), no. 217.
35. Edmund Holmes, *The Albigensian or Catharist Heresy* (London, 1925); republished as *The Holy Heretics: The Story of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London, 1948). See also J. Madaule,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London, 1967); Z. Oldenbourg, *Massacre at Montségur* (London, 1961).
36. Eric Christiansen,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 (London, 1980), 53.
37. Ibid. 92.
38. Ibid. 85.
39.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introduction by John Masefield (London, 1908), 413.
40. White, *Media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40.
41. Georges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Warriors and Peasants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1974).
42. Jean Gimpel, *The Mediaeval Machi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77), 100. [There was a charioteer's strike in Rome under Nero.]

Schiedam, AD 1265

43. J. G. Kruisheer (ed.), *Oorkondenboek van Holland en Zeeland tot 1299* (Maastricht, 1992), iii. 1305.
44. Ibid. 1528.
45. W. G. Brill (ed.), *Rijmkronik van Melis Stoke* (Utrecht, 1885), iv. 55–6.
46. See N. Denholm-Young, *Richard of Cornwall* (Oxford, 1947).
47. T. Wright (ed.), *The 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 from the Reign of King John to that of Edward II* (London, 1839), 69.
48. Ibid. 59–63.
49. P. A. Meilink (ed.), *Het Archief van de Abdij van Egmond* (The Hague, 1951), ii, 'Regestenlijst 889–1436', no. 83 (1265) 13 July.
50. Lord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London, 1875), 213.
51. See W. G. Heeres *et al.* (eds.), *From Dunkirk to Danzig: Shipping and Trade in the North Sea and the Baltic, 1350–1850* (Hilversum, 1988).

52. G. J. Renier, *The Criterion of Dutch Nationhood: An Inaugural Lectur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4 June 1945* (London, 1946), 16–17.

第6章

1. Johan Huizinga,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1924; London, 1955), 30.
2. Ibid. 10.
3. Ibid. 26.
4. 'The Advent of the New Form', ibid. 334.
5. R. Lodge,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20), 496.
6. Steven Runciman, 'The Rising Sultanate', i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Cambridge, 1965), 31.
7. Quoted by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London, 1975), 62.
8. See Gabriel Jackson, *The Making of Mediaeval Spain* (London, 1972).
9. Bryce, op. cit., p. 238.
10. Dante Alighieri, *Inferno*, vi. 49–50, 74–5.
11. As related by Simonde de Sismondi, *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 (Geneva, 1807–8), iii. 129.
12. Petrarch, 'Di pensier in pensier', in *The Penguin Book of Italian Verse*, ed. George Kay (London, 1958), 116.
13. Dante Alighieri, *Paradiso*, xxvii. 22–7, 55–60.
14. Robert Burns, 'Scots wha hae' (Bruce Before Bannockburn), in *Poems and Songs of Robert Burns*, ed. J. Barke (London, 1955), 629.
15. Declaration of Arbroath, 6 Apr. 1320,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G. F. Maine, *A Book of Scotland* (London, 1950), 81–2. On Scottish history, J. D. Mackie, *A History of Scotland* (2nd edn., London, 1978); W. Moffat, A. M. Gray, *A History of Scotland* (Oxford, 1989).
16. Quoted by Philip Ziegler, *The Black Death* (London, 1970), 66.
17. W. Rees, 'The Black Death as Recorded in English Manorial Docume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xvi. 2, p. 4; quoted by Ziegler, *The Black Death*, 197.
18. P. D. A. Harvey, *A Mediaeval Oxfordshire Village: Cuxham* (Oxford, 1965), 135.
19. Ziegler, *The Black Death*, 239.
20. H.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 (London, 1936), 200.
21. Quoted by George Holmes, *Europe: Hierarchy and Revolt, 1320–1450* (London, 1975), 131–2.
22. See R. B. Dobson, *The Peasants' Revolt of 1381* (London, 1983).
23. Charles d'Orléans, 'En regardant vers le pais de France', in *Oxford Book of French Verse* (Oxford, 1957), 30–1.
24. Shakespeare, *King Richard the Second*, II. i. 40–50.
25. See D. Keys, 'Very Civil War and Unbloody Battles', *Independent*, 23 Dec. 1989.
26. See Richard Vaughan, *Valois Burgundy* (London, 1975), 129, 175, 191–3.
27. Ibid. 169–70. Destroyed in 1793, it was turned into the site of the departmental lunatic asylum.
28. Michał Giedroyć, 'The Arrival of Christianity in Lithuania, i: Early Contacts (Thirteenth Century)'; 'ii: Baptism and Survival (1341–87)', *Oxford Slavonic Papers*, xviii (1985), 1–30; xix (1986), 34–57.
29. P. Rabikauskas, 'La cristianizzione della Samogizia, 1413–17' in *La cristianizzione della Lituania: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clesiastica (1987)* (Rome, 1989).
30. V. H. H. Green, *Mediaeval Civilisat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1971), 4.

31. Green, op. cit. 98–9.
32. From H. von Treitschke, *History of Germany* (1879), ii; quoted by J.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2), 37.
33. Huizinga,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248.
34. Friedrich Heer, *Mittelalter* (1961), trans. as *The Mediaeval World: Europe from 1100–1350* (London, 1962), 251–3.
35. 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Cambridge, 1965), 131.
36. Ibid. 37.
3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ch. 68.
38. See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Spain Repays Its Debt to the Jews', *European*, 19–25 Mar. 1992.
39. Emma Klein, 'The Sultan Who saved the Sephardim', ibid.
40. For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Columbus, see J.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1450–1650* (London, 1963).

Moscow, AD 1493

41. See *The Orthodox Liturgy, being the Divine Liturgy of S. John Chrysostom and S. Basil the Great according to the use of the Church of Russia*, trans. P. Thompson *et al.* (London, 1939), from which all the following quotations, except for the Gospel reading, derive.
42. The Old Church Slavonic text uses the terms 'Ierod Tsr'' and 'Tsr' Iudeiskyi'; from *Gospoda Nashego Iesusa Khrista Novyi Zavyet na Slavyanskom i Ruskom Yazykakh* (The New Testame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the Slavonic and Russian Languages), parallel texts (St Petersburg, 1823), 23.
43. See Dimitri Strémooukhoff, 'Moscow the Third Rome: Sources of the Doctrine', *Speculum* (Jan. 1953), 84–101; repr. in M. Cherniavsky, *The Structure of Russian History: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York, 1970), 108–25.
44. See J. L. I. Fennell, *Ivan the Great of Moscow* (London, 1961).
45. R. G. Howes, *Testaments of the Grand Princes of Moscow* (Ithaca, NY, 1967), 267–98.
46. Fennell, *Ivan the Great*, op. cit. 122.
47. Strémooukhoff, 'Moscow the Third Rome', *passim*.
48. Ibid. 113, esp. n. 46.
49. 'Testament of Ivan III', in Howes, *Testaments*. See also G. Vernadsky, *Russia at the Dawn of the Modern Age* (vol. iv of G. Vernadsky and M. Karpovich,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Conn., 1959), ch. 3.
50. Fennell, *Ivan the Great*, 146.
51. Strémooukhoff, 'Moscow the Third Rome', 115.
52. Ibid. *passim*.
53. Dimitri Obolensky, 'Russia's Byzantine Heritage', *Oxford Slavonic Papers*, i (1950), 37–63.
54. Fennell, *Ivan the Great*.
55. Vernadsky, *Russia at the Dawn of the Modern Age*, ch. 3.
56. Fennell, *Ivan the Great*, preface, pp. v ff.
57. Dimitri Obolensky, 'Italy, Mount Athos and Muscovy: The Three Worlds of Maximos the Greek' (Raleigh Lecture, 1981),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vii (1981); repr. in *Six Byzantine Portraits* (Oxford, 1988), 201–19.
58. Ibid. 160.
59. Élie Dennisoff, *Maxime le Grec et l'Occident* (Paris, 1942), 423.

第 7 章

1. See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1).
2. Herbert Weisinger, 'The Attack on the Renaissance in Theology Today',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2 (1955), 176–89.
3. See Jacob Burckhardt, *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London, 1878).
4. Bert S. Hall (ed.), *On Pre-moder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Los Angeles, 1976).
5. Walter Pater, *The Renaissance* (1873; repr. New York, 1959), 72.
6. Johan Huizinga, *Erasmus of Rotterdam: with a selection from his letters* (London, 1952).
7. Erasmus, Preface to New Testament (1516). *Prefaces to the Fathers, the New Testament, and On Study*, facsimile edn. (Menton, 1970); H. P. Smith, *Erasmus: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Place in History* (New York, 1923).
8. Erasmus, *In Praise of Folly*, trans. and ed. Betty Radice, in *Collected Works* (Toronto, 1974–), xxvii. 2, 120 ff.
9. Ibid. 148.
10. *Adagia*, ibid. 31–4; see also Erasmus, *Proverbs or Adages . . . Englished by R. Taverner*, facsimile edn. (Gainsville, Fla., 1956).
11. Étienne Gilson (1937), Reinhold Niebuhr (1941), and Nicholas Berdyaev (1931), quoted by Weisinger, 'The Attack on the Renaissance', 176 ff. See also W. K. 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Boston, 1948).
12.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in G. Kay (ed.), *The Penguin Book of Italian Verse* (London, 1958), 172–3.
13. Leopold von Ranke,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their Church and State, and especially of their conflicts with Protestantism* (1834–6), trans. E. Foster (London, 1847), i. 38.
14. Charles Drelincourt, d. 1669; quoted by Albert-Marie Schmidt, *Jean Calvin et la tradition calvinienne* (Paris, 1957), 169.
15. In 1622, by Pope Gregory XV; quoted by John Padberg, 'The Jesuit Question', *Tablet*, 22 Sept. 1990.
16. Quoted by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557.
17. Ranke, *History of the Popes*, i. 266.
18. Herbert Butterfield,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 (London, 1947).
19. Ibid. It is curious that the historian who in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31) so brilliantly exposed the teleological tendencies of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 should have argued for 'the strategic l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20. P. M. Harma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Lancaster, 1983), 17.
21. Quoted by A. W. Crosby, Jr.,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onn., 1972), 11.
22. Ibid.
23. See ibid.; also Kirkpatrick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New York, 1991).
24. See J. Larner, 'The Certainty of Columbus', *History*, 73/237 (1988), 3–23, for a summary of the changing historiography; also Garry Wills, 'Man of the Yea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Nov. 1991.
25. 'Where Did Columbus Discover America?',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170/5 (Nov. 1986), 566A with maps.
26. Yen Chung-ping, in *Historical Research* (Beijing) (1977), quoted by Larner, 'The Certainty of Columbus'; also Simon Wiesenthal, *Sails of Hope* (New York, 1973).
27. J. Manzano, *Colon y su segreto: el Predescubrimiento* (Madrid, 1982).

28. David Henige, *In Search of Columbus: The Sources for the first Voyage* (Tucson, Ariz., 1991).
29. See J. A. Levensen (ed.), *Circa 1492: 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 (Catalogue to an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Washington DC) (New Haven, Conn., 1992).
30. Jacques Attali, *1492* (Paris, 1991), pt. i: 'Inventer l'Europe', 15 ff.
31. See Eugenio Garin (ed.), *Renaissance Characters* (Chicago, 1991).
32. Martin Goncalvez de Cellerigo, *Memorial de la politica necessaria* (1600); quoted by H. Kamen, *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 (London, 1976), 79.
33. See J. H. Hexter, 'Storm over the Gentry', in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Chicago, 1979), 117–62.
34. Kamen, *The Iron Century*, 89–135.
35. With special thanks to Dr Robert Frost. See M. Robert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50–1660' in M. Roberts (ed.),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 (London, 1967), 195–225; also G.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 Myth?', in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559–1659: Ten Studies* (London, 1989).
36. See J. H. Shenn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France, 1461–1660* (London, 1968).
37. Hobbes, *Leviathan* (1651), ed. J. Plamenatz (London, 1962), 143.
38. 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1622); quoted by Charles Wilson, *Mercantilism* (London, 1958), 11–12.
39. An expression of H. Wiesflecker, *Maximilian I: die Fundamente des habsburgischen Weltreiches* (Vienna, 1991).
40. Otto von Habsburg, *Charles V* (Paris, 1967; London, 1970), p. xii.
41. See R. J. W. Evans, *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 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1979); also his 'The Imperial Vision', in G. Parker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New York, 1987), 83 ff.; and 'Culture and Anarchy in the Empire, 1540–1680',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8 (1985), 14–30.
42. R. J. W. Evans, *Rudolf II and His World: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1973); also Robert Grudin, 'Rudolf II of Prague and Cornelius Drebbel: Shakespearean archetypes?'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4/3 (1991), 181–205.
43. J. H. Ellio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63), 13.
44. Ibid. 14.
45. Ibid. 249.
46. J. Ortega y Gasset, quoted by Elliot, *Imperial Spain*, 249.
47. Geoffrey 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1972).
48.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1500–2000* (New York, 1988), 61.
49. Quoted by J. Huizinga, 'The Spirit of the Netherlands', in P. Geyl (ed.), *Dutch Civilis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68), 101.
50. See Charles Wilso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8).
51. S. R. 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642–49* (London, 1886–9), i. 168.
52. Conrad Russell, 'The Slumbering Hatreds of the English', *Independent*, 18 Aug. 1992. See hi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1990).
53. Sigismund Herberstein (1581), quoted by R.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85.
54. C. Veronica Wedgwood,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1957), 460.
55. C. R. Friedrichs, 'The War and German Society', in Parker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208–15.

56. Wedgwood, *The Thirty Years War*, 440.

Rome, AD 1667

57. Timothy Kitao, *Circle and Oval in the Square of St Peter's: Bernini's Art of Planning* (New York, 1974), 'The Last Revision', 49–52; also figs. 67–74.
58. See Torgil Magnuson, *Rome in the Age of Bernini* (Stockholm, 1982).
59. Ibid. i. 360.
60. See Oreste Ferrari, *Bernini* (Florence, 1991).
61. Filippo Baldinucci, *Vita del Cavaliere Gio. Lorenzo Bernino* (Florence, 1682), trans. C. Enggass as *The Life of Bernini* (University Park, Penn., 1966), 80, 74; the source for all quotes and anecdotes below relating to Bernini's life.
62.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Bk. I, ll. 1–6,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Milton* (Oxford, 1952), I. 5.

第8章

1.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quoted by J. Lively,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1966), p. ii.
2. Alexander Pope, *An Essay on Criticism*, ii. 162–5; *An Essay on Man*, I. x. 9–14; *The Poetical Works*, ed. H. F. Cary (London, n.d.), 53, 224.
3. See Wyn Griffith, 'The Growth of Radicalism', in *The Welsh* (London, 1950), 20–43.
4. *Essay on Man*, ii. 1; *Poetical Works*, 225.
5. Dryden, *Absalom and Achitophel* (1681), i. 45–8.
6. Quoted by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226.
7. Ibid. 236.
8. 'Voltaire's Deism', in Lively, *The Enlightenment*, 43–5.
9. *L'Esprit des Lois*, XI. vi.
10.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Discours aux Sorbonniques', in *Œuvres de Turgot*, ed. G. Schelle (Paris, 1913), i. 205, 215–16. See also D. Dakin, *Turgot and the Ancien Regime in France* (New York, 1972).
11. Voltaire, 'Stances à Mme Lullin, de Genève' (1773), in *Contes en vers et poésies diverses* (Paris, 1936), 163–4.
12. Voltaire's 'Declaration' of 1778, text in app. 497, *Complete Works* (Oxford, 1987–), quoted by R. Pomeau (ed.), *Voltaire en son temps* (Oxford, 1994), v, 'La Fin'.
13. On Rousseau's loathing for Voltaire, see his letter of 17 June 1760, in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and Related Documents* (Oxford, 1968–77), cv, no. D8986.
14. Quoted by James Bowen,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London, 1981), iii. 182.
15. See Norman Davies,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in *Heart of Europe*, 262–8; Daniel Beauvois, *Lumières et société en Europe de l'est: l'université de Vilna et les écoles polonaises de l'empire russe* (Paris, 1977); and his *Szkolnictwo polskie na ziemiach litewsko-ruskich, 1803–32* (Lublin, 1991); o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see C. Miłosz, *History of Polish Literature* (2nd edn., Berkeley, 1969), chapter vii, 'Romanticism', 195–280.
16. Isaiah Berlin,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1976), p. xxvi.
17. Berlin, in *The Magus of the North: J. G. Ha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rationalism* (London, 1993); quoted by M. Rosen, 'The first Romantic?', *TLS*, 8 Oct. 1993.
18. Bertrand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1946), 702.
19. Simon Schama, *Dead Certainties (Unwarranted Speculations)* (London, 1991).
20. Quoted by H. Méthivier,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Paris, 1950), 63.
21. R. Hubret, quoted by Méthivier, *Louis XIV*, 112.

22. Compare R. Briggs op. cit. p. 220 with Méthivier, *Louis XIV*, 95.
23. From 'The Vicar of Bray' (early 18th cent.), in Ernest Newton, *The Community Song Book* (London, 1927), 24–5. The song is usually said to be inspired by the career of Revd Simon Symonds, who kept his position from Cromwell's time to that of George I.
24. See Jonathan Israel (ed.), *The Anglo-Dutch Moment: Essays o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Its World Impact* (Cambridge, 1991).
25. Neal Ascherson, 'The Spectr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Looms over Greater England', *Independent on Sunday*, 18 Nov. 1990.
26. See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onn., 1992); also Colin Kidd, *Subverting Scotland's Past: Scottish Whig Historians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nglo-British Identity, 1689–c.1830* (Cambridge, 1993).
27. *Listy do Marysieńki*, ed. L. Kukulski (Warsaw, 1973), ii. 214–19, trans. B. Mazur; quoted by Davies, *God's Playground*, i. 484–6. See also Davies, *Sobieski's Legacy* (M. B. Grabowski Lecture, 1984) (London, 1985).
28. J. T. A.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Life and Legend* (Oxford, 1983), 329.
29. 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1981), 587–8.
30.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112–38.
31. Ibid. 115.
32. Quoted by Davies, *Sobieski's Legacy*; *passim*.
33. See E. Rzadkowska (ed.), *Voltaire et Rousseau en France et en Pologne* (Warsaw, 1982).

Prague, 29 October 1787

34. From the *Recollections* of Wilhelm Kühe, quoted by J. Rushton, *W. A. Mozart, Don Giovanni* (Cambridge, 1981), 124–5.
35. Ludwig von Köchel, *Chronologisch-thematisches Verzeichnis samtlicher Tonwerke Wolfgang Amadé Mozarts* (Salzburg, 1862), 591 [K. 527].
36. Rushton, *Mozart*, 67.
37. See Jonathan Miller (ed.), *The Don Giovanni Book: Myths of Seduction and Betrayal* (London, 1990).
38. After Rushton, *Mozart*, 47.
39. Köchel 591, 527/Ouverture.
40. Köchel 592, 527/7.
41. Köchel 593, 527/20.
42. Köchel 594, 527/26.
43. Köchel 593, 527/22.
44. H. C. Robbins (ed.), *The Mozart Compendium* (London, 1990), 299.
45. Emily Anderson (ed.), *The Letters of Mozart and His Family*, rev. edn. (London, 1985), no. 550, Mozart to Baron von Jacquin, pp. 911–12.
46. Robbins, *Mozart Compendium*, 303–4.
47. Ibid. 304.
48. See Andrew Steptoe, *The Mozart–Da Ponte Operas: The Cultural and Musical Background to 'Le Nozze di Figaro', 'Don Giovanni', and 'Così fan tutte'* (Oxford, 1983). Later in life Da Ponte migrated to New York, becoming Professor of Italian Literature at Columbia College.
49. Eduard Morike, *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 introd. by M. B. Benn (London, 1970); also *Mozart's Journey to Prague*, trans. L. von Loewenstein-Wertheim (London, 1957).
50. Jaroslav Seifert, 'Na Bertramce', from the Collection *Halleyova Kometa* (Prague, 1967), 82–7 (trans. R. Pynsent).

51. Joseph II's 'Journal of a Journey across Bohemia' (1771) quoted by E. Wangermann, *The Austrian Achievement 1700–1800* (London, 1973), 93.
52. Roy Porter, 'Libertinism and Promiscuity', in Miller, *The Don Giovanni Book*, 1–19.
53. Giacomo Casanova, *The History of My Life* (1826), trans. W. R. Trast (London, 1967), 71; quoted by Steptoe, *The Mozart–Da Ponte Operas*, 207.
54. See J. Bouissonouse, *Condorcet: le philosophe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2).
55. *Memoirs of Madame de la Tour du Pin*, ed. abridged, and trans. Felice Harcourt (London, 1985), 94–5.

第9章

1. Mirabeau 25 Aug. 1790, quoted by Albert Sorel,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85), i. 554. See Norman Hampson, *The First European Revolution, 1776–1815* (London, 1969).
2. Wordsworth, *Prelude*, xi. 108; Burke, *Reflections*; Goethe at the Battle of Valmy, 1792.
3. Thomas Carlyle,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37), ed. A. R. H. Hall (London, 1930), 205.
4. J. 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G. Wright (Chicago, 1967), 17.
5. Sorel,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 1 V.
6. Thomas Jefferson, first draft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5. Cf. the final text, *In Congress, July 4 1776,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acsimile, Washington, DC, 1960).
7. S. T. Coleridge,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1797), 139–42, i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ed. E. H. Coleridge (Oxford, 1912), 191.
8. William Blake, 'The Rose', in *Poetical Works*, ed. J. Sampson (Oxford, 1905), 123.
9.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705.
10. F. Claudon, *Encyclopédie du romantisme* (Paris, 1980), 48.
11.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66), pt. iii, ch. 6, 196; also Whitney Pope, *Alexis de Tocqueville: 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1983).
12. de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56) (Paris, 1953), pt. ii, ch. 1, 223–4.
13. R. D. Harris, *Necker: Reform Statesman and the Ancien Regime* (San Francisco, 1979). See Norman Hampson, 'Update: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1989), 10–12.
14. C. E. 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ème siècle* (Paris, 1937).
15. G. Lefebvre, *Quatre Vingt-Neuf* (1939), trans. as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1947);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8), trans. 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the Origins to 1793* (London, 1962);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4).
16. Ibid. 173.
17. 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Paris, 1962), 1.
18. See M. Browers, 'Can We Stop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76/246 (1991), 56–73; also Conor Cruise O'Brie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Feb. 1990, being a review of F. Furet and M. Ozouf,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90).
19.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89).
20. See T. C. W. Blan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London, 1986).
21. R. Avezou, *Petite histoire du Dauphiné* (Grenoble, 1946), 85.
22. Abbé Emmanuel de Sieyès (1748–1836),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Jan. 1789).

23. Carlyle, op. cit., p. 35.
24. Ibid. 29.
25. G. Lefebvre, *La Grande Peur de 1789* (1932); trans. as *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1973).
26. Source unverified.
27. Edmund Burke, from *An Appeal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Whigs* (London, 1791), 127–8; text published as appendix to Norman Davies, 'The Languour of so Remote an Interest: British Attitudes to Poland, 1772–1832', *Oxford Slavonic Papers* (new series), 16 (1983), 79–90.
28. See R. B. Rose, *The Making of the Sans-culottes: Democratic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Paris, 1789–92* (Manchester, 1983).
29. See Gwyn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1978).
30. C. Dufresne, 'La Virée de Galerne', *Historama*, 20 (1991), 56 ff.
31. See J. de Viguerie, *Christianisme et Revolution* (Paris, 1986); G. Babeuf, *La Guerre de Vendée et le système de dépopulation* (Paris, 1987); S. Reynald, *Le Génocide franco-français* (Paris, 1986), and *Juifs et vendéens: d'un génocide à l'autre: la manipulation de la mémoire* (Paris, 1991); J.-C. Martin, *Les Guerres de Vendée au Musée d'Histoire de Cholet* (Cholet, 1990); also *Une guerre interminable: la Vendée deux cents ans après* (Nantes, 1985);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London, 1964).
32. See D. Sutherland, *The Chouans: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Counter-Revolution in Upper Brittany* (Oxford, 1992). [GUERRILLA]
33. E. Blum (ed.),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Paris, 1902), 3–8; trans. J. H. Stewart,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1951), 113–15.
34. Quoted by Geoffrey Bes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G. Best (ed.),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London, 1988), 105.
35.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420–1, 423, 451.
36. Quoted by Davies, *God's Playground*, i. 542.
37. From André Barbier, 'L'Idole' (1831); quoted by P. Gehl, *Napoleon For and Against*, rev. edn. (London, 1964), 31.
38. After J. M. Thompson (ed.), *Napoleon's Letters* (Oxford, 1934), no. 87.
39. J. C. Herald, *The Mind of Napoleon: a selection from his written and spoken words* (New York, 1955), no. 64.
40. Quoted by Milan Hauner, 'Německá střední Europa?' (A German Central Europe?) *Lidové noviny* (Prague), 30 Oct. 1993.
41. Daniel Beauvois, *Société et lumières à l'Europe de l'est: l'université de Vilna et les écoles polonaises de l'empire russe* (Paris, 1977), also W. H. Zawadzki, *A Man of Honour: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as Statesman of Russia and Poland, 1801–30* (Oxford, 1993).
42. J. Miller, 'California's Tsarist Colony', *History Today*, 42 (Jan. 1992), 23–8; K. T. Khlebnikov, *Colonial Russian America: Khlebnikov's Reports, 1817–32* (Portland, Oreg., 1976); P. A. Tikhmenev,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American Company* (Seattle, 1978).
43. Sorel, op. cit. i, 1.

Fontainebleau, 20 April 1814

44. 'Fanfare de l'Empéreur'; Henri Lachouque, *Napoléon et la Garde Impériale* (1957), trans. A. S. Brown as *Anatomy of Glory* (London, 1978), 795.
45. Ibid. 712–15.

46. Armand, Marquis de Caulaincourt, *Mémoires* (1933) (see n. 53 below); quoted by D.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London, 1967), 1003.
47. Herald, *Mind of Napoleon*, no. 176.
48. Lachouque, op. cit. The *grognards*, or 'grumblers', was the nickname of the Imperial Guard's 1st Regt of Grenadiers à Pied.
49. R. F. Delderfield, *Imperial Sunset: The Fall of Napoleon, 1813–14* (London, 1969), 219.
50. Ibid. 245.
51. Louis Cohen, *Napoleonic Anecdotes* (London, 1925), no. 209.
52. J. M. Thompson (ed.), *Napoleon's Letters*, op. cit.
53. Lachouque, *Napoléon et la Garde Impériale*, 415.
54.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1002.
55. Quoted by Felix Markham, *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New York, 1965), 127.
56. Ibid. 127.
57. Caulaincourt, *Mémoires*, English trans. (London, 1935).
58. Delderfield, *Imperial Sunset.*
59. Charles de la Roncière (ed.), *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London, 1935), 265.
60. Ibid. 266.
61. Louis Cohen, *Napoleonic Anecdotes*, no. 143.

第10章

1. Quoted by A. J. P. Taylor, 'Bismarck: Man of German Destiny', in *Europe: Grandeur and Decline* (London, 1967), 80.
2. From the tombstone of William Pickering and Richard Edger, who both died 24 Dec. 1845; South Porch, Ely Cathedral.
3. A. Palmer, *Metternich* (London, 1972), 15: 'Revolution became for him the supreme bogey.' See also L. B. Namier, 'Metternich', in *Vanished Supremacies: Essays on European History, 1812–1918* (London, 1958).
4. Eric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1969), 21–2.
5. See 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Oxford, 1989).
6. See 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1981).
7. See Peter Laslett,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 introduction to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s* (Cambridge, 1972), 1–89; on Le Play, ibid. 16–23.
8. B. Disraeli,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 (London, 1925), 67.
9. Norman Stone,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London, 1982), 20–42.
10. Keats,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The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1939), no. 640.
11. Lamartine, from 'Le Lac', *The Oxford Book of French Verse* (1907), no. 236.
12. Leopardi, from 'Canto notturno di un pastor dell'Asia', *The Penguin Book of Italian Verse* (London, 1958), 279–85.
13. Joseph von Eichendorff, 'Das Zerbrechenen Ringlein' (The Broken Ring), in L. Reiners (ed.), *Der ewige Brunnen*, Beck Verlag, 1992.
14. Słowacki, from 'Beniowski', translated by Norman Davies, more accurately than in *Heart of Europe* (Oxford, 1984), 243. These lines are inscribed on the tomb of Józef Piłsudski in the Rossa Cemetery, Vilnius, Lithuania.

15. A. Pushkin, from the Prologue to 'The Bronze Horseman (1833)', *The Penguin Book of Russian Verse*, ed. D. Obolensky (London, 1962), 111–15. Pushkin's words echo the lines of the exiled Mickiewicz, with whom he had once stood before the statue of Peter the Great 'under one coat'. See A. Mickiewicz, 'Pomnik Piotra Wielkiego', from 'Dziadów Części III Ustęp' (1832), *Wybór Pism* (Warsaw, 1950), 308–9.
16. Chorus Mysticus, from *Faust*, pt. ii, 12, 104–end; *Goethe: Selected Verse*, ed. David Luke (London, 1964), 355.
17. See Maria Korzeniewicz, *Od ludowości ironicznej do ludowości mistycznej: przemiany postaw estetycznych Słowackiego* (Wrocław, 1981).
18. de Nerval, the opening lines of 'Les Cydalises', *Oxford Book of French Verse*, no. 276. See R. Sabatier, *La Poésie du XIXe siècle*, i: *Les Romantismes* (Paris, 1977), 221–52.
19. Quoted by B. Russell, 764–5.
20. See B. A. Gerrish, *A Prince of the Church: Schleiermacher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theology* (London, 1984); K. W. Clements,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Pioneer of Modern Theology* (London, 1987).
21. See James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8).
22. See D. Blackbourn and G.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84); see also Madeleine Hurd, 'Sweden and the German Sonderwe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Chicago, 27–9 Mar. 1992.
23. These definitions are not too dissimilar from those preferred by A. D. Smith in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71), where the proponents of state nationalism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lateral aristocratic ethnos'. See also 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NJ, 1965); Louis Snyder, *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1964), and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1976);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Oxford, 1966);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1983); P. Alter, *Nationalism* (London, 1989); A. D. Smith (ed.),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eiden, 1992). (See n. 31 below.)
24. N. Gardels, 'Two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Isaiah Berl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1 Nov. 1991.
25. Ernest Renan, from *Qu'est-ce qu'une nation? Conférence faite en Sorbonne le 11 mars 1882*,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1947), i. 887–906.
26. See Hugh Seton-Watson, *States and Nation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77).
27. J. F. Palmer, 'The Saxon Invas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Our Character as a Rac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S., ii (1885), 173–96.
28. H. S. Chamberlain, *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1899), quoted by W. and A. Durant, 'Race and History', in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ew York, 1968), 26–7.
29. See H. Paszkiewicz, *The Origins of Russia* (London, 1954); also 'Are the Russians Really Slavs?' *Antemurale*, 2 (Rome, 1955).
30. F. M. Dostoevsky, *The Diary of a Writer*, trans. B. Basol (London, 1949), 565–6, 632.
31.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1990), 14.
32. Timothy D. Snyder, 'Kazimierz Kelles-Krauz: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biography'. D.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1995.
33. With acknowledgement to a paper 'Empire and Nation in Russian History' read by Professor Geoffrey Hosking at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3 May 1992.
34. See Louis L. Snyder, *The New Nationalism* (New York, 1968), 55 (see also Introduction, n. 66 above); 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1993).

35. Kazimierz Brodziński, quoted and translated by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202.
36. Count Eduard von Taafe und Ballymote (1833–95). 'Not only did Taafe not find an answer to the riddle, he did not even look for one'; 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9), 615.
37. Bonar Law, 1912.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n. (New York, 1911), 554; R. Kee, *The Green Flag: a history of Irish Nationalism* (London, 1972).
38. C. M. Grieve (Hugh MacDiarmid), 'A drunk man looks at the thistle' (1926), 'The annals of the five senses' (1930), in *Collected Poems* (London, 1978); T.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2nd edn. (London, 1981); *The Enchanted Glass: Britain and its monarchy* (London, 1988). See also N. MacCormick (ed.), *The Scottish Debate: essays on Scottish Nationalism* (Oxford, 1970); G. Bryan, *Scottish Nationalism: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1984).
39. Renan, 1882 (see n. 25 above).
40. See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4th edn. (Oxford, 1978); Angus Walker,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2nd edn. (London, 1989).
41. From A. J. P. Taylor,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 S. Moore (Harmondsworth, 1967).
42. Quoted by Tibor Szamuely, *The Russian Tradition* (London, 1974), 292. See Deborah Hardy, *Petr Tkachev: The Critic as Jacobin* (Seattle, 1977).
43. Professor Kołakowski reports that he has made the statement so often that he forgets where exactly he wrote it. See his *The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Origins, Growth, and Dissolution* (Oxford, 1978).
44. Robert Conquest, introduction to Szamuely, *The Russian Tradition*, p. ix.
45. See G. Woodcock,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s* (London, 1963), 'The Family Tree', 35–55.
46. Percy Bysshe Shelley, *Prometheus Unbound* (1819), III. iii. 131–5, 154, 157–61.
47.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A History of Anarchism* (London, 1991).
48. A. J. P. Taylor, 'The Wild Ones', *Observer*, 25 Oct. 1964, being a review of James Joll, *The Anarchists* (London, 1964).
49. Taylor, 'Bismarck', 90.
50. See F. Malino and D. Sorkin, *Jews in a Changing Europe, 1750–1870* (Oxford, 1990); P. John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London, 1987).
51. Quoted by C. Jelen, *Le Point* (Paris), 1, 163 (1994), 45.
52. See Heinz-Dietrich Loewe, *The Tsars and the Jews: Reform, Reaction, and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Russia, 1772–1917* (Chur, 1993); F. Raphael, *The Necessity of Antisemitism* (Southampton, 1989); R. Wistrich, *Anti-zionism and Antisemit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asingstoke, 1990); Douglas Johnson, *The Dreyfus Affair* (London, 1966); N.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London, 1967).
5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xxviii. 989.
54.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68).
55. J. Wertheimer, *Unwelcome Strangers: East European Jews in Imperial Germany, 1890–1914* (Oxford, 1987); S. E. Aschheim, *Brothers and Strangers: The East European Jew in German and German Jewish consciousness, 1800–1923* (Madison, Wis., 1988).
56. *Hundert Jahre Jahrhundertwende* (Berlin, 1988), 155.
57. Herbert Read, in *Art Now* (1933), quoted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ed. Margaret Drabble (1985), 658.

58. See J. P. Stern, *A Study of Nietzsche* (Cambridge, 1979); S. Aschheim, *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Oxford, 1992).
59. See Ben Macintyre, *Forgotten Fatherland: The Search for Elizabeth Nietzsche* (London, 1992).
60. John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London, 1992), 4. See 'Extreme Prejudice', *Sunday Times, Books* 28 June 1992, 8–9.
61. Quoted by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12.
62. Michael Coren, 'And the Inferior Swarms Will Have to Die', *Independent*, 2 Jan. 1993: a flyer for his *The Invisible Man: The Life and Liberties of H. G. Wells* (London, 1993). *Anticipations*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entry on Wells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63.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21.
64. See J. Miller, *Freud: The Man, His World,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 1972).
65. Baudelaire, from the sonnet 'Correspondences', *Oxford Book of French Verse*, no. 305.
66. From Verlaine, 'Chanson d'automne', ibid. no. 345.
67. Rimbaud, from 'Voyelles', ibid. no. 362.
68. Max Nordau, *Degeneration* (1892–3), quoted by R. C. Mowat, *Decline and Renewal: Europe Ancient and Modern* (Oxford, 1991), 12–13.
69. Quoted by Michael Howard, *The Franco-Prussian War: 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 1870–1* (London, 1962), 208. von Moltke preferred 'We have them in a mouse-trap'; ibid. 207.
70. Ewa M. Thompson, 'Russophilia', in *Chronicles* (Oct. 1994), 32–5.
71. Music-hall song by G. W. Hunt, popularized in 1878 by Jas. MacDermott;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Oxford, 1964), 112.
72. See Michael 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1976), 97–106.
73. From 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s and Reality* (1919), quoted by C. Kruszewski,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Apr. 1954), 2–16;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25 Jan. 1904), *Geographical Journal* (Apr. 1904), 421–44 (repr. London, 1969). See B. B. Bluet, *Halford Mackinder: a biography* (College Station, TX, 1987).
74. H. von Moltke, *Gesammelte Schriften und Denkwurdigkeiten* (Berlin, 1892), v. 194.
75. Quoted by Michael Howard, 'A Thirty Years' War: Two World Wa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th ser., 3 (1993), 171. Cf. Adolf Hitler before the Reichstag, 21 May 1935: 'Whoever lights the torch of war in Europe can wish for nothing but chaos.'
76. Joachim Remak, *Sarajevo: The Story of a Political Murder* (London, 1959); L. Popelka, *Heeres-gesichtliches Museum* (Vienna, 1988), 50–1. Francis-Ferdinand's two sons, Max and Ernst von Hohenberg, died in Nazi custody in 1938 at Dachau.

Whitehall, 3 August 1914

77. D. C. Browning (ed.), *Everyman's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and Proverbs* (London, 1951), no. 1792;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113; A. and V. Palmer, *Quotations in History: A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Quotations* (Hassocks, 1976), 97.
78.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 (London, 1925), ii. 10, 20.
79. Keith Robbins, *Sir Edward Grey: A Biography of Lord Grey of Fallodon* (London, 1971).
80. See B. Jelavich, *Russia's Balkan Entanglements, 1800–1914* (Cambridge, 1991), esp. 248–75. The Tsar's Manifesto of 3 Aug. made no reference to Russia's diplomatic obligations to Serbia, only to the common 'faith', 'blood',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the Slav peoples'; ibid. 275.

81. See G. M. Trevelyan, *Grey of Fallodon* (London, 1937).
82. See Sidney Buxton, *Edward Grey: Bird Lover and Fisherman* (London, 1933).
83. 8 Dec. 1919, Harvard Union; Viscount Grey, *Recreation* (London, 1920).
84. Grey, *Twenty-five Years*, i. 121.
85. From 'Chronicle' in *The Annual Register, 1914* (London, 1915).
86. W. S. Churchill, *World Crisis*, quoted by Trevelyan, *Grey of Fallodon*, 200–4.
87. *Manchester Guardian*, 4 Aug. 1914.
88. Davi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quoted by Trevelyan, *Grey of Fallodon*, 69, 254.
89. See Hermann Lutz, *Lord Grey und der Weltkrieg*, trans. as *Lord Grey and the World War* (London, 1926), esp. 193–4.
90. Grey, *Twenty-five Years*, i. 57.
91. Robbins, *Sir Edward Grey*, 290.
92.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10–18.
93.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iii (1914–16) (London, 1971), 3 Aug. 1914.
94. J. Spender and C. Asquith, *The Life of Lord Asquith and Oxford* (London, 1932), ii. 93.
95. B. Connell, '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 in *Manifest Destiny* (London, 1953), 44–5. [**GOTHA**]
96. Gilbert, *Churchill*, iii, ch. 1, 'A Really Happy Man', 25–6.
97. Ibid.
98. Ibid. 30, 4 Aug. 1914.
99. Ibid. 31.
100. Lutz, *Lord Grey and the World War*, 156.
101. See K. H. Jarausch, *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Conn., 1972).
102. Ibid. 70.
103. K. H. Jarausch, '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 Bethmann Hollweg's Calculated Risk, 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Atlanta), 2 (1969), 48–78.
104. Jarausch, *Enigmatic Chancellor*, 149.
105. 15 Nov. 1913, Bethmann to the Crown Prince, quoted by Jarausch, '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
106. 8 July 1914, ibid.
107. Jarausch, *Enigmatic Chancellor*, 149.
108. 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 *Memoirs, iii: 1909–19* (London, 1932), 161—not a friendly witness.
109. L. Cecil, *Albert Ballin: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1888–1918* (Princeton, NJ, 1967), 122 ff.
110. Von Bülow, *Memoirs*, iii. 159–60.
11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2th edn. (London, 1922), xxx. 453–4.
112. Quoted by Jarausch, '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
113. Ibid. 54.
114. Ibid. 58.
115. Ibid. 75–6.
116. 27 July 1914, ibid.
117. A. and V. Palmer, *Quotations in History*, no. 1751.
118. This is the thesis of Fritz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1969), trans. as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1972). For the crucial sequence of events on 29–30 July, see 492–8.
119. Von Bülow, *Memoirs*, iii. 163.

120.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511.
121. Palmer, *Quotations in History*, no. 1752.
122. Jarausch, '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 71 ff.
123. The phrase 'a scrap of paper' certainly accords with Bethmann Hollweg's sentiments on Belgian neutrality as confirmed that same day by his speech to the Reichstag. But the earliest documentary source for his use of the particular form of words would seem to be the British Ambassador's report written four days later. From there it was taken up by all the standard reference works. Sir E. Goschen to Sir Edward Grey, London, 8 August 1914, HMSO, *Collected Diplomat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London, 1915), no. 160, p. 111; Speech of the Imperial German Chancellor before the German Reichstag, on 4 Aug. 1914, ibid. 436–9; Palmer, *Quotations in History*, 18; *Everyman's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London, 1951), no. 215.
124. Marcel Proust, *Correspondence*, ed. P. Kolb, iii (1914) (Paris, 1985), no. 16.
125.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London, 1976), ii. no. 708.
126. C. Hassall, *Rupert Brooke: A Biography* (London, 1964), 454–5.
127.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ed. J. T. Boulton (Cambridge, 1981), ii. no. 851, to Lady Cynthia Asquith, 30 Jan. 1915.
128. *The Letters of Thomas Mann, 1889–1955*, ed. R. and C. Winston (London, 1970), i. 69–70, to Heinrich Mann, 7 Aug. 1914.
129. Count Carlo Sforza, 'Tisza, the Magyar', in *Makers of Modern Europe* (London, 1930), 65.
130. D. A. Prater, *European of Yesterday: A Biography of Stefan Zweig* (Oxford, 1972).
131. Ibid.
132. See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Oxford, 1954).
133.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2nd edn. (Basingstoke, 1991), ii, ch. 2, 'Storms before the Storm', 34–71.
134. Quoted by A. Solzhenitsyn, *August 1914* (London, 1971), 59 ff.
135. F. A.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New York, 1927), 3–23; quoted by R.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9–1919* (London, 1990), 211.
136. R. Rolland, *Journal des années de guerre, 1914–19*, ed. M. R. Rolland (Paris, 1952).
137. Michael Davie, *The Titanic: the full story of a disaster* (London, 1986); G. J. Marcus, *The Maiden Voyage: a complet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itanic disaster* (London, 1988); A. Rostron, *The Loss of the Titanic* (Westbury, 1991).
138. A. J. P. Taylor,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Englishmen and Others* (London, 1956).
139. Taylor, quoted by Paul Kennedy, 'Profound Forces in History', in C. J. Wrigley (ed.), *Warfare, Diplomacy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A. J. P. Taylor* (London, 1986), abridged in *History Today*, 36 (Mar. 1986), 11.
140. Taylor,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Oxford, 1954), chapter xxii.
141. Taylor, quoted by Kennedy, 'Profound Forces in History' (*History Today*), 12.

第 11 章

1. Anna Akhmatova (1889–1966), *Selected Poems*, trans. and introd. S. Kunitz with M. Hayward (London, 1989), no. 16, 'Chem khuzhe etot vyek pryedshetvuyushikh?' (1919), 70.
2. See Norman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1975); also A. Clark, *Suicide of the Empires: The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14–18* (London, 1971).

3. K. Rosen-Zawadzki, 'Karta Buduszczej Jewropy', *Studia z dziejów ZSRR i Srodkowej Europy* (Wrocław, 1972), viii. 141–5, with map.
4. R.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9–1919* (London, 1990), 419.
5. J. and J. Bogle, *A Heart for Europe: The Lives of Emperor Charles and Empress Zita of Austria-Hungary* (Leominster, 1990), chs. 7, 8.
6.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492.
7. Ibid. 553.
8. RAF Casualty Reports, 1–10 Sept. 1918,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Air 1/858/204/5/418 (opened 1969).
9. See Adolf Juzwenko, *Polska a 'Biała' Rosja* (Poland and the Russian 'Whites'), Wrocław 1973 (with French summaries).
10. See David Footman, *The Civil War in Russia* (London, 1961). On the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f Soviet history, see n. 35 below.
11. See R. L. Tokes, *Bela Kun and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1918–19* (New York, 1967); I. Volges, *Hungary in Revolution, 1918–19: Nine Essays* (Lincoln, Nebr., 1971).
12. See Norman Davies, 'The Missing Revolutionary War', *Soviet Studies*, 27/2 (1975), 178–95; also *White Eagle, Red Star: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20* (London, 1972).
13. Lord D'Abernon, *The Eighteenth Decisive Battle of World History* (London, 1931), 8–9.
14. See P. B. Kinross, *Ataturk: The Birth of a Nation* (London, 1964); Alan Palmer, *Kemal Ataturk* (London, 1991); M. Llewellyn-Smith, *The Ionian Vision: 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22* (London, 1973); M. Houspian, *Smyrna 1922: The Destruction of a City* (London, 1972).
15. See Walter Lac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Berkeley, Calif., 1976).
16. See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86), first published as *The Burden of our Time* (1951); also Leonard Shapiro,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2).
17. See Carl Friedrich,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otalitarian Society', in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 1954); also C. Friedrich *et al.*,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Three Views* (New York, 1969).
18. Vyacheslav Molotov, 6 Nov. 1939, and Hermann Göring, 9 Apr. 1933.
19. Hugh Seton-Watson, in *The Imperialist Revolutionaries* (London, 1961).
20. Denis Mack Smith, 'The March on Rome', *Mussolini* (London, 1981), 52 ff.; see also Adrian Lyttle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29* (London, 1987).
21. Mack Smith, 'The March on Rome', 240, described Mussolini as 'one of the few people whom [Hitler] really liked'.
22. Quoted by R. Albrecht-Carrié, *The Unity of Europe: An Historical Survey* (London, 1966), 223–4.
23. Re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Dictionnaire Quillet* (Paris, 1935), i. 602.
24. P.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78* (New York, 1981); also S. Margulies, *The Pilgrimage to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924–37* (Madison, 1965).
25. Michael Holroyd, 'Fellow Traveller', extract from *George Bernard Shaw: A Biography* (London, 1991); *Sunday Times*, 15 Sept. 1991.
26. See P. Slater, *The Origin and Influe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1977).
27. See *Europa, Europa: das Jahrhundert der avantgarde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an exhibition at the Kunst-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s, Bonn, 27 May–16 Oct. 1994, directed by Ryszard Stanisławski and Christoph Brockhaus; catalogue (Bonn, 1994), 4 vols.

28. S. O'Faolain, *Constance Markievicz* (London, 1934); also Anne Haverty, *Constance Markievicz: An Independent Life* (London, 1988).
29. 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32* (Oxford, 1982).
30. Col. Robins, 1918, quoted by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Oxford, 1954); also by A. J. P. Taylor, 'Trotsky', in *Englishmen and Others* (London, 1956), 135.
31. L. B. Trotsky,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1941; new edn. London, 1968).
32. In 1936; quoted by John Maynard, 'The Two Disciplines', in *The Russian Peasant and Other Studies* (London, 1942).
33. See Alec Nove,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Some Problems of Soviet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64); also J. Arch Getty,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Cambridge, 1988).
34. Alexis Tolstoy; quoted by Trotsky, *Stalin*, op. cit.
35. For decades, many historians counted Stalin's victims in 'hundreds' or 'thousands', whilst others, such as Solzhenitsyn, talked of 'tens of million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highest estimates have been vindicated. See 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London, 1992); also Conquest's review of the semi-repentant 'revisionists' (J. Arch Getty and R. T.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1993)), in *TLS* Feb. 1994. Yet no precise statistical breakdown has been produced. Studies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gap' of c.27 million for 1941–5, for example, mak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Soviet citizens killed by the Nazis and those killed by the Soviet regime itself. No proper analysis of losses in the USSR by nationality has been forthcoming. See Norman Davies, 'Neither Twenty Million, nor Russians, nor War Deaths', *Independent*, 29 Dec. 1987; also M. Ellman, 'On Sources: A Note', *Soviet Studies*, 44/5 (1992), 913–15.
36. Quoted by A. J. P. Taylor, 'Hitler's "Seizure of Power"', in *Englishmen and Others*, 139–53.
37. Alan Bullock,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rev. edn. (London, 1964), 773.
38. 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2nd edn. (London, 1989), 42–60. See also Tim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H. A. Turner (ed.), *Nazism and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2), 175–200.
39.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 Manheim (London, 1969), introd. by D. C. Watt, ch. 11, 'Nation and Race'.
40. Ibid. 260.
41. Ibid. 587.
42. Ibid. 598.
43. Ibid.
44. Quoted by D. Thomp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London, 1966), 727.
45. George Watson, 'Hitler's Marxism', in *The Idea of Liberalism: Studies for a New Map of Politics* (London, 1985), 110–25.
46. See R.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1); also T. Childers, *The Nazi Vote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London, 1983).
47. See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18–41.
48. Cf. Celia Heller, *On the Edge of Destruction* (New York, 1977), with L. Dobroszycki and B. Kirschenblatt-Gimblett (eds.), *Image Before my Eyes: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Jewish Life in Poland, 1864–1939* (New York, 1977–8). For a fine period piece, see Lewis

Namier, 'The Jews in the Modern World' (1934), in *In the Margin of History* (London, 1940).

49. From Lewis Namier, 'Yugoslavia', in *Facing East* (London, 1947), 66–82, a review of Rebecca West's wonderful travelogue,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London, 1942).
50. Arthur Koestler, *Spanish Testament* (London, 1937); see also his *Darkness at Noon* (London, 1968).
51. See D. W. Pike, *In the Service of Stalin: The Spanish Communists in Exile, 1939–45* (Oxford, 1993).
52. Hugh Thomas ventures a figure of 500,000 including *c.*200,000 military deaths and *c.*245,000 victim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s; *The Spanish Civil War*, 3rd edn. (London, 1977), 270, 925–7.
53. Geza Jeszenszky, Foreign Minister of Hungary, 'The Lessons of Appeasemen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lecture at SSE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 Dec. 1993.
54. Keith Feiling, *A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1946), 367.
55. See M. Gilbert,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v: *1922–39* (London, 1976), chs. 47, 48,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and 'A Defeat without a War'.
56. After H. C. Hillman, *The Comparative Strength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1939). See also Paul Kennedy, 'The Politics of Appeasement', in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1985).
57. For an intelligent discussion of this necessarily speculative subject, see Ernst Topitsch, *Stalin's War: A Radical New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85), trans. A. and B. E. Taylor (London, 1987).
58. This piece of misinformation found its way into many Western textbooks, e.g. M. L. R. Isaac, *A History of Europe, 1870–1950* (London, 1960), 241, where the Poles are described as 'Germany's much vaunted ally'.
59. See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A Short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1984), 'The Military Tradition', 239–43.
60. Quoted by Bullock, *Hitler*, 527.
61.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 R. J. Sonntag and J. S. Beddie (Washington, DC, 1948), 78.
62.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Ribbentrop, Molotov, and Stalin, 23–4 Aug. 1939, *Nazi–Soviet Relations*, 74.
63. US Chief of Counsel for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i (Washington, DC, 1948), 390–2, quoting Naujocks's own deposition at the Nuremberg Tribunal.
64. For up-to-date encyclopedic information on the Second World War, see Ian Dear and M. R. D. Foot *et al.*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1995).
65. Alvin D. Coox,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1939* (Stanford, Calif., 1985).
66. See A. Read and D. Fisher,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41* (London, 1988).
67. 16 June 1941; *The Goebbels Diaries*, ed. F. Taylor (London, 1982), 414.
68. See Victor Suvorov, *Icebreaker: Who Starte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0).
69. R. C. Raack, 'Stalin's Plans for World War Tw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6 (1991), 215–27.
70. *Goebbels Diaries*, 16.
71. J. Wnuk, *Losy dzieci polskich w okresie okupacji hitlerowskiej* (Warsaw, 1980); see also C. Henry and M. Hillel, *Au nom de la race* (Paris, 1974), trans. as *Children of the SS*

(London, 1976); Richard Lukas, *Did the Children Cry? Hitler's War against Jewish and Polish Children, 1939–45* (New York, 1994).

72. Jan T. Gross,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39–44* (Princeton, NJ, 1979); Richard Lukas,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The Pole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Lexington, Ky., 1986); also M. Brosz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enpolitik, 1939–45* (Frankfurt, 1965). On the Nazi-built ghettos in occupied Poland, see L. Wells, *The Janowska Road* (London, 1966); L. Dobroszycki (ed.), *The Chronicle of the Łódź Ghetto* (New Haven, Conn., 1984); A. Lewin, *A Cup of Tears: A Diary of the Warsaw Ghetto* (Oxford, 1988); A. Tory,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The Kovno Ghetto Diary* (New York, 1990).
73. Norman Davies and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Eastern Poland and the Soviet Union, 1939–45* (London, 1991), introd. See also J.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yelorussia* (Princeton, NJ, 1988); Keith Sword, *The Soviet Takeover of the Polish Eastern Provinces, 1939–41* (Basingstoke, 1991); Irena and J. T. Gross, *War Through Children's Eyes: The Soviet Occupation of Poland and the Deportations, 1939–41* (Stanford, Calif., 1981); and Anon. [Zoe Zajdlerowa],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preface by T. S. Eliot) (London, 1946).
74. 30 Sept. 1939. See Ewa M. Thompson, 'Nationalist Propaganda in the Soviet Russian Press, 1939–41', *Slavic Review*, 50/2 (1991), 385–99.
75. J. Garliński, *Intercept: The Enigma War* (London, 1979); also R. Wojtak, 'The Origins of the Ultra-secret Code in Poland, 1937–38', *Polish Review*, 23/3 (1978).
76. See Suvorov, *Icebreaker*: op. cit. A large part of the Soviet air force, for example, was located in vulnerable forward positions.
77. Alan Bullock, 'Hitler and the Holocaust', lecture, Logan Hall, University of London, 14 July 1993.
78. Göring to Heydrich, 31/7/1941. Text in R.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London, 1961), 262.
79.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The Critical Edition* (London, 1989).
80. R. Hilberg *et al.* (eds.), *The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1939–42* (New York, 1979).
81. After Rudolf Hoe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 (London, 1959), 144–57.
82. Prominent items include Primo Levi, *If This Is a Man* (1956), *The Truce* (1963), *If Not Now, When?*; Jerzy Kosiński, *The Painted Bird* (1966), *The Devil Tree* (1973); Leon Uris, *Mila 18* (1961), *QB VII* (1971).
83. See Hanna Kral, *Zdążyć przed Panem Bogiem: rozmowy z Markiem Edelmanem*, trans. as *Shielding the Flame* (New York, 1986); review by Norman Davi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 Nov. 1986; also 'Poles and Jews: An Exchange', ibid. 9 Apr. 1987.
84. Isaak Shahak, 'The Life of Death: An Exchan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9 Jan. 1987, 45–50.
85. See M. Edelman, *The Ghetto Fights* (New York, 1946); Y. Zuckerman, *A Surplus of Memory: A Chronicle of the Warsaw Ghetto Rising* (New York, 1993).
86. From 'Campo di Fiori', Warsaw 1943; Czesław Miłosz, *Collected Poems, 1931–87* (London, 1988).
87. Jan Błoński of the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Cracow, 'The Poor Poles look at the Ghetto', in *Polin*, ii (1987), 321 ff., the translation of an article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ygodnik Powszechny* (Cracow), 11 January 1987.
88. Irene Tomaszewski and T. Werbowski, *Żegota: the rescue of Jews in wartime Poland*

(Montreal, 1994); T. Prekerowa, *Konspiracyjna Rada Pomocy Żydom w Warszawie, 1942–45* (Warsaw, 1983); W. Bartoszewski and Z. Lewin (eds.), *Righteous among Nations: How Poles Helped the Jews, 1939–45* (London, 1959); also K. Iranek-Osmecki, *He Who Saves One Life* (New York, 1971).

89. See Bruno Szatyn, *A Private War: Surviving in Poland on False Papers, 1941–45* (Detroit, 1985); N. Tec, *When Light Pierced the Darkness: Christian Rescue of Jews in Nazi-occupied Poland* (New York, 1985); Thomas Keneally, *Schindler's Ark* (London, 1982); also the true life story of Solomon Perel, as portrayed in Agnieszka Holland's film *Europa, Europa* (1990) videorecording by Channel 4 Television (London, 1991).
90. See Istvan Deak in 'Who Saved Jews? An Exchan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5 Apr. 1991, 60–2, a continuation of earlier discussions starting with Deak's 'The Incomprehensible Holocaust', ibid. 28 Sept. 1985.
91. S. Friedlander, *Pius XII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6); J. D. Holmes, *Pius XII, Hitler and the Jews* (London, 1982); also R. G. Weisbord, *The Chief Rabbi, the Pope,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2).
92. A high estimate of 5.957 millions was produced by Jakub Lestchinsky, a low estimate of 5.1 millions by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rev. edn. (New York, 1985), 767, 670. A detailed appendix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Holocaust*, ed. I. Gutman (New York, 1990) provides a minimum estimate of 5.596 millions and a maximum estimate of 5.86 millions: iv. 1797–1802. From this, the median estimate would work out at 5.728 millions. There can be no definitive figure. But various historians using similar methods reach similar conclusions (see Appendix III, p. 1328).
93. The total of excess wartime deaths within the USSR is now estimated at 26–7 millions. See S. Maksudov, 'Losses Suffered by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SR, 1918–58', in R. Medvedyev (ed.), *The Samizdat Register II* (London, 1981). Figures above 27 million, which began to appear in the 1990s, appear to relate not to wartime deaths but to projections of demographic losses, including those of post-war generations that were never born. The breakdown of such figures, however, is highly problematical. One may reasonably assume that the heaviest civilian casualties during the war were incurred in regions most heavily contested by the Nazis and Soviets, i.e. Ukraine, Byelorussia, and eastern Poland. See n. 35 above. One must equally be wary about dubious definitions of territory, chronology, and causes of death. See M. Ellmann, S. Maksudov, 'Soviet deaths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 not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4 (1994), 671–80.
94. Jean Paul II, *Maximilien Kolbe: Patron de notre siècle difficile* (Paris, 1982); W. Herbstrath and B. Bonowitz, *Edith Stein: A Biography* (London, 1985); W. T. Bartoszewski, *The Convent at Auschwitz* (London, 1990).
95. See Józef Garliński, *Fighting Auschwitz: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London, 1970); also M. R. D. Foot, *Six Faces of Courage* (London, 1978), 105–19. Piłecki was executed by the communist security service on 25 May 1948. His own account, suppressed for fifty years, was published as *Raport Witolda*, ed. A. Cyra (Warsaw, 1991). Polish communist propaganda wrongly stated that resistance inside Auschwitz was run by J. Cyrankiewicz, a post-war prime minister.
96. Jan Karski, 'The Tragedy of Szmul Zygelbojm', *Poland*, May 1987, 43–50, extracts from *Story of a Secret State* (Boston, 1944); see also David Engel, *In the Shadow of Auschwitz: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Exile in London and the Jews, 1939–42* (London, 1987).
97. See D.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45* (New York, 1984); also R. Bolchover, *British Jewr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1993).
98. M.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London, 1981).

99. Lucy S. Dawidowicz, 'The fate of the Jews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was unique'; 'The Jews: A Special Case', in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Cambridge, Mass., 1981), 11 V. Discussions on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he Holocaust centre less on the historical event itself than on the motives of those who oppose all forms of comparison. According to Sir Isaiah Berlin, for example, 'If uniqueness of a phenomenon is examined . . . , we mustn't rush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s unique before we have compared it to other events which in some ways resemble it. That is what's happening to the Holocaust . . . It has a conspicuously political motive.' in G. Thomas (ed.), *The Unresolved Past: a Debate in German History*, chaired and introduced by Ralf Dahrendorf (London, 1990), pp. 18–19.
100. Rosa Luxembourg, in relation to antisemit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y do you come with your special Jewish sorrows? I feel just as sorry for the wretched Indian victims of Putamayo.' Quoted by Dawidowicz, 'The Jews: A Special Case', 4.
101. See I. Abrahamson (ed.), *Against Silence: The Voice and Vision of Elie Wiesel* (New York, 1985).
102. Lucy Dawidowicz,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45* (London, 1975).
103. R.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104. Yehudah Bauer, *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1978). This line is developed in Raul Hilberg, *Perpetrators, Victims, Bystanders: The Jewish Catastrophe, 1939–45* (London, 1992).
105. Martin Gilbert, *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London, 1986).
106. L. Dawidowicz, 'The Curious Case of Marek Edelman', *Commentary* (New York), 83/3 (March, 1987), 66–9. See M. Edelman, *The Ghetto Fights* (New York, 1946), a non-Zionist view by the last surviving leader of the Warsaw Ghetto Rising.
107. Arnold J. Meyer, *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The 'Final Solution' in History* (London, 1988).
108. Lukas,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also R. C. Lukas (ed.), *Out of the Inferno: Poles Remember the Holocaust* (Lexington, Ky., 1989).
109. Arthur R. Butz, *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chmond, Va., 1976), also P. Rassinier, *The Holocaust Story and the Lies of Ulysses* (Costa Mesa, Calif., 1978); see also Noam Chomsky, 'All Denials of Free Speech Undercut a Democratic Society',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7/1 (1986), 123–7; also his 'Thought Control in the USA', *Index on Censorship*, 7 (1986), 2–23, and subsequent correspondence.
110. Paul Findley (ed.), *They Dare to Speak Out: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Confront Israel's Lobby* (Westport, Conn., 1985).
111. C. Lanzmann, *Shoah: An Or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The Complete Text of the Film)* (New York, 1985); numerous reviews included T. Garton Ash, 'The Life of Dea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 Dec. 1985; J. Karski, 'Shoah (Zaglada)', *Kultura* (Nov. 1985), 121–4; J. Turowicz, 'Shoah w polskich oczach', *Tygodnik powszechny* (Cracow), 10 Nov. 1985; P. Coates, 'A Ghetto in Babel', *Encounter*, 49/1 (1987); and the collection *Polish Americans Reflect on Shoah* (Chicago, 1986).
112. Rafał Scharf, 'In Anger and in Sorrow', *Polin: A Journal of Polish–Jewish Studies*, 1 (1986), 270.
113. Władysław Anders, *An Army in Exile: The story of the Polish Second Corps* (London, 1947; repr. Nashville, 1981).
114.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known as the Atlantic Charter, made public 14 August 1941'; J. A. S. Grenville,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1914–73: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London, 1974), 198–9.

115. 18–21 June 1945. *Trial of the Organisers, Lea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olish Diversionist Organisation, Moscow* (London, 1945). See Z. Stypułkowski, *Invitation to Moscow* (New York, 1962).
116. Gilbert, *Churchill*, vii: *1941–5* (London, 1986), 991–3.
117. A. Solzhenitsyn, *Prussian Nights: A Narrative Poem*, trans R. Conquest (London, 1977), esp. 41–3, 49–53.
118. S. E. Ambrose, *Pegasus Bridge: 6 June 1944* (London, 1984). At midnight on 5/6 June, Pegasus Bridge was guarded by two Polish conscripts, one of whom, Pte. Vern Bonck, was reported leaving for the Benouville brothel. The 'Ox and Bucks' were relieved next day by Lord Lovat's commandos headed by a bagpiper.
119. Peter Hoff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 Resistance, 1933–45* (London, 1988); see also T. Prittie, *Germans Against Hitler* (London, 1964); F. R. Nicosia (ed.), *Germans against Nazism* (New York, 1990); D. C. Large, *Contending with Hitler: Varieties of German Resistance* (Cambridge, 1991).
120. To Albert Speer, 19 Mar. 1945; Bullock, *Hitler*, 774.
121. Ibid. 794–5.
122. Wisława Szymborska, stanzas from 'Koniec i początek' (Beginning and End), to be publish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Presented by Stanisław Baranczak, in 'The Most Pressing Questions are Naïve Ones',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Polish Literature, SSE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2–5 Mar. 1993.

Nuremberg, 19 October 1945

123. An earlier Polish version of this section was published in *Gazeta Wyborcza* (Warsaw), 3–4 Apr. 1993, under the excellent title 'Prawda ujawniona, i prawda ukryta' (Truth Revealed and Truth Concealed).
124. Airey Neave, *Nuremberg: A Personal Record* (London, 1978), 73–85. The author was killed in 1979 by a bomb placed by Irish terrorist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car park.
125. Ibid. 26.
12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The Trial of German Major War Criminals: Documents and Proceedings*, ed. L. D. Egbert (Nuremberg, 1947–9), vols. i–xlii.
127.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Speeches of the Chief Prosecutors* (London, 1946).
128. *Manchester Guardian*, 23 Mar. 1946, *The Times*, 8 May 1946; quoted by A. and J.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 (London, 1983), *passim*.
129. Quoted by Neave, *Nuremberg*, 331.
130. M. Bloch, *Ribbentrop* (London, 1992), 454.
131. Tusa and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 472.
132. See R. K. Woetzel, *The Nuremberg Trial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1962).
133. See R. A. Kirk,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R. A. Taft* (New York, 1967).
134. H. K. Thompson and H. Strutz (eds.), *Doenitz at Nuremberg: A Reappraisal* (Torrance, Calif., 1983).
135. Neave, *Nuremberg*, 26.
136. Lewis Namier, *Manchester Guardian*, 19 Oct. 1945; quoted by Tusa and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 *passim*.
137. Ibid.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interpreter, Vyshinsky's exact words were: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defendants. May their paths lead straight from the courthouse to the grave'; Telford Taylor,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A Personal Memoir* (London, 1993), 211.

第12章

1. A favourite metaphor of John Paul II, e.g. in his Apostolic Letter *Euntes in mundum* (1988), on the millennium of Kievan Rus'.
2. See Keith Sword *et al.*,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sh Community in Great Britain, 1939–50* (London, 1989).
3. Nikolai Tolstoy, *Victims of Yalta* (London, 1977).
4. James Bacque, *Other Loss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ss Deaths of German prisoners . . .* (New York, 1989), a thesis vehemently contested by G. Bischoff and S. Ambrose (eds.), *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 Facts Against Falsehood* (Baton Rouge, La., 1993), reviewed in *History*, 79/255 (1994), 186.
5. Krystyna Kersten, 'The Transfer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from Poland, 1945–7',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10 (1964), 27–47; Alfred M. De Zayas, *Nemesis at Potsdam: The Anglo-American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rev. edn. (London, 1979), and *The German Expellees: Victims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1993); John Sack, *An Eye for an Eye: 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on Germans, 1945* (New York, 1993).
6. See Kazimierz Moczarski, *Rozmowy z katem* (1974), trans. as *Conversations with an Executioner* (London, 1978).
7. Arthur Bliss Lane, *I Saw Poland Betrayed* (New York, 1947); Stanisław Mikołayczyk, *The Rape of Poland: The Pattern of Soviet Domination* (London, 1949); Jan Ciechanowski, *Defeat in Victory* (London, 1968). On the Kielce Pogrom, see T. Wiącek, *Kulisy i tajemnice pogromu kieleckiego 1946r* (Cracow, 1992).
8. George Kennan,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under the pseudonym 'Mr X'.
9. Gilbert, *Churchill*, viii. 200.
10. Ibid.
11. *Times*, 6 Mar. 1947.
12. Gilbert, *Churchill*, viii. 265–7.
13. Ibid. 267.
14. Ibid. 355. For statements at the Hague Congress see Anthony Sampson, *The New Europeans: A Guide to the Workings, Institutions, and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London, 1968), 4–5.
15. Neal Ascherso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at will Survive all Tiffs', *Independent on Sunday*, 21 Feb. 1993.
16. K. D. Bracher, *Die deutscher Diktatur* (1969), trans. as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Harmondsworth, 1970).
17. Anthony Sampson, *The Essential Anatomy of Britain: Democracy in Crisis* (London, 1992).
18. After Walter Laqueur, *Europe since Hitler* (London, 1967), 194.
19. Dr Otto von Habsburg, *The Economist*'s Charles Stransky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20 Sept. 1993.
20. 'The Last Testament', in Strobe Talbot (ed.), *K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1974), 284.
21. See Laqueur, *Europe since Hitler*, 'The Soviet Economy', 231 ff.
22. Quoted by Geoffrey Hoskin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85), 405.
23. Irina Ratushinskaya, *Grey Is the Colour of Hope*, trans. A. Kojevnikov (London, 1989), 229.
24. Michael Bourdeaux,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Fall of Soviet Communism* (London, 1992).

25. Adam Ważyk, 'Poemat dla dorosłych' (A poem for adults), *Nowa Kultura* (Warsaw), 21 Aug. 1955; quoted by Davies, *God's Playground*, ii. 582–3.
26. On the Prague Spring, see H. Gordon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1976).
27. Col. Ryszard Kukliński: as reported in *Washington Post*, 27 Sept. 1992; *Gazeta Wyborcza*, 28 Sept. 1992.
28. As reported by the Czech ex-Politburo member Karel Kaplan in *Panorama* (May 1977): see 'Stalin's Secret Council of War', *The Times*, 6 May 1977; also 'Secrets from the Prague Spring', *Time*, 9 May 1977.
29. George Ball, 'JFK's Big Mome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3 Feb. 1992.
30. L. Kołakowski, 'Tezy o nadzieji i o beznadziejności', *Kultura* (Paris), June 1971, trans. as 'Hope and Hopelessness', *Survey*, 17/3(80) (Summer 1971), 37–52.
31.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London, 1988), p. xv.
32.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including the protocols and final act with declarations, Maastricht 7 February 1992* (London, 1992); text published by *Sunday Times*, London, 11 Oct. 1992.
33. Slavenka Drakulic, *How We Survived Communism and Almost Laughed* (London, 1992); Janine Wedel, *The Private Poland* (New York, 1986).
34. Stanisław Lem, in Stanisław Barańczak (ed.), *Breathing Under Water and other East European essays* (Cambridge, Mass., 1992), 1–6.
35. 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s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Cambridge, 1990), 78. See also David Selbourne, *The Death of the Dark Hero: Eastern Europe, 1987–90* (London, 1990).
36. To the Governor of Steiermark; after von Habsburg, Charles Stransky Lecture, *passim*.
37. Timothy Garton Ash, *In Europe's Name: Germany and the Divided Continent* (London, 1993), 385.
38. See E. and J. Winiecki, *The Structural Legacy of the Soviet-type Economies* (London, 1992).
39. Arpad Goncz, quoted by Garton Ash, op. cit., 60.
40. Conor Cruise O'Brien, 'A Grave marked Maastricht', *The Times*, 30 Apr. 1992.
41. Gyorgi Konrad, in *Antipolitics* (London, 1982).
4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also 'The End of History Is Still Nigh', *Independent*, 3 Mar. 1992.
43. Zbigniew Brzeziński, speaking at Bologna, Feb. 1992; see J. Moskwa, 'Brzeziński o trzech Europach', *Nowy świat*, 3 Mar. 1992.
44. Prof. Ken Jowitt (UC Berkeley) at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ference, Yale University, 2–4 Apr. 1992.

Summertown, 14 February 1992

45. *Independent*, 14 Feb. 1992; *Guardian*, 14 Feb. 1992; *El Pais*, 13 Feb. 1992; *Le Monde*, 13 Feb. 1992; *De Telegraaf*, 13 Feb. 1992; *Suddeutsche Zeitung*, 13 Feb. 1992; *Gazeta Wyborcza*, 12 Feb. 1992; *The Oxford Times*, 14 Feb. 1992.
46. *Corriere della Sera*, 13 Feb. 1992.
47. *Daily Mail*, 13 Feb. 1992.
48. *Le Monde*, 14 Feb. 1992.
49. *European*, 13–19 Feb. 1992.
50. *The Times*, 14 Feb. 1992.

51. Alan Hamilton, 'Scots Recall an Ancient Act of Treachery', *The Times*, 14 Feb. 1992, 16; *Die Zeit*, 7 Feb. 1992, Reiner Luyken, 'Schotten, erhebt euch! Reisst der Nationalismus nun auch Grossbritannien in Stücke?'
52. *Polska tak, ale jaka?* (Poland, yes, but what sort of Poland?) is an old tag from the 19th cent., when Poland had been destroyed. Now it's Russia's turn.
53. (Eternal wanderer of the unmoving azure, | I miss Europe with its ancient ramparts); from Arthur Rimbaud, 'Le Bateau ivre', in *Poésies: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Paris, 1973), 97.

附录二

“概要介绍”注释

ABKHAZIA 1. Yutaka Akino, *The Last Scenario of Gamsakhurdia* (December 1993). Institute of East–West Studies (Prague, 1994); also Neal Ascherson in the *Independent*, 17 July 1994. Ascherson's *Black Sea* (1995) contains a chapter on Abkhazia. [1173]

ADELANTE 1.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3rd edn. (London, 1977), 452 ff. 2. From W. H. Auden, 'Spain 1937', quoted by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460. 3. See F. Graham, *The Battle of Jarama, 1937: 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Battal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Newcastle, 1987). 4.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853.

AGOBARD 1. Allen Cabaniss, 'Agobard of Lyons' in P. Quennell (ed.), *Diversions in History* (London, 1954), 41–51. 2.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pistolae*, iii. 159; quoted by Christopher Dawson, *The Making of Europe* (London, 1932), 257.

ALCHEMIA 1. R. J. W. Evans, 'Rudolph and the Occult Arts', in *Rudolph II and His World: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1612* (Oxford, 1973), 196–242. 2. M. Rady, 'A Transylvanian Alchemist in London', to be published in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 Evans, op. cit. 199. 4. J.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London, 1970). 5. See F. Sherwood Taylor, *The Alchemists* (London, 1952); J. Read, *Through Alchemy to Chemistry: a procession of ideas and personalities* (London, 1957). 6. 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33*.

ALCOFRIBAS 1. Lucien Febvre (1942), trans. as *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Religion of Rabelais* (Cambridge, Mass., 1982). 2. M.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Cambridge, Mass., 1968).

ALPI 1. L. Pauli, *The Alps: Archaeology and Early History* (London, 1980). 2. R. Blanchard, *Les Alpes et leur destin* (Paris, 1958); also P. P. Viazzo, *Upland Communities: E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Alps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89).

ALTMARKT 1. *Jewish Encyclopedia* (New York, 1903), iv. 658 and references. 2. Arthur Harris, *Bomber Offensive* (London, 1947); D. Saward, *Bomber Harris: the story of Marshal of the Royal Air Force, Sir Arthur Harris* (London, 1984). 3. See D. Irving, *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 rev. edn. (London, 1971); also Gordon Musgrove, *Operation Gomorrah: the Hamburg Firestorm Raids* (London, 1981). 4. Ibid. 195 ff. 5. Ibid. 218–26. 6. Norbert Burger, Lord Mayor of Cologne, 'The Memorial for Sir Arthur Harris: A Summary'; also 'Bomber Harris: A Tactless Choice', *Financial Times*, 2–3 May 1992. 7. *Suddeutsche Zeitung*, 23 November 1994, as reported in the *Daily Telegraph*, 24 November 1994.

ANGELUS 1. Commemorative tablet in the nave of Saint-Pierre, Saintes (Charente Inférieure).

ANNALES 1.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revue trimestrielle, tome premier, année 1929, No. 1 (Paris, 1929). 2. See P.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and the 'Annales' School* (Cambridge, 1990). 3. M. Aymar, 'L'Évolution de l'historiographie braudélienne', Lecture, 15 Nov. 1990, Maison Française, Oxford. 4. *Annales*, 1 (1), 1–2.

ANNO DOMINI 1. 'Dionysius Exiguus',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n. (1910–11), vii. 285. 2. 'Calendar', ibid. iv. 987–1004. 3. S. V. Utechin, *Everyman's Concise Encyclopaedia of Russia* (London, 1961), 85.

APOCALYPSE 1. Rev. 21: 4–6.

AQUILA 1. J. E. Cirlot, *Diccionario de simbolos tradicionales*, trans. as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2nd edn. (London, 1971), 91–3. 2. Adrian Frutiger, *Signs and Symbols: Their Design and Meaning* (London, 1989), 247. 3. W. Leaf and S. Purcell, *Heraldic Symbols: Islamic Insignia and Western Heraldry* (London, 1986), 70–1.

AQUINCUM 1. T. Cornell and J. Matthews, *Atlas of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82), 143. 2. Klara Poczy, *Aquincum Polgarvarosa* (Budapest, n.d.).

ARCHIMEDES 1. See Heinrich Dorrie, *Triumph der Mathematik* (Wurzburg, 1965), trans. as *100 Great Problems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heir History and Solution* (New York, 1965), nos. 1, 38, 56; also T. L. Heath,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in G. Murray (ed.), *The Legacy of Greece* (Oxford, 1921), 122–5; also E. J. Dijksterhuis, *Archimedes* (Copenhagen, 1956).

ARICIA 1. James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the Roots of Religion and Folklore* (First Edition), 2 vols. (London, 1890), i. 6. 2. Ibid. i. 210. 3. Ibid. i. 211–12. 4. Ibid. ii. 370. 5. Ibid. ii. 370. 6. Ibid. ii. 370–1.

ATHLETES 1. See M. I. Finley and H. W. Pleket, *The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London, 1976). 2. See H. A. Harris, *Greek Athletes and Athletics* (London, 1964). 3. Pindar, Nemean 6.1–7. Trans. C. M. Bowra. 'Men and Gods', ode in the honour of Alcimidas of Aegina, winner in the boys' wrestling at the Nemean Games; in *Greek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chosen by Michael Grant (London, 1977), 104. 4. 2 Tim. 4: 7. 5. A. Krawczuk, *Ostatnia Olimpiada* [The Last Olympiad], (Wrocław, 1976); R. D. Mandell, *The first modern Olympics* (Berkeley, 1976).

ATHOS 1. Sotiris Kadas, *Mount Athos: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Monasteries and their History* (Athens, 1979). See also P. Sherrard, *Athos: The Mountain of Silence* (Toronto, 1970). 2. Father Maximos, *Human Rights on Mount Athos: An Appeal to the Civilised World* (Welshpool, 1990). 3. Richard North, 'Doctrinal Divisions among the Monks of Athos', the *Independent*, 17 July 1990.

AUC 1. J. J. Bond, 'The Roman Calendar', in *A Handy-book of Rules and Tables for verifying dates with the Christian Era . . .* (London, 1869), 1–6, 195–6 (repr. Llanerch, 1991).

AUSCHWITZ 1. 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Record Group 373: Mission 60 PRS/462, Can D1508, exposure 3055, to Can D1510, exposure 5020. Quoted by Martin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London, 1981), 216, 249. 2. Ibid. fig. 28, and pp. 331–2. 3. See Jan Karski, *The Story of a Secret State* (London, 1944); also D.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45* (New York, 1984). 4.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ch. 21. Witold Piłecki, who had escaped from Auschwitz I in 1942, had no direct knowledge of Auschwitz II-Birkenau. (See Chapter XI, n. 95.) The five Jewish escapees of 1944 raised the alarm after making their way to Slovakia. 5. Ibid. and 312. 6. See D. A. Brugioni and R. G. Poirer, *The Holocaust Revisited: A Retrospect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Extermination Complex* (Washington, 1979). Reference from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249 n. 7.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337. 8. See Ch. XI, note 29. Given a total of *c.*6 million Jews killed overall, including *c.*2 million on Soviet territory and *c.*2 million in other Nazi ghettos and camps in

occupied Poland,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the figure of 4 million for Auschwitz alone. Testimony supplied to the Nuremberg Tribunal by the former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Hoess, suggested a total of 2.5 million deaths in the camp. **9.** In 1970 Dr Józef Garliński, a former inmate, made a calculated estimate of 2 million deaths in the camp. (See Chapter XI, n. 95.) In 1983 another former prisoner, the French researcher G. Wellers, reached a figure of 1,471,595. Dr Franciszek Piper's figures, as prepared for the State Museum at Oświęcim, were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F. Piper, *Ilu ludzi zginęło w KL Auschwitz? Liczba ofiar w świetle źródeł i badań, 1945–90* (Oświęcim, 1992).

BALLETTO 1. Iain Fenlon, 'The origi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taged ballo', in I. Fenlon, T. Carter (eds.), *Studies in Italian Opera, Song, and Dance, 1580–1740* (Oxford, 1995); A. Bland, *A History of Ballet and Dance in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1976); A. Haskell, *Ballet Russe: the age of Diaghilev* (London, 1968).

BAMBINI 1. M. Pollard, *Maria Montessori* (Watford, 1990), 35. See also Rita Kramer, *Maria Montessori* (Oxford, 1978), and James Bowen,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iii: *The Modern West* (London, 1981), 394–402. **2.** On the tradition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see *Friedrich Froebel: a selection of his writings* (Cambridge, 1967); G. L. Gutek, *Pestalozzi and Education* (New York, 1968); J. Piaget, *Sci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trans. D. Coltman (New York, 1971).

BARBAROS 1. 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Oxford, 1989). **2.** Neal Ascherson, *Black Sea* (London & New York, 1995), 49.

BARD 1. *King Henry IV*, Part 2, IV. iii;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II. i. See F. G. Stokes, *Who's Who in Shakespeare* (London, 1924), 124.

BASERRIA 1. W. A. Douglass, 'The Basque Stem-Family Household: Myth or Reality?',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3 (1) (1989), 75–89.

BATAVIA 1. S.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Fontana, London, 1987), 15–24, 'The Mystery of the Drowning Cell'. **2.** Ibid. 6. **3.** Ibid. 289.

BATT-101 1. 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1993); quoted by Alan Bullock, 'The Evil Dream', *TLS*, 5 Feb. 1993, 3. **2.** C. Perechodnik, *Czy ja jestem mordercą?* (Warsaw, 1993), ed.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ies by Paweł Szapiro. See Leszek Kołakowski, 'International Books of the Year', *TLS*, 3 Dec. 1993. **3.** John Sack, *An Eye for an Eye: 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 (New York, 1993), endorsed by Anthony Polonsky, Professor of East European Jewish History, Brandeis University. Similar testimony was provided by Jakub Berman, head of Poland's post-war communist Security Office (UB), interviewed in 1981. See T. Torańska, *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 (London, 1983).

BAUME 1. *Guide Michelin: Jura, Franche-Comté* (Paris, 1990), 56–7. **2.** René Locatelli, Pierre Gresser *et al.*, *L'Abbaye de Baume-les-Messieurs* (Dole, 1978), 24–31. **3.** Ibid. 234.

BENZ 1. *Deutsches Museum von Meisterwerken der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Guide Through the Collections* (Munich, 1988), 92–3. **2.** D. Cardwell, *The Fontana History of Technology* (London, 1994).

BERNADETTE 1. With special acknowledgement to R. Harris, 'Evidence and Devil's Evidence', seminar paper, University of Oxford Faculty of History, 24 May 1993. See also R. Laurentin, *Lourdes: dossiers des documents authentiques* (Paris, 1957); F. Duhoureau, *Saint Bernadette of Lourdes: a saint of the Golden Legend* (London, 1934).

2. Eugene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London, 1977). 3. Harris, 'Evidence and Devil's Evidence', *passim*.

BIBLIA 1. Compiled from entries under 'Bible', 'Codex', 'Ulfilas', etc.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Washington, DC, 1967),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 F. L. Cross (Oxford, 1957), and E. A. Livingstone, ed.,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1977).

BLACK ATHENA 1.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2 vols., London, 1987–91). See M. Levine, 'The Challenge of Black Athena', *Arethusa* (Fall 1989); also Jasper Griffin,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June 1989.

BLARNEY 1. For modern Irish history, see Roy F. Foster,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1988). 2.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blarney, sb 1819, a cajoling tongue and the art of flattery', hence *v.*, 'to use flattering speech'.

B.N.R. 1. V. Kippel and Z. Kippel (eds.), *Byelorussian Statehood: Reader and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88). 2. Symon Kabysh, 'Genocide of the Byelorussians', in *Genocide in the USSR: Studies in Group Destruction* (New York, 1958), 77–88. [VORKUTA] 3. As reported by Otto von Habsburg, Charles Stransky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20 Sept. 1993.

BOGEY 1. R. G. L. Waite, 'Adolf Hitler's Guilt Feeling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 (1970–1), 229–49. 2. David Irving, *The Secret Diaries of Hitler's Doctor* (London, 1983). 3. From the oral tradition, with many variants. Prof. M. R. D. Foot, historian of SOE, confirms that this immortal ditty is of wartime vintage. 4. L. Bezymenski, *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 Unknown Document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York, 1968). ('Bezymenski' is probably a Russian pseudonym meaning 'nameless'.) 5. Waite, 'Hitler's Guilt Feelings', 236 ff. The subject of the Führer's allegedly abnormal anatomy may ultimately derive from a secret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launched by SOE in the Arab countries in 1941: *Independent*, 5/6 Sept. 1994. 6. After 'Fred Karno's Army', from Joan Littlewood, *Oh What a Lovely War!* (Theatre Workshop, London, 1976).

BOGUMIL 1. See Steven Runciman, *The Mediaeval Manichee: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Dualist Heresy* (Cambridge, 1947; repr. 1984). 2. Euthymius Zigaberius, *Dogmatic Panoply*, quoted by Runciman, 76. 3. See V. H. H. Green, *Medieval Civi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1971), 179–80.

BOUBOULINA 1. *The Great Greek Encyclopaedia*, 'PIRSOS' (Athens, *c.*1980), 75.

BOXER 1. See H. Keown-Boyd, *The Fists of Righteous Harmony: A History of the Boxer Uprising in China* (London, 1991); A. H. Smith, *China in Convulsion* (Edinburgh, 1901).

BRIE 1. Patrick Ronce, *The French Cheese Book* (London, 1989), 299, 340. 2. Hugh Johnson, *World Atlas of Wine* (London, 1971), 60–1. Corton or 'Curtis Ottonis' received its modern name after the later Emperor, Otto I; *The Great Book of Wine* (Lausanne, 1970), 65–6. 3. Ronce, op. cit. 3–7.

BRITO 1. Bed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 and People*, i. 10. 2. See B. R. Rees, *Pelagius: A Reluctant Heretic* (Woodbridge, 1988); St Prosper of Aquitaine, *The Call of All Nations* (Westminster, Md., 1952).

BUCZACZ 1. Wincenty Urban, *Droga krzyżowa Archidiecezji Lwowskiej, 1939–45* (The Way of the Cross of the Archdiocese of Lwów) (Wrocław, 1983), 52–5. 2. The figure of 60–80,000 is given by Jan T. Gross,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Princeton,

NJ, 1979). The Polish (Communist)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es Against the Polish Nation suggested a figure of 300–400,000. See M. Terles, *Ethnic Cleansing of Poles in Volhynia and Eastern Galicia* (Toronto, 1993), 32, 36. The alleged admission of President Krawchuk of Ukraine that 'Ukrainian chauvinists murdered around one half million Poles in the Eastern Borderlands' (*ibid.* 70) has not been substantiated, and appears to derive from a forgery. 3. Ryszard Torzecki, *Polacy i Ukraińcy: Sprawa ukraińska w czasie II Wojny Światowej na terenie II Rzeczypospolity* (Warsaw, 1993), esp. ch. 6, 'Wojenna tragedia', also Wiktor Poliszczuk, *Gorzka prawda: zbrodniczość OUN–UPA* (unpublished typescript, Toronto, 1993). 4. Terles, *Ethnic Cleansing*, 16–17. 5. Z. Zieliński (ed.), *Życie religijne w Polsce pod okupacją, 1939–45* (Katowice, 1992), 500. 6. See Norman Davies, 'Neither Twenty Million, Nor Russians, Nor War Dead', the *Independent*, 29 Dec. 1987. 7. Martin Gilbert, *Atla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82), 82. 8. 'In Lieu of a Self-Portrait', in Simon Wiesenthal, *Justice Not Revenge* (London, 1989); also Alan Levy, *The Wiesenthal File* (London, 1993).

BUDA 1. Martyn Rady, *Mediaeval Buda: a study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Jurisdiction* (Boulder, 1985). 2. Henry Bogdan, *Histoire de Hongrie* (Paris, 1966), 14. 3. Lovag Zsuzsa, *The Hungarian Crown and other regalia* (Hungarian National Museum), Budapest, 1986. 4. 'Inamissible. Now rare, 1649– . Not liable to be lost.' *SOED.*

C14 1. H. Y. Göksu *et al.* (eds.), *Scientific Dating Methods* (Luxembourg, 1991): also S. Bowman, *Radiocarbon Dating* (London, 1990). 2. A. Gob, *Chronologie du mésolithique en Europe* (Liège, 1990), nos. 0217, 2279, and 1816. 3. L. Picknett, C. Prince, *The Turin Shroud: the shocking truth revealed* (London, 1994); R. Hoare, *The Turin Shroud is genuine: the irrefutable evidence* (London, 1994).

CABALA 1. See Bernhard Pick, *The Cabala: Its Influence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La Salle, Ill., 1913).

CADMUS 1. See M. Bernal, *Cadmean Letter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Before 1400 BC* (Winona Lake, Minn., 1990).

CANTATA 1. W. G. Whittaker, *The Cantatas of J. S. Bach* (Oxford, 1959), 659–74. 2.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op. cit. ii. 505–7.

CANTUS 1. Russian notation, 12th–13th centuries; from Armand Machabey, *La Notation musicale* (Paris, 1952). 2. *Ut queant laxis* from the Gregorian *Liber Usualis* and in modern transcription. See Alec Harman, *Media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Music* (Man and His Music, pt. 1) (London, 1988), 3 and pl. iii. 3. See Deryck Cooke, *The Language of Music* (Oxford, 1959; paperback 1985). 4. J. Gayard, *La Méthode de Solesmes* (Paris, 1951).

CAP-AG 1. R.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 (1976), 30–75. 2. *Past and Present*, 78, 79, 85, 97 (1975–81). 3.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New York, 1974). With special acknowledgement to Martyn Rady, 'Core and Periphery: Eastern Europe',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Slavic Conference (*c.*1992). 4.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99. 5. R.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4 (1977), 25–92. See also R. A. Denemark and K. P. Thomas, 'The Brenner–Wallerstein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 (1988), 47–65.

CARITAS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n. (1912), vol. xiii, 593–4, under 'Drente'. 2. Ibid. vol. v, 876, under 'Charity and Charities'. 3. See R. M. Clay, *The Mediaeval Hospitals of England* (London, 1909). 4. Michel Foucault, *Historie de la folie*

(1961),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976), *Surveiller et punir* (1975), trans. a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1991). 5.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assim.*

CATACOMBI 1. See J. Stevenson, *The Catacombs: Rediscovered Monuments of Early Christianity* (London, 1978).

CAUCASIA 1. J. F. Blumenbach, *Collectionis suae cranorum diversarum gentium* . . . (Göttingen, 1798–1828). 2. Revd E. Cobham Brewer, *The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1870; repr. New York, 1978), 229. 3. L. Poliakov, *The Aryan Myth: A History of Racist and Nationalist Ideas in Europe* (New York, 1974), esp. 233 ff.; J. Boissel, *Gobineau: Un Don Quichotte tragique* (Paris, 1981). 4. See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1916). 5. For the most recent, popular, and brilliant survey of the subject, see Steve Jones, *The Language of the Genes: Biology, History, and the Evolutionary Future* (London, 1994). 6. See Ashley Montague, *Statement on Race: An Annotated Elaboration of . . . the Statements on Race Issued by UNESCO* (New York, 1972).

CEDROS 1. Russell Meiggs, *Trees and Timber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Oxford, 1982).

CHASSE 1. Gaston Phoebus, repr. as *The Hunting Book* (Geneva, 1978). See *Musée International de la Chasse: Château de Gien, Summary of the Collection* (Gien, Loiret, n.d.). 2. Marcin Kromer, *Polonia* (1577), quoted by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Oxford, 1981), i. 249. 3. See Raymond Carr, *English Fox-Hunting: A History* (London, 1986).

CHASTITY 1. Rom. 7: 22–4; 8: 6. 2. 1 Cor. 7: 9. 3. Peter Brown,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88), 446–7.

CHERNOBYL 1. *Słownik geograficzny Królewstwo Polskiego i innych krajów słowiańskich* (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of Other Slavonic Countries), ed. F. Sulimierski, B. Chłebowski, W. Walewski (Warsaw, 1880), 'Czarnobyl', i. 750–4. 2. *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aedia*, 3rd edn. (Moscow, 1978), vol. xxix, 'Chernobyl'. 3. Rev. 8: 10, 11.

CHERSONESOS 1. See M.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1922). 2. D. Obolensky, 'Crimea and the North before 1204', *Archeoin Pontou* 35 (1978), 123–33. 3. G. A. Koshalenko *et al.*, *Antichnye Gosudarstva Severnogo Prichernomor'ya* (Moscow, 1984); Alexander L. Mongait, *Archaeology in the USSR* (Moscow, 1955, London, 1961), chapter 6, 'Classical Cities on the North Coast of the Black Sea.' 4. Neal Ascherson, *Black Sea* (London, 1995), 12–48. 5. R. Conquest, *The Nation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London, 1970).

CHOUAN 1. E. Le Roy Ladurie, 'The "Event" and the "Long Term" in Social History: The Case of the Chouan Uprising' (a review of P. Bois, *Paysans de l'ouest* (Paris, 1972),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79), 111–32.

CODPIECE 1. Lois Banner, 'The Fashionable Sex, 1100–1600', *History Today*, 42(4) (1992). 2. A. Junke and E. Stille, *Zur Geschichte der Unterwaesche, 1700–1960* (Illustrated Catalogue to an Exhibition at the Historical Museum) (Frankfurt a.M., 1988).

COMBRAY 1. From 'Itinéraire proustien,' in Syndicat d'Initiative, *Illiers-Combray* (Illiers-Combray, 1989). See R. Hayman, *Proust: a biography* (London, 1990); L. Hodgson (ed.), *Marcel Prous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1989); Sheila Stern, *Swann's Way* (Cambridge, 1989).

COMENIUS 1. *Comenius, 1592–1670: European Reformer and Czech Patriot* (Catalogue to an Exhibition at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1992), notes by R. J. W. Evans. See also M. Spinka, *The Incomparable Moravian* (Chicago, 1943). 2. T. G. Masaryk, *Svetová revoluce, za války i ve válce, 1914–18* (Prague, 1925); trans. as *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ries and Observations, 1914–18* (New York, 1969). 3. From J. A. Comenius, *The Great Didactic*, 2nd edn. (London, 1910), 66–9: see also J. E. Sadler, *J. A. Comenius and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Education* (London, 1966).

COMPOSTELA 1. See B. Tate, *Guià del Camino de Santiago* (Santiago); W. Starkie, *The Road to Santiago: pilgrims of St James* (London, 1957); H. Davies, *Holy days and holidays: the mediaeval pilgrimage to Compostela* (Lewisburg, PA, 1982); also James Bentley, *The Way of St James: a pilgrimage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 (London, 1992).

COMPUTATIO 1. See J. B. Geisbeek, *Ancient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Lucas Pacioli's Treatise* (Denver, 1914; repr. Osaka, 1975); also R. G. Brown and K. S. Johnston, *Pacioli on Accounting* (New York, 1963). 2. See P. L. McMickle and R. G. Vangermeersch, *The Origins of a Great Profession: Catalogue to an Exhibition of Rare Accounting Books and Manuscripts from the Montgomery Collection* (Memphis, 1987). 3. M. F. Bywater and B. Yamey, *Historic Accounting Literature: A Companion Guide* (London, 1982).

CONCLAVE 1. J. N. D. Kelly,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pes* (Oxford, 1988), 327.

CONDOM 1. Aetius, quoted by M. K. Hopkins, 'Contracep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ety*, 8 (1965–6), 124–51. 2. P. Ariès, 'Sur les origines de la contraception en France', *Population*, 3 (1953); see P. P. A. Biller, 'Birth Control in the West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94 (1982), 3–26. 3. See J. T. Noonan, *Contraception: A History of Its Treatment by Catholic Theologians and Casuists* (Cambridge, Mass., 1966). 4. Deposition of Beatrice de Planissoles, quoted by E.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London, 1980), 172–3. 5. See A. McLaren, *Birth-Control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1978). 6. A. Nikiforuk, *The Fourth Horseman* (London, 1991), chapter 6. 7. Christina Hardyment, 'Marie Stopes and Germaine Greer . . .', paper read at the Alistair Horne Fellowship Symposium,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June 1993. 8. Ibid.

CONSPIRO 1. S. Hutin,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11th edn. (Paris, 1993). See also G. Falzone, *La Storia de la Mafia* (1973), translated as *Histoire de la Mafia* (Paris, 1973); R. Catanzaro, *Men of Respec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icilian Mafia* (New York, 1992).

CORSICA 1. Dorothy Carrington, *Napoleon and His Parents: On the Threshold of History* (London, 1988); *Granite Island: A Portrait of Corsica* (London, 1962); also P. Arrighi, *Histoire de la Corse* (Paris, 1947); R. Ramsay, *The Corsican Time-Bomb* (Manchester, NH, 1983).

CORVINA 1. C. Csapodi and K. Csapodi-Gárdonyi, *Biblioteca Corviniana 1490–1990*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Budapest, 1990); reviewed by H. R. Trevor-Roper, 'Reunion in Budapes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 July 1990.

COWARD 1. 'Campaign to Pardon Troops Hits Setback', The *Independent*, 16 Aug. 1993. See also J. Putkowski and J. Sykes, *Shot at Dawn* (London, 1989). 2. 'Deserters', in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1995).

CRAVATE 1.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ompact Edition (1970), i. 1144. 2. É. Littré,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1966), ii. 1094. 3. The *Independent*, 3 July 1991. 4. *Louis XIV*, 16. Littré, *Dictionnaire*. 5. R. Filipovic, *Englesko–Hrvatski ili Srpski*

Rjecnik, 8th edn. (Zagreb, 1977); M. Benson, *An English–Serbocroatian Dictionary* (Cambridge, 1990). Filipovic favours *kravata*, Benson *masna*.

CRUX 1. A. Frutiger, *Der Mensch und Seine Zeichen* (Dreieich, 1989), trans. as *Signs and Symbols: Their Design and Meaning* (London, 1989), 276–7. 2. Frutiger, op. cit., pp. 276–7. 3. 'Tamgas and Tribal Signs' in W. Leaf, S. Purcell, *Heraldic Symbols: Islamic Insignia and Western Heraldry* (London, 1986), 76–82. 4. Tadeusz Sulimirski, *The Sarmatians* (London, 1970), discussed by Ascherson, *Black Sea*, op. cit. 230–43. 5. Władysław T. Bartoszewski, *The Convent at Auschwitz* (Bowerdean Press, London, 1990).

CSABA 1. Arpad's Tale, 'The Skyway of the Warriors', after Kate Seredy, *The Good Master* (Budapest), trans. into English (London, 1937), 92–6.

DANNEBROG 1. B. Rying, *Denmark: History* (Copenhagen, 1988), 39.

DANUVIUS 1. See C. Magris, *Danube: a sentimental journey from the source to the sea* (London, 1989). 2. Dimitrie Radu, *Pasarile din Delta Dunarii* (Birds of the Danube Delta) (Bucharest, 1979). 3. See A. Demangeon, L. Febvre, *Le Rhin: problèmes d'histoire et d'économie* (Paris, 1935).

DASA 1. John D. Barrow, *Pi in the Sky: Counting, Thinking and Being* (Oxford, 1992), 60–3. 2. C. Kephart, *Sanskrit: its origin, composition and diffusion* (Strasburg, VA, 1949); also K. Srinivasachari, *Learn Sanskrit in Thirty Days* (Madras, 1987). 3. See G. Flegg, *Numbers: Their History and Meaning* (London, 1983); A. Lillo, *The Ancient Greek Numeral System* (Bonn, 1990).

DEMOS 1. Peter France, *Greek as a Treat*, programme 3, BBC Radio 4, 12 May 1993. 2. See R. K.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Cambridge, 1988), and E. M. Wood,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London, 1988), both reviewed in P. Cartledge, 'The First Popular Government', *TLS*, 6–12 Jan. 1989. 3. T. G. Masaryk, inaugural address, 23 Dec. 1918.

DESSEIN 1. C. Pfister, 'Les "Œconomies Royales" de Sully et le grand dessein de Henri IV', *Revue historique*, 56 (1894), 304–39. 2. D. J. Buisseret, *Sully and the Growth of Centralised Government in France, 1598–1610* (London, 1968). 3. See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Cambridge, 1967), 24 ff.

DEVIATIO 1. Thomas Szasz, *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quisition and the Mental Health Movement* (London, 1971). 2. P. Reddaway (ed.), *Uncensored Russia: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77); S. Bloch, *Russia's Political Hospitals: The Abuse of Psychiatry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77); S. Bloch and P. Reddaway, *Soviet Psychiatric Abuse: The Shadow over World Psychiatry* (Boulder, Colo., 1985); Vladimir Bukovsky, *To Build a Castle: My Life as a Dissenter* (London, 1978).

DIABOLOS 1. N. Forsyth, *The Old Enemy: Satan and the Combat Myth* (Princeton, NJ, 1987); reviewed by G. Steiner, *TLS*, 1–7 Apr. 1988.

DING 1. Kirsten Hastrup, *Culture and History in Mediaeval Iceland: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e and Change* (Oxford, 1985). 2. S. Lindal, 'Early Democratic Traditions', in E. Allardt (ed.), *Nordic Democracy: Ideas, Issues and Institutions* (Copenhagen, 1981).

DIRHAM 1. *The Risālah of Ibn Fadlān*, (trans. and introd. J. E. McKeithen (Ph.D. thesis, Indiana Univ., 1979), quoted by T. S. Noonan, 'The Impact of the Silver Crisis in Islam upon Novgorod's Trade with the Baltic', in *Oldenburg-Wolin-Staraja Ladoga-*

Novgorod-Kiev: Handel und Handlesverginbungen im südlichen und östlichen Ost-seeraum während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Kiel, 1987), 411–47. 2. T. S. Noonan, 'Dirhams from Early Mediaeval Russia', *Journal of the Russian Numismatic Society* (USA), 17 (1984–5), 8–12. 3. M. Sternberger, *Die Schatzfunde Gotlands der Wikingerzeit* (Lund, 1947). 4. After I. Andersson, *History of Sweden* (London, 1962), 18. Andersson's translation of 'Rus' as 'Swedes' is acceptable in this period.

DOLLAR 1. See D. R. Cooper, *Coins and Minting* (Princes Risborough, 1983), 10–16. 2. J. Hans, *Maria-Teresien Taler: zwei Jahrhunderte* (Leiden, 1961).

DÖNHOFF 1. See Roman Aftanazy, *Dzieje rezydencji na dawnych kresach Rzeczpospolitej*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Houses in the Former Borderlands of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11 vols., Wrocław, 1991), illustrated. 2. Marion Dönhoff, *Kindheit in Ostpreussen* (Berlin, 1988); trans. as *Before the Storm: Memoirs of My Youth in Old Prussia* (New York, 1990), 204.

DOUAUMONT 1. *Voir et comprendre Verdun: Champ de bataille, environs* (Drancy, 1981); *Ouverture à la visite du champ de bataille* (Fleury-devant-Douaumont, n.d.). See Alistair Horne, *The price of glory: Verdun 1916* (London, 1993).

$e = mc^2$ 1. See J. Schwartz, *Einstein for Beginners* (Exeter, 1979), 2—a quotation which appears in various forms. See M. White and J. Gribbin, *Einstein: A life in Science* (New York, 1993); reviewed by R. Dinnage, 'Man of Science Agog', *TLS*, 17 Dec. 1993.

ECO 1. From Plato's *Critias*; quoted by Clive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1991), 76–7. 2. Genesis ix. 1–3: God's promise to the sons of Noah; Psalm viii. 5–6; Psalm cxv: 16. 3. Hazel Henderson, *Creating Alternative Futures* (1978), quoted by Ponting, 159. 4. See Sven Forshufvid, *Assassination at St. Helena* (Vancouver, 1978); B. Weider and D. Hapgood, *The Murder of Napoleon* (London, 1982).

EESTI 1. At the Charles Stransky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20 Sept. 1993; also letter from Dr von Habsburg, 28 Sept. 1993. See also E. Uustalu, *A History of the Estonian People* (London, 1952); R.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Oxford, 1993).

EGNATIA 1.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Oxford, 1991), i. 679. See also R. Chevallier, *Roman Roads* (Berkeley, Calif., 1976).

EIRIK 1. Quoted by Magnus Magnusson and H. Pálsson, *The Vinland Sagas* (London, 1965), 24–5. 2. See Helge Ingstad, *Westward to Vinland* (New York, 1969). 3. S. E.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i, *The Northern Voyages*, AD *500–1600*, ch. 3, 'The Norsemen and Vinland' (O.U.P.) (New York, 1971), 32–80. 4. R. A. Skelton, T. E. Marston *et al.*,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New Haven, Conn., 1965). See also J. H. Parry, 'The Vinland Story', in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i (1967), 417–33; M. A. Musmanno, *Columbus Was First* (New York, 1966). 5. Texts in Magnusson's translation, *The Vinland Sagas*. 6.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i. 61. 7. On John Davys, see R. Hakluyt's *Principal Navigations and Voyages . . . of the English nation*, A. S. Mott (ed.) (Oxford, 1929).

EL CID 1. R. Fletcher, *The Quest for El Cid* (Oxford, 1989); C. Smith, *The Making of the 'Poema de Mio Cid'* (Cambridge, 1983). 2. M. H. Keen, *The Outlaws of Mediaeval Legend* (London, 1961); J. C. Holt, *Robin Hood* (London, 1989); R. B. Dobson and J. Taylor, *Rymes of Robyn Hoo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Outlaw*, rev. edn. (London, 1989). 3. Juraj Janosik (*c.*1688–1713). See 'Legenda Tatr', *Literatura polska: Przewodnik Encyklopedyczny* (Warsaw, 1984), 553.

ELDLUFT 1. With acknowledgement to the Open University programme 'Oxygen', broadcast on BBC2, 26 Sept. 1992. 2. As illustrated in J.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London, 1970), 146–7.

ELEKTRON 1. See V. W. Hughes, H. L. Schultz, *Atomic and electron physics* (London, 1967); G. Leon, *The Story of Electricity* (New York, 1983).

ELEMENTA 1. See J. Hudson, *The History of Chemistry* (Basingstoke, 1992); W. H. Brock, *The Fontana History of Chemistry* (London, 1992).

ELSASS 1. F. L. 'Huillier, *Histoire de l'Alsace* (Paris, 1947); G. Livet, *L'Europe, l'Alsace, et la France* (Colmar, 1986). 2. E. Birke, *Silesia: A German Region* (Munich, 1968); W. J. Rose, *The Drama of Upper Silesia: A Regional Study* (Battleborough, Vt., 1935); K. Popiolek, *Śląskie dzieje* (Warsaw, 1981); W. B. Goldstein, *Tausend Jahre Breslau* (Darmstadt, 1974). 3. Rose Bailly, *A City Fights for Freedom: The Rising of Lwów, 1918–19* (London, 1958); West Ukrainian Press Agency, *The Problem of Eastern Galicia* and *The Eastern Galician Question* (Vienna, 1920); L. Podhorodecki, *Dzieje Kijowa* (Warsaw, 1982).

EMU 1. See Stephen George,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xford, 1985), Ch. 9,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PIC 1. From Stephanie Dalley, *Myths from Mesopotamia: The Creation, the Flood, Gilgamesh, and Others* (Oxford, 1989). 2. Homer, *Odyssey*, 1. i. 3. See Stephanie West, *Assurbanipal's Classic*, a review of Dalley, and of Maureen G. Kovacs, *The Epic of Gilgamesh* (Stanford, Calif., 1989), *London Review of Books*, 8 Nov. 1990, 23–5.

EPIDEMIA 1. See C. D. Gordon, 'The Huns', in *The Age of Attila* (Ann Arbor, Mich., 1966), 55–111. 2. A. Nikiforuk, *The Fourth Horseman* (London, 1991), ch. 5, 'The Smallpox Conquest'. 3. Ibid. 14.

EPIGRAPH 1. *CIL* xii. 7070; quoted by R. Bloch, *L'Épigraphie latine* (Paris, 1952), 59. 2. *CIL* vi. 701; quoted by Bloch, *L'Épigraphie latine*, 83. 3. *CIL* xiii. 3, fasc. 2, 10021; quoted by Bloch, *L'Épigraphie latine*, 102. See also D. Feissel *et al.*, *Guide de l'épigraphiste* (Paris, 1986).

EROS 1. K. L. von Pollnitz, *Le Saxe galante, or The Amorous Adventures of Augustus of Saxony . . . translated by a Gentleman of Oxford* (London, 1750). 2.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1981), i. 493–5. 3. In Cambridge.

ETRUSCHERIA 1. Quoted by M. Finley, 'The Etruscans and Early Rome', in *Aspects of Antiquity* (London, 1968), 115. 2. 'The Etruscans and Europe', Galéries du Grand Palais, 15 Sept.–14 Dec. 1992, in *Le Petit journal des grandes expositions*, 237 (Paris, 1992). 3. D. H. Lawrence, *Etruscan Places* (1927), quoted by Finley, 'The Etruscans and Early Rome', 100.

EULENBURG 1. James D. Steakly, 'Iconography of a Scandal: Political Cartoons and the Eulenburg Affair in Wilhelmian Germany', in M. B. Dubermann *et al.*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New York, 1989; London, 1991), 233–63. 2. B. Inglis, *Roger Casement* (London, 1973); H. O. Mackey, *The Crime Against Europe: The Writings and Poetry of R. Casement* (Dublin, 1958); Richard Ellmann, *Oscar Wilde* (London, 1987). 3. M. Baumont, *L'Affaire Eulenberg et les origines de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1933); quoted by Steakley, 'Iconography of a Scandal', 235. 4. E. J. Haeberle, 'Swastika, Pink Triangle, and Yellow Star: the Destruction of Sexolog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Homosexuals in Nazi Germany', in Dubermann *et al.*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365–82.

EULER 1. Petr Beckmann, *A History of PI* (New York, 1971), 147–57.

FAMINE 1. Cecil Woodham-Smith, *The 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49* (London, 1962), 91. 2. Ibid. 19. 3. Roy Foster,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1988), 325. 4. Quoted by A. Nikiforuk, 'The Irish Famine', in *The Fourth Horseman* (London, 1991), 123. 5. From Lady Wilde, 'The Exodus', in C. Morash (ed.), *The Hungry Voice: Poetry of the Irish Famine* (Dublin, 1989), 219; S. Cronin, *Irish Nationalism: a history of its roots and ideology* (New York, 1980).

FARAON 1. *The National Monument of the Santa Cruz de Valle de los Caldos: a tourist guidebook* (Madrid, 1961).

FAROE 1. L. K. Schei and G. Moberg, *The Faroe Islands* (London, 1991), ch. 5, 'Political Awakening'.

FATIMA 1. J. Delaney, *A Woman Clothed in the Sun* (Dublin, 1991), 194. See also M. De la Sainte Trinité, *The Third Secret of Fatima* (Chulmleigh, 1986). 2. See T. Tindale-Robertson, *Fatima, Russia, and Pope John Paul II* (Chulmleigh, 1992). 3. See M. Parham, 'With God on Our Side', *Independent Magazine*, 4 Dec. 1993; also the quarterly *Medjugorje Messenger* (London, 1986–).

FAUSTUS 1. Goethe, *Faust*, pt. ii, ll. 12,073–5. 2.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German Literature*, 173.

FEMME 1. Translated for *Wollstonecraft, Wome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exhibition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992. 2. See Sara E. Melzer and Leslie W. Rabine (eds.), *Rebel Daughters: Wome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92).

FIESTA 1. Federico de Cesco, *Viva Europa: Die Hundert schönsten Volksfeste* (Zurich, n.d.).

FLAGELLATIO 1. C. Bertelli, 'The Flagellation', in *Piero della Francesca* (New Haven, Conn., 1991), 115–26; C. Ginzburg, *The Enigma of Piero: The Baptism, the Arezzo Cycle: The Flagellation* (London, 1985); K. Clark, *Piero della Francesca* (London, 1969). 2. R. Wittkower and B. A. R. Carter, 'The Perspective of Piero della Francesca's "Flagellatio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6 (1953), 292–302. 3. Bertelli, 'The Flagellation', 115–16. 4. John Pope-Hennessy, *The Piero della Francesca Trail* (23rd Walter Neurath Lecture) (London, 1993), 10; also his 'Whose Flagellation?', *Apollo*, 124 (1986), 162–5. 5. Alison Cole, *Perspective* (London, 1992). 6. See Michael Woods, *Perspective in Art: A Drawing Tutor* (London, 1984). 7. Cole, *Perspective* 24. 8. J.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1972); also *The European Way of Seeing* (London, 1972).

FLAMENCO 1. With thanks to Sra. Jozefina Del Carmen Boyd. 2. Quoted by James Woodall, *In Search of the Firedance: Spain through Flamenco* (London, 1992), 149.

FLORA 1. See Monica Kippner, *The Quality of Mercy: Women at War, Serbia 1915–18* (Newton Abbot, 1980), 223. 2. Ibid. 34. 3. See Julie Wheelwright, *Amazons and Military Maids* (London, 1989) which contains a chapter on Flora Sandes. 4. Kippner, *The Quality of Mercy*, 30.

FOLLY 1. Aleksander Bocheński, *Dzieje głupoty w Polsce* (repr. Warsaw, 1947). 2. Adam Michnik, *Z dziejów honoru w Polsce: wypisy więzienne* (Paris, 1985). 3. Barbara Tuchman,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London, 1984).

FREUDE 1. F. von Schiller, 'An die Freude', in L. Reiners (ed.), *Der ewige Brunnen* (Munich, 1992), 910 ff.; F. von Schiller, *Ode to Joy* (Paisley, 1987). 2. G. Grove, *Beethoven and his Nine Symphonies* (London, 1898), 326–7. 3. Ibid. 309–400; Ralph Hill (ed.), *The Symphony* (London, 1949), 113–17.

FUTHARK 1. See R. A. Page, 'Rune-Masters and Skalds', in J. Campbell-Graham,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1989), 155–71. 2. N. Pennick, 'Figure and Sequence', in *Games of the Gods: The Origin of Board Games in Magic and Divination* (London, 1988), 75. 3. Tacitus, quoted ibid. 91. 4. Pennick, *Games of the Gods*, 95–100: see also R. A. S. Macalister, *The Secret Languages of Ireland* (Cambridge, 1987); D. McManus, *A Guide to Ogham* (Maynooth, 1991); R. R. Brash and J. R. Allen, *Ogham Monuments in Wales* (Llanerch, 1992).

GAGAUZ 1. See W. Zajązkowski, *Język i folklor u Gagauzów w Bulgarii* (Kraków, 1966). 2. See H. T. Norris, *Islam in the Balkans: religion and society between Europe and the Arab world* (London, 1993). 3. T. J. Winnifrith, 'The Pomaks', in *Shattered Eagles, Balkan Fragments* (London, 1995), 82–98. 4. R. J. Donie, J. V. A. Fine, *Bosnia and Hercegovina: a tradition betrayed* (London, 1994).

GAT-HUNTER 1. Clive Gamble, 'Hunter-gatherers and the origin of states', in J. A.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1968); see also R. B. Lee, I. De Vore (eds.), *Man the Hunter* (Chicago, 1968).

GATTOPARDO 1. 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 *Il Gattopardo* (Milan, 1958); trans. Archibald Colquhoun as *The Leopard* (London, 1960), 11. 2. Ibid. 29. 3. Ibid. 223.

GAUCHE 1. See J. van Clove, R. E. Frederick,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Left: incongruent counterparts and the nature of space* (London, 1991). 2. N. Nugen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3rd edn.) (London, 1994).

GENES 1. P. J. Bowles, *The Mendelian Revolution* (London, 1989); C. F. Meyer, *The Genesis of Genetics: The Growing Knowledge of Heredity Before and After Mendel* (Rome, 1953); C. Stern, *The Origin of Genetics: A Mendelian Source Book* (London, 1966). 2. Zhores Medvedev, *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 (1967; trans. New York, 1969); D. Joravsky, *The Lysenko Affair* (Cambridge, Mass., 1970). 3. See J. S. Huxley, *Soviet Genetics and World Science* (London, 1949).

GENOCIDE 1. G. J. Libaridian, *A Crime of Silence: the Armenian Genocide* (London, 1985); D. M. Lang, *The Armenians: a people in exile* (London, 1981); C. J. Walker, *Armenia: survival of a nation* (London, 1990); S. L. Sonyel, *The Ottoman Armenians, victims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London, 1987); R. Hovannisian (ed.), *The Armenian Genocide: history, politics, and ethics* (London, 1991); R. Melson, *Revolution and Genocide: on the origin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2). 2. From the notes of Admiral Canaris, 22 August 1939, quoted by L. P. Lochner, *What about Germany?* (New York, 1942), 2. The passage is sometimes misquoted as if it referred to the Final Solution. With acknowledgement to Dr Mark Levene. 3. R. Lemkin, *Axis Rule in Europe: Laws of Occupation,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roposals for Redress* (New York, 1944). See also 'Genocide',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1971), vol. 7, 410.

GENUG 1. After G. Brandreth, *Famous Last Words and Tombstone Humor* (New York, 1989).

GESANG 1. Martin Luther, '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in *Der ewige Brunnen: ein Handbuch deutscher Dichtung* (Munich, 1979), 971; see also F. Blume, *Protestant Church Music: a history* (London, 1975). 2. Translated by Thomas Carlyle, *The English Hymnal with Tunes* (Oxford, 1933), no. 362. 3. Thrasybilos Georgiades, 'The German Language and Music', in *Music and Language: The Rise of Western Music as Exemplified in Settings of the Mass* (Cambridge, 1982), 49–58. 4. 'Tallis's Canon', a shortened form of the melody by Thomas Tallis (1505–85) from T. Ravenscroft's *Psalter* (1621), words by Thomas Ken

(1637–1710). See M. Baughen (ed.), *Hymns for Today's Church* (London, 1982), no. 274. See also E. H. Fellowes, *English Cathedral Music* (London, 5th edn., 1969).

ĠGANTIJA 1. J. D. Evans, *Prehistoric Antiquities of the Maltese Islands* (London, 1971). 2. B. Blouet, *The Story of Malta*, 3rd edn. (London, 1981).

GHETTO 1. 'Ghetto',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1970), vii. 542–6. 2. Gershon Hundert, *Jews in a Polish Private Town: The Case of Eighteenth Century Opatów* (Baltimore, 1992).

GONCALVEZ 1. B. Davidson, *Black Mother* (Boston, 1961); rev. ed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Boston, 1980), 53–4. 2. Ibid. 55. 3. Ibid. 67–9, 101–3. 4. Ibid. 163. 5. 'How Many?', ibid. 95–101.

GOOSE STEP 1. See P. J. Haythornthwaite, *Frederick the Great's Army* (London, 1991); also Gordon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1955).

GOTHA 1. E. Scheeben, *Ernst II: Herzog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 (Frankfurt, 1987); J. Van der Kirstie, *Dearest Affi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 and Duk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 1840–1900* (Gloucester, 1984). 2. R. R. James, *Albert, Prince Consort: A Biography* (London, 1985); S. Weintraub, *Victoria: A Biography of a Queen* (London, 1988); T. Aranson, *Heart of a Queen: Queen Victoria's Romantic Attachments* (London, 1991). 3. A. S. Gould Lee, *The Royal House of Greece* (London, 1948). 4. Brian Connell,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in Five Profiles of . . . the Mountbatten Family* (London, 1953); M. Kerr, *Admiral Louis of Battenberg* (London, 1934); R. Hough, *Louis and Victoria* (London, 1974). 5. *Polski Słownik Biograficzny* (Wrocław, 1960–1), ix, 'Hauke'. 6. Anthony, Lord Lambton, *The Mountbattens* (London, 1989). 7. Richard Tomlinson, 'Trying to be Useful',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9 June 1994; extracts from *Divine Right: The Inglorious Survival of British Royalty* (London, 1994).

GOTHIC 1. J. Ruskin, *The Nature of Gothic* (1892; repr. Portland, Oreg., 1975), 5. 2. See A. Saint, 'Building in the Holy Town', *TLS*, 9–15 Mar. 1990, a review of A. Erlande-Brandenburg, *La Cathédrale* (Paris) and R. Recht (ed.), *Les Bâtisseurs des cathédrales gothiques* (Strasburg, 1989).

GOTTHARD 1. Ian Robertson, *Switzerland*, Blue Guide (London, 1989), 230, 304–5. 2. Suvorov monument. Personal visit.

GRECO 1. David Holton (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Crete* (Cambridge, 1991); A. Embiricos, *La Renaissance Crétoise*, 2 vols. (Paris, 1960–7). 2. C. T. Dimaras, *A History of Modern Greek Literature* (London, 1972).

GRILLENSTEIN 1. R. Sieder and M. Mitterau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Life Course: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Empirical Results', in R. Wall *et al.* (eds.),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1983), 309–45.

GROSSENMEER 1. Peter Laslett, 'Family and Household as Work Group and Kin Group: Areas of Traditional Europe Compared', in R. Wall *et al.* (eds.),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1983), 513–63. 2. Peter Laslett,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in Laslett and Richard Wall (eds.),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Domestic Group over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Cambridge, 1972). 3. J. Valynseele, *La Généalogie: histoire et pratique* (Paris, 1991). See also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Finding Aids to the Microfilmed Manuscript Collection* . . . (Salt Lake City, 1978–83).

GROTE MARKT 1. Jacques Darras, 1989 Reith Lectures, 1, 'The Time Traveller', from *Beyond the Tunnel of History* (BBC Radio 4), *Listener*, 23 Nov. 1989. 2. Reith Lectures, 2, 'The Golden Fleece', *Listener*, 30 Nov. 1989.

GUERRILLA 1. Robert Moss, *Urban Guerrillas: the new face of political terrorism* (London, 1972). 2. A. Racineux, 'Les Chouans: une armée de l'ombre', *Historama*, no. 89, July 1989, 12–19.

GUILLOTIN 1. After Martin Manser, *Dictionary of Eponyms* (London, 1988), 120.

HANSA 1. T. Lindner, *Die deutsche Hanse: ihre Geschichte*, 4th edn. (Leipzig, 1911); Hugo Yrwing, *Visby: hansestad pae Gotland* (Stockholm, 1986). 2. Fritz Grotemeyer, 'Warenzug hansischer Kaufleute' (1942), in *Die Hanse: Lebenswirklichkeit und Mythos, Ausstellungskatalog des Museums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 Bd 2 (Hamburg, 1989), 623; also Carsten Prange, *Auf zur Reise durch Hamburgs Geschichte—A Journey through Hamburg's History* (Hamburg, 1990).

HARVEST 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sation and the Terror Famine* (London, 1986), 3. 2. Ibid. ch. 16, 'The Death Roll'. 3. Vasily Grossman, *Forever Flowing* (New York, 1972), quoted by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286. 4. S. J. Taylor, *Stalin's Apologist: Walter Duranty, the New York Times' Man in Moscow* (Oxford, 1990). 5.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ch. 17, 'The Record of the West'. 6. Ibid. 'Preface', 1.

HATRED 1. G. Bell, *Archbishop Davidson* (London, 1935), ii. 756–70. 2. K. Slack, *George Bell, 1883–1958* (London, 1972). 3. In G. Bell, *The Church and Humanity* (London, 1946), ch. 22, 'God Above Nation', 201–10. 4. Ibid. 22–31. 5. Ibid. ch. 14, 'Obliteration Bombing'. See also M. Czesany, *Allierten Bombenterror: der Luftkrieg gegen die Zivilbevölkerung Europas, 1940–5* (Leoni, 1987). 6. D. Bonho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E. Bethge, ed. (New York, 1967), quoted by Slack, *George Bell*, 97. 7. Bell, *The Church and Humanity*, ch. 19, 'Christianity and the European Heritage', 177–82.

HEJNAŁ 1. With thanks to Professor Jacek Woźniakowski, art historian and, in 1991, Lord Mayor of Cracow. 2. Gaspard de Marval, *Le Guet de la cathédrale*, Postface by Oliver Freeman (Chapelle-sur-Moudon, 1992).

HEPTANESOS 1. W. H. Zawadzki, *Man of Honour: A. Czartoryski, Statesman of Russia and Poland* (Oxford, 1993). 2. 'Great Britain and the Ionian Islands, 1848–51: A Case of Bad Publicity',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7(2) (1987), 131–44.

HERMANN 1. See George Mosse, *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Ithaca, 1991). 2. Professor Rees Davies of Aberystwyth writes: 'The story and the monument [of Beddgelert] belong to the 1790s ... The "inventor" was an immigrant into the area, David Pritchard—no doubt wanting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to this part of Wild Wales. He was, I think, the local publican. It was a typical, Romantic, Ossian, Iolo Morganwg sort of story ...'; private letter, 16 May 1994.

HEXEN 1. Hugh Trevor-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0), 84. 2. Ibid. 3. *Księgi Miejskie Kaliskie* (1612), quoted by B. Baranowski, *Procesy czarownic w Polsce XXVII i XVIII wiekach* (Łódź, 1952). Recent estimates put the total number of victims at c.50,000.

HOLISM 1. *Das Buch von der Gebärung* (c.1520), 3.3; in *Paracelsus: Essential Readings*, sel. and trans. Nicholas Goodrick-Clarke (Wellingborough, 1990), 59.

HOSSBACH 1. 'The Hossbach Memorandum', in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45* (London, 1949), ser. D, i. 29–30. 2. A.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63), 168–72. 3. T. W. Mason, in E. M. Robertson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71), 114. See also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1963), esp. 328–34.

HYSTERIA 1. Quoted by Mary K. Lefkowitz in 'The Wandering Womb', *Heroines and Hysterics* (London, 1981), 15–16. See also L. Dean-Jones, *Women's Bodies in Classical Greek Science* (Oxford, 1994). 2. Lefkowitz, 'The Wandering Womb', 12. 3. E. Shorter, *A History of Women's Bodies* (London, 1982).

IKON 1. See J. Baggley, *Doors of Perception: Icons and their spiritual significance* (London, 1987). 2. See N. P. Kondrakov, 'Iconography of the Bogurodítsa', in *The Russian Icon* (Oxford, 1927). 3. G. Ramos-Poquí, *The Technique of Icon Painting* (Tunbridge Wells, 1990). 4. Stefania Hnatenko, *Treasures of Early Ukrainian Art: Religious Art of the 16–18th Centuries* (Ukrainian Museum) (New York, 1959); S. Hordynsky, *The Ukrainian Ikon from the XII to the XVIII centuries* (Toronto, 1973). 5. Suzanne Martinet, *La Sainte-Face de Laon et son histoire* (Laon, 1988). 6. Maxim Gorky, *Childhood* (Penguin Classics, London, 1966), pp. 61–4.

ILLYRIA 1. See D. Gelt, *The Slovenia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ictoria, 1983); E. M. Despalatović, *L. Gaj and the Illyrian Movement* (New York, 1973); J. Punk *et al., A Brief History of Slovenia* (Ljubljana, 1994); S. Gazi, *A History of Croatia* (New York, 1973); R. W. Seton-Watson, *The Southern Slav Question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 (New York, 1911); J. Pogonowski, *Iliryzm i Słowianszczyzna* (Lwów, 1924).

ILLYRICUM 1. See J. Wilkes, *The Illyrians* (Oxford, 1992); also 'Th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T. Cornell, J. Matthews, *Atlas of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82), 118–66.

IMPRESSION 1. Herman Wechsler, *Lives of Famous French Painters* (New York, 1962), 103–8. 2. Ibid. 16.

INDEX 1. N. Parsons, *The Book of Literary Lists* (London, 1985), 207–13. 2. See J. Vernaud and A. Bennett, *An Index to INDEX ON CENSORSHIP, 1972–88* (London, 1989). 3.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Washington, DC, 1967).

INFANTA 1. Quoted by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London, 1979), 15. 2. Prado, Madrid: Coello, *The Infanta Isabella* (1579), Cat. 1137; Velasquez, *The Infanta Margherita of Austria* (1659), Cat. 1192. See S. N. Orso, *Velazquez, los Barrachos, and Painting in the Court of Philip IV* (Cambridge, 1993). 3.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ch. 5, 'From Immodesty to Innocence'.

INQUISITIO 1. See F. E.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0) trans. D. Magarshack (Harmondsworth, 1958); also *The Grand Inquisitor*, trans. S. Koteliansky, intro. by D. H. Lawrence (London, 1935). 2. See Eduard Wasiolek, *Dostoyevsky: the major fiction* (Boston, 1964); Judith Gunn, *Dostoyevsky: dreamer and prophet* (Oxford, 1990); J. Frank, *Dostoyevsky* (Princeton, 1979–), 3 vols.; W. J. Leatherbarrow,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Cambridge, 1992). 3. Quoted by A. B. Gibson, *The Religion of Dostoyevsky* (London, 1973), 187. 4. Quoted by Gunn, op. cit. 5. John 12: 24.

IONA 1. Ellen Murray, *Peace and Adventure: The Story of Iona* (Glasgow, 1987). See also T. O. Clancy, G. Marcus, *Iona: the Earliest Poetry of a Celtic Monastery* (Edinburgh, 1995).

JACQUARD 1. See S. Augarten, *Bit by Bi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omputers* (London, 1984).

JEANS 1. See Joanna Brogden, 'Strauss, Levi', in *Fontana Biographical Companion to Modern Thought* (London, 1983), 734.

KALEVALA 1. With special acknowledgement to Prof. M. A. Branch. See also F. J. Oinas, *Studies in Finnic folklore: homage to the Kalevala* (Mäntä, 1985).

KATYŃ 1. NKVD to Comrade Stalin, 5 March 1940, nr 794/5, Central Committee Archives of the CPSU. Document released by President Yeltsin, and published in *Gazeta wyborcza* (Warsaw), nr 243 (1016), 15 Oct. 1992. 2. See J. T. Gross,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39–45* (Princeton, 1979); R. Lukas,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Lexington, KY, 1986). 3. Conversation with Stalin in the Kremlin, 14 November 1941. S. Ko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Kremlin and Despatches from Russia* (London, 1963), 112–43. 4. Detailed studies summarizing the case prior to Moscow's confession of guilt included *The Crime of Katyń: Facts and Documents* (Polish Cultural Foundation, 1948), trans. (London, 1965); J. Mackiewicz, *The Katyn Wood Murders* (London, 1951); J. Czapski, *The Inhuman Land* (London, 1951); J. K. Zawodny, *Death in the Forest: The story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 (Notre Dame, 1962); Louis Fitzgibbon, *Katyn: Crime without parallel* (London, 1971); *Despatches of Sir Owen O'Malley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London, 1972); M. Dąbrowski (ed.), *KATYN, 1940–1990: Documentary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Polish Institute and Sikorski Museum, London, 1990). 5. Philip C. Bell, 'The Katyn Graves Revealed' in *John Bull and the Bear: British Public Opinio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SSR, 1941–5* (London, 1990). See also C. S. and S. A. Garrett, 'Death and Politics: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20/4, Jan. 1987, 429–46. 6. As reported in *The Times*, 10 June 1995. 7. Nicholas Bethell, 'The Cold Killers of Kalinin', the *Observer*, 6 Oct. 1991. Further studies published after the Soviet confession of guilt include: Allen Paul, *Katyń: the Untold Story of Stalin's Polish Massacre* (New York, 1991), and Vladimir Abarinov, *The Murderers of Katyn*, trans. from the Russian (Hippocrene, New York, 1993). 8. See the illegal publication by J. Łojek, *Dzieje sprawy Katynia* (Warsaw, 1983). 9. *The Black Book of Polish Censorship* (Directives of the Polish State Censorship for 1976) (London, 1977). 10. A. Moszyński (ed.), *Lista Katyńska* (The Katyn List) (London, 1977). 11. See Ewa Haraszti Taylor, *A Life with Alan* (London, 1987), 221.

KEELHAUL 1. Denis Hills, *Tyrants and Mountains: a Reckless Life* (London, 1992), 103–8. 2. Ibid. 120–4. Hills was rewarded by being caricatured in Leon Uris's novel *Exodus*, and the subsequent Hollywood film based on the incident, as the man who tried to *stop* the ship from sailing. 3. Ibid. 130. 4. Ibid. 136. 5. Ibid. 137–40. 6. See Nicholas Bethell, *The Last Secret: Forcible Repatriation to Russia, 1944–47* (London, 1974); Nicholas Tolstoy, *Victims of Yalta* (London, 1978); Nicholas Tolstoy, *The Minister and the Massacres* (London, 1986). 7. A. Cowgill, T. Brimelow, C. Booker, *The Repatriation from Austria in 1945: the Report of an Enquiry*, 2 vols. (London, 1990); reviewed by J. Jolliffe, 'The Riviera of Hades', *Spectator*, 20 Oct. 1990; D. Johnson, 'Macmillan: a vindication that came too late', *The Times*, 19 Oct. 1990; R. Harris, 'Here's a way out for every war criminal', *Sunday Times*, 21 Oct. 1990.

KHAZARIA 1. Quoted by O. Pritsak, 'The Khazar Kingdom's Conversion to Judaism',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2 (1978), 271; also in Pritsak, *Studies in Mediaeval Eurasian History* (London, 1981). 2. Arthur Koestler, *The Thirteenth Tribe: The Khazar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London, 1976).

KONARMYA 1. I. Babel', *Konarmiya* (Moscow, 1928), 5. 2. N. Davies, 'Izaak Babel''s "Konarmiya" Stories, and the Polish–Soviet War',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7 (1972), 845–57. 3. K. M. Murray, *Wings over Poland* (New York, 1932).

KONOPIŠTE 1. Count Carlo Sforza, 'The Man Who Might Have Saved Austria', in *Makers of Modern Europe* (London, 1930), 32–43. 2. Ibid. 27. 3. Ibid. 20.

KRAL 1. See H. Spanke, *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Dichtung des Mittelalters* (Stuttgart, 1943). 2. W. Kootz, *Frankfurt: City Guide* (Frankfurt, n.d.), 9–12.

LANGEMARCK 1. John Keegan, 'When the guns fell silent: the Belgian battlefield where the seeds of German revenge were sown', *Daily Telegraph*, 11 Nov. 1988. That one grave site contains a similar number of men to that of all US military death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See Appendix III, p. 1326.)

LAUSSEL 1. Monica Sjoo and Barbara Mor, *The Great Cosmic Mother: Rediscovering the Religion of the Earth* (San Francisco, 1987), 84. On Stone Age religion, see G. Rachel Levy, *The Gate of Horn* (London, 1948). 2. R. Graves, *White Goddess: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Poetic Myth* (London, 1966); also *The Greek Myths* (London, 1955), 2 vols. 3. Neal Ascherson, *Black Sea* (1995), 111–17. 4. W. I. Thompson, *The Time Falling Bodies Take to Light: Mythologies, Sexuality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e* (New York, 1981), 102; quoted by Sjoo and Mor, op. cit. 79. 5. See 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Centre for Partnership Studies, Pacific Grove, Ca.) (New York, 1988).

LEONARDO 1. Jean Mathé, *Leonardo's Inventions* (Geneva, 1980). 2. After D. Wallechinsky *et al.*, *The Book of Lists* (New York, 1977), and C. M. Cox,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es* (Stanford, Calif., 1926).

LEPER 1. Quoted by S. N. Brody, *The Disease of the Soul: Leprosy in Mediaeval Literature* (Ithaca, NY, 1974), 80–1. 2. Ibid. 66–7. 3. *Chronicle of Lanercost*, quoted by R. M. Clay, *Mediaeval Hospitals of England* (London, 1909), 56. 4. Eilhart, L 4276–9, quoted by Brody, 180. 5. James A. Michener, *Hawaii* (New York, 1959).

LESBIA 1. Judith C. Brown, *Immodest Acts: The Life of a Lesbian Nun in Renaissance Italy* (New York, 1985). 2. Lillian Faderman, in *Signs: A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2(3) (Spring 1987), 576.

LETTLAND 1. A. Silgailis, *Latvian Legion* (San José, Calif., 1986). 2. After ibid. 245–50.

LEX 1. H. F. Jolowicz, *The Roman Foundations of Modern Law* (Oxford, 1957); A. D. E. Lewis (ed.), *The Roman Law Tradition* (Cambridge, 1994).

LIETUVA 1. H. H. Bender, *A Lithuanian Etymological Index* (Princeton, NJ, 1921), 5. 2. V. Ambrazas *et al.*, *Grammatyka litovskogo yazika* (Vilnius, 1985), 5. 3. See J. Biddulph, *Lithuanian: A Beginning* (Pontypridd, 1991).

LILI 1. R. Lax and F. Smith, *Great Song Thesaurus*, 2nd edn. (Oxford, 1985). 2. Hans Leip, 'Lili Marleen', in *Der ewige Brunnen: ein Hausbuch deutscher Dichtung*, ed. L. Reiners (Munich, 1979), 502. The original English title was '*My Lili of the Lamp-light*'. See 'The Saga of Lilli Marlene'. 3. *Les Feuilles Mortes* (Autumn Leaves); words by J. Prévert, music by J. Kosma, English lyrics by Johnny Mercer. 4. *Podmoskovnye Vechera* (Moscow Nights), *c.*1958; words by M. Matusovsky, music by V. Solovyov-Sedi; C. V. James (ed.), *Russian Song-Book* (Oxford, 1962), i. 31.

LLANFAIR 1. Melville Richards,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in Mediaeval Welsh Settlement', *Studia Celtica*, 3 (1968), 9–19. On Welsh History see John Davies, *Hanes Cymru*

(1990), trans. as *A History of Wales* (London, 1993). **2.** Ward Lock's *North Wales* (Northern Section), 14th edn. (London, n.d. *c.*1948), 193. The name combines and improves on three genuine Welsh village names: LLANFAIR PWLLGWYNGYLL and LLANDYSILIO (Anglesey) and LLANDYSILIOGOGO (Cardiganshire). Letter from Professor Rees Davies of Aberystwyth, 16 May 1994.

LLOYD'S 1. A. Brown, *Hazard Unlimited: From Ships to Satellites: 300 years of Lloyd's of London* (Colchester, 1987). **2.** Edmund Halley, in *Mortality in Pre-industrial Times: The Contemporary Verdict: Edmund Halley et al.*, J. H. Cassedy, ed. (Farnborough, 1973); also R. Schofield *et al.*, eds.,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 in Europe* (Oxford, 1991).

LOOT 1. 'I once had two wonderful statues, a woman and a young man, both so perfect that one could see their veins. They were taken when Poros was destroyed, and some soldiers were going to sell them to the Europeans in Argos.... But I took the soldiers aside and talked to them. "Even if they give you ten thousand thalers, you should not let them be taken out of our homeland. That is what we fought for."' After H. A. Lidderdale, ed., *The Memoirs of General Makriyannis* (Oxford, 1966). **2.** W. St. Clair, *Lord Elgin and the Marbles* (Oxford, 1967); C. Hitchens *et al.*, *The Elgin Marbles: should they be returned to Greece?* (London, 1987). 3. Charles de Jaeger, *The Linz File: Hitler's Plunder of Europe's Art* (Toronto, 1981); Lynn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e* (London, 1994). 4. M. Bailey, 'Nazi Art Loot Discovered in Russia', *Observer*, 24 March 1991. 5. Wm. H. Honan, 'New Facts and Lawsuits in the tale of art thefts from German Church', 'Stolen Treasure' and 'Inventory in Texas Case Turns up New Works', *New York Times*, 25 June, 30 June, 10 September 1990. **6.** E. Aleksandrov, Z. Stankov,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Sofia, 1979);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Humanities, *Who Owns the Past? a Symposium* (Melbourne, 1985); B. Walter, *Rueckfuehrung von Kulturgut in internationalen Recht* (Bremen, 1988); J. Greenfield, *The Return of Cultural Treasures* (Cambridge, 1989).

LUDI 1. See D. P. Mannix, *Those About to Die* (London, 1960). **2.** Ibid. 29. 3. From the *English Prayer Book* (1662).

LUGDUNUM 1. A. Pelletier, *Histoire de Lyon: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Roanne, 1990). **2.** F. Braudel, *The Identity of France*, i,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1988), 288–91. 3.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pt. 1 of E. Lavisse, *Histoire de la France* (Paris, 1911), i. 8.

ŁYCZAKÓW 1. See S. S. Nicieja, *Cmentarz Obrońców Lwowa* (Wrocław, 1990).

MADONNA 1. José Maria de Sagarra, *The Monserrat* (Barcelona, 1959). **2.** S. Z. Jabłoński, *Jasna Góra: ośrodek kultu maryjnego* (Lubin, 1984); Z. Różanów *et al.*,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Jasna Gora* (Warsaw, 1974). 3. J. Brun, *Rocamadour: historique, description, excursions* (Saint-Cere, Lot, 1927). 4. Guide Michelin, *Auvergne* (Clermont, 1980), 87. 5. With due acknowledgement to Alex Boyd. **6.** Marina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The Myth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London, 1976).

MAGIC 1. H. S. Cronin, 'The Twelve Conclusions of the Lollard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2 (1907), 298, quoted by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1971), 58. **2.** Ibid. 485–90. 3. See David Cannadine, *Rituals of Royalty: Power and Ceremonial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1987).

MAKEDON 1. M. Andronikos, *Verginia: The Royal Tombs* (Athens, 1984). **2.** E. Kofos, 'National Herit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Macedonia',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9 (2) (1989), 229–68. 3. 'Writers Campaign for Greek Scholar', the *Independent*, 13 May 1994.

MALET 1. Godfrey LeMay, 'The Conspiracy of General Malet', in P. Quennell (ed.), *Diversions of History* (London, 1954), 52–68.

MARKET 1. See R. J. Heilbroner, 'The Wonderful World of Adam Smith', in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The Lives, 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6th edn. (London, 1991), 42–74. 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MARSTON 1. Sir G. N. Clark, 'Marston', in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Oxford*, v, ed. Mary D. Lobel (Oxford, 1957), 214–21. 2. Jennifer Sherwood and Nikolaus Pevsner, *The Buildings of England: Oxfordshire* (London, 1974), 699–700. See also J. Sherwood and J. Piper, *A Guide to the Churches of Oxfordshire* (Oxford, 1989). 3. W. E. Tate, *The Parish Chest: A Study of the Records of Parochial Administration in England* (Chichester, 1983). 4. From '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750), by Thomas Gray, written at Stoke Poges, Buckinghamshire.

MASON 1. See F. L. Pick and C. N. Knight, *A Pocket History of Freemasonry*, rev. edn. (London, 1992); also Stephen Knight, *The Brotherhood: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Freemasons* (London, 1984); J. J. Robinson, *Born in Blood: The Lost Secrets of Freemasonry* (London, 1990). 2. Ibid. 45. 3. Knight, chapters 1 and 2, 'Origins' and 'Metamorphosis', 15–24. 4. See Margaret Jacob,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London, 1981).

MASSILIA 1. Marcel Pagnol, *Marius* (Paris, 1946), II. vi. 2. J.-L. Bonillo, *Marseille: ville et port* (Marseille, 1992).

MATRIMONIO 1. D. B. Rheubottom, ' "Sisters First": Betrothal Order and Age at Marriage in Mediaeval Ragusa',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3 (1988), 359 ff. 2. F. W. Carter, *Dubrovnik (Ragusa): A Classic City-State* (London, 1972); Z. Zlatar, *Between the Double Eagle and the Crescent: The Republic of Ragus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Boulder, Colo., 1992). 3. J. Haynal (1965); discussed by P. Laslett, 'Family and Household as Work Group and Kin Group', in P. Wall *et al.* (eds.),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1983), 513–63. 4. See D. Herlihy, *Mediaeval Households* (Cambridge, Mass., 1985). 5. 'When Beauty Is Destroyed, God suffers', *Financial Times*, 10 Feb. 1992.

MAUVE 1. *An Outline of the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the Dyestuffs Industry* (ICI Dyestuffs Division) (London, 1968), 10. 2. Ibid. p. 7. 3. 'The Amazing Chemistry of Colour', *Crosslink* (Newbury), vol. 2, no. 1 (1990), 4–6. 4. *The Bayer Tapestry: An Unfolding History from 1863* (Newbury, n.d.); *100 Years Research and Progress: Bayer Pharma 1988* (Bayer AG) (Leverkusen, 1988), p. 4. 5. D. W. F. Hardie and J. D. Pratt,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British Chemical Industry* (Pergamon, Oxford, 1966), pp. 68–70.

MENOCCHI 1. Rounding the Cornice of Pride in Purgatory, Virgil turns to Dante: *O superbi cristiani!*... (Oh proud Christians! ... do you not see that we are worms, whose insignificance lives but to form the angelic butterfly, that flits to judgement naked of defence?); *Purgatorio*, x. 121–6. 2.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London, 1982), 57.

MERCANTE 1. Iris Margaret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 (London, 1957), 336–8. 2. See F. Bensa, *Francesco di Marco da Prato* (Milan, 1928). 3. Usance meant the customary interval between delivery and payment. Between Florence and Barcelona it was 20 days. 4. File 1145;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146–7. 5.

Francesco to Margherita, 5 Apr. 1395; File 1089;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136. 6. Fernand 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1979), 57. 7. Ibid. ch. 2, 'The Market Economy and Capitalism'.

METRYKA 1. See A. Tomczak, *Zarys dziejów archiwów polskich* (Toruń, 1982); R. C. Lewandowski, *Guide to the Polish Libraries and Archives* (Boulder, Colo., 1974). 2. Patricia Grimsted, *The Lithuanian Metrica in Moscow and Warsaw: Reconstructing the Archives of 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 (Cambridge, Mass., 1986); also her *Handbook for Archival Research in the USSR* (Washington, DC, 1989). 3. A. E. P. Zaleski, 'Some New Archiv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Recent Polish History', MA thesis (SSE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4), 5–6.

MEZQUITA 1. Rafael Castejón, *La Mezquita Aljama de Cordoba* (Madrid, n.d.). 2. Adam Hopkins, 'Of Castles and Castanets',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6 May 1993.

MICROBE 1. Z. Święch, *Klątwy, Microby i Uczeni* (Warsaw, 1989).

MIR 1. F. Sulimirski *et al.*, *Słownik Geograficzny Królestwa Polskiego* (Warsaw, 1885), 485–8. 2. See also 'Mir' in Roman Aftanazy, *Dzieje rezydencji na dawnych kresach Rzeczypospolity* (Warsaw, 1991). 3. A. Mickiewicz, *Pan Tadeusz*, xii.

MISSA 1. Thrasybulos Georgiades, *Musik und Sprache* (1974), trans. as *Music and Language: The Rise of Western Music as Exemplified in Settings of the Mass* (Cambridge, 1982), 7. See also J. Harper, *The Forms and Orders of the Western Liturgy from the T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1). 2. W. Mellers, *Romanticism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n and His Music, pt. iv*), rev. edn. (London, 1988), 1011.

MOARTE 1. See M. V. Riccardo, *Vampires Unearthed: The Vampire and Dracula Bibliography* . . . (New York, 1983). 2. With acknowledgement to Rebecca Haynes, 'Vampirism, the Cult of Death and the Romanian Legionary Movement', seminar paper presented at SSE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0 June 1993. See Z. Barbu, 'Rumania', in S. J. Woolf (ed.), *European Fascism* (London, 1968), 146–66; also C. Z. Codreanu, *For My Legionaries* (Madrid, 1977).

MOLDOVA 1. Aleksei Vasilev, *They are talking about us in Pravda* (1951), oil on canvas 99 × 156 cm, in M. C. Down *et al.*, *Soviet Socialist Realist Painting, 1930s–1960s*, pl. 28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Engineers of Human Souls', Oxford Museum of Modern Art, Jan.–Mar. 1992).

MONKEY 1. William Irvine, *Apes, Angels and Victorians: The Story of Darwin, Huxley and Evolution* (New York, 1955), chapter i. 2. F.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 2nd edn. (London, 1892; repr. 1950), pp. 325 ff. 3. Irvine, p. 280. 4. D. W. Forrest, *Francis Galton: the Life and Work of a Victorian Genius* (London, 1974).

MONTAILLOU 1. E.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Cathars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294–1324*, trans. B. Bray (London, 1980), 276. 2. Ibid. 212.

MORES 1.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Basle, 1939), i; trans. a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1978), 68 ff. 2. Ibid. ch. 2, vii, 'On Spitting'. 3. Ibid. 129. 4. Ibid. 85–162. 5. Ibid.

MOUSIKE 1. After A. Isacs and E. Martin (eds.), *Dictionary of Music* (London, 1982), 247–8 (mode), 337–8 (scale).

MURANO 1. L. Zechin, *Vetro e vetrai di Murano: studi sulla storia del vetro* (Venice, 1987); also M. Dekówna, *Szkło w Europie wczesnośredniowiecznej* (Wrocław, 1980).

NEZ 1. Desmond Morris *et al.*, *Gestures: Their Origins and Distribution*, 'The Nose Thumb' (London, 1979), a survey confined to Western Europe, 25–42. 2. See J. Bremmer and H. Roodenburg (e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sture* (Oxford, 1993).

NIBELUNG 1. W. Huber, *Auf der Suche nach den Nibelungen* (Gütersloh, 1981), 20. 2. H. and M. Garlan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German Literature*, 2nd edn. (Oxford, 1986), 664–7.

NIKOPOLIS 1. See Barbara Tuchman,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8).

NOBEL 1. E. Bergengen, *Alfred Nobel: the Man and his Work* (London, 1962); N. K. Stahle, *Alfred Nobel and the Nobel Prizes* (Stockholm, 1986).

NOMEN 1. James Gow, *A Companion to School Classics* (London, 1888), 166 ff. 2. Neal Ascherson, 'Do me a favour, forget my name . . .',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4 Sept. 1994. 3. See *Pamiętniki Filipka*, ed. W. Zambrzycki (Warsaw, 1957), 115 ff.; quoted by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245–7.

NOMISMA 1. E. Junge, *World Coin Encyclopaedia* (London, 1984), 15. 2. See Jean Babelon, *La Numismatique antique* (Paris, 1949).

NORGE 1. See G. Opstad *et al.*, *Norway* (London, 1991).

NOSTRADAMUS 1. Nostradamus, Prophecies i. 35. See E. Cheetham, *The Prophecies of Nostradamus* (London, 1973). 2. Prophecies x. 39. 3. Ibid. i. 3. 4. Ibid. i. 63.

NOVGOROD 1. F. M. Thompson, *Novgorod the Great: Excavations at the Mediaeval City* (London, 1967), 58. See also M. Brisbane (ed.), *The Archaeology of Novgorod, Russia: Recent Results from the Town and Its Hinterland* (Lincoln, 1992). 2. Ibid. 63. 3. On the destruction of Novgorod and the slaughter of 60,000 citizens see I. Grey, *Ivan the Terrible* (London, 1964), 178–82.

NOYADES 1. See J. Brooman, *The Reign of Terror in France: Jean-Baptiste Carrier and the Drownings at Nantes* (York, 1986). 2. See Jan Karski, *The Secret State* (London, 1944). 3. R. Hilberg, 'Origins of the Killing Cente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1985), 221–38. 4. J. C. Pressac, *Auschwitz: Technique and Operation of the Gas Chambers* (New York, 1989). 5. Paraphrased from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6), viii. 324–9. 6. Lyubo Boban, 'Jasenovac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Histor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4 (1990), 580–93.

OEDIPUS 1. Betty Radice, *Who's who in the Ancient World: a Handbook to the Survivor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Classics* (London, 1973), 'Oedipus', pp. 177–8.

OMPHALOS 1. F. Poulsen, *Delphi* (London, 1920), 29. 2. See H. W. Parke, *The Greek Oracles* (London, 1967), 'Delphic Procedure', 72–81. 3. H. W. Parke and D. E. W. Wormell, *The Delphic Oracle* (Oxford, 1956). Vol. ii, *The Oracular Responses*, contains an exhaustive and critical study of all the oracle's known utterances, which, however, are not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4. Parke, *The Greek Oracles*, 34.

OPERA 1. *New 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 Stanley Sadie (London, 1992), XII. 514–34. See also R. Parker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pera* (Oxford, 1994).

ORANGE 1. Françoise Gasparri, *La Principauté d'Orange au Moyen Âge* (Paris, 1985). 2. See C. V. Wedgewood, *William the Silent* (London, 1944); Marion Grew, *The House of Orange* (London, 1947); H. H. Rowen, *The Princes of Orange: Stadholders in the Dutch Republic* (Cambridge, 1988). 3. See C. Fitzgibbon, *Red Hand: The Ulster Colony* (London, 1971); Tony Gray, *The Orange Order* (London, 1972).

OXFAM 1. M. Black, *Oxfam: the first 50 years* (Oxford, 1992); F. Jean, *Life, Death, and Aid: the Médecin sans Frontières Report*... (London, 1993).

PALAEO 1. D. C. Greetham, *Textual Scholarship: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92); B. Bischoff, *Latin Palaeography: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90); T. J. Brown, *A Palaeographer's View: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1993). 2. C. Hamilton, *The Hitler Diaries: Fakes That Fooled the World* (Lexington, Ky., 1991).

PANTA 1. See Michele d'Avino, *Pompeii prohibited* (Edizioni Procaccini, Naples, n.d.); M. Grant *et al.*, *Erotic Art in Pompeii: the secret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ples* (London, 1975). 2. 'Oh, [my] rampant son, how many women have you fucked?'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IL*) vol. iv, no. 5213. 3. '[In case you hadn't noticed], Ampliatus, Icarus is buggering you.' ibid. no. 2375. 4. 'Restituta, drop your tunic, I beg you, [and] show [your] hairy pud', ibid. no. 3951. 5. 'Weep girls, sod [—]... superb cunt, farewell... Ampliatus... so many times... This also I fookie fookie...', ibid. no. 3932. 6. 'Thrust slowly' (with illustration), ibid. no. 794. 7. 'Here Messius fucked nothing.' ibid. (from the House of Amando).

PAPESSA 1. J. N. D. Kelly,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pes* (Oxford, 1988), appendix, 329–30; also J. Morris, *Pope John VIII—An English Woman: Alias Pope Joan* (London, 1985).

PAPYRUS 1. On Derveni, see S. G. Kapsomenon, *Gnomon*, 35 (1963), 222–3; *Archaeoll. Deltion*, 14 (1964), 17–25; also Eric Turner, *Greek Papyri: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80). 2. E. G. Turner, *Greek Papyri,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68; repr. 1980); *Greek Manuscript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2nd edn. 1987).

PARNASSE 1. After Ronald Taylor, *Franz Liszt: Man and Musician* (London, 1986), 46.

PASCHA 1. E. A. M. Fry, *Almanacks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History: being a series of 35 almanacks arranged for every day upon which Easter can fall . . . 500–1751 AD (OS), 1751–2000 AD (NS)* (London, 1915). 2. C. Wesley, '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 rev. edn. (London, 1950), no. 141.

PETROGRAD 1. R. J.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2nd edn. 1991). 2. See Harrison Salisbury, *The 900 Days' Siege of Leningrad* (New York, 1969). 3. Ruth T. Kamińska, *Mink Coats and Barbed Wire* (London, 1979).

PFALZ 1. See Leo Hugot, *Aachen Cathedral: A Guide* (Aachen, 1988); Erich Stepheny, *Aachen Cathedral* (Aachen, 1989).

PHILIBEG 1. Hugh Trevor-Roper, 'The High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in T. Ranger and E. Hobsbawm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1983), 15–42. 2. See Robert Bain, *The Clans and Tartans of Scotland*, 5th edn. (Glasgow, 1976), 164–5. 3. Ranger and Hobsbawm,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263–307.

PHOTO 1. Brian Coe, *The Birth of Phot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Formative Years, 1800–1900* (London, 1976).

PICARO 1. Bronisław Geremek, *Świat Opery Żebraczej: obraz włóczęgów i nędzarzy w literaturach XV–XVII wieku* (The World of the Beggar's Opera: Tramps and Beggar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5th–17th Centuries) (Warsaw, 1989); *Poverty: A History* (Oxford, 1994). 2. Ewa M. Thomson, *Understanding Russia: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1987).

PLOVUM 1. Lynn White Jr.,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Media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62), 39–78, with superlative footnotes.

POGROM 1. 'Pogrom',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1971), xiii. 694–702. 2. See J. D. Clier, *Pogrom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Cambridge, 1991); I. M. Aronson, *Troubled Waters: The Origins of the 1881 Anti-Jewish Pogroms in Russia* (Pittsburgh, 1990). 3. Norman Davi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Polish Jews, 1918–2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viii/2, 1973, 119–42.

POTEMKIN 1. J. Dreifuss, *The Romance of Catherine and Potemkin* (London, 1938). 2. Anatoliy Golitsyn, *New Lies for Old: The Communist Strategy of Deception and Disinformation* (London, 1984), 412. 3. H. Marshall, *Sergei Eisenstein's 'Battleship Potemkin'* (New York, 1978).

PRADO 1. F. J. Sanchez Canton, *The Prado* (London, 1959), 7. 2. See *Treasures of a Polish King: Stanislaus August as Patron and Collector* (Catalogue to the Exhibition, Dulwich Picture Gallery, London, 1992).

PRESS 1. S. H.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London, 1955), 23. 2. Ibid. 177–8. 3. See Francis Robinson, *Technology and Religious Change: Islam and the Impact of Print*, inaugural lecture at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4 Mar. 1992.

PROPAGANDA 1. J.-M. Domenach, *La Propagande Politique* (Paris, 1955), 55. See also Z. Zeman, *Nazi Propaganda* (Oxford, 1973); F. C.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rinceton, 1964). 2. Stephen Koch, *Double Lives: Stalin, Willi Munzenberg and the Sedu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1994), 12. 3. Sidney Hook, *Out of Step* (New York, 1987), 491–6, quoted by Koch, 77.

PROSTIBULA 1. J. Rossiaud, *La Prostitution Médiévale*, trans. as *Medieval Prostitution* (Oxford, 1988); L. L. Otis, *Prostitution in Mediaeval Society: The History of an Urban Institution in Languedoc* (Chicago, 1989). 2. L. Roper, *The Holy Household: Women and Morals in Reformation Augsburg* (Oxford, 1989).

PUGACHEV 1. See Orland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21* (Oxford, 1989). 2. See Paul Avrich, *Russian Rebels, 1600–1800* (New York, 1972); also J. Y. Alexander, *Autocratic Government in a national crisis: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and Pugachev's Revolt, 1773–75* (Bloomington, Ind., 1961); A. Bodger, *The Kazakhs and the Pugachev Uprising in Russia, 1773–4* (Bloomington, 1988). 3. E.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Manchester, 1971); also R. H. Hilton, *Bondmen made free: mediaeval 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 English rising of 1381* (London, 1973); D. Mitrany,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Chapel Hill, 1951). 4. Theodore Shanin,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selected readings* (Oxford, 2nd edn., 1987); *Defining peasants: essays concerning rural societies* (Oxford, 1990). 5.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 no. 1 (1973–4), 1–3. 6. E. Le Roy Ladurie (1969), trans. as *The French Peasantry, 1450–1660* (Aldershot, 1987). 7. Y. M. Berce, *Croquants et nu-pieds: les*

soulèvements paysans en France du XVIème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1974). **8.** R. Mousnier, *Peasant Uprising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1971). **9.** R. Pillorget, *Les mouvements Insurrectionnaires de Provence entre 1596 et 1795* (Paris, 1975). **10.** L. Sciascia, *La Corda Pazza* (Turin, 1970), 390.

QUAKE 1. T. D. Kendrick, *The Lisbon Earthquake* (London, 1956); J. Noses, *O terramote de 1755: British Accounts* (Lisbon, 1990).

RELAXATIO 1. Edward Whymper, *The Ascent of the Matterhorn* (1880) (reprinted London, 1987); *Scrambling Amongst the Alps*, 5th edn. 1890 (reprinted Exeter, 1986); see also P. Bernard, *The rush to the Alps: the Evolution of Vacationing in Switzerland* (Boulder, Colo., 1978). **2.** J. Walvin, *The People's Game: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football* (London, 1975); B. Butler, *The Football League, 1888–1988* (London, 1987). **3.** J. Mercier, *Le Football* (Paris, 1971); P. Soar, M. Tyler, *The Story of Football* (Twickenham, 1986).

RENTES 1. E. Le Roy Ladurie, P. Couperie, *Annales*, July 1970, translated as 'Changes in Parisian Rents',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79), 61–78.

RESPONSA 1. Rabbi Ephraim Oshry, *Mi-Maamakkim*, III. i. 11; in Rabbi Dr H. J. Zimmels, *The Echo of the Nazi Holocaust in Rabbinic Literature* (London, 1975), pt. 3, 'An Anthology of Responsa', pp. 253–353, s. 24, 'Adoption'. **2.** These paraphrased examples are taken either from Zimmels, *The Echo of the Nazi Holocaust*, or from 'Religious Leadership during the Holocaust', a seminar paper read by Rabbi Hugo Gryn at SSEES, Univ. of London, 30 Apr. 1992. **3.** *Oshry, Mi-Maamakkim*, I. i. **4.** *The Holocaust: The Victims Accuse. Documents and Testimony on Jewish War Criminals* (Brooklyn, NY, 1977).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spiritual pornography, this would fit it' (Hugo Gryn). **5.** See Pesach Schindler, *Hassidic Responses to the Holocaust in the Light of Hassidic Thought* (Hoboken, NJ, 1990). **6.** Dr Milejkowski *et al.*, *Recherches cliniques sur la famine exécutées dans le ghetto de Varsovie* (Warsaw, 1946). **7.** Letter of 9 Dec. 1993 from Rabbi Hugo Gryn.

REVERENTIA 1. See Peter Brown, *Relics and Social Status in the Age of Gregory of Tours*, Stenton Lecture 1976 (Reading, 1977). **2.** Patricia Morison, 'An Exquisite Gothic Treasure Trove', *Financial Times*, 3 Sept. 1991.

ROMANY 1. Jules Bloch, *Les Tsiganes* (Paris, 1969), 7–16. A Franciscan pilgrim reported seeing a community of cave-dwellers, probably gypsies, near Candia in Crete in 1322; ibid. 16. **2.** See Angus Fraser, *The Gypsies* (Oxford, 1992); also G. Puxon, *Roma: Europe's Gypsies* (London, 1987). **3.** Matthew Arnold, from 'The Scholar-Gipsy',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1250–1918*, no. 760, p. 914.

ROUGE 1. E. J. Haeberle, 'Swastika, Pink Triangle and Yellow Star: The Destruction of Sexolog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Homosexuals in Nazi Germany', in M. Duberman *et al.*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London, 1991), 365–79.

RUFINUS 1. Nicholas Barker,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Spread of Learn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478–1978* (Oxford, 1978), 2–4. **2.** *Why We Are at War: Great Britain's Case, with an appendix of original documents*, by Members of the Oxford Faculty of Modern History (E. Barker, H. W. C. Davis, C. R. L. Fletcher, Arthur Hassall, L. G. Wickham Legg, F. Morgan) (Oxford, 1914); as recorded in the OUP archives, and with acknowledgement to Dr H. Pogge von Strandmann.

RUS' 1. N. Freret, *Mémoire sur les origines des francs* (Paris, 1714). **2.** Omeljan Pritsak, *The Origins of Rus'* i (Cambridge, Mass., 1981), ch. 1. **3.** Norman Golb and Omeljan Pritsak (eds.), *Khazarian Hebrew Documents of the Tenth Century* (Ithaca, NY, 1982), ch. 1, 'T-S (Glass) 12.122—the Kievan Letter'.

SAMOS 1. Guy de la Bédoyère, *Samian Ware* (Princes Risborough, 1988). 2. J. Dechelette, *Les Vases céramiques ornées de la Gaule romaine* (Paris, 1904); H. B. Walters, *Catalogue of Roman Pottery . . .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05); M. Durand-Lefebvre, *Marques de potiers gallo-romans trouvées à Paris* (Paris, 1963); J. A. Stansfield and Grace Simpson, *Central Gaulish Potters* (Oxford, 1958); A. C. Brown, *Catalogue of Italian Terra Sigillata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968); P. Petru, *Rimska keramika v Slovenji* (Ljubljana, 1973). 3. Stansfield and Simpson, *Central Gaulish Potters*, chronological table, 170.

SAMPHIRE 1. Jane Renfrew, *Food and Cooking in Prehistoric Britain: History and Recipes* (London, 1985), 35, after R. Philips, *Wild Food* (London, 1983). 2. Ibid. 36, after Mrs Beeton. 3. Ibid. 38, after M. B. Stout, *The Shetland Cookery Book* (Lerwick, 1968).

SANITAS 1. Dhiman Barua and Wm. Greenough III (eds.), *Cholera* (New York, 1992), ch. 1, 'The History of Cholera'. 2. A. Nikiforuk, op. cit., 154. See also F. R. van Hartesfeld, *The Pandemic of Influenza, 1918–19* (Lampeter, 1992); R. Collier, *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 (New York, 1974).

SARAJEVO 1. Adapted from 'A Letter from 1920' (*Pismo iz 1920g*) by Ivo Andrič, trans. Lenore Grenoble, in *The Damned Yard and Other Stories*, ed. Celia Hawkesworth (London, 1992), 107–19. 2. Ibid. 7. 3. Francesca Wilson, *Aftermath* (London, 1947), 'Sarajevo'.

SCHOLASTIKOS 1. From *The Philogelos or Laughter-lover*, trans. by A. Eberhard (Berlin, 1869) and into Polish by J. Łanowski (Wrocław, 1965). 2. See S. West, 'More Very Old Chestnuts', *Omnibus*, 20 (Sept. 1990).

SHAMAN 1. Nevill Drury, *The Elements of Shamanism* (Longmead, Dorset, 1989). 2. Aleksander Nawrocki, *Szamanizm i Węgrzy* (Warsaw, 1988).

SHQIPERIA 1. S. Pollo, A. Puto, *The History of Albania* (London, 1981); James Pettifor, *Albania* (London, 1994).

SINGULARIS 1. Montaigne, *Essais* (1580): quoted by Alain Laurent, *Histoire de l'individualisme* (Paris, 1993), 27. 2. See Colin Morris, *The Discovery of the Individual, 1050–1200* (London, 1972). 3. Margaret Thatcher; see *Margaret Thatcher in Her Own Words* (Harmondsworth, 1987). 4. R. Hughes, *The Culture of Complaint: The Fraying of America* (London, 1993); and David Selbourne, *The Principle of Duty: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Civic Order* (London, 1994).

SLAVKOV 1. D. Chandler, *Austerlitz 1805: Battle of the Three Emperors* (London, 1990). 2. 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trans. Rosemary Edmonds (London, 1957), vol. I, book 1, ch. XIV, p. 317. 3. John 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 (London, 1978).

SLESVIG 1. Bent Rying, *Denmark: History* (Copenhagen, 1981), ii. 332. 2. See W. Carr, *Schleswig-Holstein, 1815–48: A Study in National Conflict* (Manchester, 1963);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German Unification* (London, 1991).

SMOLENSK 1.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Harvard, Mass., 1953). 2. J. Arch Getty,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38* (Cambridge, 1988), 203. 3. See Jacek Kuroń, *Wiara i wina: do i od komunizmu* (Warsaw, 1990), 324–5. The author,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was jail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the 1960s, when he shared a prison cell with a Gestapo officer of wartime vintage. 4. Norman Davies, 'The

Misunderstood Wa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9 June 1994. 5. Gitta Sereny, 'Giving Germany Back Its Past',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5 May 1994.

SOCIALIS 1. Nils Andrén, *Modern Swedish Government* (Stockholm, 1961).

SONATA 1. W. Mellers, *The Sonata Principle* (London, 1988), 655; W. S. Newman, *The Sonata in the Classic Era* (New York, 1972).

SOUND 1. Robert Browning, 'How They Brought the Good News from Ghent to Aix',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896), i. 250–1. 2. Brian Rust, *Discography of Historical Records on Cylinders and 78s* (London, 1979), 41. (It is possible that it was preceded by Edison's recording of W. E. Gladstone on 22 November 1888.) 3. See *Revolutions in Sound: A Celebration of 100 years of the Gramophone* (British Library exhibition and catalogue, London, 1988). 4. *Die Klangwelt Mozarts* (exhibition of the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1991–2). 5. See Grace Koc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rchives (IASA), Directory of Member Archives*, 2nd edn. (Milton Keynes, 1982). 6. Quoted by Rust, *Discography*, 277.

SOVKINO 1. N. Zorkaya,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viet Cinema* (New York, 1991). 2. Quoted by R. Taylor, *The Politics of the Soviet Cinema, 1917–29* (Cambridge, 1979), 39.

SPASIT'EL 1. Ryszard Kapuściński, 'The Temple and the Palace', in *Imperium* (London, 1994), 95–108.

SPARTACUS 1. R. Orena, *Rivolta e rivoluzione: il bellum di Spartaco* (Milan, 1984). 2. W. D. Phillips, *Slavery from Roman Times to the Early Transatlantic Trade* (Manchester, 1985); C. W. W. Greenidge, *Slavery* (London, 1958). 3. W. Z. Rubinsohn, *The Spartacus Uprising and Soviet Historical Writing* (Oxford, 1987).

SPICE-OX 1. Marcel Détienne, *Les Jardins d'Adonis* (Paris, 1972), trans. as *The Gardens of Adonis* (Hassocks, 1972), ch. 4, 'The Spice Ox', 37–59.

STATE 1. See Rein Taagepera, 'Growth and Decline of Empires since 600 AD'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2. Norbert Elias, *U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sle, 1939), ii. 3.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1990). 4.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1500–2000* (London, 1988). 5. Richelieu, *Testament politique*, quoted by J. H. Shenna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uropean State, 1450–1725* (London, 1974).

STRAD 1. D. Boyden, *The Hill Collection*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969), No. 18, 'Le Messie'. 2. W. E. Hills, *The Salabue Stradivari* (London, 1891).

STRASSBURG 1. See G. Gardes, *La Marseillaise, ou les paradoxes de la gloire* (Lyons, 1989); F. Robert, *La Marseillaise* (Paris, 1989).

SUND 1. C. E. Hill, *Danish Sound Dues and Command of the Baltic* (Durham, NC, 1926).

SUSANIN 1. A. Loewenberg, *Annals of Opera, 1597–1940* (London, 1978), 784–6. 2. S. Sadie (ed.),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Opera* (London, 1992), ii. 1261–4.

SYLLABUS 1. This paraphrase is based on the much larger one in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Washington, DC, 1967), xiii. 854–6. 2. On Dostoyevsky's political views, which regarded socialism, anarchism, terrorism, and Roman Catholicism as closely related, see [**INQUISITIO**].

SYPHILUS 1. See Claude Quétel, *A History of Syphilis* (Cambridge, 1990). 2. Quoted by Nikiforuk, *The Fourth Horseman*, op. cit. 91. 3. L. Baumgartner and J. F. Fulton, *A Bibliography of the Poem '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 by Girolamo Fracastro of Verona* (London, 1935) also G. Eatough, *Fracastro's Syphilis*, (Leeds, 1984).

SYROP 1. See R. H. Bainton, *The Hunted Heretic: The Life and Death of Michael Servetus* (Boston, 1953). 2. J. Bossy, *Giordano Bruno and the Embassy Affair* (New Haven, Conn., 1992).

SZLACHTA 1. Norman Davies, 'Szlachta: The Nobleman's Paradise', in *God's Playground* (Oxford, 1981), vol. i, ch. 7. See also A.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also M. J. Bush, *Rich Noble, Poor Noble* (Manchester, 1988).

TABARD 1. Eric Delderfield, *Inns and Their Signs: Fact and Fiction* (Newton Abbot, 1975); also Dominic Rotheroe, *London Inn Signs* (London, 1990).

TAIZÉ 1. J. L. Gonzalez Balado, *The Story of Taizé*, 3rd edn. (London, 1988); Rex Brice, *Brother Roger and his community* (London, 1978). 2. J. Playfoot (ed.), *Mother Theresa: My life for the poor* (Yarmouth, 1986); E. Egan, *Such a Vision of the Street* (London, 1985); P. Porter, *Mother Theresa: The Early Years* (London, 1986); N. Cahwla, *Mother Theresa* (London, 1992); Sue Shaw, *Mother Theresa* (London, 1993). 3. See 'Aid to the Church in Need', *Mirror*, bi-monthly (Antwerp, 1992–).

TAMMUZ 1. M. Lambeth, *Discovering Corn Dollies* (Aylesbury, 1987). See also 'Demeter and Proserpine' and 'Lityerses: The Death of the Corn-spirit', in James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London, 1890), ch. 3, sects. 8, 9. 2. See D. Harris and G. C. Hillman, *Foraging and Farming: The Evolution of Plant Exploitation* (London, 1988); M. N. Cohe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Overpop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 1977); P. J. Ucko and G. W. Dimbleby,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London, 1969). 3. J. Percival, *The Wheat Plant* (London, 1921).

TAXIS 1. See S. MacCormack, *Art and Ceremony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Calif., 1981). 2. Leipzig Univ. Library 28. 3. See J. P. Bury, 'The Ceremonial Book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 *EHR* 22 (1907), 209–27; also A. Vogt, *Constantin Porphyrogenète: le livre des cérémonies* (Paris, 1935–40). 4. See D. M. Nicol, '*Kaiseralbung*: The Unction of Emperors in Late Byzantine Ritual',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 (1976), 37–52.

TEICHOS 1.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1991), i. 519–20; see also A.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 (London, 1899).

TEMPUS 1. E. Bruton, *The History of Clocks and Watches* (London, 1979), 34–5. 2. See G. J. Whitrow, *Time in History: Views of Ti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 (Oxford, 1989).

TEREM 1. See Nancy S. Kollmann, 'The Seclusion of Elite Muscovite Women', *Russian History*, 10 (1988), 170–87. 2. Augustin von Mayerburg, *Iter in Moscoviam . . .* (1661), quoted by Lindsey Hughes, *Sophia: Regent of Russia, 1657–1704* (New Haven, Conn., 1990), 17. (Winner of the Heldt Prize for Women's Studies, 1992.) 3. Ibid. 264–5. This unflattering description was printed in Foy de la Neuville's *Relation curieuse et nouvelle de Moscovie* (Paris, 1698), but had been added to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possibly by a hostile editor during Peter's reign.

THRONOS 1. See A. C. Mandel, 'The Seated Man: Homo Sedens', in *Applied Ergonomics*, 12(1) (1981); also published separately (Copenhagen, 1981).

TOLLUND 1. Seamus Heaney, 'The Tollund Man', *New Selected Poems, 1966–87* (London, *1990*), 31–2. 2. 'Iceman of the Alps comes in from the cold . . .', *Sunday Times*, 29 Sept. 1991; also F. Spencer, *Piltdown: a scientific forgery* (London, 1990).

TONE 1. G. Perle, *Twelve-Tone Tonality* (London, 1977); M. Hyde, *Schoenberg's Twelve-Tone Tonality* (Ann Arbor, Mich., 1982); S. Milstein, *Schoenberg: Notes, Sets, Forms* (Cambridge, 1992). 2. R. R. Reti, *Tonality, Atonality, Pantonality: A Study of Some Trends in Twentieth Century Music* (London, 1958). 3. P. Griffiths, *Olivier Messiaen and the Music of Our Time* (London, 1985); B. M. Maciejewski, *H. M. Górecki: His Music and Our Times* (London, 1994).

TOR 1. See A. Reissner, *Berlin, 1675–1945: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etropolis* (London, 1984); A. Read, D. Fisher, *Berlin; the biography of a city* (London, 1994).

TORMENTA 1. Norbert Elias, *History of Manners*, 203–4. 2. After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1975), 9–11, quoting contemporary accounts. 3. C. Phillipson, *Three Criminal Law Reformers: Beccaria, Bentham, Romilly* (London, 1923); *Cesare Beccaria and Modern Criminal Polic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1988 (Milan, 1990); J.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 Regime* (Chicago, 1977). 4. See G. R. Scott, *A History of Torture* (London, 1994); J. H. Burgess and H. Danelius,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London, 1988).

TOUR 1. Serge Douay, 'Tours et Détours du Tour de France', *Historama*, 89/July 1991, 58–63; see also G. Watson, *The Tour de France and its heroes* (London, 1990); G. Nichol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our de France* (London, 1991). 2. *Independent*, 27 July 1992.

TRISTAN 1. John Manchip White, 'Tristan and Isolt', in P. Quennell (ed.), *Diversions in History* (London, 1954), 138–46. 2. Gabriel Bise, *Tristan and Isolde: From a Manuscript of 'The Romance of Tristan'* (15th century) (Fribourg–Geneva, 1978). 3. *Povest'e Tryschane* (1580), Raczyński Library, Poznań (MS 94): trans. Z. Kipel as *The Byelorussian Tristan* (New York, 1988). 4. From the *Morte D'Arthur*, quoted by White, 'Tristan and Isolt', 146. 5. G. Phillips and M. Keaman, *King Arthur: The True Story* (London, 1992). 6. See G. Ashe, *The Quest for Arthur's Britain* (London, 1968). 7. Tennyson, *Idylls of the King*, 'To the Queen', ll. 62–6; in R. W. Hill (ed.), *Tennyson's Poetry* (New York, 1971), 431.

TSCHERNOWITZ 1. Michael Ignatieff, 'The Old Countr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Feb. 1990, reviewing Gregor von Rezzori, *The Snows of Yesteryear: Portraits for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89).

UKRAINA 1. Taras Shevchenko, '*Zapovit*' (Testament, 1845) in *Song out of Darkness*, selected poems translated by Vera Rich (London, 1972), p. 85 (modified). See D. Čyževsky, *A History of Ukrainian Literature* (Littleton, Colo., 1975); G. Grabowicz, *Toward a history of Ukrain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1981). 2. D. Doroshenko, *A Survey of Ukrainian History* (Winnipeg, 2nd edn. 1975); R. Szporluk, *Ukraine, a brief history* (Detroit, 1982); R. Magocsi, *Ukraine: a historical atlas* (Toronto, 1985); O.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Toronto, 1988).

USKOK 1. Catherine Wendy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 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driatic* (Cornell, Ithaca, 1991).

USURY 1. See J. Shatzmiller, *Shylock Reconsidered: Jews, Moneylending and Medieval Society* (Berkeley, Calif., 1989), reviewed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6/21–2 (18 Jan. 1990). 2. K. B. McFarlane, 'Loans to the Lancastrian Kings: The Problem of Inducement',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9 (1947–9), 57–68.

UTOPIA 1. Sir Thomas More, *Utopia*, trans. Raphe Robynson, 1552 (Cambridge, 1879) (17th repr., 1952). 2. See Isaiah Berl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Oxford, 1979); also H. Hardy (ed.), *The Crooked Timbers of Humanit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1991). 3. Vercors, *Le Silence de la mer, et autres récits* (Paris, 1951), 19–43. 4. K. Moczarski, *Rozmowy z katem*, trans. as *Conversations with an Executioner* (London, 1974).

VALTELLINA 1. See Geoffrey 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1972). On Sfurzat wine, see G. Dalmass, 'The Wines of Italy', *The Great Book of Wine* (Lausanne, 1970), 221.

VENDANGE 1. See E. Le Roy Ladurie,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le* (Paris, 1967), trans. as *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 (New York, 1971); H.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82); also Sir Crispin Tickell, 'Climate and History', Radcliffe Lecture (Oxford, 1994). 2. Le Roy Ladurie, *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ch. 2. 3. Ibid. ch. 3, 'Problems of the Little Ice Age'.

VENDÉMIAIRE 1. H. Morse Stephens,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9–1815* (London, 1936), app. vi: 'Concordance of Republican and Gregorian Calendars', 374–5.

VINO 1. J.-F. Gautier, *Histoire du Vin* (Paris, 1992). See also H. Warner Allen, *A History of Wine* (London, 1961). 2. Gautier, op. cit. p. 99. 3. Hugh Johnson, *World Atlas of Wine* (London, 1971), p. 191.

VIOLETS 1. D. Ackerman, 'Smell', in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London, 1990), 3–63. 2. See 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urs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Leamington Spa, 1986). 3. S. Ferenczi, *Thalassa: A Theory of Genitality* (1938; repr. London, 1989).

VLAD 1. M. Cazacu, 'Il Potere, la Ferocitá, e le Leggende di Vlad III, Conte Dracula', *Storia* (Firenze), iii, no. 15, 10–16; see also C. Leatherdale, *The Origins of Dracula: the background to Bram Stoker's Gothic masterpiece* (London, 1987); A. Mackenzie, *A journey into the past of Transylvania* (London, 1990); S. Pascu, *A History of Transylvania* (Detroit, 1982). 2. John Foxe, *The new and complete Book of Martyrs, or an universal history of martyrdom*, revised & corrected (London, 1811–17).

VORKUTA 1. See Paul Hollander, 'Soviet Terror, American Amnesia', *National Review*, 2 May 1944, 28–39. 2. J. Scholmer, *Vorkuta* (London, 1954); Edward Buca, *Vorkuta* (Constable, London, 1976); also Bernard Grywacz, interviewed by Caroline Moorhead, 'Out of the Darkness', *Independent Magazine*, 26 Jan. 1991. 3. Avraham Shifrin, *The First Guidebook to the Prisons and Concentration Camps of the Soviet Union* (Seewis, GR, Switzerland, 1980), 2nd edn. (London, 1981); on Vorkuta, pp. 203–9. See also R. Conquest, *Kolyma: the Arctic Death Camps* (London, 1978). 4. Shifrin, op. cit. 31–5. 5. Personal visit, Oct. 1991. 6. '80,000 ghosts return to haunt Moscow', the *Independent*, 6 Sept. 1989.

WASTE LAND 1. T. S. Eliot, *The Waste Land: 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 of the Original Drafts with the Annotations of Ezra Pound*, ed. Valerie Eliot (London, 1971), 5, 135, 145, 148, 1.

WIENER WELT 1. Stephen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1867–1938: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1989), esp. 34–7. 2. Ibid. *passim*. 3. Martin Freud, 'Who Was Freud?', in J. Fraenkel (ed.), *The Jews of Austria: Essays on Their Life, History and Destruction* (London, 1967), 197–211. 4. Joseph Roth, quoted by R. S. Wistrich, *The Jews of Vienna in the Age of Franz-Joseph* (Oxford, 1990). 5. Rabbi Güdemann to Kamilla Theimer, 19 Dec. 1907, quoted by J. Fraenkel, 'The Chief Rabbi and the Visionary', in Fraenkel, *The Jews of Austria*, 115–17.

XATIVAH 1. See David Hunter, *Papermaking: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 (London, 1947); also J. Dąbrowski and J. Siniarska-Czaplicka, *Rękodzieło papiernicze* (The Papermaking Craft) (Warsaw, 1991), with extensive English summaries.

ZADRUGA 1. Maria Todorova, 'Myth-Making in European Family History: The Zadruga Revisite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4(1) (1991), 30–69.

ZEUS 1. M. J. Price, 'The Statue of Zeus at Olympia', in P. Clayton and M. J. Price,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London, 1988), 59–77.

附录三

"概要介绍"一览表

（原书附录Ⅰ）

附录四

图片鸣谢说明

（原书附录 II）

SECTION 1 (*between pages* 430–1) [1205]

1. EUROPA'S RIDE. *Il ratto dell'Europa.* Hellenistic fresco from 'the House of Jason', Pompeii. First quarter of the 1st century AD. Both Greeks and Romans treasured the legend of Europa. Museo Nazionale, Naples.
   Photo: Anderson/Alinari 23469.

2. GATHERERS AND HUNTERS. A composite drawing based on palaeolithic cave art from Teruel and Cogul (Lerida), Spain. Male and female figures combine to present an evocative reconstruction of a sophisticated social order frequently dismissed as that of 'cavemen'.
   Drawing by Danyon Rey 1993.

3. MINOAN FISHERMAN. 2nd millennium BC,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Photo: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4. PRINCE OF KNOSSOS. Late Minoan. Minoan Crete was unfortified, and possessed no warrior caste. Heraklion Museum.
   Photo: Ancient Art & Architecture Collection.

5. SYMPOSION—A BANQUET. Greek vase-painting by the Brygos painter (490–480 BC). The 'symposium' provided the setting both for eating, drinking, and love-making and for serious conversation. The men reclined on couches in the oriental fashion. Women and boys did not attend except for the purposes of entertainment.
   Photo: British Museum BM E 60.

6. ETRUSCHERIA. Mural from the Tomb of the Banquet, Tarquinia (*c.*470 BC). See [**ETRUSCHERIA**].
   Photo: Hirmer Fotoarchiv BM E 60.

7. ARCADIAN IDYLL. *Et in Arcadia ego* (1639–43), Nicholas Poussin, bought by Louis XIV in 1683.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rcadia was the land of pastoral bliss. In Poussin's famous development of an idea by Guercino, a group of pensive shepherds and nymphs examine the tomb of Daphnis, who died of love, thereby discovering that 'Even in Arcadia, I (Death) am to be found'. Louvre.
   Photo: © RMN.

8. SABINE RAPE. *Les Sabines* (1796–9) by Jean-Louis David. As recounted by Livy and Ovid, one of the favourite tales of early Rome tells how King Romulus organized a festival at the Circus Maximus in order to ensnare the women of the neighbouring Sabine tribe. David's heroic rendering shows Roman matrons intervening to stop the

bloodshed on a background reminiscent of the Bastille. It earned him the label of 'the Raphael of the Sansculottes'. Louvre.

Photo: © RMN.

9. DEATH OF SIEGFRIED. An episode from the 5th-century Legend of the Nibelungen: Julius Schnorr von Carolsfeld (1794–1872): *Hagen ermordet Siegfried (Hagen killing Siegfried)* (1845). Hagen surprised Siegfried drinking at the spring, and pierced his magical protection. Munich was the capital of King Ludwig II of Bavaria, patron of Richard Wagner, who popularized the nationalistic revival of pagan Germanic folklore. Koenigsbau, Munich. See [**NIBELUNG**].

Photo: AKG, London.

10. ATTILA INVADES ROME, AD 452. Ulpiano Checa y Sauz (1860–1916), *The Fall of Rome* (1891). Many pictures of this genre, which lionize the barbarian heroes, say as much about the nineteenth-century revolt against classical taste as about ancient history.

Photo: © Hulton Deutsch Collection.

11. EASTERN ORTHODOXY. Christ Pantakrator flanked by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 (r. 1042–55) and the Empress Zoe at the time of the Church Schism (1054): 11th-century mosaic. The Byzantine tradition stressed the union of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uthority. Hagia Sophia, Istanbul.

Photo: Foto Fabbri.

12. WESTERN MONASTICISM. St Benedict and the Abbey of Monte Cassino, founded *c.*529. 11th-century miniature. The first great Western monastery, founded by Europe's Patron Saint, survived intact until 1944.

Vatican Photographic Archive. Vat. Lat. 1702 IIr.

13. CONSTANTINE'S DONATION. The medieval legend that the Pope's temporal powers were donated by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I, illustrated in a fresco (AD 1246). The legend was unmasked as a papal forgery during the Renaissance. San Silvestro, Rome.

Photo: Foto Fabbri.

14. THE SLAVONIC LITURGY. Alphonse Mucha, *Zavedeni slovanska liturgie* (1910). A late Romantic view of an event in the 9th-century mission of SS Cyril and Methodius to Moravia: the first of Mucha's series illustrating scenes from Czech history. City Gallery, Prague.

Photo: State Gallery, Prague.

15. CATHOLIC PIETISM. Enguerrand Quarton, *La Pietá de Villeneuve-les-Avignon* (1444–66). An express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 Mary's 'Lamentation of Christ' from 15th-century Provence. Louvre.

Photo: © RMN.

16. ST AUGUSTINE. *St Augustin et les patrons de Marchiennes* (12th-cent.) miniature.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ouai.

Photo: Photo Giraudon.

17. ST CHARLEMAGNE. A. Dürer, *Karl der Grosse* (1512).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18. ST MATTHEW. A full-page illumination on folio 25h of the Lindisfarne Gospels (late 7th century, Northumbria).
    British Library, BL Cott. Nero Div. 25v.

19. SS JOHN THE BAPTIST AND JEROME. By Masolino, c.1383.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20. MATKA BOSKA 'The Mother of God'. (14th-century.) The Black Madonna of Częstochowa, Poland, an icon of Byzantine origin or possibly a copy ordered by King Władysław Jagiełło. See [**MADONNA**].
    Photo: Polish Cultural Institute, London.

21. ST JOHN THE THEOLOGIAN. The dictation of the Gospel to Prokhor (Italo-Cretan School, early 17th century). Crete, which was ruled by Venice until 1669, saw an inimitable blending of Orthodox and Catholic styles. See [**GRECO**].
    Photo: Sotheby's, London.

22. ST. LUKE—ICON PAINTER. According to Orthodox tradition, the first icon was painted by St Luke, when he drew the Virgin Mary from life. (17th-century icon from the Church of St Luke, Opachka, Pskov, Russia: restored.)
    Photo: Church of St Luke, Pskov, Russia.

23. BOGORODICA. The Virgin of Pelagonitissa: a Serbian icon of the Holy Mother and Child (14th-century) from Skopje, Macedonia.
    Photo: AKG, London.

24. HOMAGE TO OTTO III. The four lands of Europe—Slavonia, Germany, Gaul, and Italy—offering homage to an Emperor who sought to re-unite East and West. Otto III's Gospels, Bamberg (c. AD 1000).
    Photo: Staatsbibliothek, Marburg.

25. ENGLAND CONQUERED. The Death of King Harold at Hastings, AD 1066. Detail from the late 11th-century *Tapisserie de la Reine Mathilde*, known in English as the Bayeux Tapestry. The 58 panels of this early example of strip cartoon art relates the Norman version of events, including King Harold's alleged treachery and Duke William's consequent claim to the English throne.
    Photo: Michael Holford.

26. WENDISH CRUSADE. L. Tuxen, *The Fall of Svantevit* (1894).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agan idols of the Slavs during the Wendish Crusade (12th century). Such scenes attended the 'advance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Caesar's felling of the druidical grove at Marseilles to the final baptism of the Lithuanians in 1386. Fredericksborg, Copenhagen.
    Photo: Fredericksborg, Copenhagen.

27. TRUCE IN THE RECONQUISTA. 12th-century miniature from *El libro de Juegos de Ajedrez.* A Christian and a Moslem warrior play chess. Escorial, Spain.
    Photo: Arxui Mas.

28. TRISTAN'S LAST SONG. Miniature (*c.*1410) from the *Roman de Tristan.* From its origins in 6th-century Cornwall to Wagner's opera of 1859, the tragic love story of Tristan and Isolde was recounted in numberless versions. See [**TRISTAN**].
    Photo: Austrian Nat. Library, Vienna, MS 2537.

29. IRON PLOUGH. 'March' from *Les Tré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 (early 15th-century). The heavy horse-drawn plough was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 of the medieval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Musée Condé, Paris. See [**PLOVUM**].
    Photo: Photo Giraudon.

30. SCENT OF THE STAG. 'Tracking' from Gaston de Foix, *Le Livre de la Chasse* (late 14th-century). Until recent times, the art of hunting was a mainstay of Europe's diet and nourishmen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MS Français, 616 fol. 57v. See [**CHASSE**].
    Photo: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31. DANTE IN LOVE. H. Holiday, *Dante and Beatrice* (1883). A popul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ment on the banks of the Arno in Florence which was to inspire Europe's greatest poem. Beatrice Portinari, who died in 1290, was adopted by Dante as his spiritual guide through Paradise.
    Photo: Walker Art Gallery, Liverpool, no. 3125.

32. BARTOLOMEA IN A DILEMMA. 'Dioneo's Tale' from Boccaccio's *Decameron*: 15th-century miniature. The neglected wife of a Pisan judge, Bartolomea, goes off on pilgrimage, where she is seduced by the pirate, Paganino da Nare (*left*). On reflection, however, she chooses to live with the pirate (*right*).
    Photo: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Paris. Arsenal 5070 fol. 91v.

33. ST FRANCIS BLESSES THE BIRDS. Fresco (1295–1300) by Giotto. The patron saint of animal lovers, St Francis was also a social radical whose devotion to poverty and non-violence challenged many of the reigning assumptio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Church of San Francesco, Assisi.
    Photo: AKG, London.

34. KING CASIMIR GREETS THE JEWS. Wojciech Gerson (1831–1901), *Kazimierz Wielki i żydzi* (*c.*1890). This late Romantic painting celebrates the expansion of Europe's largest Jewish community at the time of the Black Death, when large numbers of Jews took refuge in Poland from persecution in Germany. Museum Narodowe, Warsaw.
    Photo: H. Romanowski, Museum Narodowe, Warsaw.

35. PICARO. Hieronymus Bosch, *The Vagrant.* Rural poverty, vagrancy, and fugitive serfs constituted one of the perennial social ills of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See [**PICARO**].
    Photo: Museum Boymans van Beuningen, Rotterdam.

36. MARCO POLO.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sets sail for China from the Grand Canal, AD 1270. Miniature, *c.*1400. Europe's voyages of discovery began long before the age of Columbus.

   Photo: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Bod. 264 f. 218.

37. WESTERNER AS EASTERNER. Jean-Etienne Liotard, *Portrait de Richard Pococke* (*c.*1738–9).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Sublime Porte painted in Ottoman dress, overlooking the Bosporus.

   Photo: © Musée de l'Art et d'Histoire, Geneva.

SECTION 2 (*between pages* 942–3)

38. VENUS. Lucas Cranach, *Venus restraining Cupid* (1509). Cranach's full frontal female nude crowned the long process of artistic defiance, initiated by Donatello's bronze *David* (*c.*1434), which broke the medieval taboo against nudity, thereby reviving interest in the human body.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39. PERSPECTIVE. Piero della Francesca, *The Flagellation* or *The Dream of St Jerome* (*c.*1460). A profoundly enigmatic work by an artist experimenting both with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visual symbolism. Galleria Nazionale, Urbino. See [FLAGELLATIO].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40. ALLEGORY. Antoine Caron (1521–99), *L'Empéreur Auguste et la Sibylle de Tibur* (*c.*1575). In an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 paganism of the Ancient World with Christianity, Caron portrays the Roman Sibyl prophesying to the Emperor Augustus about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and the Birth of Christ. Louvre. From the court of Henri III.

   Photo: Photo Giraudon.

41. COLUMBUS LANDS AT SAN DOMINGO, 1493. F. Kemmelmeyer, *The First Landing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800–5). An evocation of a moment now described not as a 'discovery' but as an 'encounter'.

   Photo: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42. LUTHER ENTERS WORMS, 1521. R. Siegard, *Die Rede Martin Luthers von dem Reichstag in Worm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scene on the day which was to split Catholic Europe, and launch the Reformation.

   Photo: Stadtarchiv, Worms.

43. DREAM OF EMPIRE. El Greco, *The Adoration of the Name of Jesus* (*c.*1578): an autographed version of a larger picture in the Escorial, Spain, known as *The Dream of Philip II.* The kneeling figures of the King of Spain, the Pope, and the Doge of Venice embody the ultra-Catholic mission of the Holy League whose forces defeated the Turks at Lepanto in 1571, thereby saving Europe from the jaws of Hell.

   Photo: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44. VISION OF PAST GLORY. J. Matejko (1838–93), *Bathory at Pskov* (1872). A nostalgic Romantic painting recalling the occasion in 1582, when the King of Poland receiv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Russian *boyars.*

   Photo: Royal Castle, Warsaw.

45. THE BOARD OF GOVERNORS. Frans Hals, *Regentessen Dude Mannenhuis* (*The Regentesses of the Old Men's Almshouse*) (1664). A portrait of corporate pride showing the lady governors of a Dutch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 parallel portrait of *The Regents* bears the same date.

Photo: © Frans Halsmuseum, Haarlem.

46. MOSCOW HOLIDAY. A. P. Riabushkin (1861–1904), *A Seventeenth Century Moscow Street on a Holiday* (1895). This lively scene from old Moscow shows a cross-section of Muscovite society, from the haughty black-bearded *boyar* to the blind beggar, wending their way home from church through the muddy streets.

Photo: SCR Photo Library.

47. SUN KING AS PATERFAMILIAS. J. Nocret (1615–82), *Louis XIV en famille* (c.1680). Louis XIV participated in all the masques and galas of the Court, in this scene putting his entire family into classical dress. Musée de Versailles.

Photo: © RMN.

48. TROUSERLESS PHILOSOPHER. Jean Huber (1721–86), *Le Lever de Voltaire* (c.1770). Voltaire changing from his nightclothes whilst dictating to a secretary: one of a series of intimate scenes from Ferney, painted by Voltaire's Swiss friend and savant. Musée Carnavalet.

Photo: Giraudon.

49. MASTER OF THE CONTINENT. A. J. Gros, *Napoléon à Eylau* (1808). One of the less sycophantic portrayals of a Napoleonic battle scene, this one at Eylau (Iława) in East Prussia, 8 February 1807. Louvre.

Photo: © RMN.

50. LORDS OF THE SEA. C. van Wiermigen, *Het ontploffen van het Spaanse admiraalschip* (*The explosion of the Spanish Admiral's Flagship, 25 April 1607*). Dutch naval supremacy, which underpinned the successful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against Spain, was not seriously challenged until the rise of England's Royal Navy in the later 17th-century.

Photo: © Rijksmuseum, Amsterdam.

51. INFANTA IN PINK. Diego Velazquez, also attributed to Mazo, *Infanta Margarita* (1664). A child portrayed as a miniature adult. Other versions of the same portrait can be found in Vienna and in Kiev. Prado, Madrid.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52. READER AND LISTENER. Hubert Gravelot, *Le Lecteur* (c.1740). Marble Hill House.

Photo: English Heritage.

53. MOTHER. J. Rembrandt, *The Artist's Mother* (1639). Neeltje Willemsdochter van Zuydhoeck painted by her son in the last year of her life.

Photo: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54. SUMMER. G. Arcimboldo, *Estate* (1573). One of four such pictures ordered by the Emperor Maximilian II as a gift for the Elector of Saxony. In a later series of 'composed heads' Arcimboldo used the Emperor Rudolph as model. Louvre, Paris.
Photo: © RMN.

55. ROYALIST. P. N. Guerin, *Henri de La Rochejacquelein* (1817). A heroic portrait of the Vendéan leader painted after the Restoration.
Photo: Musée de Cholet.

56. REPUBLICAN. A. Cambron, *La République* (1798). A personification of republican France painted one year before Napoleon's coup d'état and a whole generation before similar images attracted the name of 'Marianne'.
Photo: Musée de Montaubon.

57. THE CHILDREN'S FRIEND. This picture of Stalin embracing a young admirer at th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of 1938 at the height of the purges was widely reproduced by Soviet propaganda agencies. It even inspired a public statue erected in Moscow. The girl, Gelya Sergeyevna, learned much later that her father had been shot on Stalin's orders, and that her mother had been cast into the Gulag for enquiring about his fate.
Photo: David King.

58. KNIGHT IN SHINING ARMOUR. H. Lanzinger, *Adolf Hitler als Ritter* (*c.*1939). The Nazis' search for *Lebensraum* in the East was often seen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medieval *Drang nach Osten* and the campaigns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Photo: AKG, London.

59. ETERNAL WANDERER. C. D. Friedrich, *Wanderer above the clouds* (1818). The supreme image of the Romantic spirit.
Photo: © Elke Walford, Hamburger Kunsthalle.

60. DYNAMO. J. M. W. Turner, *Rain, Steam and Speed* (1844). A pioneering example of Impressionism, and the supreme imag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s obsessions both with Nature and with Mechanical Power.
Photo: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61. NO SURRENDER, 1831. W. Kossak (1856–1942), *Sowiński on the Ramparts of Wola* (1922). Facing the Russian assault on Warsaw, the Napoleonic veteran, General Józef Sowiński, ordered his men to fix his wooden leg in the ground, resolving never to bow down to tyrants.
Photo: Museum Wojska Polskiego, Warsaw.

62. FREE HELLAS. Ch. Perlberg, *Popular festivities at the Olympeion in Athens, 1838.* This scene from the newly independent Kingdom underlines both Greece's Classical heritage and her legacy of four centuries of Ottoman rule.
Photo: 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 Athens.

63. MUSICAL EVENING. J. Danhauser, *Liszt am Flugel* (1840). From the left: Alfred de Musset (or Alexandre Dumas), Victor Hugo, Georges Sand, N. Paganini, Gioacchino Rossini, Marie d'Agoult. Nationalgalerie, Berlin.
Photo: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64. CONCERT OF EUROPE. A. von Wern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 (1881). From the left: Count Karolyi (Austria), Prince Gorchakov (Russia), Benjamin Disraeli (Britain), Count Andrassy (Hungary), Chancellor von Bismarck (Germany), Count Shuvalov (Russia), Mehmet Ali (Ottoman Empire). Staatlichen Museum, Berlin.
   Photo: AKG, London/Berlin.

65. RURAL POVERTY. J.-F. Millet, *Les Glaneuses* (*The Gleaners*) (1857). The summer countryside of Normandy seen by a master of French realism.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66. INDUSTRIAL GRIME. L. S. Lowry (1887–1976). Though painting in the mid-20th-century, the Lancashire artist evoked a quaint and anachronistic vision of the early industrial landscape, which had all but disappeared.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67. IMPRESSIONIST. Claude Monet (1840–1926), *The Seine at Bougival* (1869).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uburban Paris painted by a young Monet taking his first cautious steps into Impressionism. See [**IMPRESSION**].
   Photo: The Currier Gallery of Art, Manchester, New Hampshire.

68. PRIMITIVE. Henri Rousseau (1844–1910), *War* (1894). One of the vivid, dream-like images of 'Le Douanier' Rousseau, instinctively produced by a naïve artist in the era of Freud's discovery of the subconscious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great European peace. Musée d'Orsay, Paris.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69. SURREAL. P. Blume, *The Eternal City* (1937). A dislocated vision of Rome from the years when Mussolini sought to build a new Roman Empire and when Eliot's *Waste Land* suggested that European civilization had been shattered. See [**WASTE LAND**].
   Museum of Modern Art, Guggenheim Fund, New York.
   © Estate of Peter Blume/DACS, London/VAGA, New York 1997

70. EUROPE DECEIVED. A. Vasilev, *They are Writing About Us in Pravda* (1951). A practitioner of Stalinist 'Socialist Realism' presents an idyllic imaginary scene from a collective farm in Moldavia. In reality, Moldavia's population had been purged and repressed after the Soviet invasion of 1940, and the peasantry collectivized by force. Private Collection. See [**MOLDOVA**].
   Photo: Museum of Modern Art, Oxford.

71. EUROPE DIVIDED. Sigmar Polke, *Watch Tower with Geese* (1987–8). An image of the Iron Curtain painted two years before its collapse by a German who had himself escaped across 'the Wall' in 1953. On the left, in the East, a concentration camp: in the West, floating consumer *kitsch*.
   Photo: © 1994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72. EUROPE IN TORMENT. Marc Chagall (1889–1985), *White Crucifixion* (1938). The central symbol of Christian Europe is overlain with Jewish imagery: painted by a Russian Jewish exile to Western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1993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 1994 DACS, London.

附录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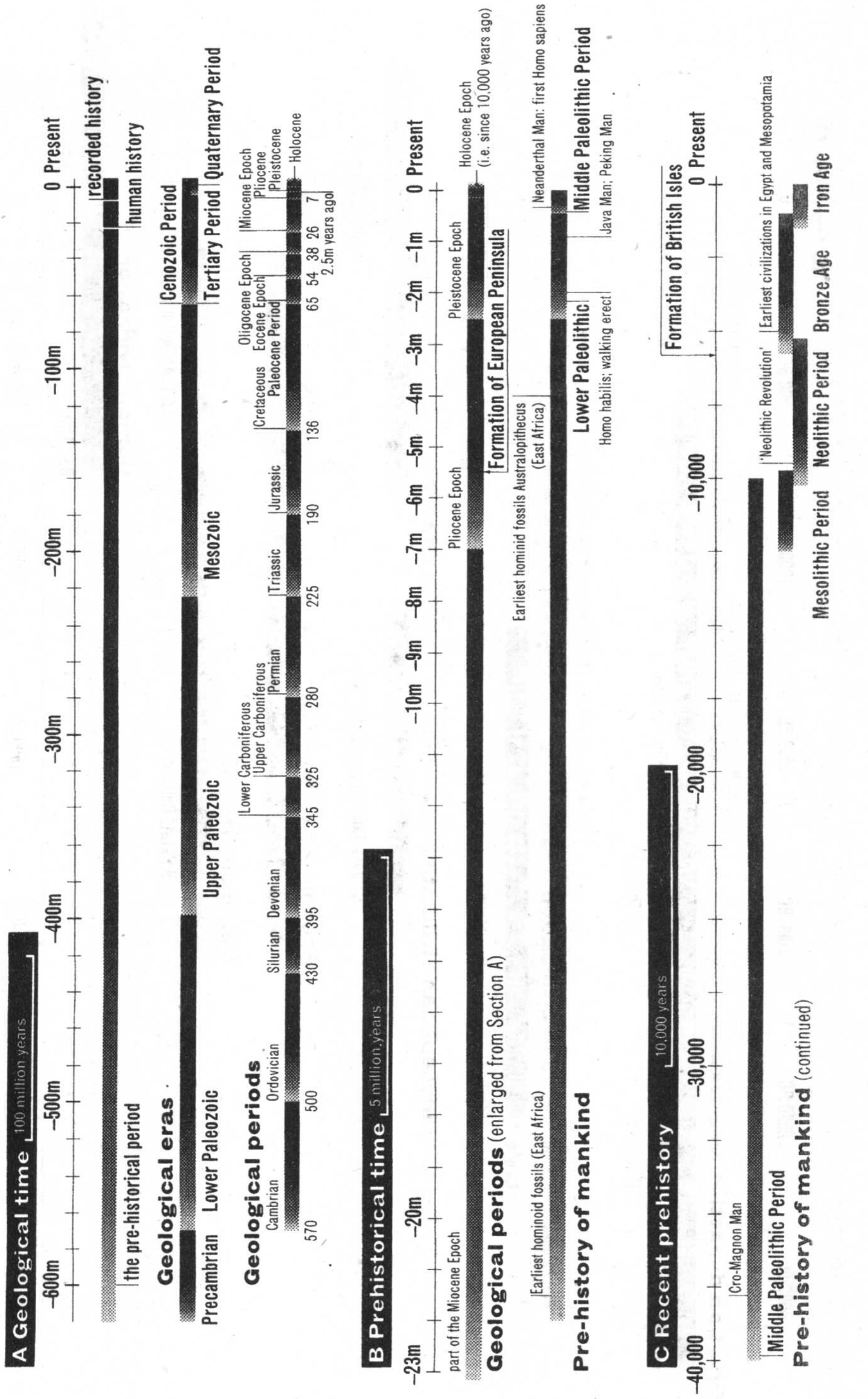
历史图解简编

（原书附录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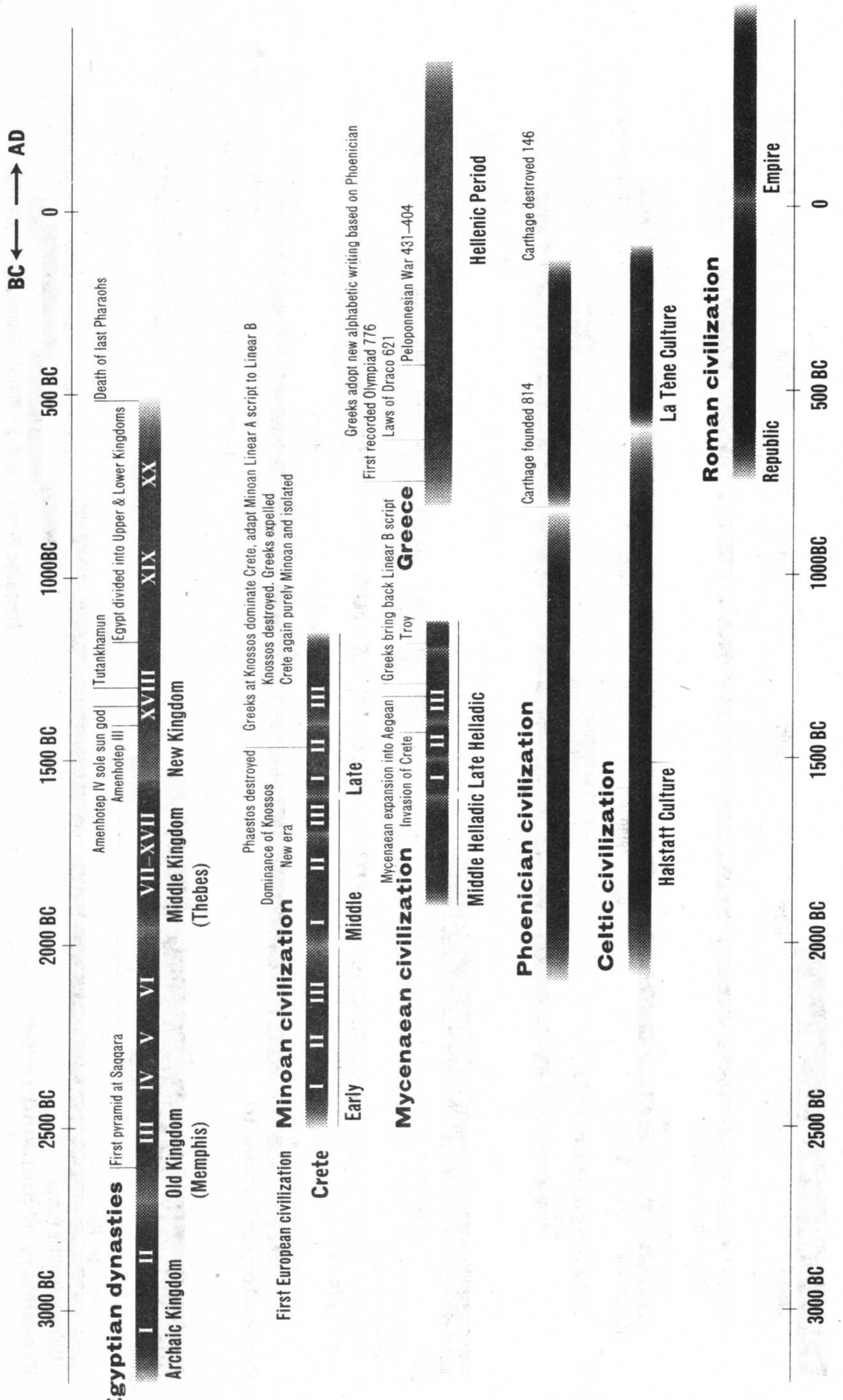
[1213]

G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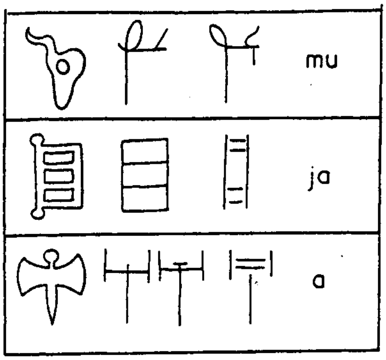
[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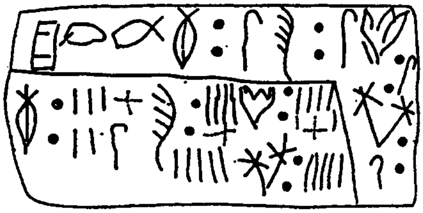
[1216] Ancien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s: Periodization



Minoan Scrip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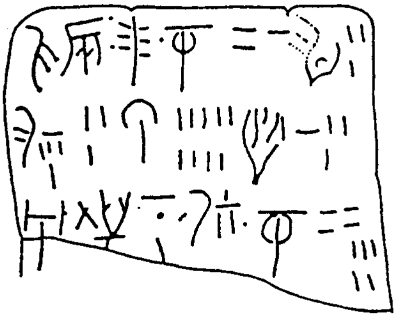


a. The evolution of Aegean writing (left to right): hieroglyphic, Linear A, Linear B, sound va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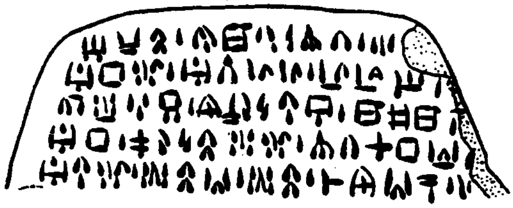
b. Stage I: 'pictographic' or 'hieroglyphic', from *c.*2000 BC: a hieroglyphic tablet from Phaistos, Crete.

J.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Pelican), 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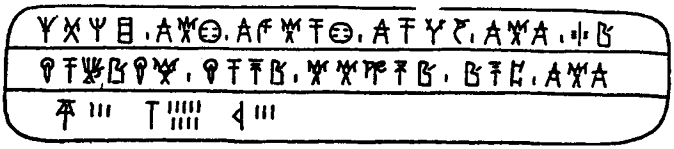
c. Stage II/1: Linear A (undeciphered), from + 1750 BC: tablet from Hagia Triada no. 114

J.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Pelican), 1961



d. Stage II/2: The Cypriot syllabary: fragment of a clay tablet from Enkomi, *c.*1200 BC

J. Chadwick, *Linear B and Related Script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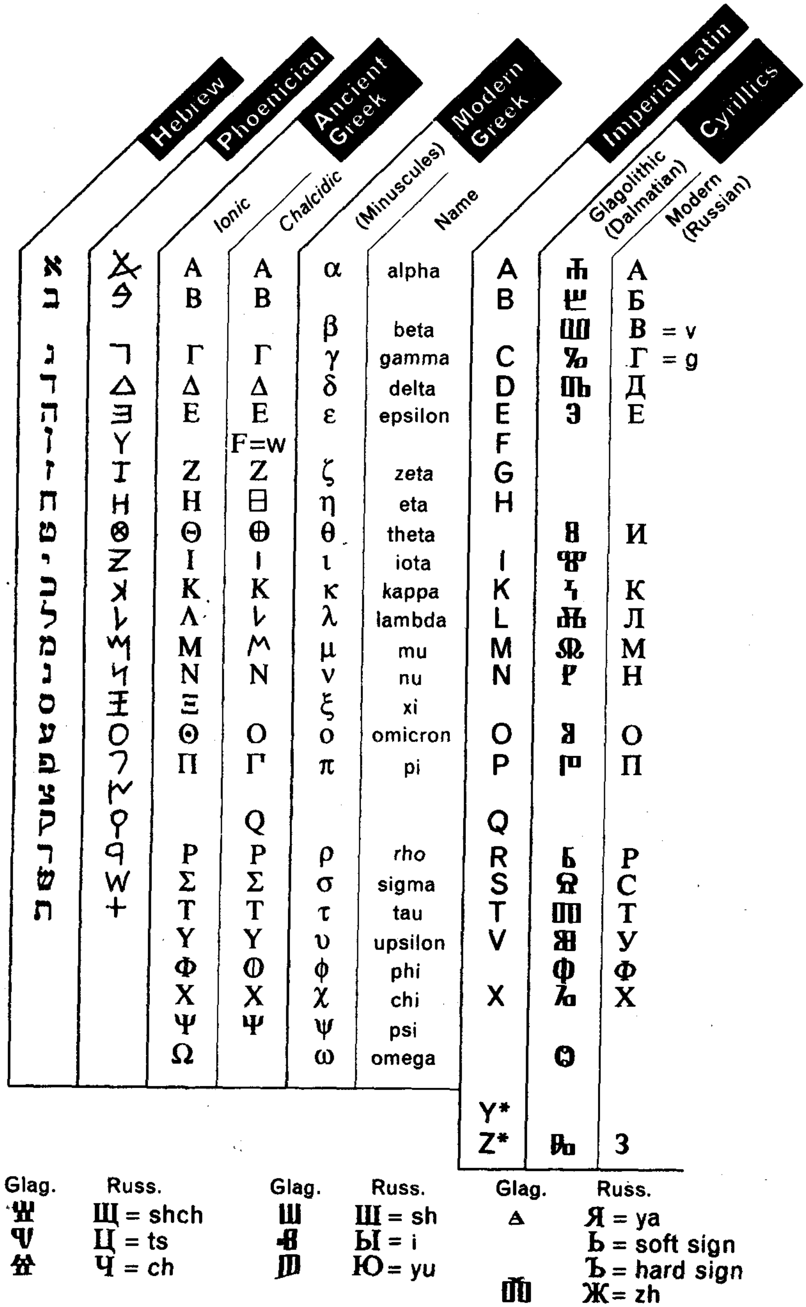
e. Stage III: Linear B, found both on Crete and in Mycenaean Greece. Like modern Japanese *kanji* and *kana*, it contained a mixture of pictographic and syllabic signs. Linear B tablet from Pylos, with proto-Greek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Hiereia echei-que, euchetoi-que etonion echeen theon, ktoinoochons-de ktionaon kekeimenaon onata echeen. (Tossonde spermo) WHEAT 3–9–3.'

'This the priestess holds, and solemnly declares that the god has the true ownership, but the plot-holders the enjoyment, of the plots in which it is laid out. (So much seed) $3^{57}/_{60}$ uni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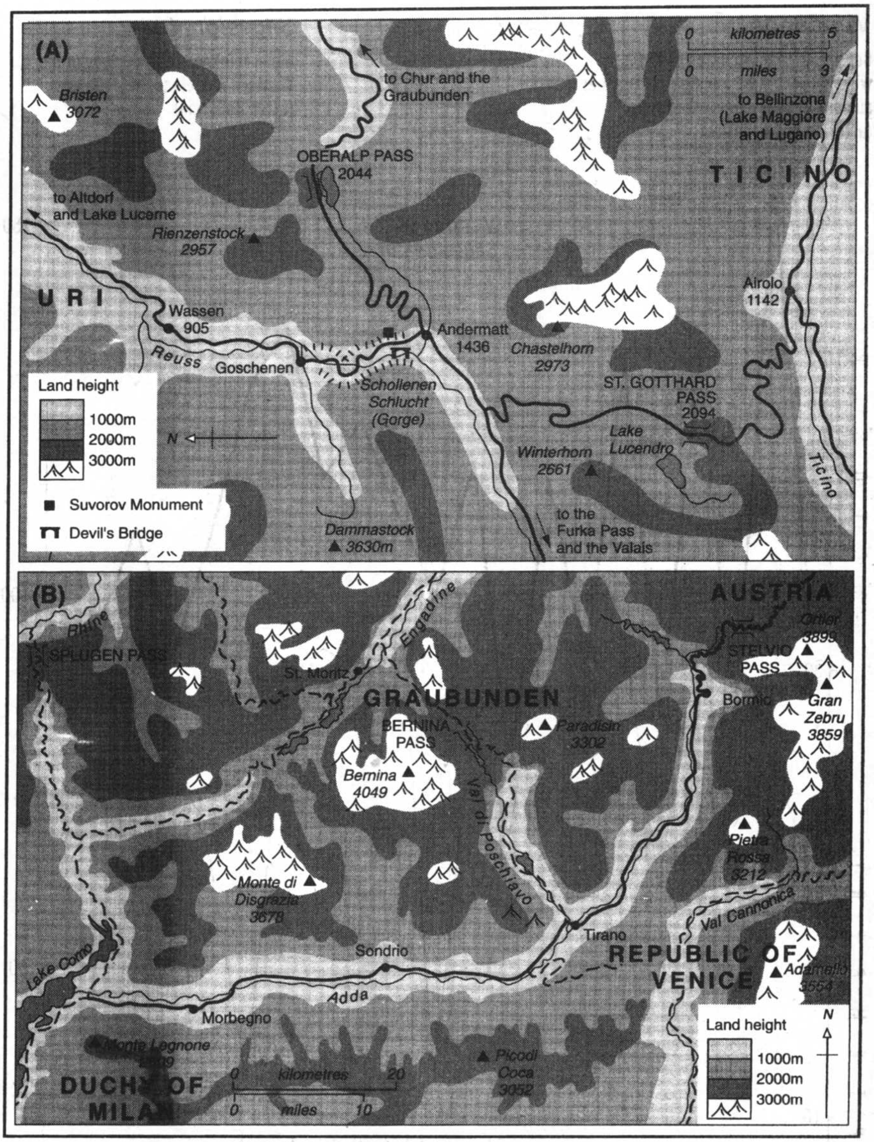
Leonard Cottrell, *The Bull of Minos* (Athens, 1982)

[1218] European Alphabets



* Introduced after 100 BC for foreign words only.
Imperial Latin did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I and J, or V and U. There was no W.

Crossing the Alps: The St Gotthard Pass and the Valtellina [1219]



(A) The St Gotthard Pass; (B) The Valtellina (17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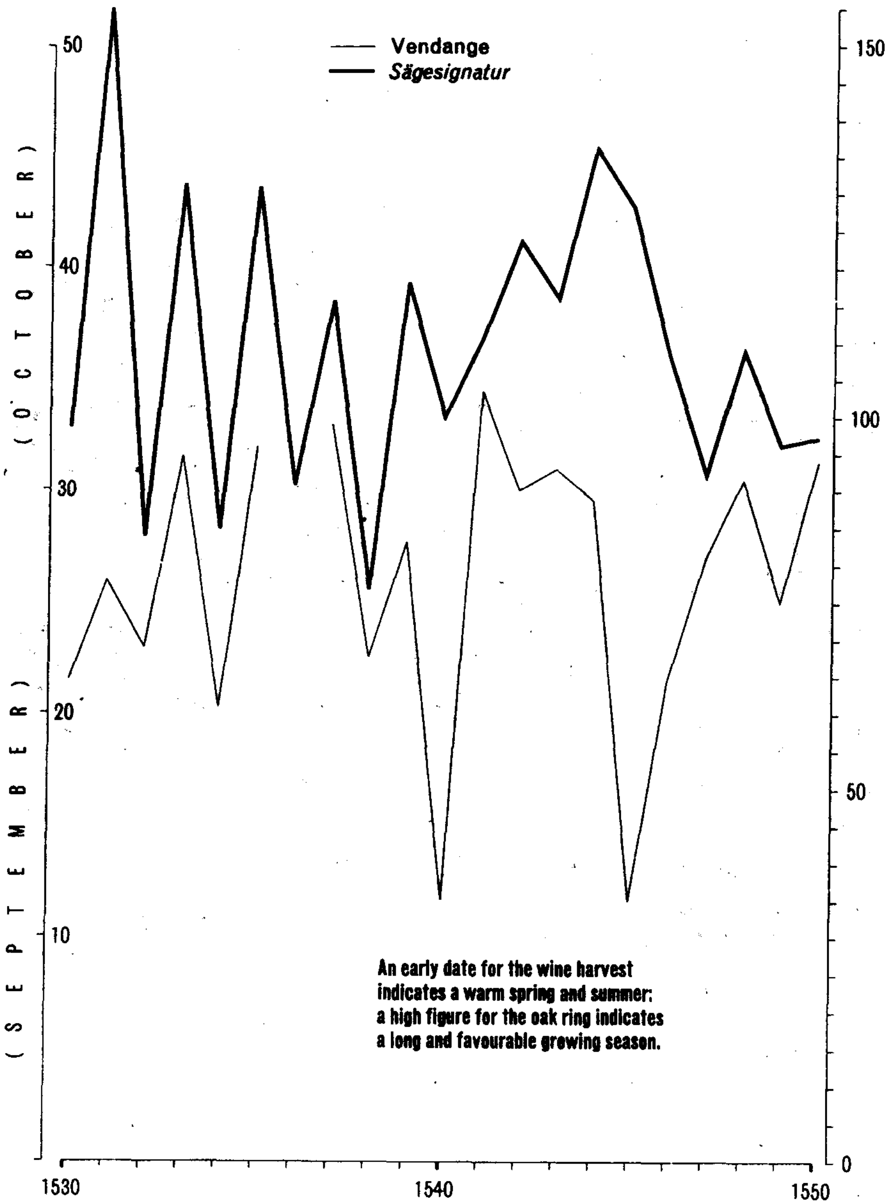
[1220] Phenology and *Sägesignatur*: Indices of Historical Climatology, 1530–50

Vend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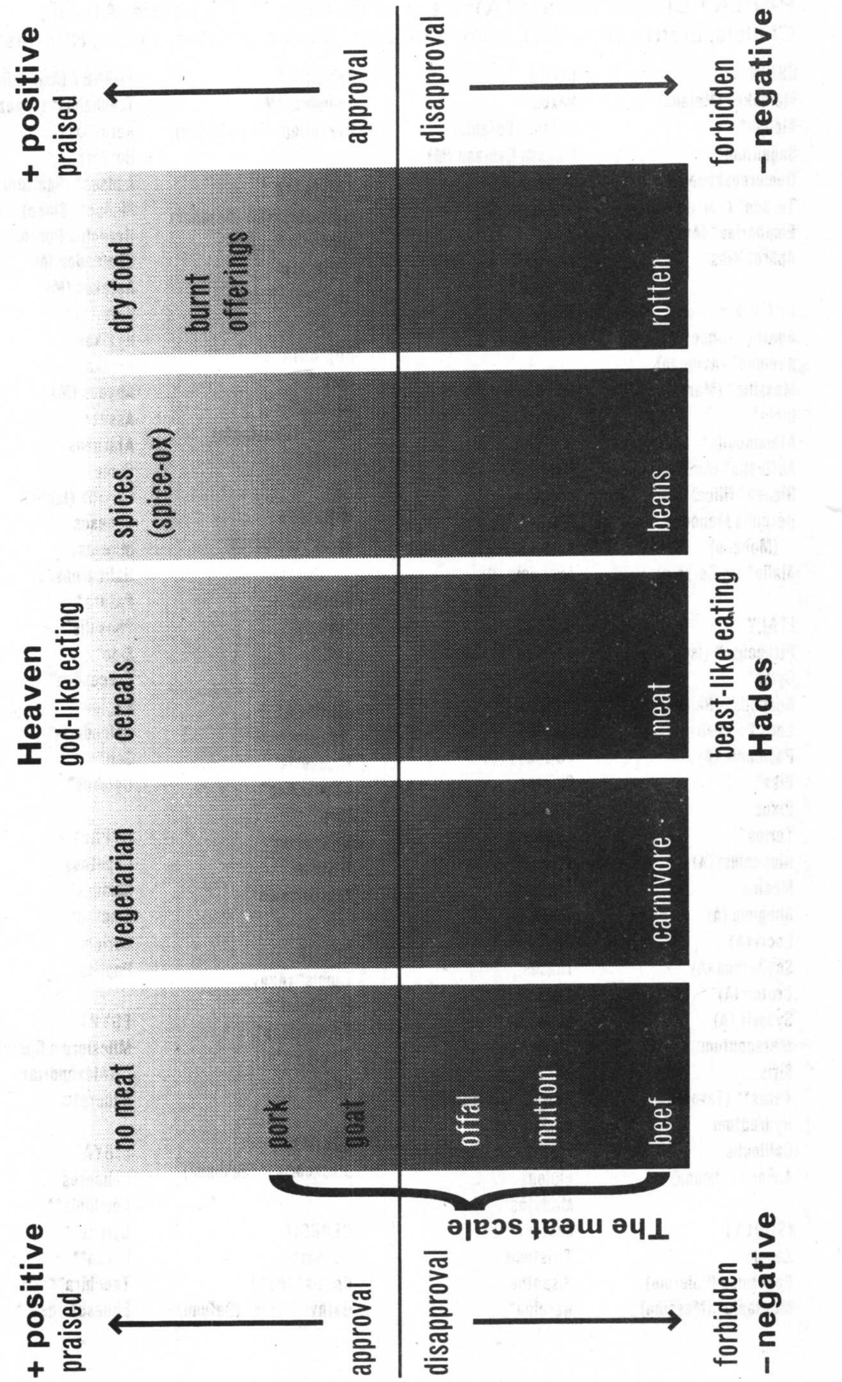
Consolidated mean dates of the wine harvest in NE and Central France: number of days after 1 September (after Le Roy Ladurie)

Sägesignatur

Mean thickness of oak rings in the Western Rhineland, in 1/100 mm (after Hellstein)



Spice-Ox: The Pythagorean Classification of Foods [1221]



[1222] Ancient Greek Colonies, with their Contemporary Locations

PARENT CITIES. Achaea (A); Megara (M); Corinth (C); Locris, Athens, Chalcis, Eretria. (Ionia)*; Lesbos, Phocæa, Samos, Miletus, Thera, Rhodes**.

SPAIN
Mainake* (Malaga)
Alonae*
Saguntum*
Hemereoskopeion*
Taraco* (Tarragona)
Emphoriae* (Amporias)
Aphrodisias*

FRANCE
Agathe* (Agde)
Avennio* (Avignon)
Massilia* (Marseille)
Olbia*
Athenopolis*
Antipolis* (Antibes)
Nicaea* (Nice)
Herculis Monoeci* (Monaco)
*Alalia** (in Corsica)

ITALY
Pithecusa* (Ischia)
Cyme*
Neapolis* (Naples)
Laus Pompeii
Posidonia (A)
Elea*
Pixus
Terina
Hipponium (A)
Medina
Rhegium (A)
Locri (A)
Scylletium (A)
Croton (A)
Sybaris (A)
Metapontum
Siris
Taras** (Tarento)
Hydruntum
Callipolis
Ancona (Ancona)

(SICILY)
Zancle
Panormus (Palermo)
Messania* (Messina)
Lipara
Naxos
Catana (Catania)
Megara Hyblaea (M)
Syracusa (C)
Camarina (C)
Gela**
Acragas** (Agrigento)
Himera*
Selinus (M)
Lilybaeum

EASTERN ADRIATIC
Tragyrium
Epetium
Issa
Pharos
Lissus
Epidamnus (C) (Durres)
Apollonia (C)

GREECE
Corcyra (C) (Corfu)
Leucas (C)
Ambracia
Mende*
Potidaea (C)
Olynthos
Torone*
Acanthos
Stagiros
Amphipolis
Neapolis
Crenides
Thasos*
Abdera
Lemnos
Chios

TURKEY (in Europe)
Ainos
Kardia
Elaious
Madytos
Sestos
Tiristasis
Bisanthe
Heraion*
Perinthos*
Selimbria (M)
Byzantion (M) (Istanbul)

BULGARIA
Mesembria (M) (Nesebar)
Apollonia Pontica* (Sozopol)
Odessus* (Varna)

ROMANIA
*Cruni**
Kallatis*
Tomoi* (Constanta)
Histria*

MOLDOVA
Tyras* (Belgorod)

UKRAINE
Ophiusa*
Olbia*

(CRIMEA)
Chersonesus*
*Theodosia**
Kimmeriken*
Akra*
Nymphaion*
Tiritake*
Pantikapaion*

RUSSIA
Tanais* (Azov)
Phanagoria*
Hermonassa*
Gorgippia*
Pityus*

ABKHAZIA
Dioskourias* (Sukhumi)

GEORGIA
Guenos*
Phasis* (Poti)
Bathys Limen* (Batumi)

TURKEY (Asia Minor)
Trapezous* (Trabzon)
Kerasous*
Kotyora*
Amisos* (Samsun)
Sinope* (Sinop)
Heraclea Pontica (M)
Chalcedon (M)
Astakos (M)
Kios
Kyzikos*
Artaka
Abydus (M)
Assus
Atarneos
Cyme
Smyrna (Izmir)
Ephesos
Miletus
Halicarnassus
Patara*
Phaselis*
Side*
Corcesium*
Nagidus*
Calenderis*
Soli*
Cytorus*

CYPRUS
Lapethos
Salamis
Amathus
Curium
Paphos

EGYPT
Milesiorum Castellum (Alexandria)
Naucratis

LIBYA
Paliouros
Apollonia**
Cyrene**
Barca**
Tauchira**
Euhesperides**

The Roman Emperors, 30 BC–AD 1453

[1223]

JULIO-CLAUDIAN DYNASTY

31 BC–AD 14	*Augustus*
14–37	Tiberius
37–41	Caligula
41–5	Claudius I
54–68	Nero
68	Galba
	Otho
69	Vitellius
69–79	Vespasian
79–81	Titus
81–96	Domitian
96–8	Nerva
98–117	Trajan
117–38	Hadrian
138–61	Antoninus Pius
161–80	M. Aurelius*
161–9	Lucius Verus*
180–92	Commodus
193	Pertinax
193	Dedius Julianus
193–211	S. Severus
211–17	Caracalla*
211–12	Geta*
217–18	Macrinus
218–22	Heliogabalus
222–35	Alex. Severus
235–8	Maximinius
238	Gordian I
238	Gordian II
238	*Balbinus**
238	Pupienus*
238–44	Gordian III
244–9	Philippus
249–51	Decius
251	Hostilianus
251–3	Gallus
253	Aemilianus
253–60	Valerian*
260–8	Gallienus*
268–70	Claudius II
270–5	Aurelian
275–6	Tacitus
276	Florianus
276–82	Probus
282–3	Carus
283–5	Carinus*
283–4	*Numerianus**
284–305	Diocletian*
286–305	Maximian*
305–6	Constantius I*
305–10	Galerius*
306–12	Maxentius
308–13	Maxinus
308–24	*Licinius* (E)
305–37	Constantine I
337–40	Constantine II
337–50	Constans*
337–61	Constantius II*
361–3	Julian
363–4	Jovian
364–75	Valentinian I
364–78	Valens (E)
375–92	*Valentinian II**
375–83	Gratian* (W)
379–95	Theodosius I
395–423	Honorius* (W)
395–408	Arcadius (E)
408–50	Theodosius II
421	Constantius III*
425–55	Valentinian III
450–7	Marcian (E)
455	Petronius (W)
455–6	Avitus (W)
457–61	Majorian (W)
457–74	Leo I (E)
461–5	Libius (W)
467–72	Anthemius (W)
472	Olybrius (W)
473–4	Glycerius (W)
474	*Leo II* (E)
474–5	J. Nepos (W)
474–91	Zeno (E)
475–6	Romulus Augustus (W)
491–518	Anastasius I
518–27	*Justin I*
527–65	Justinian I
565–78	*Justin II*
578–82	Tiberius II
582–602	Maurice
602–10	Phocas

HERACLIAN DYNASTY

610–41	Heraclius I
641	Constantine III*
641	Heracleonas*
641–8	Constans II
668–85	Constantine IV
685–95	Justinian II
695–8	Leontius
698–705	*Tiberius III*
705–11	Justinian III
711–13	*Philippicus*
713–15	Anastasius II
716–17	Theodosius III

ISAURIAN DYNASTY

717–41	Leo III
741–75	Constantine V
775–80	Leo IV
780–97	Constantine VI
797–802	Irene
802–11	Nicephorus I
811	Stauracius
811–13	*Michael I*
813–20	Leo V
820–9	Michael II
829–42	Theophilus
842–67	Michael III

MACEDONIAN DYNASTY

867–86	Basil I
886–912	Leo VI
912–13	Alexander
913–19	Constantine VII
919–44	*Romanus I*
944–59	Constantine VII
959–63	Romanus II
963	Basil II
963–9	Nicephorus I
969–76	John I
976–1025	Basil II
1025–8	*Constantine VIII*
1028–34	Romanus III
1034–41	Michael IV
1041–2	Michael V
1042	*Zoe and Theodora*
1042–55	Constantine IX
1055–6	Theodora
1056–7	Michael VI
1057–9	Isaac I
1059–67	Constantine X
1067–8	Michael VII
1068–71	*Romanus IV*
1071–8	Michazel VII
1078–81	Nicephorus III

COMNENIAN DYNASTY

1081–1118	Alexius I
1118–43	John II
1143–80	Manuel I
1180–3	*Alexius II*
1183–5	Andronicus I
1185–95	*Isaac II*
1195–1203	Alexius III
1203–4	Alexius IV
1204	Alexius V
1204–22	Theodore I.
1222–54	John III
1254–8	Theodore II
1258	John IV

PALAEOLOGAN DYNASTY

1258–82	Michael VIII
1282–1328	*Andronicus II*
1328–41	Andronicus III
1341–76, 1379–91	John V
1376–9	Andronicus V
[1390	John VII]
1391–1425	*Manuel II*
1425–48	John VIII
1448–53	Constantine XI

Joint Emperor; (W) Western Emperor; (E) Eastern Emperor

[1224] The Popes, Patriarchs of Rome

Peter, St; d. AD 64
Linus, St, c.66–c.78
Anacletus, St, c.79–c.91
Clement I, St, c.91–c.101
Evaristus I, St, c.100–c.109
Alexander I, St, c.109–c.116
Sixtus I, St, c.116–c.125
Telesphorus, St, c.125–c.136
Hyginus, St, c.138–c.142
Pius I, St, c.142–c.155
Anicetus, St, c.155–c.166
Soter, St, c.166–c.174
Eleutherius, St, c.174–89
Victor I, St, 189–98
Zephyrinus, St, 198/9–217
Callistus I, St, 217–22
[Hippolytus I, St, 217–35]
Urban I, St, 222–30
Pontian I, St, 230–5
Anterus, St, 235–6
Fabian, St, 236–50
Cornelius, St, 251–3
[Novatian, 251–8]
Lucius I, St, 253–4
Stephen I, St, 254–7
Sixtus II, St, 257–8
Dionysius, St, 260–8
Felix I, St, 269–74
Eutychian, St, 275–83
Gaius, St, 283–96
Marcellinus, St, 296–?304
Marcellus I, St, 306–8
Eusebius, St, 310
Miltiades, St, 311–14
Silvester I, St, 314–35
Mark, St, 336
Julius I, St, 337–52
Liberius, 352–66
[Felix II, St, 355–65]
Damasus I, St, 366–84
[Ursinus, 366–7]
Siricius, St, 384–99
Anastasius I, St, 399–401
Innocent I, St, 401–17
Zosimus, St, 417–18
Boniface I, St, 418–22
Celestine I, St, 422–32
Sixtus III, St, 432–40
Leo I, St, 440–61
Hilarus I, St, 461–8
Simplicius, St, 468–83
Felix III (II), St, 483–92
Gelasius I, St, 492–6
Anastasius II, 496–8
Symmachus, St, 498–514
[Lawrence, 498–9; 501–16]
Hormisdas, St, 514–23
John I, St, 523–6
Felix IV (III), St, 526–30
[Dioscorus, 530]
Boniface II, 530–2
John II, 533–5
Agapitus I, St, 535–6
Silverius, St, 536–7
Vigilius, 537–55
Pelagius I, 556–61
John III, 561–74
Benedict I, 575–9
Pelagius II, 579–90
Gregory I, St, 590–604
Sabinian 604–6
Boniface III, 607
Boniface IV, St, 608–15
Deusdedit (later Adeodatus I) St, 615–18
Boniface V, 619–25
Honorius I, 625–38
Severinus, 640
John IV, 640–2
Theodore I, 642–9
Martin I, St, 649–53
Eugene I, St, 654–7
Vitalian, St, 657–72
Adeodatus II, 672–6
Donus, 67 8
Agatho, St, 678–81
Leo II, St, 682–3
Benedict II, St, 684–5
John V, 685–6
Conon, 686–7
[Theodore, 687]
[Paschal, 687]
Sergius I, St, 687–701
John VI, 701–5
John VII, 705–7
Sisinnius, 708
Constantine, 708–15
Gregory II, St, 715–31
Gregory III, St, 731–41
Zacharias, St, 741–52
Stephen (II), 752
Stephen II (III), 752–7
Paul I, St, 757–67
[Constantine, 767–8]
[Philip, 768]
Stephen III (IV), 768–72
Hadrian I, 772–95
Leo III, St, 795–816
Stephen IV (V), 816–17
Paschal I, St, 817–24
Eugene II, 824–7
Valentine, 827
Gregory IV, 827–44
[John, 844]
Sergius II, 844–7
Leo IV, St, 847–55
Benedict III, 855–8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 855]
Nicholas I, St, 858–67
Hadrian II, 867–72
John VIII, 872–82
Marinus I, 882–4
Hadrian III, St, 884–5
Stephen V (VI), 885–91
Formosus, 891–6
Boniface VI, 896
Stephen VI (VII), 896–7
Romanus, 897
Theodore II, 897
John IX, 898–900
Benedict IV, 900–3
Leo V, 903
[Christopher, 903–4]
Sergius III, 904–11
Anastasius III, 911–13
Lando, 913–14
John X, 914–28
Leo VI, 928
Stephen VII (VIII), 928–31
John XI, 931–5
Leo VII, 936–9
Stephen VIII (IX), 939–42
Marinus II, 942–6
Agapitus II, 946–55
John XII, 955–64
Leo VIII, 963–5
[Benedict V, 964]

Antipopes in square brack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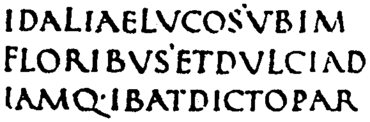
John XIII, 965–72
Benedict VI, 973–4
[Boniface VII, 974, 984–5]
Benedict VII, 974–83
John XIV, 983–4
John XV, 985–96
Gregory V, 996–9
[John XVI, 997–8]
Silvester II, 999–1003
John XVII, 1003
John XVIII, 1003–9
Sergius IV, 1009–12
Benedict VIII, 1012–24
[Gregory (VI), 1012]
John XIX, 1024–32
Benedict IX, 1032–44, 1045, 1047–8
Silvester III, 1045
Gregory VI, 1045–6
Clement II, 1046–7
Damasus II, 1048
Leo IX, St, 1049–54
Victor II, 1055–7
Stephen IX (X), 1057–8
[Benedict X, 1058–9]
Nicholas II, 1058–61
Alexander II, 1061–73
[Honorius (II), 1061–4]
Gregory VII, St, 1073–85
[Clement III, 1080, 1084–1100]
Victor III, 1086–7
Urban II, 1088–99
Paschal II, 1099–1118
[Theoderic, 1100–1]
[Albert or Adalbert, 1101]
[Silvester IV, 1105–11]
Gelasius II, 1118–19
[Gregory (VIII), 1118–21]
Callistus II, 1119–24
Honorius II, 1124–30
[Celestine (II), 1124]
Innocent II, 1130–43
[Anacletus II, 1130–8]
[Victor IV, 1138]
Celestine II, 1143–4
Lucius II, 1144–5
Eugene III, 1145–53
Anastasius IV, 1153–4
Hadrian IV, 1154–9
Alexander III, 1159–81
[Victor IV, 1159–64]
[Paschal III, 1164–8]
[Callistus (III), 1168–78]
[Innocent (III), 1179–80]
Lucius III, 1181–5
Urban III, 1185–7
Gregory VIII, 1187
Clement III, 1187–91
Celestine III, 1191–8
Innocent III, 1198–1216
Honorius III, 1216–27
Gregory IX, 1227–41
Celestine IV, 1241
Innocent IV, 1243–54
Alexander IV, 1254–61
Urban IV, 1261–4
Clement IV, 1265–8
Gregory X, 1271–6
Innocent V, 1276
Hadrian V, 1276
John XXI, 1276–7
Nicholas III, 1277–80
Martin IV, 1281–5
Honorius IV, 1285–7
Nicholas IV, 1288–92
Celestine V, St Peter, 1294
Boniface VIII, 1294–1303
Benedict IX, 1303–4
Clement V, 1305–14
John XXII, 1316–34
[Nicholas (V), 1328–30]
Benedict XII, 1334–42
Clement VI, 1342–52
Innocent VI, 1352–62
Urban V, 1362–70
Gregory XI, 1370–8
Urban VI, 1378–89
[Clement (VII), 1378–94]
Boniface IX, 1389–1404
[Benedict (XIII), 1394–1417]
Innocent VII, 1404–6
Gregory XII, 1406–15
[Alexander V, 1409–10]
[John (XXIII), 1410–15]
Martin V, 1417–31
[Clement (VIII), 1423–9]
[Benedict (XIV), 1425]
Eugene IV, 1431–47
[Felix V, 1439–49]
Nicholas V, 1447–55
Callistus III, 1455–8
Pius II, 1458–64
Paul II, 1464–71
Sixtus IV, 1471–84
Innocent VIII, 1484–92
Alexander VI, 1492–1503
Pius III, 1503
Julius II, 1503–13
Leo X, 1513–21
Hadrian VI, 1522–3
Clement VII, 1523–34
Paul III, 1534–9
Julius III, 1550–5
Marcellus II, 1555
Paul IV, 1555–9
Pius IV, 1559–65
Pius V, St, 1566–72
Gregory XIII, 1572–85
Sixtus V, 1585–90
Urban VII, 1590
Gregory XIV, 1590–1
Innocent IX, 1591
Clement VIII, 1592–1605
Leo XI, 1605
Paul V, 1605–21
Gregory XV, 1621–3
Urban VIII, 1623–44
Innocent X, 1644–55
Alexander VII, 1655–67
Clement IX, 1667–9
Clement X, 1670–6
Innocent XI, 1676–89
Alexander VIII, 1689–91
Innocent XII, 1691–1700
Clement XI, 1700–21
Innocent XIII, 1721–4
Benedict XIII, 1724–30
Clement XII, 1730–40
Benedict XIV, 1740–58
Clement XIII, 1758–69
Clement XIV, 1769–74
Pius VI, 1775–99
Pius VII, 1800–23
Leo XII, 1823–9
Pius VIII, 1829–30
Gregory XVI, 1831–46
Pius IX, 1846–78
Leo XIII, 1878–1903
Pius X, St, 1903–14
Benedict XV, 1914–22
Pius XI, 1922–39
Pius XII, 1939–58
John XXIII, 1958–63
Paul VI, 1963–78
John Paul I, 1978
John Paul II, 1978–

Source: J. N. D. Kelly,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pes*, Oxford,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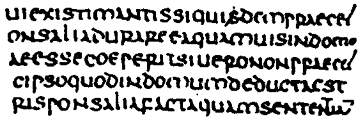
[1225]

[1226] **Palae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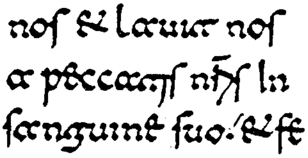
(*a*) Roman majuscule (Virgil, 4th–5th cents. AD). (*b*) Roman minuscule, mixed uncials (*Pandects*, 6th–7th cents.). (*c*) Lombardic or Beneventan cursive (Lectionary, Monte Cassino, 1058–87). (*d*) English pointed insular (*Anglo-Saxon Chronicle*, c.1045). (*e*) Carolingian minuscule, Latin (10th cent.). (*f*) *Littera fractura*, Gothic script (14th cent.). (*g*) Gothic rotunda (Horace, Cremona, 1391). (*h*) Greek papyrus (Timotheus, *Persae*, 4th cent. 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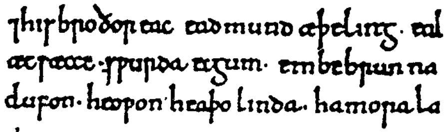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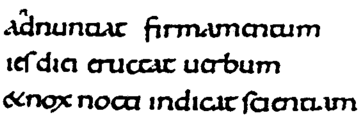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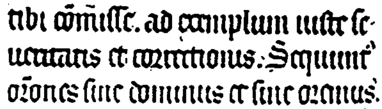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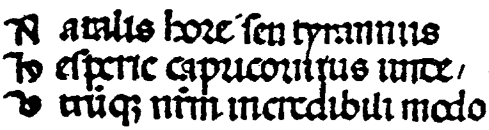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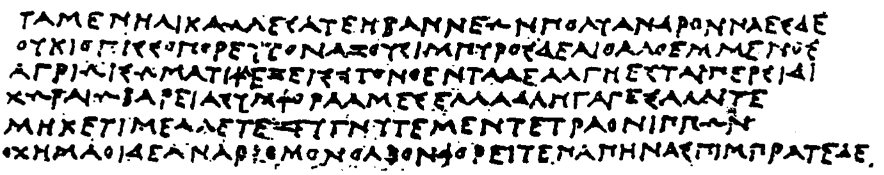
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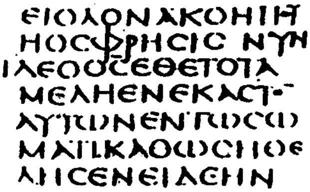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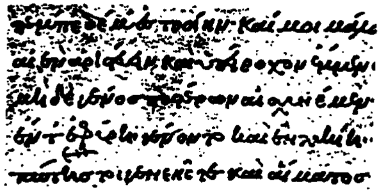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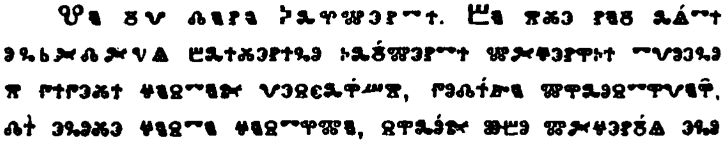
(*i*) Greek 'biblical uncial' (1 Cor. 12; *Codex sinaiticus*, c.AD 350 ; after C. H. Roberts). (*j*) Greek [1227] cursive minuscules (*Iliad* vi, BM Townley MS, c.1255). (*k*) Glagolithic (Kiev Missal: 9th-cent. translation of a 7th-cent. Roman rite). (*l*) Bulgarian Cyrillic (*Savinna Kniga*, 11th cent., preserved at Pskov, Russia). (*m*) Serbian Cyrillic (15th cent. MS, Belgrade; after R. Auty). (*n*) Ottoman chancellery script (accounts from Podolia, late 17th cent., after D. Kołodejczy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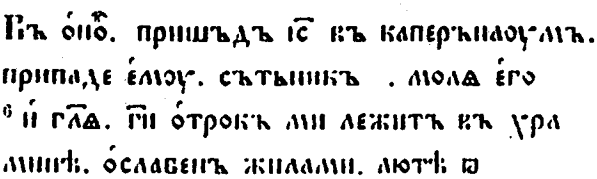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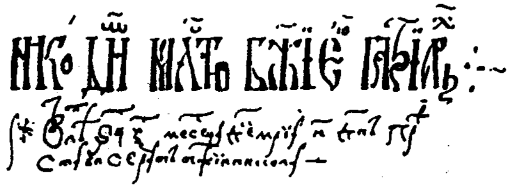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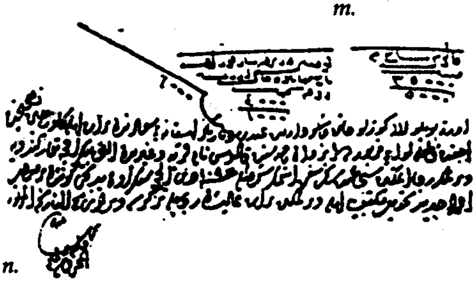
k.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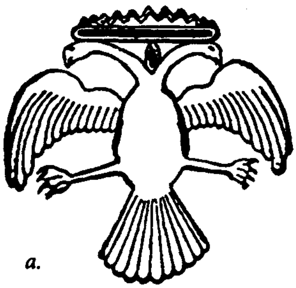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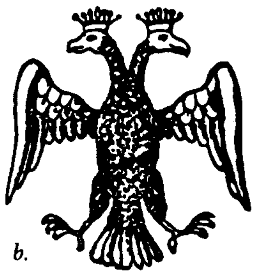
n.

[1228] **Eagles and Crosses**

Top row, left to right. (**a**) Double-headed Roman Eagle under a single crown, symbolizing the crea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mpires (after an inscription in Athens, 4th century AD). (**b**) Late Byzantine Eagle, from the throne of Sophia Palaeologos, Grand Duchess of Moscow, *c.*1470. (**c**) Charlemagne's Eagle, embroidered in silk on his cloak (9th century, after Frutiger). *Centre:* (**d**) The 'Small Coat-of-Arms' of the Russian Empire, 1914: crowned imperial double-headed black eagle holding orb and sceptre, with the arms of the city of Moscow in escutcheon and surmounted by the Romanov crown. The eagle's wings carry the arms of the Tsar's assumed titles (*dexter*: Kazan, the white eagle of Poland, Taurida and Kiev, Novgorod and Vladimir; *sinister*: Astrakhan, Siberia, Georgia, and Finland). *Bottom row, left to right.* (**e**) The 'Small Coat-of-Arms' of the Austrian Empire, 1915: crowned imperial double-headed black eagle holding orb and sword, with the red-white-red shield of Austria in escutcheon, ensigned by the Habsburg Crown. (**f**) Arms of the Albanian People's Republic, 1944. (**g**) Arms of the Kingdom of Spain, 1947: a black eagle bearing in escutcheon a crowned shield quartered with the arms of Castile and Leon, Aragon and Navarre, supported by a yoke, the pomegranate of Granada, and a sheaf of arrows, and surmounted by the slogan of the Falanga, 'One, Great, and Free'.



a.



b.



c.



d.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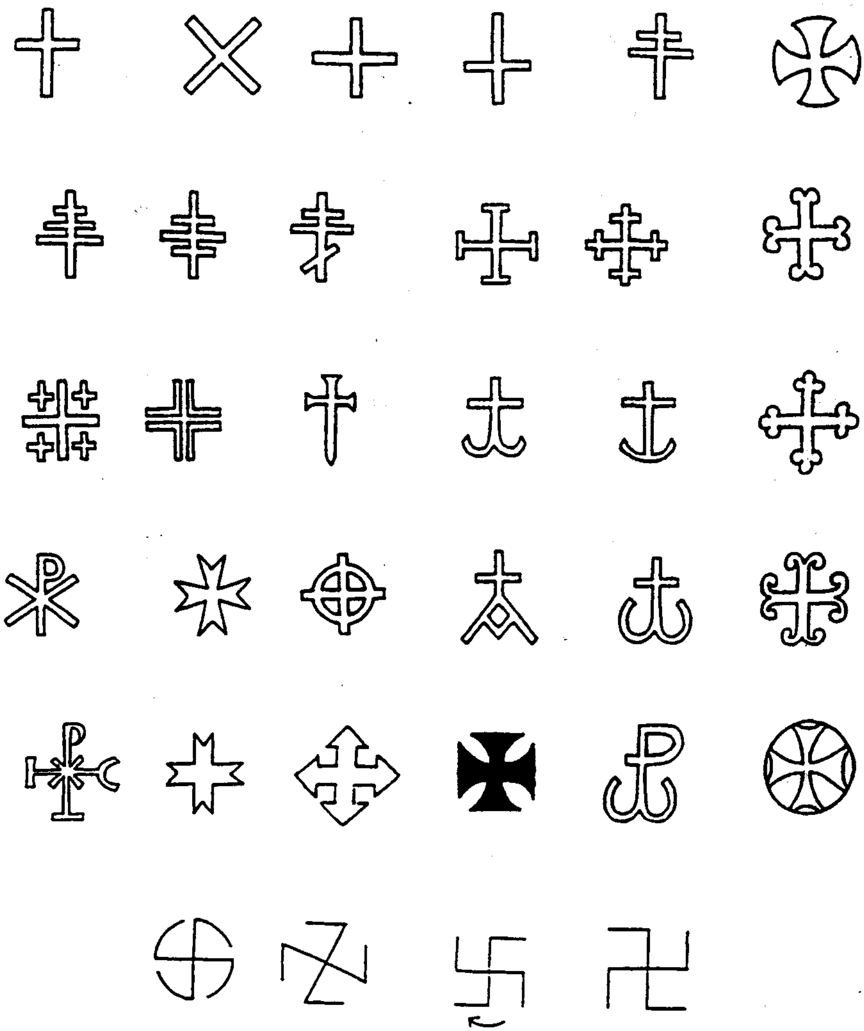


f.



g.

1st row (left to right): Crux capitata, Crucifixion Cross or Latin Cross; *Crux decussata* or St Andrew's Cross; Greek Cross; St Peter's Cross; Cardinal's Cross or Cross of Lorraine; Templars' Cross or Disc Cross. *2nd row:* Papal Cross; Triple Cross; Orthodox Cross; Cross of Jerusalem; Germanic Cross; Heart Cross. *3rd row:* Cross of the Crusades; Gamma Cross; Sword Cross; Anchor Cross of Faith; Anchor Sign (Cross of Christ with the Virgin Mary's Crescent); Cloverleaf Cross. *4th row:* Chi-Rho sign (monogram of Christ); Cross of St John or Maltese Cross; Celtic Cross (Christian Cross within the Sun); Alpha Cross; Omega Cross; Leaf Cross. *5th row:* Resurrection Cross; modified Maltese Cross; Arrowhead Cross; Teutonic or Iron Cross; Polish Anchor Cross (*Polska walczy*, 'Poland fights'); Runic Circle Cross. *6th row:* Pagan Sun Cross; Runic Lightning Cross; clockwise *Gammadion, Fylfot,* or 'Swastika', signifying bad luck; anti-clockwise swastika, signifying good fortune. (After Frutiger.) [1229]



[1230] 'The Great Books Scheme': The Chicago Can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list of authors proposed by Mortimer J. Adler, in 'Great Books, Past and Present', an Epilogue to G. van Doren (ed.), *Reforming Education: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1988), 318–50.

Homer
Aeschylus
Sophocles
Herodotus
Euripides
Thucydides
Hippocrates
Aristophanes
Plato
Aristotle
Epicurus
Euclid
Archimedes
Apollonius
Cicero
Lucretius
Virgil
Plutarch
Tacitus
Nicomachus
Epictetus
Ptolemy
M. Aurelius
Galen
St Augustine
St Thomas Aquinas
Dante Alighieri
Chaucer
Machiavelli
Erasmus
Copernicus
Thomas More
Luther
Rabelais
Calvin
Montaigne
W. Gilbert
Cervantes
Bacon

Shakespeare
Galileo
Kepler
W. Harvey
Hobbes
Descartes
Milton
Molière
Pascal
Huygens
Spinoza
Locke
Racine
Newton
Leibniz
Defoe
Swift
Congreve
Bishop Berkeley
Montesquieu
Voltaire
Fielding
Johnson
Hume
Rousseau
Sterne
Adam Smith
Kant
Gibbon
Boswell
Lavoisier
Goethe
Dalton
Hegel
Jane Austen
von Clausewitz
Stendhal
Schopenhauer
Faraday

C. Lyell
A. Comte
Balzac
de Tocqueville
J. S. Mill
Darwin
Dickens
C. Bernard
Kierkegaard
Marx
George Eliot
H. Melville
Dostoevsky
Flaubert
Ibsen
Tolstoy
J. W. R. Dedekind
M. Twain
W. James
Nietzsche
G. Cantor
Freud
D. Hilbert

1900–1945

G. B. Shaw
James Joyce
Proust
T. Mann
Joseph Conrad
Faulkner
D. H. Lawrence
T. S. Eliot
Kafka
Chekhov
O'Neill
Henry James
Kipling
J. Dewey
A. N. Whitehead
B. Russell
Santayana
E. Gilson
J.-P. Sartre
J. Ortega y Gasset
Max Planck
Einstein
N. Bohr
E. Schrodinger
J. H. Woodger
J.-H. Poincaré
T. Dobzhansky
G. Sorel
Trotsky
Lenin
W. Sumner
Max Weber
R. H. Tawney
T. Veblen
J. M. Keynes

1945–1977

A. Camus
G. Orwell
T. Pynchon
Solzhenitsyn
S. Bellow
S. Beckett
Wittgenstein
Heidegger
M. Buber
W. Heisenberg
J. Monod
R. P. Feynman
S. Hawking
A. Toynbee
C. Lévi-Strauss
F. Braudel
E. Le Roy Ladurie

Ancient Illyricum and Napoleon's Illyrian Provinces

[1231]



Illyrian Provinces 1809–13

Roman provincial bounda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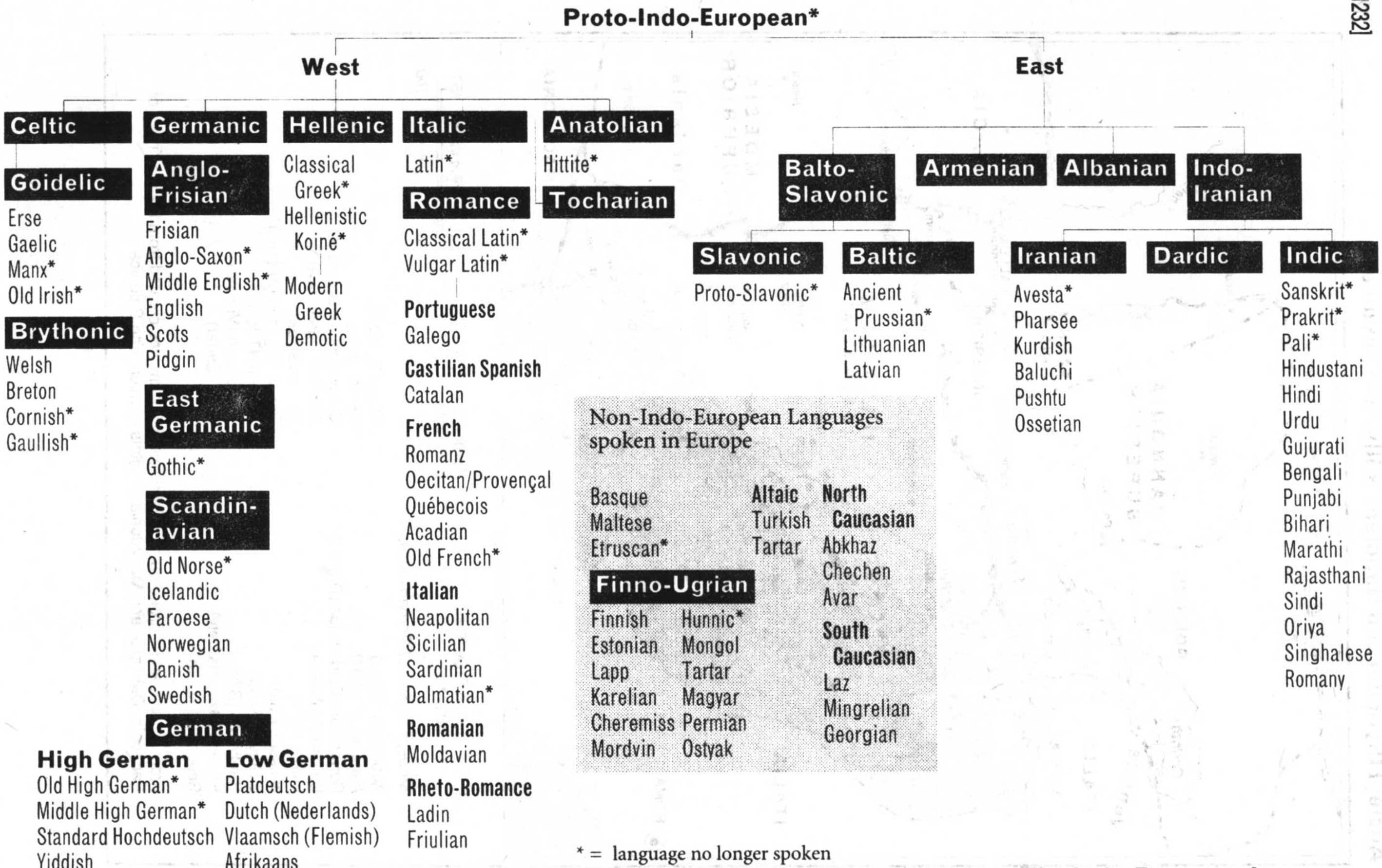
0 kilometres 150

0 miles 100

Modern names of Roman c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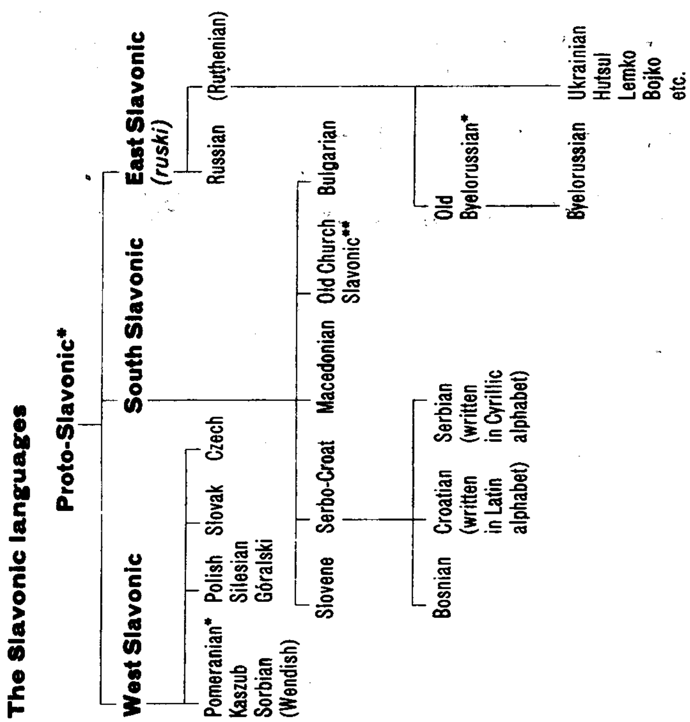
Aquincum (Buda)
Aspalathos (Split)
Dyrrachium/Epidamnus (Dürres)
Emona (Ljubljana)
Lindia (Linz)
Naissus (Nis)
Ovilava (Weils)
Raetinium (Bihac)
Savaria (Szombathely)
Scodra (Shkodra)
Scupi (Skopje)
Senia (Senj)
Singiodunum (Belgrade)
Sirmium (Metrovica)
Siscia (Sisak)
Siscia Segestia (Zagreb)
Tergiste (Trieste)
Vindobona (Vienna)
Zara (Zad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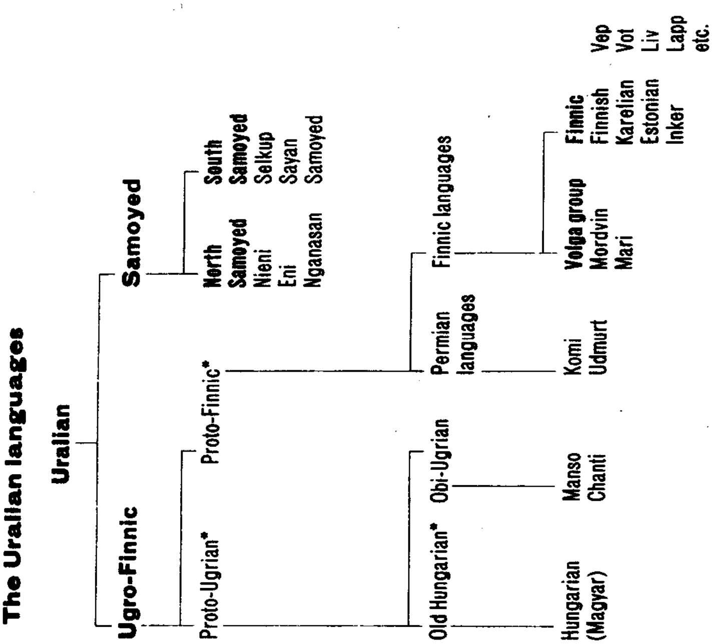
From AD 395, an enlarged dual Prefecture of Illyricum was created from the provinces of Pannonia, Dalmatia, and Macedonia: capitals Sirmium and Salonica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he Slavonic and Uralian Language Groups (after A. Nawrocki) [1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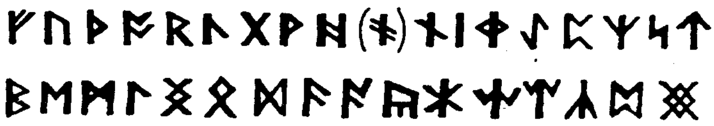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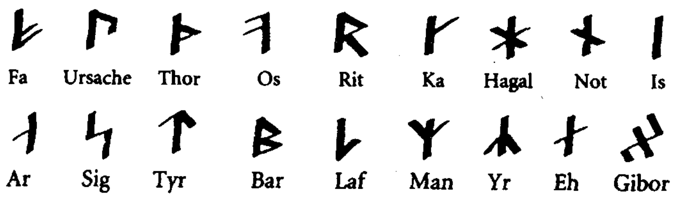
* = language no longer spoken
** = Liturgical language

[1234] Runes and Oghams

(*a*) The 33-sign Northumbrian Rune-stave containing earlier 24- and 29-sign staves common in England.
(*b*) The 18-sign Armanen Rune-stave, a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st ancient Germanic runic system; and (*below*) possible divinatory connotations (after N. Pennick).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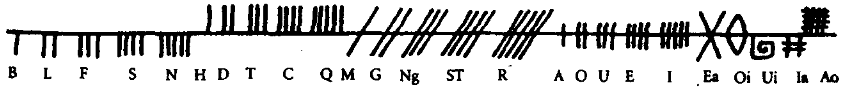
b.

The Armanen Ru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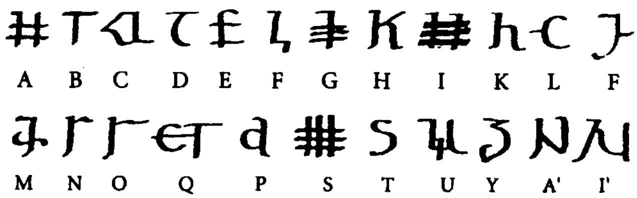
number	*letter*	*name*	*symbol*	*connotation*
(1)	F	FA	CATTLE	Wealth
(2)	U	UR	PRIMAL OX	Creative Power
(3)	Th	THURS	THORN TREE	Lightning/Sudden change
(4)	A	OS	MOUTH	Wisdom
(5)	R	RAD/RIT	WHEEL	Journey
(6)	K	CEN/KA	PINE-TORCH	Fire/Regeneration
(7)	H	HAGAL	HAIL	Delay
(8)	N	NOT/NYD	—	Caution
(9)	I	IS	ICE	Inertia
(10)	Y	AR	SERPENT	Necessary Evil
(11)	S	SIG/SIGEL	SUNBEAM	Light/Victory
(12)	T	TYR	ARROWHEAD	Success
(13)	B	BAR	BIRCH	Purity/Rebirth
(14)	L	LAF	WATER	Lifeforce
(15)	M	MAN	MAN	Humanity
(16)	—	YR	YEW, BOW	Skill
(17)	Kh	EH	CHALICE (Inverted)	Death
(18)	G	GA/GIBOR	ODIN'S SPEAR	Axle, Fulcrum

(*c*) The Basic Irish Ogham-stave. [1235]

(*d*) An Irish 'Bardic Alphabet'; and (below) possible divinatory connotations (after N. Pennick).



c.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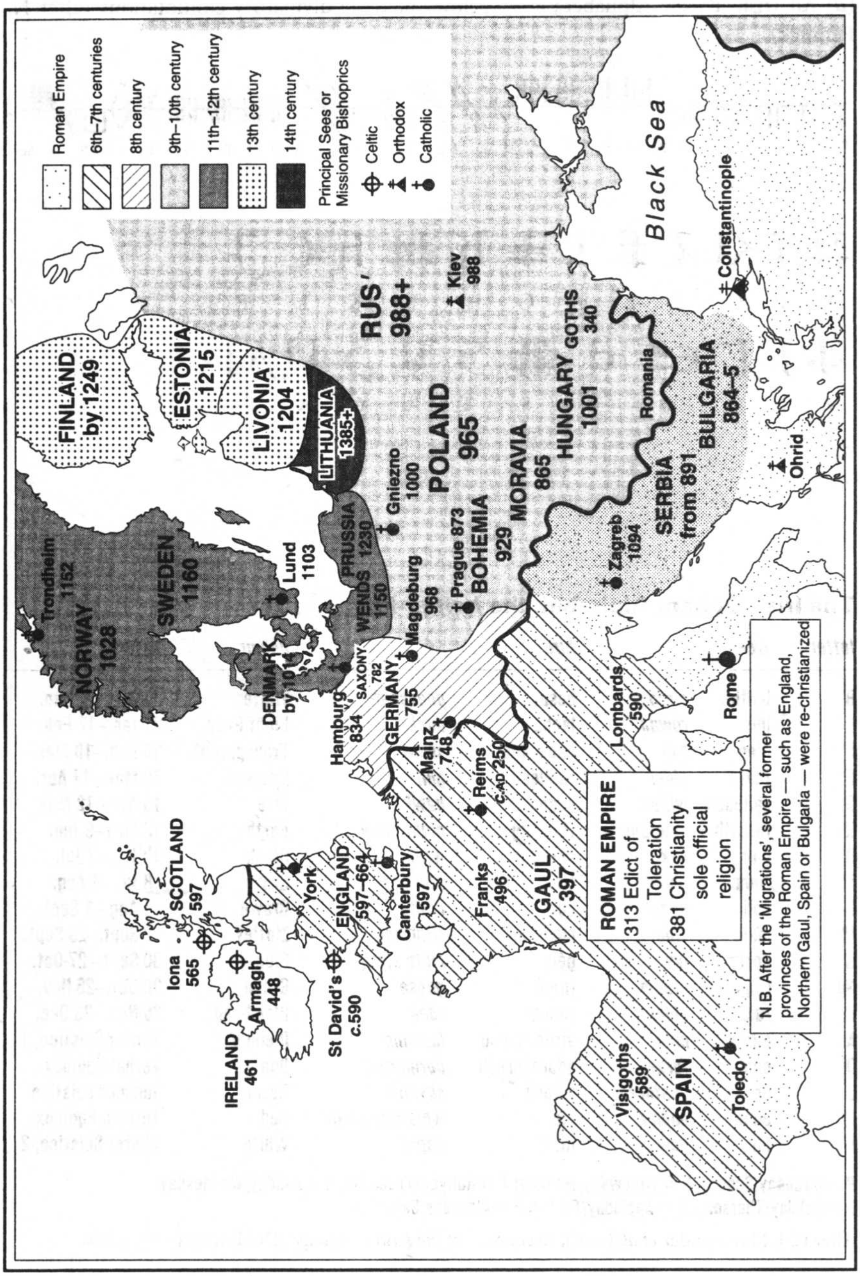
The Irish Ogham Alphabet: the *beithe-luis*

letter	*tree*		*bird*		*colour*	*dates*
B	beithe	*birch*	besan	*pheasant*	White	24 Dec.–20 Jan.
L	luis	*rowan*	lacha	*duck*	Light Grey	21 Jan.–17 Feb.
N	nion	*ash*	naoscach	*snipe*	Transparent	18 Feb.–18 Mar.
F	fearn	*alder*	faoileán	*gull*	Crimson	19 Mar.–14 Apr.
S	sailleach	*willow*	seabhac	*hawk*	Fire	15 Apr.–12 May
H	(h)uath	*hawthorn*	(h)adaig	*night crow*	Earth	13 May–9 Jun.
D	dair	*oak*	dreoilin	*wren*	Black	10 Jun.–7 Jul.
T	tinne	*holly*	truit	*starling*	Grey	8 Jul.–4 Aug.
C	coll	*hazel*	corr	*crane*	Brown	5 Aug.–1 Sept.
M	muin	*vine*	meantán	*titmouse*	Motley	2 Sept.–29 Sept.
G	gort	*ivy*	géis	*mute swan*	Blue	30 Sept.–27 Oct.
Ng	(n)getal	*broom*	(n)gé	*goose*	Green	28 Oct.–25 Nov.
R	ruis	*elder*	rocnat	*rook*	Blood-red	26 Nov.–23 Dec.
A	ailme	*pine*	airdhircleog	*lapwing*	Piebald	Winter Solstice, 1
O	onn	*furze*	odoroscrach	*cormorant*	Dun	Vernal Equinox
U	úr	*heather*	uiseóg	*skylark*	Resin	Summer Solstice
E	edad	*poplar*	ela	*whistling swan*	Red	Autumn Equinox
I	iúr	*yew*	illait	*eaglet*	White	Winter Solstice, 2

B = Birchday/Sunday; S = Willowday/Monday; T = Hollyday/Tuesday; N = Ashday/Wednesday;
D = Oakday/Thursday; Q = Appleday/Friday; F = Alderday/Satur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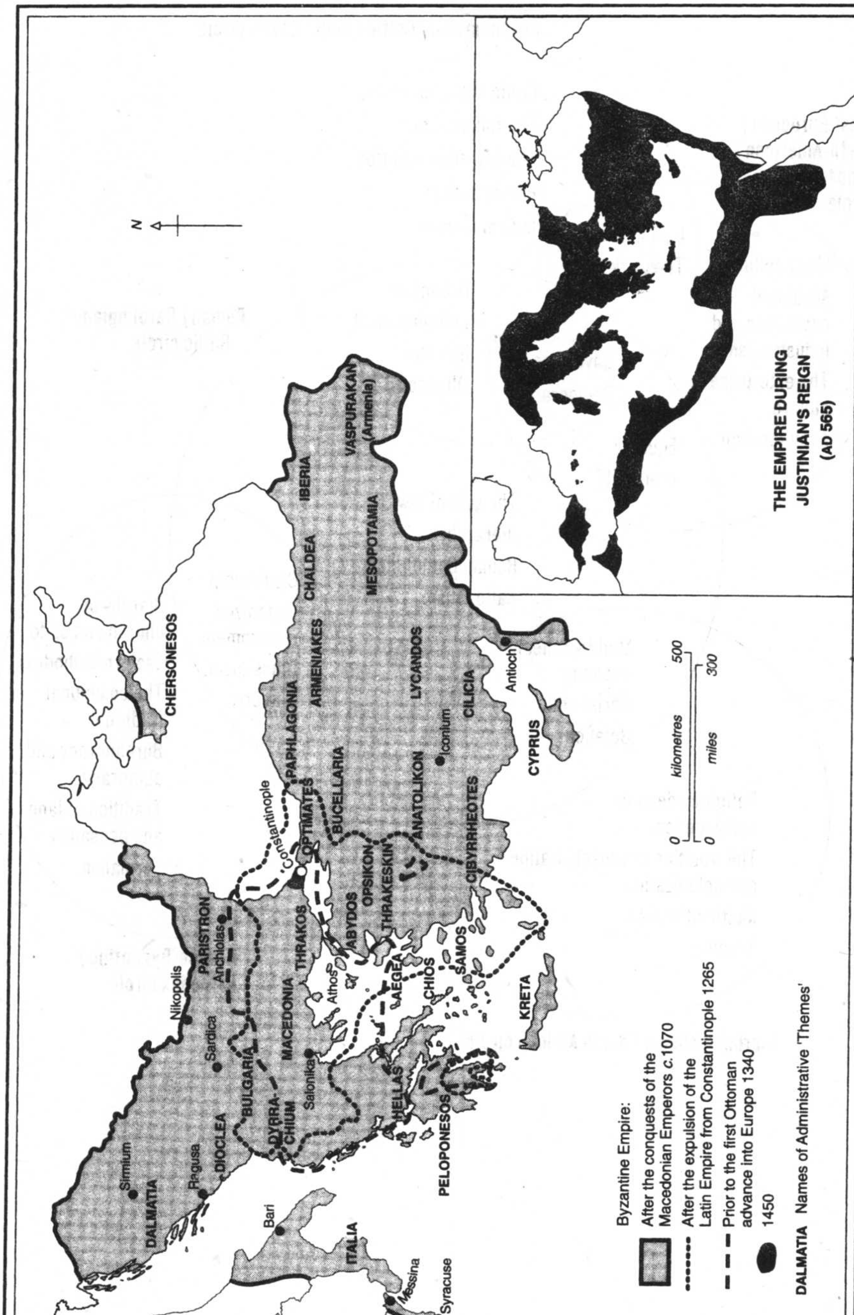
After C. J. Marstrander *et al.* (eds.), *Dictionary of the Irish Language* (Dublin, 1913–76), 4 vols.

[1236]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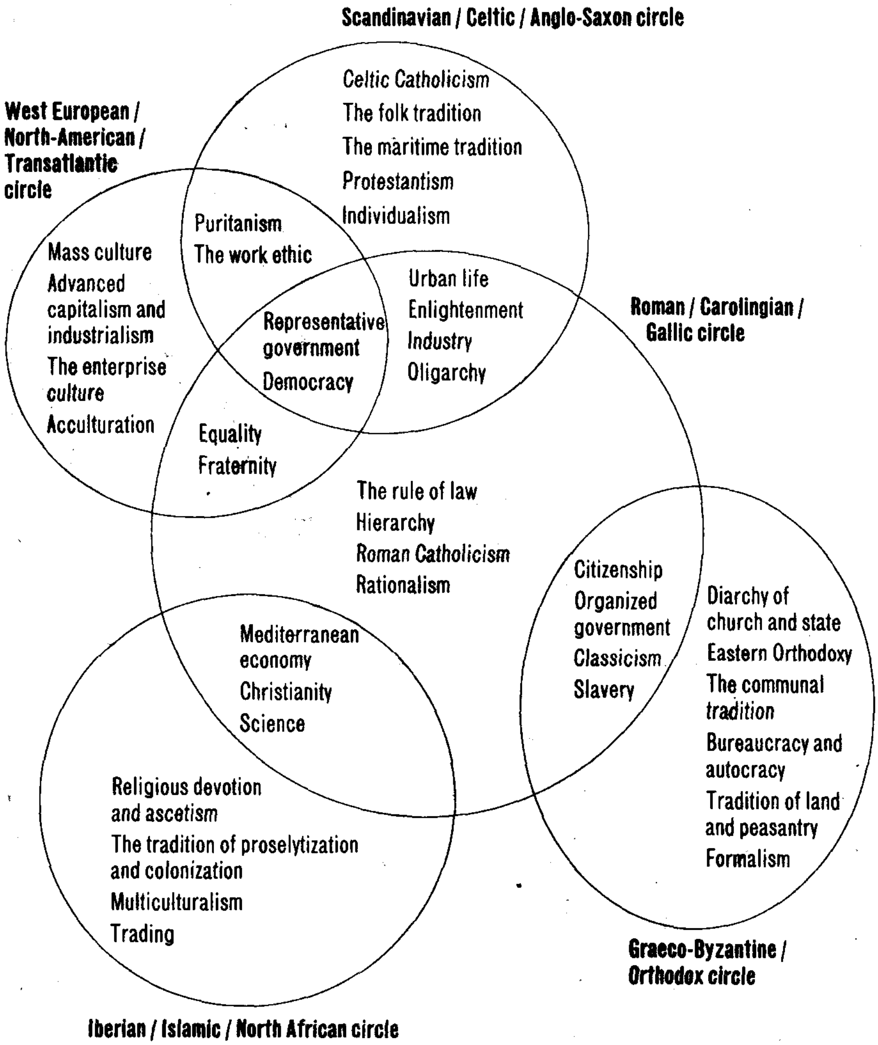


The Byzantine Empire

[1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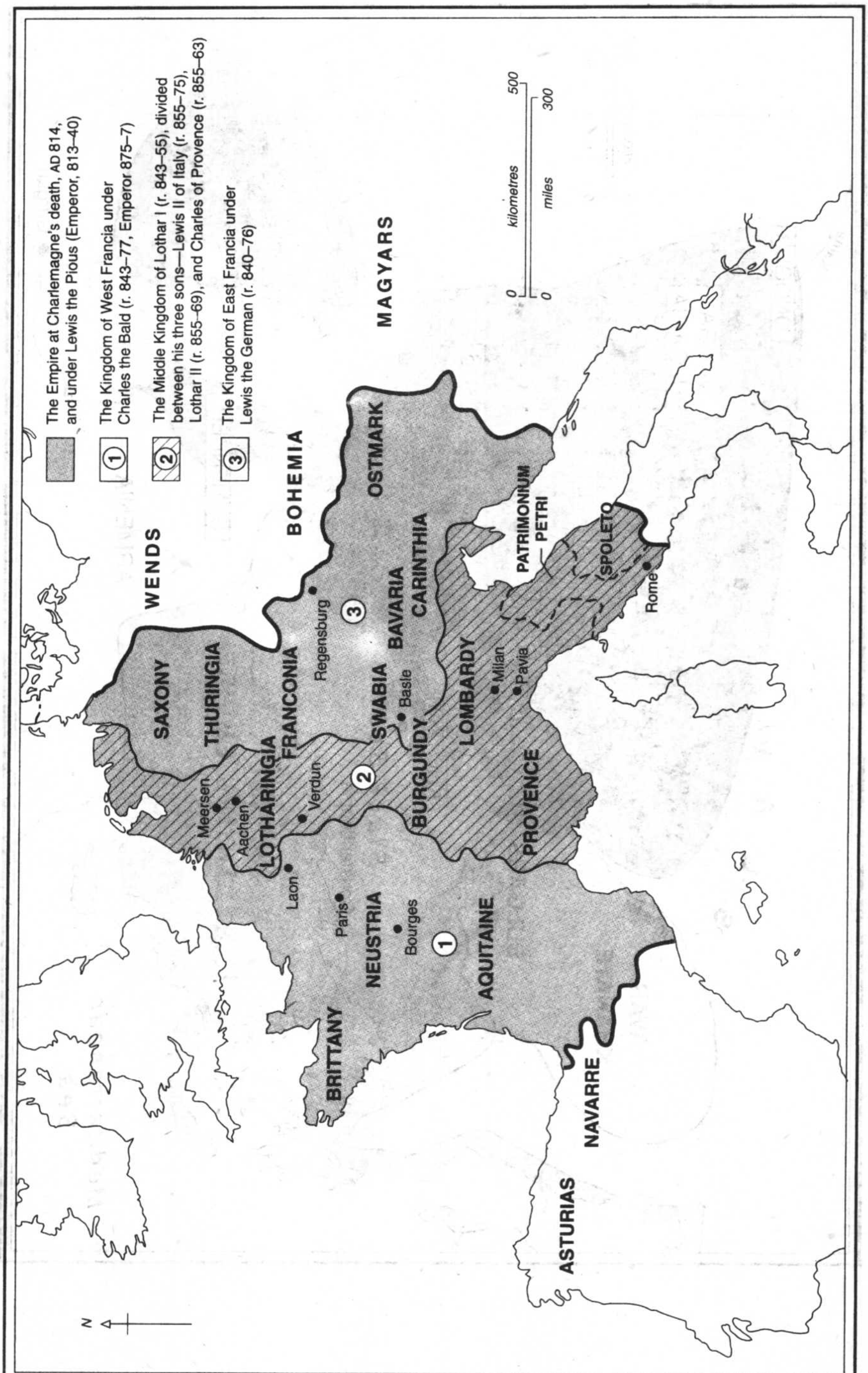


[1238] **Europe's Cultural Circles: an Interpretation** (after M. Shen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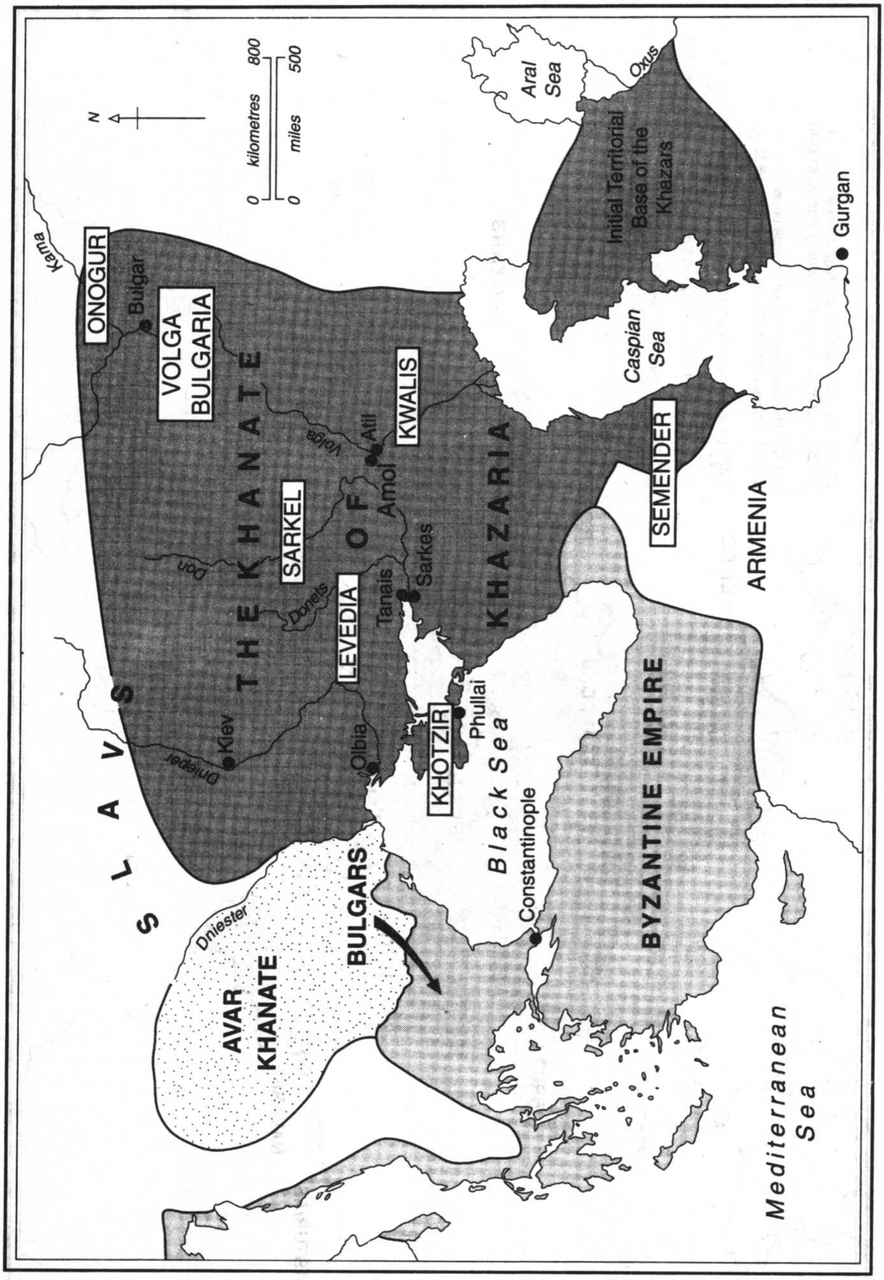


The Frankish Empire, AD 800–77

[1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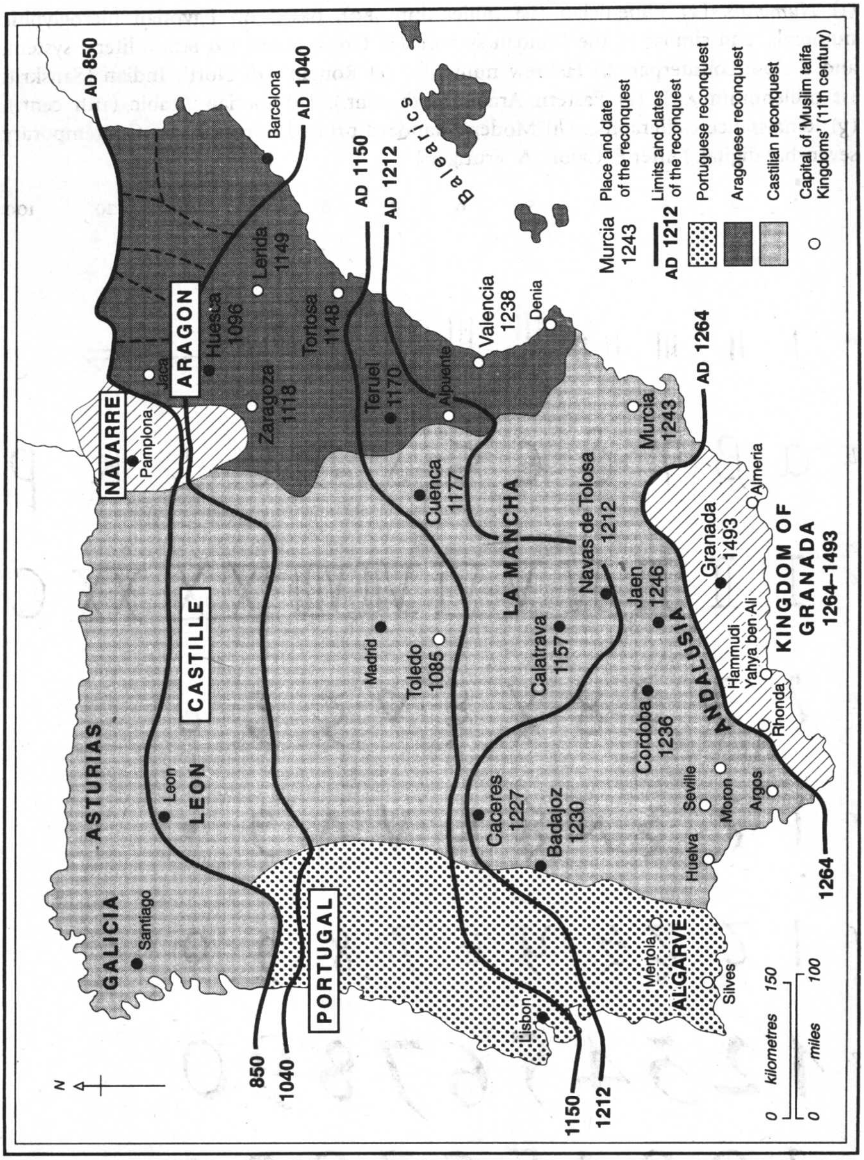


[1240] **Khazaria at its Greatest Extent, *c.* AD 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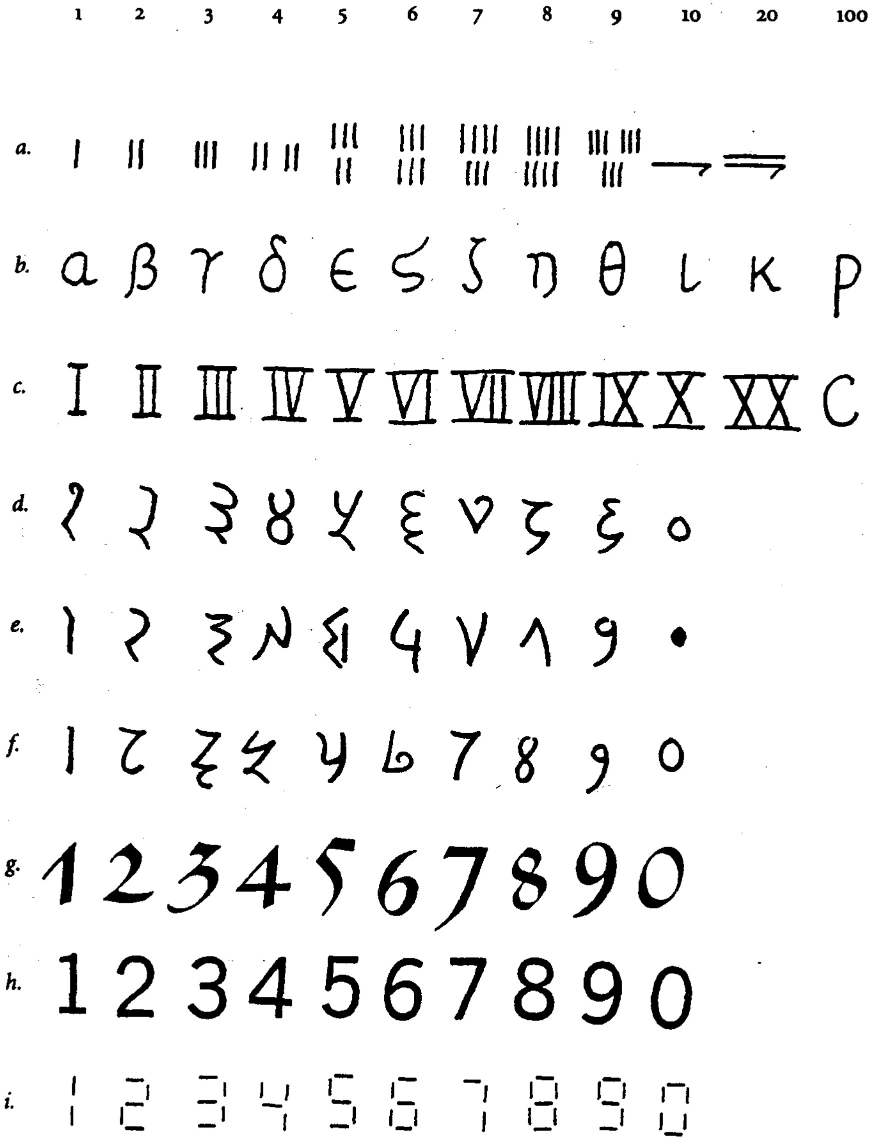
The Christian *Reconquista* in Iberia, 850–1493

[1241]



[1242] **Numerals and Mathematical Notation**

(1) *Numerals:* (*a*) Phoenician (1st millennium BC), based on Egyptian hieroglyphic numerals, and similar to the Minoan system. (*b*) Greek (from 350 BC), a literal system, and a close counterpart to Hebrew numerals. (*c*) Roman. (*d*) North Indian (Sanskrit, 1st millennium AD). (*e*) Eastern Arabic (10th cent.). (*f*) Iberian Arabic (11th cent.). (*g*) Renaissance calligraphic. (*h*) Modern standard printed numerals. (*i*) Contemporary seven-bar digital. (After F. Cajori, A. Frutiger.)



(2) The Origins of Standard Mathematical Notation: A Selection. [1243]

(After Cajori.)

Sign		Date	Probable first use
L	latus, square root	—	Roman
½	fractional line	1202	Leonardo da Pisa, *Liber abbaci*
%	per cent	1425	Italian commercial usage
+	(et) plus	1489	J. Widman, *Behennde und hubsche Rechnung auf*
−	minus	1489	*allen Kaufmanschaften*
p̃	plus	1494	Luca Pacioli, *Summa de arithmetica* (Venice)
m̃	minus	1494	
M	multiplicatio	1544	M. Stifel, *Arithmetica integra* (Germany)
D	divisio		
=	equality	1557	R. Recorde, *Ground of Artes* (Oxford)
•	decimal fraction	1585	Simon Stevin, *La thiende* (Antwerp)
±	plus/minus	1626	J. Girard (France)
×	multiplication	1631	W. Oughtred, *Clavis mathematica* (London)
::	proportion	1631	
∽	difference	1631	
>	greater than	1631	T. Harriot, *Artis analyticae praxis* (London)
<	less than	1631	
x^2	powers	1634	P. Herigone, *Cursus mathematicus* (Paris)
∞	infinity	1655	J. Wallis, *De sectionibus conicis* (Oxford)
∼	similar	1655	
÷	division	1659	J. H. Rahn, *Teutsche Algebra* (Nuremberg)
∴	therefore	1659	
:	ratio	1669	V. Wing, *Astronomica britannica* (London)
$\sqrt{\ }$	square root	1669	
π	pi	1706	W. Jones, *Synopsis palmariorum matheseos*
( )	aggregation	1726	J. Herman, *Commentarii*, i (St Petersburg)
e	logarithm base	1736	L. Euler, *Mechanica*, i
E	Euler's Number	1736	
C	Euler's Constant	1736	L. Euler, *Commentarii* (St Petersburg)
∫	summa, number theory	1750	L. Euler, *De numeris amicalibus*
Σ	summation	1755	L. Euler, *Institutiones calculi differentialis*
≡	congruence	1801	F. Gauss, *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
∵	since, because	1805	*Gentleman's Mathematical Companion*

[1244] **The Growth of the Royal Domain in France, to 1547**



Bulgaria, Medieval and Modern

[1245]



Medieval key

- ● Medieval cities
- ◉ Capitals
- ‡ Seat of the Bulgarian Patriarch (1235)
- ◉ Pliska (7th century)
- ◉ Preslav (9th–10th centuries)
- ◉ Turnovo (from 1187 under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 —— Frontier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under Tsar Symeon (r. 893–927)

Modern key

- BULGARIA, 1878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 had diminished the 'Greater Bulgaria' set up by the earlier Treaty of San Stefano
- EASTERN RUMELIA: added to Bulgaria following the national rising of 1885 to form a sovereign principality
- SOUTHERN BULGARIA, acquired during the Balkan Wars, 1912–13
- Area of Yugoslavia occupied by Bulgaria, 1941–4
- ○ Modern cities
- ◉ Capital

① SOUTHERN DOBRUDJA, to Romania 1913

② Districts ceded to Yugoslavia 1919

③ WESTERN THRACE, 1913–18, ceded 1918 to Greece

[1246] German Emperors and Kings of France

Carolingian Dynasty

d741 Charles Martel, Duke of the Franks

741–68 Pepin III, Mayor of Neustria
from 752 King Pepin I of the Franks

741–54 Carloman, Mayor of Austrasia

768–814 *Charles I the Great (Charlemagne*)*
814–40 Louis I the Debonair of Aquitaine*
840–55 Lothair, King of Italy*
855–75 Lewis II, King of Italy*

855–76 Lewis the German of Bavaria, King of Germany
876–82 Lewis the Saxon

875–7 Charles II le Chauve, King of Neustria*
877–9 Louis II, King of France
879–82 Louis III, King of France
882–4 Carloman, King of France

882–5 Charles the Fat*

891–4 Wido of Spoleto*
893–928 Charles III the Simple, King of France
887–99 Arnulf, King of Germany*
896–9 Lambert of Spoleto*
901–5 Lewis, King of Provence*

KINGDOM OF FRANCE

928–54 Louis IV d'Outremer, King of France
954–85 Lothair, King of France
986–7 Louis V, le Faineant, King of France

Capetian Dynasty

987–96 Hugues Capet
996–1031 Robert le Pieux
1031–60 Henri I
1060–1108 Philippe I
1108–37 Louis VI le Gros
1137–80 Louis VII
1180–1223 Philippe-Auguste
1223–6 Louis VIII
1226–70 Louis IX, St.

Saxon Dynasty

918–36 Henry I, the Fowler, King of Germany

HOLY ROMAN EMPIRE

936(62)–73 Otto I,* The Great
973–83 Otto II*
983–1002 Otto III*
1002–24 Henry II*

Salian or Franconian Dynasty

1024–39 Conrad II*
1039–56 Henry III*
1056–1106 Henry IV*
1106–25 Henry V*
1125–37 Lothair II* of Saxony

Hohenstauffen Dynasty

1138–52 Conrad III
1152–90 Frederick I Barbarossa*
[1177–80 Rudolf of Swabia]
[1081–8 Hermann of Luxemburg]
1190–7 Henry VI*
1198–1218 Otto IV* of Brunswick (Guelph)
[1198–1208 Philip of Hohenstaufen]
1211–50 Frederick II*
[1246–50 Henry Raspe of Thuringia]
[1247–56 William of Holland]

* Crowned Emperors　　[ ] = anti-Emperors, or unconfirmed electees

KINGDOM OF FRANCE

1270–85	Philippe III le Hardi
1285–1314	Philippe IV le Bel
1314–16	Louis X
1316–22	Philippe V

Valois Dynasty

1322–8	Charles IV
1328–50	Philippe VI
1350–64	Jean Le Bon
1364–80	Charles V le Sage
1380–1422	Charles VI le Simple
1422–61	Charles VII le Bien Aimé
1461–83	Louis XI
1483–98	Charles VIII
1498–1515	Louis XII
1515–47	Francis I
1547–59	Henri II
1559–60	Francis II
1560–74	Charles IX
1574–89	Henri III

Bourbon Dynasty

1589–1610	Henri IV
1610–43	Louis XIII
1643–1715	Louis XIV
1715–74	Louis XV
1774–93	Louis XVI
1793–5	Louis XVII

Napoleonic Empire

1804–15	Napoleon I*

Bourbon Restoration

1814–24	Louis XVIII
1824–30	Charles X
1830–48	Louis-Philippe

Napoleonic Restoration

1852–70	Napoleon III*

HOLY ROMAN EMPIRE [1247]

1250–4	Conrad I
[1257–72	Richard of Cornwall]
[1257–75	Alfonso X of Castile]
1273–91	Rudolf I of Habsburg
1292–8	Adolph of Nassau
1298–1308	Albert I of Habsburg
1308–13	Henry VII* of Luxemburg
1314–47	Lewis IV* of Wittelsbach = Matilda of Habsburg
[1314–30	Frederick the Fair of Habsburg]
1346–78	Charles IV* of Luxemburg
[1349	Gunther of Schwartzburg]
1378–1400	Wenceslas of Luxemburg
1400–10	Rupert of the Palatinate
1410–37	Sigismund* of Luxemburg
[1410–11	Jobst of Moravia]

Habsburg Dynasty

1438–9	Albert II
1440–93	Frederick III
1493–1519	Maximilian I*
1519–56	Charles V*
1556–64	Ferdinand I*
1564–76	Maximilian II*
1576–1612	Rudolf II*
1612–37	Ferdinand II*
1637–57	Ferdinand III*
1658–1705	Leopold I*
1705–11	Joseph I*
1711–40	Charles VI*
1742–5	Charles VII* of Bavaria
1745–65	Francis I* of Lorraine = Maria Theresa, Habsburg
1765–90	Joseph II*
1790–2	Leopold II*
1792–1806	Francis II* (Francis I)

Habsburg Emperors of Austria

1804–35	Francis I*
1835–48	Ferdinand I*
1848–1916	Francis-Joseph I*
1916–18	Charles I*

Hohenzollern Emperors of Germany

1871–88	William I* of Prussia
1888	Frederick III*
1888–1918	William II*

[1248] European University Foundations, 1088–1912

Bologna	1088	Catania	1434–44	Besançon	1691
Paris	c.1150	Barcelona	1450	Halle	1693
Oxford	1167	Glasgow	1451	Breslau	1702
Salerno*	1173	Valence	1452	Dijon	1722
Palenzia	c.1178	Greifswald	1456	Camerino	1727
Reggio	1188	Freiburg	1457	Göttingen	1733
Vicenza	1204	Basel	1459	Erlangen	1743
Cambridge*	1209	Ingolstadt	1459 (1472)	Moscow	1755
Salamanca	1218–19	Nantes	1460	Ljubljana	1774
Padua	1222	Bourges	1463	Zagreb*	1776
Naples	1224	Bratislava (Pressburg)	1465	Palermo*	1779
Vercelli	1228	Genoa*	1471	Lemberg (Lwów)	1784
Toulouse	1229	Trier	1452 (1473)	Kharkov	1804
Piacenza	1248	Saragossa	1474	Kazan	1804
Valladolid	c.1237	Mainz	1476	Lille	1808
Seville	1254	Tübingen	1476	Lyons	1808
Arezzo*	1255	Uppsala	1477	Rennes	1808
Montpellier*	1289	Copenhagen	1475 (1479)	Berlin	1810
Lisbon	1290	Palma	1483	Christiania (Oslo)	1811
Macerata	13th cent.	Aberdeen	1495	Genoa*	1812
Lerida	1300	Frankfurt/Oder	1498	Ghent	1815
Rome	1303	Alcala	1499	Liège*	1815
Avignon	1303	Valencia	1500	Warsaw	1816
Orléans	1306	Wittenberg	1502	Bonn	1818
Perugia	1308	Avila	1504	St Petersburg	1819
Coimbra	1308	Marburg	1527	Madrid	1822
Treviso	1318	Granada	1531	London	1826
Cahors	1332	Königsberg	1544	Munich*	1826
Angers	1337	Jena	1558	Zurich*	1832
Grenoble	1339 (1542)	Geneva	1559 (1876)	Durham	1832
Pisa	1343	Olomouc	1570	Bern*	1834
Prague	1347	Leiden	1572	Brussels*	1834
Perpignan	1350	Oviedo	1574 (1608)	Kiev	1834
Huesca	1354	Helmstedt	1575	Athens	1837
Sienna*	1357	Vilnius	1578	Messina	1838
Pavia	1361	Altdorf*	1578	Munster*	1843
Kraków	1364 (1400)	Edinburgh	1582	Queen's Belfast	1850
Vienna	1365	Graz	1586	Marseille	1854
Orange	1365	Dublin	1592	Iasi	1860
Pecs (Fünfkirchen)	1367	Cagliari	1596	Bucharest	1864
Erfurt	1379	Harderwijk	1600	Odessa	1865
Heidelberg	1385	Giessen	1607	Cluj	1872
Cologne	1388	Groningen	1614	Czernowitz	1875
Buda (Ofen)	1389	Rinteln	1621	Amsterdam	1877
Ferrara	1391	Strasbourg*	1621	Stockholm	1877
Barcelona	1401 (1450)	Salzburg	1623	Manchester	1880
Wurzburg	1402	Dorpat	1632	Birmingham	1880
Turin	1404	Utrecht	1634	Fribourg	1889
Aix-en-Provence	1409	Sassari	1634	Lausanne*	1891
Leipzig	1409	Pest (Tyrnau) Nagyszembat	1635	Wales*	1893
St Andrews	1411	Abo (Helsinki)	1640	Constantinople	1900
Rostock	1419	Bamberg	1648	Leeds*	1904
Dole	1422	Durham	1657 (1837)	Liverpool*	1904
Louvain	1425	Kiel	1665	Sofia*	1904
Poitiers	1431	Lund	1666	Belgrade*	1905
Caen	1432	Innsbruck	1672	Bristol	1909
Bordeaux	1441	Modena*	1683	Debrecen*	1912

Main source: L. Jílek (ed.), *Historical Compendium of European Universities* (Geneva,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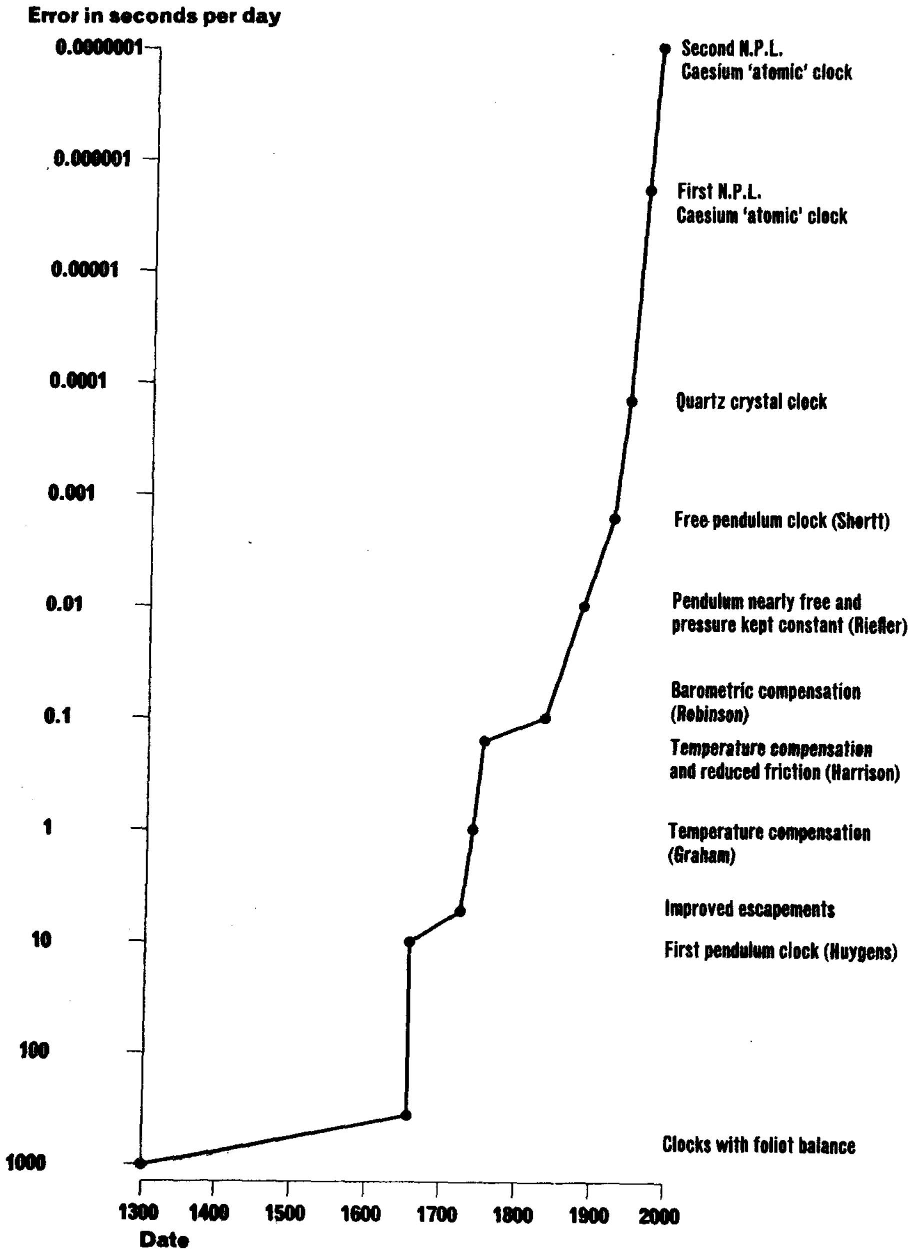
* University founded from an older institution (dates) in brackets indicate refoundations.

The Partitions of Kievan Rus′

[1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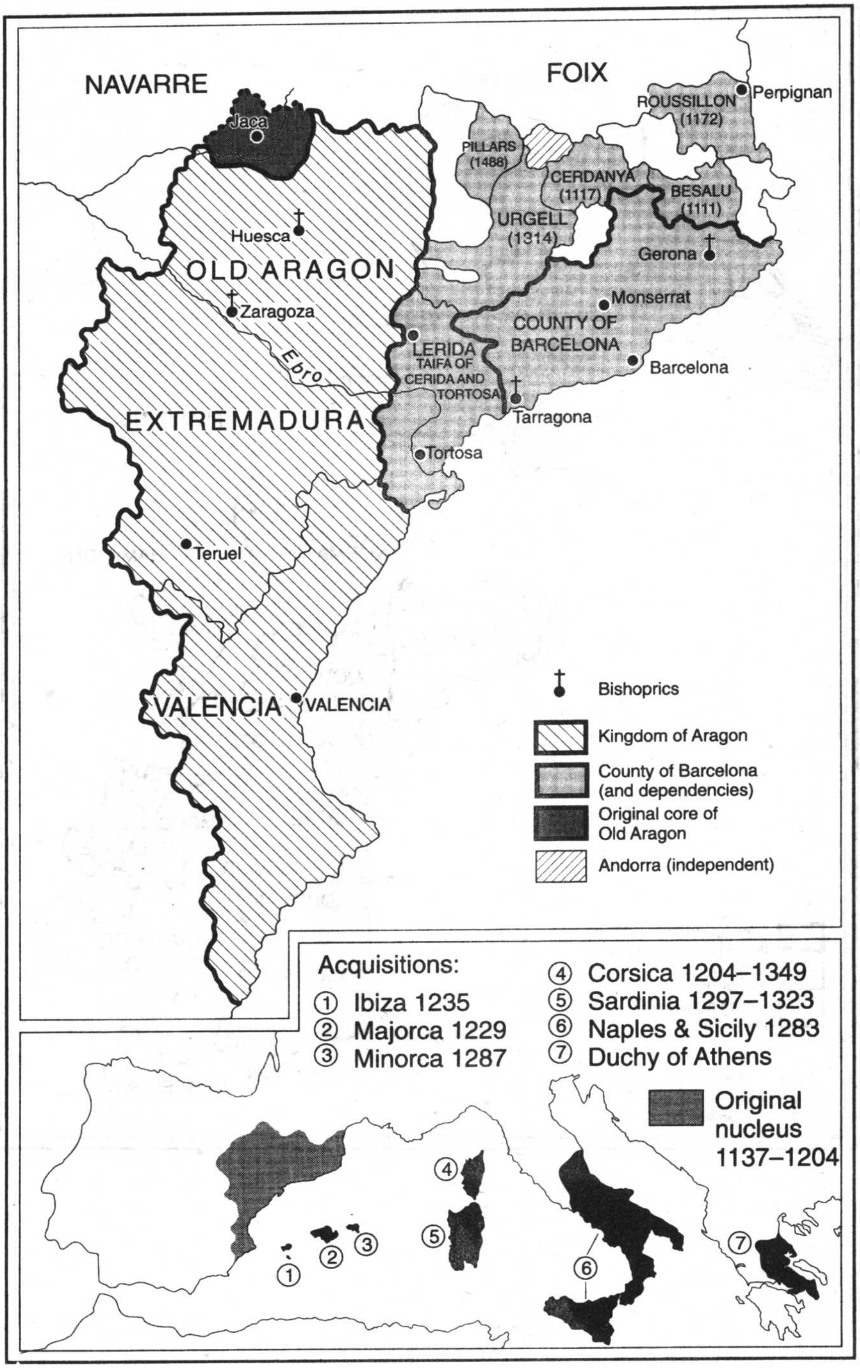


[1250] **Timekeeping in History:** a graph illustrating the rate of increase in the accuracy of timekeeping that has occurred si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first mechanical clock around AD 1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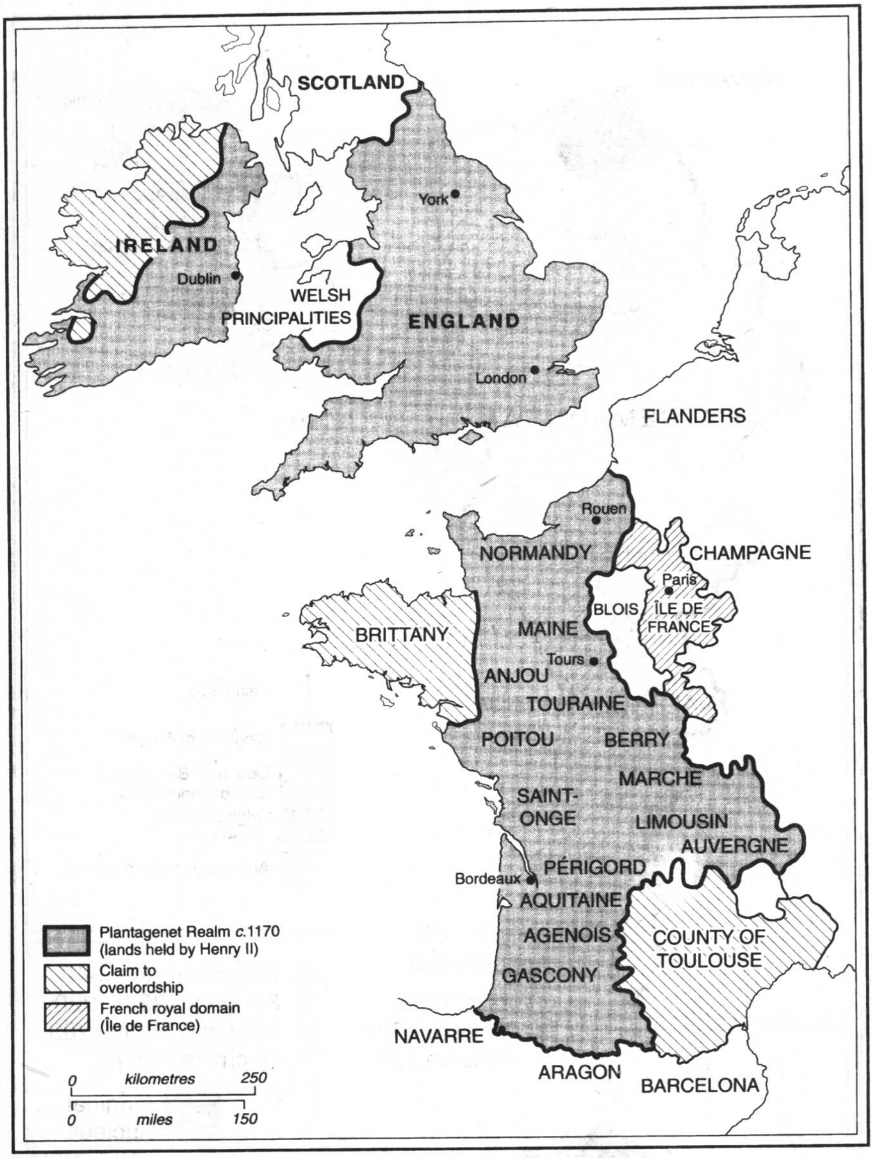


Based on a chart devised by F. A. B. Ward, formerly of the Science Museum, London.

The Kingdom of Aragon and Its Overseas Possessions [1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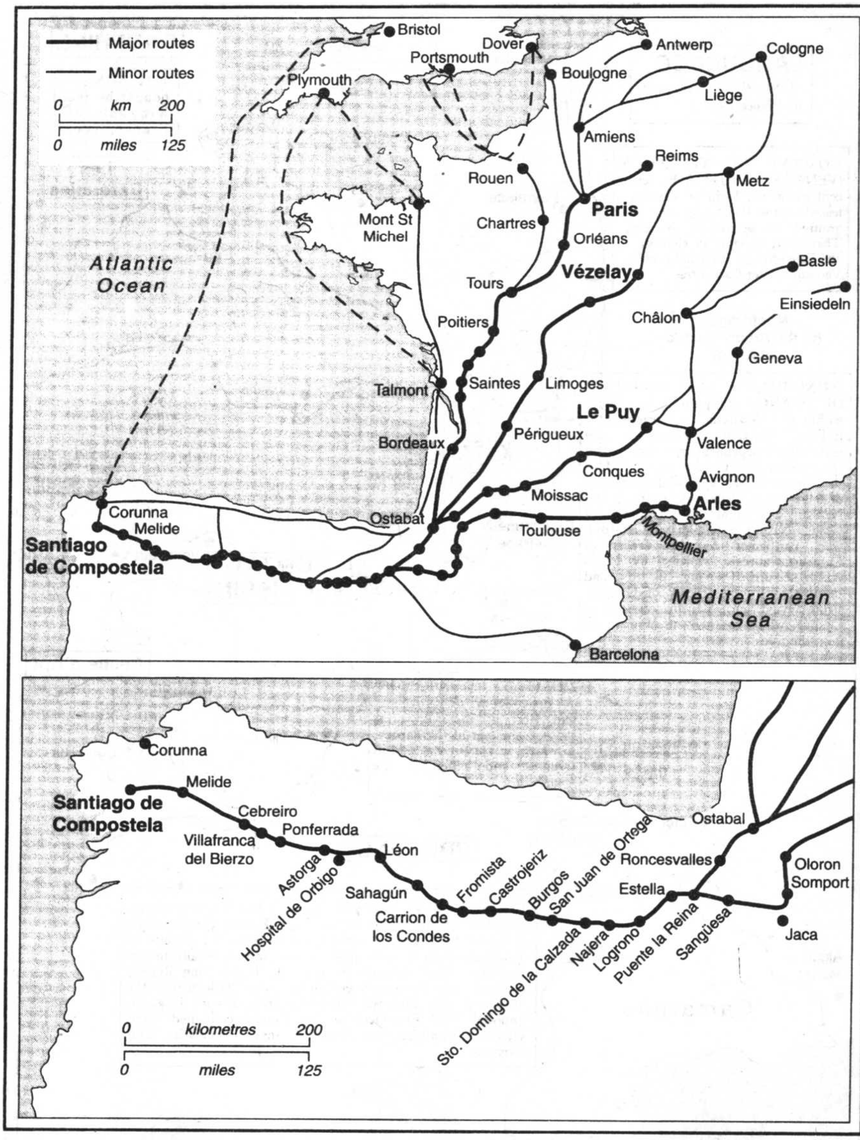


[1252] **The Plantagenet Realm, *c.*1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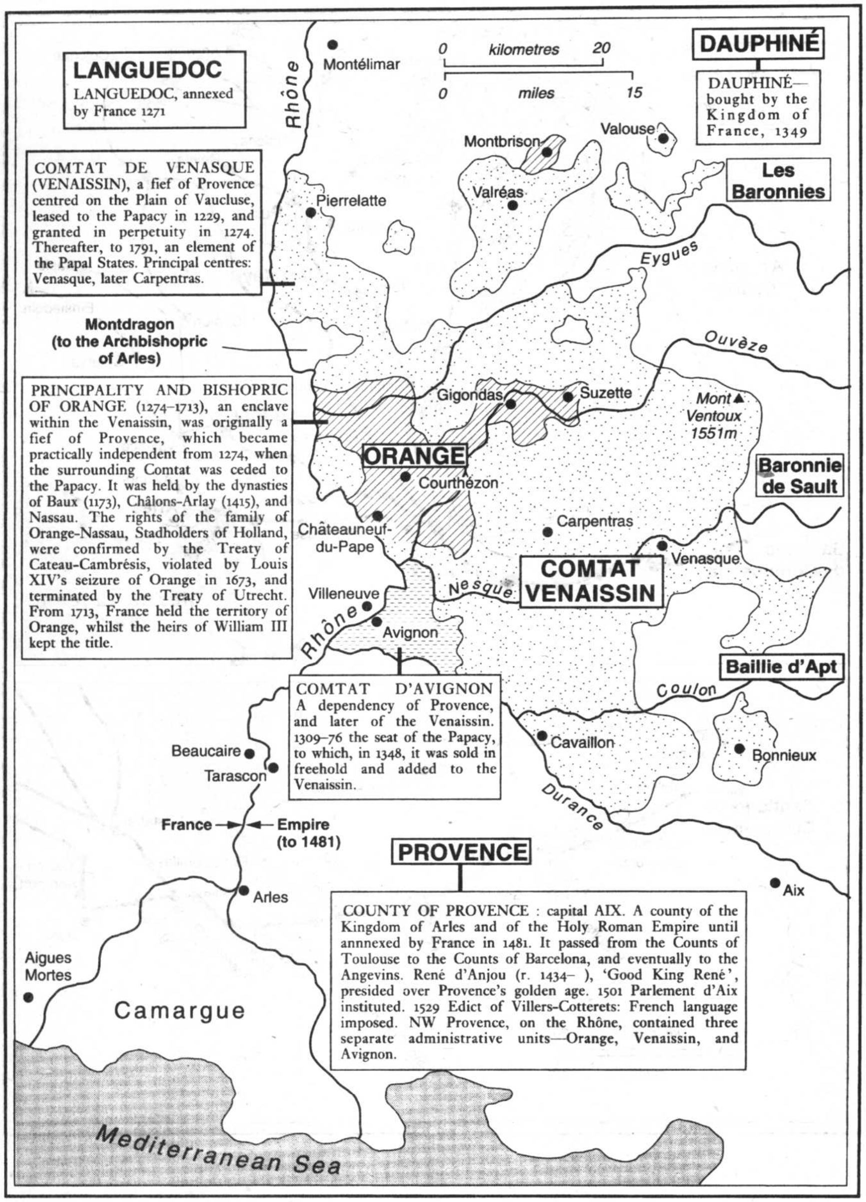


The Roads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253]



[1254] The Principality of Orange and the *Comtat Venais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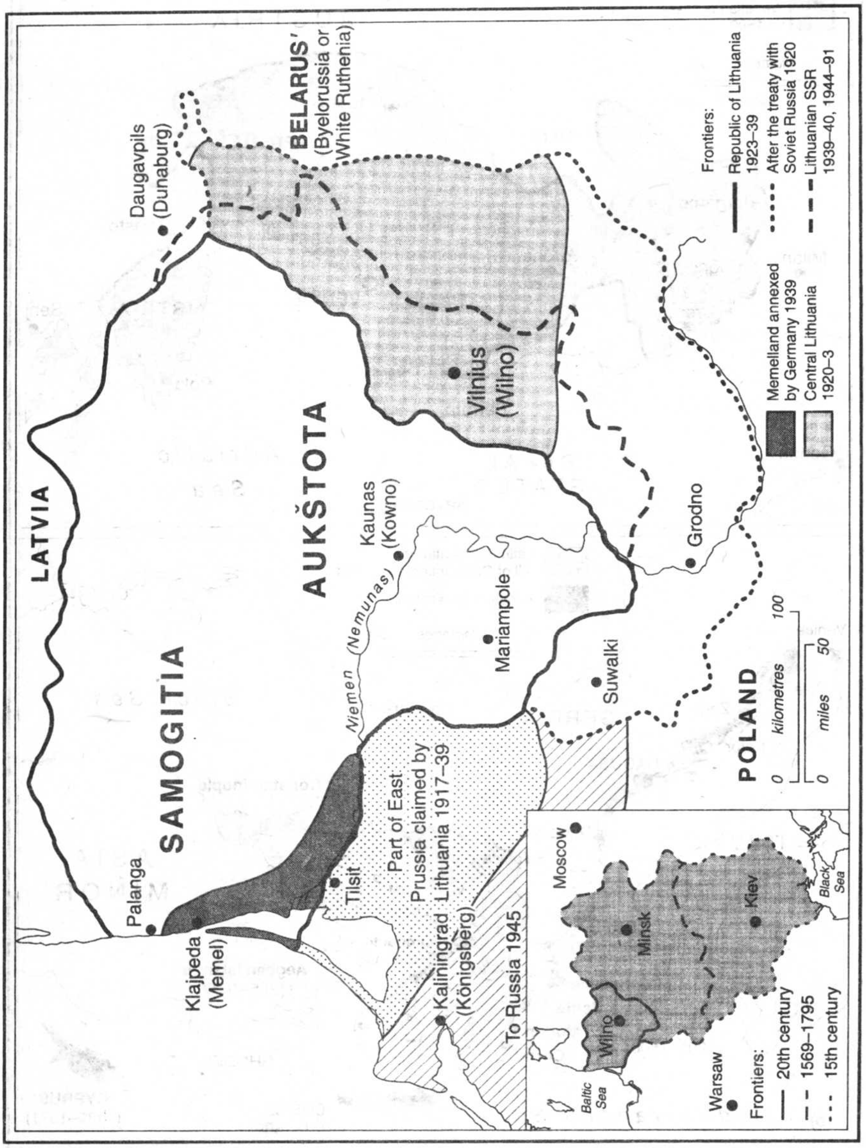
The Republic of Venice: *Terra Firma* and the Venetian Empire

[1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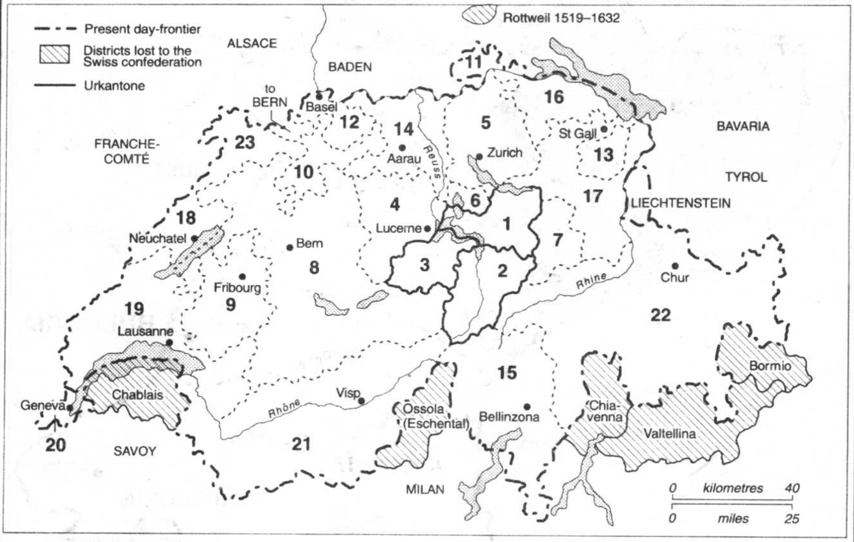


(*a*) Venice's *Terra Firma*; (*b*) The Venetian Empire

[1256] **Lithuania, Medieval and Mod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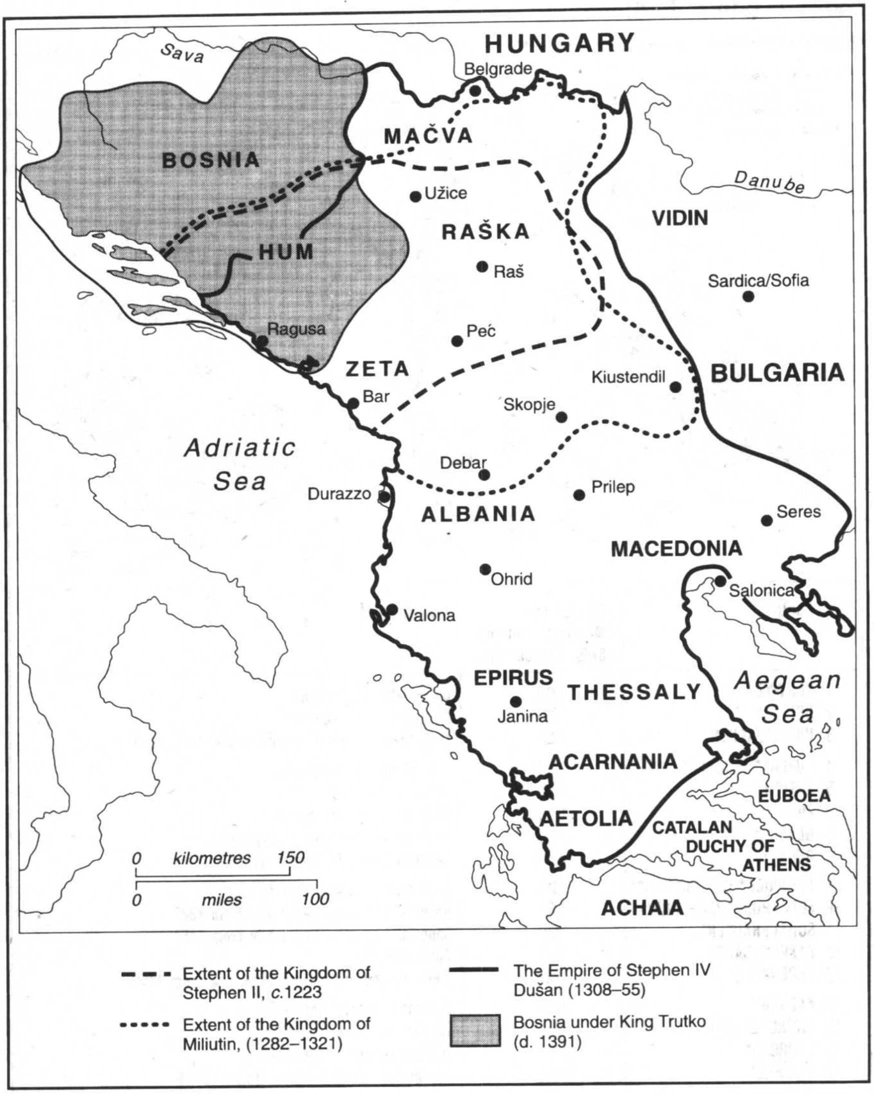
The Growth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the *Eidgenossenschaft*, 1291–1815 (simplified)



	Canton	Date of Full Membership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Previous status
1	SCHWYZ* **	1291	universitas of freemen
2	URI* **	1291	communitas of freemen
3	UNTERWALDEN* **	1291	free communities of Obwalden and Nidwalden
4	LUZERN* (LUCERNE) **	1332	city: Habsburg possession
5	ZURICH*	1351	imperial free city
6	ZUG*	1352	city: Habsburg possession
7	GLARUS*	1352	lands of the Convent of Säckingen
8	BERN*	1353	imperial free city from 1191
9	FRIBOURG* (FREIBOURG)**	1481	Free city of Savoy from 1178
10	SOLOTHURN* (SOLEURE)	1481	imperial free city: Swiss ally from 1385
11	SCHAFFHAUSEN*	1501	imperial free city: Swiss ally from 1454
12	BASEL* (BÂLE)	1501	Episcopal city
13	APPENZELL*	1513	Swiss protectorate from 1411, ally from 1452
14	AARGAU*	1803	subject territory from 1415
15	TICINO* (TESSIN)	1803	subject territory from 1440
16	THURGAU*	1803	subject territory from 1460
17	ST GALL*	1803	associated abbatial state, from 1451–4
18	NEUCHÂTEL (NEUENBURG)	1815	allied state from 1406, Hohenzollern possession 1701–1857 annexed by France, 1798–1815
19	VAUD* (WAADTLAND)	1815	subject territory from 1536
20	GENÈVE (GENF, GENEVA)	1815	Prince–bishopric: Swiss ally from 1536 (French department of Léman, 1803–15)
21	VALAIS (WALLIS) **	1815	Bishopric of Sion: ally from 1416–17 (French department of Simplon, 1810–15)
22	GRAUBUNDEN (GRISONS)	1815	League of God's House (1367) *Oberbund* : Mountain League (1399) League of Ten Jurisdictions (1436) } allied Rhaetian leagues from 1497 to the Cisalpine Republic, from 1797
23	JURA*	1978	allied Bishopric of Basel, 1579–1798: thereafter to Bern

* Component of the Helvetian Republic, 1798–1803. ** Member of the *Sonderbund*, 1845–7

[1258] **Medieval Serbia and Bosnia**



The Growth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Europe, 1355–1683

[1259]



① Royal Hungary (to Habsburgs, from 1529)
② Ottoman Hungary (1529–1697)
③ Transylva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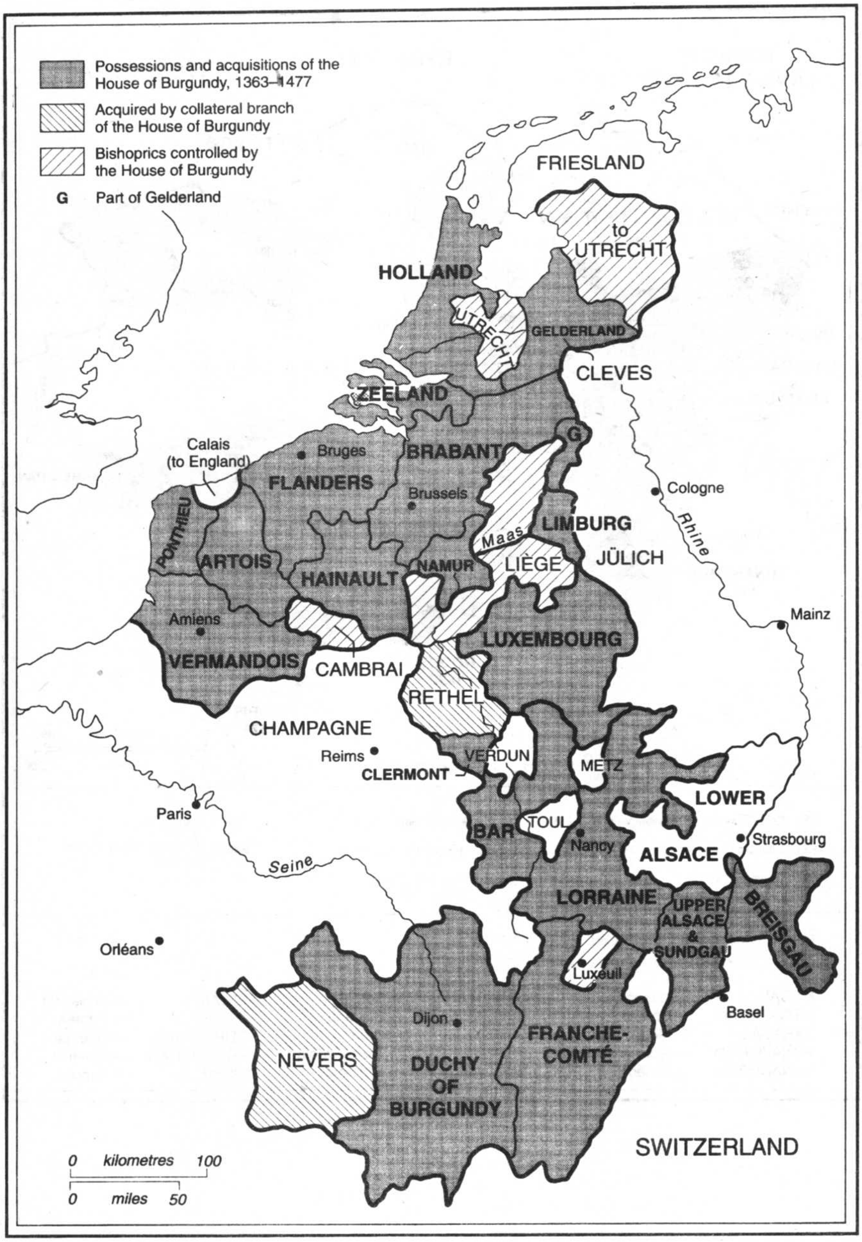
Ottoman Realm 1355
Ottoman Realm 1481
Maximum extent of Empire 1682–3

Battlefields
Habsburg military frontier after 1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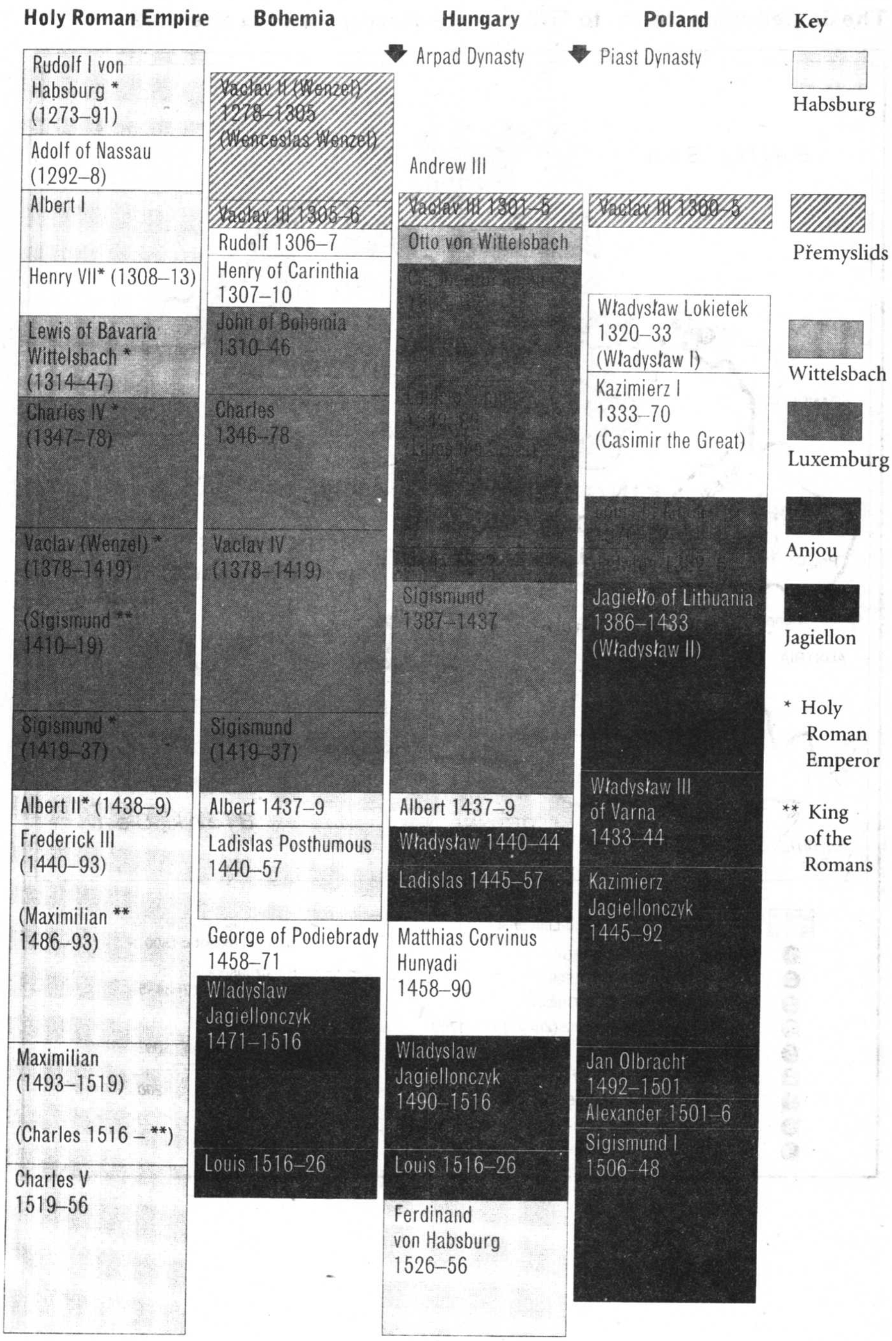
RUMELI BEYLERBEYLIĞI (Lordship of Lordships of RUMELI)
ANADOLU BEYLERBEYLIĞI (Lordship of Lordships of ANATOLIA)

MACARISTAN — Hungary
HIRVATISTAN — Croatia
KARADAG — Montenegro
ARNAVUTLUK — Albania
YUNANISTAN — Greece
SIRBISTAN — Serbia
BULGARISTAN — Bulgaria
GIRIT — Crete
ERDIL — Transylvania
BUĞDAN — Moldava
EFLAK — Wallachia
KIRIM — Crimea
GÜRCISTAN — Georgia
ERMENISTAN — Armenia
KIBRIS — Cyprus

[1260] Fifteenth-Century Burgundy



[1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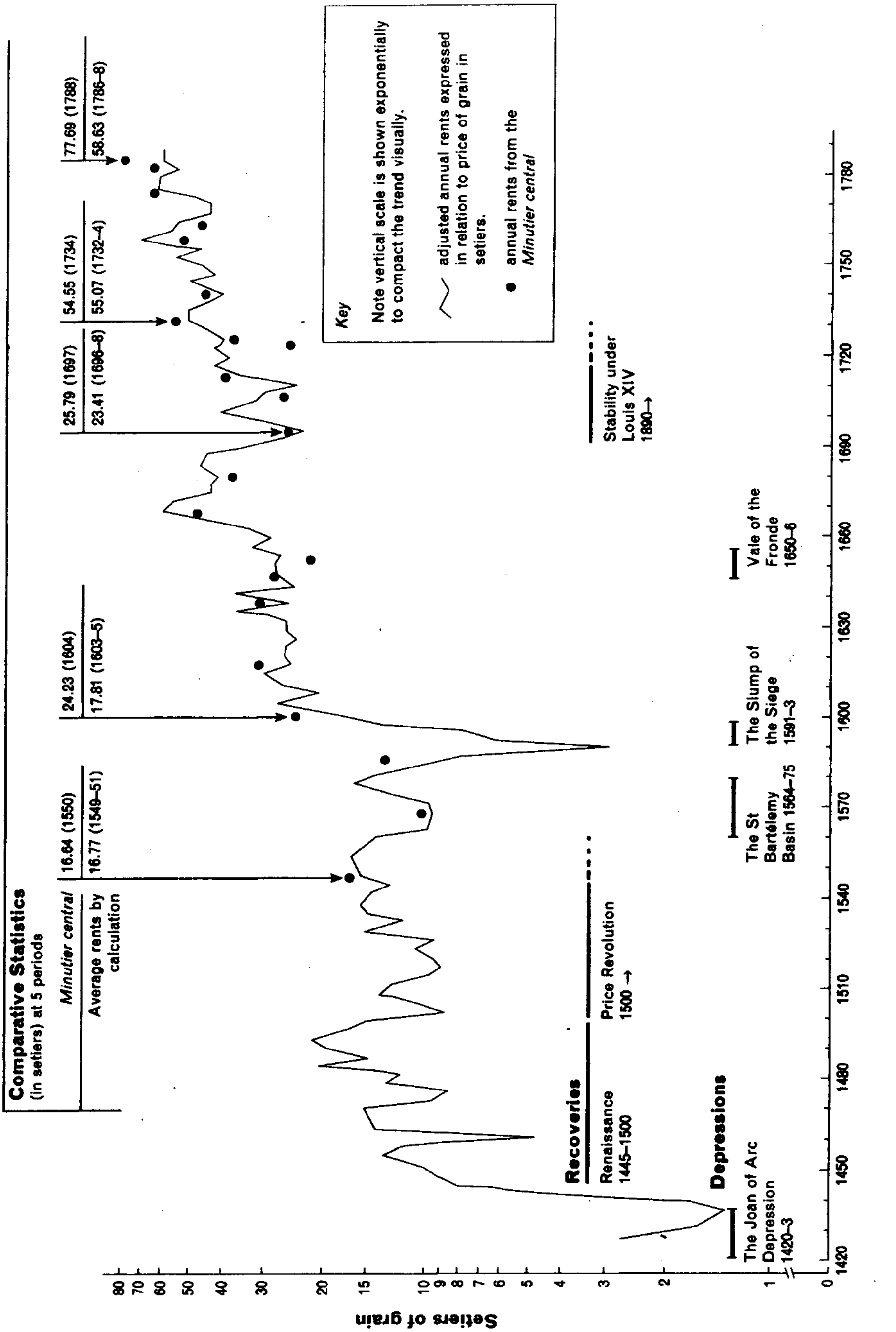

Holy Roman Empire
Bohemia
Hungary
Poland
Key
Arpad Dynasty
Piast Dynasty
Rudolf I von Habsburg * (1273–91)
Adolf of Nassau (1292–8)
Albert I
Henry VII* (1308–13)
Lewis of Bavaria Wittelsbach * (1314–47)
Charles IV * (1347–78)
Vaclav (Wenzel) * (1378–1419)
(Sigismund ** 1410–19)
Sigismund * (1419–37)
Albert II* (1438–9)
Frederick III (1440–93)
(Maximilian ** 1486–93)
Maximilian (1493–1519)
(Charles 1516 – **)
Charles V 1519–56
Vaclav II (Wenzel) 1278–1305 (Wenceslas Wenzel)
Vaclav III 1305–6
Rudolf 1306–7
Henry of Carinthia 1307–10
John of Bohemia 1310–46
Charles 1346–78
Vaclav IV (1378–1419)
Sigismund (1419–37)
Albert 1437–9
Ladislas Posthumous 1440–57
George of Podiebrady 1458–71
Władysław Jagiellonczyk 1471–1516
Louis 1516–26
Andrew III
Vaclav III 1301–5
Otto von Wittelsbach
Sigismund 1387–1437
Albert 1437–9
Władysław 1440–44
Ladislas 1445–57
Matthias Corvinus Hunyadi 1458–90
Wladyslaw Jagiellonczyk 1490–1516
Louis 1516–26
Ferdinand von Habsburg 1526–56
Vaclav III 1300–5
Władysław Lokietek 1320–33 (Władysław I)
Kazimierz I 1333–70 (Casimir the Great)
Jagiełło of Lithuania 1386–1433 (Władysław II)
Władysław III of Varna 1433–44
Kazimierz Jagiellonczyk 1445–92
Jan Olbracht 1492–1501
Alexander 1501–6
Sigismund I 1506–48
Habsburg
Přemyslids
Wittelsbach
Luxemburg
Anjou
Jagiellon
* Holy Roman Emperor
** King of the Romans

[1262] The Jagiellonian Realm to 1572, and the *Rzeczpospolita* after 1572



Paris *Rentes*, 1420–1787

[1263]



[1264] Poland, Rus′, Muscovy and Russia: Princes, Kings, Tsars, Emperors

POLAND

Piast Dynasty

9th cent.?	Piast
pre-965–91	Mieszko I
992–1025	Bolesław I (the Brave)*
1025–37	Mieszko II*
1038–58	Casimir I (the Restorer)
1058–79	Bolesław II (the Generous)*
1079–1102	Władysław Herman
1102–38	Bolesław III (the Wry-mouthed)
1138–46	Władysław II (the Exile)
1146–77	Bolesław IV (the Curly) of Mazovia
1173–7	Mieszko III
1177–94	Casimir II (the Just) of Sandomierz
1194–1202	Meszko the Elder, of Wielkopolska
1202–27	Leszek the White, of Sandomierz
1228–31	Władysław III (Spindleshanks) of Wielkopolska
1231–8	Henry I Brodaty of Silesia
1238–41	Henry II of Silesia
1241–3	Konrad I Mazowiecki
1243–79	Bolesław V of Sandomierz
1279–88	Leszek (the Black)
1288–90	Henry IV of Silesia
1290–1300	Przemysl I Wielkopolski
1300–5	Vaclav II (King of Bohemia)
1305–6	Vaclav II (King of Bohemia)
1306–33	Władysław I* (the Elbow-high)
1333–70	Casimir III* (the Great)

Angevin Dynasty

1370–82	Louis of Anjou* (King of Hungary)
1384–6	Jadwiga (Hedwig) of Anjou* (1386–99, co-monarch)

Jagiellonian Dynasty

1386–1434	Władysław Jagiełło*
1434–44	Władysław III* of Varna (King of Hungary)
1444–92	Kazimierz IV of Jagiellonczyk*
1492–1501	Jan Olbracht (John Albert)*
1501–6	Alexander*
1506–48	Zygmunt Stary (Sigismund I)*
1548–72	Sigismund II Augustus*

Elected Kings of the Rzeczpospolita

1573–4	Henry de Valois of France*
1576–86	Stefan Bathory* of Transylvania
1587–1632	Sigismund III* Vasa of Sweden
1632–48	Władysław IV* Vasa
1648–68	Jan Kazimierz Vasa*
1669–73	Michał Korybut Wiśniowiecki*
1674–96	Jan III Sobieski*
1697–1704	Augustus II Wettin* of Saxony
1704–10	Stanisław Leszczyński*
1710–33	Augustus II Wettin*
1733–63	Augustus III Wettin*
1764–95	Stanisław-August Poniatowski*

KIEVAN RUS′

Rurikid Dynasty

c.862–79	Rurik, Prince of Novgorod
880–	Oleg, Prince of Kiev
912–45	Igor
945–69	Olga, St
969–80	Sviatoslav
980–1015	Vladimir, St (Volodymyr)
1019–54	Yaroslav the Wise
1113–25	Vladimir Monomakh of Rostov
1155–7	Yuri Dolgorukii of Kiev
1157–74	Andrei Bogoliubskii of Vladimir & Suzdal
1178–1202	Igor of Sever
1240–63	Alexander Nevskii, of Novgorod & Vladimir
1235–65	Daniel Romanowicz, of Halich

MUSCOVY

(Rurikid) Grand Dukes of Moscow

1305–40	Ivan I Kalita
1350–89	Dmitri Donskoi
1389–1425	Vassili I
1425–62	Vassily II
1462–1505	Ivan III

Tsars of 'Moscow and All-Russia'

from 1473	Ivan III (the Great)
1505–33	Vasili III
1533–84	Ivan IV (the Terrible)
1584–98	Feodor I
1598–1605	Boris Godunov
1605	Feodor II
1605–6	Dmitri I
1606–10	Vasili Shuiski
1608–10	Dmitri II

Romanov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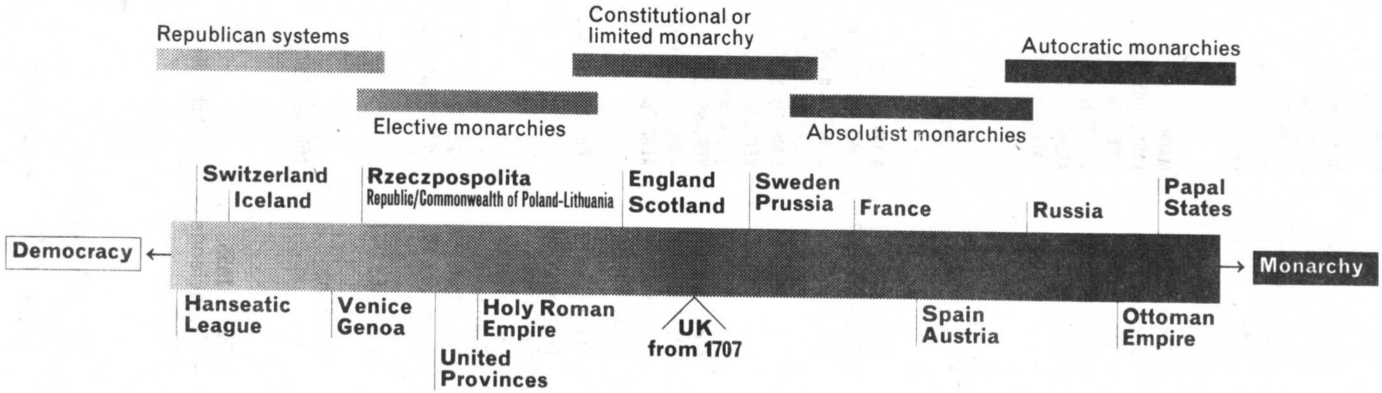
1613–45	Mikhail Romanov
1645–76	Alexei
1676–82	Feodor III
1682–9	Ivan V
1689–1725	Peter I (the Great)

Emperors of Russia

from 1721	Peter I (the Great)
1725–7	Catherine I
1727–30	Peter II
1730–40	Anne
1741–61	Elizabeth
1761–2	Peter III
1762–96	Catherine II (the Great)
1796–1801	Paul
1801–25	Alexander I**
1825–55	Nicholas I**
1855–81	Alexander II**
1881–94	Alexander III
1894–1917	Nicholas II (†1918)

* crowned King; ** also King of Pol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Systems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Rule by the people through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and elected officials.

Succession by contract between ruler-elect and the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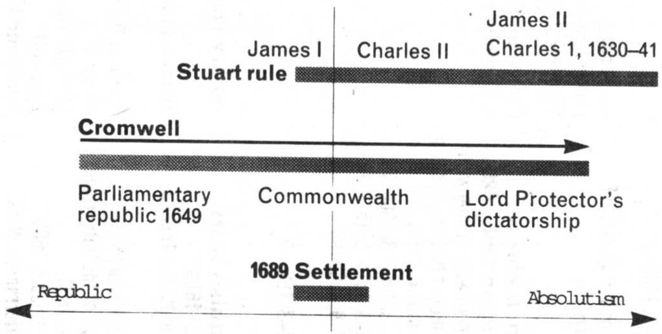
Rule by code of law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hich limits the powers of all, including the ruler.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itizens stressed against those of the ruler or the state.

Tendency to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growth of regional and local institutions.

Ancient models: Athens, Roman Republic.

England's shifting political system, 17th century



Principles of monarchy

Rule of one man (monarch, despot, autocrat) through appointed officials.

Succession by Divine Right, or self-nomination: the hereditary principle.

Ruler's will is supreme. 'Law' is equivalent to the 'ruler's decree'.

Rights of ruler stressed over those of the ruled.

Tendency to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atrophy of region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Ancient models: Sparta, Persia, Roman Empire.

[1266]

	Principal contestants	Principal battles	Peace treaties
The Italian Wars 1494–1518 Seven French expeditions 1494–8, 1499–1500, 1500–1, 1502–3, 1508–10, 1511–15, 1511–15	Successive French Kings from Charles VIII to Francis I v. Successive coalitions from initial League of Venice to Papal Leagues	Fornovo 1495 Novara 1500 Garigliano 1503 Agnadello 1509 Ravenna 1512 Marignano 1515	GRANADA 1500 LYONS 1504 NOYON 1516 FREIBURG 1516 LONDON 1518
Franco-Imperial Wars 1512–59 Five wars initially in continuation of the preceding Italian Wars: 1521–5, 1526–9, 1536–8, 1542–4, 1555–9	France v. Empire and the Empire's successive allies	Pavia 1525 Sack of Rome 1527 Aversa 1528 Turin 1537	MADRID 1526 BARCELONA 1529 NICE 1538 CRESPI 1544 ANDRES 1546 CATEAU-CAMBRÉSIS 1559
German Wars of Religion	Emperor v. Protestant Princes Schmalkaldic League	Muhlberg 1547	FRIEDWOLD PASSAU 1551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629 Nine civil wars ending with the Edict of Nantes, plus two later Huguenot revolts: 1562–3, 1567–8, 1568–70, 1572–3, 1574–6, 1577, 1580, 1587–9, 1589–98 1622–3, 1627–9	Protestant Huguenots v. Catholic League	Dreux 1562 St Denis 1567 Jarnac 1568 Coutras Ivry 1590 Siege of Paris 1589–93	AMBOISE 1563 LONGJUMEAU 1568 ST GERMAIN 1570 LA ROCHELLE 1573 MONSIEUR 1576 BERGERAC 1577 FLEIX 1580 VERVINS 1598 MONTPELLIER 1622 ALAIS 1629
Spanish Wars 1502–1659	Spain v. Portugal	(Division of New World)	TORDESILLAS 1494
War of Naples 1502–3	Spain v. France	Terranova Garigliano	
North Africa 1562–3	Spain v. Barbary States	Tunis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66–1648	Spain v. United Provinces	Haarlem 1572 Antwerp 1576	1609–12 WESTPHALIA 1648
The 'Amada', 1588	England		
Mediterranean Wars	Spain and Empire v. Ottomans	Lepanto 1571	
Flanders War 1598–9	Spain v. France	Amiens	
Valtellina 1622–6	Spain v. France		MONZON 1626
Mantuan Succession 1627–31	Spain v. France		
[Spanish involvement in Thirty Years War]		Pavia 1655	
French War 1648–59	Spain v. France	Valenciennes 1656	PYRENEES 1659
Thirty Years Wars 1618–48	Empire & Catholic Princes & Spain v. Protestant Princes & their allies (esp. Denmark, Sweden, & France)		
Bohemian War 1618–23		White Mountain 1620	
Danish War 1624–9		Lutter 1626	LÜBECK 1629

	Principal contestants	Principal battles	Peace treaties
[Edict of Restitution 1629]		Breitenfeld 1631	
Swedish War 1630–5		Lützen 1633	
		Nordlingen 1634	PRAGUE 1635
French War 1635–48		Wittstock 1635	
		Rocroi 1643	WESTPHALIA 1648
England's Wars			
Tudors'Scots Wars 1469–1502, 1511–43	England v. Scotland in alliance with France	Flodden 1513 Solway Moss 1542	'PERPETUAL PEACE' 1502 GREENWICH 1543
Anglo-French Wars 1512–18, 1522–5, 1544–6, 1557–64, 1627–30	England v. France	Spurs 1513	LONDON 1518 ARDRES 1544 TROYES 1564
Spanish War 1564–1630	England v. Spain	Zutphen 1587	
N'lands Campaign 1585–7		Armada 1588	
Anglo-Irish Wars 1598–1603, 1651–4	Expeditions of Mountjoy, Essex & Cromwell		
'English Civil War' 1642–6	Scots intervention 1644–6, 1647–51		
Three Anglo-Dutch Wars 1652–4, 1664–7, 1672–4	England v. UP		BREDA 1667 WESTMINSTER 1674
Sweden's Wars			
Wars of Independence 1500–23	Denmark v. Sweden & Norway		
Five Danish Wars 1563–70, 1611–13, 1657–60, 1675–9	Sweden v. Denmark		STETTIN 1570 KNÄRED 1613 COPENHAGEN 1660 LUND 1679
Two Muscovite Wars 1560–92, 1614–17	Sweden v. Moscow	Eslorua	STOLBOVA 1617
Three Polish Wars 1598–1611, 1617–29, 1655–60	Sweden v. Polish Vasas	Kirkholm 1605	STUMSDORF 1629
[Swedish involvement in Thirty Years War 1630–48]			OLIVA 1660
Poland's Wars			
Moldavian War 1497–9			
Six Muscovite Wars 1500–13, 1561–9, 1577–82, 1610–19, 1632–4, 1654–67	Poland-Lithuania v. Moscow	Smolensk 1511 Livonia Pskov 1582	ZAPOLYA 1582 DYLINO 1619 ANDRUSOVO 1667
Swedish Wars 1598–1611, 1617–29, 1655–60	Polish Vasas v. Swedish Vasas	Cecora 1620	OLIVA 1660
Two Ottoman Wars 1620–1, 1671–6		Chocim I 1621 Chocim II 1672	BUCZACZ 1674 ZURAWNO 1676

N.B. The complex of Livonian Campaigns between 1561 and 1592, which involved, *inter al.*, Poland, Sweden, Denmark, and Muscovy, might reasonably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Northern War'.

	Principal contestants	Principal battles	Peace treaties
Ottoman Wars			
Danube Campaigns 1481–1512			
Three Hungarian Wars 1521–47, 1551–62, 1573–81	v. Habsburgs	Mohacs 1526 Vienna 1529	
Mediterranean Wars & Venetian Wars 1569–72, 1648–69	v. Venice & Catholic Powers	Rhodes 1522 Siege of Malta 1565 Lepanto 1571 Siege of Crete 1648–69	

[1268] The Rise and Fall of European States, 1493–1993

Termina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r of the separate existence of states present in 1493

Aragon, Kingdom	1516
Astrakhan, Khanate	1556
Bohemia, Kingdom	1526
Burgundy, Duchy	1579
Castile, Kingdom	1516
Crimea, Khanate	1783
England, Kingdom	1707
Florence, Republic	1532
France, Kingdom	1792
Genoa, Republic	1797
Georgia, Kingdom	1801
Golden Horde, Khanate	1502
Holy Roman Empire	1806
Hungary, Kingdom	1526
Ireland	1801
Kazan, Khanate	1552
Lithuania, Grand Duchy	1569
Livonia	1561
Milan, Duchy	1535
Moldavia, Principality	1859
Moscow, Grand Duchy	1721
Naples, Kingdom	1860
Navarre, Kingdom	1516
Ottoman Empire	1920
Papal States	1870
Poland, Kingdom	1569
Portugal, Kingdom	1580
Scotland, Kingdom	1707
Teutonic State	1525
Union of Colmar	1523
Venice, Republic	1797
Wallachia, Principality	1859

Date of formation of the sovereign states present in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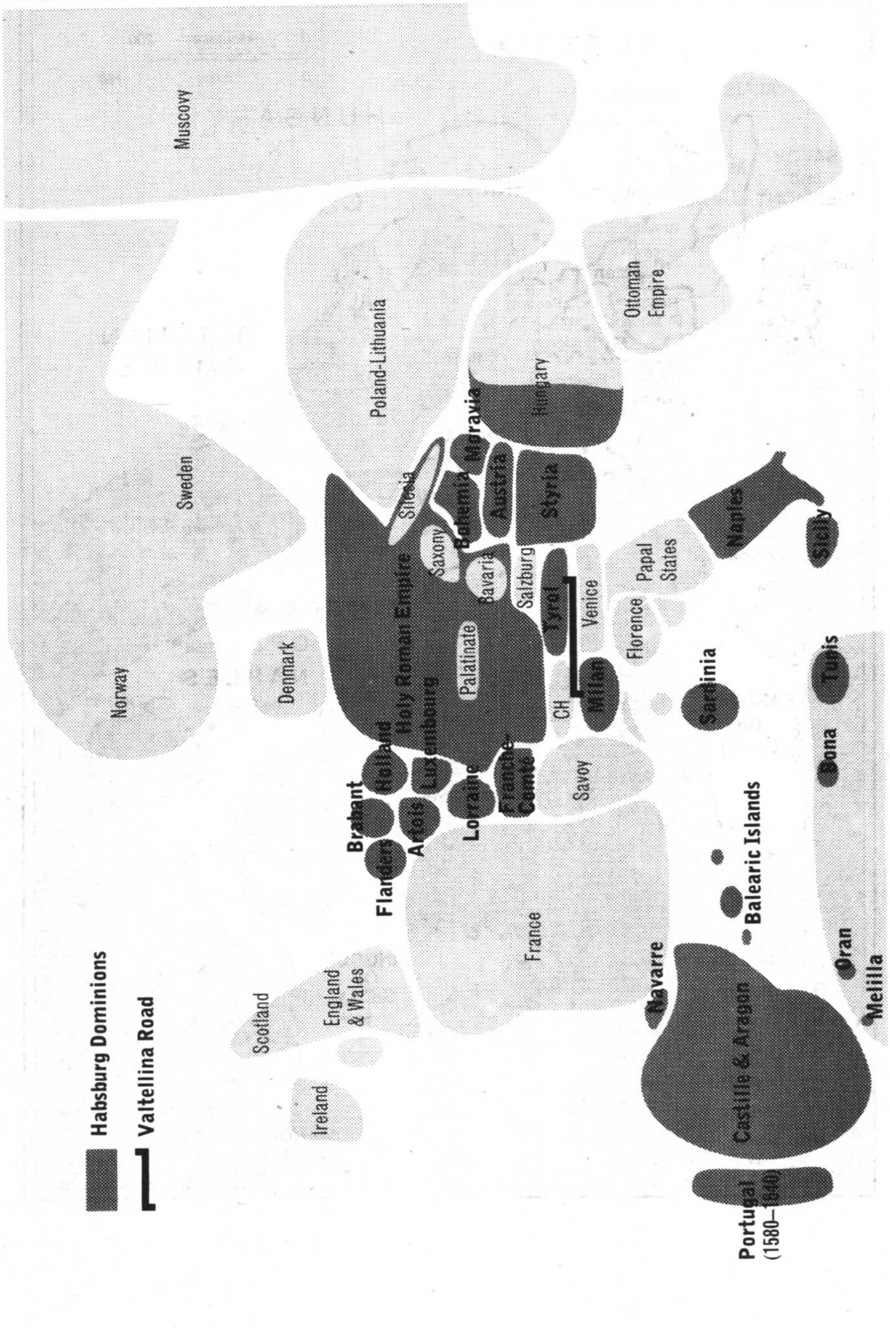
Albania, Republic	1913
Andorra, Principality	1278
Armenia, Republic*	1918 (1991)
Austria, Republic	1918 (1945)
Azerbaijan, Republic	1918 (1991)
Belarus', Republic*	1918 (1991)
Belgium, Kingdom	1830
Bosnia, Republic	1992
Bulgaria, Kingdom	1878
—— Republic*	1946 (1989)
Croatia, Republic	1941 (1992)
Cyprus, Republic	1960
Czech Republic*	1992
Denmark, Kingdom	1523
Estonia, Republic*	1918 (1991)
Finland, Republic	1917
France, Republic	1792 (1871)
Georgia, Republic*	1918 (1991)
Germany, Federal Republic*	1949 (1990)
Greece, Kingdom	1829
—— Republic	1973
Hungary, Regency	1918
—— Republic*	1946 (1989)
Iceland, Republic	1944
Ireland, Free State	1922
—— Republic	1949
Italy, Kingdom	1860
—— Republic	1946
Latvia, Republic*	1918 (1991)
Liechtenstein, Principality	1866
Lithuania, Republic*	1918 (1991)
Luxembourg, Grand Duchy	1890
Macedonia, Republic	1992
Malta, Republic	1964
Moldova, Republic	1991
Monaco, Principality	1297
Netherlands, Kingdom	1648
Norway, Kingdom	1905
Poland, Republic*	1918 (1989)
Portugal, Kingdom	1640
—— Republic	1910
Romania, Kingdom	1877
—— Republic*	1947 (1989)
Russia, Republic*	1917 (1991)
San Marino, Republic	1631
Slovakia, Republic*	1939 (1992)
Slovenia, Republic	1992
Spain, Kingdom	1516 (1976)
Sweden, Kingdom	1523
Switzerland, Confederation	1648
Turkey, Republic	1923
Ukraine, Republic*	1918 (1991)
United Kingdom	1707
Vatican State	1929
Yugoslavia, Federal Republic	1945

* States which lost all but nominal sovereignty for a period under Soviet domination.

Renaissance Italy [1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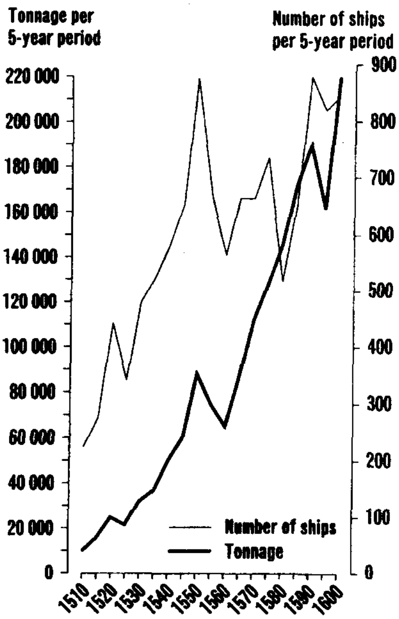
[1270] The Habsburg Dominions in Europe after 1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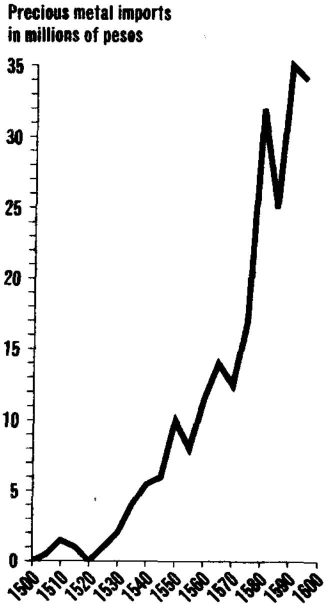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

[1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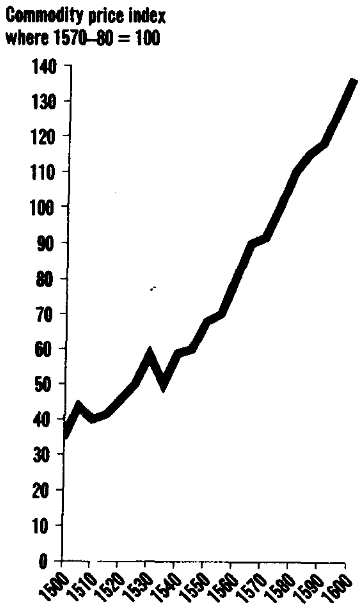
1 Shipping in the port of Seville, 1506–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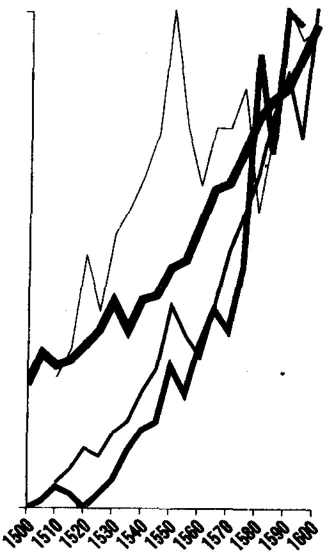
2 Importation of precious metals (gold and silver) into Spain, 1500–1600



3 Commodity prices 1500–1600



Graphs 1, 2, and 3 superimposed



[1272] a)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b)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1526–1951: A Selection

a)

P. A. Paracelsus	Basle, 1526	theory of disease
M. Kopernik	Frombork, 1543	heliocentrism
W. Harvey	London, 1628	blood circulation
R. Descartes	Amsterdam, 1644	analytical geometry
G. Leibniz	Leipzig, 1666	differential calculus
I. Newton	Cambridge 1666	laws of gravity
A. von Haller	Bern, 1757	neurology
H. Cavendish	London, 1766	hydrogen
K. Scheele	Uppsala, 1771	oxygen
S. Hahnemann	Leipzig, 1796	homeopathy
E. Jenner	London, 1796	vaccination
E.-L. Malus	Strasburg, 1808	polarization of light
B. Courtois	Paris, 1811	iodine
A.-J. Fresnell	France, 1815	frequency of light
J. J. Berzelius	Stockholm, 1818	atomic weight
H.-C. Oersted	Copenhagen, 1819	electromagnetism
G. Ohm	Cologne, 1827	electrical resistance
M. Faraday	London, 1831	electrical induction
J. von Liebig	Giessen, 1831	analysis of elements
R. Brown	London, 1831	cell nucleus
F. Runge	Berlin, 1833	phenol anilin
R. A. Kolliker	Zurich, 1841	spermatozoon
C. J. Doppler	Prague, 1842	acoustics
R. Remak	Berlin, 1852	segmentation of cells
W. Perkin	London, 1856	aniline dye
C. Darwin	London, 1859	theory of evolution
G. R. Kirchhoff	Heidelberg, 1859	spectral analysis
I. Semmelweis	Budapest, 1861	asepsis
G. Mendel	Brno, 1865	genetics
J. Lister	Glasgow, 1867	antisepsis
D. I. Mendeleev	St Petersburg, 1869	periodic table
E. Fischer	Munich, 1875	hydrazine: biochemistry
L. Pasteur	Paris, 1881	bacteriology
R. Koch	Berlin, 1882	tuberculosis bacillus
H. Hertz	Karlsruhe, 1888	electromagnetic waves
E. von Behring	Berlin, 1892	diphtheria serum
H. Lorentz	Leiden, 1895	electron theory
W. Röntgen	Wurzburg, 1895	X-rays
H. Becquerel	Paris, 1896	uranium radiation
J. J. Thompson	Cambridge, 1897	elektron
P. and M. Curie	Paris, 1898	radioactivity
M. Planck	Berlin, 1900	quantum theory
T. Boveri	Wurzburg, 1904	chromosomes
A. Einstein	Zurich, 1905	theory of relativity
H. K. Onnes	Leiden, 1911	superconductivity
E. Rutherford	Manchester, 1911	atomic structure
K. Funk	Cracow, 1911	vitamins
W. Heisenberg	Copenhagen, 1925	quantum mechanics
A. Fleming	London, 1928	penicillin: antibiotics
O. Hahn	Berlin, 1938	nuclear fission
Crick and Watson	London, 1951	structure of DNA

b) [1273]

J.Lippershey	Middleburg, 1608	telescope
Z. Janssen	Amsterdam, 1609	microscope
E. Torricelli	Rome,1643	mercury barometer
T. Savery	England, 1698	steam pump
G. Fahrenheit	Amsterdam, 1718	mercury thermometer
Jethro Tull	Hungerford, 1731	agricultural machinery
J. Watt	Birmingham, 1769	steam engine condenser
S. Crompton	Bolton, 1779	spinning mule
J. and J. Montgolfier	Annonay, 1783	hot-air balloon
C. Chappe	Paris, 1791	aerial telegraph
A. Volta	Bologna, 1800	electric battery
J.-M. Jacquard	Lyons, 1804	automated machinery
R. Laennec	Paris, 1816	stethoscope
C. Macintosh	Glasgow, 1823	waterproof fabric
G. Stephenson	Stockton, 1825	passenger railway
T. Telford	Menai Straits, 1825	suspension bridge
N. Niepce	Chalon-sur-Saône, 1826	photography
B. Fourneyron	Paris, 1827	turbine
C. Babbage	Cambridge, 1834	mechanical calculator
S. Bauer	Kiel, 1850	submarine
L. Foucault	Paris, 1852	gyroscope
H. Giffard	Paris, 1852	steam-powered airship
H. Bessemer	St Pancras, 1857	blast furnace: steel
J. Reis	Friedrichsdorf, 1861	telephone
A. Nobel	Stockholm, 1867	dynamite
W. von Siemens	Berlin, 1867	dynamo
N. Otto	Cologne, 1876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E. Berliner	Germany, 1877	microphone
C. von Linde	Munich, 1877	refrigerator
W. von Siemens	Berlin, 1879	electric locomotive
H. S. Maxim	London, 1883	machine-gun
G. Daimler	Connstatt, 1884	petrol engine
Daimler and Benz	Mannheim, 1885	motor car
R. Mannesmann	Düsseldorf, 1885	seamless pipes
H. Goodwin	London, 1887	photographic film
C. Ader	France, 1890	aeroplane
W. Maybach	Connstatt, 1892	carburettor
A. L. Lumière	Lyons, 1895	cinematograph
R. K. Diesel	Berlin, 1895	diesel engine
V. Poulsen	Copenhagen, 1898	magnetic sound-recording
F. Zeppelin	Berlin, 1900	dirigible airship
G. Marconi	London, 1901	radio transmitter
K. E. Tsiolkovsky	Moscow, 1903	rocketry
Bréguet-Richet	France, 1907	helicopter
British Army	Cambrai, 1915	military tank
J. Logie Baird	London, 1924	television
H. Geiger	Kiel, 1928	Geiger counter
F. Whittle	Cranwell, 1930	jet engine
Air Ministry	Dover, 1940	radar
Wilkes and Renwick	Manchester, 1946	EDSAC, computer
Power Ministry	Calder Hall, 1956	nuclear power station

Sources: Various. N.B. The subject of Historical Inventions is subject to historical invention.

[1274] Works and Authors Banned by the Papal Index, 1559–1952: A Selection

1559	Abelard	*opera omnia*
	Boccaccio	*Il Decamerone*
	Calvin	*opera omnia*
	Dante	*De Monarchia*
	Erasmus	*opera omnia*
1624	Luther	German Bible
1633	Descartes	selected works
1645	Sir Thomas Browne	*Religio Medici*
	Montaigne	*Essais*
1700	Locke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
1703	La Fontaine	*Contes nouvelles*
1734	Swift	*Tale of a Tub*
1738	Swedenborg	*Principia*
1752	Voltaire	*Lettres philosophiques*
1755	Richardson	*Pamela*
1759	Diderot	*Encyclopédie*
1763	Rousseau	*Émile*
1766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178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89	Pascal	*Lettres provinciales*
1791	de Sade	*Justine; Juliette*
1792	Paine	*Rights of Man*
1806	Rousseau	*La Nouvelle Héloïse*
1819	Sterne	*A Sentimental Journey*
1827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834	Casanova	*Mémoires*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Les Misérables
1836	Heine	*De l'Allemagne; Reisebilder*
1841	Balzac	*opera omnia*
1836	Dumas	all romances
1864	Flaubert	*Madame Bovary*
		Salammbô
1894	Zola	*opera omnia*
1911	d'Annunzio	selected works
1914	Maeterlinck	*opera omnia*
1922	France	*opera omnia*
1937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939	Stendhal	*opera omnia*
1948	Descartes	*Méditations*
1952	Gide	*opera om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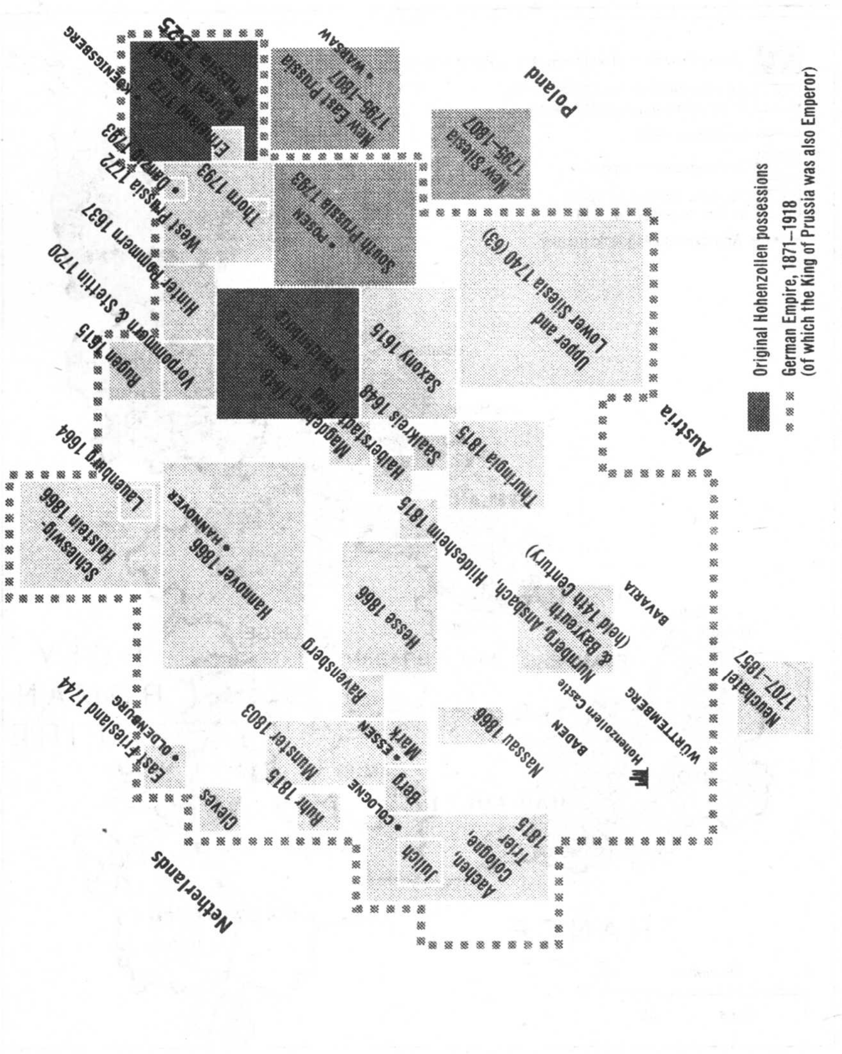
Source: N. Parsons, *The Book of Literary Lists* (London, 1985), 207–13; in turn from A. L. Haight, Banned Books (1955).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84–1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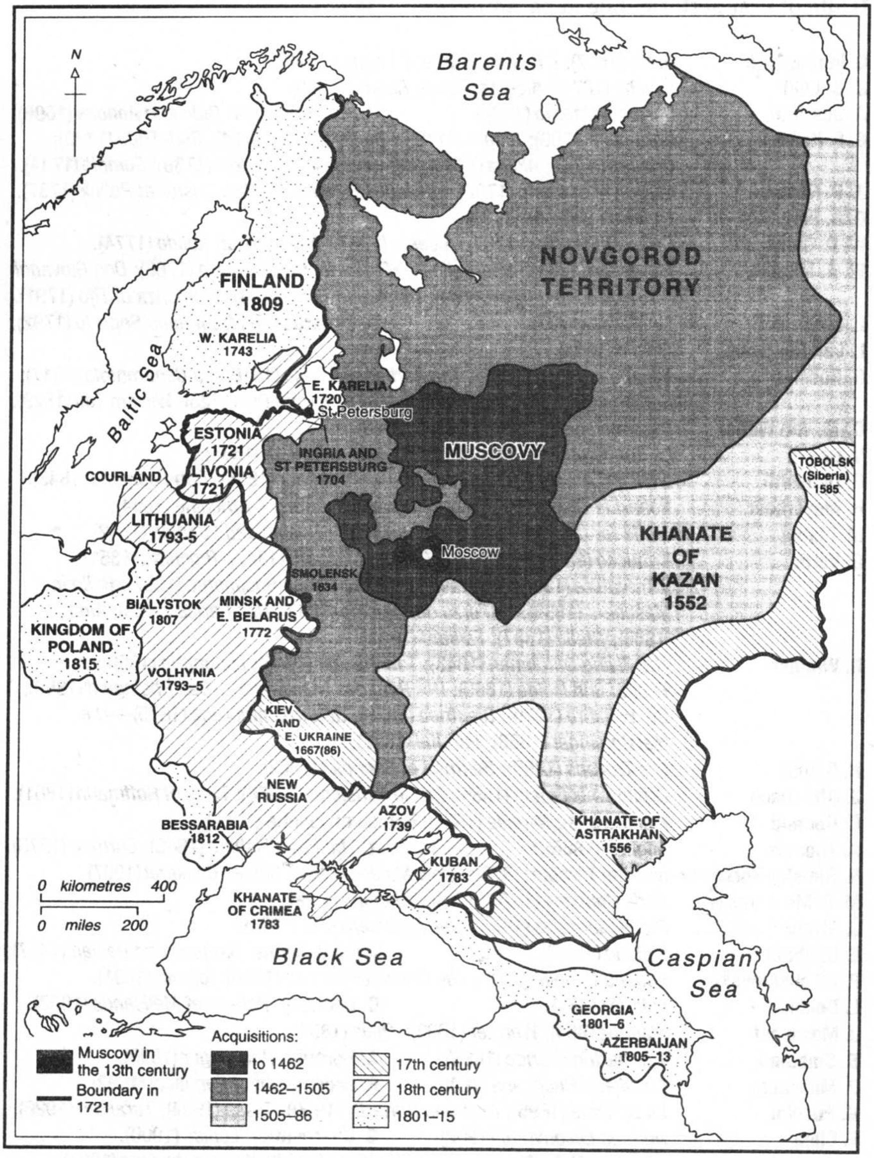
[1275]



[1276] **The Prussian Agglomeration, 1525–1871**



Russia's Expansion into Europe, 1552–1815 [1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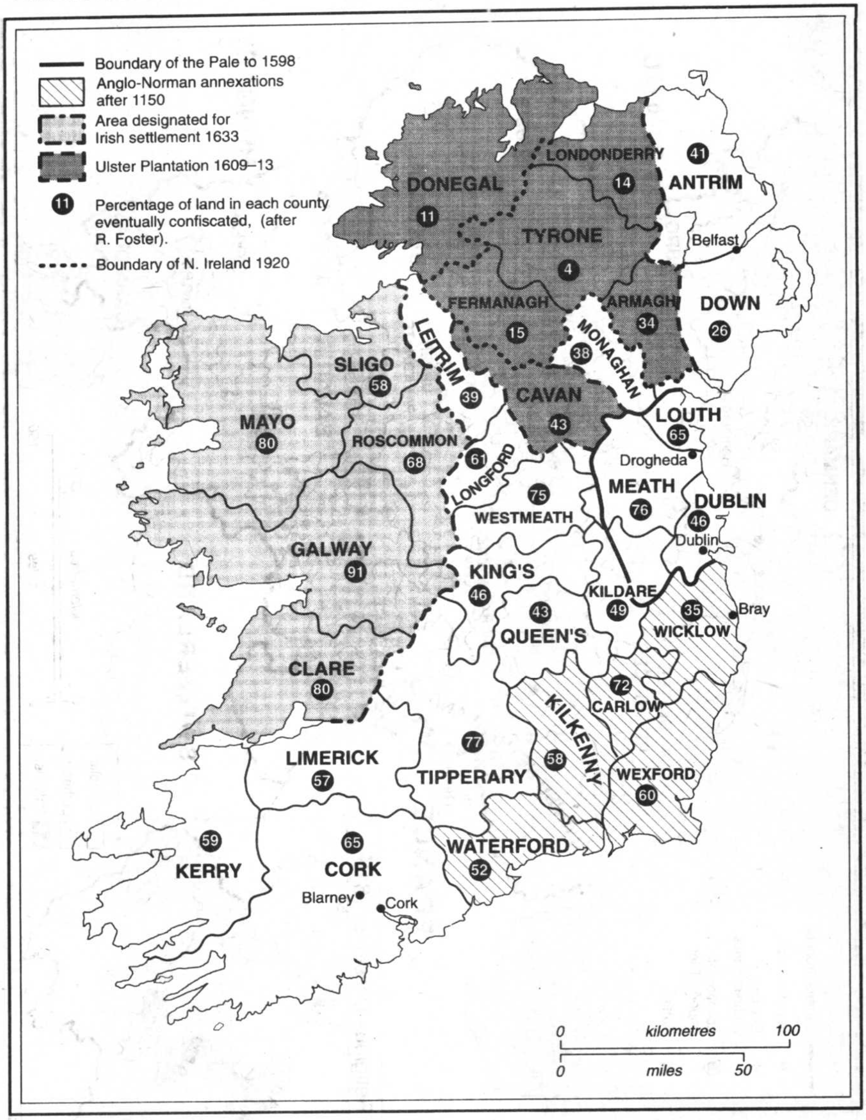


[1278] The Standard Repertoire of Grand Opera, 1609–1969
(Date of first performance in parentheses)

C. Monteverdi	*Orfeo* (1607); *L'Incoronazione di Poppea* (1642).
J.-B. Lulli	*Psyche* (1671); *Alceste* (1674); *Roland* (1685).
A. Scarlatti	*Pirro e Demetrio* (1694). **H. Purcell** *Dido and Aeneas* (1696).
G. F. Handel	*Agrippina* (1709); *Rinaldo* (1709); *Giulio Cesare* (1724); *Rodelinda* (1725); *Orlando* (1733); *Alcina* (1735); *Berenice* (1737); *Xerxes* (1738); *Semele* (1744).
J.-P. Rameau	*Hippolyte et Aricie* (1732); *Les Indes galantes* (1735); *Castor et Pollux* (1737).
G. B. Pergolesi	*La Serva Padrone* (1733).
W. C. Gluck	*Orfeo et Eurydice* (1767); *Alceste* (1767); *Iphigenie en Aulide* (1774).
W. A. Mozart	*Idomeneo* (1781); *Il Seraglio* (1782); *Le Nozze de Figaro* (1786); *Don Giovanni* (1787); *Così fan tutte* (1790); *Die Zauberflöte* (1791); *Clemenza di Tito* (1791).
L. Cherubini	*La Medée* (1797). **D. Cimerosa** *Il Matrimonio Segreto* (1792).
L. van Beethoven	*Fidelio* (1814).
G. Rossini	*Italiana in Algeri* (1813); *The Barber of Seville* (1816); *La Cenerentola* (1817); *Gazza Ladra* (1817); *Semiramide* (1823); *Comte Ory* (1828); *William Tell* (1829).
C.-M. von Weber	*Der Freischutz* (1821); *Oberon* (1826).
V. Bellini	*La Sonnambula* (1831); *Norma* (1831); *I Puritani* (1835).
G. Donizetti	*L'Elisit d'Amore* (1832); *Lucia di Lammermoor* (1835); *Don Pasquale* (1843).
H. Meyerbeer	*Robert le Diable* (1931); *Les Huguenots* (1836); *L'Africaine* (1864).
M. Glinka	*A Life for the Tsar (Ivan Susanin)* (1836); *Ruslan and Ludmila* (1842).
G. Verdi	*Nabucco* (1842); *I Lombardi* (1843); *Macbeth* (1847); *Rigoletto* (1851); *Il Trovatore* (1853); *La Traviata* (1853); *Simon Bocanegra* (1857); *Ballo in Maschera* (1859); *La Forza del Destino* (1862); *Don Carlos* (1869); *Aida* (1869); *Otello* (1887); *Falstaff* (1893).
R. Wagner	*The Flying Dutchman* (1843); *Tannhäuser* (1845); *Lohengrin* (1850); *Tristan und Isolde* (1865); *Der Ring des Nibelungen—Das Rheingold* (1869); *Die Walküre* (1870); *Siegfried* (1876); *Gotterdämmerung* (1876)—*Die Meistersinger* (1868); *Parsifal* (1882).
H. Berlioz	*Les Troyans* (1855); *Béatrice et Bénédict* (1862).
J. Offenbach	*Orphée aux Enfers* (1855); *La Vie Parisienne* (1866); *Tales of Hoffmann* (1881).
C. Gounod	*Faust* (1859); *Mireille* (1864); Roméo et Juliette (1867).
A. Thomas	*Mignon* (1866). **G. Bizet** *The Pearl Fishers* (1863); *Carmen* (1875).
N. Rimsky-Korsakov	*Ivan the Terrible* (1873); *Snow Maiden* (1881); *Golden Cockerel* (1907).
M. P. Mussorgsky	*Boris Godunov* (1874); *Khovanshchina* (1886).
J. Strauss, Jnr.,	*Die Fledermaus* (1874); *Der Zigeunerbaron* (1885).
E. Chabrier	*L'Etoile* (1877). **C. Saint-Saëns** *Samson and Delilah* (1877).
P. I. Tchaikovsky	*Eugene Onegin* (1878); *The Queen of Spades* (1890); *Iolanta* (1891).
L. Delibes	*Lakmé* (1883). **C. Debussy** *Pelléas et Mélisande* (1902).
J. Massenet	*Manon* (1884); *Werther* (1892); *Thais* (1894).
B. Smetana	*The Bartered Bride* (1886). **A. Borodin** *Prince Igor* (1890).
P. Mascagni	*Cavalleria Rusticana* (1890). **R. Leoncavallo** *I Pagliacci* (1892).
G. Puccini	*La Bohème* (1895); *Madame Butterfly* (1900); *Tosca* (1904); *Turandot* (1926).
F. Cilea	*Adriana Lecouvreur* (1902). **G. Charpentier** *Louise* (1900).
L. Janáček	*Jenufa* (1904); *The Cunning Little Vixen* (1924); *Katya Kabanova* (1921).
R. Strauss	*Salome* (1905); *Elektra* (1909); *Der Rosenkavalier* (1911); *Ariadne auf Naxos* (1912); *Intermezzo* (1924); *Arabella* (1933); *Capriccio* (1942).
B. Bartok	*Bluebeard's Castle* (1911). **M. de Falla** *La Vida Breve* (1915).
M. Ravel	*L'Heure Espagnole* (1911); *L'Enfant et les sortilèges* (1925).
S. Prokofiev	*The Love for Three Oranges* (1919); *War and Peace* (1945).
P. Hindemith	*Cardillac* (1926); *Harmonie der Welt* (1957).

The Colonization of Ireland (Seventeen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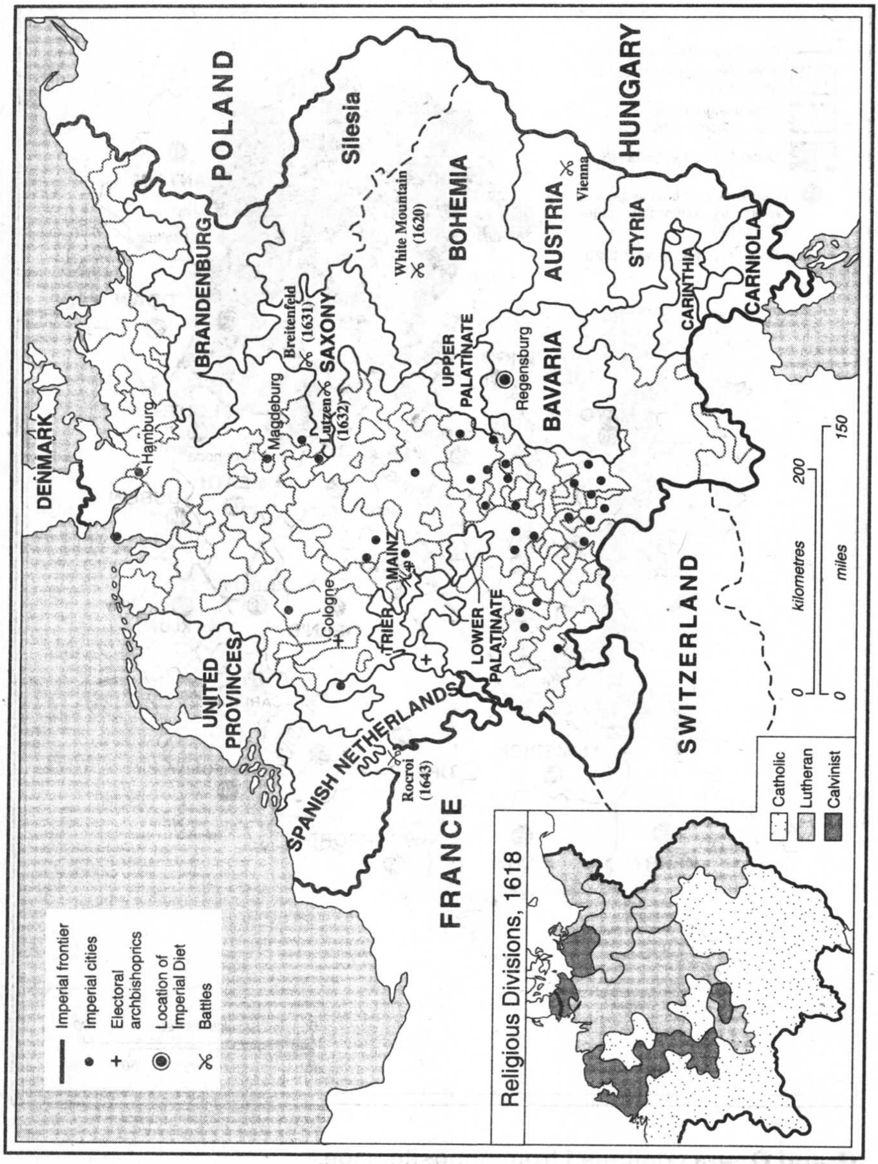
[1279]



Grand Opera continued from opposit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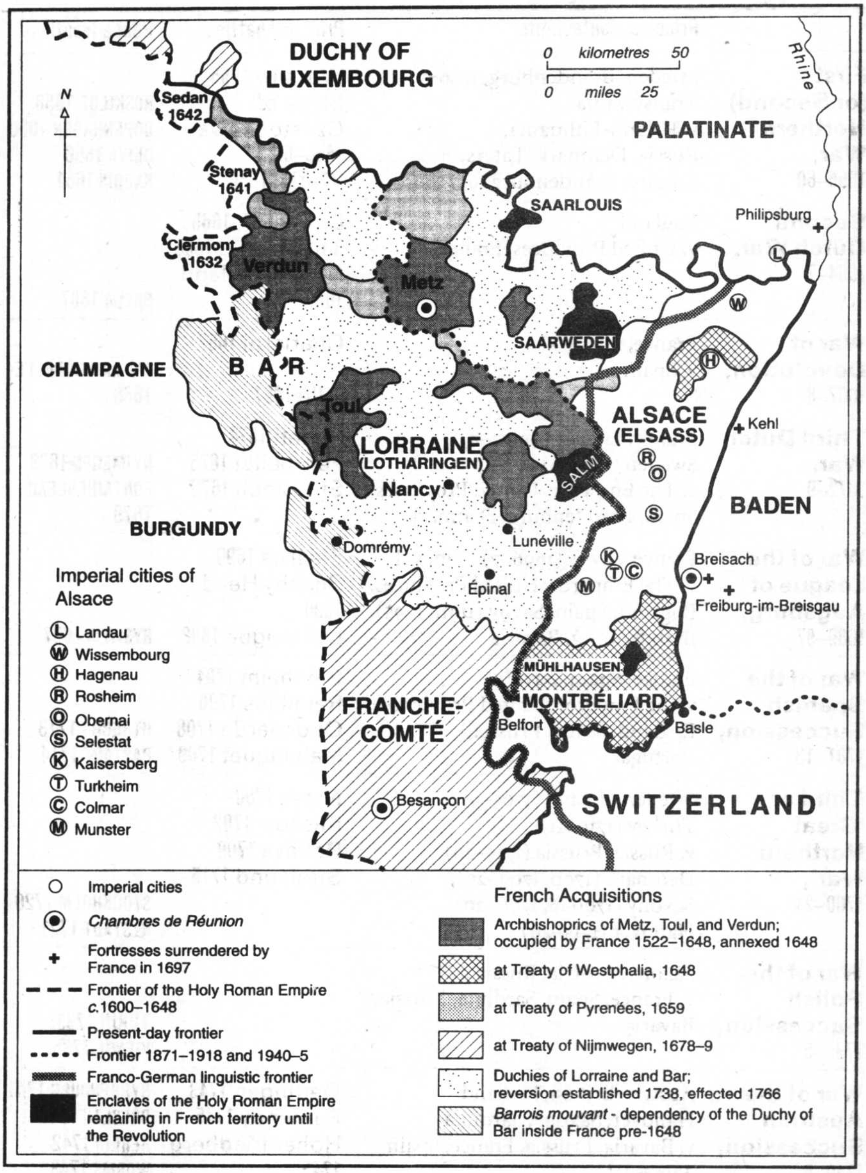
A. Berg	*Wozzeck* (1925).
I. Stravinsky	*Oedipus Rex* (1927); *The Rake's Progress* (1951).
A. Schoenberg	*Moses and Aaron* (1932).
D. Shostakovich	*Lady Macbeth of Mtzensk* (1936).
F. Poulenc	*Les Mamelles de Tirésias* (1947); *Les Dialogues des Carmelites* (1957).
B. Britten	*Peter Grimes* (1945), *Billy Bud* (1951); *Turn of the Screw* (1954);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1960); *Death in Venice* (1973).
W. Walton	*Troilus and Cressida* (1954).
M. Tippett	*Midsummer Marriage* (1955); *King Priam* (1961).
K. Penderecki	*The Devils of Loudun* (1969).

[1280] Germany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48



The Franco-German Frontier in Lorraine and Alsace

[1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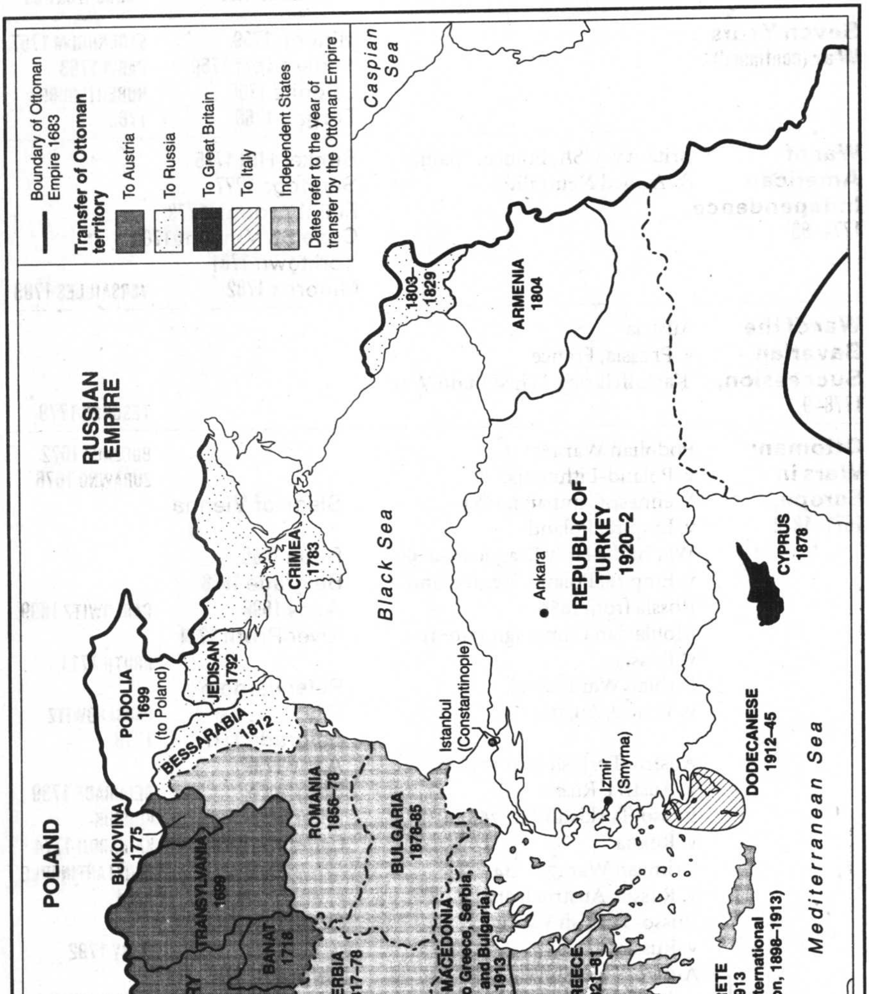
[1282] Europe's Wars, 1648–1789: A Selection

	Principal contestants	Principal battles	Peace treaties
First (or Second) Northern War, 1655–60	Sweden, Brandenburg, 1656–7, Transylvania v. Poland-Lithuania, Russia, Denmark, Tatars, Empire, Brandenburg 1657–60	Warsaw 1655 Siege of Czestochowa 1655–6 Warka 1656	ROSKILDE 1658 COPENHAGEN 1660 OLIVA 1660 KARDIS 1661
Second Dutch War, 1664–7	England v. United Provinces, France	Lowestoft 1665 The Downs 1666 North Foreland 1666	BREDA 1667
War of Devolution, 1667–8	France, Portugal v. Spain	Charleroi 1667 Lille 1667	AIX-LA-CHAPELLE 1668
Third Dutch War, 1672–9	France, England (1672–4), Sweden (1675–9) v. The Emperor, United Provinces, Spain, Brandenburg, Denmark	Seneff 1674 Fehrbellin 1675 Stromboli 1676	NYJMEGEN 1679 FONTAINEBLEAU 1679
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 1689–97	France, Savoy (1696–7), James II v. The Emperor, United Provinces, England, Spain, Savoy (until 1695), Brandenburg, Bavaria	Fleurus 1690 Beachy Head 1690 La Hougue 1692	RYSWIJK 1697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1–13	France, Spain, Bavaria v. the Emperor, United Provinces, England, Savoy, Prussia, Portugal	Blenheim 1704 Ramillies 1706 Oudenarde 1708 Malplaquet 1709	UTRECHT 1713 RASTADT 1714
Third or 'Great Northern War', 1700–21	Sweden, Poland (1705–9), Turkey (1710–11) v. Russia, Prussia (1715–20), Denmark (1700, 1709–20), Saxony (1700–6, 1709–20), Hanover (1715–20)	Narva 1700 Kliszów 1702 Poltava 1709 Stralsund 1715	STOCKHOLM 1720 NYSTADT 1721
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 1733–5	Saxony, Austria, Russia v. France, Spain, Sardinia, Prussia, Bavaria		TURIN 1733 VIENNA 1735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8	Austria, Britain, Holland, Hanover, Saxony, Sardinia v. Bavaria, Prussia, France, Spain, James III	Dettingen 1743 Fontenoy 1745 Hohenfriedberg 1745	NYPHENBURG 1741 BRESLAU 1741 BERLIN 1742 WORMS 1743 WARSAW 1745 AIX-LA-CHAPELLE 1748
Seven Years War, 1756–63	Saxony, Austria, France, Sweden, Russia (until 1762) v. Prussia, Britain, Hanover	Grossjägersdorf 1757 Rossbach 1757 Zorndorf 1758	WESTMINSTER 1756

	Principal contestants	Principal battles	Peace treaties
Seven Years War (continued)		Minden 1759 Kunersdorf 1759 Leignitz 1760 Torgau 1760	STOCKHOLM 1757 PARIS 1763 HUBERTSBURG 1763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4–83	Britain v. USA, France, Spain, & 'Armed Neutrality'	Bunker Hill 1775 Saratoga 1777 Flamborough 1779 Cape St. Vincent 1780 Yorktown 1781 Minorca 1782	VERSAILLES 1783
War of the Bavarian Succession, 1778–9	Austria v. Prussia, France 'Kartoffelkrieg' 'The Potato War'		TESCHEN 1779
Ottoman Wars in Europe, 1671–1812	Podolian War 1671–6 v. Poland-Lithuania		BUCZACZ 1672 ZURAWNO 1676
	Viennese Campaign 1683 v. Empire, Poland	Siege of Vienna	
	War of the Holy League 1684–99 v. Empire, Poland, Venice, and Russia from 1689	Buda 1686 Belgrade 1688 Azov 1696	CARLOWITZ 1699
	Moldavian Campaign 1710–11 v. Russia	River Pruth 1711	PRUTH 1711
	Serbian War 1714–18 v. Venice, Austria	Peterwardein 1716 Belgrade 1717	PASSAROWITZ 1718
	Austro-Turkish War 1736–9 v. Austria, Russia	Azov 1736 Belgrade	BELGRADE 1739
	Russo-Turkish War 1768–74 v. Russia	Akerman 1769 Chesmé 1770	KUCHUK-KAINARDJI 1774
	Crimean War 1778–84 v. Russia, Austria from 1781		CONSTANTINOPLE 1784
	Russo-Turkish War 1787–92 v. Russia	Ochakov 1788	JASSY 1792
	Austro-Turkish War 1788–91 v. Austria	Belgrade 1789	SISTOVA 1791
	Russo-Turkish War 1806–12 v. Russia		BUCHAREST 1812
Wars of the Polish Partitions, 1768–95	War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Bar 1768–72. Polish Confederates v. Russia, Prussia, Austria	Siege of Czestochowa 1771–2	TREATY OF THE FIRST PARTITION 1772
	War of the Second Partition 1792–3 Poland v. Russia, Prussia, and Confederates of Targowica	Zieleńce 1792 Dubienka 1792	TREATY OF THE SECOND PARTITION 1793
	War of Poland's National Rising 1794–5. Polish Insurrectionaries (T. Kościuszko) v. Russia, Prussia, Austria	Racławice 1794 Maciejowice 1794	TREATY OF THE THIRD PARTITION 1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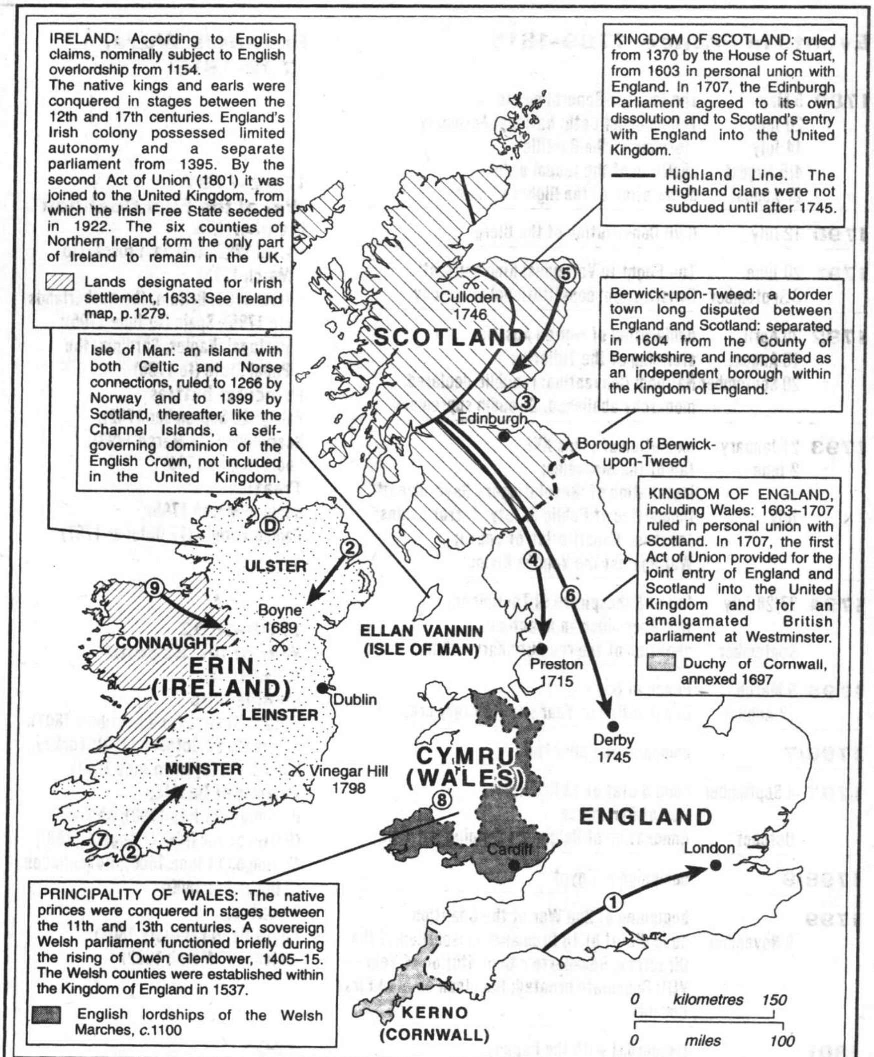
[1283]

[1284] **The 'Eastern Question': Ottoman Decline, 1683–1920**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07–1922

[1285]



① Nov. 1688 Invasion route of William of Orange from Torbay to London.

② 1689 Irish expeditions of James II from Kinsale in the south and of William of Orange from Carrickfergus in the north.

③ 1708 Abortive expedition to the Firth of Forth by James III, the 'Old Pretender'.

④ 1715 Invasion of England by the forces of the first Jacobite Rising, the 'Fifteen'.

⑤ 1715–16 Peterhead to Scone: the march of the 'Old Pretender'.

⑥ 1745 Invasion of England by the forces of the second Jacobite Rising, 'the Forty-five'.

⑦ 1796 Abortive landing of General Hoche and his French fleet at Bantry Bay.

⑧ 1797 'The Fishguard Invasion': abortive landing of French troops under the Irish-American adventurer, General Tate.

⑨ 1798 General Humbert's landing at Killala (Co. Mayo) and his march to Longford in aid of the United Irishmen.

Ⓓ 1688–9 The Siege of Derry: critical to maintaining the Protestant Ascendancy in Ireland prior to the Battle of the Boyne.

[1286] Chronolog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Era 1789–1815

Events in France, 1789–1815

Year	Date	Event
1789	5 May	The Estates-General meets
	20 June	Tennis Court Oath: National Assembly
	14 July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4/5 August	abolition of the feudal order
	27 August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1790	12 July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1791	20 June	The Flight to Varennes: King's arrest
	3 September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1792	20 April	declaration of war on Austria
	10 August	storming of the Tuileries
	20 September	National Convention: republic declared, *monarchy abolished. Girondin supremacy*
1793	21 January	execution of Louis XVI
	2 June	fall of the Girondins; installation of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July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Terror begins;* Jacobins' Constitution of Year I; War against the Vendée Rising
1794	27/28 July	fall of Robespierre (9 Thermidor); *the 'Thermidorian Reaction'*
	September	aboli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1795	5 March	Peace of Basle
	17 August	Constitution of Year III; Directory created
1796/7		campaign in Upper Italy
1797	4 September	coup d'état of 18 Fructidor; rise of Bonaparte
	October	Annexation of Belgium: Cisalpine Republic
1798/9		campaign in Egypt
1799		beginning of 2nd War of the Coalition
	9 November	coup d'état of 18 Brumaire; dissolution of the Directory; Bonaparte's Constitution of Year VIII; Consulate created; Napoleon elected First Consul
1801		Concordat with the Papacy
	9 February	*Peace of Lunéville*
1802	27 March	*Peace of Amiens*
	2 August	Constitution of Year X; Bonaparte Life Consul; Annexation of Piedmont
1803		The 'Armée de l'Angleterre' camps at Boulogne
1804	21 March	promulgation of Code Napoléon
	2 December	Constitution of Year XII; French Empire created
1805		Napoleon, King of Italy
	August–Dec.	War of the Third Coalition

France's Wars, 1792–1815

1792–1797
War of the First Coalition
Membership
- *from 1792: Austria, Prussia (to March 1795)*
- from 1793: Britain, the Netherlands (to 1795); Spain (to June 1795); Portugal, Naples, Sardinia, the Papal State (to 1796)

Principal battles
Valmy (20 September 1792); Neerwinden (18 March 1793); Lodi (10 May 1796)
Treaties
Basle (5 March 1795); Campo Formio (17 October 1797)

1799–1802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Membership
Britain, Austria (to 9 February 1801); Russia (to 22 October 1799); Turkey, Naples, Portugal (to June 1801)
Principal battles
Pyramids (21 July 1798); Aboukir (Battle of the Nile) (1 August 1798); Marengo (14 June 1800); Hohenlinden (3 December 1800)
Treaties
Lunéville (9 February 1801); *Amiens (27 March 1802)*

1805
War of the Third Coalition
Membership
Britain, Austria, Russia, Prussia, *Naples, Sweden*
Principal battles
Ulm (20 October 1805); *Trafalgar (21 October 1805);* Austerlitz (2 December 1805)
Treaties
Schönbrunn (12 December 1805); Pressburg (26 December 1805)

1806		Joseph Bonaparte, King of Naples;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 Holy Roman Empire abolished
	September	War of the Coalition
	November	proclam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ystem
	21 November	Berlin Decree: Continental System proclaimed
1807		Jerome Bonaparte, King of Westphalia; Grand Duchy of Warsaw created
	July	Treaty of Tilsit: Franco-Russian Accord; Occupation of Portugal
1808	May	Bayonne Talks: Re-organisation of Spain
	27 September to 14 October	Congress of Erfurt
1808/9		campaign in Spain
1809		Illyrian Provinces created; Annexation of Rome and Papal States
	April	beginning of 5th War of the Coalition
	14 October	Peace of Schönbrunn
1810		Annexation of Holland and North Germany; Bernadotte, Prince Royal of Sweden
1812	24 June to December	Russian Campaign: Napoleon's 'Polish War'; collapse of the Grand Army in Russia
1813		German Campaign: 'War of Liberation' begins
1814	31 March	capitulation of Paris
	6 April	Napoleon's first abdication: exile to Elba
	24 April	Restoration of Louis XVIII
	30 May	Treaty of Paris I: frontiers of 1792 re-instated
	4 June	Royal Charter restores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September	Congress of Vienna convened
1815	6/7 March	Napoleon lands at Cannes; The '100 Days' begin
	May to June	campaign in Belgium
	9 June	Napoleon's second Abdication: exile to St. Helena
	22 June	Final Act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
	20 November	Treaty of Paris II: foreign occupation, reparations

1806–1807
War of the Fourth Coalition
Membership
Britain, Prussia, Russia, Saxony
Principal battles
Jena and Auerstedt (14 October 1806); Prussian Eylau (8 February 1807); Friedland (14 June 1807)
Treaties
Posen (December 1806); Tilsit (7–9 July 1807)

1808–15
Peninsular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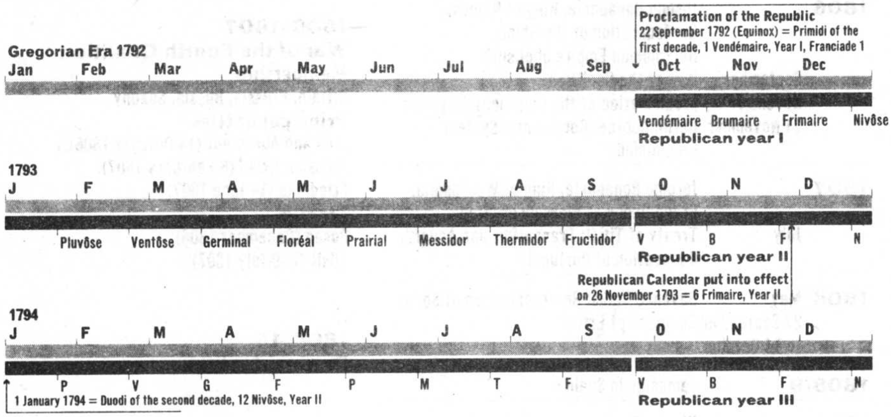
1809
War of the Fifth Coalition
Membership
Britain, Austria
Principal battles
Aspern (22 May 1809); Wagram (5 July 1809)
Treaties
Schönbrunn (14 October 1809)

1812
Russian War
Principal battles
Smolensk (18 August 1812); Borodino (7 September 1812); crossing of the Berezina (26–28 November 1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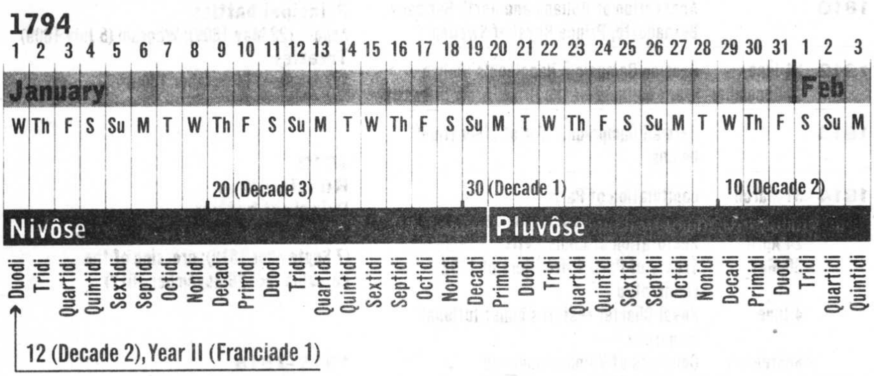
1813–1815
War of the Sixth Coalition
Membership
Russia, Prussia (from March 1813), Britain (from June 1813), Austria (from August 1813), Sweden, Spain, Portugal
Principal battles
Leipzig (16–19 October 1813); Tolentino (3 May 1815); Ligny (15 June 1815); Waterloo (18 June 1815)
Treaties
Paris I (30 May 1814); Vienna (9 June 1815); Paris II (20 November 1815)

[1288]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Calendar, Years I–VIII (1792–1800)

A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Calendar, 1792–4 (I–III)



B January 1794 / Nivôse–Pluvôse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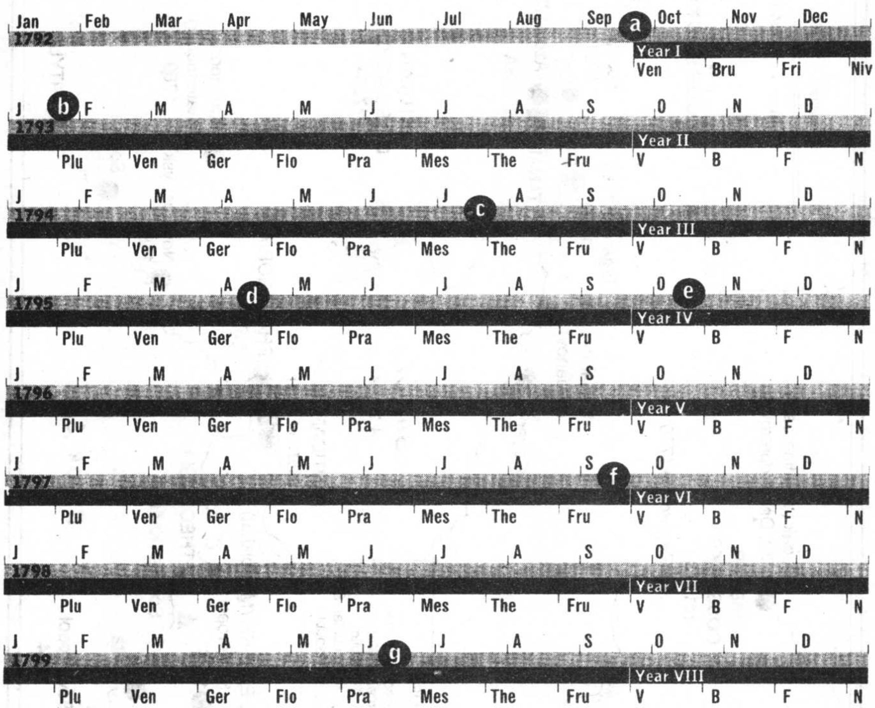
C Months of the Revolutionary Calendar

1 Vendémiaire
2 Brumaire
3 Frumaire
4 Nivôse
5 Pluvôse
6 Ventôse
7 Germinal
8 Floréal
9 Prairial
10 Messidor
11 Thermidor (Fervidor)
12 Fructidor

Sources: H. Morse Stephens,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9–1815* (London, 1936), pp. 374–5, J. J. Bond, *A Handy-book of Rules and Tables*, (London, 1869), pp. 10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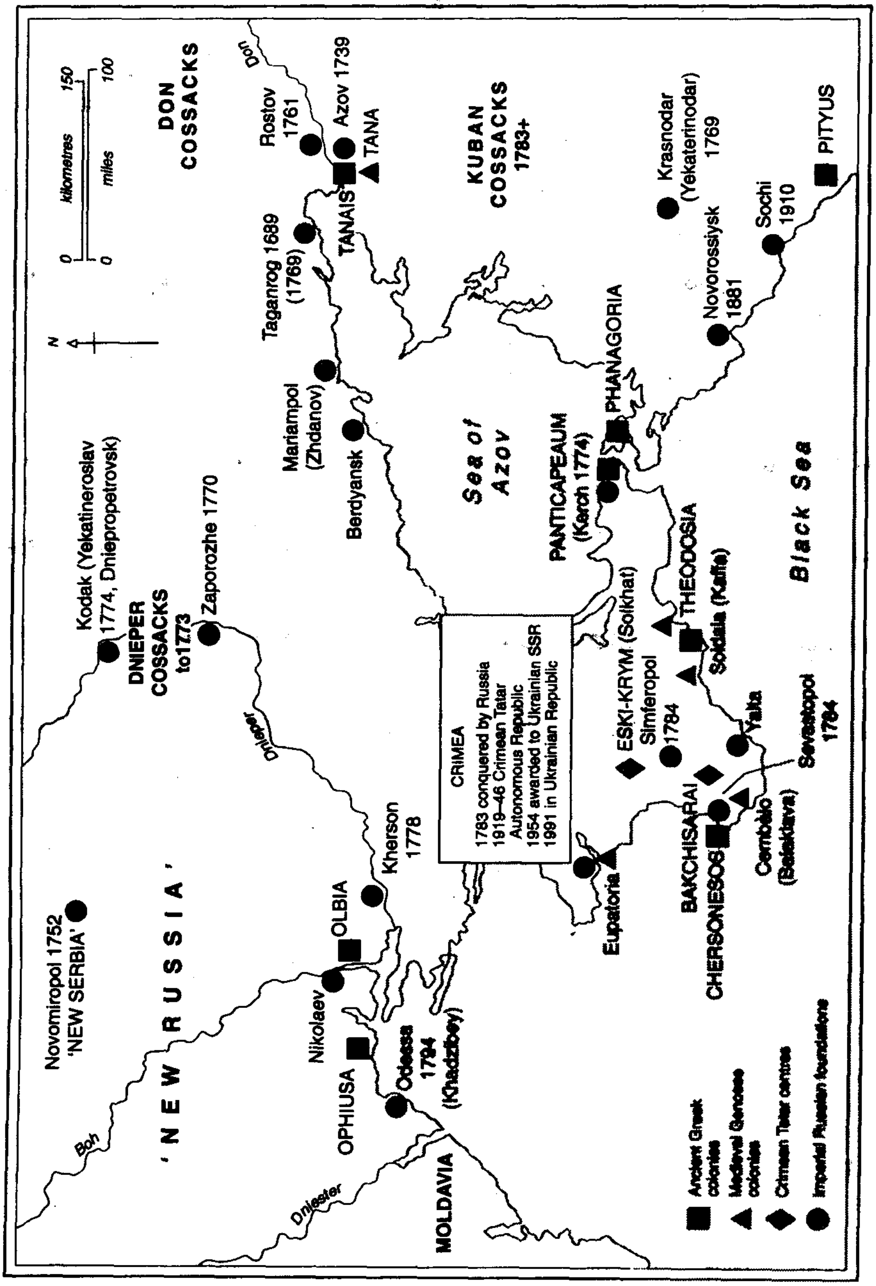
[1289]

D The Republican Era, years I–V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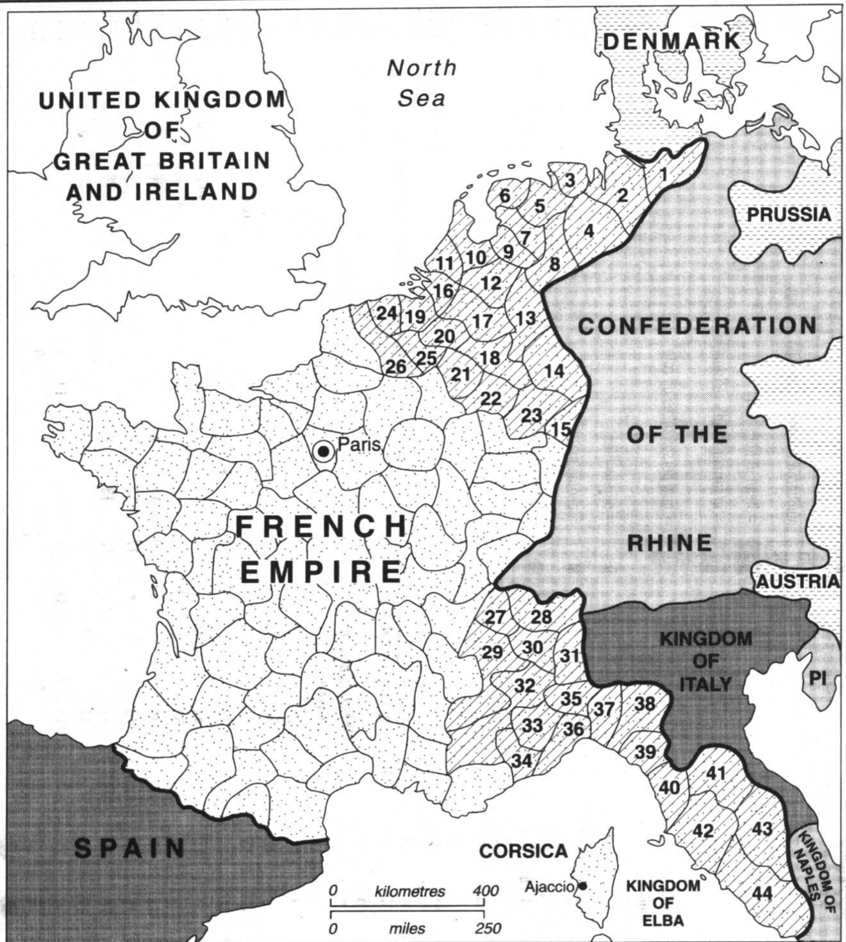


	Event	Revolutionary Calendar	Gregorian Calendar
a	**Proclamation of the Republic**	1 Vendémiaire I	22 September 1792
b	**Execution of Louis XVI**	2 Pluvôse I	21 January 1793
c	**Fall of Robespierre**	9 Thermidor II	27 July 1794
d	**Constitution of Year III**	14 Germinal III	3 April 1795
e	**Insurrection of Vendémiaire**	13 Vendémiaire IV	5 October 1795
f	**Revolt of Fructidor**	18 Fructidor V	4 September 1797
g	**Bonaparte's Coup d'Etat**	30 Prairial VII	18 June 1799

[1290] **The Crimea, with Russian Colonization of the Black Sea Coastland**



The French Empire, 1812 [1291]



French Empire 1812

French-controlled states

French all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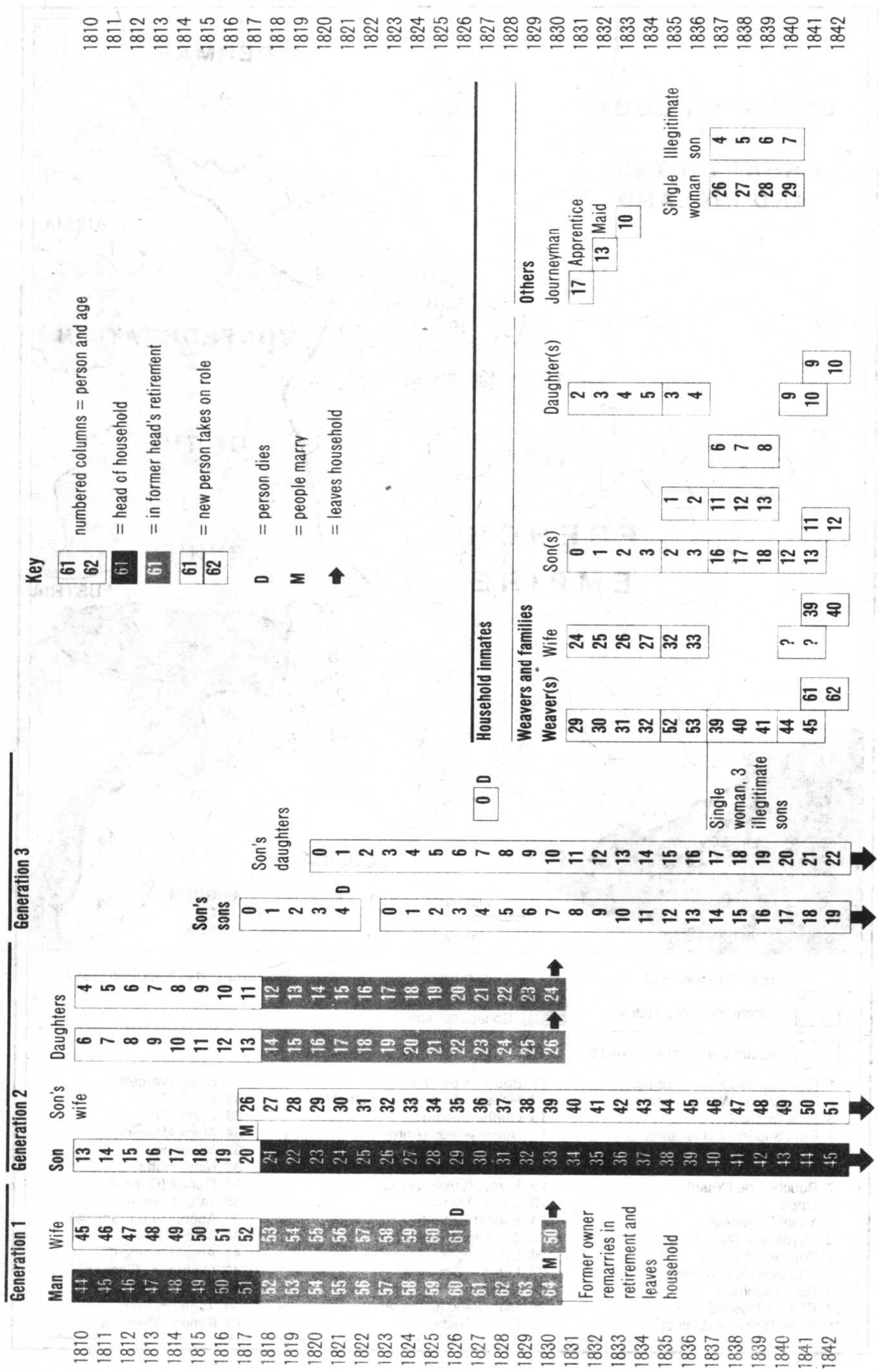
Kingdoms ruled by Bonaparte family

Elba awarded to Napoleon, 1814

Departments lost in 1814-15

1 Bouches de l'Elbe (Hamburg)
2 Bouches du Weser (Bremen)
3 Ems Oriental
4 Ems Supérieur (Osnabruck)
5 Ems Occidental
6 Frise
7 Bouches de l'Yssel
8 Lippe
9 Yssel Supérieure
10 Zuyderzée (Amsterdam)
11 Bouches du Rhin
12 Bouches de la Meuse
13 Roer (Aachen)
14 Rhin-et-Moselle (Coblenz)
15 Mont-Tonnerre (Mainz)
16 Bouches de l'Escaut
17 Meuse-inférieure (Maastricht)
18 Ourthe (Liége)
19 Deux-Nèthes (Antwerp)
20 Dyle (Brussels)
21 Sambre-et-Meuse (Namur)
22 Forêts (Luxembourg)
23 Sarre (Trier)
24 Escaut (Ghent)
25 Jemappes (Mons)
26 Lys (Bruges)
27 Leman (Geneva)
28 Simplon
29 Montblanc (Chambery)
30 Doire (Aosta)
31 Sesia (Vercelli)
32 Po (Turin)
33 Sture (Coni)
34 Alpes Maritimes
35 Marengo
36 Montenotte
37 Gênes (Genoa)
38 Taro (Parma)
39 Apennins (La Spezia)
40 Mediterranée
41 Arno (Florence)
42 Ombrone (Sienna)
43 Trasimène (Spoleto)
44 Tibre (Rome)
PI Illyrian Provinces

[1292] **Grillenstein: The Life Course of an Austrian Peasant Household, 1810–42**



Modernization: The Component Processes

[1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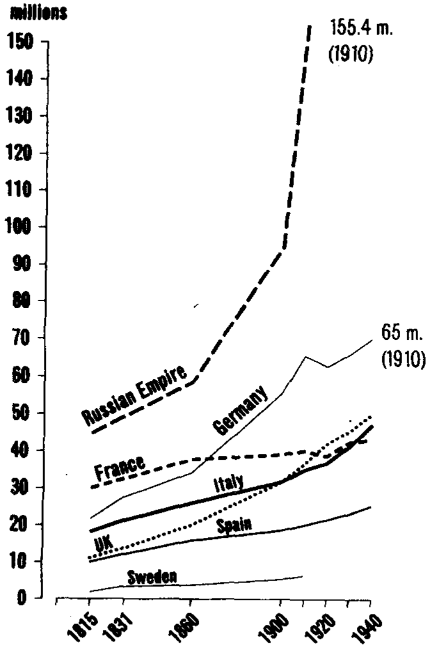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 Scientific and mechanized agriculture
2. Mobility of Labour: enclosures, emancipation of the serfs
3. New sources of power: coal, steam, gas, oil, electricity
4. Power-driven machinery
5.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metallurgy
6. Factories and factory towns
7. Improved transport: canals, roads, railways, flight
8. Communications: post, telegraph, telephone, radio
9. Capital investment: joint-stock companies, trusts, cartels
10. Expanding domestic markets: new industries, internal trade
11. Foreign trade: import and export, colonies
12. Government policy
13. Demography: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its consequ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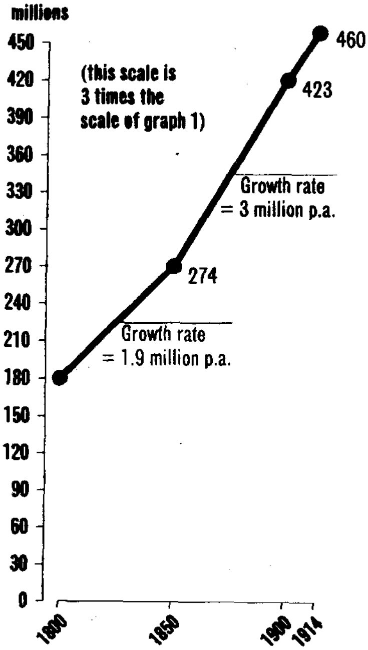
14. The money economy: wages, prices, taxes, paper money
15. Marketing skills: advertising, stores, sales distribution
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7. Financial services: credit, savings banks, insurance
18. Standardization of weights, measures, and currencies
19. Urbanization: town planning, public services
20. New social classes: middle classes, domestics, 'workers'
21.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s: 'the nuclear family'
22. Women: dependency and subordination
23. Migration: local, regional, international
24. Public health: epidemics, hygiene, medical services
25. Poverty: unemployment, vagrancy, workhouses, slums
26. Exploitation: child labour, female labour, sweatshops
27. Organized crime: police, detectives, criminal underclass
28. Private charities
29. Education: primary, technical, scientific, executive, female
30. Literacy and mass culture
31. Leisure: organized recreation and sport
32. Youth movements
33. Religious trends: fundamentalism, temperance, worker priests
34.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s, anthropology, ethnography, etc.
35. Collectivism: industrial and urban psychology
36. Consumerism
37. Class consciousness
38. National consciousness
39.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40. Extension of the electorate: universal suffrage, suffragettes
41. Political parties with mass constituencies
42. State-run welfare: pensions, social insurance, benefits
43. *Elaborate social legislation*
44. Expans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state bureaucracy
45.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46. Political associations and pressure groups: trade unions
47. Imperialism
48. Total war: conscript armies, mechanized warfare, home front

[1294] European Demography, 1800–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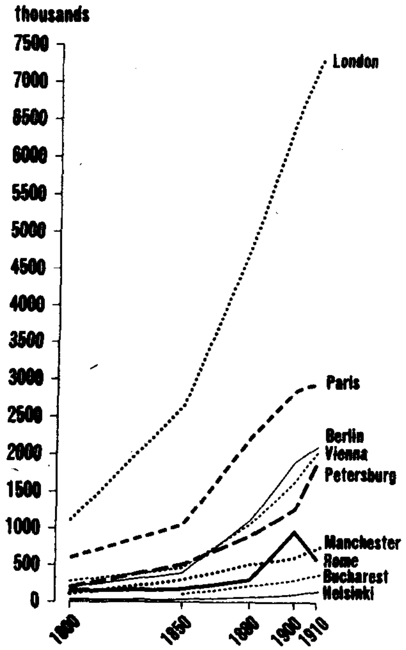
1 European population by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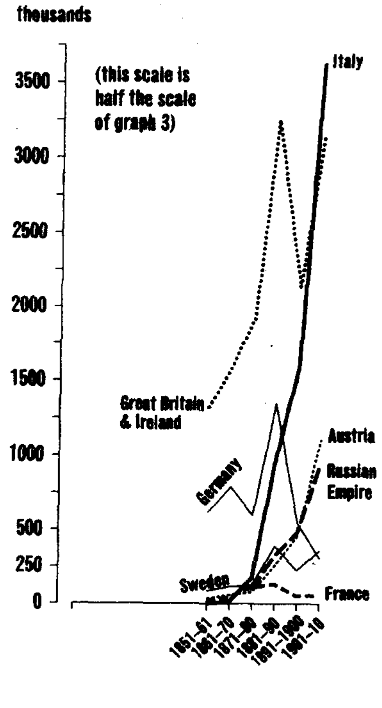
2 European population including European Russia



3 Population of major cities



4 Emigration from Europe



Indices of Liberalization, 1791–1948

Country	State constitutions	Universal male suffrage	Women's suffrage	Jewish emancipation*
France	1791 1852 1830 1875 1848 1946	1848 1852 1870	1944	1791
Poland	1791 1921 1815	1918	1919	(1809) 1921
Sweden	1809	1909	1919	1838 1870
Spain	1812	1890		
Norway	1814	1898	1912	1851
Netherlands	1814	1896	1946	1796
Portugal	1821	1910		
Belgium	1831	1893	1948	1831
Greece	1844 1864		1952	1830
Switzerland	1848	1848 1874	1971	1866
Italy	1861(71)		n.a.	1945
Piedmont/ Sardinia	1848	1912	—	1870
Austria	1849	1907	—	
Hungary	1867	1907	— n.a.	1867
Denmark	1849	1915		1814 1849
Prussia	1850	1850	n.a.	1812
German Empire	1871	1871	1919	1871
Romania	1864	n.a.	n.a.	1919–1923
Ottoman Empire	1876	1908	1934	
Great Britain	—	1884	1928	1871
Ireland	1922	1922	1922	—
Jugoslavia	1921	1921	1946	—

n.a. data not available — does not apply * removal of all limitations on Jewish civil rights

[1296] Selected Indices of Industrialization, 1800–1914

Output of coal (■ = 10,000,000 metric tonnes)

	Austria	France	Germany	UK	Sweden	Italy	Russian Empire
1815	95,000	882,000	1,300,000	16,200,000	—	—	—
1850	877,000	4,434,000	5,100,000	50,200,000	28,000	34,000	300,000
1875	4,471,000	16,957,000	47,800,000	135,400,000	64,000	117,000	1,700,000
1900	10,990,000	33,404,000	142,650,000	228,800,000	252,000	480,000	16,160,000
1913	16,460,000	40,844,000	277,330,000	292,000,000	364,000	701,000	36,050,000

Output of pig iron (■ = 1,000,000 metric tonnes)

	Austria	France	Germany	UK	Sweden	Italy	Russian Empire
1815	—	—	—	310,000	—	—	123,000
1850	155,000	406,000	210,000	2,285,000	142,000	—	228,000
1875	363,000	1,448,000	1,759,000	6,467,000	351,000	28,000	428,000
1900	1,000,000	2,714,000	7,550,000	9,104,000	528,000	24,000	2,937,000
1913	1,758,000	5,207,000	16,761,000	10,425,000	730,000	427,000	4,641,000

[1297]

Length of the railway (■ = 2000 km)

	Austria	France	Germany	UK	Sweden	Italy	Russian Empire
1835	—	141	6	544	—	—	—
1855	1588	5037	7826	11,744	—	1207	1049
1875	10,331	19,357	27,970	23,365	3679	8018	19,029
1895	16,420	36,240	46,500	28,986	9756	15,970	37,058
1905	21,002	38,607	56,739	31,456	12,647	17,078	61,0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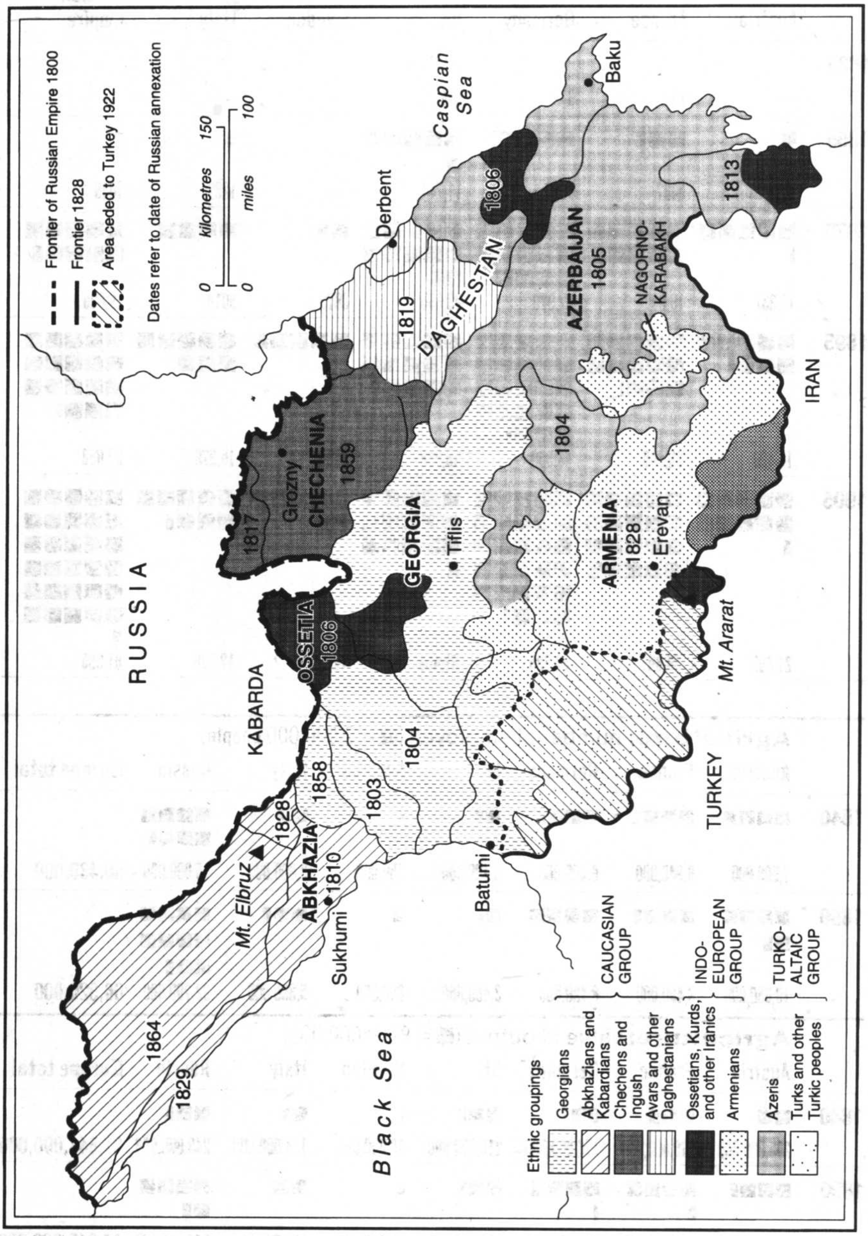
Agriculture: number of employed (■ = 2,000,000 people)

	Austria	France	Germany	UK	Sweden	Italy	Russia	Europe total
1840	7,500,000	6,940,000	6,400,000	3,400,000	550,000	3,600,000	15,000,000	50,430,000
1890	10,600,000	6,450,000	8,120,000	2,460,000	850,000	5,390,000	22,700,000	66,32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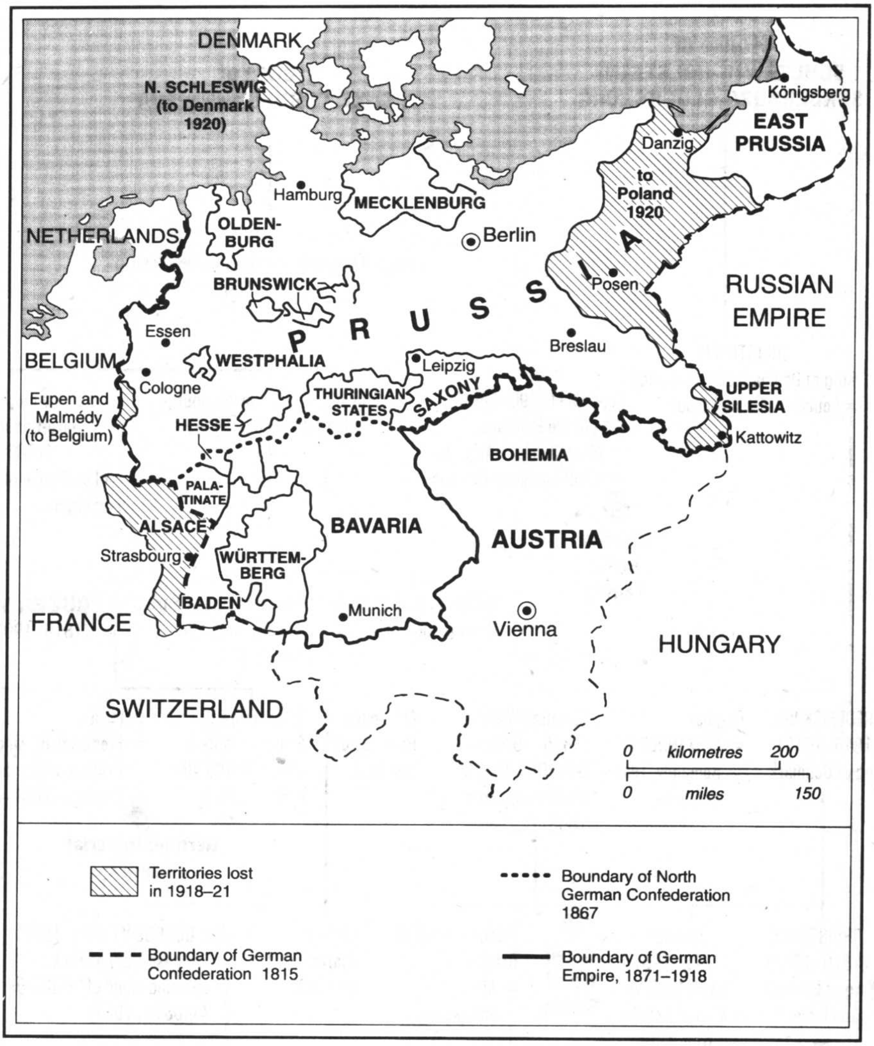
Agriculture: value of output (■ = £100,000,000)

	Austria	France	Germany	UK	Sweden	Italy	Russia	Europe total
1840	205,000,000	263,000,000	170,000,000	218,000,000	16,000,000	114,000,000	248,000,000	£1,544,000,000
1890	331,000,000	460,000,000	424,000,000	251,000,000	49,000,000	204,000,000	563,000,000	£2,845,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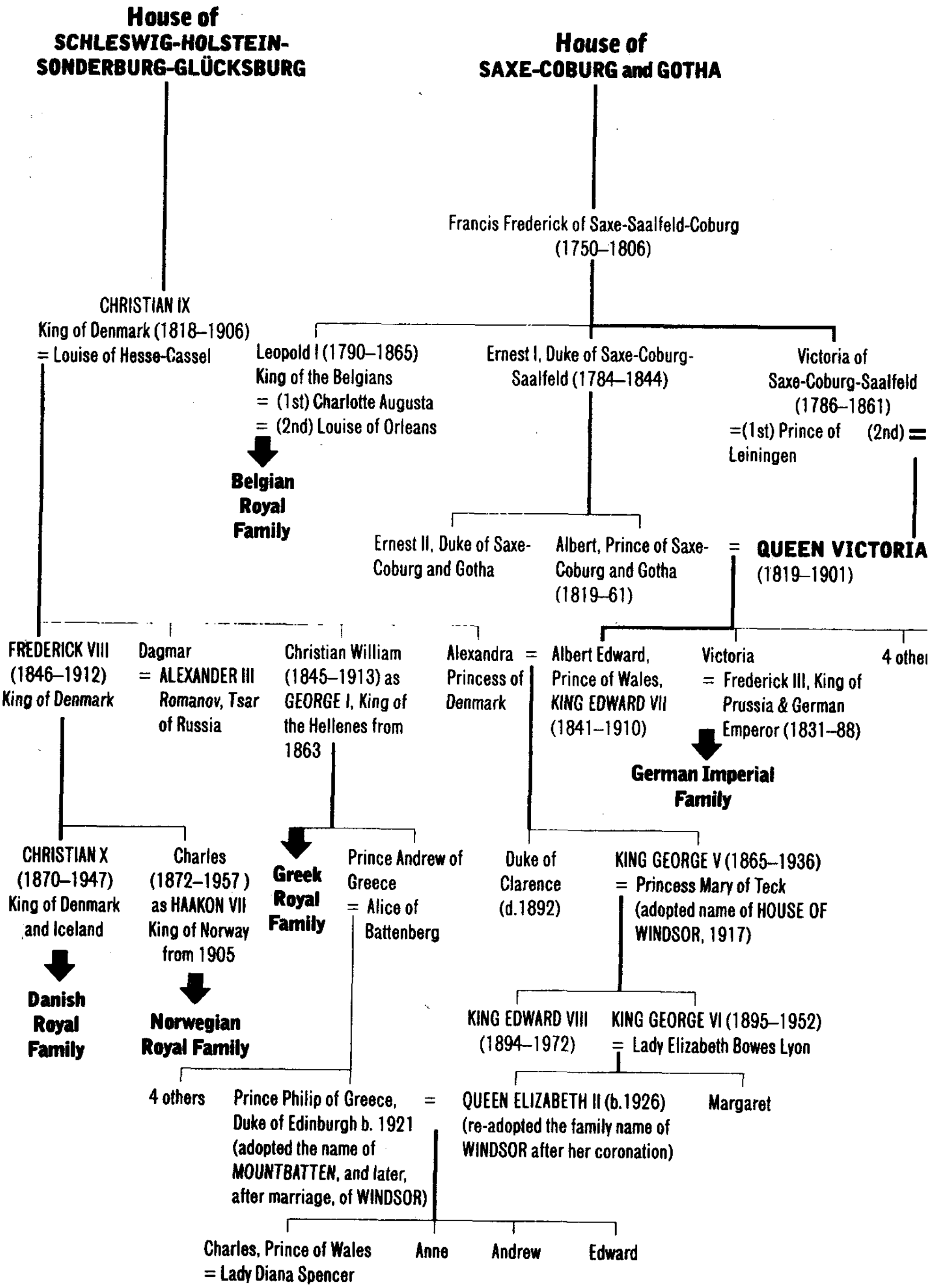
[1298] **The Caucasus: Ethnography and Russian Expansion**



Germany: The Confederation and the Empire, 1815–1918



[1300] Queen Victoria (1819–1901) and her Relatives



[1301]

House of BRUNSWICK-LÜNEBURG (HANOVER)

George Louis of Brunswick-Lüneburg (1660–1727), First Elector of Hanover, and from 1714 King 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 Sophia Dorothea, of Brunswick-Celle

GEORGE II (1683–1760),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Elector of Hanover
= Wilhelmina Caroline of Anspach

GEORGE III (1738–1820),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Elector of Hanover
= Charlotte of Mecklenburg-Strelitz

= Edward, Duke of Kent (1767–1820)

7 others

KING WILLIAM IV (1765–1837)

KING GEORGE IV (1762–1830) Prince Regent to 1820
= Caroline of Brunswick

Charlotte Augusta (d. 1817)

House of HESSE

Grand Duke LOUIS II of Hesse and the Rhine (1777–1848)

Grand Duke LOUIS III of Hesse and the Rhine (1806–77)

Prince Charles of Hesse (1809–77)
= Princess Elizabeth of Prussia

Prince Alexander of Hesse
= Julia Hauke (adopted title of Countess of BATTENBERG) (1825–95)

Princess Marie of Hesse
= ALEXANDER II Romanov, Tsar of Russia

Russian Imperial Family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 & Saxe-Coburg-Gotha (1844–1900)
= Marie of Russia (1853–1920)

Romanian Royal Family

Princess Beatrice

Princess Alice (1843–78) = Grand Duke Louis IV of Hesse and the Rhine (1837–92)

3 others

Grand Duke Ernest Louis of Hesse and the Rhine

Dukes of Hesse

Princess Victoria of Hesse (1863–1950) = 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 (1854–1921) (Admiral RN, changed his surname to Mountbatten)

Prince Alexander of Battenberg

Bulgarian Royal Family

Prince Francis Joseph of Battenberg

Prince Harry of Battenberg
= Princess Beatrice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Princess Alice of Battenberg
= Prince Andrew of Greece

Princess Louise of Battenberg
= King Gustav Adolf VI of Sweden

Swedish Royal Family

George, Marquess of Milford Haven

Admiral, Earl Louis Mountbatten of Burma, RN, (1900–79)

Princess Victoria Eugenie (Ena) of Battenberg
= King Alfonso XIII of Sp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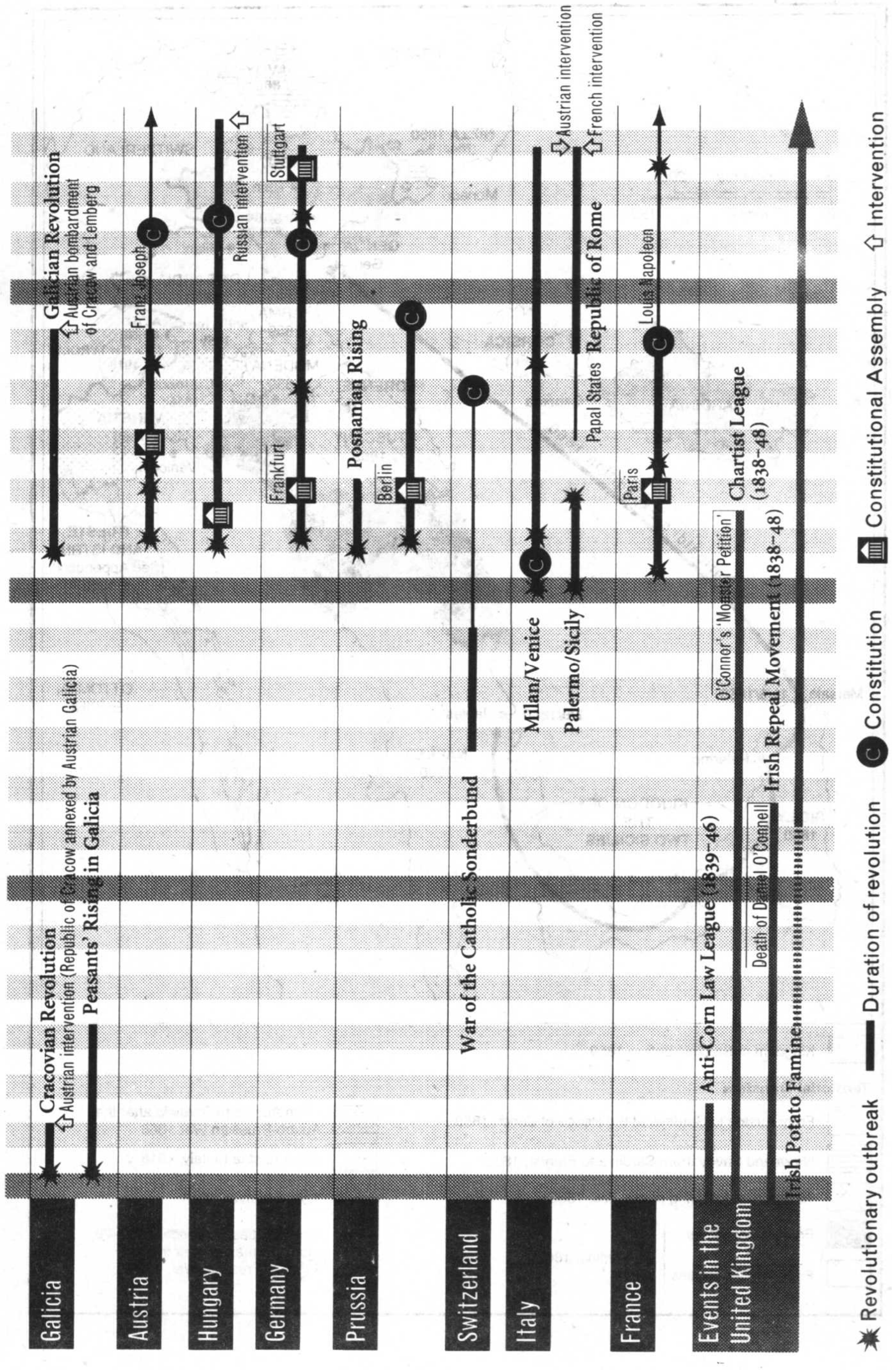
Spanish Royal Family

[1302] The Expansion of Greece, 1821–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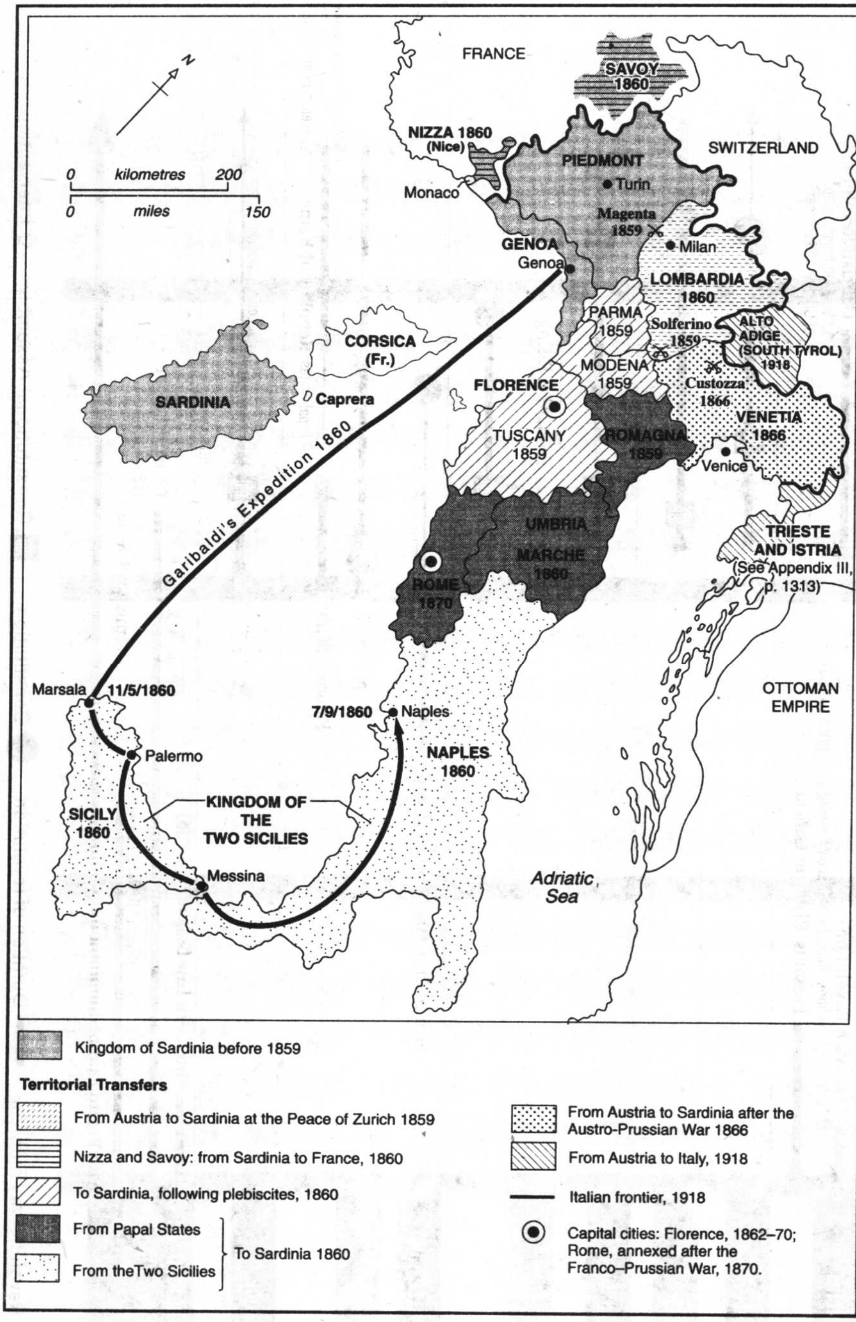


Springtime of Nations: The Revolutions of 1846–9

[1303]



[1304]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185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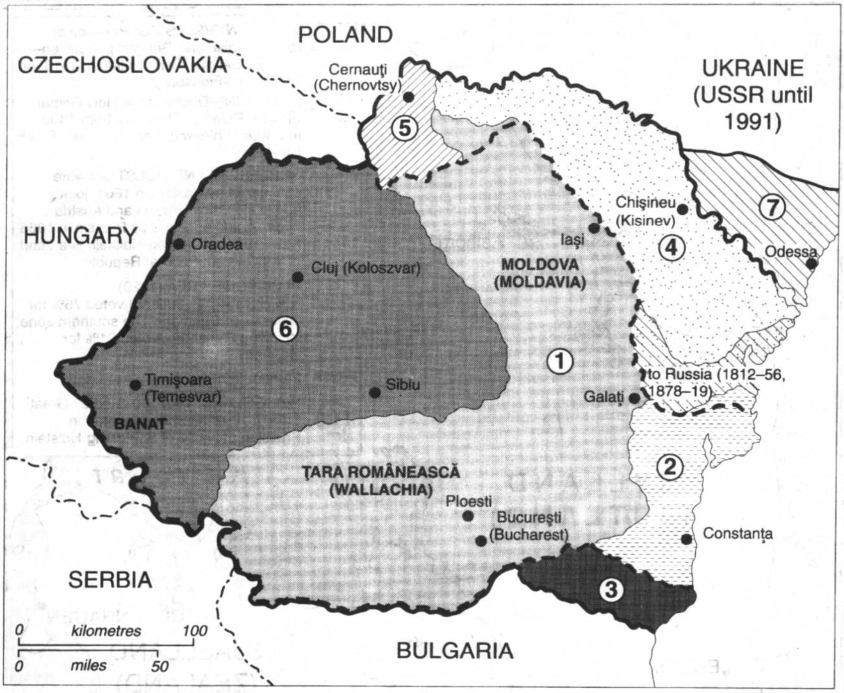


Slesvig (Schleswig) and Holstein

[1305]



[1306] The Growth of Romania, 1861–1945



— Boundary 1920 - - - Present-day boundary

① 1861 Ţara Românească, 'the Romanian Land' (Wallachia and Moldavia)

② 1878 Dobrogea (Dobrudja)

③ 1913 S. Dobrogea from Bulgaria, lost 1945

④ 1918 Basarabia (Bessarabia) (see box), lost 1944

⑤ 1919 Bucovina (Bukovina) (see box), lost 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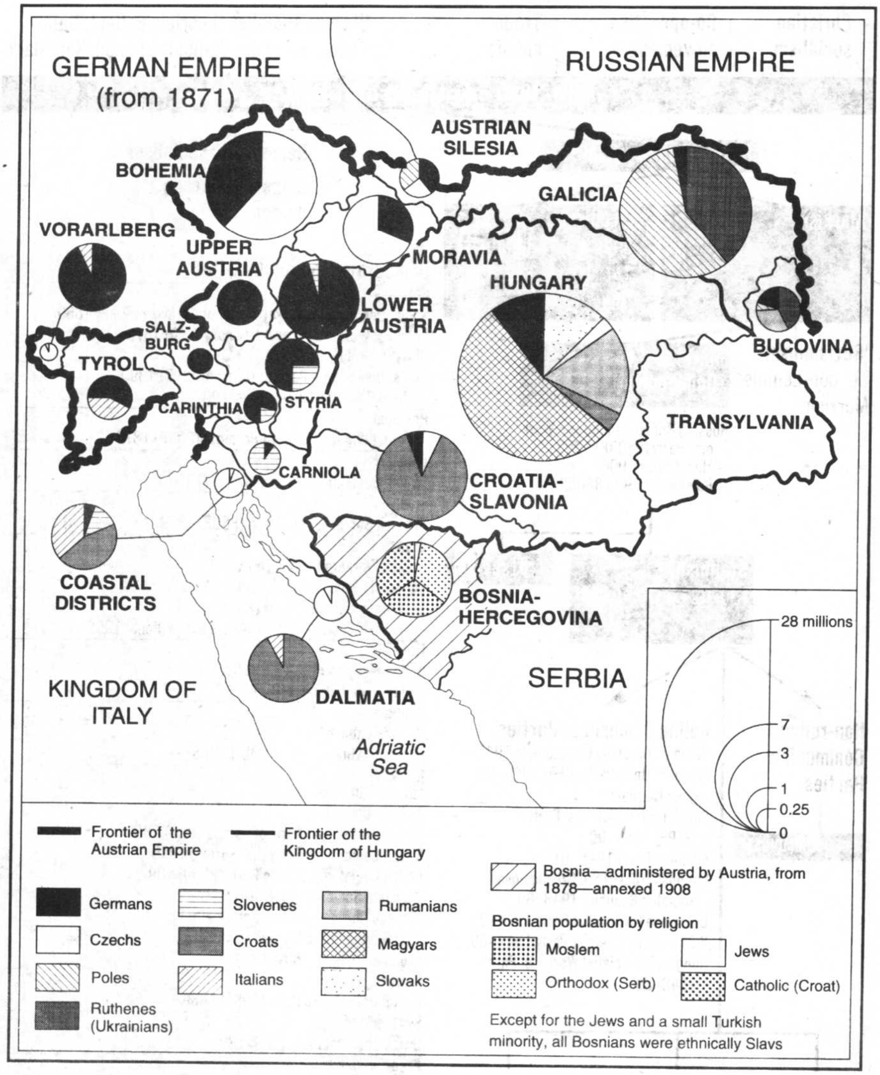
⑥ 1920 Transilvania (Transylvania), from Hungary

⑦ Transnistria; occupied by Romania, 19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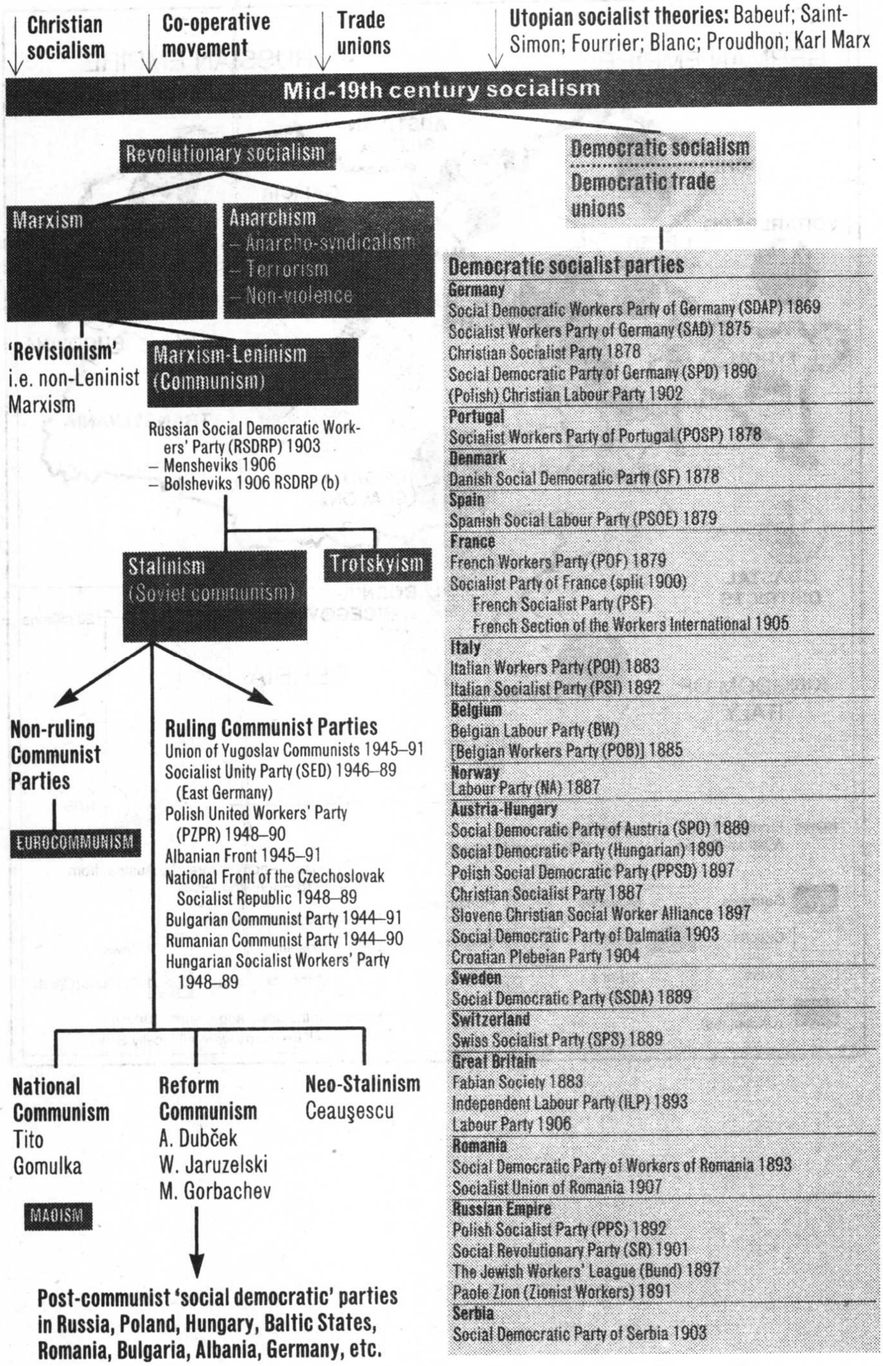
BESSARABIA, now MOLDOVA. In Russian Empire 1812–1917; in the Moldavian SSR 1940–1, 1944–91; in Romania 1918–40, 1941–4; independent since 1991.

BUCOVINA (BUKOVINA) In Austria until 1918, in Ukraine 1918–19, 1940–1, since 1944; in Romania, 1919–40.

The Dual Monarchy: The Nationalities of Austria-Hungary, 1867–1918 [1307]



[1308] **The Pedigree of Socialism**



Macedonia: The Partition of 1913

[1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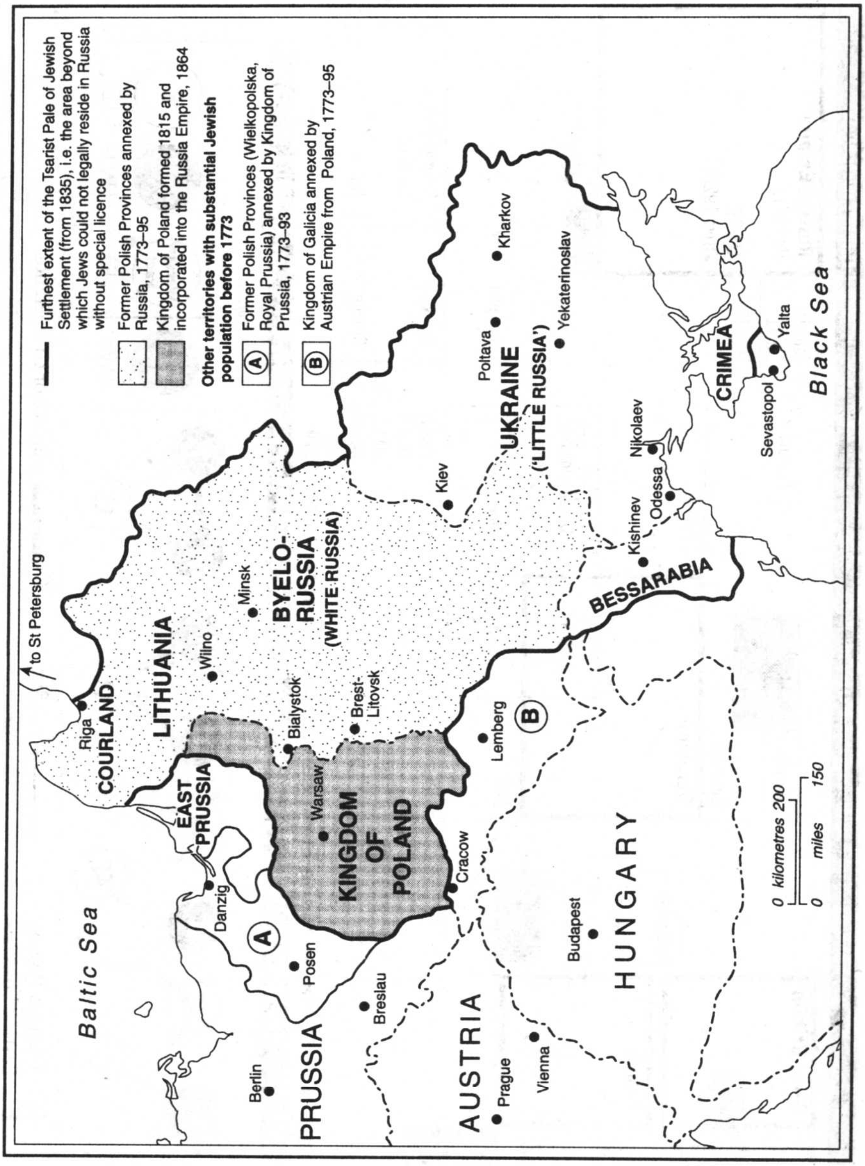


[1310] **Greater Alba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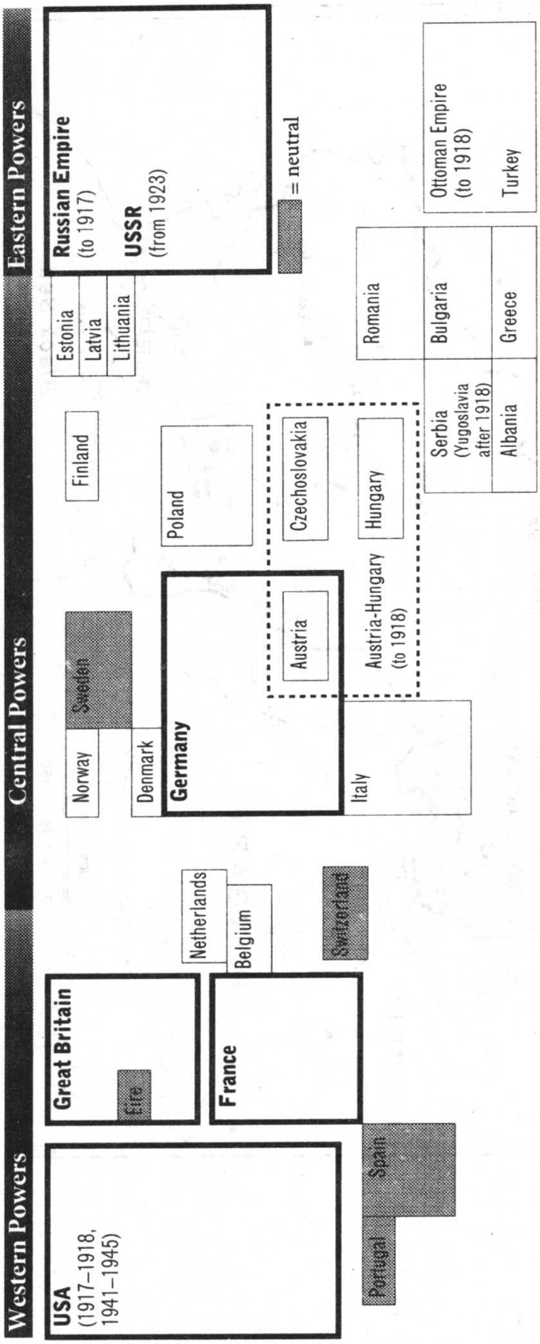


The Jewish Pale in the Russian Empire, to 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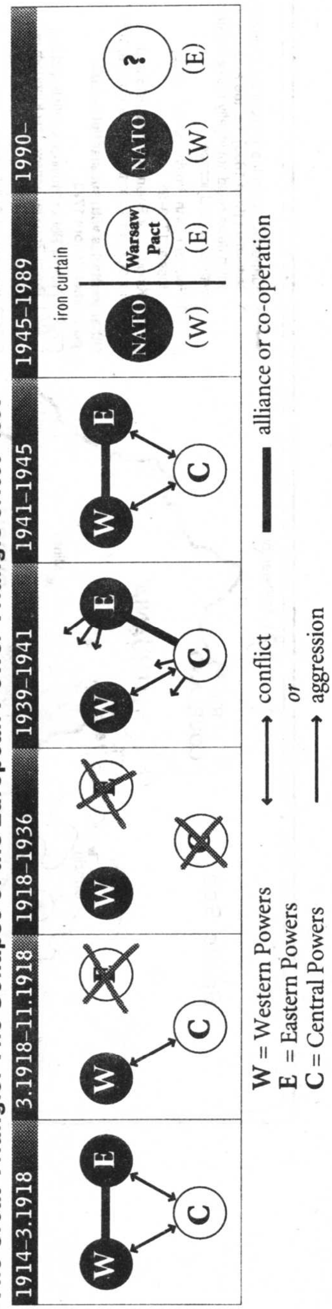
[1311]



[1312] The 'Great Triangle': European Power Centres, 1914–91



The Great Triangle: The Collapse of the European Power Triangle c.1890–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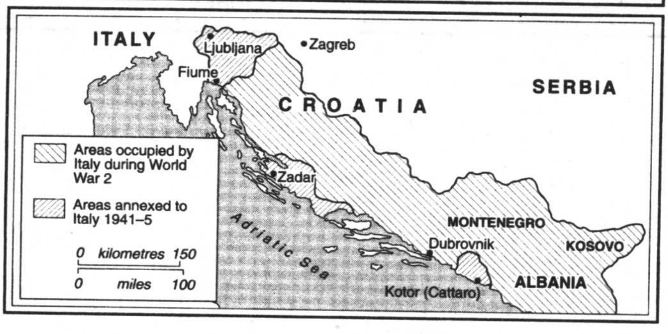


The Italo-Slav Borders, 1939–92

[1313]



(*a*) 1939–92 Italy's North-Eastern Front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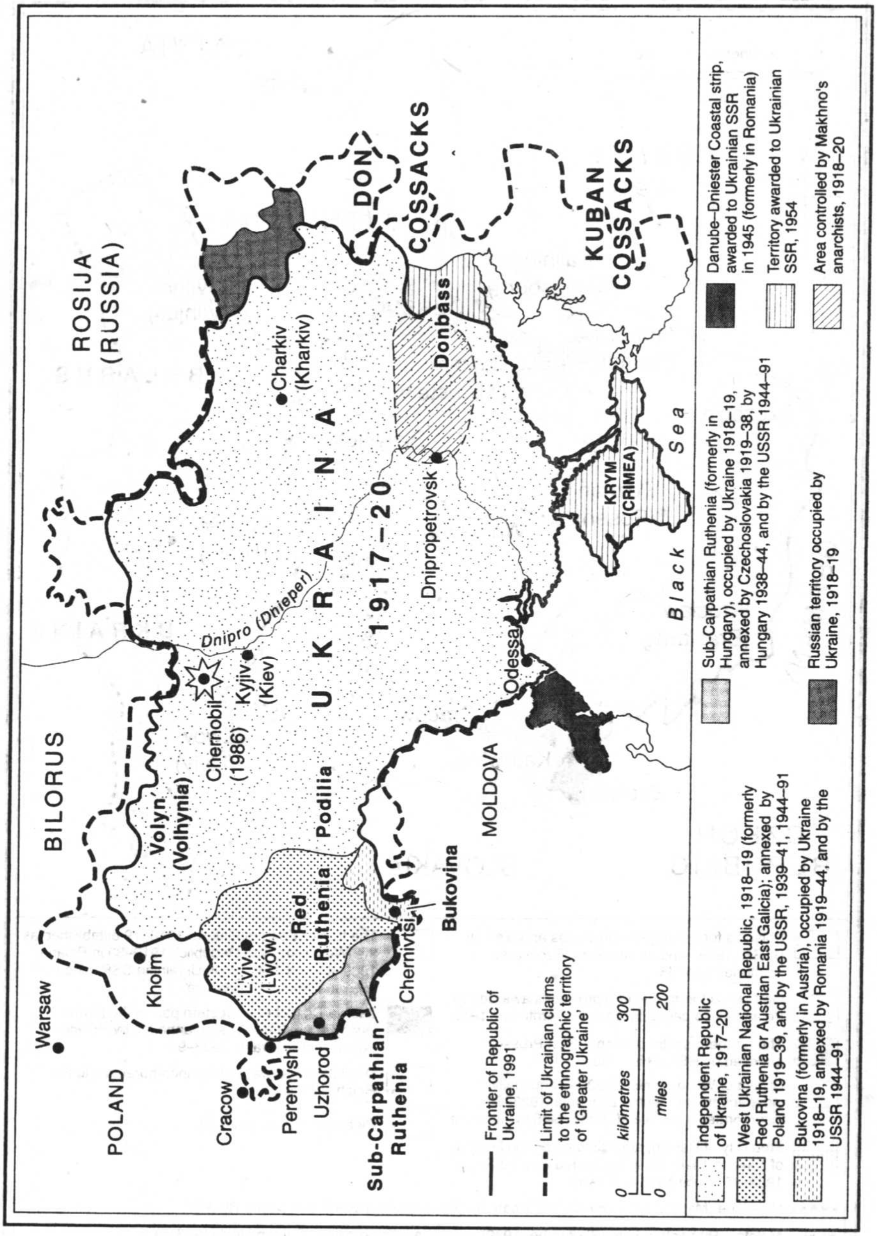
(*b*) Italian Occupation Zones, 1939–44

[1314] The Expansion of Soviet Territory in Europe, 1917–45



The Republic of Ukraine, 1918–91

[1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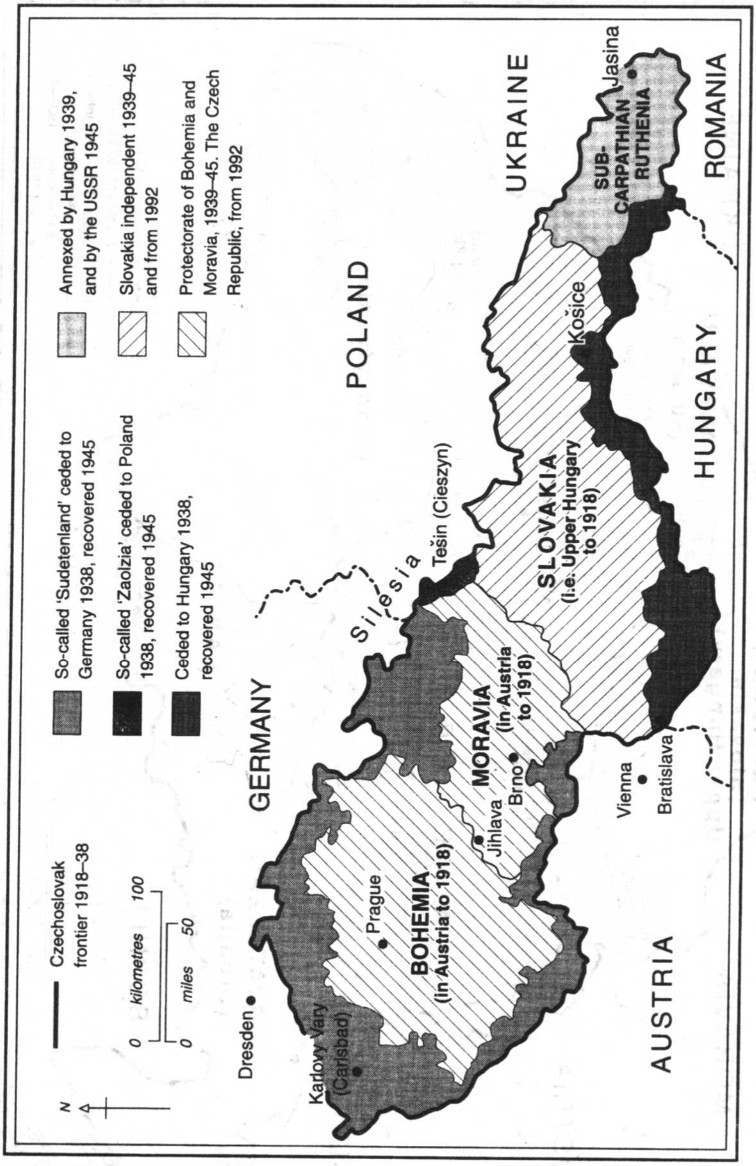
[1316] **Poland, 192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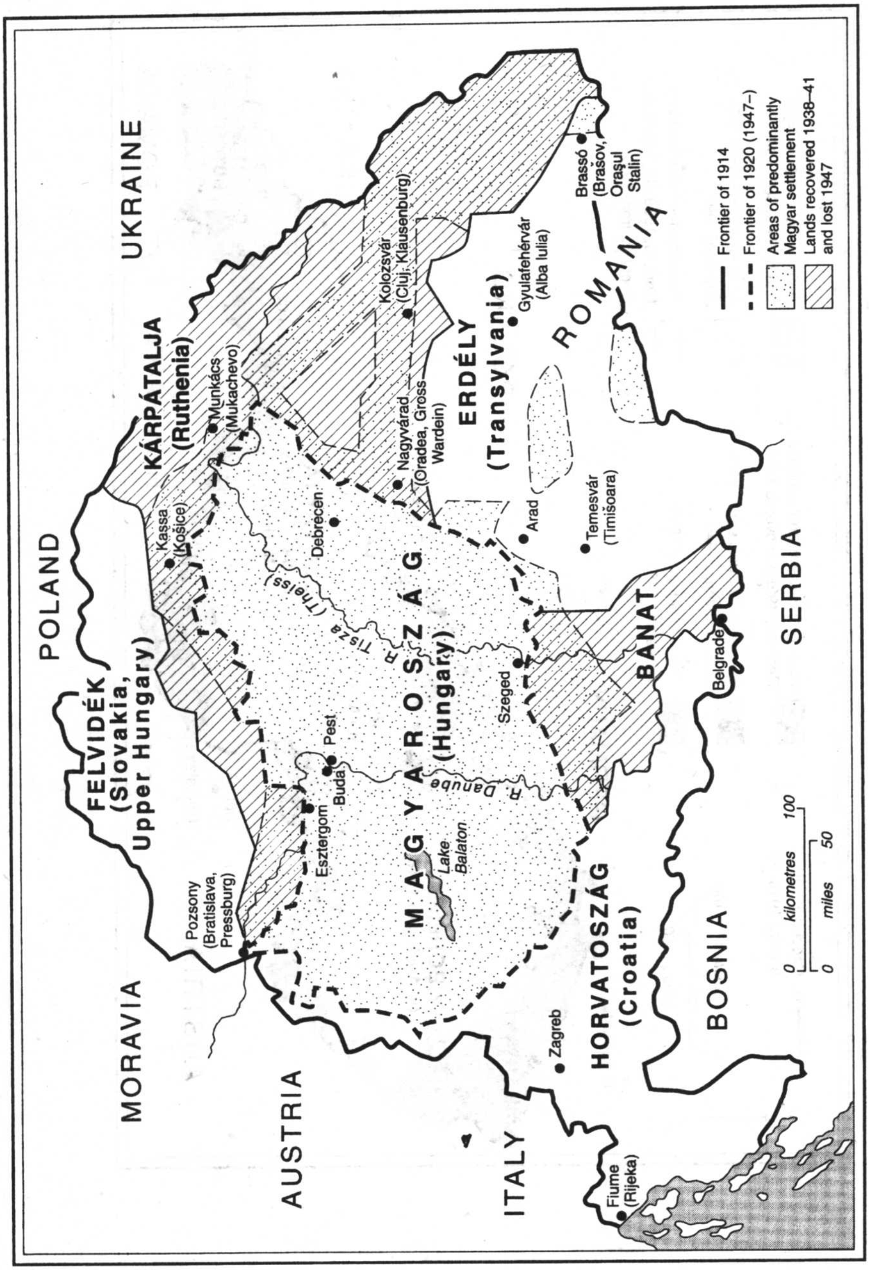
- Poland's former eastern provinces annexed by USSR, 1939, and as so-called 'Recovered Territories' in 1945.
- Germany's former eastern provinces awarded to Poland as so-called 'Recovered Territories' 1945.
- The northern sector of former East Prussia annexed by RSFSR in 1945
- District of Wilno (Vilnius), 1920–3 nominally independent as 'Central Lithuania': 1923–39 incorporated into Poland; since 1945 in Lithuania.
- Free City of Danzig, administer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0–39,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ich 1939–45, since 1945 in Poland.
- The former Eastern Galicia: 1918–19 established as the 'West Ukrainian Republic', 1919–39 in Poland; 1939–41 and 1945–91 in Ukrainian SSR: since 1991 in Republic of Ukraine.
- Zaolzia District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former Duchy of Austrian Silesia), annexed by Poland from Czechoslovakia 1938–9.
- Districts of pre-war Pol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ich, 1939–45.
- Plebiscite Areas, 1919–21.

- Riga Line (March 1921) fixed by the Treaty of Riga between Poland and Soviet Russia.
- Molotov–Ribbentrop Line (September 1939) revived as the so-called 'Curzon Line' (1943–5).
- Oder–Western Neisse Line (July 1945) imposed by the Potsdam Conference.

Czechoslovakia, 1918–92



[1318] **Hungary, 1918–45**



The Growth of Serbia (1817–1913) and of Yugoslavia (1918–45)

[1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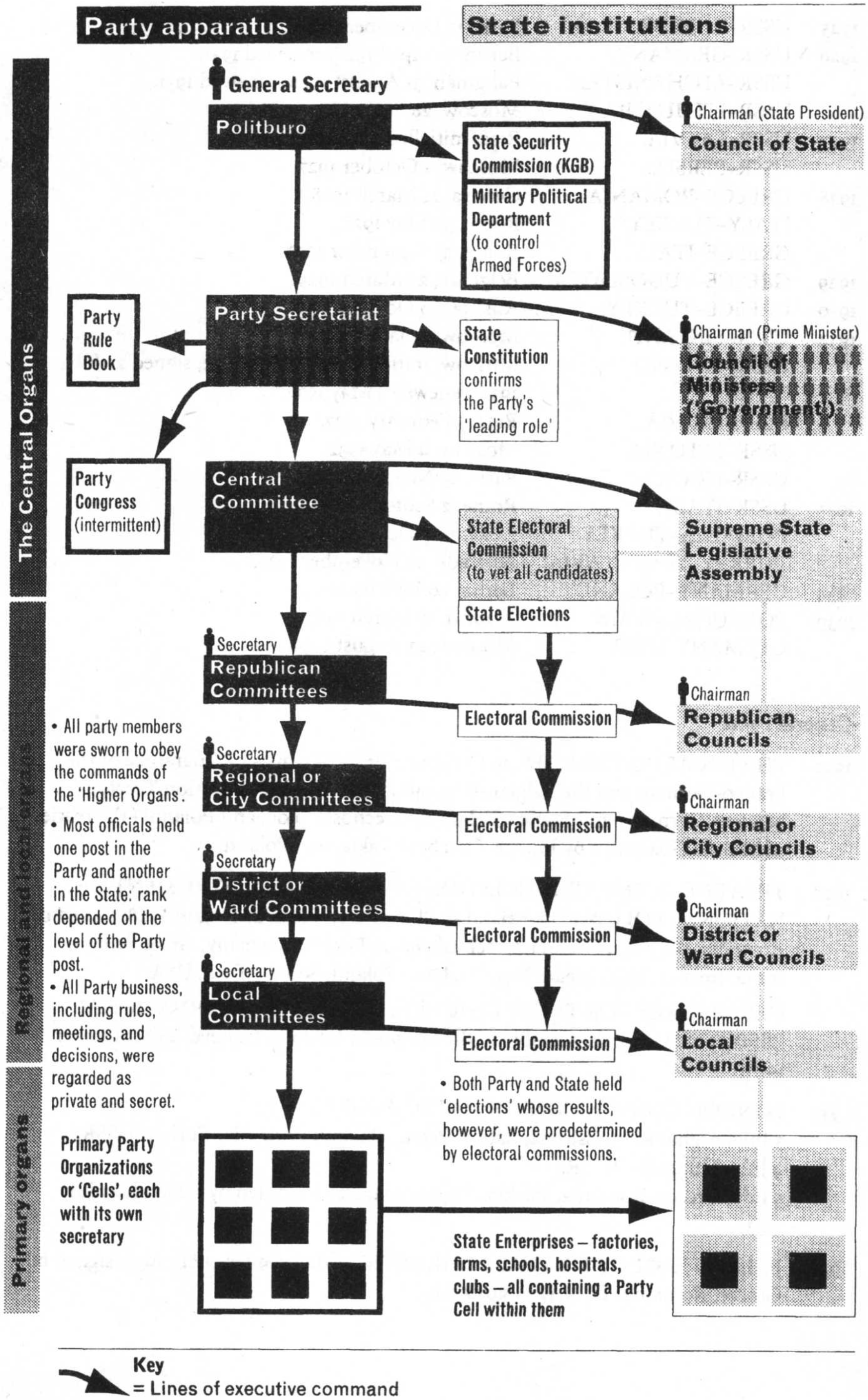
In October 1918, the 'Kingdom of the Serbs' was expanded to form the 'Kingdom of the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 The name of the state was changed in 1931 to the 'Kingdom of Yugoslavia'. Broken up and occupied by its neighbours 1941–4, the country was reconstituted in November 1945 as the 'People's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consisting of Serbia, Croatia, Slovenia, Bosnia and Hercegovina, and Macedonia. There were two autonomous regions within Serbia—Vojvodina and Kosovo. In 1992, the Yugoslav Federation disintegrated once more, leaving Serbia and Montenegro as its only members after all the other ex-Yugoslav republics had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

[1320] **The Dictatorships of Inter-War Europe, 1917–39**

	Duration	Dictator(s)	
Soviet Russia and USSR	25.10.17 o.s [7.11.17]–1991	**Lenin (to 1924) J. V. Stalin 'Vozhd' (to 1953)**	Bolshevik coup d'état, totalitarian, Communist/Party State. Terror.
Hungary	21.3.19–9.1919 1919–44	**Bela Kun** **Admiral Horthy**	Soviet Communist Republic. Terror. Proto-fascist dictatorship. Terror.
Italy	28.10.22–1943	**Benito Mussolini**	Fascist takeove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replaced by 'corporate state'. All opposition parties disbanded, 1926.
Bulgaria	8/9.6.23–1944	**Aleksandr Tsankov**	Military coup d'état: authoritarian regime, dissolution of opposition: from 1934, royal dictatorship of Boris III.
Spain	23.9.23 –20.1.30	**General Miguel Primo de Rivera**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agreement with King Alfonso XIII, military directorate: suspen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urkey	29.10.23–1938	**Gazi Mustaf Kemal Pasha**	Personal dictatorship, one-party national state.
Albania	1.25–1940	**Ahmed Zogu (became king 1928)**	Authoritarian regime, first presidential then royal.
Poland	12.5.26–1939	**Marshal Joseph Pilsudski**	Military coup d'état: left-wing military regime: 'Sanacja' dictatorship, operating behind a parliamentary façade.
Portugal	28.5.26–1975 from 1932	**Manuel de Oliveira A. Salazar**	Authoritarian regime,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constitution suspended.
Yugoslavia	1.29–1941	**King Alexander**	Coup d'état: royal dictatorship.
Lithuania	19.9.29–1940	**Antónas Smetona**	Nationalist one-party state.
Romania	9.6.30–1941	**King Carol II**	Coup d'état, royal dictatorship.
Germany	30.1.33–1945	**Adolph Hitler, 'Führer'**	Nazi electoral success: one party state introduced through 'emergency powers'. Terror.
Austria	3.33–1937	**Engelbert Dollfuss**	Dictatorship by the semi-fascist 'Fatherland Front', rule by emergency decree.
Estonia	12.3.34–1940	**Konstantin Päts**	Authoritarian regime, state of emergency, rule by decree, parliament dissolved.
Latvia	15.5.34–1940	**Karlis Ulmanis**	Authoritarian regime, a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parliament dissolved.
Greece	10.1935–1941	**General J. Kondilis General I. Metaxas**	Authoritarian military-royal regime,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Spain	9.36–1975	**General Francisco Franco, 'Caudillo'**	Military Fascism: totalitarian regime. Terror.

The Dual System of Communist 'Party-States'

[1321]



[1322] Inter-War treaties of Non-Aggression and/or Neutrality, 1925–39

1925	USSR–TURKEY.	Paris, 17 December 1925, renewed 1929, 1931.
1926	USSR–GERMANY.	Berlin, 24 April 1926, renewed 1931.
	USSR–AFGHANISTAN.	Pahgman, 31 August 1926, renewed 1931.
	USSR–LITHUANIA.	Moscow, 28 September 1926.
1927	USSR–LATVIA.	Riga, initialled 9 March 1927.
	USSR–PERSIA.	Moscow, 1 October 1927.
1928	GREECE–ROMANIA.	Geneva, 21 March 1928.
	ITALY–TURKEY.	Rome, 30 May 1928.
	GREECE–ITALY.	Rome, 23 September 1928.
1929	GREECE–YUGOSLAVIA.	Belgrade, 27 March 1929.
1930	GREECE–TURKEY.	Ankara, 30 October 1930.
1932	USSR–FINLAND.	Moscow, 21 January 1932.
	USSR–POLAND.	Moscow, initialled 25 January 1932, signed 25 July 1932, renewed 5 May 1934.
	USSR–LATVIA.	Riga, 5 February 1932.
	USSR–ESTONIA.	Moscow, 4 May 1932.
	USSR–FRANCE.	Paris, 29 November 1932.
1933	USSR–ITALY.	Rome, 2 September 1933.
	ROMANIA–TURKEY.	Ankara, 17 October 1933.
	TURKEY–YUGOSLAVIA.	Belgrade, 27 November 1933.
1934	GERMANY–POLAND.	Berlin, 26 January 1934.
1939	PORTUGAL–SPAIN.	Madrid, 18 March 1939.
	GERMANY–USSR.	Moscow, 23 August 1939.

General Pacts

1925 THE LOCARNO TREATIES, 16 October 1925. (1) Treaties of Guarantee of the Franco-German and the Belgian-German Frontiers. (2) Arbitration Treaties between Germany and France, Belgium, Czechoslovakia, and Poland. (3) Treaties of Mutual Guarantee by France, Czechoslovakia, and Poland.

1928 TREATY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The Briand–Kellogg Pact), Paris, 27 August 1928: signed by Australia, Belgium, Canada, Czechoslovakia,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ndia, Ireland, Italy, Japan, New Zealand, Poland, South Africa, USA.

GENERAL ACT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26 September 1928.

1933 LONDON CONVENTIONS DEFINING AGGRESSION:
3 July, Afghanistan, Estonia, Latvia, Persia, Poland, Romania, Turkey, USSR.
4 July, Lithuania, USSR.
5 July, Greece, Romania, Turkey, Yugoslavia, USSR (joined by Finland, 23 July 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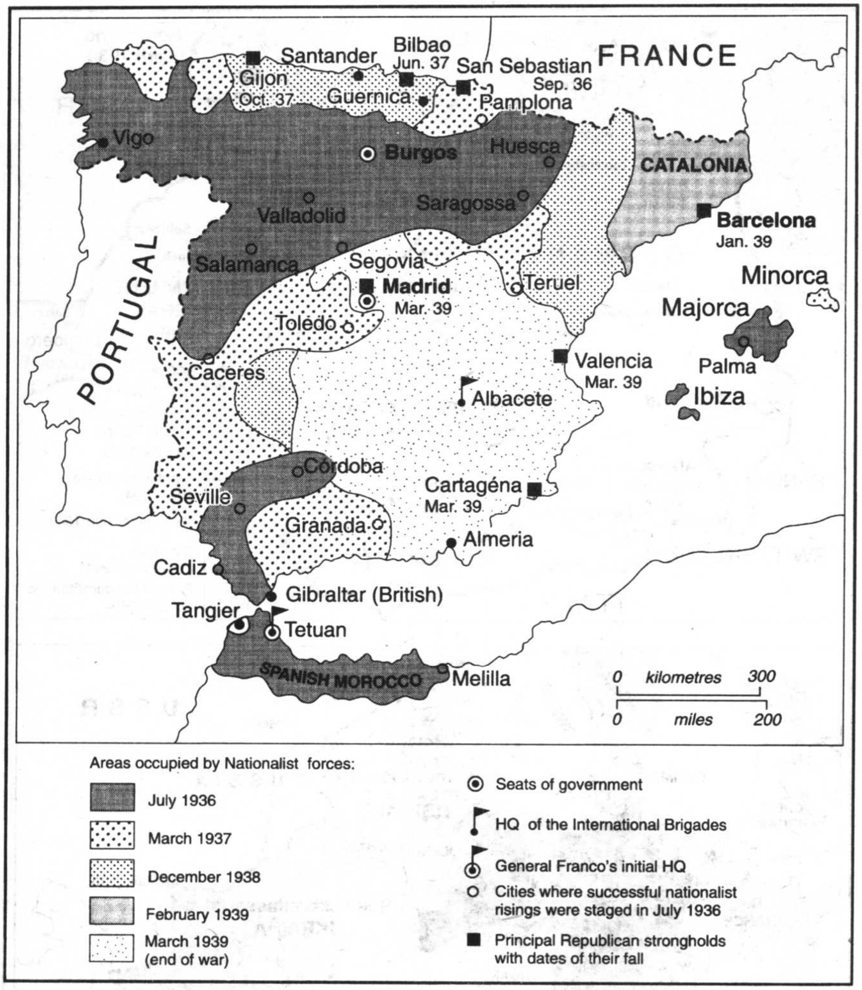
1934 BALKAN PACT OF MUTUAL GUARANTEE, Athens, 9 February 1934: signed by Greece, Romania, Turkey, Yugoslavia.

The Rise of Nazi Power, 1933–43

[1323]



[1324]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39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in Spain, 1936–9

Formed	No.	Name	Battalions	Principal initial composition
Oct. 1936	XI	Hans Beimler (later Thaelmann)	1 Edgar André	German
			2 Commune de Paris (later transferred to IB XIV)	Franco-Belgian
			3 Dombrowsky (transferred to IB XII)	Polish
Nov. 1936	XII	Garibaldi	1 Thaelmann (transferred to IB XI)	German
			2 Garibaldi	Italian
			3 André Marty	Franco-Belgian
Dec. 1936	XIII	–	1 Louise Michel (transferred to IB XIV)	Franco-Belgian
			2 Chapiaer (transferred to IB 129)	Balkan
			3 Henri Vuillemin (transferred to IB XIV)	French
			4 Mickiewicz (Palafox)	
Dec. 1936	XIV	Marseillaise	1 Nine Nations Battalion (transferred to IB XI.2)	
			2 Domingo Germinal	Spanish Anarchist
			3 Henri Barbusse	French
			4 Pierre Brachet	French
Dec. 1937	XV	Lincoln-Washington	1 Dimitrov (transferred to IB 129)	
			2 British	British
			3 Lincoln, Washington	USA
			4 Sixth of February (transferred to IB XIV)	French
June/July 1937	'150'	–	1 Rakosi	Hungarian
			2 – (transferred to IB XIII)	
	'129'	–	1 Masaryk	Czechoslovak
			2 Dajakovich	Bulgarian
			3 Dimitrov	Yugoslav/Albanian
	– (attached to the 86th Brigade)		Col. Morandi Battalion	Mixed

[1326] The Waffen-SS Divisions, 1933–45

Number	Designation	Name	Formation	Recruitment
I	SS-PD	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	1933–	SS Panzer Regt. 1
II	SS-PD	Das Reich (initially Deutschland)	1939	SS Verfügungsgruppe (Special task force)
III	SS-PD	Totenkopf	1939	Totenkopfverbände (KL guards); Politische Bereitschafte (Political Readiness Group)
IV	SS-PgD	Polizei	1939	Militarized Police
V	SS-PD*	Wiking (initially Germania)	1940	Nordland Regt. (Danes and Norwegians); Westland Regt. (Flemings/Dutch; Finnish Battalion)
VI	SS-GbD**	Nord	1941	Kampfgruppe 'Nord'
VII	SS-FGbD**	Prinz Eugen	1942	Balkan Volksdeutsche recruits
VIII	SS-KD	Florian Geyer	1941	SS Totenkopf Reitenstandarte
IX	SS-PD	Hohenstaufen	1942	German conscripts
X	SS-PD	Frundsberg	1943	German conscripts
XI	SS-FPgD*	Nordland	1943	Norwegian and Danish Legions; SS Wiking
XII	SS-PD	Hitlerjugend	1943	17-year-old Hitler Youth volunteers
XIII	WGbD der SS*	Handschar	1943	Bosnian Muslims
XIV	WGD der SS*	Galizien (Ukrainische 1)	1943	West Ukrainians
XV	WGD der SS*	(Lettische No. 1)	1943	Latvian Legion
XVI	SS-PgD	Reichsführer-SS	1943	SS Escort Battalion
XVII	SS-PgD	Götz von Berchlingen	1943	Wehrmacht (France)
XVIII	SS-PgD**	Horst Wessel	1944	Hungarian Volksdeutsche +
XIX	WGD der SS*	(Lettische No. 2)	1944	Latvian Legion
XX	WGD der SS*	(Estnische No. 1)	1943	Estonian Legion
XXI	WGbD der SS*†	Skanderbeg	1944	Albanian Muslims
XXII	FKD der SS**	Maria Theresa	1944	Hungarian Volksdeutsche + Veterans of SS-VIII
XXIII	WGbD der SS*†	Kama (Kroatische No. 2) (disbanded)	1943	Croatians and Bosnian Muslims
XXIII	FPgD der SS*	Niederland/Nederland	1944	Dutch Legion
XXIV	WGbD†	Karstjäger	1943	Karstwehr Security Battalion (Italy)
XXV	WGD der SS*†	Hunyadi (Ungarische No. 1)	1944	Hungarians
XXVI	WGD der SS*†	(Ungarische No. 2)	1944	Hungarians

[1327]

Number	Designation	Name	Formation	Recruitment
XXVII	SS-FGD*†	Langemarck (Vlanderen 1)	1944	Flemish Legion
XXVIII	SS-FGD*†	Wallonien	1944	Walloon Legion
XXIX	SS-FGD*	(Russische No. 1) (disbanded)	1944	Kaminski Brigade; ex-Soviet POWs
XXIX	WGD der SS*†	(Italienische No. 1)	1945	Ex-Italian Army
XXX	WGD der SS*	(Russische No. 2)	1944	Ex-Soviet POWs
XXXI	SS-FPgD**†	Böhmen-Mähren	1944	Bohemia and Moravia
XXXII	SS-FPgD*	30 Januar	1945	Courland
XXXIII	WKD der SS*†	(Ungarische No. 3) (disbanded)	1944	Hungarians
XXXIII	WGD der SS*	Charlemagne (Französische No. 1)	1944	*Légion Volontaire Française*
XXXIV	SS-FGD*†	Landstorm Nederlands	1944	Dutch volunteers
XXXV	SS-GD†	Polizei (No. 2)	1944	(As SS-IV)
XXXVI	WGD der SS	—	1944	Dirlewanger Brigade
XXXVII	SS-FKD†	Lützow	1944	
XXXVIII	SS-GD†	Nibelungen	1945	Bad Tölz Cadet School
XXXIX	GbD der SS†	Andreas Hofer	1945	formation incomplete
XL	SS-FPgD†	Feldherrnhalle	1945	formation incomplete
XLI	WGD der SS*†	Kalevala (Finnische No. 1)	1945	formation incomplete
XLII	SS-D†	Niedersachsen	1945	formation incomplete
XLIII	SS-D†	Reichsmarschall	1945	formation incomplete
XLIV	SS-D†	Wallenstein	1945	formation incomplete
XLV	SS-D†	Waräger	1945	formation incomplete

Miscellaneous SS Units:
† Legion of St George (1940), British volunteers; SS-Fallschirmjäger (SS Parachute Brigade (penal); SS-Panzer Abteilung 'Hermann von Salza'; Begleit Battalion-Reichsführer (SS escort battalion); Wachtbattalion-Adolf Hitler (Führer's bodyguard).

* Units composed mainly of non-German troops.
** Units composed mainly or partly of East European *Volksdeutsch* troops.
† Units always below divisional strength. NB. Designations were prefixed either with 'SS-' (for units fully integrated into all the SS organizations) or with 'der SS' (for non-integrated units).

Abbreviations: SS: Schutzstaffeln; PD: Panzer Division; PgD: Panzergrenadier Division; GbD: Gebirgs (Mountain) Division; KD: Kavallerie (Cavalry) Division; F: Freiwillinge (Volunteer); WGD: Waffen Grenadier Division; WGbD: Waffen Gebirgs Division.

Sources: A. J. Bader, The Waffen-SS at War (London, 1982), app.: 'SS Divisions, 1940–5', 121–2; B. Quarrie, Hitler's Samurai: The Waffen-SS in Action (London, 1983), ch. 2, 'The Growth of the Waffen-SS'; G. H. Stein, The Waffen-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1945 (Ithaca, NY, 1966)

[1328] **Europe's Estimated Death Toll, 1914–45**

1 Military losse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by states, killed in action or dead of wounds) (not including USA)

Allied Powers	
Russian Empire	1 700 000
France	1 357 800
Britain & Empire	908 371
Italy	650 000
Romania	325 706
Serbia	70 000
Belgium	13 716
Portugal	7 222
Greece	5 000
Montenegro	3 000
sub-total	**5 040 815**
Central Powers	
Germany	1 773 700
Austria-Hungary	1 200 000
Turkey	325 000
Bulgaria	87 500
sub-total	**3 386 200**
Total *(estimate)*	**8 427 015**

2 Military loss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states, killed in action or dead of wounds) (*not* including USA)

Allied Powers	
Soviet Union	* 8 – 9 000 000
Yugoslavia	305 000
Britain	264 443
France	213 324
Poland	123 178
Greece	88 300
Belgium	12 000
Czechoslovakia	10 000
Netherlands	7 900
Norway	3 000
Denmark	1 800
sub-total	**10 026 945**
Axis Powers	
Germany	3 500 000
Romania	300 000
Italy	242 232
Hungary	200 000
Finland	82 000
Bulgaria	10 000
sub-total	**4 335 232**
Total (estimate)	**14 362 177**

* This figure includes 3–4 million Soviet POWs killed during Nazi captivity or on repatriation

3 Civilians kille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states)

	minimum	maximum
Allied Powers		
Soviet Union	** 16 000 000	19 000 000
Poland	*** 5 675 000	7 000 000
Yugoslavia	1 200 000	
France	350 000	
Greece	325 000	
Czechoslovakia	215 000	
Netherlands	200 000	
Britain	92 673	
Belgium	76 000	
Norway	7 000	
Denmark	2 000	
Axis Powers		
Germany	780 000	
Hungary	290 000	
Romania	200 000	
Italy	152 941	
Bulgaria	10 000	
Finland	2 000	
Total (estimate)	*27 077 614*	

** This huge number, which is based on post-war demographic shortfalls, not on recorded deaths, conceals several categories listed in Table 5. It is only partly attributable to the German Occupation. It also ignores the breakdown by nationality, never officially disclosed, where the heaviest losses were sustained by Ukrainians, Byelorussians, Russians, Poles, Balts, and Jews.

*** The lower figure does not allow for Polish citizens obliged to adopt Soviet citizenship in 1939.

4 The Holocaust: the genocide of Jews by the Nazis, 1939–45
(by states of origin, minimum and maximum estimates)

	minimum	maximum
Poland	2 350 000	3 000 000
Soviet Union	1 500 000	2 000 000
Germany & Austria	218 000	240 000
Hungary	200 000	300 000
Romania	200 000	300 000
Netherlands	104 000	110 000
Czechoslovakia	90 000	55 000
France	60 000	65 000
Greece	57 000	60 000
Yugoslavia	55 000	60 000
Belgium	25 000	28 000
Italy	8 500	9 500
Luxembourg	2 800	3 000
Norway	700	1 000
Denmark	less than 100	
Totals (estimate)	**4 871 000**	**6 271 500**
average	*c.* **5 571 300**	

[1329]

5 Categories of people killed 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53 (excluding war losses, 193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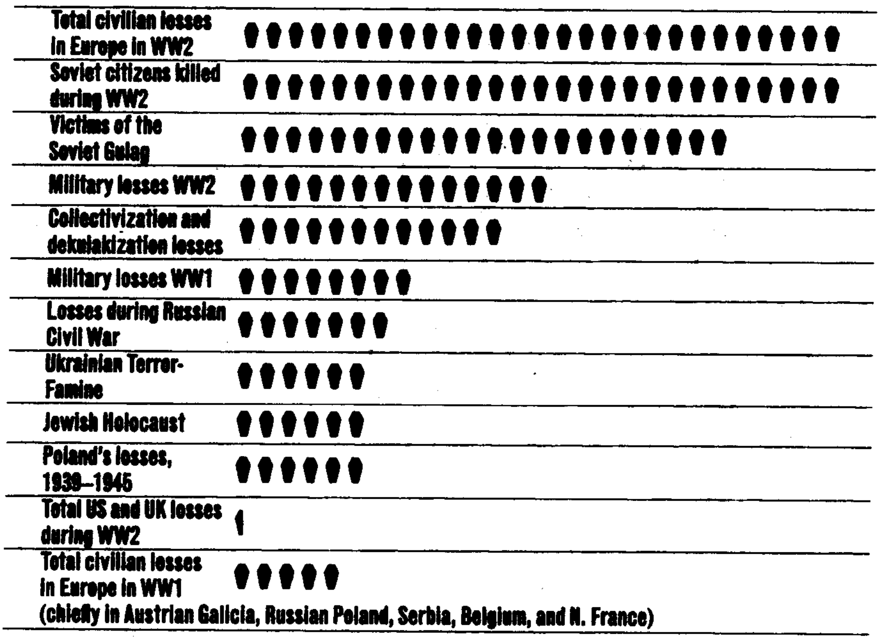
(after R. Medvedev, R. Conquest)

	minimum	maximum
Civil War & Volga Famine, 1918–22	3 000 000	5 000 000
Political repressions in the 1920s	tens of thousands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and 'dekulakization' after 1929	10 000 000	14 000 000
Ukrainian Terror-Famine, 1932–3	6 000 000	7 000 000
Great Terror (1934–9) and Purges	1 000 000	
Deportations to the Gulag, to 1937	10 000 000	
Shootings and random executions, 1937–9	1 000 000	
Deportations from Eastern Poland, Baltic States, and Romania, 1939–1940	2 000 000	
Foreign POWs: Poles, Finns, Germans, Romanians, Japanese	1 000 000	
Deportations to the Gulag, 1939–45	7 000 000	
Deportations of nationalities: Volga Germans, Chechens, Ingush, Crimean Tatars, etc.	1 000 000	
Post-war screening of repatriates and inhabitants of ex-occupied territory	5 000 000	6 000 000
Gross total (median estimate)	*c.*54 million	

NB. Several of these categories overl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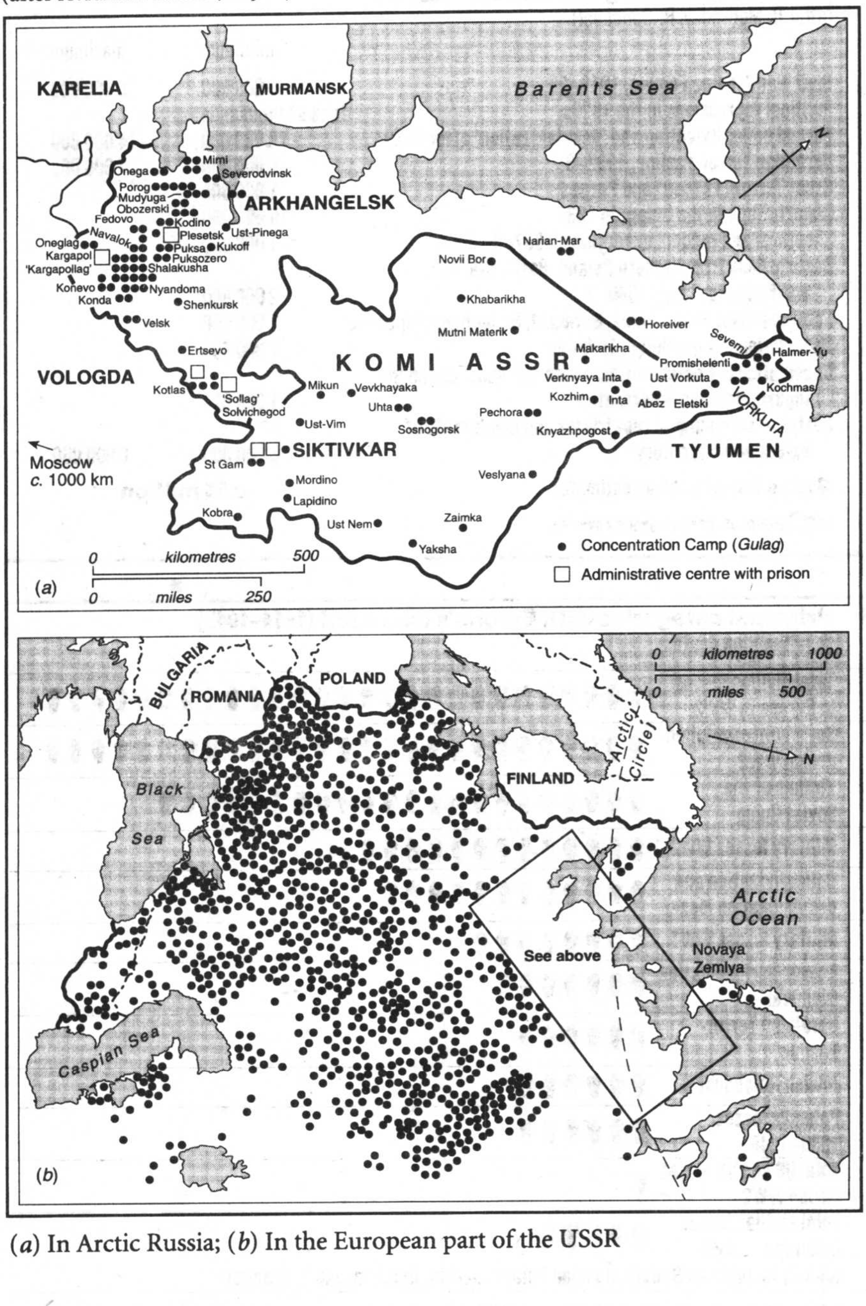
6 Principal categories with Europe's death toll (1914–1945)

⬮ = 1 million deaths



Warning Except for the Military losses during WW1 and the Jewish Holocaust, none of these estimates have been satisfactorily researched or substantiated. They can only be used as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scale of the losses invol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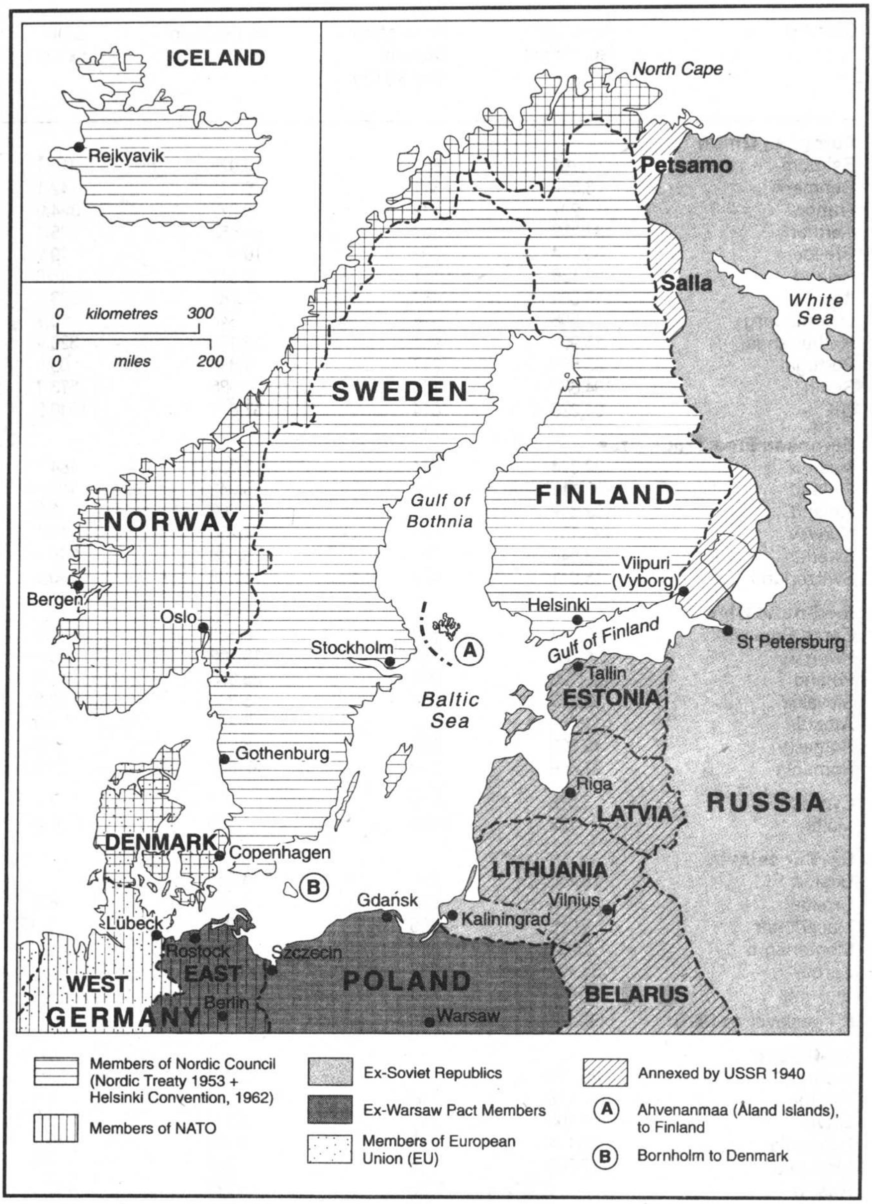
[1330] The Gulag Archipelago: Soviet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KGB prisons
(after Avraham Shifrin, *c.*1980)



(*a*) In Arctic Russia; (*b*) In the European part of the USSR

The Baltic Countries, 1993

[1331]



[1332] Europe, 1992: Assorted Statistics

Country	Territory (sq. miles)	Population Density (per sq.m.)	Population (m.)	GDP ($ bn.)
European Union				
Belgium	11,781	851	10.025	218.7
Denmark	16,629	311	5.17	142.1
France	211,207	272	57.372	1324.9
Germany	137,352	587	80.569	1775.1
Greece	50,944	202	10.3	79.2
Ireland	27,136	131	3.547	48.8
Italy	116,303	497	57.782	1223.6
Luxembourg	908	374	.340	10.4
Netherlands	15,963	951	15.178	320.4
Portugal	35,553	277	9.846	83.9
Spain	194,884	175	34.085	573.7
UK	94,226	614	57.848	1040.5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Austria	32,374	244	7.884	184.7
Finland	130,119	39	5.042	109.6
Iceland	102,819	3	.260	6.6
Norway	125,181	34	4.286	113.1
Sweden	173,648	50	8.678	245.8
Switzerland	15,941	433	6.905	240.5
Ex-Soviet Bloc				
Czech Rep.	30,343	342	10.383	25.3
Hungary	35,969	284	10.202	30.7
Poland	120,725	318	38.365	75.3
Slovakia	18,917	283	5.346	10.2
Albania	11,101	301	3.338	1.0
Bulgaria	42,823	209	8.952	11.9
Romania	91,699	249	22.865	24.9
Cyprus	3,578	200	.715	7.1
Malta	122	2,950	.360	2.6
Ex-Yugoslavia				
Bosnia	19,741	221	4.366	
Croatia	21,824	219	4.784	8.6
Macedonia	9,928	205	2.039	5.06
Montenegro	5,332	120	.639	
Serbia	34,107	287	9.792	
Slovenia	7,817	258	2.017	14.4
(Yugoslavia, to 1991)	(98,766)	(239)		
Ex-USSR				
Belarus'	80,150	129	10.346	32.2
Estonia	17,413	89	1.554	5.9
Latvia	24,500	107	2.617	8.9
Lithuania	25,174	149	3.754	10.1
Moldavia	13,000	335	4.359	9.5
Russia	6.591m.	23	148.920	479.5
(in Europe)	c.1.3m.	92!	120!	
Ukraine	232,046	225	52.1	121.9
EUROPE: TOTAL	3,639,001 sq.m.!	c.190	694.01!	8626.6#
EU	912,886	375	342.062	6841.3
USA	3,618,770	70	252.18	5689.2
Japan	142,811	871	124.45	37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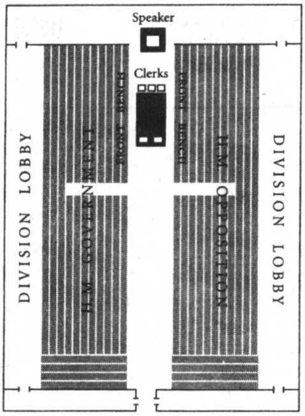
[1333]

GDP ($ per capita)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Higher education (% pupils/population 20–4 aged)	Medical care (people per physician)
21,815	18,170	37	321
27,485	17,768	32	448
23,093	18,665	40	421
22,032	16,310	33	710
7,689	8,417	29	340
13,758	12,427	26	410
21,176	17,521	31	552
30,588	24,771	33	496
21,110	17,023	34	444*
8,521	9,736	18	575
16,831	14,731	34	360
17,987	16,300	25	870
23,427	18,005	33	333
21,737	15,025	47	322
25,385	17,067	25	960
26,388	17,785	43	503
28,324	16,496	33	355
34,830	22,159	28	1,441
2,437	6,923	18	389
3,009	5,297	15	740
1,963	4,081	22	416
1,908	5,224	18	389
229	—	7	2,070
1,329	4,770	31	340
1,089	2,307	9	n.a.
9,930	—	15	754
7,222	—	11	500
			636
1,800			471
2,481			463
			493
7,150	8,098		512
3,110			250
3,830			204
3,410			195
2,710			222
2,170			249
3,220			214
2,340			229
11,933!#			
20,000			
22,560			
29,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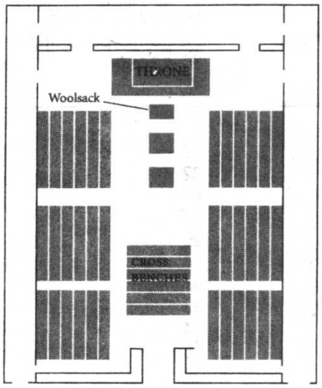
! = estimate # includes the whol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ources: *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December 1993; *IMF IFS*, December 1993; *DOTS 1993 Yearbook*; *World Bank Atlas*,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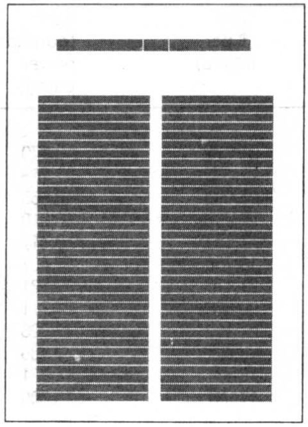
[1334]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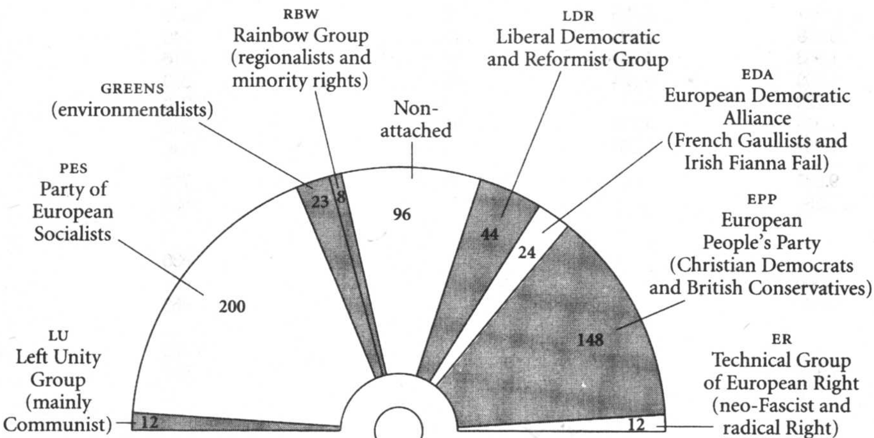
(a)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Westminster)



(b) British House of Lords (Westminster)



(c) Supreme Soviet (Moscow)



Political Group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Strasbourg, 1994) (after N. Nugent)

See also pp. 696–7.

Europe 1995: Membership of F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335]

	C of E[1]	NATO[2]	WEU[3]	EU[4]	CSCE[5]
Founded	1949–50	1949	1954	1957	1975
Function	Co-operation in legal and cultural affairs and human rights	Defence	European Defenc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HQ	Strasbourg	Brussels	Brussels	Brussels	Prague
Total membership (1995)	33	16	10	15	53
Albania	G	PfP			CSCE
Andorra	C of E			STr	
Armenia		PfP			CSCE
Austria	C of E			EU	CSCE
Belarus	G	PfP			CSCE
Belgium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Bosnia	G				
Bulgaria	C of E	PfP	A	A	CSCE
Croatia	G				CSCE
Cyprus	C of E			A	CSCE
Czech Republic	C of E	PfP	A	A	CSCE
Denmark	C of E	NATO	Ob	EU	CSCE
Estonia	C of E		A	A	CSCE
Finland	C of E	PfP	Ob	EU	CSCE
France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Georgia		PfP			CSCE
Germany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Greece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Hungary	C of E	PfP	A	A	CSCE
Iceland	C of E	NATO		EEA	CSCE
Ireland	C of E		Ob	EU	CSCE
Italy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Latvia	G	PfP	A	A	CSCE
Lithuania	C of E	PfP	A	A	CSCE
Luxembourg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Macedonia	G				Ob
Malta	C of E			A	CSCE
Moldova	G	PfP			CSCE
Monaco				STr	CSCE
Netherlands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Norway	C of E	NATO		EEA	CSCE
Poland	C of E	PfP	A	A	CSCE
Portugal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Romania	C of E	PfP	A	A	CSCE
Russia	G	PfP			CSCE
San Marino	C of E			STr	CSCE
Slovakia	C of E	PfP	A	A	CSCE
Slovenia	C of E	PfP		A	CSCE
Spain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Sweden	C of E	PfP	Ob	EU	CSCE
Switzerland	C of E			STr	CSCE
Turkey	C of E	NATO			CSCE
Ukraine	G	PfP			CSCE
United Kingdom	C of E	NATO	WEU	EU	CSCE
Vatican State					CSCE
Yugoslav Federation (Serbia & Montenegro)					Suspended
Canada		NATO			
USA		NATO			

Key
C of E = Full member; A = Associate status; G = Guest member; EEA = Member of European Economic Area only; PfP = Member of Partnership for Peace; Ob = Observer status; STr = Special Treaty status

* *Source*: *Independent*, 5.12.94 [1] Council of Europe (including Court of Human Rights)

[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3] Western European Union

[4] European Union (formerly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European Court

[5]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附录六

重要人物、事件、机构、地点等的索引

（黑体字页数为"概要介绍"中出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欧洲史　下卷
作者=（英）诺曼·戴维斯著
页数=2016
SS号=11849577
DX号=
出版日期=2007.1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